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三卷

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

M. 埃尔·法西主编
I. 赫尔贝克助理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京)新登字 020 号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III

Africa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Eleventh Century

Editor M. El Fasi

Assistant Editor I. Hrbek

Unesco ISBN 92-3-501709-2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责任编辑:张元一
责任校对:禹 杉
索 引:赵儒林

非洲通史 第三卷

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

M. 埃尔·法西主编

I. 赫尔贝克助理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 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振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48 印张 字数 1152(千)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001-0215-1/K・14

定价: 66.00 元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 三 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卷翻译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承担，屠尔康同志主持这一工作，并由陈绂、吴良健、葛佶三位同志参加审订。公司担任本卷译稿审定工作的是张元一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2年7月

目　录

插图目录　xi

图片目录　xv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xix

序言　xx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编写计划说明　xxv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B.A.奥戈特

纪年注释　xxvii

1. 从世界史的范畴看非洲　1

I.赫尔贝克

2. 伊斯兰教的降临和穆斯林帝国的扩张　24

M.埃尔·法西

I.赫尔贝克

3. 伊斯兰教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在非洲的传播　44

M.埃尔·法西

I.赫尔贝克

4. 七世纪以后作为非洲一种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73

Z.德拉马尼－优素福

5. 苏丹地区的各族人民:人口流动　93

F.德－梅德罗斯

6. 讲班图语的各族人民及其扩展　110

S.卢旺加－卢尼伊戈

J.范西纳

7. 埃及——从阿拉伯征服到法蒂玛统治结束(公元1171年)　129

T. 比昂基

8. 基督教努比亚文明的全盛时期 155
S. 贾科别尔斯基

9. 北非遭到征服和柏柏尔人的抵抗 181
H. 莫纳

10. 马格里布的独立 199
M. 塔尔比

11. 南北关系中撒哈拉和撒哈拉居民的作用 224
T. 莱维基

12. 法蒂玛王朝的兴起 254
I. 赫尔贝克

13. 阿尔莫拉维德 272
I. 赫尔贝克
J. 德维斯

14. 西部非洲的贸易与商路 298
J. 德维斯

15. 乍得地区——十字路口 355
D. 兰格
B.W. 巴尔金多合作

16. 几内亚地区：概况 374
瑟斯顿·肖

17. 几内亚地带：喀麦隆山与象牙海岸之间的各族人民 397
B.W. 安达
J.R. 安医达赫合作

18. 上几内亚：象牙海岸与卡萨芒斯河之间的各族人民 433
B.W. 安达

19. 非洲之角 456
特克勒－查迪克·梅库里阿

20. 埃塞俄比亚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470
E. 塞鲁利

21. 东部非洲沿海地带和科摩罗群岛　480
F.T. 马萨奥
H.W. 穆托罗

22. 东部非洲内陆地区　505
C. 埃雷特

23. 中部非洲——赞比西河以北　525
D.W. 菲利普森

24. 南部非洲——赞比西河以南　542
T.N. 赫夫曼

25. 马达加斯加　557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

26. 散居在亚洲的非洲人　575
Y.A. 塔利布
根据F. 埃尔－萨米尔供稿编写

27. 非洲各地区间的相互关系　599
A. 巴思利
克劳德·梅拉苏合作

28. 公元七至十一世纪——非洲形成期的五个世纪　612
J. 德维斯
J. 范西纳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649

作者简历　651

参考文献目录　654

索引　702



插图目录

1.1 旧大陆形势图 15
(公元845年、回历230年前后)
2.1 伊斯兰国土的扩张 38
3.1 到公元1100年，非洲的伊斯兰化地区 46
3.2 到公元1500年，非洲的伊斯兰化地区 47
5.1 11世纪的西部非洲 98
6.1 班图语族的扩张 114
6.2 卢旺达境内鲁伦博遗址出土的早铁器时代陶器(乌雷韦) 119
6.3 卢旺达境内卡布耶地方出土的早铁器时代陶器(乌雷韦) 119
6.4 (a-c) 卢旺达境内布塔雷地区经复原的早铁器时代炼铁炉剖面图 120
7.1 阿拉伯埃及 130
8.1 基督教努比亚 158
8.2 古栋古拉的清真寺建筑 161
8.3 西德贝拉基督教时期遗址的平面图 164
8.4 努比亚寺院组合体维兹堡的平面图 164
8.5 努比亚教堂建筑发展的第二阶段 176
8.6 努比亚教堂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 177
9.1 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 186
11.1 撒哈拉 225
12.1 5/11世纪上半叶的马格里布 259
13.1 阿尔莫拉维德帝国：城镇和遗迹 285
13.2 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时期塞内加尔河沿岸图 288
14.1 跨越撒哈拉沙漠途经的地带：当今的等雨量线图 300
14.2 伊本·豪卡勒描述的商路 304
14.3 法蒂玛征服前夕的金币铸制点 320
14.4 伊德里斯王朝时期西马格里布第纳尔硬币铸造点 321
14.5 公元910年之后穆斯林世界西部的金币铸制点 322
14.6 阿尔莫拉维德金币的铸造坊 326
14.7 巴克里的日程图(西段部分) 331
14.8 伊德里西的日程图(西段部分) 335
14.9 跨撒哈拉贸易沿途遗址(9-11世纪) 338

14.10 西部非洲的产金区域 345
16.1 几内亚地区：本章所涉及的地方 375
16.2 瓦苏遗址的平面图 384
16.3 瓦苏遗址中的两个圈 385
16.4 克巴奇的竖琴石 386
17.1 本章所涉及的城镇和遗址 398
17.2 本章提到的语种、民族和王国 399
17.3 加纳共和国贝戈出土的10至11世纪的彩陶 405
17.4 加纳共和国纳布伊佩出土的7至9世纪的陶器 406
17.5 加纳共和国纳布伊佩出土的7至9世纪的陶器 406
17.6 出土于加纳共和国恩库夸－布奥霍的第二时期的陶器 408
17.7 出土于加纳共和国恩库夸－布奥霍的第一时期金坦波文化的文物 408
17.8 出土于加纳共和国切雷克切雷特的沙伊地方当梅族陶工制作的铁器时代中期陶器 410
18.1 西非主要自然地理区域 434
18.2 西非语系 437
18.3 “曼丁”各族人民和他们的语言 438
18.4 上几内亚地区的人口移动 445
19.1 非洲之角 457
21.1 科摩罗群岛姆罗－代乌阿出土的陶器 488
21.2 科摩罗群岛多莫尼－昂儒昂的古设拉子清真寺 489
22.1 公元7－9世纪左右东部非洲的主要社会群体 507
23.1 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考古文化 527
23.2 中部非洲的考古遗址 528
23.3 桑加出土的陶器和一支象牙镯 532
23.4 从赞比亚东部马克韦石洞出土的卢安瓜传统的陶器 539
23.5 现代伦圭本古传统陶器 540
24.1 公元700－900年间南部非洲以陶器风格划分的一些族群 543
24.2 公元950－1000年间南部非洲的族群及其迁移情况 545
24.3 班图牧牛文化的生活居住布局 548
24.4 按照公元1050年的形式再现的K_2遗址 552
24.5 公元1075年和1150年马庞古布韦形式的再现 553
25.1 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 559
27.1 9－11世纪非洲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600

本书出版者谨在此衷心感谢上述地图和/或插图的提供者。他们是：

B.W. 安达教授

J.R. 安匡达赫教授
A. 巴思利教授
T. 比昂基教授
J. 德维斯教授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女士
C. 埃雷特教授
I. 赫尔贝克教授
T.N. 赫夫曼教授
S. 贾科别尔斯基教授
S. 卢旺加－卢尼伊戈教授
F. 德－麦德伊罗斯教授
D.W. 菲利普森教授
瑟斯顿·肖教授
P. 韦兰教授



图片目录

封面	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
2.1	饰板:麦地那的情景　27
2.2	饰板:麦加的情景　28
2.3	古兰经经页　31
3.1	凯鲁万清真寺内一座雪松雕的宣教台的明细图　54
5.1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清真寺　107
6.1	鲁塔雷的香蕉种植园　117
6.2(*a*)	在卢旺达发现的一个早铁器时代炼铁炉的复原图:尼亚鲁亨盖里Ⅰ　121
6.2(*b*－*d*)	早铁器时代炼铁炉的出土:
(*b*)	卡布耶XXXV　122
(*c*)	尼亚鲁亨盖里Ⅰ　122
(*d*)	吉萨加Ⅵ　122
7.1	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　149
7.2	法蒂玛统治时期的清真寺:清真寺正面11世纪的装饰　149
7.3	开罗旧城法蒂玛时期的坟墓　150
7.4(*a*－*b*)	法蒂玛统治时期埃及的釉绘陶器:
(*a*)	10世纪的罐　151
(*b*)	11世纪的碗　151
7.5	巴卜・奈斯尔——法蒂玛统治时期城墙的城门之一　153
7.6	朱尤希清真寺　154
8.1	古栋古拉的王家建筑　161
8.2	法拉斯大教堂的壁画:公元866－902年期间法拉斯主教基罗斯的肖像　162
8.3	法拉斯大教堂里发现的玻璃高脚杯　167
8.4	法拉斯大教堂的壁画:公元1005－1036年期间法拉斯主教马里亚诺斯的肖像　172
8.5	法拉斯大教堂甬道北端的情景以及该教堂大幅壁画耶稣诞生图,公元1000年　179
9.1	特贝萨城的卡拉卡拉拱门　191
10.1	非斯城全景　208
10.2	非斯城里卡拉维因清真寺的宣礼塔　208
10.3	马拉喀什的库巴・巴拉迪因清真寺:穹顶下的精细装饰　209
10.4(*a*－*b*)	苏斯的隐修所:

(a) 隐修所四周围墙 213
(b) 隐修所内院 213
10.5 凯鲁万附近的大湖——拉卡达湖 220
10.6 科尔多瓦的清真寺西边正面的大门 221
11.1 杰里德地方托泽尔城中建于10世纪的清真寺 253
11.2 姆扎布诸绿洲之一 253
12.1 马赫迪亚半岛鸟瞰 260
13.1 马拉喀什:第一个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宫殿的出土文物 293
13.2(a-b) 阿尔莫拉维德装饰艺术:
(a) 铜门的细部 294
(b) 铜门环 295
13.3(a-b)
(a) 在阿尔及利亚发现的阿尔莫拉维德铸币和冲压模具 297
(b) 阿尔莫拉维德金币 297
14.1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当地制的陶器产品 317
14.2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法蒂玛的玻璃法码 323
14.3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金丝 329
14.4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半截金锭 329
14.5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银链 330
14.6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陶制油灯 342
14.7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进口玻璃高脚杯 342
14.8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赤土陶俑 350
14.9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锻铁天平 353
15.1 在喀麦隆北部胡鲁夫出土的铜制品 360
15.2 在喀麦隆北部胡鲁夫出土的原始人形陶罐 361
15.3 喀麦隆北部的德格斯丘陵 361
16.1(a-h) 从伊格博-乌库遗址挖掘出土的文物:
(a) 微型青铜垂饰头像 390
(b) 青铜垂饰山羊头 390
(c) 装在铜棍上的青铜豹子头骨 390
(d) 青铜悬垂装饰品,形状为一只鸟和两枚蛋,上面的叉形饰物和珠子由铜丝相连 390
(e) 青铜圆柱形碗 391
(f) 青铜带托座碗 391
(g) 青铜贝壳,顶带一只动物 391
(h) 青铜月牙形碗 391
17.1 一位"奥尼"(国王)雕像上的赤陶土头形,出土于伊费的伊塔-耶茂 417

17.2 一座雕像的赤陶土头形,可能是一位王后,出土于伊费的伊塔－耶茂 418
17.3 在伊费的伊费瓦拉路旁发现的一个赤陶土头形 419
17.4(a–f) 伊格博－乌库的出土文物:
(a) 象头形青铜垂饰装饰品 426
(b) 青铜权杖饰头 426
(c) 公羊头形的青铜垂饰装饰品 426
(d) 带套索的青铜壶和青铜祭坛座 427
(e) 球形壶 427
(f) 陶罐 427
19.1 阿尔马国王统治时期的货币 459
19.2 格里马大主教福音书 466
19.3 阿戈仙的特切库斯(圣西里亚克斯)教堂内观 468
21.1 曼达遗址 485
23.1 基萨尔时期早期的墓穴:卡米兰巴遗址 531
23.2 典型的基萨尔时期的墓穴:桑加遗址 533
25.1 香樟树 562
26.1 氏族战斗,取自尼扎米的哈姆萨手稿 583
27.1 马里境内萨赫勒地区的牧民季节性迁移放牧 602
28.1(a–g) 非洲牛的品种:
(a) 南非乳牛群,扎伊尔 616
(b) 卢格韦尔种公牛,扎伊尔 616
(c) 来自卢旺达的公牛 616
(d) 德文牛与南非乳牛杂交的母牛 616
(e) 恩达玛公牛,扎伊尔 617
(f) 弗里斯兰乳牛群,扎伊尔 617
(g) 泽西种母牛,扎伊尔 617
28.2 泥砖砌的房屋建筑:一座圆顶卧室 623
28.3 公元6至10世纪之间在当今尼日尔共和国境内制作的赤土陶俑 625
28.4 赭色泥土制作的赤土陶器女性躯干 626
28.5 陶器碎片覆盖层,出土于伊费的伊塔－耶茂 627
28.6 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金丝珠宝饰品 630
28.7(a–b) 伊格博－乌库:光玉髓垂饰、光玉髓练子和玻璃珠串 631
28.8(a–b) 梯形外衣,出土自特勒姆岩洞 634
(c) 头上包着棉布套的人颅骨,出土自特勒姆岩洞 634
28.9 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纺锤锭盘 635
28.10 在象牙海岸北部发现的靛青染缸 635
28.11 瓦拉塔地方盐的生产:一支载着棒状盐驮的商队 636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M.布雷特博士，〔9.1，11.1〕
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巴黎，〔28.2〕
让·德维斯，〔7.3，14.1，14.5，28.9，28.10〕
穆罕默德·埃尔·法西先生阁下，〔10.1〕
G.赞赫尔瓦里博士，〔7.6〕
弗里尔美术馆，华盛顿，〔7.4(*a*)，7.4(*b*)〕
B.加多，〔28.3〕
阿谢特（阿尔贝·舒凯），〔7.5〕
A.霍尔，〔15.1，15.2，15.3〕
IMRS，努瓦克肖特，〔5.1，14.2，14.3，14.6，14.7，14.9，28.4〕
热拉尔·詹森，〔28.8(*b*)，28.8(*c*)〕
P.德－马雷，〔23.1，23.2〕
克劳德·梅拉苏，〔27.1〕
阿尔及利亚文化旅游部，〔13.3(*a*)〕
埃塞俄比亚文化部，〔19.1，19.2，19.3〕
摩洛哥文化部提供封面照片，〔10.2〕
皇帝中部非洲博物馆，〔28.1(*a*)－(*g*)〕
自然史博物馆，巴黎，〔25.1〕
贝尔纳·南塔特，〔3.1，13.3(*b*)，14.4，14.8，28.6，28.11〕
国家博物馆和纪念馆委员会，拉各斯，〔16.1(*a*)－(*h*)〕
突尼斯国家考古和艺术研究所，〔10.4(*a*)，10.4(*b*)，10.5〕
突尼斯地志和地图署，〔12.1〕
波兰科学院地中海考古研究中心，华沙，〔8.1，8.2，8.3，8.4，8.5〕
卢浮宫留尼汪馆，〔2.1，2.2〕
瑟斯顿·肖，〔17.4(*a*)－(*f*)，28.7(*a*)，28.7(*b*)〕
F.斯特林，〔28.8(*a*)〕
H.泰拉斯，〔13.1〕
托普卡皮·萨雷博物馆（赖哈·古奈），〔26.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1(A.哈利勒)，13.2(*a*)－(*b*)（多米尼克·罗歇）〕
希拉·昂温，〔21.1〕
M.C.范－格伦德贝克，E.罗奇，H.杜特勒蓬，〔6.2(*b*)－(*d*)〕

M.C.范－格伦德贝克，E.罗奇，H.杜特勒蓬，D.克拉多克，〔6.2(a)〕

F.范－诺顿，〔6.1〕

沃纳・福尔曼档案馆，〔2.3, 10.6, 11.2〕

弗兰克・威利特，〔17.1, 17.2, 17.3, 28.5〕

1 从世界史的范畴看非洲

I. 赫尔贝克

如果有一位其他星球的来访者在公元7世纪初曾看到过旧大陆，而在五个世纪之后，在公元1100年左右再次来访，他会很容易地得出结论说，世界正在成为穆斯林的天下。 1

在他第一次来访时，先知穆罕默德正在浩瀚无垠的阿拉伯沙漠中小小的麦加城传播着伊斯兰新的宗教体系。在他的周围，为了生存而与他们的同胞中不断增长的敌意进行斗争的人，充其量不过百把人。但是五个世纪之后，这种教义的信徒所居的地区，却从西面的埃布罗河、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沿岸，伸展到东面的锡尔河和印度河沿岸，从欧亚大陆心脏底部的伏尔加河延伸到非洲东海岸。

在这些地区的各个中心部位，穆斯林教徒构成人口的大多数。而在某些边缘地区，他们则是统治者或商人，因此他们把伊斯兰的边界一步又一步地向前推进。虽然当时伊斯兰世界已经失去了它昔日的政治统一而分裂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国家，而且甚至失去了它的某些领土（诸如西班牙北部，西西里，在本卷所述的后期，还失去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一小块领土），但它仍然代表着一种相当一致的文化和文明，其创造力还远未衰竭。

与此同时，伊斯兰已不再是一种仅仅专属于阿拉伯人的宗教；新教义显示出能争取和同化各式各样极不相同的族群，把他们融合在一个单一的文化和宗教社会之中。伊斯兰出生于阳光灼热的阿拉伯半岛，而后来却能适应于世界上许多不同的区域和各式各样的人民，诸如波斯、埃及和西班牙的农民，柏柏尔人、索马里人和突厥人的游牧民，阿富汗和库尔德的山区部落，印度的贱民，索宁克的商贩和加奈姆的统治者。其中的许多人转而成为伊斯兰的勇猛战士，他们从阿拉伯人手中接过了火炬，向新的方向扩展他们的信仰。

毫无疑问，如此巨大的成就肯定会给我们这位假设的其他星球来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把公元7世纪到11世纪——甚至更晚的这段时期称作"伊斯兰时期"。这种称呼并不意味着穆斯林统治了整个世界，也不是说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以外发挥了决定性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必须从它和其他文化区域的关系来理解，并且意识到当时伊斯兰世界是最有生气的，它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内是最进步的。当然，这样也许会错误地引向忽视其他区域正在发生的变化，或者低估与此同时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其他人的成就，因为那里已经存在着后来演变的萌芽，这对世界的命运并不是没有影响的。 2

伊斯兰文明的兴起

阿拉伯人的征服，在许多方面与所有世界上著名的征服雷同，但也在另外许多方面与之有所不同。第一，阿拉伯人虽然受到一种宗教教义的激励，但原则上他们并不期望被征服的人民进入他们的宗教社会；他们允许被征服的人民保留自己原来的宗教忠诚。但是过不了几代人之后，绝大部分的城市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即使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也倾向于使用阿拉伯语作为文化的共同的交流媒介。阿拉伯帝国的征服由一支游牧民的武装力量进行，但是这支军队却由城市商人领导，他们早已熟悉了那些被征服领土的文化。阿拉伯人建立的帝国与其他游牧民帝国不同的是：它能保持一个整体并持久不衰。让我们和蒙古人作个比较，阿拉伯人不采用当地的语言和宗教体系，而是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强加于被他们征服的各族。

公元7至8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产生了两个重大而持久性的成果。比较立竿见影和引人注目的是在地中海流域和近东创建了新的世界性国家。第二个成果虽不如前者迅速和激动人心，但也同样地重要，这就是在上述国家中发展了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

阿拉伯的世界性国家是用一种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创建的一种帝国体系。在他们登上世界舞台的一个世纪内，阿拉伯人就独霸了从法国边境的比利牛斯山脉到中亚的帕米尔高原，西班牙，北非，埃及，托罗斯山脉以南的前拜占廷领土以及东面的波斯帝国都被熔接在一个帝国的领域之内，可与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相匹敌。

阿拉伯征服者们把臣服于他们的土地掌管在一起达一个多一点世纪。到公元8世纪 3 中叶以后，不同的地区开始分裂，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们开始起来维护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在帝国西部，西班牙、北非，后来又加上埃及，逐渐取得独立而走它们自己的道路。在帝国东部，则出现了各种波斯血统和突厥人血统（文化上波斯化）的王朝，直到他们在哈里发统治的东部地区成为主人。等到公元11世纪末，原来的阿拉伯帝国早已不复存在了，它变成了令人难解的一大串零星小国、地区性政权、和相互竞争的王朝，几乎没有起源于阿拉伯的。

于是最初的征服者们建立的阿拉伯帝国转化成为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它是一个世界而非一个帝国，是一个由许多单个的而且常常是互相敌对的国家组成的政治领域，但也意识到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共同的特征。它是穆斯林，而不独是阿拉伯，它是基于共同的宗教而不是基于种族的纽带。

来自阿拉伯征服的第二个长远的结果，是在这一穆斯林环境内创建了一种新的世界文化。阿拉伯征服者们同时使用他们的新信仰——伊斯兰教和他们的军事威力来建立一个帝国，但是他们从沙漠故乡带来的文化未免太单纯简单了。与被征服国家中发现的丰富的、古典的、希腊风格的或波斯的传统相比，阿拉伯的文化贡献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其重要性，但实在是太有限了。除宗教之外，他们把他们的语言用作行政管理、文学和科学的主要工具，还用作他们的诗歌和审美的价值准则。

作为穆斯林鼎盛时期特征的独特和丰富的文明是由所有接受伊斯兰的人民或处于其

影响下的人民的各种不同的传统混合而成的。它不仅继承了近东和地中海世界的物质和知识成就，而且还利用和吸收了许多起源于印度和中国的成分，并将其发扬光大。

把穆斯林文明仅仅看作是一种简单地把借来的文化商品的零头碎片捏合在一起的东西，肯定是错误的。当初，确实有许多特征未加改造地被直接挪用了。但这些特征逐渐结合、扩充、发展成为新的模式，起着穆斯林科学、艺术表现和技术革新的创造力的源泉和推动其前进的双重作用。以上述方式涌现的穆斯林文明具有它自己独特的模式，符合于新的普遍的精神和新的社会秩序。

地理和经济因素

上述文明之所以能兴旺发达，是由于一系列有利的、辩证地连结在一起的因素造成的。穆斯林帝国建立在具有最古老的世界文明的地区，阿拉伯人征服这里时发现该地区有悠久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经济的传统。他们非常迅速地抓住这个机会，除了定居在原有的古老城市外，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城镇。正是穆斯林世界和穆斯林文明的这种城市特征，深深地刻划出它与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西方的差别。在穆斯林帝国中存在着许多人口众多的城市，这对整个帝国的经济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帝国和旧大陆其他地方的商业关系更是如此。在穆斯林的核心地带可以发现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最重要的中心，而与此同时的西欧，却提供了一幅截然相反的疏疏落落的乡间社会景象，在那里只有极少的商业和智力活动。因此，当时穆斯林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倾向与同一时期欧洲历史的特点是恰恰相反的。 **4**

如此众多的国家被兼并在穆斯林帝国之内，为贸易活动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使其发展的规模达到了在该地区政治上处于分裂时所无法达到的程度。从公元7世纪晚期到12世纪末，穆斯林帝国起着一种类似自由贸易区的作用。世界上一个地方生产的商品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成为也可以买到的东西，因而就使居住在广阔领土上的众多形形色色的人口中间，出现了一种消费品上的一致性。穆斯林世界地处东西方的中途，它还起着在帝国范围以外的人民中间传播技术新发明的作用。穆斯林世界各个地区之间与其边界以外地区的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刺激了一个地方为其他地方的市场生产商品的活动。同时也促进了应用技术和理论技术的提高，例如在航海术以及与其关联的造船业、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同样也在商业和金融业方面。

公元8世纪即已开始的经济繁荣持续了数世纪之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贵金属流向近东的中心地带所造成的。公元7世纪末，伍麦叶王朝开始首次铸造金第纳尔，它主要流通于原来的拜占廷各省。穆斯林世界东部曾长时间保持着银币区的传统。公元9世纪黄金供应的增加导致了穆斯林帝国货币制度的变化：自古以来只有银币流通的那些国家转向金银两本位制，哈里发统治的东部各地的所有造币厂也都开始铸造金第纳尔了。穆斯林世界西部的形势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马格里布和穆斯林西班牙停留在白银货币范围里的时间很久，主要原因是缺乏容易发掘的金矿。这种状况直到公元10世纪从西非的西苏丹进口黄金的日益增加才开始改变，到铸造阿尔莫拉维德第纳尔时这种变 **5**

化达到了顶峰，该币得到了国际的承认。① 大量发行精致的金币和银币，给穆斯林各国的经济生活带来了许多后果。人们对各种货物消费的增长刺激了生产，但同时物价也急剧地上升了。

作为一个地区，穆斯林帝国也受惠于处在旧大陆心脏正中地位这一地理位置。由于统治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两大海域之间的地峡，因此穆斯林在长途贸易中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穆斯林世界的实际范围是从大西洋沿岸直到中国边界，这一事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它是几大文化区中唯一与其他各大文化区都能直接接触的一个，——与拜占廷、西欧、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使它可以与广大的边远地区以及新涌现的各族人民进行接触——在欧亚大陆的冲积平原，在中亚细亚，在撒哈拉沙漠另一方的苏丹－萨赫勒地区，在东南亚。上述地区是第一次征服浪潮之后伊斯兰进一步扩展所及之处，基本上是沿着主要的长途贸易通道而发展。既是沿着伟大的大陆通道，即经过草原、沙漠和绿洲，从中亚到西非的通道；同时也沿着导向印度洋沿岸各国至东亚的海上航线。

穆斯林世界所处的正中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在旧大陆所有其他地区之间起一种中间媒介和沟通的作用。与通过陆地和海洋通道运来贸易商品的同时，也传来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观念，以及科学技术新发明。其中一部分只为穆斯林民众所接受，而更多的则是传往更远的邻接地区。文化上和物质上引进的实际路线和年代，在许多情况下是不清楚的。但是，毫无疑问它们是经过传播而来的。例如，纸就是一种重要产品从老远的中国经过穆斯林地带传到了欧洲。它本来是中国的一项发明，是公元751年被押往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们介绍到穆斯林帝国的。这些中国的造纸者们把造纸的技术教给了穆斯林们，于是撒马尔罕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境外的有造纸工业的地方。造纸工业又从这里传播到巴格达，接着到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埃及，而最后在公元9世纪传到了摩洛哥，在公元10世纪上半叶传到了穆斯林西班牙。在这里，哈蒂瓦城（阿拉伯语称为沙提巴）就成了造纸工业的主要中心。接着，造纸技术又从这里在公元12世纪时传到了加泰罗尼亚，这是第一个生产纸张的欧洲国家。我想，这里没有必要再强调传播这一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深远影响。

6 同样地，数学中的位置记数法是印度人的一项发明，即所谓的阿拉伯数字，最早在公元8世纪为穆斯林所采用，他们称之为印度数字，在公元9世纪末到公元10世纪中叶之间，西方世界开始知道了这套体系。穆斯林对位置记数法的采用使得数学的一个分支——代数学有了发展的可能，而代数学在那个时候以前还未成为任何严肃地系统地研究的对象。代数学后来却成为数学的基础，没有它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近代分支学科就不可能产生。

伊斯兰世界与非洲

让我们转向处在穆斯林世界及其文明范畴内的非洲和非洲各族人民。首先让我们考

① 参阅C.卡亨（C. Cahen），1981年。

察一下非洲大陆因征服活动第一次浪潮的结果而变成穆斯林帝国整体一部分的地方，即埃及和北非；然后再让我们注意那些虽然从未在政治上被当时任何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兼并过，但在不同方式上受到伊斯兰教或穆斯林人民影响的地区。

公元7世纪至11世纪末期间，伊斯兰埃及提供了一幅演变的迷人图景。它从哈里发帝国的一个重要而又地处边缘的行省变成了新的强盛的法蒂玛帝国的中心；从仅仅是一个粮仓变成了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最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从在穆斯林知识活动领域中的一个穷亲戚变成了阿拉伯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中心。和非洲其他部分的关系方面，埃及起着多方面的作用。它既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对马格里布进行征服的起点，同时又是公元11世纪希拉尔侵略的起点。前者导致北非的伊斯兰化，后者则使其阿拉伯化。阿拉伯贝都印人是从埃及开始他们的南进活动的，他们逐渐渗入努比亚，从而为该处各基督教王国的最终覆灭和尼罗特苏丹的阿拉伯化铺平了道路。虽然埃及在这段时间里失去了它的基督教特征，并且居民中的大多数人改信了伊斯兰教，但是亚历山大大主教管区的主教仍然保有对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基督一性论派教会的控制权，这种教会常常成为埃及在这些国家中的政治工具。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埃及是许多黑非洲奴隶的最终目的地，他们是由努比亚（根据著名的巴克特条约）、埃塞俄比亚、中苏丹和西苏丹输人的。在这些不幸的活人商品中有一个奴隶叫卡富尔的，他终于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其他成千奴隶在军队中服役，对本国的政治施加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的奴隶则处于各种不同的卑下的奴仆地位。 7

虽然埃及作为维护伊斯兰教、反对欧洲十字军和蒙古侵略者旗手的显著作用还是后来的事（公元12世纪和公元13世纪），但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在此之前几个世纪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巩固所致。

在马格里布，前来征服的阿拉伯人遇到了柏柏尔人顽强的抵抗，直到公元7世纪末主要的地区才被征服。接着柏柏尔人的大多数接受了伊斯兰教，虽然他们憎恨阿拉伯人的政治统治，但伊斯兰教信仰却在他们中得到了新的精力饱满的信徒，这些人协助把伊斯兰教扩展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对岸，而且越过了撒哈拉沙漠。以柏柏尔战士为主体的穆斯林军队为伍麦叶王朝征服了西班牙，以柏柏尔战士为主体的阿格拉布王朝的部队从拜占廷手中夺得了西西里；以柏柏尔战士为主体的法蒂玛王朝的部队则在埃及和叙利亚赢得了辉煌的战役。

北非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穆斯林世界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就是从马格里布开始了对西班牙和西西里的征服，从而对地中海西部和欧洲的历史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这里构成了重要的连系纽带，使不同的文明能够相互接触，同时不同的影响得以相互交流。穆斯林的统治又将马格里布引进到一个广阔的世界范围的经济领域，它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段时期里，它经历了包括大规模城市化在内的人口增长和新的经济和商业的繁荣。

从宗教的角度看，柏柏尔人所起的作用有着双重的意义。首先，他们的民主和平等的传统使他们很早就接受了那些鼓吹这类倾向的伊斯兰教派的教义。即使柏柏尔的哈列

哲教义经过数世纪的繁荣而遭到摧毁，只继续存在于少数几个社区之中，但是改革的和大众的精神仍然是马格里布伊斯兰教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精神在阿尔莫拉维德人和阿尔莫哈德人的伟大运动中显示了出来，并且也显示于苏非兄弟会的扩展中。

柏柏尔人的第二个重要作用——不论从伊斯兰还是从非洲的角度来看——是把伊斯兰引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柏柏尔商贩们的商队穿过大沙漠来到较为富饶的萨赫勒和苏丹地区，他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的产品，而且还有新的宗教和文化观念，这首先在商人阶级中，后来又在非洲统治者们的宫廷中得到了反响。② 苏丹地带伊斯兰化的第二次浪潮是在公元 11 世纪时随着阿尔漠拉维德王朝的崛起而到来的，这是一次真正的柏柏尔宗教运动。柏柏尔伊斯兰的特征和它的改革精神在苏丹地区从未消亡，到公元 19 世
8 纪圣战时期变得最为突出。

撒哈拉和苏丹地区的开放使北非在穆斯林世界的经济中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当苏丹地区的黄金开始以越来越多的数量不断地流向地中海沿岸时，它所引起的经济繁荣使得穆斯林世界西部许多王朝的货币都得以由银币改成了金币。撒哈拉盐矿的开采和日益加紧的发展用来满足撒哈拉以南非洲对这种不可或缺的矿产越来越大的需要。新近出现的一种权威意见认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了许多世纪之久的贸易，可能是穆斯林对外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部分。③

西非的苏丹地区是未被阿拉伯人或其他穆斯林征服的非洲地区之一，因此从未成为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仍感到一种不断增加的穆斯林世界的影响，通过商业和文化的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它已被纳人其经济结构。东非沿岸也是类似的情况，只是有某些重要的偏向。

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和波斯的商人为了做生意，曾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在伊斯兰教兴起并建立伊斯兰帝国之后，印度洋上出现了一个由穆斯林（绝大部分是阿拉伯和波斯人）控制的庞大的商业网，它从波斯湾/阿拉伯湾，④ 后来又从红海伸向印度、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南方，并包括东非沿岸、科摩罗群岛和部分马达加斯加。凡属这个网内的沿海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整个印度洋地区总的经济形势，尤其是靠那些穆斯林国家而繁荣兴旺的。由于上述经济在本章所述时期得到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法蒂玛王朝开始和印度洋发展贸易关系以来，东非沿岸的居民点出口黄金、铁、皮革和其他商品、在整个商业网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沿海城市在上述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利益方而得到了好处，而且，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也间接地为斯瓦希里文化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的繁荣发达作出了贡献。

伊斯兰势力的迅速扩张无疑地给埃塞俄比亚的经济生活以重大的破坏，因为它通往红海的出海口被切断了，它与毗邻地区的贸易也被垄断了。这种影响也可在政治领域中感觉到。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分裂了，它的中央权威被削弱达两个多世纪之久。穆斯林称
9 霸沿海地区的另一结果是使埃塞俄比亚国家的中心向南转移，并朝此方向进行更有力的

② 有关伊斯兰传播的进一步情况，请阅后文第 3 章。

③ E. 阿什托尔（E. Ashtor），1976 年，第 100－102 页。

④ 其正式名称是“波斯湾”。

扩张。这些南方地区转而成为从公元9世纪开始的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国家复兴的核心。从公元10世纪起，伊斯兰教对埃塞俄比亚内地的渗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种渗透来自达赫拉克群岛和宰莱的穆斯林商人，在今日埃塞俄比亚南部为首批穆斯林国家奠定了基础。由于各种因素的结合，形成了后来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统治埃塞俄比亚地区而长期相互斗争的局面。

如果人们试图总结一下伊斯兰帝国的兴起在上述五个世纪中对非洲所起的作用的话，其结论如下：

(1) 非洲大陆面向地中海的部分，从苏伊士地峡到直布罗陀海峡及其毗邻的大西洋沿岸，被纳入伊斯兰世界，从此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块土地永远不再是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成为穆斯林一方面向西班牙和西西里，而另方面又向撒哈拉和西非西苏丹进一步扩张的出发点。

(2) 在东北非，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遭到削弱，虽然这两个基督教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被征服过。努比亚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为穆斯林埃及所控制，而且开始遭到阿拉伯游牧民的渗透，最终丧失了它的基督教特征。埃塞俄比亚则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单位生存了下来，虽然它必须调整其外部关系以适应包围它的各种穆斯林势力日益强大的局面。

(3) 撒哈拉以及苏丹地区的大部分通过贸易网与伊斯兰经济领域连接在一起，它们的主要出口物（黄金和奴隶）发挥着不断增长的重要作用。伊斯兰的宗教和文化影响沿着贸易商道渗透了进来，逐渐渗入非洲人的生活方式之中。

(4) 在东非，由穆斯林控制的国际贸易所起的作用与之雷同，重要的区别在于穆斯林商人把他们的活动仅限于沿海居民区，伊斯兰的影响未能渗透到内地去。但是穆斯林各国和印度对津巴布韦黄金不断增长的需求，看来也已在赞比西地区引起一些变化。马达加斯加某些部分和科摩罗群岛也成了印度洋大商业网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伊斯兰时代最初的五个世纪中，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方曾经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新的伊斯兰帝国的影响。在有些地区，这有助于打破它们以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 **10** 局面，与外界的接触提供了文化交流和引进的可能性。某些西非国家和东非沿岸城镇的统治阶级接受伊斯兰的结果，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与穆斯林世界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在西非，那些在伊斯兰教传入前就存在的国家，它们进一步扩张成大帝国之举，看来基本上是对发展与北非贸易的一种反应。⑤

穆斯林世界与热带非洲的接触也同样重要。在某种意义上，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这些地区当时情况的记载成了不可缺少的珍贵原始资料。⑥如果没有这些材料，我们今天就会对非洲各族人民在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所知甚少或是一无所知，这一点在全面评价穆斯林世界和非洲的相互影响时必须牢记不忘。

---

⑤ J. D. 费奇（John D. Fage），1964年，第32页。
⑥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Ⅰ卷第5章对这些材料的评价。

过渡时期的非洲与中世纪欧洲

当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向远方阿拉伯传播他新教义的时候，欧亚大陆主体的西部半岛——即人们称作“欧洲”的部分，分成三个区域，它们在总的发展阶段上有着鲜明的区别。这三个区域是：拜占廷帝国；目前受日耳曼各族统治的西部欧洲原先的罗马诸省；和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居住的地方，其中许多人仍在向他们更为永久的家园迁移。

拜占廷帝国

只有拜占廷帝国可以宣称继续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统，它拥有一个行政效力高的发达的国家组织，有繁荣的货币经济和在众多领域里的高级文化活动。帝国在经历了第一次民族大迁徙的动乱之后存在了下来，并能于公元6世纪在查士丁尼领导下夺回和重建了对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又一次使地中海成为拜占廷湖。拜占廷人试图从帝国最少受民族迁徙影响的亚洲各省和埃及重开通向东方的贸易商道，包括陆路（到中国的丝绸之路）和海路（通过红海到印度）。但是这些企图都被这一地区的另一个大国萨珊王朝的波斯帝国所破坏，后者统治着除叙利亚边缘的肥沃新月地带以外全部伊朗民族核心地区。上述两个帝国之间的斗争从公元6世纪中叶起一直继续到公元7世纪最初三分之一的年月。霸权在拜占廷人和波斯人之间换来换去，虽然后者最终占了上风。

这种频繁的战斗劳民伤财，使双方在财政上和军事上都衰弱不堪，以致不久就达到了两者都难以抵挡新兴穆斯林阿拉伯人富有活力的袭击的程度。这种袭击招致了萨珊帝国的永远消失，而拜占廷则失去了一些它最有价值的省份：在阿拉伯人征服的第一次浪潮中失去了叙利亚和埃及，在公元7世纪后期失去了整个北非。

整个公元9世纪和10世纪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的战斗降格成为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北部的边境冲突，对双方的力量平衡没有引起多大的变化。甚至在东部的哈里发帝国处于政治上分裂而拜占廷帝国得以收复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时，实力对比也未发生多大的变化。

阿拉伯人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衰竭了，从而被塞尔柱突厥人所取代，后者恢复了穆斯林在小亚细亚的进军，在公元11世纪末，明确地占领了该处的大部分土地。这种新的穆斯林进攻是构成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原因。

在与非洲的关系方面，拜占廷帝国在公元7世纪已不再起任何重要的作用。埃及很快就丧失了，想从海上收复它的企图均未成功，北非的某些沿海地区直到公元7世纪末仍在拜占廷手中，其所以推迟把他们赶走的原因，是阿拉伯人之间的内战使他们的进攻停顿了数十年之久。拜占廷人的东正教同教会在非洲各省从来未曾强大过，因为埃及人顽固地坚持他们基督一性论的信条，而北非的城市人口则依附罗马天主教教会。不论东

正教在前几个世纪有多大影响，经过穆斯林的征服这种影响便永远丧失了。尽管努比亚从来不是拜占廷帝国的一部分，但拜占廷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却保持得比别处强大，即使在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之后，尤其是在努比亚三个基督教国家的中心马库里亚，它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接受了东正教（梅尔凯特）的教义，其行政当局以拜占廷的官僚机构为依据，其上层阶级穿着拜占廷服饰并且讲希腊语。但是，它与拜占廷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也逐渐削弱，到公元7世纪末马库里亚的国王把基督一性论教义引入他的国家。这时马库里亚已和北方的诺巴迪亚合并。⑦这个变化导致了加强同科普特埃及的联系，同样也 12 部分地加强了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联系。努比亚的基督徒在那里和他们基督一性论教派的同宗接触中得到了更多的启示。

当拜占廷与波斯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它很愿意和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结盟，虽然后者是基督一性论者。阿拉伯人的扩张切断了拜占廷与红海的联系以及与印度的贸易，从而使得上述联盟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由于基督一性论基督教越来越成为埃塞俄比亚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它敌视伊斯兰，也敌视基督教的其他任何派别。它发展起自身独创的特性，不论在神学或者艺术与文学方面的表现上，均无丝毫参照拜占廷模式之处。

西部欧洲

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原来古罗马帝国的西部诸省（即人们一般称作“西部欧洲”的地方），在本章所述阶段的前夕，我们遇到的是一种与拜占廷完全不同的形势。自莱茵河以西到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整个地区，包括不列颠诸岛的部分地区，在公元4世纪到7世纪之间，成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场所。

这种迁徙使西部欧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城市生活衰落了，社会生活仅局限于狭小的群体之中。西部欧洲已不成为一种城市文明，变成了一种只保留着相互关系痕迹的小农业居民点的文明。

生活的全面混乱在公元5世纪至10世纪之间把欧洲变成了一群支离破碎的小块领土。人类社会实际上生活于森林和平原之中，在那里人们拼命地为维持生存而挣扎，力争活到下一次收获。每天吃饱肚子是少数有权势的大人物的特权。这样的社会几乎无法采取经典的城市文明的方式。

在这样的乱世，不论地方贸易还是长途贸易都难以开展；所有层次的经济都呈现一种自给自足的倾向，导致市场交换和货币经济逐步消失。由于货币越来越少，人们只能以农产品来支付必需的货物和劳务。土地和对它的使用权是除战争以外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在这些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都和地主形成各式各样的契约关系，以他们大部分或大量产品来换取安全保障和防御内外敌人。如此发展下去就逐渐形成在欧洲以后许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征性的封建制度。

公元7世纪时，拜占廷帝国不得不同时抵抗来自南北两方的入侵者，西部欧洲却没 13

⑦ 关于努比亚的东正教和基督一性论宗教问题可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Ⅱ卷，第12章，和第Ⅲ卷，第8章。

有受到外部敌人的威胁，能够重新把自己组成一些多少是比较稳定的领土单位。西哥特人在西部统治着整的伊比利亚半岛，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在高卢及其毗邻地区确立了统治，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英格兰建立了他们的王国。意大利在公元7世纪末被南方的拜占廷人和北方新来的日耳曼民族的伦巴第人所瓜分。在以后的数世纪过程中，西部欧洲的所有日耳曼民族都信奉了天主教。因此公元7世纪左右，民族、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分裂状态的西部欧洲，得到了一种能够促使宗教上和文化上趋于统一的因素。

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柏柏尔人对西哥特西班牙的征服截取了拉丁西方很大一块地方。法兰克人虽然有能力阻止穆斯林向高卢进一步渗透，但是阿拉伯人对法兰西南部沿海一带和意大利的侵袭和骚扰却持续了两个世纪以上，造成地中海地带普遍的不安全状态。然而就在该世纪末，第一个——也是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唯一一个——成功地使西部欧洲政治统一的企图得到实现，这是加洛林王朝的业绩。查利曼大帝的前辈统一了比利牛斯山脉与莱茵河之间法兰克人的领土，挫败了来自东边的其他日耳曼民族的攻击。查利曼大帝自己（公元768－814年在位）把东部日耳曼人的大部分合并到他的国家里，并建立起一条边防以抵挡易北河畔的斯拉夫人。意大利的北半部和西班牙北部的一些领土也都落入法兰克人统治之下，难怪查利曼大帝作为拉丁西方最有权势的君主于公元800年被加冕为皇帝。不过，西部欧洲的许多地方仍然处于他的帝国之外：不列颠诸岛屿，西班牙的大部分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意大利南部仍在拜占廷人和伦巴第人手中。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关于查利曼大帝的著名论断导致了对穆斯林帝国的出现以及西部欧洲的命运二者之间关系问题的热烈争辩。[8] 亨利·皮雷纳的论断概括地声称：罗马终止对地中海地区贸易的控制并非由于公元5世纪时"野蛮的日耳曼部落"侵略，而是穆斯林帝国的形成。阿拉伯人从拜占廷夺走北非和东部各省造成了东西方之间的最后分离，这就迫使西部欧洲转向它自身的内部和它自己拥有的资源，以加洛林王朝的大陆经济取代了墨洛温王朝的海洋经济，因此西部欧洲变得贫穷和野蛮了。亨 14 利·皮雷纳的论断说明"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大帝"。照此观点，西部帝国的建立更多地是一个弃权的象征，而非伟大重建的象征，而且标志着拉丁西方的命运改变了方向。只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新的欧洲城市化的出现才使停滞状态得以克服。总之，使现代社会的兴起有了可能。

虽然上述论断最终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否定，但是它的主要功劳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中世纪经济变化的重要问题和欧洲封建主义的兴起。而且它还使历史学家们意识到阿拉伯人及其统治北非对欧洲发展的影响，而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课题。

阿拉伯人征服的结果，究竟是导致了地中海的完全关闭和长途贸易的中断呢，还是仅仅缩小了贸易的数量——这是讨论中的关键问题。这与亨利·皮雷纳论断的主要弱点似乎关系不大。亨利·皮雷纳认为，长途贸易不论多么有利，或者规模有多大，但在西部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都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它的中断不可能在经

---

[8] H.皮雷纳（H. Pirenne），1937年；A. F. 哈维格斯特（A. F. Havighurst），1958年。

济结构中引起如此深刻的变化。帝国内部严重威胁到城镇生存的自给自足大领地在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征服之前早就存在了。

阿拉伯和伊斯兰对欧洲的持久影响并非由于军事冲突和横跨地中海的贸易接触中断的缘故，而是穆斯林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长年统治所造成。带进这些地方的新农作物、农业的加工和技术之类创新，以及主要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新观念，被介绍到了欧洲，而欧洲原来在这些方面不如伊斯兰世界发达。虽然欧洲的文艺复兴开始得较晚 —— 从公元 13 世纪起 —— 但是为其兴起所奠定的基础却出现在伊斯兰文明最昌盛的时期，即公元 8 世纪到 12 世纪之间。

东部和北部欧洲

在欧洲的其他部分 —— 莱茵河和多瑙河古罗马边界之外的地区 —— 西迁的日耳曼部落移民为斯拉夫民族的扩张打开了通路，这种扩张的大致走向有二：一是向南跨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另一是向西进入今天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在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祖先，于公元 6 世纪越过多瑙河之后，袭击了拜占廷的欧洲各省，并逐渐在那里定居，完全改变了那里的政治和种族结构。

16 对穆斯林世界来说，斯拉夫各族在好几个世纪中起着和黑非洲人同样的作用，他们都被当作奴隶输送进来。⑨ 作为日耳曼邻居们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战争和侵袭的受害者，或是自己互相残杀战争的牺牲品，他们不仅在欧洲被扣作劳动力，而且还被出口到穆斯林各国去。那些在中欧被俘获的，都经过法兰克人的国家运到了穆斯林西班牙；而那些在巴尔干被俘获的，则多数被威尼斯人卖到了北非。阿拉伯人把他们称作“萨卡利巴”(al-Ṣakāliba，单数称“萨克拉比”al-Ṣaḳlabī)，主要是被雇来当兵，在政府机构中任职或被阉割后则留在后宫当差。⑩“萨卡利巴”一词在穆斯林西班牙很快发展到成为对所有欧洲人奴隶（白奴）的称呼，而不论其所属的民族。在马格里布和法蒂玛埃及则保留着它的原义。也正是在这里，来自巴尔干的奴隶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作为士兵和行政人员参与了巩固和扩充法蒂玛王朝的势力。⑪ 他们中最著名的是贾瓦尔，他是埃及的征服者，而且是开罗和爱资哈尔大学的创建者。虽然奴隶们很快就在种族上和文化上被马格里布和埃及的穆斯林阿拉伯社会所吸收，然而从公元 10 到 11 世纪的过程中，他们对决定北非上述地区的命运也作出了贡献。

斯拉夫民族的绝大部分由于接受了基督教而进入了欧洲的“文明”民族之列，于是不再被作为奴隶卖到国外。公元 11 世纪末，波希米亚、波兰、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

⑧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有的西欧语言中“奴隶”一字（Sklave, esclave, esclavo, escravo 等）都来源于“斯拉夫”(Slav) 一词，而这正是斯拉夫各族对自己的称呼。这说明在欧洲各族语言的形成阶段（恰好与本章所述的时期相吻合）斯拉夫战俘想必构成了西部欧洲奴隶人口中的主要部分。

⑩ 阉割是穆斯林法律所禁止的，因而只能在欧洲进行，其中凡尔登是最主要的地方，被莱因哈德 · 多齐 (Reinhard Dozy) 称作“太监工厂”。

⑪ 参阅后文第 12 章。

保加利亚诸国业已存在，而在东边的基辅国则完成了统一东面大多数斯拉夫民族的任务。

公元8世纪到10世纪之间，来自地中海国家地平线外的另一个民族群体出现在欧洲的舞台上，它就是维金（或诺曼人）侵略者，征服者和商人冒险家。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家乡乘坐技术上先进的船舶以攻击沿海的地区，甚至顺河流而人，到达内地的一些地方。这种攻击和侵袭接连不断地持续了许多年，致使像不列颠诸岛和法兰西这样的许多地区遭受严重的破坏和普遍的不安定。而有些诺曼人（阿拉伯人称之为麦居斯）一直 17 向南，远达穆斯林西班牙甚至摩洛哥。在欧洲东部，维金人（在当地被称作瓦亚戈斯）把贸易和侵袭合为一体，沿着俄罗斯的河道系统建立起他们的工厂。沿伏尔加河顺流而下，他们到达里海，并与哈里发诸国发生接触。有时他们抢劫外高加索的沿海区域，有时他们作为商人到处旅行，远至巴格达贩卖皮毛、刀剑和奴隶。

公元11世纪以前，诺曼人除了在公元858或859年如前所述袭击过摩洛哥沿岸这一短暂插曲外，一直没有和非洲有任何直接的接触。一群诺曼人永久定居在法兰西的北部（诺曼底），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就是这些诺曼人，除了在公元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之外，还在意大利南部为他们自己开辟出一个国家。他们从这块地方又着手征服穆斯林西西里，使其成为他们部分指向北非的进一步扩张的基地。西西里的诺曼人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成为穆斯林北非政治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自南边的穆斯林袭击和来自北边的诺曼人侵略对西部欧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在这样多的地方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攻击给以集中而有组织的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地方上的防御工作便由各地的领主来组织，结果这些人对他们名义上的统治者、国王和皇帝，就变得越来越独立，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比后者的势力更大并更为富有。中央集权逐渐分解的这种过程，早在公元9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同时也加剧了早已存在的封建割据。

到公元11世纪，欧洲又回到了相对稳定的岁月，危险的入侵和伴随着动荡的移民业已终止，欧洲大陆的绝大部分地方出现了多少是带有永久性的种族格局。从此以后，政治边界的变更和国家的出现与消亡，主要是由于王朝统治的政策和抱负，而非整个民族的迁徙所致。

把公元7世纪到11世纪这段时期称为欧洲的过渡或转化时期看来是适当的，理由是在这几个世纪里出现了一个和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欧洲有着深刻区别的新欧洲。

生活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范畴之外的古代新民族被认为是不属于欧洲的，仅仅只是由于他们接受了基督教及其文化价值观念，并且遵循共同的政治制度，才被接纳入欧洲社会。欧洲大陆在政治上、并且更多地在经济上，一直是分裂为许多小单位，但是到公元11世纪却出现了一种宗教上和文化上团结一致的意识，虽然模糊不清但不断增强，尤其在针对穆斯林世界时更是如此。但是这种觉醒的意识尚未强大到足以使东正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停止争斗，也未能避免公元11世纪中叶的严重分裂。

18 公元11世纪还标志着经济上过渡时期的结束，从此以后农奴制成为中世纪欧洲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附庸的束缚关系在那里也占统治地位，形成了那种典型的可以恰

如其份地叫做封建制度的社会政治结构。在西部欧洲和北部欧洲的某些地区，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停滞以后，农业引进深耕、垦荒和三年轮作之类改革措施，改进了生产粮食的方法。工业生产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技术，诸如利用水力织布或使用铁锤和风箱以生产更多更好的铁和铁制品。由于发明了在长车前面用横木和更好的马具，从面使陆上的运输日益方便，在造船方面也有诸多改革。

在许多世纪衰落之后欧洲城市重新兴盛起来，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其中最为壮观的是意大利城市的复苏，特别是像威尼斯、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这样的港口城市。公元10世纪以前，这里的商人已经开始和拜占廷帝国以及北非与近东的穆斯林国家开展贸易，出口木材、金属和奴隶，进口奢侈品，如丝绸和香料，也进口亚麻、棉花、橄榄油和肥皂。公元11世纪时，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他们中最活跃的威尼斯商界已经得到拜占廷皇帝的许可在所有拜占廷港口享有自由贸易的特权，而且几乎垄断了海上的运输。这样一来，拜占廷就变成了威尼斯的一个商业殖民地。

在此之前，长期面对形形色色侵略面为生存斗争所拖累的西部欧洲，到公元11世纪时终于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放弃消极防卫而转人积极进攻状态。

攻势从西西里开始，公元1060到1091年之间，诺曼人从阿拉伯统治者手中征服了全岛，并建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他们从这里攻击北非海岸和滨海城市。公元1085年，西班牙最重要的穆斯林城市之一托莱多落人基督徒之手。虽然后来基督教势力的进攻由于柏柏尔阿尔莫拉维德人和阿尔莫哈德人的干预面受阻达一个世纪以上，但上述日期标志着复地运动的真正开始，从此西班牙的穆斯林被迫长期处于守势了。

公元11世纪末，第一次十字军——这是最早的一次重大海外冒险，许多欧洲民族都卷人其中——由于征服耶路撒冷和地中海东岸诸国其他某些城市而胜利地取得了第一次成功。将近二百年之久被他们的穆斯林敌人称之为法兰克的欧洲人，开始时确是受到虔诚的宗教热诚的激发，后来又受封建领主和意大利商人更为世俗的利益的驱使，试图将地中海东部合并到自已的势力范围中来。但是穆斯林的反攻，不顾一批批十字军源源而来，逐渐侵蚀了地中海东岸的拉丁人国家，并在公元13世纪末将最后一批十字军战士逐出巴勒斯坦。与此同时，遭到西欧人猜忌和敌意的拜占廷帝国成了十字军的主要牺牲品，最后变得远比以前更为衰弱了。在这长达两世纪之久的斗争中的真正胜利者，首先是穆斯林，其次是意大利各共和国，后者成为强盛的商业国。 19

我们在前文业已详细陈述过穆斯林在北非地中海南岸出现对西部欧洲所具影响的各种论点。虽然我们没有完全赞同亨利·皮雷纳的论点，然面历史事实却仍然是：地中海流域由于阿拉伯人对北非的征服已不再像过去一千年那样是一个独成一体的大文化区了，它已被区分为欧洲人（或基督徒）与阿拉伯－柏柏尔人（或穆斯林）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都各有其自已的文化，各走其自已的道路。

在西部欧洲人的眼里，非洲和穆斯林世界是一回事，因为主要的袭击和侵略都来自这个地区，而且还随之而来了各种不同的影响和观念。当地中海南北两岸之间的商业往来更加频繁以后，欧洲人在那时所了解的非洲仍然是一个穆斯林的非洲。因此，把非洲和基督教的大敌视为一体就毫不奇怪了，并相应地以此看待和对待非洲的居民面不顾他

们的肤色。⑫由于欧洲缺乏与穆斯林范围以外非洲的任何直接接触，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对该大陆——尤其是它的黑色居民——产生一种非常扭曲的形象。近期的某些研究，主要是J.德维斯和F.德－梅德罗斯⑬的研究成果，已经清楚地指出当时欧洲人如何无知和把黑非洲人和穆斯林混为一谈，同时也指出这二者是如何使欧洲人对黑非洲人形成了不良的印象，把他们看作是罪过、邪恶和劣等的化身。在中世纪早期，欧洲人对黑色皮肤各族就已经产生了否定态度以及歧视和敌意，这又在后来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中得到了强化。

非洲、亚洲和印度洋

鉴于非洲历史中印度洋因素的总的方面，尤其是那些有关地理和海洋地理性质的内容，已经在《非洲通史》第II卷中⑭进行了讨论，我们此处将只考察对公元7至11世纪这段时期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情况。

20 近二十年间，有少数从事专门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和一些集体研究成果曾致力于研究印度洋区域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问题⑮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要人们注意尚存的问题，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而不是试图对大量尚未解决的有关非洲及其毗邻岛屿的历史重大问题做出明确的答案。

在本章所述的这段时期里，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多。而主要的困难产生于下面的事实：由于某些特殊的巧合（与本时期之前和之后的阶段相比），我们关于印度洋和其沿岸各国之间关系的历史知识，是建立在相当脆弱的证据之上的。

直到现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只有为数不多公元10世纪以后穆斯林作者写的东西，绝大部分还是第二手的记载。另有一些是非洲东海岸和毗邻岛屿上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原产于亚洲的货物，以及某些物质文化方面的相似之处。印度南部和东南亚的史料寥寥无几，也无助于使上述情况得到改善，本章所述的时期这些地方的历史远没有印度以西伊斯兰诸国的历史那样为人所知。另一个困难是日期问题：我们确定在非洲发现了一些毫无疑问是来自亚洲的作物，还有在非洲语言中，特别是斯瓦希里语中，包含着许多借自印度语的词汇，但是，要准确地指出它们传入的确切时间却大有问题。还有其他许多疑难和问题有待处理，只要看一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印度洋两岸历史关系讨论会的报告所列举的一长串书目，⑯即可充分认识到，尚待进行的研究工作十分庞大，要对印度洋地区相互联系描绘出较为清晰的图画尚需作出巨大努力。

⑫ “摩尔人”（Moors）一词以及其他来源于拉丁字“摩里”（Mauri）的称呼，在长时期内对穆斯林和黑人都适用，后来才区分为“白摩尔人”和“黑摩尔人”；参阅J.德维斯（J. Devisse），1979年（a），第53－54页及第220页注。

⑬ 同上著作，第47和以后诸页，并散见各处；F.德－梅德罗斯（F. de Medeiros），1973年。

⑭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2章。

⑮ 主要参阅D.S.理查兹（D.S.Richards）（编），1970年；M.莫拉（M.Mollat），1971年；与圣德尼（Saint-Denis）的谈话，1972年；H.N.奇蒂克（H.N.Chittick）和R.I.罗特伯格（R.I.Rotberg）（合编），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

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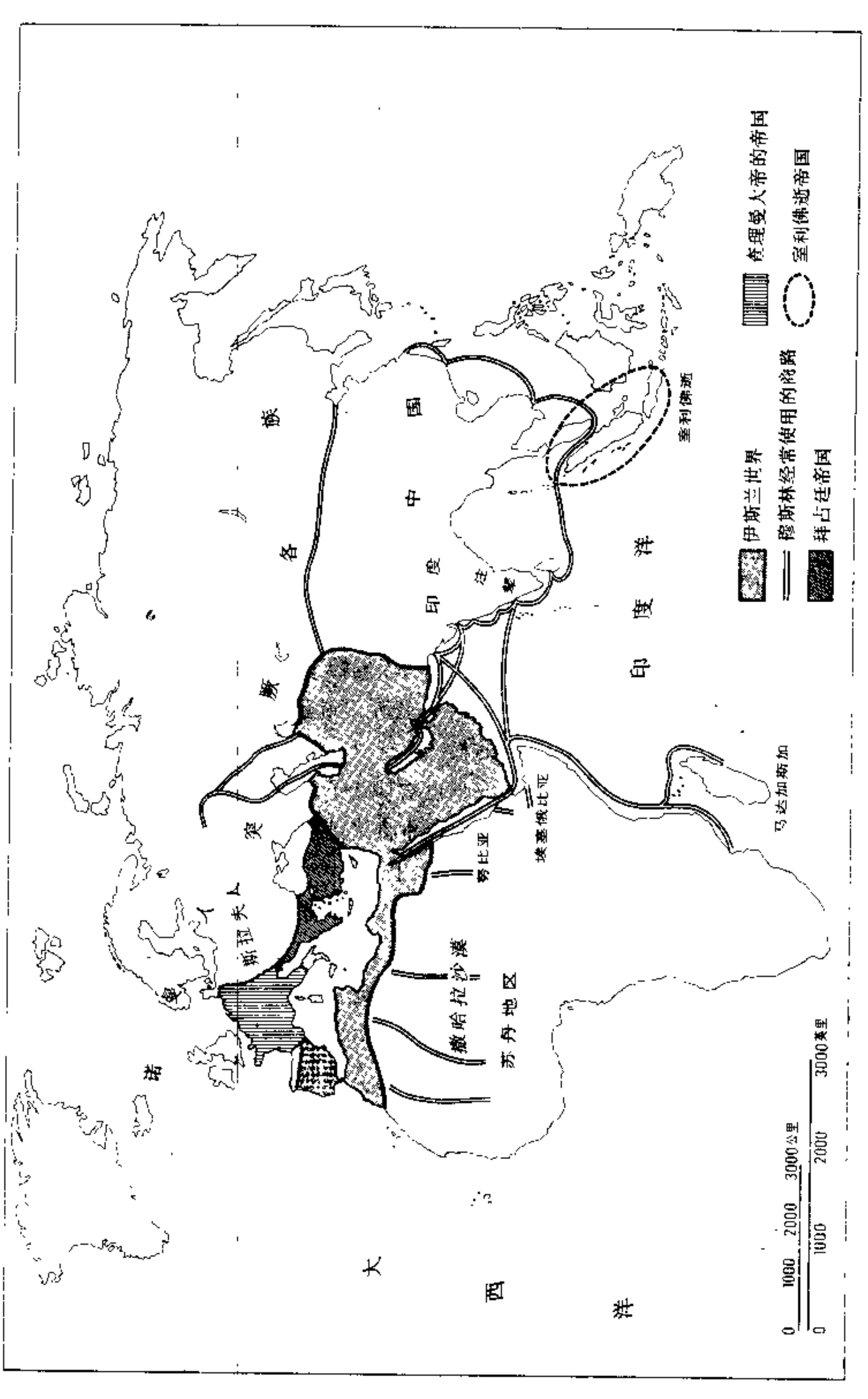


插图1.1 旧大陆形势图(公元845年、回历230年前后)

穆斯林的贸易

伊斯兰帝国在沟通各大陆之间的联系方面所处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我们在本章前段已经作了论证，此处不再把造成它在经济、贸易、航海等等领域内建立霸权的所有因素一一重复。

与地中海比较，印度洋总的说来是个和平的海洋。印度洋各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虽说不是对所有参加者都经常是同样地有利，但只有很少的时候才受到战争的干扰。经久不衰的贸易趋势似乎比不断变迁的政治趋势力量更大，推动经济交流的力量胜过了政治上的对立。在中世纪早期的地中海、穆斯林和基督教各国

21 都被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虽然商业往来从未全部停止，但战争状态一般都不利于贸易。相反地，伊斯兰在印度洋的扩张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贸易往来却未有不良的影响，因为商人们迫切希望不要由于强制改变信仰，干扰久已确立的商业关系。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洋贸易就像田园诗一般。奴隶贸易往往伴随着好战的行动和使用武力。除此之外，在本章所述的整个时期里，一直存在着大规模的海上掠夺。但是必须指出，它从未到达已知的地中海的程度，在那里海盗行为因宗教的差异而受到煽动，甚至被认为是正当的。

穆斯林事业的持续繁荣还受到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的干扰。在公元 9 世纪下半叶，有两起事件严重地打乱了印度洋贸易。第一件是公元 866 到 883 年（回历 252 到 270 年）在下伊拉克和波斯湾地区爆发的大规模的僧祇人起义。[17]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如巴士拉、乌刺、阿巴丹遭到了破坏，巴格达的人海口也被切断了。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上述各港口的商人们逃亡到内地或其他港口，许多船也都遭到损失。这个地区的海上贸易由于缺乏商人的资金、货物和船只而萧条了 15 年以上。

对穆斯林贸易的第二个打击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公元 878 年（回历 265 年），当中国造反者黄巢的兵力劫掠广东时，屠杀了一大批外国商人，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穆斯林诸国。有些商人明显地是被饶命了，因为按照讲述这次悲惨事件的人说，叛乱者压制阿拉伯的船主们，把非法的负担强加在商人们身上，并没收他们的财产。[18]

当然，这两场灾难的发生不可能不在穆斯林商人的航海事业上留下痕迹。位于波斯湾终端的那些港口经历了一段衰落时期，在东方的穆斯林商人宁肯以格勒为终点（它位于马来亚半岛的西岸），当时是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的一部分（参阅后面英文原书的第 27－29 页），并在该地与他们的中国同行接触。

虽然有公元 9 世纪时的这些灾难和室利佛逝统治者的独占倾向，但穆斯林贸易还是逐渐得到恢复，并慢慢地开始重新发挥它原先那种重要作用。即使又发生公元 10 世纪的那些灾祸，诸如公元 920 年（回历 308 年）来自阿拉伯半岛东部的卡尔马特人劫掠巴士拉，公元 942 年（回历 330 年）整个阿曼船队被它所围困的巴士拉统治者所烧毁，还

[17] 参阅后文第 26 章。

[18] G. F. 胡拉尼（G. F. Hourani），1951 年，第 77－79 页。

有公元977年（回历366年）的地震摧毁了撒那威，都未能阻止穆斯林船舶在印度洋航道上的活动。

到公元11世纪，穆斯林贸易由于中东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衰落和在北非土地上法蒂玛王朝的同时升起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以波斯湾为终点的航道和途经红海的航道之间的对立终于在对后者有利的情况下解决了，许多世纪以来，后者在印度洋贸易中一直只起次要的作用。 22

关于穆斯林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洋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已经做了尽情地叙述。那么其他的人们又如何呢？非洲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人？这些民族在这种关系中又参与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之间进行的文化和物质交流，是通过直接的接触呢？还是仅只有间接的来往？

所有这一切都与另一个问题有关系：仅仅是由于有关他们活动的资料和文件在目前是最丰富，而我们并没有过高估计和夸大穆斯林在印度洋所起的作用？只有对所有目前掌握的证据进行细致研究才能对此得出明确的结论。业已发现的有关该问题的一些新的事实和情况有助于对非穆斯林在印度洋相互关系中所起作用作出较前为好的估计。尽管如此，看来并不会因承认其他民族的作用而改变穆斯林在该地区作用突出的总的形象。

这是理所当然的：穆斯林贸易的统治地位并非虚无漂渺的，它反映了在这几个世纪里穆斯林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活力，以及它在两大陆交叉地点的有利地理位置。如前所述，旧大陆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区域在当时能和所有其他区域都维持持续不断的往来。伊斯兰地区是唯一发展了真正洲际贸易网的地区，公元7至11世纪这段时期，正是洲际贸易的发展达到成熟的阶段，即使它的鼎盛时期尚待来临。

中国人的贸易

现在再来谈谈当时参加贸易的其他族人：首先让我们讲中国人，主要的理由是已经有一些关于他们在印度洋的事业和与非洲来往的详尽研究。⑲ 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人与旧大陆其他重要地区——印度、西亚以及地中海周围各地——的交往，几乎完全是通过出口贸易建立起来的，其最重要的商品是丝绸，后来还有瓷器。

虽然中国在唐朝（公元618－906年）就已经掌握了在印度洋作远距离海上航行的必要的技术知识和手段。但是到马来亚半岛以外的地方去从事贸易时却不使用本国的船。中国人之所以未在印度洋出现的原因是由于文化和惯例所致。⑳ 就在伊斯兰崛起前的那几个世纪，锡兰（今斯里兰卡）是中国和西部亚洲之间从事海上贸易的主要货物集散地。船从占婆或印度尼西亚诸国出发，往往最远向西航行到锡兰，由此再往西的贸易则控制在波斯人和阿克苏姆人的手中。 23

中国人是通过印度人、波斯人和后来的阿拉伯中间人而知道印度洋的。他们大概未曾意识到在大洋彼岸还存在着另一个大陆。在中国的文字资料中提到非洲人和非洲的片

---

⑲ 参见J. J. L. 杜文达克（J. J. L. Duyvendak），1949年；T. 菲列西（T. Filesi），1962年，1970年。

⑳ 王赓梧（Wang Gungwu），1980年。

断记载似乎是引自穆斯林的记载。因此他们以为非洲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臣民，以为非洲人的国家是阿拉伯帝国的组成部分。㉑ 中国所需要并欢迎的非洲商品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用自己的船只来到中国口岸的外国商人那里得到。

到达中国的非洲货物中最重要的是象牙、龙涎香、乳香和没药以及僧祇奴。㉒ 伊本·拉基斯关于公元945－946年（回历334年）瓦克瓦克人攻打坎巴鲁（奔巴）一事的著名记载中，也说到中国人需要玳瑁和豹皮的情况。㉓

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东非的历史是写在中国瓷器堆里的。㉔ 的确，在东非沿岸各城市曾发现大量中国瓷器，因此可以肯定这种商品曾是中国向非洲出口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索马里和阿拉伯半岛南部也发现了与东非沿岸所发现非常相近的瓷器碎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从这一进口类别看，印度洋西部整个地区可以被认为是已形成一个整体。㉕ 但是，已发现的中国瓷器大部分是属于公元11世纪之后这段时期的。从沿海发现的中国钱币也可得到相似的情况。按此证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非洲商品很早就已成为中国经常进口的货物，而大量中国货物的到达却可能只是公元11世纪之后的事。因此，中国与非洲之间并非直接进行交换，而是通过印度洋的穆斯林贸易网络进行联系。

24 印度人的贸易

有关印度在印度洋地区所起作用的所有问题迄今尚有待研究，尤其是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千年里的情况更是如此。这主要涉及印度人参与国际贸易的前前后后，以及印度对该地区各个部分的影响。解决这个错综复杂问题的任务，由于在本卷所述的时期内，几乎完全没有出自印度的资料而更难完成。

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首批现象之一是印度对印度洋地区东部和西部的影响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整个东南亚，不论是在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印度文化的影响是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存在着有些部分后来为伊斯兰的影响所笼罩。在印度洋的东岸没有东西可敌得上婆罗浮屠、古爪哇文的罗摩衍那史诗、巴厘人的印度教和几十种语言中的梵语外来语等等。似乎是印度人在印度洋上从南至北划了一条线，有意决心把他们的目光只朝东方，避而不看西方。这一定是发生在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中间一段的某个时期。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印度船肯定往返于印度和印度洋西部之间，甚至在埃塞俄比亚和努比亚都可见到印度的影响。但是正如D.K.凯斯瓦尼正确地指出的那样，㉖ 印度海上活动的那段光荣历史并没有延续多久。即使如此，印度文化对非洲这部分地区的影响也远较对东南亚为弱，甚至根本无法进行比较。后来，在东非沿海城市

㉑ 同上。

㉒ 参阅后文第26章。

㉓ 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Buzurg ibn Shahriyār），1883－1886年；参阅后文第25章。

㉔ 莫蒂默·惠勒勋爵（Sir Mortimer Wheeler），由G. S. P. 弗里曼－格伦维尔（G. S. P. Freeman－Grenville）引用，1962年（a），第35页。

㉕ 同上。

㉖ 参阅D. K. 凯斯瓦尼（D. K. Keswani），1980年，第42页。

欣欣向荣的那个时候，印度人参与非洲与印度之间贸易的人数开始不断地增加，但是要使印度文化对这些已经伊斯兰化了的沿海社会产生任何较深的影响，为时已晚。

在公元 7 到 11 世纪这段时期里，非洲和印度的关系似乎是处于最低潮。[27] 接触仍然存在，不过绝大部分与货物交换有关。象牙一直是出口到印度的最重要非洲货物之一，象牙贸易在古代就已经兴旺了，任何阿拉伯文的记载在描写东非沿海时几乎没有不提到这一情况的。马苏迪（死于公元 956 年，回历 345 年）就明确写道，东非出口象牙的目的地是印度和中国。又说，其主要货物集散地是阿曼。这就证实了业已假定的说法，即在这段时间里非洲和印度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28] 至于其他还有什么别的出口货物，我 **25** 们并没有掌握有关这几个世纪的资料。伊德里西（死于公元 1154 年，回历 549 年）关于非洲的铁出口到印度的著名报告很可能谈的是更早的时期，因此也就可以联想到我们所涉及的时期也可以同样存在。非洲的这项产品对发展印度工业的一个分支起了重要的作用，即钢刀的生产。似乎这是非洲出口货物中少有的不属于初级产品的东西。此处必须强调的是：非洲出口的并非铁矿石（对当时船的负载量来说无论如何它的体积太庞大了），而是已经初步加工过的产品，或许是生铁。[29]

虽然在以后的时期里有许多作为奴隶进入的非洲血统的人在印度显赫起来，但在我们所涉及的时期里尚无这种情况。有些非洲奴隶肯定是经过阿拉伯半岛或波斯出口到印度的，但迄今尚未出现相应的文件或其他证据。我们也没有关于人口向相反方向流动的足够的迹象，即印度人向非洲的流动。来自沿海及毗邻岛屿的口头传说有许多讲到一种叫“达布里”的人（达布里人），相信这种人到达沿海一带的时间甚至早于设拉子人，因此是在公元 12 世纪以前。有些古代的建筑物与他们有关。他们的名字被认为是来源于印度河口的名叫达波尔的大港。[30] 对他们到达沿海一带的确切时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有些传说把它放在沿海城市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另一些传说则把它与火药武器的传入联在一起，因此要晚得多。历史记载中只有一个与达布里家谱有关的人，此人于公元 1502 年被葡萄牙人立为基尔瓦的素丹。

所有这一切并不排除下述的可能性，即有些印度血统的人——绝大多数很可能是商人——早期曾定居在沿海一带。但在任何状况下他们的人数不会很多，因为不然的话，就会在文字记载或物质文化中保存下更多具体的线索。的确，斯瓦希里语中有许多印度语源的外来语，但迄今为止一直不能断定它们输入的年代。根据完整的文献，印度人在以后几个世纪移居国外的人数增加了，这些外来语似乎是比较近代才被借用的，肯定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之内。

---

[27] 关于这段时期内来自索科特拉的印度海盗的活动，确有证据可以证明，但是海盗一般不能担当传播文化的使徒的作用。穆卡达西（al-Mukaddasī），1877 年，第 14 页；马苏迪（al-Mas'ūdī），1861－1877 年，第 3 卷，第 36－37 页；参阅 G. F. 胡拉尼，1951 年，第 80 页。

[28] 参阅 G. S. P. 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 年（a），第 201－202 页，从商业和航海方面讨论了缺少直接交往的原因。

[29] 伊德里西（al-Idrīsī），1970 年，第 1 卷；伊克利姆（Iklīm）1/8，第 67－68 页。

[30] 参阅 J.M. 格雷（J. M. Gray），1954 年，第 25－30 页；G. S. P. 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 年（a），第 202－203 页。

与印度尼西亚的来往

如上所述，非洲为一方、中国和印度为另一方之间的来往，更多地是间接的而非直
26 接的，却在印度洋另一端的一个地区至少在非洲的某些部分留下了不容置疑的痕迹。印度尼西亚人在马达加斯加人口构成中的贡献是早就得到公认的。当前，马尔加什历史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阐明在马尔加什文化中印度尼西亚成分和非洲成分混合的过程。由于马尔加什历史中此类性质的问题在本书其他章节还要详加讨论，㉛ 此处我们将只处理直接与非洲大陆有关系的主题。

现在看来，印度尼西亚人对非洲大陆的影响似乎被夸大了。实际上人们并没有掌握印度尼西亚人像在马达加斯加那样直接渗人东非的证据。迄今在考古学上、语言学上、和人体方面都没有发现资料足以说明印度尼西亚人的长期存在。H. 德尚的理论㉜认为，原始的马尔加什人在马达加斯加定居之前曾在非洲大陆的沿岸有过停留，并在那里与非洲人混合或通婚，但缺乏任何支持该理论的证据。雷蒙德·肯特引伸了这一假说，假定在讲班图语的部族群体到达之前有一个从印度尼西亚向东非迁移的运动，后来印度尼西亚人和班图人相遇并在内陆相混合，而非裔马尔加什人就是这一混合的结果。班图人扩张到沿海地区时遂迫使上述族群移居到马达加斯加。㉝

上述学说产生的基础是认为印度尼西亚人不可能不停顿地完成横跨印度洋直达马达加斯加的迁移。作为一种推论，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可能停留的地点，如尼科巴群岛、斯里兰卡、印度、拉克代夫群岛和马尔代夫群岛。因此，印度尼西亚人的迁移像一连串较短的跳跃，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在印度和东非也有些停留点。这种设想就其本身而论并非不可能或不会发生，但此类停留时间必然很短，以致印度尼西亚人并未在这些地点留下可资辨认的痕迹。

对于所谓“马来西亚植物复合体”，包括诸如大米、香蕉、芋头（可可薯蓣）、薯蓣、面包果和其他构成许多非洲人主食的作物已经作过许多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由G. P. 默多克进行的。默多克等人相信这类复合体是基督纪元前第一个千年时期由印度尼西亚移民带到马达加斯加的，他们在到达非洲东海岸之前正是沿南亚海岸远道而来。抛开有关这些作物起源之类复杂问题，应该指出，耕种作物的传播并不依靠那些首先种植它们或较早采用它们的人的有形移居。公元16世纪以后，某些美洲的农作物经过非洲
27 西部和中部传播的情况，就可以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排除东南亚的某些作物后来从马达加斯加传到非洲大陆的可能性。

但是，毫无疑问印度尼西亚人是有能力和学识的航海家，他们从老家所在的岛屿向四面八方进行了大量航行。除了也许是最早和中国开辟了海上贸易之外，他们特别积极地开辟通向印度的海上通道。苏门答腊和爪哇两地在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的后半期都出

㉛ 参阅后文第25章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8页。
㉜ H. 德尚（H. Deschamps），1960年。
㉝ R. K. 肯特（R. K. Kent），1970年。

现了庞大的海上强国，诸如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帝国（公元7至13世纪）和爪哇夏连特拉王朝统治下的国家（公元8世纪），后者也曾在室利佛逝掌权。㉞

这里我们只谈他们历史中一方面与印度洋区域总形势有关、而另方面又与他们同非洲可能的交往有关的那些方面。室利佛逝国家最初的中心在苏门答腊的东南部，到公元7世纪下半叶发展成为海上强国。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它继续在领土和商业两方面进行扩张，到公元10世纪阿拉伯和波斯地理学家涉及该国的记事首次问世。他们把室利佛逝的统治者视作是“马哈拉贾”（Maharaja），即杰出者，是整个区域最有权势和最重要的君主，是“东海诸岛之王”。室利佛逝的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主要出口海港行使控制权，从而在香料贸易上获得了广泛的独占权。控制马六甲海峡给了他们无法估量的好处，因为所有的海上运输都必须通过这里并停靠在它的各个港口。它一方面与印度南方注辇王国交往，另方面又与中国交往，这种关系一直友好地持续到公元11世纪的头二十五年。

公元878年（回历265年）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的侨居地几乎全部被摧毁（参阅英文原书第21页），随之而来的是穆斯林和中国人直接贸易的衰退。室利佛逝的统治者们抓住这个机会使自己挤进了这桩有利可图的事业。东来的穆斯林船与南行的中国船在马六甲海峡的格勒相遇。格勒是处于室利佛逝帝国宗主权之下的一个港口。与此同时，室利佛逝的船也参加了印度洋的贸易。与印度南部的紧密接触，在佛教寺院的碑文和内加帕坦的学界中均有文献可考。由于是向西印度洋航行，我们引用了少许但却极为重要的阿拉伯文资料。首先就是瓦克瓦克人于公元945—946年（回历334年）攻打坎巴鲁（奔巴）的纪事。㉟

28

从故乡出发到达东非的航行需要整年的时间来完成，仅此一点就足已使人们得出瓦克瓦克群岛位于中国对岸的结论。G.费朗曾说，在瓦克瓦克一词的背后，穆斯林学者们引伸出两个地区或两种居民，一个在印度洋西南部的某地，包括马达加斯加和苏法拉以南的非洲海岸，另一个在东南亚，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㊱ 对此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和“奇闻”，而后来的作者又增添了很多相互矛盾的细节，因此大大地迷惑了真相。而且似乎直到今天仍无人对下列奇妙的巧合予以注意，即在阿拉伯文地理著作中瓦克瓦克总是和下面一些地名联系在一起，在瓦克瓦克，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血统的人和尼格罗人或是同处一地，或是相互为邻，或是彼此混血。这一点看来已为比鲁尼所证实，㊲ 他说瓦克瓦克岛的居民是黑皮肤的，虽然在他们邻近生活着比他们肤色浅的其他人，与突厥人（穆斯林对黄种人的习惯称法）相类似。这里比鲁尼心目中所指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地方。他所说的瓦克瓦克，或是指新几内亚（伊里安岛），因为那里据说有个叫法克法克

㉞ 参阅D.G.霍尔（D.G.Hall），1964年，第53和以后诸页。

㉟ 参阅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1883—1886年，第174—175页；这一记载的全文译文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Ⅱ卷，第706—707页，第二句如下：“……他们乘了上千条船到达这里，同对方（坎巴鲁居民）进行激烈的战斗，但未能打败对方。”

㊱ G.费朗（G.Ferrand），1929年，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讨论情况，见G.R.蒂贝茨（G.R.Tibbetts），1979年，第166—177页。

㊲ 比鲁尼（al-Bīrūnī），1887年，第164页；英译本，见1888年，第1卷，第210—211页。

的地方迄今尚有待发现，或是指摩鹿加群岛中的某处，因为部分岛屿居住着美拉尼西亚人，或者二者皆是。许多穆斯林学者没有能力或者并不真正想弄清被称作“瓦克瓦克人”的准确种族划分。因此，必须与上下文联系起来分析每一条参考资料才能理解这一名词的具体涵义。

关于这个问题，伊本·拉基斯叙述的某些细节，非常明确地指出，东南亚就是这些瓦克瓦克人的故土。由于我们知道这段时期室利佛逝帝国是印度洋东部的主要海上大国，因此认为这种长距离远征的目的是为了扩展室利佛逝贸易网能达到的区域，以便直达非洲商品出产地而避开穆斯林的垄断，也不能算是过分牵强附会。看来这不是此类航行的第一次，很可能这类远征是在穆斯林的商业活动因僧祇人起义和公元9世纪下半叶中国港口驱除外国商人而受到严重限制的时候开始的。这类远征究竟持续达多久，这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伊德里西证实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印度尼西亚船继续访问非洲沿海和马达加斯加。这是指公元10至12世纪间印度尼西亚向马达加斯加移民的新浪潮。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排除那些后来的移民或多或少与印度南部的注辇王国在公元11 29 世纪前半叶对室利佛逝的侵略和袭击有关，这事件严重削弱了这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导致人口的外逃和流动。要做出更为肯定的结论，其困难在于缺乏室利佛逝历史的足够史料。

结 论

与以前的时期相比，非洲大陆与印度洋区域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交往，其范围和特征都起了某种包括质、也包括量的变化。

首先我们都能看到中东各族人民在印度洋地区的所有部分，尤其是东非沿岸，都大量存在、并处于不断增长中。在这里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能够使他们在基督纪元头几个世纪业已奠定基础的商业活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新的扩张与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统一的强大的哈里发帝国的兴起密切相关。有了这样的背景，穆斯林才有可能垄断东非的贸易，并在该地区的对外关系中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这些交往无疑对繁荣某些沿海城市使之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以及导致非洲企业家阶级的兴起都起了作用。但也不应忘记在此同时，大量非洲奴隶被运往大陆以外，去为多数是在中东的各个亚洲国家的经济卖命。

其次是与印度的直接来往明显地下降了。公元7世纪以前，埃塞俄比亚船曾到某些印度港口开展贸易，这种关系已被在埃塞俄比亚境内发现的大量印度（贵霜）钱币以及埃塞俄比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中的许多印度影响的痕迹所证实。公元7世纪到11世纪之间未见到任何这类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交易转到了穆斯林的手中，而他们却在这些关系上打上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烙印。

再次，虽然穆斯林在印度洋上占优势，印度尼西亚人却仍然能够和马达加斯加、以至非洲大陆沿海的某些部分保持交往。不过，他们在非洲大陆上的影响肯定是很小的，某些学者所提倡的印度尼西亚对非洲文化具有决定性贡献的论断应该说仅仅是一种缺乏

充分证据的假设。当然，在马达加斯加情况就完全不同，因为与印度尼西亚的联系实在太明显了。

最后，我们要考察一下非洲血统的各族人民在印度洋范围内所起的作用。在评价此事时，我们应该牢记的是，在本章所讨论的这段时期内，非洲大陆只有极小的部分，即沿海的窄狭地带与外部世界有交往。有机会对外施加影响或接触到这种机会的非洲人的数目肯定是极其有限的。这和西部非洲的情况就有显著的不同，在西部非洲不同文化的交往是在更广更深的前沿上进行的。即使如此，非洲血统各族的作用始终没有被忽视 30 过。相反，正是非洲人在这一强大帝国命运的深刻变化中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僧祇人起义是真正的社会起义，其影响之深远曾波及政治、社会、经济的许多领域。起义使得穆斯林帝国的统一分崩离析，大的省份脱离了哈里发帝国，并为古老的阿拔斯政权的衰亡铺平了道路。由僧祇人起义预示的政治危机加深了社会各阶级间存在的鸿沟，富裕的阶级由于担心他们的特权，开始把他们的信赖放在突厥人的职业军队和其他雇佣军身上，把他们作为唯一能够维持秩序的力量，这开辟了穆斯林中东史的新纪元。这一起义也给穆斯林的统治阶级一个教训，我们从此不再发现穆斯林东方有任何大规模的企事业是以集中的奴隶劳动为基础的，似乎在农业和灌溉方面对奴隶的剥削也被取消了。随之导致下个世纪封建制度的兴起，并成为东部穆斯林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奴隶剥削让位给了封建剥削。是否结果导致了进口非洲奴隶数目的下降（缺乏任何统计），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僧祇人起义的另一个后果似乎是种族感情在那些时间里变得严酷起来了，黑色非洲人遭到蔑视。尽管有伊斯兰的教诲，但在穆斯林的著作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对黑人持否定态度的主题。

本章所讨论的这段时期里非洲历史的其他方面，部分是由于印度洋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应该提到东非沿岸城镇在国际海洋贸易中参与程度的增长。即使船是由外国商人所控制，其制造者和出口者仍为非洲沿海的人民。虽然斯瓦希里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极盛时代出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但其基础却是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期内奠定的。

2 伊斯兰教的降临和穆斯林帝国的扩张

穆罕默德·埃尔·法西
I.赫尔贝克

31 本书第一章曾试图考察回历1/公元7世纪至回历5/公元11世纪这一时期旧大陆与非洲历史上的主要事件。考察结果表明这一时期起作用的一个最有生气的力量是伊斯兰社会在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种种表现。

本章旨在阐述伊斯兰教的降临、它政治扩张的过程以及它教义的演变，作为对本书和《非洲通史》其余各卷所探讨或涉及的历史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有更好了解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前　言

按照伊斯兰教的观点，说先知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或者说他提倡一个新的宗教信仰，都是不正确的。伊斯兰这个独特的宗教信仰的名称并非穆罕默德首先提出来的，他只不过是若干先知中的最后一位，每位先知都反复重述前一位先知的信仰．这可以以下述的伊斯兰教义为根据：自从真主创造了人，他就派遣先知来引导他们，给他们指出在世上应该遵循的正道，为他们获得永恒福祉作准备。最终他判定，人类已经达到如此成熟的地步，可以接受他的最后启示，可以理解和领会指导他们各方面行为的各项法则。他选择来执行这最后一项任务的先知是一位出生于麦加城的阿拉伯人名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他是古莱什部落的人。

担任过先知使命的穆罕默德的先辈（除一些次要人物外）有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基督，他们都根据天意降示给他们的经文，宣扬信仰唯一的神。信仰那些先知和经文的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被称作“信奉圣书的人们”（*ahl al–Kitab*），他们作为掌32 握了部分真理的人，有权得到穆斯林的特殊照顾。神的旨意从一开始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只相信他是最高主宰。因此，接连而来的启示都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神论和普济性。第一个得到这种启示的民族是犹太人，但他们在自己历史进程中，偏离了当初的启示，把一神论信仰据为己有而不传予他人。为了纠正背离他原来旨意的这一偏差，神派遣耶稣来到人世，他确实恢复了一神论的普济性。但是基督教徒也像犹太教徒那样偏离了基本原则，他们声称耶稣是神的儿子从而偏离了一神教教义。于是，穆罕默德被赋予使命，把人类带回到真正的普济的一神教，即伊斯兰教，因此穆罕默德不能说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伊斯兰教是原已存在的宗教），①而是一系列先知中的最后一位，是“最

① 《古兰经》第28章53节：信奉圣书的人说：在降示真言（指古兰经）之前，我们已是穆斯林。

后的先知”（*khātimu l-anbiyā'*）。因此伊斯兰教崇敬所有以前的先知，认为他们都是传达神的旨意的使者。按照伊斯兰教教义，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只是神的旨意才使他的诞生成为奇迹，就像神当初创造最初的人—— 人类的始祖亚当那样。不能因此就说他有一点点神性。他的母亲，童贞女圣母玛利亚（穆斯林称之为毛拉图纳·米尔雅姆 *mawlātunā Miryam*）。在伊斯兰世界享有最高的尊敬。基督并非被犹太人所杀害，只不过是神召唤他回到神的身边。他无须赎免亚当之罪，因为神在强制亚当离开天国去尘世生活之前已经宽恕了他。

穆罕默德自己坚认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并且明确区分自己作为人的属性与自己作为先知的作用："我是像你们那样的凡人。在神启示给我的事情上，你们必须遵从我的教导，但是你们比我更懂得你们自己的世俗事务。所以我在这些方面的意见不是有约束力的"。[②] 但是穆罕默德既然是神的使者，他的行为会违反神的旨意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伊斯兰教信仰中同样也牢固地树立起相信他在世俗事务方面的指引。我们将在下文谈穆罕默德作为先知的言行传述 ——"圣行"（*sunna*, 逊奈教规）的作用问题。

穆罕默德的生平

在这里详述穆罕默德的生平难免过于冗长而显得多此一举。由于已有大量文献以种种文字叙述这位先知的生平，本章将只谈一些主要事件。

公元 7 世纪前夕阿拉伯半岛上居住着许许多多政治上独立的部落，他们组成一个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的群体。他们大多数人是游牧民（贝都因人），但在阿拉伯半岛南部 33 和各个绿洲中则有定居的人口务农。沿着从印度洋海岸通往地中海的古代商路有一些城镇，城里的居民从事商业但仍然保持游牧民的生活习惯和道德准则。麦加是阿拉伯半岛的商业和宗教中心。伊斯兰兴起之前阿拉伯人的宗教主要是万物有灵论（泛灵论），他们崇拜的神祇精灵据信是栖居于巨石、山岩、树木或井泉之中。有些神祇是来自天上的星星（如太阳、金星）。已经有一个最高主宰的概念，叫做安拉（Allāh），但安拉不是崇拜的对象；更重要的似乎是崇拜拉特（Al-Lāt,女神）。麦加一座叫克尔白的古代神殿里供有若干这类神祇的偶像。总之，当时的阿拉伯人（不论是游牧民还是定居者）对宗教问题甚少关心，对他们来说，宗教不过是自己祖先习俗的一部分。

在阿拉伯半岛还有一些信仰犹太教的人的大居民点；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改信犹太教的阿拉伯人，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绿洲，与信奉传统宗教的阿拉伯人有类似的"部落"组织。基督教很早已传入阿拉伯半岛，它的一些主要中心是在阿拉伯半岛的南部（奈季兰）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外约旦的沙漠边缘地带。也有基督徒散居各城镇，而在沙漠中则有离群索居的僧侣。

穆罕默德带着神的启示正是被派遣到异教的阿拉伯人那里。他生于麦加，是他父亲

② 因此把穆斯林叫作"穆罕默德教徒"（Muhammadans）或把伊斯兰教叫作"穆罕默德教"（Muhammadanism）都是不正确的。这两个词是按照佛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义的模式引入欧洲语言的，在后两种宗教里创始人被当作神来崇拜。

的遗腹子，从小是个孤儿。直到 40 岁他一直以经商为生。他做生意以诚实公平著称，此外别无与众不同的地方。大约在公元 610 年，他第一次得到神的启示。由天使加百列口授的启示，命令他向他的同胞宣讲伊斯兰教教义。这些最初的启示集中在神的唯一性和世界末日，以及劝诫人们不要因世俗事务而忽视宗教，启示还声明了所有的人不分地位高低和贵贱贫富一律平等的原则。

当穆罕默德开始传教并在自已周围集结起信徒们组成的小团体时，麦加的富商和财东寡头集团很快就意识到他宣扬的启示内容的革命性，认为是对他们特权的威胁。另一个危险则是，作为阿拉伯人传统宗教的中心并拥有克尔白圣殿的麦加将由于新宗教的兴起而失去其重要性。每年来自整个半岛的成千上万阿拉伯人到此朝圣是麦加商人巨额利润的源泉。而且，虽然穆罕默德在开始时没有追求麦加的政治领导权，可是他的道德和思想品质由于他的先知使命和同真主的交往而显得力量倍增，这使得他在寡头集团心目中成了危险的眼中钉。所以，直到 622 年穆罕默德和他的团体的历史是一部屡遭迫害甚至是阴谋杀害这位先知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先知命令几个新的信徒包括他的一个女儿及其丈夫移居到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他们在那里受到国王（"尼格斯"）的友好款待。[③] 离开非正义、压制和迫害盛行的地方到别的地方避难以便穆斯林能够在那里积聚力量然后重返故土、重振旗鼓追求符合伊斯兰原则的生活，这种思想是伊斯兰思想的重要精髓，在此后多次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历史中屡见不鲜。

35

当迫害达到高峰时，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离开麦加迁往绿洲城镇耶斯里卜，后来称作麦地那特－纳比（先知城），不久就以麦地那闻名于世。此事发生在公元 622 年，那个年份就是回历元年。从麦加转移到麦地那这一行动称做"希吉拉"（*hidjra*）；通常译做"出奔"（'the flight'）是不正确的，因为阿拉伯语中此字的真正意思是"割断过去的部落联系，开始新的关系。"

穆罕默德是由麦地那的居民请到那里去的，这些人被称为"辅士"（安萨尔，(*Ansār*)；随他从麦加迁到那里的信徒则称作"迁士"（*Muhādjirūn*——参加"希吉拉"的人）这两批人合起来称为"圣门弟子"（*Ashāb*——先知的追随者）。以后一些年直到他 11/632 年去世，穆罕默德着手巩固与加强对穆斯林社会（阿拉伯语称为"乌玛"——*umma*）的统治，击退麦加敌人的攻击，通过外交和战争手段取得阿拉伯各"部落"广泛联盟的最高地位。当他足够强大时，他凯旋重返麦加，成为胜利者和宗教与政治领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真主召回他离开尘世的时候，穆罕默德实际上已是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方的君主，并已作好准备要把伊斯兰教向半岛之外扩张。

古兰经的教义

在麦加和在麦地那，先知都接连奉到启示。这一系列启示分成许多"节"（单数：*āya*、复数：*āyāt*），编排成"章"（单数：*sūra*、复数：*sūrāt*）。长短不一的总共 114 章

③ 参阅本书第 19 章。



图片 2.1 麦地那的情景：这个饰板的图案是麦地那清真寺的立视图。该清真寺建在穆罕默德故居的所在地，穆罕默德之墓位于祈祷室内。许多穆斯林赴麦加朝圣之后，都来麦地那纪念先知。自 17 世纪之后，各清真寺的墙上都挂有这类饰板，估计是朝圣者们捐助的。

36



图片 2.2 麦加的情景。这个饰板制作于伊兹尼克。它的图案是麦加大清真寺及其七层宣礼塔的轮廓的立视图。在庭院中部可以看到“克尔白”(Ka' ba) —— 据说由亚伯拉罕所建，它的一个角上嵌有“黑石”，凡是穆斯林，如有可能，在其一生中至少应来此礼拜一次。每座小建筑物，以至每个门，都用纳斯基字体 (Naskhi script) 写上它的名字。总体图上方是一段古兰经的题词，也是草写体（经文第 9 章第 90 ～ 92 节），提醒人们注意朝圣的职责。

合起来成为《古兰经》。

《古兰经》并非穆罕默德写的"圣书"。"古兰"这个字的意思是"诵读"，穆罕默德所作的是宣读由天使加百列传达给他的真主的教导。"古兰经是完全神授的，然而同时同先知穆罕默德内心深处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神的话通过先知的心涌现出来。"④它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是穆斯林的"圣经"；古兰经在伊斯兰教的地位大不相同，因为穆斯林之看待古兰经就像基督徒之看待基督本人：传达真主的话。基督教的"新约"是基督言和行的记载，伊斯兰教中与之最相似的是"圣训"（哈底斯 *hadīth*）。因此试图像对"圣经"那样对《古兰经》进行文字校勘那是十分亵渎的，可是校勘"圣训"则是许可的，从很早时候起穆斯林学者就一直这样做。 **37**

《古兰经》的教义内容广泛，旨在指导人们处理同真主以及同人类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古兰经》的训诫和原则构成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础。

第一条原则是绝对的一神论，在大概是世界上一切宗教中最简短的信条里明确表达："真主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凡皈依伊斯兰教者只要公开表白这个短句（即"念功"，）即可成为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的先知特性是该信条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没有他的先知使命就不存在伊斯兰教的完整。

"念功"（*shahāda*）于是成了伊斯兰教五项基本功课或"五功"（*arkān al－islām*）的第一功。第二功是"拜功"（*salāt*），即每个穆斯林每天必须做五次礼拜。祈祷使信徒们终日心神专注于真主。祈祷最好是集体举行，或站立或跪坐，排成整齐的行列；全体信徒都要面对麦加方向出声祈祷。祈祷的不可缺少部分是在祈祷以前要按规定净身。因此祈祷也有实用的卫生价值，并且把集体纪律的价值灌输给人们。

第三功是"斋功"（*saum*），包括在莱麦丹月（即太阴年第十月、回历九月——（Ramadān）每日从破晓（并非人们常常认为的是从日出开始）到日落禁止一切肉体享乐（饮食、男女等）。所以"过斋月"这个短语意味着奉行穆斯林的斋戒。病人、斋月旅行者、分娩的妇女、从事艰苦劳动的工人、正在作战的战士可免除斋戒，但要在当年另一个时间里补行同样天数的斋戒。奉行斋戒是一种象征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的行为，它本身就提高精神生活。它还教育富人懂得忍受饥饿折磨的滋味，促使他们同情终年备受这种折磨的穷人。 **38**

第四功是"课功"（*zakāt*），也即对社会尽至关重要的义务。它就是叫做"天课"的义务施舍，把自己手中全年积余的财物拿出一部分给穷人和某几种生活困难的人，所占比例为2.5－10%不等。"课功"强调了乐善好施的重要性，而且在伊斯兰教的早期也有必要以此来维持主要由一无所有的贫困移民组成的社会。"天课"由伊斯兰社会（乌玛）征集然后分配给古兰经所指明的那几类人。它相当于现代国家办的社会福利。

第五功是"朝功"，即每年到麦加朝圣（*hadjdj*）。这个制度反映伊斯兰教一直关注着信徒们应彼此认识并尽量经常聚会。正是在朝圣期间，伊斯兰教启示的普济意义最为明显可见，这时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回历十二月聚集在麦加举行各种仪式，旨在纪

④ R.法兹尔（R. Fazlur），1966年，第33及随后各页。

念亚伯拉罕在该地的牺牲。朝圣是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但他只是在具备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非得履行这个义务不可：能自备旅费、保证旅途安全和本人身体健康。他还必须能够在自己远出的期间给家庭留下足够的生活资料。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能够履行这项义务的人数与穆斯林总人数相对比来说是很少的。然而，即便如此，朝圣仍是今日地球上人类最大规模的多民族的聚会。朝圣的人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亲眼目睹，他们本身是不分种族、不分语言、遍及全球的穆斯林兄弟的成员。它使朝圣者加强了对伊斯兰价值标准的深刻认识，使他在归来后成为一个受尊敬的人，因为他到过先知穆罕默德居住的地方，到过真主降示古兰经的地方。

另一宗穆斯林信条见于《古兰经》第4章第135节："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确信他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神、经典、使者和末日，谁确已深入迷途了。"

审判日是伊斯兰教信仰的基石之一；到复活日和审判日来临时人类的全部历史将告结束。死者在坟墓中等待这个时刻，而众先知和殉道者则径往天堂。所有的人在最后审判时刻将出现在真主面前根据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然后或升天堂或入地狱。

《古兰经》还包括对世俗生活的一系列禁令和劝告。它禁止吃猪肉和其他一些动物，禁止饮酒和其他含酒精饮料。在第17章第23－40节，它还对人们的日常行为作出指导：挥霍、骄傲自满受到谴责，信道者被命令应使用公平的度量衡。

奴隶制虽被认为是得到承认的制度，然而必须善待奴隶，允许他们嫁娶、鼓励他们赎买自身的自由。古兰经劝告主人释放已成为信道者的奴隶。⑤

伊斯兰教义宣称男女平等。先知声称："在教法面前妇女完全是男人的姐妹"。但是，与正统教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习俗却使伊斯兰教这一美好的方面黯然失色。但是在法律上，穆斯林妇女享有的法律地位足以使其他宗教制度下的妇女不胜羡慕。穆斯林妇女一向有权自行告状而不必委托她的丈夫，并且有权不受丈夫的约束自行处置自己的财产。不要求妇女给丈夫带来嫁妆，倒是丈夫必须给予新娘一定数额的钱并给予她一定数量的礼物，这一切都成为妻子的个人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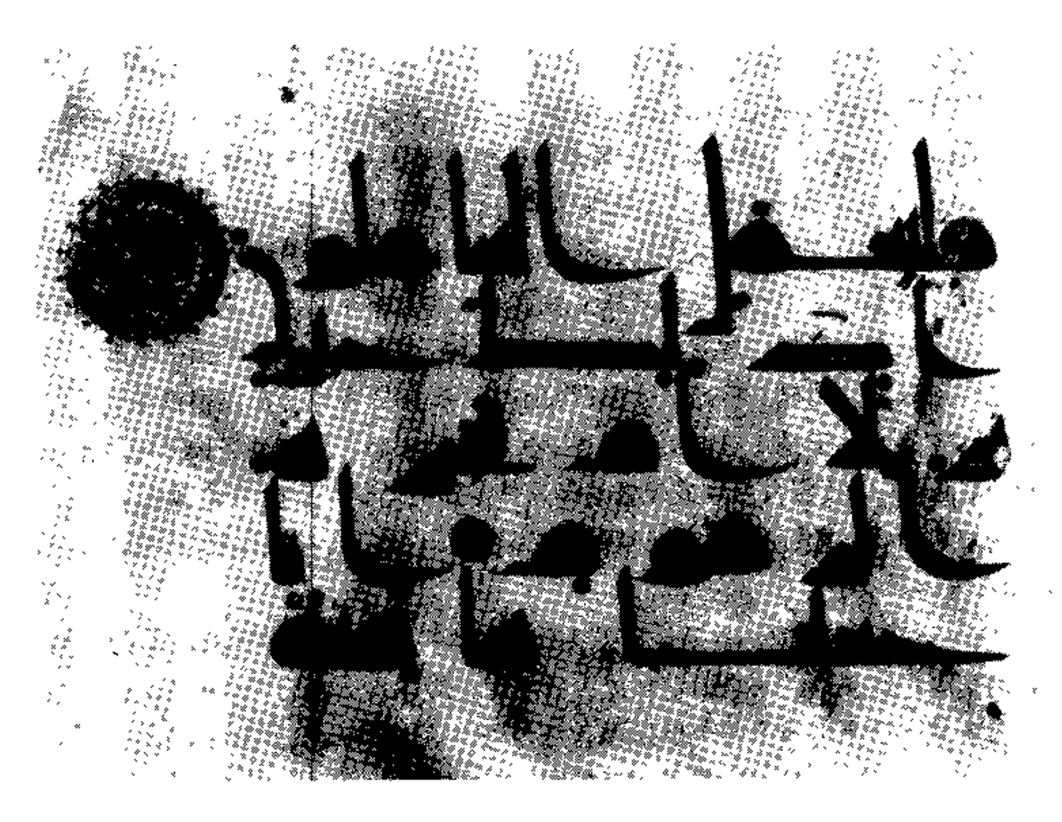
40

《古兰经》允许男子有4个合法妻子；这同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比较起来是个进步，那时候拥有妻子的数目不受任何限制。并且，伊斯兰教使多妻制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可以认为它已向废除或者至少是减少这种社会现象迈进了一步。这从下述诸节《古兰经》文句中可以清楚看出来："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者娶你们占有的女战俘。"（第4章第3节）；"即使你们希望公平，你们也不能公平地待遇诸妻"（第4章第129节）。⑥

⑤ 关于伊斯兰教对奴隶制态度的讨论，参阅本书第26章。

⑥ 著名的埃及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卜杜（Muhammad, Abduh）（卒于1323/1905年），在斟酌解释这些句节的力量时认为古兰经实际是推行一妻制。参阅R. 利维（R. Levy），1957年，第101页。

39



图片 2.3 用古阿拉伯字体（库法手写体，Kufic script）书写的古兰经经页，公元第 9 世纪，阿巴西亚（伊拉克）

沙里亚和斐格海

伊斯兰教不仅是一个宗教，它是一整套生活方式，适应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为各行各业的人提供指导：个人的与社会的，物质的与精神的，经济的与政治的，法律的与文化的，国家的与国际的。⑦

“沙里亚”（*sharī'a*）——教规、教法，是详尽的行为规范，包括各种箴言戒律，指导礼拜的方式、方法以及道德和生活的各项准则。它由一系列律例组成，它们作出各种许可和规定，判断正确与错误。各位先知虽然都有同样的宗教信仰（*dīn*）但是所带来的却是适合于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的不同的“沙里亚”。穆罕默德作为最后一位先知，带来了最后的规范，将永远适用于全人类。已往的“沙里亚”因此废除了，因为有了穆罕默德的全面的“沙里亚”。

伊斯兰教教规、教法的源泉是《古兰经》和圣训（哈底斯，*hadīth*），后者是圣门弟子保存并流传下来的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成千上万条圣训由学者们筛选汇辑成为各种版本的言行集，其中最著名的是布哈里（256/870 年逝世）和阿布·穆斯林（261/875 年逝世）的选辑本。先知穆罕默德言行传述的内容称作“逊奈”（*sunna*），即穆罕默德的举

⑦ K. 艾哈迈德（K. Ahmad），1976 年，第 37 页。

止行为——圣行。

整理“沙里亚”的训示并加以阐释的学问叫作“斐格海”(*fikh*, 伊斯兰教法学体系), 从事这种学问的学者叫做“法基赫”(宗教法理学家, 单数: *fakīhs*, 复数: *fukahā*) 或称法学博士;“斐格海”是最卓越的伊斯兰学问,“法基赫”则被认为是“乌里玛”(*'ulamā'*)—— 伊斯兰贤哲或伊斯兰学问家 (单数: *'ālim*)。

41

穆斯林社会征服了自古继承的社会经济环境极为不同的许多地方之后, 遇到了大量问题。另外, 由于建立了一个与原来在麦地那的社会大不相同而且复杂得多的国家, 又产生其他不少问题。但是《古兰经》很少谈到具体问题, 而只是定下指引穆斯林生活的一般原则. 所以十分明显, 穆斯林社会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不论是在圣书或是先知的圣训里都难以找到答案。于是, 伊斯兰法添进了另外两种来源。第一种是按思辨原则进行类比推理 (*kiyās*), 即按照古兰经或根据一条具体圣训业已获得解决的类似事例与目前需要解决的事例进行比较。第二种是问题也可以由著名的伊斯兰法学博士采取公议原则 (*Idjmā'*) 得出。

在 2/8 至 3/9 世纪之间, 穆斯林世界各处的知识界中心, 特别是麦地那和巴格达两地的著名学者, 将伊斯兰法全面整理成为条理连贯的体系。他们对这项巨大任务的研究方法各自不同, 于是形成了四个伊斯兰教法学学派 (*madhhab*, 复数: *madhāhib*) 各以其创始人命名, 他们都具有伊玛目 (*Imām*) 这一荣誉称号。

这四大伊斯兰教法学学派是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和罕百里学派。他们都是正统派 (逊尼派), 区别主要在于具体细节; 因此把这些学派称为教派是不恰当的。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则编纂本派法典。各位伊玛目一致同意《古兰经》的经文和所有穆斯林学者都认为可靠的圣训, 然而他们根据个人意见 (称作“伊智提哈德”*idjtihād*, 伊斯兰立法原则) 对这个或那个教法原始资料给予优先地位。

虽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更, 目前每个学派在特定的地域受人信奉: 哈乃斐学派在历代突厥人王朝统治的地区占优势, 即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中亚细亚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北部。沙斐仪学派则主要是在印度洋沿岸, 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和东非延伸到印度尼西亚。马立克学派很快就在北部非洲、穆斯林西班牙以及在西苏丹和中苏丹牢固地树立其地位。最后罕百里学派, 过去曾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到广泛信奉, 如今实际上只限于沙特阿拉伯。

各学派之间的区别不是根本性的, 主要是有关仪式的具体细节和教法的次要点。伊斯兰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依照下述概念来评定人类的一切行为与关系: 绝对义务 (“瓦吉布”*wādjib*)、可嘉许的行为和关系 (“曼杜卜”*mandūb*)、无关紧要的行为和关系 (“木巴哈”, *mubāh*) 受谴责或不赞成的行为和关系 (“麦克鲁海”, *makrūh*) 和被禁止的行为和关系 (“马兹胡尔”, *mazhūr*)。整个伊斯兰法充满了宗教和伦理的考虑, 例如: 一般禁止放款取息或发不义之财, 禁止赌博和其他方式的投机行为, 关心订约双方的平等地位, 关心公正平均以及痛恨极端行为。

42

另一个使“斐格海”有别于其他法律体系的特点是, 它是由民间的法理学家制订并

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任何已有的法律体系中产生出来：它创造了自己。国家没有起立法者的作用，也没有以政令颁布法律，在很长时间里没有由国家机关颁布的官方法典。相反，这些法律乃是收编在学术性手册中而具有法律的效力，在实际司法裁判中起着参考作用。

伊斯兰教的宗教结构，忠实于它的平均主义原则和良知，从未产生过任何形式的外部组织或任何种类的等级制度，没有教士职务也没有教堂。每个人是他本人的教士，真主与信徒之间并无中间人。它虽承认公议原则（*idjmāʿ*），伊斯兰法学博士的一致意见被认为是教义的有效来源，却既没有宗教会议也没有法庭来颁布它的裁定。

一致意见的达成没有固定的形式，或是由那些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人默许同意，有时是经过长时间的书面争论然后大多数人达成统一意见。于是，伊斯兰教教义在各个领域都更趋精致与周密，由许多著名的杰出思想家使之精益求精，这些学者遵循先知穆罕默德的著名教诲："追求学问吧，从摇篮直到坟墓。"

但确有这样的情况，当"乌里玛"力求为礼拜仪式和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确立伊斯兰戒律的时候，往往过分注重神圣教法的形式方面，而没有为个人的虔诚礼拜留下足够余地，于是兴起一种逆反现象，以伊斯兰神秘主义——苏非主义（sūfism）[8]的方式出现，反对唯理智论和形式主义。其实，在早期的穆斯林中间已经具有强烈的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公元12世纪以前的许多著名神秘主义者对伊斯兰教信仰的强化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些苏非主义信徒倾向于藐视"沙里亚"所规定的宗教义务，认为自己可以不负担穆斯林的普遍义务。在11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加扎利（505/1111年逝世）将苏非主义与正统的伊斯兰信仰搀合，既强调需要亲身靠拢真主，也强调遵奉"沙里亚"教规教法的义务，认为两者都是穆斯林宗教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不久以后，苏非派的人开始组成神秘主义的教团或兄弟会（阿拉伯语叫做"图鲁克"，*turuk*；单数为"塔里卡"，*tarīka*），团结在称作"谢赫"（*shaykhs*，教长）的各个精神领袖周围。这些教团中最早的一个是卡迪里教团（"卡迪里亚"，*Kādirīyya*），由阿卜德·卡迪尔·吉拉尼（561/1166年逝世）在巴格达创建，不久就扩展到各个穆斯林国家。此后，教团的数目与时俱增，结果几乎每个穆斯林都属于非此即彼的教团，参加称作齐克尔（*dhikr*）的神秘的宗教仪式（请神或应答祈祷）。 **43**

与这些受人尊敬和得到承认的教团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对圣徒的崇拜，这些圣徒在马格里布称作"马拉博"（*marabout*，伊斯兰教隐修士）。有许多"马拉博"假装创造奇迹、制造各种护身符和驱邪物，并且声称能与真主直接沟通因而能替别人求情，以此欺骗剥削天真的穆斯林。这是严重违反伊斯兰教义的，因为每个穆斯林是他自己的教士，唯有真主才能受人崇拜和直接靠拢。伊斯兰教使人完全独立于真主以外的一切。从真正的伊斯兰教观点看，崇拜"圣徒"乃是赘疣般寄生生活的结果。

8　sufis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 *sūf*（羊毛），表示这些人习惯穿着羊毛织的长袍。在阿拉伯语苏非主义称作"塔苏武夫"（*tasawwuf*）。

伊斯兰教的派别

教派发生重大分裂其根源是政治性的；成为教义上的分歧只是后来的事。

早期穆斯林众说纷纭的主要问题是穆罕默德的继承问题；不是作为先知——因为他是最后一位先知——而是作为伊斯兰社会的首领。在他生前，穆罕默德曾在几个场合指出，治理这个社会的有效制度是“舒拉”（*shurā*），也即协商，就是今天所谓的民主。他死后，他的直接继任者是经过选举产生的，由此开始被称为哈里发。最早的四位哈里发，穆斯林称作“（真主）使者的继任人”（*al-k̲h̲ulafā' al-ras̲h̲idūn*），他们是阿布・贝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他们都属于古莱什部落，都与穆罕默德有亲戚关系。阿里更是穆罕默德的堂兄弟。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被一帮叛乱的穆斯林杀害，因为他的某些政策触怒了他们，于是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布在当时的首都麦地那被推举为哈里发。然而有些圣门弟子不承认他，特别是叙利亚总督穆阿威叶。结果在内部，阿里的追随者与穆阿威叶的追随者发生剧烈冲突。阿里哈里发同意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由两名成员组成，一名代表他，另一名代表穆阿威叶。但是阿里的追随者有很多人拒绝这种解决办法，离开了他以表示不满；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哈列哲派〔源自阿拉伯语哈列哲（*k̲h̲arad̲j̲a*）意思是“退出”〕。他们认为仲裁（其结果对阿里不利）是背叛真主的行为，唯一的仲裁人只能是真主。1/7 世纪和 2/8 世纪期间，某些地方甚至是在更晚时期、哈列哲派屡次起来反叛，先反对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和中央政府，后来又反对阿拔斯王朝，反叛活动主要发生在伊拉克、阿拉伯半岛、伊朗和邻近地方。哈列哲派 **44** 本身不久又分裂成许多派别，它们在理论和实际行动上都有差异。但是有若干共同特点。他们都坚持采取行动的重要性，认为不能仅仅停留于信仰，他们断言凡犯了严重罪过的人就是不信道者和叛教者，应予处死。他们的主要教义之一是关于伊玛目职位，也即关于穆斯林社会的领导职位。其他穆斯林认为伊玛目（或哈里发）的职位是某些世系的特权（或是统指古莱什部落的人或是特指阿里家族），和他们相反，哈列哲派坚持任何人（即使是一个黑奴）都可以当选为穆斯林社会的首领，只要他具有虔诚、正直、和宗教知识这些必要的条件。这种民主倾向，有时濒近于无政府状态，吸引着因这个或那个原因对政府不满的许多人。总的说来，哈列哲派虽然主张民主、虔诚，宣扬纯正的伊斯兰教，都由于对其他穆斯林不能宽容而排斥许多人，因此在哈里发国家东部一些地方只能是少数派。但是在马格里布，哈列哲派的几个派别（易巴德派、努卡尔派和苏非派）在对伍麦叶王朝的苛政不满的许多柏柏尔人中间为自己的教义找到肥沃的土壤。⑨

留下同阿里一起的那些穆斯林则相信哈里发职位（他们更喜欢把这种制度称作伊玛目职位）应归于先知的家族，以阿里及其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婚生后裔为代表。这些穆斯林被称为“什叶图・阿里”（*S̲h̲ī'atu 'Alī*），也即阿里党，欧洲语言中他们

⑨ 见本书第3章、第9－12章。

的“什叶派”(Shī'ites)名称由此而来。哈列哲派与正统伊斯兰教只是在政治和伦理问题上有分歧，什叶派则走得更远，他们添加了不少纯属宗教内容的新教义。什叶派反对伊斯兰社会协商一致的公议原则，而代以另一种理论，认为每一时代都有一位从来不犯错误的伊玛目，真主把指引人类的任务只交托给他一人。第一代伊玛目是阿里，以后的所有继任者都是他的直系后裔。伊玛目被认为是神授的，是信徒的统治者和导师，他们有超人的本领，那是从神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通过穆罕默德传给他们的。因此，伊玛目是唯一有权领导穆斯林社会的人；什叶派认为，尽管最后一位伊玛目从世上“隐遁”了，他仍继续以“隐遁伊玛目”的身份进行指引。他将有一日以马赫迪（Mahdî——救世主）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世上重建和平和正义。

什叶派很快又分裂成许多派别，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是由谁是“隐遁伊玛目”这个问题引起的。在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派叫做十二伊玛目派（*Ithnā' ashrīyya*），他们承认阿里的第十二代后裔穆罕默德·马赫迪，他于266/880年隐遁。当今十二伊玛目派的大本营是伊朗，自11/16世纪以来什叶派的这一支一直是那里的国教。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印度也有重要的支派。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时代，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人数更形增加，主要在大城市。 **45**

承认第七代伊玛目伊斯玛仪的什叶派，从主体分离出来被称为伊斯玛仪派或“七伊玛目派”（*Sab'iyyuna*）。除了与其他什叶派共有的信仰以外，伊斯玛仪派发展了一套主要以新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特殊的教义，如表现在众先知和众伊玛目身上的心性灵明的理论。在他们对《古兰经》的注释中，他们探求恰是新成员易于理解的隐晦的意义。很长时间，伊斯玛仪派以秘密会社方式从事活动，随着法蒂玛王朝的建立才公开露面，该王朝是什叶派各支派中最成功的一支，建立起一个从大西洋岸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和汉志的帝国。[10]伊斯玛仪派后来的分支有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活动的德鲁兹派（*Druzes*）。再后有“阿萨辛派”(即哈萨辛派，*al–Hashīshiyyūn*)，这是一个恐怖主义派别，6/12世纪至8/14世纪活跃于中东，中心地在伊朗和黎巴嫩。

在穆斯林各派的斗争中正统派最终获胜，于是出现了逊尼派，由拥护“逊奈”（即先知穆罕默德的行为——圣行）的人组成。现今逊尼派占全世界穆斯林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逊尼派与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教义分歧在于：逊尼派的教法来源是《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公议原则和推理类比，而什叶派教法的四大基石乃是《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和众伊玛目的圣训、众伊玛目的公议以及理性。什叶派虽然也到麦加朝圣，但他们更喜欢瞻仰位于伊拉克的纳杰夫城和卡巴拉城的阿里和他儿子侯赛因的陵墓。

并非所有阿里和法蒂玛的后裔（他们有权享有“谢里夫”*Shārif*这一荣誉称号）全是什叶派教义的信徒。大部分谢里夫过去是现在也是逊尼派。在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谢里夫执政成为素丹或埃米尔，如在摩洛哥（伊德里斯王朝以及萨迪斯和阿拉维两个由谢里夫执政的王朝）以及汉志、伊拉克和约旦的哈希姆王朝，他们信奉正统派，从不宣

---

[10] 参阅本书第12章。

称有什叶派所说伊玛目拥有的那种超人本领。

尽管如此，源于什叶派的一个概念（相信马赫迪必将降临人世）却渗透进了逊尼派伊斯兰教。它不像在什叶派里那样成为正式的教义，而是在大众化信仰的水平上把马赫迪看作和弥赛一样，将重返世上杀死反对基督的人，使世上充满正义，如同世上到处都是非正义和暴政之前那个样子。在许多世纪中，马赫迪已不止一次出现在各个穆斯林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苏丹的马赫迪——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和索马里的马赫迪——穆罕默德·伊本·阿卜迪尔。

伊斯兰教对非穆斯林的态度

伊斯兰教严格区分两类非穆斯林。其中一类已经归属于某个宗教体系，信奉神所降示的某本圣书，也是所谓的“信奉圣书的人”。另一类非穆斯林则是多神论者、偶像崇拜者或信奉传统宗教者。依照伊斯兰教义，神的启示是陆续降赐的，先知是历代相承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是已经“信奉圣书的人们”，不能强迫他们接受伊斯兰教。这种宽容态度也适用于祆教徒以及信奉某种古代近东宗教体系的萨比教徒，后来甚至也适用于印度教徒（尽管他们信奉众多神祇）和佛教徒。

至于第二类非穆斯林，既然先知穆罕默德受神的派遣特别是要对那些尚未奉到任何启示指引的人传布伊斯兰教，他和他的继任者就必须对传统宗教进行搏斗，使“异教徒”改变信仰。给予他们的选择是，或者成为穆斯林，或者进行战斗；如果战败，他们的命运就是俘虏和成为奴隶。

关于“吉哈德”(*d̲jihād*) 有许多错误的观念。这个字通常译成“圣战”，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它丝毫没有这种含意，它的原意是尽最大努力进行“奋斗”。能说明此字真正含意的最好例证是穆罕默德在一次对一个信奉传统宗教的阿拉伯氏族进行讨伐归来时所说的话：“我们从一场小吉哈德归来为的是完成大吉哈德，也就是说为灵魂的完善而奋斗。”

就“吉哈德”作为一种战争活动而言，早期确实存在过以它作为伊斯兰教第六功的倾向，主要是在哈列哲派中间，但这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各个伊斯兰法学学派（罕百里学派除外）都认为，在符合某种条件的情况下，“吉哈德”是一项义务，所谓条件是非信徒先挑起敌对行动，并且要有成功希望。在特定情况下，“吉哈德”可以成为连奴隶、妇女和未成年者也义不容辞的职责；这就是说，如果敌人进攻穆斯林领土，谁不履行这个职责，谁就是罪人，就是伪善者。

穆罕默德死后，伊斯兰国家历次向外扩张的战争，其目的并不是使被征服的人们改变宗教信仰，因为这些人多数信奉的宗教有神所降示的圣书，他们是基督教徒、祆教徒或犹太教徒。这些人必须交纳人头税（“吉兹亚”，*d̲jizya*），然后成为受保护的依附者（“希姆米” *d̲himmi*），并不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使个人或甚至使一些群体改信伊斯兰教仅仅只是“吉哈德”极其次要的目的；真正的主要目的是使伊斯兰国家得以扩张，使沙里亚在其领域内享有无上权威。这表现为对伊斯兰教地区（*Dār al-Islām*）

和战争地区（*Dar al-harb*）严加区别。"伊斯兰教地区"一词并不意味着所有居民必须是穆斯林而只是说它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在那里伊斯兰教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至高无上，伊斯兰教的集体礼拜得到奉行。"战争地区"是伊斯兰教地区的对立物，即世界的其他部分，伊斯兰教在那里尚未占统治地位；从理论上说，战争地区将有一天消失而并入伊斯兰教地区，正如古兰经（第9章第33节）所说："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使者，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即使以物配主者不愿意。"

尽管如此，从3/9世纪之后，统一的哈里发国家分裂成一些小国家，这时穆斯林世界同"战争地区"建立起互相宽容的关系；对战争地区的征服从人间历史推迟到将来救世主降临之时。支配同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国政治和商业关系的是承认他们中间有的属于中间范畴——停战地区（*Dar al-sulh*）。这为同非穆斯林国家的和平接触与交往提供了主要的法理依据。另一个便利此种接触的措施是使用通行许可证，叫做"阿曼"（*aman*），一个穆斯林国家的首脑可对任何非穆斯林国家臣民（当时称之为穆斯塔米农——*musta' minan*）颁发通行许可证，这不但使外交使节的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得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商人可以在穆斯林国家中居住。

伊斯兰教的扩张
哈里发国家的兴衰存亡

伊斯兰世界的兴起及其对非洲各地的影响，有些方面在第一章已有涉及。本章则将对自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到5/11世纪末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历史略述梗概。伊斯兰世界非洲部分各地的具体历史本书将分章予以叙述，本章的注意力将更多地集中在伊斯兰世界东部诸省的发展情况。其所以有此必要不仅是因为伊斯兰世界作为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文化地区有其明显的重要性，而且更因为在波斯、阿拉伯半岛及其邻近地区的历史性变革所产生的反响对印度洋地区，因此也对东部非洲一些地区，有直接的重要性。

在最早的四位哈里发（"真主使者的继任人"）——阿布·贝克尔、奥马尔、奥斯曼和阿里[11]——统治时期，穆斯林阿拉伯人开始向阿拉伯半岛以外进行扩张。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氏族群体这时由共同信仰的纽带团结起来，禁绝自相残杀的战争，他们在一批出身于麦加的出色将领率领下，在短短几年里对两大强国（拜占廷帝国和萨珊王朝统治下波斯）的军队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在叙利亚与拜占廷人作战，只花了两年时间，自此之后拜占廷皇帝及其军队就在15/636年撤离这些省份，一去不复返。征服波斯历时较久，初战失利以后，阿拉伯人就一再取胜。16/637年卡迪西叶战役和攻克首都泰西封使得底格里斯河以西伊拉克的肥沃低地对阿拉伯人开放无遗。从他们新建立的军事基地巴士拉和库法，穆斯林军队侵入伊朗高原追击败退的波斯军队。最后一场大战尼哈温德战役（21/642年）决定了萨珊帝国的命运。此后，穆斯林占领了伊朗的其他部分，继续向东方进军，到29/650年他们抵达印度边境、伊拉克北部、亚美尼亚和阿姆 48

[11] 阿布·贝克尔，11/632－13/634年；奥马尔，13/634－23/644年；奥斯曼，23/644－35/656年；阿里，35/656－40/6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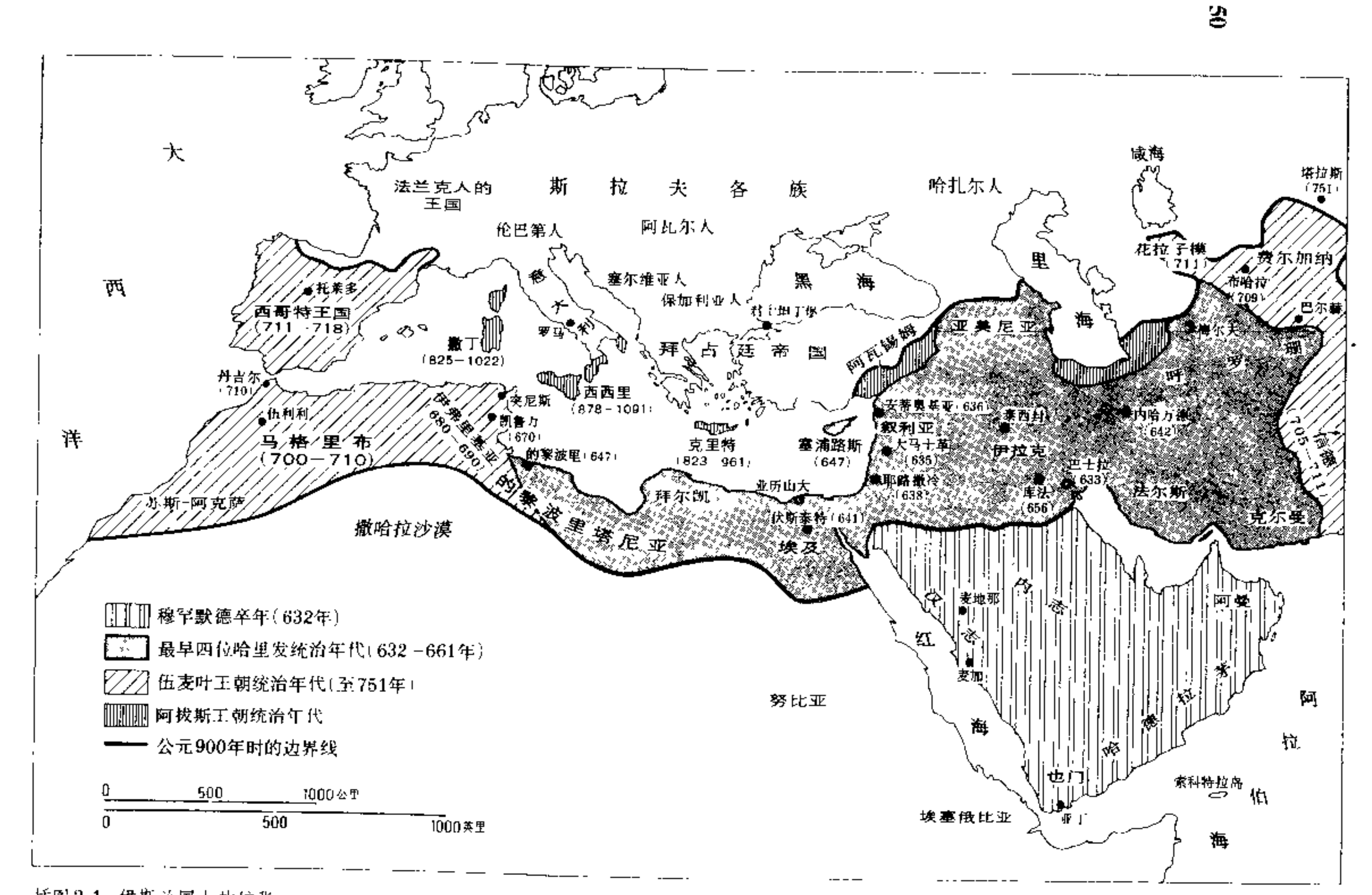


插图2.1 伊斯兰国土的扩张

河（乌浒河）畔。

征服叙利亚之后，阿拉伯军队转向埃及，它乃是更易征服之地。18/639－21/642年，整个下埃及连带它的首都亚历山大被入侵军队攻下，拜占廷从而又丧失一个富裕省份。它后来成为阿拉伯人向北非进一步推进的出发点。[12]

穆斯林取得闪电式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那两个帝国经历了长时期的一系列战争、财力、兵力都已疲竭。而且拜占廷人受境内闪米特人和科普特人臣民的憎恨，因为他们横征暴敛，迫害所谓“异端”的一神论教会。萨珊帝国的处境颇为类似；在伊拉克几个最富有的省份里居住着信基督教、讲阿拉米语各族，他们反对信袄教的统治阶级。在阿拉伯人大举进攻的前夕，王位争夺已使这个帝国四分五裂，政治和军事结构都遭到削弱。总的说来，在大多数被征服的国家中，当地居民对入侵的阿拉伯人没作什么反抗，因为改朝换代他们所失甚少或毫无所失；某些情况下，穆斯林甚至受到欢迎。

奥斯曼死后爆发阿里与穆阿威叶之间的内战。这场内战一直持续到阿里去世，伍麦叶王朝41/661年上台以及该王朝迫切需要巩固其政权时才告结束。阿拉伯国家的向外扩张不得不因此暂停了若干年。但是，穆阿威叶掌权时边疆已明显扩展。在北非有乌克巴·伊本·奈菲领导下的扩张疆界行动；在东方，整个呼罗珊省（伊朗东北部和阿富汗）遭到征服，阿拉伯人越过了乌浒河（43/663年至54/674年）。在这段时期里，阿拉 **49** 伯军队两度突入拜占廷首都的城垣，但都未能征服它。第三次也是最认真的一次努力是隔了很久之后进行的，那是98/716－717年，阿拉伯人同时从海上和陆地进攻君士坦丁堡没有成功。直到9/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把这个东方基督教的堡垒纳入伊斯兰世界。

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65/685－86/705年）和哈里发瓦利德一世（86/705－96/715年）在位时，发动全面出击的第二次征服高潮。在西部征服了整个马格里布并入侵西班牙；在东北征服了中亚细亚（河间地带，Transoxania），与此同时阿拉伯军队推进远达印度河，给哈里发国家添加了新省信德。外高加索战事的成果是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进一步向西推进受到法兰克人的阻挡，而向高加索以北的觊觎则为突厥族哈扎尔人所挫败。结果长时间里帝国的疆界限于比利牛斯山脉和高加索。[13]

因此，穆罕默德死了100年之后，阿拉伯国家已拥有庞大的领土而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了。此时阿拉伯人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议的主人，形成唯一的统治阶级。伍麦叶王朝的政策是使这种情况永存：凡非穆斯林必须纳税，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得以免交，甚至还得到从这点收入中付给他们的年金。所以阿拉伯人统治阶级并不喜欢被征服地区大批人皈依伊斯兰教，每个新穆斯林必须依附于一个阿拉伯氏族群体，做一名受庇护的依附者（单数：“马乌拉”，*mawla*；复数：“马瓦里”，*mawalī*），这些新穆斯林仍须照常纳税。另一方面，被征服各族，不论他们是波斯人、科普特人还是阿拉米人（居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日益增多的人进入日益复杂化的政权机构任职。由于阿拉伯人过惯游牧

---

[12] 参阅本书第7、第8和第9章。

[13] 114/732年被夏尔·马泰尔在普瓦蒂埃击败的阿拉伯军队似乎只是一支挺进队而不是一支占领军。对哈扎尔人的战争，其目的是否在于彻底征服南俄罗斯草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生活的落后背景，他们无法应付不断扩张中出现的繁重的行政管理问题。因此他们甘愿保留各省原已存在的拜占廷和萨珊王朝的行政体制，交由改信伊斯兰教的当地居民来管理。于是，少数人攫取全部政治权力连同经济特权，而多数人虽然已是穆斯林却毫无所得；这种情况所引起的矛盾是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其结局是伍麦叶王朝最终覆灭，新的阿拔斯王朝随之兴起。后者胜利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得到所有不满分子的支持，所谓不满分子主要是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他们要求在凡信徒一律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中享有自己应得的全部权利。阿拔斯王朝的革命否定了"阿拉伯王国"（伍麦叶王朝时期人们有时如此称呼），开创了按宗教界线而不是按民族界线区别对待的伊斯兰帝国。阿拉伯人失去了作为伊斯兰教最先传播者而享有的特权地位，但阿拉伯语继续是国家、文学和科学的用语，为非阿拉伯血统的各族人民广泛使用。

伍麦叶王朝时期，帝国中心是叙利亚，首都在大马士革；虽然绝没有忽视东部诸省，但主要注意力却自然地转向地中海地区——埃及、北非和西班牙。

阿拔斯王朝兴建巴格达（144/762年）把首都由叙利亚迁往伊拉克，这不仅仅是地理上帝国重心的转移，而且也是开辟新纪元的象征性行动。伍麦叶王朝强调阿拉伯主义，他们的后继者则代之以强调伊斯兰教作为政权的基础，提倡正统派伊斯兰教成为哈里发政府当局一项主要任务。

阿拔斯王朝当权的第一个世纪，哈里发国家的领土继续得到扩张，但其规模稍逊于前：里海诸省被兼并进来，处于附庸地位和阿格拉布王朝在212/827－828年开始其对西西里的征服。另一方面，阿拔斯王朝的国土自一开始就比伍麦叶王朝的国土小得多，因为穆斯林西班牙从未归属于它。一个完全独立的王朝已于138/756年在西班牙由伍麦叶家族的后裔建立起来，它延续了两个半世纪。在最初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阿拔斯王朝对埃及以西的所有非洲行省都失去控制，或是输给哈列哲派，或是输给伊德里斯王朝。184/800年，伊弗里基亚总督阿格拉布实际上独立，建立起自己的王朝。[12]

已往时代大帝国逐渐瓦解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用当时可以得到的交通工具没有可能从一个中心点对有着形形色色居民、而其文化和经济水平又各不相同的各个地方所组成的巨大版图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且由此引出的必然结果是，各省总督往往叛离中央政府。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哈里发国家，由于出现异端教派持不同意见的运动（常同社会动乱缠在一起），上述的一般性原因就更加突出。

可是，到3/9世纪的下半叶，接连出现几个精干的哈里发，阿拔斯王朝才维持住了有效的统治和控制。只是在僧祇人起义之后，[13] 不可避免的瓦解进程才势头越来越大。在伊朗和中亚细亚以及在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出现了一系列短命的当地王朝。4/10世纪期间，甚至阿拔斯王朝国土的核心伊拉克，也落入什叶派的白益王朝掌握之中，他们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成了随意摆布的傀儡。在西部，法蒂玛王朝建立起敌对的哈里法国家，开始实施他们统治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宏伟计划。他们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却使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从阿拔斯王朝的领土分裂出去。由于317/429年西班牙的伍麦

[12] 参阅本书第10章。

[13] 参阅本书第1章和第26章。

叶王朝的阿卜德·拉赫曼三世进封“信徒们之王”（*amīr al-mu'minīn*）这个哈里发称号，一时穆斯林就有了三个哈里发。虽然5/11世纪中叶突厥族塞尔柱人（他们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把阿拔斯王朝从白益王朝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准备恢复这个王朝哈里发政治权力的意思。

中亚的突厥人自3/9世纪以来一直是左右穆斯林近东国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穆斯林各国的军队主要由突厥骑兵组成，突厥族的将军（埃米尔）很快就成了操纵国王废立的后台。塞尔柱人入侵的新奇之处在于整个突厥族此时都活跃起来力求征服西亚的大部分地方。这个行动开创了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广大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史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时代。突厥人继承阿拉伯人的事业朝各个方面扩张伊斯兰教。塞尔柱族的先驱者，阿富汗的伽色尼王朝已经在印度河以东开始对印度发动军事进攻，其他王朝也纷纷步其后尘，结果其中最强大者莫卧儿人（他们于10/16世纪开始强盛）得以宣称印度的大部分归属了“伊斯兰教地区”。

塞尔柱人为伊斯兰世界添加了小亚细亚东部和中部大片新的领土，那些地方是长期阻挠穆斯林前进的拜占廷基督教帝国的坚强堡垒。其后若干世纪，小亚细亚的其余地方受其他突厥王朝统治；新的突厥穆斯林的攻势由于奥斯帝国的素丹迈赫默德二世法蒂赫在857/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而登峰造极。

在8/14世纪，整个伊斯兰世界除马格里布和穆斯林西班牙外全都归突厥人或突厥化的蒙古人王朝统治，他们给伊斯兰教增添了新的活力。伟大的历史学家伊本·哈勒敦认为，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中几乎普遍占有支配地位是真主关心穆斯林地位的证明。在穆斯林世界经受危机而衰弱无助的时期，真主以其智慧从突厥人中间降赐新的君主，使奄奄一息的伊斯兰世界得以恢复活力，穆斯林得以重现统一。[19]

从伊斯兰宗教思想发展的角度讲，阿拔斯王朝时期是各门宗教学问的形成时期，特　53
别是伊斯兰法学体系（*fikh*）和教义学（*kalam*）。这些学科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形成乃是在穆斯林社会本身内部进行激烈辩论，以及同外部对手，主要是基督教徒和摩尼教徒（宗教二元论者），或者叫做“曾特克斯”，（*zindīks* ——不信神者）进行争论的结果。

总的说来，在穆斯林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穆尔太齐赖教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名称是指穆斯林宗教思想家的一个早期学派，他们受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想使理性的能力为伊斯兰教服务，因而从他们的对手那里接过这种武器用来反对对方。在欧洲文献中，穆尔太齐赖教派有时被称作“自由思想家”或“自由派”，但这类标签是错误的。实际上，穆尔太齐赖教派并非一个宗派，在它的支持者中间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有；他们力图把伊斯兰教的教条描述成不仅在信仰上可以接受而且在理性上也能接受，并且设法对宗教信仰作出系统表达。在穆尔太齐赖教派所论述的主题中最主要的是关于真主的性质、古兰经的性质以及人与真主的关系。他们坚持真主的完整性和唯一性，甚至否认真主有现实的属性，否认一切形式的拟人神论。至于古兰经，他们认为它不是无

---

[19]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867年，第5卷，第371页。

始无终而是及时创造之物。最后的大主题来自伊斯兰教关于神意的原则。穆尔太齐赖教派认为宿命论与真主的仁慈难以调和；他们痛恨那种认为人会因真主叫他去做的行为而受到惩罚的想法。真主总是要求为善，因为他不要恶，他不会令人为恶；为恶的乃是人自己。3/9世纪前半叶有一段时间，穆尔太齐赖教派的教义取得阿拔斯王朝国教的地位；穆尔太齐赖教派对别人的观点毫不容忍，坚持以武力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广泛承认，因此仅仅经过短暂时期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学派，轮到了他们遭受迫害和镇压。可是，尽管它的主要学说遭到否定，穆尔太齐赖教派对于逊尼派正统神学的发展仍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迫使正统派对宗教信仰的某些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忠实于先知言行的人们"（逊尼派信徒）的信仰形成明确的信条，它以艾什尔里（324/935年逝世）和巴基尔拉尼（403/1013年逝世）等伊斯兰神学杰出人物的教导为其代表。

这些逊尼派神学家生活和工作的时代，正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和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分裂出来的法蒂玛王朝统治着一半以上的伊斯兰世界，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威胁着其他部分。在阿拔斯王朝境内白益王朝使哈里发成为傀儡，甚至在那里什叶派也盛行一时。一些什叶派小朝廷统治着阿拉伯半岛某些地方、叙利亚和伊朗北部。

54 塞尔柱人的到来不仅仅恢复了伊斯兰世界的领土统一；伴随而来的是逊尼正统派宗教的大复兴。有趣的是，这种正统派复兴和对异端邪说的反击在东方（塞尔柱人）和西方（阿尔莫拉维德人）几乎同时开始，东西两方传播正统教义者都是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新皈依的各族游牧民。在安纳托利亚和在西班牙一样，突厥人和柏柏尔人的宗教热忱和军事才能在边境地区同基督教徒重新爆发的战斗中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结 束 语

在伊斯兰世界，5/11世纪的结束标志着各个层次都有十分显著的变化。政治方面，这一时期预示着突厥人在东方和柏柏尔人在西方占有明显的优势。法蒂玛王朝的势力在这个世纪中叶达到登峰造极。到了这个世纪末该王朝失去了马格里布诸省（输给齐里王朝和希拉利阿拉伯人），还损失了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但仍保持对埃及和红海沿岸一带的控制。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对拜占廷的进攻，在西欧引起反响，所采取的是第一次十字军形式。法兰克人（穆斯林国家对十字军的称呼）的领土收获虽然不算太大，但确是在"圣地"和在地中海沿岸的亚洲部分树立了基督教的地位，把一个新的政治因素引进近东的舞台。差不多经过一个世纪以后耶路撒冷才被穆斯林军队收复，又经过近一个世纪基督教国家的最后残余势力才被肃清。

在穆斯林西班牙，基督教势力于478/1085年攻克托莱多，随后又对穆斯林诸小国（*mulak al-tawa'if*）发动进攻，这是第一次威胁到伊斯兰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生存。这一危机由于阿尔莫拉维德柏柏尔人的介入而暂趋缓和。在地中海地区中部，穆斯林则失去了西西里，并且从此再没有恢复在那里的地位。

经济和贸易方面发生的变化，重要性也不逊色。随着塞尔柱人的到来，"伊克塔"

制度（*ikta'*，一种军事采邑制）成为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方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结构的特征。对这种制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很明显，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制度在类型上与欧洲封建制度差不多。虽然这种制度在埃及和马格里布只是到后来才得到充分发展，但在12/19世纪之前它一直是穆斯林世界普遍而典型的制度。

4/10世纪和5/11世纪期间还出现一种现象，印度洋贸易的终端逐渐由阿拉伯/波斯湾转移到红海，从而纳入法蒂玛王朝的势力范围。埃及从这种变化中得益最大，成为在未来长时间里地中海和印度洋间过境贸易的主要中心。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 **55** 垄断了欧洲一方的过境贸易，不久还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海运，穆斯林的航运业在地中海几乎绝迹。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逊尼派正统伊斯兰教在5/11世纪时取得胜利。什叶派虽在领土方面和宗教信仰方面都损失惨重，但它继续存在于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然而，随着法蒂玛王朝的逐步衰落，什叶派信仰失去强有力的倡导者，只好等待几个世纪，直到波斯的萨非王朝才再次把它提到国教的地位。

这个时期逊尼派伊斯兰教的胜利主要归功于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建立“马德拉沙”（*madrasa*），即古兰经学院，这是培养“乌里玛”（伊斯兰学问家）的高级宗教教育机构。虽然在塞尔柱人到来之前，在东方已经有少数“马德拉沙”类型的学校，但是一般认为塞尔柱人统治时期在著名的大臣尼扎姆·穆尔克（485/1092年逝世）的倡导下，“马德拉沙”才遍及各地，很快在几乎所有穆斯林国家建立起来。建立“马德拉沙”的目的是抗衡法蒂玛王朝在埃及的类似机构，以提供更有效的防御抵制伊斯玛仪派有组织的宣传；“马德拉沙”名副其实地是“正统派的堡垒”。第二项起作用的措施是承认苏非主义，并把它纳入官方伊斯兰教的范围，因而出现了各种苏非派教团，“乌里玛”纷纷成为这些教团的成员，因而能指导其领导人和成员离开异端邪说走向正统教义。得到承认的苏非派教团“塔里卡”(*tarīka*)所奉行的正统派苏非主义也强调道德上的完善，宣传个人奋斗，认为完成“大吉哈德”是穆斯林社会价值观念必不可少的基础，并且坚持慈善行为和自我节制。

3 伊斯兰教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在非洲的传播

穆罕默德·埃尔·法西
I. 赫尔贝克

56

概　说

伊斯兰教以及佛教和基督教都属于传道宗教的范畴，也即，在这些宗教里传播正道和使“不信道者”皈依，被其创始人，于是也就被整个团体，认为是应尽的职责。穆斯林用阿拉伯语“达瓦”（*dawa*）一字表示劝说改宗的活动，此字原意是“召唤、呼吁、邀请”，这里指归顺伊斯兰教信仰的正道。

古兰经有许多章经文提到劝说非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的职责，如“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和蔼的态度劝说他们”（第16章第126节）。又如“你对已接受天经的人和不理会的人都要说：‘你们归顺伊斯兰教吗？’如果他们归顺，那么他们已遵循正道。如果他们扭头走开，那么你的责任是传达启示”（第3章第19节）。在其他许多章的经文中也有类似的勉励语句。

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期间，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人的宗教；将这个新宗教传到阿拉伯半岛疆界以外的任务落到他的直接继任者、最早几位哈里发肩上。在阿拉伯半岛疆界以外，穆斯林所碰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些地方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一直信奉传统宗教（多神论者），而四周国家居住的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祆教徒，按照伊斯兰教的看法，这些都是属于“信奉圣书的人们”（*ahl al-Kitab*），也就是已在使用天启经文，因此是信奉尽管不完全却属于一神论宗教体系的人。对待这类人，不要求穆斯林方面有何义务使他们改宗或消灭他们，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教是不鼓励强迫改宗的。它希望通过体现伊斯兰精神的穆斯林社会的生活，使最后真理得以存在，并灼然可见，从而发挥吸引力。在阿拉伯人大征服时期，确实没有通过武力使“信奉圣书的人们”改宗的企图。

57 虽然历代学者已经清楚地论证，穆斯林阿拉伯战士一手持剑、一手举着古兰经的形像纯系无稽之谈，但这种形像至今仍流传于以伊斯兰教为内容的流行著作中，并在非穆斯林的国家里为人们所普遍相信。这种误解产生于那样的假设，认为在非穆斯林土地上为扩张穆斯林统治而进行的战争目的在于使那里的人们改宗。[1] 实际上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要求由穆斯林控制国家，但并不要求穆斯林国家的每个臣民都变成信徒。”回历（希吉拉历）一世纪时进行的征服，并不是为了促使人们改宗，而是为了扩张“伊斯兰教地

[1] T. W. 阿诺德（T. W. Arnold），1913年，第5页。

区”(*Dar al-Islam*)。穆斯林更感兴趣的是把非穆斯林归并到伊斯兰国家中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表示最终实现一项由神意注定的有关人类的计划，而不是使人立即改信伊斯兰教。② 从宗教观点看，促使人们改宗是值得向往的，但是从政治角度看，这并非必要。

6

“信奉圣书的人们”在一切宗教问题上都拥有广泛的自主权，只要他们交纳人头税“吉兹亚”(*djizya*)。穆斯林则免交这种税，穆斯林阿拉伯战士和他们的家属甚至还可以由中央国库付给年金，并享受有特权的社会地位。属于胜利者宗教信仰的人所拥有的明显好处，被征服者也不甘心丧失，于是他们中许多人纷纷改信伊斯兰教。

在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改宗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许多省份的岁人减少得令人触目惊心。针对这种情况，官方采取了不鼓励更多人改宗的政策，下令新改宗者要继续照旧交纳土地税和人头税。只是在虔诚信奉宗教的哈里发奥马尔二世(99/717－101/720年)在位期间，这种政策才中断过一个短时期。但是后来又恢复歧视改宗穆斯林的做法。据说，下述名言：“真主派遣穆罕默德召唤人们知晓正道，而不是充当收税吏”就是这位哈里发说的。③ 到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新人教者才成为伊斯兰社会拥有全权的成员，阿拉伯人则失去其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

直到回历(希吉拉历)二世纪和三世纪，大部分近东人才正式加入伊斯兰教；在军事征服这个地区和使这个地区的人民改宗之间有一段很长时间。导致改宗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为伊斯兰教简单明确的教义所吸引，有的人是想逃避赋税，还有的人则是谋求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彻底投身于新兴的伊斯兰文化。

然而，阿拉伯征服造成(不是立即而是在长时期里)近东和北非大多数居民的伊斯兰化，这是事实。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统治所形成的政治、宗教、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利于人们纷纷改信政治上占统治地位集团的宗教，完全没有必要再使用武力。 **59**

第一部分

北非的伊斯兰化

M. 埃尔·法西

埃　及

埃及当时是拜占廷的一个行省，是非洲首先遭阿拉伯人侵入的地方。对它的征服不费多少时间，因为拜占廷的驻军不多，当地的科普特人也没有进行什么抵抗；他们反而欢迎阿拉伯人，把他们当作摆脱拜占廷桎梏的解救者。④ 在这以前，他们不但深受沉重

② I. 戈德济赫尔(I. Goldziher)，1925年，第27页。

③ 伊本·萨德(Ibn Sa'd)，1904－1940年，第5卷，第283页。

④ 参阅本书第7章。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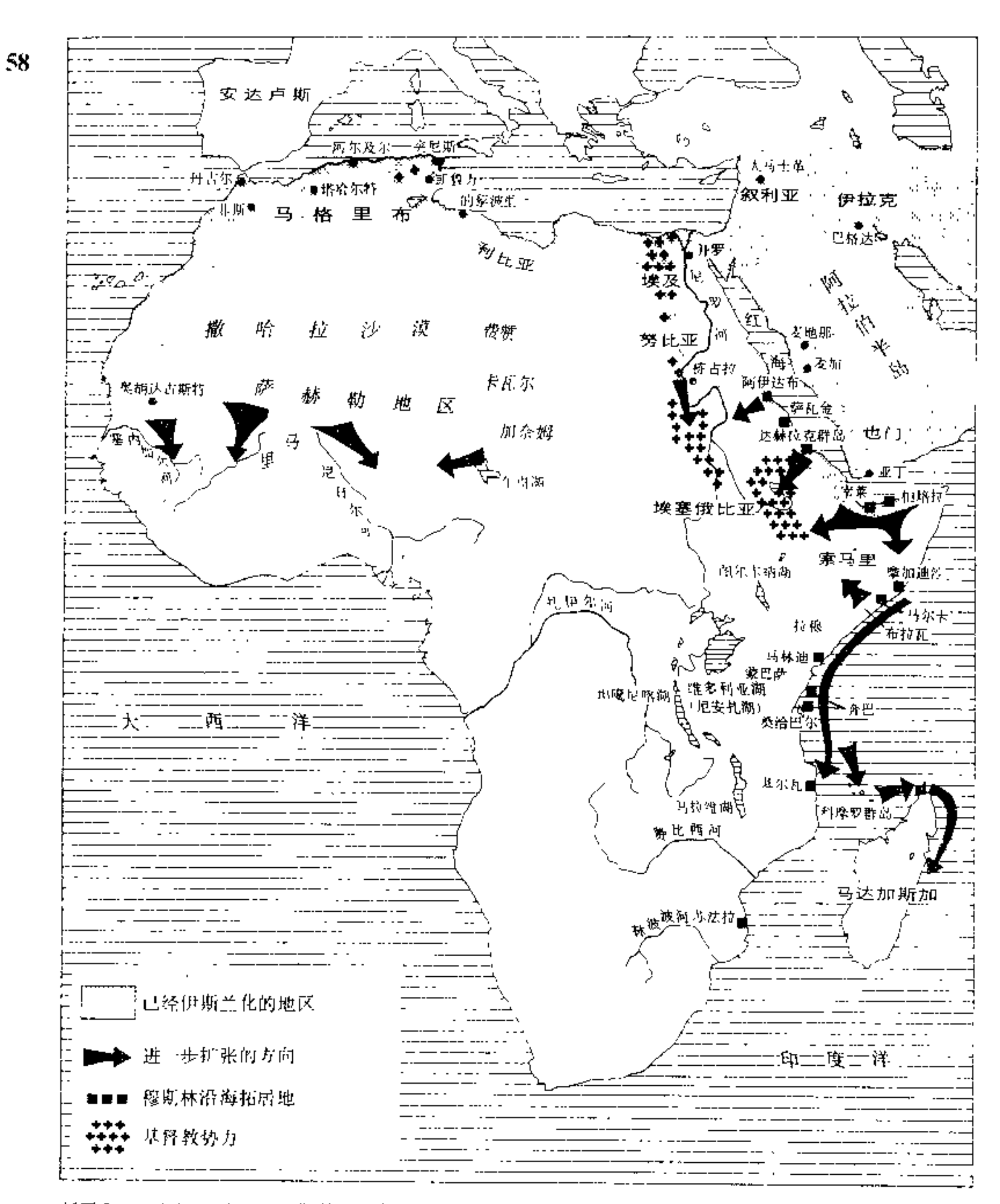


插图3.1 到公元1100年，非洲的伊斯兰化地区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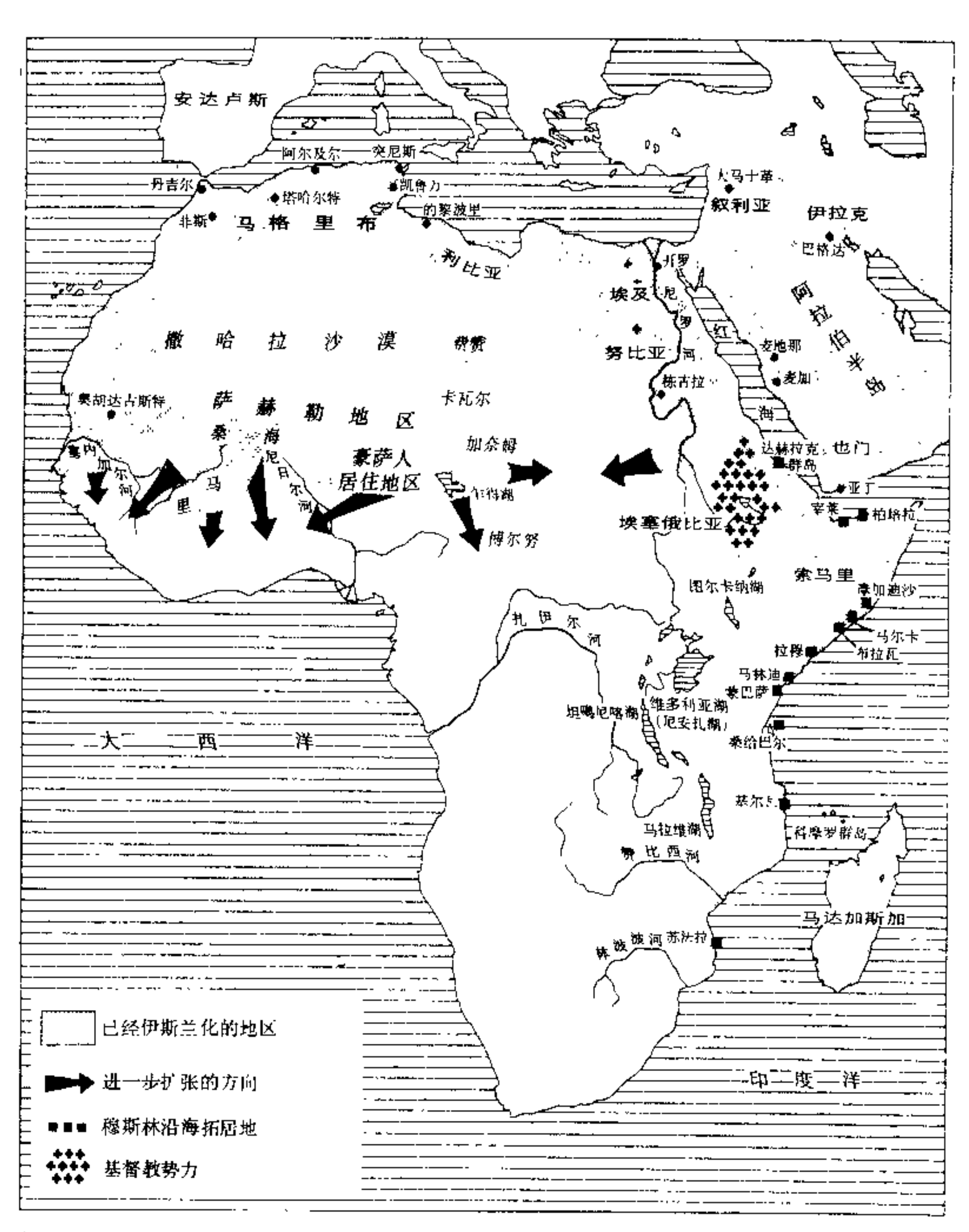


插图3.2 到公元1500年，非洲的伊斯兰化地区

的赋税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之苦，而且作为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徒，遭到官方的正统拜占廷教会的镇压。就在阿拉伯人征服的前夕，这种压迫加强了，企图禁止科普特的礼拜方式并对科普特基督教神职人员进行无情的迫害。

可以认为，埃及两派基督教会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埃及人很早就皈依伊斯兰教。极为玄奥难懂的神学争论没完没了，这必然使得广大的基督教徒群众觉得很难理解，他们无疑对这种徒劳的争论感到厌倦和困惑。许多科普特人于是求助于另一种宗教信仰，这种宗教向他们提供有关单一的神及其先知使者的简单而明白的道理。这有助于解释阿拉伯人占领早期伊斯兰教迅速得到传播的原因。⑤虽然后来科普特人不时受到某些狭隘的君主的迫害，不少人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这种情况毕竟是反常而不是常事。看来颇为矛盾的是，非穆斯林的臣民是在法蒂玛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统治时期（这两个王朝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提倡者）享有其前及其后时期很少见到的宗教自由；由于使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团结到一起，这种宽容态度导致科普特语言逐渐从日常使用中消失，而为阿拉伯语言所取代。在6/12世纪，只有受过较高教育的神职人员才懂得科普特语，甚至于有必要把宗教礼拜仪式的典籍译成阿拉伯语言以便大多数下层神职人员和广大基督教徒群众能读得懂。科普特人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很多官职，承包税收和担负起财务及行政的职责；在这方面他们并非独一无二，因为有许多其他基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犹太教徒也同样得到聘用。⑥

61

埃及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同时也由于阿拉伯贝都因人自阿拉伯半岛和肥沃新月地带持续不断地涌人而得到促进；他们定居下来成为农民，同土著的科普特人混杂成一体，从而增加了讲阿拉伯语者和穆斯林的人数。另一个促使人们改宗的因素是5/11世纪以后科普特神职人员越来越腐化堕落，根本忽视人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需要。到7/13世纪，整个主教管区的居民都成了穆斯林，重要原因是那里没有负责的神职人员，竞争亚历山大城主教职位的候选人之间长期争吵不休，无法任命新人。⑦

所以，埃及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甚多——真诚的宗教信仰、经济利益和社会原因、遭受迫害、科普特人基督教教会的腐败以及大量穆斯林从国外涌人。综合起来的结果是，马木路克统治下的埃及已是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科普特教徒和犹太教徒只占少数的国家。

马格里布

在埃及以西的北部非洲，穆斯林势力向前推进时，宗教情况比在埃及遇到的要复杂得多。城镇和沿海平原的居民业已罗马化，长期信奉基督教，而内地的柏柏尔人则仍然

⑤　甚至在征服完成之前，数以千计的科普特人改信伊斯兰教，以后每年都有大批的改宗者。让·德-尼基乌（Jean de Nikiou)，1883年，第560页；塞维鲁·伊本·穆卡法（Severus ibn al-Mukaffa'），1904年，第172－173页。

⑥　参阅G.维厄（G—Wiet），1932年，第199页，C.卡亨（C. Cahen），1983年，第87和此后诸页。

⑦　J. M.万斯莱本（J. M. Wansleben），1677年和E.勒诺多（E. Renaudot），1713年，对当时腐朽情形有详细叙述。

主要信奉传统宗教，虽然有些山地居民已经信奉犹太教。在古罗马和拜占廷统治时期，基督教化的柏柏尔人就已热衷于宗派斗争：多纳图斯教派和塞孔西利昂教派（主张平均主义和简单教条的两个派别）多次反叛教会当局并拒绝交纳赋税，从而表达了具有特色的柏柏尔人对独立的酷爱和对国家当局的反感。⑧

关于阿拉伯人进行征服和柏柏尔人激烈反抗这段戏剧性历史，本书另有详细论述，**62** 无需在此重复；⑨本章的任务在于叙述马格里布的伊斯兰化。

关于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传播，我们掌握的资料相当贫乏；而且伊斯兰化初期的情况在后来的阿拉伯文文献中受到乌克巴传奇的渲染，乌克巴传奇把这位勇敢的战士描绘成一个和平的传教者。然而实际情况也确实是，由于在 50/670 年建立了凯鲁万城，乌克巴·伊本·奈非不但创建了一个军事基地而且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创建了一个重要的中心。

虽然伊弗里基亚（现今的突尼斯）早在回历（希吉拉历）一世纪时已成为哈里发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在这里阿拉伯人的统治也比马格里布的其余地方较为稳定，但这里的伊斯兰化过程仍然还是进展得相当缓慢。在许多地区，主要在萨希尔、南部一些地方和姆扎布绿洲，罗马化和信奉基督教的非洲人在征服后的最初两个世纪中继续占人口的大多数。在较僻远的地区（在诸如迦太基和突尼斯这样一些城市里也是如此）甚至几个世纪后仍然有插在穆斯林社会中间的小小的基督徒居住地：如 5/11 世纪在姆扎布绿洲、6/12 世纪在加夫萨，8/14 世纪在某些纳夫扎瓦人村庄。⑩在托泽尔城，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徒居民存在到 12/18 世纪。⑪ 5/11 世纪在马格里布有 47 个主管教区。在突尼斯城，有一个小小的土著基督徒社会，与外来的基督徒商人明显不同，在 9/15 世纪时组成哈夫斯王朝素丹们的贴身警卫。⑫这些基督徒残存力量引起后来几个世纪观察家们的好奇心，这个事实本身表明到 5/11 世纪他们已经是身处占多数的穆斯林中间。这个世纪的某些罗马天主教教会文献，哀叹缺乏神职人员，这也是当时基督教在北非衰落的明证。⑬土著基督教徒得以长期存在的事实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足以驳斥所谓强制改宗的假想；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引起宗教渐进变化的乃是总的社会环境。来自凯鲁万及其他伊斯兰中心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和虔诚分子的积极的布道活动无疑推进了改宗活动。像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伊斯兰教在城镇居民中间比在乡村传播得更快。

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回答（由于缺乏充分证据）各柏柏尔族群（他们有好几十个）为何又如何信奉了伊斯兰教，却至少可以辨识出整个过程中各个阶段特有的某些总的趋势。

在最初阶段，许多柏柏尔族群，经过对阿拉伯军队激烈抵抗以后被征服改宗。这种 **63**

---

⑧ 关于罗马和拜占廷时期的情况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I 卷第 19 章。
⑨ 见本书第 9 章。
⑩ T. 莱维基（T. Lewicki），1951－1952 年，第 424 及以后诸页，又见 A. 马哈朱比（A. Mahjoubi），1966 年。
⑪ H. R. 伊德里斯（H. R. Idris），1962 年，第 2 卷，第 761 页。
⑫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1956 年，第 2 卷，第 67 页。
⑬ T. W. 阿诺德，1913 年，第 126－127 页。

情况下的改宗行动主要是形式上的而且大概只限于首领和氏族头人，他们通过这种行为表示承认新主人的统治权。一旦阿拉伯人军队撤退或被赶走（这在1/7世纪中发生过许多次），柏柏尔人就恢复自己的传统信仰，自认为不受任何政治或宗教的效忠问题的束缚。伊本·哈勒敦从而有句名言：柏柏尔人在其同伊斯兰教接触的最初70年中变节叛教的次数够上一打。[14] 当84/703年柏柏尔人在卡希娜领导下最后一次大规模起义临近失败的时候，这个无畏的女人派她的儿子们带着她的指示来到穆斯林的营地说他们准备信奉伊斯兰教，同阿拉伯人合作。促使她采取这一行动究竟是由于认识到抵抗下去没有用处，或是由于想由她的世系保持贾拉瓦族柏柏尔人的首领地位，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很难断定。

最后，阿拉伯人终于懂得他们以武力征服柏柏尔人是办不到的，[15] 于是改变政策。著名的总督穆萨·伊本·努赛尔开始从俘虏中间挑选出身贵族的青年人，以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为条件释放他们，然后任命他们到军队高级司令部任职。[16] 这种政策很快就见成效，许多柏柏尔战士为他们头目的榜样所鼓舞纷纷加入了阿拉伯军队。阿拉伯人使柏柏尔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努力由于成功地侵入西班牙而进一步得到推进。入侵西班牙的行动几乎立即把大批热衷于参加征服以便分享战利品的柏柏尔人拉到阿拉伯人一边。在西班牙的穆斯林军队主要由新近改宗的柏柏尔人组成，甚至它的首任司令官塔里克也是一个柏柏尔人。因此在粉碎对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抗之后不久，成千上万的柏柏尔人既加入了自己昨日敌人的军队又信奉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可是这种改宗行动仍然只涉及居民中的少数，因为阿拉伯对今日的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大部分地方还是鞭长莫及，至于山岳地带，伊斯兰势力更是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渗入。

不过，可以说8世纪的最初三四十年中，伊斯兰教在平原和沿海地带的城市、农村以及甚至部分地在那一带的游牧的人口中获得巨大发展。而且恰恰是在同一个时候柏柏尔人所特有的对待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态度开始显露出来：柏柏尔人准备接受伊斯兰教作为宗教信仰，或甚至也可以接受阿拉伯文化，并且大量地这样做；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对政治上受代表远方君主的外国官僚机构统治却深为抵触，这个官僚机构歧视新皈依者，向他们勒取苛税，好像他们是异教徒一般。加之，在西班牙的柏柏尔战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在那边分到的是不那么肥沃的土地，尽管他们在征服事业中至少是起着同阿拉伯人同样大的作用。

64

于是下一阶段的戏随即开场了，柏柏尔人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表现为伊斯兰范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了抗议正统派阿拉伯人的压迫，他们转而信奉哈列哲教派的教义，那是最古老的伊斯兰教的政治－宗教派别。

哈列哲教派的政治和宗教教义是民主的、清教徒式的、原教旨主义的；在所有这些方面，它的信徒激烈反对正统派和专制主义的哈里发政权。他们从平均主义原则出发提出关于选择伊玛目（*Imam* ——穆斯林社会首脑）的教义：他应是选举出来的而不是世

---

⑭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925－1956年，第1卷，第21页。

⑮ 一位阿拉伯人总督、哈桑·伊本·努曼曾惊呼："征服非洲是不可能的。"

⑯ 马卡里（al-Makkari），1840－1843年，第1卷，第65页。

裔的；任何虔诚的信徒，只要在道德和信仰方面无可指谪，不分阿拉伯人或非阿拉伯人，不分奴隶或自由民，都有希望担任伊玛目的职位。[17]

哈里发国家东部诸省的哈列哲教派（不久分裂成许多互相敌对的支派）；在领导几次反对伍麦叶王朝的叛乱以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一些侥幸者移居北部非洲以逃避迫害，继续宣扬他们的教义。在那里这种教义在柏柏尔人中间找到肥沃的土壤，许多柏柏尔人热情地信奉这种教义作为自己与阿拉伯人统治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信徒一律平等的原则，既符合柏柏尔人的社会结构和理想，又符合那些反对阿拉伯人官僚机构所带来的重税苛政的人的心愿。同样有吸引力的是另一个教义：既然凡是穆斯林一律平等，那么某些人的豪华生活和铺张作风是有罪的；真正的信徒应该生活严肃简朴，在个人行为和商业活动中慈善为怀，绝对诚实。这种清教徒式的主张必然对节俭的柏柏尔农民和半游牧民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对阿拉伯统治阶级奢侈放荡的生活极为反感。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哈列哲教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柏柏尔人中间得到更多的信徒。莱因哈德·多齐说得好："伊斯兰教的加尔文主义终于在北非洲找到了它的苏格兰。"[18]

哈列哲教派的教义以其两种主要形态（易巴德教义和苏非教义）主要在草原地带和柏柏尔人中间传播，东起的黎波里塔尼亚经过伊弗里基亚南部西达摩洛哥南部，对扎纳塔族这一大支柏柏尔人特别有影响。[19] 2/8 世纪中叶，哈列哲教派创立了两个神权国家：一个是塔哈尔特伊玛目国，自的黎波里塔尼亚至阿尔及利亚南部的易巴德派信徒都效忠于它；另一个是锡吉勒马萨的苏非派君主国。这两个国家在 4/10 世纪时期被法蒂玛王朝摧毁以前，一直是阿拔斯王朝中央政府以及半独立的阿格拉布王朝的伊弗里基亚总督鞭长莫及之地。[20] 65

很显然，如此众多的柏柏尔人信奉哈列哲教派的教义，根源还在于社会和民族方面对阿拉伯统治阶级统治的反抗。柏柏尔人的哈列哲教派决不是一种反对伊斯兰教的运动，相反，它是柏柏尔人接受伊斯兰教作为宗教信仰的表现。而且，通过众多的易巴德派谢赫（shaykh）和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很大部分的柏柏尔人更好地了解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职责，真正地而不仅是名义上改变了宗教信仰。

同样，柏柏尔人的反抗并非反对穆斯林阿拉伯人，他们所针对的仅仅只是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统治阶级。柏柏尔人强烈反对任何强制地或专横地强加于他们头上的外国统治或外国统治者，然而他们却乐意通过自由选择接受非柏柏尔人穆斯林做他们的首领。塔哈尔特的波斯人伊本·鲁斯泰梅，摩洛哥阿里派的伊德里斯和库塔马柏柏尔人中法蒂玛派的乌巴杜拉都是这种情形。在所有上述事例里，这些人不仅被接受为反政府的反对派领袖，而且也得到认可具有突出的伊斯兰号召力。这个事实再一次表明，这里提到的柏柏尔人已经了解伊斯兰教，并谋求赋予他们的反抗行动以伊斯兰的特色，不论是哈列

---

[17] 这种教义同什叶派和逊尼派的观点都是对立的。什叶派坚持伊玛目职位只能由先知家属成员（他的女儿法蒂玛及其丈夫阿里的后人担任）；逊尼派观点则是，只有麦加的古莱什部落的成员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

[18] R. 多齐（R. Dozy），1874 年，第 1 卷，第 150 页。又见 A. 伯纳德（A. Bernard），1932 年，第 89 页。

[19] T. 莱维基，1957 年；又见本书第 13 章。

[20] 参阅本书第 12 章。

哲教派（伊本·鲁斯泰梅）、正统逊尼派（伊德里斯）、还是什叶派（乌巴杜拉）。

也有过一些尝试想创立纯属柏柏尔人的宗教以与伊斯兰教抗衡，其中最著名而且历时最久的是巴尔加瓦塔人（马斯穆达族的一支）创立的宗教。这些人住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平原，在萨勒与萨菲之间，他们的首领萨利赫·伊本·塔里夫在127/744－745年自称为先知，编了一本以柏柏尔语写的古兰经，并且颁布了一部法典，主要依据当地习惯的宗教礼仪和教律。虽然这一切使得巴尔加瓦塔人的宗教不再属于伊斯兰教的范畴，然而它受伊斯兰教的启发则是显然可见，它代表一次最有独创性的努力，试图使从东方传入马格里布的宗教"柏柏尔化"。

这个异端宗教在摩洛哥柏柏尔人中间获得很大成功。萨利赫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于哈里发政权的国家的君主，直到5/11世纪，他的继位者继续统治着大西洋海岸的大片地方。他们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的宗教和国家，抵抗一切外来的攻击，最后被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征服，这个王朝的缔造者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在同这些异教徒作战中身亡。

66 在摩洛哥北部其他地方，在奥拉巴人、米克纳萨人、戈马拉人和其他一些部族中，伊斯兰教2/8世纪时已有若干发展，但是真正的突破和比较牢固地扎根则还是发生在伊德里斯王朝统治时期。[21] 柏柏尔人热烈欢迎该王朝的创业者，一位阿里家族的后裔，因为对先知穆罕默德后代世系世袭特殊"保佑权力"（*baraka*）的信仰已经开始被信徒群众所接受，不论是伊斯兰世界的东部还是西部都是如此。伊德里斯被邀请来领导反对阿拔斯王朝的运动，他抓住时机，在被宣布为哈里发（172/788年）以后，迅速发动攻势把那些尚未改宗的柏柏尔人置于伊斯兰教支配之下。这种政策由他的儿子伊德里斯二世继续推行，于是到了下一个世纪中，摩洛哥北部在很大程度上伊斯兰化了（除了信奉异端宗教的巴尔加瓦塔人以外）。应该指出的是，与某些学者的意见相反，[22] 伊德里斯王朝不能算做是个什叶派的王朝，因为他们从不宣传什叶派形态的伊斯兰教义。在伊德里斯王朝统治的领域内，柏柏尔人的伊斯兰化也由于阿拉伯人不断从安达卢西亚和伊弗里基亚移入新建的非斯城而得到促进，此城在马格里布西部所起的作用可与凯鲁万在东部地区的作用相媲美。

到4/10世纪，整个马格里布的伊斯兰化实际上已经完成。只在某些地区和城镇还有小小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社会存在，此外在僻远山区有少数柏柏尔族群墨守自己的古老信仰，而"异教的"巴尔加瓦塔人则仍然没有屈服。但正在此时，政治和社会形势发生许多变化，深深地影响整个宗教形势。

在这些变化中，法蒂玛王朝的作用最为重要，尽管看来十分荒谬。通过荡平哈列哲教派统治下的塔哈尔特和锡吉勒马萨两个国家，以及镇压多次哈列哲教派的叛乱，法蒂玛王朝给了柏柏尔人哈列哲教派以致命的打击。可是他们未能将柏柏尔群众吸引到他们的伊斯兰教形态——什叶派。相反，柏柏尔人当时转而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特别是信仰马立克法学学派，幸存的哈列哲教派，或是退隐僻远地区（姆扎布绿洲，奈富塞山区等等），或是逐渐地放弃原来的教义转而信仰马立克学派，后者此时已在伊弗里基亚

[21] 关于这个王朝的初期情况见本书第10章。

[22] 例如P. K. 希蒂（P. K. Hitti），1956年，第450－451页。

的凯鲁万城和在摩洛哥一些地方牢固地生根立足。哈列哲教派不再是独特的柏柏尔形态的伊斯兰教，因为此时它失去了表达柏柏尔人反对外国统治的存在理由。在法蒂玛王朝将其帝国中心转移到埃及而把马格里布交由柏柏尔人齐里王朝管理之后，马格里布已不存在外国统治。过一段时间，齐里王朝宣布独立而效忠于巴格达的逊尼派哈里发。不久 **67** 以后，马格里布西部归柏柏尔人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治，这个王朝消灭了哈列哲教派、什叶派和巴尔加瓦塔异端宗教在该地区的最后残余，明确地确立了逊尼派伊斯兰教马立克学派的统治地位。

第二部分

伊斯兰教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传播

I. 赫尔贝克

由于非洲北部出现伊斯兰化是阿拉伯人征服的结果，人们往往认为伊斯兰教传人热带非洲也遵循同样的模式，也就是说，当地各族人民先被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征服，然后被迫信奉伊斯兰教。阿尔莫拉维德人对加纳的征服常被引用来作为这种伊斯兰化形式的最突出的事例。但是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现有的证据并不证实对加纳改宗情况的这种说法（见下文）。外来穆斯林人侵者的征服所起作用除东苏丹外是微不足道的，东苏丹一大片阿拉伯人拓居地对伊斯兰教的传播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但即便在那里，本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也是很久之后的事情。当地伊斯兰化的国家对非洲社会的征服，在乍得地区和在埃塞俄比亚南部是重要的因素，看来矛盾的是，那里19世纪时基督教阿姆哈拉帝国的最后扩展对伊斯兰教的发展比起前几个世纪的军事行动有着远为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影响。㉓ 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地，伊斯兰教的正常传播过程彼此是大不相同的，其情况有如下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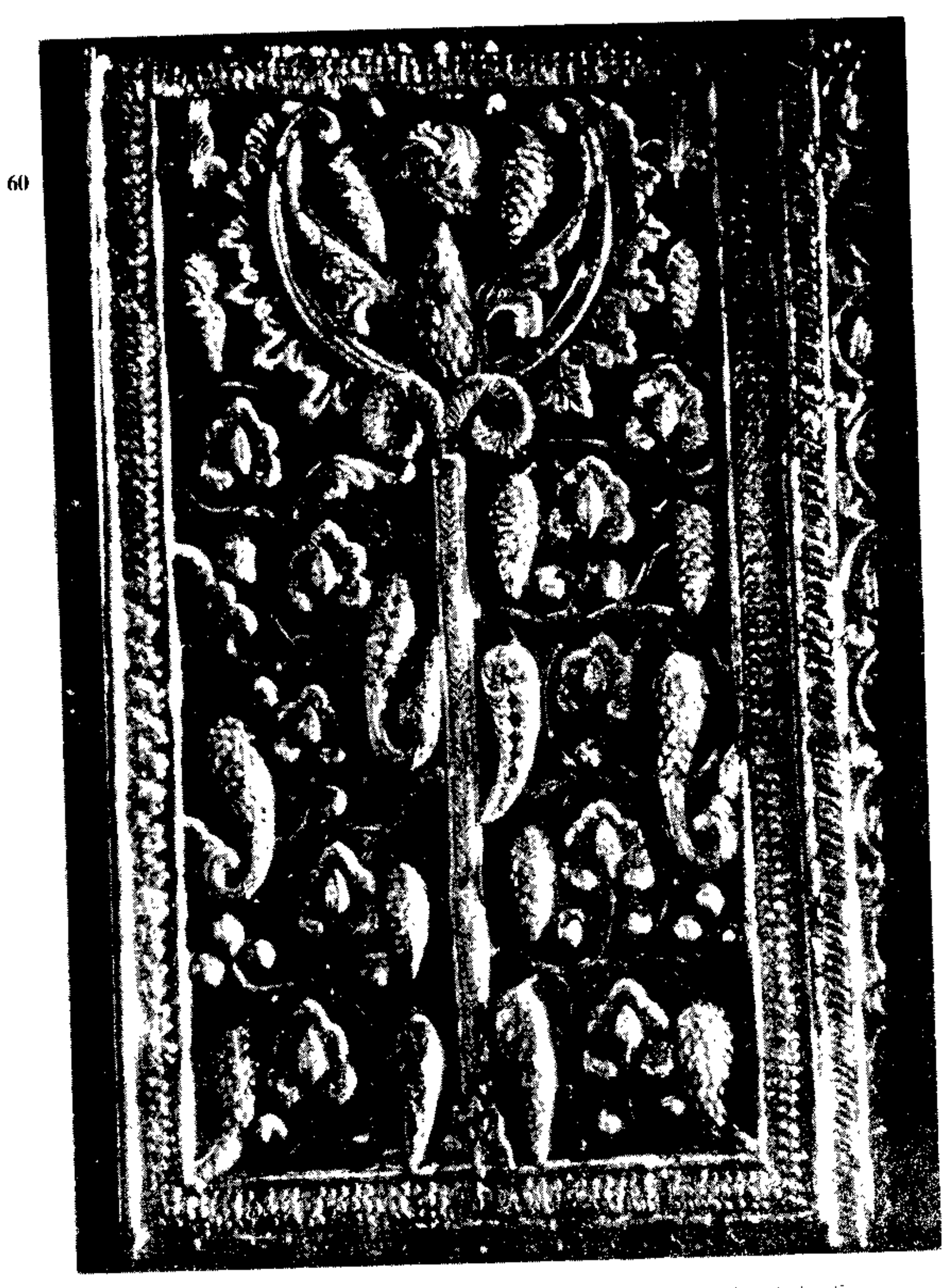
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西部的柏柏尔人与伊斯兰教发生接触，一种可能是通过从苏斯-阿克萨侵人他们地区的阿拉伯战士，另一种可能是通过穆斯林商人——这些商人的商队来自锡吉勒马萨或苏斯-阿克萨的其他城镇，在阿拉伯人刚征服马格里布以后就出现在西部撒哈拉的商路上。这类接触当然导致为商队做向导和护卫的某些个别柏柏尔人改信伊斯兰教。在商队沿线若干商业和政治中心——穆斯林商人已经长期立足的地方，穆斯林文化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必然更加强烈、更加深人。

关于阿拉伯人和撒哈拉柏柏尔人之间的接触，最早的资料是谈及乌克巴·伊本·奈菲 **68** 远征摩洛哥南部的记载。63/682年他攻打苏斯-阿克萨以南的马苏法柏柏尔人，抓了

㉓ I. M. 刘易斯 (I. M Lewis)，1974年，第108-109页。

60



图片 3.1 凯鲁万清真寺内一块雕花松木的"敏拜台"(minbar、宣教台)的细部

若干俘虏以后退兵。㉔ 这次讨伐所至似乎远达达拉干河（德拉河）。虽然后来的乌克巴传奇对它大加渲染，这次远征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侦察行动，与这位阿拉伯将军 47/666－667 年间在的黎波里以南对费赞和卡瓦尔进行的远征相似；㉕ 这样的短暂袭击会导致当地人民伊斯兰化是极不可能的。

伍麦叶王朝的伊弗里基亚总督穆萨·伊本·努赛尔所进行的几次战役也没有多大差别；他曾在 87/705-706 年至 90/708-709 年之间征服和平定大部分摩洛哥柏柏尔人，而且据说使他们改信了伊斯兰教。他还进入苏斯－阿克萨甚至抵达锡克勒马萨远到马苏法人境地边界的达拉城。㉖ 然而同一资料来源又说，确实征服苏斯－阿克萨并使其居民改信伊斯兰教乃是迟至 8 世纪 30 年代阿拉伯将军哈比卜·伊本·阿比·乌巴达的远征。㉗ 阿拉伯军队归来时带着许多俘虏和大量黄金。俘虏中有相当数量的马苏法人；这表明这些柏柏尔人仍拒绝信奉伊斯兰教。

8 世纪 40 年代柏柏尔人大叛乱之后阿拉伯人停止对西部撒哈拉进行军事远征。柏柏尔人的大叛乱导致阿拉伯统治的衰落和马格里布的普遍无政府状态。

得到证实的首批改宗的撒哈拉柏柏尔人看来是兰图纳人，因为伊本·哈勒敦曾写道，2/8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不久他们就信奉了伊斯兰教。祖赫里（6/2 世纪）也曾提到兰图纳人、马苏法人和朱达拉人在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希沙姆·伊本·阿卜杜拉·马立克统治时期（106/724－125/743 年在位）改信伊斯兰教。㉘ 可是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在未来许多世纪中必然只是薄薄一层表面装饰。阿尔莫拉维德运动起源的历史充分证明这三支柏柏尔人伊斯兰化的表面性质。

西苏丹和中苏丹

甚至在马格里布和撒哈拉本身完全改信伊斯兰教以前，伊斯兰教就已越过沙漠传入西苏丹。据祖赫里称，商业城市塔德梅卡的君主们（巴努坦马克柏柏尔人）在加纳人之后 7 年也被刚改宗的加纳强迫改信伊斯兰教。㉙ 自然，相当可能，在这个事例中所谓“改宗”意味着在原已信奉哈列哲教派的人们中间强制推行正统派阿尔莫拉维德伊斯兰教。自 3/9 世纪以后，塔德梅卡一直有来自北部非洲的易巴德派商人到来，它已成为这些人在苏丹地区各族人中传教活动的中心。4/10 世纪时反法蒂玛王朝的哈列哲教派起义的著名领袖阿布·亚齐德可能就出生在塔德梅卡。㉚ 69

㉔ 伊本·哈勒敦，1925-1956 年，第 1 卷，第 212 页；J. M. 库奥克（J. M. Cuoq），1975 年，第 330 页；N. 莱维蔡恩（N. Levtzion）和 J. F. P. 霍普金斯（J. F. P. Hopkins）合编，1981 年，第 326 页。

㉕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Ibn 'Abd al-Hakam），1947 年，第 63－65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45－46 页；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12 页。

㉖ 拜拉祖里（al-Balādhurī），1866 年，第 230 页。

㉗ 拜拉祖里，1866 年，第 231-232 页；伊本·阿卜德·哈卡姆，1947 年，第 122-123 页；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1948－1953 年，第 1 卷，第 51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46 页。

㉘ 祖赫里（al－Zuhrī），1968 年，第 126 页、181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21 页；T. 莱维基，1970 年。

㉙ 祖赫里，1968 年，第 181－182 页；T. 莱维基，1981 年，第 443 页。

㉚ 伊本·哈马德（Ibn Hammād），1927 年，第 18 页、第 33－34 页；参阅本书第 12 章。

这使得我们思考哈列哲教派，特别是易巴德支派对伊斯兰教在苏丹地区的传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T.莱维基近年所写的关于北非、撒哈拉和苏丹地区易巴德派的著作，对这种清教徒式的穆斯林在商业及传教方面活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现已十分清楚，易巴德派商人进入苏丹地区比正统的逊尼派早得多，而且很可能，苏丹人中间最初改宗者有些人之所以皈依伊斯兰教全是易巴德派传教工作的结果。大部分古典的阿拉伯文文献没有提到这些传教活动，因为它们的作者乃是正统派穆斯林，对离经叛道者怀有偏见；㉛ 我们只能零散片断地或间接地从这些资料里得知苏丹地区确有易巴德派存在。㉜ 另一方面，来自北部非洲的易巴德派作者的作品则充满了关于 2/8 世纪以后撒哈拉和苏丹地区易巴德派教徒的贸易网的资料。有证据表明来自塔哈尔特、瓦尔格拉、突尼斯南部和奈富塞山区的易巴德派商人在苏丹地区各城镇，诸如加纳、加奥、奥胡达古斯特、塔德梅卡、盖耶鲁、扎富努和库加等地都有定居点。属于苏非支派的哈列哲教派教徒统治着锡吉勒马萨，直到 4/10 世纪那里是最重要的商队贸易北部终端；宰维莱（在费赞）的巴努－哈塔卜人建立的易巴德派王朝控制着自利比亚到乍得湖流域这条重要商路的北部终端。近来研究所显示的图景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贸易关系的广泛程度。虽然有关这些商人传教活动的报道不多，但可以判断，他们在重要的苏丹中心地区长达数世纪的存在对

70 当地居民所起的宗教影响决不能低估。最初改信伊斯兰教的自然是他们贸易活动中的苏丹人伙伴。另一方面，在苏丹地区却找不到易巴德派信仰的宗教教义存在的踪迹。看来我们只能在宗教建筑中发现较明显的易巴德派影响：苏丹地区的许多地方至今尚存的清真寺宣礼塔建筑式样本是源自突尼斯南部，而寺内的长方形宣教台则是仿照来自姆扎布绿洲的建筑式样，姆扎布绿洲乃是 4/10 世纪之后易巴德派的主要中心。㉝

早期易巴德派在南部撒哈拉和西苏丹的影响由于阿尔莫拉维德的冲击而被彻底根除。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宣传正统派伊斯兰教的教义，并保证苏丹地区的穆斯林从此以后坚信马立克学派。与此同时，5/11 世纪时，游牧的巴努希拉尔人对北非和撒哈拉北部边缘的入侵进一步促使各地的易巴德派社会一蹶不振，并使他们决定性地失去在商队贸易中的商业优势地位。

有两件奇妙的插曲可以视作过去易巴德派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影响的回波。豪萨人有一个关于道拉的传说，其中谈及阿布亚齐杜（或巴亚吉达）的故事，说他是“巴格达国王之子”，是传说中豪萨族各统治王朝的祖先。阿布亚齐杜此人似乎与反法蒂玛王朝的哈列哲教派著名起义领袖于 335/947 年被杀的阿布·亚齐德有某种联系。当然，从历史学角度不可能将这两个人等同为一个人，但是应该承认在这个传说里能隐约看到易巴德传统在苏丹地区的回波。当我们知道历史上阿布·亚齐德是塔德梅卡（或加奥）地

㉛ 在阿尔莫拉维德征服奥胡达古斯特城时的死难者中间，巴克里（al-Bakrī）1913 年，第 24 页（见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91－92 页）只对一位凯鲁万的阿拉伯人（一位逊尼派穆斯林）之死感到悲痛，对于大部分属易巴德派的扎纳塔柏柏尔人遭到屠杀则略而不提。

㉜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1969 年，第 395 页提到扎加里的一批白种人易巴德派信徒。虽然《苏丹史》（*Tārīkh al-Sūdān*，1900 年，第 61 页）说桑海的松尼·阿里是哈列哲派，看来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参阅 T. 霍奇金（T. Hodgkin），1975 年，第 118 页，注 3。

㉝ 参阅 J. 沙赫特（J. Schacht），1954 年。

方一位苏丹族母亲所生时，就格外倾向于接受这种看法了。㉞

达尔吉尼（7/13世纪）——马格里布的一位易巴德派作家——描述一件关于他的曾祖父的轶事，据说575/1179－1184年左右他的曾祖父曾到苏丹地区旅行，在那里动员马里（位于加纳内地）的国王改信了伊斯兰教。这件轶闻使人联想起巴克里关于使一位马拉尔国王改信伊斯兰教的著名故事；这件事必然是发生在巴克里的著作写成之前（460/1068年以前）。年代的差距表明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达尔吉尼伪造的道貌岸然的骗局，他把一个不知名的传教士的成就归功于他的祖先。㉟ 但是，这种欺骗手法并不降低其价值，因为，这一轶事能够作为证据表明，易巴德派的早期传教活动确实存在，而且后来几个世纪中人们知道这一情况。

伊斯兰化这第一次浪潮产生了多大后果，又有多深刻的意义，是很难估计的。观察伊斯兰教在较近时代的情况，可以推断，一般说来，这种早期伊斯兰教含有许多属于自古罗马时代结束之后在马格里布就为人所知的伊斯兰教兴起前各种宗教信仰（犹太教，基督教）的种种成份，以及柏柏尔人和非洲人原有宗教信仰的残余。这就难怪伊本·亚辛类型不妥协的正统派（主要是马立克学派）改革家们对撒哈拉和苏丹地区传统宗教残余的根深蒂固和那里早期伊斯兰教各种成份并存的“混杂”性质深感震惊。经过许多世纪，由一长串改革家和复兴派传播的纯正的伊斯兰教才取得某些成就。 **71**

首先将伊斯兰教传给苏丹各族人民的无可否认的功绩属于易巴德派；即使他们的成就无法以数量来衡量——看来数量不是很大——但他们奠立了基础，使后来传播伊斯兰教的人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更牢固的建筑。

伊斯兰教和商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高度结合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后来几个世纪中商业上最活跃的族群（迪尤拉人、豪萨人和迪亚坎凯人）正是他们各自的国家同穆斯林接触时最先改信伊斯兰教的人。这种现象可由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伊斯兰教诞生于麦加商业社会，由本人曾经长时间是个商人的先知穆罕默德加以传播。这种宗教信仰势必提供一套与商业活动有密切联系的道德和实践的教诲。它所提供的道德规范有助于促进和管理商业往来关系，在不同部族群体的人员中间提供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从而有助于远程贸易两个主要前提——安全保障和信用——得到保证。正如A.G.霍普金斯所恰当指出的：“伊斯兰教能够促进散布在广大地区并且常常是在外国的商业网或行号的成员保持一致；它使得商人们彼此互相认识因而容易进行贸易；而且它提供道德和礼仪的约束力便于执行行为规范使信任和信用成为可能”。㊱

这种早期的穆斯林往往自行组成小型的社会，分布在整个萨赫勒和苏丹地区的主要商路沿线。在若干主要城市中，如加纳或加奥，商人们和穆斯林们（实际上这两种人在大多数场合是等同的）住在单独的居住区，往往享有某种政治和司法的自治权。这种格

㉞ H. R. 帕尔默（H. R. Palmer），1928年，第3卷，第132及以后诸页；W. K. R. 哈勒姆（W. K. R. Hallam），1966年，以及A. 史密斯（A. Smith），1970年的评论。

㉟ 参阅J. 沙赫特，1954年，第21－25页；T. 莱维基，1969年，第72－73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195－196页；N. 莱维茨恩和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68－369页。

㊱ A. G. 霍普金斯（A. G. Hopkins），1973年，第64页。

局直到晚近时期还是一再出现的，不但贸易中心而且在许多村庄中也是如此，穆斯林们更喜欢同异教徒的多数居民分开来住，受自己的谢赫（教长）或卡迪（执法官）管辖。

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区建立清真寺，由于某些与伊斯兰教教规有关的习俗，诸如每天做五次礼拜、服装款式、以及某些虔诚穆斯林的完全禁酒等等，很快就形成与众不同的特色。

72 因此伊斯兰教最初并非在连绵不断的大片土地上以群众性改宗的方式推进其边界，而是在一些贸易和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一系列城市中的据点，至于农民则很少被触及。[37] 这些商路沿线和主要中心地的穆斯林居留地构成伊斯兰教最终广泛传播的摇篮。

当然，并不是每个穆斯林商人都会有充分时间或意愿在当地人民中间从事传教。但是紧跟商人之后，随着穆斯林社会在苏丹地方许多地方的建立和扩展，穆斯林教士接踵而来，对于他们，宗教活动通常较之商业活动更为重要。最初，他们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穆斯林社会进行各种神职人员的职务，后来又再加上治病、占卜，以及制造和出售符咒与护身符。通过这些途径他们在非穆斯林中间赢得尊敬和声望，这些非穆斯林的宗教信条不是排他主义的，而且他们常常寻求这些教士的帮助以图操纵超自然现象。这些教士活动中触及魔法和迷信的方面在苏丹地区各国非穆斯林眼中形成伊斯兰教的主要吸引力。详梦、靠信仰治病、占卜未来、相信祈祷力量，特别是求雨，都起着重大的作用。[38]

自从伊斯兰教出现在西非洲，它不断地要同非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作斗争。对于大多数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信奉新宗教绝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与非洲传统宗教有关的一切非伊斯兰教的习惯。事实上许多人最初信奉伊斯兰教是因为早期的穆斯林领导人在解释何谓信奉伊斯兰教时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因此对于某些非伊斯兰教的习惯十分宽容。

继商人之后，第二个改信伊斯兰教的社会阶层是各国的君主和朝廷重臣。苏丹地区的商人通过同北非的商人接触信奉伊斯兰教是在许多年中逐渐进行，并不引人注目，因此没有打动穆斯林文献作者们的好奇心；然而每一位君主的改宗总是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和轰动，作为伊斯兰教的辉煌胜利及时记载在案。因此每次王族和宫廷要人的伊斯兰化，我们所得的资料总要比一般详细得多；而且，其具体日期使我们有条件将此过程比较有把握地按年代加以排列，形成年表。

一般认为，西苏丹地区成为穆斯林的第一个君主是塞内加尔河下游塔克鲁尔的沃尔·戴阿比，他在11世纪30年代（回历5世纪20年代）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兴起之前73 就已信奉伊斯兰教。据巴克里记载，他把新宗教传播到邻国锡拉；[39] 在448/1056年，其子拉比和叶海亚·伊本·奥马尔一起对叛乱的朱达拉人作战。虽然塞内加尔河下游讲富尔贝语的人如今被称作图库洛尔（塔克鲁尔的变音）人（他们自己不用这个名称），

---

[37] P. D. 柯廷（P. D. Curtin），1975年，第48页。

[38] H. J. 费希尔（H. J. Fisher），1977年，第316页。但有些教士并不热忱于向未改宗的人传播伊斯兰教，而宁愿垄断秘传法力专供本集团之用；参阅Y. 佩尔松（Y. Person），1968－1975年，第1卷，第133页。

[39] 巴克里，1913年，第172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96页；M. 莱维茨恩和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77页。

但很难断言 5/11 世纪时他们是否已一居住在这个地方。看来更可能的是，古代塔克鲁尔的居民是索宁克人。[39] 后来若干世纪中，塔克鲁尔这个名称在北非和埃及常用以指称中苏丹和西苏丹的所有穆斯林国家。究竟这是由于塔克鲁尔是西非洲第一个穆斯林国家、还是由于到 8/14 世纪时塔克鲁尔的居民（此时已是讲富尔贝语）已开始产生穆斯林教士阶级（托罗德贝人），这些人对整个西苏丹的伊斯兰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40]

更早，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之前的时期，也有一位当地君主改宗的事发生在加奥（考考），大致是 400/1009－1010 年，迪亚（扎）的第 15 代君主科索伊信奉了伊斯兰教。[41] 巴克里没有提这次改宗是在什么环境下进行的，但报道说一位新君主在加奥即位时，被授予一口宝剑、一只盾和一本古兰经，据说是一位哈里发的赠予，作为他登基的标帜。巴克里还说，国王宣誓信仰伊斯兰教，决不把最高权力授予穆斯林以外的任何人。[43]

但是巴克里描述的加奥宫廷典礼显然是非穆斯林的。伊斯兰教成为官方的王室宗教而居民群众却是非穆斯林，宫廷又主要实行一套传统的典礼；这种格局长期一直是苏丹地区许多国家中的普遍时尚。它表示伊斯兰教同本地宗教结构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属于同一时期的还有上文提到过的马拉尔国（一个早期的马林克人酋长国）国王的改宗。据巴克里报道，这位君主是由于一个穆斯林居民为该国久旱祈祷带来甘霖而被争取到伊斯兰教一边的。当时王室和宫廷成员虽成了真诚的穆斯林，老百姓则继续信他们的传统宗教。[44] 这位国王公开宣称忠诚于新宗教，被称为"穆斯利马尼"，但是在他之前的阿卢坎的君主却不得不在臣民面前隐瞒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

5/11 世纪由于加奈姆的君主（称为"马伊"，*mai*）的改宗，伊斯兰教在中苏丹第一次确立起它的地位。[45] 在胡迈依·吉勒米（约 472/1080－490/1097 年在位）的"特权授予书"（*mahram*）中我们读到如下一段话：

> "伊斯兰教首先进入的苏丹地区国家是博尔努。它是由穆罕默德·伊本·马尼带来的，他在布卢国王在位期间在博尔努住了 5 年……，在乌姆迈（胡迈依）国王在位期间住了 14 年。然后蒙乌姆迈国王的恩典，他把博尔努带进伊斯兰教……乌姆迈马伊和穆罕默德·伊本·马尼到处传播伊斯兰教将持续到最后审判日"。[46]

74

有意思的是，胡迈依·吉勒米之前有几位君主在位时（从 5/11 世纪初开始）宫廷

---

[39] 沃尔·戴阿比是一个索宁克人专有名字；参阅 C. 蒙泰伊（C. Monteil），1929 年，第 8 页；讲富尔贝语的人移入塞内加尔河下游乃是后来才开始的。

[40] 参阅 U. 纳夺尔（U al－Naqar），1969 年

[41] 《苏丹史》（Ta'rīkh al－Sūdān），1900 年，第 5 页。

[43] 巴克里，1913 年，第 183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08－109 页。

[44] 参阅注 35.

[45] 参阅 D. 兰格（D Lange），1978 年。

[46] H. R. 帕尔默，1928 年，第 3 卷，第 3 页；H R. 帕尔默，1936 年，第 14 和以后诸页，重印。

中已有穆斯林教士，他们甚至于把伊斯兰格言教给君主，并同君主一道诵读古兰经的某些章节；然而没有一位马伊公开信伊斯兰教。正因为如此，巴克里在胡迈依·吉勒米在位之前一个世代写作时，认为加奈姆虽受穆斯林的影响却仍是一个“崇拜偶像的黑人的”王国。可以说明此事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个有趣的故事，说那里有一些伍麦叶王朝的避难者，他们“仍然保持阿拉伯方式的服饰和习俗”。㊼ 胡迈依·吉勒米的继位者，他的儿子杜纳马（490/1097－545/1154 年在位）两度到麦加朝觐，在第二次朝觐时候淹毙。㊽

5/11 世纪似乎是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和中苏丹首次真正突破的时期：从塞内加尔河下游至乍得湖沿岸，伊斯兰教受到各地君主和酋长们的信仰，从而在非洲各地社会的结构中获得官方的承认。同一世纪还发生了苏丹地区各国中最为著名并且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加纳改信伊斯兰教。

人们过去常认为这一改宗行动之出现是由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在 469/1076 年征服加纳所致。可是在近年研究中，学者们诸如 D. 康拉德、H.J. 费希尔、L.O. 桑纳和 M. 希斯基特 ㊾ 对这种看法提出质疑，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征服，这两个强国自始至终保持友好关系。正如一位近代权威所作结论：“看来更可能的是，加纳的索宁克人同沙漠里的阿尔莫拉维德人一直和睦相处，后者成为同盟者而不是敌人，加纳人是被后者和平地说服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作为加纳帝国的官方宗教”。㊿ 从阿拉伯文资料，主要是巴克里的著作，我们知道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治时期以前加纳首都有一个庞大的穆斯林社会，不但有商人而且有宫廷成员和大臣们。因此加纳的君主75 们长期以来已经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也很可能，伊斯兰教最初是以哈列哲教派的形式传到加纳。因此，祖赫里所说的改宗情形（469/1076 年兰图纳人使加纳人民改信伊斯兰教 ⑤¹）只能意味着是把正统派的马立克学派伊斯兰教强加于先前的易巴德派社会，如早些时候在奥胡达古斯特发生的那样。阿尔莫拉维德人介入的最重要成就无疑在于使国王及其宫廷成员改宗。⑤²

修正派学者所反对的另一个观点是认为征服加纳并迫使它伊斯兰化导致索宁克人的大批迁移，索宁克人反对伊斯兰教，宁肯离开祖居的家园也不愿放弃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⑤³ 既然不曾有过这种征服或强迫伊斯兰化，那么确实发生过的迁徙就不可能是由于这种因素。

当然，不承认阿尔莫拉维德人的深刻影响和他们的介入给苏丹带来变化那是错误的。但是所带来的变化与迁徙理论的鼓吹者所假想的大不相同。索宁克人确实开始疏

㊼ 巴克里，1913 年，第 11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82 页；参阅本书第 15 章。

㊽ 《博尔努历代素丹世系表》；H. R. 帕尔默，1936 年，第 85－86 页。

㊾ D. 康拉德（D. Conrad）和 H. J. 费希尔，1982 年、1983 年；L. O. 桑纳（L. O. Sanneh），1976 年；M. 希斯基特（M. Hiskett），1984 年。

㊿ M. 希斯基特，1984 年，第 23 页。

⑤¹ 祖赫里，1968 年，第 180 及以后诸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19 页。

⑤² M. 希斯基特，1984 年，第 26 页。

⑤³ 这个概念是下述理论的根源：如今加纳共和国的阿坎诸族的祖先（据说“阿坎”一字乃是“加纳”一字的音讹）是古代加纳被阿尔莫拉维德人征服以后从那里出来的。

散，但是这是很多时候以前就已开始的一个过程的继续。伊斯兰化的索宁克商人（即阿拉伯文资料中的方加拉人）在萨赫勒地区及更往南，靠近热带森林的边缘，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网。他们根本没有对伊斯兰教有任何抵触情绪，事实上他们还大力协助向苏丹地区的非穆斯林部分传播这种宗教，那些地方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从未渗入过。从尼日尔河畔的迪亚迁到巴芬河畔的新中心迪亚坎巴的索宁克人被称为迪亚坎凯人。他们讲马林克人的语言，发展起一个结合得十分紧密的社会，在其中宗教活动与商业的活动携手并进。[54]其他索宁克血统的商人发展起另外的商业网（但语言上也常用马林克语）：迪尤拉人主要在南方各地，马尔卡人在尼日河河湾，雅尔塞人在沃尔特河流域诸国。他们的大部分历史和他们在传播伊斯兰教中所起的作用是以后几个世纪的事，然而这个过程的起步乃是在紧随阿尔莫拉维德人介入加纳之后的时期。

无疑，在阿尔莫拉维德这一幕间奏曲之后，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活动更加强化了。加奈姆的胡迈依·吉勒米马伊信奉伊斯兰教常被说成是受阿尔莫拉维德的影响，其实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已经知道，在阿尔莫拉维德兴起之前苏丹地区早已有别的君主成为穆斯林。看来似乎是，在5/11世纪，苏丹地区有不少国家的发展动态已经达到一个阶段，信奉伊斯兰教为统治阶级和日益扩大的当地商人集团提供好处。这种好处在随后的若干世纪，在苏丹地区的大帝国马里和桑海兴起时，更加显而易见。 **76**

在过去的非穆斯林帝国实行某种程度伊斯兰化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外部原因同贸易有关，因为从经济观点看，这些帝国的职责是控制苏丹地区同北部非洲的贸易从中获利。统治阶级有强烈兴趣组成伊斯兰化的联合阵线（通过强化其宫廷和进行朝圣）以便建立和增进同北部非洲的顾客和伙伴们的良好关系。[55]其内部原因则是，这些帝国的君主们都面临一个巨大问题：如何获得被征服的异教部落和部族的效忠，这些部落和部族的祖先和国土的崇拜对象同统治王朝完全不同。像伊斯兰教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宗教似乎能提供恰当的解决办法；于是君主们就作出巨大努力，至少把这种宗教灌输到其他世系或氏族的头人中间，树立起一种新的共同宗教纽带。帝国版图日益扩大，使得有效地管理帝国领土更加复杂化；在这方面穆斯林书吏和其他能写会读的人的帮助在函牍和国事管理中必不可少。穆斯林教士在宫廷的影响当时已经很大，从而为君主及其家族的最终改宗打下基础。

这并不意味着国王们必然是非常虔诚和宗教感情深厚的穆斯林。他们同时也得考虑占人口大多数的非穆斯林臣民的当地习俗和传统信仰，这些人把君主看成是超自然力量的化身或中间人。没有一个君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势，可以不必同非穆斯林的信仰妥协而轻易推行伊斯兰教教义或教法。这种实际情况有助于解释在马里的历代曼萨（*mansa*）和桑海的历代阿斯基亚（*askiya*）这样一些穆斯林国王的宫廷中何以保存众多的异教徒仪式和典礼，这些国王都曾到麦加朝觐并且通常被认为是虔诚的穆斯林。

马里帝国君主的伊斯兰化发生在7/13世纪末松迪亚塔后代的统治时期，虽然伊

---

[54] 关于迪亚坎凯人，参阅L. O. 桑纳，1979年；P. D. 柯廷，1971年。

[55] C. 科全里－维德罗维奇（C. Coquery－Vidrovitch），1969年，特别见第73页。

本·巴图塔和伊本·哈勒敦认为这位创业英雄本人改信了伊斯兰教，[56] 马林克人的口头传说却极力强调他作为"异教徒"术士的特色，不承认他有任何改宗行为。但是松迪亚塔的儿子和继位者乌利曼萨在马木路克素丹拜巴尔斯（658/1260－676/1277 年在位）统治时期曾经朝圣。他执政时，马里在萨赫勒地区扩张，控制了瓦拉塔、廷巴克图和加奥这几个商业城市，因而比起以前几个世纪，同伊斯兰化各族有更为直接的接触。[57]

78 从他统治时期起，国王朝圣成为历代曼萨固定不变的传统。帝国的伊斯兰面貌形成于 8/14 世纪穆萨曼萨（大约 712/1312－738/1337 年在位）和他的兄弟苏莱曼曼萨（大约 738/1341－761/1360 年在位）统治时期，他们鼓励兴建清真寺和发展伊斯兰教学术思想。伊本·巴图塔是当时情况的目击者，他赞扬了马里的穆斯林在背诵古兰经和做公共礼拜方面的热忱。人们读他的记载时的一般感想是，8/14 世纪中叶的马里是一个伊斯兰教已在那里生根立足的国家，它的居民遵奉伊斯兰教的主要戒律。他没有提到任何异教徒的宗教习惯，除了妇女裸露身体之外，他没有看到伊斯兰教法所禁止的任何事物。[58]

马里帝国全盛时期天下太平有利于西苏丹贸易的开展。穆斯林商人在帝国各地建立各种商业网，甚至在帝国疆域之外经营业务。越来越多的马林克人改信了伊斯兰教，来自其他族群的人，诸如塞内加尔河流域和马西纳的富尔贝人也纷纷皈依伊斯兰教。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出现了本地的教士阶级并日益壮大起来，他们集中在主要的政治中心和商业城市，在尼亚尼和加奥，尤其是在杰内和廷巴克图。有充分证据表明，到 9/16 世纪，廷巴克图的大部分穆斯林学者已是苏丹血统；他们中许多人在非斯学习过，其精通伊斯兰教教义和对伊斯兰教虔诚的程度引起外国客人的赞赏。[59] 廷巴克图的主要职位（执法官、伊玛目和宣讲师）全由黑人穆斯林担任，这些黑人来自马里帝国的内陆地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杰内和迪亚加（迪亚），伊本·巴图塔称赞那里的居民是"老穆斯林，以虔诚和追求知识著称。"[60] 一整批苏丹血统而学识渊博的穆斯林学者和教士，其地位的确立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自此之后伊斯兰教由讲当地语言、具有当地习俗，并且宗教知识渊博的本地人来宣讲和传播教义；他们掌握的知识有利于他们的布道工作，保证他们比北非来的同道们早年所得成就更大、更辉煌。在非洲人的心目中，伊斯兰教已不再是外国白人的宗教；由于它如今由非洲人自己传播，它成了非洲的宗教。

79 这个新的黑人教士阶层的影响所及远达中苏丹。直到 8/14 世纪，乍得湖与尼日尔河中游之间的地区在伊斯兰教传播方面还是一泓死水的区域，特别是豪萨兰一直是传教活动鞭长莫及之地。然后，在卡诺的"萨尔基"(*Sarki*) 亚吉统治时期，来自马勒的万

---

[56] 伊本·巴图塔，1969 年，第 4 卷，第 420 页；伊本·哈勒敦，1925－1956 年，第 2 卷，第 110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310 页、第 344 页。

[57] 参阅 J. L. 特里奥德 (J. L. Triaud)，1968 年，第 1329 和以后诸页。

[58] 伊本·巴图塔，1969 年，第 423－424 页；他在马尔代夫群岛遇到同样裸露身体的情况而没有对那里居民的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正性有何怀疑。

[59] 参阅《苏丹史》(*Ta'rīkh al-Sūdān*)，1900 年，第 78－84 页。

[60] 伊本·巴图塔，1969 年，第 4 卷，第 395 页。

加拉人带来了穆斯林宗教。”[61] 根据H.R.帕尔默的年表，亚吉执政是从750/1349到757/1385年；然而近年发现的11/17世纪《万加拉编年史》却明明白白地说这些传教士是在穆罕默德·鲁姆法在位时（867/1463－904/1499年）到达卡诺的，那些人离开他们的故土是在835/1431－1432年。[62] 早期豪萨历史上确定年代十分困难，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伊斯兰教首次传入豪萨兰的日期，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致是不足为奇的。尽管有《万加拉编年史》编者提出的论点，看来更可能的是，这些穆斯林之到来是发生在8/14世纪亚吉统治时期而不是在一个世纪之后鲁姆法统治时期。《卡诺编年史》所述的亚吉是一位严格的穆斯林，要求他的臣民做祈祷；而亚吉与鲁姆法之间的诸王（*sarakuna*），除了拥有穆斯林姓名，根据描述还确是穆斯林。[63] 在鲁姆法前一位国王的统治时期，穆斯林富尔贝人（富拉尼人）自马勒来此，“带来关于神学和语源学的书籍”，而在这以前豪萨穆斯林只有“圣训”和关于伊斯兰法学的书籍。[64]

当然，有可能豪萨兰在不同时期接待了几批万加拉穆斯林，他们的早期代表已经成功地主要在商人中间传播了伊斯兰教，而编年史中所记载的那一批则是向统治阶级布讲这一新宗教。[65]

强大的伊斯兰教传统开始确立是在9/15世纪的后半叶。三位重要的君主（他们可能是同时代人物）—— 扎里亚的穆罕默德·拉博、卡齐纳的穆罕默德·科鲁乌和卡诺的穆罕默德·鲁姆法，通过引进或确认伊斯兰教使豪萨的发展焕然改观。关于穆罕默德·拉博，除了他是扎里亚的第一位穆斯林萨尔基（*Sarki*）以外，其他毫无所知。卡齐纳的下一代君主易卜拉欣·苏拉据记载是一位严厉的统治者，他把不肯做礼拜的人一概囚禁起来，而他的儿子阿里被称为“穆拉比特”(*murabit*,伊斯兰隐士)，这些君主中许多人受伟大的穆斯林改革家穆罕默德·马吉利的影响，马吉利应鲁姆法之请写了《君主的职责》(Obligations of Princes) 作为穆斯林君主的行为指南。[66] 关于谢里夫（*sharif*，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们在当时到达卡诺也有记载，他们的来临导致宗教信仰的加强和某些异教残余的消灭。伊斯兰教在当时仍然充斥着许多本地的风俗习惯，有些君主不仅向马吉利也向著名的埃及学者苏尤提请教正确行为的指导。[67] **80**

即使经过这些努力来扶植其力量，伊斯兰教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信仰。它成为各地商人和专业教士这个狭小社会的宗教；宫廷人士接受表面的影响，而人民群众则继续保持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但是逐渐地，伊斯兰教的观念和态度越来越深人，形成一种“混杂的”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在苏丹地区这些部分的进一步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的

---

[61] 《卡诺编年史》(Kano Chronicle)，见H. R.帕尔默，1928年，第3卷， 104页。

[62] M. A.哈吉（M. A. al－Hajj)，1968年，第7和以后诸页。

[63] 《万加拉编年史》(Wangarawa Chronicle) 的主要弱点在于：它把万加拉人的到来同发生在9/15世纪末改革者马吉利的到来混淆起来。

[64] 《卡诺编年史》(Kano Chronicle)，见H. R.帕尔默，1928年，第3卷，第111页。

[65] 参阅S. A.巴洛贡（S. A. Balogun)，1980年，第213－214页。

[66] 关于马吉利，见A. A.巴特兰（A. A. Batran），1973年。

[67] 苏尤提（al－Suyūtī）在其致易卜拉欣·苏拉的信中写道：“我听说在戈比尔人中间有那么一些人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以一名男奴或女奴作为献祭的牺牲，声称这将使他们赎免死亡。”参阅T. L.霍奇金，1975年，第119页。

是，这种多种成份并存、"混杂的"伊斯兰教为豪萨商人所乐于接受，他们继迪尤拉人之后成为第二个最活跃的穆斯林商业阶级。随着通往黄金海岸（现今加纳）内地盛产柯拉果地方的商路开通，他们（在那些地方碰到向东迁移的迪尤拉人），把伊斯兰教带到森林的边缘。

到10/16世纪，由于桑海的阿斯基亚（*askiya*）穆罕默德所推行的政策，由于加奈姆的马伊（*mai*）们迁到博尔努以及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的长期执政，伊斯兰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改善。据推测，伊德里斯·阿拉沃马为支持他的一个被保护者而对曼达拉进行的干预，为伊斯兰教传入那个地方铺平道路，而且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图布人信奉了伊斯兰教。新建立的巴吉尔米在同一世纪成为穆斯林国家，而稍晚一些时候，得到巴吉尔米的启发，阿卜德·卡里姆得以将瓦代团结成一个至少在名义上是穆斯林的国家。

在苏丹地区的另一端，在塞内冈比亚，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次伊斯兰攻势。10/16世纪初，绝大部分冈比亚居民已经被认为是穆斯林。[68]到了该世纪后半叶，随着图库洛尔人在富塔托罗得到发展，伊斯兰教的传播更为明显。穆斯林传教士（葡萄牙人叫他们"比希林"，*bixirim*）在沿海几乎周游所有可到之处，宣讲伊斯兰教的信条，鼓吹禁食猪肉，并散发护身符。冈比亚河畔有三座隐修所专门培养教士，然后派他们去所有毗邻地方劝人改宗。[69]

当然，在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到过一些挫折。尼日尔河河湾的莫西人曾长期抗拒伊斯兰教的传播，尽管他们早在8/14世纪就同伊斯兰教有所接触，当时他们攻陷和洗劫了廷巴克图，甚至攻陷和洗劫了瓦拉塔。[70]在下一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中，穆罕默德阿斯基亚对他们发动了一次圣战，因为他们抵制他要求信奉伊斯兰教的号召。但是，甚至在军队遭到惨败之后，莫西君主也拒绝放弃自己的传统宗教，他的大部分臣民也照此办理。只是到11/17世纪之后，穆斯林商人（雅尔塞人）才开始渗入莫西诸王国，迟到13/19世纪才有一些莫西人改信伊斯兰教。

班巴拉人在古马里帝国境内形成另一个信奉传统宗教的岛屿。马里帝国衰落以后，甚至马里的伊斯兰文化也退化了；马林克人失去了外围领地并同撒哈拉贸易隔绝，他们生活在小小的"卡富"（*kafu*，酋长领地）中，没有什么中央政府，也没有城市生活。伊斯兰教被执政阶级所抛弃，这时它只是商业群体（迪尤拉人）或者教士们（"摩里巴"）的宗教。[71]

但是总的说来，到10/16世纪伊斯兰教已在整个苏丹地区（从大西洋岸到乍得湖畔及以远地区）确立其地位。这个地带所有大国的统治阶级和大部分小国的统治阶级至少在名义上是穆斯林。在所有城市和许多村庄里生活着各个部族血统的非洲穆斯林社会，

---

[68] D.帕切科·佩雷拉（D. Pacheco Pereira），1956年，第69－73页。

[69] M. F.德 B.桑塔伦（M. F. de B. Santarem），1842年，第29页。

[70] 可是从近年研究看来，不敢肯定这些莫西人是否就是沃尔特河流域的莫西人。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9章。

[71] Y.佩尔松，1981年，第614页、641页。

有时只是名义上的穆斯林，但往往是信仰虔诚和眼界开阔的人，同撒哈拉以北更大范围的世界有广泛的联系。虽然大多数农民对这种普遍性质的宗教只是略有接触，但在存在许多世纪之后，伊斯兰教已成了人们熟悉的现象，成为西非文化的一个部分。

努比亚和尼罗特苏丹

努比亚和尼罗特苏丹的伊斯兰化一向是—— 而且实际上今天仍然是 —— 一个长期连绵不断的过程。虽然努比亚从 1/7 世纪早期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来就同伊斯兰教有接触，但是伊斯兰教在那里的传播却由于信奉基督教的努比亚国家的存在和努比亚人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怀有深厚感情而受到阻挠。来自埃及的穆斯林在 31/651－652 年曾企图征服努比亚，甚至渗入远达栋古拉的地方，但努比亚人激烈抵抗迫使他们不得不谋求停战。随后签订的条约（通常称做巴克特条约），[72] 是一个非侵略性协定。它允许努比亚人的国家马库拉保持其独立地位；它允许双方臣民有权在对方领土内旅行和贸易，并且规定努比亚境内的穆斯林受到保护。[73] 该条约一直生效了整整 600 年，就一个国际条约存在的时间来说确是异常之长。它还表明穆斯林放弃了占领努比亚的想法；他们更有兴趣的是终止努比亚人的袭击，保持那个地方作为势力范围。虽然有时偶尔企图使君主们改信伊斯兰教（例如法蒂玛王朝在埃及统治的初期），可是历代穆斯林埃及政府的总政策是不去打扰那个基督王国。

82

埃及统治者和努比亚君主之间的友好关系为穆斯林商人的进入打开了大门。在马库拉的首都从很早时代起就存在着阿拉伯商人的居民点，他们按照整个苏丹地区既定的格局居住在城中单独的地区。虽然这些商人似乎并不积极宣传伊斯兰教，然而他们初步把这种新宗教信仰的基本原理带进一个到此时为止完全是基督教势力范围的地区。

努比亚的伊斯兰化（同时也是阿拉伯化）是很不相同的几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在 2/8 世纪已有一些阿拉伯游牧族群开始从上埃及向努比亚迁移，主要选择了尼罗河河谷和红海沿岸的地区。在 4/10 世纪，他们已在努比亚的最北部定居下来。同时第二瀑布以北的某些努比亚人已改信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进入努比亚的第二条途径（虽然不如尼罗河走廊那么重要）是红海沿岸。阿拉伯商人从 2/8 世纪起就开始定居在阿伊达布、巴迪和萨瓦金等沿海城市。内地居住的是动乱中的游牧民贝贾人，他们的反复入侵长期骚扰着上埃及。历代穆斯林政府想通过类似同努比亚缔结的条约来安抚他们，但是由于贝贾人没有什么权力集中的政治组织，这些条约往往只包括族群的一部分。可是贝贾人的首领们还是允许穆斯林商人在他们境内定居，于是这个地区也就向伊斯兰教势力开放了。

随着一些阿拉伯游牧族群迁入贝贾人居住的地方，伊斯兰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他们的成员在那里同贝贾人的统治家族通婚；他们的孩子成为某些贝贾族群的首领。这个过程在长时期中一再周而复始，于是穆斯林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类似的通婚过程也在努

---

[72] 关于巴克特（bakt）条约，参阅本书第 8 章。

[73] 我们这里只谈该条约中同伊斯兰教的传播直接有关的部分。

比亚进行，导致建立起强有力聊穆斯林世系。m外，贝贾人的伊斯兰化还由于4/10世83纪至7/13世纪之间从尼罗河流域到红海诸港的商路穿过贝贾人地区而得到促进。最北部的贝贾族群（哈达里巴人和阿巴布达人）逐渐阿拉伯化，甚至冒名顶替采用阿拉伯人的家谱，然而他们的古老宗教信仰只是淡淡地用一层伊斯兰外衣伪装起来。其他族群没有感受到穆斯林阿拉伯人如此强大的影响，但是即便是他们也经过长时期接受了伊斯兰教，或者至少是接受了它的某些信条。可以说，到8/14世纪时大部分贝贾人已正式伊斯兰化，也就是说，他们自认为是穆斯林，也被他们的教友认为是穆斯林，然而他们的许多传统宗教信仰和习惯仍然保持。

与此同时，阿拉伯移民不断流入努比亚北部；直到6/12世纪末，在马库拉王国仍然保持独立之时，这种移民的流入多多少少是采取小批贝都因人逐渐渗透的方式。由于马木路克人干预王族的内争，努比亚国王成了附庸式傀儡君主。在715/1315年，马木路克人挑选一个已经改信伊斯兰教的王公作努比亚国王；这个事件是努比亚基督教势力开始衰落的前奏。政权转入一个穆斯林手中使努比亚从一个战争地区（*Dar al-harb*）转变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地区（*Dar al-Islam*）；交给埃及穆斯林统治者的"吉兹亚"(*djizya*)（人头税）停止交纳了。[74] 君主的伊斯兰化也使巴克特条约宣告终止。

北部努比亚王国的瓦解（阿拉伯"部落人"的早期渗入对此起了很大作用）促使阿拉伯人向努比亚沙漠以远的肥沃牧地大举突破。虽然这些阿拉伯贝都因人名义上是穆斯林，可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信仰伊斯兰教有比其他游牧民基础深厚之处，很难设想他们会狂热地劝说别人信奉他们的宗教。然而，基督教王朝的灭亡和随之基督教不再是国教，必然大大促进沿尼罗河河谷的定居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促使努比亚基督教衰落的因素还包括当地的基督教势力同外部世界越来越隔绝，以及基督教在埃及地位日益恶化，而大部分高级教士是来自埃及。基督教并没有一下子消灭殆尽，而是苟延了很长时间，更确切地说它是由于内部弱点而消亡的。它的地位逐渐地被伊斯兰教所取代。在更南部的阿勒瓦王国，它一直存在到10/16世纪初，到那时它才被阿拉伯"部落人"和芬吉人的联合行动所推翻。

此时阿拉伯游牧民业已渗入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之间的贾齐拉和阿特巴拉河和青尼84罗河之间的布塔纳。在那里他们在阿勒瓦大主教教区和在森纳尔住下来，并向南推进远达白尼罗河上的阿巴岛。阿拉伯人渗入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南部的情形与此相似。

继阿拉伯游牧民之后，穆斯林教士和神职人员接踵而至。他们来自古老的伊斯兰教国家或曾在那些地方学习过，是他们最早把一些伊斯兰教教规（"沙里亚"，sharīa）的知识带到这个地方来的。这些虔诚的传教士中来得最早的是也门人古拉姆·阿拉·伊本·艾德，他于8/14世纪后半叶来到栋古拉地区；他发现那里的穆斯林由于缺乏导师而愚昧无知。[75] 后来几个世纪中苏非教团的传教士开始定居在苏丹地区，对宣传伊斯兰教义作出了贡献。他们成功地使芬吉人（一种黑色皮肤的民族）皈依伊斯兰教，芬吉人的直接发源地是青尼罗河上游。在芬吉诸王执政时期伊斯兰教得到提倡，许多学者和虔

[74] 伊本·哈勒敦，1956—1959年，第5卷，第922—923页。

[75] Y. F.哈桑（Y. F. Hasan），1966年，第154—155页。

诚信徒迁往他们的王国。到10/16世纪伊斯兰教的南部边疆稳定在沿北纬13度一线。伊斯兰化过程伴随着阿拉伯化过程，这在该国的大片地方留下了标志。[76]

非洲之角

伊斯兰教进入埃塞俄比亚是通过从达赫拉克群岛和宰莱通往内地的两条重要商路。达赫拉克群岛在2/8世纪初已是穆斯林岛屿，与此同时红海沿岸另外一些地方也开始有穆斯林定居，大部分是阿拉伯或其他非洲血统的人。从这些中心地开始，伊斯兰教在沿海的本地人（主要是游牧民）中传播开来，但是4/10世纪以前伊斯兰化的影响并不强烈。

在达赫拉克群岛发现的大量阿拉伯文碑文表明当地穆斯林社会十分富裕、地位重要，它后来发展成为很有势力的素丹国。[77] 虽然如此，这个群岛在伊斯兰教向埃塞俄比亚内地传播方面似乎未曾起过很大作用。主要障碍是埃塞俄比亚北部讲提格雷语和讲阿姆哈拉语各族中间基督教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君主们无疑是欢迎来自沿海拓居地的穆斯林商人的——达赫拉克曾经长时期是埃塞俄比亚王国唯一的出口处——但这些君主禁止商人们传播其宗教信仰。然而在3/9世纪，一些主要的中心地和主要商路的沿线已经出现了穆斯林社会。埃塞俄比亚的贸易，尤其是远程的商队贸易，从这么早年代起就为穆斯林所垄断，是因为当地的基督教社会一直轻视商业活动和手工业。[78] 在彻底是基 **85** 督教势力范围的提格雷省也发现有早期穆斯林社会的遗迹；[79]看来在这个基督教王国，商人们该是有迁徙自由并被允许带着自己的家庭和仆人在那里定居的。[80]

达赫拉克群岛肯定是埃塞俄比亚北部穆斯林社会创造者进入该地的门户，而在南方，绍阿省穆斯林社会的创建者则必然是从宰莱（亚丁湾的一个重要港口）得到的启示。在这方面，宰莱的重要性一直超过达赫拉克，正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南部伊斯兰教注定要起突出的作用。

宰莱腹地的情况同北部的情形大不相同：那里对基督徒和穆斯林来说都是边远地区，他们在那里为各自的信仰而争夺有着传统宗教信仰的本地广大居民的灵魂。同这种宗教竞争同时进行的是争夺政治和经济控制权的斗争，它在未来许多世纪中连绵不绝。

到2/8世纪和3/9世纪，伊斯兰教在亚丁湾沿海地带的地位已经巩固；其后几个世纪，它在整个地区，特别是在内地的政治和宗教重要性增加了。伊斯兰教势力之所以能得到发展，一方面有其内部条件：基督教王国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有外部条件：法蒂玛王朝势力在红海的崛起和随后的贸易复兴。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商人深入南部内地，建立起小型的社会和政治单位。这为穆斯林教士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开始使本地人

[76] 关于伊斯兰教在尼罗特苏丹的传播，参D J. S. 特里明厄姆（J. S. Trimingham），1949年。

[77] 关于这些碑文参阅B 马尔穆西（B. Malmusi），1895年；G. 奥曼（G. Oman），1974年（a），1974年（b）。

[78] 参阅M 阿比尔（M. Abir），1970年，第123页。

[79] M. 施奈德（M. Schneider），1967年。

[80] 参阅马苏迪（al-Mas'ūdī），1861-1877年，第3卷，第34页，谈到哈巴夏人的穆斯林家庭是本地各族的附庸。

皈依伊斯兰教。

早期亚丁湾沿岸的穆斯林的商业城市和君主国在4/10世纪末开始沿哈勒尔高原扩张，到下一个世纪初，伊斯兰教的扩张已导致该地区讲闪米特语和讲库希特语各族建立起一些穆斯林素丹国。一本当地阿拉伯语编年史说，绍阿素丹国的第一位君主在3/9世纪末已开始执政，但更可能的是，这个国家到6/12世纪初才创立。[61]统治家族声称其世系源自麦加的著名族群麦克朱米。这个地区还有其他阿拉伯血统的非麦克朱米家族的君主国。

86 一个较为重要的穆斯林王国是伊法特，它的君主也声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家族阿布·塔利卜的后代；在684/1285年它最著名的素丹奥马尔·瓦拉斯玛将绍阿素丹国并入伊法特国。

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的原始资料表明，除伊法特外至少还有三个穆斯林王国存在：达瓦罗（在哈勒尔地区以西）、阿鲁西地方的萨尔卡和达瓦罗以南的巴莱。较后时期，我们才发现资料中提到哈迪亚、阿拉巴卜尼和达拉和其他一些国家。哈迪亚在7/13世纪以后特别有名，成为奴隶贸易的中心。[62]伊法特很长时期一直是主要的穆斯林国家，这是由于它在从宰莱通往阿姆哈拉和拉斯塔两省以及通往其他穆斯林君主国的重要商路上占据重要战略地位。

尽管自7/13世纪以后，所罗门王朝的皇帝逐渐兼并了南方的穆斯林大小国家，高原上的商队贸易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穆斯林手中。

在这些早期世纪里，除了商人和宫廷成员外，当地一般人的伊斯兰化程度究竟有多大和多深是很难估计的。绍阿素丹国编年史只是到了6/12世纪初期才报道内地有重大改宗行为，特别是在绍阿高原的东侧丘陵地带。在哈勒尔地区，7/13世纪的阿拉伯文碑文是存在颇为发达的穆斯林社会的见证，从而证实了哈勒尔做为这一地区伊斯兰教扩散中心地的重要地位。[63]在基督教对南方发动攻势的时期，伊斯兰教无疑在势力和人员方面都受到损失；然而它继续为许多未被攻势直接波及的族群，诸如阿法尔人和索马里人所信奉。10/16世纪，艾哈迈德·格兰对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发动圣战时，他能招募平原地带的阿法尔人和索马里人以及高原地带讲闪米特语和讲库希特语各族的人到他的军队里来，这些人都长期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尽管建立一个穆斯林埃塞俄比亚帝国的企图最终失败了，埃塞俄比亚的东部和南部边缘地带仍然牢固地留在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内。[64]

伊斯兰教在埃塞俄比亚的早期传播情况可以借助书面文献加以追溯，但索马里伊斯兰化的初期情况却比较模糊不清，当然我们有阿拉伯地理学家所写的关于一些沿海城市的记载（如宰莱、柏培拉、摩加迪沙、布拉瓦和马尔卡），甚至还从这些地方发现载有年代的铭文，但是若说广大索马里人居住的内地的情况，那就只能从历史传说中推断出

[61] E. 采鲁利（E. Cerulli），1941年，第5－14页；参阅本书第20章。
[62] 欧麦里（al-'Umarī），1927年，第20和以后诸页。
[63] R. P. 阿扎伊斯（R. P. Azaïs）和R. 尚博尔（R. Chambord），1931年，第1卷，第125－129页。
[64]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化，参阅J. S. 特里明厄姆，1952年。

某些概貌。居住在亚丁湾沿岸的索马里族群无疑在极早时候就同穆斯林发生接触。阿拉 87 伯和波斯的商人似乎是沿海城市的最初拓居者，他们在那里同本地妇女通婚，终于同本地的索马里居民融合。他们带来伊斯兰教作为宗教信仰，影响了生活在拓居地里和邻近腹地的索马里人，使这些人逐渐转化成穆斯林。但是只是在经过若干世纪之后，这些穆斯林的影响才得以固定下来。索马里的传说记载道，达罗德·伊斯梅尔长老（谢赫）自阿拉伯半岛来到这里，定居在迪尔人（最古老的索马里部族）中间，娶了一个迪尔妇女，后来成为一个大氏族的始祖，这个大氏族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做达罗德。这事的年代不能肯定，但一般认为事情发生在4/10或5/11世纪。另一个类似的传说是关于大约两个世纪后又一位阿拉伯人伊沙克长老（谢赫）的到来，他是公认的伊萨克－索马里部族的缔造者，该部族定居在达罗德人以西。[65] 这些老祖宗的形象虽然带着传奇色彩，但看来这些传说反映了北部索马里人中间有一个激烈的伊斯兰化时期，同时也反映了达罗德部落和伊萨克部落大约在此时期里得到发展和扩张。以伊斯兰教为纽带而统一起来的大氏族的建立释放出大量内部的动力，促使这些族群大体向南普遍向非洲之角内地移动。可以相当肯定地推断，在这类迁移行动时，原已伊斯兰化的氏族对迄今未被触及的讲索马里语的族群施加了使他们改宗的影响。这花了多长时间则还无法肯定。

住在印度洋沿岸的索马里人以同他们北方同族相似的方式从沿海城市摩加迪沙、布拉瓦和马尔卡了解了伊斯兰教。在4/10世纪前半叶，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商人已有相当多人在这些城市中立足。继这些最早的拓居者之后，有来自阿拉伯半岛、波斯乃至印度的许多连续不断的移民浪潮。他们最后同当地居民融合产生了混合的索马里－阿拉伯文化和社会。当然沿海各城市的情形并非千篇一律，但最重要的共同特点是其穆斯林性质。这些沿海城市，当初都是些贸易据点，必然同腹地的索马里人有经常接触。他们对于伊斯兰教传播的贡献是否达到与高度伊斯兰化的北方各族群相同的程度则尚难以断定。

索马里伊斯兰教的一个特色是它没有伴随着阿拉伯化。虽然索马里人为自己的传说感到自豪（这些传说声称他们是高贵的阿拉伯世系的后裔），并且他们的语言也有很多阿拉伯外来语，可是他们从未丧失自己的特性，与北部非洲或尼罗特苏丹所发生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可以解释为是由于阿拉伯人从来没有大批地移入非洲之角，而仅仅 88 是作为个别人、商人或传教士到来，他们很快就为索马里社会所吸收。[66]

东非海岸和岛屿

穆斯林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到东非海岸、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以及他们在那些地方定居的情况，在本书其他各章有详细论述，[67] 这里我们只谈伊斯兰教的传播问题。

---

[65] E.塞鲁利，1954－1964年，第1卷，第60－61页。

[66] 许多原先是阿拉伯人的氏族逐渐索马里化了；穆克里氏族（摩加迪沙的主要执法官总是由该氏族的人担任）将其姓名改成索马里姓氏雷尔·法基赫（Rer　Fakīh）。参阅J. S.特里明厄姆，1952年，第215页。

[67] 参阅本书第21章、第25章。

这方面，这个地区提供了（在本章所述的时期内）与热带非洲其他地方大不相同的情景。尽管在苏丹地区或在索马里人中伊斯兰教逐渐地渗透到所有各族人民中间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各非洲族群的生活，然而在东部非洲讲班图语各族和其他族群中间却没有出现同样的影响。的确，伊斯兰教在这里是欣欣向荣的，但它只是一种生活在沿海或岛屿各拓居地中封闭式阶层社会里的来自海外的移民们的宗教。虽然考古学以及阿拉伯文的文字资料提供大量证据证明从拉穆到莫桑比克许多沿海城市都具有伊斯兰特色，然而它们同时也证明伊斯兰教没有深入内地，不论讲班图语各族或任何其他族群直到13/19世纪都没有接触到伊斯兰教。只是在那些同城市中的阿拉伯和/或波斯的外来户有直接接触的沿海各族人民中间伊斯兰教才获得成功。有报道说，甚至在穆斯林拓居地附近的村庄里住的也是"不信教的人"（*kafir*），他们是奴隶掠夺的受害者。[98]

沿海城市的社会无疑是伊斯兰社会，但却不是阿拉伯社会。移民们（人数从来不是很多）同非洲女人通婚并同当地居民相融合。他们的混血后裔很快就放弃阿拉伯语而使用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语逐渐发展成沿海所有穆斯林社会的通用语言。但是在未来的长时期中，东非的伊斯兰化成份始终是少数，他们寄希望于海洋胜过寄希望于非洲本身。

这个普遍规律有个例外，那就是穆斯林（主要是斯瓦希里商人）深入到如今莫桑比克的腹地和深入到津巴布韦，在津巴布韦发现年代为7/13世纪和8/14世纪的中国和波斯陶瓷，表明同沿海居民点有商业往来，特别是同基尔瓦及其南方的前缘据点（如苏法拉）有商业往来。后来，9/15世纪以后，当基尔瓦－苏法拉对黄金的垄断趋于衰落时，以安戈谢和莫桑比克为基地的商人同崛起的莫塔帕帝国发生兴盛的贸易联系。10/16世纪的葡萄牙文资料有很多记载提及有数以千计的"摩尔"商人活跃在莫塔帕帝国，葡萄牙人对他们的竞争深为不满。下述情况也证明了穆斯林商人在这个帝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姆韦尼·马塔帕（*Mwene Mutapa*）的第二个王妃是负责穆斯林事务的大臣。这些商人绝大多数是黑色非洲人，或是由较老的沿海中心移到北方的斯瓦希里人，或是接受了穆斯林城市社会国际贸易文化的本地人。

89

沿海穆斯林深入东南非洲内地并没有在这个地区的各族人民中间留下任何可以辨认的伊斯兰文化遗产。实际上，伊斯兰教未被内地的非洲人接受作为宗教信仰，尽管他们同穆斯林有数世纪之久的接触。传统的说法认为伊斯兰教的扩张随穆斯林商人的活动而到来似乎由于尚未探明的原因不适用于这个地区。

在科摩罗群岛，沿海的穆斯林表现了较多劝人改宗的积极性。"设拉子人"（《基尔瓦编年史》把基尔瓦的伊斯兰化归功于他们）据说也曾定居在昂儒昂岛，群岛上的本地传说大体上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事件的年代颇难肯定，但很可能，最早的穆斯林是在7/13世纪左右到来的。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他们同本地的马尔加什人以及群岛上的非洲人混合，产生了安塔洛策人（"海上人"），他们的语言是斯瓦希里语的一种方言，补充许多马尔加什外来语。据近来研究，科摩罗群岛的最后伊斯兰化发生在9/15世纪。[99]

[98] 参阅伊本·巴图塔，1969年，第2卷，第193页。

[99] 参阅C.罗比诺（C. Robineau），1967年。

尽管在过去数十年中对马达加斯加伊斯兰教的研究取得相当进展，但未能解答的问题仍比得到解答的问题要多。无疑地，伊斯兰化各族（不管是阿拉伯血统或者更可能是斯瓦希里血统）从4/10世纪以后陆续在西北海岸和邻近的沿海小岛上定居下来，正如考古学、口头传说以及早期葡萄牙人文献所证明的那样。最初拓居者的文化同拉穆和基尔瓦之间的东非海岸文化有许多类似之处。在东北海岸，5/11世纪到8/14世纪盛行一种西北方的古代斯瓦希里文化。这些拓居地的伊斯兰化居民同东非、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南部以及东印度进行贸易，特别是出口绿泥片岩制造的器皿。伊斯兰化的各族从东北方来，沿着整个东海岸散播，远达多芬堡。穆斯林移民的盛衰看来大体上是随着印度洋贸易的扩展而起伏，特别是随东非贸易网的扩展而起伏。 **90**

某些马尔加什族群的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属于阿拉伯血统；不但北部的族群如此，东南部的族群尤其如此。这些族群中最重要的是扎菲拉米尼亚人、翁贾齐人和安泰莫罗人。"阿拉伯"移民逐渐被本地的马尔加什居民同化，他们的伊斯兰文化存留下来的只有阿拉伯文书写的"索拉贝"(*sorabe*, 传说汇编)、对古兰经的模糊记忆以及某些社会－宗教习俗（主要是泥占卜和魔法方面的习俗）。书吏（*katibo*）和预言家（*ombiasy*）受到尊敬，他们是书写和解释"索拉贝"的专家（尊重书面语言是伊斯兰教典型的特色），然而那里既没有发现伊斯兰教体制的遗迹，也没有发现清真寺的遗迹。因此我们仍很难断定这些族群是穆斯林。

另一方面，北方的穆斯林，由于同外面伊斯兰世界不断接触，并多次补充新的移民而得到加强，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甚至将它传播给周围一些马尔加什邻人。这些拓居地有深刻的伊斯兰特点，10/16世纪葡萄牙来到这里的人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提到有许多清真寺，提到谢赫（长老）们和卡迪（执法官）们是政界和宗教界权威的代表。就像在科摩罗群岛一样，这些城邦的居民被称做安塔洛策人。这个词今天仍被用来指称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化居民。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在马达加斯加，伊斯兰教未曾发挥与在热带非洲其他地方相同的作用。在后者，经过一定时间它成为整个族群的宗教，深刻地影响着非洲人社会。但它从未把自己的文化加在马尔加什文化之上；相反，在岛上较僻远的地方可以看到相反的过程，即伊斯兰化的人被本地文化环境所吸收。[90]

结束语

1/7世纪到10/16世纪，伊斯兰教在非洲广大地区确立其地位。它的传播过程在各地不是千篇一律，也不是一往直前，因为在各个地方使用的方法、途径和人员不一样。我们可以把伊斯兰化的形式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1） 阿拉伯对埃及和北非的征服。它虽然不在征服的同时迫使当地的科普特人和 **91**

---

[90] 伊斯兰教及其对马达加斯加的影响问题，P. 韦兰（P. Vérin）主编，1967年，中有论述；本书第25章也有论述。又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24章。

柏柏尔人改宗，却创造一种社会和经济环境，经过一定时间导致大多数本地人改信伊斯兰教。

(2) 穆斯林的商业活动（先是远程或海上贸易，继之以地区贸易）在热带非洲许多地方起了促进伊斯兰化的作用。最初起作用的是阿拉伯血统的商人（在东部，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半岛本身），波斯血统的商人（在同一地区）和柏柏尔血统的商人（在西部）。从 5/11 世纪起劝说改宗的工作主要通过非洲穆斯林的活动来进行，他们是索宁克人、马林克人、富拉尼人、卡嫩布人、豪萨人等等。

(3) 教士或神职人员是最早把伊斯兰教传进索马里的人，然而在其他地方这些人的贡献主要是在形式上已经伊斯兰化的各族人民中（西非和东苏丹）加深宗教信仰，并紧随商人之后进一步传播宗教教义。

(4) 在尼罗特苏丹，伊斯兰化随阿拉伯游牧民的渗入而到来；可是在索马里兰，一些大民族的南迁是一个有助于把新的宗教信仰传播给其他族群的因素。

在北非、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进入该地的穆斯林都遇到与之竞争的另一个一神教信仰——基督教。本地的基督徒对伊斯兰化的抵制因当地政治和社会条件各异而各不相同。在马格里布，基督徒只是少数人（主要是混血种或外国血统），伊斯兰化比较彻底，到 5/11 世纪时基督教已经消失。在埃及，这个过程经过较长时间，只是在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才加速进行；伊斯兰化从来没有全面完成，约有 10% 的埃及人仍旧属于科普特基督教会。

对比起来，在信奉基督教的努比亚，直到 7/13 世纪末伊斯兰教的影响还很小，但在其后两个世纪基督教逐渐消声匿迹，为伊斯兰教所取代。只有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基督徒尚能坚持。在高原以南无论是穆斯林商人的和平渗透还是穆斯林国家的军事征伐都未能摧毁埃塞俄比亚人对其祖先宗教信仰的忠诚。在这场历经几个世纪的斗争中，埃塞俄比亚基督教虽以胜利姿态出现，却始终只是穆斯林海洋中的一个孤立的边远据点。

4 7世纪以后作为非洲一种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Z. 德拉马尼-优素福

伊斯兰作为宗教，从而成为精神文明和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近代非洲文明的一 92 个根本方面，以至于这个大陆的许多居民常认为伊斯兰教和非洲是一个统一的实体。确实，非洲和伊斯兰这个宗教是老相识了。甚至在“希吉拉”(*hidjra*)之前，遵照先知穆罕默德的命令，一些圣门弟子和信徒就到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君主的宫廷避难．这个小小的难民社会，包括穆罕默德的亲属和某些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受到了当地君主十分慷慨的接待。穆罕默德去世以后不到8年，伊斯兰教就在埃及站稳脚跟；在其后一个世纪完成了对非洲北部的征服。

担负传播伊斯兰教任务的是一个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已经接触到多种类型文化生活的民族（阿拉伯人），这些文化或是兴起于沙漠地带、或是兴起于城市之中，而且拜占廷人、波斯人、基督教徒、犹太教徒都曾力图给予影响。伊斯兰教的训示是用真主“降示真言”所用的语言表达的；姑且不提阿拉伯语从而产生的自豪感，① 它也必然导致一个统一的阿拉伯文化的涌现。伊斯兰教成了文化霸权的传播工具，这种文化霸权必然导致同扎根于其他类型社会的他种文化发生冲突。伊斯兰教在近东对各种伊斯兰崛起之前的文化和社会实行统治，这一现象由于有书面成文的遗产而特别引人注目，这个主题我们在这里无需过多赘述。研究非洲的文化和社会比较困难。就像其他许多情况一样，非洲的知识靠口头流传（这是非洲丰富而古老的文化生活的固有特性)。这意味着有关非洲情况的证据往往是来自外国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阿拉伯文史学著作的资料由于这 93 些著作受到偏见和观念形态某些假设的干扰，使用时必须加以验证和澄清。否则就可能出现以下危险：非洲历史似乎成了一种毫无内在创造力的历史，而且看来在长时期中成了一个“客体历史”—— 一个被征服、被剥削和被开化的地方的历史。的确，黑色的非洲人不像近东居民和埃塞俄比亚人那样，他们没有一部“圣书”作为神的启示的象征，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列为没有应受尊敬宗教的民族，因此没有资格获得受伊斯兰教“照顾”的地位，从而也就几乎没有可能拥有应受尊敬的语言和文化。②

---

① 为了对阿拉伯语这种升华作用的重要意义有足够的估价，我们应该记住，在3/9世纪时人们曾花费巨大精力把伊斯兰教崛起之前文化中凡有意义的东西都一概译成阿拉伯文．这同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徒在二、四个世纪前的所做所为颇为类似。

②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是1984年4月9－14日在达喀尔举行的“阿拉伯－非洲问题讨论会”上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那个讨论会由非洲文化学会（ACI）和阿拉伯联盟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ALESCO）举办，讨论“非洲语言与阿拉伯语的关系”问题。讨论会的总结论是：没有一种非洲语言由于同阿拉伯语接触而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对该问题的这种看法是我们完全不能同意的。

伊斯兰教，非洲各族人民和他们的文化

伊斯兰教公开赞扬高度统一，这种统一在理论上并不排除文化的多样性。它坚决断言人类有统一性，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有相同的本性，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凡人都属于亚当的“族类”，对于这个族类，上帝在万世之前赐下了“原始之约”。在这种理论概括的这一层次，伊斯兰教的高度统一性对非洲人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可是，对于埃及的基督教徒，对于埃塞俄比亚人，以及一般地对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一神论者，它却引起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古兰经》题为《筵席》的那一章③通过同一个神的三名使者，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确立了亚伯拉罕之后的历史连续性。得到前两位先知启示的那部分人未能信守训示；由于人表现出不忠的倾向，同时也由于通过穆罕默德传达的启示是历史上最后的启示，因此这第三位先知对必须遵奉真主的命令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

这种统一性，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之外，一般人是容易掌握和接受的。在它底下又有同伊斯兰教相联系的第二层次：有些宗教仪式和习惯足以表明一个人是穆斯林社会的成员，因而也可以禁止此人参加除《古兰经》所规定以外各种形式的宗教生活。职责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包含在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功课”（五功）之中。“念功”（*shahāda*）或“作证”，表现为口诵真言，公开表白“真主之外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 94 者”；“拜功”（*salat*）是一整套礼拜仪式，每日五次；“斋功”（*saum*）指斋月的斋戒，即每年斋戒一个月；“课功”（*zakāt*），完纳法定的施舍，用来资助穷人和孤儿；最后是“朝功”或到麦加朝觐（*hadjdj*），凡身体健康具备经济能力的穆斯林一生须去一次。统一的信仰和统一的宗教习惯使穆斯林信徒彼此都是团结友爱的“兄弟”，在这种团体意识中洋溢着殷勤好客和公平正义精神——上述这些同样的也不会在理论上引起什么严重的问题。穆斯林信徒的社会理想被认为适合于人类的天性，因为它实行互助、好客、慷慨大方，首先对穆斯林社会（*umma*，乌玛）的成员信守承担的义务，对其他社会也同样如此；并且还要节制欲念；通过“吉哈德”（*djihad*，圣战），④不惜牺牲自己生命；这种理想还提供超越自我的机会。这是高度团结一致的表现，这种高度一致是伊斯兰教的特征并赋予它独一无二的地位。这种团体精神显然同根深蒂固的非洲社会组织传统可以并存不悖。穆斯林的经文符合潜在的非洲人理想：布哈里写道，在加百列口授的圣训里，伊斯兰教“给饥饿者食物，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一概互祝平安”；⑤纳瓦维写道，“你们当中谁要是为自己着想超过为〔穆斯林〕兄弟着想，他就不是真正的信道者”。⑥然而，这种团结一致与一种真正的个人道义责任同时并存；谁也不会代人受过；人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因此，团体意识，也即每个人是整体一部分的感觉，仿佛是通过辩证的过程同关心自己的命运，关心自己的义务结合成一体。信道者认

③ 《古兰经》第5章。

④ 吉哈德（*djihad*）一词的原义是“为达到既定目的而奋斗”，参阅本书第2章。

⑤ 布哈里（al－Bukhārī），1978年，第2卷，第37页。

⑥ 纳瓦维（al－Nawāwī），1951年，第21、33、36、42、43各页。

识到与神有一种个人的交往，神要求他表现出自己。

从一开始就应当注意到，信奉伊斯兰教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如果这是一种负责行为，它就必须是本人自由作出的选择，精神和肉体的胁迫是《古兰经》所禁止的。但是它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行为。它是一种**社会性**改宗行为，意味着加入一个新型的社会而同其他类型的社会－文化团体割断联系。这是穆斯林世界同非洲各种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发生争论的根本点。**历史的**状况肯定是千差万别的，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如此。属于不同宗教的非洲人不会被强迫信奉伊斯兰教；可是他们的宗教地位（由于没有一部圣书）使他们不得不完全依附于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社会面前毫无抵御能力。

于是我们触及到第三个也是远为更加引人注目的层次：教法方面的关系。差不多经过整整三个世纪，穆斯林世界才确立起根据《古兰经》和先知教导制定的教规——"逊奈"（*Sunna*）。这些教规是收集"（先知）所有言行、饮食、服装、和做功的方式方法，以及对待信道者和不信道者的态度"加以汇编而成。[7] "沙里亚"（*shari'a*）把《古兰经》的规定[8]收集在一起，加上"斐格海"（*fikh*）中的戒律和阐释。曾有四个法学学派以不同方式对教法进行解释，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只不过是在拘泥字面和具体执行方面僵硬程度各异。关于伊斯兰教与非洲社会的关系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特色是，非洲人不得不与之发生关系的法学学派在大陆西部与东部并不一样。西部（从马格里布到西非洲）具有马立克学派影响深远而且几乎是独霸一方的特点。马立克学派比其他法学学派更偏重于形式主义，特别是在 5/11 世纪取得一连串胜利以后，它同逊尼派教义一起被法理学家（"富卡哈"，*fukaha*）抬高到绝对不容许妥协的地步。这种情况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从 5/11 世纪到 10/16 世纪。在东边，沙斐仪派（它在埃及有牢固的地位，比较自由）通常在非洲之角和东非沿海一带占统治地位。上述种种情况或许可以解释许多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差别。

最后，必须谈一下，5/11 世纪经历的仅仅只是在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两种趋势。一方面，自突厥人在巴格达占统治地位之时起，逊尼派的僵硬态度越演越烈。它最终占了上风，倾向于通过教法对国家当局和对教育要求整齐划一，并且推行单一的穆斯林仪式。另一方面，则有神秘主义思潮（苏非教派）的重新出现，该教派曾长期遭到反对，它谋求通过禁欲和抛弃俗务来表现宗教感情。马格里布首先热烈欢迎这种神秘主义。[9] 在 7/12 世纪，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苏非兄弟会，最早的一个是同巴格达有联系的卡迪里教团（卡迪里亚）。在摩洛哥，沙兹里教团（沙兹里亚）由贾祖里于 9/15 世纪加以推广，既起政治作用，也起宗教作用。5/11 世纪的这两种趋势都对伊斯兰教与各地非洲人社会之间的往来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前一种趋势，由马立克学派掌握全局，这使穆斯林社会

---

[7] R. 布拉谢尔（R. Blachère），1966 年，第 92 页。

[8] 指导穆斯林个人在其社会中生活的教法条款在《古兰经》的穆阿瓦拉特（Mu'āwalāt）部分作出规定。它们主要是第 2、4、5 各章，约有 500 节。

[9] 据 H. 马塞（H. Massé），1966 年，第 175 页："恐怕再没有别的穆斯林地区对圣徒们的崇拜达到更为极端的地步了；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它是农村居民特别是妇女的唯一宗教，带有泛灵论的仪式和对自然的崇拜。"

在同非洲文化传统打交道时更加僵硬不妥协。另一种趋势则极为成功地传播对圣徒的崇
96 拜，得到“保佑权力”（*baraka*）相当于朝觐中得到神的赐福。这种圣徒担负起治病者和祭司的作用，从而使得非洲人日常生活中某些非常古老的方面伊斯兰化了。在那些总是乐意相信奇迹的思想单纯的人们心目中，圣徒和“马拉博”（*marabout*, 隐修士）似乎比庄严而遥远的伊斯兰教的真主更容易接近。尤为重要的是崇拜这些本地圣徒有时可以起到免除去麦加朝圣的义务，有时则可以同早先的某种崇拜结合起来。于是最早是在马格里布，然后特别是11/17世纪以后在西部非洲，“马拉博”这种角色⑩大为发展，他们是西部伊斯兰教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人物。

因此，随着教法的发展，由之产生得到国家支持的法学专家，以及神秘主义的兴起，这三者与非洲社会的关系远比宗教信仰或单纯的教规更为密切。这种教义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不像早先各种关系那样顺当。问题在于近东的社会生活规范与伊斯兰宗教信仰往往混淆不清。

保不住还有第四个因素会起作用：那就是仿效阿拉伯型号的文化，这意味着彻底抛弃非洲文化传统而全盘承认阿拉伯世界的价值准则，不论它是被认为称心合意、确实具有优越性还是生搬硬套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可能是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混淆不清。

人们对伊斯兰教在非洲确立为社会体制的过程进行分析以前应该作出如下评价：伊斯兰教是不同传统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的汇合，这种汇合的结果如何，决定于各方对于什么是纯属文化的意义，什么是具有一般宗教的意义这两者能够区别的程度，而归根结底这是非洲的社会和文化究竟能够被来自东方的新势力渗透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方面，非洲的社会和文化决不是消极被动的。⑪换句话说，任何把伊斯兰教当作一种社会
97 体制的探讨都意味着研究伊斯兰化和征服的现象，研究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地理上共存的现象使得下述情况不可避免：由于伊斯兰空间轮廓的形成，不同血统的穆斯林之间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必将出现对话，对话中必将提出以下问题：有还是没有坚如磐石、颠扑不破的统一性呢？或者是统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呢？

从容自在的共处时期：5/11世纪

柏柏尔人反抗某些形式伊斯兰化的顽强斗争⑫往往被人们引用作为证据支持那种认为在黑非洲征服是以暴力进行的观点，事实上，阿拉伯人在向南推进时停顿不前是常见

---

⑩ “马拉博”（*marabout*）一词在马格里布和黑非洲含义不同。在马格里布，它指的是创立教团的圣徒式人物以及他的陵墓；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指任何一个多少是精通《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经典知识的人以及运用这种知识来充当信徒与真主之间媒介的人，与此同时又凭靠传统的占卦知识和使用驱邪物。这种人被公众认为是学问家（就宗教意义而言）、术士和用宗教信仰治病的人。

⑪ 许多假设和命题采用这个主题作为立论根据。是否存在过一种黑人的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曾被仔细考察过，这种做法或许是忽视了所提到的这种宗教的坚如磐石的性质，而对于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更多地从社会学方面考虑，而不是从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考虑问题。本书所采用的非常明确的探讨方法（作为社会体制），就目前所掌握知识状况而言，似乎同现今所能得出的结论更相符合。

⑫ 见本书第3章。

之事，这是由于他们遇到了反抗，这种反抗在对历史和政治状况毫无所知、或所知甚少、或难以控制的条件下是很难克服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向努比亚，向费赞和卡瓦尔，向苏斯和西部撒哈拉，进展是非常有限的。⑬在这些地区，帝国的领导人推行的政策同他们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或在中亚细亚所施行的没有什么两样：意识到大规模军事失败可能带来的危险，他们将自己的行动局限于以小股进行的袭击性讨伐。这种入侵行动有些后来曾以胜利的口吻大加庆祝，尽管如此，这种行动并没有深远的影响，结果在多数情形下往往是以妥协解决问题，一方面为穆斯林供应奴隶提供可靠的手段，⑭同时也保证南方的居民享有和平。至于大陆北部埃及和马格里布的伊斯兰化在长期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将在本书其他各章加以论述。⑮

事实上，伊斯兰教传入黑非洲的情况非常复杂，而且在初期阶段主要是非暴力的，近年的许多研究证明了这一点：⑯沙漠中的柏柏尔人，或者他们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易巴德派或苏非派商人，以及法蒂玛王朝利益的代表者，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但没有重大暴力行为的迹象。甚至对最初时期之末阿尔莫拉维德人同黑人各族打交道时使用的方法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毫无疑问，人们曾经一度过多地倾向于倚靠完全是阿拉伯或阿拉伯－柏柏尔来源的历史著作，并且受到信道者最终战胜不信道者观点的强烈影响，即使这些不信道者是“信奉圣书的人们”，此外人们还倾向于对某些英雄人物过分推崇，其中最受人欢迎、在神话中最广泛给予歌颂的是乌克巴·伊本·奈菲。 **98**

这种情况促成一种无声的、微妙的辩论，其中包含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假设。辩论涉及对地中海沿岸非洲皈依伊斯兰教所作历史说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解释）的两种完全对立的倾向。大体上说，东方和中东的历史学家，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来自已受中东文化影响的非洲各地区（埃及、苏丹地区、利比亚和突尼斯）的人和马格里布其他地方特别精于伊斯兰教研究的人——都难于接受（或毫不含糊地拒绝）那种认为阿拉伯征服是居民改变宗教信仰前提的说法。为了证明他们的观点，他们强调伊斯兰教不允许用武力改变宗教信仰。其他非洲史专家（他们几乎全部都与前一种人一样是穆斯林问题和伊斯兰扩张问题的专家）分成两类：一类用征服的实例来支持他们的分析，另一类承认征服是事实，但从其正确的历史规模看待它，认为是一种长期渐进的现象。后一类人既包括西方人，也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和人数极其有限的专门研究柏柏尔问题的马格里布历史学家（特别是摩洛哥历史学家）。难道这仅仅是个学术性争论吗？不，我们不这样想，我们认为这种辩论对了解使阿拉伯人同非洲各族人民发生关系的人文和文化因素的整个系列有其重要性。总之，我们认为这些民族发生遭遇，在

---

⑬ 见本书第3章。

⑭ 努比亚王每年向阿斯旺贡献约500名奴隶；费赞和卡瓦尔各进贡360名——象征性数字：见伊本·阿卜德·哈卡姆（Ibn ‘Abd al-Hakam），1948年，第63页；换言之，总数约为每年1300－1500名奴隶。

⑮ 见本书第3章、第7章、第9章。

⑯ 见本书第3章及T.莱维基（T. Lewicki），1981年；D. C.康拉德（D. C. Conrad）和H. J.费希尔（H. J. Fisher），1982年、1983年。这些作者设法证明了阿尔莫拉维德事件并非如一向所说的那样暴烈。参阅Z.德拉马尼－优素福（Z. Dramani-Issifou），1983年（b）：“阿拉伯语与非洲各种语言的历史关系”，向在达喀尔举行的阿拉伯－非洲讨论会提供的报告（参阅本章注2）。主要阅读该报告的注11和注26。又见A. R.巴（A. R. Ba），1984年。

起初更多地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而不是宗教的问题。

事实上，在早期许多世纪里，穆斯林世界全神贯注的事物，撒哈拉以北与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大不相同。

撒哈拉以北，无论是作为进一步向西班牙、地中海诸岛以及意大利扩张的跳板，或是作为防止仍是经常性威胁的好战的基督教势力卷土重来的堡垒，在战略考虑上都是极其重要的。

从这种双重立场看来，埃及居于世界性重要地位，拜占廷人是深知此点的。把埃及留在伊斯兰教地区之内极为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劝导它的居民不要背弃当阿拉伯军队确立其地位的时候同他们订立的协定。在埃及，伊斯兰社会结构严密的组织占有支配地位；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只能在其中充当受保护的依附者（*dhimmi*）。

99 在若干世纪中，柏柏尔人占领了自大西洋岸到尼罗河畔的广大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到处流动，靠着骆驼控制这些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差别悬殊，从完全定居到彻底游牧。[17] 在非洲大陆北部，他们不得不适应伊斯兰教地区好战的因而也是政治性的要求。尽管正统派力图消灭宗教溶合论的危险（而且是持续的）迹象，但他们还是允许柏柏尔人长时期在伊斯兰教内部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和某种语言独立性。此外，他们尊重那些并不影响穆斯林生活主要特点的传统习惯，对此长期采取宽容态度。伊本·哈勒敦举出关于伊本·图马特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例：

> 他喜欢时常出入于清真寺；年青时他有个绰号叫“阿萨福”，意思是“明亮”，因为他习惯于点燃大量蜡烛。[18]

伊本·图马特显示柏柏尔人喜欢光亮的传统习惯，圣·奥古斯丁也曾提到过这一点。[19] 还可以举出其他更有深远意义的这种残存习惯的例子。在奥拉斯、卡比利亚、尼罗河以及阿特拉斯山这些地方的某些部落里，柏柏尔人保留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那是他们独特性的源泉。例如，习惯法和非《古兰经》所规定的司法组织是柏柏尔法律独有的特点，用集体宣誓做为证明的手段是一例；一种叫“勒卡农”或“卡农”（*lkanun* 或 *kanun*）的法规和刑罚标准是又一例，由公断人或村庄集会主持正义也是一例。这种习俗同《古兰经》教法并不发生矛盾，但是对于主张马立克学派学说的逊尼派在阿尔莫拉维德统治时期推行标准化的进程，它们却可能成为一种抵制因素；[20]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些特点在阿尔莫哈德帝国的组织结构中得到反映。作为对这种相对自由的交换，[21] 北方的柏柏尔人承认自己被兼并，并同意提供军事援助，虽则后者时常是相互竞争的君主之间讨价还价的问题，特别是在4/10世纪和5/11世纪。经过2/8世纪大规模的对抗之后，领土上和政治上对北方柏柏尔人的兼并或多或少已是既成事实；这对于穆斯林世界

---

[17] 见本书第9章。

[18]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925—1956年，第2卷，第163页。

[19] 关于反对他在墓地点燃蜡烛举行丧葬宴会见J. P. 米涅（J. P. Migne）主编，第33卷，第91页。

[20] 马立克学派认为惯例行为（*al-'amal*）是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原则之一，只要同伊斯兰教的原则没有矛盾，人们可以凭惯例办事；因此，多亏有马立克学派，柏柏尔人的习惯才在北部非洲得到承认。

[21] 见本书第3章、第9章。

至关重要。㉒

在阿特拉斯山脉以南和东非沿海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需要采取相似的政策。西方的 100 柏柏尔游牧民很快加入了伊斯兰教。关于这点，阿拉伯文资料一直是说得很含糊。即使伊本·哈勒敦对此也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说兰图纳人"在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一些时候信奉了伊斯兰教"，㉓ 一方面又说，他们是"在回历第三世纪"改宗。㉔ 正如T. 莱维基所说，按目前研究阶段掌握的资料看，与黑人居民有联系的柏柏尔人其伊斯兰化似乎开始于117/735－122/740年这个时期。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在同一个十年中与苏法柏柏尔人抵制了伊斯兰教。㉕ 因此不急于，也不存在什么压力非达到一体化不可。迟至8/14世纪，伊本·巴图塔指出，他作为一名穆斯林，发现令人十分震惊的是，沙漠柏柏尔人的社会习惯不止在一个方面原封不动：穆斯林教法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尊重，更不用说关于婚姻的教规和阿拉伯的合乎礼仪的原则了。㉖

因此，当穆斯林进入非洲大陆具有强烈文化和社会特性的各族人民所居住的地区时（不止一位著作家发现这种特性自成体系令人惊奇），有强大的理由需要谨慎从事。这些地方同长期以来人们设想的和报道的相反，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国家，与同时代北非和西欧的国家一样强大。西部的索宁克人天下，中部的扎加瓦人和卡嫩布人世界以及东部讲班图语各族的世界使穆斯林感到惊奇，他们连忙对这些人详加描述。在6/12世纪以前穆斯林并没有谋求使这些人皈依伊斯兰教，更没想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文化和社会习惯。长时间中他们满足于作为商人和这些人共处。这种情况对穆斯林有利，因为他们绝大部分同黑人的王公和商人有着热情亲切的关系。而且这种政策即使从宗教角度看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塞内加尔河流域的王公和商人们如何改宗的情形（大概在10世纪）我们现在了解得越来越多。㉗ 我们也深知加奥的情形。历史学家伊本·萨吉尔在290/902－903年写过一部关于塔哈尔特地方鲁斯泰梅王朝伊玛目的编年史。他说，在159/776年至166/783年之间塔哈尔特与加奥之间有着商业往来，它的君主自称是穆斯林。㉘

在加奈姆，君主们皈依伊斯兰教大概是在5/11世纪，甚至是在王朝更替导致胡迈依·吉勒米（478/1085－490/1097年）上台以前，㉙ 后者可能仅仅是对传入逊尼派教义 101 一事负责，此事与阿尔莫拉维德人在更西部的行动同时发生。很可能乍得湖地区的贸易对伊斯兰教向南推进起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宗教信仰是一种保护自己免得被卖作奴隶的手段。据雅库比记载，早在3/9世纪贩卖奴隶就是乍得湖与地中海中间商

㉒ 见本书第3章、第9章。
㉓ 伊本·哈勒敦，1925－1956年，第2卷，第65页。
㉔ 同上，第67页。
㉕ 见本书第3章、第11章。
㉖ J.－L莫罗（J.－L. Moreau），1982年，第99页。
㉗ 见本书第3章、第13章。
㉘ J. M.库奥克（J. M Cuoq），1975年，第55－56页；本书第3章；T.莱维基，1962年，第515页；Z.德拉马尼－优素福，1982年，第162－164页。
㉙ D.兰格（D. Lange），1977年，第99页。

路沿线兴隆的生意。[30] 对非洲社会来说，这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形式；对于伊斯兰教这有点出乎意料，但无疑非常重要。[31] 它当时在东非大概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因为在 3/9 世纪的僧祇奴起义并劫掠伊拉克以后僧祇奴的出售额下降了。[32] 关于东非海岸和马达加斯加这个时期的情况，目前不像西非和南部非洲那样有可靠的资料，除了某些令人感兴趣的记载像马苏迪所写的那样。

因此，没有采用战争手段，也没有用暴力手段迫使人改宗，伊斯兰教早在 6/12 世纪以前就在非洲土地上向前推进。[33] 这种发展对于伊斯兰教地区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不是不可逆转的；它对王公和商人远比对耕作者更为重视。至少可以说，在 5/11 世纪起逐渐展开的大力扩张伊斯兰教地区以前，伊斯兰势力已经取得一些重大成就。共处所产生的效果比表面看来更为引人注目，纵使伴随而来的是重大的妥协让步。

实际的情形往往只不过是某个君主在形式上改宗。关于马拉尔一个首领改宗的轶事（阿拉伯作家们几度加以引用）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34] 我们在后文还将提到一个有点令人惊讶的事实：马里的曼萨，朝圣途中在开罗时，表现出对穆斯林有关日常生活的教规知识十分浅薄。[35] 如果这就是不久之后被虔诚的宗教法理学家们批判为“伪伊斯兰教”的王公们的真实情况，那么那些就追求短期商业目的而言是忠诚伙伴、但却是相当表面化的穆斯林的所谓“改宗”商人们则更是不堪一提了。至于农村世界，根本不存在影响人们宗教信仰和习惯的问题：如果发生这样的事，那将意味着打乱整个社会和它的生产方式。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像 15 世纪末一位刚果国王对待基督教那样：改信伊斯兰教的君主们看到改宗有明确的好处，他们能够借此摆脱在非洲行使权力所带来的许多义务（这种权力在行使时受到一些有组织的抗衡力量的调节）而又不必同他们的下属分享新宗教信仰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在撒哈拉以南只要没有强大的宗教抗衡力量，伊斯兰教可以提高王位的古老权力甚至提高王位的现实权威：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从阿拉伯文资料可以看到其他类型的甚至更为重要的妥协让步。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老话讲道，一旦产金者皈依伊斯兰教，黄金便不翼而飞。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作为顾主）和对于充当中间商的君主们同样非常糟糕。因此，不让产金者改宗，而他们人数非常多。[36] 在 8/14 世纪，人们考虑给予这种例外情况以合法的外衣。欧麦里解释说，马里

---

[30]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48－49 页。

[31] 关于乍得地区，从资料文献中直到近代时期不断提起中部非洲各地出售奴隶的情形来看，这个事实有很大的历史重要性。

[32] 见本书第 1 章、第 26 章。

[33] 非洲地中海沿岸、撒哈拉沙漠和苏丹地区居民之间往来关系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年代、往来的性质、国家的形成等等），已有相当数目的研究人员提出并借助适当的假设加以论述。最新研究成果应该提及下列著作：T. 莱维基，1976 年；J. 基－泽博（J. Ki－Zerbo），1978 年；J. 德维斯（J. Devisse），1982 年、Z. 德拉乌尼－优素福，1982 年。肯定还有许多我们未提到的著作，但我们要请读者特别注意两位年轻的塞内加尔研究人员关于塔克鲁尔及其有关问题所作的建设性和科学性研究。他们是 Y. 福尔（Y. Fall），1982 年，第 199－216 页和 A. R. 巴（1984 年）关于塔克鲁尔的论文。

[34]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02 页和 195－196 页。又见本书第 3 章。

[35] 欧麦里（al－'Umari）语，见 J.M. 库奥克，1975 年，第 273 及以后诸页。

[36] 见本书第 14 章。

的君主容许他的帝国中“存在”仍然奉行传统宗教的居民，他对这些人免征不信道者应交的税款，但他让他们开采黄金。㊲直到很近年代，这种情况看来基本没变。根本原因在于黄金的勘探和生产伴带着许多魔法操作，同一系列的宗教信仰联在一起，我们今天还能识辨这些宗教信仰的痕迹。㊳

铁也有同样的情况，它或许是比黄金更为明显的例证。在许多地区，叙述权力关系的记载表明，王室权威与冶铁师傅和铁匠之间有密切联系。“铁匠”的形象又同魔法、同铁铺老板拥有危险力量联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消逝，铁匠这种“类型”与“马拉博”的“类型”越来越对立；1960年苏联学者D.奥尔德罗格注意到这种对立，作出与上述相似的理解。㊴

马拉博——或者更简单地说，穆斯林教法的传播者——后来终于消灭了铁匠的势 103 力。正如A.R.巴在他的论文《10－11世纪的塔克鲁尔》一文中所揭示的，随着伊斯兰化逐渐成为既成事实，尽管它一直仅仅是城市中的现象，而且教徒过着本身自成一体的群居生活而不与世溶合，看来还是打破了早先时候王室权力与铁匠之间的联合。铁匠先是被排斥于一切政治影响之外，虽然由于他们的魔法力量和经济力量仍为世人所畏惧，逐渐地他们形成一个孤立的集团，受各种禁令的禁锢，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为世人所畏惧。没法把他们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因为他们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逐渐地，围绕着他们产生一种等级观念：12/18世纪他们在宗教上和社会上相当的孤立，他们被人瞧不起正说明他们的魔法仍为世人所恐惧，也说明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具有有权势人物的名声。这个事例或许也表示穆斯林社会体制的传人是一个多么漫长而缓慢的过程；当它开始同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接触时，它是何等小心谨慎。这个事例也有助于使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了解苏马奥罗与松迪亚塔对抗的史实。前者周围是“一些异教徒铁匠坏家伙”，而后者虽然本人是一个铁铺老板，却不再屈服于信奉传统宗教者的压力。由此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关于松迪亚塔个人有否信奉伊斯兰教问题所引起的理论战的重要性。

在沙漠以南立足的穆斯林商人集团最终同意生活在部分伊斯兰化的少数派社会里，与非洲人为邻，而决不是处于支配者的地位。他们从本地君主那里受到的待遇类似于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少数派在伊斯兰地区所享受的待遇，只是大概可以免交赋税。这说明了为什么穆斯林住区能够靠近各国的王城，通常有自己的清真寺，却没有对居民整体产生什么压力。

易巴德派㊵显然在这个时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同苏丹人（*Sudan*，黑人）关系融洽，这有点出人意外，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待其他派别的穆斯林十分苛刻。这种情况或许表明撒哈拉柏柏尔人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同黑人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

被正统派埋没许多世纪，近年才重见天日的易巴德派资料，㊶对这种情况有很好说

㊲ 欧麦里语见J. M.库奥克，1975年，第280－281页.

㊳ J.德维斯，1974年。

㊴ D.奥尔德罗格（D. Olderogge），1960年，第17－18页。

㊵ 这个教派创始人是阿卜杜拉·伊本·阿巴德（'Abdallāh ibn Abād）按传统习惯拼音为易巴德（Ibad），因此有易巴德派（Ibâdites）之称，现在沿用此名称。

㊶ T.莱维基多篇著作（阅参考文献目录），又阅本书第11章。

明。这些资料提供许多事例，说明在对待浸透着被称为“异端”的传统宗教的各种非洲文化及其社会习俗方面有着真正的宗教上相互宽容，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互理解——从主张马立克学派学说的逊尼派观点看来，这种理解恐怕是难以容忍的。

104 4/10世纪法蒂玛王朝大放光彩（这对于非洲十分重要）。此后，随着5/11世纪正统的逊尼派取得胜利，到处情况都起了变化，出现了远非宽容的宗教态度，如阿尔莫拉维德运动之类，至少它在非洲是表现如此。即使在东部非洲，6/12世纪穆斯林对待各地非洲文化和社会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这是第二个时期的开端，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越来越致力于使自己控制下的地区实现生活方式标准化。

5/11世纪中叶以后与伊斯兰教成就有关的社会和文化紧张局势

紧张的原因

圣训（*hadith*）说“天使不进入有狗的人家”，如果按字面来理解这句话，那么伊斯兰教同非洲各族人民之间是不可能有发展关系的前途了，因为在非洲社会中，狗永远是家庭生活的特色。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伊斯兰教坚决反对大事宣扬养狗、特别是反对吃狗。

非洲社会在接受伊斯兰教信奉单一上帝的信仰方面原则上没有阻力，所以从社会角度看，归根结底一切决定于伊斯兰教所提出的或强加的各种变革能否真正渗透进非洲人的社会。

受到伊斯兰教渗透的非洲黑人社会是个农业社会。它的运行同土地，同它们的直接环境（矿产、植被、空气和水）的各种特点相联系。这种农业文化，根据口头传说，与伊斯兰教崛起之前的阿拉伯世界在某些社会－文化方面有相似之处。当然，这并不是说伊斯兰世界的社会结构同非洲的社会结构相似。在非洲社会里，核心家庭——夫、妻和孩子——不被认为是独立治理的单位；由血亲关系和土地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共同祖先的后裔组成的大家族才是基础结构，由高度的经济团结联合在一起。这些大家族作为基本单位直到发生分裂为止的繁荣历史，也就是他们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成为更大群体的历史（或是承认有共同祖先——多少是虚构的，或是在同一地带从事劳动），在此无需重复。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不论其规模大小，都认为他们之间的纽带——即便出于虚构——是宗教性质的，为他们先前的祖先、目前活着的生者和尚未出世的孩童全体所共有，世代相传，连绵不断，同土地、丛林和河川有着神圣的联系，后者为人们提供食物，是崇拜的对象。除非打破他们整个的生活平衡，这种社会－宗教的结构是不105 会解体的。多亏对于共同的过去有历史悠久的认识，而且经历的变化进度缓慢，整个社会有一种共同的一致感。与这种社会相比，还有其他比较复杂的社会。在后面那种社会里有利的地理－经济条件使人们有可能积累储备，从而使专门从事不同工作的各种社会范畴得以存在。有些范畴是社会－经济性质的，保证了更进一步的分工。另一些范畴

是社会－宗教性质的：通过术士、占卜者、以宗教手段治病者和人神之间代行祈祷的人的活动，保持社会的团结，不如此，这种社会团结会受到分工的威胁。再有一些范畴代表着比在单纯的农业社会里发展程度更高的政治组织。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非洲人保持着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认为那是应予驱除或应加利用的各种力量的巨大对峙。正如约瑟夫·基－泽博所正确指出的：“在这个充满激荡而互相冲突的急流的海洋中，〔人〕为了要游泳把自己变成鱼”。[42] 在两种不同的框架内（一个比较城市化，另一个则往往是农村性质），非洲社会的形式具有很大差别，决定于那里的人是草原居民还是森林居民，是定居者还是游牧民，是耕种者还是牧畜者，是狩猎－采集者还是城镇社会的成员。可是，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宗教认识的一致往往胜过物质细节的差别；而母亲和妇女往往在财产留传问题上起很大作用。这里的生活方式与氏族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与伊斯兰教法几乎完美地和谐一致的阿拉伯人父系家庭的生活方式也相去甚远。

当然，也正是在这方面出现紧张和冲突，特别是在西部非洲，当穆斯林法学家施加压力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这些穆斯林法学家总喜欢劝导非洲人更彻底地献身于他们设想是属于伊斯兰的“社会样板”，尽管这种“社会样板”大概主要是近东样式的。可是，这种紧张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地区之间，各个不同时期，差别很大，并且取决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以及来自东方和北方的穆斯林与非洲穆斯林之间各种力量（所具实力，主要是人数）的关系。因此，当我们争取对伊斯兰教改造或未能改造黑非洲各地社会的情况作出评价的时候，我们所要探讨的历史是丰富多彩而又十分复杂的。

如果事情发生的地点是个城市，那么在 4/10 世纪大概就有可能像今天在卢旺达那样，[43] 人们对古老的农村姻亲关系弃而不提，而更改姓名投入能满足自己各方面需要的新的伊斯兰社会，并且在时机到来时，在那个社会里根据新的意识形态基础建立新的家系；从社会联系的观点看，更改姓名可以体面而自然地从原来的社会转到穆斯林社会。[44] 在非洲萨赫勒地区，这种转变看似容易，而其实它并不表明彻底决裂：非洲化味道浓厚的穆斯林名字（穆罕默德往往变成马马杜，阿里变成阿利尤）[45] 被加到原有的非洲姓名上——它们只是经过长时间并且按照非常严格的规则才实现伊斯兰化的。整个过程是一种缓慢的融合，不论国王、商人，还是农村居民，情况都是如此，时间甚至迟于 6/12 世纪。大量发生更换姓名之举的非洲其他一些地方，则情况并非如此。[46] 当然，穆斯林本身在对待非洲社会－文化传统方面采取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来自北方的伊斯兰教法学家，以自己的学识为武器，以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自豪，倾向于强调黑人社会“不遵奉国教”的种种行动，以此证明它们是伊斯兰世界的异己，必须加以反对；而出生在这些社会并且希望生活在这些社会里的黑人穆斯林（他们往往是人数不多、受到宽容的少数派），则更倾向于认为一些非洲宗教的习俗并不构成接受伊斯兰教的真正障碍。

106

---

[42] J. 基－泽博（J. Ki－Zerbo），1978 年，第 177 页。

[43] J. 卡加博（J. Kagabo），1982 年。

[44] 在索马里这种更改是全面而彻底的。

[45] 本·阿舒尔（Ben Achour），1985 年。这不是仅限于非洲黑人，在柏柏尔语中，穆罕默德变成哈穆、穆哈、穆赫；法蒂玛变成塔穆、蒂玛，等等。

[46] 这些例子完全可与改宗基督教的情形相比，如 1930 年以后卢旺达－布隆迪之例。

他们的宽容范围可能非常广泛，而来自北方的他们同教人毫不犹豫地指责他们纵容、勾结甚至指责他们背叛伊斯兰教。可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保证伊斯兰教从6/12世纪到10/16世纪取得最持久成就的却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教法上的不妥协态度确实是改变母系继承法则而代之以《古兰经》要求的父系继承习惯问题上引起极度紧张的根源。尚没有全面的研究展示这个冲突的各个阶段，这种冲突毫无疑问早在5/11世纪就已发生，其最著名的事例乃是我们后文即将提到的马吉利所发表的意见：他宣称，抛弃穆斯林的立法而实行母系继承的人不是穆斯林。[47] 这个问题上的压力显然首先是加在那些当权的人身上。许多家谱都表明这些家系在两种继承方式之间显露出犹豫不决。[48]

一种社会与另一种社会无法并存的情况大概在涉及货物所有权概念的时候最为强烈。当巴克里提及阿卜杜拉·伊本·亚辛的"怪诞决定"时，[49] 他显示出一个个体的107 和利己主义的所有主对阿尔莫拉维德派教士想要施行的"社会化"体制、平等和财产再分配强烈厌恶的情绪。而更成为理由的是，对个体家庭和城市富豪习以为常的穆斯林对非洲人的土地、劳动和收获的社会组织几乎无法理解。马吉利的意见，再次从不同角度提出货物所有权问题，而他的答复又一次是激进的。[50]

对"非洲人的伤风败俗行为"显然比较温和的抗议，同样也是徒劳：妇女行为过于不检点，她们不戴面纱，[51] 少女们赤身露体；阿拉伯作家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记载[52]或者谴责[53]他们看不过去的那些"丑事"。

6/12世纪至10/16世纪之间，阿拉伯穆斯林社会与不论是否穆斯林的非洲人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着差别，无法达成一致，在上述各个层次上存在着各自的组织方式，难以相容。人们无疑地倾向于把这种对立的社会生活方式看成是伊斯兰教与非洲宗教势不两立的征兆。

非洲统治者所起的作用

不论是伊斯兰教的朋友还是本人是个穆斯林（举例而言，从4/10世纪起在塔克鲁尔和从6/12世纪起在马里），非洲统治者一般说来都乐于接受划分地域和劳动力，只要保证在完全地或部分地伊斯兰化的城市中他们能得到所需要的行政人员；至于农村世界，虽是驯服的农业劳动力的无穷源泉，改宗一事却并非当务之急。伊斯兰惯例似乎也同样适应于这种情况。它无论如何承认特权地区（伊斯兰教地区，*Dar al-Islam*）与不信教者或异教徒所居住的地区（不信真主的地区，*Dar al-Kufr* 和战争地区，

---

[47] J. M. 库奥克，1975年，第424页。
[48] 例如，J. M. 库奥克，1975年，第344页。
[49] 巴克里（al-Bakrī），1913年，第319及以后诸页；参阅本书第13章。
[50] J. M. 库奥克，1975年，第410及以后诸页。
[51] 戴面纱不是伊斯兰教的宗教义务，一些穆斯林国家认为理所当然的妇女戴面纱并非正统的习惯。
[52]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见J.M. 库奥克，1975年，第311页。
[53] 马吉利（al-Māghīlī），见J. M. 库奥克，1975年，第431页。

Dar al－harb）并存。伊斯兰教往往满足于使君主们改宗，从长期看，君主改宗是使群众改宗的保证。伊斯兰教所采取的大概是“牧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同一时期的基督教欧洲也可以看到。[54]

非洲的君主们，即使他们是穆斯林，也绝不能想像他们曾积极地投人劝人改宗的活动。可是试图按照伊斯兰的模式实现政治和社会一体化之举则不乏其例，这既是由于他们本人的行动，也是由于他们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穆斯林顾问们的行动。他们甚至往往因文化模仿而受到指责。例如，人们会联想起坎库·穆萨（曼萨）从东方归来带回来一位建筑师萨希利，或联想起穆罕默德一世（阿斯基亚）或卡诺君主穆罕默德·鲁姆法，他们两人都曾求救于特莱姆森的虔诚教士马吉利或求救于埃及学者苏尤提；人们也会联想起马里皇帝苏莱曼（曼萨，742/1341－761/1360 年在位），他是马林王朝素丹阿布·伊南的朋友，马立克学派的学者和教士们曾望风来到他的朝廷。许多作家倾向于赞成伊德里西所宣布的严厉的见解：“他们中间几乎未闻有学者和著名人士，他们国王所懂得的有关治国安邦之道都是得自从更北方来的有学问的宾客们的教诲”。[55] 这种看法恐怕是忽视了重要的两点。首先这种见解没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它增强那种有害的观点认为非洲本身没有产生过任何重要的事物，任何重要的事物总是来自外部。此外，更加严重的是，像伊德里西那样考虑问题，就是忘却非洲社会在接触伊斯兰教之前很久就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政治组织，关于这些组织我们今天正在逐步获得更多的知识，而过去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在许多世纪中对它们都毫无所知。行使权力的方式是非洲宗教意识的不可分割部分，只有得到社会作为整体的同意和彻底归顺伊斯兰才能放弃它们：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位马拉尔的国王在 5/11 世纪改宗的轶事，巴克里和达尔吉尼对此讲述各不相同。[56] 据说，这位国王在大旱之后为了向穆斯林的真主祈求得到自己人民生存所必需的甘霖在极其激动人心的情况下接受伊斯兰教。在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他按照非洲的权力样式行事。改宗的代价是巨大的：毁弃祖先宗教的一切手段，追逼巫师，破坏年代久远的传统习惯。人民的反应出人意外：“我们是您的仆人，不要改变我们的宗教！”因此我们有权怀疑一般的黑人统治者是否根本没有向穆斯林社会（它信仰单一的神）学习对管理自己国家方便有效的东西，以及这种“现代化”的尝试是否根本没有形成一系列行动，想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的非洲传统的“重要性”与“新宗教的要求”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我们利用一些具体实例可以观察到王室采取的纳人伊斯兰教的政策的真正活动范围。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中，8/14 世纪常被看作是马里帝国达到顶峰的时代，其特点是经济发展显著，在国际范围有政治影响，包括同摩洛哥和埃及建立了外交关系。尤

108

109

---

[54] 虽然历史事例的对比不应过度极端，然而有意思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用来渗透进“异教”社会并在那里立足的方法却经常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只是基督教采用暴力相比之下大得无与伦比，对待斯拉夫人和对待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是如此。

[55] B. 刘易斯（B. Lewis），1982 年，第 61 页。

[56]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02 页和 195－196 页。

其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地位决定性地确立起来。因此这是穆斯林宗教胜利的时代。让–吕克·莫罗在其著作中有力地突出了这一点：“随着马里帝国的兴起，伊斯兰教在西苏丹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至少部分地是新社会的创始者”。[57] 约瑟夫·基–泽博说，穆萨曼萨是“一位热心的穆斯林，〔他〕给伊斯兰教的扩张以新的推动”。[58]

朝圣国王穆萨曼萨对伊斯兰教的虔诚是无可置疑的，而且无可否认，主要在城市中，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确立起来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上述两位作者（而他们并非仅有的两人）还是误入了歧途。一方面是陷入有关 8/14 世纪马里的相当大量的文献而不能自拔[59]，另一方面也是受 11/17 世纪阿拉伯人和苏丹–柏柏尔人资料沾沾自喜的情调的影响。而且，基–泽博自己承认：“……农民大众（他们占马里人口的绝大多数）仍保持泛灵论信仰，而这得到曼萨的宽容以换取他们的服从和交纳赋税”。[60] 再者，我们看不出穆萨曼萨曾如何设法给“伊斯兰教扩张”以新的动力，因为，同马里所有其他君主一样，他并没有发动圣战（“吉哈德”，djihad）。

让我们往前看一个半世纪：9/15 世纪末和 10/16 世纪提供另外的例证说明某些穆斯林教士所表现的想深刻改造非洲习惯的愿望和君主们面对这种压力踌躇不前的反应。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靠政变取得政权，他作了大量努力按《古兰经》的道德观实现政治和社会的一体化。为使他的政变合法化，他乞灵于穆斯林宗教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他在廷巴克图学者组成的“穆斯林随行人员”支持下，于 9/15 世纪末到麦加朝圣。“哈里发”（khalīfa）的尊号赋予他苏丹地区宗教权威的地位。在内政方面，他所求教的几乎全都是穆斯林学者。面对如何解决他从松尼·阿里大帝那里继承下来一部分遗产所引起的社会问题这一难题，他向三位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塔凯达的阿卜杜拉·安萨姆马尼、苏尤提和马吉利——四次求教。马吉利似乎最为不辞辛苦。他应阿斯基亚之请，写了一本论述理想穆斯林君主的手册《答哈吉·阿卜杜拉·伊本·阿布·贝克尔埃米尔问》（*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Emir al-Ḥadjdj 'Abdullah ibn Abu Bakr*）。[61] 应另一位黑人君主之请，马吉利又写了一本同一体裁的书——《君主的职责》（*Risalat al-Muluk*），那是为卡诺国王穆罕默德·鲁姆法（870/1465–905/1499 年在位）写的。

110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为使自己符合于一位理想哈里发的模式，采用了东方的权力标志：一个印玺、一把宝剑和一本《古兰经》；他宣布星期五为每周接见日，他对“不信教者”进行圣战（虽然无所成就），可是他并不比马里的皇帝们更成功，后者在远离非洲传统习惯方面比他领先。这些传统习惯命令他保存自希人时代继承下来的祖先标志：鼓、圣火、有关服饰和发型的严格规定、权力标志、承接国王的痰唾。在高级政权机构中有一位“霍里·法里马”（*Hori farima*），也即崇拜祖先和神灵的大祭司。

---

[57] J.–L. 莫罗，1982 年，第 103 页。
[58] J. 基–泽博，1978 年，第 136 页。
[59] 伊本·巴图塔、欧麦里、伊本·哈勒敦等。
[60] J. 基–泽博，1978 年，第 136 页。
[61] Z. 德拉马尼–优素福，1982 年，第 34–40 页，马吉利的原文见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398–432 页

最终，他没有把马吉利提出的反对“伪穆斯林”的强硬措施付诸实施，据这位法学者说，阿斯基亚周围尽是这类人。马吉利的教诲在西非一直被束之洲阁，直到奥斯曼·丹·福迪奥把它们变成原则和武器用来反对那些当时对伊斯兰教的扩张已不再有用的君主。

在加奈姆国的后身博尔努，君主们（马伊，*mai*）是活着的神明，可是他们的宫廷里却有许多学识渊博的穆斯林伊玛目。阿里·伊本·杜纳马统治时期（877/1472－910/1504 年在位）这些人试图使贵族们的品行符合《古兰经》的规定。“素丹”默许这一行动，可是贵族们拒不服从。与此类似，执法官（卡迪，*kadi*）所执行的教法只限于城市范围，并不替代各非洲族群的法律。豪萨兰有些地区在 8/14 世纪由富拉尼人和万加拉人的教士、君主和热心的信徒使之改信伊斯兰教。这些地方在使农村的（甚至城市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时遇到同样的困难。在卡齐纳，马吉利来访时曾设法使豪萨人缺乏热情的伊斯兰教趋于纯正，此后“泛灵论信仰者在各处的神林被夷为平地，在原来的地方建起清真寺”。在穆斯林社会中近东的生活方式占有突出地位：妇女深居闺房，出门要戴面纱，使用阉人，实行以《古兰经》为依据的财政制度等等。但是这些变革不能持久。归根结底，国王们表面上的无所作为看来是表明他们深知社会压力会导致排斥伊斯兰教。

这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教最后“在基层”获得明显的进展，这超出他们控制之外。非 **111** 洲商人、万加拉人和后来的迪尤拉人以及形形色色的穆斯林传教士将先知的启示传播到乡下，传播到城市，甚至远达森林边缘。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缓慢的扩张并没有使那些社会内部因有不大的穆斯林群体的存在而毁掉它们原有的各种习惯。例如，这些社会仍继续生产各种保持原来传统的文化制品：近年在“穆斯林”马里的中部发现的著名赤陶雕塑艺术证明了这一点。[62]

效 果

依照目前的研究状况，效果很难估计，许多显然矛盾之处令人不安。

毫无疑问，早在 4/10 世纪，书法和衡重技术[63] 就被伊斯兰教引进撒哈拉以南。此两项革新搅乱早先的习惯达到了什么程度？关于保存往事痕迹、计算和数学知识的早先习惯是怎样的呢？

有相当理由可以说，撒哈拉以南的阿拉伯语文献似乎从未注意非洲人的文化和他们的语言。为了肯定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目前在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和苏丹正在从事研究的各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内容，并对此作出评价。还必须对某些非洲语言与阿拉伯语接触过程中的发展情况进行科学的研究。下面的说法大概是确切的：那些识得阿拉伯语的人忽视了古老的非洲文化，一方面因为这些文化是“异教

[62] 关于这种艺术的探讨：B. 德－格鲁纳（B. de Grunne），1980 年。又见《音韵与情节》（*La rime et la raison*），1984 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V 卷，图片第 6、11、12 和 14。

[63] 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D. Robert－Chaleix）等人，1983 年，第 407－419 页。

的”，另一方面，更干脆地说，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文化存在。在这方面他们显现得自己恰如若干世纪以后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那样懵然无知。把这种无知状况一概说成是对非洲社会和文化的故意蔑视，恐怕是不公正的。

这些撒哈拉以北的学者，多数情况下直到 9/15 世纪还对这一地区很不熟悉（虽然在东非情况大概并非如此），可以说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成见。到 7/13 世纪以后，这类学者似乎不再具有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高峰时期的光彩（尽管举例而言 7/13 世纪时期的摩洛哥看来还出现过几位大思想家）。这可能是由于，那时候的穆斯林世界许多知识部门已经凋敝不振，仅仅只是某几个部门还继续繁荣；也可能是由于，过多地抄袭过去的作家，教法的形式主义压倒了活跃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为了得出站得住的结论我们再次强调必须等待直到对数以千计的手稿作过认真分析（迄今为止这些手稿虽已编目还未经研究）。例如，我们需要充分估价非斯的卡拉维因图书馆和拉巴特的王家图书馆两处宝藏，那里收藏着大量来自廷巴克图的手稿和关于非洲的著作。

112

目前看来，一般的情况是，从一开始，有教养的马林克人、富拉尼人、索宁克人、柏柏尔人或尼格罗－柏柏尔人，诸如杰内的穆里马加·坎科伊；廷巴克图的巴加尤古、卡蒂、伊本·丹萨勒·富拉尼、艾哈迈德·巴巴、伊本·穆赫塔尔·贡贝莱等等这样的学者，他们恪守伊斯兰教的文字词句和精神实质，用阿拉伯语思维和写作，对属于伊斯兰传统的书籍进行注释。这种伊斯兰中心主义无疑地使得廷巴克图各大学者看来不像今天黑非洲人所希望的那样光辉灿烂，因为，据我们目前所知，他们在那些大学里几乎看不到自己以往文化的任何踪迹。[54] 既然如此，只能得出一种看法：上述穆斯林学者属于相当封闭的世界，面对着广大信奉非洲传统宗教的人他们始终是少数，他们自认为理所当然地有责任使广大人民群众改宗，或者还要引导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很难成为对非洲过去进行研究的开明的历史学家，甚至不容易以同情态度观察他们认为属于“异教的”土著社会的生活。

大概正是在这方面，研究工作进展最少，同时研究工作者也最难保持客观。

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

非洲社会的最终改头换面大概首先是发生在加奈姆和东非：把自己的起源和自己的历史“阿拉伯化”。西非走上同样的道路也不慢。

7/13 世纪时，卡嫩布王朝的家谱学家努力为本朝的君主重新创造高贵的世系。他们毫不犹豫地作出极其重要的发明，也即在东方甚至在圣经传说故事中寻找出身渊源。[55] 这是一种观念的开端，后来证明这种观念取得非凡的“成功”，并使非洲社会与穆斯林世界的文化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稍有名声的君主的先辈都必然来自东方；唯一高贵的血统是东方的血统；凡是过去，除非同先知、同先知的家族或者圣门弟子有某种关系，否则就不值得一提。于是开始（当然不是最后一次）改写非洲历史；而这种“新历史”对非

113

[54] Z. 德拉马尼－优素福，1982 年，第 196－203 页。
[55] D. 兰格，1977 年。

洲社会过去往往自称其血统渊源来自宇宙或动物的陈腐荒谬说法予以沉重的打击。

在东非，8/14 世纪以后一段时间家谱文献盛极一时。在那里，一直到 13/19 世纪，家谱成了敌对的穆斯林派别之间以及各统治王朝家族之间意识形态冲突的武器之一。[66] 弄清楚这种文献的真伪须花费大量精力。在西非，关于“曼丁哥人”起源故事的面目全非很引人注目；[67] 而关于瓦加杜国创始人祖先起源故事的改头换面也同样是这种情况。逐渐地稍有重要性的所有伊斯兰化族群都从阿拉伯半岛找到一位祖先。这大大加强了圣经起源说的论点，按照这个说法非洲各地的居民都来自中东，这种说法的影响自然流传甚广。另一方面则是凡非洲稍具价值的事物，都倾向于找出它的“白种”渊源——或者是阿拉伯根源或者是波斯根源。即使这意味着即使要贬低自古就证明其价值的非洲文化也在所不惜。于是非洲历史开始黯然无光，后来欧洲人又使这种情况变本加厉。

所有占统治地位的家族和群体都逃脱不了“阿拉伯化”的威力。[68] 13/19 世纪，布基纳法索的雅尔塞人当他们的商业霸权和特权地位处境危殆的时候竟然也声称具有阿拉伯人的血统。其实，他们的商业霸权两世纪以前就已开始，而其特权地位使他们能与瓦加杜古的莫西人取得真正的历史性妥协。[69] 甚至毫无穆斯林传统、僻处马达加斯加中部的贝齐莱乌人也为伊斯兰教的“文明样板”所吸引而为他们的君主找出阿拉伯的渊源。顺便说一下，在马达加斯加他们并非唯一这样做的族群。[70]

归根结底，伊斯兰教引起人们如此的信任和迷恋是毫不奇怪的。这种现象必须客观冷静地加以研究，因为它对于伊斯兰化的非洲社会十分重要，而且有好几个世纪它显然具有“东方”诱惑力的特色。

这种“家系攀比”保证那些把自己的身世追溯到阿拉伯祖先那里去的人能够长时间、高质量地奉行伊斯兰宗教习惯；它也保证了地位趋于巩固的贵族们的“历史权利”。它最终具有如此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乍得湖与尼罗河之间，它成了许多族群阿拉伯化－伊斯兰化的正常过程。马巴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伊斯兰教已经在加奈姆得势，这时布拉拉人到来，通过同包括马巴人在内的其他族群接触，帮着使伊斯兰教的 **114** 影响向东伸延。直到 9/15 世纪至 10/16 世纪，马巴人丝毫没接触过伊斯兰教影响。10/16 世纪末，一位自称阿拔斯王朝后代的名叫贾迈的阿拉伯人来到他们中间（或是实有其事、也可能纯属虚构），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贾迈挑选了一个属于马巴氏族的人作妻子；他加入马巴族群使得事情变得简单了。随着新宗教越来越得势，某些马巴氏族声称自己具有阿拉伯穆斯林血统 伊斯兰教渗透进来之前不久，阿拉伯人与本地各族居民间开始有接触，但当初这种联系并无宗教或文化的含义。这种联系是以黑奴贸易以及黄金和象牙贸易为基础。阿拉伯父系氏族群体称马巴人为“阿姆拜”（*'ambay*，原始人），而本地各族则以“阿拉姆戈”（*aramgo*，野人、野蛮人、无政府主义者）之称奉送给马巴

---

[66] M. 罗森斯特罗奇（M. Rozenstroch），1984 年。
[67] A. 孔代（A. Condé），1974 年。
[68] D. 哈马尼（D. Hamani），1985 年。
[69] K. 阿西米（K. Assimi），1984 年。
[70] E. 德弗拉库（E. de Flacourt），1913 年。

人。直到那时，他们还不曾由于语言或由于宗教观点而与当地人结合在一起。不久以后，有些阿拉伯人同一些马巴人大家族结婚；他们成为半定居的族群，并且或多或少采纳了马巴人的传统习惯。影响是双向的。马巴人学了阿拉伯人的语言，于是理解《古兰经》没有困难。宗教要求人们遵奉伊斯兰礼仪习惯，也要求使用《古兰经》的语言。随着伊斯兰教义的传播，马巴人"不仅谋求仿效伊斯兰教所提供的阿拉伯样板，而且谋求与阿拉伯人认同。在各个氏族里，靠权力上台并保持其地位的首领，力求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寻找根源：多数情况下，世系被追溯到先知的家庭，或者谦虚一点则追溯到四大圣门弟子之一"。此外，伊萨·哈亚尔写道，"采纳阿拉伯人的宗教、阿拉伯人的习俗和阿拉伯人的语言，同其他阿拉伯或穆斯林族群联姻结盟，乃是整个马巴人社会不可抗拒的趋向"。[71]

伊斯兰化加上阿拉伯化对整个马巴人社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马巴人由于编造假的世系伴带着彻底变更姓名而不自觉地改写了自己的历史。

这种多少是集体地更改姓名的做法说明今天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历史事件的后果时为什么会遇到困难。从我们所注意的观点看，马巴人之例在许多方面相当突出。他们的情况一般来说和瓦代人差不多，他们本身的文化价值体系为伊斯兰教的道德标准打下基础并与之共处。但是，由于书面和口头的教学体系赋予伊斯兰教以文化活力，它往往使这些传统的社会文化价值黯然无光、遭到失败，变得隐而不现。

115 伊斯兰教促使非洲各地社会生活一系列改头换面中最后一个环节大概最为重要。它导致它在其中获得完全支配地位的社会被彻底"解除文化"；它促成"黑人阿拉伯主义"，这是一种历史上的矛盾现象，而且这种穆斯林社会在文化上显得十分贫乏。许多非洲社会对此的反应不同于马巴人。他们估量了被提出的或强加的替代办法要付出多大代价。有时他们的反应甚至是拒绝伊斯兰教。最后，受这个问题影响最严重的乃是那类人，他们一直被排除在伊斯兰教所引起的那种变化之外却身受其害，他们的信仰被人瞧不起，而且人们思想上把他们当作是取之不竭的奴隶源泉，而从中主要受益者则是为伊斯兰教辩护的人和那些从事奴隶贸易的黑人国家。于是，在许多情况下，产生猜疑和不信任，从而促使某些非洲社会公然抵制和产生对立情绪。

对话的中断：10/16世纪末到11/17世纪初

10/16世纪末到11/17世纪初标志着西非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阶段。这个时期确有一定理由被人们说成是一个转折点，但我们宁可把它视为一个漫长而又极为丰富多彩的时期结束之后出现的间歇。在那个时期里，撒哈拉以南主要黑人国家诞生并得到发展；也是在那个时期里，涌现出两种世界观，即非洲大陆各种传统宗教的世界观与伊斯兰教世界观的对抗。那个时期也是另一个较短的严重动乱和变化无常的阶段的起点，在该阶段伊斯兰教显然暂时停止其扩张，甚至在不少地区有所退却。人们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曾

[71] I. H. 哈亚尔（I. H. Khayar），1976年，第43—44页。

经与伊斯兰教有联系的非洲各族人民大部分回归到原来的宗教。人们分析一下伊斯兰教作为非洲社会经济关系动力的作用就可以看到这个间歇本是历史的需要，伊斯兰教的这种作用在它地位不那么牢固的地方显示出更大的危害性：当伊斯兰教向前推进时，定居的农业社会是由非洲寡头政治集团统治；在伊斯兰教掩盖之下，整个大陆各地区成了奴隶的后备地。

反对穆斯林的反应采取方式最为激烈的地方是松尼·阿里大帝（868/1464－897/1492年在位）领导的桑海帝国。这种反应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这些人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被认为同非洲的传统价值观念势不两立。有许多情况有利于其实应该称之为一场反攻的举动。

在8/14世纪最后25年期间和下一个世纪的早期，马里中央政府的权威有所削弱，**116** 随后几乎荡然无存，而中央政府的权威原是组成帝国的各族人民之间政治凝聚力的源泉。在马里某些君主苛捐杂税的逼迫之下，各属国、行政区、乡村地区和城市中心发现离首都越远越容易摆脱中央政权。那些富裕的、五方杂处的城市居民，有伊斯兰教的良好组织和结构，开始扮演起自治的甚至独立的商人国家的角色。例如，杰内、瓦拉塔和廷巴克图就是这种情形。新兴的桑海帝国，通过征服，继承了马里的东方诸省。在新帝国里，松尼·阿里同这些城市，特别是廷巴克图的关系迅速恶化并发生严重冲突。冲突的原因也有经济和战略的缘由，但是，决定性的因素似乎是由于立国根基在于皇帝威权高于一切。松尼·阿里这位皇帝魔法师是在非洲君主全能的精神气质中成长起来的（毕竟他的称号是"达理"（*Dali*），换言之就是"至高无上者"），他无法忍受看到自己的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得到忠守非洲传统宗教的他的广大臣民群众的承认）受到廷巴克图穆斯林学者的挑战，何况这些人还是外来者。[72] 的确，柏柏尔人、尼格罗－柏柏尔混血种人以及富拉尼人构成那个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因此那个城市确实是受到那里的学者的严重折磨，更是被那两本史书的博学作者搅得乌烟瘴气。[73] 松尼·阿里统治时期的特征是使廷巴克图就范，使加奥地位至高无上，[74] 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使非洲传统宗教对伊斯兰教作出对抗性的反应。898/1493年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发动的政变以及使"伊斯兰教的选择"成为不可逆转的愿望，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解释。

除了穆罕默德一世（898/1493－934/1528年在位）和达乌德（956/1549－990/1582年在位）两个阿斯基亚王朝期间（这两位君主显示出对振兴伊斯兰教颇感到兴趣），10/16世纪末年的特色是摩洛哥人的征服。政治结构的崩溃和社会组织的瓦解，导致了桑海各城市确凿无疑的衰落。大约10年历程的对摩洛哥占领军的抵抗造成各地居民向南迁移，主要迁到登迪。这些居民自行组成一些小的独立国家，其社会－宗教结构主要是吸取祖先的传统，他们除姓名以外没有保存任何伊斯兰教的痕迹。

---

[72] A. 科纳雷－巴（A. Konaré－Ba）1977年。

[73] 《苏丹史》（*Ta'rīkh al-Sudan*），1900年，第105、107、110和115各页；《法塔史》（*Ta'rīkh al－Fattash*），1913－1914年，第80、84和94各页。

[74] Z. 德拉马尼－优素福，1983年（a）。

艾哈迈德·巴巴（963/1556－1038/1628年）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书名《苏呼德－117 米拉吉》（*Mi'radj al－Suhud*）。它写于1001/1593年至1025/1616年之间，对11/17世纪之交由于摩洛哥的征服和奴隶制的盛行而引起的社会动乱作了很有见地的考察。图沃特的商人曾请艾哈迈德·巴巴对桑海帝国一些地方的居民遭到征服被卖为奴一事提出看法（判断——“法特瓦”或“法塔瓦”，*fatwa/fatawa*），他趁机对11/17世纪初更大范围的尼日尔河流域苏丹地区的社会和宗教情景作一记述。这个记载一心想遵奉伊斯兰教的道德标准，作者希望保护那些成为非法捕捉受害者的各地居民，他在书中指出，当时的经济活动主要倚靠穿越撒哈拉的黑奴贸易。他密切注意这个地区各族人民伊斯兰化的程度和差别情况，伊斯兰教的退却显然可见。

比这种退却更为重要的是，在桑海帝国烟消云散和摩洛哥占领带来的骚乱两者所造成的政治真空里，社会和宗教一片混乱，出现了一个表面上声称忠于非洲准则的“信仰泛灵论”的国家。这就是11/17世纪时期塞古的班马纳人（班巴拉人）王国。其所以产生是由于：一方面“穆斯林帝国政权”灭亡了；另一方面帝国的城市组织衰落和伊斯兰教遭到了公开抵制，这种抵制自7/13世纪以来就发生在农村环境里，尽管有马里的历代曼萨和桑海的历代阿斯基亚。

伊斯兰教同非洲的接触是世界史上最富有成果的一项人类冒险事业。伊斯兰教提供了可以称为“一种社会选择”的东西，它的含义在不同时期和在黑色大陆的不同地方理解不一样。赌注很大：不折不扣地改变观点、改变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述方式、改变人的行为。它是用自己的文化换取另一种文化的问题，就差没有变成另一种人了。尽管有1/7世纪至11/17世纪初所表现的抗拒，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最终还是接受了穆斯林的选择。它被伊斯兰化，并且开始阿拉伯化。

在非洲其他地方，伊斯兰教没有找到造成它在大陆的东部和北部以及在西班牙获得成就的那种顺利的历史环境。虽然伊斯兰教既不是一个征服者，也未彻底掌握政权（它不得不把政权交给那些仍然满脑子非洲传统的君主们——尽管这些君主由于自己改宗和常常由于从出售奴隶牟取巨利，而往往“见外”于受他们统治的各族人民），毕竟它还是在沙漠以南和在东部非洲取得显著的宗教上的成就。到10/16世纪，伊斯兰教仍然没能找到把黑人社会和他们的文化纳入“伊斯兰教地区”而不产生问题的全面解决办118 法。下一个间歇时期同样没有更有助于找到这种解决办法。最后，再说一点，社会一体化将在12/18世纪和13/19世纪初的一系列革命事件的进程中发生：在某些地区，单是这些革命事件就足以使得伊斯兰教成为人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表现。

5 苏丹地区的各族人民：人口流动

F. 德-梅德罗斯

问题与根源

119

编纂非洲史的工作到了现阶段，深入研究最终导致在西非苏丹地区确立各族位置的人口流动十分必要，然而这是极其复杂的任务。

由于在讨论中有些人突出地假设来自北部和东部的某些族群在文化上有优越地位，使得产生人口流动的来龙去脉变得模糊不清。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经常考虑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研究非洲历史的方法和应当侧重的主要方向。这需要花大力气用批判的眼光去思索并相应地作出全神贯注的努力。

在有关非洲历史的大多数书籍和专著中，人口流动问题占有重要的位置；通常在展开其他论题的讨论之前，人们就以广泛流行的“迁徙”概念介绍人口流动。苏丹地区十分广阔，适合于人们流动、接触和交流。在缺乏可靠的地理学和年代学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求助于外来影响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样，追溯苏丹各族起源的口头传说也常为人所引用，力图把各族的文化和素有声望的祖先的文化两者联系起来。最后，“迁徙”这个主题有助于产生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以求通过非洲历史的种种事实真相，重现起源于可以当作典型的更古老文化的格局和结构。

“含米特假设”经常被用来说明非洲各种文化在古代的演变，它一直被广泛采用为容易讲得通的解释结构。[1] 根据这个理论，从人种（高加索人）和语族的观点看，“含米特人”是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截然不同的一种非洲人。因此，“含米特人”的北支应包括撒哈拉居民柏柏尔人、图布人和富拉尼人。“含米特假设”明确区分以畜牧为生的“含米特人”和务农为生的黑人，认为两者是互不相干、界限分明的两种人。

120

由于“含米特人”与中东缔造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各族有着“天生的”亲属关系，因此，有人就认为，非洲所取得的和在非洲的一切进步和创新都应归功于他们。这样，从事畜牧的养牛人就被认为文化优越。据说，是这些白种游牧民把“文明”的种种内容传播给了定居的黑人。[2]

像M.德拉福斯、H.R.帕尔默、Y.于尔瓦这样的作家，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苏丹

---

① R.科纳万（R. Cornevin），1960年，第70－71页，试图说明“查米特人”（Chamite）和“含米特人”（Hamite）这两个名词，但他赞成第一个名词；参阅C. G. 塞利格曼（C. G. Seligman），1930年、1935年。

② C. G. 塞利格曼，1930年，第96页。

地区各族的知识，但其著作中故意采用这种传播论的观点。[3] Y.于尔瓦其个确信，“是白人把优越的组织模式的种子”带到非洲。[4] 当代从事编纂非洲史工作的学者对这种已经遭到系统批判的假设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前提十分敏感。[5] 但是必须承认，诸如此类恣意武断的资料在教科书和其他作品中仍然非常流行。因为，虽然这些理论及其影响正受到认真的挑战，但要以研究成果基础上取得的新成就取代它们，却是远为更加困难的事，尽管这种研究本身已经越来越成熟而严密了。

还有另一类问题，它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缺乏对这个主题进行透彻研究的资料。本章所涉及的这个时期——回历1－5／公元7－11世纪——通常被称作“黑暗时期”[6]。应该承认，尽管非洲历史研究最近有所发展，我们迄今所掌握的古代各时期资料仍然是凤毛麟角，极不完整。

确实，阿拉伯人对北部非洲的征服宣告了一个交往时期的开始，一般认为这个时期会比以往几个世纪有更加可靠的资料。但是，来源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书面资料越来越显出有其局限性。[7] 这些资料站在作者本人文化环境的立场进行构想，它们是支离破碎的，在关于苏丹地区各族这一特定的问题上，反映出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鸿沟。它们的作者大多是东方人，如雅库比，他就从未到过尼罗河三角洲以西的地方。他们中有些人还必须考虑派他们去收集资料的主子的利益和扩张主义企图，例如伊本·霍卡勒（他为法蒂玛王朝效劳）。无疑，巴克里是一位其贡献已被证明最为重要的作家。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他在西班牙土地上描写的非洲国家，他所记述的情况主要来源于在他之前各个作家的作品（主要来源于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的官方档案）和经他询问后旅行者所说的故事。[8] 在伊本·巴图塔（8/14世纪）之前的那些作者没有一个真正到过苏丹地区。

121

但是，这个主题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探讨。特别是这方面研究取得进展的时候，J.M.库奥克、N.莱维茨恩和J.F.P.霍普金斯收集的阿拉伯资料以及他们的一系列研究著作都有宝贵的参考价值。[9] 遍及非洲各地，人们对口头传说都采取积极的态度，“瓦加杜传说”（马里和曼丁哥人居住地区的编年史学家和研究民间传说的人所提供的描述），以及桑海人、扎尔马人、豪萨人、富拉尼人（颇尔人）和莫西人的传说，加上从毛里塔尼亚到乍得这一大片土地上正在进行的考古工作，使得我们有可能更有判断力地看待这个主题，并扩大了中掌握资料的范围。

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范围十分广泛，现在以“苏丹”这个名称表示的“黑人地区”（*Bilad al-Sudan*）不仅包括塞内加尔河流域、尼日尔河流域和乍得湖流域，也包

---

(3) M.德拉福斯（M. Delafosse），1912年；H. R.帕尔默（H. R. Palmer），1936年；Y.于尔瓦（Y. Urvoy），1936年、1949年。

(4) Y.于尔瓦，1949年，第21－22页。

(5) W.麦加菲（W. MacGaffey），1966年；E. R.桑德斯（E. R. Sanders），1969年。

(6) 参阅E. F.戈捷（E. F. Gautier），1937年，和R.莫尼（R. Mauny），1971年的著作标题。

(7)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卷，第5章。

(8) 参阅本书第14章。

(9) J. M.库奥克（J. M. Cuoq），1975年；N.莱维茨恩（Nehemia Levtzion）和J. F. P.霍普金斯（J. F. P. Hopkins）合编，1981年。

括更南边热带大草原和森林地带的口岸。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更是缺乏，研究工作尚处于萌芽阶段。在孔城（科特迪瓦）、贝戈（加纳）和普拉（布基纳法索）等地进行的研究目前正取得进展；但是，除了尼日利亚的塔鲁加和伊费之外，都不能与在提希特、泰格达乌斯特或昆比萨利赫或在多贡地方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拟。在萨赫勒地区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事实上为重新估价苏丹地区与其撒哈拉边缘地带的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不容忽视的资料。这些资料转过来又使人们懂得，苏丹地区各族人民是在什么条件下占有他们所处的环境、又如何适应了这种环境并从中获得他们的文化资源。

北部边界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透过“穆斯林眼镜”来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就是完全根据居住在北非的穆斯林社会的眼光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穆斯林社会是我们现有书面文献的主要来源。穆斯林时期及其带给马格里布的新局面，无疑是我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了解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苏丹地区各族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穆斯林阿拉伯的文化和社会带来了对它与苏丹地区关系的种种影响。这是很有用处的史料，因之阿拉伯文资料备受重视，加上它们是“信奉圣书的人们”十分珍视的书面语言，所以声望 **122** 更高。但是，如果我们稍稍偏离一点这种流传甚广的态度，就会发现人们对苏丹地区及其各族人民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穆斯林世界东部和穆斯林世界马格里布部分利害关系的影响极大，并处处受其牵制。

用北非人的眼光来看待“黑人地区”，这个倾向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古代，当时地中海流域四周的“已知世界”是世界的地理中心。这种结构在伊斯兰纪元开始之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而且，这种突出北非地位而忽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至少在9/15世纪以前一直反映在许多作品之中，这些作品当然并非传播论的拥护者所著，结果出现了不平衡状况：一方面过多地描写古代和中世纪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另一方面对同一时期黑人各族的了解却极为残缺不全，而存在这个偏向本身就是充分的理由需要考察一下北非人对待苏丹地区的态度，苏丹地区通过撒哈拉沙漠与柏柏尔人居住地区相联系。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讲，柏柏尔人在西部非洲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史前时期以来，他们一直活跃在撒哈拉地区，远达它的南部边缘。他们来自费赞的祖先加拉曼特人据说在古罗马时期就是非洲省和“黑人地区”之间活跃的中间人。⑩

柏柏尔人以前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历代北非霸主（从迦太基人到拜占廷人）所控制的地区的一部分，这时他们发现由于骆驼数量的增加自己向沙漠方向流动的能力加强了。不论这种流动性过去曾否促成在北部远处建立定居的王国和君主国，或者在毗邻沙漠的地区和撒哈拉本身形成大的游牧部落联盟，柏柏尔人我行我素、不愿受约束的态度导致他们长期反对新来的阿拉伯政权。这种对立情绪表现为各种抵抗运动，特别表现为对哈列哲派异端给予衷心的欢迎。⑪

⑩ 参阅R. C. C. 劳（R. C. C. Law），1967年（a）、1967年（b）。
⑪ 参阅本书第3章和第10章。

确实，从2/8世纪后期开始，在与苏丹地区进行贸易中处于主动地位的，正是那些由哈列哲教派控制的君主国和贸易中心。奈富塞山区、瓦尔格拉、塔哈尔特和锡吉勒马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事这类活动。[12]

在西面，柏柏尔人组成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法扎里（2/8世纪）称之为安比亚国。它大概包括马苏法人、兰图纳人和朱达拉人的一些部落。[13] 雅库比把他们归属于在整个 123 撒哈拉西部发挥重要作用的桑哈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必然向南与加纳控制的地区有接触。柏柏尔人的另一个群体是豪瓦拉人，他们最初来自的黎波里塔尼亚，随着“黑人地区”移动。为了避免被人征服，他们向西行进，在穿越马格里布时参加了多起反对阿拉伯人的起义。2/8世纪时，他们信仰哈列哲教义，在参加了阿布·亚齐德领导的最后一次哈列哲派起义之后，[14] 便向西和向东溃散，也有些人向南逃窜。有记载表明，这个时期他们到了费赞。

在霍加尔也有豪瓦拉人。豪瓦拉（Hawwāra）这个族名和霍加尔（Hoggar）这个地名之间的联系就表明这一点。历史学家伊本·哈勒敦说，柏柏尔人有小部分越过沙漠，在戴面纱的拉姆塔人附近的地方定居。拉姆塔人居住在“黑人地区”的考考（加奥）城附近。[15]

桑哈贾人在穿越撒哈拉贸易的西边商路上起着十分活跃的作用。这说明在古时候就已经有人居住的地方出现一个贸易中心的原因。这个中心后来被称作奥胡达古斯特。此城很快就为兰图纳人所控制，在3/9世纪和4/10世纪时由这一地区的柏柏尔人、黑人和来自北方的商人居住。有一条道路把奥胡达古斯特和摩洛哥南部塔菲拉莱特地方的大商港锡吉勒马萨连接起来。

在东面，易巴德教派的柏柏尔人在通往伊弗里基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两个口岸的贸易中起了相似的作用。他们从事贩卖黑奴的贸易，这些黑奴是从加奈姆地方扎加瓦人居住地区贩运来的。柏柏尔人的首府宰维莱是这种贸易的中心，起了储存等待北运的奴隶的仓库的作用。

雅库比在提及这种贸易时，对易巴德派穆斯林从事买卖黑人异教徒这一事实并没有不以为然之感；他只是在发现“黑人首领们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而且也没有战争动机地出售黑人”时，略为有点惊奇。[16] 对于那些从事这种买卖的人来说，奴隶贸易并非偶尔从事的职业，而是有赖于马格里布和地中海市场的需求，也即受供求规律支配的一种经常性的经济活动。因此，这些易巴德教派的柏柏尔人（他们在宗教上是持不同信仰者，因为他们信奉哈列哲派教义）就经济而言则同穆斯林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与苏丹地区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使他们成为范围远达撒哈拉南部的大阿拉伯－柏柏尔联合

⑫ 参阅本书第11章。

⑬ 参阅J. M. 库奥克，1975年，第42页。

⑭ 参阅本书第12章。

⑮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925—1956年，第1卷，第275—276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330—331页。

⑯ 雅库比（al-Ya'kūbī），1962年，第9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42页、48页；又参阅本书第11章、第15章。

体的促成力量。

在撒哈拉地区柏柏尔人的各个群体中，图阿雷格人（后来以这个名称为我们所熟 **125** 知）占有特殊地位。他们的居住区相对而言靠近“黑人地区”。他们组成若干部落联盟，所占地方从北撒哈拉的古达梅斯一直延伸到尼日尔河及其以远，这些人的主要定居地在霍加尔、阿伊本、和伊福拉斯高原的山岳地带。尽管信奉伊斯兰宗教，他们还是尽量保持自己文化的基本面貌，诸如自己的语言（塔玛谢格语）、自己的文字（提非纳格文），以及自己的社会结构——分成武士、宗教导师、纳贡者、奴隶和手艺人阶级。他们谈及本身的起源时，强调祖宗门第，这也是一种无可置疑的文化特征。根据图阿雷格人的口头传说，他们是塔菲拉莱特一个名叫廷·希南的女人的后代。这位女王是克尔－雷拉贵族部落的祖先，据说她由女仆塔卡玛特（达格－拉利人的祖先）陪同，骑着一峰白色母骆驼来到霍加尔。1929 年和 1933 年在霍加尔以西阿巴莱萨一个墓葬遗址进行的发掘看来是证实了这些传说。人们发掘出属于公元 4 世纪的大量物品，表明在人们广泛使用骆驼的时候，摩洛哥南部和霍加尔之间存在着一条古商路。[17]

从人类学角度看，图阿雷格人实际上是撒哈拉地区和苏丹地区两者之间的中途族群。他们分为两个群体：北支居住在阿杰尔高原和霍加尔；南支则是阿伊尔高原的阿维利米德人和克尔－维人，他们与豪萨族的黑人通婚。在这种情况下，黑人各族势必会对图阿雷格人起某些文化影响。据 H.T. 诺里斯说，图阿雷格人相信一种叫“蝰蛇”（*tachchelt*）的占卜术。他们根据字的形状向这种爬行动物寻求答案。[18]蛇也会在另外一些场合出现，其含意往往可以作多种解释。据说它对人起保护作用，但是出现于梦中则是不祥之兆。巴克里提到过苏丹地区扎夫卡瓦人也有一种传说，两者比较颇为类似，本章作者认为图阿雷格人和加纳有文化上的联系。[19]

在撒哈拉沙漠的东部和中部，尤其是在西部，居住着黑人各族。在西部，哈拉廷人通常构成摩洛哥南部和毛里塔尼亚诸绿洲人口的重要部分。他们的起源问题尚有争论：他们一直被称作黑色柏柏尔人。[20] 但是，研究古代撒哈拉各族分布情况的新探索，对这个问题持不同看法。因此，它只能作为全面研究撒哈拉环境对西非各族发展所起作用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有一种看起来颇为合理的论断认为，他们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向南流 **126** 动的黑人各族的活标本。

苏丹熔炉中非洲各族的融合趋势

我们如果完全站在边缘地带立场上看苏丹地区各族的问题，也即单纯根据马格里布以东地中海沿岸各地社会的观点和利害关系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很可能有歪曲西部非洲

---

⑰ M. 雷加斯（M. Reygasse），1940 年；1950 年，第 88－108 页；M. 加斯特，（M. Gast），1972 年；又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I 卷，第 20 章。

⑱ H. T. 诺里斯（H. T Norris），1972 年，第 8－9 页。

⑲ 巴克里（al-Bakrī），1911 年，第 173 页；1913 年，第 330 页。

⑳ 参阅 G. 坎普斯（G. Camps），1969 年，第 11－17 页，1970 年，第 35－45 页；H. 冯－弗莱施哈克（H. von Fleischhacker），1969 年，第 12－53 页。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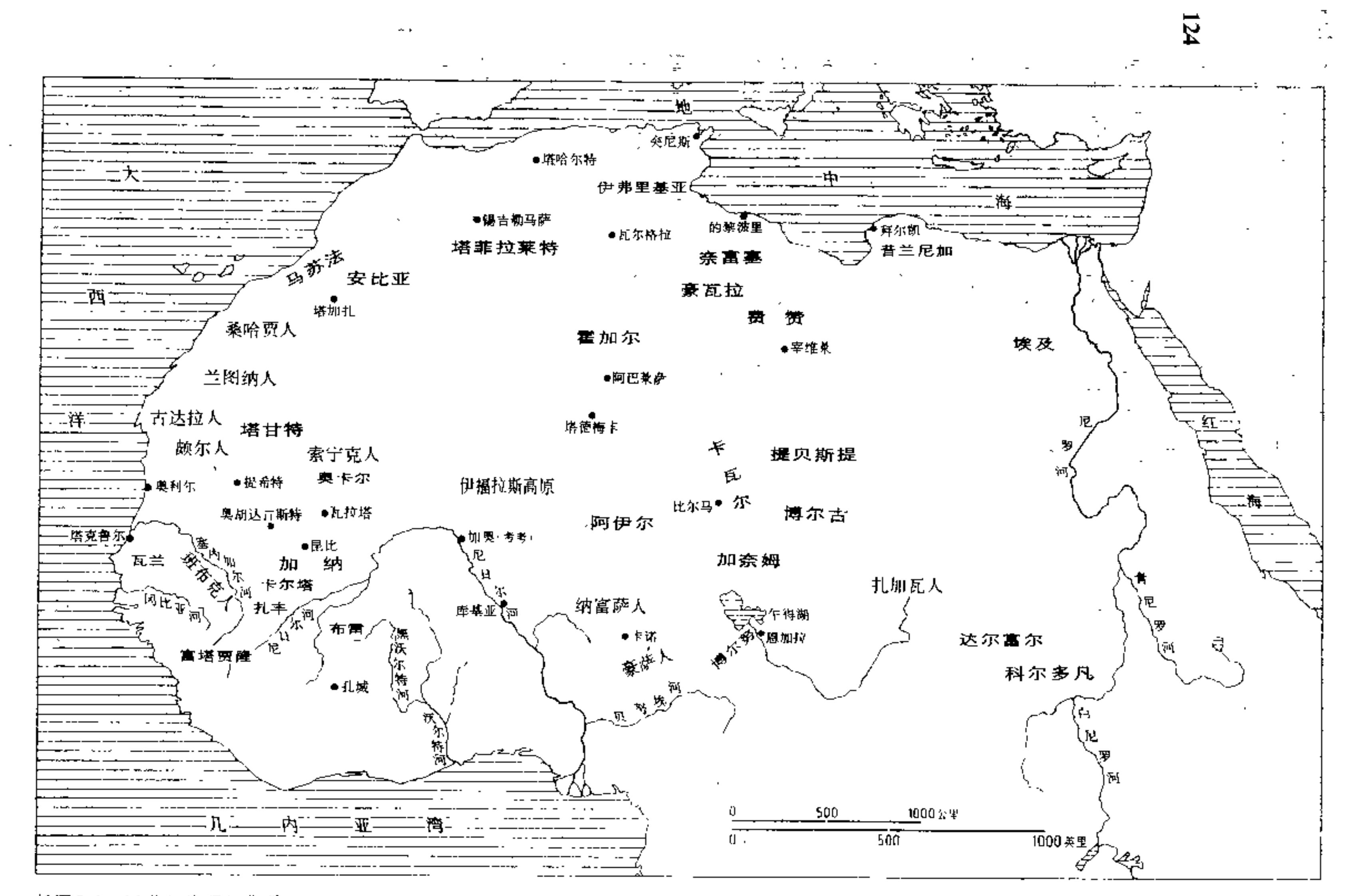


插图5.1 11世纪的西部非洲

具体环境及当地各族人民形象的危险。站在这种立场分析的结果势必是不完整的。诚然，我们逐步有所进展，但我们掌握的资料仍是支离破碎，很不完整的，而许多问题尚未得出答案。我们首先要设法肯定本章所述时期内组织和建立起来的非洲各个社会的地区范围。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古生态学、孢粉学和考古学最新研究基础上取得的成果。把这类成果同比较容易得到的来自口头传说的资料以及现有的阿拉伯文文献结合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得出某些合乎情理的假设。在毛里塔尼亚进行的关于撒哈拉史前时期和此后时期的研究工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特别是阿德拉尔、塔甘特和奥卡尔诸地区成绩最为突出）。H.J. 于戈和 P. 芒森在上述地方开展的研究项目[21]，可以看作是一个样板，说明要想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取得进展需要的是什么。它们直接关系到“黑人地区”的西面部分，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像富拉尼人和索宁克人这样有代表性的族群提供了良好前景。[22] 对这个地区人口流动所作的研究，把我们带回到撒哈拉的新石器时代，特别是该地区发生干旱化和沙漠化地球气候大变化的时期。这一过程约在基督纪元前第四个一千年时进入活跃期，所引起的社会和历史巨变，影响整个非洲大陆。现在人们公认，新石器时代撒哈拉的人口分布明显地不同于气候变化以后的情况。有一种看起来颇为合理的论断认为，大多数人口是定居的黑人。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特征之一很可能是黑人务农社会继续存在，而且在利比亚人与柏柏尔人的混合种和后来的柏柏尔游牧民中间这些黑人务农社会还是地位牢固的核心。来自前两者的压力使务农社会逐渐向南迁移，也即移向大部分由黑人保有的地方。现在我们该当考虑这些假设能否有助于我们了解萨赫勒地区富拉尼人和索宁克人的起源这一争论不决的问题。 127

富拉尼人居住在西非热带大草原这个广阔地区，塞内加尔和喀麦隆之间好几个地方都发现他们的踪迹，使得他们的起源和他们迁徙的路程究竟有哪些阶段的问题具有重要性。[23] 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使他们与其他族群的往来非常有限；这种情况使得人们产生一种看法，认为富拉尼人基本上是流动的，总是在“迁移”。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传播论者的设想何以能在富拉尼人身上找到肥沃的土壤，从而发展成为各种“含米特”理论。人们长期以来在非洲和非洲以外的许多地方寻找富拉尼人的发源地：他们的祖先或许是茨冈人，或许是佩拉斯吉人，或者是 M. 德拉福斯所说的犹太教叙利亚人。有些人认为他们来自印度，因为富尔富尔德语和塞雷尔语据信与达罗毗荼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有些人发现阿达马瓦地方的富拉尼人与古伊朗人有着人种学上和社会学上的相似点。还有人认为他们是阿拉伯柏柏尔人的后代；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努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或者是东非人的后裔，并把他们与科尔多凡的努巴人联系起来。[24]

上述理论大多数都有各种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论点作为依据，但没有一种能真正令人信服。它们全都包含“含米特”假设的成分，认为苏丹地区一些大国的形成主要由于像

---

[21] P. 芒森 (P. Munson)，1968 年、1970 年、1971 年、1980 年；H. J. 于戈 (H. J. Hugot) 等人，1973 年；H. J. 于戈，1979 年。

[22] 关于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参阅 C. 图佩 (C. Toupet)，1977 年。

[23] 有大量关于富拉尼人的文献：参阅 C. 赛义杜 (C. Seydou)，1977 年。

[24] L. 托克西埃 (L. Tauxier)，1937 年和 D. J. 斯滕宁 (D. J. Stenning)，1959 年曾对各种假设加以阐述。

富拉尼人这一类牧民提供的外部因素。当前的研究成果并不支持这种观点。所有研究趋于一致地认为富拉尼人现象是属于西部非洲范畴的事物，它是西部非洲人文地理、历史发展和文化的整体组成部分。只有在这种论点的背景下才有可能正确解释富拉尼人的起源和迁徙问题。从语言学角度看，更好地理解富拉尼人的方言之后，就知道富尔富尔德语的基础无可置疑地是非洲的，同沃洛夫语和塞雷尔语有相似之处，尽管有柏柏尔人形成部族前的成分植入了这个核心。关于他们的起源，有证据指明是在毛里塔尼亚的南部，那一带基督纪元之初就有富尼拉人。人们可以发现，在毛里塔尼亚的布拉克纳和塔甘特地区，许多地名与富尔富尔德语明显相似，显然受其影响。这一套假设表明，富拉尼人的祖先是饲养家畜的人。关于这点，在毛里塔尼亚发现的证据可以测定为基督纪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一千年。在本章论述的时间里，富拉尼人与黑人同时向塞内加尔河流域流动，并对某些国家（如塔克鲁尔）的形成起了作用。富拉尼人存在于西部非洲，**128** 5/11世纪的富塔托罗尤为明显，虽然在马克里齐和卡诺编年史之前（8/14世纪至9/15世纪）的阿拉伯文资料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

在此有必要谈一下关于富拉尼（颇尔）人㉕和图库洛尔人的人种名称问题：富拉尼（颇尔）人称自己为普洛人（Pullo，单数形式）和富尔贝人（Fulbe，复数形式）。所有讲他们语言（普拉尔语或富尔富尔德语）的人都被称为哈尔－普拉伦人（Hal－pularen）。后一个名字也是富塔托罗居民使用的名称。欧洲人资料中称这些居民为图库洛尔人（Tukulor或Toucouleur）。到了殖民统治时期，与塞内加尔的富尔贝人有过接触的人种史研究学家和其他学者开始把牧民都称作富尔贝人（富拉尼人、颇尔人），而把讲同样语言的定居者都称作图库洛尔人，认为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虽然这两群人有着不同的习俗，但其差别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因素所引起，与人种、语言或文化没有关系。在富尔贝人向东迁移的出发地，也即塞内加尔河流域（富塔托罗）这个地区，富尔贝人竟被叫做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名称，这真是命运的嘲弄。㉖

如果撇开关于富拉尼人的起源和史前迁移的种种推测和假说，现在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在历史上富拉尼人来自塞内加尔的富塔，而塞内加尔的族群（他们的近亲塞雷尔人和沃洛夫人的邻居）应该被看作是核心，讲普拉尔语或富尔富尔德语的其他族群由这个核心向外扩散，向东和向南迁移。

在5/11世纪至9/15世纪之间，富拉尼人通过琼博戈和卡尔塔向马西纳迁移。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富拉尼人是通过逐渐接触的过程才定居下来的。这样，来自费尔洛和富塔托罗的小部族和家族在富塔贾隆定居下来。于是，通过与早在富拉尼人到来之前就已在这块地方定居的各族交往从而出现了缓慢的融合。㉗ 富拉尼人的迁移行动与入侵毫无

㉕ "富拉尼"（Fulani）一词流行于英语非洲学文献中，而"颇尔"（Peul）一词则流行于法语文献中，这主要因为法国人最初接触这些人是在他们还保持自己所使用的名称的环境（塞内加尔）中，而英国人则是在北尼日利亚接触到这些人，在那里，政治上掌权的人已采用豪萨语的名称"富拉尼"。

㉖ 曼丁哥人把富尔贝人（Fulbe）叫做富拉人（Fula），豪萨人叫他们富拉尼人（Fulani，单数为巴－菲兰西（Ba－Filanci），卡努里人和苏丹地区的阿拉伯人叫他们费拉塔人（Fellata），阿拉伯人叫他们富拉尼人。

㉗ T.迪亚洛（T. Diallo），1972年。

共同之处。因此这种行动与关于"白色的含米特人"改变了黑色各族的古老结构这种"含米特理论"的通常说法完全不相符合。富拉尼人的起源和迁移问题对西非各族人民的历史至关重要，因为它影响西苏丹和中苏丹的所有族群。但是富拉尼人与这些族群的 129 关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与沃洛夫人、塞雷尔人、索宁克人和"曼丁哥人"以及同古加纳王国的关系的其他方面，仍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加纳的建立，犹如富拉尼人的起源一样，长期以来一直是按传播论的说法进行解释的，所依据的是经典史书的作者们所述的情况。M. 德拉福斯认为，加纳是由叙利亚－巴勒斯坦人缔造的，他们自昔兰尼加来到奥卡尔地方的索宁克人那里，途中在阿伊尔高原和尼日尔河的苏丹地区稍作逗留。这些外来者据信是富拉尼人的祖先，据说在公元3世纪建立了强大的加纳国家。临近2/8世纪末，据信索宁克族黑人在他们第一位国王（*tunka*）卡雅·马汉·西塞的带领下把白人赶回塔甘特、戈尔戈勒和富塔。[28]

矛盾的是，有关瓦加杜王国的传说似乎使这种说法增添了色彩。夏尔·蒙泰伊介绍了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瓦加杜的都城昆比的创建者迪纳是犹太人（约伯）的后裔；第二种说法则认为他是伊朗人（先知的圣门弟子波斯人赛尔曼）的后裔。[29]但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意见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实的，因为只要对瓦加杜传说稍加分析就足以表明它们缺乏历史根据。这些故事的意义在于别的方面，特别是在宗教和社会方面。就此而言，它们与关于加纳的缔造者是叙利亚－巴勒斯坦人后裔的说法所包含的细节不相符合。

人们看来已经取得一致意见，新石器时代撒哈拉的居民大多数是黑人，他们的踪迹远到阿德拉尔都可以找到。随着气候变得日益干燥，白种居民（利比亚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种）向南迁移，但他们遇到像提希特陡崖地方加纳索宁克人的祖先那样有组织的黑人农民的反对。提希特陡崖的防御工事遗址表明，当时黑人确实是组织起来抵抗利比亚人和柏柏尔人混血种游牧民的压力。根据这些因素，看来很可能，像阿拉伯文资料里所说加纳这样有良好组织的国家，其基础可以一直追溯到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而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900年的切布卡阶段也有可能是可信的假设，如同A. 巴思利根据对D. 芒森著作的解释所提出的那样。[30]

关于黑人居民在非常古老时代就建立了加纳，以及它最初在新石器时代撒哈拉的住地比后来时期的加纳更加靠北的假设，并非纯属主观臆测。特别因为从阿拉伯时期直到当今时代一直存在"遗留的"人员，使这种假设更显得大有道理。无论如何，阿拉伯地 130 理学家都认为这是甘加拉－万加拉人和巴富尔人起的作用，据此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而根据哈拉廷黑人迄今仍然散居于撒哈拉各地的事实则更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对阿拉伯文的文献和口头传说稍加研究，就可以发现在历史上黑人所居住的地区远比他们现在居住的地区往北得多。当时，他们控制着塔甘特、奥卡尔、霍德（豪德）、提里斯和阿德拉尔诸地区。对这些文献和传说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索宁克人当时是在

---

[28] M. 德拉福斯，1912年，第2卷，第198及以后诸页。

[29] C. 蒙泰伊（C. Monteil），1953年，第370－373页、386页、389页。

[30] A. 巴思利（A. Bathily），1975年，特别是第29－33页。

塔甘特和霍德，而塞雷尔人和富拉尼人的祖先则是在如今毛里塔尼亚的其他地方。后两个族群起先一同居住在毛里塔尼亚南部，后来又在富塔托罗居住在一起。[31] 富拉尼人一直留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塞雷尔人则向南迁到辛和萨卢姆他们目前居住的地方。

人们常常过分强调柏柏尔游牧民与定居的黑人各族之间的对立和他们彼此间激烈的、毫不退让的残酷斗争。虽然这两个群体彼此相互冲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由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需要，他们生活在一起，合作得非常密切。单纯从种族和宗教对抗的观点来观察萨赫勒地带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再能解释一切，其原因就在于此。[32]

把索宁克人散处各地的现象完全归因于柏柏尔人，特别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施加的压力是不够的。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气候因素。他们原来的住地——在索宁克人的传说中是瓦加杜——位于气候不稳定的地区，但是从商业角度看应该说是地理条件颇佳。根据瓦加杜传说的说法，瓦加杜的人民在一次持续 7 年的旱灾之后逃往南方。这次由气候造成的灾难（使人联想起 20 世纪 70 年代那次旱灾）似乎是索宁克人散处各地的主要原因。他们的迁移行动使他们分布在西苏丹的广阔土地上，从冈比亚一直延伸到桑海。但是仍有一个很大的族群继续留在奥卡尔和霍德他们原来的居住地。他们是在这块地方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国家——古加纳。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定这些事件的粗略年表，但索宁克人的迁移行动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则是绝无疑问。

苏丹地区霸权国家的出现

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期间，中苏丹和东苏丹涌现出一系列有组织的社会，并逐步发展成真正的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甚至变得非常强大，诸如加奈姆和加纳。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在形成过程之中，诸如豪萨、桑海和塔克鲁尔，后者没有前者那么大。在伊斯兰纪元最初几个世纪穆斯林刚来到苏丹地区时，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些群体，必须与之打交道。虽然对于这些国家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我们了解得还是很少，但是我们可以集中注意力于那些建立加纳和加奈姆的群体，大致勾划出一般的轮廓。

131

在苏丹地区最古老的单一群体中，卡努里人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撒哈拉干旱化以后的时期，黑人务农诸族撤退到乍得湖剩余低洼地周围，分布在湖两侧气候十分恶劣的地区——博尔库－阿兹本－乍得三角地带。讲所谓乍得语的各族（如豪萨人）定居在这一地区的西边，而讲特达－达扎语诸族群，特别是卡努里人，卡嫩布人和扎加瓦人则住在东边。当地的传说把建立加奈姆国家的功绩归于一位阿拉伯英雄赛义夫·伊本·西·亚赞，他控制了一个定居在乍得湖东北的游牧民群体——马格米人。[33]

---

[31] 参阅 T. 迪亚洛，1972 年。

[32] J. 德维斯（J. Devisse），1970 年；S. K. 麦金托什（S. K. McIntosh）和 R. J. 麦金托什（R. J. McIntosh），1981 年。

[33] 参阅本书第 15 章。

在西苏丹，加纳帝国建立在非常广泛的部族基础上：讲曼德语的大语族从南部森林地带一直延伸到与撒哈拉相接的萨赫勒地带。加纳王国位于北部，居住着索宁克人，他们与撒哈拉的白人游牧民有联系。加纳建立之后约一千年，在廷巴克图收集到的口头传说称，那个国家的第一个统治王朝是白人王朝。

起源于苏丹地区各个社会本身的口头传说经常称他们的祖先是白人，这看来颇令人感到惊奇。它引起苏丹地区国家结构的起源问题。但是，这些故事出现于很晚时期，以及产生这些传说的黑人社会所处的位置，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某种解答：那些故事只不过是把那些社会的当代现实投影到过去年代。关于白人祖先的传说，实际上出现的背景是北方的柏柏尔诸族群起着支配作用。

阿拉伯作者对这一特定问题的态度在此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一般说来，穆斯林世界一个普遍的倾向就是把某个族群或某个王朝的统治阶级与先知或其随从人员挂起钩来，从而对他们的权威给以合法认可。[34] 然而，不论是提及加纳、塔克鲁尔或桑海，6/12 世纪中叶以前的阿拉伯作者从未提到统治苏丹地区诸国的王朝是白人血统。巴克里提供了大量 5/11 世纪的情况，他明确的态度消除了对这个问题的一切疑虑，他说，加纳由一位黑人异教徒国王统治。[35] 直到伊德里西所处的时代（6/12 世纪），白人血统的说 132 法才发展起来，[36] 所以这种说法日益扩散的背景还是伊斯兰教在苏丹地区的日益扩展。伊德里西是第一位录下撒哈拉西部桑哈贾柏柏尔人为先锋的阿尔莫拉维德征服之后各项事件的人。只要我们对口头传说传播的故事和巴克里之前阿拉伯作者的著作都加以仔细检阅就能澄清白人血统说法何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与此同时，为压制这种说法而作的努力也显示了与之对立的论点的重要性。

苏丹地区诸国是黑人各族的特定创造物。他们与撒哈拉南缘的柏柏尔人有联系，并与白人血统的邻人保持复杂的关系。当然，黑人务农者最初是在游牧民的压力下撤走，而在比较不那么艰苦的萨赫勒各地定居下来。但是，后来他们逐步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便能更好地抵制这种压力。苏丹人发现他们自己拥有勇敢地对付来自沙漠的威胁所需要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但是，由于来自北非的扎纳塔人的活动，强大的加纳帝国自 380/990 年起就处于经济上支配奥胡达古斯特的地位，并且从而建立起政治上的霸权，使对抗状态持久存在。一个世纪后，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压力下，同一个加纳失去了它在苏丹地区诸国中无可争议的首脑地位。然而，存在于柏柏尔人与黑人间的紧张状态没有造成柏柏尔人接管苏丹地区诸国的后果，因为后者已经建立起牢固的组织基础。

苏丹地区各国繁荣的基础

在本章所述的时期内，苏丹地区诸国的形成和发展其基础是某些工具和技术的推广，从而使得这些工具和技术的拥有者能够统治萨赫勒地区农民和牧民的小族群。在这

[34] 参阅本书第 4 章。
[35]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99－100 页。
[36]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33 页。

方面有两个因素看来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是铁的广泛使用；另一则是马和骆驼的使用。

对黑非洲金属推广和使用问题的研究（目前仍是零星片断的），说明铁与苏丹地区一些大国的形成有密切联系。铁除了对狩猎和农耕有重要意义外，还是决定军事实力强弱的重要因素，铁能够使其拥有者比别人有更大的技术优势。就苏丹地区的情况而言，像加奈姆或加纳这样一些国家，在它们的形成过程中军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关铁的交易和铁匠的情况，在口头传说中越来越成为人们感兴趣的内容，这些铁匠成为在许多方面握有实权的一种人。这有助于说明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有多大。但是，关于技术的最初如何获得以及它们如何传播和推广的问题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却很少有人研究。

有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认为，中东的铁通过尼罗河流域经由重要而繁荣的冶炼中心麦罗埃到达苏丹地区，[37] 从那里它向南和向西进入热带大草原。根据第二种假设，铁来自北部非洲，是由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于公元前5世纪传人苏丹地区的。在撒哈拉发现的岩画所描绘的武器曾被援引来支持这种说法．但是，在北尼日利亚乔斯高原以南地区的诺克发现的实物却表明黑非洲早在古代就懂得冶铁术。早在公元前第三世纪，铁在那一带已广泛得到应用。这些新发现的事实说明有必要重新评价以往的理论，并指出铁进入非洲可能有几条道路，但也不排除有一些炼铁中心是在当地发展起来的可能性。

人们常常提到，铁与马的使用有密切联系，因为两者都与苏丹地区一些大国的形成有关。众所周知，在基督纪元前第二个一千年的后半期和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的最初几个世纪，撒哈拉就已经有马。然而，随着人口流动，马格里布和东南方的栋古拉也发现有巴巴利马。西部非洲的霍德和萨赫勒，远至杰尔马，也使用巴巴利（或蒙古）马。但是从基督纪元开始之时起，骆驼取代了马作为穿越撒哈拉的交通工具。骆驼是更能抗耐沙漠艰苦条件的动物，它对于从塔克鲁尔远至加奈姆建立苏丹人的统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萨赫勒地带到处都饲养骆驼，人们用它运输食盐和围捕奴隶，更不用提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了。[38]

原始文明的特点

以我们目前对苏丹地区各族的了解为基础，人们对他们与他们的北方伙伴——柏柏尔人和马格里布人——之间的商业往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种商业往来有损于黑人社会本身内部的本地贸易；而萨赫勒地带的大国与热带大草原和森林地带各地之间的关系，更是受到损害。[39] 在这方面，可用的文献资料不多，而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也无助于我们弄清情况。然而，我们可以分析在柏柏尔人和马格里布人与苏丹地区黑人各族之间通过穿越撒哈拉的往来进行接触而产生的势力均衡中黑人国家的处境。最普遍的印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遭到装备更为精良的北方国家的大量剥削，这些北方国家拥有从

[37]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11章、第21章。
[38] 关于各种动物的使用和它们的重要性，参阅H. J. 于戈，1979年。
[39] 参阅本书第14章。

充满各种最新式发明的地中海世界传入的种种先进的工具和技术。

至少对某些地区而言，诸如奴隶制度这样古老而又相当稳定的现象就足以表达上述情况。很多商业网看来是由负责开创主要商路的马格里布人和撒哈拉柏柏尔人老板建立的。他们既出现在北方的口岸也出现在商路沿线，商路沿途散布着许多补给站。为争夺商路的控制权发生过残酷的斗争。当时的大国努力确保它们本身感到满意的安全条件，以便有秩序地进行经常可赚大钱的贸易。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由于各种情况都有利于北方人，随之发生的贸易不平衡也就有利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苏丹地区诸国的表现又如何呢？可以从三个层次观察黑人国家的活动：它们力量的增强；对它们所管辖地方的实际控制；它们采取符合本国人民利益的政策。

巴克里关于加纳国王和考考（加奥）国王的描述，提供许多细节说明这两个王国的君主制度如何得到加强，促使人民对国王崇拜，加纳国王以典礼服饰华丽著称：只有他和王储才有资格穿缝制的服装；他还戴镀金的帽子和头巾、项链和手镯。国王在令人难忘的仪式环境下当众执行审判。这种仪式有严格的礼仪规格，对此，巴克里有非常详细的记述。他提到一个因其宗教含意而显得极为重要的习惯做法：当国王来临时，他的臣民们匍伏在地，向自己头上撒土。[40] 但是穆斯林可以免掉这种习俗（它不符合伊斯兰教教规），他们只要拍掌致意。最后，对国王葬礼举行的突出壮观的仪式记述下来的有：把仆人同君主一起埋葬的习俗；向君主献祭牺牲和奠酒；荫蔽国王陵墓的圣树，和它们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使君主政体成为人们心目中值得崇敬的神圣制度。

关于考考（加奥）国王，巴克里说，他用膳伴有一种专门仪式：妇女随鼓乐声翩翩起舞；国王用膳时全城中止一切事务；用大声喊叫向公众宣告御膳完毕。[41]

135

神圣的王权看来是苏丹地区黑人大国的文化特色，至少在伊斯兰时期是如此。有人曾试图用这种类型君主制的特征来支持传播论的主张。但是，从中世纪的苏丹地区所面对的是一个比较一致的穆斯林世界这个背景来看，这种制度还是一种本地特有的事物。意味深长的是，阿拉伯地理学家们并没有费笔墨来描述像塔克鲁尔的君主那样已经伊斯兰化和成为整体一分子的统治者。所以，这样一种制度也可以看作是这种社会统治自己国家的有效工具，像加奥和加纳这样对广大地区行使霸权的王国，情形尤其如此。

苏丹地区诸国的国王在自己国家内有威信与权力，他们以适合本国情况的制度牢固地统治自己的国家；掌握对外关系的本领也并非一窍不通。自从兰图纳人在3/9世纪建立奥胡达古斯特起，柏柏尔人就在那里统治，加纳同这些柏柏尔人的关系可以说明这种外交才能。从2/8世纪后期起，加纳的统治者向四面扩张他们的疆界。在沙漠的最南边缘建立一个柏柏尔人的商业中心有利于同北方进行贸易；从这个角度看，奥胡达古斯特城很有其存在的必要。同时，这些商人的作用又不得超出与加纳主权一致的范围，需要他们在交易中充当的不过是代理人或中间商的角色，这种交易的真正南方终端当然是加纳。商人们的要求逐步升级和兰图纳人在奥胡达古斯特力量的加强，都可能对加纳国家

[40] J. M. 库奥克，1975年，第90—100页。
[41] J. M. 库奥克，1975年，第108页。

构成威胁。4/10世纪至5/11世纪时加纳国力达到顶峰。这说明为什么要设置一个索宁克人总督以控制拉图纳人的权力。索宁克人的管理看来是非常有效地达到了它的预期目的，因为黑人一直控制着奥胡达古斯特的局势，直到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恼怒他们与加纳结盟，于446/1055年毁了此城为止。㊷

索宁克人之所以能控制政治局势与他们对自己管辖区内的整个经济部门实行真正的箝制是分不开的。这个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源源不断地获得有关其繁荣源泉的情报。加纳的统治者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实行严格而有效的控制，特别是关于黄金的来源和如何获得黄金。有可能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久了。诸如黄金的"哑巴交易"这样的事情，甚至在非洲以外都广泛流传，它除了别的作用外有可能是用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㊸

136 加纳君主为控制撒哈拉以南商业交易的源泉，实行了一项明智的政策：他对进入或运出其领土的货物征税。在盐的交易上，商人须两次付税：运进时交纳一个第纳尔，运出时再交纳两个第纳尔。这样，加纳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产品——盐的销售中心。据巴克里的记载，加纳君主把所有开采出来的块金拥为己有，以防止黄金价格暴跌。㊹ 由于深深懂得加纳处于枢纽地位的经济机制，加纳君主一直想保持对像黄金之类关键性产品的垄断。于是，黑人世界组织起自己的贸易经济，以抵挡产盐者的势力，盐是用来交换黄金的。

既然如此，那么贸易和它所需要的整个经济交换体系很少可能像有些人经常设想的那样是由利比亚人和柏柏尔人的混血种传给加纳黑人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利比亚人和柏柏尔人混血种传给加纳的不仅是进行贸易的思想，而且还有进行贸易的技术（包括奴隶贸易），从而促成了加纳国家的诞生。苏丹地区诸国的统治者对他们本身的商业部门施加的控制，说明这样的假设不值一驳。加奈姆的塞富瓦人的事例在这方面颇能给人启137 发，当加奈姆伊斯兰化时，塞富瓦人从扎加瓦人统治者（杜古瓦王朝）手中接管之后，就认识到该地的宗教发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主要以奴隶贸易为基础的经济。要害在于禁止把自由的穆斯林变成奴隶。正如D.兰格在其论述5/11世纪至6/12世纪伊斯兰教发展和加奈姆政治变革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塞富瓦人继续实行一种政治－经济统治方式，这使人想起他们的非穆斯林祖先在扎加瓦人统治时期的一惯做法。㊺

苏丹地区诸国的国王们在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中以及同他们与之有来往的所有北方伙伴的文化交往中，显示出精湛的政治技巧。他们利用常去他们国家的穆斯林的才能使局面有利于自己。据巴克里说，加纳国王从穆斯林中挑选自己的翻译、司库和大臣。㊻他把自己政府的一些部门委托给受过良好教育的穆斯林主持，希望从中得到某种效益。作为报答，他设法创造优越条件以便他们奉行宗教习惯。与加奥一样，加纳在王城旁边

㊷ 参阅J. M. 库奥克，1975年，第91－92页所引巴克里著作。参阅本书第13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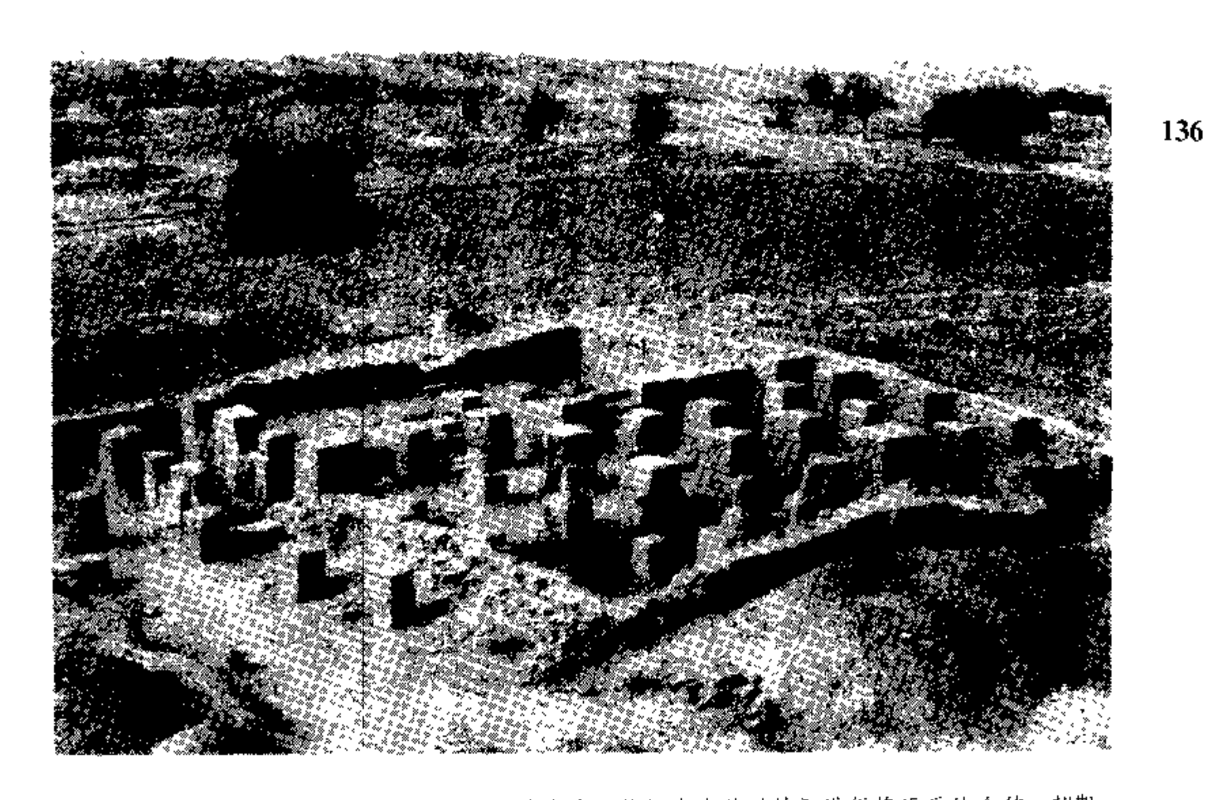
㊸ 关于"哑巴交易"，参阅P. F.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P. F. de－Moraes Farias），1974年。

㊹ J. M 库奥克，1975年，第101页。

㊺ D. 兰格（D. Lange），1978年，第513页；参阅本书第15章。

㊻ J. M. 库奥克，1975年，第99页。

建了一座穆斯林居住的城，城内有12座清真寺，各寺都有自己的伊玛目、穆安津（宣礼员）和诵经人。法学家和学者也住在这个城里。最后，不强迫穆斯林遵循有悖他们宗教信条的习俗。



136

图片5.1.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清真寺，挖掘出土并对墙壁进行修正后的全貌，朝觐墙（即朝向麦加殿堂方向的墙）向着南－西南方向

关于加奥的统治者，一般认为他们也是穆斯林。而且，在其登位仪式上，所授予的君权标志物品，除印章以外还有宝剑和《古兰经》，根据巴克里记载，后者"据说是'信徒们的埃米尔'赠给的礼物"。㊼ 但是，两国君主统治下的人民自由遵循传统宗教惯例这个事实，成为伊斯兰化初期苏丹地区各族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㊽

总的说来，苏丹地区诸国的君主坚持以负责的态度努力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这可以看作是萨赫勒苏丹各国（相当于当时"黑人地区"的已知部分）的一个特点。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它深深扎根于传统宗教之中，而传统宗教往往不引人注目地却又是十分有效地对许多装备显然更为优良的社会所具有的自负和声望提出挑战。

结　论

138

对人口流动的研究，首先需要以严格的批判眼光重新评价所谓黑人远距离"迁徙"这个流传广泛的概念。苏丹地区各族在5/11世纪以前的流动，不像是在广阔土地上大

㊼ 同上，第109页。

㊽ 关于这些问题，参见第3章、第4章、第28章。

规模、无秩序的行动。

第一批重新定居始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当时，昔日繁荣的撒哈拉经过“缓慢的痛苦挣扎”之后已成为不毛之地，令人生畏。占撒哈拉人口大多数的黑人不得不向南撤至萨赫勒地带，寻找有利的农耕环境。他们把自己的故土放弃给了专事放牧的牧民族群。这些族群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同时继续试图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萨赫勒地带各族，使他们经常处于压力之下。后者在那里发现了其他黑人群体，就与他们结成联盟勇敢地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这样就促使大小不等的社会政治单位逐渐发展，它们在伊斯兰教传人苏丹地区之前分布范围东起加奈姆，西至塔克鲁尔。

当穆斯林来到苏丹撒哈拉时，他们发现自己面前已经存在一系列国家，其中有的已经完全建成，有的则正在形成过程中。强大的索宁克人王国加纳统治着散布于塞内加尔和尼日尔两河之间地区的曼德人群体，而后来成为桑海王国的那个部分，其核心正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东部形成。这个王国控制了河道运输以及经由伊福拉斯高原和霍加尔把尼日尔河同北部非洲联接起来的商路。在乍得湖的另一边，萨奥人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获得了他们后来实行征服政策的工具。马和骆驼的使用有助于他们系统地向北扩张，在那里，他们将在卡努里人中间取得自己的地位，卡努里人这时刚开始作为一个族群出现。

2/8 世纪伊斯兰教的传入，带来一个崭新的因素。此后一个世纪，这个新因素大大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增长。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宗教因素，后者注定了要在从马格里布到苏丹地区这个广阔地带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2/8 世纪至 5/11 世纪这个时期对苏丹地区各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他们的君主政体有健全的组织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结构，他们能够理解与地中海和撒哈拉非洲进行贸易的重要性。然而，他们经常关心的是对贸易保持控制，不让撒哈拉的中间商人对贸易和对他们的财源进行箝制。但是，在看出有北方伙伴存在、自己可以从中获得文化和经济好处时，他们对这些人所持观点和宗教愿望采取充分宽容的态度，甚至达到皈依伊斯兰教的程度，同时仍然根深蒂固地保持自己的宗教传统。这样一来，苏丹地区的领袖们，特别是加纳的领袖们，就能经受住他们邻人桑哈贾人的竞争（桑哈贾人是 5/11 世纪阿尔莫拉维德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使得他们虽然遭到阿尔莫拉维德人的猛烈攻击一时威望大落却没有彻底垮台。就这样，这些黑人国家成功地捍卫了它们的个性，从而保证了一个持久文明的基础，这个文明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在马里帝国、桑海帝国以及豪萨城邦中得到体现。

139

〔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人附注〕：

对非洲古代冶铁术的研究，目前发展得很快，人们对有关情况已不再是毫无所知。关于这种工艺如何在非洲得到传播，理论上的大辩论已告结束。经过考古发掘和年代测定，现已证明至少在基督纪元前五个世纪铁就在非洲大陆好几个地方通过熔炉还原法提炼出来。当时的遗址已经找到，不仅尼日利亚有，尼日尔的阿伊尔地区、如今的马里，

以及喀麦隆、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都有发现。当然，上面列举的名单仅仅是目前掌握的。几乎每年新的研究成果都使得整个面目为之改观，原先关于这种工艺究竟是普遍分布还是局限性分布的种种假设不断遭到挑战。从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起，在塞内加尔河曲、林波波河湾和加纳也生产铁。许多研究非洲和马尔加什的学者目前正在从毛里塔尼亚一直到马达加斯加广阔的土地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古代非洲这种使用直接法冶炼铁所具有的技术上的重要意义在多次会议上得到阐述，举例而言，1983年在贡比涅大学、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会议文集已出版）和在第一巴黎大学（会议文集在出版中）举行的一系列会议。[49] 同时，学者们也对冶金术的历史进行研究。修订这类技术词汇（过去一直模糊不准确的太多了）的必要工作也已开始。

[49] 贡比涅会议的文集已经出版，但既不完全也不令人满意。法兰西学院会议的文集在1983年以《非洲冶金术》（*Métallurgies africaines*）书名出版，系《非洲学会论文报告》第九种，由尼科勒·埃沙尔公司出版；至于第一巴黎大学会议文集则尚在出版之中。



讲班图语的各族人民及其扩展

S.卢旺加-卢尼伊戈
J.范西纳

140　居住在非洲大陆靠南三分之一土地上的各族人们，西起喀麦隆－尼日利亚海岸，东抵索马里－肯尼亚海岸，向南一直延伸到伊丽莎白港，他们所讲的语言关系紧密，统称班图语族。

班 图 语 族

班图语族总共有400多种语言，它们源自同一原始语言，叫做“原始班图语”。这一事实已毫无疑问地为词汇的、语音的、词法的（语法的）和句法的相似所证实，而这些相似决非仅仅偶合或相互借用所能说明。必须肯定这些语言有共同的来源。试举一例，下列各种语言中意义为“人”的词是：

杜亚拉语：*bato*	布尚语：*baat*
芳语：*bot*	卢巴语：*bantu*
蒂奥语：*baaru*	卢旺达语：*abantu*
刚果语：*bantu*	绍纳语：*vanhu*
芒戈语：*banto*	赫雷罗语：*abandu*

所有这些词都遵循同一格局。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由词根 *－*ntu* 和表示复数的前缀 **ba*－ 所构成的词形派生出来的。另外，各个语言之间的差异也是有规律的，这从其他方面的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例如，在蒂奥语中，词根第二位的－*t*－，无例外地都变为－*r*－。这就排除了偶然相似或者相互借用的可能性。一份列举500多个词根的原始班图语词汇表已经编制出来，①全部遵循有规则的语音格局。

但是词汇仅是语言的一个方面。各种班图语言的词法（语法）系统中，即使在非常具体的细节上，也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在上述例子中，前缀决定语法上的呼应（一致），它自身属于特殊种类的前缀。相应的表示单数的前缀为 **mu*－，与词根结合构成单数的“人”字。在语法呼应的体系方面，在形容词的构成方面，在所有种类的代词方面，

① M.格思里（M. Guthrie），1967－1971年，收集了已有的资料。请与A. E.梅欧森（A. E. Meeussen），1969年，相比较。

在动词分解为前缀、标志、中缀、词干、添加部和词尾诸部分以及这些成分的作用方面，在不变词方面，在动词派生出来的名词的构成方面，各种班图语言都彼此相似，犹如由拉丁语衍生出来的各种罗曼语言中的语法结构彼此相似一样。事实上已经出版了一部班图语常用语法。②以上关于词法的提法，同样适用于句法和音韵系统。因此一切证据都表明，事实情况是，分布在非洲大陆靠南三分之一广阔土地上的400多种语言都来源于同一种原始语言。这一巨大奇迹的历史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各种班图语言的起源和分支

各班图语言之间关系紧密的现象当然不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早在16世纪初，最先抵达这里的葡萄牙航海家就惊奇地发现把刚果王国的居民与大陆东海岸居民联结起来的语言纽带。威廉·布莱克③在1862年首先判明讲班图语的人属于同一个族群，把它命名为"班图"(Bantu)，因为意思为"人"的词在这个族群里都有类似"Bantu"的结构。自此之后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学者，都对班图语问题发生极大的兴趣，都试图阐明讲班图语各族的起源和流动情况。1886年，H.H.约翰斯顿提出一个理论用来判定原始班图语的诞生地和追溯它在地理上扩展的历史。他在1919年至1922年之间发表的研究报告，是第一部旨在确定各班图语言的发源地并划分其传播阶段的严谨著作。他依靠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判定讲班图语各族的祖先居住在加扎勒河流域，"距杰贝勒河不远，北面在科尔多凡高原以东，西面在贝努埃河和乍得湖流域。"按照他的说法，讲班图语各族首先东迁到埃尔贡山，再从那里迁移到维多利亚湖北岸、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和扎伊尔森林地带。首次大规模进入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则始于公元前300年左右。④

1889年，卡尔·迈因霍夫提出正式的（语音学的）证据证明各班图语言的统一性。从那以后，语言学家——常被称为"班图语言学家"——不断地丰富对班图语族 142 的知识。⑤语言学家们提出两大理论来阐明讲班图语各族的起源。约瑟夫·格林伯格认为讲班图语的人一定是起源于班图语歧异最大的地区。根据这一理论，他追溯他们的起源地到尼日利亚贝努埃地区的中部，到这一广阔地区西北部各种班图语言根深蒂固的地方。⑥

由于有影响的班图语言学家马尔科姆·格思里不同意这个结论，所以这个结论随即受到严格的考验。现在所有的语言学家都承认它是准确的。马尔科姆·格思里认为，"讲原始班图语的人，其诞生地最可能的位置是在班图语最大限度地趋同的地方，这就是说在刚果河和赞比西河的分水岭附近，中心在扎伊尔的沙巴省。⑦两位著名语言

② C.迈因霍夫（C. Meinhof），1906年。一部新的比较语法正在莱顿和特维伦的研究中心编写中。
③ W. H. I.布莱克（W. H. I. Bleek），1862－1869年。
④ H. H.约翰斯顿（H. H. Johnston），1919－1922年。
⑤ C.迈因霍夫，1899年。关于史实纲要和有关参考书目，可参阅J.范西纳，1979－1980年。
⑥ J. H.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1972年。
⑦ M.格思里，1962年。

学家所提出的互相矛盾的假设一直被许多专家用来作为他们自己关于班图语起源和扩展理论的基础

著名的历史学家罗兰·奥利弗认为格林伯格和格思里的假设可以互相补充，他提出了另一个杰出的理论，把班图语从其西部非洲发源地向南部非洲扩展分为四个阶段如下：(1) 一小批接着一小批讲各种“前班图”语言的群体，沿着刚果河（扎伊尔河）各河道从喀麦隆中部和乌班吉的林地向扎伊尔赤道森林以南的林地迅速迁徙；(2) 从事迁徙的各族逐渐结合起来，定居下来，他们的扩展穿过了南部的森林地带，其范围从海岸的一端到另一端，包括西海岸方面扎伊尔的刚果河（扎伊尔河）河口与东海岸方面坦桑尼亚的鲁伍马河两者之间整个中部非洲地区；(3) 讲班图语各族迅速深入到他们早先横向发展地带以南和以北更为湿润的地区；(4) 占领当今班图非洲的其余部分，这个过程始于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到基督纪元后第二个一千年中期方告结束。[8]

自1973年以来，有三批各自独立进行工作的语言学家证明马尔科姆·格思里的论点是错误的，这三批学者都采用了相似的方法（以词汇研究为依据），但是所用的资料不同。其中一批人实际上是用格思里本人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143 因此各种班图语发源于西部非洲的说法已经得到公认。为了探明这些语言的分布和扩展的路线，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找出这个语族的各个下属分支。在历史语言学的比较研究中，首要的任务是作出一个语族谱系图，足以表明该语族的始祖确是下属各分支祖先的直接先人，而这些分支的祖先本身又是下一代语言分支的先人，如此等等。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必须进行大量的比较研究，既要研究基本词汇（词汇统计）又要研究语法现象。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能依据令人信服的论据，提出对班图语系的谱系划分。原因在于语言学家们所说的“趋同现象”，也就是从它们的共同祖先直到现在，各班图语言之间的大量借用情况。有许多相同之处，很难说哪些是借用来的，哪些又是共同分支的先祖时代就有的。这一情况本身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说明讲班图语的各个群体一直经常地同他们的邻人有着密切的接触，实际上他们彼此间从来没有隔绝过。

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使用计算机，依据基本词汇的比较成分或是（在最近研究的项目中）依据语法的比较成分，建立遗传趋异的各种模式。[9] 语言学家现在一般公认有两个主要的班图语集团：西部集团主要位于赤道森林地区；东部集团则从乌干达延伸到好望角

进而言之，属于东部集团的各语言之间比起西部集团的各语言之间彼此关系更为密切。这意味着东部集团的扩展比起西部集团开始得较晚，而发展得较快。这是假定两个集团的变化速度和趋同程度相同，它实际上可不一定真是如此。在时间表的另一端，大家一致认为：有一些小的遗传支系起源于语言史上较近时期，诸如一个刚果语集团和来自大湖区的一个语言集团。晚近的一些研究使得人们已有可能越来越精确地追溯这些

[8] R. 奥利弗（R. Oliver），1966年。数年前，他完全放弃了这一理论。参阅R. 奥利弗，1979年。

[9] Y. 巴斯廷（Y. Bastin）、A. 库珀兹（A. Coupez）、B. 德－阿勒（B. de Halleux），1981年。在趋同现象方面，将两种资料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实际上是肯定的结论。西部班图语集团与东部班图语集团有十分明显的不同。在前者中间，西北集团与中央森林集团又显然有别。计算机研究工作随着新资料的收集而扩展。

小支系的起源。

专家们并不等待这些研究的结果才来划分班图语言的支系。早在1948年，马尔科姆·格思里开始应用他称之为实用的分类体系，根据对已有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把一些地理上邻近的语言集团分成“相似的”语言区。[10]这样的划分只是临时的，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但是它们既方便又实用，因而现在仍常被应用。每个语言区指定用A到T之间的一个字母代表，后面所附的第一位数码代表较小的语言分类，第二位数码则代表具体语言。如 A_{70} 代表所谓的“帕胡因”语言集团，而 A_{74} 则代表芳族语。 **145**

一眼就可看出，这种分类方法没有什么历史价值。这个事实得到了证实，因为人们作出越来越精心的努力来设计出可靠的历史分类法。即使是标上数码的各个分支语言集团也不总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而且，实用的分类法不能用作历史论证的依据。譬如，加蓬的班加语和马拉博岛的布比语同属 A_{30} 语言集团，却不能据以表明各种布比语来源于班加人所居住的海岸地带，也不能表明班加语源自布比人居住的岛屿。换言之，这种分类没有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

然而概括地说，有些语言区比起其他语言区显然更为密切地符合于语言遗传情况。在那些已证明没有价值的语言区中，可以提一下B区（加蓬/刚果），这是马尔科姆·格思里原先划分的D区，它早已被重划在D区和J区，而且根据稍欠说服力的证据又被重划在F区及D区。虽然一种没有历史价值的分类法应用起来有很大缺点，但是在班图语族的分支体系确凿无疑地建立起来之前，语言学家依然不愿使用一种以遗传资料为基础的符号和术语的分类系统。

建立这种系统将是一项旷日费时的工作。首先是因为现有的资料，即便是就基本词汇而言，也只包括所有班图语言的一半左右。然而要想得出权威性的结论，至少要求有一套正确的语言符号，有更广泛的词汇和每一种班图语的语法大纲。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充满信心地进行工作。因此，为了进行真正有把握的工作，基本要求是有一整套的字典和语法，而目前有的却寥寥可数。讲班图语各族的语言遗产大部分迄今未经记录整理。另外一个困难在于存在这样的情况：在班图语言的大部分历史中，它们是从一个完整的语言核心，经过一种或少数几种语言的分化过程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各语言集团无法彼此进行比较，不像诸如印－欧语系的情形那样。从长远来看，为了摆正各个班图语言在历史中的恰当位置，需要经过长期积累，对几乎每一种班图语都获得详尽的知识，尤其是对西部集团。[11]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语言学与历史 **146**

语言学资料具有历史意义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属于单一语族的各种语言分布在如此广大的区域，这一现象背后，必然有着非一眼就能看透的某种意义，确切地说它究竟

[10] M.格思里，1948年。

[11] 必要的步骤在B.海涅，1973年，有极好的叙述。参阅B.海涅（B. Heine）、H.霍夫（H. Hoff）和R.福森（R. Vossen），1977年。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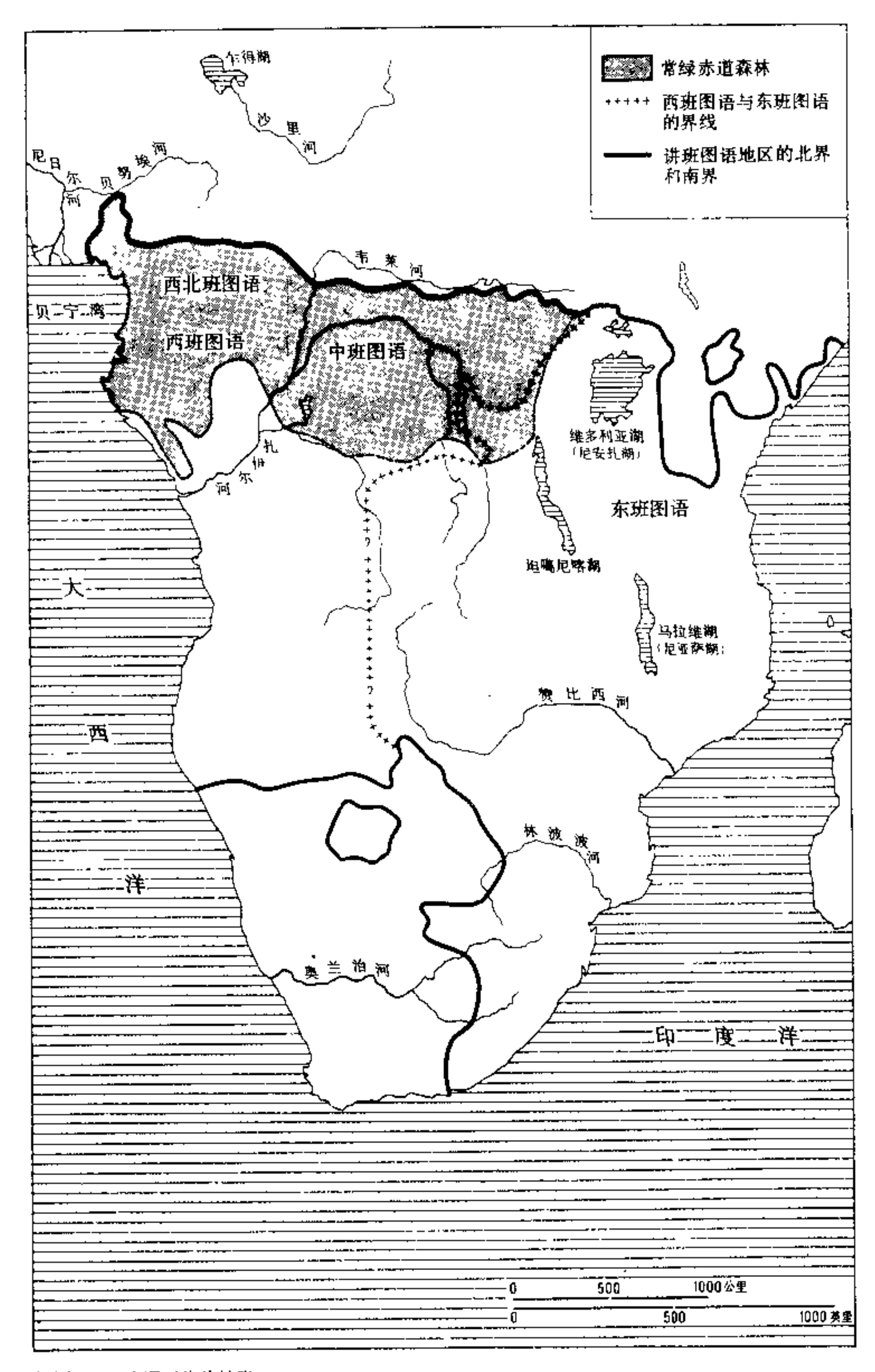


插图6.1 班图语族的扩张

是什么呢？所有学者都假设我们所论述的各种班图语言其传播是由于讲这些语言的人广泛迁移的结果。还有一种倾向是把语言、文化和种族并列甚至混淆起来。尽管班图语的扩展在地理上从一个原始核心地带延伸到非洲大陆的边界，而且在不断扩展中度过了好几千年，仍有许多人希望能重新发现一个至今尚存的班图社会、班图文化或班图哲学。这一类的设想究竟有多少根据呢？

把语言、文化和种族等同起来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这是很容易证明的事情。举例而言，比拉语是住在扎伊尔东北部森林中务农和捕捉野兽的居民社会讲的语言，同时也是与这些社会或毗邻的种植庄稼的部族生活上有密切来往的俾格米狩猎者讲的语言。因此两个完全不同的部族群体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居住在热带大草原上的比拉族农民也讲同一种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与森林地带的比拉人截然不同。⑫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语言甚至于无法与一种单一的文化联系起来。相反，相同的文化和相同的生活方式却能在毗邻的社会里讲不同语言的部族中同时找到。森林地带的比拉人和瓦勒人生活方式相同，后者讲的却是一种中苏丹语。上面讲到的俾格米人同邻近的讲苏丹语的俾格米狩猎者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而俾格米牧民的生活方式则同讲中苏丹语、班图语乃至于讲尼罗特语的其他牧民相似。因此语言与文化之间并无严格的对应关系。

当然，应该指出，上面这种情况是容易解释的。俾格米人采用了与之有来往的务农部族的语言，而原先住在森林地带的务农部族，在迁到热带大草原后，采纳了大草原各部族的文化，除非这个族群原先是居住在大草原，而后来适应了森林地带的生活方式。但这是无关紧要的。主要的是，原来只有一个居民社会讲那种语言，因此，文化、语言和种族的一致性才是有根据的。当然可以举出很多实例，说明文化、语言和种族往往有互相重叠的情况。人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最初讲比拉语的居民社会决非它所属种族中唯一讲比拉语的群体，甚至也不是唯一有其特定生活方式、社会形态或文化表现的群体，却必然是与讲其他语言各族分享这些东西。

虽然当初确是有一个班图社会，讲原始班图语，属于某个具体的“种族”，有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但是问题仍然并不完全清楚，因为资料表明，虽然这个社会的主要职业是捕鱼，可是它的某些分支却可能以务农为生。而且，关于原始班图文化，我们的唯一知识来源是各种语言。很可能，当时是存在着类似比拉人那种情况。实际上那种情况后来必然存在，因为有些土著居民社会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语言而开始讲某种班图语。 147

另一种假设认为班图语族的扩散是由迁徙引起的，这种论断并非如乍看起来那样无懈可击。举例而言，各种罗曼语言并非通过古代拉丁发源地居民的大规模迁徙而传播开来。有一系列社会的和语言的机制可以导致各种语言的地理位置的变迁，其中最重要之一为语言本身的变化。一个族群可以学习某种外来语言，成为掌握两种语言的族群，然后放弃自己的语言而采用了外来的语言。加蓬的塞克耶尼人情况便是这样。他们同时使用两种语言，讲姆蓬圭语，而开始放弃他们原来的语言。开普省西部和纳米比亚南部的居民也是如此，他们丧失了科伊语和桑语，现在只讲阿非利堪语（布尔语）。这些变化

⑫ M. A. 布赖恩（M. A. Bryan），1959 年，第 89—90 页。

是社会文化势力的消长关系造成的。各种罗曼语的传播是基于古罗马帝国的扩张，中国南部的汉语化是由于中华帝国的兴盛，汉族人民不断自北而南的移民。有时人口也起一定的作用。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被人数更多的被征服臣民所同化，丢掉了讲法语的习惯。同样的情况以前也曾在诺曼底发生过，诺曼人在那里采用了法语。商业或文化的优势也可以影响语言的发展。塞克耶尼人采用姆蓬圭语，因为这是商业用语。法兰西在欧洲的文化优势造成18世纪比利时盛行法语。总之，人们可以看到，商业的、社会－政治的、甚至宗教的联系，常可产生新的共同语言，由某种素有声望的语言派生而来，例如，古希腊共通语、克里奥尔语和萨比尔语。从各种班图语言涌现出来的大量趋同现象看，上述类型的情况可能发生过不止一次。在较为晚近的时期，值得一提的有属于克里奥尔语类型的一些商业用语——林加拉语、斯瓦希里语和莫诺基图巴语。

为了对班图语言的扩展获得更确切的解释，历史学家必须使用对比类推的方法，经常对有关的一整套社会－语言机制胸中有数。他们不能机械地把一切都说成是迁徙所致。不论如何，根据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人口密度的大致情况，从大规模人口移动方面立论是会把人引入歧途的。局部地区的人口优势，再加上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的优势，更可能有助于说明这种现象。而且，各种班图语的传播历时如此长久，波及地区如此广泛，我们不能不假设，我们用对比类推方法所知道的那些因素，即令不是全部，也是相当部分地在某个时期起了作用。

事实上，语言学方面的资料只在一个方面有着直接用处，即依据一个讲原始班图语的社会使用的词汇所透露的情况来重新构想这个社会的实况。而词汇当然反映的是整个时期，而不是反映某个时刻。原始班图语本身在演化，分裂成许多不同的方言，并变得与其他有关的语言分歧更加显著。现今可以利用的班图词汇⑬ 指的是狭义的班图语集团，即在时间上距我们最近的“普通班图语”。现有的资料，虽可方便地从形体上再现原始班图语词汇，但从字义上说，就不总是这样了。因为字义随着时间也发生变化，如今在一种语言与他种语言之间可能变化很大。例如，词根 **kùmù* 在东部集团意为“治病者”甚至是“预言家”，在西部集团则意为“酋长”，而在西部某个语言集团中（属于A_{70} 诸语言）它的意思是“一个富有者”。当然可以把这些意思贯穿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原始班图酋长既是一个富有者，又是一个治病者和预言家。但这样的结果可能有些牵强附会。在这个具体实例里，我们只好选取“领袖”这个意义，它虽然正确，却有点笼统。

然而，人们从古班图语词汇可以推断出，讲原始班图语的居民社会种植薯蓣类作物、其他某些块根作物、甚至也种植谷类作物，山羊是已知的他们所饲养的唯一家畜。这个社会的人们从事狩猎（特别是猎取非洲疣猪），但他们的专长是捕鱼。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原始班图语可以是生活方式相当不同的两种社会的共同语言。在社会的内部组织上，亲属血缘关系是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社会有其专业人员、领袖和专职的宗教神职人员。祖先崇拜和巫术信仰都是根深蒂固的。人们甚至可以想象那些贡献妻子者

⑬ M.格思里，1967－1971年，第2卷；A. E. 梅欧森，1969年。

集团对那些纳娶妻子者集团的态度。但是对词汇的研究方面，仍有大量待做的工作，如果一切进行顺利，我们可以期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会有远为更加详细的论述。

结合考古资料和有关班图社会发祥地的词汇，使我们能够提供班图语开始扩展的时间。我们现在所论述的班图社会是一个已经从事农业生产（诸如谷物种植）但还没有掌握金属冶炼技术的新石器时代社会。这个线索使我们能把讲原始班图语的时间缩小到公元前1000年（或者更早一些）至公元前400年之间。⑭

149

扩展本身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东部非洲它甚至直到19世纪还没有完全结束。⑮ 虽然如此，最早的阿拉伯旅客已经从非洲东海岸带回班图语的词汇。因此可以肯定，公元8世纪左右，一些讲班图语的社会群体已经在非洲的印度洋沿岸安家落户。这就说明班图语的扩展不但遍及非洲大陆的三分之一土地，而且在时间跨度上也长达两三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这一扩展的先后过程，我们所能找到的仅仅只是非常一般的、而且常常是歧异极大的材料，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154



图片6.1 鲁塔雷(卢旺达境内)的香蕉种植园

⑭ T 肖 (Thurstan Shaw), 1978年, 第60-68页、78-80页; P. 德-马雷 (P. de Maret) 和 F. 恩苏卡 (F. Nsuka), 1977年, 研究了金属冶炼问题。

⑮ 一个恰当实例是坦桑尼亚的姆布圭地方。

语言学与考古学

学者们所遵循的方针是明确的，这反映在班图语扩展的开始是如何得到确定的。必须对词汇细加研究，以找出可由考古现场的发现加以证实的信息。再者，有关班图人大规模迁徙的考古证据可以与关于班图语传播的已知情况相对比，当然，结论不是那么确凿。

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应能提供答案。然而，鉴于人们对印－欧语系的所有各种语言都已有了详尽的阐述，并且所进行的考古发掘远比非洲的多，而印－欧语专家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仍然众说纷纭，歧异甚大，那么重新构想班图语传播扩展过程的工作，肯定既非易举，也非一蹴可就。有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困难可以在这里提一下。某个早铁器时代遗址其建立年代可能是在班图语最初扩展运动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只有非洲靠南三分之一土地上讲班图语各族才晓得如何炼铁。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铁器时代的遗址全都是讲班图语的居民社会所为。东部非洲有证据表明，一种早铁器时代的陶器曾经非常迅速地传播开来。由于这些遗迹都在东班图语的扩展区域，这种一致性（它纯属偶合）被视为是一种证据说明这些地方是班图语扩展在考古学上的线索。[16] 可是，首先，在讲班图语非洲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极少有所发现，其次，下述说法同样可以讲得通：铁的这种迅速传播是铁匠和陶工们的业绩，他们在定居的总人口中恐怕只占很小比例。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下列事实：考古学并不能证明制造和使用某种陶器、种植某株谷类，或制造在某个遗址发现的金属、石质或骨质物品的人讲的是什么语言。但是，语言学的和考古学的资料可以进行比较，相互关系越明显，则作为证据的价值越大。

150

这里我们不对早铁器时代的遗址进行探讨，因为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二卷已有若干章作了评述。这里只是提一下以下论断就够了：讲班图语各族的最早遗址无疑是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铁器时代的遗址，是同讲班图语各族留下的踪迹有关。[17]

讲班图语各族的扩展

对讲班图语的人从他们的故土向外扩展的解释，学者们提出过两种理论。一种理论认为：他们放弃不稳定的狩猎和采集经济，改而从事农业经济，从而引起人口激增，于是导致人口迁徙，向外寻找生存空间。考古学家梅里克·波斯南斯基在六十年代初期发表著作提出：从西部非洲迁往中部非洲的班图各族已进入农业社会，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后200年之间，从印度尼西亚引进的农业技术（种植香蕉和薯蓣）传播给中部非洲

---

[16] 详见 D. W. 菲利普森（D. W. Phillipson），1977年，第102－230页，特别是第210－230页。

[17] 参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5章和第27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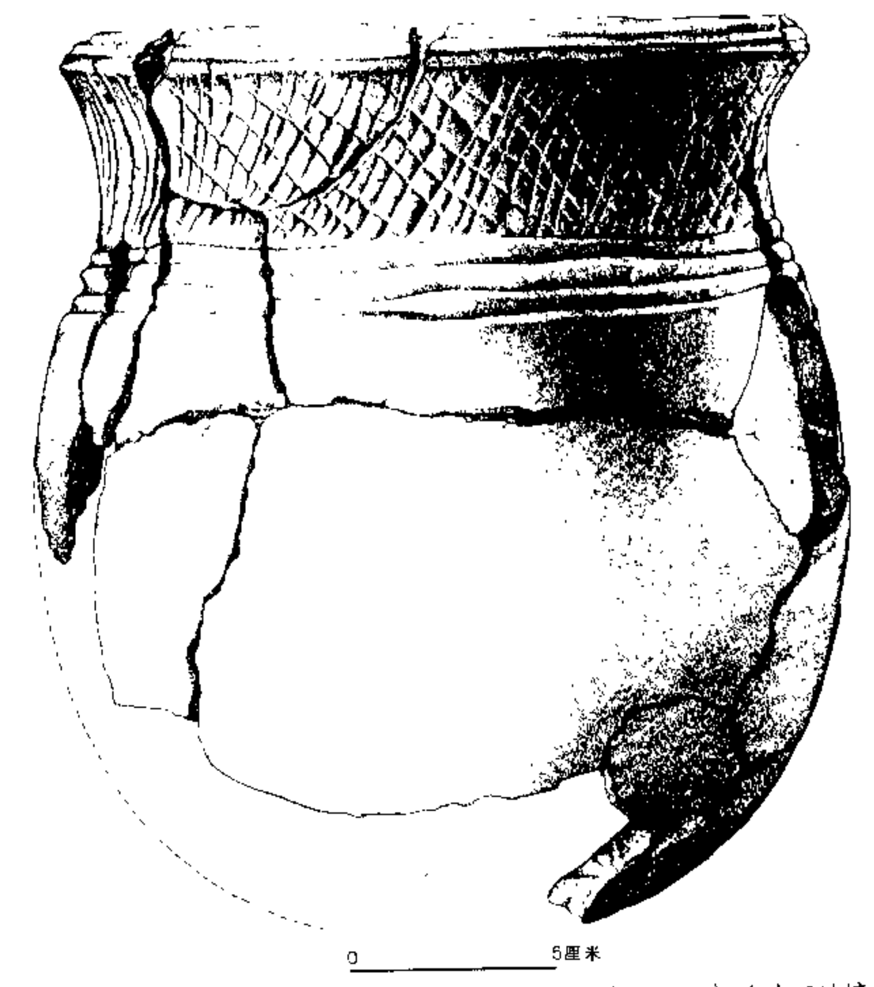


插图6.2 一件几乎完整的早铁器时代的陶器标本(乌雷韦Urewe),在卢旺达境内鲁塔雷地方的鲁伦博遗址称为穆塔拉一世萨穆盖希陵墓的洞穴上面发现的(根据F.范-诺顿,197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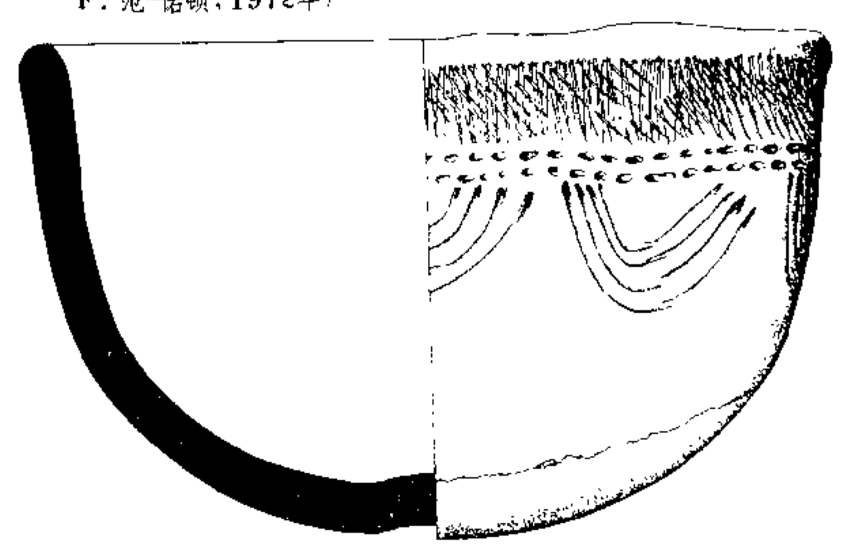


插图6.3 早铁器时代的陶器(乌雷韦Urewe),在卢旺达境内卡布耶地方发现(根据F.范-诺顿,1983年)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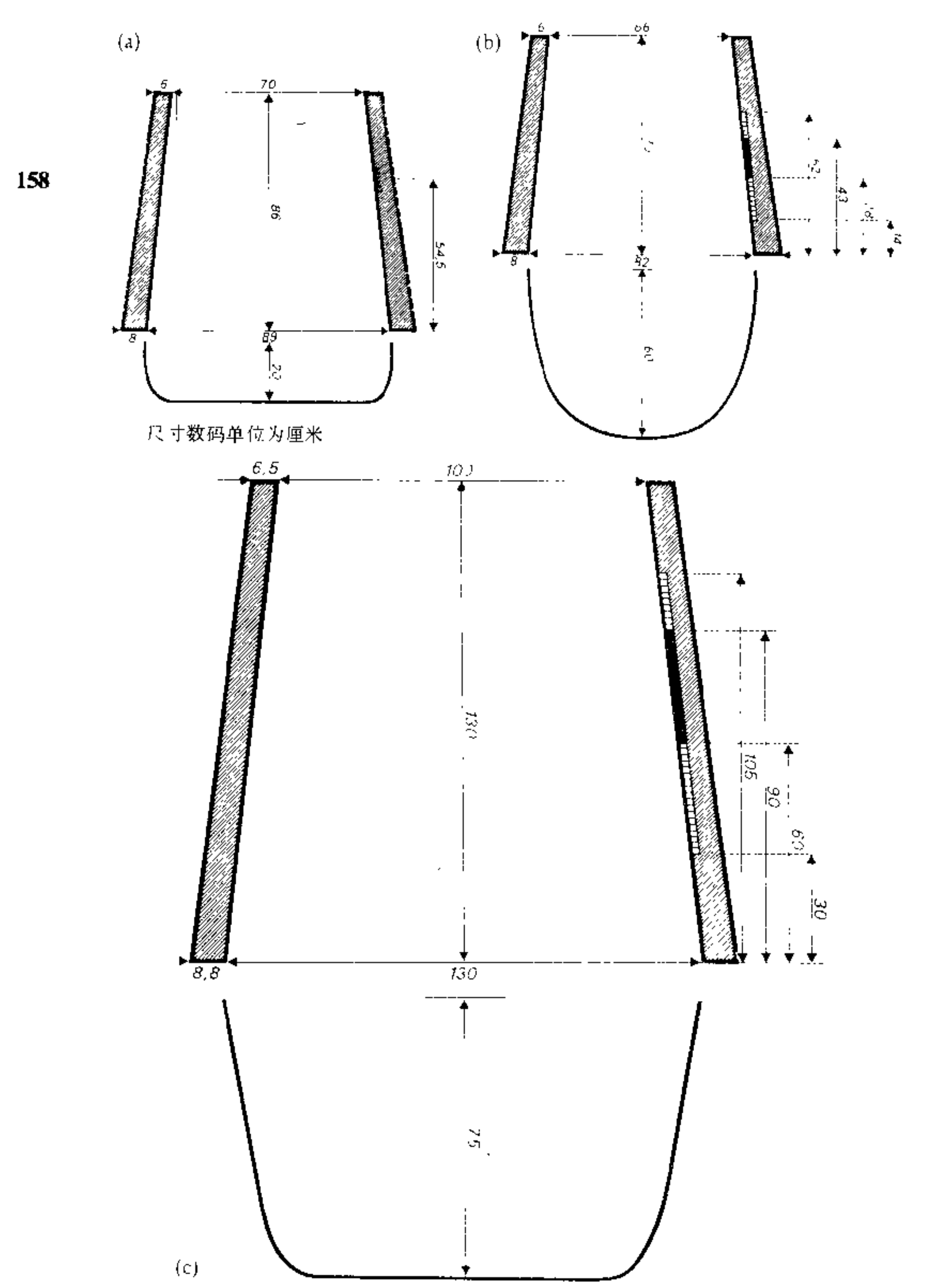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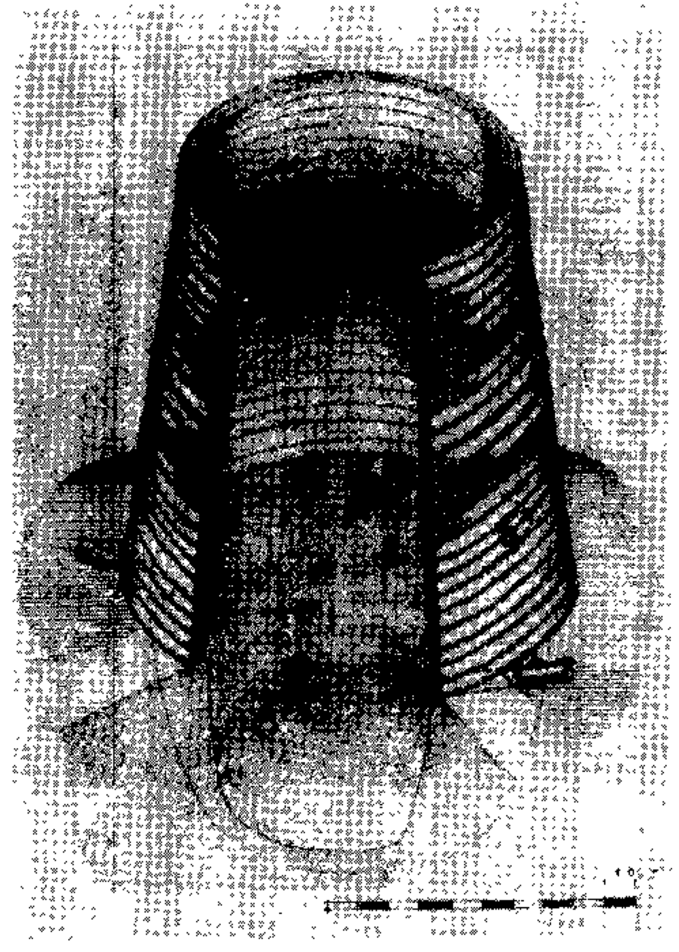


插图6.4 卢旺达境内布塔雷地区的早铁器时代的三个经复原的炼铁炉的剖面图：
(a) 吉萨加vii +255；(b) 卡布耶xxxvi 32；(c) 穆亚韦辛泉I（+380）

156



(a)

(b)

图片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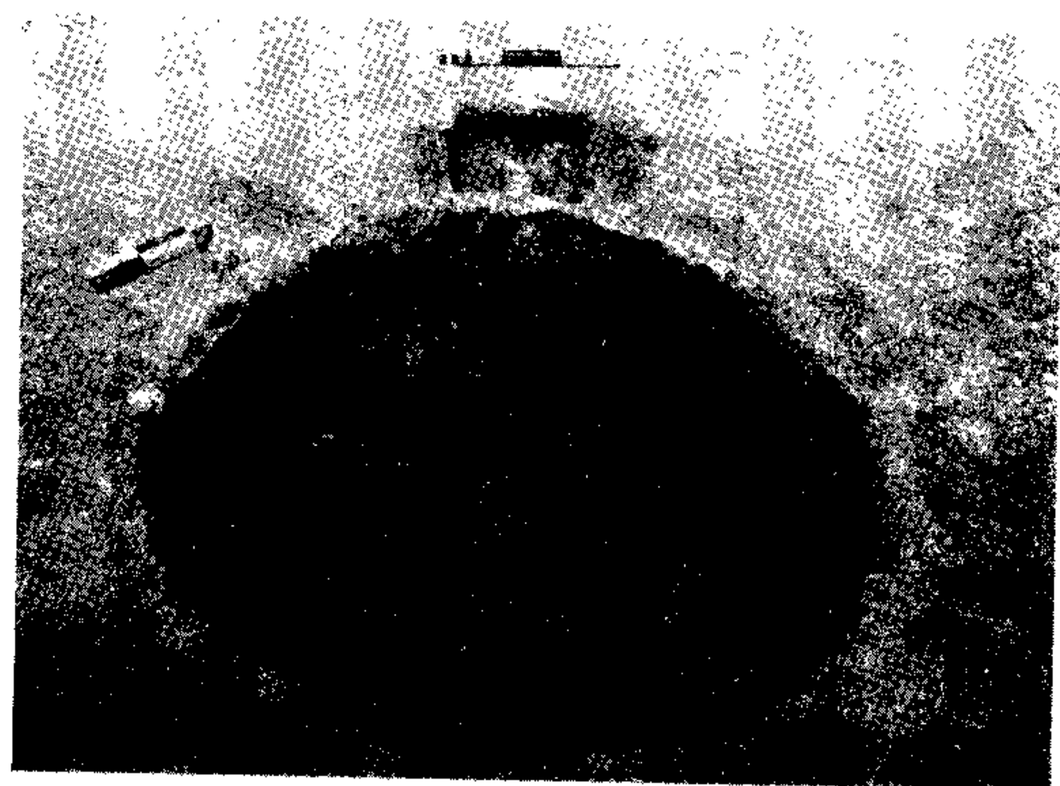
(a) 在卢旺达发现的一个早铁器时代的炼铁炉的复原图：尼亚鲁导盖亚 I

(b) 一个早铁器时代炼铁炉的发掘：卡布耶 XXXV

157



(c)



(d)

图片 6.2

(c) 一个早铁器时代炼铁炉的发掘:尼亚鲁亨盖里 I

(d) 一个早铁器时代炼铁炉的发掘:吉萨加 VI

森林地带的居民之后，迁徙的势头就越来越大。⑱ 另一种理论则建立在征服观念的基础上，把讲班图语各族的扩展与铁器时代的开始联系起来。据称，铁的使用，由于铁制工具效率更高，促进了农业生产，从而使讲班图语的人得以统治他们所定居地区的各族人民。这个理论的主要代表 C.C. 里格利声称这些讲班图语的人"是占优势的少数民族，靠手用梭标打猎，他们作为肉食供应者享有无上威信；……因而不断吸引新的追随者，不断摆脱新的流动的冒险者团伙，终于整个南部非洲次大陆都使用铁器，并讲班图语"⑲ 从目前这个一千年后半叶人口迁徙的格局来看，或许可以引用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理由来解释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期间讲班图语各族在赤道以南非洲不停顿地流动的现象。饥荒、寻找更适宜的生活环境（也就是更好的适于农耕和放牧的土地）、瘟疫、战争、以及纯属冒险的精神，都可以是曾经促成早期讲班图语各族迁徙的动力，但是这些因素至今未曾受到重视。

对于人口激增理论和征服理论，应当指出，农业经济的引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立即在赤道以南非洲代替了以前的狩猎和采集经济。实际上，这两种形态的经济当时是同时并存、相互补充的，直到今天在非洲某些地方仍然是如此。因此不能把农业经济的开始看作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它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不会立即引起一场人口激变，从而导致班图人为了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大规模迁徙。铁的使用只是逐渐改革了农业，因为在班图非洲，当初只生产很少量的铁。在早铁器时代，炼铁技术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使农业发生革命。直到本世纪之初，大部分林地和丛莽的开辟还是靠烧荒来完成，而木棍挖掘的耕作方式在非洲一直存在到进入 20 世纪。早铁器时代情况岂不更是如此！冶铁技术无疑地改进了那个时期讲班图语的人所用的武器。具有铁尖的梭标和箭矢是最突出的新武器，但这些武器发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可能并不认为它们比石镞、骨镞的箭、或比木矛和木棒更为有效，新武器并没有使它们的持有者更富侵略性。

151

讲班图语各族的扩展并没有达到大批移民离开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规模。它极其可能是少量人从一个村落迁移到邻近村落，有时又迁回来。这个过程一再重复，直到后续的世代达到了赤道以南非洲的所有地方，跨越的时间或许是上千年甚至更久。不应当想象讲班图语各族的迁徙会是直线式进行，朝着一个方向，永远是向前的运动。相反，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人口流动必然是各个方向都有。

考虑到这一切情况之后，对于讲班图语各族的扩展，我们今天还能作出哪些肯定性的判断呢？讲原始班图语的地区接近于一条生态分界线，因此就居民们能加以开发利用的环境而言，是在比较富庶的地方。过剩人口的迁徙，至少是小规模地，可能在这种地方发生。另外，也有整个村落迁徙的情形，这是大约每隔 10 年左右，人们为了更靠近新开垦的土地而进行的搬迁。他们深入森林地带极其可能是个缓慢的过程。西北班图语与赤道森林中央的班图语歧异悬殊。⑳ 它们的分布表明是沿着三个主要方向传播开来。

---

⑱ M. 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1964 年。

⑲ C. C. 里格利（C. C. Wrigley），1960 年，第 201 页。

⑳ 在词法和语法的分类上，都有着清楚的分界线。

第一个方向是沿着海岸向南，渡海传播到马拉博岛。在这第一个方向的传播中，他们甚至可能达到了加蓬河口。第二个方向的传播采取的方式是沿着森林的边缘向东挺进，至少达到了桑加河。第三个方向则是从森林边缘的各个地点进入森林，或是由于农业的正常进展，或是由于桑加河上渔民们活动的后果。

152 讲班图语各族的第一个成就是掌握了扎伊尔森林的环境。渗透过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北向南，讲班图语人口只是沿着各河流和窄狭的冲积地带前进；第二阶段是班图农业人口沿着一个广阔的面向前推进，逐渐破坏原始森林。

关于讲西部原始班图语地区早期的农业和冶金史，我们所知甚少。但是曾有人提出扎伊尔的赤道地带是一个独立的农业发展中心，其发展是由于非常重视薯蓣的种植和棕榈油的生产。[20] 在马拉博岛，以棕榈油生产为基础的农业发展开始于6世纪，而在更广泛的赤道地区，农业可能也就在同一时期开始。在扎伊尔的斯坦利湖/开赛河地区曾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粗重的石镐、石圆盘、磨光的石斧、石锛和陶器。据信，讲班图语各族当时所种植的是薯蓣和油棕，但并无直接的证据，因为这些生产活动没给考古学家留下什么遗迹。

在扎伊尔有两个主要的铁器时代文化传统，即开赛河/斯坦利湖传统和沙巴/东基伍传统。在讲西部原始班图语的地区（即开赛河/斯坦利湖传统地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对成层遗址进行过挖掘研究，虽然在地表上曾发现大批早铁器时代的"凹底"陶器。遗憾的是，一直还未能取得本地区的等距离日期，但有理由认为在那里铁的使用不会比在沙巴/东基伍传统地区早很多，而通过碳－14测定得出的时间，沙巴为公元4世纪，基伍为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沙巴地区的成层遗址提供了铁器时代开始的明确年代，而基伍地区的成层遗址则没有，因为在卢旺达和布哈亚（坦桑尼亚），类似的考古遗址所测定的年代要早得多，大约为公元前300－500年。

在讲西部原始班图语的地区，农业革新是从地区内部开始的。农业革新虽能促进人口流动，但客观地分析，可以断定这种流动大部分是发生在本地区范围之内。赤道的自然环境不利于这种流动，直到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之末，在两个主要班图语集团之中，西班图语大概是比较稳定。虽然在这个地区证据相当贫乏，班图人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肯定已在使用铁器，但他们对铁的应用不大可能已发展到那种程度，即种植农业的进步足以造成人口激增，导致向外扩展，或者是使作战方法起了根本性变化足以鼓励讲西班图语的人跑到他们自己的区域以外去从事征战。

154 尽管如此，各班图语集团的全面分布情况说明，必定有过一个强大得多的向东推进，沿着森林边缘把讲东班图语各族的先辈带到远至大湖一带。这一理论既没有被其他资料证实，也没有被其他资料否定。在这些地方没有发现东班图语，虽然当今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东部所讲的一些语言，有很大可能属于这一语言集团。唯一可能的情况是的确存在一个东部班图语集团。况且，在此最初阶段，西部班图语集团所属其他语言的祖语，特别是中央森林班图语集团的祖语，向着乌班吉和扎伊尔以远的地区进行扩展。假

[20] J. D. 克拉克 (J. D. Clark)，1970年，第187－210页。

定由于存在着世界第二大沼泽无法径直前进，那么必然会经过栋戈以北的北线，或是经过桑加河口以南的南线。属于这个语言集团的各种语言，其地理分布情况表明所选取的是南线，而阿利马河和森林地带之间，扎伊尔河/刚果河右岸一带，人们可能曾经使用这种祖先语言。随后这些语言被传播到森林各处，或是经由渔民沿着本地区呈扇形分布的各条河流前进，或是经由牧民逐个村庄扩散。

阿利马河和森林地带之间的地区是森林和热带大草原交织的混合地带，和讲原始班图语社会所曾居住过的地方相似，但是，各种班图语言所进入的是各不相同的生态环境，这一发展情况不可能不带来扩展行动的某种中断，或至少是减慢速度。举例而言，某些群体不得不逐渐适应缺水的大草原生活，诸如巴泰凯高原的情况。相反，在东部则水量过多，某些社会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于沼泽地带生活，或是就在当时，或是在很久之后。但是这些语言在多数情况下还是由那些喜欢定居森林地带的人讲的，他们或是从事农业或是从事渔业。然而也有些语言流行于开赛河下游地区，那里有极其丰富的水产资源，但森林却已缩小到只剩下沿着河道的狭窄林带。这又是另一种大草原和森林交织的生态环境。最后，在此第二阶段期间，还有一些别的语言在南面和西南面沿森林边缘地带发展起来。这个区域的森林是南北走向，到了扎伊尔河下游地区才重新成为森林与大草原交织的区域。 **155**

在这部分讲西班图语的地区里没有遗留下任何当地土著语言的痕迹。土著语言遭到同化这一现象应如何解释呢？由于讲班图语各族定居在村庄里，这使得他们比起定居程度较差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者，有着无可否认的优势。村庄成为周围地区的中心，其语言的影响随着地区结构的重新组合而相应地增大。村庄促进了贸易（农产品的贸易！），也许也促进了彼此联姻。并且可能还出现了到此观光的人，他们纯系出于满足好奇心的愿望，对他们来说村庄就是一个大都会。在森林地带的环境中，这个情况是完全说得通的，并且与渔民沿着主要河流和海岸迅速传播各种语言的说法很相符合。这些人流动性很大，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又倾向于建立相当大的村庄，这些村庄在地理位置特别有利的地方会变成有相当的固定性。村庄必定影响周围的务农者的生活，或是直接产生影响，或是间接地通过用鱼、陶器和海盐与猎物和采集食物进行交换。只要看一下地图，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渔民社会是造成中部盆地语言上高度统一的原因，因为他们与农民有广泛深入的接触。这些接触制止了语言的趋异倾向，促进了趋同现象，特别是在语法方面。

我们不知道西班图语言的传播何时越过了森林地带的南部边缘，甚至也不知道这是冶金技术在该地区广泛流传之前还是之后。新近获得的资料也还不能肯定地证实这些语言后来扩展到了开赛和扎伊尔两河下游以南地区。

这个地区后来发生过多次语言的流动。在北面，特别是在乌班吉河和扎伊尔河之间，从班吉到韦莱河，向各个不同方向的流动情况是有迹可循的。有些情况是班图语言替代了其他语种（例如：从利萨拉到基桑加尼的姆巴－蒙东加语种）；另外的情况则是，班图语言面对中苏丹语族相形逊色，特别是在伊图里河地区，那里一个巨大的班图语集团在语法结构上受到中苏丹语族的强烈影响。有的时候，两个系统的语言之间也进 **159**

行交流。

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弗·埃雷特发展了一种理论，大致是说各种苏丹语传播远达南部非洲，但是后来却在班图语扩展之下被同化。他认为，围绕坦噶尼喀湖西岸的东部原始班图语是公元前600年至400年之间，在接连的三个社会系列中发展出来的。这三个社会群体是：莱加－古哈人，他们定居于扎伊尔东部，在西裂谷地带以西；湖区班图人，他们定居于现在的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西部和南部地方（还可能在坦桑尼亚内湖地带的一些地方）；以及图利人，他们居住在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极其广泛的区域。这些图利人后来又分为两个群体，即佩拉人和彭贝莱人。前者包括肯尼亚以及坦桑尼亚一些地方所有讲班图语的人；后者包括马拉维、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东部的大部分地方以及整个东南非洲讲班图语各族。到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结束时，这些佩拉人和彭贝莱人社会都已经发展成为不同的实体脱离了坦噶尼喀湖以西他们的东部原始班图祖先，并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最初两三个世纪中迅速向东部和南部非洲扩散。目前这些地区讲班图语各族就是他们的后代。㉒

没有其他语言学家附和克里斯托弗·埃雷特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所依据的证据仍然过于薄弱。即令现有的考古资料有些可以支持他的理论的某些方面，仍应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在坦噶尼喀湖以西地区对早铁器时代进行过考古研究。而这一地区正是埃雷特教授认为是讲东部原始班图语的人分裂为各不同集团的地方。然而，必须承认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班图语言是如何在东部非洲取得优势的，那里是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本地居民所掌握的技术比讲班图语各族更为先进，而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无疑是讲中苏丹语的，至少在这一地区的西北部是如此。

语言学对东班图语扩展情况的了解不如对扩展以前的情况了解那么清楚。考古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到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冶金技术在这个地区已经相当发达，并在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从大湖地区传播到了德兰士瓦和纳塔尔。㉓ 人们很容易会想象理所当然地有一个相应的语言流动从大湖区延伸到开普省，从而得出结论，班图语之所以能在整个地区获得优势地位是由于技术上的优越性。的确，南边的技术优势，也包括农业和畜牧业。但在这里就该提请人们注意：在东部非洲本身，许多种语言彼此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细类的办法，只有林波波河以南的各种语言和赞比西河以南绍纳人所讲的各种语言除外。此外，我们还应记住，东班图语在更往西的地方，在扎伊尔东南部和赞比亚境内也流行。至于从扎伊尔河下游往南远至纳米比亚地区的各种语言的状况，则仍有若干疑点有待澄清。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些语言是受到了东班图语的强烈影响，而讲这些语言的那些地区，在偶有经过考古调查的情况下，已经发现其分布与早铁器时代各种文化的典型分布不相符合。

因此，人们仍有可能与埃雷特教授持有相同看法，认为这些语言起源于坦噶尼喀湖以西，随后向北和向南传播。至于认为这些语言起源于辽远的北方或是起源于开赛河上游

㉒ C.埃雷特（C. Ehret），1973年。

㉓ N. J. 范－德－默尔韦（N. J. Van Der Merwe），1980年，第478－485页，特别是第480页；关于最新的发展见M.霍尔（M. Hall）和J. C.沃格尔（J. C. Vogel），1980年；P.施密特（P. Schmidt），1981年，第36页。

或赞比西河上游任何一个地方的说法，也同样是说得通的。

在这个地区，在最南部的一些班图语中可以分辨出某些非班图语的痕迹，因为这些班图语吸收了科伊语和桑语的词汇和音韵。在东部非洲，语言的地理分布表明，它们在那里的发展卓有成就。班图语和其他语言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甚至在不太远的过去，非班图语和班图语还彼此互相渗透。班图语的扩展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相反，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曾几度倒退，挫折延续了数世纪之久，讲班图语的地区有很多地方受到影响。如果果真是这样，那就应该能在班图语中找到这一类其他语言的痕迹，就像在扎伊尔东部找到中苏丹语的影响一样。

本章的研究截至公元后 1100 年左右为止，那时讲班图语各族已在赤道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定居下来（这是他们至今还居住的地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各种文化那时已开始具有明显的地区特色。在研究的现阶段，还不可能对讲班图语各族的起源，或何以他们的扩展会遍及于赤道以南非洲各地，作出明确的答复。当然，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并扩大到越来越多的班图语言，会有许多新的情况被揭示出来，因为还有如此众多的语言我们至今还所知甚少。前面的概括评述肯定将会得到扩展和充实。 **161**

最后，有必要再强调一下语言学资料与考古学资料的区别。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为了避免把不同学科的证明价值混淆起来，而尤为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在学术领域制造神话——这种学术领域的神话看来还颇有力量，其实它毫无根据。在听到“班图”这个字眼时，人们容易情不自禁地把它同一个族群或民族实体联系起来，而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语言学的称呼。它并不意味着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威廉·布莱克选用了这个称呼，未免有点过分灵活，如今我们必须保护自己免受其后果的影响。因为正如“含米特神话”之产生是由于混淆了语言、文化和种族一样，一个班图神话也会从同样的混淆中发展起来。

〔附录〕:

〔编者按：本章是教育背景不同、观点歧异的两位专家所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不同观点的组合。令人相当惊奇的是，这两位作者在最主要的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这就证明了下述情况：多年来富有成果的讨论，已在班图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仅仅只在一点上，两位作者有严重的分歧，即作者之一（S.卢旺加－卢尼伊戈）提出的理论。他的观点与大多数这方面专家的观点不同。因此，我们在下面转载了这位作者本人在其原稿中所讲的话。

我根据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得出自己的结论，最近提出：讲班图语的人从很早时期起就居住在一片宽阔的土地上，从东部非洲的大湖地区到扎伊尔的大西洋海岸，而所谓讲班图语各族从西部非洲向中部、东部和南部非洲流动，并不存在。[24]

[24] S.卢旺加－卢尼伊戈（S. Lwanga－Lunyiigo），1976年。

证据表明有尼格罗人种体型的各族从中石器时代起，就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而讲各种班图语的人就是这个尼格罗人种的后裔。有可能各种班图语正是通过早期尼格罗人社会相互间的作用发展起来的，它们之间彼此互相借用词语，从而促成了从多种尼格罗语言合成体中发展出新的班图语言。这种说法当然并不排除那种表明讲互相关 162 连的各种语言的人都来自同一个起源的遗传因素。但是应当指出，语言学家提出的用来解释讲班图语各族起源于一地或数地的遗传因素绝非唯一的因素。

考古证据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几处早期尼格罗人定居的地区，也就是早期尼格罗社会所在的地区，它们可能互相影响形成一些全新的语言。在西部非洲，尼格罗种人存在的最早证据来自尼日利亚西部的伊沃－埃莱鲁，那里发掘出一个“原始尼格罗人”的头骨，据测定属于基督纪元前第十个一千年早期（公元前9250年）。在西部非洲别的地方（马里的阿塞拉尔）也挖掘出一个尼格罗人头骨，据测定属于基督纪元前第七个一千年早期（公元前6046年）。其他早期尼格罗人遗骨（在尼日利亚北部罗普地方发掘出来的和在加纳北部的金坦波地方发掘出来的）经测定其年代分别为基督纪元前第二个一千年（公元前1990年 ± 120年）和基督纪元前第四个一千年。在东部非洲，尼格罗人在更新世末期、全新世初期即已开始出现。在扎伊尔东部的伊尚戈，公元前9000－6500年之间，“非洲出现了一个从更为古老的旧石器时代种族诞生的土著尼格罗人群体”。㉕肯尼亚的坎加尼格罗种人残骸经测定其年代为基督纪元前第三个一千年。南部非洲的尼格罗人在更新世中期开始出现，㉖这些尼格罗人以津巴布韦出土的布罗肯希尔人、滕普拉斯和博德洞穴残骸以及南非共和国开普省的晚石器时代晚期的残骸为代表。㉗奥克赫斯特、马切斯岩洞、巴姆班迪亚纳洛和豹山地的尼格罗种人遗物进一步表明，在更新世晚期、全新世早期尼格罗人就已在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存在了。㉘因此，讲班图语各族祖先的群体从中石器时代以后，一直广泛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不论讲班图语各族是起源于西部非洲、还是当今苏丹共和国境内的加扎勒河地区，或是刚果－赞比西两河的分水岭附近，或东部非洲的内湖地带，有一个因素看来是确凿无疑的：无论讲班图语各族源自何处，他们确是离开自己的故土，并终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取代了科伊桑人并且与他们混同，而且还可能取代了苏丹人并且与他们混同。他们的这一行动到了早铁器时代的末期和基督纪元后第二个一千年初期，已经大部分完成。

㉕ J.德－海因策林（J. de Heinzelin），1962年。
㉖ D. R.布罗思威尔（D. R. Brothwell），1963年。
㉗ 同上。
㉘ B.魏－奥戈苏（B. Wai-Ogosu），1974年。

7 埃及——从阿拉伯征服到法蒂玛统治结束（公元1171年）

T. 比昂基

导　言

阿拉伯人为埃及传奇般富庶的农村和广大勤劳人民所吸引而进入埃及时，他们已经征服了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大片领土。业已形成组织、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伊斯兰教就是在这块地方与非洲发生接触的。直到现在，埃及一直充当着阿拉伯东方与黑人世界之间中间人的重要角色。

自从同埃及在血统渊源和语言上都不相同的托勒密王朝覆灭之后，埃及在自己的土地上就再没有一个权力中心了。作为受古罗马、随后又受拜占廷剥削的一块殖民地，埃及生产了供应帝国首都居民们食用的相当大部分粮食。它的繁荣兴盛对于君主们的安全保障是至关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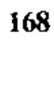
在伊斯兰教统治的最初两个世纪里，情况没有多少变化。然而，在麦地那、在大马士革和最后在伊拉克的中央政权往往随着它们主要目标的不同而下达不同的旨意。它们的主要目标有时候是要让科普特人改宗伊斯兰教，有时候则恰好相反，是要从科普特人那里获取更多的黄金和征收更高的谷物税。

自从公元9世纪（回历3世纪）之后，那些被任命在埃及当权的人出现一种抵制哈里发要求的倾向。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历史：由逐步自治，而后独立，最后取得帝国的权力。这种先从巴格达到伏斯泰特，然后再到开罗的政治权力转移，是紧跟贸易路线从海湾和美索不达米亚转移到东部地中海、尼罗河流域和红海而发生的。由于埃及所起的作用，一向不为人知的努比亚和非洲腹地在地中海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

臣服的埃及

征　服

拜占廷统治下的埃及受驻节于亚历山大的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委任的公爵统治。整个国家分为五个公爵领地，每个公爵领地又包括两个州，州由一系列区组成。这一严格的地域等级制度，反映了社会中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都已高度组织起来，目的是为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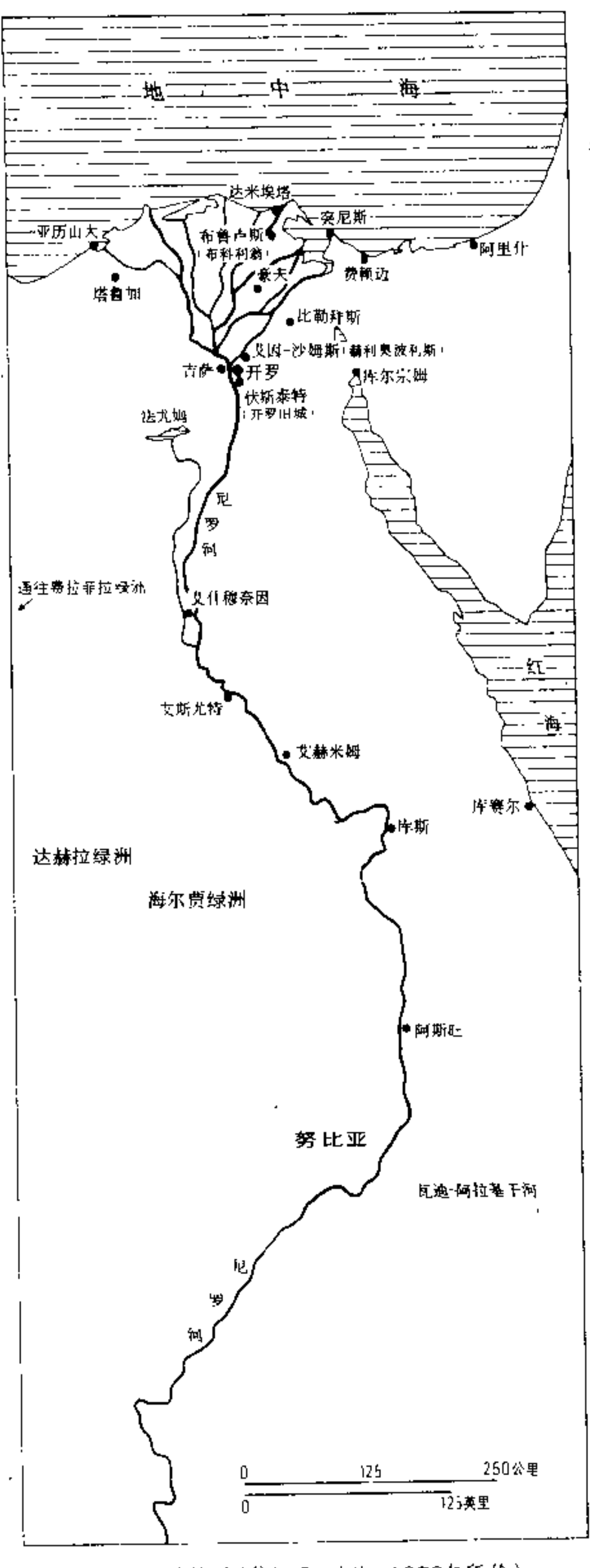


插图7.1 阿拉伯埃及（依据G·迪比，1978年所绘）

了方便征收实物和货币税，收集“安诺纳”（*annona*）[①]即小麦征实，并支付将其运往君士坦丁堡的费用，因为每年 10 月 10 日前必须将 250 万公石的谷物运往该城。

地方部队从惯于行伍生活的科普特人家族中招募，以维持农村的秩序。这种部队对提高收税人的权威是十分必要的；但并没有多少军事价值，也缺乏机动性。城市四周必须建造堡垒，以确保其不受游牧民的袭击。

拜占廷当局关心的是居住在亚历山大城里讲希腊语、信仰东正教的基督徒，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与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接近。各省的统治权都是由希腊人高级官员和拥有大量土地的希腊化家族掌握。

科普特农民保持法老时代埃及的语言传统。他们拒绝东正教的卡尔西登教义（主张基督具备神人两性）而信仰基督一性论教义。两个教会各有自己的教区主教。科普特人的宗教本身具有强烈的隐修、苦行色彩，这种特征由于大量农民为躲避苛捐杂税的重压躲避他乡而更形加强。投身乡村，特别是到耕作地带边缘的沙漠地区去过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城市，首先是亚历山大——代表了混乱、荒淫与异端。

公元 619 年波斯人轻易地征服了埃及，并在那里呆了十来年；他们对希腊人和东正教徒进行迫害，但对科普特人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波斯人离开后，拜占廷帝国的神学家们曾企图使两个教会接受同一种能得到普遍承认的教义。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失败了，于是重新开始了迫害行动。正当埃及对远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权和它在亚历山大的当地代表表示强烈不满时，阿拉伯的征服开始了。埃及人无法同拜占廷帝国在政治、宗教和语言上保持一致。

阿拉伯将军阿姆鲁·伊本·阿斯带领不多的军队在公元 639 年 12 月（回历 18 年）进入埃及。刚刚完成的对叙利亚的征服使他确信不会遭遇到拜占廷帝国来自陆地的进攻。阿姆鲁占领了阿里什和费赖迈，沿（尼罗河）三角洲东支向西南方向前进，他先 **165** 到达比勒拜斯，然后到达尼罗河各支流形成三角洲的交汇点赫利奥波利斯。防守之坚固仅次于亚历山大城的巴比伦就在南面，并且也在尼罗河右岸，面对着罗达岛（即劳代岛）。

拜占廷的防御由卡尔西登教派的教区主教居鲁士和军队统帅西奥多率领。阿姆鲁在得到增援后，一面包围巴比伦，一面派军队向法尤姆和三角洲进攻，巴比伦在公元 641 年 4 月（回历 20 年 6 月）陷落。公元 641 年 6 月（回历 20 年 7 月）拜占廷帝国在地中海南部沿海的权力中心亚历山大开始遭到包围。这个有 60 万居民的巨大设防城市最终被迫投降，阿拉伯人在公元 642 年 9 月（回历 21 年 10 月）占领该城。促使希腊人四分五裂的党派纷争和对科普特人的宗教仇恨为入侵者大开方便之门。拜占廷的上层当权人物没有能力在普通老百姓中激起抵抗的精神，母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给予的支援也不够充足。

阿姆鲁同拉加王朝一贯在亚历山大港建立政治权力中心的传统决裂，选择了正好在

---

① 安诺纳（*annona*）：由包括埃及和北非在内的某些行省，向帝国首都罗马，随后向君士坦丁堡送去小麦以便皇帝们能把它销售给首都居民。

三角洲和中埃及中途的巴比伦作为行省的首府。他把父系氏族群体的阿拉伯人安置在堡垒的北面。一座作为宗教和政治集会中心的清真寺奠定了这座新城市团结成为一体的基础，它被称为伏斯泰特或者开罗旧城。历史文献无法使我们对这座城市形成概貌。毫无疑问，帐篷逐步被住房所取代；建筑房屋先是用晒干的土坯，后来用烧制的砖和石头。非阿拉伯人则在阿拉伯父系氏族群体侧面的“哈姆拉”（沙漠）中定居了下来。

从那时起直到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亚历山大一直是受到行省当局严密监视的次要城市。那里一直存在拜占廷军队在港口登陆的危险，果真如此则有可能在对拜占廷人有利的条件下建立起一个桥头堡。实际情况也是25/645－646年（拜占廷）帝国的海军确曾短时间占领了这座城市。只是在急忙被召回的阿姆鲁率领下，穆斯林才重新收复该城，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阐述阿拉伯人在征服期间强加给埃及的财政体制颇为困难，因为早期一些著作（诸如拜拉祖里的著作）报道相互矛盾的传闻。埃及既可以说是通过不流血的投降——称为“苏尔罕”（*sulhān*）[②]——而被征服的一块土地，也可以说是由军队从它的居民手里夺过来的——称为“安瓦坦”（*anwatan*）[③]的一块土地。在前一种情况下，土地仍然将留在那些耕种它的人手里；为了保有这些土地，他们必须交纳土地税（有时叫“卡拉杰”、*kharadj*）[④]。此外，他们也还要交纳人头税（有时叫“吉兹亚”，*djizya*）[⑤]，以回报他们可以免于一死和不改宗伊斯兰教。在后一种情况下，土地将归穆斯林社会所共有，这种土地可以自由地雇用免死的被征服的农民作为雇工或佃农。

166

文献上的混乱可能是由于传统的编年史学家使用单一的表达方法来阐述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相距甚远的事件。拜占廷军队有可能再次拿起武器，而科普特人由于地方部队的投降只能退而保住自己的土地。另外，穆斯林当局竭力找出某些理由拒绝将土地给父系氏族群体阿拉伯人，这些土地由科普特人耕种产量更加稳定。

随着征服而来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局面看来已被人们所利用。投降条约的存在妨碍阿拉伯酋长们土地要求的满足；科普特人不乐意遵守向他们提出的要求不断提醒人们，用武力征服的土地是可以从主人那里夺走的。各种文献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交纳人头税的多少说法不一，14岁以上的男人每年交税从1第纳尔到4第纳尔不等。至于实物税则要根据耕种土地的面积，可以缴纳谷物、油、醋，有时还可以交纳衣服或者牲口。粮食可以通过尼罗河/红海水道运送到阿拉伯半岛；同样，征敛到的黄金大部分也可以通过水路运送到哈里发那里去。开始时，当局明确规定每个行政区域应征收税的总数，而让收税人和教会在个人和农庄中分配这些负担。这种两级财政制度可以解释阿拉伯统治

② 苏尔罕（*sulhan*）：指穆斯林通过对方投降占领城镇。

③ 安瓦坦（*anwatan*）：指对方拒绝投降，穆斯林军队发动进攻占领城市。

④ 卡拉杰（*kharādj*）：指伊斯兰征服期间，对没有弃而不用的农田征收的土地税，一般交纳实物；可以统指所有的土地税。

⑤ 吉兹亚（*djizya*）：指被允许长期居留在伊斯兰教领土上的非穆斯林，特别是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所须交纳的人头税，作为报偿，付人头税后可免服兵役，有自由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的权利，并有资格受到穆斯林统治者的保护。

时期的希腊文莎草纸文献所叙述的事实为什么不同于阿拉伯历史学家后来用推理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哈里发奥斯曼意识到一个既能指挥一支军队又掌握哈里发国家财政所需的黄金和供首都居民消费的小麦的行省长官往往是一个危险人物，所以他建议阿姆鲁把财政管理权交给上埃及总督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掌管，阿姆鲁本人仅保留政治和军事职权。阿姆鲁拒绝“去抓牛犄角而让别人挤奶”，这一抗命行动正好符合罗马和拜占廷当局的心意。于是23/644年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被任命为掌握全权的埃及总督

31/652年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发动对努比亚（即今天的苏丹）的远征，直捣第三瀑布上游的栋古拉。信仰埃及“基督一性论”教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殊死抵抗。入侵者由于弓箭手们能准确射中阿拉伯骑兵的眼睛以及这一带的贫穷景象而深感沮丧，愿意坐下来谈判。同努比亚人签订的巴克特条约[6]规定：努比亚保证提供奴隶而 到粮食 **168** 和布匹。当时，这个巴克特条约被穆斯林法学家们看成是一个同少数野蛮人以平等地位谈判的通商条约，而不是一个政治文件。该条约修改了几次，一直到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结束，它还在生效。偶尔也爆发一些事件——诸如，努比亚强盗入侵上埃及来抢夺黄金或宝石矿藏——但阿斯旺上游这一带始终保持独立。

伊斯兰教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大片领土，在那些地方原来的政治和社会分层是以文化对立为基础的，因此当它碰到相对一致的居民时就一败涂地。由于放弃兼并努比亚，埃及南部成了当时的“国土尽头”，尼罗特非洲的伊斯兰化也因此而推迟到马木路克统治时期。

大马士革的伍麦叶王朝

41/661年在大马士革建立了哈里发国，这一现象说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向北移动。35/655年以埃及水兵马斯特斯取胜开始的阿拉伯人与拜占廷之间的海战严重地打击了地中海的贸易。这以后，红海水道被迫放弃改而利用波斯湾和陆路，在埃及、陆上贸易也不再是南北向而是东西向了。

导致穆阿威叶当上哈里发的危机是从奥斯曼哈里发在麦地那遭暗杀的35/656年开始的。这是伊斯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危机，它导致在教法与政治权力两者的关系以及在最高地方长官的继承问题上分裂为彼此敌对的集团。阿拉伯－伊斯兰统一的这次早期分裂使各种来源的新改宗伊斯兰教的人易于在支离破碎的结构中得到适应，并使这个宗教得以避免争取优先地位的争论、种族主义的诱惑和唯我独尊的排他态度。各种不同来源的人在皈依伊斯兰教时随身带来了他们固有的早期文化的一些成分。科普特人的基督教是朴素的、虔诚的和敏感的，他们抵制拜占廷人的思辩神学。他们把他们要与

[6] 巴克特（*Bakt*）一词源出拉丁文 *pactum*。它几乎是阿拉伯人同拒绝伊斯兰教信仰的人之间签订的唯一的一份双边条约。努比亚人保证向穆斯林输送奴隶而接受小麦或许还有酒和布匹。这个在公元651－652年奥斯曼哈里发统治时期签订的条约曾几次延长和修改，一直生效到公元1276年，那时努比亚被拜巴尔斯素丹统率的军队所征服并臣服于马木路克埃及。

死去的亲人保持接触的固执愿望注入平易的逊尼派教义之中。卡拉法的墓地证明对今生和来世之间难以确定的界线达到了和古王国时代大墓地同样的程度

169 导致暗杀伍麦叶领导人奥斯曼哈里发的叛乱是驻埃及的阿拉伯军队发动的，但也与这个省通过它的总督阿姆鲁的行动，在绥芬和阿兹拉挫败哈里发阿里的要求有关 阿姆鲁死后，穆阿威叶的兄弟奥特巴接替阿姆鲁担任埃及总督（44/664－665年）。因而什叶派在埃及的信徒从来不多，尽管人们经常对先知的后裔表示对先知的追思。

当阿拉伯人初到埃及时，他们接管了现成的拜占廷体制。通用的希腊语、低级收税官员、原有的行政区划、原有的铸币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个体制继续为当地的新统治者而不是为远方君士坦丁堡的利益服务。基督一性论教会仍然在国家和村庄之间以及国家和个人之间起中介作用．然而随着阿拉伯人留在埃及的时间越来越长，对过去的这种尊重就不再有效了。第一步是用《古兰经》经文取代拜占廷帝国印在货币和官衙用莎草纸上的基督教标志。87/706年，哈里发国家各地起草官方公文都必须使用阿拉伯文．埃及被征服初期，阿拉伯和希腊两种文字同时出现在官衙公文上，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02/720年前后才停止。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希腊文文献，最晚的日期是8世纪末；在2/8世纪的最早25年间，埃及完全转而使用阿拉伯文。科普特文则继续在农村中使用了两个世纪，在基督一性论教派（雅各布派）的科普特礼拜仪式中使用得更长久一些。到了4/10世纪，埃及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卡尔西登教派的教徒还是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徒都用阿拉伯文记事。波斯人与突厥人在改宗伊斯兰教后仍保留或者又回过头来使用他们的民族语言，从而享受文化上的自立。但是埃及人没做到这点，他们溶入了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讲阿拉伯语的世界之中，讲阿拉伯语的世界早在中世纪即已诞生，从它目前的界限再也看不出过去一度存在过的帝国或任何自然统一体的痕迹，但是它一直存在到现在，并且第一次把埃及的文明并入比尼罗河流域更为广阔的范畴之内．这个讲阿拉伯语的世界不受来自伊斯兰教的任何约束，因为非穆斯林讲阿拉伯语者颇多，而讲突厥语和波斯语的人不多。

在伍麦叶哈里发的统治下，很少有阿拉伯人生活在埃及农村，而穆斯林士兵（通常是也门人）和生活在城市里的埃及人中间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相互的文化适应很快就产生了，双方都采纳了过去是保留给希腊化阶级的那种城市生活方式。不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增加：有根据花名册领取年金的军人，行政官员，为总督、军事长官和财政官员效劳的工匠。然而城市生活方式引起开支的增加，从80年代/7世纪以后，征服行动放慢了，国库再不能依赖于战利品。财政压力日益加重，赋税使农村受到损害。 170

对新的税收要求的反抗，像在拜占廷统治时期那样，最初是消极抵制 农民纷纷遗弃他们在那里登过记的村庄隐藏起来或者去当僧侣以逃避人头税 当阿卜德・阿齐兹・伊本・马尔万把人口税扩大到包括僧侣在内时（65/685－85/704年），科普特人又用改宗伊斯兰教作为解决办法。穆斯林当局必须作出选择：要么鼓励人们改宗，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要么修改法律，规定新改宗的穆斯林不能免税，从而阻止为自私目的而改宗。从90/709年到95/714年担任政治和财政总督的库拉・伊本・谢里克拒绝让改宗

的科普特人废除人头税，还对逃亡者起诉并征收一种附加特别税用来供应对拜占廷人的海战。他以耕种休耕地和种植甘蔗来增加生产。哈里发苏莱曼·伊本·阿卜德·马利克命令库拉·伊本·谢里克的继任者采取"敲骨吸髓，杀鸡取卵"的手段，哈里发奥马尔·伊本·阿卜德·阿齐兹（99/717－101/720年在位）对改宗问题通过立法提出一项解决办法。他是一个狂热的穆斯林，迫切希望增加改宗者：他把免除人头税的新改宗的穆斯林本人同他的土地分开，而土地仍保留原先的等级，他继续责成耕种这块土地的任何人（即使是改宗者），都要交纳"卜拉杰"（土地税）。

随着埃及农村地区赋税越来越重而人们惯于使用的逃税办法又遭禁止，107/725年科普特人的首次反抗终于爆发。穆斯林当局把凯斯父系氏族群体的阿拉伯人安置在尼罗河三角洲，大约有1万人带着家属先后分三次来到这里。就这样，对农村地区的控制方便了，同时在征服期间一度占优势地位的也门人，其优势也被抵销。当局再一次企图取得平衡，这次是针对基督一性论教会（雅各布派）的影响。107/725年，当局把东正教的教堂归还给它的教徒，在和拜占廷达成协议后，任命了一位卡尔西登教派的教区主教，尽管拜占廷海军曾在101/720年进攻提尼斯，还在118/736年再一次发动进攻。军事行动与谈判双管齐下和关心各个社会集团的平衡是中世纪阿拉伯政策的两个特征。

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初期的重大叛乱

132/750年伍麦叶政权被推翻，它的最后一位哈里发当年8月份在埃及遭到杀害。凯斯人和也门人之间的战争使伍麦叶统治者忽视了呼罗珊的局势，在那里，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战士中间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哈里发的统治中心已经迁到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历史边界以外的美索不达米亚，离埃及更远了。大马士革退居为一个自主的权力中心。古莱什贵族，特别是那些谢里夫们（*sharīf*），由于有把握会受到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盛情接待，就放弃了麦加和麦地那。伏斯泰特作为被大草原同地中海远远隔开的美索不达米亚当局的中继站，它的地区功能更形加强和扩大。 171

从150/767年到254/868年这段时间里，叛乱连续在埃及发生，几乎没有任何间断，科普特人的叛乱是由于任用穆斯林代替基督徒地方官员而引起的，特别是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小城镇。科普特人深感在自己的国家里简直就像是外邦人，这是他们不满的深一层的原因，因而在150/767年和155/772年之间，尼罗河三角洲的基督徒们力图用暴力把穆斯林官员赶走。217/832年三角洲北面布科利克斯地区的农村基督徒居民起来造反；要平定它并不容易。这是基督徒最后一次单独拿起武器在埃及反抗穆斯林当局；此后的所有叛乱中，他们都是在穆斯林领导的运动中和后者联合行动。

从3/9世纪开始，阿拉伯父系氏族群体的居民和士兵们都是主要的动乱基础。最初的热情消失了。军事行动一般都是在伊斯兰领土上进行的，经常是对付贫苦农民；他们再不能从战利品中得到好处了。在和平时期也得给士兵们发军饷，到了打仗的时候还必须支付额外的费用。他们的忠心依靠按时领到军晌。一旦发生叛乱，地方军队往往受同化太深，严重地不可靠，所以军队必须花很大费用从美索不达米亚调来。193/809年在

伏斯泰特发生了一次兵变，第二年，总督不得不在城外小山上修建官邸，以后开罗城就在这座山上建立起来。

居住在尼罗河三角洲边缘地带的父系氏族群体阿拉伯人保留着半游牧的生活方式，他们把科普特人耕种的田地当作牧场使用，并拒绝为他们占据的土地交付“卡拉杰”（土地税）。相反，另外一些阿拉伯人则转化成为农民，采纳科普特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由于科普特人已经被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同化，因此很难把后一部分阿拉伯人同科普特人区分开来。大家都同样地拿起武器反抗收税人。

从169/785年以后就有关于来自父系氏族群体的阿拉伯人参加叛乱的报道，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豪夫，居民直到194/810年始终处在叛乱的状态中。从198/814年到217/832年埃及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伏斯泰特的当局除上游的中埃及和上埃及外，已经不再有人承认。来自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难民已经在亚历山大成立了一个国家，并占据了三角洲西部。至于三角洲东部，从提尼斯到比勒拜斯和费赖迈形成另一个政权实体。在不谈细节的情况下仍应提一下：217/832年派来了4000名突厥兵以及哈里发马穆恩回到埃及，使秩序重新得到恢复。从次年起，阿拉伯人被排除在领取年金的名单之外；他们被解除服兵役的义务，但也再没有领取国家年金的资格。

172

当初征服埃及的阿拉伯人的后代形成三种完全不同的命运：阿拉伯半岛的贵族或商人家庭的成员以及那些定居在老城市周围或者定居在伊拉克或埃及新建城市中来自父系氏族群体的阿拉伯人已经城市化了。他们作为官吏、执法者和商人，从城市的经济发展，从市场交易迅速兴起和从他们从事的行业中得益，这种繁荣同样得益于从农村地区征收来的赋税。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其他一些群体已经与当地农村人口同化，并分担了纳税的重担。最后，许多阿拉伯人成为贝都因人：或是像在埃及那样定居在开垦土地的边缘，过半游牧生活，或是成为游牧在草原上的真正游牧民。他们从军队中被淘汰出来，再次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同时继续听任决定他们粮食价格的市场法则的摆布。面对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城市的奢华生活，他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蔑视。他们接受哈桑团伙或卡尔马特反叛者提出的主张。掠夺商队和防御薄弱的城市中的圣地，使他们能够重新得到巨额财富，犹如他们的祖先在过去发动战争中得到的一样。因此，阿拉伯的征服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仅仅过了两个世纪，胜利者的后代既存在于得到政权庇护的特权者中间，也存在于被剥削与被抛弃者中间。

自治的埃及

图伦王朝

在穆尔台绥姆哈里发的统治下（218/833－227/842年在位），突厥奴隶被召进美索不达米亚的军队，数量之大使他们得以控制了军队，并对民事、财政和行省的行政管理施加影响。宫廷的军队使哈里发沦为由他们任意捧上台和拉下马的傀儡领袖。行省或几个行

省的行政权委托给哈里发的家族成员或者突厥首领；这些人继续住在巴格达或萨迈拉，由他们再委托一位亲戚实际掌握行省行政权。比如，艾哈迈德·伊本·图伦于254/868年受巴克巴克封赠来到埃及，他只被授予“沙拉特”（*salat*，掌管省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而没有“卡拉杰”（*kharadj*，财政和税收权力），后面这个权力由伊本·穆达比尔保有。

33岁的伊本·图伦像他的突厥同僚一样，具有出色的军事经历，曾在塔尔苏斯与拜占廷人作战达7年之久。但是，由于他在宗教和文学方面具有出色的修养，使他脱颖 **173** 而出。他一生中主要是把自己的智慧用来为宏大的抱负服务，很少凭借武力。到255/872年，由于他在萨迈拉导演的阴谋，伊本·穆达比尔被转移到叙伊亚。

伊本·图伦必须首先插手上埃及的事务，因为那里在255/869年和256/870年爆发了三次叛乱。阿斯旺东南瓦迪－阿拉基干河的金矿和努比亚的奴隶对人有极大的诱惑力。221/863年同努比亚的条约得到延长，努比亚国王的儿子们在伏斯泰特和巴格达受到接待。同在尼罗河流域和红海之间居住的贝贾游牧民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他们中有一支部族就住在阿斯旺。在这种情况下，上埃及的一些城市纷纷皈依伊斯兰教，与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新的贸易联系建立了起来，同时通过来自一些沙漠绿洲的小道与马格里布也建立起类似的联系，259/873年危害最大的叛乱分子伊本·苏菲被打败，逃往阿拉伯半岛。过后不久，控制着阿拉基干河金矿的乌玛里也被杀死，与南方贸易联系的安全从而得到保证。

伊本·图伦拥有供他支配的相当数量的资财，并利用这笔资财组建了一支能使他在埃及以外进行干预的军队。他派军队到的黎波里塔尼亚平定一次叛乱。256/870年，当他向伊拉克进纳的贡物在叙利亚被抢走时，他几乎要进军该国。然而，哈里发的左右宁可不要他的帮助来解决这一事件，因为他的野心已开始暴露无遗。伊本·图伦控制着埃及的小麦、黄金和努比亚的奴隶；哈里发国家需要他送到伊拉克的贡金以便为军队发饷，然而他从这个制度中却一无所获。两种发展方向对这位强有力的埃及总督都具有诱惑力：或是像北非的王公那样，使自己独立于哈里发，并保留贡金作为自己军队的经费，或是与此相反，去干涉伊拉克的内部事务。256/870年，一位新的哈里发穆塔米德登位，把帝国的东部委托给他的兄弟穆瓦法克管理。同时，哈里发把在叙利亚和西利西亚征收土地税的权利委托给伊本·图伦；作为交换，他把贡金从埃及直接送给哈里发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当时，穆瓦法克正面临着两次极端危险的叛乱—— 波斯的萨法尔王朝的叛乱和伊拉克南部的僧祇黑奴的起义——，他认为他从埃及收到的贡金数额入不敷出。伊本·图伦在430万第纳尔的财政收入中，显然每年要送给哈里发220万第纳尔，并在876年又额外送给穆瓦法克120万第纳尔。在同一时期，伊本·图伦确实修建了一条引水渠道和一座医院，并在伏斯泰特东北面建起一座有兵营的新城、一座宫殿和一座萨迈拉风格的巨大清真寺。根据伊本·台格利比尔迪的说法，这些建筑物是用从伏斯泰特附近发现的一座法老陵墓中取出的黄金建造的。这批黄金计重150万或250万第纳尔。这是不是有意制造出来的一种传闻，用来作为拒绝向正在为哈里发的安全苦战的穆瓦法克提供更多援助的一种借口呢？不管怎样，穆瓦法克派了一支军队要把伊 **174**

本·图伦赶出埃及，但是士兵却由于没有发饷而在拉卡散伙了。

264/878年伊本·图伦入侵叙利亚，除在安条克外，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但是，他在西利西亚的塔尔苏斯却受到反对，刚来得及任命一位总督，就不得不匆忙退回埃及，因为他的儿子阿巴斯造反了。这个年轻人被当成犯人带回伏斯泰特。公元882年2月（回历268年9月），伊本·图伦作为埃及和叙利亚无可争辩的统治者秘密邀请哈里发来伏斯泰特并在那里住。然而，这位哈里发却企图逃走，事后被送回首都，并被迫签署了一项文件宣布革除伊本·图伦的职位。公元883年5月（回历269年11月），伊本·图伦在大马士革召集代表埃及、叙利亚和西利西亚穆斯林的执法官（*kadi*）、法理学家和"谢里夫"（*sharif*）们开会，并要他们投票，使对穆瓦法克的"圣战"合法化。同时，他向哈里发施加压力，取消所有哈里发国家发出的文件。拒绝投赞成票的只有三个埃及人，其中包括伏斯泰特的执法官。不到一年，在公元884年3月（回历270年9月），伊本·图伦患病死在伏斯泰特。

他的儿子胡马拉瓦叶继位。胡马拉瓦叶设法把他的君主国和塔尔苏斯及贾齐拉（上美索不达米亚）合并。273/886年，哈里发国家承认图伦王朝在30年内对埃及和叙利亚拥有统治权。279/892年哈里发穆阿台迪德同胡马拉瓦叶的女儿卡特尔·纳达结婚，她的陪嫁有100万第纳尔。这场婚礼在阿拉伯历史上是最豪华的。282/896年，胡马拉瓦叶在大马士革遭暗杀，留下空无所有的国库。接着，他的儿子贾伊什和儿子的儿子哈龙相继登位，他们的统治彻底毁坏了这个王朝，使它无力防御卡尔马特教派对叙利亚的进攻。这个在2/8世纪崛起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源出于伊斯玛仪阿里派的教派利用了当哈里发的军队转化成突厥人和黑奴的军队时被遣送回沙漠的父系氏族群体阿拉伯人的痛苦而壮大起来，从289/902年起，贝都因人入侵叙利亚，轻而易举地就大败了由图格杰率领的大马士革图伦王朝的军队。阿拔斯王朝的将军穆哈默德·本·苏莱曼从这一失败中得到教训，进军叙利亚，在290/903年粉碎了卡尔马特教派的部队，然后向伏斯泰特进军，于公元905年1月10日（回历292年3月20日）进入该城。其时，哈龙·本·胡马拉瓦叶刚刚被害。

金迪有关图伦王朝的记述提供了一个正在演变之中的社会的情况。伊本·图伦死后，统治当局十分脆弱，处于一批王子、亲戚或者将军们威胁的阴影之下，这些人懂得使王朝具有合法地位的军事基础的重要性。一旦君主被武力推翻，这帮人就对继承者宣誓效忠，清真寺当权者也就承认新君主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从前王那里夺取政权或杀死前王都是清白无罪的。一切能加强已成事实且发挥作用的政权的行动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得到肯定。这种轻易就能得到的意见一致难以掩盖宗教当局对行省权力究竟是否具备合法基础实际上毫不关心，只要"呼图白"（*khutba*）⑦能以哈里发的名义发布就万事大吉了。民间社会和军队意识之间的分裂开始出现。突然更换一位伊斯兰执法官或伊玛目对市场上人们的震动远比更换一位君主厉害。伏斯泰特和大马士革这两座行省一级的

⑦ 呼图白（*khutba*）：指星期五中午礼拜时，宣讲师从大清真寺宣教坛上发表的讲道。讲道中一个主要内容是以这个城市承认的哈里发的名义祈求真主的保护，同时也要为总督从他那里得委任权力的那位统治者祈祷。

城市，住着斤斤计较、心胸狭窄的手艺人和商人，他们根本不信任图伦王朝的君主们，后者的道德和文化修养都有波斯式放任纵情的倾向。这个新生的中等阶级把自己看作是清真寺的“马斯吉德”(*ahl al-masdjid*，即每天去圣寺做礼拜的人们)，[8] 并把谋得一个执法职位看成是地位的晋升。这个阶级的人严密地注视着层次较低的阶级，即那些被称为“阿斯法尔·奈斯”(*asfal al-nas*，卑贱的人）的阶级，也即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农民和士兵的子弟，并在需要时向当局告发他们。

王朝的另一个缺陷来自它的军队。它没有能力应付要保护的领土上的各种任务，更没有能力对抗习于征战的西利西亚军队。图伦王朝的军队是杂牌队伍，包括突厥人、代拉米人、黑人、希腊人和柏柏尔人，后者来自定居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各族；东部三角洲从半游牧的父系氏族群体提供阿拉伯人，他们组成令人生畏的卫队。

虽有上述这些弱点，我们仍应看到埃及经济势不可挡的进展。阿拔斯王朝的军队之所以忿怒地抢劫伏斯泰特，并破坏大清真寺之外所有图伦王朝的建筑物，证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进展，并知道它对伊拉克优势的威胁。 **177**

脆弱的阿拔斯王朝复辟：无政府状态

从图伦王朝在292/905年倒台到穆哈默德·伊本·图格杰于323/935年出任总督，埃及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这里无需赘述。职权限制在军事和政治事务的总督一个接替一个，同时马扎拉伊家族则牢牢掌握财政大权，甚至可以否决某些总督的任命。军队不能按时发饷便去抢劫。伏斯泰特的居民为了逃避被抢，请清真寺当局要求军队移防吉萨。这是一项合乎逻辑的要求，因为这个城市正受到柏柏尔人的威胁。这些柏柏尔人定居在尼罗河左岸、三角洲和法尤姆地区，他们以建立在伊弗里基亚的法蒂玛伊斯玛仪王朝的名义进行行动。柏柏尔人的军队已经和埃及军队以及在图伦王朝统治期间招募的各色各样其他军队合成一体；只有父系氏族群体的阿拉伯人被遣散了。这个由不同族群拼凑成的杂烩产生了纪律问题；“西部人”与“东部人”之间的猛烈的火并成为法蒂玛统治时期大冲突的序幕。

作为阿拉伯世界中世纪下半叶特色的两个制度——“伊克塔”(*ikta'*)[9] 和“瓦克夫”(*wakf*)[10]——是在图伦王朝统治末期和随后的混乱时期在埃及发展起来的。付给士兵现金薪饷和实物津贴是军队进行战争所在省份的责任。因此，当混乱状态要求军队在场时，首先受到影响的是财政工作，而另一方面，远距离运送大批军队所需的经费很不容易筹集到。为了分散财政工作，统治者委托军队指挥官向农村地区收税，并为维持

---

[8] 马斯吉德（*ahl al-masdjid*）：指那些每天去清真寺做礼拜的人，他们一般都是商人、手艺人和法官。

[9] 伊克塔（*ikta'*）：统治者把征税代理权给予在一个财政地区里的军事或民政官员，作为其对国家服务的奖赏。这种特许权是可以收回的。

[10] 瓦克夫（*wakf*）：这是一种不能剥夺的合法的和宗教的捐赠，由一宗不动产的所有人把他的不动产收入赠给宗教机构或公共、社会福利机构和/或自己的后代子孙。以公认的形式起草、有宗教和慈善目的支持的捐赠文件为“瓦克夫”和受益人确定一个受托人。如果文件别无它法执行，可以要求执法官应允依照赠款人的合法意愿来执行。宣布一项私产为“瓦克夫”，其目的往往是为了避免统治者没收它或者孤儿在年幼时财产被夺走。

他指挥的士兵，有的就是他本人拥有的部队，负全部或部分责任。“伊克塔”把指挥官和他帮助防御的地域连在一起，从而减轻了省行政当局的负担。

178　民政性质的“伊克塔”无疑是为了保证马扎拉伊之类财政官员能够接近国库并带来好处而建立的，他们的官职无疑能使他们聚集起巨额的土地和房产（他们侵吞了100万第纳尔）；这些暴发得来的横财引起当权者的忌妒。马扎拉伊宣称把他们的财产放在“瓦克夫”范畴内，以确保只有他们的后代能够使用。

由于建立这两种制度的结果，城市更加沉重地成为农村的负担，增加农产品的税额，给农民剩下的最多只够勉强维持家庭的生活，不可能有任何储存。这样，使现存的状态停滞不前，中央和地方当局的活动领域都受到限制。与此同时，农民停止诉诸暴力，至少不采取大规模叛乱的形式。这是因为建立了“伊克塔”对农村的监视更加广泛，而职业军人使用刀和长矛这种新的打仗技术对武装起来的平民占有绝对的军事优势。

伊赫什德王朝和卡富尔

公元935年7月（回历323年8月），穆哈默德·伊本·图格杰被任命为埃及总督来到伏斯泰特。他既拥有“沙拉特”（政治、军事权）也拥有“卡拉杰”（财政、税收权）。这种一身而兼任双重职责是违反图伦王朝结束以来一直遵循的做法的，这要归因于埃及和叙利亚的税务稽查官法德尔·伊本·贾法尔·伊本·福拉特的支持。后者曾经当过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大埃米尔伊本·拉伊克的大臣并与之有姻亲关系；他也与伊本·图格杰有姻亲关系。当他在326/938年去世时，伊本·福拉特已经开始设法削弱马扎拉伊家族掌管的财政权。伊本·福拉特的儿子贾法尔·伊本·法德尔在卡富尔统治末期和以后在哈里发阿齐兹统治下担任过大臣。在这个时期，伊拉克的税务官及包税人家庭同突厥人或波斯人总督或军事首领之间的联姻是很平常的事。巴努·福拉特同另外的税务官一起，把有利于什叶派的文化环境从巴格达带到了伏斯泰特，从而间接便利了法蒂玛派的宣传。

伊本·图格杰是萨迈拉警卫队一名突厥军人的孙子，是大马士革前总督的儿子，他担任过不少军事领导职务。他曾奉命到伏斯泰特担负保卫哈里发国家西翼的使命，防御法蒂玛派迫在眉睫的进攻。他得到授权成立一个自治的君主国。327/939年在他的要求下，他被授予“伊赫什德”（公仆）的称号，按传统这个称号是由费尔加纳君主承受的。在他受命到埃及这一年（323/935年），他不得不同柏柏尔人相对抗，因为他们已经占领伏斯泰特对面的罗达（劳代）岛，并放火烧了岛上的军火库。他们曾一度向伊弗里

179　基亚的方向离去，但324/936年又和一支法蒂玛的军队一道回师进攻埃及，只是他们没能取胜。伊弗里基亚拥有的财富、它通过撒哈拉得到的黄金和它与安达卢西亚和西西里的关系，吸引了来自红海的巨额贸易。因此，与地中海岸平行并联接北非和尼罗河三角洲、各个绿洲以及上埃及的小道在数量上有了增加。对它们进行军事控制相当困难。

伊本·图格杰恢复图伦王朝的传统，把叙利亚看成是他的君主国的一个组成部

分。他必须同被逐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首领们争夺这个省份，因为他们把这个省看成是对他们损失的补偿。伊本·拉伊克被他的副手巴杰卡姆赶出巴格达，他在326/938年企图征服叙利亚，经过几场胜负未决的交锋，伊本·拉伊克和伊本·图格杰结成姻亲关系，并在他们之间瓜分了这个省份：南部归伊赫什德，北部和大马士革归前巴格达大埃米尔。330/942年，位于摩苏尔的哈姆丹王朝的统治者纳西尔·道拉派人杀死了伊本·拉伊克，并于332/944年派其兄弟阿里（即后来的赛义夫·道拉）占领阿勒颇。这时，哈里发穆塔基在巴格达受到突厥埃米尔图宗的威胁，逃到拉卡避难。伊本·图格杰也像在他之前的伊本·图伦一样，亲自邀请哈里发到伏斯泰特居住。哈里发返回巴格达，在那里，波斯埃米尔穆仪兹·道拉于334/945年建立阿里派政权，即长达一个世纪的白益王朝。也是在334/945年，伊本·图格杰在同意与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统治者讲和之后逝世。随后，乌努朱尔·伊本·伊赫什德崛起角逐权力，于336/947年同哈姆丹王朝的统治者瓜分了叙利亚，承认哈姆丹王朝统治者对金纳斯林－阿勒颇和霍姆斯的“宗德”（征兵区 djund）① 的权利。伊赫什德王朝统治者则保留对埃及以及对拉姆拉－巴勒斯坦、太巴列－约旦和大马士革的“宗德”（征兵区）的权利。这样划出的边界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只有短时间的例外。

伊本·图格杰任命了一位黑人宦官卡富尔统率他的军队，后者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把无可争辩的军事、行政和外交才能同虔诚的逊尼派信仰结合于一身。当他还是小孩子时，就作为奴隶被带到库斯，他比任何前任更能与伏斯泰特的人民保持一致，愿意同他们打成一片。伊本·图格杰死后，卡富尔在伊本·图格杰的两个儿子，乌努朱尔（334/946－349/961年）和阿里（349/961－355/966年）的最高权力下面，治理伊赫什德国家。从355/966年到他逝世的357/968年，卡富尔以“乌斯塔赫”（al－Ustadh）的称号，使用自己的名义在埃及和南部叙利亚行使权力，而他的权威得到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承认。

埃及和叙利亚的安全日益没有保障，这成了卡富尔统治时期的标志。除了西面存在法蒂玛的威胁外，还有来自南面新出现的努比亚人的侵犯。后者在339/950年进攻几个绿洲，在345/956年又进攻阿斯旺。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的贝都因人则袭击朝圣的商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忙于在北非镇压叛乱的法蒂玛人正执行一个通过其盟友 180（特别是卡尔马特教派和努比亚人）来掠夺埃及的政策。另外，这些事件又与由于不充分的洪水造成埃及经常性的粮食短缺有关。贝都因人和努比亚人一样都要购买粮食，当埃及的粮价上涨而使贸易条件对他们实在太不利时，他们就依靠武力以便吃得便宜些。

因此，卡富尔大力加强军队，把从上埃及市场上购来的黑奴编入军队。卡富尔这些部队从来没有完全并入由白奴（ghulam）、突厥人、代拉米人组成的伊赫什德部队，双方形成壁垒分明、互有敌意的集团。卡富尔竭力把那些对他不利的同僚排挤走，而又用赠送巨额“伊克塔”的手段收买另一些人的忠诚。在他死后，高级军官无法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找到继承人，只好听任伊本·福拉特的摆布。卡富尔采用的那一套制度他死后

① 宗德（djund）：相当于一个征兵单位的地区。

全被废除。如果在358/969年春天集中在伏斯泰特的军事首领中有一位具有卡富尔的品质，那么与马木路克相似的政权就会早300年在尼罗河两岸建立起来。

成为帝国的埃及

埃及最初的三位法蒂玛伊玛目

在358/969年初夏，法蒂玛将军贾瓦尔在伏斯泰特下游的尼罗河两岸取得了一次胜利，使他逼近这座城市，并迫使伊赫什德王朝和卡富尔麾下的头领们逃往叙利亚。后者在联合起来、保卫国家、抵抗柏柏尔人入侵问题上的无能是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虽然他们在作战技术方面有无可否认的优势，本来可以使他们避免这次失败。手中掌握大量经费的宣传人员为法蒂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们对公众舆论施加心理影响，这些公众舆论由于卡富尔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而无所适从，更由于非常严重饥荒的影响而陷于瘫痪。伏斯泰特的伊拉克主要人物同情阿里派，使得事情能够水到渠成。凭借武力结束埃及国家的不稳定状态，这一漫长过程取得了成功。穆仪兹和他的继位者由于懂得如何进行政治和思想战，因此使用普普通通的军队就取得了光辉的成果。

当贾瓦尔为他的君主法蒂玛伊玛目穆仪兹征服埃及时，穆伊兹还在伊弗里基亚。贾瓦尔在邀请穆伊兹来埃及之前还有两项任务非得执行不可：建立一个配得上接待哈里发的首都和保证国家的安全。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伏斯泰特北面的开罗（*al－kahira*），在那里为伊玛目修建了一座宫殿、一座清真寺殿堂（后者就是今天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和供各军团使用的兵营。他争分夺秒地营造，在360/971年建成了第一批建筑物。于是，贾瓦尔送信给他的君主，宣布他的新首都已在等待他的光临。

181

保证埃及的安全则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现在需要对法蒂玛的教义提上几笔，以确定它在这个时期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地位。穆仪兹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和先知精神继承人阿里的儿子侯赛因的后裔。这一家系原则曾是阿里派反对先知家族迫害者伍麦叶王朝和以后反对被指摘私吞先知家族遗产的阿拔斯王朝的借口。与承认阿里十二位后代的伊玛目什叶派同时存在的还有只承认七位后代的伊斯玛仪什叶派，后者是这个运动中提出最激进的宗教和社会要求的一派。源出于伊斯玛仪派的卡尔马特教派在3/9世纪末拿起武器反对阿拔斯王朝的神权政府。它怀疑宗教仪式与社会、家庭伦理，可以说是那些尚未与新的城市中心同化的人所具有的秘密愿望的反响。但它无法吸引除少数杰出人物外的中间阶层，它在军事失败后要继续生存的唯一途径是在它控制的一小块领土上建立起政治体制，并用它的军事力量为外国野心服务。

法蒂玛运动的起源与之相同，但它在4/10世纪初期从卡尔马特教派分离出来，当时后者正将其影响扩大到叙利亚。法蒂玛伊玛目马赫迪·乌巴杜拉离开塞莱米耶来到伊弗里基亚，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哈里发国家。他的继承人依靠少数柏柏尔人部族的献身精神占有北非和西西里的大片土地。他们随即进行征服埃及的准备，这是征服巴格达前的最后步骤。他们宣传的伊斯兰教教义并不能在埃及引起震动：宗教仪式上的微小变

动，妇女对遗产享有平等权利但仍对她们采取颇为严厉的道德限制，这些都不足以抵销伏斯泰特对逊尼派的信仰，况且那里的逊尼派还为忠诚于先知家族的精神所打动。贾瓦尔在他致伏斯泰特人民的信中曾答应恢复朝圣，重开圣战，整修清真寺和给清真寺工作者付报酬。他并不需要去对付任何宗教反对派，他保留了原来的执法官，让他们继续在阿姆鲁清真寺从事审判工作。当然，和接近十二伊玛目派的公开教义同时并存的确实还有为初入教派者设置的秘密教义。

公开谴责宗教仪式，特别反对朝圣的卡尔马特教派，并不因为与法蒂玛派接近而有所让步。战争的借口是由于贾瓦尔在伏斯泰特陷落的几个月后派出了一支柏柏尔军队侵入叙利亚。原来伊赫什德王朝统治的地区——拉姆拉、太巴列和大马士革——被库塔 182 米人将军贾法尔·伊本·法拉赫占领。他利用赛义夫·道拉和纳西尔·道拉死后哈姆丹王朝抵抗削弱的机会，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刚被拜占廷占领的安条克。但是他不得不召回他的军队，因为他在大马士革受到卡尔马特教派的攻击。后者以巴格达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义行事，意在重新控制叙利亚。自从卡富尔死后，他们就把这个省份纳入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贾法尔·伊本·法拉赫在360/971年被杀身亡，法蒂玛撤出叙利亚，贾瓦尔非常艰难地打退了包围开罗的卡尔马特教派。

公元973年6月（回历362年9月），伊玛目穆仪兹进驻他的新首都和他的宫殿。363/974年春天，卡尔马特教派又一次进攻开罗，但被穆仪兹的儿子埃米尔阿卜杜拉挡了回去；他们又去攻打叙利亚，也不得不放弃进攻。于是，在东面恢复了安全。在北面，由于同拜占廷达成协议，地中海的商业航运得以发展。在南面，同努比亚基督教政权签订的条约（巴克特条约）重新生效。事实上，法蒂玛帝国的真正才能是经商。在这方面穆仪兹的顾问雅库布·伊本·基利斯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是一个伊拉克犹太人，是在叙利亚经商的商人，在卡富尔统治时期皈依伊斯兰教并成为穆仪兹征服埃及时的情报人员。他在穆仪兹的儿子阿齐兹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大臣，还被公认为精通伊斯玛仪派教义的博学之士。他执行一项聪明的外交政策。他宁可支持在叙利亚的保护国，而不愿进行花费浩大的军事行动，他主要关心的是发挥经济关系的润滑作用。他在那个省里拥有农业资源，能使他在供应不足的年份把小麦运进埃及，甚至还出口到拜占廷帝国。许多历史学家们还不怎么理解这个利润丰厚的谷物买卖的重要性，由于旧开罗城秘库收藏的文件，人们才得以认真研究伏斯泰特犹太商人所从事的活动。这是联结从南欧和北非到印度洋和非洲之角的费用昂贵或者说十分昂贵商品的远程贸易。伊斯玛仪派的商人像在叙利亚一样，同样也活跃于也门和印度。他们在他们驻足的城市建立起足以表明他们信仰的社会。

一俟卡尔马特教派被打败，埃及的饥荒成为过去，朝圣活动得以在363/974年恢复，麦加和麦地那可以听到法蒂玛君主祈祷的声音，通过尼罗河小麦源源不断地供应。来自整个伊斯兰世界各个地方的朝圣者齐声赞美开罗的王朝。

在阿齐兹统治下（365/975－386/996年在位），埃及经历了平静和繁荣的年代。它的影响遍及地中海南部、北非、阿拉伯半岛以及叙利亚的中部和南部。直到雅库布·伊本·基利斯逝世（381/991年），埃及对叙利亚一直执行十分谨慎的政策，对的黎波里更

183 是如此，因为的黎波里同哈姆丹王朝和同拜占廷隔海相望，并且有可能从这里运走叙利亚的部分小麦。从 380/992 年到他逝世的 386/996年，阿齐兹发动了更具冒险性的军事行动。他引进了突厥装甲骑兵和改良的围城机械，并从369/980 年起依靠这支经过彻底改造的军队，进攻位于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的统治者以及他强有力的拜占廷保护者。与此同时，他在大马士革设置一名法蒂玛总督，把贝都因人逐出巴勒斯坦。阿齐兹目睹他将军们所取得的胜利，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又试图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亲自带领去攻打拜占廷帝国，但未能如愿。

阿齐兹遗留给他儿子哈基姆的局势并不如表面上显示的那样辉煌。哈基姆从 386/996 年统治到 411/1021 年。当时最富有的帝国的并立首都伕斯泰特和开罗的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柏柏尔、突厥和黑人士兵、伊拉克和叙利亚商人、手艺人、清真寺管理人员和其他官员都蜂涌到据说是遍地黄金的这两个城市。各个行省交纳的贡金和对埃及过境贸易征收的税款确实形成金银的积累．然而，财政收人的主要来源（不管是实物或是金银），还是埃及的农村或者各省城市的手艺人，他们因而受到损害。包税人和财务官吏把他们征得税款的大部分中饱私囊，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常常使伕斯泰特的逊尼派穆斯林掀起一种反对少数集团的倾向，这种态度早在雅库布·伊本·基利斯时期已经有所流露。开罗的朝臣、官员、军事首领和大商人拥有巨额钱财，以至于社会受到短缺威胁、需求大大超过供应时，物价加剧上涨。于是货物短缺的现象向周围的市场扩散，引起贝都因人和各省居民骚动。

突厥人在军队中的迅速晋升和由此而得到的经济利益引起柏柏尔部族人的妒忌，他们在阿齐兹逝世时利用哈基姆年幼攫取权力。受迫害的东部士兵和斯拉夫阉人（“萨卡利巴” *al-sakaliba*——白奴）、基督教徒和伊拉克官员结成联盟来清除柏柏尔人。

哈基姆是历史上在一个辽阔的帝国中行使绝对权力的最后一位阿拉伯君主。他不设大臣，只设一个行政公署首脑，由此人充当伊玛目和臣民之间的中间人。哈基姆很快也停止任命军队长官，而代之以在进行战争时指定一位将军负责。他处决了许多不诚实的执法官，但一旦遇到一位公正的官员时，他充分尊重其独立性，很少例外。在他年轻时，哈基姆就目睹阿齐兹的朝臣们阿谀奉承的行为而对此深恶痛绝。后来，如果没有他的老师巴尔贾万的保护，他恐怕早被库塔米人杀害了。他毕生都厌恶和蔑视宫廷侍从。他喜欢经常去伕斯泰特，看看那里的市场（*sak*）和贫民区。不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他

184 直接和逊尼派的手艺人和商人接触。他渐渐知道宫廷的奢侈和大发横财给国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文武官员在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间筑起的障碍。他试图通过处决他怀疑不诚实和有个人野心的人来清除这些中间障碍物。但是，他没有成功，因为伕斯泰特的逊尼派人士不支持这样做。他忍受不了绝对权力加给他的精神紧张，竭力试图找出一个解决办法。但是，他的神经实在绷得太紧了，以至最后精神失常，经常发作一阵阵嬉怒无常、疯狂绝望的病症。

他的宗教政策是前后不一贯的。他希望法蒂玛的礼拜仪式在伕斯泰特能够得到接受。为了讨好逊尼派人士，他强迫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改宗伊斯兰教．并在他们举行礼拜的地方建造清真寺。399/1009 年他甚至下令把耶路撒冷的耶稣圣墓推倒，在大致同一

时间（396/1006－404/1013 年），他对逊尼派礼拜仪式采取宽容态度，并任命逊尼派的经师在他创办的经院（dâr al-‘ilm）[12] 任教。随后他又一反常态转过来禁止逊尼派的礼拜仪式，到了 408/1017 年他又让一些波斯人宣讲他的神性。这是一次失败：没有能够逃走的宣讲人遭到屠杀，而第二年哈基姆眼看伏斯泰特北部的居民区遭到黑人士兵的洗劫。他模模糊糊的感觉到，他企图不经过政府机构和军队作为中间人而直接把王国建立在逊尼派城市中等阶级的一致支持上，这一努力已遭到失败。于是，他对伏斯泰特失去了兴趣，独自登上穆卡塔姆，准许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只要本人愿意可以公开放弃 10 年前他强迫他们改宗的伊斯兰教。他遭受暗杀被诡称为失踪，这是他的亲信随从策划的，因为他们害怕进一步的清洗。崇信他的神性的一些教徒在叙利亚建立了德鲁兹教派。

在哈基姆统治期间，阿拉伯“部落”掀起多次骚乱。一个名叫阿布·拉克瓦的伍麦叶人煽动扎纳塔柏柏尔人和巴努－库拉阿拉伯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叛乱。他在多次打败法蒂玛的军队后于 396/1006 年威胁伏斯泰特。然而平民百姓对哈基姆表现了忠诚，他们检举宫廷和柏柏尔军队中的叛国行径。在努比亚人的帮助下，阿布·拉克瓦被俘获，并在开罗附近被处决。当时，法蒂玛的军队已经暴露出缺乏效率的迹象，这支军队花费了国库 100 万第纳尔才肯出发。因此在 402/1011 年当巴勒斯坦的塔伊族酋长伊本·贾拉赫抬出麦加哈桑团伙的统治者为拉姆拉的哈里发时，哈基姆采取收买接近伊本·贾拉赫的某些人的手段，而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使反对他的人回到麦加。同样，407/1016 年征服阿勒颇省和阿勒颇城也是使用了巧妙的外交策略的结果。

5/11 世纪的大危机

185

在查希尔统治下（411/1021－427/1036 年在位）和在他的儿子穆斯坦西尔统治下（427/1036－487/1094 年在位），执行的政策不再出自伊玛目的意志，而是由压力集团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直到 454/1062 年，帝国的局势在上文提到的那些弱点影响下不断恶化。军队由地位各不相同、而又常常互相敌视的各个集团组成：有阿拉伯同盟者柏柏尔人、白奴、黑奴和雇佣兵。在和平时期，军队耗费国家收入的大部分。当进行战争时，还必须为他们装备坐骑和武器并发给额外的军饷。当兵不仅仅意味厕身行伍，更意味着保证获得国家的年金。尽管敕令一再重申取消那些不再为国家服役的士兵的后代在领取国家年金花名册上的名字，但执行时却故意马马虎虎。由于每一个集团分别由一个特定的行政公署管理，而国库可支配的资金又不能随有资格领取年金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伊玛目、谢里夫、文官、部队的家族的人数越来越多），因此经常出现利益的冲突。士兵们因为军饷太少而去抢劫农村和城市郊区。军队不再是维持秩序的因素，它自身倒成为动乱的基本根源。

---

[12] 经院（*dar al-‘ilm*）：指学习的房舍，由法蒂玛伊玛目哈基姆创立的一种进行宗教教育和教义宣传的机构，它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在某些方面它预示了塞尔柱王朝创办逊尼派古兰经学院（“马德拉沙”，madrasa）作为传播占统治地位宗教思想的中心。

城市过分拥挤:因贝都因人入侵而被赶出农村的人们住在卡拉法墓地,上层人士则纷纷离开边远地区来到中心城市伏斯泰特或开罗寻找安全保障。商人们等待穆斯林重大节日来临的时候忧心忡忡,因为抢劫关闭的市场越来越频繁。粮食短缺日趋尖锐和经常。城市居民竟然夺走农民的耕牛和准备让洪水浸泡的土地,政府显要在这些土地上饲养大群牲畜,为富裕的城市增加肉类供应。每当预见到尼罗河水量不足时,投机活动就促使小麦价格上涨。418/1027年到437/1045年担任大臣的贾尔贾拉伊用强制实行单一粮价的办法来制止价格上涨,并且鼓励面包商人竞相削价,但是所有高级官员,包括伊玛目本人在内,都从事屯积居奇和投机倒把。

沙漠边缘地带居民中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情况也变得明显了,叙利亚三个大父系氏族群体——塔伊、卡尔布和基拉布——在415/1024年结成联盟,并派出密使与尼罗河三角洲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部落进行接触。顺应环境的团结克服了原来的宿怨:他们希望得到饲养他们牲口的耕地,偶尔也抢劫城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冬天变得更加干燥了。直到433/1044年,法蒂玛将军迪兹比里尽管没有得到开罗多少支持,却仍能控制叙利亚各部落。在上埃及,他利用了齐里·伊本·巴迪斯的叛逆行为,把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送到的黎波里塔西亚和伊弗里基亚,这些人在上埃及地区大肆掳掠(442/1050年)。

186

451/1059年,法蒂玛王朝赢得它最后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一位突厥人将军白萨西里俘虏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卡伊姆,并且在巴格达的清真寺公开作了有利于穆斯坦西尔的祈祷。然而几个月后,塞尔柱王朝的首领、东方逊尼派的新教长图格里尔·贝克重新占领巴格达并恢复了卡伊姆的地位。但局势在462/1070年又有反复,当时法蒂玛将军纳西尔·道拉在亚历山大发动叛乱,承认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国家,464/1072年他把穆斯坦西尔囚禁在开罗,并向塞尔柱王朝求援。这种情况下,法蒂玛王朝原是有垮台可能性的。

从454/1062年开始并于457/1065年以后陷入非常严重境地的一次大饥荒饿死了埃及很大一部分居民。穆斯坦西尔变卖了王朝的珍宝也仅仅靠乞讨活了下来。整个大厦被他庇护过的那些蛀虫破坏殆尽,正在塌陷。468/1073年伊玛目向巴勒斯坦总督、亚美尼亚人巴德尔·贾马利寻求支持。这位粗鲁的武将在公元1074年1月(回历466年5月)来到开罗,处决了几个主要负责的军官,解散了持异见的部队,并围绕他统率的亚美尼亚队伍重建起一支小而有效的军队。他接受了拥有全权的大臣称号,然后前往镇压在蹂躏上埃及的黑人;468/1076年回师保卫遭受塞尔柱王朝的盟友、突厥人阿特西兹进攻的开罗。469/1077年他把莱瓦特柏柏尔人赶出尼罗河三角洲,把这个部落的2万名妇女送到市场上出卖。与此同时,他又挥兵跨越叙利亚,他未能夺回大马士革,但设法巩固了法蒂玛王朝对巴勒斯坦各港口的统治。他派人在叙利亚的城市四周筑起石头城墙以加强防卫。开罗现存的三座法蒂玛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城门就是在巴德尔·贾马利的命令下修建的。

他免去农民三年的税以便他们重新耕种已被荒芜的土地。他重新划分行政区域,重建了政府和军队,从而把法蒂玛政权的寿命延长了一个世纪。卡尔卡尚迪和其他一些作

家的著作在叙述法蒂玛政权政府机构的作用时都提到由巴德尔·贾马利改革产生的国家，它与第一个法蒂玛国家完全不同。

6/12世纪：法蒂玛政权的垂死挣扎

454/1062－468/1076年危机之后，法蒂玛帝国已经死亡。为穆斯坦西尔做的祈祷不再在伊弗里基亚或麦加，也不再在阿勒颇或大马士革听到了。埃及在尼罗河流域周围进行了整顿，正逐步从它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亚历山大通过与意大利开展贸易重新繁荣起来，而上埃及的库斯则在销售来自努比亚的黑奴和来自印度的香料。487/1094年巴德 **187** 尔·贾马利逝世，接着穆斯坦西尔驾崩。巴德尔·贾马利的儿子阿夫达尔·库泰法特宣布把穆斯坦西尔的幼子哈桑立为哈里发而把长子尼扎尔监禁起来。但是，在塞尔柱王朝领土上伊斯玛仪派“达瓦”（*da'wa*）[13] 的教长哈桑·伊本·萨巴赫却承认尼扎尔为伊玛目；他领导的“阿萨辛”运动，像德鲁兹运动一样，是在埃及之外单独发展的，这个运动结束了传统的法蒂玛“达瓦”。

穆斯坦西尔的统治几乎长达四分之三世纪，就在比他的统治长不了多少的一段时间里，邻近这个王朝结束之前，竟然嬗传了6位哈里发。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真正行使过权力；也没有任何一位由自己选择继承人。权力掌握在军人大臣的手里；他们有的靠武力夺取权力，有的则是继承权力，其中有几个相当出色，比如塔拉伊·伊本·鲁齐克。但也有些只不过是暴发的强盗而已。在法蒂玛教义的传布显然已经销声匿迹的埃及，他们标榜起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巴德尔·贾马利的孙子阿夫达尔·库泰法特提倡十二伊玛目派的教义，并为四种礼拜仪式设置四个执法官。里德万是逊尼派教徒，他在亚历山大开设了一座沙斐仪派的古兰经学院。老百姓对哪一派伊斯兰教掌权这一门面装璜漠不关心；依恋王朝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伊斯兰教的权力中心建立在埃及土地上而为此感到自豪。只有一位号称“伊斯兰之剑”的非穆斯林大臣巴赫拉姆的出现不怎么受人欢迎。

巴德尔·贾马利死后三年，法兰克人进入穆斯林的领土，推翻了塞尔柱王朝，并 **188** 于492/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他们在阿斯卡伦打败了法蒂玛人。除了少数几次小冲突外，那里的情况就这样维持了多年原有的局面。法兰克人和法蒂玛人之间没有积极的合谋关系，而在法蒂玛一边则相当冷淡，这是容易理解的。在4/10世纪，法蒂玛国家的财源来自征收铸币贡金和从事谷物贸易。它要控制广阔的领土并守住叙利亚的贝卡谷地和戈兰高地。6/12世纪谷物价格下跌，这一方面是由于5/11世纪灾荒后人口锐减，同时也是由于叙利亚出现另一次气候变化后扩大了耕地面积。黄金在叙利亚十分罕见，它主要流通于印度和西方之间，因而法蒂玛人所需要的只是控制住在尼罗河流域和巴勒斯坦海岸的贸易站，那里像亚历山大一样，经常有意大利商人出入。军队都集结在巴勒斯坦南部和埃及，准备对付想在开罗恢复逊尼派统治的塞尔柱人。对法蒂玛人来说，十字

[13] 达瓦（*dawa*）既指由秘密的或半秘密的传教士传布的经常为伊斯玛仪派或法蒂玛派所宗的某种什叶派教义，又指传教士们为宣传目的所用的各种手段。

军在叙利亚的存在还是有利的，因为可以在塞尔柱人和埃及之间设起一个屏障，并使贸易从红海转到尼罗河流域。549/1154年努尔丁在大马士革掌权以前，未出现穆斯林为把法兰克人驱逐出叙利亚而团结起来的任何迹象。对法兰克人的存在埃及只受到道义上的伤害，并不比其他穆斯林国家更加关心。

努尔丁依靠一支强大的军队，着手重新征服叙利亚。脆弱的法蒂玛国家、军队已经分裂成对立的集团，不得不在政策上作出抉择：要么支持反对十字军的立场——这种政策必然会激怒法兰克人；要么求助于法兰克人，反对希望接过塞尔柱人恢复逊尼派政权计划的努尔丁。开罗争夺权力的各个派系，对这二种方案犹豫不决，一会儿倾向这个，一会儿又倾向那个，有时同时推行两个截然不同的政策，希望以此控制局势，结果加快了这个国家崩溃的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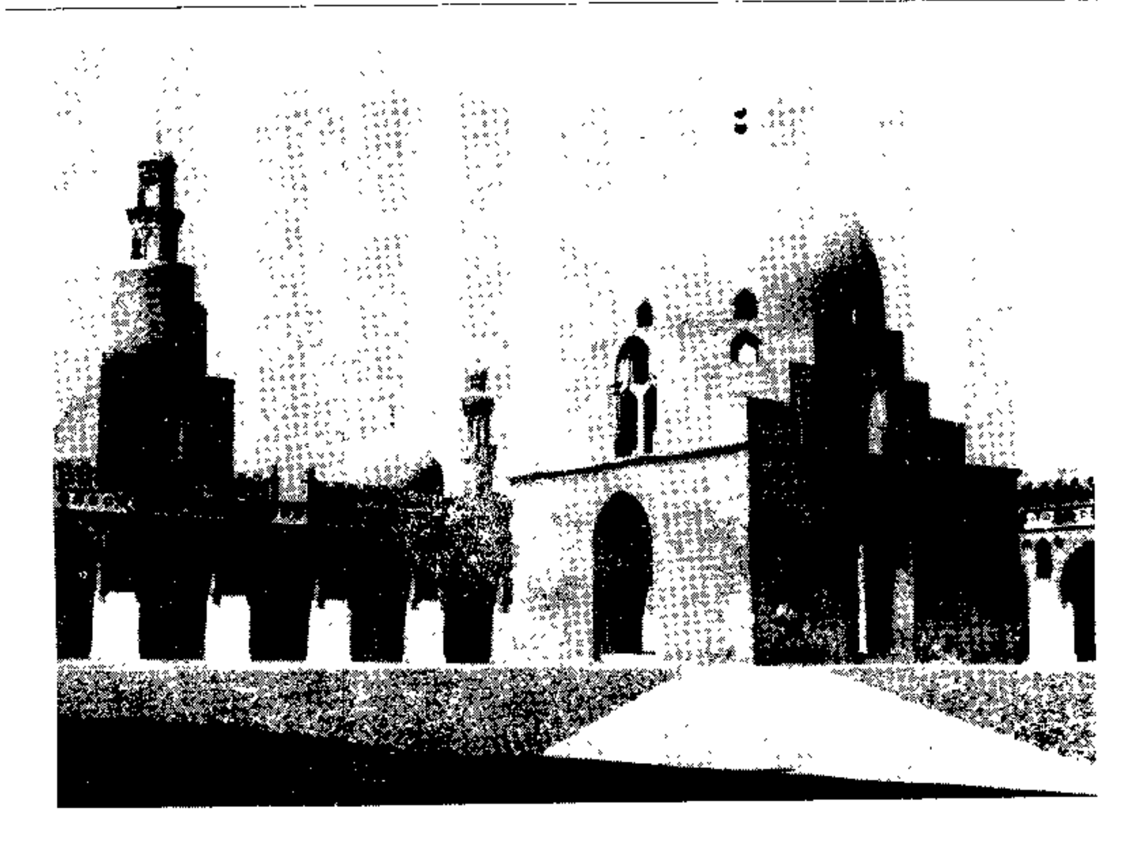
548/1153年，十字军放弃关于巴勒基坦问题的中立立场，夺取了阿斯卡伦。努尔丁在叙利亚中部建立政权促使十字军要在埃及寻求补偿。法蒂玛王朝大臣们（通常都当过库斯的总督）最关心的是保护红海南部通过上埃及到亚历山大的重要通道。他们原来就准备给努尔丁一笔大数目的金第纳尔，这样可使他们没有必要在东部边界建立防御工事。然而，塔拉伊・伊本・鲁齐克向法兰克人占据的巴勒斯坦发动了两次远征。他虽然取得胜利，但由于努尔丁按兵不动，没能得到持久的战果。556/1169年，法兰克人发动了对埃及的进攻。他们打算在564/1169年以前这段时间里再发动四次进攻，其中有些是应开罗大臣们的请求而行动的。只是到了558/1163年法兰克人才遇上努尔丁派来的希尔库赫和他的侄儿萨拉丁指挥的军队。由于大臣伊本・萨拉尔和哈里发阿迪德一方自食其言，突然背盟和背叛，这次军事行动毫无结果。因此希尔库赫在564/1169年自己出任法蒂玛大臣。他不久去世，职务由萨拉丁取代。

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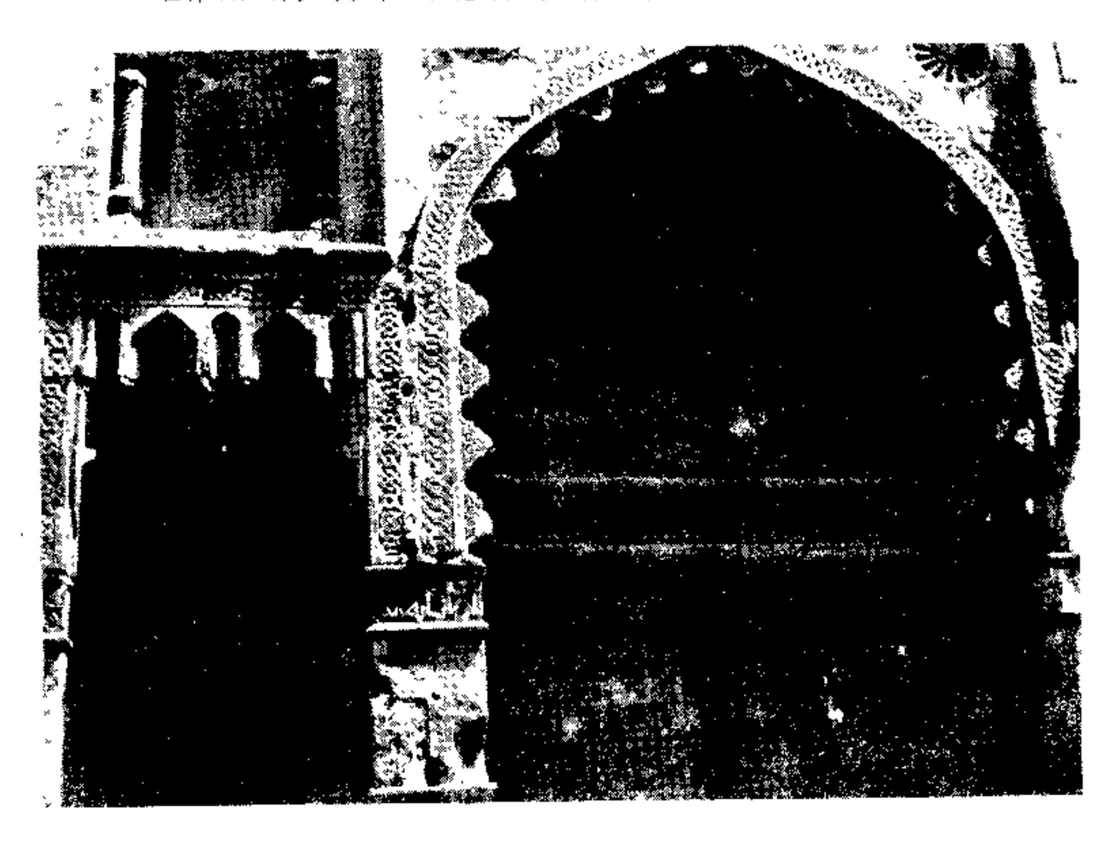
从而，最后一位法蒂玛大臣竟然是一个逊尼派库尔德族将军，或者说是大马士革君主、逊尼派突厥人努尔丁的陪臣。人们祈祷时，在伊玛目阿迪德的名字后面必然要提到萨拉丁的名字。这种情形对伊玛目来说实在是无法容忍的，他命令一个宦官贾瓦尔去刺杀萨拉丁。萨拉丁知道这件事后，把贾瓦尔处决了。于是，开罗的黑人卫队哗变。接着出现了非常激烈的斗争，阿迪德不得不抵赖为他捐躯的黑人士兵与他的关系。卫队惨遭屠杀。法蒂玛哈里发的谎言对萨拉丁颇有用处，尽管努尔丁人进行谴责，他拒绝就此罢手。到566/1171年，一个波斯人公开地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义宣读了“呼图白”，因而就无须再把阿迪德废黜，埃及的法蒂玛伊玛目国家从此不复存在。就在这个时候阿迪德令人皆大欢喜地寿终正寝了。这个存在了两个世纪的政权最后在开罗居民漠不关心的情况下退出了政治舞台。

566/1171年以前在埃及建筑的伊斯兰纪念物

到开罗参观的人能够目睹的大多数美丽的阿拉伯巨大建筑物都属于阿尤布和马木路克时期。在开罗旧城和埃及省，除了在卢克苏尔、库斯和亚历山大的少数例外，十字军时期以前的中世纪建筑物遗迹，一般都是属于基督教的。然而，阿拉伯人在埃及头五个



图片 7.1 开罗的伊本·图伦清真寺：庭院的部分景观，宣礼塔和戒斋亭



图片 7.2 法蒂玛统治时期的清真寺：清真寺正面 1. 世纪的装饰

176



图片 7.3 伏斯泰特法
玛统治时期的坟墓

世纪还是遗留给后代一些建筑物。它们数目不多，常常经过重大的重建和改建。但是它们的规模、它们的风格和它们从建成时就具有的或者在历史进程中获得的精神力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四座主要清真寺是由四位有声望的埃及统治者或以他们的名义建造的。伏斯泰特大清真寺是由总督阿姆鲁·伊本·阿斯于 20－1/641－2 年在靠近尼罗河处修建的。经过几次的扩充、修改和现代化，已不再看得出原来的样子了。埃及文物部门在 1970 年到 1975 年间对清真寺遗址进行了重要的考察，搞清了建筑物多次扩建的年代。我们希望他们公布考察报告和图片，使我们能得到进一步的信息。

265/879 年艾哈迈德·伊本·图伦在伏斯泰特东北的卡塔伊高地修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清真寺（图片 7.1）。由于它从来没有完全供普通居民使用，所以它比这一时期许多其他建筑物保护得更好也更少改动。在一个有生气的热闹非凡的城市的中心，

190





(a) (b)

图片 7.4 法蒂玛统治时期埃及的釉绘陶器
7.4(a)：10 世纪的罐
7.4(b)：11 世纪的碗

这座清真寺朴素、庄重和严肃的建筑结构保持着一派肃静和虔诚的气氛。英国历史学家 K.A.C. 克雷斯韦尔曾经对这个宏大的建筑群作过透彻的分析：围绕近乎方形庭院的围墙角边长度为 92 米，开了四处优雅而高大的门廊。朝向麦加方向一边的门廊配有五排圆柱，其他三边配有两排圆柱。开罗旧城－伏斯泰特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和精神首都的使命正是由一位虔诚的突厥武士建筑的这座以烧制砖建造的并充满亚洲气息的令人赞叹不止的历史性建筑物而第一次得到肯定。

当 359/970 年贾瓦尔为他的君主穆仪兹建筑开罗时，他在卡塔伊以北、首都的中心建起了一座宏大的清真寺，那就是举世闻名的爱资哈尔。它表现出来的生气盎然同伊本·图伦清真寺给予参观者肃穆和与世隔绝的感觉形成强烈的对比。开罗是非洲人创建的；非洲的文化移植到伊斯兰教是爱资哈尔提供的教导所取得的成果。这座寺庙作为向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传播穆斯林教义的特殊源泉所取得的成功足够表明该建筑物必定经历过多次扩展；的确，只有庭院还显示出法蒂玛王朝原来的设计。埃及的整个历史和它在边界以外所起的作用在这个建筑群里表现得非常明显。开罗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开端。

400/1010 年哈基姆在开罗城北边缘地区修建了另一座大清真寺。我们刚叙述的四座清真寺的地址说明在伊斯兰创建时期最初三个半世纪中，埃及首都的重心有规则的逐步向北－东北的方向移动。然而，真正的中心基本上由贾瓦尔确定，哈基姆对这个事实心中有数。他修建的清真寺没有获得爱资哈尔那样辉煌的成就，从此以后，首先是开罗城或者是开罗同伏斯泰特之间的地区成了阿尤布和马木路克君主们营建居住区主要建筑物

的所在。哈基姆修建的清真寺曾长期被废弃，后来加以修复供伊斯玛仪派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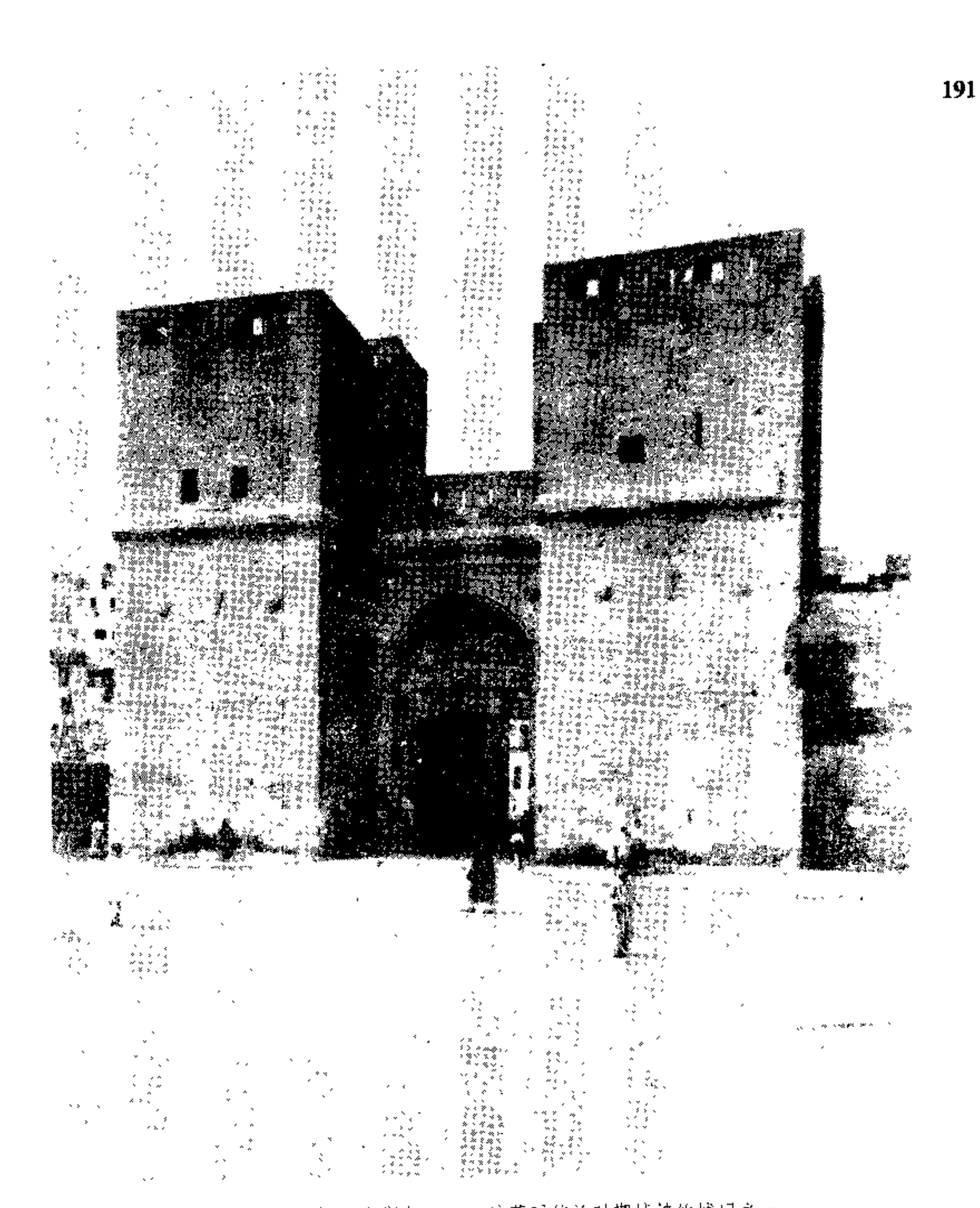
出身是亚美尼亚人的著名大臣巴德尔·贾马利把石头建筑物引进到以前一直使用砖的开罗。他下令改建首都的城墙，并建起宏伟的城门。人们至今还能欣赏其中的三座：其一是这座法蒂玛城市主轴以南的巴卜·祖瓦伊拉城门；其二是同一个主轴以北的巴卜·福图赫城门；其三是位于东北的巴卜·条斯尔城门（图片 7.5）。这三座城门所包含的建筑思想是十分高超的，既要求有威严的外表，又要求具备实际军事效用。由于掌握了细致的石头切割术，这两个目的均已达到。确实，6 世纪曾经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建造过许多教堂的拜占廷石匠的优良传统被亚美尼亚人在遥远的埃及山区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6/12 世纪，这种技能再次在整个法兰克的和穆斯林的东方得到传播。

还有四座较小的清真寺建于法蒂玛统治时期的下半叶。在莫卡塔姆山上 478/1085 年建造的朱尤希殉教者清真寺，就像在守卫这座伟大城市的死者和生者的命运；它那种在埃及不同凡常的风格再次引起埃及大规模建造类似风格亚美尼亚教堂的潮流（图片 7.6）。519/1125 年，较小的阿克马尔清真寺建造在哈基姆清真寺和爱资哈尔清真寺之间的开罗主要通衢上。它正面用的经过雕琢的石头和它装饰华丽的正门宣告宗教建筑又一次风格上的革命。527/1133 年前后建于伊本·图伦清真寺东南陵园内奉献给赛义德·鲁卡亚的虚设陵墓，证明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力争把忠诚于伊斯兰教神圣家族的朝圣者都吸引到开罗来。怀着同样的政治和宗教意图，大臣萨利赫·塔拉伊士 555/1160 年下令在巴卜·祖瓦伊拉城门南面建造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清真寺。该清真寺美丽的正面采用并发展了阿克马尔清真寺的某种格调，而且用当时的审美情趣加以提高，它是宗教建筑在 6/12 世纪有迅速进步的明证，也预示了阿尤布和马木路克时代艺术的繁荣。

结束语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五个多世纪以后的566/1171年，埃及成了东方最富庶的地方。由它的作坊生产出来的陶器、玻璃器皿、纺织品和金属与木制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程度。农业保持了几千年来获得的特点，同时吸引了来自亚洲的一些新的庄稼品种。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军事建筑都涌现出一些有影响和具有纪念意义的成品；随后的几个世纪必然会更加果实累累。用阿拉伯文创作的文学不断发展，渐渐失去它的地方性。居民在首都的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历史著作和对埃及大地上种种风貌描述的特色给予埃及文学以它特有的独创性。尽管最优秀的著作还待以后才能写出来。

但是非洲文化向伊斯兰教移植既不迅速也不完全。一大部分人，诸如上埃及的农民和外省各个城镇的手艺人，仍然信仰基督教。至于伏斯泰特的逊尼派教徒，他们对军事首领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漠不关心，那些军事首领通常是奴隶出身，统率的军队是包括不同集团的大杂烩。至于埃及的特性只有少数文献谈论到它，与伏斯泰特和开罗的迅速发展相比较，它的发展是缓慢的。然而在随后的世纪里，非洲伊斯兰教的进一步发展将由埃及的学者和苏非派教义来指导。



图片 7.5 巴卜·奈斯尔——法蒂玛统治时期城墙的城门之一

192



图片 7.6　朱尤希清真寺，从东边看到的全景

现在，已经到了历史学家把那些有可以追溯这条深沉河流兴起的因素汇集起来的时候，唯有这样才能使埃及的历史不再只是历代帝王将相的历史。



基督教努比亚文明的全盛时期

S. 贾科别尔斯基

与穆斯林埃及的早期关系

194

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强大的基督教王国的出现，为努比亚居民开拓了有利的发展前景①。有两个因素使该王国经济上得以繁荣兴盛。第一个因素是：以法拉斯为首都的北方诺巴迪亚（阿拉伯文为努巴）王国、与以古栋古拉（阿拉伯文为顿库拉·阿久兹）为首都的中部马库里亚（阿拉伯文为穆库拉）王国的联合，并随之组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第二个因素是：公元651年阿卜杜拉·伊本·阿比·萨尔赫领导的阿拉伯人入侵栋古拉之后签订了被称为“巴克特”的条约，从而顺利地解决了与毗邻的埃及的关系。人们主要从阿拉伯历史学家及旅行家的报道中得悉努比亚历史上这两个因素，迄今仅部分地为考古研究所证实。因此让我们对这两个因素进行具体的探讨。②

看来，阿拉伯人入侵时，努比亚的北部和中部已在栋古拉国王卡利杜鲁特统治下得到统一。因此，阿布杜拉·伊本·阿比·萨尔赫在栋古拉只签订了一项条约，而没有重视诺巴迪亚。实际上，由于诺巴迪亚与埃及直接接壤，建立一种正确的关系对他说来其实是更重要。“巴克特”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条约，在穆斯林世界尚无先例，这实际上是一个媾和或者互不侵犯条约。协议的全文保存在马克里齐的希塔特③。协议原文对以下问题作了规定：根据协议条款，阿拉伯人不得攻击努比亚；两国公民作为旅行者而非定居移民享有自由通过对方国家的权利，在此情况下当局应对另一国公民的安全负责。协议还包括一国从另一国引渡逃亡者的条款。努比亚人负责维修建于古栋古拉的清真寺以款待来访的穆斯林。努比亚还承担每年向阿斯旺总督进贡360名奴隶。另一材料（阿里·哈利法·胡马亚德·本·希沙姆·布海里）④回顾当时情况称：作为交换，阿拉伯人必须提供1300阿戴布（*ardeb*）小麦、1300卡尼尔（*kanir*）⑤酒，以及一定数量

195

① 关于基督教努比亚的早期历史，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1卷第12章。

② 对这段时期进行过探讨的主要作品，见J. W. 克劳福特（J. W. Crowfoot），1927年；U. 莫内勒·德－维拉尔（U. Monneret de Villard），1938年；P. L. 欣尼（P. L. Shinnie），1954年，1971年、1978年（a）；B. G. 特里格尔（B. G. Trigger），1965年；O. 迈纳尔达斯（O. Meinardus），1967年；I. 霍夫曼（I. Hofmann），1967年；Y. F. 哈桑（Y. F Hasan），1973年；G. 范蒂尼（G. Vantini），1975年，1981年（a）；W.Y. 亚当斯（W.Y. Adams），1977年，第433－507页；A. 奥斯曼（A. Osman），1982年（a）。

③ 参阅P. 福兰德（P. Forand），1971年，第114－115页；Y. F. 哈桑，1973年，第22－24页；G. 范蒂尼，1975年，第640－642页。

④ G. 范蒂尼，1975年，第642－643页；W. Y. 亚当斯，1977年，第452页。

⑤ 关于该资料提示的内容，参阅L. 特勒克（L. Torok），1978年，第301页，注3。

的亚麻布及织物等。这样，这一条约也带有某种贸易协定的成分。总的说来，这次媾和使基督教文明在以后的整整5个世纪中得以在努比亚坚持下来。在初期，当阿拉伯军队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的广大地区并直逼拜占廷时，该条约对维持和平和对为国家发展创造条件方面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两个努比亚王国合并的时间，还必须提一提另一种假设[6]。这种假设把统一归之于公元697年登位的默库里奥斯国王。保罗斯主教的法拉斯大教堂奠基碑文使这一年份得以确认。碑刻的时间为公元707年，碑文明确指出这是该国王统治的第十一年。[7]看来统一国家之后，默库里奥斯国王把他的主要注意力转向统一努比亚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在公元8世纪（回历2世纪）初致力于使努比亚教会从属于亚历山大的基督一性论主教管区。

地域的统一和后来宗教的统一，也就是说在埃及的基督一性论教会支持下为统一的努比亚王国、南方的阿洛迪亚王国（我们对该王国这一时期的情况还知之甚少）以及埃塞俄比亚创造了一个把它们都包括在一起的共同的基点，这无疑为努比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排除了来自阿拉伯人的实际威胁，使得与埃及进行贸易成为可能以及可以按朝圣者的愿望与拜占廷保持联系或至少与耶路撒冷保持联系。这一切的结果是在随之而来的时期内发展起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努比亚文化，这可以在一种有文字的文明的成长与成熟中表现出来。这种文明的建筑与文化传统与科普特人的传统和拜占廷都有关系。后者特别在国家的行政管理、宫廷组织、房屋建筑以及工艺品制作方面成为仿效的源泉。

196

因而公元8世纪结束时，努比亚进入繁荣时期，并一直持续到公元12世纪后半叶初。此外，这个时期还存在着有利的经济状况。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是当时尼罗河的水位相对地比较高，这给努比亚的农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会。[8]

我们对这一时期政治事件的了解主要来源于阿拉伯文文献，而且主要是关于统一的努比亚王国的。它的边界北自卡斯尔堡区（阿斯旺以南仅几公里）向南延伸到第五、第六瀑布之间（艾卜瓦布）。在那里它与建都于索巴的阿洛迪亚（阿拉伯文作阿勒瓦）北部接壤。索巴在今喀土穆附近。

我们对阿洛迪亚当时的情况几乎全然不知。只有从马克里齐[9]所引的伊本·萨利姆·阿斯瓦尼的记载中得知索巴有着宏伟的建筑物与花园，以及充满黄金的教堂。记载中还说阿勒瓦的国王比马库里亚的统治者更有权威，他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统治的土地也更为肥沃。英国东非研究所近来在索巴进行的发掘，接近于可以证实这一城市宽

---

⑥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12章，第333-334页。关于合并的日期，参见，例如：L. P. 柯万（L. P. Kirwan），1935年，第61页；U. 莫内勒·德-维拉尔，1938年，第80页，K. 米哈洛夫斯基（K. Michalowski），1965年（a），第16页；S. 贾科别尔斯基（S. Jakobielski），1972年，第35-36页；W. Y. 亚当斯，1977年，第453-454页；G. 范蒂尼，1981年（a），第71-72页；又参阅L. P. 柯万，1982年。

⑦ S. 贾科别尔斯基，1972年，第36-46页；J. 库宾斯卡（J. Kubinska），1974年，第14-19页。

⑧ P. L. 欣尼，1978年（a），第569页；B. G. 特里格尔，1970年，第352页。

⑨ G. 范蒂尼，1975年，第613页；又参阅A. J. 阿克尔（A. J. Arkell），1961年，第194-195页；P. L. 欣尼，1961年，第11-12页。

阔宏大的说法[10]。最近发掘出一组用红砖砌成的教堂和教会建筑物构成的建筑群。当然，这仅仅是全貌中一个极小的部分。

迄今未能直接得到阿洛迪亚与马库里亚合并日期的资料，尽管知道在公元10世纪中叶两个朝廷已由血缘关系互相结合。这是伊本·豪卡勒在公元945－950年左右到阿洛迪亚旅行时报道的。他还援引了努比亚国王乔治斯二世的儿子斯特凡诺斯国王及其前任欧塞维奥斯国王的话。[11] 公元8世纪中叶的基里亚科斯国王被科普特传记作者迪肯·约安尼斯描绘为整个努比亚王国的统治者，"其权力远达大地的南端……"[12]但是从以后的报道来判断，阿洛迪亚也许只是暂时被并入统一的努比亚王国，而几乎整个基督教时期努比亚一直是一个分立的国家实体。

尼罗河的东西两岸

198

与努比亚王国东部边界接壤的地方居住着贝贾各部落。从公元8世纪到10世纪，他们是世界这一部分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直对埃及南部构成某种威胁。埃及南部早年一直存在着遭受布伦米人袭击的危险。布伦米人是来自东部沙漠从事游牧的贝贾人。

3/9世纪初，大多数居住在红海山区的贝贾人还仍然是"异教徒"。虽然其中有些人名义上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还有一些人—— 特别是在北方 —— 则看来处于伊斯兰教的强烈影响之下。公元831年，在一系列边境冲突之后，穆尔台绥姆哈里发向贝贾人派出一支讨伐军。贝贾人的领袖卡农·伊本·阿卜德·阿齐兹惨遭失败后，被迫承认哈里发的宗主权。正在这个时候协商出某种条约，尽管它的某些条款与"巴克特"的相同，但含义却截然不同。贝贾人必须每年纳贡，而阿拉伯人方面却没有给予任何保证。后者有权在贝贾人土地上定居。贝贾人的统治者发现自己处于附庸地位。[13]

条约并未结束敌对状态，反而创造了一个可以进一步导致冲突的环境。那些阿拉伯游牧父系氏族群体（*kabila*）所占的土地富有金矿（特别在瓦迪阿拉基干河地区），阿拉伯人对这些地方的渗透日益增强。公元9世纪，战争再次公开爆发，贝贾人原来的领导人阿里·巴巴在穆罕默德·孔米所领导的强大的阿拉伯军队面前不得不屈膝投降。根据某些阿拉伯文献：此时贡赋已经高达将近每年2400克黄金。[14]

既然经常遭受威胁，贝贾人谋求努比亚得到保护就是十分自然的了。阿拉伯人对这个问题的报道是互相矛盾的。但看来努比亚军队无疑是以某种方式参加了上述战斗。伊

---

[10] 自1981年起，由英国考察队对这些发掘陆续提出的初步报告，将在《阿扎尼亚》（*Azania*）上发表。有关以前的著作，参阅P. L. 欣尼，1961年。

[11] G. 范蒂尼，1981年（a），第117－118页。斯特凡诺斯国王的名字也是从麦罗埃的壁刻上得到证实的；U. 莫内勒·德－维拉尔，1938年，第157页。

[12] G. 范蒂尼，1981年（a），第75－77页。

[13] W. Y. 亚当斯，1977年，第553－554页；Y. F. 哈桑，1973年，第38－41页；G. 范蒂尼，1981年（a），第92－93页。

[14] 根据塔百里（al－Tabari，公元930年逝世），见G. 范蒂尼，1975年，第99页；1981年（a），第95页。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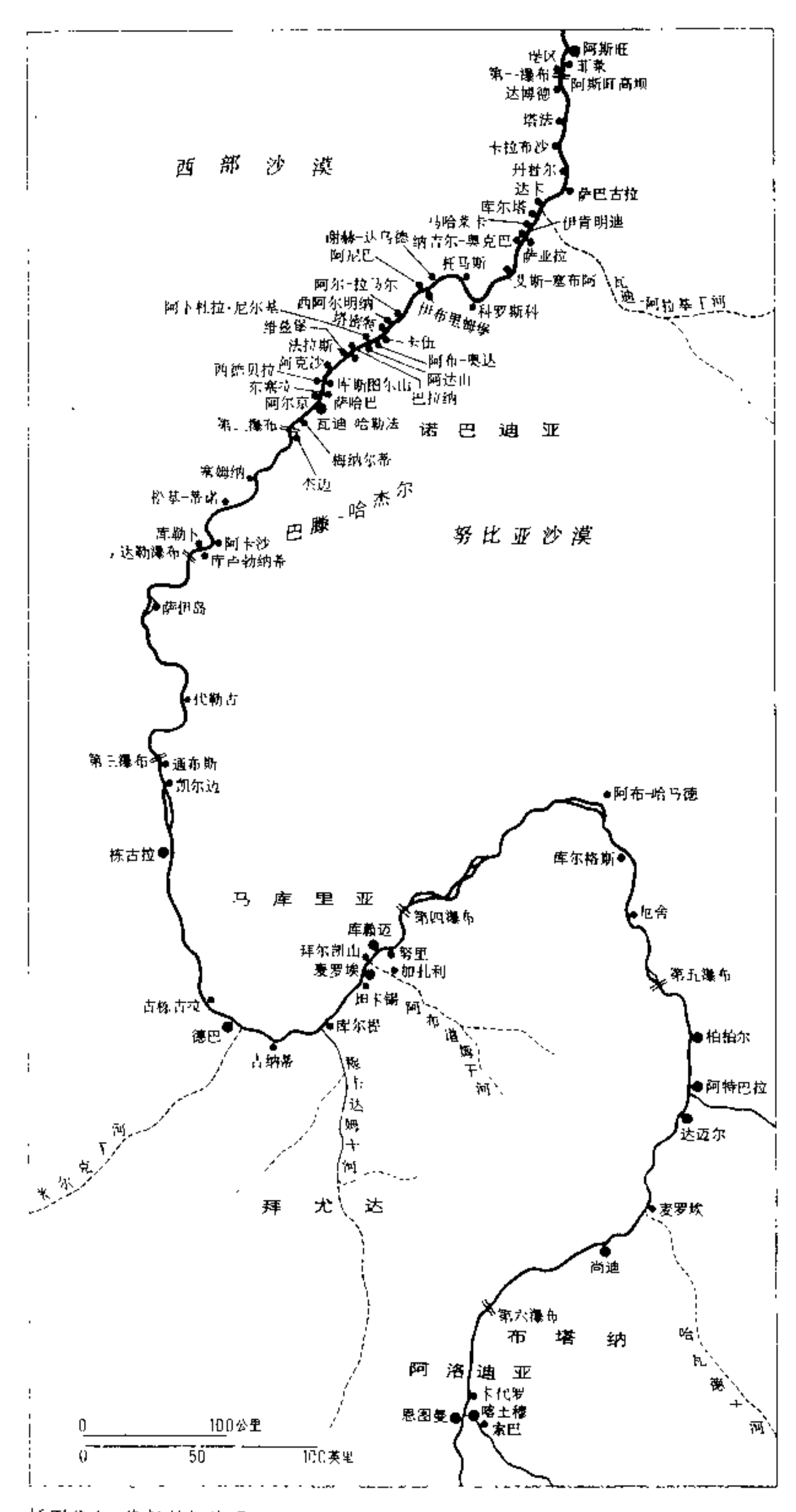


插图8.1 基督教努比亚

本·豪卡勒甚至报道说：阿里·巴巴和努比亚国王尤基（乔治斯）双双被擒，被带到巴格达的穆塔瓦基尔哈里发面前。[15] 至于乔治斯国王在巴格达的逗留情况，我们留待下文再谈。总之，即使在其全盛时期，努比亚王国东部边界以外沿红海的地段，经常遭遇敌对行为。

与居住在尼罗河流域以西的阿拉伯父系氏族群体的关系却完全不同。虽然我们了解这方面情况甚少，但从伊本·豪卡勒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从尼罗河流域经过沙漠走许多天的路程，到达一个住着一些被称作杰巴利荣人（高地人）和阿哈迪荣人的牧民的地方，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我们可以推断为科尔多凡的南部（努巴山区）和北部，而阿哈迪荣人被认为是信奉基督教的。[16] 已有证据证明居住在努巴山区（代尔人、迪林人）和达尔富尔（比尔吉德人、米多布人、通朱尔人）的某些群体与尼罗河流域讲努比亚方言的人存在着明显的语言上的联系。[17] 这是互相接触或进行迁徙的证据，努比亚王国与苏丹地区这一部分间的来往接触已部分地为考古研究所证实。例如，在艾因·法拉赫（达尔富尔北部）发现了努比亚古典时期基督教的陶器，在乍得的科罗托罗[18] 发现了稍晚时期的陶器。根据伊本·豪卡勒的记载，上述两种人都归顺于马库里亚国王或阿洛迪亚国王。[19]

199

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实际上就是努比亚根据巴克特条款承担向埃及提供的奴隶的来源地。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奴隶贩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的事业而不是作为经济的主要支柱，[20] 也不知道如今苏丹共和国的西部地区当时受到努比亚人多大程度的殖民统治。

栋古拉、法拉斯和其他城镇

古栋古拉位于尼罗河东岸第三、第四瀑布之间，曾是统一的努比亚王国的首都。这一城市的发展史可以从 1964 年以来波兰考察队发现的一系列考古结果中追寻。阿布·萨利赫曾对公元 11 世纪初期的栋古拉城作过如下的描绘："这是王位所在地。这是真主保佑的尼罗河岸畔一个巨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教堂、巨宅和宽阔的街道。国王的住所宏大，带有几个红砖砌成的圆顶，颇有伊拉克建筑物的风格……"。[21] 考古发掘

---

[15] G. 范帝尼，1975 年，第 158 页。根据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公元 988 年逝世）的著作。

[16] G. 范帝尼，1981 年（a），第 140—141 页。

[17] E. 齐赫拉兹（E. Zyhlarz），1928 年（b），R. 史蒂文森（R. Stevenson），1956 年，第 112 页；R. 塞瓦尔（R. Thelwall），1978 年，第 268—270 页；1982 年。一般谈苏丹地区各种语言的情况，见 J. H. 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1963 年（b），和 R. 史蒂文森，1971 年。

[18] P. L. 欣尼，1978 年（a），第 572 页和 R. 莫尼（R. Mauny），1978 年，第 327 页注 2。关于蒂埃（乍得）的努比亚陶器，参阅 A. D. 比瓦尔（A. D. Bivar）和 P. L. 欣尼，1970 年，第 301 页。

[19] G. 范帝尼，1975 年，第 165—166 页。

[20] W. Y. 亚当斯，1977 年，第 505 页。

[21] K. 米哈洛夫斯基，1966 年（a），第 290 页；阿布·萨利赫（Abu Sālih），1969 年，第 149—150 页；G. 范帝尼，1975 年，第 326 页。

200 的结果看来证明这一记载句句属实。[22] 目前这个城市的废墟是一个面积达 35 公顷的组合体。早期建筑物的残留部分被埋没在穆斯林时代（公元 15－19 世纪，回历 9－13 世纪）建筑物下面。城市的中部建筑在一个露出地面的岩层上，过去曾为巨大的围墙所围绕。这座基督教时代的城市向北延伸到包括波兰考古学家发现的一组教堂建筑群（这使得人们有可能彻底重新估价迄今为止有关努比亚圣事建筑的理论，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文再作探讨）。再往北，有一系列公元 8 至 9 世纪（回历 2 至 3 世纪）的房舍。这一带发现的房屋，在布局、设备（供水设备、澡堂及取暖系统）以及内墙的壁画方面都是前所未见的。

从城市中心往东，在山岩上有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两层楼王家建筑，其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 8 世纪初。这座建筑物有 11 米高，国王御座所在的大殿位于上层，一度绘有壁画（插图 8.2），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曾被误认为教堂。1317 年该殿被赛义夫・丁・阿卜杜拉改建为清真寺，一直用于宗教目的直到 1969 年。这座建筑物本身曾多次被毁、多次重建，其外观已随时间推移面发生变化（图片 8.1）。但无论如何这是所有受拜占廷文化影响的地区中唯一能保存下来的基督教朝堂。它可能是按照君士坦丁堡大殿的模式建造的，而对于君士坦丁堡大殿，现在只能通过纸面上的描述来了解了。[23]

对于原来属于马库里亚王国的其余重要遗址，尚未进行考察。这一时期的萨伊岛是主教管区的所在地，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心。[24]

但是对于国土的北部（即从前的诺巴迪亚，也有些文献称之为马里斯省），我们掌握的材料更为确切。这是 1961－1966 年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为抢救努比亚历史纪念物免遭努比亚湖洪水淹没的运动中获得的。[25]

202 法拉斯也是在这个时候由波兰考察队 [26] 进行考察的。法拉斯有壮丽的大教堂、礼拜堂、宫殿和修道院。这些建筑物都位于城市的中央，有古老的围墙，保持着作为宗教中心的作用。法拉斯的地位由于一个名叫基罗斯的努比亚人在此就任都主教（公元 866－902 年），而上升为都主教管区所在地因此得到加强。基罗斯颇为壮观的肖像装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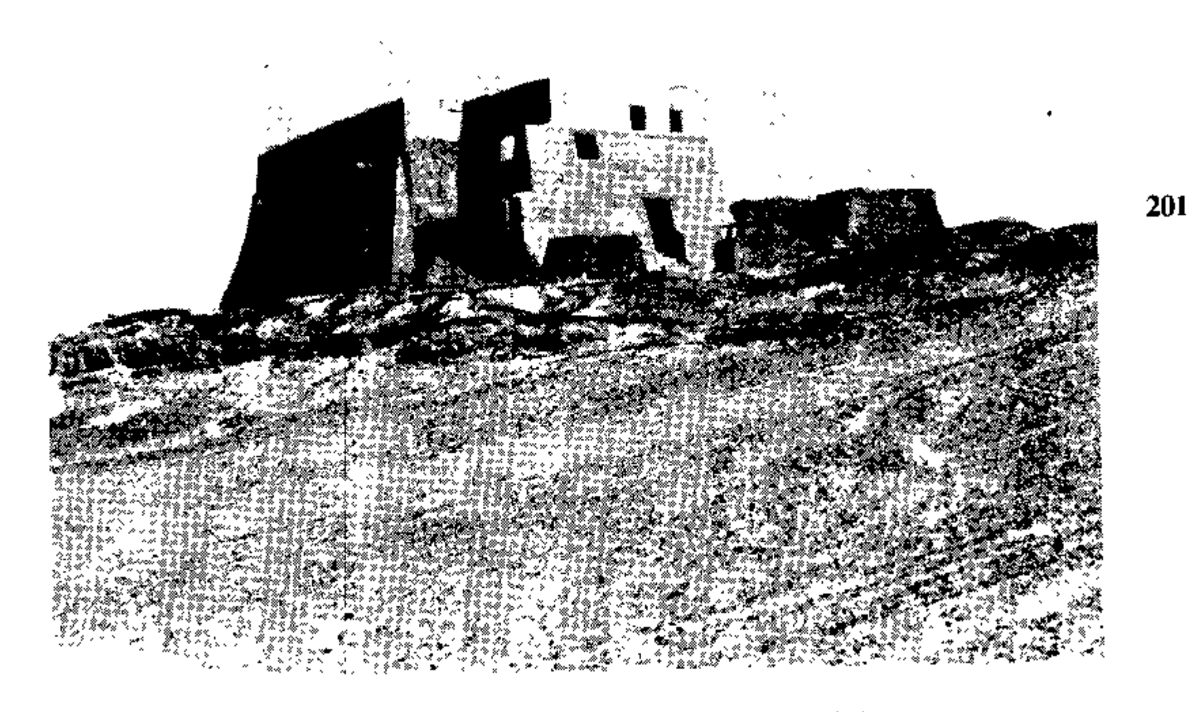
[22] 关于发掘的结果，参阅 K. 米哈洛夫斯基，1966 年（a）；S. 贾科别尔斯基和 A. 奥斯特拉兹（A. Ostrasz）、1967－1968 年；S. 贾科别尔斯基和 L. 克日扎尼克（L. Krzyzaniak），1967－1968 年；S. 贾科别尔斯基，1970 年、1975 年，1978 年，1982 年（a），1982 年（c）；P. M. 加特基维奇（P. M. Gartkiewicz），1973 年，1975 年；W. 戈德卢斯基（W. Godlewski），1982 年（a）。关于发掘的最近报告，登在 1973 年第 8 期以来华沙出版的《研究与论文》（*Études et Travaux*）上；最后出版物将以华沙出版的一系列《波兰科学院地中海考古中心论文集》问世。

[23] W. 戈德卢斯基，1981 年，1982 年（a）

[24] J. 韦科特（J. Vercoutter），1970 年；U. 莫内勒・德－维拉尔，1938 年，第 162－166 页；P. M. 加特基维奇，1982 年（a），第 81－83 页。

[25] 有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抢救运动的书目概要，见 L.－A. 克里斯托夫（L.－A. Christophe），1977 年；有关新近的发现和努比亚抢救运动时期发掘遗址的新书目，见 J. 勒克朗（J. Leclant），1958－1974 年、1975－1983 年；又见 W.Y. 亚当斯，1966 年；1977 年，第 81－90 页；F. 欣克尔（F. Hinkel），1978 年；关于在苏丹境内所有考古遗址的目录，见 F. 欣克尔，1977 年。

[26]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I 卷，第 12 章和 K. 米哈洛夫斯基，1962 年，1965 年（c）、1967 年、1974 年；（在第 312－314 页有一个关于遗址的详尽书目）；S. 贾科别尔斯基，1972 年；K. 米哈洛夫斯基，1979 年；G. 范蒂尼，1970 年（a）；M. 马滕斯－恰尔内茨卡（M. Martens－Czarnecka），1982 年（a）；P. M. 加特基维奇，1983 年。



图片 8.1 古栋古拉的王家建筑，1317 年改建为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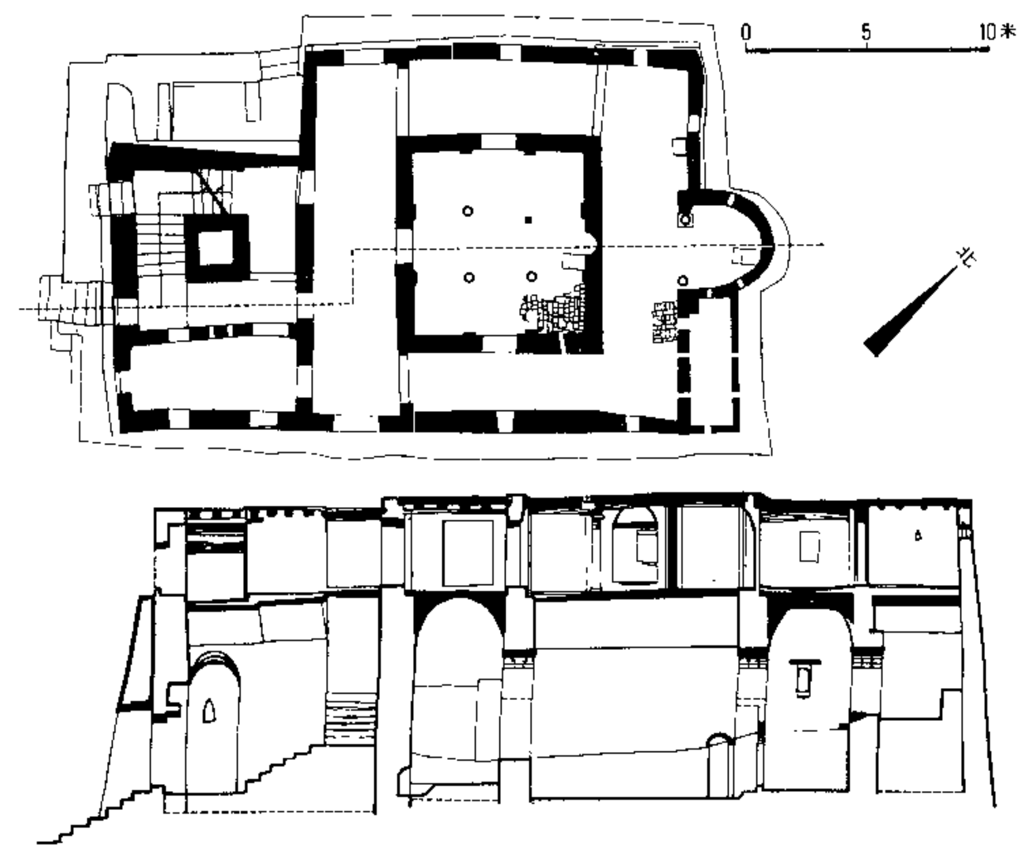


插图8.2 古栋古拉清真寺建筑的现状：上图：为国王御座所在的上层的平面图，1317年改建为清真寺；下图：为该建筑物的东一西翼。（根据圣·麦迪克斯扎所绘）

203



图片8.2 公元866—902年期间法拉斯主教基罗斯的肖像，这是法拉斯大教堂的壁画

着法拉斯大教堂的墙壁。(图片: 8.2)。法拉斯作为都主教驻地的地位一直继续到公元10世纪之末。最后一位具有这一头衔的人是彼得罗斯一世 (公元974-999年)。

法拉斯很可能同时也是行政中心，是州长驻在地。州长是王国北部的皇家行政长官。其任务不仅在于控制该省，也在于负责王国与埃及间的交往。他还是财政总管。[27] 努比亚的行政当局，不管是皇家的还是诺巴迪亚当地的，都负有各种宫廷的职能。他们的希腊文官阶，源自拜占廷统治时期的埃及和北非，后来在努比亚被采纳，但其职能却不一定与原来的相同。这一类官阶诸如 *domestikos*, *protodomestikos*, *meizon*, *protomeizoteros*、*nauarchos*, *primikerios* 等等，仅仅出现于古努比亚语中。

某些学者认为，州长的驻地后来迁到伊布里姆堡要塞。[30] 该处因位于高耸的岩石上，是考古发掘中唯一未被努比亚湖水淹没的遗址。它正由埃及考察协会 [31] 进行系统的考察。除大教堂和城市建筑遗迹外，伊布里姆堡还向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方面的发现以及数以百计的文稿残余，其中有宗教和文学方面的著作、书信和文件。

尼罗河东岸，法拉斯以北十余公里处有一座庞大的阿达山城 [32] 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带的大城镇很可能曾住过数以千计的居民，面另一些较小的中心诸如：库尔塔、卡拉布沙、萨巴古拉、伊肯明迪和谢赫-达乌德在前期都是设防的，每处都住有数百人。[33] 由于发掘而被人们了解得较多的那些更小的中心，诸如塔密特、阿尔明纳 **204** (埃及曼尼)、梅纳尔蒂、西德贝拉 (插图8.3), 和阿卜杜拉·尼尔基 [34] 为古典基督教时期努比亚的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在这里还有些典型的修道院中心，如维兹堡 (插图8.4)、努比亚北部的阿尔-拉马尔，和离今日默拉维 [35] 不远沙漠中的马库里亚的加扎利。

㉗ L.特勒克，1978年，第298-299, 303-304页。关于州长的职责，特别参阅 W. Y.亚当斯，1977年，第464-467页；J. M.普拉姆利 (J. M. Plumley) 和 W. Y.亚当斯，1974年，第238页。

㉘ U.莫内勒·德-维拉尔，1938年，第189-192页；L.特勒克，1978年，第305-307页。

㉙ J. M.普拉姆利，1978年，第233页；A.奥斯曼，1982年 (b)，第191-197页。

㉚ 参阅J. M.普拉姆利，1975年 (a)，第106页；另一种意见是W. Y.亚当斯，1982年，第29页所述。但毫无疑问伊布里姆堡在基督教时期的后期是州长的驻地。

㉛ 发掘者的报告已定期在《埃及考古杂志》上发表，自1964年第50期开始。也可参阅：J. M.普拉姆利，1970年、1971年 (a)，1975年 (a)，1975年 (b)，1978年，1982年 (b)，1982年 (c)，1983年；W.Y.亚当斯，1982年；R.安德森 (R. Anderson)，1981年；P. M.加特基维奇，1982年 (b)。

㉜ N. B.米利特 (N. B. Millet)，1964年，1967年；W. Y.亚当斯，1977年，第494、511、535、536页。

㉝ W. Y.亚当斯，1977年，第488、494-495页；P. M.加特基维奇，1982年 (a)，第59页；关于各个具体遗址的书目见L-A.克里斯托夫，1977年。

㉞ S.多纳多尼 (S. Donadoni) (编)，1967年；B. G.特里格尔，1967年；K. R.威克斯 (K. R. Weeks)，1967年；W. Y.亚当斯，1964年，1965年 (a)；P. L.欣尼，1975年；P. L.欣尼和M.欣尼 (M. Shinnie)，1978年；P.范-穆尔塞尔 (P. van Moorsel)，1970年 (a)；P. 范-穆尔塞尔、J.雅凯 (J. Jaquet) 和 H. D.施奈德 (H. D. Schneider)，1975年；L.卡斯蒂廖内 (L. Castiglione)、G.哈伊诺西济 (G. Hainóczi)、L.卡科西 (L. Kákosy) 和 L.特勒克，1974-1975年。

㉟ G.斯坎伦 (G. Scanlon)，1970年，1972年；U.莫内勒·德-维拉尔，1935-1957年，第1卷，第132-142页；P. L.欣尼和H. N.奇蒂克 (H. N. Chittick)，1961年；也可参阅W. Y.亚当斯，1977年，第478-479页；S.贾科别尔斯基，1981年，第42-43页。

205

插图8.3　西德贝拉基督教时期遗址(24－R－8)的平面图，图中黑色标明的是早期建筑。
(根据P.L.欣尼，19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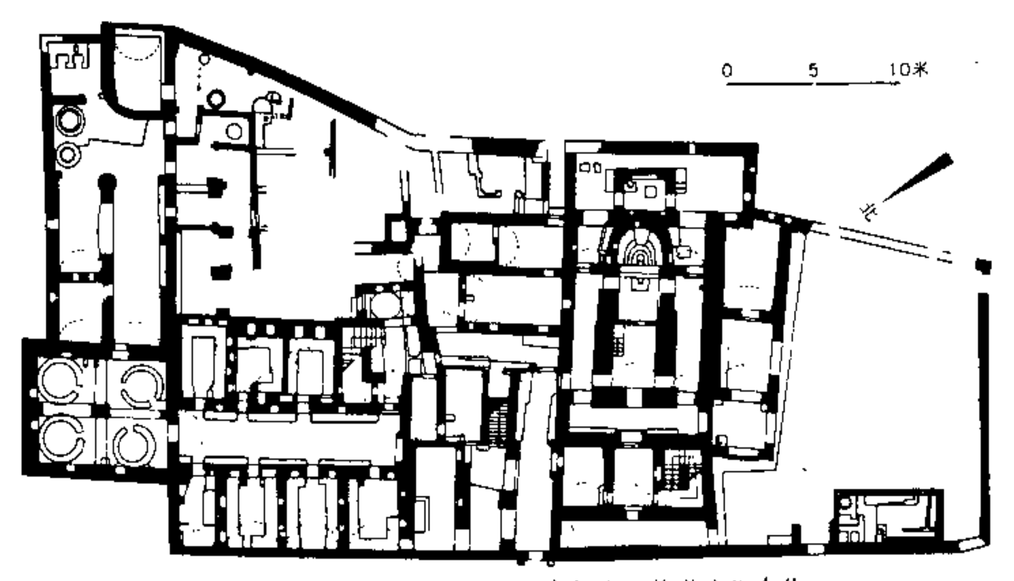


插图8.4　维兹堡的平面图。这是一个努比亚修道院组合体。
(根据 P.M.加特基维奇，1982年a)

经济和社会状况

尽管考古遗迹非常丰富，但是我们对本章论述时期努比亚文明最为重要的特征却仍然知之甚少。对诸如西德贝拉或阿尔明纳这样的居民点进行的考察，提供了一幅繁荣的、同时又是惊人地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景象。在这里社会地位的不同并不一定反映在物质文化方面。[36] 小规模的农耕继续成为生存的基础。不像埃及，这里的务农者一年要生产好几季作物。主要作物是大麦与小米。枣可能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耕地明显地扩大了，特别是在第二瀑布的岛屿上和巴滕－哈杰尔。[37] 务农者早已开始饲养牛、羊、驴、鸡，到这个时期他们的家畜也包括了猪。

绝大部分土地为小土地所有。但归根结底，努比亚人都是佃农，因为按照法律一切土地为国王所有。[38] 努比亚的税收以土地税为基础（可能还有其他赋税），而且往往由僧侣担任税收官。[39] 看来当局赐予各修道院地产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村庄和小城镇多数能自给，而绝大部分日用品可能都是努比亚的手艺人提供的。这一阶段大量生产的物品中最突出的要算花纹精致的陶器，它们比同时代的埃及器皿更高级，而且绝非其仿制品。公元8世纪末发展起一种被称为古典基督教型的新型的陶器，[40] **206** 出现了饰有鲜艳的花卉和动物图案的丰富式样（各种各样的瓶、碗和罐）。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拜占廷甚至波斯的影响。[41] 其他人则认为这些装饰中一些花环和交替的几何图象是同时代科普特抄本花边的翻版。[42] 古典基督教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更接近于麦罗埃时代的产物，而不像是插进来的5个世纪的产物。[43] 当地产品的卓越发展可能是外部原因所造成的。在公元8至9世纪（回历2至3世纪）间的某个时期，从埃及进口到努比亚的陶器数量明显地下降了，尤其是产自上埃及科普特修道院中的双耳细颈椭圆酒罐（连同装在里面的酒）。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登上王位，导致了加紧对科普特人迫害以及对埃及修道院的禁令。[44]

最著名的努比亚陶器厂之一设在法拉斯。[45] 在古栋古拉本身及其毗邻地区必然有过某些主要的生产中心，那里对花纹的式样有所改变。这类陶器从加扎利的修道院[46] 到

---

[36] W. Y. 亚当斯，1977年，第501页。
[37] B. G. 特里格尔，1970年，第355页。
[38] L. 特勒克，1978年，第296－299页。
[39] W. Y. 亚当斯，1977年，第503页。
[40] W. Y. 亚当斯教授业已提供了大量精选的各种努比亚陶器。见W. Y. 亚当斯，1962年（b）、1967－1968年、1970年、1978年。关于古典基督教型陶器（概述），见W. Y. 亚当斯，1977年，第495－499页；又参阅F. C. 利斯特（F. C. Lister），1967年；M. 罗齐维奇（M. Rodziewicz），1972年；K. 科洛杰伊奇克（K. Kolodziejczyk），1982年。
[41] P. L. 欣尼，1978年（a），第570页；1965年，第268页。
[42] K. 魏茨曼（K. Weitzmann），1970年，第338页；W. Y. 亚当斯，1977年，第496页。
[43] W. Y. 亚当斯，1977年，第496页。
[44] P. L. 欣尼，1978年（a），第570页。
[45] W. Y. 亚当斯，1962年（a）。
[46] P. L. 欣尼和H. N. 奇蒂克，1961年，第28－69页。

第四瀑布以南都能见到。

有许多地方上生产陶器的中心，生产诸如贮藏罐、烹调锅或者一种专用于“萨基亚”（*sakiya*，水车）上的名叫“卡杜斯”（*kadus*）的容器。公元9至10世纪（回历3至4世纪）所生产的古典基督教型陶器完全可以满足该国国内的需要。只有到了公元11世纪，进口的埃及陶器（也被称为阿斯旺陶器）才开始与当地产品同时出现。同时也出现了上釉的阿拉伯陶器，只是从未在努比亚仿制过这种陶器。[47]

古典基督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行业是纺织。主要产品是用羊毛或驼毛织成的。[48] 而 **207** 埃及则相反，是以亚麻为主。努比亚的呢袍绝大多数的花式是经色彩鲜艳的彩条相间而成，偶尔也有格子花样。这种袍子与法拉斯及其他地方的努比亚壁画中所描绘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所发现的物品来判断，最大的纺织中心之一无疑是伊布里姆堡。

努比亚的手艺人也制造铁器（锄、刀等）、皮革制品以及各种席子、篮子和用棕榈纤维精心编织成的工艺品（凉鞋、席子和“塔巴克”盘子）。这种生产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除上述当地产品外，本章所述时期内，在物质文化方面还有着许多外来的产品。除巴克特条约所提到的物品（小麦、大麦、酒类，还有麻布、织物及成衣）外，考古学上的证据说明努比亚从埃及进口了各种各样的玻璃器皿。然而，从所发现的器皿式样及装饰技巧来看，如使玻璃成形、刻花、嵌花、绘画等，说明其来源并非出自一处。在法拉斯大教堂发现的圣器中有一只美丽的深紫色玻璃高脚杯（图片8.3）。[49]

努比亚的贸易大部分是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的。努比亚没有货币系统，只有北部地区例外，在那里与阿拉伯人交易时，使用的是埃及的钱币。因此，努比亚在对外贸易中不得不使用货币，而国内的财务交往则禁止这样做。这从在巴滕－哈杰尔地区的上迈克斯（阿卡沙）建立严格的边防（实际上是海关）一事中可以看到。这样就把对外贸易区和国家的中心地区分隔开来，[50] 而外贸是由国王本人严格控制的。努比亚的出口以奴隶为主，但是，像黄金、象牙、皮革等传统产品在其对外贸易中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栋古拉想必也通过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与来往于西部非洲中、西苏丹各国贸易商道的商人们进行交往。

公元9世纪（回历3世纪）以后的政治史

有关这一时期政治事件的最好资料来源是阿拉伯作者们的著作，如雅库比、塔百里、伊本·豪卡勒和伊本·萨利姆·阿斯瓦尼（后两人本人到努比亚旅行过）。此外

[47] W. Y. 亚当斯，1977年，第499页；P. L. 欣尼，1978年（a），第570页。

[48] I. 伯格曼（I. Bergman），1975年，第10—12页；P. L. 欣尼，1978年（b），第259页；J. M. 普拉姆利、W. Y. 亚当斯和E. 克劳福特（E. Crowfoot），1977年，第46—47页。

[49] 现存苏丹国立博物馆。参阅K. 米哈洛夫斯基，1964年（a），第196页。关于基督教努比亚的玻璃，见W. Y. 亚当斯，1977年，第499—500页。

[50] L. 特勒克，1978年，第296页；P. L. 欣尼，1978年（b），第260—262页；关于贸易，也可参阅R. 莫尼、1978年，第335页。

208



图片 8.3 法拉斯大教堂里发现的玻璃高脚杯

还有基督教人物所写的资料，如塞维鲁、艾什穆奈因的主教和亚美尼亚人阿布·萨利赫的著作（都引自科普特文献）。另外还有叙利亚人迈克尔的作品，他利用了安条克教区牧首狄奥尼修斯的编年史资料。[51]

公元9世纪（回历3世纪）的30年代，哈龙·拉希德哈里发继位之争对埃及造成严重不稳局面，努比亚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停止支付巴克特条约规定的贡赋。公元833年，易卜拉欣·穆尔台绥姆终于继承哈里发的位置，在他所采取的恢复秩序的行动中，就包括了一封致栋古拉国王扎察里亚的信。信中不仅要求恢复每年的贡赋，并要求加倍支付所有欠款，努比亚国王无力满足这一要求，遂决定由其子乔治斯（他后来成为努比亚国王，可能是在公元856年[52]）去巴格达与哈里发磋商，同时也对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力量作了估计。[53]乔治斯在公元835年夏天由他的主教们和宫廷成员们陪伴去巴格达之前，被正式册封为努比亚王位的继承人。他去会见哈里发的旅行对于基督教努比亚王国是一件空前的大事，也是一次巨大的政治成就，因而在近东一带广事宣扬。这位使臣签订了一项双边条约，修改了巴克特条约的条款，宣布自那时起只要三年一进贡就行了。过去的欠款也被一笔勾销。乔治斯还从穆尔台绥姆处得到了大量礼品，约在公元837年回到了栋古拉。亚历山大主教管区的大主教（牧首）约瑟夫在他归国途中陪了部分旅程。

关于此事的记载有许多出处，但各种文本混乱之处甚多。有些资料说条约是在公元833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在开罗签订的，而且乔治斯曾到过巴格达两次，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另一次的情况就不那么愉快了。是同贝贾人的国王阿里·巴巴一起作为俘虏于公元852年去的。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也是含糊不清的。[54]

通过乔治斯一世的长期统治，我们掌握了公元9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详细记载。其中有阿拉伯采金人对努比亚腹地的探险和神学家阿布·阿卜德·拉赫曼·乌玛里曾一度利用自己的私人军队占领了阿布－哈马德附近的一些金矿。乔治斯国王派他的外甥纽蒂率领军队打击侵略者。纽蒂与乌玛里的军队进行了数次遭遇战之后，与之签订了条约。于是，乔治斯国王把纽蒂视为叛徒，先是派他的长子，以后又派他的幼子扎察里亚去反对纽蒂。扎察里亚与乌玛里结盟，然后派人用计杀死纽蒂。随后，扎察里亚又转过来攻击乌玛里，迫使他北撤。乌玛里在贝贾卷入了它的内部纷争，最后为伊本·图伦的代理人所杀。

乌玛里的远征并不代表埃及官方对努比亚的政策。但它清楚地体现了阿拉伯人千方百计企图渗入努比亚，目的无疑地在于确保从南方来的黄金能源源不断地流入埃及。与贝贾的冲突也反映出这一点。马克里齐对乌玛里的冒险作了详细的记载，这些记载可能摘自更早的作品，我们通过它知道努比亚诸王及其王朝习俗的情况。

[51] 所有这些材料均摘自G.范蒂尼，1975年，译文。关于这一时期各项事件，参阅U.莫内勒·德－维拉尔，1938年，第103－115页。

[52] S.贾科别尔斯基，1972年，第92－96页。G.范蒂尼，1981年（a），第112页中曾对日期提出怀疑，并提出公元839年的说法。

[53] 参阅G.范蒂尼，1975年，第317页。

[54] G.范蒂尼，1970年（b）；W.Y.亚当斯，1977年，第455页；P.L.欣尼，1978年（a），第578－579页。

乔治斯一世对努比亚的统治一直继续到公元915年，有多种材料证实了他的长寿。他去世的年代，可以从法拉斯的科姆南坡教堂门楣上刻的科普特文题字中推算出来。这块门楣是伊苏州长在乔治斯的继承人扎察里亚三世国王在位第十五年[55]之际建立的。实际上，扎察里亚三世之所以有权继位并非因为他是乔治斯的儿子，而是因为他同时也是国王姐妹女儿的儿子。国王姐妹的女儿也就是纽蒂的姐妹，他才是合法的王位第一继承人。纽蒂死后，扎察里亚成为王位的唯一继承人。努比亚的王朝继承完全按族内婚的原则通过母系进行的。但由于通常在平辈表兄妹中通婚。[56]因而在努比亚王位继承中完全可能出现子继父位的现象。

上述科普特铭文中也提到了国王的母亲马里亚姆，这证实了另一个重要的朝廷称号：太后。这种称号后来在古努比亚文中被称为“农南”（*nonnen*）[57]。在法拉斯公元11世纪（回历5世纪）初的一幅壁画中，[58]另一位太后马萨被描绘为在圣母玛利亚的保护之下。这种称号不仅表明在王位继承制度中母系的重要性，可能也同时反映出麦罗埃努比亚的一个古老传统，即国王母亲起重要作用。[59]

看来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以及前一个世纪的后半叶是努比亚国家的兴盛时期。唯一对这种兴盛有过干扰的仅仅只是尼罗河的洪水。洪水淹没了诺巴迪亚的一些地区，使居民们重新迁移定居。不过，努比亚国家以其坚实的经济基础成功地克服了困难。历史事件表明这是一个强大的王国，其强大不仅在于军事力量。

公元956年，努比亚与埃及的关系再次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不过这次倒不是阿拉伯人侵略，而是努比亚人袭击并劫掠了阿斯旺。一支埃及的讨伐军很快就深入到伊布里姆堡，但这仅仅只是短暂的成功。[60]公元962年，努比亚人占领了上埃及远达艾赫米姆的大片土地。这次入侵无疑是伏斯泰特最后的素丹们伊赫什德王朝统治时期（公元936－968年）埃及当时形势造成的必然后果，但也可能是为了让法蒂玛王朝在该国得胜。努比亚人后来和法蒂玛王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211**

努比亚对埃及的占领并没有因法蒂玛哈里发于公元969年登位而中止。可能占领地区的边界重新划定了一下，因此埃德富得以保留在努比亚边境内。直到公元11世纪（回历5世纪）中叶，这一直是一座重要的努比亚文化中心城市。[61]此时也是努比亚人重建阿斯旺附近著名的圣西米恩修道院的时候。[62]

---

[55] 记载这段文字的出版物（S. 贾科别尔斯基，1966年(b)，第107－109页；1972年，第110－113页）误以“第十”年代替了正确的“第十五”年，从而导致错误地把乔治斯一世死亡的日期确定为公元920年（一般引用这一年）而代替了正确的公元915年这一日期。参见S. 贾科别尔斯基，1982年（b），第132页，注27。

[56] A. 克罗内贝格（A. Kronenberg）和W. 克罗内贝格（W. Kronenberg），1965年，第256－260页；也可参阅S. 贾科别尔斯基，1972年，第113页。

[57] A. 奥斯曼，1982年（b），第193页。

[58] 壁画现存苏丹国立博物馆，喀土穆。参阅K. 米哈洛夫斯基，1964年（a），第203页，图片42(b)；1967年，第154－157页，图片第77－79页，1974年，第48页，J. 勒克朗和J. 勒鲁瓦（J. Leroy），1968年，图片51；M. 马滕斯（M. Martens），1972年，散见各处；B. 罗斯特科斯卡（B. Rostkowska），1972年，第198－200页。

[59] S. 多纳多尼，1969年；B. 罗斯特科斯卡，1982年（b）。

[60] 关于此类事件的详细论述，见J. M. 普拉姆利，1983年，第161页；G. 范蒂尼，1981年（a），第116页。

[61] U. 莫内勒·德－维拉尔，1938年，第124－125页。

[62] U. 莫内勒·德－维拉尔，1927年，第24－36页。

我们关于这一阶段的资料主要来自伊本·萨利姆·阿斯瓦尼的著作。此人约于公元969年奉命率团去见努比亚统治者乔治斯二世。国王给这位阿拉伯使臣以热情的接待。然而，由于努比亚当时正是一个强国，国王处于一种可以拒付巴克特条约所规定的贡赋和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地位。[63]

宗教方面的发展

公元10世纪末，哈基姆哈里发（公元996－1021年在位）统治时期，埃及再次发生对科普特人的严厉迫害。起初，努比亚并未代表埃及的科普特教会进行干预。这可能是由于政治上与法蒂玛王朝有着友好的关系，或者是出于其他种种原因。但努比亚人最后确实为埃及难民开放了它的边界，因而有大批的人迁移到了努比亚。

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时，努比亚的教会在国务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可以为下列事实所证明：当阿拉伯使节在乔治斯二世在位时来到栋古拉，这位统治者召集了一个由主教们参加的会议，[64] 以决定如何对阿拉伯人作出回答。国王后来也在纯属宗教的事务中充当调解人，例如他应埃塞俄比亚当局之请，在该当局与菲洛西奥斯大主教（公元979－1003年任教区牧首）之间为埃塞俄比亚提名合适大主教人选问题进行调解。[65]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它还说明当时的教会与基督一性论教义关系密切，努比亚与埃塞俄比亚之间也存在真诚的关系。

212

阿拉伯文献所提及的七个努比亚主教管区中，有五个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这五个是：库尔塔、伊布里姆堡、法拉斯、萨伊和栋古拉。法拉斯的情况为了解主教管区的历史提供了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资料。原因是那里有一份主教名单铭刻在大教堂墙上、墓碑上和刻画上，从中足以得出该主教管区自公元7世纪（回历1世纪）建立之时起，直至公元1175年全部高僧们的不间断的编年顺序。[66]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公元9世纪（回历3世纪）和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有五位主教具有帕乔拉斯（即法拉斯）大主教（都主教）的头衔。幸亏那里保存着十七幅主教的肖像画，[67] 使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努比亚主教们法衣的式样。法拉斯、松基·蒂诺和塔密特的壁刻看来是了解教会上层统治集团等级的重要资料来源。

努比亚教会信奉基督一性论教义这一特征，已为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法拉斯和其它主教管区的一系列资料所证实。但是，来自法拉斯的证据在另一方面又说明，公元

---

[63] 这些说法只保留在马克里齐（al－Makrizi）和伊本·萨拉姆·曼努菲（Ibn al－Salām al－Manūfī）著作的引语中。其他有关的史料还有马苏迪（al－Mas'ūdī）的著作，伊本·法基赫（Ibn al－Fakīh）和雅库比（al－Ya'kūbī）的著作，参阅G.范蒂尼，1975年。

[64] O.迈纳尔达斯，1967年，第150页。

[65] U.莫内勒·德－维拉尔，1938年，第125页；A.J.阿克尔，1961年，第190页；G.范蒂尼，1981年（a），第123－124页。

[66] S.贾科别尔斯基，1966年（a）；1972年，第190－195页；G.范蒂尼，1981年（b）。

[67] K.米哈洛夫斯基，1974年，第46页；M.马滕斯－恰尔内茨卡，1982年（a），散见各处；S.贾科别尔斯基，1982年（b）。

10世纪（回历4世纪）末和公元11世纪（回历5世纪）初在信仰方面发生了某种变化。我们发现在公元997－999年期间，有两位大主教同时占有帕乔拉斯的主教宝座，其中一人是彼得罗斯一世（公元974－999年在职），另一人是约安尼斯三世（公元997－1005年在职）。合理的解释可能是约安尼斯三世代表着一种不同于法拉斯大主教彼得罗斯一世基督一性论的教派，即希腊（或者梅尔凯特教派）的信仰。情况还远没有弄清楚，根据来自法拉斯的证据[68]所提出的假设，学者们争论热烈，并提了一些质疑。[69]但是某些历史事实值得在这里提出以支持该主教管区曾出现梅尔凯特教派接管的论点。约安尼斯三世的任期恰好出现在阿齐兹哈里发死后不久，而这位哈里发在埃及是以公开赞同梅尔凯特教派著称的，他的妻子（或是妾）就属于该教派。她的一个兄弟耶雷米亚斯即被阿齐兹任命为耶路撒冷的大主教（教区牧首），另一个兄弟阿西尼厄斯成为埃及的梅尔凯特教派大主教（教区牧首）。[70]看来梅尔凯特教派很可能从这位哈里发的宽厚大度中得益非浅，他们争取重新掌管某些教区的努力看来不止一次地获得了成功。约安尼斯三世的两位继承者登上了法拉斯主教的宝座——马里亚诺斯（1005－1036年在职）和默库里奥斯（1037－1056年在职）——在碑文中被称为“他的儿子们”。这种表达方法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是信奉同一教派的。以他在法拉斯大教堂的庄严的画像（现存华沙国家博物馆）（图片8.4）而闻名的马里亚诺斯，死于伊布里姆堡，那里已发现了他的墓碑。从墓碑的铭文中[71]可以推断出他来法拉斯之前已在另一个主教管区担任过两年主教。铭文还说他是“巴比伦的使者”（即旧开罗），这一点与他在法拉斯壁画上的浅肤色是完全符合的。

213

关于努比亚礼拜仪式的特点，我们还知之甚少。希腊文很可能仍然是教会中所用的最重要的语言，那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希腊文是一种通用语言。[72]除希腊文外，科普特语也被广泛地用于教会著作、官方铭文和墓碑上。它至少可以为努比亚境内众多的科普特社团所使用。从公元10世纪中叶开始，努比亚用被称作古努比亚文（或称中世纪努比亚文）写的碑文数目剧增。这种语言是生活在水滨的努比亚人（即现在的马哈斯人）方言的前身，属于东苏丹语族。古努比亚文采用科普特字母（它本身源自希腊文）书写，仅仅只是增加了四个符号以适应努比亚的发音。

最早用古努比亚文写的铭文，是一个名叫彼得罗的来自法拉斯的教士于公元795年留在艾斯－塞布阿教堂壁刻上的。[73]用古努比亚文写的材料大部分是宗教性的，古努比亚文的著作集成则包括：圣经经文（福音书的断简残篇）；有关圣徒传记和言论的抄本

[68] K.米哈洛夫斯基，1967年，第91－93页；1970年，第14页；S.贾科别尔斯基，1972年，第140－147页；J.库宾斯卡，1974年，第69－86页。

[69] P.范－穆尔塞尔，1970年（b），第281－290页；T.萨韦－瑟德贝格（Säve－Söderbergh），1970年，第238－239页；M.克劳斯（M. Krause），1970年，第71－86页；1978年；K.米哈洛夫斯基，1979年，第34－35页。

[70] G.范蒂尼，1970年（a），第83、98、223页；1981年（a），第145－147页；W. H. C.弗伦德（W. H. C. Frend），1972年（b），第297－308页；P. L.欣尼，1978年（a），第571页。

[71] J. M.普拉姆利，1971年（b）。

[72] 关于基督教努比亚诸语言的一般情况，见P. L.欣尼，1974年；S.贾科别尔斯基，1972年，第12－16页；W. H. C弗伦德，1972年（a）；W. Y.亚当斯，1977年，第484－486页；T.海格（T. Hägg），1982年。

[73] F. L.格里菲思（F. L. Griffith），1913年，第61页；E.齐赫拉兹，1928年（a），第163－170页。

214



图片8.4 公元1005—1036年期间法拉斯主教马里亚诺斯的肖像，这是法拉斯大教堂里的壁画

(其中有圣梅纳斯的奇迹);[74] 假拟的克里索斯托姆布道;[75] 祷告书;向十字架的启应祷文;以及新近在伊布里姆堡发现的内容特别丰富的法律文件和书信的珍藏。[76] 还有相当大量的努比亚文(或是希腊文与努比亚文相混杂)的壁刻。所有这些材料都具有极度重要的意义,不仅是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而且从语言的角度也是如此,因为 **215** 对古努比亚文不论是在词汇编纂方面还是语法方面的研究都还远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77] 而新发现的文本大部分尚未公之于众。

公元11世纪(回历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没有什么史料可供查考。史料记载了拉斐尔国王在位的时间约在公元1002年左右。阿拉伯编年史提到了阿布·拉克瓦于公元1006年前后反对法蒂玛王朝的起义。他在本国遭受失败后,逃到了努比亚。正由于如此,努比亚再次被卷入其北方邻国的事务之中。但是,总的说来,在法蒂玛王朝统治埃及的二百年漫长时间里(公元969－1169年),两国关系是和好的。努比亚在穆斯坦西尔哈里发统治期间(公元1036－1094年在位)与之保持着最好的关系。在这位哈里发统治时期,努比亚人甚至被召募入法蒂玛王朝的军队,其人数多达50 000人。这一材料来源于纳西尔－伊·胡斯罗的著作,他在公元1050年曾访问过埃及和努比亚。[78]

关于努比亚教会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基督一性论教会大主教史》(History of the Monophysite Patriarchs)一书,[79] 主要是关于第六十六任大主教克里斯托杜洛斯(公元1047－1071年在职)时期的活动情况。他在亚历山大担任大主教的头十年,正是重新对科普特人进行迫害的时候,由亚祖里大臣(公元1051－1059年任职)颁发的命令导致科普特教堂关闭。克里斯托杜洛斯本人也曾一度遭监禁,他派了两名埃及主教作为使者去见努比亚国王请求帮助和干预。国王通过这两位命名者送去了一笔赎金,以使这位大主教获释。十余年后,他提名维克托为努比亚(栋古拉)的新任大主教(都主教)。克里斯托杜洛斯与努比亚国王的联系,可能像法拉斯的例子所表现的那样,使原已岌岌可危的基督一性论教会的地位得到加强。这位大主教此时与埃及大臣巴德尔·贾马利的关系也有所改善,当他从主教管区向努比亚国王派出第二个使团时,大臣也派遣了他自己的使者赛义夫·道拉随同使团的瓦西姆主教默库里奥斯一同前往,要求从努比亚引渡叛逆坎兹·道拉,并获得了成功。巴德尔·贾马利不久(公元1080年)在开罗接待了努比亚前国王萨洛蒙。这位国王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姐姐的儿子乔治斯三世而逊位的,他自己则专心去过修道生活。我们还听说巴西利奥国王在公元1089年统治努比亚。

---

[74] E. A. W. 巴奇(E. A. W. Budge),1909年;F. L. 格里菲思,1913年,第6－24页。关于一般的古努比亚文著作,见C. D. G. 米勒(C. D. G. Müller),1975年,1978年。有关主要出版物的其他版本见F. L. 格里菲思,1928年;B. M. 梅茨格(B. M. Metzger),1968年;J. 巴恩斯(J. Barns),1974年;G. M. 布劳内(G. M. Browne),1982年(b)。

[75] G. M. 布劳内,1983年。

[76] 参阅J. M. 普拉姆利,1975年(a),1978年;R. 安德森,1981年。

[77] F. L. 格里菲思,1913年;E. 齐赫拉兹,1928年(a) 1932年;B. H. 斯特里克(B. H. Stricker),1940年;F. 欣策(F. Hintze),1971－1977年;G. M. 布劳内,1979－1981年、1982年(a)。

[78] Y. F. 哈桑,1973年,第46页;G. 范蒂尼,1981年(a),第129页。

[79] 来源于塞维鲁(Severus, 萨维鲁·阿布尔·巴沙尔·伊本·穆卡法,Sawirus Abu'l-Bashar ibn al Mukaffa'),见G. 范蒂尼,1975年,第189、209－218页。

随着法蒂玛王朝的覆灭（公元1170年），努比亚和埃及的关系迅速恶化。几乎与此216同时，努比亚的黄金时代也就此结束。与阿尤布素丹萨拉丁军队的武装冲突，揭开了努比亚历史的下一个阶段（被称为基督教时期后期）。

艺术与建筑

建 筑

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是努比亚历史上发展艺术和建筑的最佳时期。深入研究圣事建筑物，无疑是了解努比亚建筑总的情况的关键。[60] 教堂建筑是这一阶段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中充分反映出建筑的艺术和建筑的观念。在这方面我们掌握的材料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已经知道的教堂在诺巴迪亚有一百二十多座，在亚库里亚约有四十座。[61] 已知的努比亚教堂分布得如此不均衡（几乎北方的所有教堂均已经过发掘）使人们接受这样的看法，[62] 即努比亚的圣事建筑物只来源于教堂样式中的"（罗马式）长方形大会堂"，事实上这是一种在北方流行的式样。只有在波兰考察队发现了栋古拉古教堂并且在其平面图上标出"花岗岩柱教堂"和"十字形教堂"之后，[63] 情况才开始明朗化，我们面对的是圣事建筑物中两种同样重要的倾向，即中心设计和长方形式样的延伸。这两种倾向都对某些个别教堂建筑结构产生了影响。建筑物的主要倾向首先在包括主教管区驻地在内的文化和行政中心的大建筑上表现出来，诸如古栋古拉、法拉斯或伊布里姆堡。与中心的建筑平行的是地方级建筑的发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以此为模型，但受到实施条件和材料方面可能性的限制。这种形式的发展是形成古典基督教时期和基督教时期后期主要分布在努比亚北方的所谓"典型努比亚设计"的教堂的原因。许多当地内在的特征在这种典型里表现出来，这种教堂一般是一长方形建筑，东一西向，用墩或柱隔出中殿和两条走廊，中殿的东端尽头是一个半圆形室，有着半圆形的讲217坛。中殿的相当一部分为司祭席，中间是祭坛。半圆形室的两边各有一间屋子。北面一间用作法衣室，南面一间用以施洗礼。[64] 两室之间由半圆形室后面的一条窄走廊相连。教堂的西部在两角各建一室。南边一间按常规有一楼梯；北边一间的用途不详。教堂的两个入口从南、北直通两条走廊。中殿的中央靠北侧设有讲坛。

所有的圣事建筑物都可以区分出如下的阶段，以及一些受努比亚之外影响的发展

---

[60] G. S. 米勒哈姆（G. S. Miteham），1910年；S. 克拉克（S. Clarke），1912年；U. 莫内勒·德－维拉尔，1935 1957年，第3卷，W. Y. 亚当斯，1965年（b）、P. M. 加特基维奇，1975年、1980年、1982年（a）、1983年、S. 贾科别尔斯基，1981年

[61] 努比亚境内全部已知教堂的"清单"发表在W. Y. 亚当斯，1965年（b）；总的结论也可参阅W. Y. 亚当斯，1977年、第473－478页。

[62] W. Y. 亚当斯，1965年（b）。

[63] P. M. 加特基维奇，1975年。由P. M. 加特基维奇写的一篇关于这些教堂建筑的专论（栋古拉之二）将在《CAMAP》，1984年、第27卷上发表。也可参阅S. 贾科别尔斯基，1982年（c）和本章前面的注22。

[64] 关于努比亚洗礼堂问题的详尽讨论，见W. 戈德卢斯基，1978年，1979年。

脉络：[85]

第一阶段：

前期：对努比亚宗教建筑最早的外国影响。教堂都以一个延伸了的单轴线和三条走廊的设计为基础。它们一般用砖坯修建，覆以木制天花板，天花板用砖坯砌成的柱子支撑。

后期：建筑活动的发展。以方石或烧砖建立大教堂。设计仍未改变，三条或五条走廊，房顶用柱子支撑。除这种活动外，用砖坯建筑的传统方法仍用于较小的建筑物。筒形拱顶当时正在传入。最典型的努比亚教堂建筑物，像上文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正是在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的。

第二阶段：

结合亚美尼亚和拜占廷建筑上的影响，教堂式样的演变已彻底改变了建筑物中的空间观念。在此阶段中有两种倾向得到了发展：各地仍保持着传统的形式，而一种新的、官方的、以中央设计型为特点的建筑物却在首都出现了。烧砖广泛得到使用。栋古拉的花岗岩柱教堂就是在这一阶段修建的，它是在罗马式长方形大教堂内部加进十字形结构组成的。这是努比亚的建筑物创造能力达到的顶峰。努比亚的建筑师们得益于更加广泛的基督教世界的建筑成就而形成的固有观念，其实例之一就是古栋古拉的陵庙（十字形教堂），这是建立在四臂同样长的希腊式十字形设计之上的。无疑地栋古拉成了这一阶段努比亚建筑活动的主要中心。（插图 8.5）

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中人们还无法区分出发展路线延续的主要趋势。建筑活动分散为几个中心，吸收了主要来源于拜占廷的不同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共同特点是公元 10 世纪末左右圆屋顶的传入。这一概念与教堂的建筑形式中垂直的轴线应起最重要的作用这一新看法是相联系的。延伸型（罗马长方形）和中央设计型的教堂都起了变化，在中央加上了圆顶，以柱子代替了砖砌的墩子，砖坯又开始通用起来。除重建一些老教堂外，还建立了一些新的。新教堂的式样是进行了各种简化并根据当地情况加以改变的结果（插图 8.6） **219**

教堂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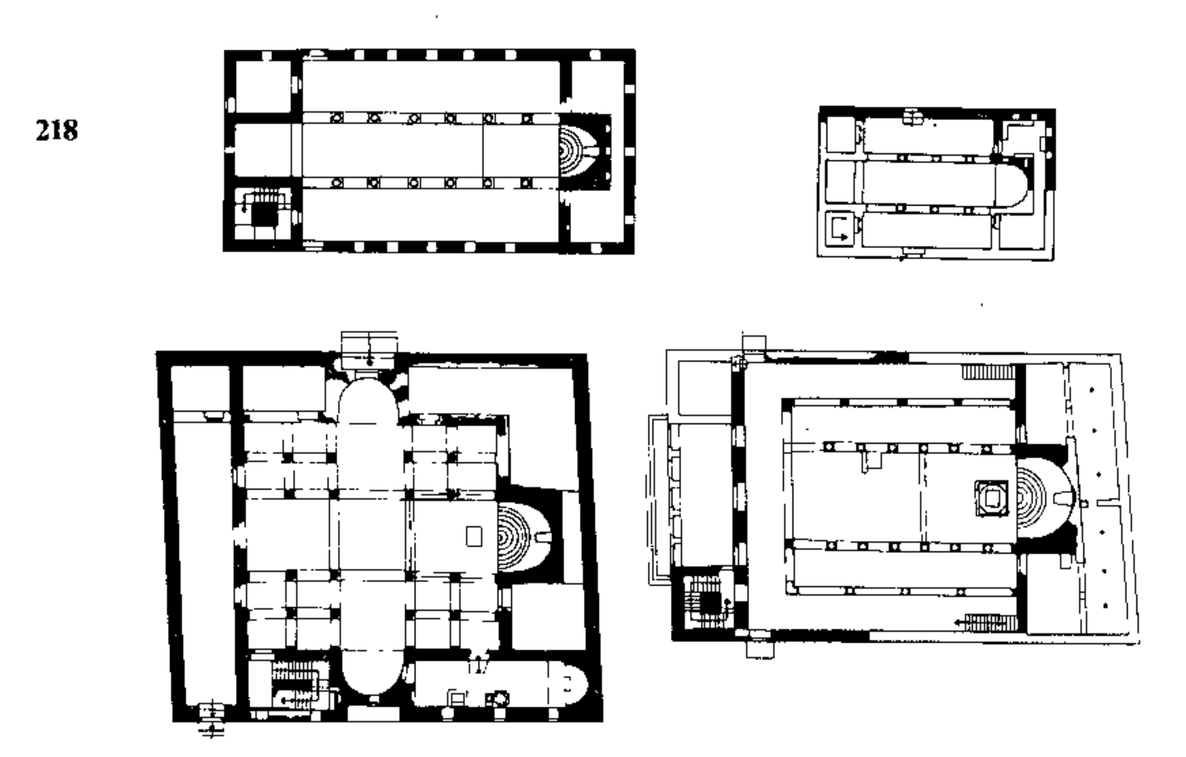
公元 8 世纪末，圣事建筑物内部的标准装璜，人物肖像壁画已经取代了早期的建筑上的装饰（横梁、门旁侧柱、以及饰有浮雕的柱头）。从法拉斯的全套壁画看，[86]除了基

---

[85] 根据 P. M. 加特基维奇，1980 年，1982 年（a），第 73－105 页。

[86]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I 卷，第 12 章，第 336－337 页；K. 米哈洛夫斯基，1964 年（b），1966 年（a），1967 年、1970 年，1974 年；K. 魏茨曼，1970 年；G. 范蒂尼，1970 年（a）；M. 马滕斯，1972 年、1973 年；M. 拉萨尔（M. Rassart），1972 年；G. 范蒂尼，1981 年（b）；S. 贾科别尔斯基，1982 年（d）； N. 波梅兰采娃（N. Pomerantseva），1982 年。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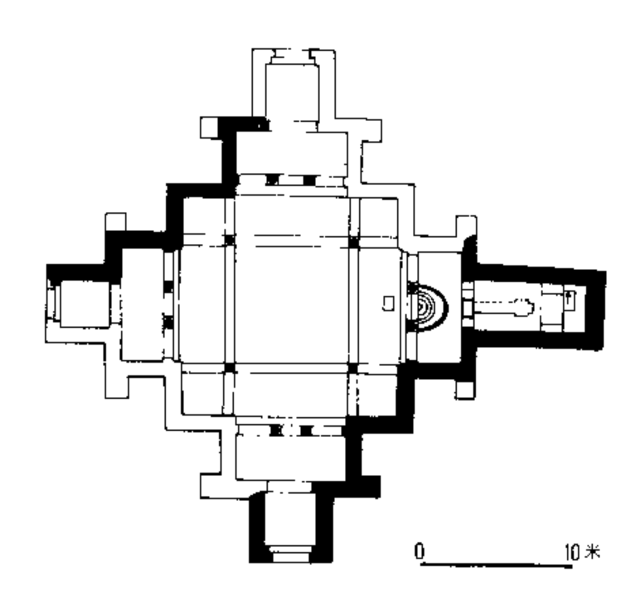


插图8.5 努比亚教堂建筑发展的第二阶段：上图：传统的(保守的)教区建筑活动(B_2)；加扎利的修道院和法泣斯的科姆南坡教堂。中图：改进后的主流趋势，前期(A_3)；关于空间布局及中央(古栋古拉的花岗岩柱教堂)或纵向设计(伊布里姆堡大教堂)。下图：改进后的主流趋势，后期(A_4)实例，旧栋古拉陵庙，一个十字形教堂。(根据P·M·加特基维奇，1982年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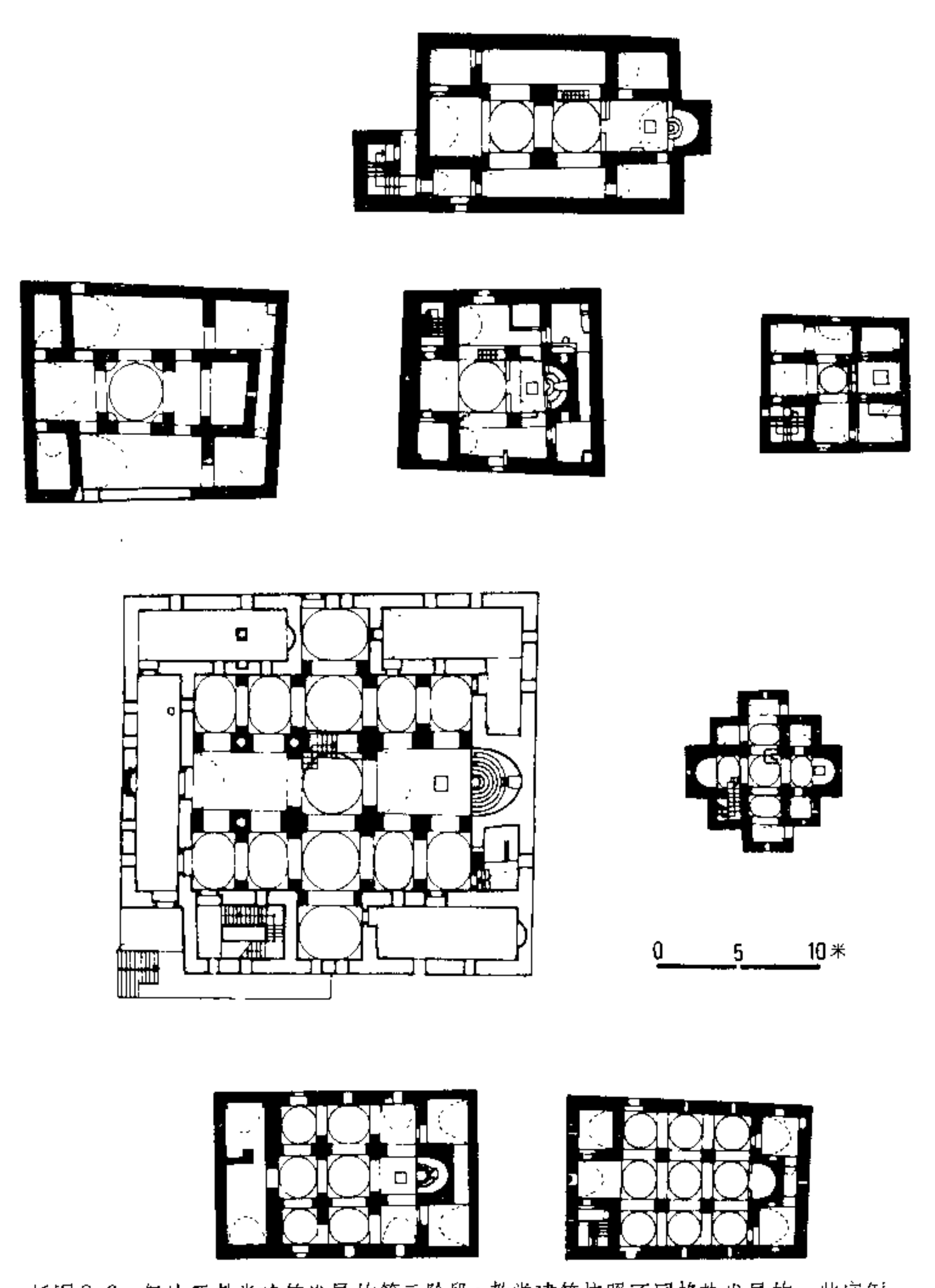


插图8.6 努比亚教堂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教堂建筑按照不同趋势发展的一些实例。上图：第一排C_1——受圆顶罗马长方形影响(塔密特的长方形教堂)。第二排C_2——受双屋顶结构影响(纳吉尔·奥克巴的教堂)或受方十字型影响(松基·帝诺的教堂)。第三排C_3——受圆顶十字型影响(公元10世纪末重建的法拉斯大教堂和塔密特的天使教堂)。下图：C_4——受多轴线大厅结构影响(卡伍的圣拉斐尔教堂)。(根据P·M·加特基维奇,1982年a)

27

督和圣母玛利亚之外，还绘出圣徒、天使长、旧约和新约中的故事，同时在这些圣像掩护下，也出现了当地显贵们的画像，从而可以看到努比亚壁画发展的全貌。它与邻国这一门艺术的表现手法迥然不同。

法拉斯的材料使人们有可能按年代顺序来区分和排列风格不同的各类绘画，其中有些在《非洲通史》第II卷中已经提到过。在这些画中，紫色的色调在公元8世纪（回历2世纪）末占统治地位，接着是公元9世纪（回历3世纪）初那种晚期紫色和过渡时期的色调，以及公元9世纪（回历3世纪）后半叶的白色色调，其典型例子就是第一任大主教（都主教）基罗斯的画像（图片8.2）。这种早期壁画激励了新一代的努比亚本地艺术家们，从而在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创立了他们自己的绘画流派。该流派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把外来的装饰形式以一种独特的方法转化成一种努比亚特有的装饰，[87]每个阶段都有其典型的色调的选择。因此，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初对法拉斯大

221 教堂内部重新粉刷之后，一种新的叫做黄红色的色调得到发展。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放弃了具有现实倾向的白色色调，而更崇尚深远的理想化、系统化的颜面特征。代表当时人物的长袍上的花绣和装饰物变得更加鲜明。可以用国王乔治斯一世的画像作为这种风格的一个范例，这幅画是在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初加在法拉斯大教堂的半圆形室圣母玛利亚和使徒们的组画之中的。在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末重建大教堂的壮举之后，创立了“多色一号”的色调。这是努比亚北部分布最广的一种色调。在好几个教堂中都能得到证实。例如在阿卜杜拉·尼尔基、松基·蒂诺以及塔密特的教堂中即是。[88]其特点是用非常鲜艳的色彩和过分考究的细致来对待长袍、书籍、冠冕和其他描绘出来的东西。四十八幅这类风格的绘画中，公元11世纪初期年代里绘制的马里亚诺斯主教的画像是这种新艺术的杰出代表作。（图片8.4）现在保存在喀土穆苏丹国立博物馆中的大幅耶稣诞生图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图片8.5）；它是努比亚最大的壁画。我们在这里看到努比亚的艺术家当时已经掌握画出众多人物场面的高超技术，这些人物在不同层次上一个高过一个。这里没有连环画面，这是一种埃及艺术的特征，但有一种结构，即几组（三贤人、牧羊人、天使长、飞行天使）从主题到形式都密切相关的画面并列。[89]

努比亚绘画的一个典型新颖的题材是表现当地的权贵们，把他们置于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天使长迈克尔的神圣保护之下。这里采用了一种典型的风格准则：世俗人物的脸色保持着真实色调的深浅程度，不像诸圣和基督，面部总是白色的。[90]

多种颜色的风格一直延续到努比亚基督教时期的后期。它的进一步发展被称为“多色二号”（公元11世纪——回历5世纪——后半叶），“多色三号”（公元12世纪即回历6世纪）和后期风格（公元13世纪至15世纪，即回历7世纪至9世纪）。

---

[87] M.马滕斯－恰尔内茨卡，1982年（a），1982年（b），1982年（c）。

[88] P.范－穆尔塞尔、J.雅凯和H.施奈德，1975年，第54－131页；S.多纳多尼和S.库尔托（S. Curto），1968年；S.多纳多尼，1970年；S.多纳多尼和G.范蒂尼，1967－1968年；S 多纳多尼（编），1967年，第1－60页

[89] K.米哈洛夫斯基，1974年，第39页。也可参阅，K.米哈洛夫斯基，1967年，第143－148页，图片63－69。

[90] 参阅S.贾科别尔斯基，1982年（d），第164－165页；B.罗斯特科斯卡，1982年（a），第295页。

222



图片 8.5 法拉斯大教堂甬道北端的情景和具有“多色一号”风格的耶稣诞生图大幅壁画

法拉斯绘画所确立的编年顺序被已发现的装饰努比亚建筑物中的其他壁画所证实——它们甚至达到可以用来作为确定年代依据的程度。[91] 关于这一方面，对努比亚绘画的调查先于对埃及的科普特绘画所进行的类似工作。埃及的科普特绘画迄今尚未完成全部的编目或分类工作。

总之，人们从古典基督教时期的努比亚绘画中，可以看到拜占廷艺术的影响占着统治的地位（甚至在大量使用装饰品中看得出来），但这种影响并未完全代替在此以前阶段曾盛行过的科普特因素。[92] 这种艺术的主要表现，显示出只有努比亚绘画才有的典型地纯属当地的特征。

这里人们可以注意到努比亚这门艺术在肖像画方面所具有的价值。[93] 这表现在对最早期的基督教思想的传统和圣经的内容有着渊博的知识，努比亚在其黄金时期毕竟是基督教"奥伊科曼尼"[94] 一个重要的分支。它通过自己的交往（这至少从当地的艺术和建筑中可以看到），不仅从埃及的科普特人，甚至很可能从埃塞俄比亚，而且还从拜占廷文化的整个领域，从亚美尼亚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所有这些源泉中吸取灵感，在此过程中创立了她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个性。

---

[91] 特别参阅 M. 马滕斯－恰尔内茨卡，1982 年（c）。

[92] 关于法拉斯壁画的影响，参阅 J. 勒克朗和 J. 勒鲁瓦，1968 年；K. 魏茨曼，1970 年；P. 迪－布尔盖（P. Du Bourguet），1970 年，第 307－308 页；M. 拉萨尔，1972 年，第 274－275 页；1978 年；B. 罗斯特科斯卡，1981 年；M. 马滕斯－恰尔内茨卡，1982 年（d），第 111－116 页。

[93] 有关这一题目的文章很多，可参阅：T. 戈尔高斯基（T. Golgowski），1968 年，1969 年；P. 范－穆尔塞尔，1966 年，1970 年（b）；1972 年，1975 年；E. 丁克勒（E. Dinkler），1975 年；T. 多布泽尼基（T. Dobrzeniecki），1973－1975 年，1974 年，1980 年；L. 特勒克，1975 年；J. 库宾斯卡，1976 年；W. H. C. 弗伦德，1979 年；A. 武卡谢维奇（A. Lukaszewicz），1978 年，1982 年；E. 卢凯西－帕利（E. Lucchesi－Palli），1982 年；W. 戈德卢斯基，1982 年（b）；也可参阅本章前面注 86。关于肖像研究问题的详细状况，参阅特别是：K. 米哈洛夫斯基，1974 年，第 42－63 页（书目第 312－313 页）；1979 年，第 33－38 页，B. 罗斯特科斯卡，1982 年（a），第 295－299 页。

[94] "奥依科曼尼"（*Oikoumene*，来源于希腊文 *oikouménê*，意思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古代地理学家用以称呼地球上为人所居住的部分，以区别于整个地球。

9 北非遭到征服和柏柏尔人的抵抗

H. 莫纳

在《非洲通史》第II卷中，读者对于柏柏尔人、他们的渊源、他们的部族结构以及他们的某些特性可能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印象。① 由于本章是本书叙述马格里布（埃及以外的伊斯兰北非）的第一个章节，因此在这里让读者熟悉一下21/642年以后阿拉伯征服马格里布时期阿拉伯人发现柏柏尔人时后者的状况可能是有益的。 224

某些现代作家认为，“马格里布”一词已失时效，因为它指的仅仅只是我们要讨论地区的一部分。大约600年前，伊本·哈勒敦（732/1332－808/1406年）也持有同样见解；根据他的看法，“马格里布”一词称不上真正地理意义上的适当名字。但是他又说，在他那个时候，它已成为有关特定地区的专有名字。②

E.F.戈捷在他的著作《北非的往昔——几个黑暗的世纪》（*Le passe de l'Afrique du Nord－les siècles obscurs*）开篇第一章就加上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标题“没有名字的地区”。③ 这种做法带有幽默含意，因为马格里布（伊斯兰乡土的“西部”）事实上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地理角度说，都是世界上一个界限分明地方的毫不含糊、非常明确的名字，即处于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埃及以外的非洲北部。

一直到最近，北非（或马格里布）仍被认为（除少数一点点小块的可耕地外）是一个岩石和黄沙组成的贫瘠地区。和阿拉伯半岛一样，极度贫乏的土地使它的居民养成自豪、自由和能够吃苦耐劳的特性。实际上马格里布远远不是贫穷的。其沿海地带拥有充足的水资源和植物资源。阿特拉斯山脉北坡提供了良好的有树牧场，并生长茂盛的橄榄树。在北边，海岸和山麓具有地中海型温和宜人的气候，被伊本·哈勒敦描绘成人间乐园（*mizadj al－tulul*）。大阿特拉斯高原覆盖着林地和森林，大西洋沿岸有土壤肥沃的广阔陆地。

阿特拉斯山脉有丰富的森林、可耕地和牧场，气候宜人，风景优美。那里是地球上一个最坚强和最有耐力的民族——柏柏尔人——的摇篮。伊本·哈勒敦大为称赞“柏柏尔人乡土”的优美和壮丽，他指的柏柏尔人乡土包括利比亚和撒哈拉的相当大一部分。 225

简括地描写了那里的地理环境以后，我们应该简略地讲一讲论述阿拉伯如何征服北非洲的阿拉伯人的著作和现代作家的著作。相当数量古老的阿拉伯人的作品依然存在，它

①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17－19章。

②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1956－1959年，第4卷，第193页。

③ E.F.戈捷（E.F.Gautier），1937年，第7页。

们是那些负有盛名的历史学家写的，如拜拉祖里、伊本·阿卜德·哈卡姆、伊本·阿西尔、伊本·伊达里、马利基、达巴格、伊本·哈勒敦、阿布尔－阿拉伯·塔明和努韦里；这些人的作品大都是信得过的资料的宝库。④ 即使如此，他们作品中也偶尔会出现不一致的地方、日期的错误和种种矛盾之处，这是由于北非被征服的时期和这些历史学家最早作品写作的时间两者相隔超过两个世纪。上边提到的作家中的大部分人，只能算是编年史家，没有很多评论历史的意识；其中唯一的例外是伊本·哈勒敦，他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大量可靠的事实资料，而且还有对柏柏尔人历史合乎情理的阐释。可是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都是阿拉伯人，他们持有的是征服者的观点，并不知道柏柏尔抵抗者的观点，尽管在阿拉伯人的编年史中保留着一些柏柏尔人传统的痕迹。

直到最近，对北非的研究长期由法国和西班牙学者垄断（对利比亚的研究则由意大利学者垄断），他们的著作包括从古代起到独立的马格里布整部历史。虽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历史学家在出版、翻译和阐述阿拉伯古代文本方面做了大量令人钦佩的工作，并且在澄清种种历史问题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记住，他们的大部分作品是在殖民时代写成的，而且他们对历史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为殖民政策的目的服务，例如把阿尔及利亚并入法兰西宗主国的范畴来论述就是一个明证。今天，由于阿拉伯学者和其他学者过去二十年的不懈努力，新一代学者几乎在所有伊斯兰北非的重大历史问题上都超越了法国学者的论断。⑤

美国研究工作者埃德蒙·伯克第三以如下的话语表达了历史学家们对此种情况的流行意见：

226 研究北非历史直到最近几乎还是由法国人所独占。敢于研究马格里布的讲英语的极少数历史学家冒着风险去研究，他们总是受到批评，说他们没有充分掌握大量的法国文献……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关于殖民地研究的人为分工。那种“学者跟随国旗走”的格言在做伊斯兰世界学问上出现的缺乏远见的民族主义传统中得到经验主义的确认。⑥

然而，法国历史学家的巨大劳动应该给予高度的肯定和最深的珍视，尽管我们往往并不同意某些受尊敬的学者对原文的解释。现将这样的学者列举如下：亨利·富尔内、查尔斯·迪尔、E. 梅西耶、E.F. 戈捷、H. 巴塞、威廉·马尔赛和乔治·马尔赛、R. 布伦什维格、E. 莱维－普罗旺卡和 C.－A. 朱利安，⑦ 以上仅仅是略举这类学者中的一、二。

---

④ 见参考书目。

⑤ 参阅 A. M. 阿巴迪（A. M. al－Abbādi）和 M. I. 卡塔尼（M. I. al-Kattānī），1964 年；H. H. 阿卜德·瓦哈卜（H. H. 'Abd al－Wahhāb），1965～1972 年；J. M. 阿本－纳斯尔（J. M. Abun－Nasr），1971 年；H. 贾伊特（H. Djait），1973 年；H. 詹哈尼（H. al－Djanhānī），1968 年；A. 拉鲁伊（A. Laroui），1970 年，1977 年；H. 莫纳（H. Monès），1947 年；M. 塔尔比（M. Talbi），1971 年；S. 扎格卢勒（S. Zaghlūl），1965 年；M. 布雷特（M. Brett），1972 年；M. 丘拉科夫（M. Churakov），1960 年和 1962 年；J. 万斯伯勒（J. Wansbrough），1968 年。

⑥ 埃德蒙·伯克第三（Edmund Burke Ⅲ），1975 年，第 306 页。

⑦ 见参考书目。

阿拉伯征服前夕的柏柏尔人

在阿拉伯人征服北非开始时，他们发现柏柏尔人业已自行组成父系氏族群体。这些氏族群体可分作两类：布特尔（Butr）和巴拉尼斯（Barānis）。

令人奇怪的是，这两个名字过去从未听到有人提及过，直到阿拉伯征服时期方才出现。阿拉伯征服时期最早的编年史学家伊本·阿卜德·哈卡姆作为一个事实提到巴拉尼斯和布特尔，但是斯特凡纳·格塞尔在他十分详尽的北部非洲古代编年史中却没有提到这两个名字，实际上查尔斯·迪尔在他卷帙浩繁的拜占廷统治下非洲的历史中也没有提到这些名字。⑧

布特尔和巴拉尼斯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像阿拉伯语音。巴拉尼斯指穿“布尔努斯”（*burnus*）的那些人，“布尔努斯”是阿拉伯人到非洲前已有的一种长袍，据说第二代哈里发奥马尔·伊本·哈塔卜曾穿过这种服装；布特尔，据阿拉伯作家说，是名叫马德吉斯·阿卜塔尔的那个人的后裔。“阿卜塔尔”（Abtar）这个字是布特尔（Butr）的单数形式，含义是没有后代的人，或者是失去手或脚的人，或者是没有裹头巾的人。因为布特尔不可能由没有后代的人所生，我们只能作下面的解释：布特尔的祖先马德吉斯因为他没有裹头巾，人们就称呼他为“阿卜塔尔”。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接受任何这一类语言学的解释。我们只能承认阿拉伯和柏柏尔宗谱学家提出的有可靠证据的事实。柏柏尔历史学家伊本·哈勒敦在他的著作中说，从无法追忆的年代开始，柏柏尔人已经分为两个群体，两者互相仇视和不断吵架，这种 227 现象成为伊斯兰教传人之前和以后他们整个历史中最明显的特点。

根据E.F.戈捷的研究，这个分类法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相对应，巴拉尼斯是定居的山地居民，而马德吉斯的后裔布特尔则是平原的游牧民。这是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颇能吸引人的假设，但其中推测成分毕竟太多，未经细致的科学调查，难以使人首肯。⑨即使如此，分成两大群体的分类法确有可能是反映了马格里布柏柏尔居民对他们各自祖先的眷恋之情。看来，宗谱学家的此种分类概念是使用由果溯因的方法得出的，但他们这样推理时还是考虑到历史上经历的事实。

按照伊本·哈勒敦的说法，在阿拉伯征服时期，主要的布特尔氏族群体联盟是扎纳塔人、乌特加拉人和纳夫扎瓦人这几个联盟。扎纳塔人看来享有能够控制其他联盟的权力，据说它们曾把它们的名字赐给所有布特尔游牧部落。扎纳塔人是名叫马齐格的一个男人的孙辈，看来巴拉尼斯也是马齐格的后裔。马齐格（māzīgh）一词的意思是“自

---

⑧ S.格塞尔（(S. Gsell），1913－1928年；C.迪尔（C. Diehl），1896年。这种分类很可能阿拉伯作家只应用于讲柏柏尔语的社会中，这些阿拉伯作家在他们熟悉的中东生活现实基础上创造了这样的词汇，因为在中东，阿拉伯人自己就分成两大群体。

⑨ E. F.戈捷，1937年，第227－239页；同时参阅布伦什维格（R. Brunschwig），1974年；H. R.伊德里斯（H. R. Idris），1962年，第1卷，第4－6页。

由人”。⑩

关于巴拉尼斯，同样根据伊本·哈勒敦的说法，他们在阿拉伯征服时期最重要的氏族群体联盟是奥拉巴人、豪瓦拉人和桑哈贾人。⑪

但是，当我们开始研究阿拉伯征服时期和北非在伊斯兰统治下的历史时，我们就发觉出现新的父系氏族群体和新的部落联盟，这些新的实体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上面提到的那些联盟。因此，还需要注意的是，伊本·哈勒敦提出的世系表是为了政治目的或王朝利益编制的，出现时间比较迟，肯定不会早于4/10世纪或5/11世纪。

世系表本身矛盾甚多，根据资料的来源不同而有所不同。各父系氏族群体的地理分布形成另一个问题：例如一个父系氏族群体或氏族群体联盟可以在马格里布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有它的支系，尤其在5/11世纪巴努－希拉尔人入侵后，这种情形更加普遍。⑫

为了避免出错，我们对阿拉伯征服时期及以后直至6/12世纪的柏柏尔部落划分，最好只限于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228 在阿拉伯征服时期，巴拉尼斯又分为许多大的族群，如桑哈贾人、库塔马人、塔尔卡塔人、奥拉巴人和马斯穆达人或马萨米达人。扎纳塔人居住在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向南延伸远达奈富塞山区和费赞诸绿洲，其中地位突出的父系氏族群体联盟是豪瓦拉人、卢瓦塔人、纳富塞人和扎加瓦人。

这些族群还统治着现今阿尔及利亚的东部，这块地方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叫作姆扎布地区，其范围包括中阿特拉斯山脉北坡，远及穆卢亚河，它是称作米克纳萨人的大氏族群体的家乡，其领域向南延伸，远达塔菲拉莱特绿洲。

库塔马人和桑哈贾人居住在马格里布中部，包括奥拉斯山岳和卡巴伊尔（大卡比利亚）地区，生活在塔哈尔特和特莱姆森一带。这里是不少大族群的家乡。住在这里的有合力建立法蒂玛哈里发国的库塔马人；建立两个齐里埃米尔国的塔尔卡塔人；在摩洛哥北部建立伊德里斯埃米尔国时发挥重大作用的奥拉巴人以及其他较小的氏族群体。伊本·哈勒敦称这些摩洛哥中部的桑哈贾人为“第一代桑哈贾人”。在马格里布西部还有一些桑哈贾人的小块飞地，其中最大的是住在马斯穆达人居住地大阿特拉斯山脉的哈斯库拉人的飞地，后来桑哈贾人与马斯穆达人联合，共同建立阿尔莫哈德帝国。

另外一支桑哈贾族群居住在从达拉干河以南沙漠地区，延伸到沿大西洋海岸远到塞内加尔河的一片撒哈拉地带。其中最重要的是兰图纳人、马苏法人、朱达拉人、贾祖拉人、巴努－瓦里斯人、拉姆塔人和塔尔卡人。最后几个实际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图阿雷格人或塔瓦里克人，他们直到今天仍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主人。所有这些人都是饲养骆驼的游牧民。⑬

伊本·哈勒敦称这些桑哈贾族群为“第二代桑哈贾人”。

---

⑩ 有几个马格里布青年学者受“马齐格”（māzigh）这个名字及其含义的吸引，想以“伊马齐根”（Imāzighen，“阿马齐格”Amāzigh的复数）来代替“柏柏尔”，他们认为“柏柏尔”（Berber）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并非如此，“柏柏尔”是“Barbarei”一词失去“野蛮”涵义的专有名词。

⑪ 伊本·哈勒敦，1956－1959年，第4卷，第282－296页。

⑫ 参阅本书第12章。

⑬ 参阅本书第13章。

有几个宗谱学家把库塔马人完全摒除在桑哈贾人甚至整个柏柏尔人以外，认为他们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说他们的祖先是南阿拉伯的希米亚里特人。

但是最重要的巴拉尼斯族群还是马斯穆达人或称马萨米达人。它控制除几个小小的桑哈贾人和扎纳塔人飞地之外的几乎整个马格里布西部地区。其最重要的分支有古马拉人（居住在丹吉尔地区和整个里弗山脉）以及与奥拉巴人一起统治塞布河谷的巴尔加瓦塔人。马萨米达人居住在大阿特拉斯和小阿特拉斯山脉以及在锡尔瓦山岳以南这两个山脉之间肥沃的苏斯平原。这两个族群是阿尔莫哈德宗教运动和统一马格里布和西班牙的阿尔莫哈德帝国的创建者。⑭ 这两族中较大的氏族群体有欣塔塔人、海拉纳人（或艾拉纳人）、乌里卡人、哈扎贾人、马斯菲瓦人、杜加加人、哈尔加人、阿赫尔－廷马柱尔人、索达人、甘菲萨人、巴努－瓦瓦兹吉特人、法塔瓦卡人和马斯塔纳人。

当然，上面所讲的只是阿拉伯人到达北非时柏柏尔人及其族群最简略的概况。有些族群抵制阿拉伯人，另一些人则与他们联合，在漫长的阿拉伯征服时期里先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全体柏柏尔人都遵奉他们古老的对自然力量的崇拜。阿拉伯人叫这种崇拜活动为“麦居斯”（*madjas*），也就是“拜火教”，可是在伊斯兰早期历史中，这个词通常是泛指“异教徒”。

基督教在柏柏尔人中间并没有广泛传播，只有沿海一带的居民，被阿拉伯人叫做阿非利加人（*al－Afarika*）的才信奉基督教。阿非利加人指一种边缘族人，即柏柏尔人、罗马化了的迦太基人、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混合体，与强大的内地柏柏尔部族相比，他们只是很小的少数。⑮ 在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柏柏尔人中，基督教几乎不占什么份量，在内地只有祖杰塔尼亚和拜扎赛纳建立起基督教会。此外，拜占廷统治下非洲的基督教徒由于教会趋于分裂也自相分裂；对于柏柏尔人基督徒来说，基督教长期以来一直是团结一致反对罗马统治的基础，所以他们热情欢迎反对罗马教会教义的阿里乌教派和多纳图斯教派的反正统教义。后来在反对拜占廷的宗教政策中也出现同样情况。

犹太教也得到不少皈依者，虽然它从未发挥有些学者所想象的那种作用，然而它确实遍布整个北部非洲，出生在北非的大多数犹太教徒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改信犹太教的那些人的后代。⑯

征服的第一阶段：征服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

20/641 年，阿姆鲁·伊本·阿斯和拜占廷的最后一位埃及总督居鲁士大主教签订了亚历山大条约，后者承认阿拉伯人征服了他的领土。不久，21 年 10 月 16 日/642 年 9 月 17 日，最后一支拜占廷驻军撤出亚历山大。

⑭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V 卷，第 2 章。
⑮ 关于阿非利加人，参阅 T. 莱维基（T. Lewicki），1951－1952 年。
⑯ 参阅 H. 西蒙（H. Simon），1946 年和 H. Z. 希施贝格（H. Z. Hirschberg），1963 年和 1974 年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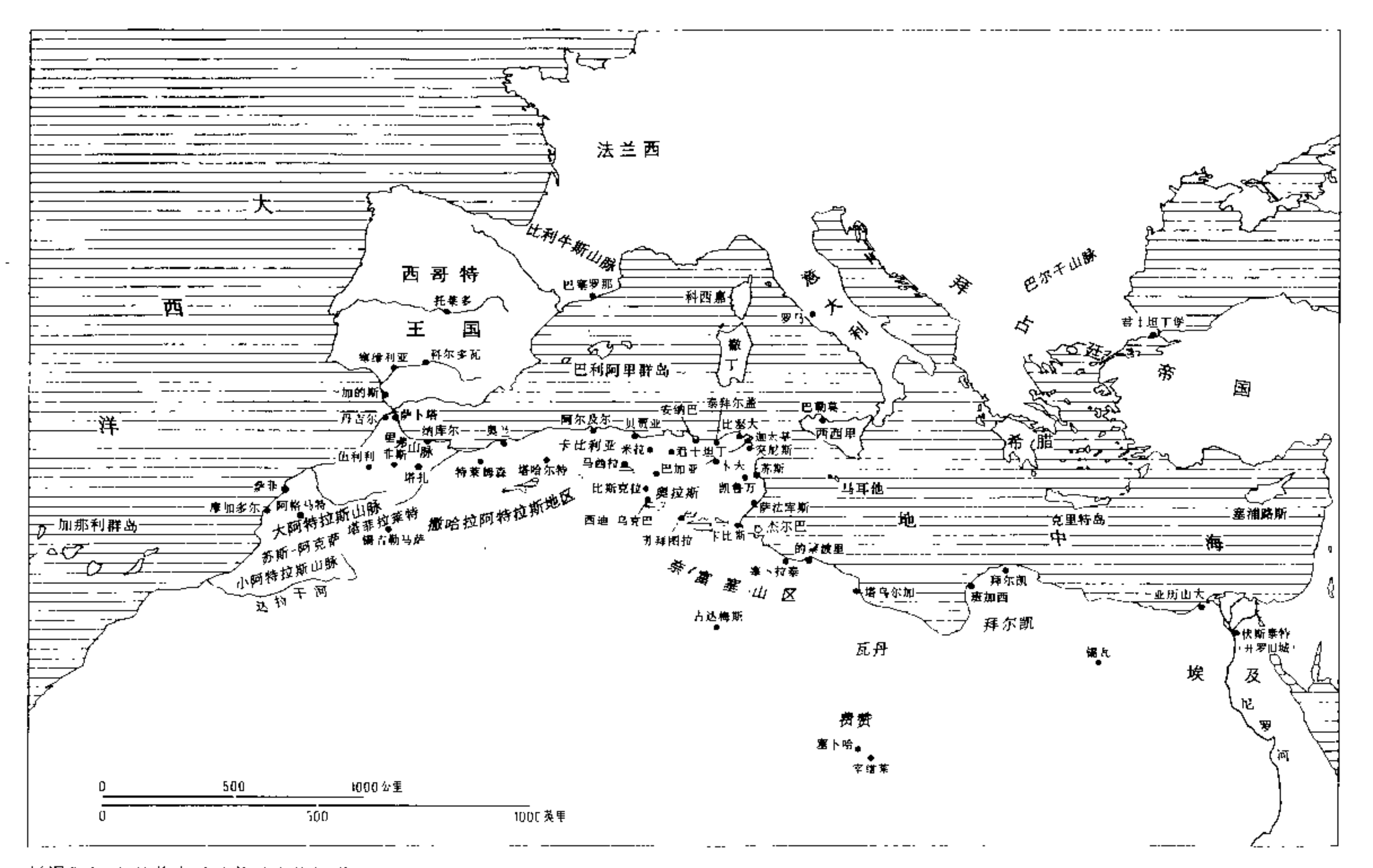


插图9.1 阿拉伯人对马格里布的征服

但是埃及的征服者阿姆鲁·伊本·阿斯认为有必要同样地吞并昔兰尼加；因为莫里斯皇帝（公元582－602年在位）最后一次调整帝国行政区划时，昔兰尼加事实上隶属于埃及省，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同样隶属于埃及。于是，阿姆鲁·伊本·阿斯于22/643 **231** 年初向昔兰尼加进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该地。他发现希腊人和鲁姆人（拜占廷人）并不反对他，反对他的只有卢瓦塔族和豪瓦拉族的柏柏尔人。这些人最后也投降了，并同意每年进贡13 000第纳尔，此后这笔贡金成为埃及应支付贡金的一部分。⑰

在阿拉伯人所写的文献中，昔兰尼加有时被称为安塔布卢斯（即班塔波利斯，五城市之意），阿拉伯人还称它为库里纳，这是希腊文名字昔兰尼的轻微变形。这个地区所有以往使用过的名字都很快消失了，只留下阿拉伯人施加给它的新名字：拜尔凯，这个名字是依据该地区一个小市镇（现称马尔杰）命名的。

与此同时，阿姆鲁·伊本·阿斯派遣他的副将纳菲·伊本·阿卜德·凯斯去占领宰维莱，这是个至今犹在的小小的绿洲，位于昔兰尼加和费赞中间的赛卜哈以南不远处。宰维莱离拜尔凯相当远，但是在那个时候是通向费赞路上最重要的供水处。这个具体细节表明为什么阿拉伯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占领沿海平原之外还有必要深入内地。纳菲·伊本·阿卜德·凯斯在宰维莱留了一支驻军后与阿姆鲁·伊本·阿斯在拜尔凯会合，22年7月/643年4月或5月两人都回到埃及。

一年后，阿姆鲁·伊本·阿斯和他的副将在完成征服北非的道路上又迈出一步。他们的目的地是的黎波里，该地在当时是拜占廷统治下的埃及的整体一部分，和拜尔凯的地位一样。并吞城墙巍峨和商业繁荣的的黎波里港在当时是势在必行的；希腊船舶当时在该港停泊，购买当地的产品——橄榄、橄榄油和羊毛，这个地区当时以其绵羊品质优良著称。阿姆鲁·伊本·阿斯经过短期包围后攻克该城。为了完成征服大业，他兵分二路发动攻击：一路由布斯尔·伊本·阿比·阿尔塔特指挥，进攻的黎波里塔尼亚西部最后一座大城市塞卜拉或称塞卜拉泰，另一路由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率领，占领的黎波里内陆最大绿洲瓦丹。有效地占领瓦丹意味着并吞了整个奈富塞山区。在那个时候，奈富塞山密布丰茂的植被、橄榄林和牧场。它是纳富萨人氏族群体联盟的巩固堡垒。

阿姆鲁·伊本·阿斯就是这样完成征服埃及的最后一幕。他管辖下这个省的西陲是安全巩固的，边界以外是拜占廷所属的拜扎赛纳省，其领域范畴大致相当于如今的突尼斯。

第一次入侵伊弗里基亚

27/647年，埃及新任总督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对拜扎赛纳发起进攻。此时拜占廷统治下非洲的总督是埃克萨赫·格雷戈里（阿拉伯人称他为朱尔吉尔）。他在几年前已宣布独立，将自己管辖下的省与拜占廷帝国其他部分割断关系。在他的军队里有许 **232**

⑰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Ibn 'Abd al-Hakam），1922年，第170和随后诸页。

多雇佣兵和柏柏尔人。阿拉伯和拜占廷双方军队在离苏费图拉（阿拉伯人称之为苏拜图拉或斯拜特拉）不远处相遇。这场战役以阿拉伯人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埃克萨赫·格雷戈里被杀，他的女儿连同许多家人被俘，苏拜图拉被攻占。大量拜占廷人逃亡到迦太基、苏斯（哈德鲁梅）和别的港口，有许多人甚至逃离非洲，从此没再回来。

取得胜利以后，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因与部将不和，回到埃及；但阿拉伯各路军队仍在整个地区四面出击，俘虏数千人，特别是在一处古罗马要塞或露天剧场锡斯德鲁斯（今名贾姆）俘获尤多。非洲居民发觉自己的命运完全操纵在阿拉伯人手中，他们向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呼吁，恳求他接受一大笔赎金，作为撤军的代价。这笔贡金看来他是接受了，他同意离开这个地区，战争于 28/649 年结束。

征服的第二阶段

阿姆鲁·伊本·阿斯和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的战争可以称为征服马格里布的初步或准备阶段。到此时，阿拉伯人对这个地区及其居民已有一些了解。参加战争的一些人获得了有用的经验。自阿姆鲁·伊本·阿斯发动远征，阿拉伯人就一直保留一支固定的驻军长期占据拜尔凯；另一支较小的部队驻扎在瓦丹。但由于爆发内战，整个穆斯林征服计划，瘫痪了近 12 年之久。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哈里发统治中期（24/644－36/656 年在位）到穆阿威叶·伊本·阿比·苏夫扬登上哈里发宝座（41/661 年）之间的岁月相互间不断打仗。

一俟阿拉伯帝国内部恢复和平，伍麦叶王朝的创建者、新登极的哈里发穆阿威叶下令，指示各条战线向前推进以加快征服战争的步伐。43/663 年穆阿威叶任命他的亲信乌克巴·伊本·阿米尔·朱哈尼为埃及总督，任命穆阿威叶·伊本·胡代杰·萨库尼为阿拉伯军总司令，率军再次出兵征服马格里布。

在这个时期，非洲局势的发展对阿拉伯人有利。由于阿拉伯人长时间迟迟没到这一带，拜占廷试图在那里重建其权力。康斯坦斯二世皇帝（公元 641－668 年在位）派出新的总督帕特里夏·尼斯福鲁斯，并命令他从该省征收相等于付给阿拉伯人赎金数量的税收。人民由于付不出如此巨大的金额，只能拒绝付税。于是局势越来越紧急，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对抗。就在这个时候，穆阿威叶·伊本·胡代杰·萨库尼的军队于 45/665 年在地平线上出现。他轻易地打败了尼斯福鲁斯，迫使后者躲在哈德鲁梅（苏斯）城里，然后由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指挥一队骑兵发起攻击。阿拉伯骑兵随即攻占苏斯，尼斯福鲁斯被迫逃往海上。穆斯林迅速连续进攻，先后攻取贾卢拉（库卢利斯）、比塞大和杰尔巴岛。到 46/666 年，他们甚至首次冒险入侵西西里海岸。

233

50/670 年，穆阿威叶哈里发罢去穆阿威叶·伊本·胡代杰·萨库尼的官职，任命乌克巴·伊本·奈菲为北非阿拉伯军总司令。这个任命后来证明对征服北非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乌克巴·伊本·奈菲从瓦丹出发，取道费赞和卡瓦尔以南地区，进行一次远征。他不论抵达哪里，都着意巩固地建立伊斯兰教的权威，建造清真寺，并留下驻军和传教士；然后他再次北进，到达古达梅斯。在那里他与穆阿威叶哈里发派来的一万

骑兵会合，这些骑兵帮助他执行新的任务。随即他开始进攻座落在加贝斯（卡比斯）和他早就决定建为该省军事基地和政治中心的那个地方之间的拜占廷最后堡垒。他不失时机地着手建设他的省会，他称这个新省会为凯鲁万，其含意是"兵营"或"军火库"。

建设这个城市的工作迅即开始。传说中提到乌克巴·伊本·奈菲当时创造了许多奇迹：上天据说指给他建城的确切朝向，所有毒蛇猛兽据说在他命令下离开了这个地区。这是非洲第一个穆斯林圣者西迪·乌克巴传奇的一部分。随着最古老和最可尊敬的伊斯兰城市之一凯鲁万的建成，第一个北非伊斯兰省宣告成立。这个省以一个非洲名字——伊弗里基亚——命名。当时，那个省的领域大致上就是今日的突尼斯。

乌克巴·伊本·奈菲就这样建立了一个作战基地，并把一个省会给予了这个新建的省。此后，他就开始准备他的战争。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使他痛苦万分的打击来临，他得知他已被解除兵权（56/675年）。他的继任者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从56/675年到63/682年担任总司令，事实证明这也是指挥阿拉伯军队征服马格里布的最卓越司令官人选之一。在他到达非洲时，他意识到形势已经有点转向对阿拉伯人不利。拜占廷皇帝康斯坦丁四世（波戈纳图斯）针对阿拉伯人第一次进攻和围困君士坦丁堡而取得了胜利，该城在第一个伍麦叶哈里发穆阿威叶统治时曾被攻占。康斯坦丁四世决定乘这次胜利的优势恢复他失去的部分领土。他收复塞浦路斯和爱琴海上的群岛，并派遣密使与留在迦太基和该省其他地方的拜占廷人恢复联系。这批密使完成任务后，还把当时最强有力的柏柏尔人领袖、统治整个马格里布中部的奥拉巴人和桑哈贾人联盟的首领库赛拉争取到拜占廷人一边。[①]

得到有关易弗里基亚形势的情报后，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按照当时阿拉伯领导人的惯例，决定尽快迎战敌人。因此他立刻进军特莱姆森地区奥拉巴人的领地。到达那里后，他试图在接战之前先与敌人接触一下。他与库赛拉会晤，成功地赢得对方的信任。他向这位柏柏尔首领解释伊斯兰教义，并向他保证，如果他接受伊斯兰信仰并集合在伊斯兰事业的旗帜下，他和他的全体部落将成为穆斯林社会享有完全权利的成员。 **234**

库赛拉被说服了，他和他的部落全体成员都信奉了伊斯兰教。这年是59/678年，是马格里布伊斯兰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第二年60/679年，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在强大同盟者的帮助下，派他的副将谢里克·伊本·苏迈兹·穆拉迪指挥一支军队征服今天称为伊克利比亚或称贾齐拉特·巴舒的半岛。从此以后，这个半岛有几个世纪以他的姓名命名：贾齐拉特·谢里克。占领这个半岛后，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攻打迦太基，攻占锡尔塔（今君士坦丁）以北不远处拜占廷极为重要的要塞米拉。

这次军事胜利后不久，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被解职，乌克巴·伊本·奈菲再次被任命为伊弗里基亚总督兼马格里布西部阿拉伯军总司令，原因是穆阿威叶哈里发逝世，他的儿子亚齐德在61/680年接位。第二次任命乌克巴·伊本·奈菲

① 伊本·阿西尔（Ibn al-Athīr）引证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沃拉克（Muhammad ibn Yūsuf al-Warrāk）的记述时，称此人为卡西拉。

为西部阿拉伯讨伐军统帅在阿拉伯征服北非史上无疑是件极为重要的大事。他使凯鲁万城重新复苏，修复城中的清真寺，并宣布要使整个马格里布向伊斯兰教开放。他在首会 235 留下一支6000人的驻军，率领15 000骑兵和几千名库赛拉所属的柏柏尔人向前进发。

他不选择走沿海平原的平坦道路，却冒险进入奥拉斯山区，打算在柏柏尔人的心脏地带攻击他们。首先，他攻打巴加亚，那里曾是拜占廷统治时分裂出来的多纳图斯教派的中心；确实，那里仍有许多基督教分立教派的教徒为躲避拜占廷人而盘据在山区的城寨中。在乌克巴·伊本·奈非的军队接近时，他们联合邻近的柏柏尔人力图阻止入侵者前进。可是他们的抵抗均未奏效，他们被打败，幸存者逃入深山。乌克巴·伊本·奈非害怕失去宝贵的时间，听任那些人和平地留在那里。几千柏柏尔人和基督教徒（在阿拉伯教科书中称为鲁姆人）向西急速退却，抛弃巴加亚不顾；乌克巴·伊本·奈非以突然袭击方式攻占马西拉，越过奥拉斯峡谷，逼近提亚雷特（塔哈尔特）。到那里时他吃惊地发现数以千计的柏柏尔人——卢瓦塔人、豪瓦拉人、祖格瓦加人、马特马塔人、扎纳塔人和米克纳萨人——正严阵以待，与他们站在一边的还有数目可观的基督教分立教派（鲁姆人）的一支军队。乌克巴·伊本·奈非率军向他们猛扑上去，经过激战把他们打散。

这场胜利给予乌克巴·伊本·奈非"不可战胜者"的美名。数以千计的柏柏尔人在他的胜利和他的人格的威慑与感召下，纷纷皈依伊斯兰教，并集体加入他的军队。他离开提亚雷特，率军入侵库赛拉以及其奥拉巴"部落人"的家乡特莱姆森的周围地区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劝告乌克巴·伊本·奈非不要进攻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是穆斯林，他们的首领库赛拉是他本人的朋友与同盟者。可是乌克巴·伊本·奈非没有听取这真诚提出的忠告，指挥他的大军袭击和占领奥拉巴人家乡的心脏地带。这种不义行动激怒了库赛拉，但是他抑制怒火，决定待机报复。

乌克巴·伊本·奈非随即渡过穆卢亚河，越过战略上重要的塔扎关隘，进军廷吉斯城（丹贾，丹吉尔）。该城的长官朱利安出来迎接，[19] 劝他移军向南去征服柏柏尔人的领地。乌克巴·伊本·奈非迅速向马萨米达人的山地据点推进，山顶上那些王公在惊慌中奔逃，向后撤退，直到达拉干河；乌克巴·伊本·奈非则追逐他们，给予他们歼灭性的打击。他从达拉干河转向东北，越过塔非拉莱特地区，然后再折而向西，抄近路趋向阿格马特－瓦里卡，在那里他建造一座清真寺，另一座清真寺则造在纳非斯河畔一个同名村庄里。

从阿格马特－瓦里卡出发，乌克巴·伊本·奈非向西南进军，到达大西洋岸边摩 236 加多尔以北的萨非，靠近伊吉兰－亚图夫村（吉尔角）。根据传说，他在那里骑在马背上跃入大海，并曾由此抵达世界的尽头为真主作战，如果他无法再向前进，那是因为世界上已没有更多的陆地让他纳入伊斯兰教的怀抱。

可是归程的行军却是一场悲剧。士兵们精疲力竭，经过如此长时间的远征，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见到他们的家人；乌克巴·伊本·奈非允许急于赶路的人先走，最后留在

[19] 现已查明，朱利安不是人名而是官衔名。"朱利安的贸易账"指的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关税。朱利安无疑是一个西哥特人。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征服西班牙时期发现另一个朱利安。参阅 J. 瓦尔韦（J. Vallvé），1967年。

他身边的只剩下5000士兵。这是库赛拉一直等待的复仇时刻。当这支军队经过他的家乡特莱姆森地区时，他抛弃乌克巴·伊本·奈菲的兵营，迅速退人阿特拉斯山脉深处，在那里与早期逃亡到这个地方的基督教徒取得联系，一起在比斯克拉以南塔胡扎附近的平原上等待乌克巴·伊本·奈菲的部队到来。后者发觉自己被5万人包围。他表现出不负本人英名的勇敢气概，立刻与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以及其余同伴一起跳下坐骑，他独自一人扑向敌阵英勇战斗至最后一瞬间。他的士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63年12月/683年8月）。

这个悲剧性的消息震动了整个马格里布。在凯鲁万，穆斯林陷人一片恐慌之中；驻军匆忙撤离，向东迅速退走。于是，库赛拉向凯鲁万挺进并占据该城。他没有公开放弃伊斯兰教义，而只是宣布自己为总督，并以克制的态度对待城中的阿拉伯人。就这样乌克巴·伊本·奈菲的传奇以灾难告终，而伊斯兰教并没有征服伊弗里基亚。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它由一个纯柏柏尔血统的人——奥拉巴人首领库赛拉——统治。

乌克巴·伊本·奈菲进行的战争不是毫无收获的冒险，尽管以悲剧告终，它是穆斯林在马格里布进行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远征。这个人曾使柏柏尔人不寒而颤，而他英勇的结局，使他成为一位圣者和烈士。西迪·乌克巴的坟墓如今成为全北非最受尊敬的圣地。

234



图片9.1 特贝萨城拜占廷防御工事的一部分：卡拉卡拉拱门，本来是位于罗马城中心的宏大建筑，拜占廷人将其改建，成为这座小得多、四周围有城墙的城市的北门，这座城市最终被阿拉伯人攻占。

柏柏尔人抵抗的开始阶段

乌克巴·伊本·奈菲进行的战争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副作用：柏柏尔人终于懂得，阿拉伯人的攻击不仅针对拜占廷，也针对他们。现在谁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阿拉伯人的目的是要把柏柏尔人和柏柏尔人的领土并入他们的帝国和他们的宗教系统。虽然一般的柏柏尔人不反对信奉伊斯兰教，但他们的首领不愿意让他们自己被并入一个外族人主宰的帝国。库赛拉的胜利是这种感情的第一次表现：他十分乐于做阿拉伯总督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的朋友，但拒绝成为一个远方哈里发的臣属。另一方面，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不打算把新省份的统治权给予一个当地首领，即使他是一个穆斯林。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伊本·马尔万（66/685－86/705年在位）暂时没有打算派遣军队增援非洲，但是从来不曾考虑过与库赛拉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

237

直到69/688年，祖海尔·伊本·凯斯才率领一支新的军队去再次征服失去的省份。库赛拉虽然已经建立起一个柏柏尔王国，其领土包括奥拉斯、君士坦丁以南地区和伊弗里基亚的大部分（68/687－71/690年），但是当他获悉一支阿拉伯军队已经在途中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在凯鲁万不安全。他决定在凯鲁万与拉里布斯之间豪瓦拉人居住的叫马姆马的小村庄等待敌人。

马姆马战役是决定性的。如今已是战争艺术行家的阿拉伯人打败了柏柏尔人（71/690年）。库赛拉被杀，他手下的士兵遭受严重损失。阿拉伯人追赶"逃跑的幸存者"，深入马格里布腹地，在某些情况下一直追到穆卢亚河。当时最顽强的一个柏柏尔部族奥拉巴人被彻底压垮，他们放弃特莱姆森周围地区，迁移到塞布河谷以北伯利利城（沃吕比利斯）一带居住。许多城寨被祖海尔·伊本·凯斯攻占，其中包括锡卡瓦奈里亚（希卡哈里亚，即今卡夫）。

获胜之后，祖海尔·伊本·凯斯在伊弗里基亚停留了一年就决定离开。可是在他去埃及途中，一支拜占廷舰队抓住阿拉伯人攻打库赛拉所提供的机会，在拜尔凯登陆并占领该城，当祖海尔·伊本·凯斯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已到距离该城不远的地方；他亲自带领先锋部队向拜尔凯进军，让大军尾随其后，他在与拜占廷人作战的过程中阵亡。

拜占廷得胜的消息引起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伊本·马尔万很大忧虑，但是在4年之内，他没有力量派遣所需要的新部队去伊弗里基亚，他在别处有许多紧急问题要解决。哈里发任命的新总督是哈桑·伊本·努曼，他召集一支庞大军队，并拨出埃及的全部税款收入作为他这次出征的费用；他要一劳永逸地完成征服马格里布的宏伟事业

哈桑·伊本·努曼的第一个目的是打败拜占廷人，以阻止他们与柏柏尔人结盟。他到达凯鲁万后，随即向迦太基进发，破坏了该城的港口设施，使它无法再为拜占廷船舶所用。然后他向四面八方都派出军队，出发前命令把鲁姆人（拜占廷人）一个不留地赶跑，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逃到地中海一些岛屿上避难。在伊斯塔福拉（萨特福拉）周围，马尔希波－迪亚尔希图斯（比塞大）、希波－雷吉乌斯（波尼·安纳巴）和泰拜尔盖

诸城所在的那个半岛上双方军队展开激战；这些地方当初都是拜占廷人的殖民地和要塞城堡，却全都被阿拉伯人占领。

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哈桑·伊本·努曼认为他的军事任务业已完成，转而着手组织政权。可是他刚刚回到凯鲁万，就传来令人吃惊的意想不到的消息：奥拉斯山区贾拉瓦族的首领、阿拉伯人称之为卡希娜、“女祭司”或“女先知”的一个柏柏尔妇女集 238 合当地所有扎纳塔人，宣称她要把阿拉伯人轰出伊弗里基亚。卡希娜（她以这个阿拉伯名字名垂青史）无疑是个令人生畏的女人，既像女王又像女巫，生有黑皮肤、浓头发和大眼睛；根据阿拉伯编年史学家的描写，当她发怒或魔鬼附体时，她的眼睛变红，她的头发直竖。她是那些产生种种传说的一个奇特人物。[20]

作为庞大的扎纳塔族群的首领，她被库赛拉出乎意外的胜利搅得心烦意乱，那位桑哈贾首领把他的统治强加在紧靠她领地的土地上。而这次入侵的阿拉伯军队又打败了桑哈贾人，威胁着要把阿拉伯人的统治领域扩大到整个马格里布，她的恐惧心理逐渐加剧，决心公然反抗阿拉伯人。

扎纳塔人起来抵抗的消息使哈桑·伊本·努曼吃惊，他立刻向新的敌人发动进攻。卡希娜预料到阿拉伯人会来夺取巴加亚，因为那个地方是向奥拉斯山区她的军队进攻的良好基地，所以她毫不迟疑地先发制人占领这个城镇，这样就切断了通向内地的道路。哈桑·伊本·努曼一直攻到米斯基亚纳，这是位于米斯基亚纳河畔的一个小村庄，距女巫－女王的营寨不远。77/696年，哈桑·伊本·努曼发起进攻，贾拉瓦人凶猛地直扑阿拉伯军，把对方击败．阿拉伯人弃尸数以百计，被俘约80人。阿拉伯人伤亡如此严重，以致一位早期的编年史学家伊本·阿卜德·哈卡姆称米斯基亚纳干河为“灾难的干河”。哈桑·伊本·努曼败退拜尔凯。卡希娜对她取得的胜利洋洋自得，没有进军凯鲁万却退入了山区。

她认为阿拉伯人意在掠夺，于是就采取“焦土政策”，下令毁坏奥拉斯和伊弗里基亚之间的所有庄稼。这一行动使定居务农的部落转过来反对她，不久那些部落派密使去见哈桑·伊本·努曼，要求他给予支援。第二年（78/697年）局势进一步恶化；拜占廷皇帝莱昂提乌斯（公元695－698年在位）派出一支舰队，洗劫迦太基，杀死那里许多穆斯林。

到80/699年哈桑·伊本·努曼才得到增援。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伊本·马尔万对征服非洲没完没了的战争感到厌倦，他决心施加决定性的打击。这次哈桑·伊本·努曼率领去攻打卡希娜的军队，其规模之大是该地区从未见过的，阿拉伯军还得到几千柏柏尔人（大多数是布特尔）的增援。

哈桑·伊本·努曼与卡希娜之间的最后决战发生在80/701年。女王被杀，她的部下被击溃。奥拉斯的柏柏尔人急忙请求休战，阿拉伯人同意停战，条件是柏柏尔人提供士兵，到阿拉伯人的军队里去打仗。于是有12 000士兵派到哈桑·伊本·努曼那里、他把这些人编队，由被打败女王的两个儿子指挥。所有这些战士（包括两个年轻王子） 239

[20] 参阅M.塔尔比，1971年．

都信奉了伊斯兰教。

到此时，哈桑·伊本·努曼有理由相信柏柏尔人的抵抗业已粉碎，遂返回凯鲁万。第二步是要保证拜占廷人再也不可能返回，为此目的他下令彻底破坏迦太基城。这件事发生在83/702年；当日荣耀一时的这个城市的历史从此宣告结束。

但是伊弗里基亚需要有一个大海港，哈桑·伊本·努曼选择处于迦太基西南浅水湾上叫做泰尔塞斯（泰尔希什）的一个古老的腓尼基海港。他下令在那里建筑新港，哈里发从埃及拨来1000名熟练的科普特人绘图员帮助他制订计划，挖了一条运河，建了一座造船厂或"军火库"。83/702年港口城市突尼斯就这样诞生了。30年后，整个阿拉伯马格里布的总督乌巴杜拉·伊本·哈卜哈卜（116/734－123/741年在职）进一步把它改造成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他扩大造船厂，建造新的船坞，他鼓励外来移民进城以充实城市人口。他使突尼斯成为这个地区阿拉伯驻军所有大兵营的中心，并把它的清真寺扩大为全区的大清真寺（*masdjid djami'*）。它就是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神殿之一——著名的宰图纳清真寺。

与此同时，哈桑·伊本·努曼已经着手为非洲这一新的省份建立行政体制。这个省份包括东起米苏拉塔西至塔瓦尔加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塔拉布卢斯）地区、从加贝斯到安纳巴的伊弗里基亚本土、以及从安纳巴到阿尔及尔以南谢利夫河上游的姆扎布地区。从那时起，整个这块地域就被认为是非洲这个新的省份。在谢利夫河以西是中马格里布，中马格里布以西则是西马格里布；从理论上说，这些地区都是伊斯兰帝国版图的一部分，那里已经建立起穆斯林社会，但事实上，从乌克巴·伊本·奈菲去世到它们真正并入哈里发国以前，人们对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所知实在是微乎其微，而并吞这两处马格里布是穆萨·伊本·努赛尔和他儿子们的功绩。

暂时，哈桑·伊本·努曼遵循整个伊斯兰帝国实行的行政体制，以此方针组织他的伊弗里基亚省。在那个帝国里，各省过去的行政区划一律保留下来；在各省的最上面，由穆斯林任命一位总督（"埃米尔"，*'amil*），然后由总督本人为每个地区选定一位区长（"瓦里"，*wali*）；作为常规，税收按个人收入大致10%的税率征收。在伊弗里基亚，那里几乎没有可以征收人头税（"吉兹亚"，*djizya*）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这种财源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埃及）是极其重要的，而在这里看来几乎不存在。

伊弗里基亚与阿拉伯半岛类似，两者都组成父系氏族群体，在阿拉伯半岛，政府征收每个氏族群体财产大致2%的税，以骆驼和绵羊缴纳。这种税叫做"萨达卡"（*sadaka*），收税人称为"穆萨迪克"（*musaddik*），这些收税人每年一次或两次到各父系氏族群体收税。哈桑·伊本·努曼在他管辖的省的山区和沙漠地区采用同样的原则办理。但是政府必须为每个族群任命一名执法官（卡迪，*kadi*），派去传教师或经师，以伊斯兰教义教育人民并主持祷告。因此从各个氏族群体几乎收集不到什么收入，因为各种国家工作人员都要从"萨达卡"税款开支费用。

240

无论如何，哈桑·伊本·努曼给予他的省份一个健全的行政基础结构。考虑到它如上所述的极为广阔的领域，这个省以后发展成为北非整个阿拉伯大厦的拱顶石，就不足为奇了。凯鲁万由于它的清真寺——通过哈桑·伊本·努曼的努力此时已全部修整

一新——成为最重要的伊斯兰教学术和文化中心之一。

尽管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都未曾有过阿拉伯政权，伊斯兰教在那里仍然得到稳步的发展。这是由于整个地区到处都有许多传教士，甚至如摩洛哥南端苏斯周围地区那样遥远的地方也有他们的踪迹。我们从可靠的文献得知，那时候柏柏尔人也到处建造清真寺，并向大清真寺捐献布道坛供公众祈祷。有的地方建造清真寺，礼拜者的朝向（kibla）如果不是正朝麦加，都给以必要的纠正。㉑ 例如，马拉喀什以南阿格马特－希拉纳清真寺的布道坛据说从 85/704 年起就在使用。

征服西马格里布

哈桑·伊本·努曼在职时间不长，尚未完成他的事业就去任了。85/704 年他的职位由穆萨·伊本·努赛尔接替，后者虽已 60 高龄，却是一个具有惊人雄心的人，惯于以很高的要求督促自己，是埃及总督阿卜德·阿齐兹·伊本·马尔万的门生。他精神抖擞地来到伊布里基亚，尽管年岁已高，却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冒险、征服和荣誉的渴望。他一到凯鲁万就着手出征。他一心想使中马格里布和西马格里布屈膝，并自信能从征服中获得大量的战利品。对他来说，最大的不幸是马格里布没有可以和伊拉克与伊朗被征服时攫取的窖藏黄金与宝石相比的东西。在这里只有人、人的家属和他们的牲畜。

作为第一次出征的目的地，穆萨·伊本·努赛尔选择泰拜尔盖以南一个山区——扎格万山区。这里又名曾吉塔努斯，是没有投降的豪瓦拉人和贾拉瓦人几个小氏族群体的领地。他发起猛烈攻击，捕获了许多俘虏。这个严重打击使得中阿特拉斯山脉从这一端到另一端的柏柏尔人心惊胆怕。他们纷纷向西马格里布逃窜，穆萨·伊本·努赛尔则紧追不舍。在攻陷一系列村庄并逼降里弗山区（库赛拉的女儿在那里避难）的氏族群体后，穆萨·伊本·努赛尔占领了丹吉尔（丹贾），并勒令休达（萨卜塔）和它的总督朱利安接受保护。从那里，穆萨·伊本·努赛尔派出由他的 4 个儿子及其他军官率领的快速突击部队从四面八方猛扑西马格里布。他们在达拉干河赶上一贯自信的马斯穆达族人，并在战斗中将其击败。 **241**

西马格里布大多数柏柏尔人投降并改信伊斯兰教。穆萨·伊本·努赛尔建立了三个新的省份：以特莱姆森（蒂利姆森）为省会的中马格里布省；以丹吉尔为省会的远西马格里布省和苏斯省。

他为每个省任命一个总督，总督以省会为基地，拥有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强大驻军。为了保证被征服人民的顺从，他把大量战士作为人质（rahā'in），把他们编在穆斯林军队里。在丹吉尔，穆萨·伊本·努赛尔任命他的儿子马尔万为总督，分配给他 17 000 名马斯穆达士兵，后来他取消这个任命，改以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接替。

就这样，穆萨·伊本·努赛尔完成了整个马格里布的征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

㉑ E. 莱维·普罗旺卡（Lévi－Provençal），1956 年，第 223 页。"基卜拉"（*kibla*）是穆斯林祷告时必须朝对的方向，这是"克尔白"（Ka'ba，指麦加神殿）所在的方向。在清真寺里它指朝这个方向的壁龛，也就是朝向麦加克尔白神殿墙上的凹入处。

就，但是他使用了极为残酷的手段，为此，穆斯林到一定时候终究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91/710年穆萨・伊本・努赛尔回到凯鲁万。第二年他被召回，接受他一生中最艰巨的任务：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安达卢斯）。

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安达卢斯）

对穆斯林征服北非的任何研究都不应该忽略柏柏尔人在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进程中发挥的显著作用，或忽略他们对伊斯兰西班牙的历史和此后穆斯林在地中海取得霸权的贡献。

伊斯兰西班牙的历史和文明构成一座宏伟大厦，而这座大厦的基础是由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共同奠定的。承担在伊比利亚南部作一次侦察性作战任务（91/710年）以探索征服可能性的第一个穆斯林军事领导人是扎拉・伊本・阿比・穆德里克的儿子塔里夫。塔里夫是伊斯兰化柏柏尔人的年轻一代，他深受哈桑・伊本・努曼和穆萨・伊本・努赛尔军事思想的薰陶。他成功地完成远征任务，西班牙南部一个小港塔里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首先决定征服西班牙的穆斯林将军也是一个柏柏尔人：塔里 **242** 克・伊本・齐亚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瓦尔古。他的祖父阿卜杜拉是纳富扎族一个支系瓦尔法朱马氏族群体的成员，追随乌克巴・伊本・奈菲改信伊斯兰教，并在后者麾下服务。

如同我们所知道的，穆萨・伊本・努赛尔曾任命塔里克・伊本・齐亚德为丹贾省（远西马格里布省）的总督，这个省就在如今摩洛哥王国的南部。塔里克・伊本・亚齐德统率一支17 000人的军队，主要是桑哈贾人。

塔里克・伊本・亚齐德率领这支远征军再加上其他一些阿拉伯军队渡过海峡，在一处岩石山岬登陆，那里从当时到如今一直叫做塔里克山，或者如我们现在的发音称之为直布罗陀。92年10月/711年8月，他大败西哥特军，在这场战争中，最后一位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或罗德里戈（阿拉伯文为鲁德里克 *Rudrik*）被杀。[22] 塔里克・伊本・亚齐德抓紧时间指挥他不知疲劳的柏柏尔骑兵冲向托莱多（阿拉伯文为图莱图拉）。在500多公里急行军后，他占领了哥特人的都城，这样就充分利用了首次胜利所取得的优势。仅仅一个月，到92年12月/711年9月，这位伊斯兰世界西部第一位柏柏尔名将就结束了伊比利亚半岛上西哥特人的统治，从而进入伊斯兰西班牙时代。

穆萨・伊本・努赛尔立即与塔里克・伊本・亚齐德会师，以他的主要是阿拉伯人的18 000人军队结束这场征服战争。两位司令官在塔拉韦拉会晤，塔里克・伊本・亚齐德和他的柏柏尔人接受征服西班牙西北部的任务。他们立刻出发进攻，3个月内，在93/712年他们席卷埃布罗河以北的整个领域，前锋所指远及比利牛斯山脉，并且吞并了险峻难达的巴斯克地区。他们在那里留下一支小部队，由一个柏柏尔人副将穆努萨率领，

---

[22] 战场遗址始终未能确定。最讲得通的意见是：瓜、德莱特沿岸或拉古纳－汉达，或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但是I. 奥拉吉（I. Olague），1974年，第2卷则说战场可能是在离直布罗陀不远的瓜达兰克河附近。

此人后来在法国南部穆斯林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塔里克·伊本·亚齐德在西班牙指挥作战时期结束之前，他与他的柏柏尔军队还征服了后来叫做老卡斯提尔的整个地区，占领阿马亚和阿斯托加，最后占领莱昂。

在西班牙国土上取得这些辉煌胜利之后，成千上万的柏柏尔人涌进伊比利亚半岛，他们迫不及待地过海，以致有人甚至用树干渡过海峡。他们一旦过海，就参加对半岛其余地区的征服，参加法国南部的穆斯林战争。终止穆斯林在高卢的胜利的普瓦蒂埃战役发生在114/732年秋天。该战役之后的四十年间，还有好几千柏柏尔人留在法国南部。[23] 另有许多人定居西班牙（安达卢斯，伊斯兰西班牙的阿拉伯名字），娶了阿拉伯或伊比利亚－罗曼人妻子，成为安达卢斯的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各处都有一些零星分散的柏柏尔人殖民的地方。他们的下一代被称为"穆瓦拉敦"（*muwalladun*），意即有阿拉伯或柏柏尔父亲和伊比利亚母亲的安达卢斯人。这种"穆瓦拉敦"占伊斯兰西班牙人口的70%。这些柏柏尔血统的安达卢斯人在社会各阶层都有，为我们留下无尽的著名人物名单，他们有将军、部长、神学家、发明家、诗人和艺术家。 **243**

阿拉伯征服后的柏柏尔人

阿拉伯人征服北非的漫长时间（公元642－711年）一旦过去，我们发现一个全新的国家，它的人民经历了全面的改变，包括他们社会甚至部族结构的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思想方法乃至世界观的改变。他们与基督教世界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联系隔绝了近10个世纪。从大西洋海岸到昔兰尼加，如今所有人注视着阿拉伯穆斯林东方。随着他们逐渐地越来越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他们越发感觉到自己属于那个世界，就是这种倾向的力量和深度，促使一些较为重要的社会集团开始夸耀遥远的伊斯兰化以前的阿拉伯祖先。以后，专业的宗谱学家编制出包括阿拉伯祖先在内的家族世系表。这种世系分支为全体柏柏尔人所接受，视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了解柏柏尔人是如何不可抗拒地被伊斯兰教所吸引实在是令人吃惊的。在征服过程中，他们大批皈依伊斯兰教，但开始时，此种"信奉"比口头应付好不了多少。他们以后继续坚信伊斯兰教是因为该教明白而简单的教义吸引他们。在整个征服时期，阿拉伯移民在北非各处都有定居，他们作为和平的新来者到了这里，他们到处受欢迎。在昔兰尼加许多地区和伊弗里基亚诸省建立起庞大的阿拉伯人定居地。他们坚持很多年，尤其是在伊弗里基亚和姆扎布这两个省一级的地区。这些殖民者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巨大的塔明阿拉伯氏族群体联盟。后来，在阿格拉布王朝统治时期（184/800－296/909年），这些阿拉伯殖民地衰落了，逐渐与当地居民同化。

也有一些小型的阿拉伯群体，有时甚至只是单个的家庭或个人，他们定居于柏柏尔人的部落中，在那里他们被看作经师，充当伊玛目（或宗教领袖）。这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常常发展成为政治上的领导地位，阿拉伯伊玛目成为这个部落的政治头目。这种发

[23] 参阅J.雷诺（J. Reinaud），1836年；J.拉坎姆（J. Lacam），1965年；和G.德－雷伊（G. de Rey），1972年

展转过来看也可以说是阿拉伯殖民者的柏柏尔化。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阿拉伯人巴努·萨利赫·伊本·曼苏尔·亚马尼的家庭；91/710年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伊本·马尔万把纳库尔地区（在如今摩洛哥北部阿尔胡赛马斯附近）作为礼物赐给这个家庭在那里定居，他们与当地人混在一起，最后柏柏尔人终于承认他们为埃米尔。同样，244 巴努·苏莱曼·伊本·阿卜杜拉·伊本·哈桑的家族是先知的后代，他们定居于特莱姆森，在那里他们与当地柏柏尔人合作，建立了好几个阿拉伯－柏柏尔酋长国，而他们的表亲非斯地方的伊德里西王朝，自172/789年起就积极推进西马格里布的伊斯兰化。

这些阿拉伯殖民者一般多属于反对伍麦叶王朝政权的叫作哈列哲（哈瓦利吉、*khawaridj*）的持不同意见教派中这个或那个组织。这些组织宣传平等教义，极易被柏柏尔人接受。

使阿拉伯人得以扩张到他们半岛以外的历次大征服都是在新兴的伊斯兰教旗帜和名义下进行的。在征服的最初阶段，"阿拉伯"和"穆斯林"两词往往是意味着同一回事。这种认为族群和宗教同义的倾向随着征服地区人民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不但没有消退，反而随着伍麦叶王朝的出现而保持下来，甚至进一步变本加厉。伍麦叶帝国实际上是以麦加的古莱什贵族部落为首的一个阿拉伯王国，这个贵族部落曾经是先知的对头，只是到最后时刻才改信伊斯兰教。这个贵族部落统治伊斯兰国家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顾作为伊斯兰教义特点的民主原则。新改信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信徒继续被视作次等公民，不能享受与阿拉伯人同样的权利，特别在有关他们必须支付的税收问题上更是如此。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们，除了虔诚的奥马尔·伊本·阿卜德·阿齐兹（99－101年/717－720在位）一人之外，所想的都只是保持本人的特权和收入，他们决不愿给予新皈依者以穆斯林社会（*umma*）成员的权利，也不愿把那些人看作与阿拉伯人具有平等的地位。就是这种政策促使伍麦叶政权统治下出现如此深刻的危机，导致这个王朝在回历2世纪中叶/公元8世纪时彻底崩溃。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族群和社会的紧张局势必然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宗教运动中表现出来。就柏柏尔人而言，当时已经万事具备。伍麦叶王朝的最后一个总督推行一项苛刻的政策，立刻激起敌视的反应。政府把柏柏尔人当作被征服的人民，要用强制手段来压制，不顾几乎所有柏柏尔人都已改信伊斯兰教这一事实，不顾他们曾为伊斯兰教而战因而自视为伊斯兰帝国整体的一部分，与阿拉伯人享有平等的地位。柏柏尔人埋怨说，他们的服务只得到微薄得不能再微薄的奖赏（西班牙的事例最为明显，在那里他们得到的封地采邑都不是肥沃的地区）。因此马格里布人十分厌恶代表伍麦叶官方政策的正统逊尼派教徒，那里的人们信奉哈列哲派教义。哈列哲派教徒成功地在各处建立他们的教区，包括的黎波里以南奈富塞山区那种僻远的地方。这些反正统教派的中心由柏柏尔人建立的和由阿拉伯人建立的245 同样多，两者都攻击伍麦叶政权。123/741年从乌巴杜拉·伊本·哈卜哈卜总督管理下的西马格里布开始的反对伍麦叶王朝的大暴动，并不如一般断言的是柏柏尔人反对阿拉伯人、要把后者彻底赶出马格里布的起义，而是一次反对伍麦叶政权的伊斯兰教徒的反叛。我们将在本卷的其他章节详细叙述这次起义。[24]

[24] 参阅本书第3章和第10章。



马格里布的独立

M. 塔尔比

马格里布的起义和独立

246

伍麦叶王朝统治下的马格里布

普瓦蒂埃战役（114/732年）之后，曾是不可抗拒地吸引越来越多东边和西边各省进入大马士革势力范围的向心力耗竭了。8年后，122/740年开始了逆转过程，离心的反作用导致几个独立国家的建立。78/697－122/740年间，省会凯鲁万前后共经历8位总督，凯鲁万统治整个穆斯林世界西部领土，从的黎波里以东的莱卜达到比利牛斯山脉外面的纳博讷。但大马士革通过凯鲁万直接管理一大片广阔地区的时间只延续了40年多一点。与古罗马、汪达尔和拜占廷的长期统治相比较，这样的短时间似乎产生不了多大影响。但其后果却十分重大和久长。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当地人民在反对外来统治的同时，衷心支持由伊斯兰教引入的价值观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信仰越来越执着，因为这些价值观念能以决定性的方式推动并激励为自由而斗争的力量。

日益增长的愤怒

要理解由征服而促成独立的新马格里布的艰难开端，必须划清眼前的古兰经和它在历史上解释间的界线。过去对它的解释几乎总是导致误解。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古兰经上规定的不分种族、肤色和地区的穆斯林之间兄弟般情谊的理想，实际应用时非常不如人意。应当承认，根本不存在理论和原则基础上的种族主义，也不存在真正的种族隔离。尽管如此，阿拉伯人经常倾向于认为柏柏尔人只能算是"大地的渣滓"①，并传播对柏柏尔人带有侮辱性的圣训（*hadith*）②。这无疑是捏造的，有极大的危害，并令人反感。为了表示公正，或者说为了不传播错误的观念，某些最具博爱精神的阿拉伯人试图为柏柏尔人设计出几个遥远时代的阿拉伯祖先，尤其是也门人祖先，以便使柏柏尔人出身高贵。③其目的在于某种程度上使用虚构世系的方法（这在当时发挥相当大的作

247

①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867年，第6卷。
② 伊本·哈勒敦，1867年，第6卷，第177、181－189页。关于圣训（*hadīth*）见本书第2章。
③ 雅库特（Yakut），1866－1873年，第1卷，第369页。

用）来争取柏柏尔人，同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兄弟[4]。这种情况反映了阿拉伯人对待柏柏尔人的行动中已经表现出踌躇不决和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种犹豫不定的态度在当时的政治场合可以明显看到。哈桑·伊本·努曼继续采取库赛拉的朋友和同盟者阿布·穆罕吉尔·迪纳尔的政策，把柏柏尔人纳入他的军队，在作为战利品分配土地时也有他们的一份。他的继任者穆萨·伊本·努赛尔（79/698－95/714年在位）虽然与相当大一部分柏柏尔人和解，并在自己周围聚集许多来自他们中间的忠实的受庇护者（包括著名的西班牙征服者塔里克），但另一方面还是继续乌克巴的生硬作风，以直截了当的手段对柏柏尔人发动扫荡战争。哈里发苏莱曼·伊本·阿卜德·马立克（96/715－99/717年在位）以穆罕默德·伊本·亚齐德代替他的位置，这位哈里发的各个叮嘱中最严格的命令是征税平等。虔诚信教的奥马尔·伊本·阿卜德·阿齐兹（99/717－101/720年在位）进一步加强这种倾向，他任命的总督是一个"马乌拉"（*mawla*）[5]，并且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这位总督把他的全部热情注入传播伊斯兰教，力求使它在人们心目中有最佳形象。遗憾的是奥马尔的统治太短促，当他逝世时，在伊拉克哈吉贾吉创办的学派受过严格训练的亚齐德·伊本·阿比·穆斯林被派到凯鲁万就任新总督。由于当时大批人纷纷改信伊斯兰教，政府的税收明显下降，为了维持税收总额，这位新总督不顾违反古兰经的精神，下令新近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们一律继续交付人头税（*djizya*）[6]，他甚至在他的柏柏尔卫兵双手烙上印记来侮辱他们。最后他终于被卫兵所暗杀（102/720－721年）。这次杀害总督是当地人越来越群情激愤的第一个信号，伊本·哈勒敦在论述这一事件时正确地看到马格里布哈列哲教派精神的最早表现。[7]

从那时起，形势逐渐恶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叙述，只是引用一段令人震惊的能充分说明柏柏尔人委屈不满情绪的全文。下文实际上是迈萨拉率领的代表团作为最后手段送呈希沙姆·伊本·阿卜德·马利克（哈里发，105/724－125/743年在位）的备忘录内容的誊录；迈萨拉在他的最后努力失败后，就发动了标志马格里布独立开始的起义：

248

> 迈萨拉为了与希沙姆会晤，率领十来个人的代表团向东方进发。他们要求接见，碰到重重困难，而后他们去找阿卜拉什，请求他把下述意见送呈"信徒们的君主"：
>
> 我们的埃米尔带领我们和他的阿拉伯士兵一起出征。但是，当俘获到战利品时，他不分给我们，却对我们说："他们比你们有更多权利得到它"。我们对自己说："好吧！我们为真主的事业打仗，正由于我们从战争中一无所得，我们就格外纯洁。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有权利，我们愿意为他们的利益放弃我们的权利；如果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不屑要求任何战利品"。他们继续讲下去：当我们进攻一个城

---

4 伊本·哈勒敦，1867年，第6卷，第187页。

5 马乌拉（*mawla*），复数为马瓦里（*mawali*），指非阿拉伯人穆斯林，是依附于一个阿拉伯部落的客户。

6 "吉兹亚"，指非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等）须缴纳的人头税。

7 伊本·哈勒敦，1867年，第6卷，第220－221页。

市时，我们的埃米尔对我们说"前进！"他把他的阿拉伯军队留在后面。我们对我们的人说，"好吧，我们前进！在为真主事业的战争中我们肩负重任，我们是为兄弟而背负重担的人。这样，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拯救了他们，我们为他们牺牲了自己"。

接着轮到我们的羊群。他们着手剖开怀孕母羊的肚子，从中寻找胎羊的白羊毛去献给"信徒们的君主"。他们为一件胎羊毛衣服剖了上千只母羊的肚子。我们对自己说，"对'信徒们的君主'来说，这一切是多么轻而易举、垂手可得！但是我们却必须交出所有的东西，让他们为所欲为！"

然后他们侮辱我们，达到劫夺我们外貌标致的女儿的程度。于是我们说，我们在古兰经和经外先知言行中绝对是找不到这种行为是正当的证明。而我们是穆斯林。

现在我们想知道——"信徒们的君主"本人是否赞成所有这一切所作所为，赞成还是不赞成。[8]

哈列哲教派的教义——革命的理论

被称为"贱人"(*al-hakīr*)的迈萨拉原是一个柏柏尔人挑水夫，他改信了苏非派的哈列哲教派教义。在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哈列哲教派的教义曾是最强大的革命力量。它崛起于菲特纳(*fitna*)[9]，即奥斯曼哈里发遭到暗杀(35/656年)后震撼穆斯林社会的重大危机之中，最重要的是它成为一种政治神学。这种神学有一个在所有哈列哲教派各支系的教义中都能发现的共同基础，那就是社会的最高领袖伊玛目由选举产生的原则，没有种族、肤色或地区的差别，由此，使权力授予最佳人选。"即使他是一个鼻子裂开的阿比西尼亚奴隶。"[10] **249**

在哈列哲教派中存在四个运动，可以按照它们革命极端主义的程度排列为：阿扎里加派、纳贾达特派、苏非派和易巴德派。它们中第一个也是最激烈的是阿扎里加派，它于81/700年左右在东方被非常强有力的哈吉贾吉消灭；纳贾达特派实际上还要早几年在马格里布被完全征服前的74/693年左右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只有苏非派和易巴德派继续存在下来。有相当把握可以这样说，它们的宣传人员在95/714年光景向西方进发，好像它们曾经划分过各自的势力范围，苏非派在凯鲁万以西，易巴德派在以东。

它们带给马格里布的是什么？在东方孕育和付之实施的革命战略以及适应这个战略的教义。这个战略把"库乌德"[11]（在"塔基亚"[12]掩饰下秘密的颠覆行动）与"胡鲁

---

[8] 塔百里(al-Tabarī)，1962-1967年，第6卷，第254-255页。

[9] 菲特纳(fitna)指穆斯林内部的叛乱或战争。

[10] 拉比·伊本·哈比卜(al-Rabī'b. Habīb)的《圣训汇编》(*Musnad*)，第819号；A. J. 文辛克(A. J. Wensinck)及同仁，1933-1969年。

[11] "库乌德"(*ku'ud*)字面上的意思是"坐"，即旨在削弱现存体制的颠覆行动。

[12] 塔基亚(*takiyya*)意思是为了逃避迫害，不暴露真实信仰。

杰”⑬（在适当时机发动公开起义）相结合。这种教义强调在全体穆斯林中绝对平等，并断言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伍麦叶统治权力的不合法性。它谴责该执政当局的非正义本性，这个政权历次破坏古兰经的文字与精神，尤其是在税收事务上。所有主要意识形态主题都符合“哈底斯”（圣训，先知的言论），这些言论可在伊本·阿比·拉比的易巴德派的“穆斯纳德”⑭中以及其他地方找到。苏非派没有经典著作，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两个派别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没有敌对意识。因而，宣讲反对伍麦叶暴君的起义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且还是迫切的宗教义务。

还应该指出，哈列哲教派的教义的主张朴素和严格的生活吸引群众。十分明显，在这种教义与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经济或物质条件之间存在完美的互补性。实际的地理 250 环境也有一定意义。正如莱因哈德·多齐曾在著作中写道，尽管过去了几百年时间，短短的几行教义仍保持着全部活力；在马格里布“穆斯林的加尔文主义终于找到了它的苏格兰”⑮。可是，除了这个几乎属于生物学的互补性外，哈列哲教派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个事实，即柏柏尔人被迫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们感到被挫败、被侮辱和被压迫，他们的苦情未曾得到大马士革一丝一毫的关心。此刻风暴即将爆发，无限的痛苦已充塞他们的心头。苏非派和易巴德派运动就要使这股力量迸发出来。

胜利与挫折

迈萨拉就这样在苏非派旗帜下高举义旗、揭竿而起（122/740年），并根据最高权力应给予最值得赞扬的人、不分种族和社会地位的教义被授予哈里发的称号。⑯然而，第一个柏柏尔哈里发的统治十分短暂，他面临强敌，不得不退回丹吉尔，被解除指挥权、并被处死。他的继任者哈立德·伊本·胡迈德·扎纳提赢得诺布尔斯战役大捷（123/741年），这场战役是阿拉伯贵族精华的可耻失败。临近这一年年底，这场大捷之后，起义者在塞布河谷两岸又取得同样辉煌和全面的另一场胜利。阿拉伯人阵亡者中有从东方急忙派来率领一支庞大军队以图挽回局势的库尔苏姆·本·伊亚德。从各种迹象看，一个柏柏尔人的国家在苏非教派精神的团结下即将在马格里布诞生。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成为现实。随着胜利的临近，胜利者队伍里播下了不和的种子。第二年，在被包围的凯鲁万城的城墙下，有两支对立的军队，一支在阿斯南扎营，由阿卜德·瓦希德·哈瓦里率领，另一支在卡伦扎营，由乌卡沙率领。非常出人意外，它们先后均被汉扎拉·伊本·萨夫万打败（125/743年初）。由此产生的欢庆远达东方，在那里，马立克的埃及竞争者、马立克学派的创立者莱斯把这场胜利比作巴德尔战役的胜利。

---

⑬ “胡鲁杰”（khurūdj）意思是从秘密行动走向公开起义。

⑭ “穆斯纳德”（Musnad）即《圣训汇编》，其次序按传达者的名字而不是按主题排列。

⑮ R. 多齐（R. Dozy），1932年，第1卷，第149页。

⑯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Ibn 'Abd al-Hakam），1947年，第124－125页；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1848－1851年，第1卷，第53页；伊本·哈勒敦，1867年，第6卷，第221页。

新的政治地图和对外关系

苏非派诸王国

马格里布的政治地图在骚乱发生后彻底改观。虽然公认凯鲁万地位巩固，但是全部 251 西马格里布和中马格里布如今已处于东方权力鞭长莫及的境地。

哈列哲教派所主张的民主精神和它渴望自治的意愿加上部落宗派主义导致在中央集权的阿拉伯政权废墟上崛起大批国家。这些国家中的较小者，由于它们变动不定的边界和难以肯定的存在年份，我们对它们的情况知道不多。只有最大的几个王国，它们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在历史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记。

在先后建立的这些国家中第一个是塔马斯纳，它位于摩洛哥的大西洋岸边，在萨勒和艾宰穆尔之间，更出名的是它的贬义名称巴尔加瓦塔王国。这个国家的创立者是曾经参加苏非派攻打凯鲁万的扎纳塔人塔里夫。在这个国家里柏柏尔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苏非派的哈列哲教义事实上确曾促进政治自由，但是伊斯兰教的精神统治依然存在，也就是说还是屈从于外来思想。巴努－塔里夫王朝的第四位国王尤努斯·伊本·伊利亚斯（227/842－271/884年在位）决定要人民信奉的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国教，以便更加全面地解放他们。他宣布他的祖父萨利赫·伊本·塔里夫原是个先知，说他留下一本柏柏尔文的古兰经和一整套比伊斯兰教更加严格要求因而被认为更加高明的钦定仪式和饮食限制。简言之，这种做法相当于是一种文化上的解放，目的在于对已经达到的政治解放加上最后的润色。这个过程有点类似当代的非殖民化现象。巴努－塔里夫王朝成功地保持他们的独立和他们的独创性达数世纪之久。他们的逊尼派穆斯林敌人也禁不住赞扬他们的勇气和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这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成功。

正当塔马斯纳王国形成之际，阿布·库拉在中马格里布创建特莱姆森王国（124/742－173/789年）。阿布·库拉的父亲名叫邓纳斯[17]，这个名字说明他出身于基督教家庭。阿布·库拉也曾参加过对凯鲁万的不成功的进攻。根据伊本·哈勒敦的记述[18]，他被推举为哈里发。但是他的扎纳塔人王国在他死后不久即遭到灭亡。173年7月15日/789年12月8日，特莱姆森未作任何抵抗就落入伊德里斯王朝手中。

第三个苏非派王国是由米克纳萨柏柏尔人在锡吉勒马萨的可能是古老城市遗址上建立的巴努－瓦苏勒王国（140/757－366/976年），人们在更多情况下叫它巴努米德拉尔王国。这个王国的领土环绕塔菲拉莱特绿洲，伸展远到达拉干河。它平稳地一直存在到296/909年，到那时法蒂玛王朝开始执掌政权。未来的法蒂玛哈里发乌巴杜拉·马赫迪 252 假扮成商人进入锡吉勒马萨，在那里经过几次支吾应付后最后被捕入狱。296年底/909年9月，阿布·阿卜杜拉·达伊突袭该城，才救出了他。雅萨·伊本·米德拉尔被处死，接替者是一个法蒂玛总督，但此人任职未能超过两个月。巴努－瓦苏勒王朝重新

[17] 伊本·哈兹姆（Ibn Hazm），1962年，第51页。

[18] 伊本·哈勒敦，1867年，第6卷，第267页。

获得对这个城市的统治权，尽管有各种阻碍，还是能继续维持统治。该王朝随之舍弃苏非派教义，先是信奉易巴德派，最后信奉逊尼派，直到被由西班牙伍麦叶王朝支持的扎纳塔人巴努·哈兹龙永远赶跑为止。锡吉勒马萨首先是重要的撒哈拉贸易中心，又是运送黄金之路的歇脚和撒哈拉以南各地、马格里布与东方贸易的汇集点。[19] 今天已不再存在的锡吉勒马萨在后人心目中留下巨大贸易中心的记忆，它的繁荣景象和它的优美住宅（“克萨尔斯”，ksārs）受到地理学家的称赞。可惜对遗址的初步挖掘现在放弃了。[20]

易巴德派诸王国

易巴德派的势力范围最初局限于的黎波里。它处于令人难以安心的位置上。在东西方交通线关键位置上的的黎波里，对于维护凯鲁万与哈里发国家本土的联系至关紧要。它的战略地位使得没有一个公认的易巴德派王国能在那里维持权力达一定长度，甚至连短时期也难做到。如上所述，起义首先出现于西方，它属于苏非派的思想体系，由扎纳塔人领头。易巴德派相对而言比较温和，出于需要言行均较谨慎，开始时只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他们第一步先根据他们的神学（允许“库乌德”（颠覆活动）和“基特曼”[21]（秘密工作）同时进行）把自己组织起来，为时机到来做准备。

起义的爆发是在127/745年。当时大马士革陷于无政府状态，凯鲁万落人阿卜德·拉赫曼·伊本·哈比卜手中（关于此人我们以后还要提到）。他把的黎波里省的易巴德派领袖阿卜杜拉·伊本·马斯乌德·图吉比杀了，从而铸成大错。这次杀害成为“胡鲁杰”（公开起义）的信号。易巴德派的两位领导人阿卜德·贾巴尔·本·凯斯·穆拉迪和哈里斯·本·塔利德·哈德拉米（都是阿拉伯人）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最后占领了整个的黎波里省。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也和他们的苏非派兄弟一样，遭到内部不和的祸殃。后来，人们发现他们死了，两人都把剑刺入对方的胸膛。以后由一个柏柏尔人伊斯梅尔·本·齐亚德·纳富西担任领袖，他率众围攻加贝斯。但是这次进攻失败了。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在131/748年设法打败起义者，并收复了的黎波里，他在那里大规模屠杀易巴德派教徒，以消灭这个省里的异端分子。

可是，所有这些手段都不起作用，易巴德派没有被消灭，只是转入秘密活动（“库乌德”），或者以适当的秘密工作进行颠覆活动（“基德曼”），或者策略地掩盖真正信仰（“塔基亚”），保证能生存下去直到东山再起（“祖胡尔”，*zuhur*）。易巴德派以后又有两次突出地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前列。137/754年它利用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遭暗杀后出现的普遍混乱局势，在的黎波里掌权。从的黎波里出发，阿布尔·哈塔卜向凯鲁万进发，可是与此同时这个城市被从突尼斯南部来的苏非派人上瓦尔法朱马占领

[19] 参阅本书第11章。

[20] 发掘工作是在当时的教育部长穆罕默德·埃尔·法西（Mohammed El-Fasi）请求下开始进行的，但随后被他的后任放弃，虽然已经显出颇有取得成绩的迹象。法西先生取得的引起人们注意的成果是发现“水槽里铺设内部上釉的管子”，它表明“先进的文明水准”。

[21] “基特曼”（*kitmān*）即秘密工作。

并残酷蹂躏。阿布尔·哈塔卜于141年2月/758年6—7月进城，任命未来的提亚雷特创建者阿卜德·拉赫曼·伊本·鲁斯泰梅为总督。有很长一段时间，哈列哲教派的旗帜在整个马格里布迎风飘扬。在这种情况下，马格里布有没有终止与东方的联系呢？事实并非如此。144年3月/761年6—7月，伊本·阿沙斯在凯鲁万再次升起阿拔斯王朝的黑色旗帜。可是10年之后，又一次出人意料之外的猛烈的起义再次爆发，大多数哈列哲教派的领袖都参加这次起义，其中包括阿布·库拉和伊本·鲁斯泰姆，但两人未能成功地维护他们的同盟。事实上，只有从的黎波里来的易巴德派人士阿布·哈提姆对伊弗里基亚的都城进行围困，迫使居民吃猫狗充饥。155/772年初，这个陷于饥饿绝境的城市又一次落人易巴德派手中，但仅仅只有几个月时间。到155年6月19日/772年5月27日，亚齐德·伊本·哈提姆·穆哈拉比使易巴德教徒夺取东马格里布政权的企图永远破灭。

提亚雷特（塔哈尔特）是巩固建立起来而延续时间较长的唯一易巴德派国家(144/761—297/910年)。这个国家是由一位波斯人阿卜德·拉赫曼·伊本·鲁斯泰姆创建的，此人在伊本·阿沙斯围攻凯鲁万时设法从该城逃出。大约在160/778年，他被推举为伊玛日，他的势力很快使东方有所察觉，由此易巴德派教友捐献给他大量资金，这些钱对巩固这个新国家起了一定作用。他创建的王朝尽管出现严重的宗派分裂，但从未遇到真正的挑战。鲁斯泰梅王朝的国土从中马格里布伸展，远到奈富塞山区，很像断续不连的流体原生质围绕着易巴德派的虔诚教徒。这个边界含混不清的国家从未建立起复杂的行政机构，在提亚雷特城本身之外，伊玛日的权力主要是精神、宗教而非世俗性质的。尽管在教义上有矛盾，鲁斯泰梅王朝与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254** 纽带，而对它东方与西方的邻国则采取小心谨慎的中立立场。只有伊玛目阿卜德·瓦哈卜(168/784—208/823年在位)毫无成果地支持奈富塞山区来的追随者夺取的黎波里的企图，从而对阿格拉布王朝进行干涉。嗣后在283/896年，易卜拉欣二世在马努的一次战役中打败王国的先锋和伊玛日的忠实追随者纳富塞人时，提亚雷特袖手旁观而未予支持。

哈列哲教派的衰落和伊德里斯王朝的建立

哈列哲教派不是单独进入马格里布的。实际上在同一时候，有瓦绥勒派倾向的隐士派（伊蒂扎勒派，*i'tizal*）㉒ 也赢得大量追随者，以至易巴德派不得不召来他们最有智慧的学者，在公开的演讲竞赛中与之较量。此类竞赛引起轰动，被后人长久传为美谈。由一个柏柏尔人易卜拉欣·伊本·穆罕默德·穆尔太齐赖统治的一个穆尔太齐赖派小君主国，成功地建立于提亚雷特以西的艾扎拉杰。它是唯一的这类小君主国吗？

什叶派促使异教徒改宗的工作，最早的目标在东方，开始时并没有想到从马格里布打开局面。但是2/8世纪中叶以后，它在马格里布建立组织，成为受沉重挫折的哈列哲

㉒ 伊蒂扎勒派（*i'tizal*）是穆斯林神学的一个派别，这派的教义叫穆尔太齐赖（*mu'tazila*）。参阅本书第2章。

派的重要对手。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145/762年穆罕默德·纳夫斯·扎基亚在麦加领导的未遂起义和随后出现的血腥镇压。当时阿里的后代或是受推举登位，或是被迫逃到别的地方找寻庇护所。有几个定居在马格里布，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推行强有力的宗教和政治的改宗活动，他们的优势在于是先知本人的后代，这大大有利于工作的展开。阿布·苏夫扬和胡勒瓦尼145/762年到伊弗里基亚的西部边界定居，并开始为法蒂玛王朝的最终出现奠定初步基础。据说穆罕默德·纳夫斯·扎基亚的一个兄弟被派到马格里布进行情况调查和劝人改宗活动。这样，具有民主精神的哈列哲教派开始让位给一种截然相反的教义——主张建立神权政治的什叶教派教义，后者教导人们：最高权力必须由神授权利的伊玛目（通过阿里与先知女儿法蒂玛一脉传下来的先知后裔）行施，为全体人民造福。

这种教义上的变化是伊德里斯派成功的根源。这个教派于169/786年法赫未遂起义后在东方已经销声匿迹。穆罕默德·纳夫斯·扎基亚的一个兄弟伊德里斯一世绕道经255 过丹吉尔，“没有找到他正在寻找的东西”㉓，最后来到古老的基督教文明中心伍利利（沃吕比利斯），那里他在172年3月1日/788年8月9日受到奥拉巴柏柏尔人领袖穆尔太齐赖派信徒阿卜德·哈米德的热烈欢迎。6个月后他举行贝耶仪式、宣誓效忠（*bay'a*），并立刻扩充力量，从事伊斯兰化的运动。特莱姆森很快向他敞开大门。他的活动引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注意，后者在179/795年派人把他暗杀掉，凶手是特地从巴格达派来的一个医生，名叫沙马希·亚马尼，他在从事谋杀的过程中得到当时姆扎布总督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的帮助。但是暗杀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伊德里斯一世遗下他死时已经怀孕的一个柏柏尔女奴（*djariya*）坎扎。孩子生下来也取名伊德里斯，由政府摄政，直到他成人举行贝耶宣誓仪式。但是巴格达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一个阿里的后代即使有部分柏柏尔血统，甚至远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也能对它构成威胁。于是哈里发朝廷试图通过凯鲁万用阴谋与贿赂来粉碎尚处于胚胎阶段的颠覆危机。伊德里斯一世的忠实依附者和伊德里斯二世孩提时代的最亲密伙伴之一拉希德在开创基业中死去。不知原因是不是因为要消除摄政时期过长产生的不利影响。政府急于希望伊德里斯二世早日宣誓登位，典礼实际上早在187/803年就已举行，但不知道当时用的是什么头衔，可能是根据栽德派教义使用“伊玛目”的称号。但是登位并没有阻止阴谋继续进行。192/808年，伊德里斯二世以与阿格拉布王朝勾结的罪名下令处死伊克·伊本·穆罕默德·本·阿卜德·哈米德，此人依赖其父的成功而成为奥拉巴人的领袖。这是真实的罪名呢？还是盼望得到解放的一种表示？这位年轻的国王是不是迫切希望摆脱柏柏尔保护人的控制，才于第二年在法斯干河左岸建起宫殿？并任命阿拉伯人作为亲信？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格拉布王朝与伊德里斯王朝之间的仇恨渐渐消失。两者都变得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国内问题。很明显，伊德里斯王朝并不对他们的邻国构成威胁，更不会威胁哈里发国家。他们很快舍弃原来的什叶派信仰，改信逊尼派教义。这样，马格里布实际上分成三个势力范围：东部的阿格拉布王朝、中部的哈列哲教派和西部的伊德里

㉓ 伊本·阿比·扎尔（Ibn Abi Zar'），1936年，第1卷，第7页。

斯王朝。

伊德里斯二世奉行的政策与伊德里斯一世相同。从沃吕比利斯起，后来又从非斯和更远的地方，他推行的主要政策是实行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以及在这个范畴界限内扩展王国的边疆。伊德里斯二世使大阿特拉斯山的马斯穆达人承认他的权力，使特莱姆森留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并夺取南方的奈非斯。但是他在西部却遭到挫折，遇到占据大西洋海岸塔马斯纳高原的巴尔加瓦塔人的顽强抵抗。 256

213年6月/828年9月去世时，他已是一个幅员广大、社会繁荣的王国的统治者，他把整个国家分给他10个儿子中的7个管理。王国的这种划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在开始时灾难并不如一般想象的那么严重。伊德里斯二世的长子穆罕默德（213/828－221/836年在位）得到非斯，从而获得最高统治者权力。从理论上讲王国还是统一的。他的弟弟们得到丰厚的赠予，但理应是他的藩属封臣，臣服在他的权力之下。实际上这个安排起了很坏的作用。继伊德里斯一世和二世政治上实行统一和进行扩张之后接着就是王国的逐步分裂。嗣后，随着以生活奢侈而臭名远扬的叶海亚二世之死（245/859年），这个家族的长房失去王权，王权落人别房，即里弗的巴努－奥马尔手中。从那时以后，危机越来越严重，简直就是无休止的一连串内闵、动乱和血腥的战争，一直到375/985年王朝灭亡方才终止。这个王朝在摩洛哥消失后，又于407/1016年在科尔多瓦重新出现，它是巴努－奥马尔的后裔、一位短命的哈里发阿里·本·哈穆德建立的。

伊德里斯王朝远非光彩但却又不可避免的结局不应掩没它对摩洛哥命运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政治观点上讲，伊德里斯王朝对摩洛哥人民族意识的产生作出了贡献，这点直到今天还能追溯。实际上正是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摩洛哥，并把第一个首都非斯给予这个国家。非斯在马格里布的西陲，它起了凯鲁万在伊弗里基亚和科尔多瓦在西班牙所起的作用。幸而有E.莱维－普罗旺卡的著作，我们今天得以知道非斯首先是由伊德里斯一世建造的；他172/789年在法斯干河右岸建起由柏柏尔人居住的这座城市，以后伊德里斯二世于193/809年在干河左岸对着第一个城建造一座崭新的计划性更强的城市。[24] 最初这两座城各有自己的防御城墙，直到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兴起，这两座城才合并为一。由于它占有沿塔扎河谷主要东西轴线这极为有利的位置，并有可用于建筑的充分的水、木料和石块以及制造陶器用的粘土，非斯发展迅速，成为伊德里斯王朝的骄傲。作为这个新国家的精神中心，非斯当时是，并从那时起一直是第一流的知识中心。

开始时，伊德里斯王国事实上是建立在柏柏尔人基础上的，他的阿拉伯化程度不比鲁斯泰梅王国的波斯化程度更大。可是它接受从凯鲁万和科尔多瓦出来的阿拉伯难民，于是非斯迅速而不可抗拒地变成一个阿拉伯化的中心。早在189/805年，这个城市乐意地接纳500名骑兵，他们中间有凯斯人、阿兹德人、穆德利杰人、巴努－亚赫苏布人和萨达夫人，这些人都来自伊弗里基亚和西班牙。伊德里斯二世在建立他的新宫邸时，就是这些人形成他新朝廷的第一批阿拉伯官员。202/817－818年，非斯向科尔多瓦叛乱 25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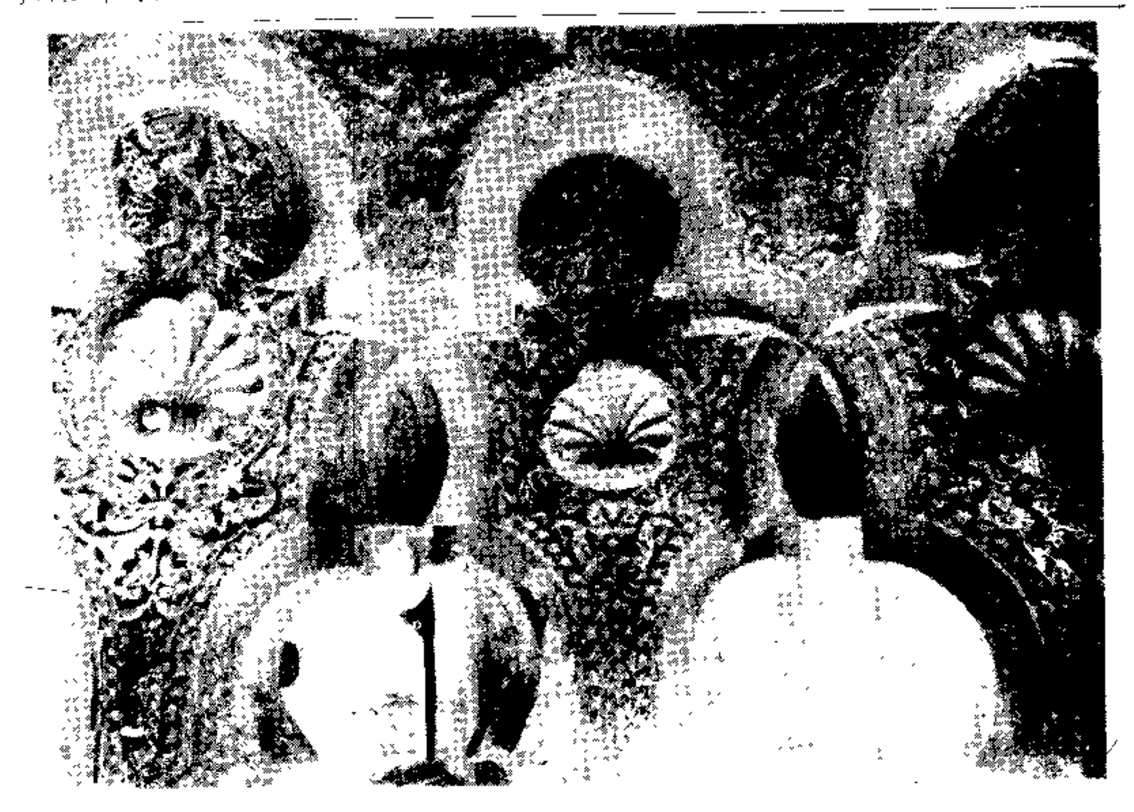
[24] E.莱维－普罗旺卡（E. Lévi-Provençal），1938年。

257

图片 10.1 非斯城全景，图前端为外城墙，它经过历代王朝多次重建



图片 10.2 非斯城里卡拉维因清真寺的宣礼塔



图片10.3 马拉喀什的库巴·巴拉迪因清真寺，穹顶下的精细装饰

中幸存的大批人敞开大门。210/825－826年又接纳来自伊弗里基亚的新移民，最后，在245/859年从凯鲁万来的一位妇女创建至今仍很著名的卡拉维因清真寺和大学，这座清真寺在摩洛哥的宗教史和文化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这样，非斯成为在柏柏尔人基础上建立的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属于阿拉伯特性的首都，非斯成为不是依赖战争而是通过渗透与影响的过程向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迈进的起始点。虽然伊德里斯王朝原是栽德派的什叶派教徒，他们并不特别积极推行他们的教义。实际上，他们鼓励传播麦地那地方的伟大学者马立克的学说，也许因为他们从不掩饰对阿里后代的同情（在伊德里斯一世的兄弟穆罕默德·纳夫斯·扎基亚领导起义的时期尤其如此）。因而马立克派的学说在伊德里斯王朝统治时期的摩洛哥成了最主要的学派。

应该注意的是，伊德里斯王朝的成就颇有感染力。另外一些阿里后代也从哈列哲教派手中夺取中马格里布，并取得相当成功。雅库比在263/876年到276/889年之间曾游历这个地区，他记录下来的阿里派酋长国不下9个。[illegible] 这些形形色色小国之间的边界自然既非严格固定也不封锁关闭。尽管有时存在政治冲突和争吵，在整个地区内人员和货物的流通十分自由，因而思想也同样自由地交流。

伊弗里基亚独立的第一次尝试

自诺布尔斯战役（122/740年）之后，当地的阿拉伯人开始理解他们已处于与他们在东方的阿拉伯同胞完全隔绝的境地。由于战败，他们深受侮辱和震惊，如今还得遭受

[illegible] 雅库比（al-Ya'kūbi），1870－1894年。

那些派来援助他们的“东方人”的蔑视，此种受蔑视的地位过去是专门留给柏柏尔人的。在谢利夫河两岸，由马格里布征服者之孙哈比卜·伊本·阿比·乌巴达·本·乌克巴·伊本·会非率领的伊弗里基亚军队，就在柏柏尔人的眼前，几乎要掉转枪口向从东方派来的、由库尔苏姆·伊本·伊亚德和他的表兄弟巴尔杰率领的“外国”增援军开火，以反击对他们讥讽与蔑视。为对这件事作出反应，阿卜德·拉259 赫曼·本·哈比卜建议由他父亲和巴尔杰进行决斗。一场公开的战斗差一点爆发。这一事件连同许多别的得到确证的事实说明一种现象。如果要理解随后发展的局势、了解这种现象非常重要，那就是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特别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从未见到过东方的那些第二代和第三代阿拉伯人的内心，滋长了真正的地方氏族意识。了解这种现象为理解一整系列事件提供基础，否则这一系列事件都难以理解。

有了这个基础，就比较容易理解，面对巴尔杰的蔑视，阿卜德·拉赫曼·哈比卜为什么能体现伊弗里基亚的尊严，成功地把汉扎拉·伊本·萨夫万（表面上有打败柏柏尔人的荣誉，但毕竟是个“外国人”）赶出凯鲁万，并在东马格里布建立第一个独立国家（127/744－137/754年）。他无疑与伊弗里基亚军队领导人串通一气，在西班牙策划好种种阴谋，然后一举在突尼斯登陆，以夺取政权。得到独立后，伊弗里基亚军队很快从近来蒙受的耻辱和失败中恢复元气，重新有了原有的精神。这支军队在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的指挥下，“暂不允许自己再次被打败”[26]，所到之处敌人闻风丧胆、260 胆战心惊。135/752－753年，它成功地攻打西西里、撒丁和特莱姆森。

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是阿拉伯人领导的国家的元首，这个国家信仰逊尼派教义，根据教义竭力主张保持穆斯林社会（乌玛，*umma*）的团结。有鉴于此，他必然寻求与哈里发国家妥协，首先是与目标相近的大马士革妥协，而后是与巴格达妥协。他毫不犹豫地举行对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忠诚宣誓（贝耶仪式）。这个举动意味着他正式承认：新政权为了它自身得以保持权力，希望（作为回报）得到对方法理上的承认，以进一步确立与增强事实上已经存在的独立。萨法赫（132/750－136/754年在位）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无保留地接受巴格达与凯鲁万之间关系的这种发展。但是他的继任人阿布·贾法尔·曼苏尔（136/754－158/775年在位）却清楚表明他想恢复原来那种局面，特别是在有关财政法规和奴隶的传统供应方面。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深知这种要求如果不能满足将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他给哈里发率直的回答：“今天，伊弗里基亚已是一个完全的穆斯林国家。我们再也没有权利从那里获取奴隶或对那里的人民施加压力。总之，不要再向我索取金钱了”。[27] 这件事成为一个转折点，不久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遭到暗杀，由他代表的第一次独立尝试也归于失败，这个独立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易巴德派的哈列哲教派企图利用这种混乱状态为自身谋取利益，但是并没有得到什么持久的好处。

---

[26] 伊本·伊达里，1848－1851年，第1卷，第61页。

[27] 伊本·阿西尔（Ibn al-Athīr），1885－1886年，第5卷，第314页。

阿格拉布王朝

阿布·贾法尔·曼苏尔成功地把伊弗里基亚重新纳入势力范围大约有40年光景（144/761－184/800年）。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地区只有在穆哈拉比王朝前两个统治者统治下（155/772－174/791年），在易巴德派第二次企图夺取凯鲁万失败后，他们个人的形像和经验尚足以维持权威时，有过法律与秩序。他们的努力只是一种胆怯地建立自己王朝的企图，事实上这个企图并没有获得成功；从178/794年以后，阿拉伯军队各征兵区的对立宗派间的武力夺取政权的斗争达到如此强烈的地步，以致伊弗里基亚变成根本无法统治的地方。此时，这个地区成了哈里发国家长期不得安宁的根源，对财政收入产生严重影响。况且，巴格达日益处于无力进行军事干涉状态。于是，不得不听从哈尔萨马·伊本·阿扬聪明的献策，哈龙·拉希德相应决定主动给予伊弗里基亚独立，否则 261 他们无疑会用武力强求独立。由于一个有力的代表人物、阿格拉布王国（184/800－296/909年）开国者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的及时出现，这个决定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并非无名之辈。他的父亲曾统治过伊弗里基亚（148/765－150/767年），并死在该地。他本人由哈尔萨马·伊本·阿扬任命为姆扎布地方的副总督（179/795年），哈尔萨马·伊本·阿扬本人当时（179/795－181/797年）是伊弗里基亚的总督；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很快就有效地投入反对伊德里斯王朝的斗争，以此表明对阿拔斯王朝的忠诚。181/797年他被提升为总督，很快又有一次表现他忠诚与纪律的机会。由突尼斯副总督塔马姆反叛引起的权力争夺中，他选择扮演一个维护合法性的战士的角色。他打败叛军，重新扶上合法总督那个庸庸碌碌的穆罕默德·伊本·穆卡蒂勒·阿基。难道他采取这样的行动没有一点私心？或者他这一行动是精明算计的结果？姑且不论他的动机如何，事实上不断出现一些人，“劝”他和敦促他取总督之位而自任。他则俨然提出条件，表示只有答应他提出的条件才接受这个“请求”，所谓的“条件”是就任之后他的地位不得再被剥夺，而且他的称号可以世袭，只有如此，他才就任埃米尔的职位。他的交换条件是可以放弃从埃及的“卡拉杰”（土地税）中拨给伊弗里基亚的10万第纳尔津贴，同时答应在他那方面每年交纳4万第纳尔给巴格达国库。哈龙·拉希德接受了这个建议，事实上这个建议对双方都有利。伊弗里基亚不可能一直是整个趋势的例外，留在122/740年迈萨拉起义发动的独立运动之外。但是伊弗里基亚的独立是通过谈判得来的，没有发生与巴格达的分裂与不和。

这个新王朝的前三个统治者把主要力量放在巩固政权上。很自然，他们无法避免军队中的叛变。这些叛变中最严重的一次是由曼苏尔·通布齐发动的（209/824－213/828年），几乎把阿格拉布王朝推翻。这次叛乱的最后平息标志一个和平与成熟时期的开始，在这段时期里，伊弗里基亚享受了一段神话般的繁荣时期。阿布·易卜拉欣·艾哈迈德（242/856－249/863年在位）在后世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位理想的君主，他全心全

意献身于他臣民的利益。他下令建造许多“里巴特”(*ribat*)[28] 以屏护海岸；为了保证凯鲁万的充分供水，他开挖水塘，这种设施甚至到今天还受到人们的赞扬。真正的黄金时代出现在易卜拉欣二世统治时（261/875－289/902年在位），开始时繁荣昌盛达到顶峰，但不久就开始衰落。他的臣民一度享受公正的司法体系和贤明的行政管理体制。但263 是这位国王不幸患忧郁症，精神状态逐渐失去平衡。随之，他对臣民的横征暴敛日益加重，他犯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为对立的什叶派争取徒众提供了绝好的有利条件。

改信什叶派者以阿布·阿卜杜拉·达伊为发言人，在卡比利亚的库塔马柏柏尔人中间传教，宣布一旦马赫迪（救世主）降临，将在大地上建立正义的天堂，天堂里神圣的太阳从西方升起，最后将以同样的强度普照众生。这种改宗宣传颇获成功。掌握大量物质资源但丧失人民支持的阿格拉布政权于是被从贫困山区突然席卷而来的游牧部落压倒，胜利者占据肥沃的河谷。终于296年6月22日/909年3月18日，在卡夫地区的乌尔布斯，王朝统治者受到致命的打击，齐亚德特·阿拉三世带着他祖上积贮的财富连夜用火把照明逃出由他祖父建筑的繁华宏伟的拉卡达城。第二天该城即遭到洗劫和掠夺。

我们在上文讨论独立运动的盛与衰，其实这不限于马格里布。举例而言，西班牙就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但很难说是受哈列哲教派的影响。在西班牙，出现的斗争主要是在两大阿拉伯部落群体之间进行——凯斯人和卡尔布人原是世仇。阿卜德·拉赫曼·本·哈比卜的表弟优素福·伊本·阿卜德·拉赫曼·菲赫里开始时似乎占上风（129/747－138/756年）。但是，他的计划最后被一个重要人物、伍麦叶王朝的阿卜德·拉赫曼·本·穆阿维耶·本·希沙姆·本·阿卜德·马立克所挫败，此人的母亲拉赫是从纳富扎部落俘虏来的柏柏尔人。于是，他逃到马格里布，从那里他经历真正奥德赛式的长期流浪生活，最后终于再次进入西班牙，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酋长国。316/929年，这个王朝的第八个君主阿卜德·拉赫曼三世根据法蒂玛王朝的先例，把酋长国改成哈里发国，这是穆斯林西班牙的黄金时代。

对外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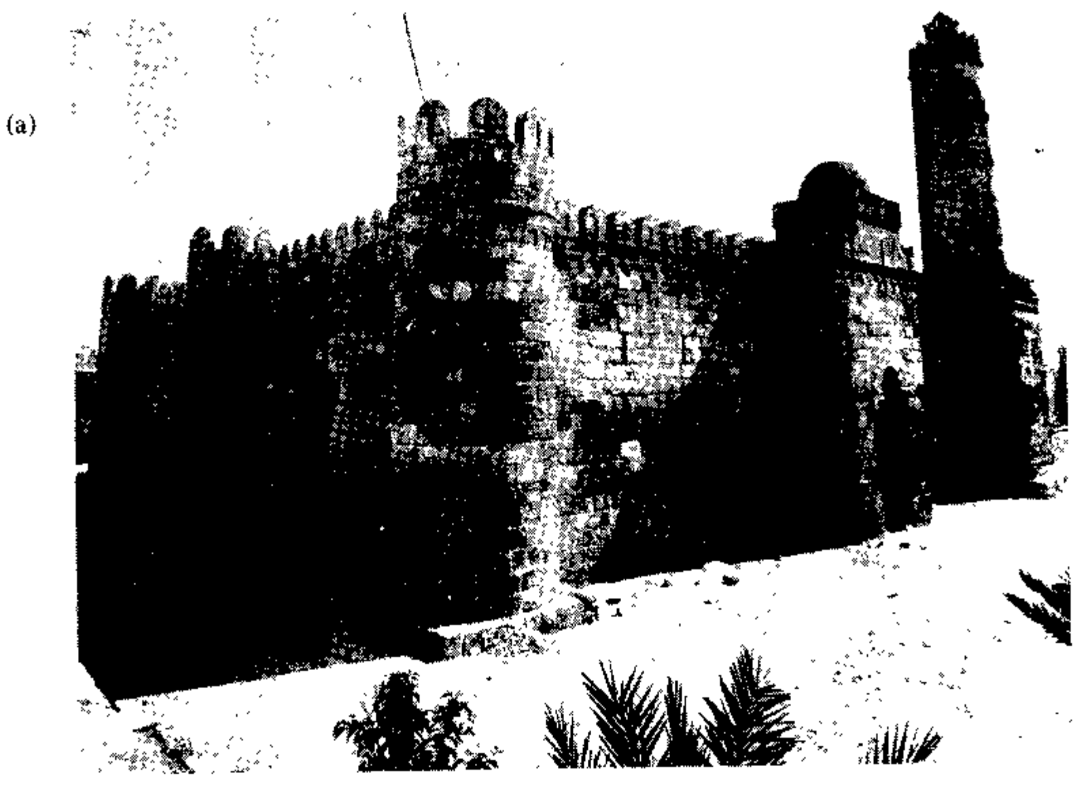
伸展到伊比利亚半岛的中世纪的马格里布，利害关系涉及两个方面：向北到基督教世界，这是从事贸易和进行圣战的地带，向南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是黄金的来源。自从阿拉伯人来到，马格里布进入历史上特别活跃的阶段，其特点为领土和经济的扩张。这是一个暴力与和平并存的过程。

向比利牛斯山外扩张的浪潮在114/732年永远被挡住了。科尔多瓦的埃米尔们随后被迫进行防御性的圣战，目的在于在北边疆界上遏止基督教的压力。早在185/801年，264 巴塞罗那的最终丢失说明这种圣战收效甚微。从马格里布向欧洲的最后冲刺发生在3和4世纪，是从凯鲁万出发的。齐亚德特·阿拉一世（201/817－223/838年在位）为减轻

[28] “里巴特”(*ribat*)的各种含义参见本书第13章。

262

(a)



(b)



图片10.4 苏斯的隐修所(*ribāṭ*).考古发掘证明它是根据伊斯兰纪元前的原则建筑的.

10.4(a):隐修所外貌:四周围墙,只有一个入口、高耸的宣礼塔。

10.4(b):隐修所内院是两层结构,小小的圆屋顶盖在雄伟的入口大门上。

伊弗里基亚不断遭受军队内部叛变的压力，抓住西西里显贵欧菲米厄斯提供的机会介入该岛，尽管遭到愿意遵守联结两个王国的条约的大多数宗教法理学家（“法基赫”）的反对，进攻由主战的执法官阿萨德·伊本·福拉特率领。这场征战（凯鲁万遭到拜占廷的反对）很快就成为非常困难和艰巨的任务。战事从 212/827 年开始，直到 50 年后占领锡拉库萨（264/878 年）方才结束。与此同时，定居于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的阿格拉布人从那里骚扰几个南部城市。基督教世界最感痛切的是对罗马的袭击。这次进攻是在公元 846 年 8 月 23 日来自海上，经过 3 个月的蹂躏（在此期间甚至梵蒂冈都难幸免），这场悲剧才告结束，当时军队在途中住宿时遭到一场暴风雨元气大伤。289 年 7 月/902 年 6 月，亲自指挥作战的易卜拉欣二世受愚蠢献计者的煽动，想通过罗马和拜占廷到达麦加，他在意大利领土上登陆，以致笼罩整个意大利南部的恐慌进一步加剧。数月后，这位埃米尔染上痢疾，在科森扎城墙下一命呜呼，这场冒险遂告结束（289 年 11 月 17 日/902 年 10 月 23 日）。从那时起，军队开始撤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连串战事使最初由意大利王公出钱的雇佣兵所建立的一个小小的穆斯林酋长国能够从公元 847 年到 871 年间在巴里站住脚跟。[29]

这些激烈的冲突只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我们不应因之而看不到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仍然保持着和平与富有成果的关系。84/703－135/752 年，以主要针对西西里和撒丁的 20 多次海上远征为标志的 50 年冲突之后，紧接着就是西部地中海的 50 年全面和平（公元 752－807 年）。在这段时间里，各方订立停战协定，互换使节。这些使团中最著名的是公元 801 年春季从巴格达出发经过凯鲁万去往加洛林王朝统治下高卢的一个使团。与亨利·皮雷纳的想法相反，穆罕默德的帝国与查理曼的帝国之间不存在关系破裂。[30] 贸易始终在进行，甚至包括具有战略价值的物资诸如铜、铁和武器，由伊弗里基亚给西西里供应，尽管这种贸易被教会所禁止，又为法理学家们所抨击。在西西里战火炽烈之际，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加埃塔、威尼斯和热那亚以及其他一些港口都与马格里布保持贸易联系，并且毫不犹豫地与它结盟。有一件事具有特殊意义：266/880 年，在离利帕里群岛不远处，一支阿格拉布王朝的舰队遭到覆灭。据报道，夺得的油料数量之大使拜占廷国内这种商品价格发生空前未有的惨跌。很明显当时已有一支专门从事贸易的船队从这条航线驶往意大利，没料到在这场海战中遇难。这说明古时开辟的贸易航线这时仍在继续使用，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动乱，还有许多其他迹象也表明这个结论是对的。特别有一件事值得着重提及，即在穆斯林莎草纸文献上写有教皇约翰八世的训令。

265

在本卷论述的时期里，马格里布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关系中没有出现过暴力行动。非洲提供奴隶这是公认的，但在这段时间里，取得奴隶不一定就是暴力行动，而且也不是仅仅与非洲有关的事情。例如，那不勒斯当时也卖白奴（萨卡利巴 *sakaliba*）[31] 给马格里布，而凡尔登在买卖阉人中充当的角色更是众所周知的。在这里，记住下边这个事

---

[29] 参阅 G. 穆斯卡（G. Musca），1964 年。

[30] 关于 H. 皮雷纳（H. Pirenne）的论点参阅本书第 1 章。

[31] 穆罕默德·埃尔·法西先生告诉我：甚至到今天，非斯住房的底层，仍有一间房间叫“萨克拉比亚”（*saklabiyya*），过去这是留给白奴萨卡利巴（*sakaliba*）居住的。

实是有益的，即奴隶（slave）这个词来自中世纪拉丁文 *sclavus*，而后者又来自 *slavus*(=斯拉夫人 Slav)。被人唤作“萨卡利巴”的斯拉夫白奴，构成中世纪奴隶劳动力的主要源泉。在凯鲁万或科尔多瓦，从撒哈拉以南地区买来的非洲人主要是送到军队里当兵，因而他们对伊弗里基亚向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扩展作出很大贡献。在穆斯林西班牙境内，他们巩固了阿格拉布王朝和伍麦叶王朝埃米尔的统治权威。

与撒哈拉在南非洲的贸易可以一直追溯到很远的古代，主要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沿大西洋海岸，另一条延伸到利比亚以南的宰维莱。可是贸易量很有限。随着马格里布进入阿拉伯穆斯林世界，自8世纪以来，贸易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那时的主要贸易路线连接奥胡达古斯特（泰格达乌斯特）与锡吉勒马萨，它是从黑人地区运送来的黄金进行分配的真正源头。地理学家兼商人伊本·豪卡勒[32] 340/951 年访问奥胡达古斯特时见到从锡吉勒马萨来的商人开给该城同行的一张42 000第纳尔的支票不禁目瞪口呆。这张支票足以表明这两个中心间的贸易量，也充分说明 S.D. 戈伊坦使用犹太教信徒的秘库（“杰尼扎”，Geniza）文献艰辛地研究的东方银行制度，还确认了伊斯兰西部领土上的贸易活动的规模[33]。锡吉勒马萨好比车轮上的毂，各条商路好比轮辐，由此引往非斯、丹吉尔和科尔多瓦；引往特莱姆森和提亚雷特；引向凯鲁万和东方。这些商路经过西西里和意大利、越过伊比利亚半岛继续通往欧洲，或者更为直接地通过夏尔·库尔图瓦所称的“岛屿路线”，即经过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到法国的普罗旺斯。[34] 266

在这个人员与货物多路流动的网络中，有时候富商本人就是使节或有势力的政界人物。这就明显地发生在穆罕默德·伊本·阿拉法身上，他受提亚雷特伊玛目阿夫拉赫·伊本·阿卜德·瓦哈卜（208/823—258/871 年在位）的派遣，向苏丹国王赍送宝贵的礼物。[35] 穆罕默德·伊本·阿拉法非常富有，以后在鲁斯泰梅王朝的首都居位显要。他所担任的使命是我们从外交史料上获悉的马格里布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最早的一位使者。

社会和文化

人口的密度和变化

中世纪马格里布的人口从来没有像3/9世纪时那样稠密，这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它急于向海外扩展的原因之一。此外，中世纪时的主要倾向与以后时期完全不同，那时候的倾向是游牧民的定居化，这些游牧民聚居于中马格里布和撒哈拉周围地区，使这些地方逐步城市化。这个地区的四个重要的政治－文化重镇——凯鲁万、提亚雷特、锡吉勒

---

[32] 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1938年，第96－97页；N. 莱维蔡恩（N. Levtzion），1968年（a），J. M 库奥克（J. M. Cuoq），1975年，第71页。

[33] S. D. 戈伊坦（S D. Goitein），1967年。

[34] C. 库尔图瓦（C Courtuis），1957年。

[35] 伊本·萨吉尔（Ibn al－Saghīr），1975年，第340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56页。

马萨和非斯——是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成果。3/9世纪时的凯鲁万肯定有几十万居民，而伊本·豪卡勒相信，锡吉勒马萨也有同样数量的人口和繁荣程度。[20] 人口集中于城市的现象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并非普遍。譬如，东马格里布、西西里和西班牙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这里要提到所有的大城市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知道科尔多瓦在4/10世纪时已有100万人口，就可以想见别处了。[21]

当时社会的鲜明特色是它十分不同的成分。马格里布的人口有前章提到的作为它基础的柏柏尔人，柏柏尔人本身又可分为多种多样的族群。西班牙居住的主要是伊比利亚人和哥特人。各种外来成分与这两个基本人种混合，尤其在这个地区的外层疆界一带。267 直到5世纪中叶/11世纪，阿拉伯人的人数还不多。例如在伊弗里基亚，那里有几万，可能有10万，最多不过15万阿拉伯人。在西班牙，阿拉伯人甚至更少，而马格里布实际上没有什么阿拉伯人，那里只有在提亚雷特、锡吉勒马萨和非斯才能找到他们的踪迹。柏柏尔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北部，他们有一些人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他们的人数超过阿拉伯人。除这些人外，还有两个其他种族成分，他们的人数和具体作用更难衡量。一种成分是有一些欧洲人——拉丁、日耳曼或甚至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普遍被认为是“萨卡利巴”（奴隶）；另一种成分则是黑人，他们与富裕人家或舒适家庭的生活结成不解之缘，或者如上文所说，充当埃米尔的贴身侍卫。

社会阶层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西部的社会，如较近时期的古代一样，由三类人组成：奴隶、一般称为“马瓦里”(*mawali*)的前奴隶、和生来就是的自由民。

奴隶在主要城镇地区人数不多，但在游牧人口占极大多数和有强大“部落”结构的地区实际不存在。如果我们作出估计，认为奴隶在伊弗里基亚和西班牙的主要城市中占人口的五分之一，读一下我们掌握的文献，就会得到印象，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实际数字。正如在别的社会阶层里一样，有些人运气好，另些人则不然。后宫中有奴隶（如白种或黑种的宠儿和阉人），在经济生活的每个部门和所有阶层中也都有奴隶，从管理主人财产的富裕管家起到辛勤劳动的农奴或砍柴、挑水的可怜仆役。但是一般地说，奴隶的生活是无可羡慕的，尽管有“斐格海”伊斯兰教法(*fikh*)提供保障和某些奴隶的例外成功。可是，他们在经济上的作用是巨大的，因为他们是当时的工作母机。人们有清楚的印象：在马格里布的东部和西班牙，家务、手工业和农业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奴隶或准奴隶，尤其在包含几个村庄的大庄园里。不过，奴隶地位不管它可能有多么不幸，决不会无限期延续下去，毕竟还是有一条出路。大家知道《古兰经》相当重视释放奴隶的德行。于是，由于奴隶渴望上升到另一个人数同样众多的社会阶层（马瓦里），奴隶的队伍通过释放和赎买自由两者结合的作用而不断缩小。确实存在的社会流动性，起着有利于获得自由的作用。

---

[20] 伊本·豪卡勒，1938年，第96页。

[21] E. 莱维-普罗旺斯，1950-1953年，第3卷，第172页。

"马瓦里"虽然在法律上已经通过释放得到自由，但仍继续住在过去的主人家里，因而成为依附于主人的受保护者。成分复杂的一大批贫贱人也属于"马瓦里"范畴。有 268 意投靠有势力阿拉伯人保护的非阿拉伯人，以阿拉伯人的"部落"祖先为自己的祖先纳人他们的谱系，由此成了他们族系（*gen*）的一员。不论是保护人还是被保护人都觉得这种"瓦拉"（*wala*,依附关系）性质[39] 的有机结合对双方都有好处。受保护人从主人保护下得到好处，保护人根据受他保护人数的多寡获得声望和权力。

自由民一般分为两类：少数有财有势的贵族叫"哈萨"（*khassa*），多数平民叫"阿玛"（*'amma*）。"哈萨"是统治阶级，但界限似乎不很明确。它包括世家门弟的贵族上层和有军事传统的人物、知识界精英以及一切拥有众多财富的人。"哈萨"中有些人的富裕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阿格拉布王朝的大臣伊本·胡迈德家族通过经营象牙贸易积贮巨额财富。另一方面，"阿玛"则由农民、小农场主、手艺人、店主和大量在城乡出卖体力劳动者等各种各样的人构成。在"阿玛"的最低层是生活在赤贫中的最不幸的人。可是"阿玛"的成员并没有被剥夺进入"哈萨"阶层的希望。不存在严格的法律结构以阻止人员的这种流动。

宗教和种族的渗透作用

人际关系中种族和社会障碍的顶端是宗教障碍，宗教障碍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遵循着不同的道路。在征服马格里布的时期，传统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时并存。伊斯兰教从所有社会阶层吸收信徒，到9世纪它无疑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宗教。虽然传统宗教，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但犹太教和基督教在当地人中仍保持相当多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有的是传统的顺民（"希姆米"，*dhimmis*）；或受伊斯兰教保护的依附者，这些人除了有宗教自由外，还享受独立的财政和法律地位。在西班牙，这些人有一个"科梅"（*comes*）作为领袖，有时也称保卫者或保护人。许多佚事传闻明确指出，除了偶尔有短期骚动外，"希姆米"和穆斯林过同样的生活，一般说来彼此关系和睦。没有迹象表明有过犹太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也未曾有过任何宗教暴动。更有甚者，融洽的程度相当深，有些事例说明，基督教徒（尤其是下层基督教徒）真正崇敬社会里卓越的穆斯林苦行者。在家庭生活中这种和谐更进一步。女奴（"贾里亚"*djariya*）或穆斯林的奴隶妻子，依旧信仰基督教或犹太教的情形事实上十分普遍。这种混合婚姻生下的孩子 269 一般信仰他们父亲的宗教，但是，有时达成一种奇怪的妥协，例如西西里某些社会群体中，女儿信她们母亲的宗教。

同样，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西部领地中没有听到过肤色的歧视。阿拉伯人无疑相信他们自己具有优越性，如我们已着重指出过的那样，但他们乐意与别的种族混合在一起。黑人女奴并不被人瞧不起，混血种人也没有什么自卑感，他们在社会等级中可以生活在任何一个阶层里。宗教和种族的多样性就这样成为家庭基本结构的内在的一部分。因此，

---

[39] "瓦拉"是主人与受依附者或被释放奴隶之间的关系。

各种宗教间和不同种族间的婚姻越来越频繁，家族世系（尽管阿拉伯传统赋予父亲以领导地位）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在现实生活中，贵族血统日益淡化和黯然失色。总之，西班牙－马格里布这个在中世纪有狂热声名的社会里，特别混杂和异质的社会两端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它是由许多既十分特殊又相互密切关连的细胞通过多条错综复杂的纽带连成的网络。

语言、艺术和科学

在本卷论述的时期里，伊斯兰世界西部通行几种语言。首先是多种柏柏尔方言，相互间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语言在整个马格里布广泛流行，特别是在阿拉伯语难以深人的乡村和山区，但是这些方言从未随着军队传到地中海北岸。实际上不管哪种柏柏尔方言在西班牙和西西里都没有使用过的迹象。在这两个地方，当地语言只与阿拉伯语作竞争。在西班牙，产生一种源自拉丁语的西班牙－罗曼语，以后普遍使用于乡村和城市。同样，还发现有一种伊弗里基亚－罗曼语的迹象，后者肯定曾在基督徒城市居民中特别广泛地流行。[39] 所有上述基本上都是口头语言。唯一书面或文字写的语言是阿拉伯语，它不单为穆斯林所使用，而且也为“希姆米”所使用，以迈蒙尼德 [40] 为例判断，“希姆米”在某些场合中能够使用阿拉伯语表达特别生动的思想。

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中心。每一个省会和所有主要城市都有自己的诗人、文学家和法理学家。有好几次人们把最著名的法理学家甚至从奈富塞山区的偏僻处找出来，如当提亚雷特受伊蒂扎勒派威胁的时候。可是，目前我们掌握详细资料的只有无疑是最卓越的三个中心，它们是凯鲁万、科尔多瓦和非斯。在这三个中心，正如整个伊斯兰世界西部一样，文学是从东方吸取大部分灵感。在整个伊斯兰广大地区，激起人们景仰的是同样几个诗人和同样几个文学家，他们追求的是同样的文学道路。旅行兼有情况研究与朝圣两方面的长处，它保持东西方通都大邑之间密切而不间断的交往。特别是马格里布的各族人民怀着对东方主人崇敬的心情达到迷信的边缘。人员和思想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若是考虑到当时交通状况的缓慢、艰苦和危险，其速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东方文化在穆斯林世界西部中心开花结果的最好例证，大概是科尔多瓦文学家伊本·阿卜德·拉比希（246/860－328/939年）[41] 编纂的选集《伊克德·法里德》（*'Ikd al-Farid*）。该书内容基本上是汇集东方文学家作品的摘要。据说白益王朝大臣萨希布·本·阿巴德（4/10世纪下半叶的著名文学家）看到此书后激动得拍案叫好，说：“这本来是我们自己的东西，现在回到我们手中了！”

然而，凯鲁万、科尔多瓦和其他大城市也有自己的诗人和文学家，虽然他们没有伟大东方诗人那样有名望，但与《伊克德·法里德》相比也不逊色。举例而言，科尔多瓦有个颂词作家易卜拉欣·伊本·苏莱曼，他歌颂阿卜德·拉赫曼二世（207/822－

[39] T. 莱维基（T. Lewicki），1951－1952年。
[40] 迈蒙尼德出生在科尔多瓦，死于公元1204年；他是著名的医生和哲学家。
[41] 伊本·阿卜德·拉比希（Ibn 'Abd Rabbihi）（1876年）。

238/852年在位）的功勋；词典编者兼诗人和医师法拉吉·伊本·萨拉姆在伊拉克旅行途中与贾希兹（255/868年逝世）交上朋友，把后者的作品尤其是《巴扬》（*Bayan*）介绍到西班牙；奥斯曼·伊本·穆萨纳（179/795－273/866年）从东方带回教他学诗的师傅著名的阿布·塔曼姆所作的《迪万》（*Diwan*）。在伊弗里基亚，文学之士也不比穆斯林世界其他地方少，这里受教育阶层的人们都喜爱诗歌，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点诗。甚至有些王公贵族也精通写诗，如穆罕默德·伊本·齐亚德特·阿拉二世（283/896年逝世）写了两本诗集《拉哈特·卡尔布书》（*Kitab Rahat al－Kalb*）和《扎赫尔书》（*Kitab al－Zahr*），不幸这两本集子均散佚不存；还应提到阿布尔·优斯尔·卡蒂布（298/910－911年逝世）写的《拉基特·马尔詹》（*Lakit al－Mardjan*）、《里萨拉特·瓦希达》（*Risalat al－Wahida*）和《库特卜·阿达布》（*Kutb al－Adab*），可惜也都遗失了，这位作家曾担任阿格拉布王朝和法蒂玛王朝的大臣。阿格拉布王朝的首都也有它的哲学家，这些人在祖拜迪的《语法学者传记资料》（*Tabakat al－Nahwiyyin*）中都得到个别的分类论述，可见都是卓越之辈。但是，看来在东方由于金迪（约256/870 **271** 年逝世）的出现已经得到某种承认的哲学，当时（甚至以后）也没有为伊弗里基亚所接受。西迪·乌克巴为保卫伊斯兰事业而奉献的这座城市难以接受这种令人不放心的思想自由。这个学科当时还在它的襁褓时期，甚至在西班牙，那里后来虽然有世界著名的哲学大师尤其是伊本·马萨拉[42]（319/931年逝世）对之进行探索，但在当时也无人过问哲学。

在整个中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人们不但偶尔热衷于写诗和进行哲学探讨，而且还爱好饮酒（有几种令人陶醉的美酒被某些伊斯兰法学学派认为是合法的，如纳比兹酒）、唱歌和跳舞，这些活动在宫廷和贵族及有钱人圈子里非常盛行。已经掌握的文献中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制订了一整套礼仪规矩来指导这种环境下奉行的礼貌举止。伊弗里基亚，尤其是西班牙，也没有例外地遵守这种规矩。在麦地那和巴格达歌舞班受过训练的女奴到处受欢迎，她们的身价有时惊人地高昂。著名的作曲奴隶同样是人们寻觅的对象。有一个作曲奴隶齐尔亚卜（173/789－238/852年）积贮起极为可观的私财，并具有相当的势力。齐尔亚卜是个黑人，也是个“马乌拉”（释放奴隶）。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允许进入著名的歌舞班在伊沙克·穆西利（150/757－235/850年）指导下接受训练。由于他技艺高超才能出众，不久就引起主人的妒忌，被放逐他乡。他在凯鲁万住了一段时间后，受哈卡姆一世（180/796－206/822年在位）的邀请去科尔多瓦。哈卡姆一世派宫廷犹太歌手曼苏尔迎接他。正值此时，哈卡姆突然去世，齐尔亚卜又受到继位者阿卜德·拉赫曼二世（206/822－238/852年在位）的隆重欢迎。齐尔亚卜为宫廷和社会上统治阶级的风俗带来深刻的变化。他带来优雅的风度和宫廷华贵气派。他指点宫中男女怎样在餐桌上举止得体，怎样化妆打扮，怎样梳头发和使自己的服饰合乎时尚和环境。齐尔亚卜的歌曲，在他自己创新的改良乐器伴奏下，很快就取代了原来的歌曲，并一直流传到今天。至今仍流行于马格里布的“平凡曲”（马卢夫曲，*malaf*）和西班牙的“弗

---

[42] 参阅M.阿辛·帕拉西奥斯（M. Asin Palacios），1914年。

拉门科"曲就是从齐尔亚卜引起的音乐革命源远流长地继承下来的。[43]

此时，西班牙的科学还处于摇篮阶段，但是在凯鲁万，拥有伊沙克·伊本·伊姆拉恩和齐亚德·伊本·卡尔卡（308/920－921年逝世）这样大师的医药学校已享有相当声誉。除了军事建筑和宫廷建筑有所成就外，3/9世纪特别以伊斯兰教最精致的两座不朽建筑物——凯鲁万清真寺和科尔多瓦清真寺——而令后世永志不忘。凯鲁万清真寺主要由阿格拉布王朝建造，科尔多瓦清真寺虽然是169/785年由阿卜德·拉赫曼一世所兴建，但直到两个世纪之后强有力的"王宫建筑大师"伊本·阿比埃米尔统治时期才全部完成（377/988年）。还应该提醒注意的是，非斯著名的卡拉维因大学和清真寺是在245/859年由一位从凯鲁万来的妇女兴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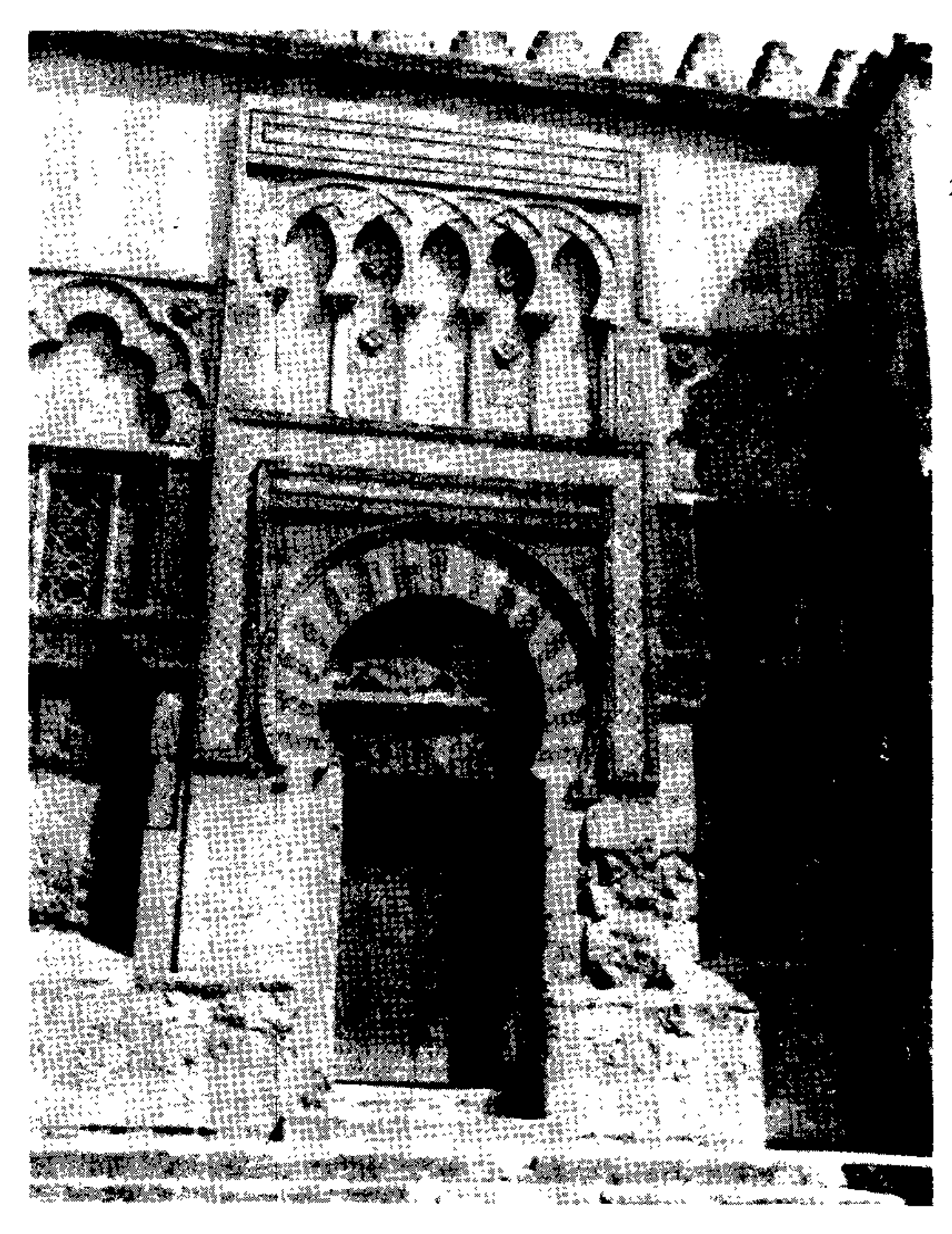
图片10.5　凯鲁万附近的大湖——拉卡达湖，结实的湖堤起着防波堤的作用，挡住大风激起的波浪

宗教思想

整个中世纪，穆斯林世界的文化活动基本上掌握在教士手中，也就是掌握在宗教法理学家手中。在3/9世纪，没有一个学派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存在着相对的思想自由和热情地坚持信仰的激烈行为。十分奇怪的是，禁止思想自由最厉害的都市是科尔多瓦。伊本·萨吉尔证明提亚雷特存在较多的宽容，虽然它由以政治态度强硬出名的易巴德

[43] 关于齐尔亚卜此人的事迹见E.莱维－普罗旺卡，1950－1953年，第2卷，第136及随后诸页。

273



图片10.6 科尔多瓦，清真寺西边正面的大门和实心拱顶

派控制。至于凯鲁万，公认的事实是，从3世纪中叶/9世纪起，大清真寺对易巴德派、苏非派和穆尔太齐赖派开放。这些宗派的教徒敢于在逊尼派教徒耳目之下公开宣讲他们
274 “非正统的”或“异端的”教义。可是，这种宽容态度，不论程度如何，决非等于漠不关心。绝对不是。争辩是活跃的，吵吵嚷嚷的，有时导致激烈的争吵接着甚至发生殴斗。举例而言，当时毫无疑问是逊尼派战士的阿萨德（213/828年逝世）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用脚踢了穆尔太齐赖派的领袖伊本·法拉，使对方退走，然后发表声明强调，对方竟敢在他的教众面前，对永恒的主的看法问题与他唱对台戏。[44]

3/9世纪是热情探究法律与神学的时代，这种探究是一项建设现今社会和未来社会的伟大事业。断言、否定、驳斥和反驳斥彼此轮番进行，其方式有的口头有的书面，但无不感情激烈、愤怒填膺。一方面，在凯鲁万掌权的穆尔太齐赖派钻研雄辩术的武库，另一方面，人口占多数并经常扮演反对派角色的逊尼派则从传统中吸取灵感。古典派和现代派争吵得相持不下！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打算出版一部再现当时凯鲁万盛行气氛的论战作品集。

辩论的主题是什么？是信仰与赎罪。信仰仅仅是内心坚信问题呢？或者它是信仰的系统化并将其化为行动？实际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在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辩论陪衬下显得突出地醒目。自由意志和命运（“卡达尔”，*kadar*）问题也是明显的辩论主题。作为伊蒂扎勒派的中心和形成问题——人的命运是否事先决定是所有宗教和哲学争论的渊源，从来没有人能够真正成功地解释清楚这一解释不了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当时燃起伊弗里基亚人的热情，人们在苏斯隐修所围墙下举行的争论引起相当规模的骚动。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上人们同样情绪活跃而热烈，诸如：神的属性；来世中真主的形象；《古兰经》的真谛等等。可以看出神学成为所有辩论的核心，并渗透到公众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3/9世纪可以说是智力活动高度集中的时期。

嗣后，从3世纪中叶/9世纪起，当塞哈努（160/777－240/854年）把“异端盲从者”从凯鲁万大清真寺赶走，正统派终于开始占上风的时候，交锋与斗争仍丝毫没有缓解。逊尼派内部出现争执，同样的对峙状态也发生在易巴德派和苏非派的徒众中间。

在这种激情、争论和冲突的背景前，衬托出几个杰出的宗教法理学家特别显著的身影。在西班牙有伊萨·本·迪纳尔（212/827年逝世）、阿卜德·马利克·本·哈比
275 卜（238/852年逝世），占更重要地位的是柏柏尔“马乌拉”（释放奴隶）叶海亚·伊本·叶海亚·莱西（152/769－234/849年）。在凯鲁万有阿萨德·伊本·福拉特（142/759－213/828年）和他的对手塞哈努·伊本·赛义德·塔努希。其中除阿萨德为哈乃斐学派所特别推崇外，其他诸人对马立克学派在伊斯兰世界西部的胜利都有一份功劳。其中塞哈努在这些事态发展中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写成文字的不朽律法纲要《穆丹宛》（*Mudawwana*），把马立克学派的学说推向最卓越的境地。塞哈努后来受人们尊敬称为大师，聚集了很多门徒。据说，每个城市都有700名左右“真正杰出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但在伊弗里基亚而且也在西班牙传播塞哈努的教导。西班牙人成群结

[44] M.塔尔比（M. Talbi），1966年，第220页。

队地去听塞哈努的宣讲。这些人3/9世纪时在凯鲁万受到的议论，犹如后来苏格兰人和德国人在巴黎受到的议论雷同。伊亚德在他的《马达里克》(*Madarik*) 一书中提到57个西班牙宗教法理学家的名字，他们把凯鲁万这位神学大师的教导带回家乡，使整个西班牙都知道他的重要著作《穆丹宛》。[45]

我们在上文所简略论述的时期是马格里布历史中关键性的时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非洲的这一部分获得独立，成功地确立了至今实际上没有改变的边界，并形成它文化上和精神上同一性的重大特征。

---

[45] M. 塔尔比，1962年。

11 南北关系中撒哈拉和撒哈拉居民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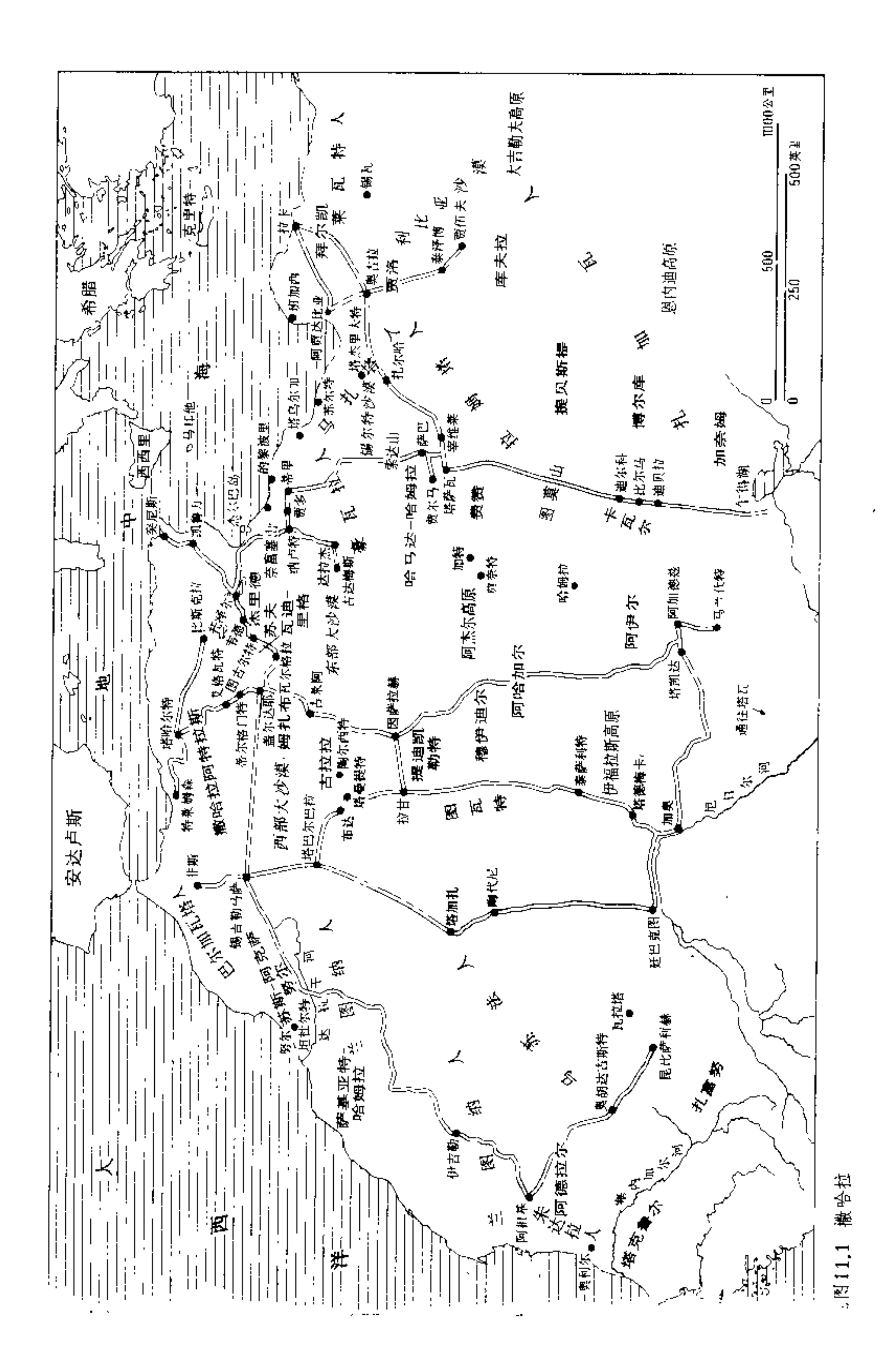
T. 莱维基

276 我们在本章将讨论撒哈拉的历史以及这片沙漠从2/8世纪到6/12世纪期间在北部非洲与苏丹地区关系中所起的作用。除考古研究所得和口头传说外，我们凭以重述那段时期撒哈拉历史的唯一资料来源只有阿拉伯人所写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资料提供的有关撒哈拉的信息从2/8世纪方才开始，而且在最初阶段十分稀少。直到4/10世纪时才逐步充分起来，在5/11世纪和6/12世纪巴克里和伊德里西的两本伟大地理著作中达到高峰，其中充满有关撒哈拉和苏丹地区的大量细节。①

生态与人口

由于从非沙漠发展到沙漠是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所以撒哈拉的疆界相当含糊。但是，如果把各种地理因素特别是气候因素考虑进去，撒哈拉的界线可限定如下：在东面，撒哈拉（包括利比亚沙漠）的界线是尼罗河；在西面是大西洋；在北面，撒哈拉延伸远及利比亚高原、锡尔特沙漠、奈富塞山、杰里德盐湖、梅吉尔盐湖、撒哈拉阿特拉斯地区和达拉干河，这样就包括了撒哈拉以北的各个贸易中心，诸如费赞、古达梅斯、瓦迪－里格、瓦尔格拉和锡吉勒马萨，这些地方通过与“黑人地区”（*Bilad al－Sudan*）通商而富裕起来；至于撒哈拉的南界，它大致上通过塞内加尔河口、尼日尔河河套的顶端、乍得湖流域（包括恩内迪），在北纬16°附近又与尼罗河会合。撒哈拉气候的基本277 特征是空气干燥和严重缺水，这种气候使撒哈拉牧地稀少，而且分布得稀稀落落，使那里的枣椰树群和果园菜圃寥寥无几，而且规模极小（北撒哈拉情况略有不同）。部分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片沙漠在中世纪早期就荒芜人烟，到今天居民仍然极度稀少，浩瀚原野，如西撒哈拉的库布拉沙漠以及利比亚沙漠，除了极少数地段例外，几乎全无人烟之踪迹。但是，尽管有上述种种实际情况，撒哈拉一方面是北部非洲与苏丹地区之间来往的障碍，另一方面却又是它们间联系的链环，在南北关系中，特别是在贸易关系中，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少数几条穿越沙漠、行程十分艰难的商旅线路，在穆斯林时代常有来自马格里布、伊弗里基亚、埃及和北撒哈拉各贸易中心的商人往返穿行。在北方各国与苏丹地区的这种贸易中，事实上由北非和埃及的商人起主要作用，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来自杰里德地区和锡吉勒马萨的易巴德教派柏柏尔商人。

① 由于这个缘故，本章内容稍稍超越本书的年代限制。


安达卢斯
大
西
洋
地
中
海
希腊
西西里
克里特
突尼斯
凯鲁万
马耳他
杰尔巴岛
的黎波里
塔哈尔特
特莱姆森
比斯克拉
非斯
巴尔加瓦塔人
撒哈拉阿特拉斯
锡吉勒马萨
苏斯-阿克萨
努尔
塔巴尔巴拉
西部大沙漠
姆扎布瓦尔格拉
瓦迪-里格
东部大沙漠
古拉拉
萨基亚特-哈姆拉
图阿特
提迪凯勒特
穆伊迪尔
阿哈加尔
阿杰尔高原
哈马达-哈姆拉
费赞
塔加扎
瓦拉塔
阿德拉尔
伊福拉斯高原
阿伊尔
加奥
廷巴克图
尼日尔河
塞内加尔河
扎富努
塔克鲁尔
博尔库
恩内迪高原
提贝斯提
库夫拉
加奈姆
乍得湖
卡瓦尔
阿加德兹
马兰代特
通往塔瓦
昆比萨利赫
奥胡达古斯特
蒂贾尔
阿德拉尔
伊古勒
奥利尔
阿拉萨
库夫拉
大吉勒夫高原
拜尔凯
拉卡
昔兰尼加
锡瓦
奥吉拉
贾洛
利比亚沙漠
0 500 1000公里
0 250 500英里
图11.1 撒哈拉

279

从2/8到6/12世纪，撒哈拉的居民非常混杂。西撒哈拉和中撒哈拉居住着具有柏柏尔血统的各个群体，有时也混杂着黑色的非洲血统。至于东撒哈拉（包括利比亚沙漠）以及北撒哈拉住的也是柏柏尔血统的人，但是南撒哈拉却是住着属于图布族群的尼格罗种人，诸如扎加瓦人、特达人和达扎人。这些族群一直分布到向北远达北纬26°左右的库夫拉绿洲和泰泽博绿洲一带。应该注意的是，图布族群在人类学和文化上的某些特征，使人感到他们很可能是利比亚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种。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在本章所讨论的时期里，撒哈拉不乏阿拉伯人的行踪，有的是城市居民，有的是逐水草而迁移的游牧民。

在建立北部非洲与埃及的关系以及北部非洲与苏丹地区的关系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撒哈拉柏柏尔人分属两个主要支系——桑哈贾人和扎纳塔人。桑哈贾人主要是游牧民，饲养骆驼、绵羊和山羊。至于扎纳塔人以及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其他柏柏尔族群，如马扎塔人和莱瓦特人，他们部分是游牧民，部分是定居民。阿尔及利亚撒哈拉环境优美的苏夫、瓦迪－里格、瓦尔格拉、提迪凯勒特和图沃特诸绿洲很可能是罗马统治时期之后由这些族群创建的。这些族群的人是有经验的挖水井好手，他们挖掘地下贮水池、修筑水渠，这种工程在古典阿拉伯语中称为“卡纳特”（*kanat*），在南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方言中叫“福加拉”（*foggara*）。他们还在那里挖自流井。这两种作业在非洲北部有悠久的历史，8/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哈勒敦曾描写挖自流井的方法，他 **278** 提到图沃特、古拉拉、瓦尔格拉和里格一些村庄里的自流井。[②]情况看来是这样：阿拉伯人侵者在的黎波里塔尼亚遭遇的扎纳塔人，从东撒哈拉的古代利比亚和柏柏尔混血种人那里学会挖掘“福加拉”和自流井的技术。至于埃及绿洲中的自流井，基督纪元5世纪希腊作家奥林匹奥多的著作中也曾提到过。进一步值得注意的是：基督纪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已经提到在加拉曼特人居住的奥吉拉和费赞生长着大量枝叶茂盛的枣椰树。

在本章涉及的时期里，只有居住在东撒哈拉南半部的图布人依旧信奉他们的传统宗教。所有别的撒哈拉人，也许除了北撒哈拉一些改信犹太教的扎纳塔人外，全都逐步皈依伊斯兰教。居住在撒哈拉的柏柏尔人早在2/8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伊斯兰化。根据伊本·哈勒敦的著作记载，在西撒哈拉过游牧生活的兰图纳人中的桑哈贾族群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换言之在2/8世纪的上半叶，才信奉伊斯兰教。[③]伊本·哈勒敦的说法得到祖赫里地理著作中一段话的进一步证实，这段话（约546/1150年）表明，穆拉比顿人（阿尔莫拉维德人）、也即西撒哈拉的兰图纳人在哈里发希沙姆·伊本·阿卜杜拉·马立克统治时期（105/724－125/743年）才信奉伊斯兰教；与此同时，瓦尔格拉绿洲的居民也皈依伊斯兰教。[④]

非常可能，撒哈拉的桑哈贾人和扎纳塔人同北非的柏柏尔人一样原来都皈依正统的伊斯兰信仰。随后，北非的柏柏尔人由于受到伍麦叶王朝哈里发政治上和财政上的压力，

---

②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925－1956年，第3卷，第286页。

③ 同上，第2卷，第65页；N.莱维蔡恩（N. Levtzion）和J. F. P.霍普金斯（J. F. P. Hopkins）合编，1981年，第327页。

④ 祖赫里（al－Zuhrī），1968年，第181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99页。

起而反对逊尼派教义；大约2/8世纪中叶（特别是属于扎纳塔人后裔的一些部落）加入反对伊斯兰教逊奈教规的两个哈列哲派别，即有激进倾向的苏非教派和比较温和的易巴德教派。撒哈拉的扎纳塔人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也支持这两个教派。另一方面，属于桑哈贾人后裔的撒哈拉人在2/8世纪时原是信仰模糊的穆斯林，直到5/11世纪中叶在阿尔莫拉维德人的宣传鼓励下才成为正统派伊斯兰教徒。至于属于扎纳塔后裔的柏柏尔人，他们居住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撒哈拉、苏夫、瓦迪－里格和瓦尔格拉的村庄里，很早就拥护易巴德教派，这是他们在柏柏尔地区东部和中部的同族兄弟早就接受的宗教信仰，他们在那些地方建立了好几个伊玛目统治的国家。所有这类国家都起源于的黎波里塔尼亚西北部豪瓦拉人、纳富萨人和扎纳塔人于125/743年建立的一个小小的伊玛目国家，最后则都归属于塔哈尔特的鲁斯泰梅王朝这一统一的伊玛目国家，其第一位首领阿卜德·拉赫曼·伊本·鲁斯塔梅是162/776－777年被推选为伊玛目的。这个伊玛目国家一直存在到297/909年，被阿布·阿卜杜拉·希伊的军队所征服。后者就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北非穆斯林国家的旧址上建立起强大的法蒂玛帝国。⑤ **280**

北非所有信奉易巴德教派的柏柏尔人都承认塔哈尔特伊玛目国的最高权威、其疆域包括南方的瓦迪－里格绿洲和瓦尔格拉绿洲。萨德拉塔位于瓦尔格拉绿洲境内，法蒂玛王朝的军队征服塔哈尔特之后，该伊玛目国最后一位鲁斯泰梅王朝的伊玛目就逃到这座城镇，在那里有相当一段时间人们怀有使易巴德派伊玛目国家复辟的想法。

米克纳萨人定居于塔菲拉莱特，这是在今日摩洛哥的东南部。他们信奉苏非教派，在塔菲拉莱特建立了一个小小的苏非派国家，其首都建于140/757－758年，后来发展成为锡吉勒马萨城。这座城市受巴努－米德拉尔王朝统治，地处沙漠的边缘，它很快就成为与苏丹地区开展贸易的重要中心，苏非教派头目的管辖一直继续到4/10世纪中叶。尽管所信奉的教义不相同，塔哈尔特的易巴德派王朝与锡吉勒马萨的苏非派君主相互间却相处十分和睦。根据阿拉伯文字资料的记载，在2/8世纪末和3/9世纪初，两个王朝间还曾有过一次婚姻联盟。穿越撒哈拉贸易中锡吉勒马萨日益增强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这种友好关系的成因。

最后，生活在当今阿尔及利亚西南部和住在撒哈拉沙漠中村落里的某些扎纳塔部落参与了穆尔太齐赖教派（也称瓦绥勒派）运动。这个运动和哈列哲教派一样反对正统派伊斯兰教。⑥我们可以这样设想，穆尔太齐赖教派的扎纳塔人所占有的地域一边延伸到提亚雷特以南的高原，另一边则延伸到姆扎布地区，姆扎布的居民原是瓦绥勒派的信徒，后来才改信易巴德教派的教义。

米德拉尔王朝统治下这个苏非派国家的首都——塔菲拉莱特地方的锡吉勒马萨城——是连结北部非洲和古加纳王国的商路终端之一，加纳王国也就是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的“黄金之乡”。一条商路通过这座城市去往鲁斯泰梅王朝易巴德派伊玛目国家的都城塔哈尔特（即今提亚雷特）。在第一位伊玛目在位之时（160/776－168/784－785年），这座城市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这座引人注目的市场城市不仅吸

⑤ 参阅本书第3章和第12章。

⑥ 参阅本书第10章。

引大量的北非商人（有易巴德教徒，也有非易巴德教徒），而且也吸引了阿拉伯商人从凯鲁万、巴士拉和库法来此经营商业。塔哈尔特的一位历史学家伊本·萨吉尔在叙述4/10世纪初前后情况时告诉人们：[7]一条连接塔哈尔特和西苏丹的商路通过锡吉勒马萨到达加纳，另一条商路连接塔哈尔特和加奥城；它在208/823年鲁斯泰梅王朝的伊玛目阿卜杜拉·瓦哈卜去世前已经在使用。[8]后一条商路看来是通过瓦迪－里格绿洲和瓦尔格拉绿洲的，这两个地方当时也卷入了塔哈尔特对苏丹地区的贸易。甚至到297/909年鲁斯泰梅王朝灭亡后，撒哈拉的易巴德教徒仍继续与苏丹地区进行贸易。

281

古达梅斯和宰维莱（在费赞地区）的易巴德派教徒和瓦迪－里格及瓦尔格拉的易巴德派商人一起组织远征队深入苏丹地区许多地方，参与这个活动的还有突尼斯南部杰里德地区的易巴德派商人以及来自奈富塞山的贸易商。从事这类贸易和远征活动的柏柏尔商人一般都属于各个扎纳塔部落。至于桑哈贾血统的撒哈拉人，他们往往是为来自锡吉勒马萨、塔哈尔特、特莱姆森、凯鲁万或的黎波里的北非商人组织的商队作响导，还在奥胡达古斯特、塔德梅卡等地桑哈贾酋长的保护下护送这些商队。

我们在上文对撒哈拉各族人民的部族、宗教和经济形势作了简短而概括的介绍，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撒哈拉某些特定地域在本卷所述时期的历史状况。

利比亚沙漠

利比亚沙漠中的4个绿洲——海尔贾、达赫拉、费拉菲拉（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之为法尔法龙）和巴赫里亚（巴赫奈萨特·瓦赫），在阿拉伯征服埃及时期组成一个穆斯林小国，由莱瓦特柏柏尔人后代建立的阿卜敦王朝进行统治。最早提及这个国家的是地理学家兼天文学家法扎里，他第一次提到该国是在2/8世纪，当时他称它为阿马勒绿洲，或称"绿洲国家"。[9]后来，在4/10世纪中叶前后，马苏迪根据330/941－942年的一份材料又概括地描述了这个国家：一个叫阿卜德·马利克·伊本·马尔万的柏柏尔君主统治这块土地，他麾下有几千骑兵供其指挥。那里除了莱瓦特柏柏尔人外，有大量科普特血统的基督教徒，还有属于巴努希拉尔部落的阿拉伯游牧民。这个穆斯林小国的王公贵族居住在达赫拉绿洲的两个地区，一个叫卡拉蒙，另一个叫卡斯尔（堡区）。有几条道路把这个绿洲国家一边连接埃及各城市，另一边通向桑塔里亚绿洲（锡瓦）。这些绿洲拥有大量的枣椰树和其他果树，还有明矾矿。[10]

282

据说，从巴赫奈萨特·瓦赫（巴赫里亚）绿洲到桑塔里亚（锡瓦，原称阿穆尼乌姆）绿洲的道路全程为10天步行距离，后者在4/10世纪至6/12世纪时是西部各条道路的会合点。这些商路中最重要的线路把桑塔里亚一方面和埃及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又和

---

[7] 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4页。

[8] 同上，第25页。

[9] 马苏迪（Al-Mas'ūdī），1861－1877年，第4卷，第39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2页。

[10] 马苏迪，1861－1877年，第3卷，第50－52页。

马格里布和卡瓦尔连接起来。伊德里西提到有一条线路连接桑塔里亚和拉卡港（位于图卜鲁格以东），还提到桑塔里亚盛产枣椰树和果树。桑塔里亚看来是长期保持独立，并不附属于埃及，直到7/13世纪，它才被埃及并入亚历山大省。[11]

在绿洲国家的最边远部分，有一个叫作塞卜鲁绿洲的地方，十分富饶，外人难以到达那里。在11世纪时，“除了少数在沙漠中迷路的旅行者外，从未有人来过”。[12] 一位佚名作家在587/1191年写的一部名为《伊斯提卜萨尔书》（*kitab al-Istibsar*）的地理专著中提到这个地方，他称之为“德卜尔绿洲”（这是塞卜鲁的讹传）。他说那里盛产枣椰树、谷物和各种水果，同时还有金矿。[13] 在我看来，他提到的金矿，恐怕只是指西苏丹经过那里运往埃及的黄金贸易。伊德里西提供的信息远为精确，他提到一个名为谢卜鲁的过去一度繁荣与人口稠密的城市的废墟，听说那里只有寥寥不多的枣椰树，确有阿拉伯人来此旅行，在这座城市的东北方有一个湖泊，湖边有自称卡瓦尔人（图布人?）的游牧民扎营放牧。这个地区的北方就是桑塔里亚绿洲（锡瓦）和扎拉城。[14]

看一看利比亚沙漠在地图上的位置，就可以知道，该沙漠中位置恰好符合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所提供的关于塞卜鲁（德卜尔或谢卜鲁，显然这个名字源自科普特语的“村庄”*tchobro*一词）情况的唯一大绿洲是库夫拉绿洲。那里有丰富的水源，沼泽与湖泊灌溉着肥沃的种植园。那里生长枣椰树、无花果树和柠檬树，适于种植谷物。如今那里的居民属扎维亚族，他们是11/18世纪中叶时从北方南下的已经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扎维亚人在那里发现图布族的非穆斯林建立了一个小国。在他们征服库夫拉后，当地的图布人退往提贝斯提山区和其他一些地方，最终被新来者消灭。如今只剩下几百个图布族的后裔留在库夫拉绿洲，业已彻底伊斯兰化，并受阿拉伯人统治。至于伊德里西提到的位于谢卜鲁绿洲、坐落在地势险峻、很难上得去的一座山山脚下的湖，它就是今天布扎伊马（卜泽马）山山脚下的那个湖。[15] **283**

伊本·豪卡勒在4/10世纪下半叶提到的4/10世纪之前连接埃及与加纳的古代商路很可能经过库夫拉绿洲。这条商路早在艾哈迈德·伊本·图伦时期（254/868－270/884年）已经使用，它在抵达库夫拉之后，就进一步向纳穆斯干河和凯比尔干河方向伸展，经过費赞，从那里奔向卡瓦尔、加奥，最后到加纳。[16] 这很可能就是伊本·法基赫（290/903年时在世）一篇专论的一节中（也许是引用更早的资料）所提到的那条路：

> 从加纳到埃及的道路，经过人们称作考考（加奥）人居住的地方，又经过人们称作马兰达人居住的地方，而后经过人们称作穆拉瓦特人居住的地区，再从那里通往在马尔萨纳的几个埃及人居住的绿洲。[17]

---

[11] 伊德里西（al-Idrīsī），1866年，第41－42页；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6页。

[12] 巴克里（al-Bakrī），1911年，原文第15－17页；1913年，译文第38－40页。

[13] 《伊斯提卜萨尔书》（Kitāb al-Istibsâr），1852年，第33－36页。

[14] 伊德里西，1866年，第41页；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5页。

[15] 见T.莱维基（T. Lewicki），1939年、1965年（c）。关于图布人迁移，参阅J.夏佩勒（J. Chapelle），1957年。

[16] 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1938年，第61页；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45页。

[17] 伊本·法基赫（Ibn Fakīh），1885年，第68页；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7页。

马兰达就是今天马兰代特，它是阿加德兹以南重要的水坑。至于马尔萨纳，这个地方可能与阿尔萨尼山或伊德里西所说的阿尔萨纳山有关系，完全有可能就是地处达赫拉绿洲以西的大吉勒夫高原。

在桑塔里亚（锡瓦）和奥吉拉绿洲群之间是一片缺水的沙土平原，这片平原的步行距离为10天，以盛产枣椰树闻名。这个绿洲群除了奥吉拉绿洲本身外，还包括贾洛城和贾卢绿洲。这个地区的首府，据巴克里所著书上说是拥有几个清真寺和集市的阿扎基亚城。整个地区遍布村庄、枣椰树和果树。奥吉拉出产的枣椰果输往阿贾达比亚（阿吉达比亚）城。奥吉拉的居民无疑是柏柏尔人，可能和桑塔里亚与拜尔凯的居民一样属于莱瓦特族群。早期居民（其所属族群与所用语言都表明是柏柏尔人）的后代现在被人们称为奥吉利人。伊德里西着重指出，奥吉拉的首府虽然面积不大，但人口稠密，居民积极从事贸易活动。由于奥吉拉处于几条商道的交叉点上，因此成为通往苏丹地区线路的重要中心。通过这个绿洲，人们可以进入"大部分黑人地区，诸如卡瓦尔和考考（加奥）"⑱。对于奥吉拉在伊斯兰时期最早几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一无所知。有可能它保持独立，后来，在3/9至6/12世纪时，它业已成为阿拉伯拜尔凯省的一部分。

284 在奥吉拉绿洲和拜尔凯省以西是苏尔特省的广袤土地，它包括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全部地方。这是撒哈拉的一个地区，这里的沙漠叫做锡尔特沙漠，它的范围一直延伸远达大流沙地带。这个省的名称来自一个大城市苏尔特，苏尔特城有一座枣椰树环绕的清真寺以及好几处集市。它的居民和当地商人讲的是"一种既非阿拉伯语也非波斯语、柏柏尔语或科普特语的方言"。⑲ 可以设想它是古代迦太基语。

当时，苏尔特省包括两个地区，第一个是苏尔特本身，大致上是沿海区域，第二个叫瓦丹（此名得自属于当今朱夫拉绿洲的一个城市），其地域相当于内陆地区。第一个地区以"苏尔特地区"为人所知，而瓦丹在3/9－6/12世纪一直被视作是另一个地区和一块独成一体的地方。苏尔特省两个地区的居民同属马扎塔柏柏尔族群，他们的邻居是拜尔凯的莱瓦特人和定居在的黎波里塔尼亚中部的豪瓦拉人。马扎塔人定居地的西疆与塔瓦尔加（今塔乌尔加）接壤，向南则一直伸展到索达山之外，那里的居民在3/9世纪与马扎塔人连连作战。在此之前，后者占瓦丹居民的大多数，但是在那里还有另外两个阿拉伯部落。在沙漠城市塔杰里夫特，马扎塔人和阿拉伯人混杂而居。根据巴克里著作所说，在那个时期扎尔哈（扎拉）绿洲也是马扎塔人领土的一个部分。⑳

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马扎塔人很早就受易巴德教义的影响，苏尔特地区曾是伊玛目阿布尔·哈塔卜·阿卜杜拉·伊本·萨姆赫·马阿菲里（131/757－758－135/761年）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建立的短暂易巴德派国家的一个省。对易巴德教义的信仰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马扎塔人在3/9世纪末以前依然信奉这个教派。26/646－647年瓦丹城被一个名叫布斯尔·伊本·阿比·阿尔塔特的阿拉伯将军占领，他向居民勒索360名奴隶作为贡品。后来，当瓦丹人民拒绝纳此重贡时，著名的乌

⑱ 伊德里西，1866年，第132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9页。
⑲ 巴克里，1911年，第11页。
⑳ 同上，第11－12页。

克巴·伊本·奈菲于46/666—667年对瓦丹再次发动远征，在惩罚其国王后取得贡物。[21]瓦丹城有一条路通往坐落在地中海岸的马格马达斯城(古代的作家称作马塞马德斯-塞洛鲁姆)以及贾尔马城(过去叫加拉马)。这无疑就是被用作运入瓦丹人向阿拉伯人纳贡奴隶的那条路。这些奴隶是远道从卡瓦尔、提贝斯提和加奈姆等地押来的俘虏。运送这些俘虏的道路据希罗多德说可能就是古代加拉曼特人追赶埃塞俄比亚穴居人的那条路。[22] 在整个这段时期瓦丹一直参与和黑人地区的贸易，瓦丹和黑人地区之间的道路经过费赞地区的宰莱城。 **285**

连接瓦丹和奥吉拉的另一条商路经过枣椰树极为茂盛的扎尔哈（扎拉）。这也是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北部到费赞和黑人地区商路的一个中间站。据巴克里（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沃拉克）说，这个地区的居民是马扎塔人；[23]但是伊德里西（他叫这个地方为扎拉）则说，那里的居民是豪瓦拉人，并说他们都从事贸易。[24]

阿拉伯的文献资料很少提到哈马达－哈姆拉（即哈姆拉石漠）及其周围的群山，唯有巴克里详细描述了从奈富塞山东部首府贾多贸易城到处于通向卡瓦尔地区和其他黑人地区途中的重要商队住宿地宰维莱一路上的情形。[25] 在到达山边有大量枣椰树的蒂里或蒂拉之前必须徒步跋涉三天沙漠。[26]

在哈姆拉石漠的西部边缘，在高原和东部大沙漠之间有一片名叫古达梅斯的撒哈拉绿洲和古达梅斯城。这片地方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重要，从很遥远的时候开始已是沙漠中最重要的歇脚处（古代作家称之为锡达穆斯或基达梅）。它是商人们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到黑人地区必经的入口。连接奈富塞山区的沙鲁斯贸易城和塔克鲁尔地区的道路经过古达梅斯。直到今天，在沙鲁斯附近，人们还能见到通往古达梅斯的旧时小道，称它为“苏丹小道”。无疑这条小道就是雅库特根据6/12世纪文献资料所提及的通往塞内加尔河上游扎富努（迪亚富努）地区的那条道路。[27]

巴克里曾提到一条商路，从的黎波里起始，经过奈富塞山区和古达梅斯，到达西苏丹的塔德梅卡。[28] 到古达梅斯之后，这条路可能穿过阿斯卡尔柏柏尔人的领地（今天的阿杰尔高原)，据伊德里西说，此处距古达梅斯有18天步行路程。[29] **286**

---

[21]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Ibn ‘Abd al-Hakam)；引自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13页。

[22]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0章。

[23] 巴克里，1911年，第12页；1913年。

[24] 伊德里西，1866年，第41-42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9页。

[25] 巴克里，1911年，第10页；1913年，第26-27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63-64页。

[26] “蒂拉”（*tira*）一字在柏柏尔文中意为“写字”，但是在第三个阿拉伯字母上加一个点，在柏柏尔文中就成为另一个字“蒂齐”（*Tizi*)，意为“山坡”。这可能就是处于从的黎波里城和从奈富塞山到费赞最短路线上的中间站米兹达（旧名为穆斯蒂维库斯）。根据易巴德派的编年史，蒂里这个中间站于3/9世纪时已经存在，当时那里的居民是易巴德派教徒。

[27] 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70-172页。关于扎富努地区，参阅T.莱维基，1971年（a)。

[28] 巴克里，1911年，第182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86页。

[29] 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1页；J. M.库奥克（J. M. Cuoq)，1975年，第153页。阿斯卡尔人是费赞地区以游牧为生的柏柏尔人，或是阿杰杰尔图阿雷格人。伊德里西，1866年，第36页。

古达梅斯的居民从古时候起就从事有限的农业（主要是在当地生产枣椰果，他们也从事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世纪的阿拉伯文献资料很早就提到这个城市。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卜德·哈卡姆在他的书中提到46/667年阿拉伯将军乌克巴·伊本·奈菲占领古达梅斯的史实。[30] 该城居民包括几个柏柏尔族群，其中一个叫蒂纳乌塔，在2/8世纪时已经为世人所知。此外，柏柏尔语迄今仍在古达梅斯使用。

早在1/7世纪，古达梅斯居民信奉基督教。但是，他们好像很早就改信易巴德教派的教义，其时间显然与他们在北方关系密切的邻近族群（即住在今日奈富塞山区的纳富萨人）差不多。3/9世纪初，古达梅斯的人民信奉反正统的易巴德支派——哈拉菲亚支派和努卡尔支派的教义，只是通过纳富萨人的武力干涉，那里才重新建立纯粹的易巴德派——瓦哈比教派。那时，古达梅斯人民，由易巴德教派的教长（马谢伊赫 *mas̲hayik̲h*，即谢赫 *shayk̲hs*）统治。[31]

古达梅斯以东不远处就是达拉杰绿洲和达拉杰城（易巴德派编年史上写成达尔杰或阿德拉杰），这是易巴德派柏柏尔人的一个重要中心。可以设想达尔杰这个名字得自伊本·豪卡勒提到过的巴努－伊德拉杰族群（特德尔杰是这个字的误写）的塔纳塔支系；同时提到的还有瓦拉杰马、巴努－布利特和其他突尼斯南部的扎纳塔族群的名字。[32] 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连接古达梅斯和纳卢特城（或拉卢特城）的一条道路经过锡纳万与达尔杰，这条路在奈富塞山区的西部。

费赞与乍得湖之间地区

287 的黎波里塔尼亚南部是一片浩瀚的费赞沙漠地带，一片绿洲群位于其间：北边是哈马达·哈姆拉（哈姆拉石漠），西边是阿杰尔高原，南边是提贝斯提丘陵，东边是利比亚沙漠。

至于加拉曼特人的古代文明，它直到阿拉伯征服马格里布之后方才消失。我们有理由相信（根据对某些考古发掘物做碳－14测定），该文明是在2/8－4/10世纪才被阿拉伯征服者毁灭的。考古资料引导人们相信，加拉曼特人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是阿拉伯常胜将军伊本·阿沙斯率军征战，他于145/762－763年征服费赞东部的宰维莱王国，大肆屠杀都城百姓。此外应该指出的是，宰维莱王国还是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直存在到3/9世纪末。

宰维莱王国的版图只占当今费赞地区东部的一部分。它创建于1/7世纪末或2/8世纪初。[33] 至于费赞地区的其余地方，在2/7－6/12世纪之间是一个单独的王国，它是加拉曼特人王国的旁系，中世纪阿拉伯作家称之为费赞王国。[34]

---

[30]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参阅N.莱维茨恩和J.F.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页。

[31] 在7/14世纪时，古达梅斯的居民仍信奉易巴德派的教义，如今他们全是热忱的逊尼派教徒。

[32] 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104页；T.莱维茨，1959年。

[33] 在46/666－667年，乌克巴·伊本·奈菲率领的远征军进入的黎波里塔尼亚之际，肯定还不存在宰维莱城。

[34] 这个王国与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马扎塔人打仗，这场战争与伊本·阿沙斯对宰维莱城的攻击一起，促成加拉曼特古文明衰落。

这个国家早在46/666－667年阿拉伯古籍就曾提到过。伊本·阿卜德·哈卡姆的史学著作告诉我们：乌克巴·伊本·奈菲在征服瓦丹城后，出发向大费赞国的都城贾尔马进军。大费赞国王投降，人民改信伊斯兰教。乌克巴然后又进军费赞的其他“城堡”，直到攻陷最北边的几个城堡。[35]

从2/8世纪末开始，费赞居民成为易巴德派信徒，从一开始，他们就承认塔哈尔特的鲁斯泰梅王朝伊玛目的最高权威。但是在某些时候，他们又成为易巴德派异端倡导人哈拉夫·伊本·萨姆赫的追随者。雅库比在世时期（3/9世纪末），费赞成为由一位独立的首领（*rā'is*）统治的幅员广阔的国家。

雅库比还提到费赞的都城，说它是个巨大的城市。[36] 他指的肯定是贾尔马，此城在6/12世纪之前繁荣了几百年之久。当时除贾尔马外，在费赞还有另外一个大城塔萨瓦，据伊德里西说，“黑人”（费赞人?）称之为“小贾尔马”。[37] 阿拉伯文献资料还提到费赞 **288** 的其他一些城市。其中，巴克里引起人们注意一个叫塔马尔马的城市，位于通往奈富塞山区贾多的商路上。这个名称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没有听到过的，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更正为“塔姆扎瓦”，也即今天的塔姆绍阿（塔姆苏阿），易巴德派作家称之为塔姆扎瓦特。巴克里还提到一个叫塞卜哈（Sabha）的大城市，这也就是今天费赞地区的首府，在我们地图上标名为Sabhah。塞卜哈有一座大清真寺和几个集市，易巴德派编年史中称它为沙巴哈（Shabāha）[38]。

中世纪费赞地区的居民由多种不同的族群组成一个称作费赞人的民族。[39] 伊本·豪卡勒曾提到，在4/10世纪有一个叫阿贾尔费赞的柏柏尔人部族，他认为他们属于扎纳塔族群。[40] 看来这个名字的前边部分“阿贾尔”（Adjār）与今天费赞地区内一个地名“阿贾尔”（Aggar）有联系，这个地方离塔萨瓦很近。该地区除了费赞人（也称费赞纳人）外，还有别的族群。巴克里提到巴努－卡尔丁人（或基尔丁人），他们与费赞人一起住在塔马尔马（塔姆扎瓦）城。[41] 卡尔丁人很可能就是卡丁人（或基尔丁人），据伊本·哈勒敦的说法，卡丁人与豪瓦拉人有关系。[42]

贾尔马的居民（显然费赞地区所有其他“城堡”的居民也一样）早在569年就是基督教徒，他们在46/666－667年阿拉伯人入侵后皈依伊斯兰教。随后他们参加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易巴德派运动（126/743－744年）。在145/762－763年阿拔斯王朝将军伊本·阿沙斯率领军队发动进攻时，他们和瓦丹及宰维莱的易巴德派教徒同样蒙受惨重损失。在鲁斯泰梅王朝伊玛目阿卜德·瓦哈卜·伊本·阿卜德·拉赫曼（208/823年去世）统治时期，费赞人已经成为易巴德派信徒。这就是为什么易巴德派编年史提到那

[35]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引自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13页。
[36] 雅库比（al－Ya'kubi），1962年，第9页。
[37] 伊德里西；参阅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0页。
[38] 巴克里，1911年，第11页。
[39] 雅库比，1962年。
[40] 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104页。
[41] 巴克里，1911年，第10页。
[42] 伊本·哈勒敦，1925－1956年，第1卷，第177页。

时费赞几个杰出人物的原因。[43]

在3/9世纪初，费赞的易巴德派教徒一度与易巴德派的反正统分子哈拉夫·伊本·萨姆赫共命运，后者反叛塔哈尔特的鲁斯泰梅王朝伊玛目，成功地把几乎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置于他的统治下，只除了奈富塞山区，那里的居民继续信奉正统的易巴德教派——瓦哈比派的教义，并继续忠于鲁斯泰梅王朝。[44] 可是，到了3/9世纪上半叶，289 费赞又重新被认为其居民信奉正统的易巴德教派——瓦哈比派的地区。

2/8－6/12世纪存在于费赞地区的另一个国家是宰维莱王国，该王国因其都城宰维莱而得名。这个国家在乌克巴·伊本·奈菲于46/666－667年率军远征深入的黎波里塔尼亚内地并抵达卡瓦尔时尚未见提到，而一个世纪后逊尼派阿拉伯人与易巴德派柏柏尔人打仗时第一次在文献资料中出现。144/761－762年，伊本·阿沙斯打败伊弗里基亚的易巴德派伊玛目阿布尔·哈塔卜后，阿拉伯军队占领宰维莱城，城中易巴德派柏柏尔居民遭到屠杀，他们的领袖阿卜杜拉·伊本·希扬·易巴迪也惨遭杀害。尽管发生了这一系列事情，宰维莱长期以来仍是主要的易巴德派中心之一。雅库比记下了3/9世纪下半叶那里易巴德派教徒的状况，说他们种植枣椰树，并与苏丹地区各国进行贸易。[45]

大约在4/10世纪初，宰维莱城曾被人们遗弃，这个情况大致发生在该城居民对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的马扎塔人发动战争之后。伊德里西提到306/918年建设宰维莱（应理解为重建该城），这个行动无疑可以用那场战争来解释。据伊德里西说，建筑宰维莱是为了给阿卜杜拉·伊本·哈塔卜·霍瓦里和他的家族居住。[46] 据伊本·豪卡勒说（约988年）。巴努尔－哈塔卜王朝不是豪瓦拉人的后代，而是马扎塔人的后裔。[47]

费赞的主要资源（这里指的是贾尔马和宰维莱二地区）是农作物，特别是枣椰树和谷物。关于这些作物的大多数资料来自巴克里的著作，他谈到塔马尔马（塔姆扎瓦）、萨巴布和宰维莱的大量枣椰树，并描述谷物的生长与在灌溉上使用骆驼的情况。他还提到在萨巴布种植一种产生靛蓝颜料的植物。[48] 伊德里西也称赞宰维莱的枣椰树，并提到在塔萨瓦种植枣椰树、小米和大麦。[49] 至于灌溉，J.德普瓦认为灌溉（地下贮水池水渠）技术在古罗马时代末期已在费赞普及。[50] 阿拉伯作家也提供了关于作物灌溉的一些资料。290 据巴克里说，在宰维莱种植作物地区，用骆驼提汲水井的水灌溉田地，这种方法在费赞一直沿用至今；伊德里西说，在贾尔马和塔萨瓦使用一种叫"因贾法"（*indjafa*）的机械汲水灌溉枣椰树、小米和大麦，马格里布居民叫这种机械"凯塔拉"（*khattara*）[51]。

在种植作物同时，费赞人的另一种主要活动是从事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因为这个地

---

[43] T.莱维基，1957年，第341页。

[44] 同上，第342页。

[45] 雅库比，1962年，第9页；参阅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2页。

[46] 伊德里西，1866年，第37－38页；参阅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2页。

[47] 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104页。

[48] 巴克里；参阅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64页。

[49] 伊德里西，1866年，第35－36页。

[50] J.德普瓦（J. Despois），1965年。

[51] 巴克里，1911年，第11页；伊德里西，1866年，第35页。提到的机械即"沙杜夫"（*shadufs*），至今仍在费赞使用，当地人叫"凯塔拉"（*kettara*）。

区在历史上一贯是仅次于尼罗河的与撒哈拉以南国家进行交往的最重要孔道。加拉曼特人从他们国土和非洲内地把产品运到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大莱普提斯（莱卜代）、奥亚（的黎波里）和塞卜拉泰（祖瓦拉）诸港口，产品有枣椰果、象牙和宝石，被称为“加拉曼特货”。从穆斯林时代开始起，费赞人也从事黑奴贸易。贸易沿着一条非常古老的路线进行，加拉曼特人在公元前5世纪就知道这条道路，它把的黎波里及其他沿的黎波里塔尼亚海岸的城市和非洲中部的卡瓦尔和加奈姆连接起来。这条道路通过宰维莱城和奈富塞山区，后者的主要城市贾多在4/10和5/11世纪时已有不少集市和大量犹太居民。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招来形形色色的民族定居于宰维莱，他们来自呼罗珊、巴士拉和库法，与易巴德派柏柏尔人混杂居住。宰维莱商人主要出口黑奴，这些奴隶是从苏丹地区捕捉来的米里人、穆鲁人、扎加瓦人和一些别的部族的人，其中大部分属于特达-达扎族群。[52]

5/11世纪，巴克里描述了从宰维莱到的黎波里塔尼亚本部和埃及去的三条道路。第一条通往贾多城，然后再到的黎波里。第二条连接宰维莱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东部边境的阿贾达比亚。第三条则从宰维莱通往埃及首府伏斯泰特（即开罗旧城）。巴克里还提到一条商队线路，它从宰维莱城通往加奈姆地区，行程40天步行距离。[53]

图莫山脉以南（也即费赞南部边境所在之处），有一连串绿洲群，大大便利了去加奈姆的交通。尽管在比尔马和迪贝拉之间横阻着一些沙丘，这条路仍不失为撒哈拉最佳商队通道，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使用。一连串绿洲中最著名的是卡瓦尔绿洲（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之为Kawār，今天则叫Kaouar），这些线路因几个世纪穿越撒哈拉贸易连续不断而出名。46/666－667年乌克巴·伊本·奈非由北到南侵占费赞所有城堡，当地居民告诉他，在这个地区以外还有卡瓦尔的一些城堡，其中主要的一个城堡即巴克里称为哈瓦尔的那一个，它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堡垒。[54]

291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曾对卡瓦尔有过简短的描述，雅库比也提起过这个地方，但是使我们得以了解细节的是伊德里西。在一系列“城市”中，伊德里西特别提到卡萨巴，把它称为“主要城市”，这个地方也就是伊本·阿卜德·哈卡姆所说的哈瓦尔，它在这位地理学家生活的时代还是个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地方。伊德里西认为乌姆伊萨堡是在卡萨巴之南，相距两天步行路程，在我看来，那个地方应该就是G.纳赫蒂加尔所说的阿斯谢努马村庄，现在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55]

在距乌姆伊萨堡40阿拉伯里（即80公里）的地方，据伊德里西说有一个叫安卡拉斯的城市，它是卡瓦尔地区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贸易场所，同时又是当地酋长的

---

[52] 雅库比，1962年，第9页；参阅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2页。

[53] 巴克里，1911年，第11页；参阅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63－64页。

[54]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引自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13页；巴克里，1913年，第12页。哈瓦尔看来就是卡瓦尔北部的吉塞比（盖塞比），在当今阿内西南只几公里处。“吉塞比”（盖塞比）这个名字看来是阿拉伯语“卡斯巴”和“加斯巴”（城堡）的讹音。

[55] G.纳赫蒂加尔（G. Nachtigal），1879－1889年，第1卷，第511页，这个城堡的名字乌姆伊萨（阿拉伯方言乌姆艾萨Umm－Aysa）只是阿斯谢努马（‘Aysa－n－umm）这个字换位构成的字。R.莫尼（R. Mauny），1961年，第141页，他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今日的比尔马。

住地。[56] 安卡拉斯可能就是叫作迪尔基的村庄，这个村子当G.纳赫蒂加尔逗留在卡瓦尔地区的时候是当地统治者的住处。据他说这个村子（特达人叫作迪尔科）是卡瓦尔最古老、最巨大的村庄。

伊德里西提到的卡瓦尔地区最后一个地方（他由北至南列举该地区有人烟的地方）是地处南部的小城塔马勒马（或塔拉姆拉）。根据J.马夸特的考证，我们可以认为塔拉姆拉就是今日的比尔马城。[57]

据雅库比研究所得结论，3/9世纪末前后的卡瓦尔地区居民混杂，由许多不同血统的穆斯林组成，其中大部分是柏柏尔人。[58] 他们是来自费赞、奈富塞山区和瓦丹的易巴德派柏柏尔商人。与柏柏尔人一起（当然还有阿拉伯商人），卡瓦尔地区还有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赛义德（685/1286年之前）提到过的属于图布（特达－达扎）族群的当地土著居民；他称卡瓦尔的当地居民为“黑人”，他说他们奉行白人的风俗习惯。[59] 3/9世纪时这些当地人已经是穆斯林，可能信奉易巴德教派。

292 据阿拉伯文献资料透露，这些相当富裕的卡瓦尔居民的财源来自种植农作物（枣椰果）、开采明矾和做生意，特别是从事奴隶贸易。人们饲养骆驼，为当地商人驮载货物，邻近阿卜扎尔的大湖里鱼类非常丰富，当地人捕捞后用盐腌渍作为食物。可是，卡瓦尔居民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开矿，当地有一种明矾矿，叫作“卡瓦里”（kawārī），质地特别纯净，得到伊德里西的高度赞扬。[60] 据伊德里西说，这类明矾矿分布在卡瓦尔南边安卡拉斯和阿卜扎尔一带，向西展伸到柏柏尔人居住区的西部，在瓦尔格拉绿洲也有发现。R.莫尼对这种明矾矿的特性很感兴趣，因为如今在卡瓦尔地方只有盐场，别无其他矿产。他的见解是，伊德里西所指的是硫酸钠，广义地讲这也是一种明矾，在今天它仅仅只是卡瓦尔地区采盐的副产品。在比尔马，盐中所含硫酸盐的成分高达79%，因之，R.莫尼认为：“当明矾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时（中世纪时用它加固物体染色），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含有极高成分硫酸盐的食盐，不加分离就当作明矾出售”。[61]

除明矾外，卡瓦尔居民财富的重要来源是奴隶贸易。大批黑奴从卡瓦尔运往贾尔马、宰维莱和瓦丹，再从那里卖到马格里布、伊弗里基亚和埃及。这种贸易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由加拉曼特人经营。

我们不了解卡瓦尔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看来这个地区在9世纪时是独立的。此后，卡瓦尔素丹国受扎加瓦（加奈姆）王国的统治，关于这个王国我们在下文还将谈及。总之，这是雅库特时期（1220年）那个地区的状况。[62]

在撒哈拉的这一地区，与定居在卡瓦尔村庄里的图布族群卡瓦尔人和易巴德教派柏

---

[56] 伊德里西，1866年，第39页；参阅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3和以后诸页。据R.莫尼说，该地即今天的卡拉拉。

[57] J.马夸特（J. Marquart），1913年，第80页。

[58] 雅库比，引自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2页。

[59] 伊本·赛义德（Ibn Sa'id），引自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92－193页。

[60] 伊德里西，1866年，第39页；参阅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3页。

[61] R.莫尼，1961年，第141、334－336、452页。

[62] 雅库特（Yākut），1866－1873年，第3卷，第142页。

柏尔人以及阿拉伯商人一起生活的还有拉姆塔柏柏尔人，他们大部分在西撒哈拉过游牧生活，尤其聚集在苏斯以南。据雅库比说，[63]生活在中撒哈拉的这些拉姆塔人，居住在卡瓦尔与宰维莱之间，向奥吉拉展伸。看来嗣后他们形成图布人或特达－达扎人的一个部分，或者退往阿伊尔高原，在那里他们加入当地的图阿雷格人社会。

图布人或特达－达扎－扎加瓦族群很早就占有利比亚沙漠中的库夫拉绿洲以及卡瓦尔地区，他们也在费赞地区南部边缘地带、贾多高原和提贝斯提山脉居住。他们过去和现在的定居地还有提贝斯提和乍得之间广阔而地势低洼的沙漠盆地博尔库（和博德莱 293 洼地及加扎勒河），以及恩内迪高原、瓦代以北地区和达尔富尔西北地区。如今依然居住在上边最后提到的那些地方的图布人，现在叫做扎加瓦人。在本章所涉及的时期里，扎加瓦人这个名字被阿拉伯地理学家用来指除了戈兰人和卡瓦尔及库夫拉绿洲游牧民以外的所有图布族支系，后者伊德里西称之为“卡瓦尔游牧民”。[64]

还应补充一下，阿拉伯作家瓦赫卜·伊本·穆纳比赫在110/728年以前的著作中曾提到与扎加瓦人在一起的有苏丹的库兰人（或科兰人），这个名称的发音也可以是“戈兰”。这个名称至今还在使用，是阿拉伯人对达扎人的称呼，达扎人是图布族群的一支，生活在乍得湖以北和东北。[65]

瓦赫卜·伊本·穆纳比赫提到的圣经中哈姆后裔各族的名字中有科兰人、努比亚人、阿比西尼亚人、柏柏尔人和东非的僧祇人，也包括扎加瓦人，其中扎加瓦人显然是当作图布族群北支的名字（也就是特达人）提及的。这个名字对中世纪其他阿拉伯作家也不陌生。在天文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胡瓦里兹米（220/835年或232/846年逝世）的作品中，扎加瓦是苏丹地区的一个地名。[66]雅库比曾提到从宰维莱出口的奴隶中有扎加瓦人，[67]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对该族人谈得比较仔细。他说，扎加瓦人定居在一个叫作加尼姆或加奈姆的地方，住在芦苇盖顶的小屋里，他们在那里创建了一个王国。[68]

加奈姆从很早时候起就与奈富塞山的易巴德派教徒保持联系。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塔哈尔特的鲁斯泰梅王朝伊玛目的代表统治奈富塞山区的阿布·乌巴依达·阿卜德·哈米德·吉纳乌尼（3/9世纪上半叶在世）不但懂得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而且还熟悉加奈姆语。[69]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哈拉比（380/990年）告诉我们，扎加瓦人是居住在马格里布以南的一个苏丹民族。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与努比亚接壤；这

---

[63] 雅库比，1962年，第9页。

[64] 伊德里西，1866年，第12－15页；参阅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5页。

[65] 伊本·库泰巴（Ibn Kutayba），1850年，第12－13页；参阅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5页；J.夏佩勒，1957年。

[66] 胡瓦里兹米（al－Khuwārizmī），1926年，第6页；参阅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7页。

[67] 雅库比，1892年，第345页；1962年，第9页。

[68] 雅库比，1883年，第219页；参阅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1页。

[69] 参阅T.莱维基，1955年，第92－93页和第96页。

两个王国的都城相隔 10 天步行距离。[70]

294 扎加瓦王国或加奈姆在北边一直伸展到卡瓦地区的比尔马和卡萨巴。扎加瓦的国土（这里指的是加奈姆）不是沙漠地带，它的居民以种植作物为生，主要是小米和豆类。他们还拥有大量绵羊、牛、骆驼和马。在穆哈拉比从事写作的时代，扎加瓦王国或加奈姆还没有宗教信仰；人民尊敬他们的国王，把他当作神来崇拜。他们几乎全身赤裸，只用兽皮遮住下身，唯独国王穿着从苏斯（摩洛哥）买来的羊毛裤子和丝织上衣。[71]

伊本·豪卡勒看来是认为扎加瓦的国土就是加奈姆。他提到有一条道路连接扎加瓦国土（加奈姆）与费赞（显然指的是那个地区的首府贾尔马）；他认为费赞和扎加瓦之间有两个月的步行距离，在我看来他的说法是过分夸张了。[72]

巴克里也知道加奈姆，根据他的说法，这块地方在宰维莱沙漠的另外一侧，离开宰维莱城有 40 天步行距离，在他那时候这地方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73]

我们高度评价伊德里西对撒哈拉和苏丹地区情况详尽的描述，他在著作中用好几行文字来说明扎加瓦与加奈姆的关系，他明确地区分两个不同的族群。加奈姆是个王国，国王住在马南城。加奈姆国王的士兵不穿衣服，犹如 150 年前穆哈拉比时代一般。除马南以外，伊德里西提到的其他加奈姆城市还有安吉米（今恩吉米）。距安吉米 6 天步行距离有个叫扎加瓦的城市（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扎加瓦的中心），在它的四周住着扎加瓦族群的好几个支系，他们全都饲养骆驼。伊德里西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图布族群的政治状况，在当时那个族群看来不受加奈姆王国的统治。谈到扎加瓦，他着重指出扎加瓦人的领地与费赞交界，因而他是把卡瓦尔地区包括在扎加瓦人居住的领地之内。[74] 在该著作的另外一章里，伊德里西谈到扎加瓦的两个中心——萨加瓦（可能就是萨卡瓦，今日瓦代南部扎加瓦人居住地方的名称）和沙马（可能就是今日阿加德兹以北的廷－沙曼）。这两个地方的扎加瓦人支系的财富来自饲养牲畜（他们吃牛奶、奶油和牲畜的肉 295 为生）和种植高粱。与沙马和萨加瓦的扎加瓦人一起还住着一群称为萨德拉塔的柏柏尔人的支系。他们是游牧民，其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像扎加瓦人。因此他们处于与特达－达扎－扎加瓦人日渐同化的过程中。[75]

---

[70] 雅库特，1866－1873 年，第 2 卷，第 932 页。在穆哈拉比描述扎加瓦的其他部分中，他说，扎加瓦与努比亚的栋古拉城之间有 20 个中间站；穆哈拉比（al－Muhallabī），引自雅库特，第 1 卷，第 277 页。

[71] 参阅 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171－173 页。

[72] 伊本·豪卡勒，1938 年，第 92 页；参阅 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46 页。

[73] 巴克里，1911 年，第 11 页；1913 年，第 29 页，参阅 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64 页。巴克里显然从早于 5/11 世纪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个材料，也许是从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沃拉克（Muhammad ibn Yūsuf al－Warrāk，362/973 年逝世）的地理著作中找到的，因为 5/11 世纪可以认为是那个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那里的人民最终在 500/1107 年之后皈依伊斯兰教。

[74] 伊德里西，1866 年，第 33 和随后诸页；参阅 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114 和随后诸页。

[75] 伊德里西，1866 年；参阅 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119－120 页。

北撒哈拉

北撒哈拉指北至阿特拉斯山脉、南至阿哈加尔（霍加尔）高原、在古达梅斯以西及西南的全部地区。这一大片土地处在石碳质石漠和西部大沙漠、东部大沙漠的沙丘（干渴之地）之中，那儿也有井泉和优美的绿洲（井泉之地）。在这些绿洲种植作物地带（主要种植枣椰树丛）的边缘，有筑有堡垒的村庄（在阿拉伯文献中称“城堡”）。它们是柏柏尔大支系扎纳塔人中的易巴德派教徒、穆尔太齐赖派教徒，甚至是犹太教徒建造的；那里的枣椰树和灌溉作物的贮水池渠道（特别在图沃特绿洲）也同样是如此。

这些绿洲可以划分为三组：

(1) 用自流井灌溉的东部绿洲，集中在阿特拉斯山麓周围。

(2) 用贮水池渠道灌溉的西部绿洲，迤逦1200公里，一端在非吉格省的撒哈拉阿特拉斯，另一端在提迪凯勒特。

(3) 在上述两组绿洲群中间有第三组重要的绿洲群——姆扎布绿洲群。

这三组绿洲群中最东边的叫苏夫绿洲，它处于从杰里德到图古尔特和瓦尔格的通道上，它的四周都是沙漠。如果不是更早，至少从阿拉伯征服北非时期开始，苏夫绿洲就具有几分重要性，因为它是连结突尼斯南部（在2/8－6/12世纪时居住着易巴德派柏柏尔人）和易巴德派柏柏尔人的中心瓦迪－里格和瓦尔格拉以及苏丹地区的商路上的一个商站。我们不知道苏夫的枣椰树和村庄建于何时，第一个提到苏夫绿洲群的是古代易巴德派的编年史，书上称它为苏夫或阿苏夫。4/10世纪下半叶，易巴德派柏柏尔人居住在苏夫绿洲，他们与杰里德，特别与托泽尔城，保持密切关系。苏夫的居民属于扎纳塔族后裔各支系，或者与柏柏尔族有关系的族群（如莱瓦特人）。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在苏夫以北，接近佘夫扎沃地区的巴努－穆利特人也是扎纳塔族的一部分，在5/11世纪时以游牧为生。[76] **296**

苏夫绿洲以西大约100公里处，有坐落在一条20公里宽溪谷间、名为瓦迪－里格的许多大绿洲。在本章涉及的时间里，我们从阿拉伯文献中（特别是从易巴德派编年史中）得知人们称瓦迪－里格为里格或阿里格；它是零落地散布在那里的几个城市与堡垒村庄（城堡）。后来，到了伊本·哈勒敦时期（8/12世纪），这种村庄几达300个之多。我们知道其中几个的名字，如阿杰卢－加尔比亚（西阿杰卢）、阿杰卢－沙尔基亚（东阿杰卢）、提吉特、巴尼努巴堡、提古尔特（今图古尔特）和瓦格拉纳。除了这5座城市，易巴德派文献还提到几处较小的地名，所在地难以辨认，但也有可以印证之处，如廷－塔迈尔纳很可能就是塔迈尔纳，廷－伊苏莱曼（西迪苏莱曼）在图古尔特的北面，以及阿库克（古格）绿洲。

里格或阿里格之名出自里加柏柏尔人（属于扎纳塔族群马格拉瓦族的一个支系）。

---

[76] 关于苏夫的历史我们知之甚少，但是我们确知有一位生活在5/11世纪下半叶、有点名望的易巴德派妇女萨拉特·拉瓦蒂娅就是那里的人。就是在她在世的时候，一支易巴德派的商队从塔德梅卡（在加奥以北的伊福拉斯山区）回程，经过苏夫，很可能是去往托泽尔。

但是除了里加人外，还有扎纳塔族群许多别的支系，如巴努－瓦尔蒂扎伦人、巴努－维利尔人、巴努－扎尔金人、巴努－伊图法人、马格拉瓦人、巴努－杨贾森人和巴努－兰特人。居住在瓦迪·里格的其他柏柏尔人或者在这些绿洲附近过游牧生活的柏柏尔人中，还应该提到巴努－瓦尔马兹人（巴努－瓦尔泽马尔人）和三种过着类似贝都因人生活的支系，他们是巴努－瓦尔西凡人、巴努－戈马拉人（巴努－戈姆拉人）和巴努－辛贾森人。其中最后一种人可能就是马格拉瓦族的一个支系巴努－辛贾斯人，据伊本·哈勒敦说，他们在8/14世纪时仍住在瓦迪－里格。

对于6/12世纪以前瓦迪－里格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土著人把他们水井的起源归功于祖尔－卡尔奈因（一个头生双角的人），换言之，归功于亚历山大大帝。可是，古代作家从来不曾提到过瓦迪－里格绿洲，它们肯定是在古罗马统治北非时期之后才建立起来的。古籍中第一次出现这个地区的名字是在记述伟大的柏柏尔游牧民首领亚比卜·伊本·扎尔金时提到的，他生活在鲁斯泰梅王朝伊玛目阿大拉赫·伊本·阿卜德·瓦哈卜统治时期（208/823－257/871年）。

4/10世纪下半叶，瓦迪－里格的居民主要由易巴德派马格拉瓦人各族群组成。471/1078－1079年开始一场内战，使这个绿洲群一蹶不振。502/1108年瓦迪·里格又发生另一场战争。还应该提到的是，在4/10－5/11世纪时，瓦迪－里格绿洲群对于北非易巴德派教徒的生活有重要作用。

北撒哈拉东面的所有绿洲中最重要的是瓦尔格拉绿洲，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称它为瓦尔杰兰或瓦尔克兰。由于尚未发现阿拉伯征服前有关这个绿洲的资料，我们无法知道瓦尔格拉的起源。但是，有可能在拜占廷帝国后期，这个地方已经存在一个村庄，它是从努米底亚到霍加尔（也许还通往尼日尔河湾）商路的一个中间站。人们就是利用这条商路进行努米底亚与中撒哈拉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在古代肯定数量不会大。"瓦尔格拉"这个名字可以在6世纪科利普斯的著作中找到，他提到乌尔塞利亚尼人的一个摩尔族"部落"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77] 它也许属于穆斯林人侵前在瓦尔格拉创建定居点的乌尔塞利亚尼人的一个部族。与这些原始定居点同时瓦尔格拉绿洲还存在几个真正的城镇，它们在第一批阿拉伯人到达马格里布时，也就是在大致1/7世纪中叶已经存在。V.拉尔若[78] 提到那时瓦尔格拉的11个城镇或村庄，至今人们还能看到它们的遗址。

阿拉伯书面资料第一次提到瓦尔格拉（称为瓦尔克兰）是在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希沙姆·伊本·阿卜杜拉·马立克统治时期（105/724－125/742年）。据祖赫里说（6/12世纪中叶），正是在这个时期瓦尔格拉的居民皈依伊斯兰教。[79]

情况看来是这样：瓦尔格拉绿洲的居民和几乎所有其他柏柏尔人一样，很快信奉哈列哲派的教义，以抗议正统派政府的压迫性统治。他们成为易巴德派教徒，支持哈列哲教派中最温和的一支，他们很快就与塔哈尔特的易巴德派的伊玛目建立了密切关系。[80]

[77] 科利普斯（Corippus），1970年，第128页；T.莱维基，1976年，第10页。
[78] V.拉尔若（V. Largeau），1879年，散见书中各处。
[79] 祖赫里，1968年，第181、340页。
[80] 参阅T.莱维基，1976年，第9－11页。

至于萨德拉塔城或塞德拉塔城，它在4/10－6/12世纪时看来是成了瓦尔格拉绿洲的首府。该城的名字来自萨德拉塔柏柏尔人，他们的另一个部族住在比斯克拉附近的姆扎布绿洲。萨德拉塔城的遗址位于瓦尔格拉城以南14公里处。在这些废墟中可以见到一座清真寺的遗址和鲁斯泰梅王朝最后一个伊玛目雅库布·伊本·阿夫拉赫坟墓的形迹，这位伊玛目在296/908年塔哈尔特被法蒂玛军队攻占后逃到瓦尔格拉。[81] 322/934年法蒂玛军队围攻萨德拉塔，居民放弃该城，纷纷逃往凯里马（今瓦尔格拉以南的加拉－克里马）避难。

嗣后，在巴克里时期（5/11世纪），瓦尔格拉绿洲中有7个"城堡"，其中最大的一个，柏柏尔语叫作阿格伦－伊卡门，但易巴德派作家却都不知有这个地名。除这些城市和"城堡"外，古籍提到瓦尔格拉绿洲中还有几个柏柏尔人的村镇，如法朱哈、巴克尔城堡（或称廷－巴克尔、巴尼－巴克尔城堡）、阿格拉姆、廷－伊姆西文、廷－巴马图斯、塔马瓦特和伊夫兰。

多亏有流传下来的古籍，特别是易巴德派编年史，我们对2/8－6/12世纪瓦尔格拉绿洲的人口成分有一点知晓。上文已经提到，根据伊本·哈勒敦的见解，这个绿洲的名字来自建立该绿洲的扎纳塔族群的一个支系乌尔塞利亚尼或瓦尔杰兰"部落"的名字。上文也已说过，在瓦尔格拉早期居民中还有一个属于莱瓦特族的群体萨德拉塔人。生活在瓦尔格拉绿洲的其他柏柏尔人还有：伊本·豪卡勒称为雅克林人（或雅格林人）的巴努－雅杰林人（或巴努－雅格林人）；从古达梅斯迁来的蒂纳瓦塔人；巴努－瓦尔泽马尔人（他们有一支在瓦迪－里格附近过游牧生活）；以及先前也居住在瓦迪－里格的大父系氏族群体巴努－瓦尔蒂扎伦人。[82] 除了瓦哈比教派或努卡尔教派的易巴德派柏柏尔人外，瓦尔格拉也有不少正统的马立克派穆斯林，易巴德派教徒有时称这些人为艾什尔里派。还应提到，雅库特在谈及瓦尔格拉的简短文字中，提起在那里和柏柏尔人共处的还有一个叫马杰贾纳的部族。[83] 这些人是罗马天主教系统的非洲基督教徒，他们是鲁斯泰梅王朝伊玛目的忠实臣民，在塔哈尔特陷落时追随最后一个伊玛目迁移到瓦尔格拉。[84] 情况看来是，早在6/12世纪之前，里格和瓦尔格拉的柏柏尔居民已经有很大部分与黑人血统相混。[85]

299

瓦尔格拉绿洲的所有城镇都是5/11世纪时称为瓦尔杰兰地区的一部分。在4/10世纪初的瓦尔格拉绿洲，有一位住在塔格亚尔特的首领（*rā' is*）。维斯亚尼提到的塔格亚尔特首领名叫伊斯梅尔·伊本·卡辛，维斯亚尼在瓦尔格拉亲眼见到管理瓦尔杰兰的官员侍立在他的两旁，那些官员肯定是这位首领的下属。在5/11世纪上半叶，瓦尔格拉

---

[81] 参阅M.范、贝尔歇姆（M. van Berchem），1952年和1954年。

[82] 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103－104页。

[83] 雅库特，1866－1873年，第4卷，第920页。

[84] 参阅T.莱维基，1976年，第79－90页。

[85] 那个时期瓦尔格拉和瓦迪－里格的居民部族分布情况一定与乔安尼·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描述的10/16世纪开始时的情况相同。他在他的《非洲纪事》(Description of Africa) 一书中说，"大部分男子是黑人……由于那些人有许多黑人女奴，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因而他们的孩子也是黑的"。参阅利奥·阿非利加努斯（Joanne leo Africanus），1956年，第437和随后诸页。

有 23 个“穆塔瓦利”(*mutawallī*,大概是城镇行政官吏),对这些人的权力大小我们一无所知。[85] 除了首领和官员外,易巴德派古籍还提到瓦尔格拉有一些显要人物(估计主要是大商人)叫作“阿扬”(*a'yān*)和“阿卡比尔”(*akābir*)。以上是 10 世纪初的情形。进一步要说的是,在瓦尔格拉绿洲,各种议事机构也起一定作用,这些机构里有该绿洲所有村庄的居民代表。这些机构曾在塔马瓦特村开会。

鲁斯泰梅王朝伊玛目统治的国家灭亡后,瓦尔格拉居民依旧承认它的最高权威,这个绿洲处于完全独立状态,尽管在 4/10 世纪时显然由于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法蒂玛王朝企图征服它。随后,有一段时间瓦尔格拉受巴努－哈马德王朝统治。当时,哈马德王朝的素丹纳西尔·伊本·阿兰纳斯(454/1062－482/1089 年)在该绿洲设置一个总督作为他的代表。

瓦尔格拉在商业上相当重要,因为该城是去西苏丹地区的所有北部非洲和埃及商人走上商路的出发点。下文让我们再观察一下瓦尔格拉与北部非洲重要贸易中心和西苏丹、中苏丹市场的关系。

300 早在 3/9 世纪中叶,就有一条直通商路经过艾格瓦特连接瓦尔格拉和塔哈尔特,同时在瓦尔格拉和锡吉勒马萨之间另有一条商路;锡吉勒马萨是北部非洲和西苏丹之间商队线路的最重要的北方终点以及从加纳和万卡拉运来黄金和奴隶的目的地。原先,瓦尔格拉仅仅是苏丹地区与埃及间大道上的一个中间站;这条大道经过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杰里德,先到瓦尔格拉而后到锡吉勒马萨。但是,瓦尔格拉的商人很快就开始在锡吉勒马萨和西苏丹黄金产地之间的贸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阿拉伯地理学家都经常提到瓦尔格拉城中的商人。那些商人显然是通过锡吉勒马萨那条路来的,当然他们也可能走塔德梅卡、考考(加奥)那条路,到达加纳和万卡拉。[87]

另外还有一条线路从姆扎布(今济班)到瓦尔格拉城和黑人地区。亏得有伊德里西的记载,我们才知道这条路是用来从姆扎布向苏丹地区输送枣椰果的。[88]

再有一条商路从瓦尔格拉通往特莱姆森,我们是根据巴克里的记载知道这条路的;他还提到有一条路从哈马德王朝的都城阿比－塔维尔堡(即巴努－哈马德堡,其遗址距当今阿拉里季堡 30 公里)通到瓦尔格拉城。[89]

连接瓦尔格拉因而也就是连接整个马格里布和苏丹地区的最古老和最直接的线路是从瓦尔格拉到伊福拉斯高原上的塔德梅卡(即在距今基达尔村 45 公里处的埃斯－苏克遗址),再从那里到达加奥城。据巴克里说,这条路从塔德梅卡起到凯鲁万止,经过瓦尔格拉和卡斯蒂利亚(托泽尔)。[90] 我们从易巴德派古籍中得知,瓦尔格拉和塔德梅卡

---

⑯ T. 莱维基,1976 年,第 10－11 页。

⑰ 最早提到从埃及到锡吉勒马萨直达线路的是阿布·扎卡里亚·瓦尔杰拉尼(Abū Zakariyā' al－Wardjlānī)6/12 世纪写的易巴德派编年史, 有关的最早记事在该书中从 4/10 世纪开始。这条线路经过托泽尔和瓦尔格拉直接奔向锡吉勒马萨。参阅 T. 莱维基,1960 年。

⑱ 伊德里西,1866 年,第 4 页;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108 页。

⑲ 巴克里,1911 年,第 182 页;1913 年,第 340 页;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86 页。

⑳ N. 莱维蔡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84－91 页;参阅 T. 莱维基,1976 年,第 32－41 页。

之间的贸易早在4/10世纪下半叶已在进行，贸易的商品是用衣服交换黄金。[91]

除了瓦尔格拉－塔德梅卡－加奥商路外，还有连接瓦尔格拉城和西苏丹各市场的穿越撒哈拉的重要商路。这里我指的是瓦尔格拉－加纳商路，这条通道远比瓦尔格拉－ 301 塔德梅卡那条重要，因为加纳城是班布克和布雷两个产金地所产黄金的主要聚集地。瓦尔格拉－加纳线路经过塔菲拉莱特地区的锡吉勒马萨城，该城是撒哈拉商业中心和通往苏丹地区的真正门户。锡吉勒马萨的统治者是与扎纳塔族有关系的米克纳萨人，他们信奉与易巴德派关系密切的苏非教派，尊崇塔哈尔特的鲁斯泰梅王朝的伊玛目。瓦尔格拉－锡吉勒马萨商路看来经过古莱阿。至于瓦尔格拉－加纳通道离开锡吉勒马萨以后的后一部分则通往苏斯－阿克萨的坦杜尔特，该城即当今摩洛哥西南部的瓦卡。这条路我们是从巴克里的著作中得知的，他还告诉我们如下两个中间站的名称，一个叫伊齐勒，即今伊吉勒山，另一个叫奥胡达古斯特，它是地处当今毛里塔尼亚南部的一个昔日重要市场，也就是今日泰格达乌斯特遗址的所在处。[92] 据祖赫里说，从锡吉 302 勒马萨到加纳的通道也经过毛里塔尼亚山区的阿祖基（阿祖吉）城。[93] 另外还有一条从瓦尔格拉经过塔德梅卡到加纳的路。瓦尔格拉与塔哈尔特间最径直的路经过姆扎布，经过蒂尔格门特和艾格瓦特，也就是经过北撒哈拉的中央绿洲群，一边是瓦迪－里格和瓦尔格拉，另一边是图沃特－古拉拉。

根据伊本·哈勒敦的著作，姆扎布这个名字来自在这个地区建立村庄的一个扎纳塔部族。但是，易巴德派教徒早在3/9世纪就知道巴努－姆扎布和姆扎布地区本身的阿拉伯化名字穆萨布。易巴德派编年史中提到的巴努－穆萨布或穆萨布山就是今天的姆扎布。巴努－穆萨布的居民原来信奉穆尔太齐赖教派的教义，但后来（5/11世纪）他们改信易巴德派教义。

扎纳塔人在北撒哈拉建立的城镇中应该提一提塔尔格门特堡（今蒂尔格门特或蒂尔哈姆特）和艾格瓦特城；后者在4/10世纪已为人们所知，称作阿格瓦特，它由扎纳塔族酋长海尔·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哈扎尔·扎纳提统治。

这个地区另一座重要城市是古莱阿，如今叫作陶里尔特－马尼亚。这座城市当初完全可能与从瓦尔格拉到锡吉勒马萨的道路相连。从瓦尔格拉到塔德梅卡的线路似乎也就在古莱阿分岔。巴克里提到古莱阿时称它为“城堡”。它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城中有一座清真寺和几处古代建筑物的遗址”。[94] 古莱阿在西部大沙漠东边一座圆椎形山上，据当地传说，在这座山的周围，原来有大片的谷物地和大量枣椰树，用24条“福加拉”（foggāras，贮水池渠道）灌溉。

北撒哈拉西边的绿洲群由古拉拉、图沃特和提迪凯勒特三个绿洲组成，这些绿洲明

---

[91] 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89、91页。这条路显然就是阿布·亚齐德·马赫拉德的父亲凯达德去往塔德梅卡和加奥所走的同一条道路。阿布·亚齐德·马赫拉德就诞生于塔德梅卡（约272/885年）。参阅本书第12章。

[92] 巴克里，1911年，第155和随后诸页；1913年，第295和随后诸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66－69页。要检阅巴克里提供的资料，请参阅V.蒙泰伊（V. Monteil），1968年。见下文。

[93] 祖赫里，1968年，第190和以后诸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95－98页。

[94] 巴克里，1911年，第77页；1913年，第156－157页。

显地形成一个地理单位。在这三个绿洲中，古拉拉人口最多，水源和枣椰树也最多。图沃特本身就像200多公里长的“枣椰树带”，处于布达和陶里尔特之间；它的人口较古拉拉少，它拥有的枣椰树比古拉拉枣椰树的数字稍稍多一点。提迪凯勒特枣椰树的数字只有古拉拉的一半。整个西边绿洲群的灌溉依靠地下集水和叫作“福加拉”的渠道。

我们对古拉拉、图沃特和提迪凯勒特8/14世纪以前的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一般假设，所有这些绿洲只是在不很久远以前才建立起来，古拉拉在公元6世纪，提迪凯勒特的一些绿洲甚至迟到11/17世纪。在图沃特的塔曼提特曾发现一个石凿的公羊头偶像，使人们有理由设想伊斯兰时期以前这个地方居住着利比亚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种，这些人可能从利比亚东部过来，在那边（也许在锡瓦）他们接受了对生有一副公羊角的阿蒙（Ammon）的崇拜。这些新迁入者还从东部利比亚人那里学会挖“福加拉”渠道的技术。

303

至于撒哈拉柏柏尔人信奉犹太教大概开始于公元2世纪，是由于昔兰尼加的犹太教徒在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下令镇压后逃到毛里塔尼亚和撒哈拉，散居各地的结果。嗣后又有一些犹太教徒移居古拉拉和图沃特。根据当地的传说，公元517年在塔曼提特建造了一座犹太教堂，725年又造起另一座。[95]

5/11世纪中叶，扎纳塔族群又进一步向古拉拉和图瓦特渗入。这第二次移动是由于巴努希拉尔人和阿尔莫拉维德人向摩洛哥人侵引起的；在这以后，一些柏柏尔人（有扎纳塔人也有别的族群，有穆斯林也有犹太教徒）逃往撒哈拉。

中撒哈拉

在撒哈拉中央和古莱阿与瓦尔格拉以南有一块称为阿哈加尔的高原，也叫霍加尔高原。它向东北延伸，进入阿杰尔高原，向西延伸，进入穆伊迪尔。另外有两块高地成为阿哈加尔高原向南延伸部分，它们就是阿伊尔高原和伊福拉斯高原。撒哈拉的这些地区在2/8－6/12世纪时住着桑哈贾族群后裔的许多柏柏尔部落，他们就是今天图阿雷格人的祖先。在这个时期，阿哈加尔或阿杰尔高原没有大城市，也没有枣椰树。

伊福拉斯高原和阿伊尔高原的情况与此相反，我们从中世纪阿拉伯古籍中得知，那里确实有名副其实的城市，城市中的居民从事商业，但是那里没有枣椰树和果园（如伊福拉斯高原的塔德梅卡情形就是如此），或者说那里此类植物不起什么作用。

阿杰尔高原这个名字来自阿杰杰尔或阿兹格尔柏柏尔人，对他们的最早描述可以在伊德里西的著作中见到。[96] 他把阿杰杰尔人称作阿兹卡尔人（应是阿兹格尔人），根据伊德里西的说法，这些人都是赶骆驼者，他们的政治中心可能在今天的加特地区（或称贾奈特），从古达梅斯到那里有18天的步行路程，从费赞地区的塔萨瓦城到那里有12天的步行路程。看来后一条线路就是古代“加拉曼特人战车”行驶过的通道，这条通道

304

---

[95] 关于犹太化问题，参阅H.Z.希申贝格（H. Z. Hirschenberg），1974年，第1卷；关于犹太教徒在贸易中的作用，M.阿比特博尔（M. Abitbol）有论述，1981年。

[96] 伊德里西，1866年，第36和以后诸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21－122页。

在基督纪元前第一个千年时连接费赞和加奥，经过阿杰尔地区、阿哈加尔高原和伊福拉斯高原。这条古代通道的存在，从阿巴莱萨城的发现和在附近找到的几个古代钱币中得到证明。

至于阿兹卡尔－古达梅斯线路（其出发点可能在加特或贾奈特附近某处），它一定就是巴克里在5/11世纪描述的塔德梅卡－古达梅斯商路的北面部分。可是这条路经过之处的确切所在，我们至今不清楚。

我们对于2/8－6/12世纪间阿哈加尔的历史所知甚少。根据当地传说，在伊斯兰时代以前，阿哈加尔住着偶像崇拜者讲图阿雷格语的伊塞贝顿人（或称伊萨贝顿人，单数为阿萨巴特人），他们从事农耕生产的方式与图阿雷格人来到之前一样（种植无花果树、葡萄和枣椰树），也掌握了开渠引水灌溉的本领。今天的达格－加利部落自称是这些伊塞贝顿人的后代，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后来阿哈加尔遭受拉姆塔人的入侵，接着又被豪瓦拉人所占领，豪瓦拉人把阿哈加尔改名为“豪瓦拉”(据伊本·哈勒敦考证，只是通过柏柏尔语的音素把 ww 发成 gg,才出现霍加尔之名)。据哈勒敦说，有一部分豪瓦拉人越过沙漠，与居住在“黑人地区”考考（加奥）城附近的“戴面纱”的拉姆塔人一起生活。[97] 曾经跨越阿哈加尔地区的伊本·巴图塔告诉我们，那里的居民脸上遮着一块面纱。[98] 看来，阿哈加尔的豪瓦拉人到达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必定与342/956年法蒂玛王朝穆仪兹王子打败奥拉斯的豪瓦拉人和搜索这些反叛者有关，他们中有些人遁逃“远至黑人地区”，显然是逃往今日阿哈加尔的方向。

阿拉伯古籍提到3/9世纪已为世人所知的阿伊尔高原几个地区（或地方）。雅库比在提到苏丹地区考考国家统治下几个王国（在尼日尔河河套以北）的同时，也提到阿伊尔还有另外几个王国。它们是马兰达王国、哈兹班王国（在手稿上写为哈尔巴尔王国）和提卡尔卡林王国（在手稿上写作提德卡里尔王国）。[99]

三个王国中第一个王国的名字来自位于阿加德兹以南的小镇和水穴（今日的马兰代特），我们从伊本·法基赫的《布勒丹书》(*Kitāb al－Buldan*)（约290/903年著）和以后的伊本·豪卡勒及伊德里西的地理著作中知道它的存在。据R.莫尼说，这个古代 **305** 村落的遗址迄今仍能见到，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古代铸铜工场尚未灭迹的物证。[100] 据伊本·法基赫的说法，马兰达人当时生活在考考以北，他们的“领地”（或者应该说他们的都城）是从加奥到埃及诸绿洲的穿越撒哈拉主要通道的一个中间站。[101] 在4/10世纪下半叶，伊本·豪卡勒也提到马兰达是从加纳到昔兰尼加的阿贾达比亚道路上的一个中间站。它距考考（加奥）城有一个月的步行路程，形成这条道路在加奥之后下段路程的起始，道路经过这段路程后通往费赞地区的宰维莱城。[102] 据伊德里西记载，马兰达是一

---

[97] 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27页。

[98] 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1969年，第4卷，第444和随后诸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04页。

[99] 雅库比，1883年，第219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1页。

[100] R.莫尼，1961年，第138页。

[101] 伊本·法基赫，1885年，第68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7页。

[102] 伊本·豪卡勒，1938年，第92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46页。

个人口众多的城市，是“那些往返进行旅行和探险者的庇护所和休息地”。然而，同一位作家也说过，“旅行者经过此地的不多”。[63]

至于哈兹班（哈兹宾），我们感激 J. 马夸特提出这个字的正确形式，他认为它就是阿兹本或阿兹宾。[64] 据 H. 巴尔特说，这是阿伊尔的早期名字，当时那个地区黑人和混血种人都这么叫它，直到那位旅行家的时代，也就是 19 世纪中叶还在使用那个名字。[65]

雅库比提到第三个王国的名字叫提卡尔卡林（Tikarkarīn）；这个字是柏柏尔文中塔卡尔卡尔特（Takarkart）的阴性多数形式，在地图上出现的地名是塔卡尔卡尔特（Tacarcart）。这个悬崖上的王国处于塔胡阿城和阿加德兹城的中途，这个地区不乏古代文明的遗迹。8/14 世纪时伊本·巴图塔谈到一个名叫塔卡尔卡里的柏柏尔素丹，此人与阿伊尔西南部塔凯达（今阿泽利克）的素丹闹纠纷。在伊本·巴图塔著作的另一部分中，这位素丹的名字成为卡尔卡里，不见了柏柏尔词头“塔”。[66]

正如上文业已提到的，阿兹宾是阿伊尔的早期名字，但在阿拉伯文古籍中，与提到阿兹宾这个词的同时，也提到阿伊尔这个词。它出现在巴克里的著作中被写成海尔或希尔。[67] 近代阿拉伯文中这个名字是阿希尔，在塔马谢克文中才是阿伊尔。

至于伊福拉斯高原的巨大山区，这两位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都是知道的，主要是因 306 为有该地区的政治中心塔德梅卡城（当今基达尔村以北 45 公里处的埃斯－苏克遗址）。塔德梅卡也是从加奥通往古达梅斯和的黎波里城商队通道上的一个重要中间站。据巴克里书中的描写：从加奥到塔德梅卡是 9 天步行距离，而从塔德梅卡到古达梅斯是 40 天步行路程，还要通过萨格马拉人地区和 4 处沙漠。[68]

萨格马拉人是柏柏尔人的一支，他们生活的地区伸向塔德梅卡以北（或者应该说东北），其地离埃斯－苏克遗址有 6 天步行距离（也就是大约直径 120 公里）。他们也有住在塔德梅卡管辖地区里的，那是在该城以南、加奥城的对面。H. 洛特认为这就是图阿雷格－伊塞卡马伦人（单数为阿塞卡马尔人），其中有一些人迄今仍在伊福拉斯高原过游牧生活。[69]

塔德梅卡在 3/9 世纪时已经存在，它主要是从瓦尔格拉、杰里德和奈富塞山区来的易巴德派柏柏尔商人前来经商的重要商业中心。这群商人经常来此购买从加纳附近产金地带运来的大量黄金。塔德梅卡还是从马格里布运入的商品尤其是服装的存贮之地，这些商品经由瓦尔格拉商路运来。这座城市在建筑上胜过加纳和加奥，但是这里没有种植农作物。[70]

4/10 世纪时，塔德梅卡成为巴努－坦马克人（桑哈贾族群的一个支系）国王统治的

---

[63] 伊德里西，1866 年，第 41 页；N. 莱维森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125 页。

[64] J. 马夸特，1913 年，第 lxxviii 页和第 cix－cxvi 页。

[65] H. 巴尔特（H.Barth），1857－1858 年，第 1 卷，第 382 页。

[66] 伊本·巴图塔，1969 年，第 4 卷，第 442 页；N. 莱维森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303 页。

[67] 巴克里，1911 年，第 183 页；N. 莱维森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87 页。

[68] 巴克里，1911 年，第 181－182 页；1913 年，第 339－343 页；N. 莱维森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85－86 页。

[69] H. 洛特（H. Lhote），1955 年，第 126 和随后诸页。

[70] N. 莱维森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86－87 页。

国家。据雅库特记载，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塔德马克，它的都城叫扎克兰（实际上应是阿克拉姆或阿格拉姆）。可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却不属于柏柏尔人中的桑哈贾族，而属于扎纳塔族。这个都城的扎纳塔居民从3/9世纪起已是易巴德派穆斯林，而塔德马克的桑哈贾族直到503/1109－1110年才成为穆斯林。⑪

还有一个古代城市塔萨利特是发现过古代矿藏的古老场所，那里曾有铜矿和另一种矿石（人们过去用来制造著名的"加奥珍珠"、有人猜想为绿松石）。在我看来这座城市就是祖赫里著作中提到的塔萨拉或塔萨利城。据那位地理学家说，塔萨拉或塔萨利城距塔德梅卡9天步行路程，这个距离符合塔萨利特的位置，因为它就在埃斯－苏克遗址以北直径距离180公里处。塔萨拉或塔萨利居民和塔德梅卡居民一样，与加纳人打仗；他们在503/1109年皈依伊斯兰教。⑫

据巴克里记述，离塔德梅卡6天步行路程处，有一个叫图塔克（或陶塔克）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地下盐矿。⑬ 图塔克省的名字来自桑哈贾一个支系的名称，这点我们从伊本·豪卡勒所列举的柏柏尔人氏族群体名单中得知。⑭ 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个地方 307 的确切所在。有可能这个地方的名字和图塔克部落的名称与现今生活在伊福拉斯高原以北、塔曼拉塞特西北阿赫奈特地区的一个图阿雷格人的贵族部落塔伊托克有关。

西撒哈拉

撒哈拉的这一部分从伊福拉斯高原向西延伸，从摩洛哥向南伸展，直到大西洋。那里从1/8世纪到6/12世纪之间的时期，其部族和政治状况我们只能从阿拉伯古籍中得知。

最早的资料是关于乌克巴·伊本·奈菲将军领导下在摩洛哥南部的远征。62/682年这位指挥官进入苏斯－阿克萨省，甚至越过它的南部边界进入撒哈拉，在那里"他攻打马苏法人，捕获大量俘虏，然后由原路返回"。⑮

在我们看来，乌克巴·伊本·奈菲领导下的远征，其目的不在于阿拉伯人要永久性地征服摩洛哥南部和西撒哈拉，并在那里实施伊斯兰化，虽然有一位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谈到这位将军曾迫使摩洛哥南部的柏柏尔人贾祖拉族群改信伊斯兰教。看来，远征的目的更可能在于勘察西苏丹的产金地区，就这方面说，其目的和这位将军于47/666－667年为了查勘从的黎波里塔尼亚经过费赞和卡瓦尔到乍得湖商路的那次远征的目的是相同的。

乌克巴·伊本·奈菲去世25年后，伊弗里基亚的新阿拉伯总督穆萨·伊本·努赛尔征服和平定了今日摩洛哥的大部分领土，并使那里的人民皈依伊斯兰教。87/705－

⑪ 雅库特，1866－1873年，第2卷，第938页；参阅T.莱维基，1981年，第439－443页。

⑫ 祖赫里，1968年，第181－182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98－99页。

⑬ 巴克里，1911年，第183页；1913年，第344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87页。

⑭ 伊本·豪卡勒，1938年，第106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50页；参阅T.莱维基，1959年。

⑮ 伊本·哈勒敦，1925－1956年。

706年和90/708－709年间，穆萨·伊本·努赛尔进一步率军深入，远达苏斯－阿克萨地区，那里的人民信奉了伊斯兰教，并接受他的儿子马尔万为他们的长官。

但是一直要到伊弗里基亚总督乌巴杜拉·伊本·哈卜哈卜统治时期（116/734－122/740年），由于阿拉伯将军哈比卜·伊本·阿比·乌巴达远征的结果，308 这个省才最后被征服，其人民最后改信伊斯兰教。这次远征不但针对摩洛哥南部、同时也针对西苏丹。哈比卜·伊本·阿比·乌巴达胜利班师而回，带回大量战俘和黄金。[16]

他的儿子伊斯梅尔继续率军数度远征西撒哈拉过游牧生活的柏柏尔人。无疑这就是于145/762年或147/764年去世的穆斯林分裂教派杰出成员阿布·哈塔卜·阿兹迪（或阿萨迪）提到的那儿次远征。由伊本·法基赫流传下来的阿布尔·哈塔卜·阿兹迪的一份记述，内中引述阿拉伯指挥官穆什塔里·伊本·阿斯瓦德下面一番话："我组织了20个远征队从苏斯－阿克萨出发进攻安比亚地区。我见到了尼罗河（实际上是塞内加尔河）；在那条河与咸海（实际上是大西洋）之间有一座沙土山，那条河就是从这座山的山脚下发源的"。[17]

这段话第一次提到"安比亚"（这个词的发音难以确定），以它指横亘苏斯－阿克萨与塞内加尔河之间的那块地方。这个词后来又出现在由马苏迪（345/956年逝世）流传下来的法扎里的著作之中，指的是处于锡吉勒马萨与加纳王国之间的地域，换言之，大致上就是整个西撒哈拉。[18] 据伊本·法基赫著作中别处提到的说法，这个地区的幅员从这一边到那一边要走70个夜晚，还要越过平原、跨过沙漠。[19] 3/9世纪末，雅库比谈到安比亚指的是桑哈贾（泽纳加）族的柏柏尔人，他们的领地从锡吉勒马萨延伸到加斯特城，即柏柏尔人的加斯特王国（别的一些作家则说是奥胡达古斯特），位于西撒哈拉的东南边缘。[20] 上述种种说法意味着这个神秘的地名指的是西撒哈拉最古老的柏柏尔人联盟。据伊本·哈勒敦的见解，这个联盟包括马苏法人、兰图纳人和朱达拉人，其解体时间在306/919年。[21] 由乌巴杜拉·伊本·哈卜哈卜总督组织的阿拉伯远征军所针对的就是这个联盟。

但是这些远征军似乎只存在一个很短时间，北非穆斯林和安比亚联盟的首领之间很快达成协议。有了协议才使随后平定西撒哈拉地区成为可能。这种局面为这些地区的穿309 越撒哈拉贸易和传播穆斯林宗教造成有利条件，伊斯兰教的教义主要由同时兼负宣扬先知真理这一传教士使命的北非商人带来。关于这个短促时期，伊本·哈勒敦下边的一段话和我们的看法一致："当伊弗里基亚和马格里布被（阿拉伯人）征服时，商人们深入西苏丹地区，他们发现，在那里没有一个国王比加纳国王权势更大"。[22]

---

[16] 关于这些远征事迹，参阅T.莱维基，1970年。

[17] 伊本·法基赫，1885年，第64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7页。

[18] 马苏迪，1861－1877年，第4卷、第37和以后诸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2页。

[19] 伊本·法基赫，1885年，第81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8页。

[20] 雅库比，1892年，第360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2页。

[21] 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28页。关于《安比亚》这个名字的来源，参阅H. T.诺里斯（H. T. Norris），1972年，第72页。

[22] 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32页。

穆斯林马格里布和西苏丹的这种关系导致北非商人和撒哈拉柏柏尔游牧民之间一定程度的和睦友好状态；这个地区的柏柏尔人最初皈依伊斯兰教就是这种和睦友好的后果之一。

统治西撒哈拉的第一个桑哈贾首领是提卢坦·伊本·提克兰（伊特卢坦·伊本·塔拉卡金），他属于兰图纳“部落”。据伊本·阿比·扎尔说，他统治整个沙漠地区，有20多个苏丹地区的国王向他进贡。他的国土幅员有“3个月长和3个月宽”。他能动员10万匹受过严格训练的骆驼。他的统治时间很长，死于222/837年，享年80岁。他的孙子阿西尔·伊本·巴廷继承他的王位，统治到287/900年去世。桑哈贾国最后一位国王是阿西尔的儿子塔明，他统治这些部落直到306/918年。他被一些起来反对他的桑哈贾贵族杀死。结果引起桑哈贾各部落之间的不和与动乱，直到120年后它们在埃米尔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提法特（提福特）统率下才重新联合。这位埃米尔被人们称为塔尔西纳，是兰图纳族的首领之一（460/1035年）。他只统治了3年，接着由他的姻兄朱达利的叶海亚进行统治，成为桑哈贾族联盟的领导，在此以前仅仅在表面上是穆斯林的桑哈贾族各部落就是在他统治时皈依逊尼教派的，这个任务是埃米尔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从北非旅行回来时带回的传教士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完成的。[23]

根据伊本·哈勒敦转述的传说，在桑哈贾人中掌握最高权力的是兰图纳族，该族在伍麦叶王朝埃米尔阿卜德·拉赫曼统治时期（139/756－172/788年）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王国。伊本·哈勒敦而后历数这个桑哈贾国家的君主，最后一个叫奥拉肯·伊本·乌尔坦塔克。[24]

伊本·哈勒敦引用的另外一个资料提到桑哈贾国王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4/10世纪统治“整个撒哈拉”。他就是提纳兹瓦·伊本·万希克·伊本·比扎尔，又叫巴鲁扬·伊本·瓦希克·伊本·伊扎尔。看来这个国王与巴克里所说的名叫廷·亚鲁坦·伊本·维斯努·伊本·纳扎尔者是同一个人，他在350/961－360/974年间统治该地。[25] 伊本·豪卡勒曾经提到一个叫坦巴鲁坦·伊本·伊斯菲沙的国王，称他为“全撒哈拉的君王”，也可能是同一个人。[26] 310

据雅库比说，穿过安比亚的疆域，人们可以到达一个叫加斯特的地方，这是一个信异教的王国，它的国王经常袭击黑人地区，进行掠夺。[27] 这里有一些居民已过定居生活。这个地区包括古代阿拉伯作家称之为奥胡达古斯特的那个柏柏尔城市和王国，这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距离加纳城有10天步行路程。这个资料来源我们是从阿拉伯地理学家兼旅行家伊本·豪卡勒那里得到的，他于340/951－952年到过奥胡达古斯特，他还

㉓ 伊本·阿比·扎尔（Ibn Abi Zar'），1843－1866年，第76页。关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开端，参阅本书第13章。

㉔ 伊本·哈勒敦，1926－1956年，第1卷，第236页。

㉕ 同上；巴克里，1911年，第159页。

㉖ 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98页；1938年，第100页。

㉗ 雅库比，1892年，第360页；1937年，第226－227页；1962年，第31页。

说，从奥胡达古斯特到锡吉勒马萨相距2个月步行路程。[128] 根据穆哈拉比的记述（写于4/10世纪末前后），奥胡达古斯特是一个范围极大地区的名字，同时也是该地区都城的名字，从该地到锡吉勒马萨须步行40天以上，还非得经过沙漠和荒原不可。在同一本书的另外一节中，说到奥胡达古斯特有相当发达的市场，旅行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当地居民都是穆斯林。该地区首领属于桑哈贾族群。[129]

根据巴克里的记载，从350/961到360/971年，奥胡达古斯特国家由一个叫廷·亚鲁坦的桑哈贾国王统治，他的王国领土广袤，从这边到那边有2个月以上的步行路程。这样看来，奥胡达古斯特王国有一段时间转属于桑哈贾联盟。

有20多个黑人国王承认奥胡达古斯特国王是他们的统治者。后来，奥胡达古斯特的柏柏尔国王承认（直到446/1054年）加纳黑人国王的最高权威（这与兰图纳、马苏法和朱达拉不一样，三者不受加纳统治）。那时的奥胡达古斯特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它众多而富足的居民有阿拉伯人也有柏柏尔人（包括纳富萨人、莱瓦特人、扎纳塔人、纳夫扎瓦人和贝尔卡贾纳人各族群）。在奥胡达古斯特市场上，“整天人群拥来拥去”，用砂金购买物品。[130]

奥胡达古斯特坐落在一座草木不生、光秃秃山头脚下的沙土平原上；它的四围有果园和枣椰树。它显然与泰格达乌斯特是同一个地方，后者的遗址在提希特西南，相距约 **311** 200公里，在昆比萨利赫（加纳古都）西北，相距约400公里。[131]

5/11世纪上半叶，穆斯林柏柏尔王国奥胡达古斯特显然已经臣服于异教的苏丹地区王国加纳。由于这个原因，原来桑哈贾联盟的兰图纳人、马苏法人和朱达拉人攻击和征服了奥胡达古斯特，在5/11世纪中叶前后，建立起阿尔莫拉维德国家。

1/7－5/11世纪期间，西撒哈拉的大多数居民是桑哈贾族的柏柏尔人（兰图纳人、马苏法人和朱达拉人）。兰图纳人和朱达拉人住在伊斯兰地区的最南端，邻近黑人地区，以前曾是组成大安比亚桑哈贾国家的一部分。根据伊德里西的说法，塔祖卡格赫特地区（如今的萨基亚特－哈姆拉）属于兰图纳。[132] 兰图纳的北部领土还包括摩洛哥南部的努尔地区。[133] 向南，他们的领土伸展到伊扎勒（或艾扎勒），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伊吉勒山。再往南，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兰图纳的地区，它处于毛里塔尼亚东南塔甘特地区的西北。在446/1054年前后，兰图纳人还曾占有毛里塔尼亚山（特马尔山），后来叫作兰图纳山。这个地区有许多枣椰树种植园，它们是很早以前在此定居的一个族群建立的。

---

[128] 伊布·豪卡勒，1964年，第90－100页；N.莱维藜恩，1968年（a），认为伊本·豪卡勒从未到过像奥胡达古斯特那样远的地方。

[129] 参阅D.罗贝尔（D. Robert）、S.罗贝尔（S. Robert）和J.德维斯（J. Devisse）合编，1970年，第19－20页。

[130] 巴克里，1911年，第50－53页。

[131] 关于泰格达乌斯特的考古发掘，参阅D.罗贝尔，1970年；D.罗贝尔、S.罗贝尔、J.德维斯合编，1970年；C.瓦纳克尔（C. Vanacker），1979年。

[132] “塔祖卡格赫特”（Tāzukkāght）是柏柏尔文“azeggagh”（“道路”）的阴性形式。“萨基亚特哈姆拉”（Sakiyyat al－Hamrā）的含义是“红色沟渠”。伊本·哈勒敦已经知道这个地区，它的中心哈姆拉在14世纪亚伯拉罕·克雷斯凯地图上的名字是阿拉马拉。

[133] 努尔（或更适当的称呼为努尔－拉姆塔），今天仍存在于摩洛哥西南部古利明周围的瓦迪－农平原上，在小阿特拉斯山脉和达拉卜河之间。参阅V.蒙泰伊，1968年，第97－98页。

当地的口头传说和某些葡萄牙作家称他们为巴富尔人。

兰图纳山的主要城市是阿祖基。它是5/11和6/12世纪时环绕同名的阿尔莫拉维德人堡垒发展起来的，是从锡吉勒马萨到西苏丹通道上的重要中间站。黑人把这座城市叫库卡达姆（据伊德里西记述）或卡卡达姆。[134] 它就是今日的阿祖吉，地处毛里塔尼亚北部，现在是拥有古阿尔莫拉维德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之前遗址的一个小小的居民点，离现代城市阿塔尔不远。[135]

巴努－马苏法人生活在连接锡吉勒马萨城和加纳城的通道穿过的那片沙漠地区。312 那片地方除了距离锡吉勒马萨5天步行路程的达拉干河城（或叫提尤梅廷）外没有城市。[136]

在6/12世纪中叶前后，马苏法人往南发展远到阿祖基城。东南面有座塔加扎盐场，此时落入他们手中；通往伊瓦拉顿（或瓦拉塔）的商旅之路经过这个地区。伊瓦拉顿是西撒哈拉南面边缘的重要贸易中心，在8/14世纪时受马里国王的统治。

在巴努－兰图纳人占有的地域西南，5/11世纪以后生活着桑哈贾族群的一支——巴努－朱达拉人，他们可能是古代杰图利安人的后代。据巴克里记载，他们的居住地一直展伸到塞内加尔河下游近海处的以北地区，他们与大海之间别无其他部落。朱达拉人就这样居住在今天毛里塔尼亚的西南部和环绕拉马山（卡普布朗）的周围地区。[137]

就奥胡达古斯特王国的居民而言，他们大多数是游牧民，从严格的意义讲也是桑哈贾（泽纳加）人。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的，王国都城居住着伊弗里基亚的土著人以及贝尔卡贾纳人、纳富萨人、莱瓦特人、扎纳塔人、尤其是纳夫扎瓦人；还有少数来自其他各个主要穆斯林城市的人也寓居于此。那些人是定居在奈富塞山区、杰里德地区和苏夫、瓦尔格拉、瓦迪－里格诸绿洲的各个部族的易巴德派商人。易巴德派古籍中确实也提到过那些地方的商人到奥胡达古斯特旅行的情况。

从考古发掘和法国学者收集的口头传说中发现，西撒哈拉某些地区与游牧人口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些务农的族群，他们的后代一直到今天还在那里。我们手头有几份葡萄牙人早在9/15－10/16世纪的手稿，通过这些手稿我们有可能确定那些务农者属于哪个部族。总的说来，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种族。白种务农族群叫做巴福尔人或阿博富尔人（当地传说称为巴富尔人），黑种务农部族叫做巴尔巴尔人（或巴尔巴拉人、巴拉比尔人、巴尔巴罗斯人），他们在血缘上与索宁克人有关系。

这些非常古老的族群在毛里塔尼亚山留下相当数量的村庄废墟与考古遗址。[138] 当地传说把这些古老遗址说成是由一个叫巴富尔、阿博富尔或巴福尔的族群留下来的，他们

---

[134] 伊德里西，1866年，第59－60页；雅库特，1866－1873年，第4卷，第229页。

[135] R.莫尼，1955年（a）。

[136] 据V.蒙泰伊，1968年，第90页，此城在当今塔占尼特地区，达拉河湾以北20公里处。

[137] C.E.德－富科（C.E. de Foucauld），1940年，提到在阿伊尔和阿扎瓦格的一个图阿雷格隐修士"部落"，称作伊格达伦。看来这些人是中世纪早期朱达拉人的后裔。

[138] 见R.莫尼，1955年（a）。

313 在兰图纳人到来之前不久还住在毛里塔尼亚山区。[139] 据某些传说称，巴福尔人是属于扎纳塔族群的白种柏柏尔人（作者认为这非常可能符合事实）[140] 根据毛里塔尼亚的传说，特马尔山的非穆斯林土著居民以务农为生，是他们在山区种下第一株枣椰树。我们认为，巴福尔人可能就是利比亚（摩尔人）的巴伐尔人部落，他们在公元 3 和 4 世纪时活跃于北非西部，后来才迁移到今天的毛里塔尼亚．而把自己的文化和“巴福尔”这个名字留给特马尔山的居民，这个山区到 16 世纪早期还叫“巴福尔山”，这点在瓦伦廷·费尔南德斯的著作中有记载。[141]

据 6/12 世纪阿拉伯古籍（《伊斯提卜萨尔书》和祖赫里著作）记载，苏丹地区扎富努地方（即今迪亚富努）的居民是称作巴尔巴尔或巴尔巴拉（阿拉伯文复数：巴拉比尔）的黑人。他们算是属于贾纳瓦族，是黑人。据祖赫里记述，这些黑人也居住在沙漠中心（也许是指东南毛里塔尼亚的沙漠和草原）和加纳及塔德梅卡（加奥以北）的附近地区，而这两个地方的居民侵人他们的地盘捕捉奴隶。他们有自己的国王，穿兽皮，这在部分由游牧民组成的部族中是正常的情况。巴尔巴拉人自认为在苏丹各族中最为高贵，并自称加纳的君王出自他们的“部落”。[142]

综上所述，巴尔巴拉人看来是索宁克族群中的一个部族。巴拉比尔人（巴尔巴拉人、巴尔巴尔人）是否有可能就是当地传说中过去住在毛里塔尼亚东南部提希特城叫做巴尔巴尔的黑人呢？有些观察家认为这个传说中的部落就是古代葡萄牙编年史中提到过并称之为巴尔巴罗斯人的黑皮肤务农部族，他们在公元 15 和 16 世纪出现在毛里塔尼亚山，与“阿泽内格斯人”即柏柏尔扎纳加人（桑哈贾族）一起生活。

上文叙述了 1/7－6/12 世纪撒哈拉的历史与历史地理。我们在本章仅仅只是谈一些有关的基本事实，读者可以进一步参考论述这个时期的阿拉伯原始资料和专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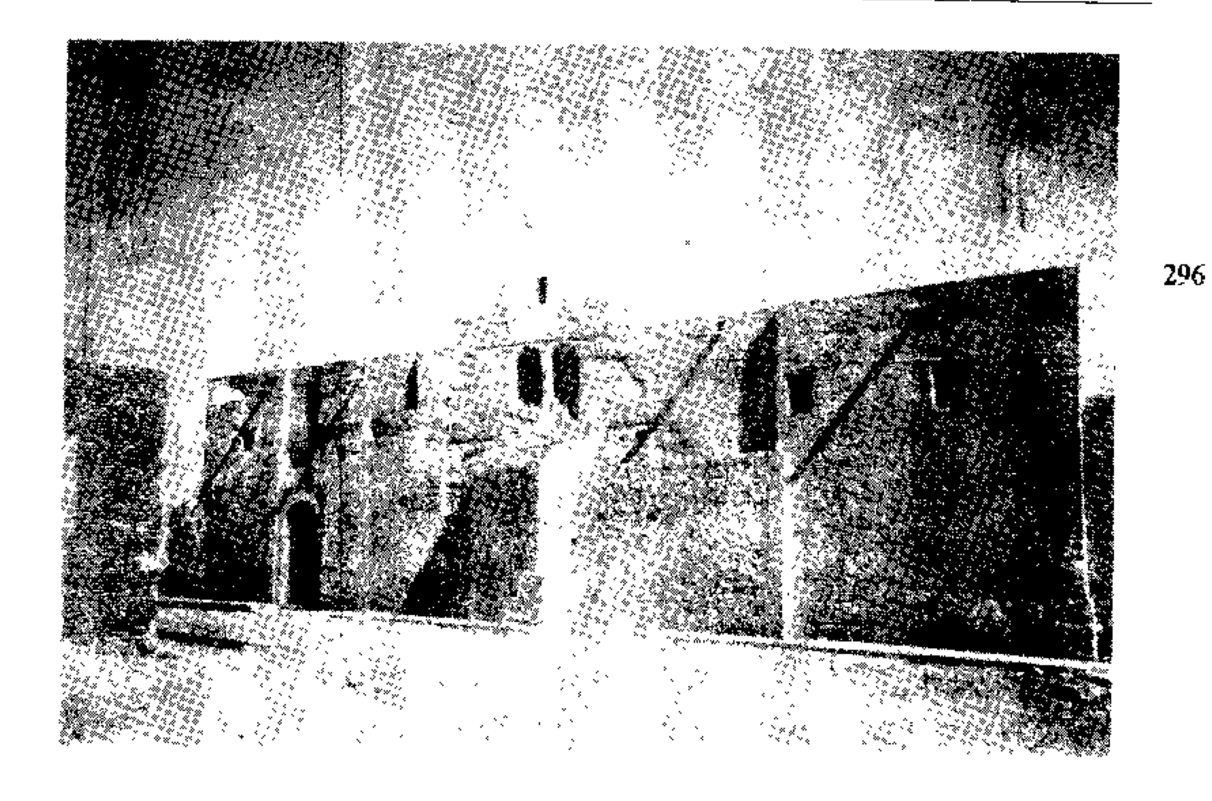
---

[139] 参阅 A. J. 卢卡斯（A. J. Lucas），1931 年；C. 莫达（C. Modat），1919 年。

[140]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Ibn 'Idhāri al-Marrākushī）14 世纪早期的《巴扬·穆格里卜书》（*kitāb al-bāyan al-mughrib*）中饶有兴味的一段话证实了这些传说，他在谈到阿尔莫拉维德国家的缔造者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进行的几个战役时，说了如下的话：“在兰图纳人居住地附近，有一个山区住着非穆斯林柏柏尔人的部落。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请他们信奉真主。他们拒绝。叶海亚·伊本·奥马尔下令攻击，兰图纳人就向他们进攻，把俘虏来的战俘瓜分了”。

[141] P. 德－瑟尼巴尔（P. de Cenival）和 T 莫诺（T. Monod），1938 年，第 154 页；T. 莱维基，1978 年，

[142] 《伊斯提卜萨尔书》1852 年，祖赫里，1968 年，第 181 页。



296

图片11.1 杰里德地方托泽尔城中建于10世纪的清真寺



301

图片11.2 姆扎布诸绿洲之一，远景

12 法蒂玛王朝的兴起

I. 赫尔贝克

314

法蒂玛王朝的建立：库塔马部族所起的作用

3/9 世纪末，穆斯林世界西部的很大一块地方（马格里布和西班牙）业已脱离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有效统治；伍麦叶王朝已在安达卢斯牢固地立足；伊德里斯王朝在穆斯林世界远西部（马格里布－阿克萨）统治着一些城市和柏柏尔人部族；在农耕地区和沙漠之间的边缘地带，则有哈列哲教派创建的若干国家，绵亘于从奈富塞山区到锡吉勒马萨一带，过着自己的独立生活。唯有伊弗里基亚的阿格拉布王朝仍维持对巴格达的忠诚，但经过 100 年实际上的独立，它们与阿拔斯王朝的联系也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1]

就宗教而言——我们不应忘记，在伊斯兰教中政教两方面始终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马格里布当时陷于分裂状态，一方是尊奉"逊奈"教规(*Sunna*) 的正统派，以凯鲁万为马立克学派的坚强据点；另一方是由哈列哲教派所属形形色色小派别（易巴德教派、苏非教派、努卡尔教派等等）构成的异端派。虽然伊德里斯王朝是阿里家族的后裔，而且是在什叶派广泛宣传之后建立的，但在其疆域内看来并未大力宣扬在穆斯林世界东部得到详尽阐述的那种什叶派教义，甚至更少在实际行动中遵循。

3/9 世纪末，随着什叶派一个充满活力和非常积极的派别伊斯玛仪派传到北非，上述情况便彻底改观。什叶派教义的一个基本部分就是坚信穆斯林社会的领导权（伊玛目职位，*imāmat*）合法地属于通过先知女儿法蒂玛和女婿阿里（第四代哈里发）延续下来的穆罕默德后裔。与逊尼派哈里发不同，什叶派伊玛目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是他的世俗统治权，而且还有解释伊斯兰教教规、教法（"沙里亚"，*sharī'a*）的特权，伊玛目是无谬误，也无瑕疵的。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由其子哈桑继位，后由其另一子侯赛因继位，伊玛目的职位即由侯赛因一支延续下来。伊玛目教义的另一个部分是相信最后一位看得见的伊玛目的临终并非死去，而是隐遁起来，在适当的时候将作为马赫迪（*Mahdī*，"神指引的人"）出现，恢复真正的伊斯兰教，征服全世界，"使世界充满正义和平等，如同现时充满压迫和暴虐一样"。但是在究竟谁是最后一位看得见的伊玛目，谁是第一位隐遁的伊玛目（也即马赫迪）的问题上，什叶派分裂成许多集团。大多

[1] 参阅本书第 10 章。

数人认为隐遁伊玛目是第十二位伊玛目穆罕默德。他于 264/878 年临终没有留下子女。他的追随者通称为十二伊玛目派（*Ithnā 'ashariyya*），这派人是现今什叶派的主流。

另外一个集团，虽然在迄至第六位伊玛目贾法尔·萨迪格为止的继承关系上与十二伊玛目派意见一致，但在第六位伊玛目的继承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他们声称伊玛目职位应属于贾法尔·萨迪格的长子伊斯玛仪（144/760 年逝世），而不应属于什叶派大多数人所承认的伊斯玛仪的弟弟穆萨。因此，伊斯玛仪（随后则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就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第七位，即隐遁伊玛目。这派人自称为伊斯玛仪派，其追随者通称七伊玛目派（*Sab'iyyūna*）。

这一派的历史及其有别于什叶派其他支派的特殊教义的早期发展相当含糊。如同持不同意见的派别通常表现的那样，伊斯玛仪运动也分裂成几个支系。它们的主要分歧点之一与伊玛目的性质有关。一方面那些持原来教义和忠于隐遁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的人坚持相信阿里和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是先知，而且当后者作为马赫迪重现时将带来新的伊斯兰教规、教法，另外一个支派，即产生法蒂玛王朝的那一派，他们所接受的教义认为穆斯林社会的首领是看得见的伊玛目。按照法蒂玛王朝官方的说法，法蒂玛哈里发世系的先辈，乃是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传下来的一系列“隐遁伊玛目”。但在他们统治北非的初期，他们的教义有一独特之处：该王朝的第二代统治者卡伊姆·阿姆鲁·阿拉享有特殊的地位，被认为他将是宣告救世主时代来到的马赫迪。只是当他死去使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消失时，伊玛目这个形象才成为世俗的和精神的领袖，在伊斯玛仪派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地位，马赫迪的地位遂被推到幕后。

伊斯玛仪派进行了非常巧妙而有效的政治和宗教宣传。他们的领袖们开始从他们修道的地方派出传道师宣讲他们的教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叙利亚的塞莱米耶地方。这些人主要是讲隐遁伊玛目将很快作为人们期待的马赫迪返回人世。他们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区——伊拉克南部、巴林、波斯和也门——争取到了大量信徒。伊斯玛仪派的教义号召社会各阶层反对现有秩序，保证随着马赫迪的出现将开始一个社会正义和改革的新时代。至于社会正义和改革的内容则是含糊不清的。在每个地区，传道师都巧妙地利用了居民中的各种不满。在某些地区他们成功地建立了小国家，但他们的宣传活动在 **317** 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北非，首先在库塔马柏柏尔人中间所取得的成功那么巨大辉煌。在伊斯玛仪什叶派所有支系中，只有法蒂玛人能够创建并维持一个帝国，历时长达 200 多年之久，并接近达到其教义的普遍目标。②

柏柏尔人的库塔马分支居住在位于吉杰利、萨蒂夫和以前罗马帝国的毛里塔尼亚最东端边缘的君士坦丁之间的小卡比利亚地区。虽然阿格拉布王朝以该地区的主人自居，但他们难得在那里行使权力，所以库塔马部族实际上是独立的。伊本·哈勒敦指出，

② 有关伊斯玛仪派的文献甚为丰富；最重要的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有 B. 刘易斯（B. Lewis），1940 年；W. 伊万诺夫（W. Ivanow），1952 年；A. S. 特里顿（A. S. Tritton），1958 年；W. 马德隆（W. Madelung），1961 年；S. M. 斯特恩（S. M. Stern），1961 年。

“他们从未被阿格拉布王朝所征服。”[3] 尽管库塔马部族受到来自阿格拉布王朝的干涉微乎其微，但他们对阿拉伯征服者和伊弗里基亚统治者仍是深恶痛绝，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们经常向阿格拉布王朝征兵区（*djund*）大量逃避当兵者提供避难所。

3/9 世纪末，阿格拉布王朝和塔哈尔特的鲁斯泰梅王朝实行停战，使前者得以重新开始试图征服库塔马人，他们的军队开始占领通向库塔马独立地带的一些设防地方。由于没有希望得到鲁斯泰梅王朝的帮助，哈列哲教派在库塔马人中间从来就不很大的影响更加衰退了，这就为伊斯玛仪派宣传大开方便之门。什叶派的教义在马格里布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因为在 3/9 世纪时曾有两个传道师，阿布·苏夫扬和胡勒瓦尼，在这些地区进行了虽然为时短暂但却相当成功的宣传活动。[4]

影响更加久远，最终起了决定性重要作用的是另一位传道师阿布·阿卜杜拉·希伊的活动。希伊出生在也门，公元 9 世纪末期被派往库塔马人中进行宣传。当一些库塔马的谢赫（长老）前往麦加朝圣时，希伊与这些人结识，并于 280/893 年随彼等前往其家乡。

阿布·阿卜杜拉·希伊所传播的伊斯玛仪什叶派教义对库塔马人来说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还不十分清楚。很难看出伊斯玛仪派的法蒂玛支系有任何明显的社会特征。在马格里布，他们利用了当地居民普遍存在的不满，并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库塔马人的扩张野心，但即使那些柏柏尔人也从来没有接受他们的教义。当他们先在马格里布，后来又在埃及掌权时，法蒂玛人并没有、也从未曾打算进行任何社会改革；他们的一些理论性著作甚至没有提到他们重视这样的事情。倒是伊斯玛仪派的另一支系，即巴林和阿拉伯半岛东部的卡尔马特教派，其基本社会主张中才体现出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理想的重视。就社会角度讲，法蒂玛政权比起所有其他伊斯兰政权并没有什么特色。[5]

318

不管是什么原因，库塔马人的大多数还是很快就被阿布·阿卜杜拉·希伊的宣传争取了过来，支持当时由伊玛目乌巴杜拉所代表的阿里与法蒂玛两人后裔的事业。不出几年，库塔马人各民族就联合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部族意识（*'aṣabiyya*）以及对法蒂玛伊玛目的忠诚，因为他们把他看成是期待已久的马赫迪，他将把世界从压迫者手中解救出来，不管压迫者是阿格拉布王朝还是远在巴格达的他们的阿拔斯主子。

反对阿格拉布王朝的决定性斗争开始于 290/903 年，当时库塔马军队从他们的山区进入伊弗里基亚的平原地带。阿格拉布王朝的军队很容易就被打败了，不出几年，伊弗里基亚的大部分便落入阿布·阿卜杜拉·希伊之手；由于他推行的财政政策，当地人对他的事业更加同情，因为他宣布一切不合教规的赋税为非法，并将库塔马人夺取的战利品都发还给被征服的城镇的居民。相比之下，阿格拉布王朝的末代埃米尔齐亚德特·阿拉三世却为了养活其军队而加重人们的财政负担，从而大大失去民心。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伊弗里基亚的首府凯鲁万被阿布·阿卜杜拉·希伊攻陷。齐亚德·阿

---

[3]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925—1956 年，第 2 卷，第 31 页。
[4] F. 达克劳伊（F. Dachraoui），1964 年。
[5] C. 卡享（C. Cahen），1961 年，第 13—15 页。

拉三世知道自己已最终失败，便离开拉卡达的府邸逃往埃及。北非史上的阿格拉布时代遂告结束。

听到他的追随者在伊弗里基亚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当时仍居留在叙利亚塞莱米耶地方的伊玛目乌巴杜拉决定迁往马格里布。但是他没有去和在伊弗里基亚的阿布·阿卜杜拉·希伊会合，却是去了摩洛哥南部哈列哲教派当权的米德拉尔国首都锡吉勒马萨。此事甚为蹊跷，迄今仍无确切答案可以解释。当很大的区域已经为他的部下控制之时，他却前往穆斯林世界的远西部，深入什叶派最凶恶的敌人之中，究竟目的何在呢？他的目的是否为了在锡吉勒马萨建立第二个中心并且想染指从苏丹地区源源不断流入该地的黄金呢？⑥不管他本意如何，在他到达该地后不久，便被雅萨·伊本·米德拉尔软禁，后又被投入监狱。

296/909年，阿布·阿卜杜拉·希伊率库塔马军队前往锡吉勒马萨解救其主人；在那次远征过程中，他在当地居民帮助下推翻了塔哈尔特的鲁斯泰梅王朝。锡吉勒马萨不战而下，乌巴杜拉获救。⑦翌年，乌巴杜拉胜利进入拉卡达，在该地被宣布为“虔诚 319 信徒之王”（这是哈里发的一种称号）并被称为“马赫迪”；按照伊斯玛仪派教义的说法，这意味着暴政时期的结束和新的“黄金”时代的开始。

关于乌巴杜拉的出身，从而关于法蒂玛王朝的起源，迄今仍然真相难明。对于他们建立王朝权利的合法性问题，穆斯林历史学家分成两个阵营。敌视法蒂玛王朝者拒绝承认他们是阿里和法蒂玛两人的后裔，宣称他们是冒牌的骗子；值得注意的是，在402/1011年以前关于他们世系的真实性并未引起争论，那年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发表一项由一些逊尼派和什叶派知名人士（其中包括许多谢里夫）签名的声明，宣称法蒂玛声称的权利是骗局。⑧我们发现，在此后的时期支持他们具有合法性的人中间，甚至包括一些著名的逊尼派历史学家，诸如伊本·阿西尔、伊本·哈勒敦和马克里齐。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代学者也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⑨但最重要的是，当时他们在北非的一些亲近追随者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是阿里家族的后裔。

乌巴杜拉·马赫迪297/909年至322/934年间在位。先是在拉卡达即位，不久后开始在东海岸的马赫迪亚建造新都，308/920年迁至该地。后来，在阿布·亚齐德叛乱后，哈里发曼苏尔（334/946－341/953年在位）又在凯鲁万以东的萨布拉－曼苏里耶建新都，于337/949年竣工。他的继位者们在该地居住到362/973年，此时法蒂玛王朝在北非的最后一位君主穆仪兹自该地迁往埃及。

什叶派掌权的国家在北非的建立，注定要使穆斯林世界分裂成为三个互相敌对的帝国；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北非的法蒂玛哈里发国家；西班牙的伍麦叶埃米尔国

---

⑥ J.德维斯（J. Devisse），1970年。

⑦ 有些逊尼派历史学家断言，乌巴杜拉在狱中已被杀害，阿布·阿卜杜拉·希伊在狱中找到的仅仅是他的一个仆人。阿布·阿卜杜拉·希伊告诉其追随者说这个仆人是真正的马赫迪。参阅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ān），1843－1871年，第3卷，“乌巴杜拉”词条。

⑧ 许多历史学家提供这一声明的全文。参阅P. H. 马穆尔（P. H. Mamour），1934年，第201和随后诸页。

⑨ 除前面注2所引研究著作外，也见同上书；W.伊万诺夫，1942、1952年；哈姆达尼（al－Hamdānī），1958年和M.卡纳德（M. Canard），1965年。

家。稍后，在 318/929 年，科尔多瓦的伍麦叶埃米尔阿卜德·拉赫曼三世面临着出现两个哈里发各自宣布建立自己的哈里发国家的局面：一个在突尼斯，是离经叛道者；另一个远在巴格达，信奉正统教义。从此在一个时期内在伊斯兰教中就有三个哈里发。422/1031 年伍麦叶哈里发国家的崩溃使帝国数目重新减少成两个，567/1171 年法蒂玛王朝灭亡，使帝国数目减少到一个，即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

在北非争夺霸权的斗争

阿格拉布王朝的覆灭和对伊弗里基亚本部的占领虽然在较短时期内即告完成，但法蒂玛王朝对马格里布进一步的征服却是相当困难而且耗费时日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该王国内部局势不稳定，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的军事力量基础薄弱。

伊斯玛仪什叶派的新教义当然会给一个已经在马立克学派的逊尼派教义与哈列哲教派的教义（或是以易巴德派、或是以苏非派的形式出现）之间陷于分裂的地区进一步带来困难。所有这些派别接受法蒂玛王朝的统治都是被迫的，因此常常出现反抗。这种反抗或者遭到残酷镇压，或者是在利诱之下平息。逊尼反对派的大本营是正统的马立克学派的著名中心凯鲁万，该派在城乡居民中的巨大影响仍未减弱。尽管逊尼派的这些集团从未公开造反，但他们的消极抵抗，以及他们与更激进的哈列哲教派联合一起的可能，增添了法蒂玛王朝的重重困难。历代哈里发对当地居民公开表示蔑视甚至憎恨，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情绪是双方都有的。[10]

从一开始，法蒂玛王朝就把北非仅仅看成是一块跳板，利用它来进一步征服穆斯林世界的东部，以便取代阿拔斯王朝，实现其统治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美梦。这一宏大目标使他们不得不同时在陆上和海上保持强大而耗费巨大的军事力量。虽然传道师阿布·阿卜杜拉·希伊当初由于废除许多非法税收而一度赢得很大同情，但这一政策迅即改变，法蒂玛国家重新征收一些不合教规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再加上通行税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贡赋。在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统治者的财政制度而激起普遍的不满反响，因为“对这些统治者来说，任何榨取人民的借口都是有用的。”[11]

最初，军事力量很不稳定，因为支持该王朝的只有库塔马部族以及桑哈贾人的另外一些支系或部族。而且，这些部族军队只有靠允许他们掠夺和分赃来保持纪律；如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就会叛变。在乌巴杜拉登位两年后这种倾向就已经表现出来，当时他派人暗杀阿布·阿卜杜拉·希伊及其兄弟，其原因我们仍不十分清楚。[12]

库塔马人对此事的反应是起而反叛，并宣布拥立一个孩子为新的马赫迪；反叛很快即被血腥地镇压下去。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库塔马人构成法蒂玛王朝权力结构的主要支柱，而且毫无疑问他们曾帮助该王朝征服马格里布和埃及，并在那里起了不应低估的作

---

[10] 关于这种情绪的许多事例，参阅 M. 卡纳德（编），1958 年。

[11] 伊本·伊达里 (Ibn 'Idhārī)，1948－1953 年，第 1 卷，第 186 和随后诸页。

[12] 马赫迪与他的传道师之间的冲突，其起源或是由于后者怀疑前者并非真正的马赫迪，或是由于阿布·阿卜杜拉·希伊的主子害怕他权力太大，而且具有笼络人心的天才。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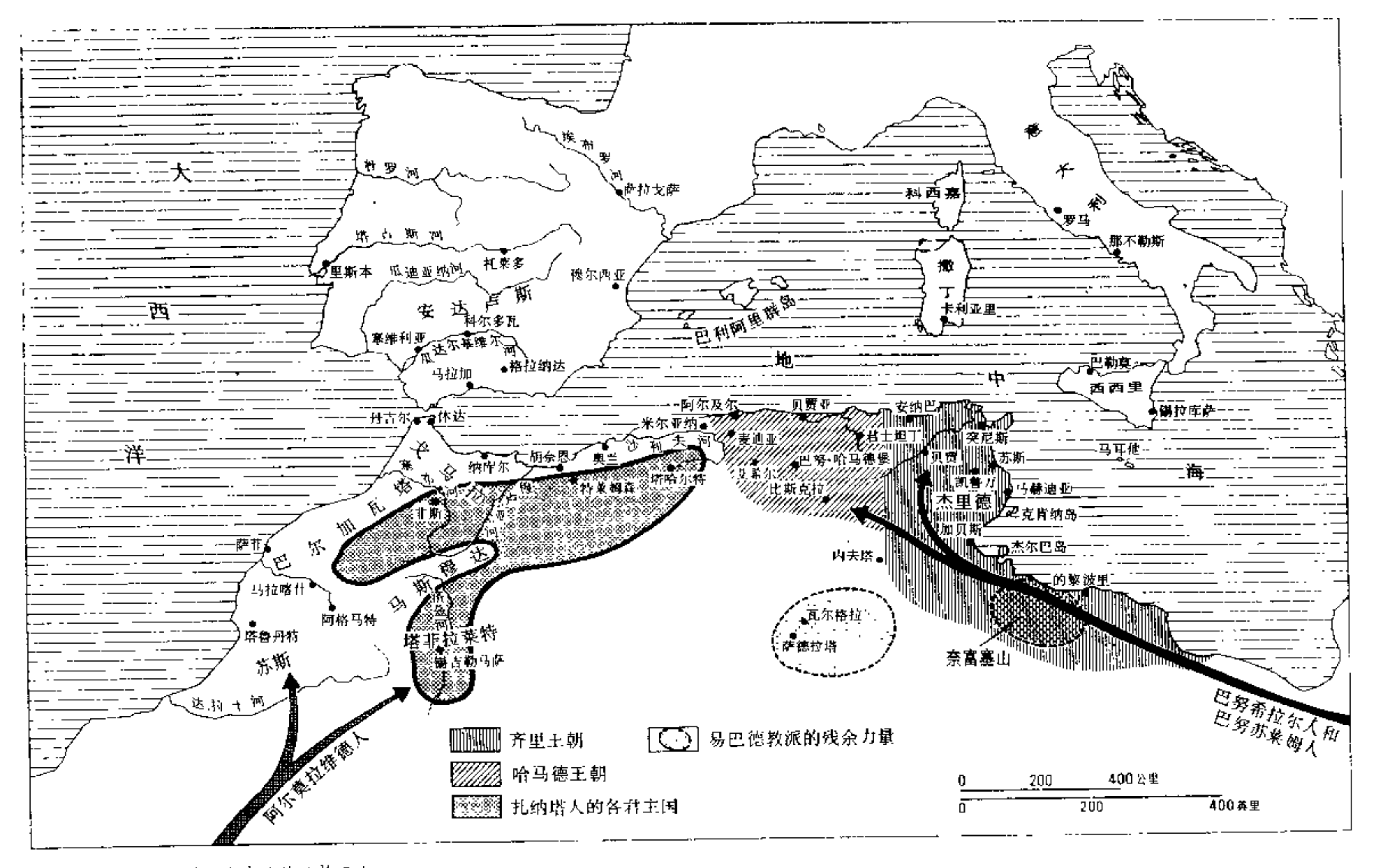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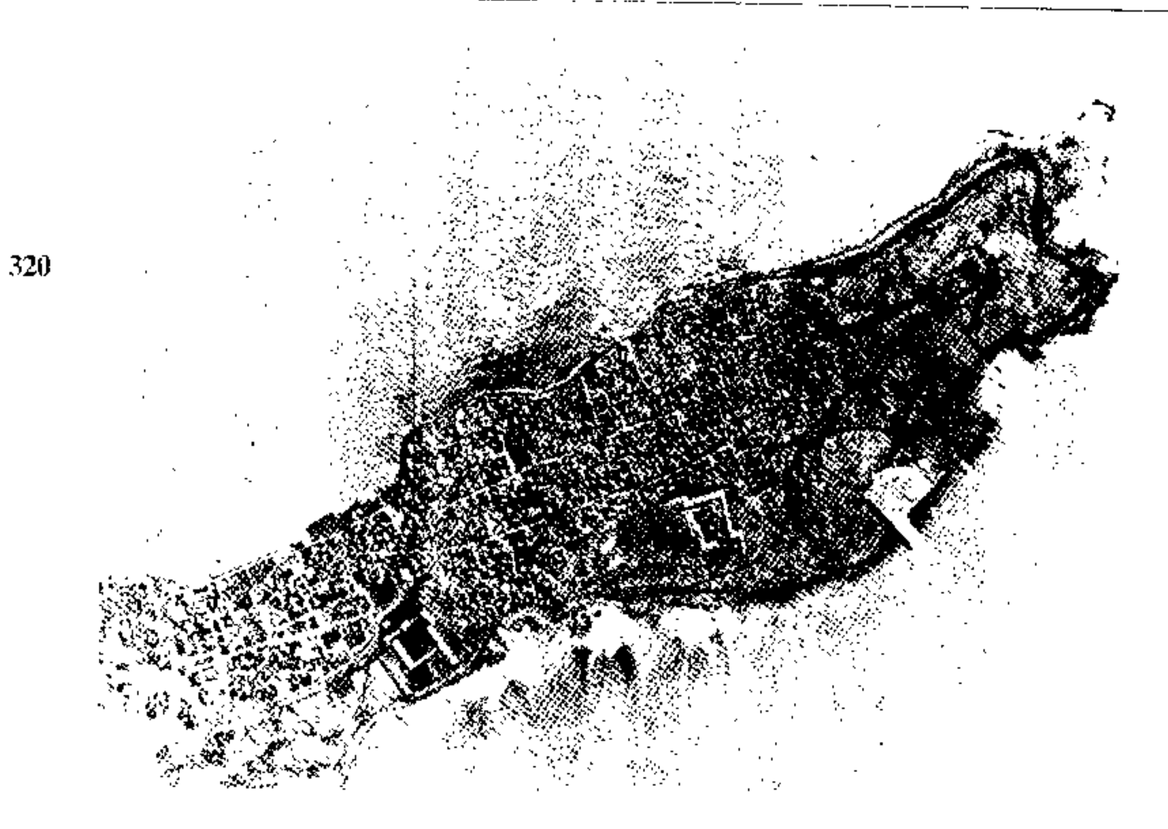


插图12.1　5/11世纪上半叶的马格里布

320



图片 12.1 马赫迪亚半岛鸟瞰（20世纪70年代摄）

用，但有许多事例说明他们曾发动叛乱、怀有二心并掀起骚动。在那样的情况下，该王朝的创建人自然而然要转向从别的地方为军队召募比较可靠的士兵。他从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各族中找到了这种人；被阿拉伯人称为"萨卡利巴"（单数："萨克利比"）——白奴。这种人虽然在阿格拉布王朝末期已经充当卫队，但只是到了乌巴杜拉和他随后几个继承人统治时期，"萨卡利巴"军队才成为法蒂玛王朝军事、以至政府机构更加可靠的第二支柱。[13] "萨卡利巴"大部分属于南部斯拉夫血统（达尔马提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伊弗里基亚，有的是被威尼斯人运来并出卖为奴隶的，有的是阿拉伯人袭击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时被俘虏的人。在法蒂玛帝国中，他们所起的作用与突厥奴隶士兵在伊斯兰世界东部各地所起的作用类似，不仅是军队的骨干，而且担任行政官员、总督和朝廷重臣，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忠心耿耿而著称。他们中有些人位居高官，如贾瓦尔后来成为埃及的征服者，开罗以及爱资哈尔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的创建者。在穆仪兹统治时期，有两个"萨卡利巴"，即凯萨尔和穆扎法尔，曾被分别任命为北非的西部和东部两省的总督，另外还有许多人曾是哈里发的贴身随从。

322

正是由于这两支军队——库塔马人和"萨卡利巴"——的帮助，才使法蒂玛王朝在伊弗里基亚的小小版图一跃而成为一个国土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叙利亚的庞大帝国，变成了4/10世纪和5/11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强国。另一方面，非洲黑人却没有起到在埃及时期所起的那种作用。不过，他们也曾充当军队中的士兵，根据位于费赞的奴隶

[13] 关于"萨卡利巴"在法蒂玛帝国所起作用，参阅I.赫尔贝克（I. Hrbek），1953年。

大市场的名字，被称为“扎维里”。这说明他们来自乍得地区。[14]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法蒂玛王朝是第一个在整个北非（伊弗里基亚和马格里布）建立政治统一的王朝，但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他们在伊弗里基亚本土以西地区的统治是多么薄弱。乌巴杜拉·卡伊姆·曼苏尔（334/946－341/953 年在位）和穆仪兹（341/953－365/975年在位）这几位哈里发在位期间在马格里布进行的战役如果要一一描写会使读者厌倦。被法蒂玛军队征服的许多地区或城镇，以后又被多次重新征服，这是因为当地人民、酋长或埃米尔只要一遇机会就设法摆脱外国统治。塔哈尔特第一次于295/908 年被占领，在 299/911 年和 322/934 年又再次被占领；非斯第一次于 308/920 年被征服，322/930 年、323/935－936 和 347/958 年又重新被征服。锡吉勒马萨的情况也是一样，法蒂玛统治者们和米德拉尔埃米尔们形成轮流统治的局面。就连紧靠伊弗里基亚的奥拉斯地区，也只是到 342/953 年才平定下来。

北非也有一些地区始终未归法蒂玛王朝统治。在塔哈尔特陷落后，鲁斯泰梅王朝的最后一位伊玛目同他的人民一起逃往瓦尔格拉，该地的易巴德教派虽未试图建立新的伊玛目国家，但仍然保持独立，甚至还扩展到姆扎布。易巴德教派古老的要塞奈富塞山区始终未被征服，在整个 4/10 世纪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的中心。

在 4/10 世纪，撒哈拉沙漠整个北部边缘地带一直掌握在扎纳塔人手中，他们控制着通往乍得湖地区和通往加奥的商路的终端。法蒂玛哈里发始终未能将马格里布的这一地区置于自己的版图之内；他们只是试图在最西端的锡吉勒马萨取得为他们的宏伟征服计划所十分需要的从苏丹流入的大量黄金。看来他们的北非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西部的运金商路，而不是在整个马格里布殖民。[15]

法蒂玛王朝执行这一政策的努力，不断受到地方上离心势力和外部敌人的阻挠，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这个什叶派王朝。桑哈贾和扎纳塔这两个柏柏尔部族之间由于生活方式、商业利益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而形成传统角逐，很快就卷入了 4/10 世纪穆斯林 **323** 世界西部两大伊斯兰强国——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和伊弗里基亚的法蒂玛王朝——之间规模更大的决斗。其实，这两大帝国没有共同的边界，它们通过作为它们工具的各自的柏柏尔盟友来进行争夺霸权的殊死斗争。一般说来（也有某些例外），扎纳塔人，特别是他们中间最强大的马格拉瓦人代表科尔多瓦哈里发的利益和要求，而桑哈贾人各部族，特别是巴努·齐里人，则坚决站在法蒂玛王朝一边。[16] 在一个半世纪当中，两个敌对的联盟互有胜负，但只要法蒂玛王朝在伊弗里基亚的力量基础存在（直到 4/10 世纪七十年代为止），桑哈贾－法蒂玛联盟始终占据上风。在此期间，他们的军队至少有两次进入马格里布西部：322/934 年，一支法蒂玛军队由迈苏尔·萨克拉比率领再次征服非斯，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重建法蒂玛保护下的伊德里斯王朝。规模更大的是

---

[14] 伊本·哈马德（Ibn Hammâd），1927 年，第 34－35 页。

[15] J. 德维斯，1970 年，第 144 页。

[16] 关于桑哈贾人与扎纳塔人之间的角逐，参阅 H. 泰拉斯（H. Terrasse），1949－1950 年，第 1 卷；L. 戈尔文（L. Golvin），1957 年；H. R. 伊德里斯（H. R. Idris），1962 年，和 E. 莱维－普罗旺卡（E. Lévi-Provençal），1950－1953 年，第 2 卷。

347－348/958－959 年的贾瓦尔战役，一支庞大的库塔马和桑哈贾军队在齐里·伊本·马纳德率领下征服了摩洛哥的很大部分，远至大西洋、只剩丹吉尔和休达仍在伍麦叶王朝手中。即使这次战役的巨大胜利也未能使法蒂玛王朝在那些遥远的地区建立起牢固的统治，大约在 8 年后贾瓦尔又不得不进入同一地区进行第二次远征，使之重新归其主子支配。此后不久，由于法蒂玛军队的主力集中去攻打埃及，马格里布西部又落入伍麦叶王朝的势力范围，法蒂玛王朝及齐里王朝属国永远丧失了这一地区。

法蒂玛王朝－伍麦叶王朝和桑哈贾人－扎纳塔人之间的争斗，其背景从一开始就是对苏丹地区所产黄金的觊觎和对商旅线路终端的控制。学者们已开始懂得上述因素对北非和西非的历史，特别是对阐明法蒂玛王朝的历史所具有的深刻涵义。[17]

前文已经谈到，居民中很大一部分人对法蒂玛王朝在财政和宗教方面的压制措施日益不满。直到卡伊姆在位晚年，不满情绪的公开表露尚未达到危险的程度，偶尔发生叛乱和暴动很容易就镇压下去了。后来，在 332/943－944 年突然爆发了一场令人触目惊心的叛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几乎摧毁了整个法蒂玛国家。这次叛乱的领袖是阿布·亚齐德·马赫拉德·伊本·凯达德，人们通常称他为阿布·希马尔（骑驴的人）。他出生于苏丹地区的塔德梅卡或加奥(考考)，是杰里德区一个扎纳塔族商人同他的女黑奴所生的儿子。[18] 阿布·亚齐德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作为学者和易巴德教派教义的宣讲师而显露出非凡才华，很快就成为努卡尔支派的领袖人物之一，这一支派是易巴德教派中最激进的一翼。当乌巴杜拉·马赫迪建立了什叶派的统治后，阿布·亚齐德竭尽其全部雄辩才能、传教热情和日益增加的影响动员人民摧毁这个邪恶的王朝。他在杰里德进行的宣传鼓动引起了当局的怀疑，于是他逃往马格里布中部。他在奥拉斯山区的柏柏尔人和平原地区的农民群众中鼓吹进行一场反对法蒂玛王朝的圣战，主张建立一个由虔诚的“谢赫”组成的会议领导、按照哈列哲教派教义进行治理的民主国家。他得到西班牙伍麦叶王朝的某种支持，并同凯鲁万的正统马立克派的中产阶级结成不稳定的联盟。他率领的由狂热的信徒组成的军队，在公开叛乱开始后的 6 个月内横扫伊弗里基亚平原地区，占领了凯鲁万城（333/944 年），在几次激烈的战斗中打败法蒂玛军队。此后，有 10 个月时间，阿布·亚齐德率军围攻法蒂玛王朝统治的最后堡垒马赫迪亚，该城由卡伊姆哈里发率领库塔马人的军队和“萨卡利巴”军队防守。什叶派在北非的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19]

一支非职业的军队包围一个城市久攻不下，往往会使这支军队力量耗尽，士气涣散。不久，阿布·亚齐德手下由各部落征召的部队就开始离散，各自回家。尽管卡伊姆哈里发于 334/946 年死去，也未改善叛乱一方每况愈下的局势。

新立的哈里发曼苏尔很快就采取有力的步骤镇压起义，他调动主要来自西西里的生力军收复了凯鲁万，经过 6 个月的战斗终于决定性地击溃了哈列哲教派的军队。阿

---

[17] 最早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是 J. 德维斯，1970 年；另参阅 C. 卡亨，1981 年。

[18] 伊本·哈马德，1927 年，第 33 页认为是出生在塔德梅卡；伊本·哈勒敦，1925－1956 年，第 3 卷，第 201 页认为是出生在加奥。

[19] 关于这次叛乱，参阅 R. 勒－图尔诺（R. Le Tourneau），1953 年。

布·亚齐德与他剩下的追随者继续在霍德纳山区抵抗达一年之久。336/947 年他在一次与法蒂玛军队的战斗中受伤身亡。他的儿子法德勒又继续战斗了一年，但在法德勒死后叛乱的浪潮渐渐地平息了。

阿布·亚齐德叛乱是反对法蒂玛王朝的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几乎把该王朝推翻了。358/968－969 年瓦哈比教派的易巴德教徒在阿布·哈扎尔领导下，在杰里德地区、姆扎布绿洲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发动了一次叛乱，主要参加者是马扎塔柏柏尔人。这次叛乱没有对法蒂玛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不久就被镇压了下去。[20] 曼苏尔哈里发对阿布·亚齐德的胜利预示哈列哲教派在北非的事业开始逐渐衰落。5/11 世纪巴努希拉尔人入侵后，衰落的速度甚至进一步加快；易巴德教派中组织最严密的一部分人撤退到一些 **325** 偏僻的地区，在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逐渐皈依了正统的伊斯兰逊尼派。

帝国政策：西西里、地中海和埃及

法蒂玛王朝从他们的前辈阿格拉布王朝那里继承了在西西里岛上的利益。阿格拉布王朝花了 70 多年时间（从 212/827 年到 289/902 年）才使自己完全成为西西里的主人。在以后的 200 年里该岛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省。[21] 法蒂玛王朝在该岛的统治开始时并不顺利，乌巴杜拉在 297/909 年以后派往该岛的连续两任总督均被当地居民赶走，他们在 300/912 年选举了自己的总督艾哈迈德·伊本·库尔胡布。他公开宣布拥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曾两次派舰队反对伊弗里基亚。但在第二次行动中遭到失败。艾哈迈德·伊本·库尔胡布独立统治该岛四年后，被他的军队抛弃，并将他交给法蒂玛王朝，304/916 年被该王朝处死。从此西西里才归属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但在以后的 30 年里该岛骚乱频起，几乎等于发生内战。穆斯林居民中的各种成分，阿拉伯人（来自西班牙和来自北非的）和柏柏尔人相互间不断发生摩擦，加上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人（包括卡勒比王朝的人）与北部的阿拉伯人这两个宿敌之间的世仇，使情况更加复杂。只是到了 336/948 年哈里发任命哈桑·伊本·阿里·卡勒比（354/965 年逝世）担任总督后，局势才有了改进，秩序得到了恢复。在卡勒比和他的继承人们，即卡勒比王朝的统治下，穆斯林西西里成为一个繁荣的省份，同时获得越来越多的自治权。

西西里的穆斯林在拜占廷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完善的结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拜占廷税收的沉重负担，把许多大庄园分割成由佃农和自耕农精心耕作的小农庄。他们还引进新的技术和作物品种充实了西西里的农业。穆斯林作家强调那里有丰富的金属和其他各种矿产，其中之一氯化铵（硇砂）是有价值的出口品。柑桔、甘蔗、棕榈、桑树的种植都始于这个时期。棉花的种植也延续了很长时期，只是在 8/14 世纪时才消失。更重要的是蔬菜种植的发展：葱头、菠菜、甜瓜和其他蔬菜都是通过西西里传播到西欧的。

---

[20] 伊本·哈勒敦，1925－1956 年，第 2 卷，第 548 页。

[21] 关于穆斯林西西里的历史，参阅 M. 阿马里（M. Amari）的名著，1933－1939 年。

同样重要的是与伊弗里基亚的双边大宗贸易。伊弗里基亚用油交换西西里的谷物和木材；众所周知，木材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十分缺乏，它使得阿格拉布王朝及其后的法蒂玛王朝能够建立强大的海军，成为中部地中海的海上大国。而西西里还是为法蒂玛王朝（以及后来的齐里王朝）的舰队提供熟练水手的主要来源。

326

对西西里的控制使法蒂玛王朝在地中海占据了战略优势，巴勒莫成为重要的海军基地。为了给他们耗资巨大的征服计划筹措战费，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们依靠袭击基督教欧洲和穆斯林西班牙的海岸而虏获战利品。这种袭击有的是由私掠船进行的，有的则干脆是由国家本身组织。早在乌巴杜拉统治时期，马耳他、撒丁、科西嘉、巴利阿里群岛和其他岛屿就已经领教过他从阿格拉布王朝继承下来的舰队的威力了。法蒂玛王朝的舰队在309/922至316/929年间尤为活跃。当时几乎每年都要袭击亚得里亚海两岸和第勒尼安海海岸以及意大利南部（主要是塔兰托和奥特朗托）。323/934－935年的远征也取得很大胜利；舰队劫掠了法国南海岸，占领了热那亚，并在卡拉布里亚一带登陆，掳掠奴隶及其他战利品。阿布·亚齐德的叛乱似曾减少这种海上活动，但是到了穆仪兹在位时期袭击又达到更大的规模。344/955－956年，法蒂玛舰队袭击了伍麦叶西班牙的海岸，一年后贾哈尔与拜占廷海军作战大获全胜，军队曾在意大利南部登陆。但他的舰队在返航中被风暴冲散，遭到一些损失。法蒂玛王朝在地中海的海上优势之大，使得伊本·哈勒敦在几百年以后仍不胜感慨地写道“基督教徒甚至连一条船都不能出海。”[22]

对西西里岛的占领，自然使法蒂玛王朝与该岛以前的主人拜占廷帝国发生冲突。由于法蒂玛王朝海上力量的兴起，同时由于地中海政治形势的变化，拜占廷帝国很快就不得不采取守势，并寻求缔结停战协定。早在乌巴杜拉在位时期，拜占廷皇帝就与他缔结了一项条约，根据该条约，拜占廷每年进贡22 000金币。法蒂玛哈里发这一方则企图与保加利亚人结盟以加强自己对拜占廷的地位。一位保加利亚使节曾访问了在马赫迪亚的法蒂玛宫廷，但在与法蒂玛的使节一起返航途中，船只被拜占廷虏获，拟议中的联盟遂告失败。在拜占廷皇帝释放法蒂玛使节后，哈里发将上述贡赋减少一半，以报答这一宽宏行为。

卡伊姆在位时期，西西里岛吉尔詹蒂的拜占廷居民曾举行叛乱，拜占廷皇帝曾企图支持叛乱者，但未取得很大成功。穆仪兹在位时期，曾与得到拜占廷某些帮助的西班牙伍麦叶王朝发生敌对行动，这时拜占廷皇帝向穆仪兹哈里发提出建议，如后者愿意同他缔结长期和约，他将撤回其军队。穆仪兹加以拒绝，只是在他的舰队获得一些胜利也遭到一些挫折后，才同意接受拜占廷的使节，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停战协定（346/957－958年）。[23] 几年后，拜占廷帝国拒绝继续缴纳贡赋，并在西西里重启战端，但是在354/965年他们的军队在拉梅塔战役中惨败，他们的舰队在海峡之战中受重创。随后举行的谈判才导致356/967年的和约，因为当时穆仪兹正在埃及作战，需要保持他侧翼的安全。

327

帝国扩张的思想是伊斯玛仪派的意识形态中所固有的，而法蒂玛王朝是这种意识形

[22] 伊本·哈勒敦，1925－1956年，第2卷，第202页。
[23] 参阅S. M. 斯特恩，1950年。

态最突出的代表；在伊斯玛仪什叶派的各个支系中，只有他们接近于实现该派教义普及全球这一目标。他们认为他们在北非建立王国仅仅是准备阶段，是创建一个由先知的后裔按照伊斯玛仪派秘传教旨进行统治的全球性伊斯玛仪帝国的必要前提。只有掌握伊斯兰的核心地带——包括从埃及到伊朗的全部地区——而不仅仅是统治边缘的伊弗里基亚和马格里布，才能接近实现全球帝国的计划。但是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们也十分现实地看到，在眼下必须以这一地区作为他们的经济和战略基地。事实上，正是北非的人力物力资源才使该王朝有可能向穆斯林世界东部胜利进军。

乌巴杜拉·马赫迪在伊弗里基亚建立自己的统治后，就过早地认为征服埃及的时机已经成熟。由他的儿子卡伊姆指挥，他于 301－302/913－915 年和 307－309/919－921 年发动了两次远征。最初取得了一些胜利，法蒂玛军队越过亚历山大港，兵临伏斯泰特城下；另一次远征则到达法尤姆地区，但这两次远征都以惨重的失败告终。在第二次远征中，法蒂玛舰队全军覆没。唯一有形的收获是长期占领了拜尔凯（昔兰尼加），为后来进一步的征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沿阵地。卡伊姆即位后于 325/925 年进行了第三次远征埃及，但也未取得胜利。接连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该王朝初期人力物力财力均感不足。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法蒂玛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形势才改善到足以进行一次新的成功地征服埃及的尝试。与此同时，伊弗里基亚及其直接统治的属地（西西里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部分地区）也经历了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一方面由于它具有地中海主要贸易集散地之一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控制了由西苏丹输人的黄金。法 **328** 蒂玛的陆海军也由于在马格里布和中部地中海久经征战而锻炼成有效的军事力量，有几位陆海军将领表现出优秀的指挥才能。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法蒂玛王朝能够建立起十分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保证了对他们的武装力量顺利执行后勤供应工作。

这些成就以及法蒂玛军队在马格里布的胜利，使第四位哈里发穆仪兹得以准备向埃及发起总攻。征服行动经过周密计划，并有巧妙的政治宣传加以配合，结果在贾瓦尔指挥下未遇到很大困难即达到目的；贾瓦尔于回历 358 年 8 月 12 日（公元 969 年 7 月 1 日）进人伏斯泰特。贾瓦尔在征服伏斯泰特后不久，便开始建设新的首都开罗——阿拉伯语为（*al－kāhira*）（卡希拉[24]），第二年即为爱资哈尔清真寺奠基。在征服该地四年后（362/973 年），穆仪兹哈里发从伊弗里基亚迁往开罗，以埃及作为帝国的中心。这个帝国自它最早创建者谢世后存在了五个世纪以上。[25] 法蒂玛王朝中心的东移，对北非的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后果。

柏柏尔人重新称霸[26]

在反对阿布·亚齐德叛乱的艰苦作战中，由齐里·伊本·马纳德领导的桑哈贾部族的一个分支塔尔卡塔人，表现了对法蒂玛事业的高度忠诚。为了表彰这一点，在阿

[24] 此城命名为 Kāhira 是因为在它的奠基日，火星（卡希尔 al－kāhir，意为“征服者”）正处于当空。

[25] 关于法蒂玛王朝在埃及的历史，见本书第 9 章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V 卷，第 15 章。

[26] 研究法蒂玛以后的时代的最详细和最近的著作，有 H. R. 伊德里斯，1962 年；另可参阅 L. 戈尔文，1957 年。

布·亚齐德被打败之后，哈里发授予齐里·伊本·马纳德以掌管一切桑哈贾部族及其领土的权力。[27] 在法蒂玛王朝留在马格里布的剩下时间里，齐里·伊本·马纳德和他的儿子布鲁金·伊本·齐里领导了多次在马格里布中部和西部反对扎纳塔人和马格拉瓦人的战役并取得胜利，他们有时是独立作战，有时是与法蒂玛的将领联合作战。后来，在穆仪兹在位时期，齐里父子被任命为总督，治理马格里布中部（艾希尔、提亚雷特、巴加亚、姆西拉、姆扎布）和他们建立的各个城市（阿尔及尔、米尔亚纳、麦迪亚）。

因此，哈里发于 359/972 年最终迁往埃及前，很自然地任命布鲁金·伊本·齐里[28]为他的副手，统治帝国的整个西部。这件事乍看起来并不是什么突然的变革，但实际上它在北非史上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齐里家族兴起以前，所有主要王朝均是穆斯林世界东部的人建立的（如伊德里斯王朝、鲁斯泰梅王朝、阿格拉布王朝、法蒂玛王朝）。齐里家族是第一个柏柏尔人王室；他们在马格里布历史上开创了一个由柏柏尔人诸王朝（阿尔莫拉维德王朝、阿尔莫哈德王朝、扎扬王朝、马林王朝、哈夫斯王朝）在该地区独揽政治权力的时代。

另一个重要性较小的变化是桑哈贾部族的崛起。法蒂玛王朝派去征服穆斯林世界东部的军队大部分是库塔马人，因此，从那以后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到处有库塔马人，有的指挥军队，有的发动叛乱，有的则是老百姓。库塔马战士的大量东迁，为桑哈贾柏柏尔人在马格里布东部建立并巩固他们的霸权开辟了道路。

在齐里王朝前 3 代——布鲁金（361/972－373/984 年在位）、曼苏尔（373/984－386/996年在位）和巴迪斯（386/996－406/1016 年在位）——当政时期，与法蒂玛王朝的关系一般说来仍属正常。向开罗纳贡定期进行，埃米尔们还不时向哈里发们赠送珍贵的礼品，然而哈里发则在埃米尔周围安插一些代表以控制他们。与此同时，齐里王朝在承认法蒂玛王朝法理上宗主权的情况下尽量设法取得更大程度的实际独立。法蒂玛王朝当然也了解这种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公开与之决裂，只是经常采取比较迂回曲折的方法提醒其藩属服从命令。当曼苏尔罢黜了法蒂玛王朝派驻伊弗里基亚的一位很有权势的代表，并宣布自己不是一个凭一纸文书即可撤换的行政长官时，开罗没有作出公开反应，但却向库塔马人那里派去一个传道师，鼓动库塔马人起而反对曼苏尔（375/986 年）。经过几年战斗，叛乱被格外残酷地镇压下去，那位传道师也被处决。库塔马人作为该地区一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力量已不复存在，齐里王朝的权力进一步得到加强。虽然巴迪斯表现出对开罗比较顺从，并及时地得到拜尔凯省作为奖赏，但当他的叔父哈马德自行宣布独立时，他丝毫没有从宗主国那里得到帮助。情况看来是法蒂玛王朝越来越专注于东方政局，逐渐失去了对帝国西部地区的兴趣。这究竟是由于伊弗里基亚在经济上日趋衰微，还是由于法蒂玛王朝已无力在军事上干涉那里的事情，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很难断定。当 5/11 世纪中叶最后的决裂终于出现时，法蒂玛王朝的

[27] 伊本·哈勒敦，1925－1956 年，第 2 卷，第 539－540 页。

[28] 齐里·伊本·马纳德在 360/971 年与马格拉瓦人作战时阵亡。

反击行动不是直接的干涉，而是采取了非常狡猾的办法，即派遣大群阿拉伯游牧部落来对付他们以前的藩属。

齐里王朝的头两位统治者布鲁金和曼苏尔在西面连续对扎纳塔人及其保护者伍麦叶王朝猛烈进攻。在布鲁金统治时期，扎纳塔人被赶出马格里布中部，这位埃米尔几乎重新征服了除伍麦叶王朝控制的休达以外全部摩洛哥领土。但一旦布鲁金的军队撤离，丹吉尔与穆鲁亚河之间的扎纳塔人在他们的"呼图白"中又重新开始称颂科尔多瓦的哈里发。曼苏尔即位之初，曾企图重建在非斯和锡吉勒马萨的势力（385/985年），但未能成功；由于忙于对付库塔马人的叛乱，并且认识到他已无力完全占领马格里布西部并征服其不安分的居民，他于是放弃了攻势，而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巩固中央地区伊弗里基亚。 330

巴迪斯在位时期，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在马格里布的政治地图上留下了烙印。首先是扎纳塔人（主要是马格拉瓦人）发动有力攻势，于389/998－999年进攻马格里布中部，一直打到的黎波里。与此同时，居住在齐里王朝领域内的扎纳塔部族发生叛乱，甚至连齐里家族的一些成员也参与其事。只是依靠巴迪斯的叔父哈马德·伊本·布鲁金的杰出军事才能才挽回了局势。哈马德猛烈进攻，平定了马格里布中部，把扎纳塔人驱赶到摩洛哥。巴迪斯不得不在马格里布中部封给他叔父大片采邑，398/1007－1008年哈马德在这片封地上创建了自己的首府巴努－哈马德城堡，这是北非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之一。它的战略地位比齐里王朝原来的都城艾希尔更加优越，因为它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和广袤的地区。不久哈马德宣布独立（405/1015年），断绝了与法蒂玛王朝的联系，转而效忠于阿拔斯王朝。于是桑哈贾人的王朝便分裂为二：即在伊弗里基亚本土维持局面的齐里王朝和统治马格里布中部的哈马德王朝。虽然巴迪斯以及在他死后继位的穆仪兹（406/1016－454/1062年在位）最终打败了哈马德，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其独立，以后桑哈贾部族这两个支系保持着不稳定的和平。

哈马德转而效忠阿拔斯王朝，导致逊尼派恢复活动。伊弗里基亚和马格里布中部居民的大部分一向反对法蒂玛王朝和齐里王朝的官方宗教伊斯玛仪什叶派，但这种反对活动总的说来是消极被动的。直到巴迪斯在位的最后一年，在贝贾和突尼斯首次发生屠杀什叶派信徒的事件，接着在凯鲁万和伊弗里基亚的其他地方也发生大规模反对什叶派的活动，成千上万的什叶派信徒遭杀害，他们的房屋遭抢劫。这一表现城乡群众情绪的事态发展，就在穆仪兹长期统治之初清楚地告诉他，把一个教派的统治强加给普遍信奉正统的逊尼派教义的居民是多么危险。这并不是说宗教问题对发生在5/11世纪中叶的齐里王朝与法蒂玛王朝的决裂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但无疑它对穆仪兹放弃对开罗的法蒂玛王朝的忠诚而重新信奉正统教派是一个起作用的因素。在忠于阿拔斯王朝和忠于法蒂玛王朝两者之间来回摇摆主要并不是由于宗教原因促成的，这一点可以从已经成为该王朝创始人的哈马德家族所奉行的各项政策看出来。哈马德在位晚年重新效忠法蒂玛王朝，而他的儿子卡伊德（419/1028－446/1054年在位）却在五、六年之内两次改变态度，先是效忠阿拔斯王朝，后来又转向重新效忠法蒂玛王朝。 331

法蒂玛王朝所追求、但始终未能长期保持的马格里布的统一，并没有维持到该王朝

东撤。柏柏尔人的分裂倾向以及他们反对政治集权的态度，证明比齐里王朝继续奉行其宗主国的统一政策的微弱努力强大得多。5/11世纪上半叶马格里布的政治地图呈现出以下情景：(1) 在东边的伊弗里基亚，齐里王朝构成一个最先进而且比较稳定的国家。(2) 在齐里王朝的西边，哈马德王朝建立起他们的独立国家，与扎纳塔人不断作战，偶尔也与齐里王朝作战。(3) 在法蒂玛王朝东撤和西班牙的伍麦叶哈里发国灭亡后，扎纳塔人各部族乘机在特莱姆森、锡吉勒马萨、非斯和其他地方建立起许多独立小国。这些国家从未形成任何权力集中的政治组织，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语言和部族群体，仅仅是由于共同反对桑哈贾人而联合在一起。(4) 在大西洋沿岸，信奉异教的巴尔加瓦塔人有能力抵抗齐里王朝和后来扎纳塔人的进攻，保持他们的独立。(5) 在摩洛哥北部，戈马拉人保持了同样的地位，伍麦叶王朝一蹶不振之后，独立的地位甚至更为加强。(6) 在摩洛哥南部小阿特拉斯山脉和在苏斯的马斯穆达人的许多部族，继续保持其小群体的独立存在，没有任何较严密的组织（参见插图12.1）。

总的说来，柏柏尔人的处境与阿拉伯人征服以前的情况颇为相似；阿拉伯人只在城镇中有影响，其势力从东往西递减。政治结构的情况也与此相当：在伊弗里基亚国家体制最为发达，而在马格里布西部，社会结构尚未达到形成国家的水平。

在法蒂玛以后的时期，宗教的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5/11世纪中叶，整个马格里布成为正统逊尼派的天下，什叶派影响已无踪影，哈列哲教派也只剩下少数微不足道的孤立点。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可以说是政治优势重新回到柏柏尔人手中的直接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哈列哲派教义作为柏柏尔人抵抗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征服者和阿拉伯王朝的意识形态，已失去其存在的理由。最成功和最强大的什叶派王朝之一的法蒂玛王朝，使北非的哈列哲教派遭受沉重的失败和损失，却为逊尼派的马立克学派在马格里布东部和中部取得确定无疑的胜利开辟了道路，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在阿布·亚齐德失败后，哈列哲教派作为北非的一支政治势力已不复存在。它只残存于边缘地区的一些小的群体中，采取守势而不是攻势。但是对哈列哲教派的胜利并无助于什叶派的事业，它仅仅是给逊尼派的复兴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332

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的入侵

439/1047年齐里王朝的统治者穆仪兹·伊本·巴迪斯与其宗主国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穆斯坦西尔最终决裂，转而承认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从而放弃了什叶派教义而改宗逊尼派教义。法蒂玛王朝对此采取了特殊形式的报复手段。由于不可能派军队去对付这个不顺从的藩属，大臣亚祖里建议他的君主将伊弗里基亚交给当时居住在上埃及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以惩罚桑哈贾人。

劝说这两个父系氏族群体的首领向西移民显然不会有很大困难，因为西迁可使他们得到丰富的掠夺品和比在上埃及要优越得多的牧场。由于阿拉伯游牧民以到处滋扰和毫无纪律闻名，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他们既不会使北非重归法蒂玛的统治之下，也不会在那里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属国。就法蒂玛王朝来说，它也并不想再得到这些失去

的省份，而只是单纯对齐里王朝进行报复，并以此作为摆脱那些不受欢迎和难以驾驭的游牧民的一种手段。

这些阿拉伯人于442/1050－1051年开始迁徙，第一步先蹂躏了拜尔凯省；接着巴努希拉尔人继续西迁，将拜尔凯留给巴努苏莱姆人，后者在该地停留数十年后才继续迁徙。当巴努希拉尔人的前锋出现在突尼斯南部时，齐里王朝的统治者穆仪兹·伊本·巴迪斯一时还没有领会这是亚祖里的计策，没有马上察觉到灾祸已临近他的国土。相反，他试图谋求入侵者为他效劳，作为可能的盟友，甚至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巴努希拉尔人的一个大首领。应他的邀请，巴努希拉尔人的大部分离开拜尔凯，大队人马长驱直入，很快就蹂躏了齐里埃米尔国的南部，越来越多的乡村和城镇遭到掠夺，穆仪兹·伊本·巴迪斯想让游牧民成为他军队支柱的美梦终于成为泡影。他设法阻挡他们的入侵，但在几次战役（其中443/1051－1052年在加贝斯地区的海达兰战役最为著名）[29]中尽管他主要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却遭到彻底败北。乡村地区、许多重要的村庄，甚至一些城镇均落入游牧民首领手中，混乱和不安到处蔓延。尽管穆仪兹·伊本·巴迪斯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阿拉伯埃米尔，仍未能制止劫掠行动的继续；446/1054－1055年他重新归附法蒂玛王朝，但仍然没有效果。最后，齐里王朝不得不于449/1057年放弃凯鲁万，逃往马赫迪亚，该地遂成为他这时已大大缩小了的国家的新都城。紧接着凯鲁万遭到巴努希拉尔部落的洗劫，从此永远未再恢复旧观。 333

当阿拉伯人侵入马格里布中部时，哈马德王朝也逐渐卷入了父系氏族群体间的复杂角逐。该王朝企图从其同族齐里王朝的困境中捞取一些好处，他们利用巴努希拉尔人中的一派作为辅助，进攻伊弗里基亚，从而造成进一步的破坏。457/1065年，哈马德王朝的纳西尔领导一个由柏柏尔人和巴努希拉尔部族结成的大联盟（桑哈贾人、扎纳塔人以及希拉尔部族中的阿思巴吉和阿迪两个支系）与其他阿拉伯部族（里亚赫人、祖格巴人和巴努苏莱姆人）作战，结果在萨比巴受到重挫。虽然直接的后果没有象齐里王朝在海达兰战役失败后那么惨重，但巴努希拉尔人的控制越来越紧，以致纳西尔不得不放弃都城巴努－哈马德堡，迁往他不久前刚建立的贝贾亚（布日伊），把他领土的南部留给游牧民。于是，贝贾亚就成了哈马德王朝的新都，半个世纪后象马赫迪亚一样落入了阿尔莫哈德人手中。与此同时，阿拉伯游牧民连同他们的家属和畜群占领了伊弗里基亚和马格里布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无数各自为政的君主国，结果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与齐里王朝和哈马德王朝的残部之间，以及与在这片废墟上出现的其他小国之间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从而使普遍的混乱状态更加严重，经济生活每况愈下。一直到6/12世纪中叶阿尔莫哈德王朝恢复秩序之前，巴努希拉尔人对那个地方的控制一直没有受到挑战。

简而言之，这些就是当时或后来阿拉伯文献中叙述的有关希拉尔部族迁徙时的情况。在这些文献中，伊本·哈勒敦是第一个强调贝都因人破坏作用的人，他把他们比作"漫天飞过的大群饥饿的蝗虫。"[30] 近代历史学家大致上都同意伊本·哈勒敦的看法，

[29] 参阅M.布雷特（M. Brett），1975年。
[30] 伊本·哈勒敦，1925－1956年，第2卷，第35页。

更进一步强调阿拉伯游牧民的到来所起的破坏作用，将其称之为“希拉尔大灾难”，并着重指出这一事件对北非历史造成的各种有害的后果。

近年来，有人试图修改关于希拉尔大灾难的说法，改变对某些有关问题的观点。例如，现在有人认为阿拉伯游牧民的人数并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的入侵造成的破坏并没334有那么大，而在他们来到以前就已有迹象表明北非的经济和社会日趋衰落。㉛ 此外，现代还有人认为阿拉伯人从埃及迁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经济形势（穆斯坦西尔在位时期发生了灾难性的饥荒），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㉜ 争论有助于澄清许多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关于希拉尔人是衰落的唯一罪魁祸首的片面看法。

但仍应强调指出，大批阿拉伯游牧民——不论其确切数字有多少——的来到，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北非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尽管阿拉伯化的过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起码在伊弗里基亚是如此，但乡村的大部分地区仍然由讲柏柏尔语的人居住和耕种。2/8世纪第一次征服时来的阿拉伯人已经被柏柏尔人所同化，而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则开始了一个相反的过程，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有意实行这种政策，而是由于定居民与游牧民之间生活方式不同必然要发生的后果。一些扎纳塔部族——特别是巴努马林人——被迫向西退却，为阿拉伯人腾出地盘。虽然阿拉伯人既未进入沿海地区，也未进入成为定居柏柏尔人逃难地的大山区，但马格里布东半部的平原地区逐步落入他们的势力范围。今天大部分北非农村阿拉伯方言都来源于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带来的游牧民土话。对比起来，他们对伊斯兰化所起的作用则微不足道，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影响，因为游牧民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很肤浅，而且他们侵入地区的全部居民，几个世纪以来早已都是穆斯林。

至于讲到他们的来到所造成的危害，一般都认为是很大的，即使“大灾难”的提法可能有些夸大其词。毫无疑问成千上万游牧民以及他们的畜群的出现，肯定会对当地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放牧地区肯定会扩大，从而损害耕地。以前北非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的平衡状态，就这样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被打破了，结果农民放弃了许多地区的肥沃土地，而把它们留给贝都因人。

尽管齐里王朝和后来哈马德王朝的崩溃而必然造成的混乱状态，也许不至于象伊本·哈勒敦所描述的那样普遍，因为许多阿拉伯首领创建了自己的小型国家，建立起某种秩序，但是，必须牢记，由于太多的各自为政和不受约束的阿拉伯部族的存在，安全普遍没有保障。

虽然凯鲁万以及其他城市由于阿拉伯人征服而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但更加致命的335则是在对外关系方面受到的影响，因为这种关系要根据行踪不定的游牧民的变化无常的态度而定。内地城市的衰落比其他地方更快，在凯鲁万注定失去了它以前的大部分重要性时，巴努－哈马德城堡则渐渐地根本消失了。混乱状态返过来又波及埃及，来自昔兰尼加的莱瓦特人劫掠了埃及的西部和北部，并蹂躏了尼罗河三角洲。

㉛ 参阅争论双方的著作，一方有C.庞塞特（C. Poncet），1954、1967年；另一方有H. R.伊德里斯，1968年(a)，1968年(b)，和C.卡亨，1968年。

㉜ 参阅R.达格福斯（R. Daghfus）最近的研究著作，1981年。

因游牧民而大为加剧的混乱状态的主要受害者是齐里和哈马德两个埃米尔国，最后他们只能苟延残喘于马赫迪亚和贝贾亚（布日伊）周围的沿海地带。阿拉伯游牧民在内地的步步推进，促使桑哈贾族柏柏尔人向沿海方向转移，并且加大了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齐里和哈马德两个埃米尔国的废墟上，海盗猖獗。贝贾亚所处的位置比马赫迪亚优越（马赫迪亚缺乏造船用的木材），成为与地中海沿岸其他地方、主要是与意大利各城市，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的一个中心。在6/12世纪初，哈马德人征服并统治杰尔巴岛。

北非原有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即使我们现在把原因说成是希拉尔人“渗入”，而不把它说成是“入侵”，后果也还是一样严重。马格里布东部条件优越的定居和农业经济逐步让位给以游牧和畜牧占优势的经济，对于这一真正根本性的变化，巴克里和伊德里西的著作中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此外，东部发生这些深刻变化的时间，与马格里布西部地区受到另一游牧部族阿尔莫拉维德人强大影响恰好同时。这两方面的事态发展揭开了马格里布历史的新篇章。

13 阿尔莫拉维德

I. 赫尔贝克
J. 德 维 斯

336 就在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开始从东面渗入北非的同时，[1]在马格里布的另一端开始出现撒哈拉柏柏尔人创建的运动，不久便侵入该地区的西部和中部。阿尔莫拉维德人从西部和希拉尔人从东部同时掀起的这两个运动，表现出游牧部族的巨大活力，两者都导致游牧民暂时对定居社会的统治，并建立了国家机构。似乎正是阿尔莫拉维德人和希拉尔人的事例，导致伟大的马格里布史学家伊本·哈勒敦产生了游牧民在军事上比定居民占优势的看法；这个观点成为他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石之一。

阿尔莫拉维德运动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背景

关于阿尔莫拉维德运动的开端，一般公认的说法是，撒哈拉西部的朱达拉柏柏尔人的领袖之一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在麦加朝圣返回途中，请求凯鲁万著名的马立克学派法学家阿布·伊姆兰·法西（430/1039年逝世）[2]派人同他一起去引导他的人民信奉真正的伊斯兰教，因为他的人民对此十分无知。由于阿布·伊姆兰·法西未能在凯鲁万物色到愿意前往沙漠地区同尚未开化的桑哈贾人生活在一起的恰当人选，他建议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到锡吉勒马萨附近的马尔库斯找他以前的学生瓦贾杰·伊本·扎卢·拉姆蒂，请他给予帮助。瓦贾杰遂推荐他的弟子、很有作为的传教士阿布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后者的母亲原是撒哈拉地方的人。[3]

由卡迪·伊亚德（544/1149年逝世）和伊本·阿西尔（630/1233年逝世）保留下来的另一种传说则既没有提到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也没有提到阿布·伊姆兰·法西，而是说另一位朱达拉族朝圣者贾瓦尔·伊本·萨卡姆在从麦加返回途中，直接请求瓦贾杰推荐一个人来引导他的人民信奉伊斯兰教义和并遵循伊斯兰礼拜仪式。

---

[1] 参阅本书第12章。

[2] 关于阿布·伊姆兰·法西，参阅H. R. 伊德里斯（H. R. Idris），1955年，第54页；关于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访问的时间当在阿布·伊姆兰·法西去世之前。伊本·伊达里（Ibn 'Idhārī）所说的年份是444/1052－3年，见1948－1951年，第3卷，第242页；《有装饰的外衣》（*Al－Hulal al－Mawshiyya*）所说的年份是440/1048－1049年，见1936年，第9页；J. M. 库奥克（J. M. Cuoq），1975年，第365页；N. 莱维蔡恩（N. Levtzion）和J. F. P. 霍普金斯（J. F. P. Hopkins），1981年，第311页，所说的年份有误。

[3] 巴克里（al－Bakrī），1913年，第165页，V. 蒙泰伊（V. Monteil），1968年，第59－60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87页；N. 莱维蔡恩和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71页。

瓦贾杰以前已在苏斯修建了一所房屋，用于学习和静修，称做“隐修士（穆拉比廷）学馆”（*dār al-murābitīn*）。瓦贾杰在这个“学馆”的成员中挑选了“一个博学而虔诚的人”阿卜杜拉·伊本·亚辛。[4]

尽管以上史料内容各有出入，但下列事实却是无可争议的：

(1) 西部撒哈拉桑哈贾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停留在表面。

(2) 朱达拉族的某些精神人物具有改进这种局面的愿望。

(3) 朝圣对这些人产生影响，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同胞对伊斯兰教理解不深，伊斯兰教在他们的同胞中普及不足。

(4) 阿布·伊姆兰·法西、瓦贾杰·伊本·扎卢·拉姆蒂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之间的联系，说明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和尚武好斗的马立克教义之间关系密切。

以上各点说明宗教因素对阿尔莫拉维德运动的兴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每一个宗教运动都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并反映社会环境的各种紧迫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就必须对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以便尽可能地确定这一运动的真正目的和起因。[5]

5/11世纪前半叶，摩洛哥及其以南远至塞内加尔河流域，居住的柏柏尔人分裂成许多互相敌对和厮杀的派别。摩洛哥本身在前一世纪是西班牙伍麦叶王朝与法蒂玛王朝两个大国争夺的目标。这两个王朝只是偶尔直接进行干预，让它们各自的柏柏尔盟友实地相互厮杀；除某些例外，一般是扎纳塔部族代表伍麦叶王朝，而法蒂玛王朝（特别在都城由伊弗里基亚迁到埃及之后）则由桑哈贾人组成的齐里王朝充当其副手和代理人。[6]这场争斗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控制通往西苏丹的商路和（或）控制这一地区的黄金贸易。西班牙伍麦叶哈里发国家的瓦解，并没有使争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减弱，因为位于摩洛哥的各个扎纳塔族君主国为了本身的利益不仅继续与齐里王朝作战，而且常常自相残杀。巴努-伊夫兰人已在萨勒和塔德莱奠定基业，而早在390/1000年就宣告脱离伍麦叶王朝而独立的马格拉瓦人则逐渐将他们的版图从非斯扩展到锡吉勒马萨、阿格马特、坦杜尔特和迄至那时为止一直由撒哈拉桑哈贾人控制的达拉干河地区。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使人们在扎纳塔人统治下已无法生活和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7]

339

---

④ 参阅H. T. 诺里斯（H. T. Norris），1971年，第255–256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125–126页；N. 莱维蔡恩和J. F. R. 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01–103页。

⑤ 有些现代学者往往缩小这个运动的宗教因素，把它仅仅说成是游牧部族与定居部族之间，或柏柏尔人不同部族之间因物质利益而引起的冲突。参阅A. 贝尔（A. Bel），1903年，第vii页；H. 泰拉斯（H. Terrasse），1949–1950年，第1卷，第217及随后诸页，维拉（Vilá），1956年，第57页；相反的观点参阅P. F.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P. F. de Moraes Farias），1967年，第798页和H. T. 诺里斯，1971年，第267–268页。本章力求全面考虑该运动的各个方面，并把它们作为互相联系的因素而作出辩证的解释。

⑥ 参阅本书第12章。

⑦ 伊本·阿比·扎尔（Ibn Abi Zar'），1843–1846年，第1卷，第71–72页详述了5/11世纪3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政治和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形。伊本·伊达里，1948–1951年，第4卷，第10页（N. 莱维蔡恩和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219和随后各页）叙述：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从安达卢斯经摩洛哥返程中，惊讶地看到该地分裂成许许多多互相敌对的父系氏族群体，柏柏尔人的情况也同安达卢斯的穆斯林诸小国差不多，如果不是更坏的话。当他问一个马斯穆达人这些人是否信奉上帝和穆罕默德时，那人回答说：“是的，但是我们谁也不会容忍一个来自外族的人骑在自己头上。”

看来，柏柏尔人的特殊神宠论也正好在这时达到顶点；一些有责任感的部落酋长和领导人感到非进行剧烈变革不可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有伊斯兰运动才能够在柏柏尔人中间提供促成统一的因素。

在摩洛哥以南，"蒙上面纱的"（*mulaththamūn*）撒哈拉桑哈贾部族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部分桑哈贾游牧民（不同于伊弗里基亚的桑哈贾定居者）由3个主要的支系组成：北部和东部（达拉干河、豪德、塔加扎）的马苏法族；中部和南部（阿德拉尔和塔甘特）的兰图纳族；西部大西洋沿岸撒哈拉的朱达拉族（又叫古达拉族）。⑧迄至4/10世纪初，西部撒哈拉的柏柏尔人被称为安比亚人，⑨它究竟是这3个主要支系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的名称，⑩抑或是它们之中某一支系的别名，现在尚无法确定。

伊本·豪卡勒和巴克里提出充分证据，在4/10世纪时曾出现某些尝试力图统一桑哈贾部族，目的大概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商路，或者是在苏丹地区推行征服政策；两人都提到一个名叫廷－巴鲁坦（或廷－亚鲁坦）的人，在340/951年与350/961年间是"全体桑哈贾人之王"或"奥胡达古斯特的统治者"。⑪虽然这两位作家都没有提到廷－巴鲁坦属于桑哈贾部族的哪个支系，但看来他可能是兰图纳人。⑫对这个联盟的性质和规模，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作过阐述，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所有桑哈贾部族的3个主要支系都加入了联盟。

340

按照较晚时期的作家伊本·阿比·扎尔（写于约726/1326年）的说法，西部撒哈拉的桑哈贾部族在此之后出现了长时期的分裂、骚动和混乱，他们无法就哪一个单一的统治者掌权达成一致意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们一致拥戴埃米尔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通常被人们称为塔拉什纳·兰图尼）作为他们的领袖才告一段落。⑬巴克里提到一个叫塔拉斯纳（或塔拉什纳）·兰图尼的人是兰图纳族的首领，此人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兴起之前不久，同黑人作战中死于苏丹某地。⑭他死后由他的女婿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朱达利继任为桑哈贾部族的统治者，就是他推荐阿卜杜拉·伊本·亚辛来到桑哈贾人中间。⑮

这种叙述虽然令人怀疑是后人为了试图理顺桑哈贾部族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以前的

---

⑧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925－1956年，第2卷，第64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332页；N. 莱维蔡恩和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27页列举7个桑哈贾部族：朱达拉族、兰图纳族、马苏法族、瓦齐拉族、塔尔加族、扎加瓦族和拉姆塔族，但认为只有前3个是"桑哈贾族"，其余的是"他们的兄弟部族"。

⑨　对此名称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

⑩　这是J. 马夸特（J. Marquart）的见解，1913年，第325页。

⑪　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1938年，第100－101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73－74页；巴克里，1913年，第159页；V. 蒙泰伊，1968年，第53页（最后这位作者把年代误认为是公元961和971年）。

⑫　他同黑人地区（Bilad al－Sūdān）关系密切，而且被称为"奥胡达古斯特的统治者"，这说明他同兰图纳部族一样，是以撒哈拉沙漠南部为基地的。

⑬　伊本·阿比·扎尔，1843－1846年，第1卷，第76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231页。在伊本·哈勒敦，1925－1956年，第1卷，第236页和J. M. 库奥克，1975年，第333页中也加以引用。

⑭　巴克里，1913年，第164页；V. 蒙泰伊，1968年，第59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86页。

⑮　伊本·阿比·扎尔，1843－1846年，第1卷，第76页指出从廷－巴鲁坦到塔拉什纳·兰图尼，中间相隔有120年，这段时间看来是太长了。巴克里没有指明年代。

历史而编造的说法，[16] 但一般说来，它反映了摩洛哥以南地区一度出现的混乱状态。在摩洛哥，继桑哈贾部族各支系短时期统一之后，出现了分裂、敌对和激烈战争的局面。没有一个联盟能够在撒哈拉保持高于一切的地位，其领导集团频繁更迭。[17]

桑哈贾人各部族之间的这种局势，对他们的经济繁荣不无影响。虽然游牧是大部分撒哈拉桑哈贾人的生活方式，而参与经过他们地域的马格里布与苏丹地区之间的商队贸易，也能使他们得到乐于接受的额外收入。他们的头领通过控制商路和贸易中心，也能从征税、收费和因提供保护或服务而收取的礼物中得到许多好处。

在4/1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上半期之前，桑哈贾部族联盟在廷－巴鲁坦强有力的领导下，控制了十分重要的奥利尔盐矿，垄断了经过奥胡达古斯特运往加纳的食盐贸易。虽然根据考古方面的资料，奥胡达古斯特城当时尚未达到其最繁荣时期，但它已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由桑哈贾部族的首领统治，大部分居民是桑哈贾人。[18] 但是，360/970年以后，奥胡达古斯特的贸易开始被扎纳塔人和伊弗里基亚的阿拉伯商人所垄断。这一变化怎样发生尚不完全清楚，但是到446/1054年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征服奥胡达古斯特时，桑哈贾部族已经几乎完全被排斥于有利可图的贸易之外。对桑哈贾人繁荣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在坦廷塔尔（塔加扎）开办一处新盐矿，开始向加纳和苏丹地区其他地方供应这种珍贵的商品，从而打破了奥利尔盐矿的垄断地位。 **341**

4/10世纪末和5/11世纪初桑哈贾部族力量的削弱，使锡吉勒马萨的马格拉瓦柏柏尔人得以控制并占领达拉干河地区阿格马特和坦杜尔特广袤的牧场，这些牧场对北方桑哈贾各部族的游牧经济是至关重要的。[19]

这样，在5/11世纪上半叶，西部撒哈拉的桑哈贾部族已丧失了他们过去在北方和南方的优势地位；那里，他们的宿敌扎纳塔柏柏尔人不仅接管了穿越撒哈拉的各条商路的终端（锡吉勒马萨和奥胡达古斯特），而且接管了他们最丰腴的牧场。

下面，让我们再考察一下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崛起前夕流行于伊斯兰世界最西部地区的宗教情况，就会发现不仅有各种各样异端教派，而且伊斯兰化的程度也参差不齐，沙漠和山区的柏柏尔人对伊斯兰教的主要教义只有极肤浅的认识，而在一些城镇和地区，则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伊斯兰教机构。

在异端教派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巴尔加瓦塔人的教派。巴尔加瓦塔人是居住在摩洛哥大西洋沿岸平原萨勒和萨菲之间地区的柏柏尔部族。他们的宗教早在2/8世纪时即已创建，其创始人是一个名叫萨利赫的"先知"。他用柏柏尔文出了一部《古兰经》，并提出了一些教义，把古老的柏柏尔人信仰同伊斯兰教的成分揉合在一起。虽然伊德里斯、伍麦叶和法蒂玛诸王朝有时也曾试图消灭这一异端，但它们始终未能打败巴尔加瓦塔人；为了抵制他们对"伊斯兰地区"（*Bilād al－Islam*）的入侵而进行"圣战"，成为在

---

⑯ 参阅N. 莱维蔡恩，1978年，第653－655页，1979年，第90页。

⑰ 根据摩尔人的传说，在过去3个世纪中，西部撒哈拉大约曾出现过16个这样的联盟；F. 德－拉－夏佩勒（F. de la Chapelle），1930年，第48页。

⑱ 参阅J. 德维斯（J. Devisse），1970年，第121－122页。

⑲ 伊本·哈勒敦，1925－1956年，第1卷，第257页。

萨勒建立的“里巴特”（隐修所，*ribāt*）居民长期固定的义务。[20]

在摩洛哥南部，在苏斯地区，在阿特拉斯山脉，以及在达拉河谷，居住着各种名目的什叶派群体。但柏柏尔人中最重要的非正统教派乃是哈列哲教派，特别是其中的易巴德派[21]。虽然在法蒂玛王朝掌权和阿布·亚齐德在伊弗里基亚叛乱失败后，哈列哲教派在地中海马格里布的政治作用有所降低，不过他们在撒哈拉和苏丹地区仍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他们的商人和传教士。[22] 由于某种原因，易巴德派的教义对扎纳塔柏柏尔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而桑哈贾人则倾向于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和后来以马立克学派形式出现的逊尼派伊斯兰教。

342

所有关于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兴起的早期阿拉伯文献都一致认为撒哈拉人的伊斯兰化只是表面现象，强调他们对宗教无知并且漠视。当然，在酋长和领导人中有些人对伊斯兰教还是有着比较深厚渊博的知识，有些人曾到麦加朝圣，甚至有些宗教法理学家曾致力于改进他们同胞的宗教状况。在摩洛哥南部存在几个战斗性很强的马立克学派的小据点，如瓦贾杰·伊本·扎卢·拉姆蒂创建的“隐修士（穆拉比廷）学馆”，但在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出现之前，他们的努力似乎并没有使情况得到任何明显的改进。

众所周知，麦加朝圣和途经比较先进的穆斯林国家的旅行，使来自伊斯兰边缘区域的虔诚的访问者们在扩大宗教和文化眼界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朝圣者意识到他们自己同胞信奉的那种肤浅的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区所信奉的真正伊斯兰教有着深刻的差别。[23] 在整个伊斯兰教史中，马格里布、撒哈拉和苏丹地区的一些改革家或宗教复兴家都曾受到朝圣经验的激励。

5/11 世纪上半叶，在穆斯林世界中，西起马格里布、东至伊朗这一大片土地上，出现了正统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复兴。逊尼派的复兴，部分是由于什叶派各王朝（诸如法蒂玛和白益）企图将它们特殊的教义强加给他们统治下的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中原信奉逊尼派的居民，因而引起强烈的反抗而造成的。[24] 在反对什叶派和其他离经叛道教派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北非的马立克学派宗教法理学家，特别是那些来自古老的马立克学派据点凯鲁万的宗教法理学家们，发挥了突出的作用。[25] 马立克学派宗教家们鼓动齐里王朝脱离法蒂玛王朝的势力范围，承认阿拔斯王朝是伊斯兰大家庭的最高首领；这些宗教法理学家还在伊弗里基亚煽动制定各种反什叶派的计划，其目的是在该地区消灭除他们自己教派以外的任何异端或任何其他伊斯兰教法学学派。[26] 凯鲁万的领袖人物之一和最活跃、最有战斗精神的马立克派代表人物正好就是 430/1038—9 年朱达拉部族首领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在凯鲁万会见的那位阿布·伊姆兰·法西。

---

[20] 参阅 R. 勒-图尔诺（R. Le Tourneau），1958 年，和本书第 3 章。

[21] 参阅本书第 10、11、12 章。

[22] 参阅本书第 3 章和第 11 章。

[23] 参阅本书第 8 章注 94。

[24] 参阅本书第 2 章。

[25] 关于马立克学派在伊弗里基亚的情况，参阅 H. R. 伊德里斯，1955 年和 1972 年；H. 莫纳（H. Monès），1972 年。

[26] “440/1048 年标志着马立克学派在穆斯林世界西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E. 莱维-普罗旺卡（E. Lévi-Provençal），1948 年，第 251 页。

伊本·亚辛改革活动的开始

343

关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被派往撒哈拉桑哈贾部族之前的经历，我们知之甚少。他出身于摩洛哥南部一个柏柏尔人部族——贾祖拉。他的母亲原籍是与加纳接壤的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塔马马努特。[27] 后来有些史料说他曾在穆斯林西班牙求学7年，[28] 但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巴克里对他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方面的造诣表示严重怀疑。[29] 甚至他在瓦贾杰的"隐修士（穆拉比廷）学馆"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也并不十分清楚；他对作为该学馆负责人和精神领袖的瓦贾杰看来一直很顺从，直到后者去世。这表明他只居于从属的地位。而另一方面，瓦贾杰既然选择他前往桑哈贾部族传教，想必是基于承认他有优秀的宗教知识和坚毅的性格力量。[30]

人们对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在桑哈贾部族中进行改革的历史只知道一般情况；在年代次序上不确切而且很混乱，起码有两个很长的时期（一是430/1039年至440/1048年之间，二是446/1054年至450/1058年之间）我们得不到任何具体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在撒哈拉沙漠的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他设法改进或改革朱达拉部族的信仰，并成功地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追随者，这一阶段大致从430/1039年到445/1053年，但以这位改革者与朱达拉部族领袖们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而告终，结果阿卜杜拉·伊本·亚辛遭驱逐。第二阶段一直到451/1059年他去世为止。在这个阶段兰图纳族成为阿尔莫拉维德运动的主力。

最初，由于有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的保护，一切进行得比较顺利；按卡迪·伊亚德的说法：

> 他让（易卜拉欣）及其人民了解他的生活准则和他的理想……他要求并强制实行严厉的教规，改变不合教法的惯例，严厉惩罚那些拒绝接受正确的指导路线的人。他在那些父系氏族群体（"卡比拉"）中继续受到善意的接待，直到他在他们中间居于支配地位，使他们宣布遵奉真正的信仰。[31]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文献史料只记下两件事：一件是对兰图纳人的进攻，在他们居住的山区（阿德拉尔）把他们打败；另一件是建立阿拉特－恩－安纳城，按照阿卜杜拉·伊本·亚辛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有房屋的高度应该相同。[32] 344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在朱达拉族中居住了10多年后，与宗教法理学家贾瓦尔·伊

㉗ 巴克里，1913年，第165页。

㉘ 伊本·伊达里，1967年，第4卷，第9－10页；《有装饰的外衣》一书，1936年，第10页。

㉙ 巴克里，1913年，第169－170页。但不应忘记这位作者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安达卢西亚学者，对粗鲁的撒哈拉柏柏尔人带有偏见。

㉚ 卡迪·伊亚德（Kādī 'Iyad），引自H. T. 诺里斯，1971年，第256页："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被公认为博学而虔诚的人。"

㉛ 参阅H. T. 诺里斯，1971年，第256页。其他史料说法相同。

㉜ 巴克里，1913年，第165页。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阿拉特－恩－安纳即现在的阿拉坦（位于毛里塔尼亚东部提希特和瓦拉塔之间的一处水泉），但有的考古发现否定了这一假设。参阅D. 雅克－默尼耶（D. Jacques－Meunier），1961年。阿拉坦是一个在许多地方广泛采用的地名，参阅H. T. 诺里斯，1971年，第258页。

本·萨卡姆和两个朱达拉贵族（阿亚尔和因·塔库）发生冲突。这次分裂的原因既是宗教方面的分歧，又是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朱达利死后发生的争夺权力的斗争。[33]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严格要求遵守教规和遵循一切宗教仪式，以及他清教徒式的平均主义思想，似乎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响应，他是一位严厉的宗教领袖，不尊重桑哈贾社会通行的社会准则和戒律。在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死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他显然站在一个遭到失败的王位争夺者一边，[34] 因而被迫离开了他在阿拉特-恩-安纳的宅邸。[35] 整个事件说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掌握的权力有限，不允许他实施自己的意愿。

在这场危机期间和危机以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得到他的老师瓦贾杰的全力支持。瓦贾杰虽然不赞成他这位学生那种极端的主张和过度的杀戮，但还是支持他并书写了一道戒令，申斥一切表示不服从的人。他再次将阿卜杜拉·伊本·亚辛派往桑哈贾部族，这次是派往叶海亚·伊本·奥马尔领导下的兰图纳部族，就是在兰图纳人中间，阿卜杜拉·伊本·亚辛找到了实现他目标所必要的政治支持，这在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也是兰图纳人之所以居于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都发生在447/1055年以前，当时在朱达拉人和兰图纳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严重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大概是由于对该运动的未来方向应采取政策的分歧引起的。[36]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的遭驱逐和卷土重来，可以看作是一种希吉拉（hidjra），我们可以从他的许多活动中看到他把早期伊斯兰习俗再次制订成法规。这种宗教复兴的一个方面是改革传统的柏柏尔军事战术，以便恢复原来进行“圣战”的方式。[37]

345

改革运动转化成为“圣战”

兰图纳人在这个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经常被认为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杰出代表。在我们继续论述这一运动的历史之前，应当先探讨一下阿尔莫拉维德（阿拉伯文：穆拉比顿 *al-Murābitun*）这一名称的由来。

到最近为止，人们认为这个词来源于“里巴特”或“拉比塔”（*ribāt* 或 *rābita*、*al-Murābitun* 即“里巴特的人”）。“里巴特”的含义一般认为是“设防边境或海岸哨所”或“进行宗教和苦修活动和（或）传播信仰的设防中心”。这种解释所依据的只是较晚的阿拉伯作家伊本·阿比·扎尔（726/1326年后逝世）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阿卜

---

[33] 这位将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带到撒哈拉桑哈贾部族的人的情况如何，无法确知。有些历史学家说，在朱达拉人驱逐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之前他已经死去，另外一些人则说，他是在“退居海岛”之前死去的。参阅后文。

[34] A. M. 阿巴迪（A. M. al-'Abbādi），1960年，第149页；H. T. 诺里斯，1971年，第260—262页。

[35] 巴克里，1913年，第165页。“他们（朱达拉人）拒绝听取他的意见，取消对他的财务资助，拆毁了他的房屋，抢走了房内的家具和内中贮存的财物。

[36] J. 德维斯，1970年，第115页，注10。

[37] 这方面情况的透彻分析，请参阅P.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1967年，第811—817页，和H. T. 诺里斯的一些论述，1971年，第266页，注45。

杜拉·伊本·亚辛同朱达拉人闹翻后，退居一个海岛，在那里，他同7个伙伴修建了一座“里巴特”，后来他在这个地方又培养了许多门徒，由于这些门徒都忠于这个“里巴特”，所以就称他们为“穆拉比顿”。[38] 伊本·哈勒敦（808/1406年逝世）也说到阿卜杜拉·伊本·亚辛退居海岛一事，但丝毫没有提及具有堡垒或隐修所意义的“里巴特”。[39] 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更早的史料提及类似的建筑，P.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正确地指出“人们感到奇怪，为什么伊本·阿比·扎尔的说法竟然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而没有提出怀疑。”[40]

以 A.M. 阿巴迪、A. 维西·米兰达、P.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H.T. 诺里斯、A. 诺特、N. 莱维蔡恩和 F. 迈耶为代表的最近研究成果，[41] 明确否定了认为“穆拉比顿”意为“里巴特的人”这种见解。这一名称似乎来源于《古兰经》中词根 *r－b－t*，它非常接近于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吉哈德”（圣战）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包含虔诚的行为和献身于伊斯兰事业的意思。“里巴特”也可能是概括说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为桑哈贾人制定的全套伊斯兰教义（*da ʻwat al－hakk*，“听从真理的召唤”）。[42] “穆拉比顿”（*al－Murābiṭūn*）这个名称也可能因瓦贾杰创立的“穆拉比廷学馆”（*dār al－murābitīn*）有某种联系，因为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在前往桑哈贾人中传教以前曾在这里住过。

最后证明根本没有设在一个海岛上的“里巴特”（设防哨所）的是“黑非洲基础研究所”1966年派往毛里塔尼亚海岸附近提德拉岛的一个考古队，他们在这个岛上找不到任何“里巴特”的遗迹。由于岛上没有粘土和石头，修建任何像伊本·阿比·扎尔所说的那种建筑物，在物质条件上是不可能的。[43] 另一方面，把伊本·阿比·扎尔的叙述和在提德拉岛上的现场发掘工作中获得的结果相对照，关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和他早年的追随者退居海岛的说法，却并非没有可能。因此，伊本·哈勒敦关于第一批阿尔莫拉维德人在丛林中生活情况的描述，不能完全否定。 **346**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退居海岛——有意识地仿效先知穆罕默德的“希吉拉”——的年代很难确定；它很可能是发生在444/1052－1053年以前，因为此后不出一年，阿卜杜拉·伊本·亚辛的追随者们袭击过锡吉勒马萨城。当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从退居的海岛重新出来，并在兰图纳人中，特别在以叶海亚·伊本·奥马尔及其兄

---

[38] 伊本·阿比·扎尔，1843－1846年，第1卷，第79页；参阅 A. 维西·米兰达（A. Huici Miranda）对该资料的批评，1959年（a），第155及随后诸页；1960年，第513及随后诸页。

[39] 伊本·哈勒敦，1925－1956年，第1卷，第238页；该书内容表明，这个群体的成员居住在天然丛林环境中，并没有修建任何像“里巴特”或“拉比塔”之类的建筑。

[40] P.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1967年，第805页。

[41] 参阅参考书目。

[42] *rabata* 的原意是“捆绑”、“束扎”；*ribāt* 的原意是“带子”、“绑扎带”；*rābita* 的原意是“绑扎”、“纽带”、“连系”，后来也指“联邦”、“联盟”、“同盟”等。在语义上是如何发展为“设防的哨所”和所有类似意义的，P.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1967年，第813及随后诸页进行了探讨；F. 迈耶（F. Meier），1981年，第80及随后诸页有更详细的论述。

[43] 参阅 H. J. 于戈（H. J. Hugot），1966年，第555及随后诸页和1019及随后诸页；P.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1967年，第821－843页；A. 戈迪奥（A. Gaudio）的重述，1978年，第52－55页。

弟阿布·贝克尔为代表的主要家族中找到最忠实的追随者后，阿尔莫拉维德运动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从一个改革运动变成了一个有战斗精神的运动，其成员随时准备以劝导或"圣战"的方式在其他桑哈贾人中、或者甚至在桑哈贾部族以外传播阿卜杜拉·伊本·亚辛的教导。尽管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从一开始就要求他的运动具有超部族的性质，但穆拉比顿人一直依然是某几个柏柏尔部族的成员。领导权掌握在以叶海亚·伊本·奥马尔为首领的兰图纳人手中。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委派他作为埃米尔指挥军队。创始这个运动的其他支系，马苏法族和朱达拉族（至少在开始时）听从这个总指挥。各个部落的成员或多或少仍由他们传统的酋长来领导，仍然与以前一样是部落的战士，不过现在是在伊斯兰的旗帜下而已。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双重领导的格局，因为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不仅掌管全体的宗教和法律事务，而且掌管着公共财政，掌握着最高权柄，就连叶海亚·伊本·奥马尔也受他领导。[44] 他甚至亲自参加作战。

统一桑哈贾部族并非易事，阿卜杜拉·伊本·亚辛重返撒哈拉沙漠后被兰图纳族打败并被强制重新加入运动的朱达拉族，仍然持敌对态度，一有机会就想分裂出去。当阿尔莫拉维德军队的主力在摩洛哥南部作战之际，朱达拉人发动叛乱，叶海亚·伊本·奥马尔被派去对付他们，但显然未能取胜，因为他被朱达拉人包围在阿德拉尔的阿祖基（阿祖吉）。[45] 阿尔莫拉维德的第一任埃米尔于448/1056年在塔卜法里拉作战中阵亡。他的军队在该地虽然得到塔克鲁尔的首领拉比·伊本·沃尔－戴阿比的军队的增援，还是惨遭失败。[46] 阿尔莫拉维德人再没有试图攻击朱达拉人，但关系依然非常紧张。另一方面，这个部族的成员后来参加了阿尔莫拉维德人在马格里布的战役，因此朱达拉人也可算是真正的阿尔莫拉维德人。与马苏法族的关系则更加模糊：按照伊本·哈勒敦的说法，马苏法族与兰图纳族之间曾发生冲突，但似乎很快就解决了，在以后的事业中马苏法人和兰图纳人结成了牢固的联盟。至于柏柏尔人的其他部族，拉姆塔族在早期就投降，归附于阿尔莫拉维德的事业，甚至有些扎纳塔族人和马斯穆达族人也是如此。

尽管内部有许多纠纷和种种分裂倾向，但新生的政治－宗教体系和共同的利益给桑哈贾柏柏尔人带来了统一。他们之中居住在商路沿线的人，一心想重新控制这些商路和商业。加入联盟的北方父系氏族群体拉姆塔和贾祖拉[47]以及某些兰图纳人，则希望重新获得阿特拉斯山脉与撒哈拉沙漠之间富饶的牧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共同的敌人都是扎纳塔人。虽然扎纳塔人并不是全都信仰哈列哲教派的教义，他们中确有许多人是信仰该派的，而他们信奉异端教派，这也成为马立克学派阿尔莫拉维德人进攻他们的又一

---

[44] 巴克里，1913年，第166－167页。阿卜杜拉·伊本·亚辛曾命令鞭笞叶海亚·伊本·奥马尔，后者甚至在还不知道原因之前就甘受惩罚。

[45] 阿祖基距离阿塔尔大致15公里，根据巴克里的说法，阿祖基是叶海亚·伊本·奥马尔的兄弟扬努·伊本·奥马尔建立的。关于这个地方，可参阅B.赛松（B. Saison），1981年（图片13.1）。

[46] 巴克里，1913年，第167－168页。关于塔克鲁尔，可参阅A. R.巴（A. R. Ba），1984年。

[47] 作为该运动的精神领袖中，瓦贾杰属于拉姆塔族，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属于贾祖拉族。

个理由，在一定程度上，阿尔莫拉维德人的征服行动是撒哈拉沙漠桑哈贾人对扎纳塔人的报复，后者在前一时期曾在马格里布西部占了上风。对阿尔莫拉维德人最初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来说，摩洛哥在各个马格拉瓦人王朝统治下普遍近乎无政府状态，这一点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许多人因而把征服者阿尔莫拉维德人当作能使他们解脱马格拉瓦人压迫的救星来欢迎。㊽ 不到5年时间，即从446/1054年到451/1059年，阿尔莫拉维德人就打破了扎纳塔人在西北非的支配地位。最初几次战役是针对扎纳塔人在达拉河谷的统治，后来的目标则是锡吉勒马萨，因为该地的居民向阿卜杜拉·伊本·亚辛申诉马格拉瓦人统治者马苏德·伊本·瓦努丁的专制暴虐。在和平解决失败后，阿尔莫拉维德人占领了该城，杀死了马苏德·伊本·瓦努丁，在该地设置了他们自己的总督。阿尔莫拉维德军队就这样夺取了商队贸易线路的北端，然后又迅即回师向南，进攻奥胡达古斯特。在征服该地后，他们无情地屠杀城里的扎纳塔居民。于是穿越撒哈拉商路的第二个终端也落入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而也就控制了整个西部贸易。㊾

与此同时，锡吉勒马萨的居民显然对清教徒式的阿尔莫拉维德人实行的严酷统治强烈不满，起而反叛，杀戮了为数不多的驻军。必须再进行一次战役以恢复局势。在阿尔莫拉维德军队的主力离开期间，在南方又发生了前文所说的朱达拉人的分离，叶海亚·伊本·奥马尔也阵亡了。这时指挥北翼军队的阿布·贝克尔，在他兄弟叶海亚死后继任为新的埃米尔。他再次征服锡吉勒马萨和达拉河谷的牧场。 348

随后几年的事实证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不仅是一位宗教改革家和坚强的勇士，而且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阿特拉斯山区的马斯穆达柏柏尔人和平地归顺了他，同样，经过长期谈判，重要的城镇阿格马特以及整个苏斯地区也落入他的掌握中（450/1058年）。为了巩固新的联盟，阿布·贝克尔娶阿格马特首领的一个女儿扎奈布为妻，此举保证阿尔莫拉维德人得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摩洛哥南部的广大地区。不用说所有流行于摩洛哥这一地区的各种离经叛道的教派和异端宗教都被清除，到处都奉行阿尔莫拉维德形式的马立克学派。

但是在与反对正统教派最强大的敌人巴尔加瓦塔人的斗争中，阿尔莫拉维德人受到第一次严重挫折；451/1059年他们战败，阿卜杜拉·伊本·亚辛在库里法拉特附近的战斗中战死，死的经过情况不明。㊿ 继承他领导全体阿尔莫拉维德人的是阿布·贝克尔·伊本·奥马尔。

尽管创业者的去世曾引起暂时的危机（据记载这时马苏法人发动了叛乱），但整个运动并没有瓦解，不久反而出现新的甚至更大的活力，使之不仅继续胜利地传播新的教义，而且继续胜利地扩大版图，这说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所取得的成就是很稳固的。

㊽ 从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起，北非的马立克学派就扮演了被压迫人民斗士的角色；阿尔莫拉维德人至少在最初阶段也同样保守这一传统立场，由于他们废除了所有非法的（不属于教法规定的）税收，因而一时获得很大同情。

㊾ 关于这次征服活动及其对马格里布、撒哈拉和苏丹地区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参阅J. 德维斯，1970年，第152及随后诸页。

㊿ 巴克里，1913年，第168页。该地位于拉巴特以南约40公里处。

随着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之死，这个宗教社会转变成一个王国。因为精神上的领导作用已开始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51] 埃米尔的职位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占居这一高位的人便创立了一个王朝。与此同时出现了等级制度：王国的最高层是兰图纳人，即统治者所属的支系，阿尔莫拉维德人由此而常被称作“兰图纳－穆拉比顿人”（*al－Lamtūniyyūn al－murābiṭūn*），或者更简单地称为“兰图纳人”至于“穆拉比特”（*al－murābit*）的称号只限于对3个创建王朝的支系的成员适用，其他父系氏族群体的成员，诸如贾祖拉人、拉姆塔人、马斯穆达人以及其他在军队中服役的人，都不能算作是“穆拉比顿”，而只是“追随者”（*al－hasham*）。这种只限于创建王朝的支系享用称号的做法，标志着贵族阶层的兴起。

349

“蒙面纱者”（*al－mulaththamūn*）是阿尔莫拉维德人的又一称呼；它来源于撒哈拉沙漠的桑哈贾族蒙面纱的传统习俗。在穆斯林西班牙，蒙面纱被看成是真正的阿尔莫拉维德人的特权，除桑哈贾人外，一切人均禁止蒙面纱。[52] 它好像是统治阶级的制服和标志服饰一样。

阿布·贝克尔统治时期头10年（直到462/1069年）的历史含糊不清，对阿尔莫拉维德人在这段时间的活动也不知其详。[53] 大约需要一段长时间来巩固新的领导权力和克服在一个由具有强大的独立传统的部族刚刚组成的新联盟中自然会出现的各种危机。

350

随着463/1070年在阿特拉斯山脉以北建设马拉喀什作为新的都城，揭开了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历史的新篇章。[54] 这一年之所以意义重大，还在于这时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分裂成两翼，南方一翼由阿布·贝克尔领导；北方一翼以阿布·贝克尔的堂兄弟优素福·伊本·塔什芬为首领。[55]这次分裂是逐渐地、并不是有意识地形成的；甚至在马拉喀什的建设竣工之前，阿布·贝克尔就被请回撒哈拉沙漠，因为在那里兰图纳人与马苏法人发生了严重冲突，危及运动的团结。优素福·伊本·塔什芬成为他在北方的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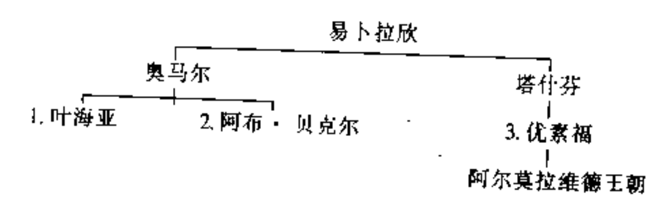
[51] 瓦贾杰·伊本·扎卢·拉姆蒂的另一伙伴苏莱曼·伊本·阿杜继阿卜杜拉·伊本·亚辛任宗教指挥官。当时还有另外一些法学家，诸如伊马姆·哈德拉米（阿祖基的执法官）或利姆塔德·兰图尼，但没有一个人具有运动创始人所具备的影响和地位。参阅H. T.诺里斯，1971年、第267－268页。

[52] 参阅E.莱维－普罗旺卡，1934年，第200－218页。关于撒哈拉沙漠柏柏尔人蒙面纱的起源和目的，有许多人进行了研究。参阅R.科尔索（R. Corso），1949年；J.尼古拉森（J. Nicolaisen），1963年； J. H.基南（J. H Keenan），1977年；H. T.诺里斯，1972年，第19－41页；F.迈耶，1981年、第143－163页。

[53] 即使同时代的人也对事态的发展知之甚少，巴克里说（1913年、第170页）“目前（即公元1067－1068年）……他们的权力已分散得支离破碎，他们住的地方在撒哈拉”，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54] 由于许多阿拉伯史料都说马拉喀什建立于454/1062年，所以这一年份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受，无人提出评论。E.莱维－普罗旺卡（1957年）、A.维西·米兰达（1956年b）和G 德弗敦（G. Deveraun，1959－1966年）以批判的态度考察了所有文献和考古发现，确定了这个新的年份。

[55] 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最初几位埃米尔的关系见下列世系简表：



表，任务是继续与扎纳塔人作战。[56] 在撒哈拉这一争执平息之后，阿布·贝克尔重返北方，再次领导整个运动。但在此期间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已巩固了他的地位，通过购买苏丹地区的黑奴和使用西班牙的基督徒俘虏，他的军队得到加强，这样就可以不必再单独依靠桑哈贾族战士。虽然名义上他仍承认阿布·贝克尔为他的上司，但他当然不准备把自己强有力的地位让给他的堂兄弟。出于种种原因，阿布·贝克尔不愿采取强制手段来恢复自己的权利，[57] 而是宽宏大量地把权力交给优素福·伊本·塔什芬。根据修正的年表，此事发生在465/1072年；然后阿布·贝克尔决然返回撒哈拉，以后再也没有重返北方。不过，他仍被承认为整个阿尔莫拉维德帝国的元首，直到480/1087年去世。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金币（第纳尔）在他去世前一直铸有阿布·贝克尔·伊本·奥马尔的名字，即使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在名义上也继续效忠于他。[58]

在北方的征服活动

351

从468/1075年到476/1083年，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率领的阿尔莫拉维德军队逐步征服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非斯于468/1075年落入他们手中，接着是大西洋沿岸平原上的其他城市。7年后他们征服了特莱姆森和奥兰；476/1083年，阿尔莫拉维德军队占领休达，从而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这样把穆斯林西班牙呈现在撒哈拉战士们的视界之内。

在西班牙，曾兴盛一时的伍麦叶哈里发国家在5/11世纪头几十年里已经四分五裂。从它的废墟上出现了成群小国，它们自相残杀，无力抵抗北方基督教国家企图征服它们的强有力的行动。不下20个这样的小国在各省或各城市出现，由埃米尔和小国王领导，他们被统称为“穆斯林诸小国”（*mulūk al-tawā'if*，西班牙语称 *reyes de taifas*）。

基督教国家的进攻，以478/1085年占领托莱多（阿拉伯语称图莱图拉）而达到顶点，人们明显可以看出基督教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于强迫这些“穆斯林诸小国”称臣纳贡，而是要完全吞并它。穆斯林法学家们对这种要从安达卢斯根除伊斯兰教及其文明的威胁感到惊恐。由于各穆斯林小国王根本无力认真地抵御基督教势力的进攻，只有从国外求援乃是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有能力完成这一使命的力量唯有阿尔莫拉维德人，因为他们锐气方盛，并以献身于“圣战”的宗教团体著称。应塞维利亚的阿巴迪王朝统治者穆塔米德之请，阿尔莫拉维德军队由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率领于

---

[56] 与此同时，阿布·贝克尔与扎奈布离婚，后者再嫁给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给他带来大量财富。

[57] 他本人声称，他不能离开沙漠而生活，参阅《有装饰的外衣》一书，1936年，第15页。虽然对游牧生活方式的依恋无疑对阿布·贝克尔的决定起了作用，但不应忘记，他的军事力量要比他的堂兄弟的军事力量弱得多。

[58]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的名字是在480/1087年以后才出现在硬币上的，这时他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唯一的统治者。

479/1086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59] 在西班牙南部进军未遇抵抗。接着，阿尔莫拉维德军队在巴达霍斯附近的扎拉卡（萨格拉贾斯）重创国王阿方索六世指挥的卡斯提尔军。[60] 整个安达卢斯一片欢腾，优素福·伊本·塔什芬按照他以前的诺言回师摩洛哥。一年后，阿布·贝克尔去世，他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也成为帝国的君主

但穆斯林西班牙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远没有彻底解决。优素福·伊本·塔什芬撤军后不久，诸小国王之间倾轧又起，招致基督教势力的再次进攻。阿尔莫拉维德人再次应邀进行干预，于481/1088年在阿莱多战役中又获胜利，尽管如此，"穆斯林诸小国"却对他们的救命恩人公开表现出敌意，毫无感恩之意，因为他们害怕优素福·伊本·塔什芬不亚于害怕他们的基督教仇敌，于是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再次离开安达卢斯。

354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对此实在是忍无可忍，遂于483/1090年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不再是以盟友而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他掌握大量摩洛哥和安达卢西亚宗教法理学家签署的宗教法律裁决（*fatwā*）作为武器，[61] 以此对付"穆斯林诸小国"，与之作战；这些小国国王被指控犯有各种反伊斯兰的罪行，诸如与基督教势力勾结、贪污腐化、非法征税等。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战役，阿尔莫拉维德军队征服或占领了所有主要城市，到487/1094年，整个穆斯林西班牙除托莱多和萨拉戈萨外，均被兼并。托莱多仍控制在基督教势力手中；萨拉戈萨的巴努胡德王朝则被允许继续存在，作为缓冲国。所有原来的穆斯林统治者均被罢黜，[62] 穆斯林西班牙又恢复了统一，但这次是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治之下。[63]

在东面，阿尔莫拉维德人的征服仅仅达到阿尔及尔城和其邻近地区。他们为什么到了该地就停顿下来，不再继续东进深入伊弗里基亚从而统一整个马格里布，原因至今仍没法弄清楚。然而，他们确实没有与当时游牧于伊弗里基亚更南部地区和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希拉尔阿拉伯人发生冲突。虽然阿尔及利亚中部哈马德王朝统治下的国家曾对阿尔莫拉维德人的进军进行过抵抗，在特莱姆森周围甚至还发生了战斗，而且胜者是哈马德人，看来阿尔莫拉维德人似乎不愿大力进攻同属桑哈贾部族一个支系的人。更大的最可能性大概是穆斯林西班牙的局势每况愈下，越来越使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里；由于他有限的人力不足以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加上他意识到阿尔莫拉维德人作为伊斯兰战士的名声必须保持，因此他决定集中力量对付基督教势力。

一个原来只不过是撒哈拉沙漠柏柏尔人的地方性改革运动，变成了版图从埃布罗河伸展到塞内加尔河的帝国；它席卷近30个纬度的地域，包括各种各样的自然条件、经

---

[59] 邀请信见马卡里（al-Makkari），1855-1861年，第2卷，第674页。有人预见到阿尔莫拉维德人接管安达卢斯的危险，对这种意见，穆塔米德声称：他宁愿在非洲做一个牵驼夫，也不愿在卡斯提尔养猪。

[60] 关于这次战役参阅E.莱维-普罗旺卡、E.加西亚-戈麦斯（E. Garcia-Gomez）和J.奥利弗·阿辛（J. Oliver Asin），1950年。

[61] 甚至连伊拉克伟大的学者加扎利（505/1111年逝世）也支持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对安达卢西亚小王国的战争。但这并未能使他的著作在后来免于被阿尔莫拉维德宗教法理学家（fukahā'）所焚毁。

[62] 塞维利亚的穆塔米德被押到摩洛哥，关入监狱，加上镣铐，一贫如洗，直到488/1095年死于阿格马特，他在悲歌中哀叹自己的命运，成为阿拉伯诗歌中的杰作。

[63] 罗德里戈·迪亚斯·德·比瓦尔在巴伦西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君主国，直到495/1102年才落入阿尔莫拉维德人之手。罗德里戈·迪亚斯·德比瓦尔，人称锡德，是西班牙著名史诗中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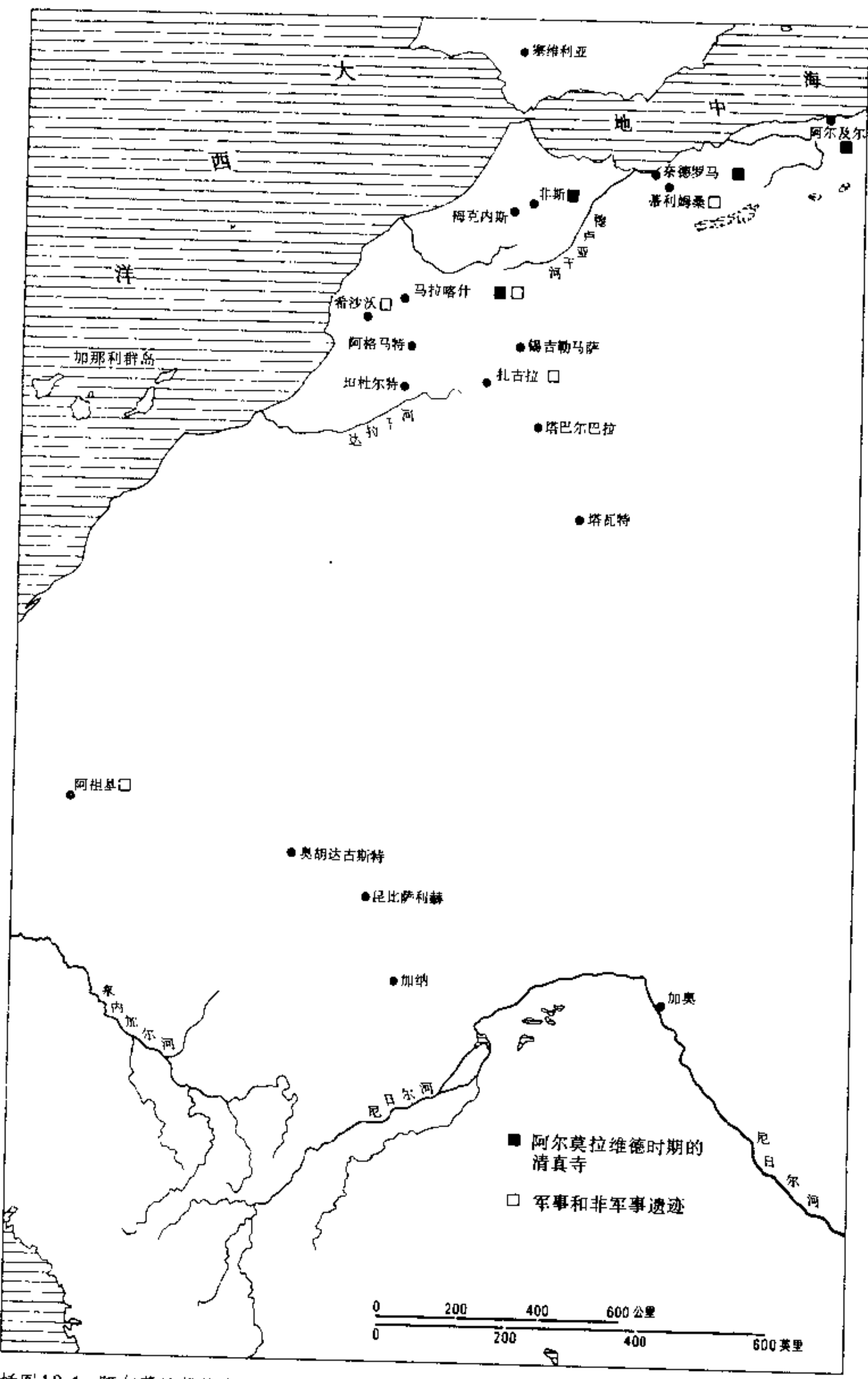


插图13.1 阿尔莫拉维德帝国：城镇和遗迹

济活动区域、以及文化传统，从西班牙和摩洛哥最富饶的平原到毛里塔尼亚的沙漠地带。

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新形势

355 遗憾的是，我们对阿尔莫拉维德帝国南部地区情况的了解比对北部地区更为欠缺。严重的困难在于资料实在太缺乏：来自阿拉伯历史文献的书面资料，写作地点离事件发生的现场相距甚远，有时在时间上也相隔颇久，而口头传说则经历了许多变化（虽然它们目前已开始为人们批判地加以研究），利用起来仍有一定困难。前者来自北方的穆斯林，后者则来自萨赫勒地区的黑非洲人，这些人虽然可能也是穆斯林，但他们的观点未见得与非洲大陆北部的人相同。

我们对塞内加尔河流域当时的情况还没有确切的了解。目前看来有把握的是，出现定居点和市场的主要地点不在沿海，而在相当远的内地。我们从考古发掘已经得知，辛丘－巴拉[64]早在公元5至6世纪时就是一个重要的地方；[65]奥戈是一个大定居点，在公元9世纪时这里已在炼铁。[66]巴克里和伊德里西以不同的方式都曾提到锡拉这个地名。在卡埃迪地区有几个地方都叫这个名字。最近有篇文章[67]说其中之一的锡拉－林道可以追溯到本章所论述的时代；那里发现的制铁遗迹（年代尚未确定但很可能是相当古老的），无疑表明此地区进行必要的考察十分重要。[68]最近几年在塞内加尔河毛里塔尼亚一侧和塞内加尔一侧进行的所有勘探和研究都显示，在今后数十年内，考古研究必将获得宝贵的成果。[69]

虽然巴克里和伊德里西的著作讲得不清楚，解释有困难，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得出印象：锡拉和塔克鲁尔尽管都还无法断定其确切位置，但从经济角度讲，它们在5/11
356 世纪和6/12世纪共同支配着塞内加尔河中游地带。[70]所以，综合一切证据确实表明，从公元6世纪至12世纪，塞内加尔河中游地带经济活动繁忙——特别在渔业领域——而且强大。书面资料和口头传说对此只有模糊的反映；为了取得成果，必须进行更多的工作，这些成果肯定会是引人注目的。

再稍往南一些，由于T.莱维基的研究，使我们对一个长期以来不为人知的王国，

---

[64] 对此地名的拼法存在着一些问题。G.蒂尔曼（G. Thilmans）和A.拉维塞（A. Ravisé）按法语发音拼作Sintiou(1980年)；Y.福尔（Y. Fall,1982年）和大多数塞内加尔作家则拼作Sincu。

[65] G蒂尔曼和A.拉维塞（1980年）。

[66] 参阅B.沙瓦纳（B. Chavane），1985年。

[67] Y.福尔，1982年。

[68] D.罗贝尔－沙勒厄（D. Robert－Chaleix）和M.索纳内（M. Sognane），1983年。

[69] 见B.坦迪亚（B. Tandia），1982－1983年，以及其他许多研究成果。1982年6月在毛里塔尼亚从塞利巴比到博盖进行挖掘的主要成果有：发现了大批带有凹槽的罐，与在辛丘－巴拉发现的公元5－6世纪制造的罐相仿。这些罐是在塞内加尔一侧的卡斯卡斯，辛丘－巴拉，马塔姆、奥戈和巴克尔，以及在毛里塔尼亚一侧正好与上述地方相对的20处地方发现的。这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文化标志。在毛里塔尼亚一侧（在许多情况下也在塞内加尔侧）的37个地点发现了大量捻绳用的圆盘（参阅R.莫尼，R. Mauny,1955年b；G.蒂尔曼，1979年，第29页）。还发现数千处炼铁炉炉基（见D.罗贝尔－沙勒厄和M.索纳内，1983年）。

[70] A. R.巴，1984年。

即迪亚富努（Diafunu）（扎富努，Zafun－u）有了较多的了解。我们得知该王国在5/11世纪时成为穆斯林，它大致位于科隆宾河与塞内加尔河汇合处一带。[71]

据初步考察，[72] 阿祖基从4/10世纪末到6/12世纪中期是一个很有生气的城市，它可能是这个“塞内加尔体系”一个很重要的补给站。[73]

所有上述资料大都是最近15年才得到的。它们还不足以使我们重现这个地区的确切历史，而由于这个地区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息息相关，所以它至关重要。阿卜杜拉赫马奈·巴最近发表的论文[74] 提出了引人注意的假设，他认为很早就存在一些与铁的生产者联盟的王朝，这些王朝同它们的同盟者一起与来自塔克鲁尔（也许还有来自迪亚富努）的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以前即已伊斯兰化的黑人军队作战，锡拉在公元11世纪时还没有信奉伊斯兰教。

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活开始为人们所知晓，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假设来看待。现在还很难肯定锡拉、塔克鲁尔或迪亚富努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黄金贸易，众所周知这些黄金来自更往南的地区，其中最靠北的是在法莱梅河和巴芬河之间。下文我们可以看到，[75] 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确立于如今毛里塔尼亚以南的地区，对黄金贸易的地理布局和对塞内加尔河沿岸各对立城镇之间的竞争，都产生不可否认的影响。

问题在于阿尔莫拉维德人是否发现了塞内加尔河沿岸的穆斯林王公，而柏柏尔人自从这个地区开始伊斯兰化之日起就同这些王公建立了联系。另外，阿尔莫拉维德人是否开始并加速塞内加尔河中游沿岸城镇的改宗活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最近一些研究[76]倾向于认为伊斯兰化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时期之前即已开始，很可能导致较早时期一个塔克鲁尔人王朝的垮台，因为这个王朝与“信奉异教的”炼铁者和巫术师们关系过分密切。对这些问题还需作大量研究，但研究工作确实正在迅速开展。无论如何，现在已能清楚看到，4/10世纪和5/11世纪，伊斯兰教在塞内加尔河流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77] 阿尔莫拉维德人与穆斯林黑人统治者之间的谅解很可能对来自北方的“蒙面纱的”战士们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发现了可用于作战 **357**

---

[71] T.莱维基（T. Lewicki），1971年（a）；莱维基按阿拉伯语发音译为“扎富努”（Zafun(u)）。

[72] B.赛松，1981年。

[73] 一些阿拉伯作家对这个地名的拼音，造成很大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手稿采用各不相同的读法和元音形式，拼法也就各不相同了。

[74] A. R. 巴，1984年。

[75] 见本书第14章关于伊德里西（al－Idrisi）描绘商路的主题。伊德里西的描述认为，比起前两个世纪所利用的商路，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商路更加重要。

[76] 见A. R.巴，1984年。另见奥马尔·卡奈（Oumar Kane）1986年12月在达喀尔提出的博士论文，论文参照索宁克人的传说指出：一些索宁克（或米拉）商人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塞内加尔河以南地区也许是早在公元9世纪，最晚也不过10世纪。富塔托罗的12个索宁克人伊斯兰隐修士家族认为他们家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奥马尔·卡奈指出，动词julde(祈祷)和julaade(贸易)均来源于jula(朱拉)一词。即使这些索宁克商人只不过是北方来的穆斯林商人的向导，但他们仍然是在阿尔莫拉维德时代之前很久的某个时期把伊斯兰教传播到非洲。巴克里也以不同方式指明了这一点。

[77] 巴克里的著作曾提到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J. M.库奥克，1975年，第90页）：塔克鲁尔人的首领沃尔·戴阿比的儿子拉比(?)在公元1056年时与阿布·贝克尔在一起。这无疑说明，当时塔克鲁尔成为穆斯林至少已有两代人的时间。

的人、奴隶和黄金。[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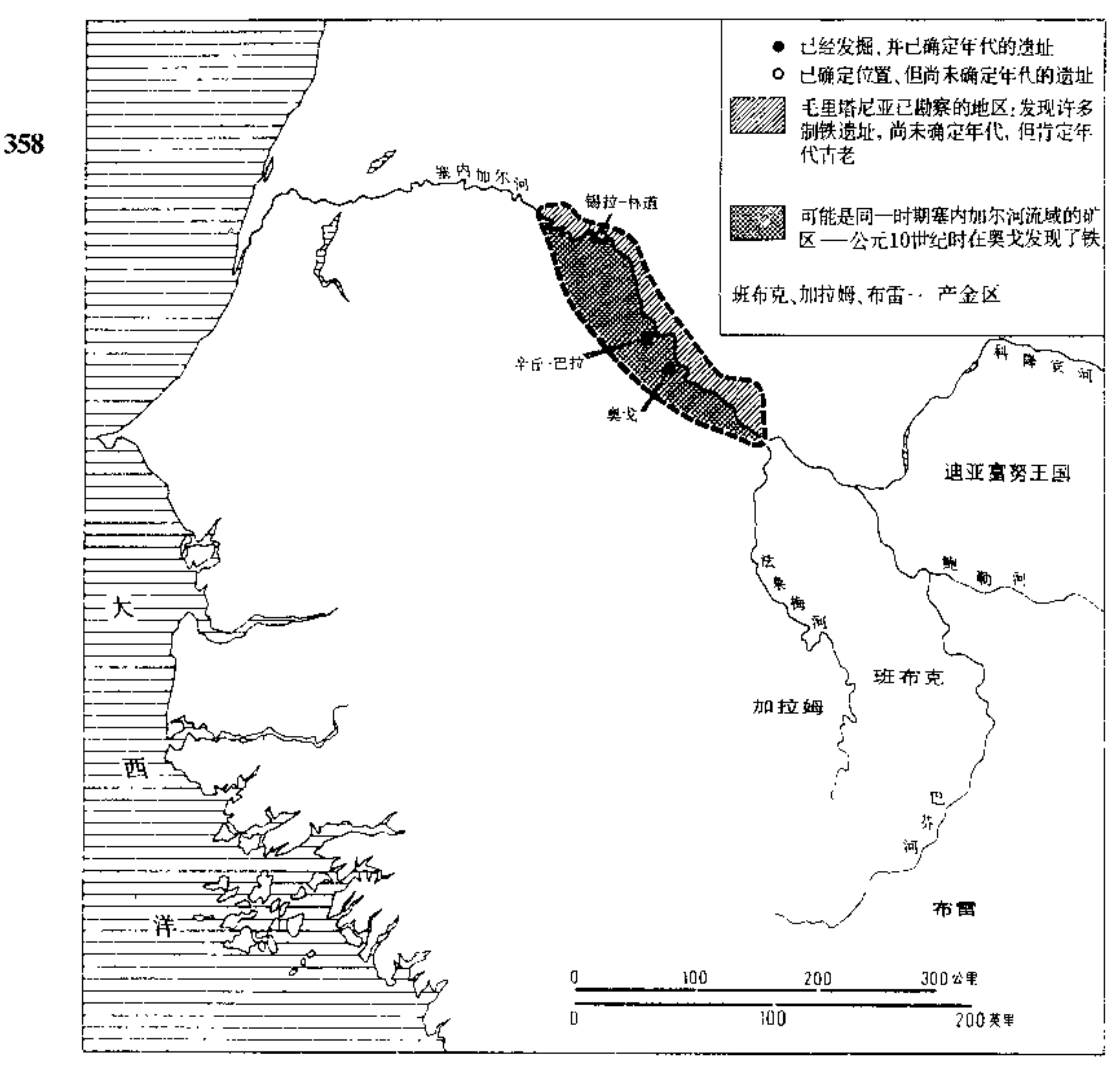


插图13.2 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时期塞内加尔河沿岸图

再往东面，局势肯定对阿尔莫拉维德人没有那么有利。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无疑是一个进行贸易的地区且在伊斯兰教到来之前即已城市化。[79] 远在森林地区生产的大量黄金大概是集中到这个地区，收集这些黄金的黑人黄金商人最迟在4/10世纪往北到达加纳，有时甚至到达加奥。统治这两个城市的王公管理着面向北方的黄金销售。阿尔莫拉维德人扩张时期，加纳的统治者还不是穆斯林，不过他与穆斯林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昆比萨利赫进行的研究表明，[80] 从4/10世纪以后，肯定有许多穆斯林居住在这个商业

[78] 参阅本书第14章，特别是关于当时以塞内加尔河沿岸和加纳各城镇为基础形成对立体系的论断。
[79] S. K. 麦金托什（S. K. McIntosh）和R. J. 麦金托什（R. J. McIntosh），1980年；J. 德维斯，1982年。
[80] S. 贝尔捷（S. Berthier），1983年。另见《毛里塔尼亚科学研究所年鉴》，第2年。

城市。那里的加纳统治者欢迎他们，他们可以在一个宏伟的清真寺中作祈祷。[61] 整个加纳－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体系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时期之前很久就已形成，并且无疑是敌视桑哈贾人的，[62] 它习惯于与伊弗里基亚的商人进行贸易。因此，很可能在阿尔莫 358 拉维德王朝与加纳体系之间发生过冲突；仅仅由于后者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它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它可以经过塞内加尔河沿岸城镇作为旁门通往黄金产地，这种冲突就十有八九会发生，不过，现在很难断定这种冲突采取了什么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确切地衡量出当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发展起来时，伊斯兰化在萨赫勒地区采取什么形式，达到什么程度。综合今天的各种研究成果，说明改宗运动（圣战）的第一次合理而协调的重大努力是撒哈拉人（阿尔莫拉维德人）作出的，其年代从 5/11 世纪起。[63] 在此以前的两、三个世纪里，伊斯兰教的传播可能是比较 359 零星分散的，它与北方商人的出现和城市化相关连。[64]

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伊斯兰化的最初阶段往往是以“个别人为基础”进行的，就法蒂玛王朝的情况来说[65] 可能已是由“国家”进行的、因而意识形态气味很浓；这个最初阶段对撒哈拉贸易的终端城镇偶尔会产生影响，但对农村地区则没有什么作用，对教育或宗教训练也没有作出多少努力。最初在加纳的奥胡达古斯特，或许在塔德梅卡、加奥、无疑还有塞内加尔河沿岸和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地带其他一些城镇出现的穆斯林社会都属于这一阶段；关于马拉尔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轶闻大概也属于这个时期。

阿尔莫拉维德人充当逊尼派教义的改革者和指导者的角色是十分认真的。他们虽然并非从零开始，[66] 但他们使西部非洲的穆斯林社会有了一定的地理范畴，这大概还是首次；在他们之后，穆斯林社会比以前有了更明确的边界。阿尔莫拉维德征服在撒哈拉以南引起的震动确实是很大的；而且这种动乱是与上个世纪什叶派取胜后作为 5/11 世纪标志的逊尼派总反攻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评价阿尔莫拉维德与加纳的关系。

加纳在 5/11 世纪末正式皈依伊斯兰教，是被逊尼派的马立克学派所征服或皈依该派的；它也许还促使塔德梅卡转而信奉逊尼派。[67] 考古学方面的证据尚没法作出定论。在现今的地面下近 5 米深处，发现可能是破坏物的遗迹；清真寺的规模在 5/11 世纪末以后有变化；在名为昆比萨利赫的地方的巨大市场 7/13 和 8/14 世纪时发展得最为惹人注目。这些都已得到公认。[68] 这些线索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阿尔莫拉维德人造成的破

---

[61] 这是目前利用碳－14 年代测定法对该城组织机构及其清真寺的最早时期的看法。

[62] 参阅 J. 德维斯，1970 年。

[63] 伊本・萨马克（Ibn Sammak,1381 年），见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364 页。

[64] 参阅本书第 3 章。

[65] 关于奥胡达古斯特的情况，现正在考察之中，另见本书第 12 章。

[66] 参阅本书第 3 章。

[67]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20 页（祖赫里〔al－Zuhri〕的文本）：“在加纳附近距离 15 天行程的地方，有两个城镇：一个是锡拉，另一个是塔德梅卡，此两城相互间距离 9 天行程。这两个城镇的居民在加纳的居民成为穆斯林 7 年以后，经过他们之间的战争和多次叛乱才成为穆斯林。加纳人曾请求阿尔莫拉维德人给予帮助，以便打败他们。”T. 莱维基，1979 年，第 166 页，引用了这段文字，并使用第一个地名的另一种译音恩－斯－拉（N－S－la）。另见 D. C. 康拉德（D. C. Conrad）和 H. J. 费希尔（H. J. Fisher），1982、1983 年。

[68] S. 贝尔捷，1983 年。

坏；在这里他们肯定会像在奥胡达古斯特一样杀死他们的扎纳塔仇敌。[89] 但我们仍缺乏

360 可以作出结论的证据。无论如何，像奥胡达古斯特的情况一样，任何可能发生的袭击都不致造成商业城镇的消失；而且恰恰相反。在考古学上还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需作出回答，截止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多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问题在于，如果确曾发生冲突，那么都城当时是何遭遇？[90] 是迁都南方，抑或也皈依了伊斯兰教？此后与南面毗邻的索索人的关系又如何？8/14 世纪和 9/15 世纪时索索人的文献告诉我们，他们曾打败已经趋于衰弱的加纳。[91] 所以，与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联系在一起的"加纳体系"的整个命运如何，[92] 迄今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实属遗憾。

R.M.A. 贝多毫不犹豫地认为，当时可能影响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好战运动是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一些重要地点被占领或重新占领的原因，[93] 也是特勒姆人之所以定居到班迪亚加拉峭壁上托洛伊地方的原因。[94] 有些作家甚至认为动乱逐渐延伸到了乍得地区。[95]

加奥的王公们早在 4/10 世纪就已是穆斯林。[96] 与阿尔莫拉维德统治下西班牙的关系的迹象出现在 5/11 世纪末，这同样也难以解释。位于加奥以北的加奥－萨内墓地发现王室的墓志石碑。[97] 这些石碑中最早的两块可能是用西班牙大理石刻成的；[98] 石碑提到的君主毫无疑问是穆斯林，并且可能是逊尼派教徒。目前，对他们还没有更多的了解。[99]

361 我们甚至连阿布·贝克尔使萨赫勒地区改变信仰的努力造成的确切后果也不了解。他死亡的年代和地点各种史料出入甚大。[100] 毛里塔尼亚的口头传说也含糊不清。[101]

显然，最后定论尚有待作出，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历史[102] 一定还会有许多出人意料

---

[89] J. 德维斯，1970 年。

[90] 参阅 D. C. 康拉德和 H. J. 费希尔，1982 年，其中有不同意假定阿尔莫拉维德人曾经征服加纳的论点。

[91]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343 页（伊本·哈勒敦，第 388 页）（马克里齐〔al－Makrizi〕）：译文需认真修订，文献甚难读懂，可容许与作者的原文有很大出入的读法。

[92] 参阅本书第 14 章。

[93] R. M. A. 贝多（R. M. A. Bedaux）、T. S. 康斯坦德塞－韦斯特曼（T. S. Constandse－Westermann）、L. 阿奎博尔（L. Hacquebord）、A. G. 兰格（A. G. Lange）和 J. D. 范－德－瓦尔斯（J. D. Van der Waals），1978 年。

[94] R. M. A. 贝多和 R. 博兰（R. Bolland），1980 年。

[95] H. T 诺里斯，1972 年。这种说法没有得到所有研究工作者的认可，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96] 穆哈拉比（al－Muhallabī，公元 990 年逝世），见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77 页："该国的国王当着他的臣民宣布自己是穆斯林，臣民中也有许多人宣布自己是穆斯林。"关于塔哈尔特在这方面可能起的作用，见 T. 莱维基，1962 年。

[97]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11 和随后诸页。

[98] J. 索瓦热（J. Sauvaget），1949 年。另见 M. M. 维雷（M. M. Viré），1958 年，第 368－376 页。

[99] 伯明翰大学的保罗·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对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他目前正同马里、毛里塔尼亚和法国的研究人员一起对萨赫勒地区的铭文石碑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应该感谢他使我们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对之有了更多的了解。另见，J. O. 亨威克（J. O. Hunwick），1980 年。

[100] 第一次（没有说明日期）提到阿布·贝克尔之死是在 7/13 世纪晚期的一篇文献中（见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76 页）。在 7/13 世纪，伊本·阿西尔（Ibn al－Athīr，见 J. M. 库奥克，第 194 页）把他的死期确定为 462/1069－1070 年、8/14 世纪的作家们则认为是在 469/1076－1077 年与 480/1087－1088 年之间莫衷一是。关于阿卜杜拉·伊本·亚辛的卒年，同样众说不一，在 450/1058 年和 452/1060 年之间。

[101] A. 乌尔德·巴赫（A. Ould el－Bah），1982 年。

[102] 两位法国历史学家 V. 拉加代尔（V. Lagardère）和 A. 内格尔（A. Nègre）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课题，他们已经发表了引人注意的初步研究成果。

的大事未曾发现，即使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首次一个有凝聚力的逊尼派王国呈现出全面的国境线，并为伊斯兰教地区与属于不同宗教体系的黑人世界之间划出了边界。面对着这些被伊斯兰教看成是“异教徒”的社会，容忍和置之不理不再合适了。这一新事物孕育着以后几个世纪的重大发展。

从埃布罗河到塞内加尔河的广袤领域上的组织：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失败

在桑哈贾人进行征服之前，阿尔莫拉维德集团北部地区的经济已经高度组织起来。从此以后，北部的经济从源源不断来自西非的黄金获得益处。长期以来，许多著作都是强调阿尔莫拉维德人的征服蹂躏了非洲西海岸。近年的研究进展表明情况并非如此，当时萨赫勒地区与北部的经济高度结合在一起。建立或巩固连接塞内加尔和摩洛哥的商路上的新补给站，这说明沿路运输量相当可观。[103]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阿尔莫拉维德集团是由阿布·贝克尔和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友好地分享（从此词的完全意义上说）权利的，这种看法没有根据。首先，锡吉勒马萨的铸币厂继续以阿布·贝克尔的名字铸造硬币，直到他去世。第二，在毛里塔尼亚发现了 6/12 世纪时在安达卢西亚铸造的第纳尔；[104] 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货币的流通是从北到南。而且，由于北方迫切需要南方的黄金，情况也只会是这样。[105] 因此，以互补的经济把各国联系在一起的漫长的大西洋海岸，从经济的观点应看成是一个整体。所以，对“来自南方的”产品的需求，完全有可能一直到 6/12 世纪中叶都在增加。当然，保持这种经济上的统一，并不妨碍存在两个行政中心，一个在马拉喀什，另一个在萨赫勒；两支军队，一支在南方，一直骑骆驼，另一支从 5/11 世纪起完全骑马；[106] 也许还有两种不同的政治风尚。[107] 但是，经济上的统一已被史料所完全证实。摩洛哥南部从这种繁荣的局面中获益匪浅。伊德里西曾雄辩地描述了在阿格马特－瓦里卡这种财富增加的情况；该地紧靠阿尔莫哈德运动的发祥地廷马尔地区。他说道：“阿格马特地方的人”

363

> 是豪瓦拉族，是通过密切接触而变成柏柏尔人的阿拉伯人。他们是殷实的商人，生活优裕。他们进入黑人国家，用骆驼商队驮着大宗的货物：紫铜、黄铜、毛毯、羊毛外衣、头巾、斗篷、玻璃珠、珠母、宝石、各种调味品、香料、熟铁制品……在“蒙面纱者”（阿尔莫拉维德人）统治下，没有比阿格马特的居民更富裕、生活更优越的人了。他们在屋门上挂着标志表示他们有多少财富。

---

[103] 参阅本书第 14 章。有可能是阿尔莫拉维德人兴建的比较重要的城镇有阿祖基（在今毛里塔尼亚）、塔巴尔巴拉（在摩洛哥东部）、以及扎古拉和坦杜尔特（在摩洛哥南部）等。关于阿祖基，参见 B. 赛松，1981 年；关于塔巴勒巴拉，参见 F. D. 尚波尔特（F. D. Champault），1969 年；关于扎古拉，参见 J. 默尼埃（J. Meunié）和 C 阿兰（C. Allain），1956 年。关于坦杜尔特，参见 B. 罗森伯格（B. Rosenberger），1970 年（b）。

[104] G. S. 科林（G. S. Colin），A. O. 巴比克尔（A. O. Babacar），N. 加利（N. Ghali）和 J. 德维斯，1983 年。

[105] 参阅本书第 14 章，特别是插图 14.6 阿尔莫拉维德铸币。

[106] 详见 V. 拉加代尔，1983 年。

[107] 参阅本书第 350 页。

受益于这种经济繁荣的不止阿格马特一地。整个摩洛哥的山区提供越来越多的铜、铁和银以供出口；6/12世纪在支持阿尔莫哈德人和支持阿尔莫拉维德人的两派之间发生了争夺矿区控制权的真正战争。[8] 在马拉喀什以西希沙沃地区[9]的出土文物中，揭示了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治时期奢侈的生活情况。拉毛粉饰[10]和绘画装饰[11]可与在北方和南方发现的其他装饰相媲美。

经济繁荣显然只使城市中某些阶层和一些接近权贵的人受惠，这种繁荣自然往往会造成铺张奢侈风气的发展，后来阿尔莫哈德人对之严加谴责。许多装饰豪华的清真寺即建成于这个时期（参见图片13.1），但一些精美的世俗建筑也同样是如此，其中有些建筑如马拉喀什的喷泉今天仍然存在。任何城市也比不上马拉喀什保留这么多阿尔莫拉维德人城市规划最早标志的重要遗迹。伊德里西生动地向我们描绘了兴建该城当时的情景。"(它）建筑在平地上，附近只有一座叫伊贾利兹的小山丘，建筑'穆斯林埃米尔'阿里·伊本·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的宫殿（称"石宫"）所用的石料即取自该山丘。除了这座山丘那里再找不到任何石头，所以该城是用粘土、烧制的砖和夯实的土建成。"[12] 考古研究使我们发现了这座宫殿，它是当时该地区一个"建筑学上的奇迹"；[13] 考古研究也使我们有可能重现阿尔莫拉维德清真寺的一部分平面图，并且完全辨明一座装饰华丽的供居民沐浴用的喷泉。[14] 阿尔莫拉维德人豪华的装饰，最北延伸到西班牙埃布罗河畔萨拉戈萨地区的阿尔哈费里亚，但如今除了一些拱门的残部外，已经荡然无存。

364 根据G. 维厄和E. 莱维－普罗旺卡的研究，[15] 马拉喀什还是一个光辉的文化中心。在这里，来自西班牙的宫廷诗人继续他们在诸王相争时期开始的文人生涯，[16] 但由于阿尔莫拉维德人征服安达卢斯以及随之实行的最初严格而简朴的生活，文化生活遭到破坏。初期的这种严格而朴素的生活曾使巴克对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持全面的保留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这种生活风尚在行动上和习惯上都不复存在了。当时的伊斯兰文化第一次以这样大的规模移植到摩格哥。随之而来的是豪华铺张的作风和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后来阿尔莫拉维德人为此受到他们对立面的指责。但是，宗教法理学家（统治家族的盟友）的教法所规定的朴素生活原则并没有消失，它往往同在马拉喀什实际存在的豪华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它强制实行一种往往是偏执的马立克学派逊尼派教义，这对伊斯兰世界西部，包括非洲伊斯兰教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做得过火，也引起不少敌对的反应。[17]

---

[8] 在M. 哈吉·萨多克（M. Hadj Sadok），1983年，第73－74页有伊德里西文章的优秀而非常精确的译文。

[9] B. 罗森伯格，1970年；P. 贝尔捷（P. Berthier），1962年，第75－77页。

[10] P. 贝尔捷，1962年，谈到与同时代西班牙的其他装饰物相比的情况。参阅C. 尤尔特（C. Ewert），1971年（B. 罗森伯格在1972年第12期《HT》，第219－221页中加以评论）。

[11] 在希沙沃地方一些白底红色几何形装饰画显然与在马拉喀什发现的同时代的装饰画有联系。我们很想知道它们是否也与毛里塔尼亚的瓦拉塔的装饰画有关。

[12] M. 哈吉－萨多克，1983年，第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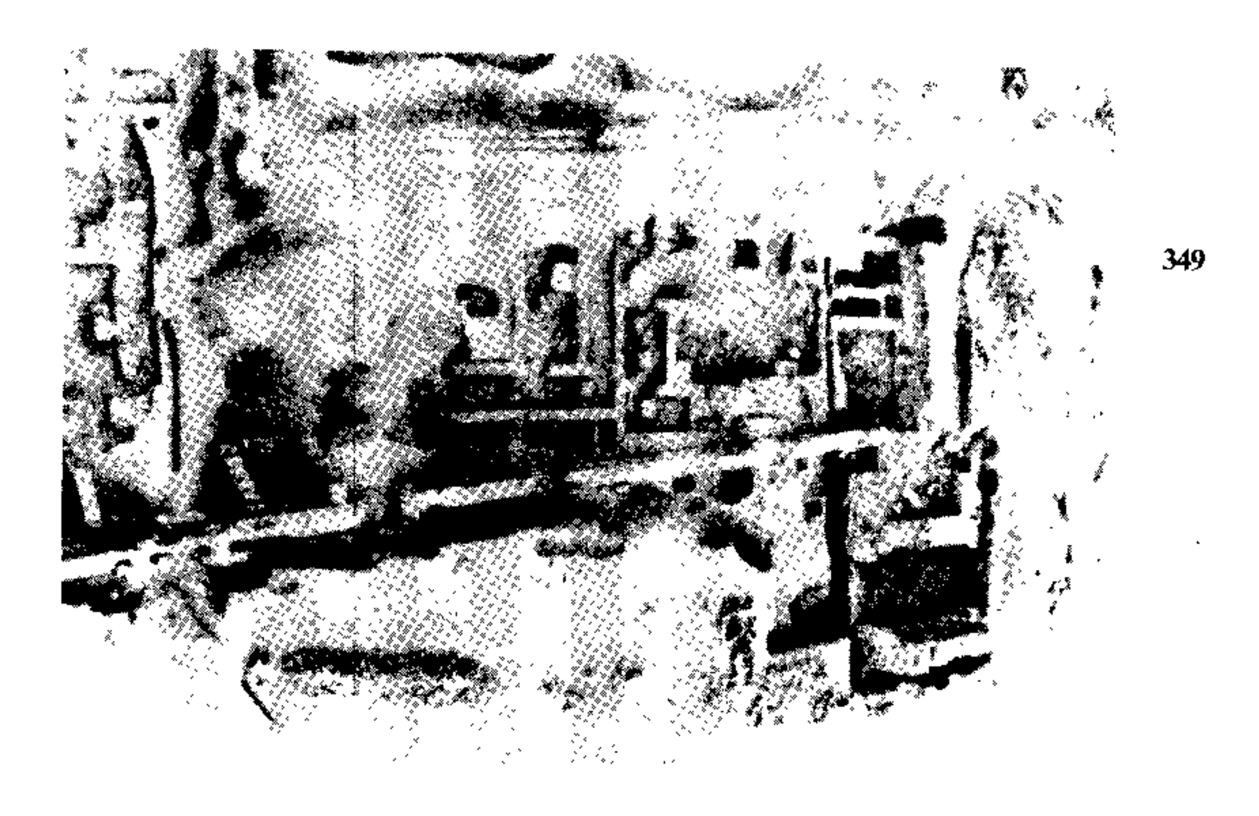
[13] J. 默尼埃和H. 泰拉斯，1952年，第11－19和20－21页：类似希沙沃的那种绘画装饰。

[14] H. 泰拉斯、J. 默尼埃和G. 德弗敦，1957年。

[15] G. 维厄（G. Wiet），1966年，第230－231页，E. 莱维－普罗旺卡，1948年，特别是第239－318页。

[16] 读者在阅读H. 佩雷斯（H. Pérès,1953年）的名著后，还可参阅S. 哈利斯（S. Khalis），1966年。

[17] V. 拉加代尔（1981年）令人信服地表明，阿尔莫拉维德人虽曾短时期对沙斐仪学派和苏非教派感兴趣，但在阿里·伊本·优素福·伊本·塔什!统治时期转而信奉不妥协的马立克学派的严格教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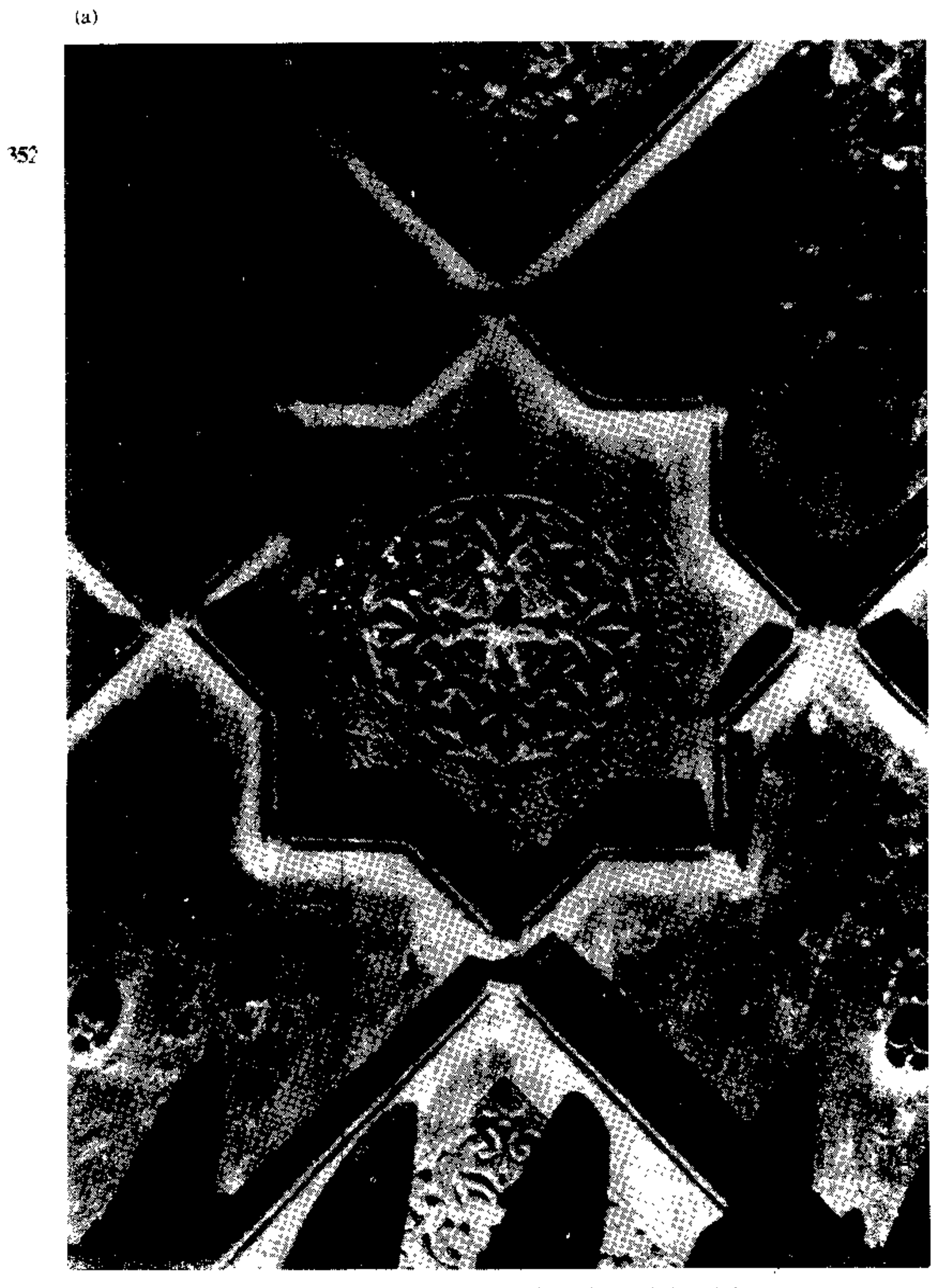
图片 13.1 马拉喀什：第一个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宫殿的出土文物

最近，V. 拉加代尔的著作阐明了由于马立克学派宗教法理学家对统治家族强制实行对立的政策而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也许还不止这两地）引起的敌对情绪的严重程度。马立克学派的宗教法理学家特别是攻击加扎利的著作。加扎利的著作当时已经介绍到穆斯林世界西部，他那神秘的语调使支持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宗教法理学家感到困惑。公元 1143 年 11 月阿尔莫拉维德君主阿布·马尔万·阿卜德·马利克·伊本·阿卜德·阿齐兹写给后来任巴伦西亚执法官的某人的一封信，清楚地表明了统治势力当时的心情和忧虑："如果你看到一本离经叛道的书或遇到宣扬某种异端邪说的人，务必严加提防，特别是阿布·哈米德·加扎利的著作。必须不断通过对异教徒的死刑宣告（原文如此），把它们追查到底，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余毒；要进行搜查、并要求那些你们怀疑其隐蔽这类书籍的人起誓。"阿尔莫拉维德政权最后几十年的气氛，被马立克学派法理学家们实行的镇压措施毒化了，这些法理学家得到王公们的支持；这种镇压措施使人们对统治王朝的谴责，特别是来自新兴的阿尔莫哈德运动的谴责，增添了份量；根据 V. 拉加代尔的说法，甚至连统治家族的合法性也由于对加扎利一段极受普遍欢迎文字的解释而受到怀疑：

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唯有谬误和蒙昧。后来，感谢先知的启示，才有了真理和正确的道路。继先知之后是哈里发，哈里发之后是君主；君主转向暴政、傲慢和虚荣。现在，由于我们发现有一种使事物返本归原 神圣倾向，所以继之而来的是：神必将使真理和先知的启示重返生活之中。……

(a)

352



图片13.2(a)　阿尔莫拉维德装饰艺术：铜门的细部（非斯）

353



图片 13 2(b) 阿尔莫拉维德装饰艺术· 铜门环 (非斯)

这段话清楚不过地说明：专制、傲慢和虚荣的统治势力，尽管受到马立克学派法理学家的正式支持，但它既不能作为王朝存在的理由，也不是宗教价值观的基础。[18] 持反对态度的“拥护正统王朝者”——对阿拔斯王朝而言——主张政权统一，与伊本·图马特的加扎利派主张相接近，这一点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19]

V. 拉加代尔在一系列文章中研究了阿尔莫拉维德王朝行政管理方面的弱点。[20] 在地方一级几乎不存在行政部门：权力是通过亲属和亲信来行使的。不止一次，早期年代在正直的安达卢斯统治者中受到谴责的不正当行为很快就死灰复燃，特别是在税收领域。执法领域和宗教裁判式的司法程序中则公然推行严厉手段。[21] 但这掩盖不了教义和现实 366 的矛盾，于是叛乱经常发生。其中在阿特拉斯山区爆发的一次，终于推翻了这个王朝，阿尔莫拉维德政府除尽量压制外别无他法。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在 5/11 世纪末用来对付诸小王国的武器，现在被用来反对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了，因为现在轮到该王朝被指控进行压迫、不公正、腐化、堕落和不严格遵守宗教教规。无可否认，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国家机器是庞大的，但它抵挡不住阿尔莫哈德人的进攻，后者攻势猛烈并在他们的山区基地具备良好的组织。

长期以来，历史对阿尔莫拉维德人一直非常苛刻。人们指责他们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怀疑他们像“野蛮人”一样干涉西班牙，而在西班牙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妥协是在投降基础上达成的。人们还说他们推翻了太多的已经确立的势力，为了使他们的侵人容易得到宽恕，他们起用了太多的新人，包括一些黑人，以避免引起疑惧和敌视。今后一些年份人们将会看到为这个王朝恢复名誉的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和对其历史作用给予较客观、较公正的评价的探索。设法衡量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留在公众记忆中的是何种印象，已经是十分吸引人的课题。一位年轻的毛里塔尼亚研究工作者在这个领域已经进行的试验表明，如果这样的调查研究能够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的话它会有多么大的价值。[2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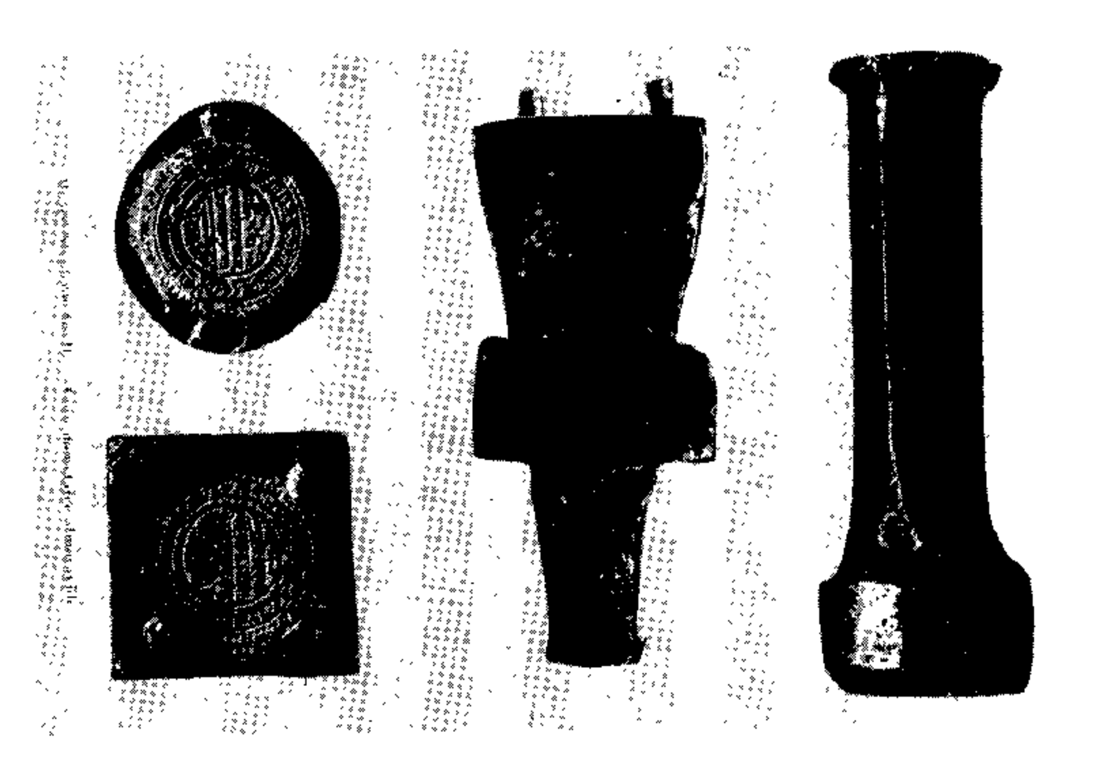
[18] 这段话转引自 V. 拉加代尔，1983 年。

[19] V. 拉加代尔，1981 年，第 53 页强调指出，伊本·图马特是阿布·穆萨·伊萨·伊本·苏莱曼·拉弗吉的弟子，来自塔迪拉省，曾受过东方冥想学说的教育；即使阿尔莫哈德人没有利用他这段话，其相似之处也是令人注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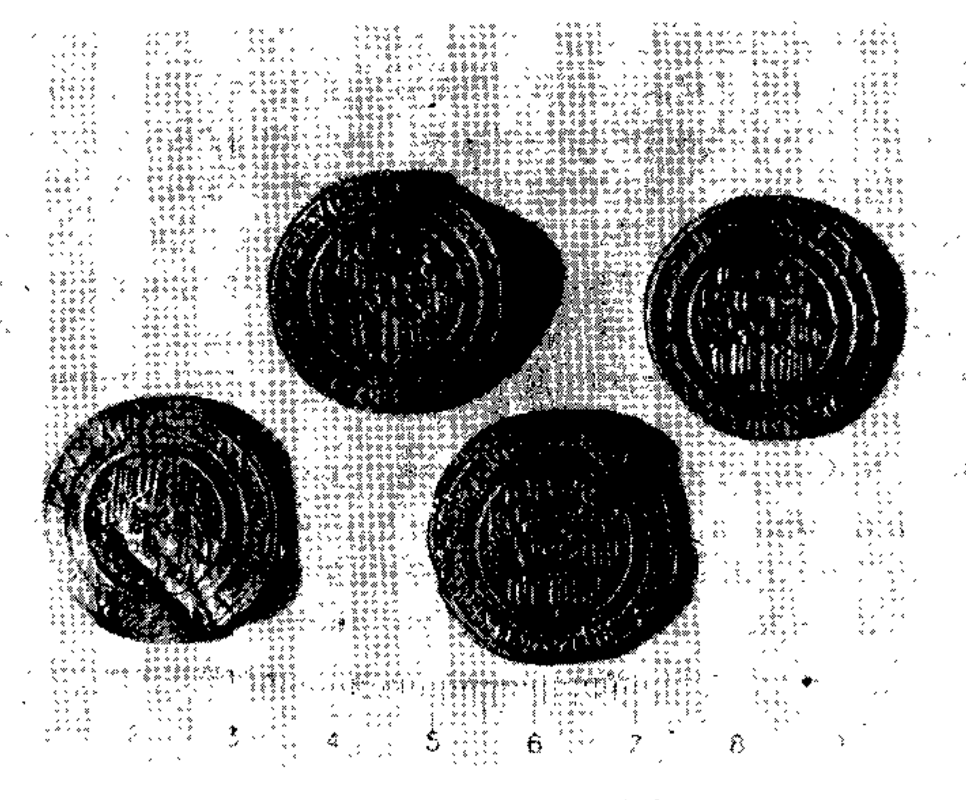
[20] V. 拉加代尔，1978、1979、1983 年。进一步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21] 对加扎利著作作出的判决（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命令将这些著作焚烧），给该王朝统治者投下了令人不愉快的阴影。(V. 拉加代尔，1983 年)。

[22] 参阅 A. 乌尔德·巴赫，1982 年。



图片 13.3(a) 在阿尔及利亚发现的阿尔莫拉维德铸币和冲压模具



图片 13.3(b) 阿尔莫拉维德金币

14 西部非洲的贸易与商路

J. 德维斯

367 过去20年间的研究工作使得可供本课题利用的资料基础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考古发掘的新发现甚多，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对伊斯兰货币进行的实验室研究带来了古币研究方面的飞跃，对我们所探讨的这一历史时期尤为如此。带着批判的眼光重新研读原始文字资料，以及运用经济史的方法研究远古时期的工作也同样取得了进展。几乎所有近期著作都对20年前还认为是想当然的结论提出了大量质疑；这些近作从根本上改变了研究工作本身，开辟了崭新而广阔的探索途径。

首先必须提醒两点。第一点是方法问题：单凭报道考古发现还不足以使揭示出来的种种迹象衔接成一体。因此，必须根据经济史研究的要求摈弃微量分析和小范围鉴定的方法，转而采取统计学或至少要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要有力求全面的观点和扩大研究范围的强烈愿望。

第二个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术语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用词不当必然会使大部分推论继续含糊不清。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在非洲以及其他地区，很早就存在一种用消费品或土产品以货易货的地方性贸易经济，在本章所讨论的时期肯定是如此。这并不直接影响本章的主题，而某种涉及专职商人的长途贩运经济则取决于对某些稀少昂贵产品（诸如食盐、柯拉果、黄金、小麦、织物和铜）的需求，这些产品当时非得来自“别处”不可。这些商品加上其他许多商品奠定了贸易的基础，唯有当北方的需求只能从南方得到补充之时，才会出现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我们必须牢记一点：在原有商路的基础上，远隔两地的贸易伙伴之间可能产生对新产品的新需求；充满风险的超长途贩运只有当它反映了迫切需求时才会出现。

368 然而，如若不是由于存在对硬币的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关键问题，我们研究穿越撒哈拉的黄金贸易史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①在卖方借助一种并不一定由买方生产的交换媒介物售出一件产品之后，当卖方期望有一种媒介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选择自由之时，便会出现对交易代币的需求。考古发现和文字资料足以清楚地证明，在本章所探讨的这一时期，整个非洲都存在这类代币（诸如小铜十字形物品、铁制物件和种种织物），因而这个问题没有必要重新进行讨论。非洲熟知需要用种种证物作货币，并且知道黄金的价

① 关于硬币供求的看法见C.奇波拉（C. Cipolla），1961年和G.P.埃内坎（G. P. Hennequin），1972和1974年。对“需求”可通过各种记事资料、考古发掘出土的硬币和金、银残片进行评估，“供给”则可以与硬币铸造的各种证据直接联系起来。当前的研究靠振兴传统的货币学再加上一种基于统计级数的货币学研究新方法，近年来实验室研究工作极大地影响着考证结果。

值以及如何积存黄金以便在世事艰难时有备无患。

因此，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并不是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现象。这种贸易以骆驼商队每年穿越一次大沙漠的形式到南方寻觅黄金，它兴起和发展的方式有待我们去识别和研究。这种贸易几经巨大变迁，也需要我们尽可能去了解。

撒哈拉大沙漠——一道新石器时代以来不断扩大的鸿沟

穿越沙漠的可能途径

就撒哈拉南北两端之间的联系而言，公元 7 至 11 世纪这段时期具有关键性意义。在这一时期内，特别需要黄金的地中海区域各地的经济与撒哈拉沙漠南部萨赫勒地区以及热带大草原各地的经济之间逐渐建立起经常性来往的通道。而热带大草原又与热带雨林区建立了联系，后一地区几乎不产盐却需用盐。这些年间通道肯定历经变迁，然而这些穿越沙漠之路原在何处，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权威人士新近认定，沙漠狩猎者和沙漠南部边缘的群体在很早以前便已形成了撒哈拉文化统一体，② 然而这只适用于尼罗河流域、从霍加尔到提贝斯提的撒哈拉沙漠中段地带，以及撒哈拉范围内的阿特拉斯山区，而并不包括当今的阿尔及利亚西南部、毛里塔尼亚和马里。③ H.J. 于戈明确指出，基督纪元前第三个一千年之前沙漠加速扩展，毁灭了原有的一切，撒哈拉沙漠在新石器时代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发掘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证实了这一点。④ 随着等雨量线不断向南北两侧推移，撒哈拉沙漠变得难以穿越。 369

查阅当今的等雨量线分布图（见插图 14.1），我们看到近一千公里宽的根本不适于放牧或是畜牧条件很差的地带，把南北两侧条件较好的草地分隔了开来。这种状况很可能与一千五、六百年前大体上相差不多，⑤ 虽然无数例证说明局部性环境恶化使一些地区生态问题更加严重，⑥ 最近几次危机则再度导致沙漠进一步向萨赫勒地区南部扩展。

除了少数几个南北两条 50 毫米等雨量线相互接近的地点以外，要穿越撒哈拉沙漠

---

② 让·勒克朗（J. Leclant）与 P. 瓦尔（P. Huard），1980 年，特别是结论部分，第 517－528 页。

③ 同上，地图第 80 页。

④ H. J. 于戈（H. J. Hugot），1979 年，特别是 213 和以后各页；J.－P. 罗塞特（J.－P. Roset），1983 年；〔法国〕《地理学与动力地貌学杂志》，1976 年特刊；R. 库珀（R. Kuper），1978 年（编）；《努瓦克肖特研讨会文献》（1976 年）；C. 图佩（C. Toupet），1977 年；H. J. 于戈，1979 年，特别是 673 和以后各页。

⑤ 关于撒哈拉气候演变的研究如今已取得高度一致。有关对人类的影响问题可见：R. 库珀，1978 年（编）；H. J. 于戈，1979 年；让·勒克朗与 P. 瓦尔，1980 年。有关生活条件变化问题见 T. 莫诺（T. Monod），1958 年著作中关于（马贾巴特）库布拉沙漠的引人注目的部分。并参阅 S. E. 尼科尔森（S. E. Nicholson），1979 年，第 31－50 页，以及他 1976 年一篇重要论文的摘要。一般来说，通过《塞内加尔西非第四纪地质研究协会学报》（达喀尔）可以了解关于西非生态环境演变史的进展情况。

⑥ J. 德维斯（J. Devisse）、D. 罗贝尔－沙勒厄（D. Robert－Chaleix）等人，1983 年，详细地研究了历史上奥胡达古斯特地下水位变化的情况以及水位暴降的可能原因。

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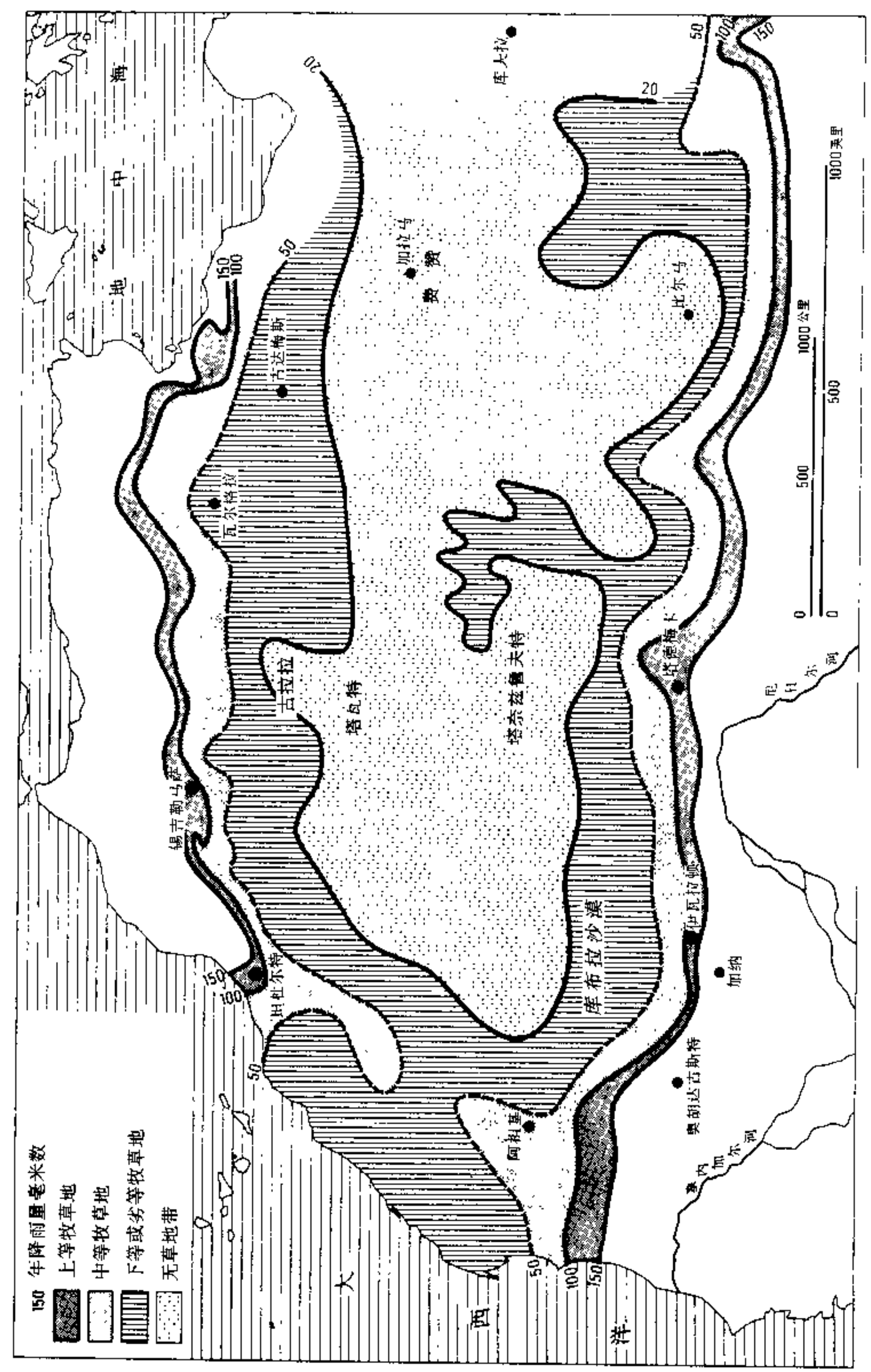


插图14.1　跨越撒哈拉沙漠途经的地带：当今的等雨量线图（根据H.J.于戈，1979年；V.M.戈丁霍，1956年）

必需找到有水井和绿洲的可靠通道或者拥有耐渴的坐骑⑦并且携带大量供人所需的饮水。⑧穿越沙漠的旅程十分危险，若无允足的理由肯定无人问津。

目前所有研究者都同意上述观点，从而使得过去关于远古时代曾有大举穿越撒哈拉的行动的说法⑨多少带有一点空谈的味道。即便有朝一日研究证实确有此举，鉴于撒哈拉南北两端的距离无情地日趋扩大，⑩截至通常称为古代的终期为止，任何旅行者势必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毫不间断地一举跨越这片大沙漠。⑪跨越沙漠的来往中，最重要一环是确有一些人，很可能是讲柏柏尔语的各族。他们定居在撒哈拉地区，迄今我们对其生活环境及其生存年代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想必是在公元4至7世纪期间。⑫这些撒哈 371 拉人群体在8世纪之前在经济上所起的作用鲜为人知。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人的作用，正是通过他们，北非才与沙漠深处各点，⑬甚至还与沙漠南部以及萨赫勒地区部分地沟通了联系。

第5、6世纪的“柏柏尔”部落联合体⑭借助于已经普及达几个世纪的骆驼运输⑮首先具备了尝试跨越沙漠的条件。关键在于骆驼是唯一可以远征南北两端相距一、两千公里撒哈拉沙漠的动物。无论是古代双轮马车（人们已不再认为这类车曾用于商业运输）⑯还有马匹（当时才引进撒哈拉地区为时不久），⑰也不管是毛驴（这是当地古老而又省钱的常见动物）还是岩画艺术所证实的慢行役牛，⑱都达不到从事艰苦繁重的远途贸易运输的要求。沙漠商队的特点，最晚自第10世纪起，就是役畜头数多，它们驮负大量货物，主要是为了到撒哈拉沙漠以南去换取黄金。

重要的是选择一条风险不多的路线。第10至12世纪的阿拉伯学者刻意描述了穿越撒哈拉商路的详细情况，明显地说明了任何草率之举都可能导致灾难。可以穿越的通道

⑦ 关于骆驼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见R.莫尼（R. Mauny），1961年，第287和以后各页，和C.德－莱斯皮内（C. de Lespinay），1981年。

⑧ T.莫诺在其1973年（a）第31页指出，撒哈拉是世界所有沙漠中最荒凉的一片，60%的地带贫瘠干旱，其中15%的地方寸草不生。

⑨ 譬如，O.迪－皮戈多（O. du Puygaudeau），1966年，第37和以后各页。

⑩ 关于沙漠向南扩展的后果，见S.达沃（S. Daveau）与C.图佩，1963年颇有启发的著作以及C.图佩，1977年；两书均有关于我们探讨的这一时期的插图。

⑪ 最新的研究成果不赞成新石器时代终结以后还存在经常性的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的说法；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0章；J.德桑热（J. Desanges），1976年，第213和374页；G.坎普斯（G. Camps），1980年，第65和以后各页。

⑫ 见H. T.诺里斯（H. T. Norris），1972年；T.莱维基（T. Lewicki），1978年；G.坎普斯，1980年；以及本书第11章。

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514页－515页。

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508页以及G.坎普斯，1980年，对这些地区是否有讲柏柏尔语的犹太人也曾讨论过。

⑮ 最近的报告（C.德－莱斯皮内，1981年；H. J.于戈，1979年，第145页）指出，撒哈拉地区已确定年代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未发现单峰驼骨骸，而岩画与雕刻中骆驼的形象则出现在较晚的时期。

⑯ G.坎普斯，1980年，第65页；H. J.于戈，1979年、第566和以后各页。

⑰ H. J.于戈，1979年，第111和以后各页。

⑱ H. J.于戈，1979年，第675页，第574－575页；于戈认为牛车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看来并不适合于在真正的跨越撒哈拉的贸易中使用，尽管（如H. J.于戈，1979年，第573页所明确指出的）可能曾短途运输原木、泥土和芦苇之类物品，特别是在萨赫勒南部热带草原地区牛车可能发挥过较大作用。

都经过精心选择，先是根据自然条件确定，后来则沿袭惯例。有时提到一条沿海路线（巴克里在11世纪提到过，却并不认为这条路线有实际重要性⑲）；近期的研究发现这条路线险阻重重，险象丛生：处于北纬24～26度之间，荒凉的滨海地带毫无人类生存的踪迹，即便在新石器时代也是如此。⑳

372 往东进入当今的毛里塔尼亚，由于南北两条50毫米等雨量线在阿祖基一带趋向靠拢，因而此地宜于发展穿越沙漠的旅行。再往东便是萨乌拉河谷，其北边是古拉拉和塔瓦特，这几处地方很快便引起商队旅人的注意。㉑ 这条路线特别重要，自第10世纪以来一直是沙漠商旅最经常利用的一条跨越通道。再进一步往东，就必定到达姆扎布绿洲的瓦尔格拉，由此南下则是伊福拉斯高原和提莱姆西谷地㉒，到了这一带便可像前面所述那样容易地找到一条通道。然而瓦尔格拉直到第8世纪才出现于历史记载，㉓ 可能到那时才成为塔哈尔特到加奥商路上的一个补给站。㉔ 在此附近发展起了伊塞德拉顿（萨德拉塔）城，这是第10世纪初，法蒂玛王朝战胜后被赶出塔哈尔特的易巴德教派难民所建立的一个城镇，由于周围环境恶劣，该城镇未能存在多久。㉕ 但是，第11世纪小镇丛生的姆扎布㉖和第10世纪日渐兴盛的瓦尔格拉则逐步发展成为跨越撒哈拉来往的中心，堪与塔瓦特媲美。

第8世纪最后25年间，塔哈尔特镇的人认为"通往苏丹之路均是经商贸易之道"。㉗ 我们从而可以推断早在8世纪下半叶当时的人们便已开始探索与"黑人地区"沟通联系；但直到10世纪这种联系才正式建立起来或是有据可查。虽然讲柏柏尔语的人早就在探寻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通道，但要开辟商路、进行经常性贸易则需要经济上的刺激和人们的决心，塔哈尔特镇只是隐约显露出最初的活动萌芽。单有"自然条件"并不足以创立商路，最终还得取决于经济方面的需求。

由此继续东行，越接近尼罗河，早期联系的痕迹越明显。但是根据现已发表的著作还不能勾画出一条十分确定的路线。加拉曼特人所起的作用至今仍是个争议问题。㉘ 现在人们认为费赞地区与乍得湖一带曾有过贸易往来，卡瓦尔地区则为南方提供食盐。㉙

373 但是我们还不能勾画出同乍得湖以南地带各族人之间可能进行的贸易格局的概貌。㉚ 从

⑲ J. M. 库奥克（J. M. Cuoq），1975年，第95页。

⑳ N. 珀蒂梅尔（N. Petitmaire），1978年，第327页；J.-C. 罗索（J.-C. Rosso与N. 珀蒂梅尔所作补充，1978年。

㉑ 见J. L. 埃沙利耶（J. L. Echallier），1970年。他断定塔瓦特和古拉拉一带最早的定居点始于第10世纪。

㉒ J. -P. 布兰克（J. -P. Blanck），1968年，指出：提莱姆西河谷，在公元前5500年时很可能还是干地，一万年前肯定更是如此。

㉓ T. 莱维基，1976年。

㉔ 同上，第12页。

㉕ 该镇于11世纪被遗弃。

㉖ H. 迪迪隆（H. Didillon）、J. -M. 迪迪隆（J. -M. Didillon）、C. 多纳迪厄（C. Donnadieu）与P. 多纳迪厄（P. Donnadieu），1977年，第32页；A. 拉弗雷奥（A. Ravereau），1981年。

㉗ T. 莱维基，1962年。

㉘ 见R. C. C. 劳（R. C. C. Law），1967年（b）；J. 德桑热，1962年，1976年；G. 坎普斯，1980年。

㉙ D. 兰格（D. Lange），1978年，第497—499页。

㉚ J. -P. 勒伯夫（J. -P. Lebeuf）、A. M. D. 勒伯夫（A. M. D. Lebeuf）、F. 特雷南-克洛斯特尔（F. Treinen-Claustre）与J. 库尔坦（J. Courtin），1980年；J. -P. 勒伯夫，1981年。在后一本概论中，作者设想9世纪时乍得湖以北的狩猎部落挥舞长矛南下。

乍得到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一条通道有可能曾用来输出奴隶，但确切时期尚无法肯定；这一点是从雅库比的书中推断出来的，他描述了9世纪中叶的情形。[31]

接近尼罗河一带，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河上交通网络以及西侧与河平行的一条陆路商道，商道沿途是一连串沙漠绿洲。这些绿洲与尼罗河之间还有东西向的通道[32]以及至少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形成的通向红海的商路。[33] 从埃及法老时代早期直到本章论述的这个时期，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与努比亚的关系。埃及穆斯林统治者与马库拉王朝出于双方利益的考虑缔结了一项条约（巴克特条约），从而确定了双方间的关系。[34] 该条约规定每年向北方输送几百名黑奴，直到马木路克统治之前，履约情况都还相当不错。努比亚缓冲地带可能挡住了埃及穆斯林经由达尔富尔高原进入乍得湖流域的直接通道。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4世纪，并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虽然这并未能阻止埃及穆斯林统治者染指瓦迪－阿拉基和努比亚的黄金矿藏，却使他们同"黑人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化。唯一畅通的道路同一条古老商路并行，其前一段，即从尼罗河到锡瓦绿洲的一段路，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熟悉。5、6世纪机灵的修道士在这条商路上从事圣·梅纳斯文物交易，这位圣者的修道院坐落于亚历山大郊外。[35] 许多论著认为，道路沿此线西行，先穿过库夫拉绿洲，[36] 然后很可能是由东向西穿越卡瓦尔，再经卡萨巴（盖扎比），[37] 最后抵达马兰代特（马兰达）和加奥。

雅库比曾在9世纪提及过这条通道，他没有确切说明年代，但笼统用的是现在时态。[38] 一个世纪之后，伊本·豪卡勒认为，此路因过于危险已被放弃。[39] 他的论述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们若按他所描述的那些道路画一张全貌图（插图14.2），就会发现他认为"埃及"商路日渐衰落，而且他"不理会"易巴德教派居住的地方同苏丹之间的联系[40]而只专注于从锡吉勒马萨到加纳的"法蒂玛"商路。他明确指出这才是"他所处时代"最繁忙的一条商路。[41] 但是，当这条路线延伸到加纳以南地区，伊本·豪卡勒提供的情况就明显有误，地理位置多为杜撰臆造，路程距离也完全含糊不清。更有甚者，伊本·豪卡勒有意不在书中附图上标出他所提及的地名（萨马、库加、吉亚鲁与库扎姆），后人不断沿用这些名词。他本人却情愿称这一地区为"黑人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地方"。[42]

374

---

[31] J. M. 库奥克，1975年，第49页。见D. 兰格与S. 伯绍德（S. Berthoud），1977年，第34－35页，他们的假设看来是完全合理的。

[32] 关于商路的体系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0章。

[33] 关于法蒂玛统治时期与红海地区联系的发展见J.－C. 加尔桑（J.－C. Garcin），1976年，第71和以后各页。

[34] 关于巴克特条约见L. 特勒克（L. Török），1978年；关于法蒂玛统治时期见I. B. 贝希尔（I. B. Beshir），1975年，并参阅本书第8章。

[35] J. 德维斯，1979年（a），第38和以后各页。

[36] T. 莱维基，1965年（c）。

[37] D. 兰格与S. 伯绍德，1977年，第33页。关于这条道路见本书第11章。

[38] J. M. 库奥克，1975年，第49页。

[39] 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1964年，第58、153页。

[40] 同上，第68页，他称易巴德教派和努卡里教派为"邪恶的伪君子"和"分裂主义者"。

[41] 同上，第58页。

[42] 同上，第61页。

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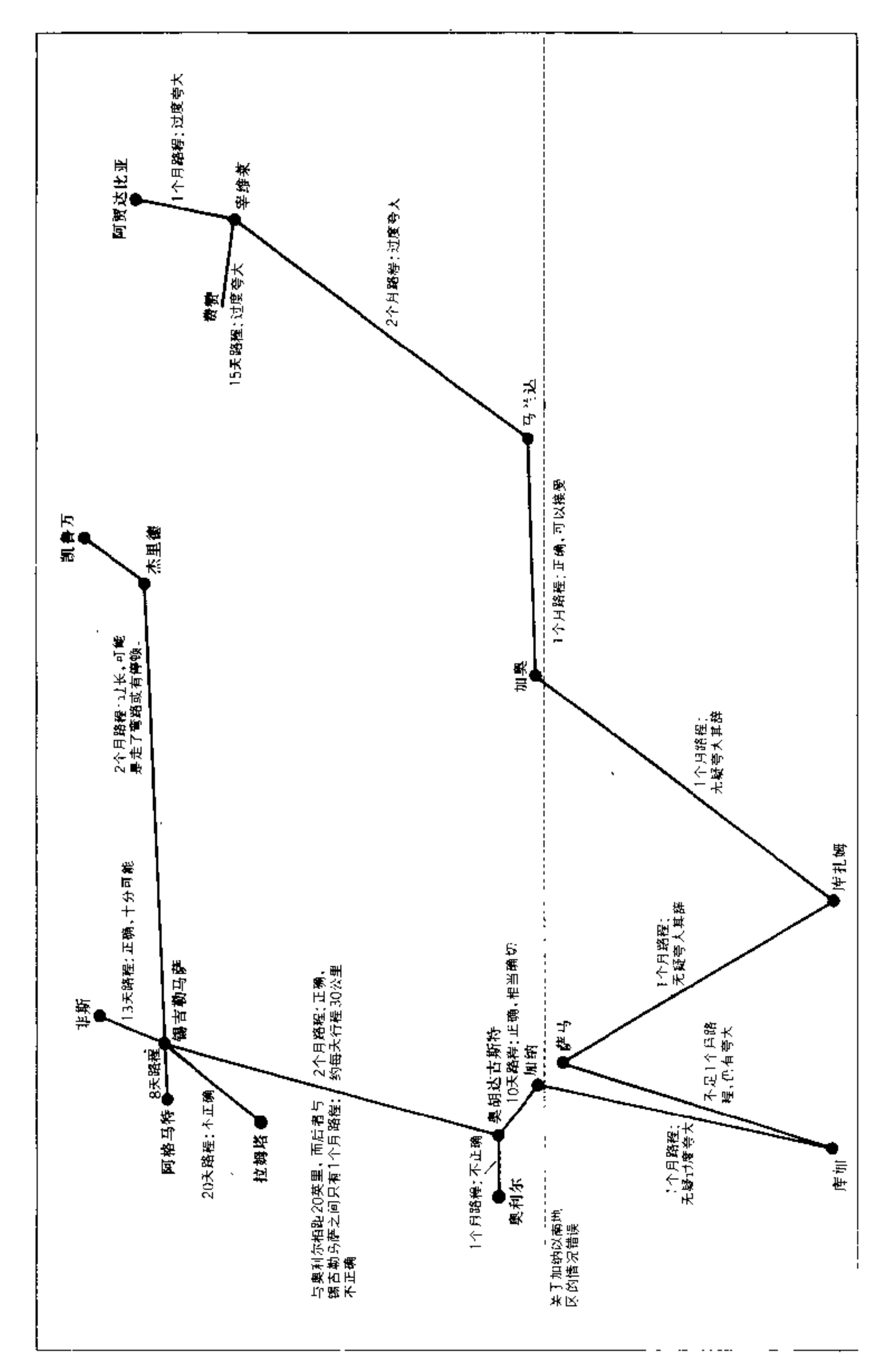


插图14.2 伊本·豪卡勒描述的商路

我们应该以此为戒：关于商路的各种论述都有政治上的考虑，完全出于作者的选择。关于古埃及商路的例子尤为明目张胆。公元 982－983 年间伊朗的一份材料《世界边缘》(*Hudūd al－'Alām*) 称，这条路要用 80 天才能走完，全程只有一处地方可以补充水和饲料，埃及商人通过此路往“黑人地区”贩运“食盐、玻璃和铅”。㊸

伊本·豪卡勒之所以不重视埃及商路恐怕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缘故，很可能是 9、10 世纪间经济方面发生某种重大变化的反映。无论巴克里还是伊德里西，这两位从事穿越撒哈拉商路研究的著名编年史学家都没有再提起过埃及商路，9、10 世纪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使这条路被废弃不用了。

事实上，的黎波里塔尼亚、乍得和大西洋地区在 9、10 和 11 世纪间确实发生了一些关键性的变化；而尼罗河周围其他地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新近考古研究揭示出的萨赫勒地区生活景况㊹

单凭新近对西非铁和铜的研究成果㊺就足以对有关纪元前各时期的许多公认定论提出质疑。在穿越撒哈拉沙漠经商壮举之前，沙漠以南地区就已经长途贩运上述两种重要商品，而并不需要北方的参与。㊻ 如果查看一下新近考古学家报道过并已确定年代的遗址图，㊼ 我们可以从这些最新发现中，了解到有关尼日尔河中游和塞内加尔河流域重要性的一些令人惊讶的情况。 **376**

班迪亚加拉－托洛伊地区（公元前 5 至 2 世纪）、杰内－杰诺地区（第一阶段自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50 年，第二阶段自公元 50 年至 400 年）和贝戈地区的遗址发掘证明这三个地区在公元 5 世纪之前经济生活十分活跃。

考古发掘证实，在公元 5、6、7 三个世纪里，塞内加尔河流域㊽以及塞内加尔南半部已有经济活动，并没有发现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影响。同样，从尼亚尼到通迪达鲁，沿尼日尔河流域远至当今尼亚美的城郊，情况显然也是如此。马兰代特、伊费和象牙海岸各遗址也发现了过去大量经济活动的迹象。远在撒哈拉沙漠贸易对南方产生巨大影响之前，萨赫勒地区早已出现金属冶炼、劳动分工和贸易这些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塞内加尔河流域、尼日尔河流域以及由此再往南去的地带，定居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所有基础设施早在这些“蒙昧世纪”时期业已形成，不必担心今后

㊸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69 页。

㊹ 见 J. 德维斯，1982 年（附有新近的文献目录和一幅遗址图）；S. K. 麦金托什（S. K. McIntosh）与 R. J. 麦金托什（R. J. McIntosh），1981 年。

㊺ 除 S. 伯尔努斯（S. Bernus）与 P. 古莱奎尔（P. Gouletquer），1974 年，1976 年之外，另见 D. 卡沃科雷希（D. Calvocoressi）与 N. 戴维（N. David），1979 年；D. 格雷贝纳特（D. Grebenart），1983 年。

㊻ 详见 R. J. 麦金托什与 S. K. 麦金托什，1981 年；R. J. 麦金托什与 S. K. 麦金托什，1980 年（b）。本书作者采用他们的大部分结论。

㊼ 见 R. J. 麦金托什和 S. K. 麦金托什，1981 年；J. 德维斯，1982 年。

㊽ 最近在塞内加尔河靠毛里塔尼亚一侧所得的研究成果（尚未发表）已提供了大量令人惊讶的新证据。毛里塔尼亚科学研究所即将发表的材料值得仔细研读。

的研究会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49]

到了第8和9世纪，我们看到除了进一步的发展（顺便提一下，这一发展进程直到第10、11世纪仍在继续）之外唯一的新生事物就是北部商业城镇（泰格达乌斯特与昆比·萨利赫）的出现。这种趋势也是10、11世纪的特点，先是阿祖基随后是瓦拉塔两镇的兴起，以及塞内加尔和尼日尔地区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仔细考察遗址中的发现物进一步使人确信，研究工作正使具有重要影响的萨赫勒文化重现其本来面貌；来自北方的商贩当时就是与这种文化发生接触。就第7世纪之前各时期而言，通迪达鲁、[50] 杰内－杰诺[51] 与班迪亚加拉[52]三处的发掘大有收获。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地区铜、铁贸易方面，S.K.麦金托什和R.J.麦金托什的见解特别重要。[53] 关于塞内加尔河流域各地区的资料没有那么详尽，[54] 但仅试掘地带的规模就足以对塞内加尔河与冈比亚河之间地区在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里的人口定居密度得出令人生疑却又不容忽视的估计。[55] 在辛丘－巴拉遗址找到了十分重要的青铜器（发掘所获尚未完全发表）。[56]沿塞内加尔河两岸各遗址出土了许多该时期制绳用的圆盘，由于出土年代不长还无法得出肯定的判断；而这同时也表明当时技术发展的水平相当高。[57] 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大量迹象说明自8、9世纪以至可能更古远时期之后，铜合金的冶炼从未间断过，其中一种原料很可能来自阿克儒特。[58] 最早的考古发掘还曾在这里发现同样古远的时期曾使用失蜡浇铸模具的证据。[59] 当地这种冶炼术显然与N.兰伯特所研究的是一脉相承的，[60] 肯定很早便起着某种联系地区之间经济的作用。

最后，将有关适应环境、畜牧业、农业和食物等方面仍然少得可怜的点滴资料联系到一起来看，我们发现就连关于8至9世纪之前的这个时期，考古研究也还是提供了一

---

[49] 当然，这一新发现将该地区发展的开始期大大推前了一步，但这并不能证明第5至7世纪就是非洲萨赫勒地区有组织的生活、贸易和文化发展的开端。仅仅新近有关铁和铜的发现就足以使我们警惕不要再犯新的类似判断错误。这些发现使人们对J.安匡达赫（J. R. Anquandah），1976年著作中关于萨赫勒地区经济发展论述中的观点产生怀疑。

[50] J. F. 萨利埃热（J. F. Saliège）、Y. 佩尔松（Y. Person）、I. 巴里（I. Barry）和P. 丰特斯（P. Fontes），1980年。借助碳－14精确地测定了发现物的年代：距今1330－40，距今1245－40，即公元620－655年间。

[51] S. K. 麦金托什与R. J. 麦金托什，1980年（b），这二位作者认为该遗址自公元2世纪起便有城镇生活；他们估计在公元900－1000年间该镇面积为40公顷。

[52] R. M. A. 贝多（R. M. A. Bedaux），1972年。

[53] 特别是在第二、三阶段（公元50－400年和400－900年）有几次难得的铜进口交易，显然与跨越撒哈拉的贸易无关；S. K. 麦金托什与R. J. 麦金托什，第76页。作者在该书第444－445页上同样论证了铁的交易，当地不生产铁，很可能是与上游产铁地带交易而得。

[54] 见G. 蒂尔曼（G. Thilmans）、C. 德康（C. Descamps）与B. 哈亚特（B. Khayat），1980年。

[55] V. 马丹（V. Martin）与C. 贝克尔（C. Becker），1974年（b）。塞内冈比亚史前遗址见1977年版《塞内加尔全国地图集》（*Atlas National du Sénégal*），第8印张，第51页。

[56] A. 拉维塞（A. Ravisé）与G. 蒂尔曼，1978年；G. 蒂尔曼与A. 拉维塞，1980年。

[57] G. 蒂尔曼，1979年，记述了42处遗址的发现，其中10处共获得10个以上圆盘。在泰格达乌斯特显然也发现了一只制绳圆盘，见D. 罗贝尔，1980年。

[58] 见C. 瓦纳克尔（C. Vanacker），1979年，第136和以后各页；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年；J. 波莱（J. Polet），即将出版；D. 罗贝尔－沙勒厄，即将出版；与B. 赛松（B. Saison），即将出版。

[59] D. 罗贝尔－沙勒厄，即将出版。

[60] 见N. 兰伯特（N. Lambert），1971年。

些重要的新答案。在杰内－杰诺，人们从古远时代起便食用鱼类和两种牛科动物，而且还可能吃大米（*Oryza glaberrima*），⑥¹ 时间被确认是在公元400年之后，900年之前（即第三阶段），同时期还食用某种粟类作物。⑥² 但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依旧很短，从发掘出土的遗骸看：6人可能不超过25岁，1人逾30岁，3人为30－35岁，1人为45－55岁。⑥³ 泰格达乌斯特从很早时期（8世纪或更早）起便有充足的牛肉；家禽（珍珠鸡）**378** 和家畜或牲畜构成日常主要食物。⑥⁴ 在尼亚尼，经考证人们从8、9世纪起食用高粱，大约从9、10世纪起吃小扁豆。⑥⁵

如今，所有这些都说明，北方人穿越撒哈拉沙漠后注定要接触的这些人类社会在当时已经具备内聚力而且组织得很不错，城镇业已出现，完全能够开展贸易，有时还是远途贸易。而且，从上述这个观点看，值得注意的是：食盐贸易网很可能从那个时期起即已存在。⑥⁶ 让我们回顾上文所引《世界边缘》（*Hudūd al-'Alām*）一书的证言以及穆哈拉比的记述，这表明公元10世纪加奥王公的财富主要来自其食盐资源。⑥⁷

撒哈拉沙漠以北的情况

就本章的目的而言，只要选择撒哈拉以北情况中某些对经济史⑥⁸ 和跨撒哈拉联系史有重大意义的特点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在当今的摩洛哥一带，有5个地区与我们的课题有关。第一个是大西洋沿岸各平原和里弗山脉的大部分地区，当地各族居民渴望保持独立。其中巴尔加瓦塔人最有代表性，他们抵抗各种统治的斗争至少持续到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时期；然而尽管尚未完全搞清楚，他们通过贸易上的联系，特别是与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的贸易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看来与萨赫勒地区没有来往。第二，伊德里斯王朝分成许多支系，不仅统治着北部地区、包括他们创建的首都非斯周围地区和梅克内斯，而且还有中阿特拉斯山区。根据现已发表著作看，他们与黑非洲也无来往。⑥⁹ 第三，北部从休达到霍奈恩有一系列海港，与邻近的西班牙之间沿海贸易来往频繁，当时这些港口的生存总是相当直接地依赖（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经济。⑦⁰ 第四，阿特拉斯与小阿特拉斯两山之间

---

⑥¹ S. K. 麦金托什与 R. J. 麦金托什，1980年（b），第188页。

⑥² 同上，第190页。

⑥³ 同上，第177和以后各页。

⑥⁴ 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年。

⑥⁵ W 菲利波维亚克（W. Filipowiak），1979年，第107、113页。

⑥⁶ J. 德维斯，1970年；从大西洋沿岸至尼日尔河之间：毛里塔尼亚的塔甘特以及奥胡达古斯特是重要补给站，卡瓦尔与乍得之间（D. 兰格与S. 伯绍德，1977年）、阿伊尔与邻区之间、等等；可能都曾有类似的贸易关系。S. K. 麦金托什与 R. J. 麦金托什也持此种观点，1980年（b），第446页。他们并未进一步研究记录，但认为自5世纪后撒哈拉以南地区食盐贸易十分活跃。

⑥⁷ J. M. 库奥克，1975年，第78页。

⑥⁸ 关于北非各地区间的贸易联系，见C. 瓦纳克尔，1973年。

⑥⁹ D. 厄斯塔什（D. Eustache），1970－1971年。根据这位作者精心编制的大事年表，并没有伊德里斯王朝铸造金币的线索；这一论证很有说服力，但就他们与南方各种关系而言，还不能因此而论定。

⑦⁰ 如果伊本·豪卡勒的说法确实可信，10世纪西班牙的影响远至大西洋岸边的塞布河一带；见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77页。

379 的苏斯地区很早便被阿拉伯作家誉为富饶之地。[71] 就在此处诞生了坦杜尔特[72] 这个南下商路的最早起始地。阿特拉斯山脉两侧与达拉河谷的各个南下的起始点是直到公元10世纪才涌现出来的。最后，中阿特拉斯山脉靠撒哈拉沙漠一侧的锡吉勒马萨（巴克里关于该城建立的几种说法自相矛盾）肯定从8世纪下半叶开始就成为与南方联系中商队的歇脚地。[73]

正如所有作者告诉我们的，南方当时是伟大的牵驼夫的王国，他们是沙漠的主宰，这种人不知道面包为何物，也不懂得农耕，只是与他们的骆驼休戚与共。他们中间包括伊本·豪卡勒早在10世纪时便提到过的巴努·马苏法人；这些牵驼夫对道路了如指掌，蒙着面纱，在冬季穿越大沙漠。[74] 再早一些时候，伊本·法基赫·哈马达尼提到过拉姆塔人，当时已经会制作著名的盾牌，"他们用酸腐的奶汁鞣革整整一年，刀剑砍上去便会被震脱手"。[75] 这种人被认为是雷蒙德·莫尼当年详细记述过的"阿达尔克人"。[76] T.莱维基最近探讨过这些群体的伊斯兰化问题；[77] 关于这个疑难课题无疑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

一旦柏柏尔人被平定之后，伊弗里基亚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特别是在阿格拉布王朝时期。就跨越撒哈拉的联系而言，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此地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第纳尔铸币。[78] 在这方面，A.S.埃伦克鲁兹的一篇调查报告讲到阿格拉布第纳尔，[79] 所有这些铸币含金量都很高（平均含金98.99%）。[80] 若按铸币年代分类则可看出纯度最低的铸币产于9世纪初叶，公元817年以后出产的含金度很高；841－863年间出产的都是足赤金币。[81] 这说明阿格拉布时代人们有办法获得黄金并用于铸币。然而，这些黄金究竟主要
380 是来自他们曾征服的西西里岛[82]，还是9世纪取自"黑人居住的地区"，[83] 至今尚难以确定，历史学家仍在争论不休。[84] 首先，在阿格拉布时代铸币问题上，我们没有获得像

---

[71] 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89页。

[72] B.罗森伯格（B. Rosenberger），1970年（b），第106页。该城镇曾存在于10世纪；雅库比（Ya'kubi）提到过此镇。

[73] 雅库比（见J. M.库奥克，1975年，第48页）称，该镇在"黑人地区"，路程约50天。伊本·豪卡勒（1964年，97页）则认为早在10世纪锡吉勒马萨与南方贸易就"从未中断过"。

[74] 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100页。

[75] J. M.库奥克，1975年，第54页；引文写于公元903年。

[76] R.莫尼，1961年。

[77] T.莱维基，1970年。

[78] J.德维斯，1970年（第140页）对此谈得过于肤浅。

[79] A. S.埃伦克鲁兹（A. S. Ehrenkreutz），1963年。

[80] 同上，第251页；仅一枚含金83%；其余的有6枚含金95－97%，22枚含金99%，3枚为纯金币。

[81] 同上，第252页。

[82] M.塔尔比（M Talbi），1961年，第250－251页，提出的这一假说。

[83] 同上（第458页）指出，埃米尔卫队中黑人卫兵的比例很高；他们完全可以是经本书前文所述那条贩奴之路来自乍得一带。而且，新近关于11世纪诺曼人征服此地之后蒙雷阿莱大教堂收藏品的一篇研究著作也间接证实了曾有黑人流入伊弗里基亚。该著作称，大教堂雇用的穆斯林劳动力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伊弗里基亚的黑人；见H.伯彻（H. Bercher）、A.库尔端（A. Courteaux）与J.穆顿（J. Mouton），1979年。

[84] H.贾伊特（H. Djait）、M.塔尔比、F.达克劳伊（F. Dachraoui）、A.布伊卜（A. Bouib）与M. A.穆拉贝特（M. A. M'Rabet），未注明著作年代，第57页，认为与黑非洲的联系还只是一种假说。M.塔尔比（1966年，第173页）认为，S. D.戈伊坦（S. D. Goitein）在研究报告中提到犹太商人信中讲的10－11世纪伊弗里基亚商贸活跃的现象表明同等水平的活动在9世纪业已存在，其先决条件在于从非洲进口黄金。

R. 梅西耶就此后各时期第纳尔古币进行重要化验研究得出的那类成果。[85] 其次，参考文件不多且难知其含意。T. 莱维基在其许多关于易巴德教派的研究[86]中强调，这个教派构成阻拦阿格拉布王朝向南渗透的政治和思想意识屏障；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或表示过：尽管他们垄断了撒哈拉商路的交通，却不曾向凯鲁万的总督们出售黄金。巴克里在 9 世纪曾把在坦杜尔特至奥胡达古斯特一路上掘井的功劳归于阿卜德·拉赫曼·本·阿比·奥贝达·费赫里。此人在公元 749 年控制了伊弗里基亚的政府，[87]后于 755年遇刺身亡。新近公布的一份材料称他于公元 752－753 年间劫掠了特莱姆森，从而征服整个马格里布。[88] 据说很早以前，约在公元 734 年，伊弗里基亚总督就曾下令远征产金之地，[89] 这也归功于费赫里。即便这次袭击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即便此事导致沿途一路掘井（最南处的井至多到北纬 23 度线），也远非等于开辟了通达（北纬 17 度的）奥胡达古斯特和产金之地的道路。[90] 似乎很难想象伊弗里基亚竟会寻找一条西部通道，借道姆扎布显然更方便得多。现在还不可能具体了解 8、9 世纪伊弗里基亚与西非有什么经济来往，甚至不清楚阿格拉布王朝在这方面是否有过始终一贯的政策。最多也只能或多或少地假定，作为东起的黎波里塔尼亚南部——奈富塞山一带——西至今日阿尔及利亚西部这一大片地区的统治者，易巴德教派当时曾试图建立起跨越撒哈拉的经常性联系。伊弗里基亚出现黄金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塔哈尔特马加奥之间存在联系的确凿事实更增加了这一假说的可靠性。因此，塔哈尔特成为我们所知初期跨越撒哈拉经常性联系的一个主要 **381** 枢纽。这些联系是同加奥而不是与加纳的来往，而且有理由怀疑塔哈尔特商贩是否真的未曾试图向囤积并倒卖食盐的加奥领主提供货源。最后，我们必须牢记塔哈尔特的伊玛目曾与锡吉勒马萨的米德拉里特人联姻结盟，希望确保在西路日益发展的贸易中分享所得。

因此，就 8、9 世纪而言，除非研究人员能得到更确切的资料，特别是在锡吉勒马萨和塔哈尔特的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目前不得不只限于接受关于跨越撒哈拉贸易北端曾有几大起始点（坦杜尔特、锡吉勒马萨、塔哈尔特、瓦尔格拉，以及杰里德诸城镇）和跨越撒哈拉的商队组织其早的假说。

因而正如埃及商道的例子一样，此处必须指出，这一问题的所有论据都是随着伊本·豪卡勒与巴克里的记述转的，前者提及 10 世纪中叶的情况，后者通过援引 10 世纪学者瓦拉克的许多说法有时也提到 10 世纪的情况。正是这两位的上述记述使我们假定 10 世纪或是 850－950 年间发生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导致产生经常性的跨越撒哈拉贸易往来。

---

[85] 见下文第 386 页。

[86] 主要文献书目见 J. 德维斯，1970 年，第 124 页。

[87] 见 E. 莱维－普罗旺卡（E. Lévi－Provençal），1960 年。

[88] H. R. 伊德里斯（H. R. Idris），1971 年，第 124 页。

[89]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Ibn 'Abd al－Hakam），1922 年，第 217 页。

[90] 见 S. 达沃，1970 年，第 33－35 页。

何种贸易？寻求何种商品？

从8世纪看，上面提到的南北两个地区间的交往，在此前2000年间由于环境的变化日益更趋困难重重。针对这种情况，人们把骆驼这种穿越沙漠的珍贵工具引进这一带已有若干个世纪。

然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没有解决：从沙漠的另一端可以得到什么？对南方来讲可能对答案所知甚微！由于对食物的需求与地中海一带截然不同，就消费产品以及整个结构调剂而言，从南方毗邻地区进货肯定要比远道跋涉撒哈拉以北更好。食盐虽不富余，但由于掌握一些生产技术，备有存货，且有若干产地，供应无疑相当不错。我们切不可被自伊本·豪卡勒之后那些阿拉伯材料引入歧途；那些资料造成的印象是，非洲萨赫勒地区根本没有食盐，完全依赖北方商人贩运。

事实上，尽管从北方进口食盐的价格不容否认与地中海一带市价之间的差距很大，但必须指出有些细微的差别。[91] 伊本·豪卡勒、巴克里与伊德里西都提到奥利尔不断生产和出口食盐。伊本·豪卡勒称之为撒哈拉以南主要食盐产地。[92] 巴克里描述产盐区生活时提到当地出产龙涎香的一段沿海地带[93]居民食龟。[94] 伊德里西则指出该盐矿还具有重要的区域性作用，其产品经"尼罗河"航运到整个"黑人地区"。[95] 伊本·豪卡勒及其之后的作者所记述的一切都是为了说明，北方商贩当初是奥利尔的顾客，只是在离开盐矿时才不得已而经由奥胡达古斯特（恰好是从这段海岸到尼日尔河流域之间的理想供水点），他们利用撒哈拉沙漠中部南北通道上的各个盐矿逐渐探索出缩短这种旅程的办法。这使他们找到了对南方食盐市场增加压力的途径，并以加纳和奥胡达古斯特为例极力制造当地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印象；事实上只是对产品的销售施加压力，因为食盐开采与运输都处于垄断之下。但是，热带草原和森林地带历史上食盐生产和消费的情况尚不得而知，这里的食盐生产很可能未曾经受来自北方的压力。南方并不需要更多的铜（这与20年前的观点正相反）或铁，南方已经能够生产，尽管产地分散却管理得法，也能满足需要。因此在跨撒哈拉贸易方面，北方的需求大于南方。

382

就本章论述的这段时期和西部非洲而言，对奴隶的需求很可能一直被过分地夸大了。克劳德·卡亨指出，根据9、10世纪阿拉伯人所提供的资料，[96]可以从实际利润率，并考虑风险的大小，十分明确地衡量远途贸易的价值。他还指出奴隶贸易一般似乎并非高额利润的来源。[97] 但是卡亨称，必不可少地需要进口奴隶，因为"经济勃兴通常……

---

[91] J.德维斯，1970年，第111和以后各页提到了这种差别。

[92] 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91页；事实上他似乎不知道其他产盐地。

[93] R.莫尼，1961年，第155页。

[94] 同上，第260页。

[95] 同上，第407页。

[96] C.卡亨（C. Cahen），1977年，第339页，所引资料包括：法蒂玛王朝臣民阿布·法德勒（Abūl - Fadl）与迪马什基（ad - Dimashqi）所著《贸易的福音》（*Tabassur al - Tidjāra*，伊拉克，9世纪）和《贸易的益处》（*Mahasin al - Tidjāra*）。

[97] 同上，第341页：很少有极高的价格；一般售价为30－60第纳尔。

需要并促成日益增加雇佣劳动力，而通过奴隶贸易很容易做到这一点。”[58] 因此，奴隶贸易是一种固定进口项目，但可能并不是经济的主要动力；从而它不能用来解释跨撒哈拉贸易的开展。年度需求量可能极有限，[59] 而且非洲大陆东北部的奴隶贸易组织得比西北部好。

根据考证，当时北方并不需要进口食物：南北相隔的距离以及主食结构差别说明，人们并不是为了购进粟类、柯拉果（13世纪之后才进入北方）或胡椒而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阿拉伯商人从亚洲买胡椒，非洲“胡椒”在此后很久才有小批量上市。同样也并无迹象表明，北方人南下采购当地土法染制的织物，因为在11世纪之前尚无大规模染织生产的证据。[60]

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回到所有阿拉伯作者无人不讲，所有历史学家无人不关注的那种产品：黄金。关于这个题目的文著汗牛充栋、鱼龙混杂、好坏都有。我们这里不打算涉及考古学或人种学方面的问题，本章要谈的首先是经济问题：即要确定在什么时期、什么环境下和出于什么目的，北方对黄金的需求导致与萨赫勒地区的经常性贸易得以组织起来。

穆斯林世界当时是主要的黄金消费者之一，7世纪末宗教改革之后更是如此，在同其邻近地区的关系方面它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区域。在本章论述的这一时期，黄金很可能是来自亚洲、努比亚，或是法老时代藏金的再度流通，而不太可能来自西非和今日津巴布韦一带。[61] 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阿格拉布王朝所辖的伊弗里基亚之外，穆斯林世界西部在10世纪前不曾铸造金币。[62]但自10世纪起则铸币成为消耗黄金的主要用途。也是从那时起（当然并非巧合），关于非洲黄金生产的信息中的臆造成分有所减少（至少相对而言），地理叙述更加精确，这些消息首次主要出自西方作者的手笔。

这里有必要把话题扯得远一些。所有穆斯林的古币理论家都把未经提炼的天然黄金白银和铸成硬币的金银明确地加以区分。在穆罕默德迁离麦加（*hidjra*，希杰拉）之前不久，在麦加称天然黄金为“提卜尔”（*tibr*），铸制黄金称“艾因”（*'ayn*）。[63]R.布伦什维格在他新近的一篇文章[64]中也同样地区别 *tibr*、*sābika*(铸金块)和第纳尔金币。这一简单事实说明，将 *tibr* 译成“金沙”必须重新考虑。这里，还有必要谈一下J.M.库奥克归纳的他翻译资料中对 *tibr* 和 *dhahab* 两字的处理办法。[65]

---

[58] 同上。

[59] 努比亚与埃及缔约之例对我们颇有启发：每年在阿斯旺最多交出500个奴隶以换取努比亚宫廷所需物资。

[60] 就北部非洲与“黑人地区”之间联系而言，上述这一切完全有可能。但此时的黎波里塔尼亚也许已经属于另一种情况：伊本·豪卡勒提到阿贾达比亚生产并出口羊毛织物（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63页），从而引出卡瓦尔所产明矾可能发挥某种作用的问题，这种说法与D.兰格与S.伯绍德（1977年）措词确切的提法相似。

[61] 这些方面的有关文献多而冗长。近期著作中值得查阅C.卡亨，1979、1980年。此处应指出，R.萨默斯（R. Summers），1969年，认定南方金矿的开采始于6世纪，到8世纪已很发达，自10世纪起支撑每年大量出口贸易。迄今无人利用这些资料像我们大多数人研究西非黄金销售那样地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黄金的销售进行全面性经济研究。

[62] 最新文著：C.卡亨，1979年。

[63] G.P.埃内坎，1972年，第7—8页注5。

[64] R.布伦什维格（R. Brunschwig），1967年。

[65] J.M.库奥克，1975年。

法扎里与伊本·法基赫等最早期的作者[106] 用 dhahab 一词泛指黄金，包括“像胡萝卜那样生长的东西”。[107]由于人们普遍器重巴克里在这方面的著述，我们曾请教过一位突尼斯年轻研究人员，他是阿拉伯文学专家和卓越的语言学家。我们请他尽可能精确地译出下面这段文字[108]：

> 如果在本国任何一处金矿中发现一块[109]黄金，国王总是挑走最佳部分，[110] 而将剩余的天然未经提炼的碎金留给下民。[111] 否则下民手中纯金[112]过多会降低黄金的价值。足色块金重大约一盎司（ūḳiya）至一拉特尔（ratl）。据说国王家中藏有一块大如卵石的黄金。[113]

这段译文为如何翻译 tibr 和 dhahab 这一对词提供了一种新方案。加利在他查阅的所有书中发现，tibr 的词意都如上所述：即指未经铸造或加工的天然黄金，很可能是碎粒或是沙金；每一处都将未经加工的黄金（tibr）与加工过的黄金（dhahab）相对比。[114]
385 相反，dhahab 在每一处都含有成色最纯而经过一段提炼的金或银类金属之意。[115] 这样，未经加工的黄金与除去杂矿所得“纯金属核心部分”之间的区别似乎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巴克里的记述。他在书中稍后一段写到纳格马拉塔人的 tibr 贸易。[116] 对于这个矛盾的说法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即留给私人掌握的 tibr 可能一般通过专营商贩出售，而纳格马拉塔人（万加拉人的祖先?）则是在君主控制范围之外经营这种黄金。然而又如何理解巴克里本人的解释呢？[117] 他的大意是说君主通过掌握天然金块的手段调节黄金的流通周转，以免供过于求而贬值。我们能否推断加纳经济通常都缺乏一贯性呢？我们不这么认为。关于金块与金沙之间的传统区分在这里讲不通了。真正的区别在于，“足色”黄金是指统治者留给自己并欲铸币的 dhahab。一个在阿拉伯文化环境中长大的 11 世纪的安达卢西亚人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表达呢？tibr 的品位也很高，却是在统治者控制渠道之外进行交易的“天然”黄金。

一个世纪之后，消息极灵通的伊德里西（与别人通常评论的恰恰相反）提供了新的

---

[106] 同上，第 42 和 54 页。

[107] 后来到 14 世纪，欧麦里（al－'Umari）称 nadjīl 的根为 tibr（J. M. 库奥克，第 273 页），尽管此后他又讲到 dhahab 的求根（J. M. 库奥克，第 280 页）。

[108] 这里指的是努尔 J. 加利（Nouredine Ghali），他正在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

[109] 阿拉伯文 nadra 一词意指“罕见”，加利强调此处指混在矿石中的一块纯金。

[110] 阿拉伯文 astasfa 一词含有“取其精华”或“择优而取”之意。

[111] 此处用阿拉伯文 al－tibra dakīka词组。《语言、文学及科学大辞典》（al－Mundjid fi'l－lughat wa'l－adab wa'l－ulūm）（贝鲁特，1975 年）第 58 页（c）栏中 tibra 的定义为：“混生于杂矿石中未经铸造或加工的黄金。”

[112] 此处阿拉伯文用的是 al－dhahab 一词，因此与前面所用的词显然不同。

[113] 其他译例如下：V. 蒙泰伊（V. Monteil），1968 年，第 73 页，译为“如果该王国任何矿山发现了天然黄金，国王便占为己有，只给其臣民留下金沙……”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01 页译作“如果该国矿山发现金块，国王便留给自己，然而将金沙给其臣民……”。

[114] R. 布拉谢尔（R. Blachère）、M. 舒埃米（M. Chouémi）与 C. 德尼佐（C. Denizeau），1967 年，第 2 卷，第 984 页，援引可能是伊本·阿卜德·哈卡姆的一句话：“他用祖拉拉的天然黄金（tibr）交换纯金（dhahab）”。

[115] 努尔丁·加利给我提供了一句未提作者姓名的引言，摘自《语言、文学及科学大辞典》（al－Mundjid fi'l－lughat wa'l－adab wa'l－ulūm）第 239 页（c）栏、240 页（a）栏，“他在矿石中发现了纯金（dhahab）；他惊喜若狂”。

[116] J. M. 库奥克，第 102 页。

[117] 同上，第 101 页。

细节。[18] 据他所述，北方商人从塔克鲁尔取得黄金（*tibr*），[19] 而万加拉人提供的黄金（*tibr*）则在瓦尔格拉铸成金币。[20] 他明确地表明，万加拉人不可能摆脱加纳君主的控制而自行其是。

在我们看来，将 *dhahab* 译作“块金”和将 *tibr* 译作“沙金”这样使两者针锋相对的做法似乎已使得这场讨论极为平淡无味；而未经处理的黄金与铸造过的黄金之间的区别则使这场讨论大为开阔而有研究的余地。这场辩论无疑只能通过编制索引卡片和系统地翻译这两个字所有用法的手段才能最终解决争议。目前，我们愿意建议再观察一下其他假说，或许有助于解决这一难题。

最后一点，阿拉伯作者在关于西部非洲的著作中几乎不用 *dhahab* 这个词。虽然在 8 和 10 世纪著作中曾出现过，但在巴克里之后的文献中除 14 世纪的两篇[21] 外无人再使用该词。而 *tibr* 一词相反却继续出现。[22] 伊本·哈勒敦[23] 以及后来的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24]也许能提供部分答案，特别是后者曾指出 *tibr* 是指未经处理过的黄金。 **386**

从此往后就我们这方而来说将毫不犹豫地用“未经处理的黄金——提炼或加工后的黄金”取代“沙金——块金”，因为就经济史而言前一种区分更为重要。

如果再进一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黑人地区”内 *dhahab* 一词逐渐让位于 *tibr*。从长远来看，*tibr* 一词很可能用以专指西非黄金。无论其处于什么形状（细粒、沙状、块状或铸块），无论其取自什么样的社会－经济背景，*tibr* 是一种纯度极高足以直接用来铸币的优质黄金。它之所以无须“提炼”是因为它几乎不含杂质，几乎不含其他金属。实际上化验证明，[25] 这种黄金含有银和微量的铜。[26] R.A.K.梅西耶确实打算利用这种含有少量铜的特点在其研究的第纳尔币中鉴别出使用西非黄金铸成的古币。[27] 我们目前对取自法莱梅地区的黄金和一些阿尔莫拉维德第纳尔进行化验分析，[28] 结果证实了梅西耶的研究成果，只是稍稍增添了一点精确性：我们发现含银量与梅西耶发表的数据相差不多，但还发现了他未曾提及的白金，尽管含量甚微，特征却很显著。[29]

这个与经济有关的语义难题显然十分复杂；有朝一日必须彻底地正本清源。

---

[18] 见 T. 莱维基，1966 年。这是一篇广引博征的著作。

[19] J. M. 库奥克，第 129 页。

[20] 同上，第 164 页。

[21] 欧麦里（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264、265 页）最终也并未能解决巴克里（al－Bakri）留下的模糊问题，他说，素丹统治着 *tibr* 金的产地，但他征服出产 *dhahab* 金的一个镇子后（第 265 页）生产便停止了。如果我们认为 *dhahab* 实际是指“政府的黄金”，就能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差别。

[22] 马苏迪（al－Maśudi）、(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62 页)、伊本·豪卡勒（J. M. 库奥克，第 62 页）、巴克里（J. M. 库奥克，第 84、101 和 102 页）、伊德里西（al－Idrisi）（J. M. 库奥克，第 129－164 页）、阿布·哈米德·加尔纳蒂（Abû Hâmid al－Ghamâti）（J. M. 库奥克，第 169 页）以及其他作者一直用到 15 世纪末。

[23] J. M. 库奥克，第 347 和以后各页。

[24] 同上，第 394 页。

[25] R. A. K. 梅西耶（R. A. K. Messier），1974 年。

[26] 我们在泰格达乌斯特的考古发掘中在一段 9 世纪地层里发现一块裹着一小块金子的坩锅残片，金块外面有一层氧化铜。

[27] R. A. K. 梅西耶，1974 年，第 37 页。这种黄金含铜量低于 1.5%，作者排除了合铸过程中掺加的可能性。

[28] 这些研究结果即将由毛里塔尼亚科学研究所发表。

[29] 毛里塔尼亚科学研究所研究助理 S. 罗贝尔先生提供了这一信息，在此谨表谢意。

如果（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tibr* 确实（至少自 11 世纪以后）系指西非那种无须提炼或合铸即可用来铸币的优质黄金，那么即可说明巴克里为何称之为世界最佳黄金，也可以解释人们渴望得到它的急切心情。最近查阅热那亚的档案证实，14 世纪之后热那亚人也倾向于用 *tibr* 一词特指优质的黄金。[30]

阿拉伯文献认定，西非的黄金是精炼成品；不过，当时撒哈拉以南的权势人物，无**387** 论是穆斯林与否，甚至到 1050 年之后也从未用这种黄金铸币。迄今为止，在大沙漠以南未曾发现一个铸模或造币作坊的踪迹。这一事实启发我们考虑某些经济史上的根本问题。假设这种黄金产自星散于各地的数千个矿点，南方是否有可能直接用金铸币？这种黄金即便铸成 4 克重的金币，难道其购买力不会远远超出当地那种贸易（即使对同一时代地中海沿岸居民间的交易来讲也是如此）的需要吗？[31]

然而根据穆斯林法律著述，当时在南方和北方的一切交易中使用加工过的黄金或是铸金都是合法的。穆斯林法理学家规定，不同制币坊出产的第纳尔之间进行兑换时不应有差价（品位明显低劣的除外），第纳尔与铸金块之间的兑换也是如此。[32] 如果加工过的黄金质量不错，自然也包括在这种兑换控制的体系之内。

在北方，特别是第 10 世纪之后，由官方当局制币已成定规。[33] 这在一方面讲是由于穆斯林世界西部各强国日益渴望争霸领土以及它们实际控制力发展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穆斯林世界西部地区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面对北非以及后来扩张到西班牙的各个自行制币的各王朝（9 世纪伊弗里基亚的阿格拉布王朝总督；10 世纪伊弗里基亚的法蒂玛王朝；10 世纪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公元 970 年以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伊弗里基亚的齐里王朝以及后来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每年对货币的需求，贸易便应运而生。然而，当然要到法蒂玛、伍麦叶与阿尔莫拉维德三大王朝先后以穆斯林西方世界前所未有过的规模发展制币业时，跨撒哈拉贸易的生命力才变得引人注目。

谁曾充当散布于南方的 *tibr* 金生产者与北方日渐有序的黄金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呢？阿拉伯文献想当然地认定是加纳承担了这一任务。但是这些文献却没有告诉我们导致这一状况的各个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没有提及奔走于采金者与其他商人之间的中人，商人大概也是到 10 世纪之后才有人提到。

388 最近有人试图估定伍麦叶时期西班牙的年度制币能力。对于这类估计自然不能轻易置信。事实上按此估计，在大量制币的公元 1009－1010 年一年间 [34] 用了约 160 公斤黄

---

[30] J. A. 坎切列里（J. A. Cancellieri），1982 年。作者写道（第 14 页），老的用词 *paiola* 和 14 世纪以后的 *tibar* 一词都不是特指沙金；他在第 16 页中断定，这是一种未经提炼的 21K 黄金，并在第 20 页提及 *tibr* 一词时说它是天然黄金，未曾经过熔炼增加纯度。

[31] 见 P. 格里尔森（P. Grierson），1961 年，第 709 页。

[32] G. P. 埃内坎，1972 年，第 9 页注 4："贵金属几乎总是保持着作为普遍接受的商品这种'准货币'作用，与铸币竞争"他接着在第 10 页写道："用这种金属制币，通过赋予其某种增值使之成为一种货币标志。这种追加价值始终存在，至少从性质上讲是如此。"

[33] 同上，第 9 页，G.P. 埃内坎毫不犹豫地写道："货币之产生，就我们所理解的意义而言，纯属当局行动使然。"同页注 2："当局接纳支付时接受任何一种货币证物这一事实保证了它在私人交易方面也能得到承认，即便这并不一定导致立即淘汰其它与其竞争的支付手段，从而导致某种受偏爱证物的垄断。"

[34] A. S. 埃伦克鲁兹，1977 年，第 270 页。

金共铸制4万枚第纳尔。这样一个巨数与目前博物馆珍藏的个别古币相去甚远。[35] 同一位作者认为从公元879－880年到公元904－905年间埃及图伦王朝每年制币量不超过10万枚第纳尔，[36] 用金量约为400公斤。北方每年制币需用的黄金量不可能根据这两个量值进行准确的估计。也许可以假定需求量最多在一吨上下，这个数量甚至包括了出于种种竞争目的而用的数量（这种竞争通过淘汰对手，往往只对一个王朝有利，先后是阿格拉布王朝、法蒂玛王朝，接着是伍麦叶王朝、扎纳塔以及阿尔莫拉维德王朝；至于齐里王朝的情况就更难分析了）。

无论如何，即便加上珠宝饰物的需求、积畜以及每年流失的金币，也很难想象每年黄金进口量会大大超过两吨，最多不过3吨。这些数字可能使得雷蒙德·莫尼在1961年[37]作出的估计显得过高了一点。假定北方自10世纪以后年平均需要3吨黄金（这是任意选定的数字，显然过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任务并非不可能完成，它意味着需要三、四十头骆驼驮运。从沙漠商队明显地大量激增以及阿拉伯文献提供的信息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这些数字过于谨慎了，沙漠商队所拥有的骆驼远超此数，至少出发时是如此，而且数目与日俱增。这里我们充分体会到掌握远古时期历史数据的难度。[38] 总之，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启运跨过大沙漠的物资重量（以及由此决定上路所需的骆驼数目）较大，而归途驮运量要小得多，两者显然不平衡。多余的骆驼如何处理？被宰杀食用、还是在萨赫勒地区出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当地的骆驼数量肯定会迅速增加。这一问题还有待于研究。

无论我们采用上文提出的3吨“最低数值”还是R.莫尼的数字，这种驮载量（从当今经济角度看简直可笑）都值得评论一番。货运量如此之低，不仅解释了激烈争夺商 389 路控制权的原因，商路需要控制到何种程度以及抢劫商旅驼队是否有利可图，而且也解释了北方各个终端站从这种黄金流通角度出发在何等程度上需要撒哈拉驼队每年定期运送，以便维持各自货币的信用（假定穆斯林世界西部地区没有别的黄金主要来源）。同样，我们现在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此以后很久，坎库·穆萨曼萨带到开罗约一吨黄金就搅乱了当地的金价。如果以为当时西非就每年输出大量黄金，那就实在太天真了。

我们还可以根据上述每年可供出口的黄金产量，再加上大约同等数量的当地消费掉的黄金，大致估计一下所需要的工作量。我们知道每个矿井平均生产黄金2.5－5克，因而每年需要开24万－48万个矿井，这意味着要消耗相当大数量的劳动力。一旦形成对黄金的定期大量需求，即使加上淘金产量，西非金矿每年也必须动员数十万季节工才能保障供应。

沙漠驼队定期每年一次为穆斯林世界铸币作坊运送黄金的活动是在何时开始的呢？

---

[35] 硬币流失的原因不胜枚举；见P.格里尔森，1975年。

[36] 见J.德维斯，1970年。

[37] 每年可出口产量的估计数：布雷为4吨；加拉姆为500公斤；普拉－洛比200公斤；黄金海岸和象牙海岸4吨；塞拉利昂的佩莱300公斤（R.莫尼，1961年，第310－322页）。这些数字自然是根据目前产量推测而得。最近J. B.基塞加（J. B. Kiethega）先生的研究认为布基纳法索的普拉地区在16－19世纪之间的年平均产金量很可能从未超过50公斤（J. B.基塞加，1983年）。

[38] 顺便提一下，即便我们取一个与R.莫尼接近的数值，即每年约6－7吨，回北方也只需要少量驮畜。

一方面我们可以排除 8 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当时北方动乱不已，人们仍然不太愿意冒险穿越沙漠，然而对驼队的袭击虽说声势不小，却往往徒劳无益。另一方面则可以严肃地提出经常性贸易始于 8 世纪下半叶和 9 世纪的可能性，那时锡吉勒马萨业已建立或发展起来，塔哈尔特繁荣兴旺，易巴德教派的贸易方兴未艾。我们还不能确切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完全可能是雅库比或甚至伊本·豪卡勒书中提到的那个贸易活动仍旧充满风险、令人望而却步的时代。此处似乎应该提一笔，伊本·豪卡勒很可能在相对而言比较晚的时候曾记述过一位目击者告诉他的一段轶事。此人说："我听说当时整个桑哈贾族之王坦巴鲁坦·伊本·伊斯菲沙自称业已统领该族人民达 20 年之久，年年有他所不认识的一批批人来访……"泰格达乌斯特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古代奥胡达古斯特之所在，那里的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恰好我们所知甚少的 8、9 世纪的珍贵材料。[39] 上文已经提到过铜的冶炼，发掘点出土了大量残存物：坩埚，失蜡浇铸模具，熔渣和小铸块。这并不足以说明存在跨撒哈拉来往关系，但确实说明存在产

390 品的交易[40] 和出售。当时肯定也生产黄金；[41] 原料无疑来自南方。纺锭盘的存在[42]说明已有纺线业甚至很可能有棉织品，尽管我们目前所知还不多，但可以肯定在那个时期这些物品很罕见。当地有一种陶器涂有白色装饰，[43] 完全是 8、9 世纪的特色。这种陶器也引起很有意义的问题：它多少有些像努比亚基督教时代出产的陶器（图片 14.1）。[44]

从北方进口的物品更有意思，当时进口虽还不多，却是穿越沙漠的证据。现已发掘到宝石、半宝石（下面还将进一步详细论述）和上釉陶器。对原产地在何处的细致研究

391 尚未取得确切肯定的结论，唯有一例除外，即伊弗里基亚遗址较深的地层中发现的一些碎陶片。[45] 我们现在还知道玻璃器皿也跨过沙漠传到了南方。[46]

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这些珍贵"货物"的出产地虽尚未确切地证实，但肯定是来自北方，它们可能是购买来的，更可能是通过易货交易得到的。发现这些货物的地层年代无疑早于公元 900 年。它们显然是证实 8、9 世纪业已存在跨撒哈拉来往的第一批物证。

现在，各种论断的所有情况都已集中，下一步应该转而讨论公元 900－1100 年之间或此期间左右跨撒哈拉贸易发展的情况了。

---

[39] 关于该遗址的年表见 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 年；J. 波莱，即将发表；D. 罗贝尔－沙勒厄，即将发表；以及 B. 赛松，即将发表。

[40] 从大西洋沿岸进口的大量贝壳（D. 罗贝尔，1980 年，第 209 页和 B. 赛松，1979 年）说明与沿海地区的种种经常性联系。上文曾提及可能使用过从阿克儒特来的铜。

[41] D. 罗贝尔，1980 年，第 209 页，带有金块的坩埚残片；B. 赛松，1979 年，第 688 页，一个称金子(？)小秤的秤盘；J. 德维斯（未发表的报告），附带裹铜黄金的坩埚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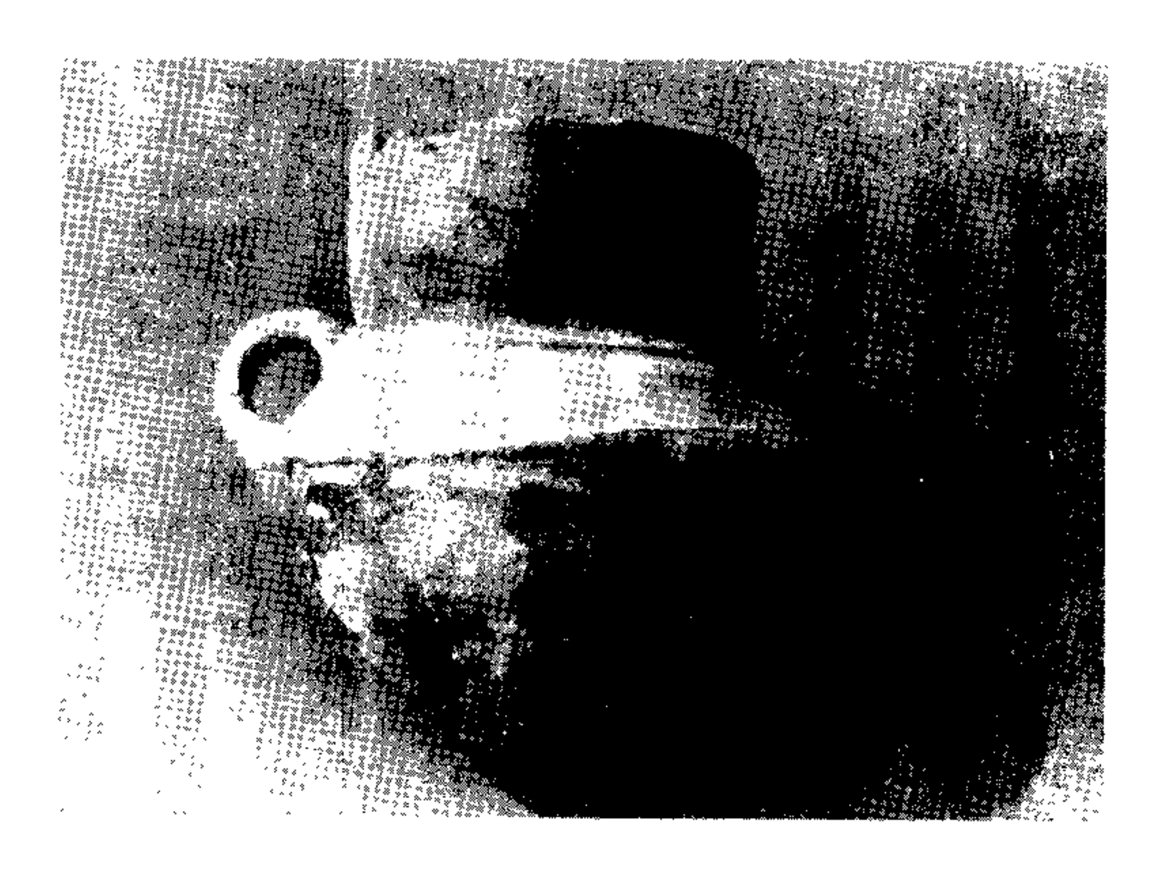
[42] D. 罗贝尔，1980 年，第 209 页；B. 赛松，1979 年；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 1983 年的著作。H. J. 于戈在其关于新石器时代撒哈拉历史的论文（1979 年）中提出，撒哈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即有纺锭盘。

[43] 见 B 赛松，1979 年，例如 548－549 页。这种陶器见发掘报告，10 世纪仍有出产。这种类型的陶器与在杰内－杰诺发现的都不一样（S. K. 麦金托什与 R. J. 麦金托什，1980 年（b），第 453 页），与在库加发现的也不一样（同书援引）。

[44] 见 S 韦尼希（S. Wenig）（1978 年），第一卷，第 132 页，图片 98、99；第 133 页，图片 100；第二卷，第 321 页，图片 285；第 322 页，图片 288。

[45] B. 赛松，1979 年，第 688 页；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 年；C. 瓦纳克尔，1979 年。

[46] J. 波莱，1980 年，第 92 页；C. 瓦纳克尔，1979 年。



390

图片 14.1　一例当地制的陶器产品，模仿马格里布进口旋制陶器（年代大致是在10至12世纪之间）

公元900至1100年间跨撒哈拉贸易的发展

——货币需求的增长；佛弗里基亚的法蒂玛王朝；伍麦叶王朝的竞争；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在7世纪末，东边的伍麦叶王朝历代君主们想在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推行一种既适合于新宗教又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货币。两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一直怀有创立货币统一观念的理想，这种货币将以先后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实施统治的唯一公认哈里发的名义铸制。因此对一个穆斯林来说（正如马克里齐亲眼目睹一篇16世纪文献所说），这种货币显然既是经济方面的生活现实，也是某种权威形象的标志。[147]

如同古罗马传统一样，铸币在穆斯林世界是君主的一种特权，[148] 统治者多少都严格

[147] 穆斯林作家，特别是自10世纪之后，创立了种种货币使用的理论。R.布伦什维格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指出（1967年，第114页）最早的一位著作家伊本·米斯卡韦赫（Ibn Miskawayh）在980年前后曾写道，村社生活与劳动分工导致需要用作报酬的物品，用以支付他人的劳动及物品，并且肯定能为他人所接受。这些报酬物必须是相当稀罕之物：由于黄金经久耐磨又易于熔炼而中选。R.布伦什维格还曾称（1967年），后来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认为货币的作用是保存财富，并作为一种价值标准进行流通而不应留作个人财产。《古兰经》也持同一种看法（9章34节）："凡是积储金银而不按真主旨意花销的人都将受到痛苦的惩罚。"

[148] 一些历史学家（G. P.埃内欣，1972年，第9页）倾向于认为货币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当局采取行动的结果。

392 把持不放。这种对铸币的垄断[49]与铸成硬币的合法流通并无关系，[50] 交易中是否接受这种标志仍旧是当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与否的问题。显然，使用那种能够利用其铸造的可靠性取得人们信任的货币更为方便。这种代表君主特权和标志着统治者与其臣民之间财税征发关系的货币，因而也可以在人们的观念中被接受为经济交易中理想的最佳仲裁。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象征着其定制者的荣耀和高贵，并总是在币面上称颂真主、先知和统治王朝的荣耀。

一张标有法蒂玛王朝掌权前不久各个金币铸造作坊地点分布图（插图 14.3）提供给我们许多情况。阿格拉布王朝在凯鲁万有一个铸币坊，伊赫什德王朝在米斯尔－伏斯泰特(开罗旧城)控制着一家。大部分金币是在伊赫什德王朝控制之下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或是在阿拔斯王朝统治区域内铸造的。西班牙和非洲大陆北部在这一时期都不曾铸造过多少金币。实际上，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51] 和统治如今摩洛哥一带的伊德里斯王朝当时是利用本地资源铸制银质迪拉姆币。[52] 铸造银币的另一个作坊也相当重要（插图 14.4)，即在锡吉勒马萨的作坊 。我们已了解到该城镇经济作用的日益增长；这个作坊肯定得到过南方来的黄金，但并没有用来铸币。法蒂玛王朝的黄金政策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53] 到 10 世纪，穆斯林世界中那些过去根本没有金币铸造作坊的地方也分别在伊弗里基亚的法蒂玛王朝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这两个相互争雄王朝的严格监督之下开办起铸金币的作坊（插图 14.5)。[54] 法蒂玛王朝与东边的阿拔斯王朝角逐，宣称那里的哈里发已经堕落，而他们意欲重新统一由于阿拔斯王朝放任自流而四分五裂的穆斯林世界。[55] 法蒂玛王朝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认定理应
396 由他们自己铸制金币。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中首先敢于大胆地与当时公认的权威分庭抗礼，自行铸制哈里发金币的；他们的铸币旨在显示新权威的力量与荣耀。[56] 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阿拔斯币的地位大大削弱，含金量降得相当低，但是以阿拔斯王朝

---

[49] 关于这方面的论点，见 P. 格里尔森，1975 年，第 130 和以后各页。

[50] 历史学家热烈争论铸币给所使用的金属增添了实际价值还是仅仅增加了心理价值（因为铸币可以加强信任感）。无论怎样，举凡西方世界、拜占廷世界、穆斯林世界的任何政府都企图坚持由其本身挑选某种金属铸币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以至发生冲突，但这与它们发行的货币的实际价值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见 G. P. 埃内坎，1972 年，第 10 页。

[51] 有关铸币的条件、方法和型式见 P. 格里尔森，1975 年，十分详尽的研究。

[52] M. 巴尔塞洛（M. Barcelo)，1979 年，第 313 页。西班牙从 127/744－745 年至 316/928 年之间，即整整 189 个年头中未曾铸制过金币，公元 928 年才恢复铸制第纳尔币（见 J. 德维斯，1970 年，第 148 页）。更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93/711－712 至 127/744－745 年间西班牙铸造的少量硬币是仿照伊弗里基亚币的型式；因而这些硬币并未给予安达卢斯政治或经济上的独立。

[53] 见插图 14.4。资料来源：D. 厄斯塔什，1970 年－ I ；B. 罗森伯格，1970 年（a)。摩洛哥银矿的年代得自《塞内加尔西非第四纪地质研究协会学报》，1978 年，第 52－54 期，第 19 页：阿瓦姆山矿区的年代为 +10 0±90，即在公元 840 － 1020 年间；提津泰斯特的兹贡德尔矿的年代为 +1250 ± 90，即在公元 610－790 年间。

[54] J. 德维斯，1970 年，1979 年（b)，见插图 14.5，并见 C. 瓦纳克尔，1973 年，地图 7。

[55] 见 E. 莱维－普罗旺卡，1950－1953 年，第 2、3 卷；J. 德维斯，1970 年。

[56] M. 卡纳德（M. Canard)，1942－1947 年。

名义统治埃及的那些人所铸制的金币含金量仍旧很高。[157] 如果某种法蒂玛金币要想为人们所接受，就需要能够产生起码与埃及金币同等效力的信任感。[158] 法蒂玛王朝需要黄金显然出于三方面的因素：意识形态、政治现实和经济现实。[159] 因面法蒂玛币从非洲经济关系角度说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它触发了穆斯林世界西部地区一场关于货币的观念之战，而法蒂玛王朝的衰亡并未结束这场战争。[160]

对法蒂玛古币的研究证明，一旦哈里发们克服了 10 世纪中叶的严重困难之后，他们便尽力设法铸制高纯度硬币，从而既积累了大量贵金属储备，又建立起有信用的国际资本。这是一种统筹兼顾的政策，值得对此进行比以往更加仔细的研究，[161] 公元 953年，特别是公元 975 年以后，无论是在锡吉勒马萨还是在马赫迪亚以法蒂玛王朝的名义铸制的第纳尔质量都格外地好，远至东方来的商人都愿意购买。[162]

如今许多资料都引向同一个方向，我们对法蒂玛王朝力求提供充足的金币不应感到意外，因为他们自己极力创造出一种需求，而且很可能主要目的还不在于经济方面。[163] 397
我们对法蒂玛王朝煞费苦心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每年组织穿越撒哈拉贩运黄金的活动也不应感到意外。我在 1970 年业已深信这一点[164]，而在泰格达乌斯特进行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远超过仅仅证实我在当时所下的结论。出土的玻璃砝码都是法蒂玛时期的（图片 14.2），其中有些所处地层位置可以帮助确定该遗址的年代。[165]这些砝码的引进恰好与该城镇的进口贸易高潮期和城镇发展鼎盛时期相吻合。第 10 世纪最后 25 年，即法蒂玛的霸权地位尚未受到明显挑战之时，穆哈拉比曾写道：奥胡达古斯特居民在马赫迪·乌巴杜拉时代便已成为穆斯林；这在今天对我们来说毫不足奇。[166] 如今我们可以肯定，尽管

---

[157] 这种论点最近已成为很严肃的研究课题，见 C. 卡亨，1965 年；A. S. 埃伦克鲁茨，1963 年（阿格拉布第纳尔的价值见第 250 页，伊赫什德第纳尔价值见第 257－258 页，全面比较东西两部分硬币成色的重要段落见第 264 页）；A. S. 埃伦克鲁茨，1959 年，业已指出阿拔斯币相对削弱（第 139 和之后各页）：9 世纪中叶之后含金量有时降到 76%，只有极少数达到 95－99%。另一方面，考察伊赫什德第纳尔的结论（第 153 页）却很好：2 枚含金 96%，4 枚 97%，12 枚 98%，10 枚达 99%。

[158] 必须记住，直到公元 969 年，埃及仍然是法蒂玛王朝的政治和战略目标。

[159] 伊弗里基亚是西西里粮食（M. 布雷特（M. Brett），1969 年，第 348 页）和埃及昂贵东方产品的主要进口者。尽管伊弗里基亚本身也出口一些产品，但贸易仍有逆差，因而需要出口硬币（见 S. D. F. 戈伊坦，1973 年）。

[160] 关于阿尔莫拉维德及其以前的时期，见 A. 洛努瓦（A. Launois），1964 年；关于此后的阿尔莫哈德时期见 K. 本·罗姆达纳（K. Ben Romdhane），1978 年。

[161] A. S. 埃伦克鲁茨，1963 年，指出了第纳尔铸币价值、特别是公元 953 年之后的铸币（第 256－257 页）。他提供的公元 969 年以后埃及铸制第纳尔的成分表也颇有启发：许多铸币含金量达 97－100%（第 259 页）。与阿格拉布王朝时期铸币相比较（第 257 页）表明所花的精力至少不亚于前人。也见 J. 德维斯，1970 年。F. 达克劳伊，1981 年，也有几页专写铸币问题。

[162] S. D. F. 戈伊坦，1967 年，第 234 页；1973 年，第 30 页。另见 J. 德维斯，1970 年，第 144 页。

[163] 应该把这种法蒂玛"黄金外交"视作与经济自然兴盛同等重要。当时，这种"黄金外交"像公元 969 年埃及"旅行"那样到处直接进行宣扬，或是通过代理商和客户作宣传。其目的在于宣扬王朝的荣耀，法蒂玛王朝对此十分敏感，以至特意委派宣传人员。然而他们的货币政策很可能确是大大推动了 10 世纪下半叶至 11 世纪初伊弗里基亚的经济活动。见前文所引 S. D. F. 戈伊坦，1967 年、1973 年；M. 布雷特，1969 年。

[164] J. 德维斯，1970 年，第 141 和以后各页。

[165] 关于这些玻璃制品证物，见 A. 洛努瓦与 J. 德维斯所写的一章，收于 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 年。关于玻璃砝码有许多争议，但并非指我们所谈的这个时代而是涉及埃及法蒂玛王朝生产的那些砝码，参见 P. 巴洛格（P. Balog），1981 年和 M. L. 贝茨（M. L. Bates），1981 年。

[166]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76 页。

3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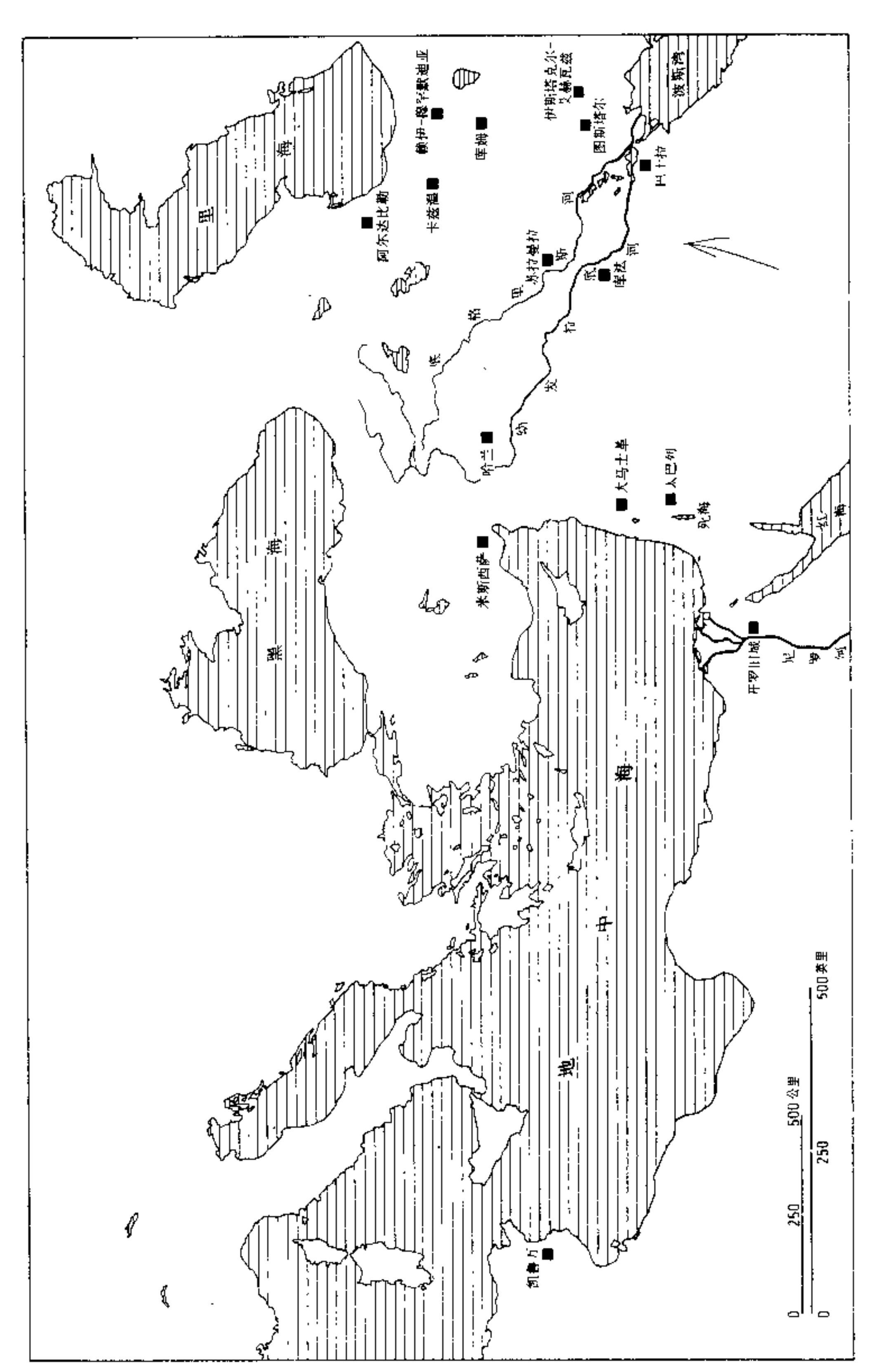


插图14.3 法蒂玛征服前夕的金币铸制点

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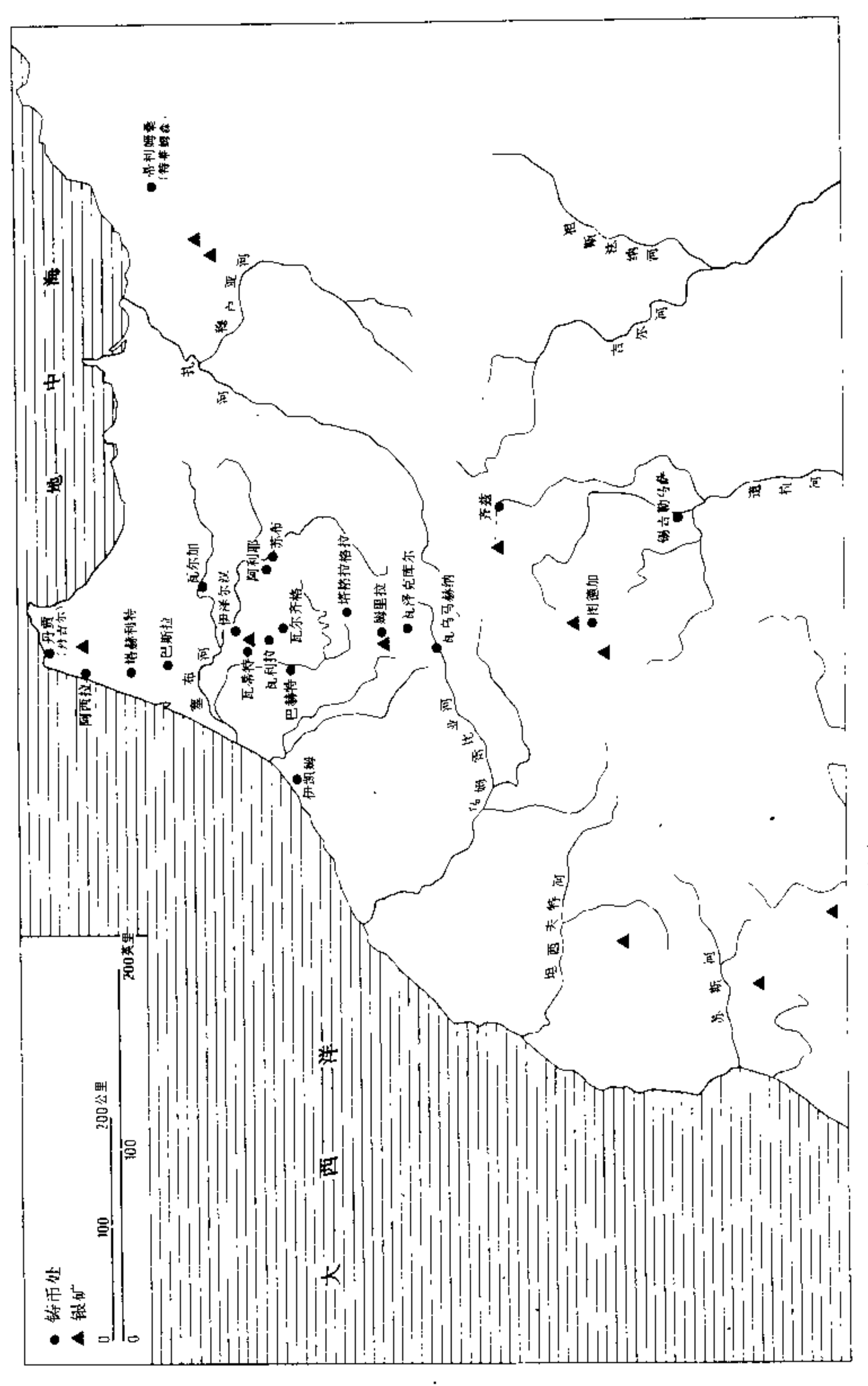


插图14.4 伊德里斯王朝时期西马格里布帝第纳尔硬币铸造点

3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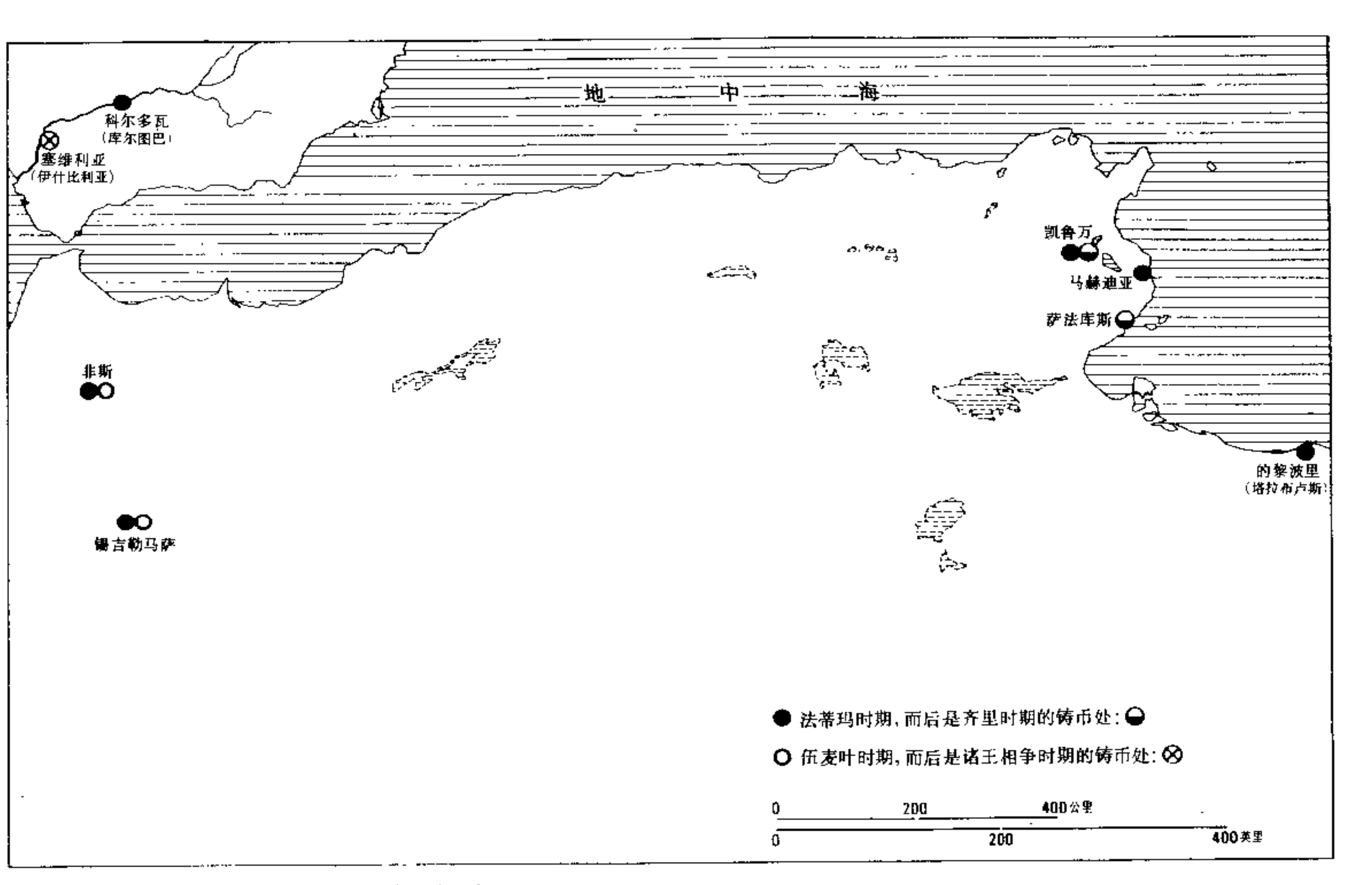


插图14.5 公元910年后穆斯林世界西部的金币铸制点

法蒂玛人在借道瓦尔格拉和塔德梅卡，即经易巴德教派通道进人黑非洲方面总是遇到困难，但他们至少在两个世纪里使得从锡吉勒马萨至加纳之路成为自己获得黑非洲黄金的主要通道和他们自产金币和建立战利品宝库的供给线。[67] 更甚于此的是，只要他们继续占据伊弗里基亚，在击败阿布·亚齐德之后他们还铸制足以使商人信赖的金币。[68]

但是，由于科尔多瓦的第三代哈里发矢志与法蒂玛决一雌雄，当法蒂玛迁往埃及之后科尔多瓦的代理人获得了一连串成功，黄金流向西班牙或至少是马格里布西部，锡吉勒马萨的铸币作坊也落人伍麦叶王朝之手。这说明至少在10世纪最后10年中，虽然每年黄金的需求量毫无变化，然而这种黄金流人的受益者已不再是法蒂玛人。这里我们又必须谨慎地看待考古发掘[69]或化验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迄今为止，泰格达乌斯特最后 **398** 出土的一批法蒂玛砝码年代确定在公元1000年后不久，也可能更早一些。R.A. 梅西耶指出，在他看来，伊弗里基亚铸造的法蒂玛第纳尔肯定含有“苏丹黄金”，但是埃及铸造的法蒂玛第纳尔却已经不再如此了。[70] 他把变化的年代定于公元1047年，即齐里王朝与法蒂玛王朝反目为仇之时。他认为，在此之前铸造的第纳尔中有47%含有西非黄金，



图片14.2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10世纪时法蒂玛的玻璃砝码

[67] 正是由于他们，才使伊本·豪卡勒和巴克里在通向黑人地区的众多路线中，对从锡吉勒马萨或坦杜尔特起始的道路，作了最佳描述。下文我们将再谈这一点。

[68] S. D. F. 戈伊坦，1967年，第237和以后各页详细列举了这方面的成就。

[69] 让我们在这里提一笔，统一建制的区域（12公顷）被发掘的不足1/5，而努达凯周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片废墟发掘面积显然还不到2/3。

[70] R. A. 梅西耶，1974年，第38—39页，埃及铸造的法蒂玛第纳尔含铜量超过了应有的含量，如果说所使用的是“苏丹黄金”。

而此后则只有 24% 的铸币含西非黄金。[71] 我们认为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很可能甚为深远，即使对齐里王朝来说也是如此，前提当然是年代限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关键在于 399 各种材料都说明公元 990 年之后西非不再向伊弗里基亚提供黄金，而黄金流向的这一急剧变化给伊弗里基亚造成了种种严重后果，S.D.F. 戈伊坦的所有著作都谈到这一点。[72]

1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间，穆斯林世界西部地区的金币铸造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西班牙硬币行市兴旺，[73] 西非离大西洋最近的地区有史以来第--次领悟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接承哈里发之衔后，也从公元 929 年起自铸金币。当时的金币质量并不太好，直到公元 987－988 年以后质量才变为上乘。公元 988－989 年在锡吉勒马萨铸造的伍麦叶第纳尔币问世。[74] 然而铸币主要还是集中在科尔多瓦的作坊，就在当局的眼皮之下。

要估价这些事情在“世界”上产生的重要影响，需要简略地谈几句基督教欧洲地区。尽管迄今为止在西方并未发掘出多少来自穆斯林世界的金币，研究工作毕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西方与伊斯兰地区所产金币之间的关系。C. 卡亨曾指出过不用模子镌制的硬币对整个西方的重要意义，西方人称之为“曼克斯”(*mancus*) —— 此字源自阿拉伯语的 *nakasha*, 其过去分词是 *mankūsh*, 意为“镌刻的”。[75]

过去人们往往认为，基督教西班牙到相当晚的时候，约 11 和 12 世纪才对第纳尔硬币产生兴趣[76]，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有人注意到加利西亚早在 9 世纪初便想拥有金币，阿斯图里亚斯到 9 世纪最后 25 年也有同样想法。基督教徒的目的是掌握金币以便从穆斯林控制的南方买进奢侈商品，当时那里是唯一的货源地。P. 博纳西埃一本写得十分出色的近著[77]又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许多情况。公元 972 年加泰罗尼亚已有来自南方的金币，公元 996 年之后提到金币的资料增多，而到公元 1010－1020 年间金币事实上已经充斥当地市场。公元 1011 至 1020 年期间，53% 的财产交易以金币结算，而公元 971 至 980 年的比例只有 1%。[78] P. 博纳西埃提及“曼克斯（币）”的次数按时期划分如下：公元 981－990 年 78 处；公元 991－1000 年 1071 处；公元 1001－1010 年 1220 处；公元 400 1011－1020 年 3153 处。作者注意到这一现象猝然而生令当时人们大吃一惊。[79] P. 博纳

[71] 同上，第 39 页。

[72] S. D. F. 戈伊坦，1962 年，第 570 页：许多金银出口到埃及；居住在突尼斯的犹太商人在信中谈到公元 1030 至 1040 年间贸易衰落，而在 10 世纪之初他们信中所讲的还是生意兴隆。公元 1040 年左右的一封信中说“整个穆斯林世纪西部的前景不值一提”；S. D. F. 戈伊坦，1966 年，第 308－328 页。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无法同意 M. 布雷特的观点，他仍把突尼斯经济生活的“大灾难”主要归咎于巴努希拉尔人的入侵。(M. 布雷特、1969 年，第 348 页)，R. A. 梅西耶也反对这一看法，见 R. A. 梅西耶，1974 年、第 35 页。

[73] J. 德维斯，1970 年，第 146 和以后各页

[74] 同上，第 148 页。

[75] C. 卡亨，1965年，第 417－419 页和 1980年。

[76] J 戈捷－达尔谢（J. Gautier－Dalché），1962 年。

[77] P. 博纳西埃（P. Bonnassié），1975 年，第 372 和以后各页。

[78] 同上，第 373 页。

[79] 同上，第 374 页，他详细地描述此事。多次提及“曼克斯”金币（*mancus*）：公元 1010 年有一种西班牙砝码“彭苏姆”（*pensum*）用以衡量金币（第 376 页）。可以区分科尔多瓦金匠在不同时期铸造的金币（第 378 页）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

西埃由此得出结论：到伍麦叶王朝末期基督教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确有真正的金币流通；[80] 而且他也认为许多黄金取自西非来铸造这种金币。由于黄金大量流入，加泰罗尼亚人才得以在公元 1018 年铸制 9 世纪以来他们的第一批金币。公元 1020 年后铸币业迅速衰落。[81]

我们只要把这些研究成果与 1970 年提出的成果对照一下，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在历史时期上是相互吻合的。这有助于经济史学家得出两点结论。首先，虽然进口的黄金数量不大，却立即被用来铸造硬币，而且这种硬币很快便进入流通领域。[82] 因而有理由相信，一部分非洲黄金至少在 12 世纪时曾被铸成西方的金币。其次，由于黄金需求量很大，因而诸国“边界”易受侵犯渗透。这一切充分说明穆斯林世界西部各国为获得非洲黄金而相互激烈竞争的原因。

伍麦叶王朝这一插曲历时比法蒂玛王朝还要短，但它保持巨大压力，促使人们继续大量需求非洲黄金的生产，并使跨撒哈拉交易久盛不衰。藩属诸王也铸造少量金币，只是效益不高，困难重重。直到后来阿尔莫拉维德帝国兴起，才得到真正的解脱。当然，我们这里需要提及的仅仅是阿尔莫拉维德时期的硬币和经济，以此说明本章所述时期的最后阶段很可能是跨撒哈拉交往史中最辉煌和最重要的时期，尽管在许多方面我们对这段时期了解得最少。

只要观察一下阿尔莫拉维德时期金币铸造作坊的分布图（插图 14.6），便可有新的发现。马格里布地区东半部几乎没什么铸币作坊，特莱姆森铸币作坊数也有限。但是，在当今摩洛哥一带，除了塞布河以南的大西洋滨海平原地区外，铸币作坊却很多。跨撒哈拉贸易的几个起止点（锡吉勒马萨、阿格马特、努尔－拉姆塔）都曾铸造金币。非斯和马拉喀什这两座首府，以至萨拉这个战略要镇（插图 14.6）也同样如此。马格里布西部有 7 家铸币作坊，而在西班牙更多达 14 家。[83] 根本谈不上在较早时期有什么集中和管理，除非我们真认为当时的政府全面控制局势，敢于允许铸币作坊散布各地。 402

所有研究过这个题目的作者都认为，铸币在当时肯定产量很高。R.A. 梅西耶 [84] 最近提出，非洲在被安达卢斯征服之前已于 451/1058 年至 488/1088 年期间开始铸制金币，锡吉勒马萨最早在 448/1056－1057 年便铸制了第一批第纳尔币。除了该作者发表的一系列例证之外，我们还应该加上在毛里塔尼亚发现的 6 枚第纳尔币[85]。总之，公元 1100 年以后铸币业产量特高。

---

[80] 同上，第 378 和以后各页。

[81] 同上，第 388 页。

[82] P. 博纳西埃，1975 年，此书谈到加泰罗尼亚人如何得到这种黄金，而并不排除其中一部分黄金回流南方用来购物的可能性。

[83] R. A. 梅西耶，1980 年，验证 1503 枚第纳尔币，有 663 枚产自马格里布诸作坊，其中 214 枚产于锡吉勒马萨，173 枚来自阿格马特，118 枚来自非斯，78 枚来自努尔，67 枚来自马拉喀什，13 枚来自特莱姆森；另外 840 枚产于西班牙。这些数字只是根据迄今发现并保存下来的金币，而并非当时铸造的所有金币。

[84] 同上。

[85] G. S. 科林（G. S. Colin）、A. G. 巴比克尔（A. G. Babakar）、努尔丁·加利和 J. 德维斯，1983 年合著。A. 洛努瓦，1967 年著作中所收的一篇手写稿中也提到一枚第纳尔币。

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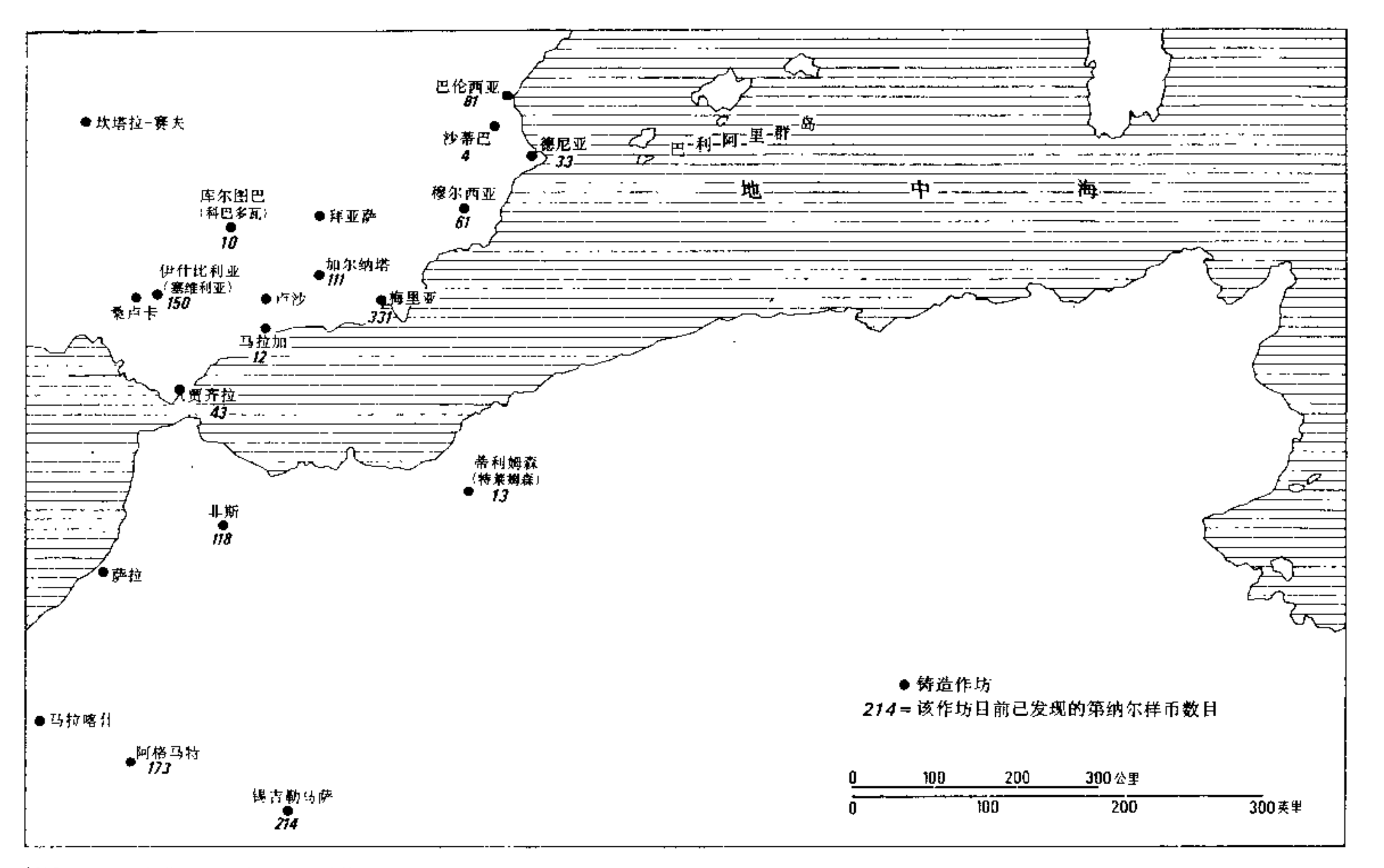


插图14.6 阿尔莫拉维德金币的铸造坊

同样根据R.A.梅西耶提供的材料[186]，我们从研究铸币数量转到研究其质量。首先，这一时期铸币含金纯度标准低于法蒂玛时期，铸币含有一定数量的银（有时超过10%）和铜。铸币与铸币之间差别相当大，但是金、银和铜同时并存使R.A.梅西耶认定所使用的是苏丹黄金，特别是锡吉勒马萨[187]以及马格里布地区其它各处铸币作坊都是用的这种原料。有51%的西班牙第纳尔含有与马格里布铸币不同的金属成分。

阿尔莫拉维德时期经常性地大量铸造金币，而且实际上并未受到其他地区的竞争挑战（竞争者远在法蒂玛统治下的埃及，当时无疑得不到苏丹黄金）。所以，阿尔莫拉维德第纳尔（在伊斯兰世界西部地区属首创）成为一种拥有经济实力的货币，尽管这种货币已不再保有法蒂玛硬币那样声誉卓著的含金纯度。[188] 西方世界一直强烈要求得到这种"马拉博廷"（marabotin），[189] 甚至法蒂玛世界本身在公元1070年以后也渴望得到阿尔莫拉维德第纳尔。[190]

为了解决这一类硬币方面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提出一系列相当难回答的问题，目前尚找不到确定无疑的答案。

西非黄金出口北方之前是否经过加工？巴克里提到过提炼黄金，但他认为这是为了出口金丝做金银细丝饰品。[191] 如前文所述，我们倾向于认为 *tibr* 金是未经提炼加工的黄金——这有助于肯定R.A.梅西耶的分析——这种黄金直接用于铸币。最多也只可能在南方把这种黄金熔化以便于运输。我们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了金丝，是用抽丝石抽成丝的。所用抽丝石也已被发掘出来（见图片14.3）。这显然是为制作金银细丝工艺品而准备的。[192] 看来这证实了巴克里的说法。如果黄金是在撒哈拉以南熔化的，最终以什么形式出口呢？是以小金锭的形式，运到目的地后分割开来做成硬币毛坯？[193] 还是在向北方出口之前已经切成毛坯？关于出口的是金锭或实际是可直接用于铸币的毛坯这种说法最有说服力，因为这样提炼方面的困难便无从谈起了，黄金不经提炼或搀入其它合金即可使用，无需担心其纯度。我们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了5枚半截的金锭，还有其他一些金银器（图片14.4和14.5）。[194] 那5枚半截的金锭或多或少都是从中间部位截割断，在铸槽或锭模中浇铸成的。其中一枚含有少量的铜。至于这些金锭是为了在当地制作金器[195]，

403

---

[186] R. A. 梅西耶，1974年。

[187] 并非没有任何问题，参阅安布罗西奥·维西·米兰达（Ambrosio Huici Miranda），1959年，关于1075－1076年间发生的一场危机。

[188] 由于条件所限此处无法细谈，但是埃及第纳尔直到11世纪末质量仍保持上乘（A. S. 埃伦克鲁茨，1963年，第259页）。此后，其价值有所下降，也许这有助于重新估量阿尔莫拉维德硬币的价值。

[189] J. 德维斯，1972年。

[190] S. D. F. 戈伊坦，1967年，第235页：1100年寄自马赫迪亚的一封信中提到获得黄金十分困难，同时还提到公元1088年运出100枚在阿格马特铸制的第纳尔币；第236页：伏斯泰特（开罗旧城）的犹太钱庄老板用阿尔莫拉维德第纳尔结算比用法蒂玛第纳尔结算更在行。同时参阅S. D. F. 戈伊坦，1973年著作中其它富有趣味的材料。

[191] J. 德维斯，1970年，第118页。

[192] 将于日后发表的文献，编号为TEG66M1V43和44。其中一根金丝有15.5厘米长。

[193] 关于铸币工艺，见P. 格里尔森，1975年，第139和以后各页；实际上，该著作提出了这些问题。G. P. 埃内坎，1972年，第13页如此描述铸币过程："从一定重量的金属块上只能切割下一定数量的硬币。"

[194] TEG66M1V26－27－28－47和48。

[195] 这批财宝包括两枚戒指，一枚耳环，和一个金珠串项圈。

还是为铸币切制毛坯则不得而知。[56] 最后，除发现上述物品外，还发现一奇特的圆金片，重1.75克，锤薄的表面呈不规则状。[57]

目前所有上述问题尚无确定无疑的答案。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化验工作的开展和将来历史学家的推论无疑将在解决其他许多问题的同时解答这些问题。

商路、运输黄金的路线以及沙漠以南的商业往来

除了考古方面的证据外，沙漠以北的阿拉伯文字记载，特别是10至12世纪的书面资料，也对研究跨撒哈拉往来有帮助。我们已经指出过，伊本·豪卡勒对“黑人地区”的地理描述十分肤浅。现在我们来谈谈巴克里和伊德里西二人的主要贡献。我们且不谈他们两个人中谁更强，不妨集中精力于理解在他们写作过程中对他们产生影响的那些考虑和信息。

406 巴克里提供了一份向他提供信息者的名单，其中自有它本身的逻辑性。[58] 插图14.7列出了从“黑人地区”到沙漠以北世界的七条主要路线，几乎都是得自不同的信息提供者。第一条路线得自两个来源：一位是巴克里的主人之一艾哈迈德·伊本·奥马尔·乌兹里，[59] 此人于公元1085年死于阿尔梅里亚；另一位是著作家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沃拉克（公元904/5－973/4年），西班牙人，他到伊弗里基亚了解非洲情况，并与易巴德教派人士有密切联系。巴克里承认他首篇关于奥胡达古斯特的报道是取材于沃拉克的。[60] 通过沃拉克，他还从阿布·贝克尔·艾哈迈德·伊本·哈卢夫·法西和阿布·鲁斯塔姆两人那里得到有关奥胡达古斯特的情况，后者是奈富塞山区人。[61] 因此，巴克里关于奥胡达古斯特的描述显然有充足的文献根据。

事实上当我们把第一条路线有关材料和巴克里对第二条路线的描述相对比，我们认识到主要的不同之处可能源自他所获得的材料本身差异很大。在第七条路线上，关于离拉斯－马6天路程的提拉卡的情况是由阿卜德·马利克·伊本·纳赫哈斯·加尔法提供的，此人还为关于布格拉特、关于提拉卡附近的尼日尔河、关于加纳至塔德梅卡路线的报告提供了材料。[62] 另一人名叫阿里·阿卜杜拉·马基，[63]提供了有关离加纳4天路程的萨马的情况。最后还有一位穆敏·伊本·尤马尔·哈瓦里，提供了从毛里塔尼

---

[56] 各种计量（如早期砝码（mitqal＝4.68克）、10世纪后期的法蒂玛第纳尔，以及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玻璃砝码）表明这些金锭每块平均至少可铸21枚最多可铸36枚第纳尔币。当然这纯粹是一个假定的数字。这5枚半截的金锭视情况而定合计可以铸制100到150枚第纳尔币。

[57] 其重量与任何已知第纳尔辅币重量均不相符。会不会是金匠用过的天平上的一个盘子呢？

[58] T.莱维基，1965年（b）。

[59] E.莱维－普罗吐卡，1960年（b），第1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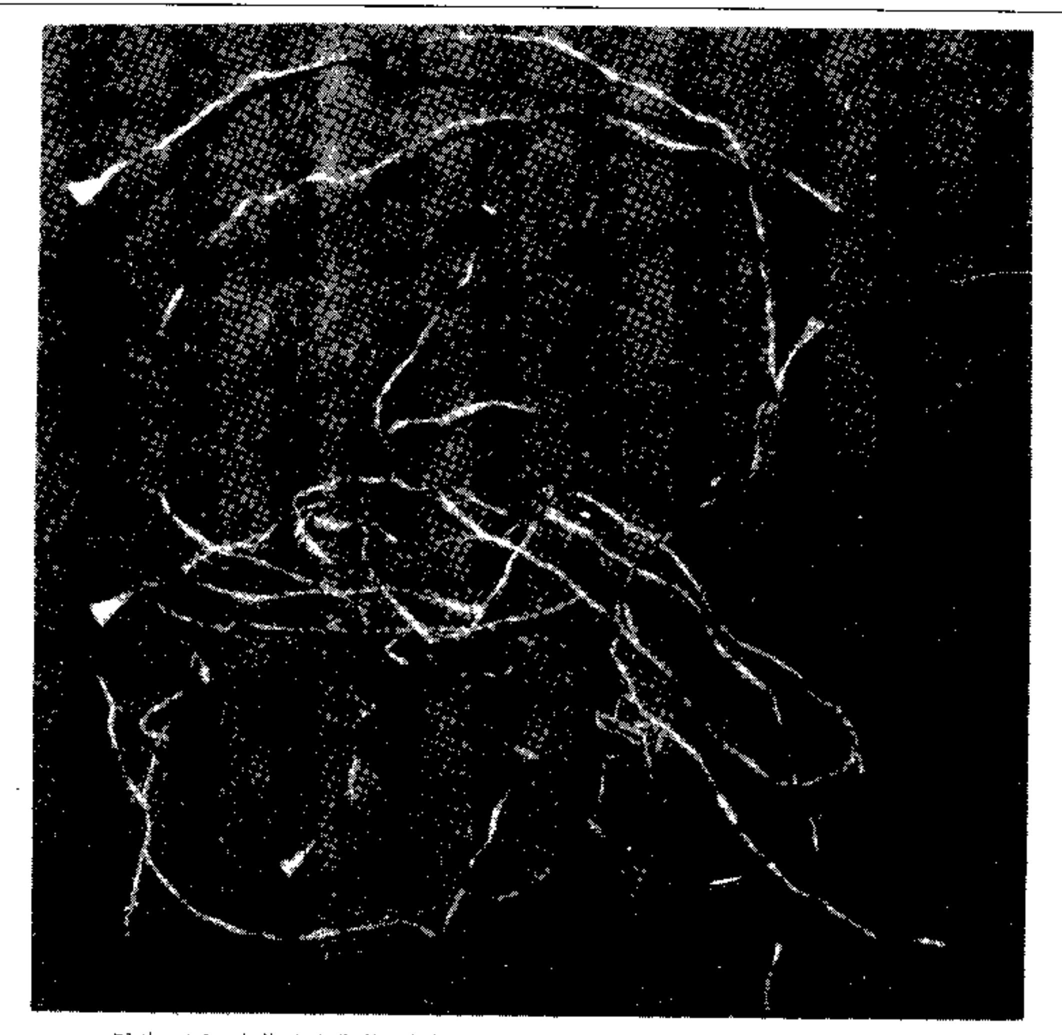
[60] J.德维斯，1970年，第110和以后各页。

[61] T.莱维基，1965年（b），第11页。关于此线路的状况见本书第11章：可能直到公元919年之后依靠武力才使该线一路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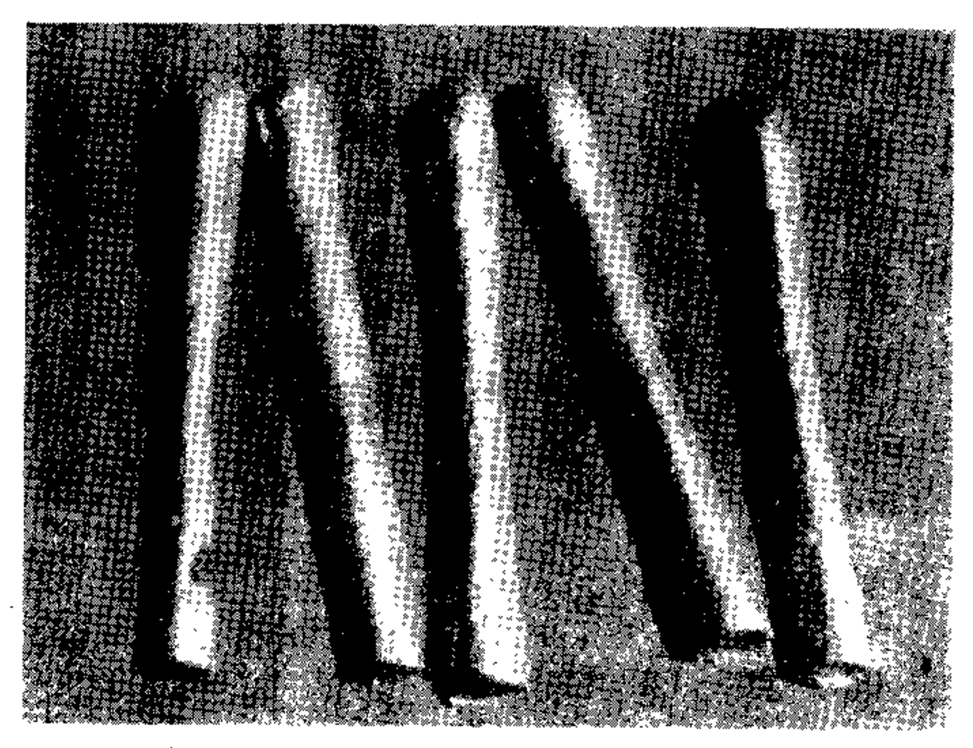
[62] T.莱维基，1965年（b），第11－12页。

[63] 同上，第12页。

404



图片 14.3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发掘出土的用抽丝不拘成的金丝



图片 14.4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发掘出土的半截金锭

405



图片 14.5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发掘出土的银链（年代大致为 10 至 12 世纪）。这件古物不幸在某实验室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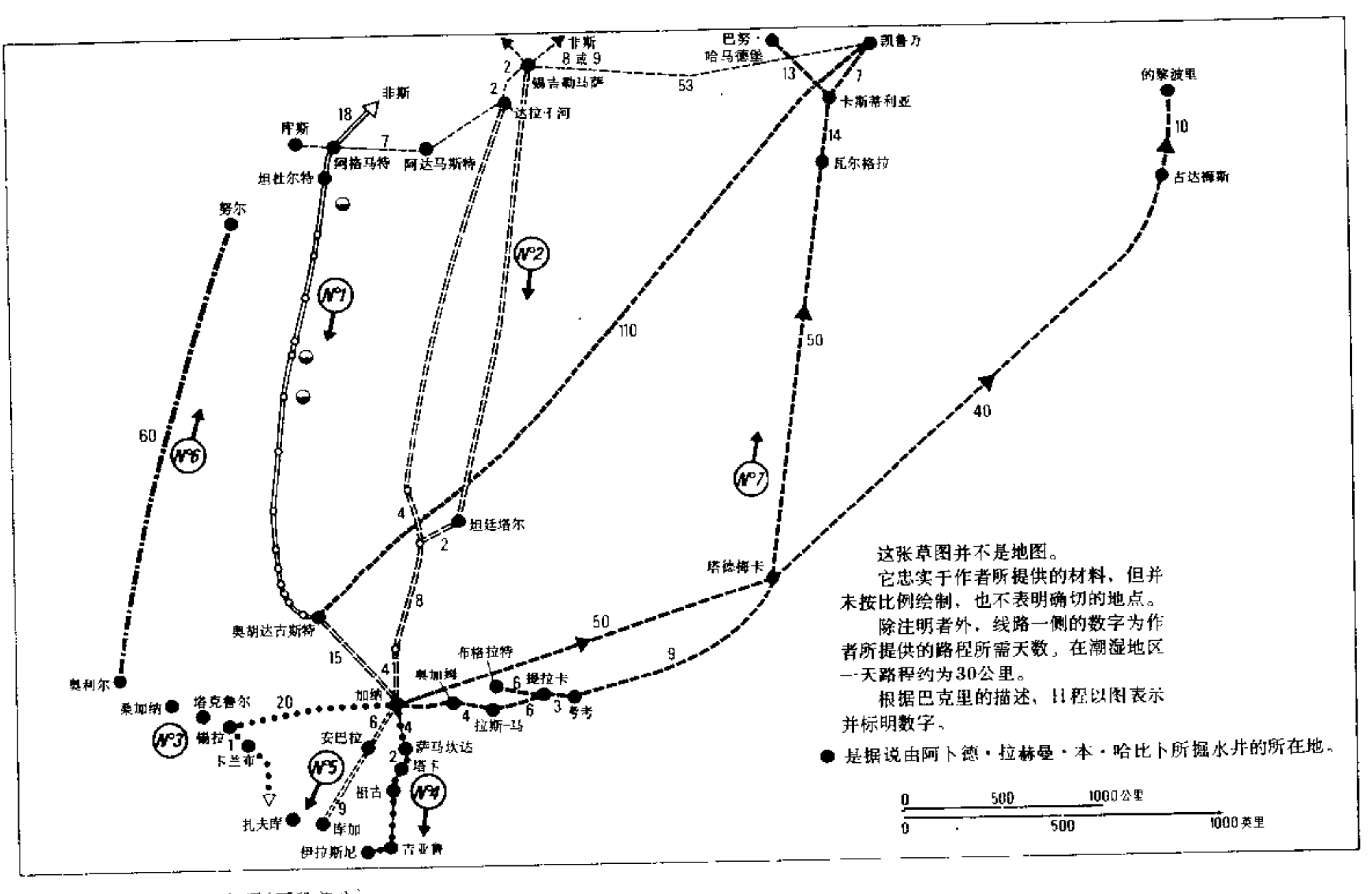


插图14.7 巴克里的日程图(西段部分)

亚沿海某处（船冬天在此停泊）到努尔路线的情况；他还专门提到从阿格马特到努尔这一段路。[64]

巴克利进行工作的方式是一清二楚的。他没有办法直接核实他所使用的材料，于是他便一段接着一段地分开描述，未能交叉查证别人向他提供的情况。

我们在这里没有列出 克里提到的更加偏东边的一条路线。此路行程 54 天，[65] 始于贾多或阿贾达比亚经辛维莱（跨撒哈拉联系的一个主要中心）到加奈姆[66]；巴克里认为这条路不很重要，但这并不等于它真的无足轻重。这条线路与其他路线不相“连接”，甚至与从古达梅斯经奈富塞山走 10 天到达的黎波里的那条路也不相连接。[67] 从古达梅斯到的黎波里的那条路是与塔德梅卡、加奥、加纳诸地相连的。另一条需走 20 天的路线从奥胡达古斯特经锡瓦到尼罗河流域各绿洲，从而与前面详述的尼罗特商路网相接。

408

回过头来，再看西面，我们借助于一张路线图发现巴克里的描述相互得以印证。第一条路线是“最重要的”路，从坦杜尔特到奥胡达古斯特一路详情尽有。[68] 与奥胡达古斯特相通的路径不多：从加纳去要 15 天，[69] 从凯鲁万去要走 110 天，[70] 后者的具体算计很可能是根据从加奥经塔德梅卡到瓦尔格拉一段路程需用时 110 天这一更为现实的估算。[71] 往南去，奥胡达古斯特似乎是处于绝路口。从锡吉勒马萨出发的各条路线，巴克里提供的材料很不确切（插图 14.7 上的第二条路线），特意偏东穿过坦廷塔尔[72] 以求得到食盐，它的终点不在奥胡达古斯特而是加纳。[73] 说来也奇怪，巴克里认为奥胡达古斯特既不与塞内加尔河沿岸各城镇相连也不通奥利尔；但看来二者都并非如此，因为奥胡达古斯特对塞内加尔河地区十分重要，巴克里本人在别的地方也曾提出，锡拉在黄金贸易方面是加纳的竞争对手。[74] 至于从奥利尔到努尔一段路（第六条路线）与其他路线没有联系则是由于提供消息的人不同的缘故。

加纳一带的线路网络更加复杂和完整。说明与这个城镇的来往在当时就十分重要，巴克里掌握的材料也很充分。但是整个体系仍然还是以提供消息的人的说法为根据。南边的一条路通向吉亚鲁。历史学家们对我们图中第四条路线所引用地名的所在位置意见

---

[64] 同上。

[65] 同上，第 27 和以后各页。巴克里称，黑人地区始于辛维莱。

[66] 巴克里，1913 年，第 26 和以后各页。

[67] 同上，第 340 和以后各页。

[68] 同上，第 296 和以后诸页。关于这条线路，见 S. 达沃，1970 年附有地图的全面性地理专著。从奥胡达古斯特去锡吉勒马萨必需经过坦杜尔特；巴克里，1913 年，第 302 页。S. D. F. 戈伊坦，1967 年，第 212 页，强调从开罗的情况来看，11 世纪从西非来的商旅驼队都要经过锡吉勒马萨和凯鲁万。S. D. F. 戈伊坦，1973 年，还在第 30、50 和 151 页上分别引用了三篇 11 和 12 世纪的材料，以证明西来的线路经过锡吉勒马萨。

[69] 巴克里，1913 年，第 317 页。重要的是：他是在一段年代可肯定属于 11 世纪的引文中提供这一情况的，这是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沃拉克（Muhammad ibn Yūsuf al-Warrāk）所没有提供的。

[70] 同上，第 303 页。

[71] 同上，第 338 和以后各页。

[72] 只有巴克里提供过这个名字。

[73] 巴克里，1913 年、第 322 页。

[74] 同上，第 324－325 页。

并不一致。[15] 第五条路线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说库加应在西面，有人则说更偏向东边。[16]

第三条路线所描绘的是塞内加尔河一带地区，然而地点和距离又是含糊不定。这条路从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城镇——卡兰布开始伸向“南方”。这是扎夫库人的家乡，T. 莱维基认为该族就是后来雅库特称为扎丰族的那批人，并认为他们是居住于今日迪亚拉以 **409** 西科隆宾河一带，因而是在巴克里提到的诸镇以东。[17] T. 莱维基甚至认为该族人在11世纪向北方贩运黄金的贸易中曾起过重要作用。[18] 再往“南”则居住着其他各族“异教徒”。在第三、四、五条路线问题上，我们掌握的情况具有几乎无法躲开的缺陷，因为鉴定工作都基于巴克里所用的不确切的材料。不过，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干的人，事实上他从未离开过西班牙，居然能给后人留下如此丰富的详细材料以供评价和批评，这本身就应该说是一个奇迹。鉴于上述原因，这些材料的整理固然重要，我们必须对这些材料采取一种批判鉴别态度，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沿着第七条路线那一组道路离开加纳，我们将进一步遇到更艰巨的解释上的困难。譬如，人们都会注意到，无论加纳北边、东面还是南方的各个城镇，与加纳的距离都说成是4天路程；有趣的是从加纳到加奥的那一段（17天路程）实在太短，似乎作者只得到了一小部分很不确切的材料。另外，人们还会注意到，通向瓦尔格拉、杰里德、伊弗里基亚、古达梅斯和的黎波里的路线边上都注有“回北方”的标志。这里没有注明直接提供材料者的人名，但复述的材料说明这些商路曾被使用过[19]，至少用到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征服西部地区为止，而且这些道路并不只是从南到北。这个“起自加纳”的东部道路网络从其南边终点延伸到巴努·哈马德堡[20]（可见材料早至11世纪）以及其东部终点的黎波里，[21] 形成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很可能这一材料反映了阿尔莫拉维德帝国之前公元11世纪的可靠情况。巴克里提到过一条与此平行的路线，从塔德梅卡到古达梅斯，专供寻找半宝石之用。我们将在下文看到这条路很可能完全可以考证出来[22]。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巴克里所提到的当时在塔德梅卡发生的值得注意的情况。他说当地居民使用的第纳尔币是“纯金币”[23]，并具有“毫无装饰”（系德-斯莱恩从阿拉伯字 *ṣulā'* 直译过来的）的特点。从巴克里的写作手法来看，我们可以推断这些硬币是准备向北方出口的坯料，尚未镌刻。*ṣulā'* 在这个场合可能用作前面见到过的 *manḳush* 的反 **410**

---

[15] 关于萨马坎达（同上，第334页，说当地巴坎族人一丝不挂）见 R. 莫尼，1961年，第126页。这张日程图上的加兰塔尔族的家乡至今无人知晓（巴克里，1913年，第332页，称有一个非穆斯林镇对穆斯林很好）。

[16] 巴克里，1913年，第324和以后各页，他指出库加曾进口玛瑙贝、盐和铜。

[17] T. 莱维基，1971年（a），其论点有充分根据。

[18] 同上，第506页。

[19] T. 莱维基，1979年，第164－166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172页。

[20] 巴克里，1913年，第105和以后各页。

[21] 巴克里，1913年，首尾一致地划分了整个伊弗里基亚地区的分界线。

[22] 关于从加奥到北方的联系线路的众多资料无疑应分别讲述。见巴克里，1913年，第324和以后各页。他称加奥的专业商贩叫布祖尔加尼亚人（Buzurghāniyyūn）。

[23] 巴克里，1913年，第339页。

义词。因此可以说还在备料阶段而非铸制阶段；铸币作坊是在北方。

因此，在不损害原文真正含义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采取一种有所鉴别和有所选择的批判态度，更加仔细地注意信息的符号性质。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这些材料同其他所有材料一样，需要通过核对口头资料和考古发掘成果加以验证。伊德里西所用的方法和目的以及他所提供的材料与其前辈的大不相同㉔。伊德里西并不满足于根据自己"卷宗"里记载的一连串无法构成整体的线路，单凭经验进行解释。他根据严格划出的地区（*iklīm*）和进一步划分的地段来描述非洲。尽管他同其前辈一样按天数来标明路程长短（有时借用前者的说法，有时取自共同的消息来源），但他对材料的处理办法却与其前辈截然不同（插图 14.8）㉕。

同上文一样，东部各条路线很快便可以讲得清楚。首先，伊德里西研究了位于第一区第三分段从尼日尔河经卡瓦尔到尼罗河的几条陆上通道，只是距离有相当明显的夸大。这一段有新的材料，值得仔细进行批判性研究。第二区第三段情况类似，是用来描述出现于北方经过古达梅斯的撒哈拉中部各条路线（距离同样远远超出实际）；该段似乎远比巴克里所说的更加独立于塔德梅卡－瓦尔格拉线路。第二区第四段描绘尼罗河和尼罗特沙漠地区，似乎意义不大。因此，引人注目的是在12世纪注意力集中于尼日尔河与尼罗河以及尼日尔河与乍得之间的联系，以及回到终点在古达梅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利比亚"线路更加独立于其他路线的看法。如果今后的研究能够证实这些说法，那将确实是一个新发现。

回过头来看第一、二、三区的第一、二段，特别是三个区的第三段，若与巴克里的论述相比较就十分有意思。巴克里挑选出来的全盛时期主要线路已不复存在。在北方，锡吉勒马萨取代了坦杜尔特；㉖这可能是由于巴尔加瓦塔人继续阻挠通行。往南走，我们现在避开了奥胡达古斯特，甚至加纳。一大新奇之处是直接来到了塞内加尔河一带的城镇，尽管跨越卡姆努里亚或纳西尔沙漠是相当困难的。塞内加尔河畔的这些城镇发现了黄金，约40天行程即可抵达。从锡拉或塔克鲁尔到锡吉勒马萨约需40天；从奥利尔到锡吉勒马萨，或从塞内加尔河经卡姆努里亚和阿祖基到锡吉勒马萨，距离也都差不多。诚然有一处画错了，可能是誊描者的错失或本身就有误，即途经阿祖基的线路过长，从而由塞内加尔到北方全程竟要费时52天。这同伊本·豪卡勒早期估计相接近。因而从现在起，可以认定确有一条自锡吉勒马萨经阿祖基至塞内加尔河一带的商路。

412

伊德里西把奥胡达古斯特东移了相当距离，距奥利尔达一个月旅程。当时外界与奥胡达古斯特的联系远不如一、两个世纪以前那样重要。尽管该城在经济上显然不及塞内加尔河畔诸商业市镇重要，但仍保持着一些不容忽视的联系。据伊德里西估计，奥胡达古斯特距加纳12天路程，与巴里萨之间的路程也一样，通过后者可以与南方进行贸易。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最后一个镇名的音译。Barīsā 是一种推设，还可以举出其他例子，如 Bur.y.sī。有趣的是，后一例音译如用阿拉伯语文字表示，则与巴克里的 Y.r.s.nī

㉔ 关于伊氏方法，见 T. 莱维基的重要著作，1966年。

㉕ 见插图 14.8。

㉖ 材料确实证明了锡吉勒马萨在11世纪居主导地位。见 S. D. F. 戈伊坦，1973年，第30－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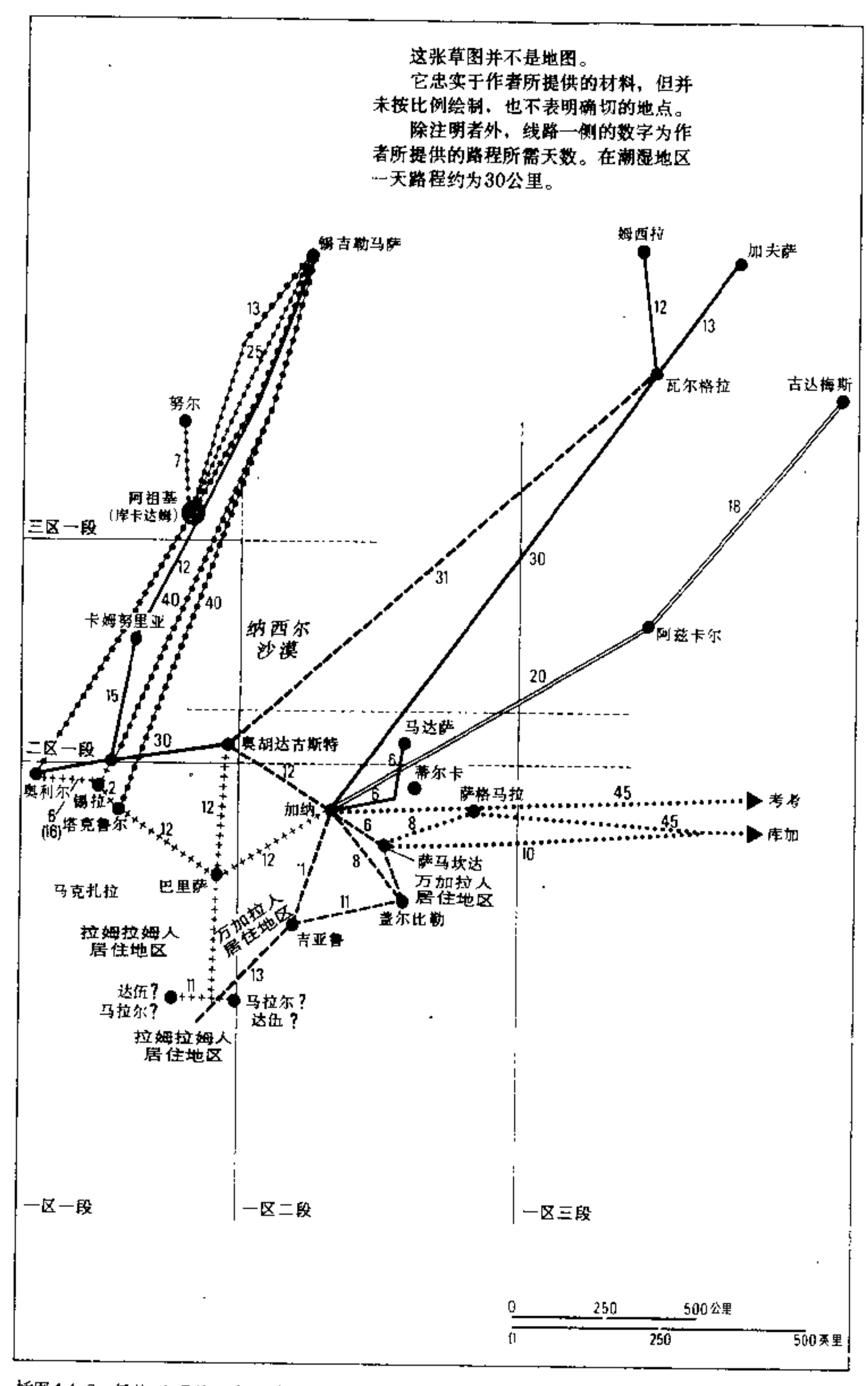


插图14.8 伊德里西的日程图(西段部分

差别并不大。而且，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巴克里的Gh.r.n.t.l和伊德里西的Gh.rbīl之间。就我们而言，问题部分地得到了解决，上述两处都有理由将两位作者提到的地方视为同一处。只是两人拼写上有些细微的差别。

伊德里西笔下的Barīsā或Bur.y.sī,和巴克里提及的Y.r.s.nī一样，曾是南方的一处要地；它是同“拉姆拉姆人”以及马拉尔地方接触的前哨。但是伊德里西的描述比巴克里更为细致确切。巴里萨还通过塔克鲁尔与塞内加尔河流域商路网有联系，路程仍旧为12天（此处肯定有点古怪）㉗。因此巴里萨分别通过塞内加尔河畔诸镇以及通过奥胡达古斯特和加纳成为两个偏北商路网中的重要环节。相比之下，巴克里对Y.r.s.nī所起的作用谈得便没有这么明确。㉘但是，同样从南往北看，从巴里萨看，塔克鲁尔在塞内加尔河流域中段的优势地位及其对黄金贸易的控制还是有新的一面，并导致一个世纪以来在组织黄金出口过程中所形成的均势发生了变化。

加纳商路网整个被移到第一区第二段，从细节看更加混乱（相当对立的信息充斥资料“卷宗”）、但从里程看却比较符合实际。有关与东方，到加奥甚至远到尼日尔河湾 413 的资料中有不准确之处；从加纳向东北，到瓦尔格拉（不考虑塔德梅卡驿站）需走30天，到古达梅斯则要38天，反之亦然。据伊德里西讲，当时第一区第二段整个地带，包括万卡拉和远至提拉卡的尼日尔河湾诸镇都在加纳控制之下。㉙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当时的人们曾在两套商路网上竞相寻求黄金。一套是以塞内加尔河畔诸镇为中心，起于锡吉勒马萨，途经阿祖基㉚。从中不难看出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之兴盛甚至其政策的直接影响，当时该王朝与塔克鲁尔结盟。另一套网系包括尼日尔河流域诸邦，由加纳控制，比以往更加紧密地保持与瓦尔格拉的联系。㉛

那么这是自10世纪以来确有实证的长期性活动呢？还是仅仅转瞬即逝的短暂现象呢？我们掌握的是否仅仅只是一种理论地理而非经济地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不应盲目地相信。㉜

伊德里西的日程图就整个撒哈拉地区而言与巴克里的大相径庭，因而也就相当重要。但就塞内加尔与尼日尔两河以南地区来说，联系已经保持两个世纪之后，却并没有

㉗ 阿拉伯制图员都喜欢如此作图。对此应持批判性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其他例证如：加纳－吉亚鲁－盖尔比勒相距都是11天路程，提拉卡和萨马坎达到加纳均相距6天路程。肯定还能找到不少别的例子；这很可能正是大错误的根源。

㉘ 但是，他还是提到过（见J. M.库奥克，1975年，第103页），“一个名叫巴努·纳格马拉塔的素丹国从Y. r. s. nī国得到 *tibr*，并从事 *tibr* 买卖。”

㉙ 伊德里西提及这个穆斯林城镇之富足，有钱的商贩居住于此（J. M.库奥克，1975年，第133页）。

㉚ 也许人们对提及阿祖基会感到吃惊（提及是正确的，考虑到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征服此地之后该镇的重要性）而对像塔巴尔巴莱特绿洲这样的地方却只字未提，后者当时很可能具有与北方通商的种种方便设施，D.尚波尔特（D. Champault），1969年、第23和以后各页。阿祖基确如伊德里西所讲的那样是一个繁华但不大的镇子（J. M.库奥克，1975年，第164页）。

㉛ 可将此论断与J.O.亨威克（J. O. Hunwick）、C.梅拉苏（C. Meillassoux）和J.－L.特里奥德（J. －L. Triaud）三人1979年关于商路的著作比较。

㉜ 至少有一例提出了要谨慎从事。对锡吉勒马萨－加纳一段没有任何评价，但伊德里西对纳西尔沙漠却有详尽的描述（J. M.库奥克，1975年，第129和149页），穿越该沙漠历时14天，找不到一处水源，疾风吹着沙土四处飘扬。他同样如此描述阿祖基（同上，第164），并称该镇是去锡拉、塔克鲁尔或加纳路上的一站。

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提供什么新的重要材料。这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原因是黑人不允许来自北方的商贩过多地到处走动。㉓ 此外，11世纪末塞内加尔河湾及加奥一带的人们虽已普遍真诚地皈依伊斯兰教，然而当时在更靠南的地方腹地，人们却仍然踌躇不前。无论如何，在两河以南地区有关黑人生活具体细节方面，伊德里西的描述并不比其前驱们更可信。㉔ 这里同样，符号学是重要的，而且不能像相信关于跨撒 **414** 哈拉往来的新鲜材料那样相信关于更南地带的复述材料（即便是有所增补）。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时所看到的，贸易点的布局与降雨量有密切的关系；当地必须有足够的水源满足驮畜和几千人从事各种活动的需要。不幸的是，我们对于萨赫勒地区环境条件的演变了解得实在太少，而考古学则引起了一连串问题（插图 14.9）。譬如说，我们应该知道有关锡吉勒马萨的各种情况；可惜目前所能依靠的文字材料关于穿越撒哈拉贸易几乎一无所有。有关阿格马特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我们掌握关于坦杜尔特的材料略多一些，这要归功于 B. 罗森伯格 ㉕。 T. 莱维基提供了有关瓦尔格拉与整个西部和中部非洲联系的具有高度科学性的材料；㉖ 显示出我们对于该镇在11世纪以前的活动实在是一无所知，那时它与锡吉勒马萨 ㉗、塔德梅卡、加纳以及出产黄金的地方都有直接的联系 ㉘。该镇同其北面的杰里德和巴努·哈马德堡也有贸易来往；瓦尔格拉与乍得湖地区之间也很可能有商队来往。关于古达梅斯，我们目前只知道文稿中谈到的很少一点情况。㉙ 就跨撒哈拉联系而言，可惜在非洲北部进行的考古研究关于第 10、11 世纪与此前两个世纪一样收获甚少。

值得高兴的是沙漠另一端的情况较好一些。我们知道阿祖基曾两度成为重要的居住地：其中一次是在 10 至 12 世纪之间，另一次是 15 至 17 世纪。㉚ 目前研究工作的进展表明，各种文稿中提到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之都将会披露引人注目的有意义材料。

已有研究成果证实奥胡达古斯特在 10、11 世纪时曾是一座大城镇。此间的产业活动早在 8、9 世纪便在一种非城市环境下开始了。当地陶器生产的持续性表明：尽管在文化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地方在 9、10 世纪期间已经相当快地发展得开始像个城市了。有了街道、广场、一座清真寺、私营企业建筑，并且日趋奢华，至少在马格里布来的商人居住区是如此。所有考古发掘者都注意到该镇的活跃生活曾于 11 世纪中叶一度中断，但此后又以一种截然不同的特殊方式恢复生机。㉛ 碳－14 测定的年代、发掘到 **416**

㉓ 伊德里西以及他之前的巴克里都尽力描述那些北方商人曾受到盛情款待的城镇，说明这一点极其重要。

㉔ 但我们在下文还是能看到，有关诸如塔克鲁尔跨越沙漠情况的一些新材料，以及关于当时仍旧是“异教徒”镇子（如马拉尔）的一些新说法。

㉕ B. 罗森伯格，1970 年 (a)，第 79 页。

㉖ T. 莱维基，1976 年。

㉗ 同上，第 16 页。

㉘ 同上，第 42－43 页；10 世纪时杰里德有一位易巴德教派的人士，前往加纳，又去古亚鲁，他发现此处居民全都赤身裸体。他死于该镇（见第 51－52 页关于古亚鲁位置的讨论）。

㉙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系巴黎第一大学的努尔丁·加利所做。

㉚ B. 赛松，1981 年。

㉛ 材料收集和披露于 C. 瓦纳克尔，1979 年；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 年；J. 波莱，即将发表；D. 罗贝尔－沙勒厄，即将发表；以及 B. 赛松，即将发表。

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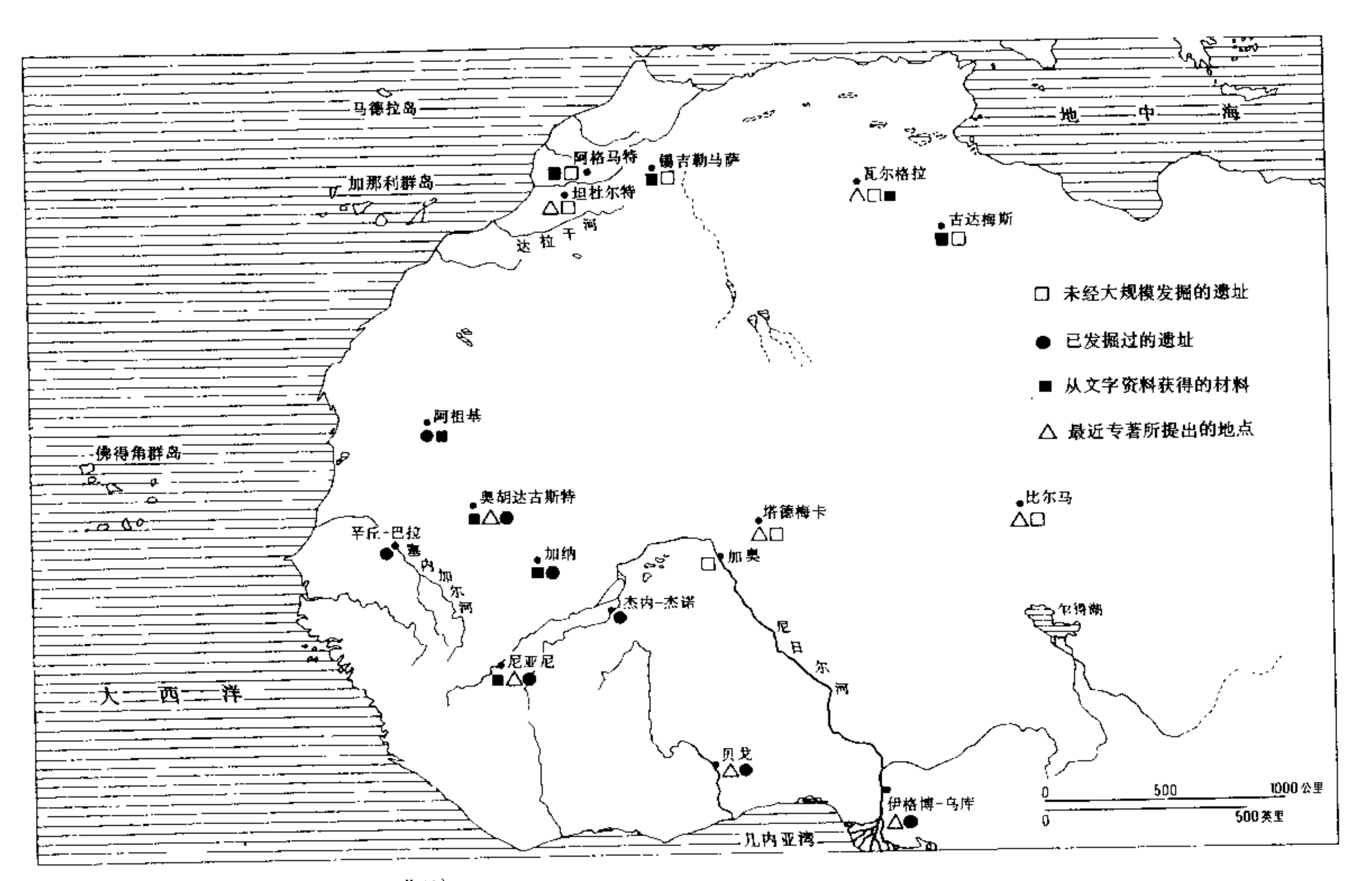


插图14.9 跨撒哈拉贸易沿途遗址（9—11世纪）

的玻璃砝码以及对进口物品的分析都证实了上述年代。奥胡达古斯特曾有数千居民，10、11世纪时曾是一片繁华景象，但无疑在11世纪中叶遭受了一场严重灾难。该镇衰落的主要原因则不是编年史范畴和本章范围之内所要探讨的问题。[42]

在加纳（昆比萨利赫），若干次考古发掘也有助于确定该地长期有人居住的年代。从8至15世纪人们居留形成的遗迹一层覆盖一层共计达7米多厚，[43] 一座非常重要的清真寺逐渐挖掘出土并得以保存。但是，巴克里提到过的那座帝国首府尚未找到。迄今为止，只发现少量从北方进口的物件；只不过同奥胡达古斯特来往的痕迹则确实无疑。

辛丘－巴拉位于一个具有相当历史意义的地区，[44] 当地发现了许多早期城镇生活留下的踪迹。[45] 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未能使我们把这一地点同巴克里和伊德里西提到的任何地名联系起来。在这里发现的种种迹象表明，早在5、6世纪当地便已经能制作金属物品，还有许多迹象表明陶器质量很高。[46] 这里我们应该记起伊德里西所谈到的塔克鲁尔和巴里萨，当地与北方的商人有接触；我们从泰格达乌斯特所得到的经验使我们懂得这种说法的含意，而且在辛丘－巴拉已经发现了上釉碎陶瓷片，这表明一段时间之后决不会一无所获。[47]

在此后一段时期，尼亚尼的生活更加光采夺目；但是，就本章涉及的那段时间而言，并没有明确的迹象说明那里存在着与跨撒哈拉来往有关的联系。[48] 然而，这座城镇无疑曾一度存在，并很可能与邻近地区进行过产品交易，这就引起人们思考，是否有可能这座城镇就是巴克里提到过的马拉尔。

417

以细致的分层研究和精确判断年代为基础，在杰内－杰诺进行的勘查得出了独创的结论。公元400至900年间，在当今杰内附近的这个遗址上已有一个镇子存在，[49] 而且该镇在此后的时期内，从900－1400年大有发展。[50] 可惜，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虽然对了解区域贸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几乎没有涉及跨撒哈拉联系。

在贝戈尚未发掘出多少证据，也还不足以提出什么假说。然而，一些踪迹表明那里的活动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世纪。仅就这一事实便说明，关于热带雨林边缘附近的热带草原地区是否在比迄今所提出的时代更早的时期便已存在货物流通这一问题，恐怕不能再长期回避下去了。[51]

---

[42] 特别见J.德维斯、D.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年。

[43] D.罗贝尔、S.罗贝尔（S. Robert）和B.赛松，1976年；并参阅毛里塔尼亚科学研究存贮的发掘年报以及S.贝尔捷（S. Berthier），1983年。

[44] 见上文关于线路的说明和发掘点地图。

[45] B.沙瓦纳（B. Chavane），1980年。

[46] A.拉维塞和G.蒂尔曼，1978年，第57页。碳－14测定的年代分别为587±120、1050±120。G.蒂尔曼和A.拉维塞，1980年。

[47] G.蒂尔曼、D.罗贝尔和A.拉维塞，1978年。

[48] 这并不是W.菲利波维亚克，1979年，第189页上的观点，他认为阿拉伯商贩曾经在10世纪抵达尼亚尼，并且引进了泥砖建筑方式和若干种蔬菜种植方法，我们对这种解释有所保留，特别是关于泥砖建筑与阿拉伯商贩的到来之间的联系。

[49] S. K.麦金托什和R. J.麦金托什，1980年（b），第190页：这是该遗址有人居住的第二阶段。

[50] 该遗址城镇生活的第四也即最后一个阶段，同上，第191－192页。

[51] M.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1976年。经证实，德温富奥区的炼铁业始于公元二世纪。

同样，在伊格博－乌库进行的富有成果的大规模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结论引起极大争议，也导致了类似上述说法的推测。[52] 瑟斯顿·肖不顾许多同事的反对，始终对这个如此靠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地区在 9 世纪时竟与北方毫无联系感到怀疑。

所有新近开展的研究工作从根本上改写了技术交流和商业来往的历史。正因为如此，西部非洲不再被视作是通过跨撒哈拉联系这一媒介而依附于北部非洲。即便是在年代和数量上降格到一定程度，跨撒哈拉贸易无论如何是具有可观的意义。它给沙漠南北各个活动领域带来的变化，从今以后将比以往更加切合实际地得到估价。

考古学在各地获得的成果对经济史和跨撒哈拉贸易史产生了影响，十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加奥[53]、塔德梅卡[54]、比尔马[55]，甚至阿伊尔[56]的材料都十分稀少，更不用 **418** 说撒哈拉以北的那些城镇。尽管如此，在与跨撒哈拉贸易有关联，哪怕是间接有关的城镇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全都具有历史意义，所得成果看来已经表明：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汲取个人选择的教训。

由于许多问题尚未解决，特别是与经济有关的问题，也由于考古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在产品交换、技术水平、乃至时尚和影响等方面的所有问题都比以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多种多样。我们目前对 11 世纪跨撒哈拉贸易的想象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且可能失之于粗略。

然而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毕竟使我们能对穿越撒哈拉运送的产品有一个初步概念。不幸的是，阿拉伯人写下的材料（只反映北方出口商关注的问题）和考古发现（重点是南方消费者购进的货物）两者并非完全吻合，甚至并不经常一致。据巴克里称，奥胡达古斯特曾为移居此地的客户以高价从北方进口小麦、枣和葡萄干；[57] 但迄今为止，考古研究尚未证实这种说法。尽管如此，巴克里的说法为研究枣类贸易这个重要课题开辟了途径。枣似乎很早就被运过撒哈拉，甚至可能还包括枣树种植知识的传播。有关奥胡达古斯特的文献均未提及当地那些以小麦和枣为食的消费者需要其他奢华的进口货，然而 **419** 考古发掘却发现了许多。所有发掘点[58]都证实在此期间半奢侈品（彩釉陶制油灯，见图片 14.6）或奢侈品（杯、瓶、釉陶香炉和饰花玻璃器皿）的进口均大幅度增加，已发现的成千上万件物品证明了高价商品贸易的存在。迄今在更靠南的发掘点，同一时代的发

---

[52] 瑟斯顿·肖（T. Shaw），1970 和 1975 年；O. 伊基默（O. Ikime）主编，1980 年；见本书第 16 和 18 章。

[53] 尽管伯明翰大学的 C. 弗莱特（C. Flight）曾进行过卓越的研究。

[54] T. 莱维基，1979 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 10 世纪以前的材料。当时一位易巴德教派的商人曾从塔德梅卡向杰里德运送 16 个每袋有 500 第纳尔的钱袋，共计 8,000 第纳尔。莱维基认为（第 165－166 页），当时该镇可能在扎纳塔人控制之下。

[55] D. 兰格和 S. 伯绍德常被引用的 1977 年的文章指出，在卡瓦尔进行考古研究将十分有价值。

[56] S. 伯尔努斯和 P. 古莱奎尔，1974 年，就古代铜的冶炼而言，成果是十分显著的。

[57]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83－84 页。这种贸易的利润肯定很高，尽管消费者及客户和这些稀有产品的卖主一样都是穆斯林。

[58] C. 瓦纳克尔，1979 年，第 155 页；B. 赛松，1979 年；J. 波莱，1980 年；D. 罗贝尔，1981 年，第 209 页；公元 10 世纪增长 17%；J. 德维斯，1982 年；55% 进口货是公元 9 至 11 世纪购进的。

现都无法与之相比，无论是在加奥、[59] 辛丘－巴拉、[60] 尼亚尼，[61] 还是在杰内－杰诺[62] 都没有上述泰格达乌斯特那样丰富的发现。玻璃制品也是如此，在同一时期泰格达乌斯特进口了各种各样的玻璃器皿（瓶、罐、杯、高脚杯，见图片 14.7），[63] 但是迄今在其他发掘点却很少发现玻璃制品。B. 赛松提出了一种颇有说服力的论点，认为当时甚至曾有组织地进口碎玻璃，在当地熔化以制成珠子，时髦妇女同喜欢其他饰物一样极其欢迎这种珠子。[64]

为了全面了解这种满足定居于萨赫勒地区的北非人的需求而跨越撒哈拉进行的奢侈品贸易，除了小麦、枣、葡萄干、陶器和玻璃制品以外，还必须加上银器。泰格达乌斯特也制造银器，[65] 可能还有那些越过奥胡达古斯特流通的宝石和半宝石。宝石与半宝石的流通始于公元 900 年以前，随后与主要消费市场的需求同步发展，这些宝石的原产地可以向我们揭示许多情况。 **420**

来自上埃及的真玛瑙颇为罕见。[66] 天河石更为重要，T. 莱维基未将其纳入他编制的阿拉伯著作家提及的宝石目录之中[67]，但是就本章涉及的这几个世纪而言，考古发掘获得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碎片[68]。迄今得到证实的矿区全都离西非十分遥远：在提贝斯提的东北[69]以及在费赞[70]。因此，在西非发现这种美丽的绿色矿石的大量碎片意味着它们曾被以某种方式从东北非运到西部非洲来。当然，十分晚近的一次研究发现在毛里塔尼亚的提吉克贾地区也有少量天河石矿藏[71]。石榴石[72]来自马格里布；T. 莱维基指出，在法蒂玛王朝时期埃及曾进口过一些，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了一块加工精美的石榴石[73]。

---

[59] R. 莫尼，1952 年。

[60] G. 蒂尔曼、D. 罗贝尔和 A. 拉维塞，1978 年。

[61] W. 菲利波维亚克，1979 年。

[62] S. K. 麦金托什和 R. J. 麦金托什，1980 年 (b)。

[63] C. 瓦纳克尔，1979 年：关于完整的或可以复原的物品的发现，见收入 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 1983 年著作中 C. 瓦纳克尔所写的一章；J. 德维斯，1982 年：发掘出来的玻璃制品中 42% 属于公元 9 至 11 世纪这一历史时期。

[64] B. 赛松，1979 年，第 659 和以后各页，挖掘时发现许多玻璃珠模具（该书第 510 页）。

[65] B. 赛松，同上：银饰物，第 595 页，图片 6; D. 罗贝尔，1980 年，第 209 页：一粒银珠，以及上引财富中的一只银手镯和三只耳环。还应注意巴克里著作（1913 年版，第 329 页）讲到加纳宫廷里的狗都戴着金和银制成的项圈，项圈上有用同样两种金属制做的小铃铛。

[66] T. 莱维基，1967 年 (a)，第 59 和以后各页。L. 德斯普拉格尼（L. Desplagnes）在马里的基利和瓦拉吉发掘古坟冢时曾发现一些玛瑙，但没有测定年代或进行地层分析，见 A. M. D. 勒伯夫和 V. 帕克（V. Paques），1970 年，第 14 页。

[67] T. 莱维基，1967 年 (a)。

[68] A. M. D. 勒伯夫和 V. 帕克，1970 年，第 14 页：基利的坟冢肯定没有测定年代；C. 瓦纳克尔，1979 年；B. 赛松，1979 年；J. 波莱，1980 年，第 91 页；D. 罗贝尔，1980 年，第 209 页，主要涉及奥胡达古斯特成为城镇后的最初几个阶段。

[69] P. 瓦尔，1966 年，第 38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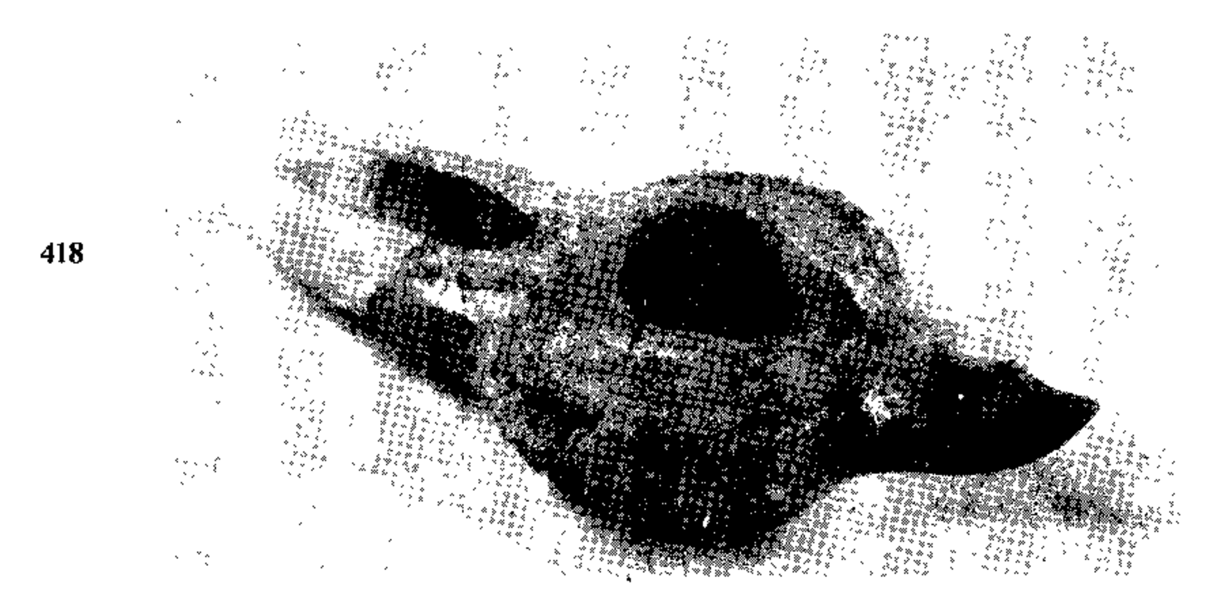
[70] T. 莫诺，1948 年，第 151 及以后各页。

[71] S. 安布拉尔（S. Amblard），1984 年，第 216 页。

[72] T. 莱维基，1967 年 (a)，第 56－57 页：阿拉伯语称之为 *bidjādi*。

[73] TEG1963，MIV409。另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时我们也可以设想这或许是另一种不同的宝石。T. 莱维基，1967 年 (a)，援引雅库特（Yākūt），提到一种锈石，其中一个品种是红色（刚玉或结晶铝），质地十分坚硬，有时被当成红宝石。据 T. 莱维基说，巴克里提到在从锡吉勒马萨到阿格马特的路上，有一处这种宝石的矿源，储量丰富。

418



图片 14.6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一盏带有储油槽的油灯，刻有旋轴式装饰图案，系涂有绿釉的陶器。灯嘴顶部经修复

419



图片 14.7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发现的进口玻璃高脚杯，可能是来自伊弗里基亚或埃及（?）（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因茨玻璃研究所修复）。

至于巴克里称之为*tasi－n－samt*的宝石[24]，T.莱维基正确地拒绝了R.莫尼将其译为

[24] J.德维斯，1970年，第119页，注2："一种很像玛瑙的宝石，有时红、黄、白三色相间"。

“玛瑙”的建议[75]，但他自己译为光玉髓也有问题，首先，为了排除曾从印度进口光玉髓的传说，必须强调指出在非洲有很多光玉髓，特别是在尼罗河流域中部[76]。因此，暂且 **421** 不考虑距离问题，在西非这一时期发现有光玉髓的踪迹并不令人吃惊[77]。但是，根据巴克里的描写，这种宝石与其说像光玉髓，不如说更像玉髓，而且在泰格达乌斯特确实发现了许多这一时期的玉髓标本[78]。我们还记得，T. 莱维基认为巴克里提到的这种矿石可能产于阿哈加尔[79]，恰与一处玉髓矿场一致，结论恐怕就是如此。至于这些宝石的用途——在10和11世纪的西非它们很受欢迎[80]——，就泰格达乌斯特的发现而言，B.赛松是证明用金属、宝石和贝壳混合制成饰物之重要性的第一人[81]。最后，我们或许应该提一下玛瑙贝的进口，我们对这种贝壳跨越撒哈拉的历史仍然了解甚少。它们大约在9到10世纪出现于奥胡达古斯特[82]，11世纪起在北方开始出现以此进行贸易的踪迹[83]。

当然，就奥胡达古斯特而言，有必要再重复一遍，这些进口产品是为满足来自北方的富有移民的需要，当他们消失以后——最迟在公元1100年之后——奢侈品也很快就消失了。在这一意义上，奥胡达古斯特似乎不是（或者仅在某种极特殊的场合下才是）南方进口这些奢侈品的集散中心，而是经营大西洋沿岸一带的经过提炼的黄金、[84] 带 **422** 有花纹的鞣制皮革、琥珀[85]，可能还有树胶[86]等北方产品的高价值贸易的一个中心。在产自北方的产品中，只有盐可能进行范围广泛的转口贸易。

随着我们的知识愈益详尽具体，这一贸易的景象显得越来越复杂。现在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研究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即为使上述奢侈品有市场，在整个萨赫勒地区的各个城镇中是否存在过一个足够富裕的“中产阶级”，其欣赏口味与马格里布人的口味大致类似。目前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慎重，即使就这一时期而言我们作出否定的回答，则奥胡达古斯特也是个例外。当时奥胡达古斯特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炼铜中心，它

---

[75] T. 莱维基，1967年（a），第53－54页。

[76] S. D. F. 戈伊坦，1973年，第283页：公元1046年曾有两包光玉髓从亚历山大送往突尼斯。

[77] A. M. D. 勒伯夫和V. 帕克，1970年，第14页：在基利和瓦拉吉发掘出许多，未测定年代；本章讨论的那个时期，在泰格达乌斯特找到它们并非异乎寻常：B. 赛松，1979年；J. 波莱，1980年；D. 罗贝尔，1980年；J. 德维斯，1982年。据报道，曾在杰内－杰诺发现一颗光玉髓珠子；S. K. 麦金托什和R. J. 麦金托什，1980年（b），第190页，经测定年代为＋400－900年间。

[78] C. 瓦纳克尔，1979年：共15例；B. 赛松，1979年：许多例；J. 波莱，1980年和D. 罗贝尔，1980年；J. 德维斯，1982年。

[79] T. 莱维基，1967年（a），第54页：位于乌扎勒和提米索之间，在古达梅斯通往塔德梅卡的一条支路上

[80] J. 德维斯，1970年，第119页注1，已经考古研究证实。

[81] B. 赛松，1979年，第385和以后各页，精巧加工的玉髓和光玉髓珠子，圆柱体天河石首饰、薄片等。

[82] C. 瓦纳克尔，1979年：更可能是在10世纪；D. 罗贝尔，1980年，第209页：10世纪；J. 德维斯，1981年（a）：更可能是9世纪。

[83] S. D. F. 戈伊坦，1967年，第154页：一般运抵伊弗里基亚诸港口的货物中有玛瑙贝；第275页：有些玛瑙贝在冬季运抵的黎波里港，承销商人抱怨，在这种季节销路不好；第373页：公元1055－1056年在凯鲁万售出十大袋玛瑙贝，售价相当于55第纳尔。

[84] 文献提到并经发掘证实，奥胡达古斯特肯定参与了猎取大羚羊和出口皮毛的活动，甚至可能包括伊本·豪卡勒（1964年，第91页）谈到的著名的拉姆塔人的盾牌。见巴克里，1913年，第301页。

[85] 正如大量双壳老蚶和瓜螺贝壳所证明的，同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从未停止过。

[86] 巴克里，1913年，第299页。

进口原料，似乎还加工成颇精致的合金，并且生产奢侈品——首饰和徽章[287]——供本地消费，或供再出口。D. 罗贝尔认为，那种在加纳被用作“通货”的铜丝可能就是奥胡达古斯特出产的[288]。

在奥胡达古斯特获得的成果，肯定会在今后开展类似考古发掘工作的地方再现。这说明目前关于穿越撒哈拉贸易的一切结论都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这一贸易比以往认为的更加变幻莫测、更加复杂、更加充满矛盾。在大沙漠东部，正如 D. 兰格和 S. 伯绍德所指出，这一时期卡瓦尔的贸易（既向南方出口枣类和食盐，又向远至瓦尔格拉的北方出口明矾）同样十分复杂。[289]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设想一下，在“赫赫有名”的食盐－黄金贸易的名义下，这种贸易的内容是否会随着时尚和力量对比的改变而有所变化，漂忽不定，而并不像文献和前述各种固定路线所描述的那样稳定？这一贸易是否真的改变了撒哈拉两边的生活习性和情趣？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黄金贸易本身。巴克里曾三次明确地谈到黄金贸易：一次涉及奥胡达古斯特，其他两次则是在描述与其他线路不相干的两条路线（插图 14.7 中的第四和第五条路线）的时候。第一条路线是从加纳至吉亚鲁[290]，先走 4 天到萨马坎达，再 2 天至塔卡，又一天到“尼罗河”的一道河湾，骆驼可由此涉水而过。从那里一路通向盖尔恩蒂尔[291]，此处没有穆斯林，据巴克里说，他们定居在西面一点的亚拉斯纳，这条线路就终止于此。第二条路线更不明确，[292] 从加纳到西南面的库加，即最好的金矿(*ma'ādin*)所在地。巴克里的论述似乎表明，穆斯林商人的“淘金狂”应能使他们深入南方，几乎同开采区发生直接的接触，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这次狂潮显然比伊德里西一个世纪以后描述的（插图 14.10）强烈得多。伊德里西所说的两条主要黄金贸易路线显然更有条理。

第一条路线是通过相当靠北的城镇，如塔克鲁尔以及附属于它的巴里萨和锡拉，沟通北方商人与处于塔克鲁尔统治下并在其控制的城镇间奔波的黑人商人之间的联系[293]。因此，存在着一个黑人控制下的贸易体系（塔克鲁尔），一个世纪以前，该地区还不存在这样的体系，尽管巴克里已经提到，锡拉当时试图与加纳竞争[294]。巴里萨是这个体系的南端，距加纳、奥胡达古斯特和塔克鲁尔有 12 天[295]路程，可以清楚地确定位于上塞内加尔地区，但却是在黄金矿区范围之外。

如果我们根据两位作者的叙述，比较一下吉亚鲁－伊拉斯纳和吉亚拉－巴里萨的

---

[287] C. 瓦纳克尔，1979 年，第 110 及以后各页；B. 赛松，1979 年。

[288] D. 罗贝尔，1980 年，第 209、259、284 页。

[289] D. 兰格与 S. 伯绍德，1977 年，第 32－35 页。

[290] 伊本·豪卡勒将此地名写作 Gh. r. yû(或 Gh. r. y. wā)；巴克里拼作 Gh. yārū；伊德里西写成 Gh. yāra。引自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01－102 页。

[291] 巴克里写作 Gh. r. n. t. l.；伊德里西写为 Gh. rbil 或 Gh. rīl。

[292]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04 页。

[293] 同上，第 136 页。

[294] 同上，第 96 页：“〔锡拉国王〕有一个地域甚大的王国，人口密集，几乎可以与加纳匹敌。”

[295] 不是 J. M. 库奥克 1975 年著作误认为的 11 天，第 130 页。

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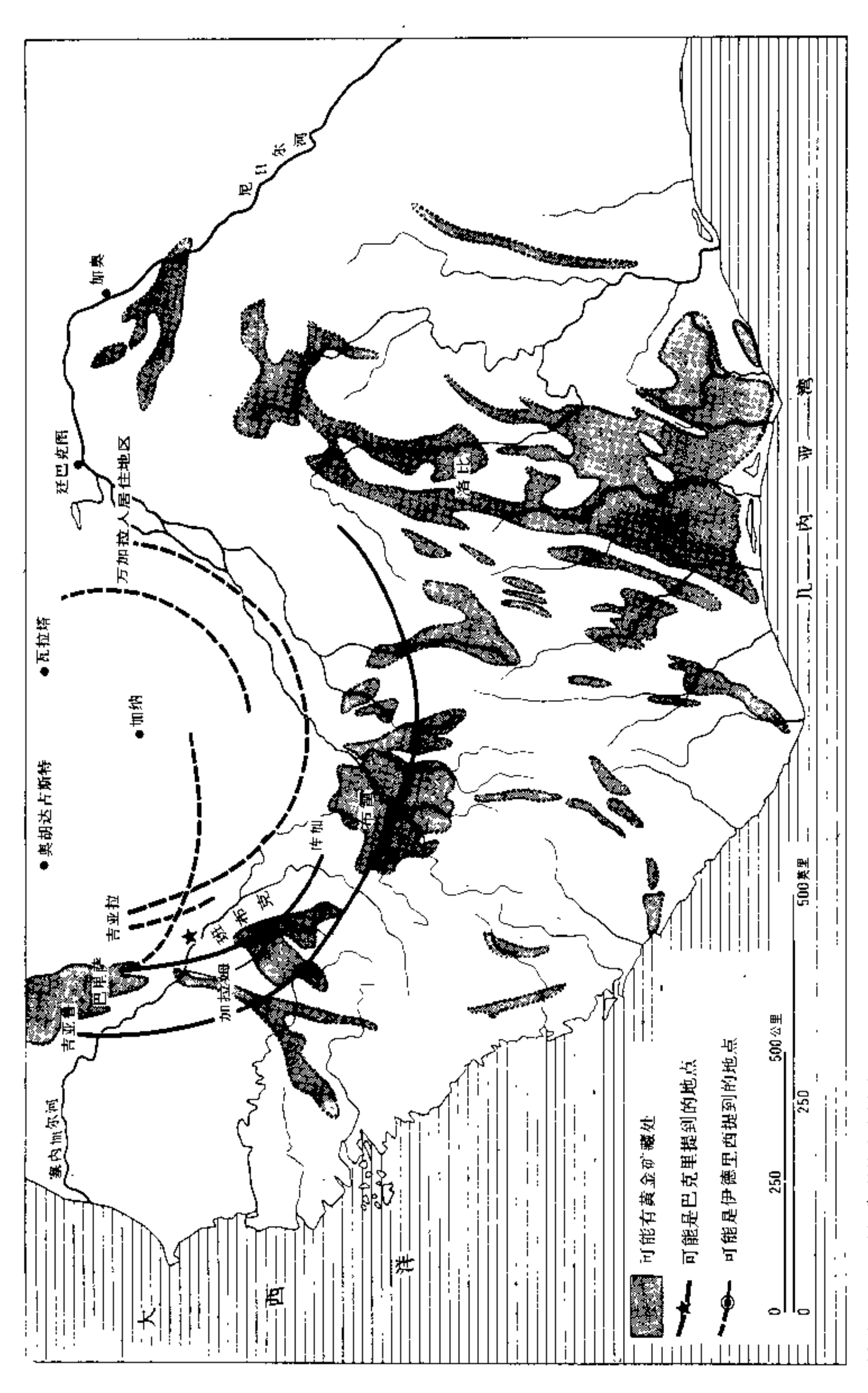


插图14.10 西部非洲的产金区域

位置，就会发现伊德里斯的说法将黄金贸易的中心大大推向北方，同时缩小了从北方到黑非洲来的穆斯林商人的活动范围。对于这种变化可以有许多种解释。我们现在可以记住，组建塔克鲁尔（当然是在公元1050年以后）急剧改变了黄金运输的地理位置。为了充分理解所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记住，按照伊德里西的说法，从塔克鲁尔向北的路线直接通到阿祖基和锡吉勒马萨。

伊德里西随后又描述了由加纳支配的第二个黄金销售体系[46]。这一体系的最南端是盖尔比勒和吉亚拉[47]。后者步行到加纳要11天，根据这份文献，位于贯穿塞内加尔河支流鲍勒河与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一条弧线上。就这两个地点而言，鲍勒河看来更可取。此外（这又是一个问题）还应注意到，这样一来便使得吉亚拉和巴里萨，从而也就是使相互竞争的塔克鲁尔和加纳两大体系互相靠近，形成危险局面，还要看到，这样一来巴里萨和吉亚拉也就成为两大体系向加拉姆和班布克的矿区推进的基地。[48] 再往东，万加拉人占据着一块盛产黄金的广袤领土。根据伊德里西提供的材料：该地区的面积（480公里× 240公里）、加纳与万加拉地区间的距离（8天）、在加纳控制下的万加拉城镇提拉卡所处的位置，以及万加拉人向马格里布和瓦尔格拉出口黄金的事实——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该地区正好与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相吻合，位于最南端布雷附近和提拉卡外围地区之间。这是对这个内陆三角洲从广义角度所下的定义，并不精确，却恰好与文献记述一致。然而，我们仍然处于黄金开采地带之外。[49]

425 应该强调指出，对各种材料中提到的黑人商人需作进一步的探讨。首先从巴克里的材料开始。J.M.库奥克对巴克里提及 '*adjam*(非阿拉伯)商人的那段文字的翻译[50]可能有问题：主要是这些被称为 Banū N.gh.m.ran 或者 Namghmarāna[51] 的商人曾被一名抄写员[52]等同于 Wangh.m.rāta，遂引发了一场重大辩论，特别是因为正如所有翻译者都认为的那样，这些商人出售黄金。[53] 当然，关于万加拉人[54]的整个问题以及他们的地域和经济作用，有朝一日还需要再作研究。最后，我们不应忘记，巴克里和伊德里西都曾提到过在盖尔比勒、吉亚拉、巴里萨、塔克鲁尔、加纳和加奥等地的黑人商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名道姓。

如果声称对这些难题已经得出最终结论，未免过于自以为是。我们最多只是想再一

---

[46] 同上，第137页："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国家都处于加纳的统治之下：它们向其提供所需的一切，而加纳则向它们提供保护。"

[47] 巴克里将第一个地方称为 Gh−r. n. t. l，第二个称为 Gh−yaru。

[48] 令人感兴趣的是，J. O. 特里奥德（J. O. Triaud）解释巴克里提供的资料时，得出关于吉亚鲁的结论同我们就伊德里西著述的看法相似（见 J. O. 亨威克、C. 梅拉苏和 J. −L. 特里奥德，1981年；另见 R. 莫尼，1961年，第124页。）

[49] 在这方面，我们也完全同意 S. K. 麦金托什和 R. J. 麦金托什 1981年的结论。

[50] J. M. 库奥克，1985年，第102页；巴克里，1913年，第333页。

[51] 我的根据是加利先生从手稿中所得出的这两种不同的读法。

[52]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MS2218，第240页。努尔丁·加利先生提供的材料。

[53] 努尔丁·加利先生建议译成："Nunghamarāta(或是 W. n. gh. m. rāt，或 W. n. gh. m. rān)，他们是把黄金带来此地及其毗邻地区的商人"。

[54] 这一名称首次出现于伊德里西的书中。努尔丁·加利建议音译为 Wan. Kāra。

次引起人们注意某些事情。在伊本·豪卡勒那个时代，有黑人定居并发现金子的那些非常含糊而又遥远的地区据说离加纳有一个月的路程。后来，在巴克里著作中，我们看到这一距离缩短了；而伊德里西则得出了看来合乎情理的结论。总之，我们对此越仔细研究，就越强烈地感觉到，那些北方商人，即向我们所援引的作者们提供情况的人，并未直接到过黄金矿区，只是与我们刚提及的黑人商人有过来往。鉴于这一切，又考虑到 426 巴克里和伊德里西各自估计的距离不同，我们似乎可以假定，北方商人从10世纪起对萨赫勒地区形成了一种压力，但随着苏丹人（不论是否穆斯林）对这种压力的反应日趋强烈，这些商人在11和12世纪之间开始向北方退缩。然而与此相反的假说也可能更为准确：伊本·豪卡勒对位于撒哈拉沙漠另一边的黑人地区只有极为模糊的了解；巴克里知道得多一些，但也夸大了商人在南方跋涉的路程；伊德里西更接近事实。实际情况从来不曾有过变化；黑人统治者坚决不让他人自由进入金矿区，甚至不允许自由销售黄金。这两种假说中哪个更接近实际，还需要做许多研究才能确定。

开展跨撒哈拉贸易所带来的文化影响

对食品的喜好以及食品的来源，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其食品作物——小麦和枣类——的种植知识以及食品的特色而言，北方能向南方传播的东西极为有限，因此只能以高昂价格向定居于沙漠以南的“外来”商人出口他们所要的北方产品。作为便于运输的商品，枣类贸易比小麦贸易更为经久不衰。[55]

除了绿洲地区有些园地之外，撒哈拉地区不靠农业为生。据伊德里西记述，由于沙漠扩展，特别是向南延伸，撒哈拉地区日益扩大。[56] 在该地区，人们不知道面包为何物，而又十分珍惜用水，他们以干蛇肉条、驼奶和野草为主食。[57] 纳西尔沙漠[58] 和加奥以北一带，[59] 这一类地方蛇很多而水更少，蛇肉便成为一种副食。各种文献几乎都没讲到狩猎，但这肯定是获得食物的另一主要来源。[60]

奥胡达古斯特属于撒哈拉沙漠和这极其干旱地区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当地水位的缘 427 故，它又是个不同于周围的很特殊的地带。10世纪时，有两种不同“阶级”的饮食方式并存。一种是主要来自北方的富人[61]饮食习惯：小麦、干果和当地水果（无花果和葡

---

[55] J. M. 库奥克，1975年，第131页；据伊德里西记述，普遍认为锡古勒马萨、塔瓦特、瓦尔格拉是枣类出口区。

[56] J. M. 库奥克，1975年，第146和以后各页。

[57] 关于食物采集区域见R. 莫尼，1961年，第228和以后各页

[58] J. M. 库奥克，1975年，第148—149页。

[59] 伊德里西的记述；见J. M. 库奥克，1975年，第151—152页，此地是萨加瓦人（扎加瓦人?）的家乡，他们食用单峰骆驼的奶、油和肉，很少吃蔬菜，不吃小麦，种植少许非洲窄叶低株粟类作物。

[60] 巴克里，1913年，第321页，只是在提及可供出口的产品时谈起狩猎，如羚羊皮和沙漠 耳郭狐毛皮。S. K. 麦金托什和R. J. 麦金托什在杰内－杰诺最早时期的地层中发现用作食物的鳄鱼、乌龟和禽鸟的遗骨（1980年（b），第188页）。见R. 莫尼，1961年，第257—258页。

[61] 我们在前文曾提请人们注意，这类人喜爱奢侈生活，这从进口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他们家中的极度奢华即可得到证明。在萨赫勒地区其他考古发掘点都未见报道的一个细节可能使人不得不信服：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了好几支用防腐木料刻制的涂眼圈用的化妆笔。

萄)、以及牛羊肉（供应充足而且不太贵）。另一种是以黑人为主的穷人饮食习惯：当在粟类[62]制成的面团或烘饼，佐以南方进口的蜂蜜[63]。在这方面，考古发掘再次对文献作了补允，我们发现了直径约10厘米的蜂房式圆盘，目前在南方还用来制作粟类烘饼。在12世纪，北方商人已经撤走，大概是阿尔莫拉维德人人侵之后，据伊德里西记述[64]，奥胡达古斯特主要靠驼肉干为生，偶尔补充一点块菌，此地每年只有几周能找到块菌。该城既然能生存下来，看来饮食习惯应与周围地区一致。

向西越过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以及位于东面的卡瓦尔，与食物有关的一切都完全不同。构成主食的有广泛种植的粟类[65]，还有稻米[66]、鲜鱼、咸鱼[67]或熏鱼[68]、牛肉和牛奶以及较为少见的绵羊和山羊的肉和奶[69]。这在三、四百年中没有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在常用食品之外增加了枣类和驼肉干。在这片粟类种植区，食物营养方面的传统十分悠久，成分均衡，与环境极为相宜[70]，不会轻易改变。在上述第三个食物区内经常有关于饮用粟类啤酒的记述[71]，我们认为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了它的踪迹，但还有待于化验证实。

三个食物区各具鲜明的特色，而且各行其是，尽管相互有所接触，但至少到12世纪仍相对独立。[72]因此，北方出现的种种农业技术重大进展[73]几乎都没有传到南方也就不令人吃惊了。南方的农耕方法很适合周围的环境，因而许多世纪都未见改变。

与此同一原因，尽管引进了某些技术和产品，但均未被南方文化所接受。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了温度高达（甚至可能超过）1000℃的烧制窑[74]，就其形状和结构来看，同在突尼斯的萨布拉－曼苏里耶发现的窑很相近，突尼斯的窑显然属于法蒂玛统治时期，与玻璃制造有关。这些窑可能与制做珠子或熔化铜合金有关，无疑曾用于反复进行尝试生产陶器上用的彩釉。这些窑未能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风云突变中幸免于难。事

---

[62] J. M.库奥克，1975年，第149页。这里提到的是粟类（*Pennisetum*，而不是高粱，见R.莫尼，1961年，第238和以后各页)。高粱十分罕见，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唯一一次发现是在8、9世纪的尼亚尼（W.菲利波维亚克，1979年，第107页）。在奥胡达古斯特，挖掘中发现了数量相对较多的谷仓，遗憾的是，与本章涉及的几个世纪有关的谷仓都是空的。发现了大量这一阶段的碾磨器具（磨石和磨臼），证实当时食用谷物确凿无疑。

[63] 关于蜂蜜，见R.莫尼，1961年，第292页。

[64] J. M库奥克，1975年，第149页。

[65] 巴克里，1913年，第324－325页。

[66] S. K.麦金托什和R. J.麦金托什，1980年（b），第188页；R. M. A.贝多等人，1978年。

[67] 伊德里西（J. M.库奥克，1975年，第131页）：充足的鱼类"是多数苏丹人的食物，他们捕获后用盐腌制。"

[68] 关于公元4或5世纪可能就有熏制坊的情况见S. K.麦金托什和R. J.麦金托什，1980年（b）。

[69] 奇怪的是巴克里注意到塞内加尔河畔的锡拉没有山羊和绵羊，而牛很多（巴克里，1913年，第324－325页）。在公元50－400年间，牛肉和鱼在杰内－杰诺居民的饮食中占重要地位（S. K.麦金托什和R. J.麦金托什，1980年（b），第189页）；绵羊和山羊在公元900年后才出现（第191页）。R.莫尼，1961年，第280页便已指出，萨赫勒地区似乎很晚才引进长毛羊（*Ovis Longipes*）。

[70] S. K.麦金托什和R. J.麦金托什，1980年（b）。

[71] 例如伊德里西，见J. M.库奥克，1975年，第132页。

[72] 巴克里坚持这样认为，伊德里西更是如此，此后很久伊本·巴图塔对苏丹地区食物特点的论述本身就证明萨赫勒地区构成各类饮食习惯的分界线。

[73] L.博伦斯（L. Bolens），1974年。

[74] C.瓦纳克尔，1979年，第124和以后各页。

件过后也未重建，似乎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建造类似的烧窑。这显然不是因为缺乏技术方面的能力——至少不比在陶器生产方面更受制于缺乏技术能力；[65] 在萨赫勒地区居民或其南面邻居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窑并非什么完全不可或缺的东西。

在进口了相当数量的高质量油灯之后，当地只进行了并非认真的仿制尝试[66]。目前无法肯定南方当时采用何种照明方式。

旋制坯陶器和上釉陶器的到来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明显地反映在当地产品的形式上，尽管技术方面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因而无法简单地用模具方法仿制旋坯方法的产品，反之亦然。但是这些进口的产品并没有使当地陶器的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当地制陶业的技术、花饰和形状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充其量，仅仅只是在那些拥有大批北方商人定居的地方，购买力很高的人们的大量需要才对生产有所刺激。目前，鉴于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了成吨的陶器碎片，我们倾向于认为当地的生产活动确实受到了这种刺激。 429 这肯定给周围环境带来了重大问题，但是产品的形状、花饰和工艺仍旧保持原样，这说明制造陶器的黑人具有文化方面的稳定性，尽管他们的顾客是来自北方的穆斯林。除模仿个别进口陶器的形状和花饰外，黑非洲产陶区依旧独立于北方的产陶区[67]。南方喜欢制作拟人造型（图片 14.8）和动物造型的陶塑这种强烈爱好（目前越来越令人吃惊的发现就是南方这种爱好的产物）也并非得益自北方。[68] 在这方面，一些古遗址的发掘工作给人们颇多收获，比那些 14 和 15 世纪出产的灿烂杰作更富启迪性。

跨撒哈拉联系的发展，北方对黄金和皮革的强烈需求，以及南方对北方产品的较为有限的需求（食盐除外），可能在 12 世纪之前一直没有给南北两方居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来什么重大的变化。

今天，我们大致会判定，这些因素也没有导致重大的基本技术传播，例如在金属制造方面。这或者是因为这种技术传播发生于更早的时期，或者是因为南方早就找到了自己的金属制造方法。就铜而言，在本章所谈及的跨撒哈拉联系扩展之前至少 1000 年，撒哈拉以南就已开始生产铜。现在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还知道脱蜡、铸造、加铅青铜[69] 和焊接等制造技术在公元 6 至 8 世纪之间就在撒哈拉以南发展起来了，尽管我们还 430 无法说出这些是否当地的发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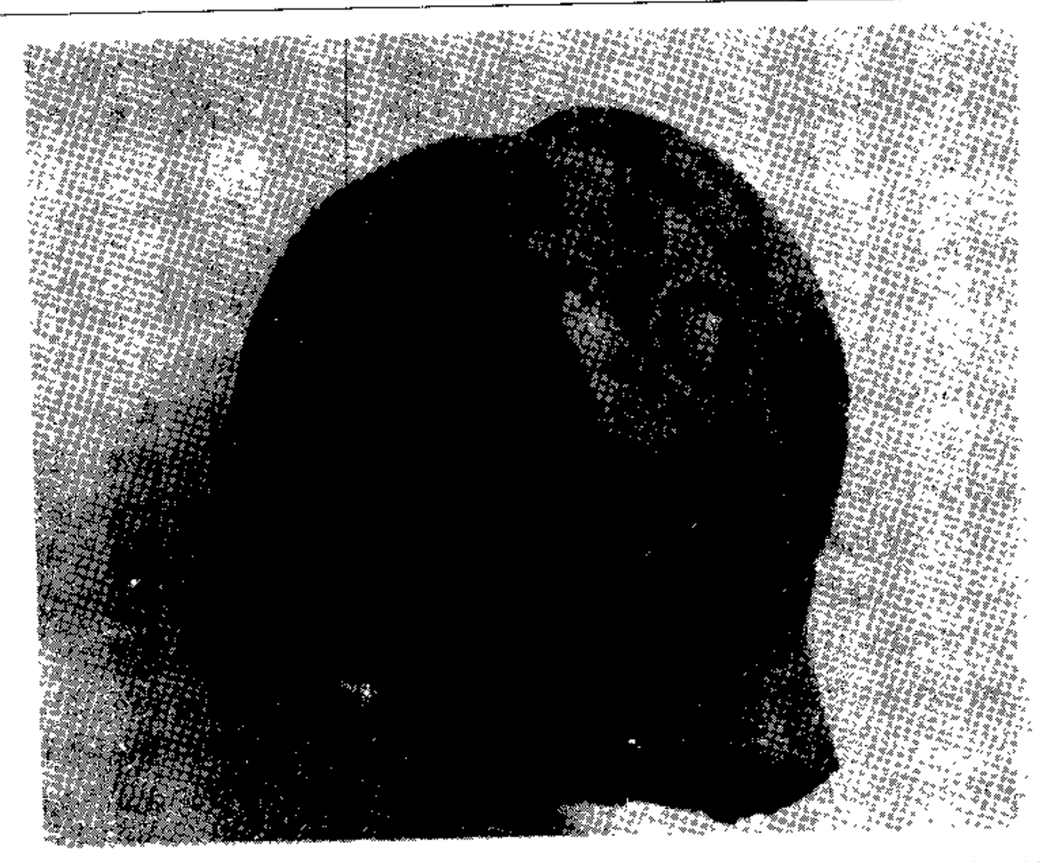
[65] J. 德维斯，1981 年（a）

[66] B. 赛松，1979 年，第 505 页。

[67] 对此处涉及的两种地区还有大量研究工作有待开展。在实验室技术提供诸多帮助的领域里，研究人员往往偏于过快地确定自己的论证方式。目前几乎无可争辩的是，黑非洲产品的形状肯定来自本地创造，在杰内－杰诺发现的精美绘制花纹（S. K. 麦金托什和 R. J. 麦金托什，1980 年（b），第 230、261、453 页）绝非模仿北方的产品，在尼亚尼和特勒姆斯发现的三足杯和四足杯可能起源相同，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这一领域中，所有一切或者几乎所有一切工作还都有待于着手进行。

[68] 在泰格达乌斯特有许多发现，不久即将在刊物上发表。已发表的见 D. 罗贝尔，1966 年以及该文所附照片。又见 S. K. 麦金托什和 R. J. 麦金托什 1980 年（b）的图片 IX 和第 189 页。最近在尼日尔的考古发现表明还将会出现不少令人吃惊之处

[69] A. 拉维塞和 G. 蒂尔曼，1978 年。仅加铅青铜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在辛丘－巴拉、泰格达乌斯特和伊格博－乌库发现这种铜的踪迹，但目前该技术传播的方向（如果有的话）还不清楚。西班牙和摩洛哥在新石器时代也出产加铅青铜器，但仅仅就此还不能得出肯定的传播方向的结论。



图片 14.8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一尊前所未见的伊斯兰纪元前赤土陶俑（侧面）。头发、眼睛和嘴的压痕是空心杆压制而成。陶象涂有一层赭色泥釉。

然而在三个领域中，技术传播——不仅仅是从北向南传播——可能确有深远的意义和"持久性"。J.沙赫特很久以前的著名论文[30]曾指出，建筑方面发生了类似于T.莱维基著作中所揭示的在人文和经济领域的那种交流：易巴德模式的影响及其跨越沙漠的传播。这些事实显然不仅仅只限于建筑领域。然而，从局部推论整体很危险，譬如不能从由于清真寺的布局设计来自北方这一点就认定所有建筑技术都是从北方引进。

但是人们仍然往往坚持这样的看法（产生于幼稚地理解文献），即建筑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坎库·穆萨曼萨朝圣归来后带到苏丹地区的。这是将建造某些纪念碑、清真寺、宫殿、特别是穆斯林城镇规划与安排生活空间的艺术混为一谈，而后者才是所有建筑学的开端。泥土建筑的意义曾长期被矫饰造作的石块建筑[31]和近代的水泥板和波纹铁皮所遮掩，然而如今重又成为人们关注和认真研究的对象[32]。在泰格达乌斯特，最古老的建筑相当多地采用模制砖，周围均可发现这种砖墙。用泥土[33]、可能还有砖[34]建

431

[30] J.沙赫特（J. Schacht），1954年。这项研究当然有要修正之处，但也颇有启迪。

[31] 即使在这方面，对坎库·穆萨所发挥作用的流行说法也需要彻底修正。早在10至11世纪，泰格达乌斯特和昆比萨利赫的建筑就曾采用石料。在这两处遗址发现的14世纪前的清真寺即用石块筑成。

[32] L.普吕辛（L. Prussin.1981年；R. J 麦金托什、1976年，是该领域中的一篇代表作。

[33] S. K.麦金托什和R. J.麦金托什1980年（b）、第189和以后各页：在公元50－900年间有泥土建筑的踪迹。R. M A.贝多等人，1978年：托洛伊人用圆柱型粘土砖造谷仓。L.普吕辛，1981年认为，那种用类似制陶工艺制成的圆柱砖建造的圆型房屋最符合非洲人的需要。

[34] J.波莱，1980年，第330页，砖的出现使线条明晰，并可砌出壁角。关于非凡的砖建筑，见L.普吕辛，1981年；R. M. A.贝多等人，1978年，第113页。

房的艺术先于频繁的跨撒哈拉来往。鉴于模制砖建筑在纳加达文化以及古代和中世纪努比亚的重要地位[55]，上述发现就不足为怪了。可以有把握地说非洲大陆很早便掌握了这种利用适应性强而又方便的建筑材料的方法。

伊斯兰化之后，穆斯林商人可能把他们自己的房屋设计，或者至少是伊斯兰城镇特有的布局带到了大沙漠以南。这一变化在泰格达乌斯特清晰可见，在 9 世纪末和 10 世纪，街道和带围墙的房屋很快在早先布局简单得多的地方出现。同时，我们也应研究是否有某些技术由南向北跨越撒哈拉沙漠。在发掘马拉喀什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王宫时曾发现一段残墙，两段石块墙中间夹着一段泥土碎石墙[56]。我们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了几堵与此近似的墙，可以设想阿尔莫拉维德人在马拉喀什采用了某种撒哈拉或萨赫勒地区的技术[57]。这问题本不值得一提，然而由此却立即引出另一问题，即墙上的绘制花饰。在 10 至 11 世纪的泰格达乌斯特，有一种红白相间的彩绘墙饰——目前还看不出有固定的型式——颇为普遍：描在一层很薄的泥土之上。可以把这种墙饰同在马拉喀什和希沙沃发现的阿尔莫拉维德时期的红白双色图案墙饰联系起来，还可以考虑一下瓦拉塔[58]和古达梅斯[59]更负盛名的花饰源自何处。

432 关于纺织和棉花跨越撒哈拉沙漠传到南方的说法同样由来已久。我们只谈谈与本章所述阶段有关的问题。各种文献都不断提到苏丹地区的人赤身裸体，但这与其说是提供了关于黑人穿着的客观情况，不如说是编纂者自身心理状态和社会背景作用的后果，这是毫不足奇的，赤身裸体和缺少一神论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曾被视为“不文明”。迄今为止，考古研究尚未提供确凿的答案。在泰格达乌斯特，从非常早的时候开始就有纺锤锭盘，但只是到 12 世纪以后才变得多起来[60]。在泰格达乌斯特，可能直到11世纪后半叶才有人穿棉布衣服[61]，在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奥戈发现棉花花粉[62]似乎也在同一时期。巴克里在描述塞内加尔河流域的城镇地区时谈到，提林卡（那里的棉花并不多）出产的缠腰布[63]在锡拉被当作“通货”使用。

如果我们现在将各种文献提供的信息汇集起来，必然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棉布在 11 和 12 世纪仍是一种奢侈品和地位的标志[64]。另一方面，R.M.A.贝多则认为从11世

---

[55] 《技术考古辞典》（*Dictionnaire archéologique des techniques*），第 1 卷，第 167 页。

[56] J. 默尼埃（J. Meunié）和 H. 泰拉斯（H. Terrasse），1952 年，第 10－11 页。该石城堡（哈贾尔堡）用 3 个月时间建成，A. 维西－米兰达，1959 年（a）。

[57] 从这个观点看，在阿祖基的发掘工作非常重要。

[58] G. J. 迪舍曼（D. J. Duchemin），1950 年。

[59] A. M. 拉马丹（A. M. Ramadan），1975 年，第 135、137 页。

[60] D. 罗贝尔－沙勒厄考察了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 155 个带花饰的纺锤锭盘，结论收入他和 J. 德维斯等人 1983 年著作。

[61] D. 罗贝尔，1980 年，第 209 页。

[62] B. 沙瓦纳，1980 年，第 139 页。

[63] 巴克里，1913 年，第 325－326 页。

[64] 伊德里西（J. M. 库奥克，第 129 页）：在锡拉和塔克鲁尔，普通人披毛皮，较富有者穿棉布；在加奥（第 139 页），普通人披兽皮，商人穿棉织布，贵族才穿特殊服装（*izār*）；在阿祖基（第 164 页），有人穿毛织物，加奥商人的衣服叫（*Kadāwir*）。R. M. A. 贝多和 R. 博兰（R. Bolland），1980 年，得出的基本结论与上述说法相去甚远。

纪起，尼日尔河河湾地区业已成为一个经济活动中心[55]。对于跨撒哈拉联系的历史来说，这个难以得出结论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可能意味着，在本章所述的时期，从北方大量进口织物的贸易一直持续到12世纪，但应该说这一问题迄今尚无定论。[56]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三个问题比前两个更加微妙和难以得出结论。这第三个问题是，突然出现对黄金的需求是否在10世纪将某种穆斯林所用的衡量体制带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57]。在泰格达乌斯特很早就有能称少量物品的天平[58]（图片14.9），玻璃砝码 433 传到了泰格达乌斯特、加奥和昆比·萨利赫[59]，可能还有其他质地的砝码传到了别的地方[60]。这些情况使我们提出谨慎而又相当明确的回答，即在10世纪北方对黄金产生大量需求之后可能确实同时带来了需要某种衡量体制的基础。但那是何种体制呢？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玻璃砝码，十分明显地看出法蒂玛衡制的影响。但此后有没有来自西班牙阿尔莫拉维德世界其他衡量体制的影响呢？[61]

最后谈一下跨撒哈拉贸易的进展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什么后果。

在南方，或者由于皈依伊斯兰教，或者出自经济原因，而需要某种国家结构。显然已有某种形式开始成型（在塔亚鲁尔和加纳十分明显，在加奥，或许还有其他地方，大致也是如此），从而加强了统治者的地位，赋予他们威望，权力和新的合法性。

在北方，黄金无疑使得比以往强大得多的国家机器得以建立。法蒂玛王朝、伍麦叶王朝，特别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都靠黄金加强了自己的力量，黄金成为他们保持独立和扩大影响的基础。一种极为辉煌和富有独创性的艺术繁荣一时，可能也应该归功于黄金给这些王朝带来了巨大财富，特别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尤其是在摩洛哥一带。在两个世纪中，穆斯林世界的西部取得了具有重要地位的形象，甚至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历史中也是如此。

---

[55] R. M. A. 贝多和R. 博兰，1980年，第15页。其论据的确涉及11、12世纪，而在这两个世纪里也的确可能发生了许多变化。

[56] 在杰内－杰诺并未找到棉花的踪迹；那里发现的纺锤锭盘属于该遗址发展的最后几个阶段。

[57] J. 德维斯就这个问题依据A. 洛努瓦女士的研究撰写了一篇论文，收入他和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年的著作。T. F. 加勒德（T. F. Garrard）成效卓著的作品，特别值得一读，见其1975年和1980年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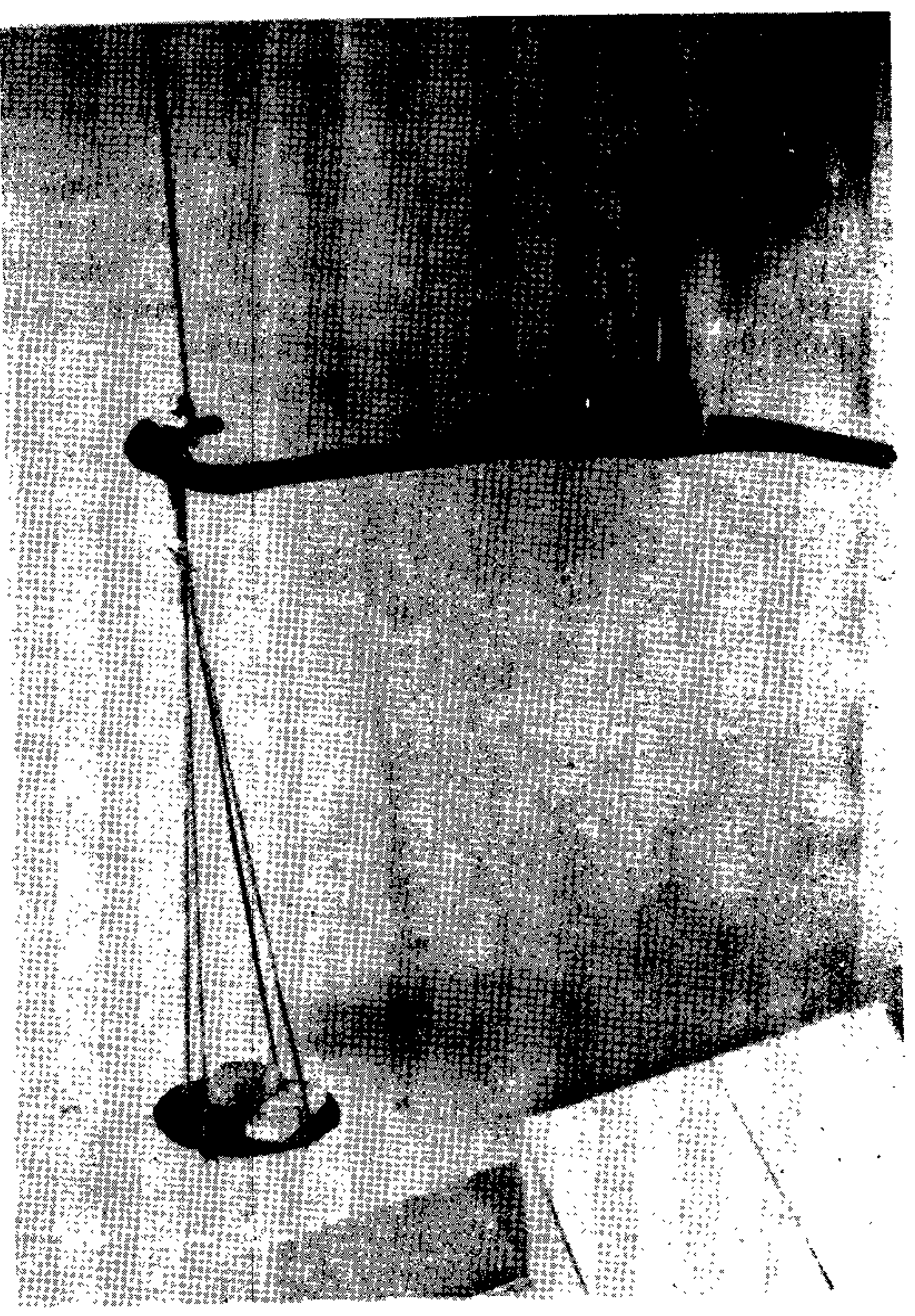
[58] B. 赛松，1979年，第688页。

[59] R. 莫尼，1961年，第415页。初步评论：昆比萨利赫与这些砝码同时出土的考古发掘物的年代大概属于14至15世纪，最早不会超过13世纪。因此，这些砝码比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砝码要晚。两个完整的砝码分别重0.65克和2.43克，另外三个可能重4.10克、6.54克和7.8克。没有一个标有任何记号。遗憾的是这些砝码现已丢失。加奥发现的两个砝码约重5.77克和10.12克。这些砝码很难归于任何已知的衡量体制。

[60] R. 莫尼，1961年，第416页：在昆比·萨利赫，同样的地层条件，发现14.85克（石质）、14.4克（铜质）、20.42克（铁质）、20.24克（铁质）的砝码。在加奥发现：14.9克（铜质）和9.37克（铜质）的砝码，R. 莫尼认为属于12世纪。在杰内－杰诺发现的一个砝码(?)（S. K. 麦金托什和R. J. 麦金托什，1980年）重约7克，但疑点很多，目前我对将它同穆斯林衡器联系到一起非常犹豫。

[61] 众所周知，穆斯林的衡量体制五花八门，既有与硬币相联系的各种弱衡制，也有各种强衡制。举例而言，（S. D. F. 戈伊坦，1967年），开罗杰尼扎的衡制：迪尔汉＝3.125克、鲁特勒＝450克、欧基亚＝37.5克、堪他尔＝45公斤．西班牙哈里发制（E. 莱维－普罗旺卡1950－53年，第3卷，第143和以后各页）：欧基亚＝31.48克、鲁特勒＝504克，这些计量单位根据计量对象不同而有所变化。在西班牙，堪他尔大多为50公斤，其1/4为一个阿鲁巴，这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单位。此地，迪尔汉重3.148克。因此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必须复原发掘到的砝码所属的衡制，如在泰格达乌斯特就一直力图这样做。

434



图片 14.9 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由法国南锡市铁器博物馆发现并修复的一对天平中的一个。锻铁，当地出产（大概年代为 11－12 世纪）。

435 对跨撒哈拉联系历史研究的进展是衡量对非洲研究成果不断更新的良好指标之一。每一项发现都意味着重新安排画面的总格局。譬如说，在毛里塔尼亚和阿伊尔发现铜就在整整20年中彻底打乱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接受的全套看法。如果认真关注一下古代包奇锡出口的范围；如果对乍得盆地和尼罗河之间的地面文物进行的认真考察，表明由于偏重南北联系而一直严重忽略东西的联系；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因此，我们在这里是力求开辟途径，清理并鉴别已有的资料，就研究方向和值得思考的问题提出建议，而不是就本课题描绘一幅令人满意的“最后的”蓝图。今后几十年中，必须不断依据研究成果将这段历史分段鉴别、重新组合。这些研究只是探索最终定论全过程中的门槛。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课题能更好地显示出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课题更能促使人们在宣布他们取得的成果时更为谦虚谨慎。

15 乍得地区——十字路口

D. 兰格
B.W. 巴尔金多 合作

乍得湖泊区是一片热带草原，早在公元前便有游牧和农业人口栖居。在草原逐渐消 436 失于沙漠之中的北部，居民以游牧民为主，尽管也有一些绿洲，由定居者居住。在南部，特别在汇人乍得湖诸河流沿岸，目前发现的主要是定居民的文化。撒哈拉的酷暑与乍得湖的萎缩把四面八方的人们吸引到日益缩小的湖泊附近。从无法再供人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汇集一起的人们以及他们为适应不断演变的环境与条件而进行的种种努力构成了这一地区历史的背景。

为更清楚地洞察历史事实的意义，对本章所述时期发生的气候变化作一精确介绍是十分可取的。事实上，萨赫勒地区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间的气候情况我们所知甚少。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那个时期的气候条件总的说来比现在要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公元 3 世纪到 13 世纪初，乍得湖水几乎不断地流入加扎勒河，人们可以推断当时湖面水位超过 286 米[①]。另外，J. 马莱伊认为，根据各种数据资料，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中期曾有过一段湿润期，但到了公元 11 世纪萨赫勒地区却经历了一段干旱期[②]。因此，定居民与游牧民的汇合地必定是在目前位置的北面。

此外，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乍得湖泊区过去始终是贸易和有效交流的聚汇点。新近掌握的铁器制作得到传播的时间，表明该地区有些居民与重大的技术革新趋势长期隔绝。这方面的主要分野看来是在东西而非南北之间。人们如今知道，在阿伊尔以南的埃 437 克内－万－阿帕兰，炼铁术早在公元前 540 年 ± 90 年[③] 就被人所掌握，与尼日利亚中部塔鲁加（诺克文化）掌握这项技术的公元前 440 年 ± 140 年几乎同时[④]。位于阿伊尔和乍得湖之间的泰尔米特地区，铁器制作似乎在公元前 7 世纪[⑤]即已开始。至于别的地方，铁器制作要到很久以后才得到推广。在乍得湖和提贝斯提之间的科罗托罗发现了以铁的冶炼为基础的文化遗迹，该文化叫作"哈达德"（取自阿拉伯语"铁匠"一词），曾经在公元 4 至 8 世纪兴盛一时。在同一遗址发现的彩陶说明它与尼罗河流域的两大文明密切相关：基督教时期的麦罗埃文明和努比亚文明[⑥]。关于乍得湖南岸地区也得到另

---

① J. 马莱伊（J. Maley），1981 年，第 65、101 页 乍得湖目前水位为 282 米。

② 同上，第 65、278 页。

③ D. 格雷贝纳尔（D. Grébénart），私人通信。

④ B. 法格（B. Fagg），1969 年；另见 R. 泰莱科特（R. Tylecote），1975 年。

⑤ G. 奎琼（G. Quéchon）和 J.－P. 罗塞特（J.－P. Roset），1974 年，第 97 页。

⑥ F. 特雷南－克洛斯特（F. Treinen－Claustre），1978 年，第 330－333 页；又见 P. 瓦尔（P. Huard），1966 年；Y. 科彭斯（Y. Coppens），1969 年。

外一些资料。到公元5或6世纪（所确定的年代相对说来不太可靠），在达伊马的主要遗址中才发现铁器，而采用炼铁术的时间还更迟。⑦这些为数寥寥无几的有关铁的考古资料说明，加奈姆国家建立之前，乍得湖地区令人注目的是它的严重分裂以及不平衡的发展水平而不是任何共同的一致的因素。

更为迅猛而壮观的变化进程始于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中期。这一进程很可能是因该地区或者从北非或者——似乎更有可能——从尼罗河流域引进骆驼并由扎加瓦人和图布人加以广泛使用而间接触发的。骆驼比马匹更能适应撒哈拉沙漠的自然条件，可以应用自如地长途跋涉于沙漠，而且还能运输相当沉重的物件。费赞和乍得湖泊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对穿越撒哈拉沙漠特别适宜；那里有一系列小绿洲和天然水穴，中途有宽阔的卡瓦尔绿洲，提供了一条理想的商旅线路。

另一个贸易机会是经过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与尼罗河流域的贸易。在没有掌握上述路线的确切考古资料之前，人们只能根据推断，判定早期与尼罗河流域的贸易似乎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位于费赞的加拉曼特人古代王国的存在无容置疑是进行长途贸易的重要因素；⑧但是同样由于缺乏有关费赞和卡瓦尔两个南方绿洲的史料证据，即使肉眼也能观察到年代不明的要塞遗迹的地方，也无法作出任何确切而肯定的结论。⑨

然而，似乎早在公元7世纪时，费赞的小型商队就来往于撒哈拉沙漠中段地带的商路上。如果在阿拉伯征服者乌克巴·伊本·奈菲之前没有柏柏尔或扎加瓦商人先行开道的话，这位著名的将军是难以前进远到卡瓦尔一带的（尽管3/9世纪的史料断定他确曾深入到这一带）。⑩卡瓦尔绿洲⑪当然不是这些商队的最终目的地，而且商队毫无疑问很早之前就已穿过此地到了乍得湖泊区。后来，继伊斯兰征服、各穆斯林国家在撒哈拉和北部非洲纷纷兴起、乍得湖泊区和地中海沿岸之间建立起正常贸易，撒哈拉沙漠中段地带的商路就越加重要了。

在南方，乍得湖周围，一系列因素——不仅包括贸易的扩大，而且包括武器和工具的改良，以及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出现的新的生活方式——导致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加奈姆－博尔努国家的建立和扩展，其凝聚力和创造力对于形成殖民时期前整个地区的命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在具体阐述该政治实体的建立和早期发展之前，先扼要按时间顺序介绍一下主要各族，或者在对他们了解不足的情况下，介绍一下居住在尼日尔中部和达尔富尔山区之间的各个语族是适宜的。

---

⑦ G.康纳赫（G. Connah），1971年，第57页。同一作者重新评估了以前所确定的年份，认为达伊马传入铁的年份应该是50年之后。（G.康纳赫，1981年，第146－147页。）

⑧ R. C. C.劳（R. C. C. Law），1967年（b）。

⑨ D.兰格（D. Lange）和S.伯绍德（S. Berthoud），1977年；另见H.齐格尔特（H. Ziegert），1969年。

⑩ 有两位作家记述了乌克巴·伊本·奈菲对卡瓦尔的远征：一位是伊本·阿卜德·哈卡姆（Ibn 'Abd al－Hakam），1922年，第195页，另一位是巴克里（al－Bakrī），1911年，第13－14页。前者写于257/871年之前，后者在460/1068年写成，尽管后者的著作的一部分以较早的史料为基础。参阅本书第9章和第11章。

⑪ 卡瓦尔这一名字可能源于柏柏尔语，意为"黑人"或尼格罗人。这一含意在哈萨尼耶语毛里塔尼亚中仍使用，在那儿"库里"（*kūri*）（复数"科瓦尔"*kowār*）一词适用于一切拥有自由人地位的黑非洲人。

乍得地区各族及其语言

阿拉伯地理学家们提供了阐明早期非洲历史的丰富史料。他们极其关心尽可能准确地用文字再现非洲的地理面貌（*sūrat al-ard*），这些作家积累了大量穆斯林地区和伊斯兰疆界以外地域的地理资料。可是，使用这些资料必须慎之又慎，因为他们中多数人从未到过黑非洲，只是从并非不抱偏见的商贩和那些已经离家很久因此并不一定了解家乡现状的黑非洲朝圣者那里收集信息。阿拉伯地理学家在描写异族时经常引用书本上 **439** 的陈词滥调，而且他们提到的名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泛称词。⑫ 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东部非洲的"僧祇人"、埃塞俄比亚的"哈巴什人"、西部非洲的"苏丹人"诸如此类的称呼，而不把已经得到确认的这些人的特点解说清楚。除了使用笼统的称呼外，有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也提到某些从旅行家那里得知的部族专用词。然而要确认这些部族却十分困难。除此之外，不同作者所讲的部族实体的地理位置大相径庭，直至伊本·赛义德于7/13世纪所著《地理》（*Geography*）一书问世才有了乍得湖地区的精确资料。⑬ 只有到现代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可以与该书相媲美的历史书籍。

在伊本·赛义德之前，多数阿拉伯地理学家在谈到中苏丹（该词在这种情况下与"乍得地区"同义）时都提及扎加瓦族。直至4/10世纪，博学的阿拉伯作家一直认为是扎加瓦人在统治加奈姆；伊德里西写于6/12世纪的著作中的详细描述才揭示出该族的纯粹游牧性质。⑭ 现代作者们无意从早期史料中汲取教益，往往贬低扎加瓦人的作用，或是将其视作无足轻重的部族，⑮ 或是相反，认为这是一个分布极其广泛的部族，也即如今的图布人。⑯ 从本书下文我们可以看到，扎加瓦人事实上由于5/7世纪后半叶中期在加奈姆发生的朝代更迭而经历了剧烈的演变，在加奈姆新王朝兴起后，部族的平衡以及定居民与游牧民间的比例已不同于以往。

重要的内部资料《萨拉丁·巴尔努世系表（迪万）》（*Dīwān salātīn Barnū*）包括一份无法同外部资料加以核对的部族名称表。因为在7/13世纪结束之前，朝廷的编年史家煞费苦心地标明历代王后出身的族群名称。例如人们知道，在4/10世纪和5/11世纪，加奈姆的各位国王娶托马格拉族、凯族和图布族的女子为王后。⑰ 今天，"托马格拉"这个名称是指特达人、卡嫩布人和卡努里人混居的一个氏族。"凯"这个名称是指一个卡努里氏族，而"图布"则是讲卡嫩布语的人专指特达-达扎人的统称。按照可 **440** 能性最大的一种推测，《迪万》记载的是历代加奈姆国王与各游牧部族的一系列联姻结盟，早期的国王们认为这些部族作战英勇，与之结盟有利于维持他们的政权。

伊德里西认为塔朱人的位置在更东边，位于扎加瓦人和努巴人之间，该部族的存在

⑫ 有关该时期阿拉伯史料的价值，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卷，第5章。

⑬ D.兰格，1980年。

⑭ 伊德里西（al-Idrīsi），1866年，第33-34页，译本第39-41页。

⑮ 见诸如Y.于尔瓦（Y. Urvoy），1949年，第16页；A.史密斯（A. Smith），1971年，第168-169页。

⑯ M.-J.图比亚纳（M.-J. Tubiana），1964年，第18页。

⑰ D.兰格，1977年，第27-32页；译本67-69页。

可以一直追溯到很久以前，但却被早期作家们所忽略。[18] 根据德国旅行家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收集的口头传说，达乔人——可能就是塔朱人——促成了达尔富尔形成国家结构的初期发展。[19] 游牧民在该地区的影响不像在乍得湖泊区那么明显。目前分布在瓦代高原和努巴山区之间的达乔人小村落社会以及关于其根源的传说和他们定居民的生活方式都说明他们源自尼罗特人。但是，他们在 7/13 世纪时好像受到来自扎加瓦人的压力，后者在被排挤出加奈姆国家权力之外后，显然力图在连接达尔富尔地区和埃及的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商路的南端重建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20] 事实上，达乔人并没有向扎加瓦人而是向通朱尔人臣服，只是撤退到隐蔽地区以抗拒被同化。与此相反，扎加瓦人能够保持其部族凝聚力，尽管他们放牧的地盘因特达－达扎人（图布人）的扩张而锐减。甚至到了今天，乍得地区和苏丹地区的阿拉伯人仍承认扎加瓦人（他们自称贝里人）和戈尔汉人（达扎人）有其特殊属性，尽管他们只是以小村落社会形式生存下来，似乎不再与任何人联合，仅仅是保持为局外的旁观者。

伊本·赛义德以可以追溯到 7/13 世纪上半叶的一份资料为基础提供了有关乍得湖泊区一些极其宝贵的具体情况。从他所著《地理》一书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杜纳马·迪巴拉米（约 607/1210－646/1248 年在位）时期，加奈姆人尚未把布杜马人的祖先逐回乍得湖中的岛屿上，并且我们还可以合情合理地假定，科托科人居住的地域并不仅仅局限于沙里河下游冲积平原的粘土地带。伊本·赛义德标出了几个族群的确切位置，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科马杜古约贝河谷仍有贝德人的社会群体（后来被卡努里人所

441 同化或被驱回恩吉津人的领地），而在乍得湖彼岸，库里人（今已被布杜马人同化）则仍居住在加扎勒河口以北的土地上。乍得湖以南住的是科托科人，使用一个属于卡嫩布人命名原则的名字。[21] 总之，7/13 世纪，卡嫩布人在所有上述地区已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部族，人们可以认为讲乍得语各族在更早些时候已经遍及加奈姆和博尔努的大部分地方。然而，由此就轻易断定该地区最早期的农民全都只讲乍得语就未免失之过于草率了；假设讲撒哈拉各种语言（包括原始卡努里语）的部族仅仅从事放牧一个行业也是错误的。

在乍得湖以南沙里河下游粘土平原地区，卡嫩布人接触到以美妙的造形艺术著称的古代文明。[22] 我们从 G. 康纳赫指导下在达伊马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了解到，粘土平原的居民在公元前的初创阶段所从事的是一种混合经济，农业与畜牧业和渔业一起经营。根据同一作者所说，公元初开始的第二阶段的标志是引进铁器制作术。这一重要创新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定居化的过程产生直接影响：农业活动集约化，特别是洪水

[18] 伊德里西，1866 年，第 13、40 页；译本第 15、47 页。

[19] G. 纳赫蒂加尔（G. Nachtigal），1879－1881 年，第 3 卷，第 358 页，A. G. B 费希尔（A. G. B. Fisher）与 H. J. 费希尔（H. J. Fisher）的英译本，见 G. 纳赫蒂加尔，1971－1980 年，第 4 卷，第 273－274 页。另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Ⅳ卷、第 16 章。

[20] 该通道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40 天通道"或"阿巴英沙漠通道"（*darb al-arba'īn*）。R. S. 奥费伊（R. S. O'Fahey），第 139－144 页，对此详加描述，他指出该通道在较近时期具有重要意义。

[21] D. 兰格，1980 年。

[22] J. －P. 勒伯夫（J. －P. Lebeuf）和 A. M. 德图尔贝（A. M. Detourbet），1950 年；J. －P. 勒伯夫和 A. 勒伯夫（A. Lebeuf），1977 年。不幸的是，J. －P. 勒伯夫的考古学著作完全不顾及年代顺序。

退后的耕作活动，把其他活动，如畜牧和捕鱼都置于次要地位。第二阶段土砖建筑术的出现，揭示出达伊马居民的生活方式已是一种与季节性迁移放牧截然不同的定居生活。大约在公元700－1050年间的第三阶段，粘土平原的居民开始享受不那么简朴的生活：各种来自长途贸易的人工制品首次出现，纺织工业的遗迹现已发现（大大先于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拟人形和动物形物件的生产似乎获得了新的动力，达伊马陶工首次开始制作巨大的陶罐，今日该地区居民视此为“萨奥文化”与众不同的标志。另一重要发明是防御工事。G.康纳赫在达伊马发现一条环绕居住土墩的壕沟的遗迹，在别的土墩上筑起的护墙很可能是为了保护那里的居民。[23] 把防御工事的出现视作在以后明显影响沙里平原农民生命安全的外来威胁的首次迹象肯定不是冒失的。显而易见这一威胁便是 443 加奈姆各族的扩张。

在加奈姆－博尔努连续几个世纪的政治和文化统治之后，粘土平原如今的居民科托科人称他们的祖先为“萨奥”或“索奥”人。鉴于在加奈姆各族取代早期居民的所有地区反复出现同一名称，所以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断这一名称最早是属于卡嫩布人的专有名字，用以称呼无力抗拒同化的当地居民。[24] 因此就其确切含义而言，“萨奥文明”一词既指科托科人祖先相对而言比较出名的文化（这与当今公认的用法相吻合）[25] 也指科马杜古约贝和加扎勒河南段的早期文化。然而从建筑学角度讲，这三个实体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仅仅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可以给予这三个互不相关的群体某种外表上的一致。

但是，比较语言学提供了一些在较早期情况下卓有意思的线索。如今人们公认，乍 444 得诸语是庞大的非－亚语系（或含米特－闪米特语系）的一个分支。毫无疑问，乍得族群之所以具有凝聚力可以从原始语言在一个能够促进语言接触与交流的地理环境下的漫长演变中得到解释。我们可以假设，中撒哈拉地区南部各地的环境在湿润期获得充沛降雨时呈最佳状态。基督纪元前第三个一千年初期，这个地区的生活条件开始急剧恶化，讲原始乍得语各族很可能是在那时被迫南迁。然而，他们从泰内雷沙漠和邻近地区的南迁发生在距今更近的时期也并非不可能。他们与各黑非洲族群发生接触后，他们肯定逐渐失去苏丹－地中海特性。今天可以见到讲乍得语各族生活在尼日尔和瓦代高原间的地区。这些族群中只有豪萨人显出新的活力，重新扩展他们的语言。但是，豪萨城邦“经济起飞”的历史却是发生在以后时期。[26]

乍得地区的第二个主要语系是尼罗－撒哈拉语系。与非－亚语言不同，这一语系语言的发展从未超出黑非洲范围。该语系最西部的分支是桑海语，沿尼日尔河从杰内到加亚都讲此语。再向北，耕耘绿洲的小务农部族（苏丹人）和饲养骆驼的少数游牧部落（柏柏尔血统），则讲桑海语的不同方言。[27] 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第二个分支是撒哈拉

---

[23] 这一段对“达伊马文化”按年代顺序的记述紧接G.康纳赫，1981年，第99－196页的叙述。

[24] 在达伊马地区，科托科人仅在几个世代以前还使用卡努里语。

[25] 值得注意的是，G.康纳赫对粘土平原文化和科马杜古约贝文化明确加以区分，不再使用“萨奥”一词统指一种经考古确定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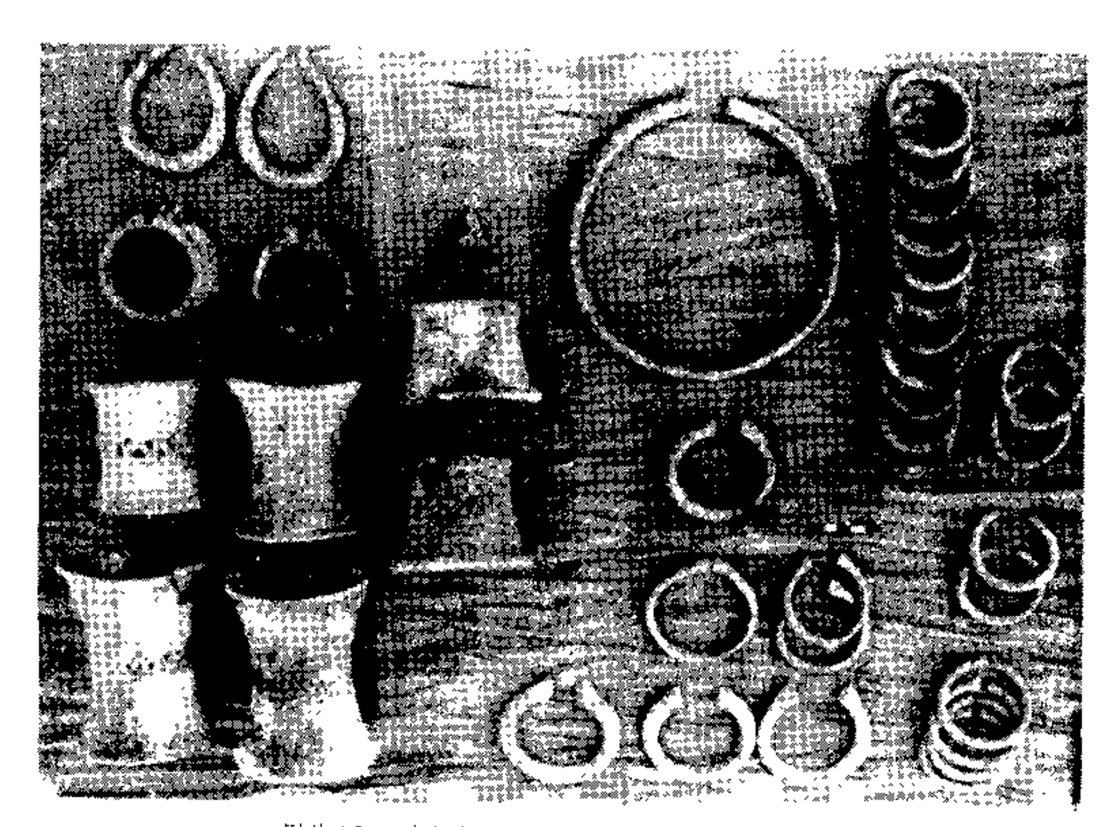
[26]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1章。

[27] R.尼科拉伊（R. Nicolai），1979年。

诸语（扎加瓦语、特达－达扎语和卡嫩布－卡努里语)。[22] 如今，桑海语与撒哈拉语间的接触业已终止；但两种语言共用的许多词汇形式说明讲尼罗－撒哈拉语的苏丹牧民（也可能有农民）曾占居尼日尔河湾和恩内迪山区之间的广大地区。这一定居过程在地理上的延续，肯定是被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撒哈拉地区的沙漠化以及利比亚人与柏柏尔人混血种不断挺进的共同影响所打断。[23] 在西面，讲原始桑海语各族开始创建考考（加奥）国家，而在乍得地区讲原始撒哈拉语各族则强行统治加奈姆。撒哈拉族群间不太明显的语言差异可以从以后的加奈姆历史，特别是“黑种撒哈拉游牧民”各族与中央政权关系的演变中得到解释。[24]

445

442



图片15.1 在胡鲁夫（喀麦隆北部）出土的铜制品

[22] 这里采用的语言分类遵循J. H. 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的分类法，1963年（b）。尽管P.－F. 拉克鲁瓦（P.－F. Lacroix），1969年的著作对把桑海语列入尼罗－撒哈拉语系提出异议，R. 尼科拉伊（目前在做的研究工作）表明桑海语和撒哈拉语间的关系比J. H. 格林伯格想象的还更为密切。

[23] 据P. 芒森（P. Munson），1980年，第462页，提希特陡岸地区（毛里塔尼亚）曾于公元前7世纪遭到利比亚人与柏柏尔人混血种武士的入侵。利比亚人与柏柏尔人混血种在公元前370年（±40年）到达阿伊尔已得到证实（格雷本山以南的伊瓦伦遗址：J.－P. 罗塞特，私人通信）。

[24] J. 夏佩勒（J. Chapelle），1957年，使用“黑种撒哈拉游牧民”一词。关于加奈姆和游牧部族之间关系的发展，更确切的情况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0章。下列文章包括一些更新近的解释也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D. 兰格，1978年、1982年（a）。

442



图片 15.2 在胡鲁夫（喀麦隆北部）出土的原始人形陶罐

443



图片 15.3 喀麦隆最北部的德格斯丘陵

扎加瓦王国

加奈姆在书面资料中首次被提及是在258/872年雅库比的著作之中。这位作者告诉我们，当时加奈姆由一个被称作扎加瓦的部族统治。㉛ 伊本·库泰巴（276/889年逝世）根据2/8世纪初期一份报告所写的著作中也提到扎加瓦人。㉜ 到4/10世纪末，另一位阿拉伯作家穆哈拉比提供了关于扎加瓦国王的大量情况，清楚地表明该王国的疆域与加奈姆王国的疆域完全一样。㉝ 扎加瓦人对加奈姆的统治到468/1075年才结束，当时一个新的王朝塞富瓦在这个国家掌权，将扎加瓦人向东驱逐到他们居留至今的地方。㉞

但扎加瓦人对创建加奈姆王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雅库比㉟谈到他所知道的西非各族在由东向西的漫长迁徙中"拥有了自己的国土"：

> 他们所拥有的第一块地方就是扎加瓦人的国土。他们在称作加奈姆的地方长期定居下来。他们所栖居的是芦苇草屋，他们没有城镇。他们的国王叫卡库拉。扎加瓦人中有个部族叫豪丁，他们拥有一个扎加瓦人国王。

从书中清晰的词句中可以推断，扎加瓦人是加奈姆最早的居民之一，但在没有进一步掌握更多证据的情况下许多人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把豪丁族㊱作为扎加瓦人一个特定的部族提出来，这本身就表明扎加瓦人远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族群。

446

实际情况可能是，从居统治地位的贵族中产生出加奈姆国王和豪丁国王，并以本身的名字称呼在两地定居的所有部族。

一个世纪后，穆哈拉比提供了重要的具体情节，说明扎加瓦人（从广义上使用该词）是由不止一族组成。尽管他并未具体提到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贵族（"真正的"扎加瓦人），但却十分强调他们国王拥有无上的权力：

> 〔扎加瓦人〕十分尊敬他们的国王，以国王代替至高无上的安拉加以崇拜。国王让人认为他是不需要进食的。仆人把食物偷偷送进他的屋里，谁也不知道吃的东西来自何处。如果某个臣民碰巧遇到运送食物的骆驼，他立即被就地处死〔……〕。由于国王对臣民有绝对权力，他可以任意把任何人贬为奴隶〔……〕。〔扎加瓦人〕宗教所崇拜的是国王，他们相信国王能决定任何人的生、死、患病还是健康。㊲

从雅库比简明的记述和穆哈拉比关于国王典礼仪式的详细描写，人们可以明白扎加瓦国王所掌握的巨大权力肯定是上文所说的诸多因素的结果。加奈姆王国的建立不可

㉛ 雅库比（al-Ya'kūbi），1983年，第1卷，第219－220页；J. M. 库奥克（J. M. Cuoq），1975年，第52页。

㉜ 伊本·库泰巴（Ibn Kutayba），1850年，第14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41页。

㉝ 穆哈拉比（al-Muhallabi）及雅库特（Yākūt），1866－1873年，第2卷，第932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79页。

㉞ D. 兰格，1977年，124－129页；关于现代扎加瓦，见M.－J. 图比亚纳，1964年。

㉟ 雅库比，1883年，第1卷，第219－220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52页。

㊱ 另外有些现代作家也提出，这一名字可能指的是豪萨。

㊲ 穆哈拉比和雅库特，1866－1873年，第2卷，第932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7 页

能如某些作家所主张的是由于形形色色移民大量入侵的结果。最能言之成理的假设是：自公元4世纪（铁器文化）起，人们就懂得了铁器制造技术，拥有马匹的数量不仅是具有威望的标志而且是占有压倒优势的战斗力的保证，在这种条件下，出现小批人触发了创建国家的发展趋势。这批人——勿容置疑是扎加瓦人——装备有铁制武器，拥有与外界（无论多么初步）接触的便利，逐渐把生活在卡瓦尔东南、乍得湖和加扎勒河之间务农和放牧的民族置于其统治之下，[38] 这一地区后来就叫作加奈姆。扎加瓦掌握统治权的贵族阶层有可能到后来才出现，尽管根据上述假设，扎加瓦人作为一个整体开始时不可能在部族人种方面与他们统治的从事农牧业的部族有什么区别，看来只是到了相当晚的阶段，在穆哈拉比时期，各种不同的族群才合并成为一体，纳入同一国家结构之中。

伊德里西在6/12世纪中叶，把扎加瓦王国和加奈姆王国加以区分，他的佐证使许 447 多历史学家对扎加瓦人在乍得湖地区的作用更加迷惑不解。事实上，假如把伊德里西关于中苏丹的一些报道综合起来看，就可清楚地看出他把加奈姆历史上两个不同时期——扎加瓦人统治时期和塞富瓦人统治时期——的史料混杂了。他没有把这些史料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反而将它们投射在地理平面上。[39] 伊本·赛义德在7/13世纪所写的著作中，把扎加瓦人置于加奈姆以东他们迄今仍生活在那里的达乔附近，并写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时处于加奈姆国王的统治之下。[40]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最后发现，以加奈姆国家的诞生和发展来解释扎加瓦人的出现要比主张有一个早期的扎加瓦族群（与该地区其他族群既一致又有区别）征服了所有当地土著居民并由此创建了尼罗河和尼日尔河之间第一个也是最大国家的说法更为自然。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论证，如果5/11世纪以前，加奈姆的历史和扎加瓦的历史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确实的话，我们可以推断，最早提及扎加瓦的人应当是瓦赫卜·伊本·穆纳比赫，这表明早在他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加奈姆国家了。瓦赫卜·伊本·穆纳比赫（约112/730年逝世）是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也门专门研究民间传说的著名学者。伊本·库泰巴（213/828－276/889年）报道过他提出的证据。除了扎加瓦人之外，他的著作中还提到努巴人、僧衹人、费赞人、哈巴夏人、科普特人和柏柏尔人。[41] 应当注意的重要之点是，根据这一早期史证，扎加瓦人既不同于费赞人（加拉曼特人的后继者）也不同于柏柏尔人。伟大的地理学家胡瓦里兹米（约231/840年逝世）在3/9世纪初也提到扎加瓦人，他在他绘制的地图上把扎加瓦人标在费赞人以南，也标在努比亚人的阿勒瓦王国[42]以南。我们已经知道，半个世纪后，雅库比明确指出扎加瓦王国位于加奈姆。假如穆哈拉比后来没有在未提及加奈姆的情况下详细描绘扎加瓦王国，我们很有可能把雅库比提加奈姆错误理解为他指的是该地区居民已经在定居的进程中完成了一个重要阶段。总之，所有上述史证都表明，在扎加瓦和加奈姆这两个概念底下，所存

---

[38] 指乍得湖落水口，不要与同名的白尼罗河支流相混淆。
[39] 伊德里西，1866年，第12－15页、33－34页；J. M. 库奥克，1975年，141 151页。
[40] 伊本·赛义德（Ibn Sa'id），1970年，第96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211页。
[41] 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12－13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41页。
[42] 胡瓦里兹米（al-Khuwarīzmī），1926年，第6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44页。

在的确实是同一个历史事实：首次提到扎加瓦是 2/8 世纪，看来这足以表明中撒哈拉商
448 道南端的这个大国当时已经存在。进而言之，如果 7/13 世纪时加奈姆本地研究民间传说的学者对王室谱系已有广博的知识，并且他们所掌握的线索已能在《迪万》和马克里齐 9/15 世纪传播的资料中找到，我们甚至可以把建立加奈姆国家的时间定在“希吉拉”（先知迁移）以前。[43]乌克巴·伊本·奈菲在阿拉伯征服早期对卡瓦尔进行的征战，显示出在该地区南北交流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这些交流是由阿拉伯势力范围以外的一个苏丹人国家控制的。

主要根据口头传说，一些作者形成下列观点：萨奥人是加奈姆的土著居民，从很早时候起他们就受到更北边的游牧民的压力。[44] 按照这一看法，作为定居民的萨奥人住在村落甚至筑垒小村镇里，很久以前就组成了一些酋长国。扎加瓦游牧民征服萨奥人之后，据信从后者那里引进政治组织的形式，从而使后来建立一个大型国家成为可能。

可是就事实而言，以上关于加奈姆国家建立的各种假设没有一个有可靠的根据。不管是游牧民和定居民之间的鲜明差异，或者是土著各族和外来者之间的种种区别，更不消说虚设的很早时候即已存在萨奥人（或萨奥文化），都不是站得住脚的主张。萨奥人在文字记载的史料中的首次出现是在 8/14 世纪的《迪万》中[45]，并且多次被不同的8/14世纪的作家提到过：当时“萨奥”一词是用来指乍得湖以东和东南地带定居的一批族群，他们可能是讲乍得诸语。这些族群只是在长期抵抗加奈姆－博尔努人扩张的过程中才形成使他们具有特色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因此把博尔努(位于乍得湖以西）土著居民在相对较晚时期发展起来的特征加在古代加奈姆土著居民头上是一个严重的时代错误。

449 此外，没有理由假设在古加奈姆时期，游牧民和定居民，或土著各族与外来者之间，存在人种特征或其他方面的鲜明差异。举例而言，称加奈姆土著居民像萨奥人一样讲乍得语恐怕完全是武断的说法。恰恰相反，定居民族群与游牧民族群之间很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文化亲缘关系——正如定居的卡嫩布人和游牧的图布人及达扎人之间迄今存在着的那种关系（他们讲异常接近的撒哈拉诸语）——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说法，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像扎加瓦贵族那样的贵族阶层（至今仍讲一种撒哈拉语）如何能够统治当地其他居民而两者之间没有发生分裂，这在后来的外国观察家眼中显得特别明显。穆哈拉比的记述——唯一谈及生活方式的书面史料——认为农民和牧民之间一直和平相处，显然只有国王拥有采取强制行动的权力：

> 〔扎加瓦王国〕所有地方都以务农为生。人们所住的房子全是芦苇草屋，即使国王的宫殿也是用苇草盖的……他对臣民拥有绝对权力，可任意将人民贬为奴隶。他的财富由畜群组成：羊、牛、骆驼和马。该国主要农作物为小米、豆类和小

㊸　D. 兰格，1977 年，第 141－143 页。

㊹　Y. 于尔瓦，1949 年，第 17－30 页，J. S. 特里明厄姆（J. S. Trimingham），1962 年，第 105－106 页、110－111 页，J. D. 费奇（J. D. Fage），1969 年；R. 科恩（R. Cohen），1962 年。

㊺　关于加奈姆历代国王的联姻结盟，《迪万》记载了 6/12 世纪一些定居的加奈姆部落的名字，这些名字在当今加奈姆居民中看来又重新出现（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V卷，第 10 章。）。

麦。国王的多数臣民赤身裸体，除一块皮腰带外一丝不挂。人们以耕种和放牧为生。

这本书没有把扎加瓦王国写成是完全一致的整体。恰恰相反，作者在一开始就声称该王国含有“许多乌玛”（社会），清楚地表明不同的族群并存于一个单一国家结构之中。4/10世纪末期，扎加瓦王国明显地大规模扩张，不再局限于讲撒哈拉语、有亲缘关系各族居住的地区：位于乍得湖和加扎勒河之间的加奈姆本土仍是王国的核心，而居住于边缘地区的其他各族也被置于其统治之下。按照穆哈拉比[46]的说法，王国疆土长度和宽度都是15天路程。与考考王国相比较，同一作者认为扎加瓦王国幅员更为辽阔，然而考考王国则更富庶。[47] 不容否认的是自从那时起，这个中苏丹最大的国家为撒哈拉诸语的扩展以及对毗邻各族的文化同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是到后来，豪萨城邦在其西疆诞生，巴吉尔米王国在乍得湖东南讲萨拉－邦戈－巴吉尔米语各族居住的地方形成，它们才为苏丹地区其他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48] **450**

在加奈姆，此时出现的另一个重要事态发展是，伴随着小城镇的建立，定居社会数目有所增加。3/9世纪末，雅库比的著作以大量篇幅说明扎加瓦没有城镇。[49] 但穆哈拉比写于一个世纪后的著作提到马南和塔拉扎基两个城镇的名字。[50] 我们从《迪万》中也可以找到关于马南这个城镇的记载，而且伊本·赛义德在7/13世纪时说过，该城是塞富瓦“异教徒祖先”的都城。[51] 但有证据说明，在5/11世纪以及6/12世纪上半叶，加奈姆历代国王仍然从托马格拉和图布两个游牧族群娶妻立后。只是到了13世纪上半叶，在杜纳马·迪巴拉米统治时期（约607/1210－646/1248年），定居民才最后占了上风。这一事态发展与伊斯兰化的发展同时并进。

伊斯兰化的进展

直接有关加奈姆和邻近地区伊斯兰教发展的书面资料寥寥无几，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使用零散的资料拼凑成从古代王朝的历代国王皈依该教起到扎加瓦王国衰败和塞富瓦王朝兴起止这一过程的一幅十分不完整的画面。关于加奈姆王国初期，有充分的史料证明，伊斯兰教在这个苏丹国家的建立及其发展初期阶段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在中苏丹最北端的卡瓦尔，在1/7世纪中叶稍后，与乌克巴·伊本·奈菲率兵远征同时，伊斯兰教曾昙花一现般出现过一段短时间，看来并未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到了

---

[46] 穆哈拉比与雅库特，1866－1873年，第2卷，第932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79页。

[47] 同上，第4卷，第329页；J. M. 库奥克，1975年，77－78页。

[48] 关于豪萨城邦的形成，参阅A. 史密斯，1970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1章。关于巴吉尔米的起源，也许我们必须接受一个较口头传说所述早得多的时期。的确《迪万》记载阿卜德·阿拉·伊本·卡戴（公元约1315－1335年在位）向巴吉尔米的君主发动战争（第21章）。另外，可以肯定地说，伊本·赛义德（7世纪中叶/13世纪）提到的名字“巴卡尔米”即指巴吉尔米（伊本·赛义德，1958年，第49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217页。

[49] 雅库比，1883年，第1卷，第219－220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52页。

[50] 穆哈拉比与雅库特，1866－1873年，第2卷，第932页。在卡瓦尔，穆哈拉比提到比尔马和卡萨巴两个城镇（同上书）。位于更北部，距穿越撒哈拉的商路有一段路程的贾多，可能此时也已成为瓦尔格拉商路上的补给站。

[51] 伊本·赛义德，1970年，第95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209页。

2/8 世纪，当时费赞和卡瓦尔的柏柏尔人纷纷改变信仰，伊斯兰教才开始深入到较南部地区。

451 费赞的居民和柏柏尔各族一样，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异端形式——易巴德教派，从而使自己和哈利哲教派联合在一起。费赞位于中撒哈拉商路的北端，控制着乍得湖地区——卡瓦尔绿洲——和地中海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因此，柏柏尔商人在撒哈拉以南地区传播的最早的伊斯兰教形式很可能实际上就是易巴德教派。书目资料中关于奈富塞山区总督阿布·乌巴依达·阿卜德·哈米德·吉纳乌尼的一个条目为易巴德教派在加奈姆的影响提供了间接的证据，该地区的易巴德教派至今依旧存在。这个条目的大意是，生活在 3/9 世纪上半叶的这位总督除懂得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之外还熟谙加奈姆语。[52] 他无疑是在访问中苏丹时学会加奈姆语的。

4/10 世纪初巴努·哈塔卜新王朝掌权，费赞局势发生变化。此后就没有再见到阿拉伯地理学家提及费赞柏柏尔人的异端信仰了，很可能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宗教信仰的趋向也发生变化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从易巴德派转向逊尼派一事在更往南的地区也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尽管在那里哈列哲教派的抵抗也逐渐消失殆尽。

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我们目前还无法下定论。值得注意的是雅库比虽然证实易巴德教派在宰维莱（费赞首府）[53] 的存在，但提到卡瓦尔的居民时还是满意地声称他们是穆斯林：

> 从宰维莱行走 15 天，可以到达一个叫做库瓦尔的城市（*madīna*），居民是各族穆斯林，大多数是柏柏尔人。他们都有苏丹奴隶。

从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3/9 世纪的下半叶，卡瓦尔的居民是柏柏尔人；他们所从事的主要是奴隶贸易。那里的其他居民还有苏丹人；即使在如此早的岁月，这些人也可能是迄今仍与卡努里人结伴而住的图布人。卡瓦尔的柏柏尔商人带到费赞来的奴隶绝大部分无疑来自加奈姆，那里的扎加瓦人国王可以“任意将其臣民中的任何人贬为奴隶”。[55] 雅库比本人就说过“苏丹人的国王可以毫无理由地出卖苏丹人（他们的臣民？），与任何战争都无关系”。[56]

452 但仅仅说加奈姆国王为了与外界贸易大量需要奴隶，这恐怕还不是全部事实真相。[57] 大部分奴隶肯定是从邻近部族劫掳来的。在邻族当中传播伊斯兰教不符合国王的利益，因为伊斯兰教法严格禁止把自由的穆斯林贬为奴隶。

可是在那个时候，加奈姆的国王们似乎已经同北非的穆斯林诸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

[52] 沙马希（al-Shammākhī），《西亚尔书》（*Kitāb al-siyar*）、T. 莱维基（T. Lewicki）引用，1964 年，第 309—310 页；另见 T. 莱维基，1969 年，第 97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67 页。

[53] 雅库比，1892 年，第 345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49 页。

[54] 同上。

[55] 穆哈拉比与雅库特，1866—1873 年，第 2 卷，第 932 页。

[56] 雅库比，1892 年，第 345 页。

[57] 加奈姆向北方出口的奴隶数目必定相当之大。一些史料表明，位于加奈姆到的黎波里商路上的宰维莱是撒哈拉最大的奴隶贸易中心。雅库比，1892 年，第 345 页；伊斯塔赫里（al-Iṣṭakhrī），1870 年，第 40 页；巴克里，1911 年，第 11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49、65、81 页。

现已掌握的史料透露了以下信息：382/992年，宰维莱总督伊本·哈塔卜从国名不详的黑人地区某个国家收到一份礼物，[58] 鉴于宰维莱所处的地理位置，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国家就是加奈姆；同年伊弗里基亚的齐里王朝的素丹曼苏尔（373/984－386/996年在位）也同样收到从国名不详的黑人地区某个国家送来的一份礼物。[59] 442/1031年，他的继承人穆仪兹（406/1016－454/1062年在位）收到由一位黑人君主[60] 送来的作为礼物的一批奴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确是加奈姆国王主动采取的外交行动，[61] 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与伊弗里基亚（突尼斯）至少有间接联系，因为按照穆哈拉比的描述，他身穿苏塞（苏斯）丝绸制成的衣裳。[62] 伊本·哈勒敦也告诉我们，在较后时期加奈姆的国王们与哈夫斯王朝（625/1228－748/1347年）从该王朝建立时起一直有联系，他特别提到，1257年"加奈姆的国王和博尔努的君主送给哈夫斯王朝的素丹穆斯坦西尔（647/1249－675/1277年在位）一头长颈鹿，在突尼斯引起轰动。[63] 这位国王是黑奴的主要供应者，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在国内享有某种获得奴隶的垄断权，他当然会尽其所能博取主要顾客的欢心。在穆斯林统治者心目中，他在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无疑比他违犯宗教准则重要得多。

同北非国家的贸易关系和与穆斯林商人的频繁接触不久就使伊斯兰教能在宫廷圈子和居民的某些阶层里取得巨大进展。倘若把加奈姆的逐步伊斯兰化想象成一个毫不间断的发展过程那可就错了。如果说国王和扎加瓦贵族阶层没有千方百计试图遏制威胁着至少是其部分权力基础的经济秩序的伊斯兰运动，那倒是怪了。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迪万》所记载，扎加瓦王朝几位末代国王之一阿尔库·伊本·布卢[64]（约414/1023－459/1067年在位）在卡瓦尔绿洲好几处地方，甚至在费赞南部的宰莱（现已成为利比亚的一个部分）建立起奴隶集聚地。核实这一情况当然很困难，[65] 但是可以理解的是，阿尔库·伊本·布卢国王出于保护自身的本能，一定感受到不将其统治权扩展到卡瓦尔的柏柏尔人社会已无法维持其权威，他必须以这种手法对贸易活动和宗教改宗活动进行更有效的控制。《迪万》的作者们当然没有讲明促使加奈姆国王占领卡瓦尔的动机，但他们突然提到萨卡达姆（塞格丁）的"清真寺"，这至少可以看作重视"宗教问题"的一个迹象。另外，我们知道在同一时期加纳国王正将其势力扩展到重要贸易中心奥胡达

---

[58]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ī），1975年，219－220页。

[59]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1948－1953年，第1卷，第275页。

[60] 同上。

[61] 我们已掌握18世纪博尔努与的黎波里外交关系的详细资料：博尔努国王派使者给的黎波里总督带去书信和礼品。参阅D.吉拉德（D. Girard），1686年。

[62] 穆哈拉比与雅库特，1866－1873年，第2卷，第932页。

[63]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847－1851年，第1卷，第262页、429页；参阅J. M.库奥克，1975年，第351页。

[64] 已经得到公认，《迪万》中的巴努－杜库即外来资料中提到的扎加瓦。见D.兰格，1977年，第113－129页。

[65] 在某些费赞考古遗迹中很容易辨认出早期苏丹人存在的痕迹：位于特拉甘附近的甘德马和加特鲁恩以北的姆比尔，都无疑是奉加奈姆国王之命建立起来的堡垒（D.兰格和S.伯绍德，1977年，第30－32、37－38页）；然而年代未能确定。

古斯特，[66] 这些事态全都发生在同一时候可能不是偶然的。

阿尔库·伊本·布卢的继任者是加奈姆第一位穆斯林国王。他的名字以三种不同形式出现在《迪万》里：拉德苏、苏（或萨瓦）和胡（或豪瓦）——正确的形式无疑是胡（或豪瓦），由于后来的篡改才弄得含混不清。《迪万》的作者在报道加奈姆王国由一位穆斯林君主即位这样一件乍得地区历史中极为重要事件时，竟然满足于轻描淡写地一笔提过："他由哈里发授位"（《迪万》第10章）。以这种方式授位以及第一位穆斯林君主名字的非正统形式均不足以证实改宗这一假设。与此相反，很有可能阿尔库·伊本·布卢在辛莱去世后，旧王朝中亲穆斯林派考虑到当时继承制度的规则，推出他们能找到的最强有力的候选人。在没有掌握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胡（或豪瓦）实际上——如同某些迹象所表明的——是一位取这样一个穆斯林名字的女人。[67] 他（或她）只在位4年，以后就由阿卜德·贾利尔继承，后者在454 位也只有4年。再下一位国王胡迈依是塞富瓦新王朝的第一代君主。[68] 胡或豪瓦（459/1067－478/1071年在位）和阿卜德·贾利尔（478/1071－483/1075年在位）统治时间之短与他们前辈的长期统治形成鲜明对照。据《迪万》记载，阿尤马统治20年（376/987－397/1007在位）、布卢统治16年（397/1007－414/1023年在位）、阿尔库统治44年（414/1023－459/1067年在位）。[69] 扎加瓦王朝最后几位统治者在位时间短暂可以解释为出现严重危机迹象：经过长期酝酿，日益增长的伊斯兰势力一旦达到关键阶段，穆斯林便首先破坏旧政权的稳定、继而引起彻底的政治变革。[70]

塞富瓦王朝的兴起

出于离奇的巧合，所有现存史料都没有清楚记述467/1075年前后加奈姆发生的朝代更替的情况。[71] 因此根本无法确定导致朝代更替的事件发生顺序及其确切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尽管这一时期至关重要，由于有关史料贫乏，我们只能满足于按仅有的一点材料进行判断。第一步是证明那时确实有一场朝代更迭存在，然后我们必须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塞富瓦是什么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楚所发生的事件的全部意义。

在《迪万》叙述阿卜德·贾利尔那一段落的结尾，有一节大部分史学家未解其意的奇怪文字：

> 关于巴努－杜库的历史，我们所写的就止于此。下面我们讲述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努－胡迈依的历史。[72]

---

[66] 巴克里，1911年，第180页，但参阅J. 德维斯（J. Devisse），1970年，第152及随后诸页。

[67] 假如加奈姆王国第一个穆斯林君主是个女人的话，那么编年史学家掩盖其真实名字的努力就可以理解了（D. 兰格，1977年，第29－30页、67－68页）。

[68] 所有受《迪万》（第11章）含糊不清的段落所迷惑的作者都在伊斯兰教传入同朝代更替两个问题上混淆不清。

[69] 似乎应对《迪万》提供的年代先后顺序的资料比对古领卡瓦尔的报道给予更多的重视。

[70] 我们不能排除加奈姆最早二位穆斯林国王是易巴德教派的可能。

[71] 这一日期是把《迪万》提供的统治时间合起来计算得出的（D. 兰格，1977年，第83－94页）。

[72] 《迪万》第11章。

自从海因里希·巴尔特起，[73] 这段话一直仅仅被理解为指皈依伊斯兰教——而不是指朝代更替——，因为《迪万》的作者们在后一段落写道，下一位国王胡迈依是阿卜德·贾利尔之子。然而我们从上文已经读到，胡（或豪瓦）和他（或她）的继承人阿 [455] 卜德·贾利尔一样早已是穆斯林，这一点决不可能逃过编年史学家的注意。因此上面援引的段落所指的必定是引入伊斯兰教以外的什么事情。

8/14 世纪的著名作家伊本·法德尔·阿拉·欧麦里确定了事件发生的顺序。他间接根据"国王的一位近亲"奥斯曼·卡奈米教长（谢赫）的旁证写道：

> 第一个（在加奈姆）确立伊斯兰教的是自称奥斯曼·本·阿凡后裔的哈迪·奥斯曼尼。在他之后，（加奈姆）落人巴尼·西·亚赞的亚赞尼荣之手。[74]

欧麦里所说的亚赞尼荣事实上不是别人正是塞富瓦，他的这一名字是由赛义夫·伊本·西·亚赞的姓名引伸出来的。作者以大量的篇幅表明引人伊斯兰教之后塞富瓦才执掌政权。

很久以后，在 13/19 世纪初，穆罕默德·贝卢就加奈姆历史的特定阶段塞富瓦王朝崛起提供了更多的情况。他提到一批柏柏尔人离开也门后一路行至加奈姆：

> 柏柏尔人发现该地各族都受到称为阿马基塔（*Amākītā*）的塔瓦里克兄弟的统治。这些柏柏尔人从阿马基塔人手中夺走了这个国家。在他们统治时期，国家十分兴盛，他们的权力一直延伸到该地区最遥远的地方。[75]

首先应当注意的一点是，作者把先后统治加奈姆的两个外来族群[76]区分开来。这一说法使我们想到作者所指的是 5/11 世纪的改朝换代。关键的一点是，他提到第二批人——而不是第一批人——来自也门，也门是塞富瓦人的与王国同名的祖先赛义夫·伊本·西·亚赞的故乡。他肯定知道，在他所处的年代仍统治博尔努的王朝自称来自也门，他知道建立加奈姆国家的不是他们（如《迪万》和民间传说所说），而是更早的另一个族群，根据他的记载，那些人也是外来的。

至于所谓加奈姆历代君主是柏柏尔人的说法，必须牢记穆罕默德·贝洛的著作是 [456] 在本章所记述事件发生约 800 年后写成的，当时柏柏尔人在中苏丹的作用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大大增强。关于塞富瓦人起源的神话似乎主要出自穆斯林学者的著作，他们中许多人是从希米亚里特传说仍然存在的地方来到早期加奈姆的。在神话编造过程中，教士无疑受到当地民间故事和传说尤其关于北－南迁移传说的影响。[77]

以强调皈依伊斯兰教来掩盖改朝换代的古代传说在 13 世纪就由伊本·赛义德所证

---

[73] 德国旅行家海因里希·巴尔特（Heinrich Barth）在 13/19 世纪访问了博尔努和加奈姆的一个部分，带回当时仅存的两本《迪万》抄本。此外，第一本加奈姆－博尔努重要历史书的出现也应该归功于海因里希·巴尔特，后者是以当地的实地观察和从《迪万》原本得到的材料为依据的。

[74] 欧麦里（al－Umari），1927 年，第 44－45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259 页。

[75] M. 贝洛（M. Bello），1951 年，第 8 页。

[76] 在穆罕默德·贝洛所处的时期，塞富瓦人已在三个半世纪前离开了加奈姆，到乍得湖以西的博尔努定居。贝洛本人曾统治博尔努以西的索科托哈里发国，他了解情况，因为他非常明确地说那批从也门来的柏柏尔人（塞富瓦人）到达的是加奈姆而不是博尔努。

[77] 参阅 B. 巴尔金多（B. Barkindo），1985 年。

实。他援引早在杜纳马・迪巴拉米（607/1210－646/1248年在位）统治时期的史料，最早证实了在加奈姆存在一个自称塞义夫・伊本・西・亚赞后裔的朝代：

> 加奈姆的素丹……是赛义夫・伊本・西・亚赞族系的穆罕默德・伊本・吉尔。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他的异教徒祖先的首都是马南；后来他的曾－曾－曾－曾祖父在一位执法官的影响下成为穆斯林，此后伊斯兰教在加奈姆土地上广为传播。[78]

穆罕默德・伊本・吉尔的曾－曾－曾－曾祖父（＝杜纳马/艾哈迈德・伊本・萨尔马马/阿卜德・贾利尔＝杜纳马・迪巴拉米）事实上就是胡迈依（约467/1075－478/1086年在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决不是加奈姆的第一个穆斯林国王，更不是一个新皈依的教徒。这段话中唯一与改朝换代直接有关的一点是首都的更改：先在马南，以后在恩吉米。

另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巴克460/1067－1068年的记述就伊斯兰教传入加奈姆和朝代更替提供给我们一个进一步讨论的出发点：

> 在宰维莱沙漠以外，从该城出发走40天的路程就到了加奈姆国土，这是一条非常难走的路。（加奈姆居民）是崇拜偶像的苏丹人。据说那里有个部落是伍麦叶王朝的后裔，当他们遭到阿拔斯王朝迫害时逃到那里避难。他们与阿拉伯人一样打扮，循照阿拉伯人的习俗。

457　我们不能确知，这条消息讲的是哪个时期，但不可能迟于460/1067－1068年。[80] 根据《迪万》中出现的年代排列，实际上就是仍属旧扎加瓦王朝一员的第一位穆斯林国王在加奈姆掌权的那一年。远在安达卢西亚的巴克里即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不会晓得这一事情；[81] 更不可能知道468/1075年前后发生的朝代更替。他提到加奈姆人崇拜偶像确是与《迪万》所述情况十分吻合。至于“与阿拉伯人一样打扮”的“伍麦叶王朝后裔”——正因为如此便不是阿拉伯人——必定是接受了某些阿拉伯人习俗的一批柏柏尔人（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是黑非洲人）。这批人也许因为不屈从权势而引起注意，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在推翻王朝前帮助旧王朝中亲穆斯林派取得成功的诸股力量之一。

所有阿拉伯作者当中，以伊德里西（549/1154年写的资料）对5/11世纪下半叶加奈姆及周围地区发生的变化所作叙述最为精确。他在扎加瓦王朝灭亡四分之三世纪后就从事写作，拥有丰富的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口头资料，但也有些得自书面材料。可是，伊德里西却把各种资料混在一起，还夹杂一些纯属想象的细节。所以使用他对黑人地区的记述时必须慎之又慎。

---

[78] 伊本・赛义德，1970年，第95页；J. M. 库奥克，1975年，第211页。

[79] 巴克里，1911年，第11页。该书未提及卡瓦尔（位于宰维莱以南），这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论据用来支持《迪万》（第9章）关于阿尔库（约1023－1067年在位）把卡瓦尔并入加奈姆的报道。但应当注意该书也没有提到扎加瓦这一名字。合编者注 N. 莱维蔡恩（N. Levtzion）和J. F. P. 霍普金斯（J. F. P. Hopkins）合编，1981年，第64页，该段文字末尾一句述及伍麦叶王朝后裔，错误地译成“他们仍保留阿拉伯人的服饰和习惯”。本书作者的译文更为正确。

[80] 巴克里记述的依据是口头资料——有些是他写作之前不久的资料——他也根据文字资料，主要一本是优素福・沃拉克（Yūsuf al－Warrāk）论述黑人地区的作品（292/904－905，至363/973－974年）。

[81] 巴克里写于460/1067－1068年。如果我们把《迪万》提供的统治时间加上去，可以看出胡（或豪瓦）肯定是在伊斯兰纪元460年的8月登位的。

尽管如此，在伊德里西所写的大量史料中，我们发现在他那个时候“加奈姆”和“扎加瓦”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实体。所有证据都表明扎加瓦人已不再统治加奈姆了：在丧失昔日的特权后扎加瓦人显然生活在不幸的环境中。他们大部分人看来是游牧民。没有关于加奈姆新统治者的具体记载，作者的一些评述表明扎加瓦人是他们的臣民。关于首都说得也含糊不清：马南和恩吉米都提到过，似乎马南是更为重要的城市，但文中看不出它是否就是加奈姆的首都。关于宗教情况也没有记述。[82]

从以上文献中可以推断，穆罕默德·贝洛提到的改朝换代以及欧麦里报道的亚赞 458 尼荣上台必定发生在巴克里写作年份（460/1067－1068年）和伊德里西写作年份（549/1154年）之间。可以看得出，改朝换代与扎加瓦人从加奈姆被驱逐发生在同一时候，这就是我们依靠外部资料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但按照《迪万》所作的分析，对于中苏丹历史极端重要的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范围还可缩小到胡迈依统治初期（约467/1075－478/1086年），因为他的先君阿卜德·贾利尔是巴努－杜库族系的最后一位国王，而胡迈依则是巴努－胡迈依族系的第一位国王。这两家王室之间的区别表明在朝代延续上发生过突然的中断；这与伊斯兰教的传入并非发生在同时。

谁是加奈姆的新君主？《迪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当著者把胡迈依从谱系上与其先君联系时，对其真正的父系祖先只字不提。[83] 然而，近代写成文字的加奈姆和博尔努的传说通常都说新王朝是赛义夫·伊本·西·亚赞的后裔。[84]

有几位作者对新王朝的渊源这一问题作了论述。阿卜杜拉希·史密斯认为，他们是游牧、半游牧民的后代，也许是图布人，他们与别的族群通过婚姻关系结成同盟，从而取得政权。约翰·拉弗斯看来也持有相同观点。[85] 努尔·阿尔卡利和巴伍罗·巴尔金多则相信他们是当地人，只是为提高声誉才试图佯装外来者。[86]

我们知道，所谓的“赛义夫后裔”之说，是在胡迈依或其继承人统治时期传入的。赛义夫·伊本·西·亚赞是也门的英雄，根据传说，他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致力于把埃塞俄比亚人逐出也门。而且众所周知，北非柏柏尔人喜欢自命为也门人的后裔，以示有别于内志和汉志的阿德南阿拉伯人。在族系上的这一态度相当于在宗教事务上自命为是哈列哲异端教派。

但应当注意，赛义夫·伊本·西·亚赞在同非洲人的战争中战功显赫。白皮肤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竟然是在先知以前的时代）和信奉传统宗教的黑皮肤非洲人（尽管埃 459 塞俄比亚人事实上是基督教徒！）进行战争这一主题在某些阶层阿拉伯人的想象中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埃及，这一主题最终形成了一部真正的民间故事或小说，它歌颂赛义

---

[82] 伊德里西，1866年，第12－15页、33－35页。对这个段落更为详尽的分析见D.兰格，1977年，第124－129页。

[83] 他母亲是凯族人（科扬人）——一个起源不详的部族——名叫塔克拉玛（Takrama），前缀“塔”（*ta*）可能是表明柏柏尔影响。对胡迈依（Hummay）这个名字本身进行分析表明可能源自穆哈默德（Muhammad）这个名字（除去前缀*Mu*和末尾*d*，换上新的后缀，成为一个爱称）。这种做法至今在塔瓦里克人中，以及在柏柏尔人影响下伊斯兰化的其他族群中仍很普遍。

[84] 参阅A.史密斯，1971年，第165－166页。

[85] 同上，第166－167页；J. E.拉弗斯（J. E. Lavers），1980年，第190页。

[86] 阿尔卡利（N. Alkali），1980年，第2及随后诸页；B.巴尔金多，1985年。

夫·伊本·西·亚赞与“邪恶的黑人”进行无数次战争中的巨大威力。[87]

把这种莫名其妙的族系观念引入中苏丹地区的黑非洲环境的那些人是否意识到它所具有的种族主义色彩尚不得而知。他们是柏柏尔人这一点不容置疑；在北部非洲，希米亚里特传奇仍很流行。H.T.诺里斯发现希米亚里特传奇在北非和撒哈拉柏柏尔人中由来已久且流传甚广。[88] 那些宣扬赛义夫·伊本·西·亚赞大名的人不可能是苏丹人或阿拉伯人，他们都具有相当尊贵的族系，然而在另一方面，柏柏尔人以他们有希米亚里特也门血统而自豪。详尽阐述“赛义夫后裔”之说的柏柏尔穆斯林教士无疑也为“加奈姆”（意思为特达－达扎以南）和“也门”（口语中常意为南方）二词的含义和使用有相同之处而大感兴趣。[89]

我们在这里所能说的是塞富瓦与他们的扎哈瓦先辈属于不同的家系，而他们之所以能执掌政权与伊斯兰教的传人并无关系，因为胡迈依并不是加奈姆第一位穆斯林君主。虽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说明塞富瓦人不是当地人，但同样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令人信服地说他们是当地人。

有迹象表明，中苏丹的伊斯兰化从以卡瓦尔居民的改宗开始，他们后来成为伊斯兰教扩张到扎加瓦王国的主要媒介。在胡迈依统治时期（467/1075－478/1086 年在位）伊斯兰教对各阶层人民逐渐渗透至少已进行了两个世纪。执政当局最后发现他们不能对这一进程熟视无睹，因为它势必危及国王对其臣民的绝对权威，同时削弱扎加瓦贵族的势力。我们已经知道，国王可能享有获得奴隶的垄断权，而为了更直接得到奴隶供应来源，打破国王垄断显然符合柏柏尔商人的利益。至于对扎加瓦贵族来说，垄断奴隶很可能被视作是国王对平民行使权力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对于并入王国的各族人民来说，信仰伊斯兰教以抵御国王的垄断权力符合他们的利益。

460 但是到 11 世纪末，伊斯兰教仍局限于王室和贵族的狭窄圈子里，只是很久以后，到了杜纳马·迪巴拉米统治时期（约 607/1210－646/1248 年在位），伊斯兰教成了扩张政策的工具时，它才有可能沟通分隔贵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各族人民的鸿沟，从而成了真正为人民所信仰的宗教。[90]

到了 468/1075 年前后，胡迈依在加奈姆掌权。同一时候，撒哈拉西部柏柏尔人的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南下征服了加纳王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穆斯林王朝。[91] 再往东，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在稍后一些时候在尼日尔河东岸的考考（加奥）王国建立一个新穆斯林王朝。[92] 有理由假设，中苏丹由胡迈依领导的运动是撒哈拉西部柏柏尔人中（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爆发的宗教骚乱的一个后果。但这与西苏丹的新王朝不同，加奈姆的塞富瓦

---

[87] R.帕雷特（R. Paret），1924 年，第 88 页，指出这个故事的书面形式可追溯到 9/15 世纪初期，口头形式肯定在更早时候就存在了。

[88] H. T. 诺里斯（H. T. Norris），1972 年，第 28 页。

[89] 参阅 J. F. 拉弗斯，1980 年和 B. 巴尔金多，1985 年。

[90] 塞富瓦统治初期伊斯兰教衰落的说法在 D. 兰格 1978 年的著作中有更详尽的记载。

[91] 根据祖赫里（al－Zuhri）的记述，阿尔莫拉维德征服加纳发生在 469/1076－1077 年（参阅祖赫里，1968 年，第 182－183 页）。但也应参阅本书第 13 章。

[92] J. O. 亨威克（J. O. Hunwick），1980 年。

王朝属于非洲范畴，从而确保他们所继承的国家传统的连续性。在他们掌权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历代塞富瓦君主千方百计力图消除人们对他们真正血统的记忆，所以他们把自己直接与扎加瓦王国的前代君主相联系。最后他们的国家体制证明比所有具有特殊神宠论倾向的国家更加强有力。

16 几内亚地区：概况（写于1977年）

瑟斯顿·肖

461

导　言

我曾经将西非的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描述为“寂静的千年”。[1] 我也曾指出，这段寂静的时期对我们了解历史是多么重要，因为这一时期势必包括对后来出现的那些王国和宗教中心至关重要的形成阶段，而人们只能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结束时或下一个一千年开始时才看到那些王国和宗教中心的涌现。这个寂静的一千年时间跨度实在是大，大部分时间无法通过口头流传的传说来追溯。[2] 通过考古发掘，人们对基督纪元前好几千年情况的了解反而多于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这部分是出于偶然，或者是由于考古发掘的遗址的特点造成的。但也有部分正表明人们生活方式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他们的遗物到今天已不那么显眼，没能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参阅原文第466页）。另一方面，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我们不仅开始有历史文献，而且开始有具有中央集权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含意的艺术作品，这才引起了考古学家和艺术历史学家的注意。总之，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收集我们能够得到的尽量多的画面。有时，得到的材料可能仅仅是一些无法把它们解释清楚或综合成更有条理纲目的资料。

农业的拓展

早期发展

本卷所述时期最重要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是从依靠狩猎、采集和捕鱼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为依靠务农和畜牧，或是大部分依靠这些活动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因为即使已有初步完全的农耕制度，狩猎、采集和捕鱼仍不失为食物来源的一个方面，尽管在程度上已不再是主要的了。在研究这一变化对几内亚地区的影响时，我们不应把它视作一种与过去的猛然决裂，或者如同在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许多地方那样，是一种突然从外部输入的全新事物。农业和粮食生产很可能是经历了许多“阶段”逐步发展起来的。最初，在撒哈拉以南或者在如今撒哈拉沙漠本身的南部，最早有计划地播种非洲本

462

[1]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Ⅰ卷，第24章。

[2] D. P. 赫尼奇（D. P. Henige），197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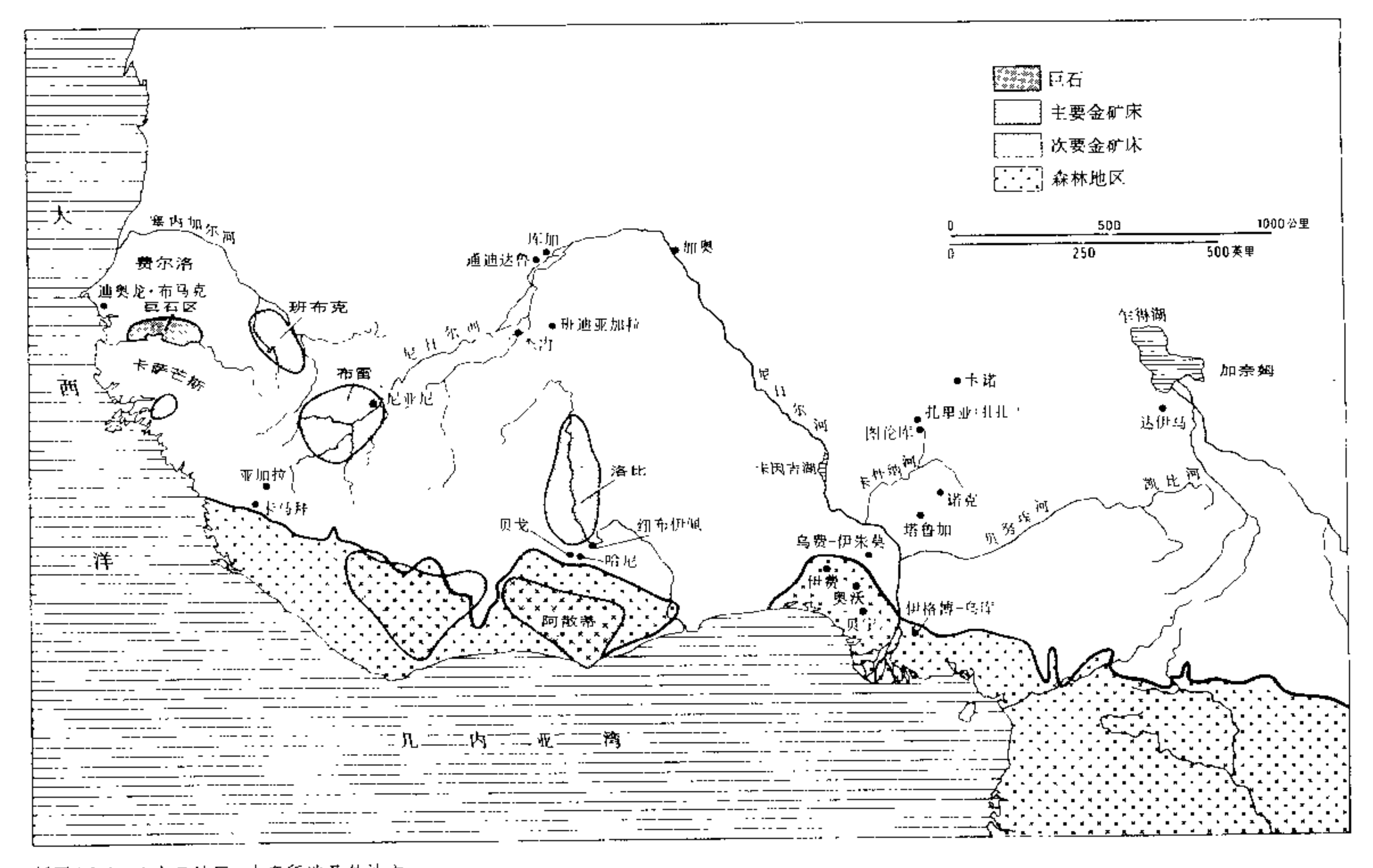


插图16.1　几内亚地区：本章所涉及的地方

地谷物，可能是定居或半定居渔民在干旱日益加剧时期所采取的最后手段。这些人渐渐习惯于用混合食物维持生计，即除了食用取自他们居住地区水资源的食物外，同时也吃在附近合适草地野生植株上采集到的粮食。很可能是随着可供捕鱼水域的日渐减少，食物中采集所得的粮食所占比例日益增加。由于不断采集，合适的野生植株日趋稀少，人们不得不去远处采集。人总是倾向于紧紧抱住自己熟悉的方式生活，在一般条件下也总能如愿以偿。他们合乎逻辑的适应环境的办法就是在日渐缩小的江河湖面附近播种，使野生植株生长得更加茂盛，而且离居住地点更近一些。看到上一年作物的种籽落入土地后能生长出新的野草和各种其他植物，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从野草中采集食物的人早就知道这一现象了。但以前的人并没有主动设法让它生长，仅仅是听其自然，让大自然替人们做到这一点。最开始时，人工种植只是临时权宜之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人工种植。在此过程中，根本不存在从狩猎、采集和捕鱼转向农业的突变，实际发生的只是不同类型食物比例上逐步改变的渐变。[③] 一旦人们长期固定地播种谷类植物，这些植物便开始发生遗传上的变化。这就导致了"驯化培育"过程以及为人类耕种、收割和消费目的改良品种的过程。[④]

几内亚地区最重要的木本作物油棕的开发充分表明从采集转向农业并非突变。从收集树上落下的野生坚果；到采取措施防止野兽食尽全部掉下来的坚果；再到主动爬上树去摘取整球的果实；到保护天然的油棕树苗防止野兽破坏、野火烧毁和野草侵袭；到 **464** 把某些林木或林区的产权分给个人或家庭；以至到最后有目的地栽种油棕果实，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发展过来的。因此，变化决非一蹴而成的突变，而是沿着这条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地从采集野生果实转化成为有计划地生产粮食。

石器时代那种狩猎者仍然存在

毫无疑问，本章涉及的大部分地区到公元7世纪初，提供人们基本生计的已是粮食生产，而不再是狩猎和采集。但是在热带大草原和森林中完全可能还有分散的人群，仍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在人们的记忆中，加纳的阿散蒂森林中迄今这类人群的事迹还存在于有关"矮人"(*mmoatia*)的故事中。[⑤] 在目前我们已知的考古资料中，有一些例子表明确有部分人在其他人群早已采用金属制造工具和武器时，仍保持使用晚石器时代的那类技术。生活在晚石器时代较早的那个千年中的人们还没有陶器和石斧。他们无疑仍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生。在晚石器时代的后期（有时叫做"新石器时代"），人们似乎已成为粮食生产者，但是我们不能只根据他们已开始使用陶器和石斧来推断这一点。完全有可能，那些在公元11世纪把石制工具留在塞拉里昂的亚加拉岩洞的人主要还是狩

---

③ T.肖 (T. Shaw)、1974年；J. D.克拉克 (J. D. Clark)，1976年，第92-93页。

④ J. R 哈伦 (J. R. Harlan)、J. M. J.德-韦特 (J. M. J. De Wet) 及A. B. L.斯坦姆勒 (A. B. L. Stemler)，1976年 (b)，第6-9页。

⑤ R. S.拉特雷 (R. S. Rattray)，1927年，第25-27页。

猎者和采集者。[6]

获得有关农业的直接证据颇为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的机会。间接的证据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留在岩石表面上磨出来的凹洞，几乎无法追溯其年代，可移动的手磨和磨石也可以用于粮食加工以外的其他目的，诸如杵和臼之类的木制品极少遗留下来。但是，在尼日利亚中部开锡矿时挖掘的冲积物中，发现了一根长 1.25 米、直径为 7.5 厘米的结实而且雕凿精致的木棍。据认为这是一根木杵和捣东西用的棍子，用碳－14 对其木料标本进行了年代测定，确定为公元 9 世纪。[7]

作　物

热带大草原地带最重要的谷物是蘼草属小米、几内亚玉米以及两种“芳尼奥(fonio)”——“直长马唐”或“饥饿之米”。在富塔贾隆人们培植一种野草，而非洲稻米在几内亚地区的西部占据着主导地位。在热带大草原南部和森林地带东部，培植的 **465** 非洲薯蓣成为大宗食品。那种以薯蓣和油棕为主食、辅以鱼类、山羊、矮牛和丛林肉类（包括蜗牛）蛋白质的混合饮食结构，或许有助于解释尼日利亚南部人口增长的原因。[8]

疾　病

另外，公元 7 世纪时，镰状细胞基因携带率已增至足以使当地居民具备相当的抗御疟疾的能力水平。最初人们采取的农业操作方法和生活方式反而使疟 的发病率增加了。[9] 由约 25 人组成的流动狩猎群体为地方病的蔓延提供的繁殖场所，远不如规模更大的定居农业人口的集聚点适宜。此外，就镰状疟原虫疟疾而言，为了耕种而在树林中清理土地所造成的条件，有利于这种疾病的发生。这是因为有一种冈比亚蚊子是镰状疟原虫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它们在原始森林中很难找到合适的自然繁殖点，因为在落叶腐殖物覆盖的林中地面上不易形成水塘。在有池塘的地方，又由于那里太黑暗不适合冈比亚蚊子生长，这种蚊子喜欢将卵产在洒满阳光、光线充足的水塘中。而另一方面，从事农业村庄的露天水坑和各家的垃圾（如扔掉的葫芦），为蚊子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场所，草屋的屋顶和屋檐则为蚊子提供了白天隐藏之处。如果孩子从父母双亲那里获得镰状细胞基因——至于镰状细胞突变究竟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确切情况，我们不得而知——那么孩子将在他达到生育年龄之前死于镰状细胞贫血症。如果孩子没有从父母任何一方获得这种基因，那么他又有很大可能性在发育成熟之前死于疟疾。但是，如果

---

[6] J. H. 阿瑟顿（J. H. Atherton），1972 年；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11 卷，第 24 章。

[7] B. E. B. 法格（B. E. B. Fagg），1965 年。

[8] T. 肖，1972 年，第 159 页。

[9] F.B. 利文斯通（F. B. Livingstone），1958 年；S. L. 维森费尔德（S. L. Wiesenfeld），1967 年；D. G. 库西（D. G. Coursey）和 J. 亚历山大（J. Alexander），1968 年。有关镰状细胞的骸骨证据，见 S. P. 博勒（S. P. Bohrer），1975 年

他从父母中的一方得到这种基因，他就不会死于镰状细胞贫血症，而且还会获得强大的抵抗疟疾的抵抗力。凡人口中镰状细胞基因携带率高的地方，也总是地方病疟疾流行的地方。尽管从父母双方得到镰状细胞基因有致死的作用，但由于它又有可能提供抗御疟疾的抵抗力，因此它的携带率得以发展到如此高的程度。据计算，携带率聚集到尼日利亚东北部那种水平，至少经过了1500年的时间；在湿度略低的地区，聚集的速度也许慢些。携带率在西部非洲由南至北，趋向于呈递减状。在沿海地带最严重，越往北越小。

466 耕种和定居的方式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在本卷所述时期的开端，四处都有生活在村庄里的农户。在有些地方（见下文），人口密度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使得建立固定的延续许多代的定居点成为可能。而在另一些地方，人口聚居点对粮食需求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从劳力投入的角度考虑，整个村子迁移到从未开垦过的地区或相当一段时间没有耕作过的地区，要比让农民为寻求合适的肥沃土地而到离村庄越来越远的地方去耕作更为经济合算。这样便产生了普遍的长期休闲制。好几代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的村庄，每隔10至20年新的泥土房屋便盖在祖辈旧房的废墟上，[①] 村庄的地面逐渐高出于周围的大地，形成土丘。考古学家已开始懂得如何寻找这种土丘。有些土丘已经过考古挖掘。但是，人们还需要做比迄今所做的更多的工作才能弄清即便是一块面积有限的地方形成这些土丘的村民的全部情况。挖掘单独一个遗址所能获得的资料是有限的。

另外一种类型的村庄遗址更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有从新近耕作时刚刚翻过的地面上发现的疏疏落落的陶器碎片才能肯定这类村庄的位置。如果上面覆盖着植物则无法察觉，除非在某些情况下能从生长植物的具体差异上看出来。即使发现了这类村庄的遗址，由于地层厚度不够，挖掘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我们对早年短暂从事耕作的村庄的了解，反而不如对晚石器时代狩猎者和采集者居住点情况了解得那么全面，原因就在于此。晚石器时代的狩猎者和采集者有经常回到岩洞或凸出的岩石下面的习惯，而这类地方比较容易被发现和进行考察。这类岩洞和岩石掩蔽处经常被后来使用铁器的农业耕作者暂时利用，他们把这类地方用作耕种时躲避和栖身之处，但是他们很少把这类地方建成永久性的住所。有一个例外，在今天马里的班迪亚加拉陡崖下的泰勒姆岩洞，人们对洞中发现的具有考古价值的资料和残骸进行了仔细的研究。[②] 如今定居当地的多贡人认定山洞里的遗物属于“泰勒姆”人，但是认为在他们从西边东迁来该地时，这些山洞无人居住。据碳－14测定，“泰勒姆”人在那些洞穴居住，是本卷所述时期即将结束时才开始的，他们在那里住了二、三百年。人们原来认为，“泰勒姆”人迁移到东面如今是布基纳法索的地方，他们是目前住在那里的库龙巴人的祖先。但是，对库龙巴人和泰

① R. J. 麦金托什（R. J. McIntosh），1974年。
② B. T. 巴祖因－西拉（B. T. Bazuin-Sira），1968年；J. 赫伊津哈（J. Huizinga），1968年，F. 威利特（F. Willett），1971年，第369页。

勒姆人骸骨进行的人类学研究表明，两者的祖先并不相同。

、冶金术的传播

467

炼　铁

当时的农民已开始使用铁器，铁的冶炼在几内亚地区已十分普遍。在这个地区的某些部分，铁矿石的提炼已有一千年的历史。对如今位于尼日利亚境内塔鲁加地方的“诺克文化”遗址进行碳－14测定表明，铁矿石的提炼在那里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时即已开始。⑫ 在加纳的哈尼挖掘出一处铁矿石提炼遗址，对混合着炉渣以及吹风管嘴和风箱碎片的木炭进行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2世纪。⑬ 尼日利亚卡诺的达拉山的山脚下⑭和扎里亚附近库班尼山谷中发现的炼铁炉据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7世纪，⑮ 在这个炼铁炉群进一步挖掘取得的新近的两次测定数据，其年代为公元8和10世纪。这表明靠近硬铁矾土富矿的这一地区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是传统的铁矿石提炼中心。⑯ 尼日尔河以南以及它和贝努埃河汇流处以西，在乌费－伊朱莫挖掘出来的一群炼铁炉的年代，经测定为公元9世纪和12世纪。对标志着这些遗址被放弃开采的地层的测定，表明其年代为公元14世纪。⑰

居住点遗址

除了实实在在的铁矿石提炼炉外，人们如今还发现一些居住点遗址，这些遗址证明在基督纪元起始之初铁器已经为人所使用，到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中叶，铁器的使用就更加广泛了。尽管在年代上不如塔鲁加炼铁炉早，但卡因吉湖水泛滥的尼日尔河流域地区和附近卡杜纳河流域的居住点土丘遗址，一处经测定最早年代为公元前130年，⑱ 另一处测定为公元100年和200年，⑲ 再一处为公元200年。⑳ 被假定为马里首都的尼亚尼㉑和伊费㉒的最早居住年代为公元6世纪。喀麦隆的贝努埃河－马约河－凯比河 468

⑫ F. 威利特，1971年，第369页。

⑬ M. 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和R. 麦金托什（R. McIntosh），1976年，第165－166页。

⑭ F. 威利特，1971年，第368页。

⑮ M. 波斯南斯基和R. 麦金托什，1976年，第171页。

⑯ J. E. G. 萨顿（J. E. G. Sutton），1976年、1977年。

⑰ M. 波斯南斯基和R. 麦金托什，1976年，第172、190页。

⑱ C. 弗莱特（C. Flight），1973年，第548页。

⑲ B. M. 费根（B. M. Fagan），1969年（b），第153页。

⑳ 作者情况未曾发表。

㉑ W. 菲利波维亚克（W. Filipowiak）、S. 亚诺兹（S. Jasnosz）和R. 沃拉吉威兹（R. Wolagiewicz），1970年；D. T. 尼昂（D. T. Niane），1970年；F. 威利特，1971年，第365页；又见G. 利泽冈（G. Liesegang），1975年。

㉒ B. M. 费根，1969年（b），第154页。

汇流处一带迄今知道的使用铁器最早年代也是公元6世纪。㉓ 在乍得湖以南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达伊马遗址，铁器使用的年代估计还要早一些。㉔ 若要对已经发表的喀麦隆北部和乍得共和国接壤地区“萨奥”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作出解释，则比较困难。㉕ 几处在如今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河的贝冢自公元7世纪开始便逐渐堆积起来，这是使用铁器者采集食物的习惯形成的。据考察，当时占据这一地带的可能是如今该地居住者的祖先迪尤拉人。㉖ 当时，除了捕食甲壳类动物，他们还下海捕鱼，喂养山羊和牛，稻米似乎已经成为主食，而且种植稻谷使人们有可能在定居点长期居住下去。塞内加尔萨卢姆河三角洲迪奥龙·布马克的贝冢好像是在公元8世纪快结束时才开始堆积的。由于公元11世纪初对甲壳类动物资源的大量捕捞，堆积便越来越多。捕捞甲壳类动物的活动到本卷所述的时期以后才停止，或许是在公元15世纪当塞雷尔·尼奥敏卡人取代曼丁人成为沿海定居者的时候。㉗

正如农业生产开始后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一般在许多地方仍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样，炼铁技术的传播同样也是很不平衡的。虽然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好几个世纪，塔鲁加就已出现炼铁术，但在几内亚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要到一千多年以后，甚至更晚些时候炼铁术才得到采用。在这段时间里，应用晚石器时代技术的人有时就居住在离使用铁器的人不远的地方。这些使用不同层次技术的人群彼此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太太平平的交换关系、有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他们是否居住在不同的地点或生态环境中而彼此很少交往——对于上述这些情况，我们迄今了解很少。塞拉利昂北部就能见到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在卡马拜发现铁制工具、炉渣和陶器，这种最高技术的使用，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7世纪和8世纪，而在亚加拉，人们一直到公元11世纪还在使用晚石器时代的技术。㉘ 据公元12世纪的地理学家祖赫里说，古代加纳人曾袭击了不拥有铁器而仅用黑檀木棒作战的人，后者当然敌不过加纳人的刀剑长矛。㉙ 对更多分布在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的遗址进行发掘和年代测定之前，我们是没有可能获悉关于西部非洲铁器使用和传播的确切历史状况的。在哈尼发现年代为公元2世纪的炼铁遗址（见原书第467页）之前，在现今加纳的这一地区，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炼铁技术来自纽布伊佩遗址，㉚ 其年代接近公元8世纪末。只是在最近，才开始对尼日尔河三角洲极其特殊的环境开展考古调查。迄今为止，在该地尚未发现石器时代的遗址，

26

469

㉓ C.弗莱特，1973年，第550页。

㉔ B. M.费根，1969年（b），第153页；G.康纳赫（G. Connah），1976年。

㉕ A.勒伯夫（A. Lebeuf）和J.－P.勒伯夫（J.－P. Lebeuf），1970年；C.弗莱特，1973年，第552－553页。

㉖ O.利纳雷斯·德－萨皮尔（O. Linares de Sapir），1971年；F.威利特，1971年，第361页；C.弗莱特，1973年，第545页。

㉗ C.德康（C. Descamps），G.蒂尔曼（G. Thilmans）和Y.托默莱特（Y. Thommeret），1974年；C. A.迪奥普（C. A. Diop），1972年，M.波斯南斯基和R.麦金托什，1976年，第184、193页。

㉘ J. H.阿瑟顿，1972年；F.威利特，1971年，第351页。

㉙ N.莱维蔡恩（N. Levtzion），1973年，第14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J. F. P. *Hopkins*）（合编），1981年，第98页。

㉚ R. N.约克（R. N. York），1973年。

最早的居住点年代为公元9世纪末。㉛

尽管制造铁器的技术传播很不平衡，我们仍可以认为，这种技术在本卷所述的时期开始时已广为流传，到了该时期结束时，遗留下来的使用石器时代技术的地方肯定已经不多，尽管某些石制工具有可能仍旧为某些人所使用。㉜ 但是，在该地的大部分地方，甚至没有流传下来有关使用石斧的民间传说。如果在地里碰巧发现了石斧，人们便把它们的来历归咎于雷电，说它们是随着闪电从天上掉下来的落雷，是造成破坏树林和房屋的祸首。就这样石斧被奉为神力的工具和象征，被供奉在尼亚梅人、桑戈人以及贝宁祖辈统治者“奥巴”（*oba*）的祭坛上。在象牙海岸南部，石斧被造成特殊庞大形状，它肯定只具有宗教仪式上的意义而没有使用上的意义。㉝

地方贸易

毫无疑问，铁器传播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用于清除灌木丛的铁锄和其他工具促使农业创造剩余，有了剩余便使人们得以进行更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工艺专业化，最终发展起城镇，并供养起帝王、朝廷和宗教法庭。这一进程很可能是个缓慢的过程，不应认为由农业生活方式导致的“人口压力”结果必然促成国家的出现，或者是国家形成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却是促成了以特定的剩余和工艺专业化为基础的地方性交换体系。环境的差异会促使产生这类交换体系，因为一种环境中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用来交换另一环境中生产的东西。靠近河边的地区可以用鱼干来 **470** 换取生长在离河边较远地区的粮食。热带大草原上猎取的草食动物可以用来换取只能在森林中找到的食物。利用本身丰富的矿石资源炼铁的地区可用铁制品换取拥有较好的合适粘土的地区所产的陶器。这种流通网络逐渐形成，一个地区的产品流通到越来越远的地区，也许经过好几个中间商之手。例如，柯拉果本来生长在南方的林区，可以与产于北方的树脂黄油交换。这类交换颇为重要，所遵循的模式也许已有一千多年之久。这种地方交换体系可能对中央集权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一旦从长途贸易获得的额外财富注入当地的交换体系，便使那些控制着易货贸易资源的首领得到了远远超过其原来所拥有的权力。㉞ 更为发达的穿越撒哈拉的贸易触角开始伸入原来存在的交换体系，这一进程无疑是本卷所述时期内几内亚地区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情。贸易网络这样的扩展决不会导致摈弃原有的地方性交换体系；如在其他某些地区见到的那样，贸易机制的发展往往起添加剂的作用，而不是替代物的作用。㉟

正如农耕制度和炼铁业发展不平衡一样，交换网络的发展也无疑是不平衡的。在交换体系不发达的地区，缺少推动集中权力和形成国家的因素，以致有助于保存西部非

㉛ M.波斯南斯基和R.麦金托什，1976年，第170、189－190页。

㉜ R. S.拉特雷，1923年，第323页；M. D. W.杰弗里斯（M. D. W. Jeffreys），1951年，第1208页；D.威廉斯（D. Williams），1974年，第70页。

㉝ B.霍拉斯（B. Holas），1951年。

㉞ R.霍顿（R. Horton），1976年，第75、110－112页。

㉟ T. W.比尔（T. W. Beale），1973年，第143页。

洲那些为数众多的无国家的社会。在南美洲的热带森林文化中，由于热带森林中缺乏同一性（这与给人的表面印象正相反），导致人们从事远距离贸易，甚至村社间发生战争也未能中断这种贸易，[36] 目前人们正认真研究其中的道理。对西非贸易的种种研究，目前大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37] 而西部非洲不同生态地区之间进行的天然产物的交换，则似乎是久远古老的事情。

对外贸易

塞内冈比亚的巨石提供了一些十分耐人寻味的证据，它证明某种形式财富的集中，以及极有可能是伴随而来的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在东西长350公里、南北宽175公里的一块近似椭圆形地区内（大约在西经13－16度，北纬13－14度30分），巨型石块之多令人惊叹不已。这些巨石的分布同冈比亚河和萨卢姆河中、上游流域以及它们的支流密切对应。在这一地区，共计有28 000块大型加工过的石块。[38] 仅在一处（辛－萨卢姆），就有约900块巨石围成54个圆圈。每个圆圈由10至24块竖立的石块围成，其高度自地面算起从半米到接近3米（见插图16.2、16.3、16.4）。石块最通常的形状呈圆柱体，有些呈正方形或者截面为D字形，也有些顶端渐细。但是每一个圆圈的石块都是同一种形状。大多数石块顶端是平的，但也有一些有凹穴或凸起部分。这些圆圈的内径为4至7米不等。许多圆圈的东边有一行同样的石块，由北朝南排列。最令人注目的是罕见的所谓"竖琴石"，是用整块的铁矾土石凿成的V字形。

近年来对其中一些石块圆圈的挖掘，清楚地表明它们与殡葬有关，并且挖掘出一些单人和多人的土葬墓。挖掘的遗址经碳－14测定，提出了三个数据，年代在公元7、8世纪之间，通过仔细的考察发现，巨石有四种类型相互有关的标志：巨石圈、石冢（同巨石圈一样，常常在其东面有一排表示正面的石块）、石头圈（其特点在于不是竖立的巨石，而是刚刚露出地面的铁矾土石块），以及土冢。[39]

推测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投入这么大量的力量来采集、运输并竖立起这些数以千计的石柱是饶有兴趣的。因为这些石柱是从含铁量高的铁矾土石的表层凿下来的，令人联想建立这些石柱的人很可能是靠炼铁和向周围村社提供铁器发了财。事实可能确是如此。但是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迄今我们尚未找到炼铁炉，也未找到巨石竖立者的居住点。这种片面的考古证据在目前所知晓的情况下，是难以推断出当时的情况的。另有一种说明塞内冈比亚巨石的论点，认为这些巨石被置放的所在地具有战略意义，使得该地居民能够控制来自布雷和班布克金

---

[36] D. W. 拉思恩拉普（D. W. Lathrap），1973年。

[37] L. 森德斯特龙（L. Sundstrom），1974年；A. G. 霍普金斯（A. G. Hopkins），1973年。

[38] V. 马丁（V. Martin）和C. 贝克尔（C. Becker），1974年（a）。

[39] P. 奥赞（P. Ozanne），1966年；P. O. 比尔（P. O. Beale），1966年；D. 埃文斯（D. Evans），1975年；G. 蒂尔曼和C. 德康，1974年、1975年。

矿的黄金贸易。[40] 倘若其建造年代为公元8世纪是正确的话，那么像如此远处西部的地点，人们为了把阿拉伯贸易推往北方居然花大力建造巨石，时间上似乎太早了一点。虽然阿拉伯人早在公元8世纪初就征服了马格里布，但他们在此之后最关心的是征服西哥特的西班牙，而不是在摩洛哥设立永久性的贸易中心。[41] 如果塞内冈比亚的巨石的年代 **475** 确实早于阿拉伯贸易，而且是为了向北方出口黄金得到保障，我们也许应该设想沙漠中的柏柏尔人是西部非洲与拜占廷北非进行贸易的中间人。假如这种贸易确曾存在，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阿拉伯人对北非的占领一旦趋于稳定，他们就以比较快的速度与西苏丹建立起商业关系。

在巨石区以北以及在塞内加尔河流域一带，有一片大土丘地区。其中有些挖掘出的陶器与巨石区的陶器相同。据统计已发现四千多个土丘。与巨石区一样，已挖掘的土丘中有群葬墓。墓中发现大量的贵重陪葬物品，包括黄金和光玉髓珠子、金和铜的装饰品、铁制武器；其中摩洛哥工艺制作的铜碗表明与北方的贸易有关。虽然南边的一个土丘经碳－14测定的年代为公元8世纪，[42] 但该地大多数土丘被认为是属于公元10世纪的。[43] 同样，在塞古以下的尼日尔河上游流域也有已挖掘出丰富陪葬品的土丘。在尼日尔河河湾起端处的库加，有一处土丘也有竖立的石块，时间被测定为公元1000年左右。[44] 在尼日尔河河湾中部地区，通迪达鲁的巨石尽管已遭到现代古董收藏家的掠夺和摧残，而且从未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挖掘，但其年代大概属同一个时期，并可证明与当时从布雷金矿顺尼日尔河而下的黄金贸易有联系。[45] 昆比萨利赫（古加纳城）在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曾是来自上述金矿的黄金的集散地，它的发展不迟于公元8世纪，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将近公元8世纪末，加纳已经以“黄金之乡”著称，其名声流传远达巴格达，这可以从法扎里的名著中得到证实。[46] 昆比萨利赫和奥胡达古斯特两地可能都是来自班布克金矿的黄金的集散地，也许正由于它们把贸易路线更大规模地组织了起来，使得那些在此之前向西开发金矿的村社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趋于衰落。

有些情况表明，在穿越塔加扎和锡吉勒马萨的贸易通道打通之前，西非黄金运到阿拉伯世界的最初通道是经过达赫拉绿洲和海尔贾绿洲更为直接地进入埃及。[47] 我们也许可以从加奥至埃及途中位于阿伊尔地区的马兰代特遗址中证实这条早期通道的存在，遗 **476** 址中的文物经碳－14测定，其年代分别为公元6世纪、7世纪和10世纪。[48] 从那里的垃圾堆中挖出了大约42 500个熔罐，表明定居在该地的工匠们活动频繁。权威人士对所加

[40] M.波斯南斯基，1973年，第151页。

[41] R.奥利弗（R. Oliver）和B. M.费根，1975年，第157页；参阅本书第9、11两章。

[42] M.波斯南斯基和R.麦金托什，1976年，第184－185页。

[43] M.波斯南斯基，1973年，第152页。

[44] R.莫尼（R. Mauny），1961年，第109－110页。

[45] R.莫尼，1970年，第133－136页。

[46] N.莱维齐恩，1973年，第3页；N.莱维齐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32页。

[47] N.莱维齐恩，1968年（a），第231－232页。

[48] H.洛特（H. Lhote），1972年（a），1972年（b）；C.德利布里亚斯（C. Delibrias）、M. T.吉约尔（M. T. Guillier）和J.拉贝里（J. Labeyrie），1974年，第44－45页；M.波斯南斯基和R.麦金托什，1976年，第183页。

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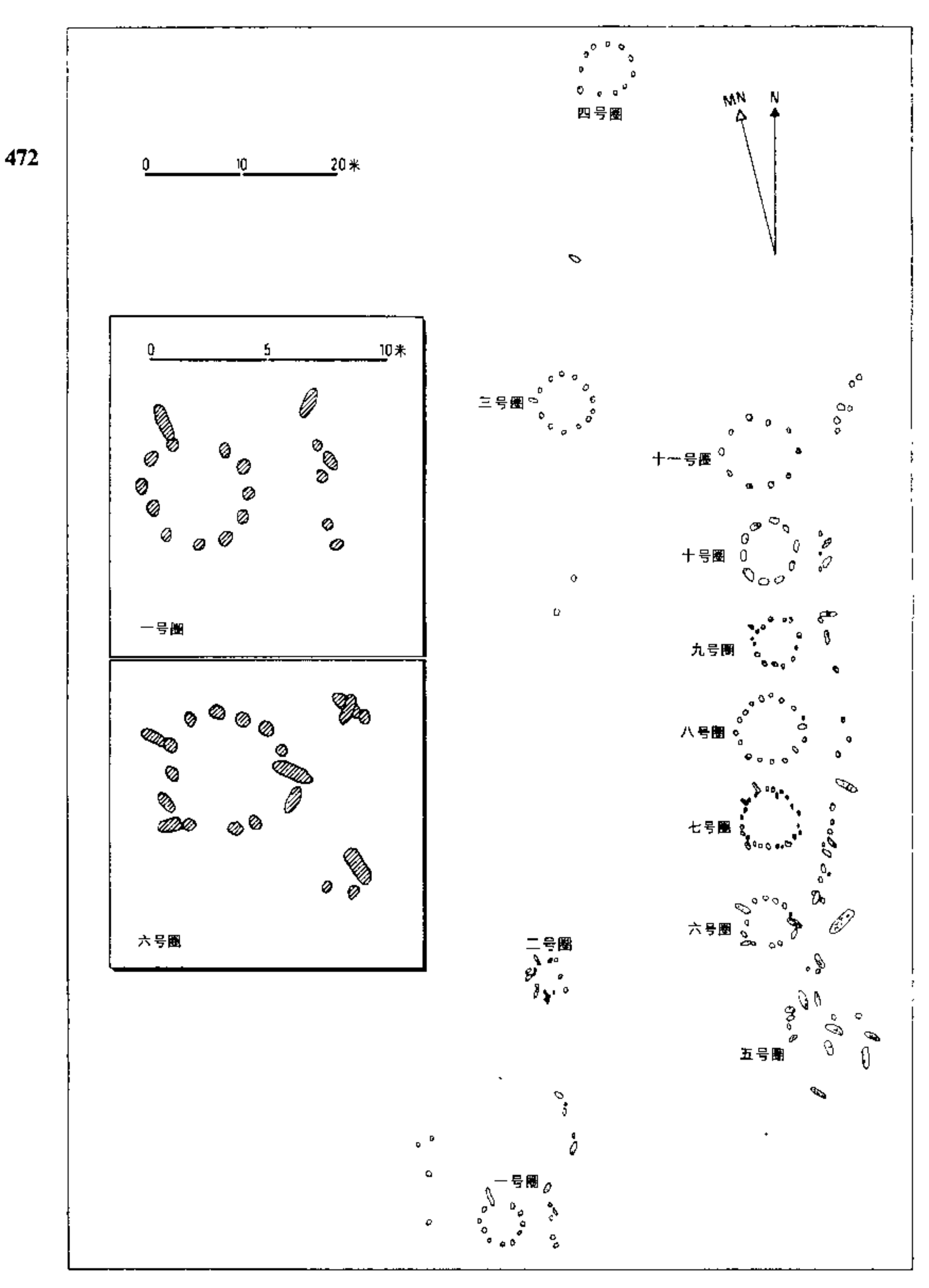


插图16.2 瓦苏遗址的平面图

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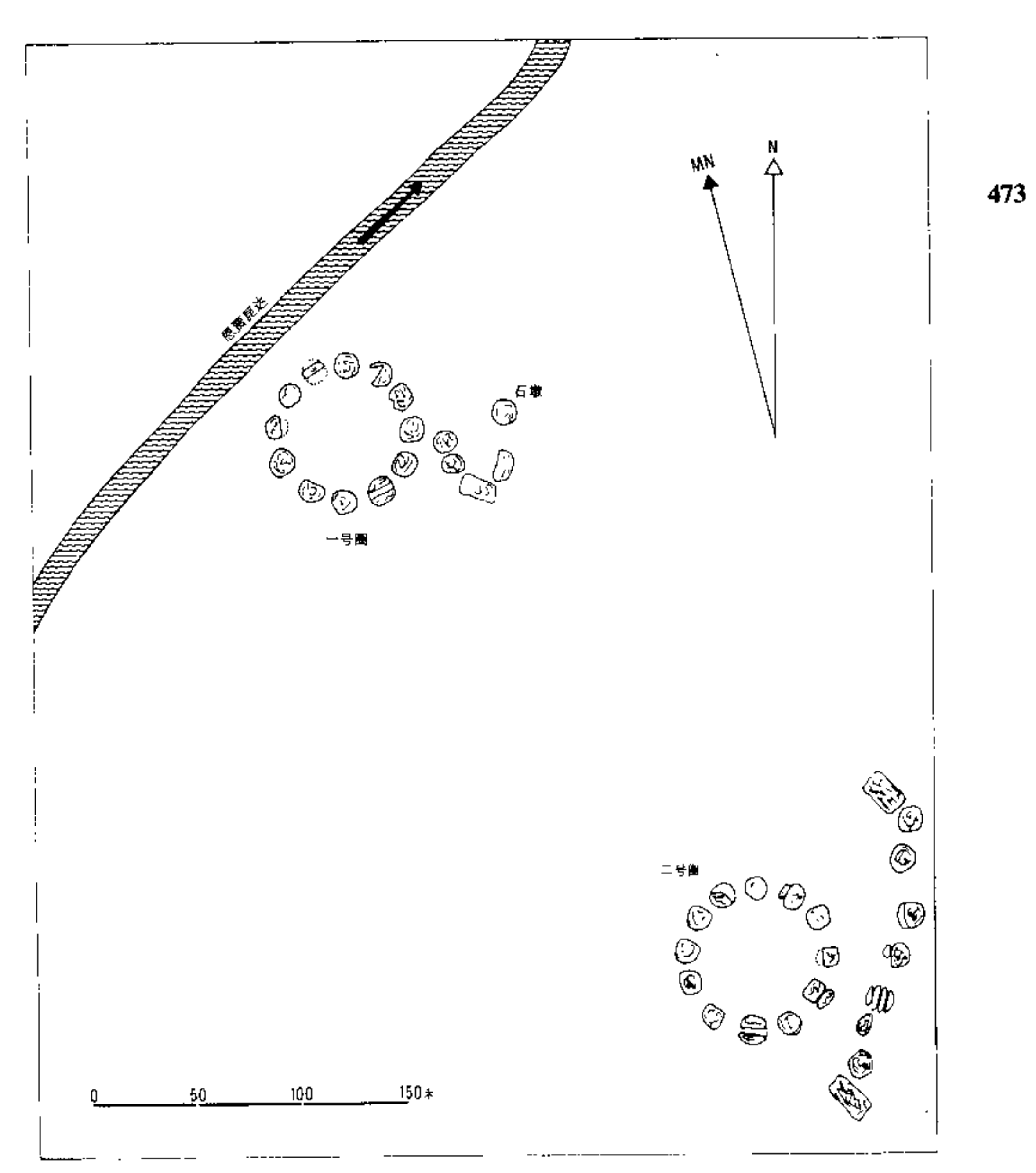


插图16.3 瓦苏遗址中的两个圈，圈外的石头在东边或多或少比较完整

4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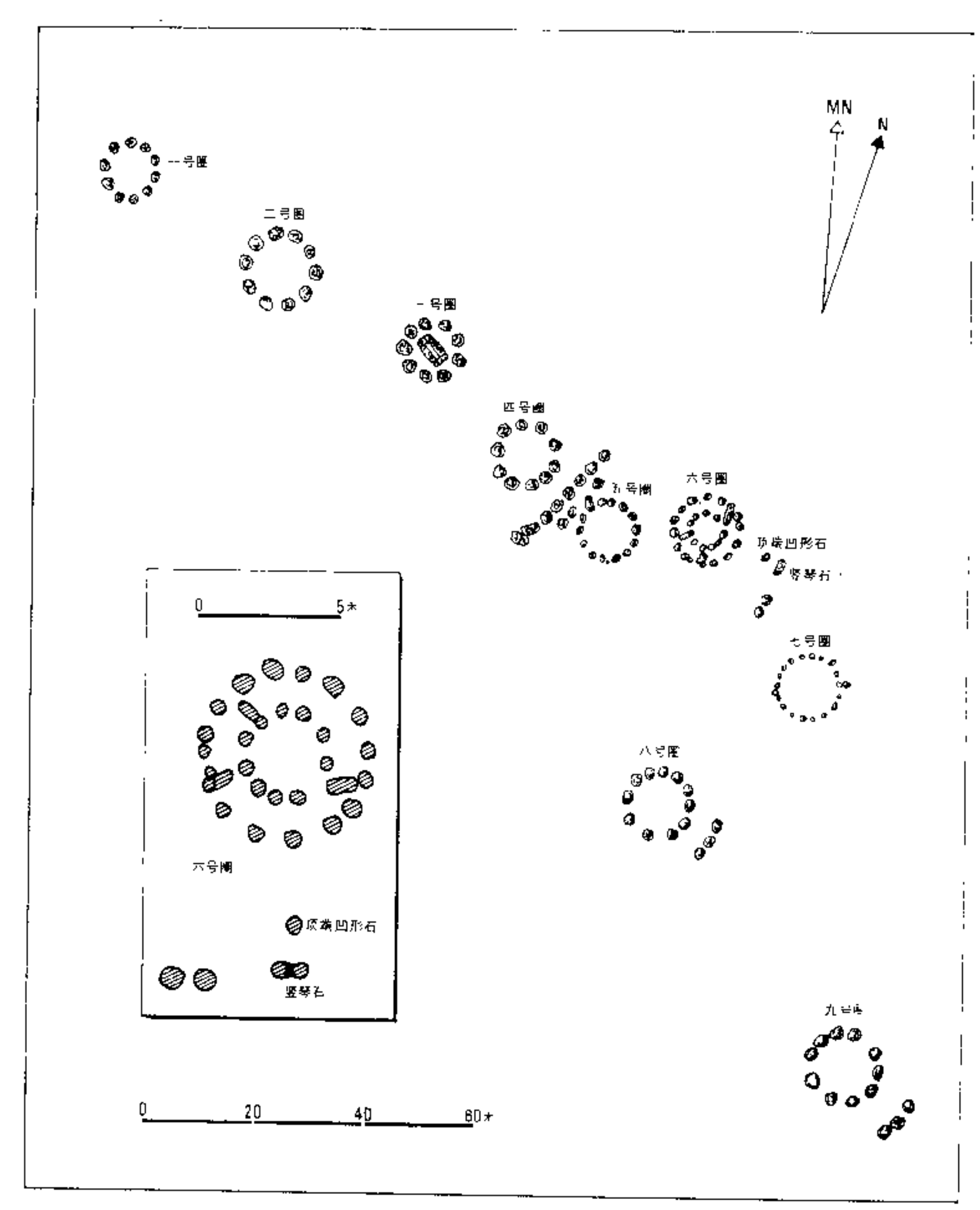


插图16.4 克巴奇的竖琴石

工的是何种金属尚有不同看法，[49] 对立的看法中有的认为是黄金，有的认为是铜。但我们目前掌握的唯一可靠的证据是对一只熔罐中的残渣进行的分析，其结果表明是铜而不是金。[50] 显而易见，重要的是要更多地了解有关马兰代特的情况。证实并缩小年代误差，最重要的是要初步弄清所使用的原料的来源、制成品的去向、工匠的身份和贸易组织的政治和商业管理等情况。如果当时马兰代特工匠使用的是黄金的话，那么这种原料只能是从远处的班布克和布雷长途运来的（因为现代加纳的阿散蒂金矿是否参与这一贸易很值得怀疑），而且离埃及还有一半路程。另外，假如没有留下铜渣的熔罐是用来熔金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昆比萨利赫、奥胡达古斯特、瓦拉塔、埃斯－苏克及其他一些地方却没有发现如此大量的熔罐？而这些地方也都是已知的穿越撒哈拉贸易的黄金集散地。铜又是来自何方？很长时间以来，研究工作者试图认定公元 14 世纪的伊本·巴图塔描述的"塔凯达"为撒哈拉南部铜的产地。有人认为，认定马兰代特西北 150 公里处的阿泽利克为铜产地更令人满意。[51] 因为该地的废墟和大量散落的炉渣及模子证实阿泽利克原先是制铜的重要地点。尽管早先有人称在阿泽利克东－北－东 13 公里处曾发现过铜产地，[52] 尽管最近的一些考察证实了该地确有铜矿，[53] 但是据称这些铜矿蕴藏量没有达到开采的水平。在阿泽利克所加工的铜必定来自外地，且据碳－14 测定，其年代为公元 12 世纪和 16 世纪，晚于马兰代特铜的年代。[54]

自巴克里以来的阿拉伯作家著作中提供大量证据表明，铜是输入几内亚地区的一项重要物资。公元 14 世纪时，它曾作为货币在塔凯达和加奈姆流通。[55] 公元 12 世纪初，曾有一支南去的商队显然在毛里塔尼亚的马贾巴特－库布拉沙漠遇到了麻烦，当时该商队驮着 2000 根铜棍，但被迫扔掉了它们。[56] 黄金是穿越撒哈拉的商人想从西部非洲贩运的首要商品，但在诸如几内亚地区东部等处搞不到黄金的地方，也有其他一些可获取厚利的商品，尤其是象牙和奴隶。根据这个事实以及马兰代特的制铜活动开始得如此之早，再结合当时存在的直达埃及的早期贸易通道，是否有助于解释在南边很远的几内亚地区东部的伊格博－乌库所发现的文物据碳－14 测定的年代如此之早的原因呢？[57] **477**

权力集中的开端

伊格博－乌库

伊格博－乌库位于尼日尔河东岸商业重镇奥尼查的西南约 35 公里处。奥尼查的政

---

[49] H. 洛特，1972 年（a），1972 年（b）；R. 莫尼，1973 年，第 763－764 页。
[50] R. 卡斯特罗（R. Castro），1974 年。
[51] R 莫尼，1961 年，第 140－141 页，308－309 页。
[52] J. 隆巴德（J. Lombard）和 R. 莫尼，1954 年。
[53] S. 伯尔努斯（S. Bernus）和 P. 古莱奎尔（P. Gouletquer），1976 年。
[54] M. 波斯南斯基和 R. 麦金托什，1976 年，第 183 页。
[55] N. 莱维蔡恩，1973 年，第 120 页。
[56] T. 莫诺（T. Monod），1969 年；C. 弗莱特，1973 年，第 544 页。
[57] T. 肖，1970 年、1975 年（a）、1977 年。

治结构受到贝宁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有一人在他院内挖水池，未挖多深便惊奇地发现一些铜制品。这些铜制品后来进入了位于拉各斯的尼日利亚博物馆。当时，该国古代文物部的工作人员在上述地点留下了标记，以便日后进一步挖掘。二次大战结束后，便对此地进行挖掘，发现了三处互相毗邻的遗址。第一处是一座库房或神祠，里面保存着王室的徽章和祭品，但由于某种缘故中途放弃挖掘从而使它迄今还完好地保存着。第二处是一座葬有一个重要人物的四边有木板的葬室。第三处是一个里边有扔掉的祭品的堆放坑。上述三处地方发现的紫铜和黄铜制品，库房中是 70 多件大的、近 500 件小的；葬室中是 19 件大的和 32 件小的；堆放坑中则 13 件大的和 87 件小的。库房中还发现 6 万多颗珠子，葬室中则发现 10 万多颗珠子。三处都发现了颇有特色的绘有精制图案的陶器，堆放坑中的陶器种类最为丰富。这类文物显然不是普通平民的日用品。从给予葬室中的那位重要人物的待遇可以清楚看出，其方式与给予村社中其他人完全不同。这种与众不同的待遇，可能是给予伊格博人等级制度中的高级要人（*ozo*）的，或许是给予"祭司－国王"（*eze nri*）本人的，拥有这个职位的人直到本世纪早期，在伊格博兰的大部分地区虽不拥有政治权力，但掌握着强大的祭祀礼仪上和宗教上的支配权。他最重要的职能是与薯蓣作物和土地肥力联系在一起的，还负责在有人违背禁忌后清除对祭祀造成的污染和解释纠纷。人们进入科学时代之前，对诸如肥力**480** 和天气等情况的变化原因知道得很少，因此可以想象当时肯定会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前科学时代的宗教方式竭力对这些能够左右其生计的事物加以控制。这种情况曾发生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阶段，但人们当时着重注意如何寻找大批猎物和成功地加以捕杀。转入农业阶段之后，重点转向土地本身的生产力以及影响土地生产力的那些因素。因此，对于以农耕为生的社会来说，储存某些特定的资源并挑出以确保土地生产力为职责的特殊人物，都是值得做的事情。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的集中通常与这一进程密切相关。尽管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这很有可能是各个几内亚王国和中央集权组织机构产生过程中的必然组成部分。

在伊格博－乌库遗址，除了用来加工青铜器的金属和玻璃珠子外，没有可辨认的其他外来物品。关于玻璃珠子的背景，人们尚缺乏了解，以致无法对此作出确切的年代判断。青铜制品的式样相当独特，完全不同于贝宁和伊费的铜制品。因此难以根据式样的特征来确定年代。于是只得依赖碳－14 来测定其中一件物品的年代，即在葬室中发现的一把嵌有铜饰钉椅凳的木料，据测定其年代为公元 8 世纪至 11 世纪初。对堆物坑中的木炭所作的三次测定，其年代也属同一时期。但是，同一来源的另外一块木炭的年代却为公元 14 世纪末到 15 世纪初；这个年代和可与伊格博－乌库出土的青铜制品相比的唯一其他青铜制品类同。[58] 对伊格博－乌库出土文物作出碳－14测定的最早年代的可靠性尚有争议，[59] 但其根据却常常是错误的。[60]

---

[58] D. D. 哈特尔（D. D. Hartle），1967 年、1968 年。

[59] B. 拉沃尔（B. Lawal），1973 年；D. 诺思拉普（D. Northrup），1972 年。

[60] T. 肖，1975 年（a）。

尼日利亚的铜很少，[61] 且尚未发现古代炼铜的遗址，这意味着其年代确定为公元 11 世纪或更早些时候的铜制品，所用的铜是从北方经陆路输入本地的。无疑，输入本地的还有诸如玻璃珠子和没有保存下来的诸如盐那样不能久存的东西。尼日利亚东部没有黄金可供对外交换，所以这些奢侈品可能是用象牙和奴隶交换来的。有些人的看法并非如此，认为在西部非洲没有别的地方如此靠南而在碳－14 所测定的那段年代里已有开展长途贸易的证据。这一论点值得尊重，但是必须记住阿拉伯世界从西苏丹获取黄金的最早通道是途经绿洲（海尔贾绿洲和达赫拉绿洲）把古加纳和埃及连接起来的（见前文，原书第 475 页）。只是公元 9 世纪中叶之后，走这条通道风险太大，才开拓通往马格里布的西部通道。在古罗马和拜占廷晚期，还有一条“象牙之路”从的黎波里沿着穿越撒哈拉的最短捷径通往乍得湖地区，阿拉伯人很有可能也曾利用过这一通道。据巴克里称，在公元 11 世纪期间，铜从苏斯向南输入黑人地区。[62] 那支驮着约 2 000 根铜棍、在马贾巴特－库布拉沙漠遇难的商队所留下的遗物，据测定年代约为公元 1100 年左右（见前文，原书第 476 页）。这样，就有了充分的证据，不仅可以大体上证明伊格博－乌库出土的文物经碳－14 测定所属的年代已经存在穿越撒哈拉的贸易，而且还可证明这个年代已经存在铜的贸易。剩下的唯一疑问是这种贸易是否达到伊格博－乌库那样遥远的南面地方。这只有通过对这一带同年代的其他遗址的挖掘才能加以确定。应记住的另一个尚待日后查考的可能性是，铜也可能来自扎伊尔河下游正北边的尼阿里河流域的产金属地区。[63]

481

关于穿越撒哈拉贸易在公元 11 世纪时达到了南边相当远的地方这一论断，也许能从位于如今加纳贝戈的尼亚科地方出土的文物所作的两次碳－14 年代测定得到支持，该地曾是从阿散蒂向北至杰内进行黄金贸易的重要集散点。[64]

伊　费

伊费文化的顶峰时期不属于本卷论述的时间范畴。因为根据对那里 7 个不同遗址的挖掘所作的 25 次碳－14 测定的核实结果表明，可将 12 世纪中叶至 15 世纪中叶确定为用竖起来的陶器碎片修筑人行道的最杰出时期。这种人行道本身很可能就是使伊费成为这一带超群出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有力“标志”。[65] 如果根据热释光测定得出的年代可信的话，那些著名的黄铜制头像和其他铜合金铸品的制成年代应属于这 300 年

---

[61] M. A. 翁韦杰奥古（M. A. Onwuejeogwu）对此提出质疑，1974 年；见 T. 肖，1975 年（a），第 513 页。

[62] N. 莱维茨恩，1968 年（a），第 231－232 页；R. C.C.劳（R. C. C. Law），1967 年（b）；巴克里（al－Bakri），1913 年，第 306－307 页；N. 莱维茨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69 页。

[63] P. 马丁（P. Martin），1970 年，第 143 页；T. 肖，1975 年（a），第 5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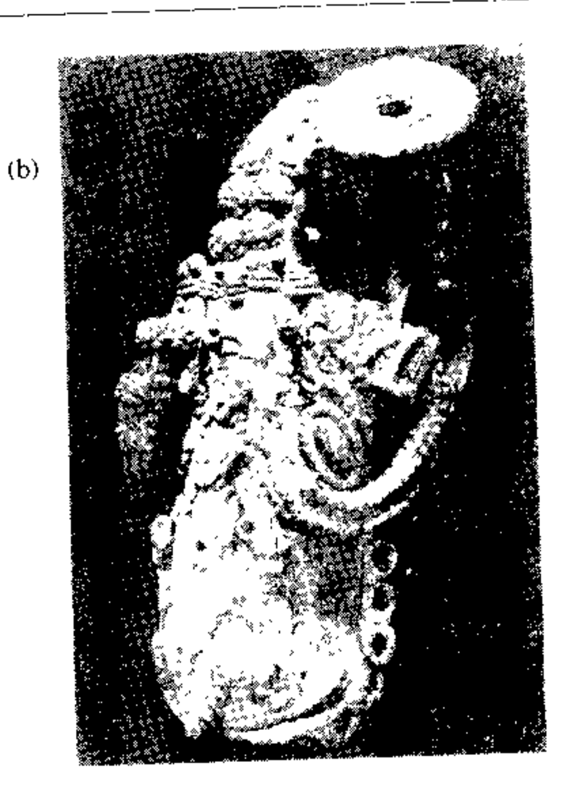
[64] M. 波斯南斯基和 R. 麦金托什，1976 年，第 166 页。本章写成后所作的考察表明，在当今杰内城东南方向 3 公里处传说中的杰内－杰诺遗址，从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1400 年曾有人居住；这一发现对了解杰内城的初期形成和发展情况颇有帮助。见 R. J. 麦金托什，1979 年；R. J. 麦金托什和 S. K. 麦金托什（S. K. McIntosh），1981 年；S. K. 麦金托什，1979 年；S. K. 麦金托什和 R. J. 麦金托什，1980 年（a）、1980 年（b）。

[65] T. 肖，1978 年，第 157－163 页。

478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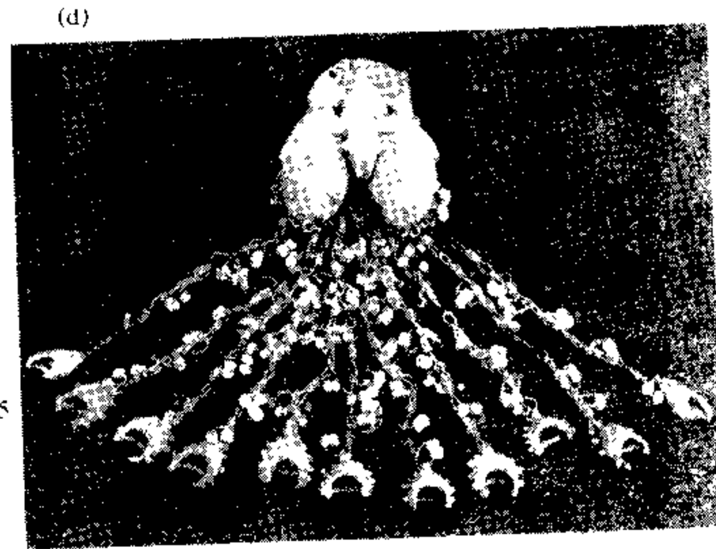
(b)



(c)



(d)



图片 16.1　从伊格博－乌库遗址挖掘出土的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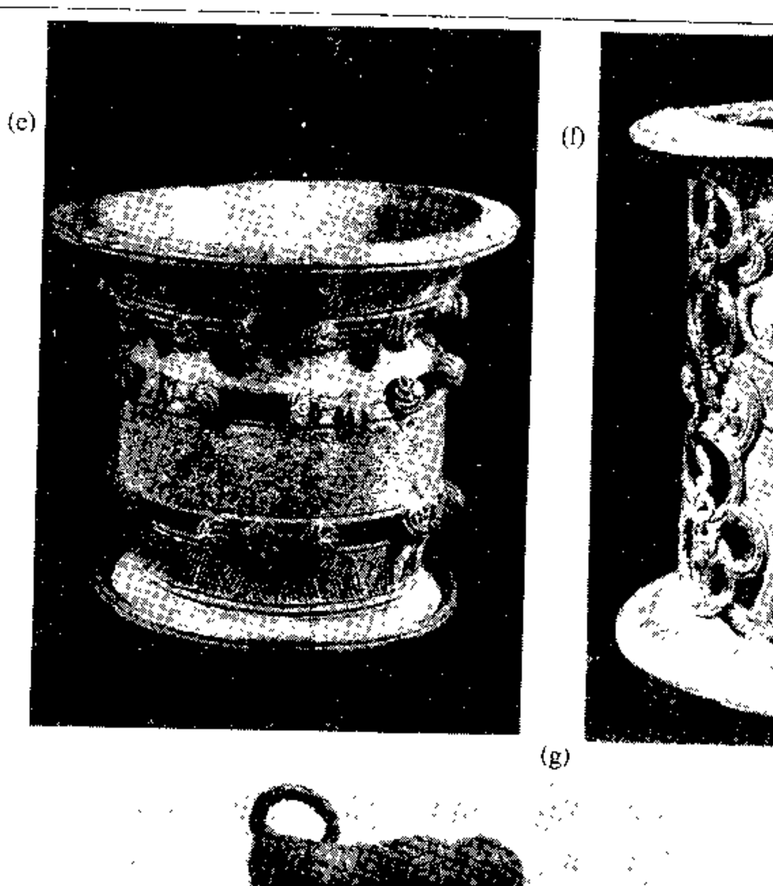
16.1(a)　微型青铜垂饰头像侧面（高 7.5 厘米）

16.1(b)　青铜垂饰山羊头（高 8.5 厘米）

16.1(c)　装在铜棍上的青铜豹子头骨（长 24 厘米）

16.1(d)　青铜悬垂装饰品，形状为一只鸟和两枚蛋，上面的叉形饰物和珠子由铜丝构造（高 21.5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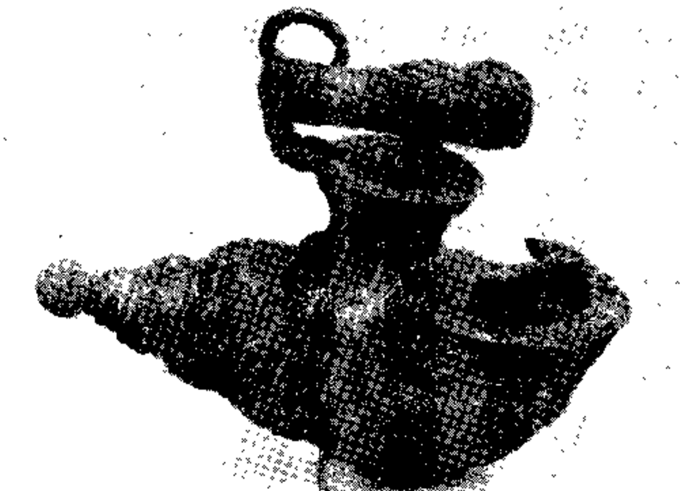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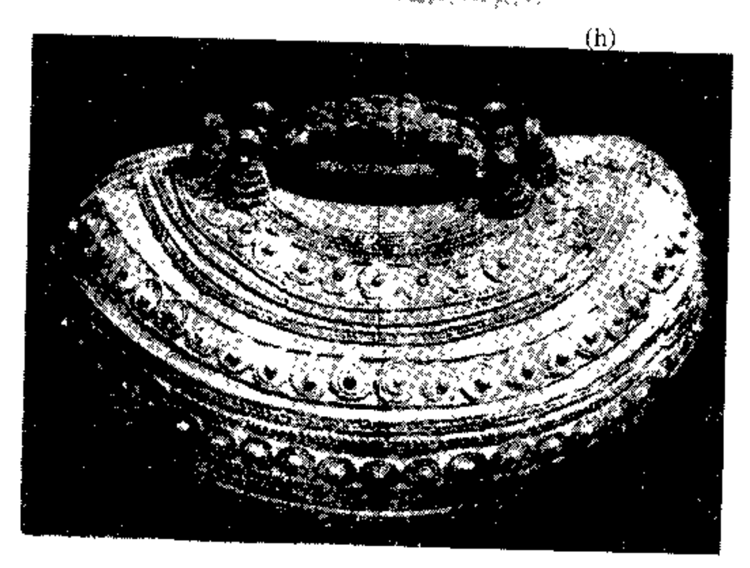
(f)



(g)



(h)



图片16.1　从伊格博－乌库遗址挖掘出土的文物

16.1(c)　青铜圆柱形碗（高20厘米）

16.1(f)　青铜带托座碗（高27.5厘米）

16.1(g)　青铜贝壳，顶带一只动物（长20厘米）

16.1(h)　青铜月牙形碗（长14厘米）

阶段的后150年。[66] 拥有足够财富来赞助杰出艺术作品的那些权力集中的政治和宗教体482 制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因此，重视导致上述事态发展的背景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形成阶段正处于本卷论述的时间范畴内，应当给予适当论述。关于伊费“崛起”的这一问题，涉及一个更广泛的题目，那就是使不少作者感到困惑的约鲁巴城市化的起源问题。[67]

我们可以认为，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期间，尼日利亚的森林地带逐渐由从事薯蓣和油棕种植的农业人口居住；邻近森林地带北边的热带大草原，主要作物大概是薯蓣和几内亚玉米，有些地方则是非洲稻米；在热带大草原北部，薯蓣可能已被蘸草属小米所取代。经过三十代人的时间，由于使用了当地生产的铁制工具，清理丛林地和农业生产的效率大为提高。尽管在约鲁巴人定居的地区尚未展开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挖掘工作来为上面的论断提供考古证据，但是对伊费两处遗址所进行的6次碳－14测定所得出的年代是公元6世纪至10世纪，证实了这段时间当地曾有人居住。[68]

当时的居民看来有三个特征。第一，在进入科学时代之前，所有定居的农业人口都觉得，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和增减无常的农作物产量，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又不能完全理解，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事情以确保土地的生产力和农作物的高产，这是他们农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当时多数人仍认为，要做到所希望的那样只能取决于超自然力量的恩惠。普通老百姓在对付这种潜在危险时往往信心不足，甚至害怕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因此，他们很乐意把此任务委托给专家去考虑，因为专家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没有把握、犹豫不决，况且专家们又自称掌握了必要的专门知识。于是，祭礼和负责祭礼事宜的祭司在社会生活中便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人口处于经常性的增长状态。这不是无意识的，但往往是缓慢的，不过人口确确实实在增长。由于荒年和因永久性定居产生的疾病，人口增长有时也会倒退，对于这些疾病，狩猎者和采集者比定居人口患者要少。但是定居者生育往往更为频繁，定居者妇女生育的孩子多于狩猎者和采集者中的妇女。这种人口增长本身就影响农业生产活动，并使之朝着更有效地开发各种不同生态地区的方向发展。

第三，这种更有效地开发资源的活动有可能导致不同生态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彼此之间又进行产品的交换（如前文原书第438－439页所述）；这将有利于建立一种为公众所承认的内部交换体系。[69] 不同生态地区开发的资源间的相互补充有利于职业的专业化483 和经济的相互依存；地理位置彼此相连的社会各个部分成为休戚与共的整体。这种局面促使建立有关再分配的安排。关于伊费在这种交换网中可能占据特殊地位的问题将在后文再作讨论。

在尼日尔河以西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看来与尼日尔河以东不同。在尼日尔河以东，农民住在位于其耕地中央的分散的农舍中感到安全。在伊格博兰上筑防御工事极其罕见，但在埃及和约鲁巴农村却相当普遍。这表明（我们目前出于某种原因还只能猜想）

---

[66] F.威利特和S. J.弗莱明（S. J. Fleming），1976年。

[67] 例如，W. R.巴斯科姆（W. R. Bascom），1955年；E.克拉普夫－阿斯卡利（E. Krapf-Askari），1969年。

[68] F.威利特，1971年，第366页。

[69] R. McC.亚当斯（R. McC. Adams），1966年，第52页。

在尼日尔河以西的地区，防务的需要迫使农民不得不集中居住在可以步行到达其农田的村庄中。因此，在讲约鲁巴语和埃多语的群体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体制和伊格博的体制颇为不同。由于不同世系的人们居住得很靠近，所以邻里关系开始与血亲关系对立起来，后来甚至超过了血亲关系。亲戚的要求往往在有关防御的需要上对村庄的团结起破坏作用。任命某些世系的人担任村社生活中的特殊职务，如首领、作战领导人、历史学家、发言人和祭司等等，就可以阻止承担亲戚义务所起的破坏作用。这样一来领导职位往往发展成为固定的权威。当这种固定权威一旦在大范围内推行时，它又需要助手和一个管理阶级来协助它执行职能。[79] 难道我们把事情本末倒置了吗？与伊格博的分散不完整的社会体制相比，约鲁巴人早已建立起了等级社会体制，把比例越占越大的生产果实集中在社会的顶端和社会金字塔的上层，这些阶层为了控制生产果实，也许是土地和生产工具，设法加剧村社内部的对立，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倘若情况的确如此：是防务的需要促使零落分散的农业人口集中到村庄，那么出现的威胁又是什么性质的呢？是人口的密度已经达到为争夺农田而展开真正竞争的地步，以至村社彼此间互相威胁呢？还是威胁来自外部，是北方马里、桑海之类贸易国家的商业和军事优势所引起的呢？我们现在碰到的难处之一是我们对约鲁巴兰形形色色的土筑工事的建造年代不甚了解。实际上制定一项考古研究计划以弄清这一情况不会很困难。除了贝宁公元 14、15 世纪的内墙外，讲埃多语地区的大多数土筑工事体系似乎也是为了内部的需要，更像是为了划定界线。[80] 但实际情况可能是：约鲁巴兰的防御工事是在 **484** 当时人们感到有外来压力之后才开始建造的，很明显这是在 1100 年之后，那时马里的统治区正达到它最大范围，它顺尼日尔河而下，扩展到距约鲁巴最北部定居点不到 100 公里的地方。我们现在还只能猜测这些压力最初是如何施展出来的，最大可能是出于对奴隶的需求。肯定发生过马里王国向南掠夺奴隶的袭击事件，但这种袭击最早是什么时候向东发展到约鲁巴兰北部的，尚没弄清楚。掠夺奴隶的重要性在中苏丹要大于西苏丹，因为中苏丹不产黄金。[82] 上文已经提到热带大草原北部的人将树脂黄油之类物品卖到森林地区以换回柯拉果，这种交换体系可能比任何一种长途贸易的时间都更早。一旦这种交换体系建立起来，一旦由于交易者相互间接触，北部地区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完全有可能提供从远处获取的其他物品，这些物品同树脂黄油和别的商品一起，可以推动南方提供更多的产品作为回报。

由于一方面需要建立祭祀体制以确保土地的生产力和农作物的丰收，并需要有祭司这样的人物为他们担当超自然农田管理专家；另一方面又需要将再分配的安排制度化，情况便促使某种形式的祭祀中心出现了。[83] 假定祭司的职能是在村庄一级行使，特别是在交换体系逐渐形成的地方行使，这些专家便有可能越来越多地在交换体系的中心点居住。同样，再分配的需要只能通过市场交换体系来满足。但是在祭司祈求超自然力量的

---

[79] R.霍顿，1976 年。
[80] G.康纳赫，1975 年，第 98－106 页；P. J. 达林（P. J. Darling），1974 年、1976 年。
[82] N.莱维蔡恩，1973 年，第 174－178 页。
[83] P.惠特利（P. Wheatley），1970 年、1971 年。

恩惠以确保土地生产力和居民幸福的地方，他可以期望得到服务报酬，有时是直接酬劳，有时则是给神贡献祭品的形式，不过更多的是两种形式兼而有之，其区别模糊不清。祭祀中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里庙宇和宫殿、神祠和"阿拉芬"（*alafin*）或"奥巴"（*oba*）相互协调的机构合起来成为有效的再分配体系。在参与贸易方面，伊费的"奥尼"（*oni*）没有贝宁的"奥巴"（*oba*）那样明显，其原因可能是伊费的商业垄断在15、16世纪时垮台，还有19世纪约鲁巴多次战争造成的破坏，以及缺乏传统的连续性。贝宁的"奥巴"控制着对贝宁之外的全部个人经营的贸易，并一人独自据有最值钱的贸易商品，如奴隶、豹皮、胡椒、椰仁、珊瑚、以及大部分象牙。但是，**485** 约鲁巴的一首圣歌给我们提示，这首歌把伊费的缔造英雄和第一位"奥尼"奥杜杜瓦描述为靠出口当地产柯拉果和从北方输入马匹而致富的商人。[73]

伊费位于森林地带向北凸出部的中心，[74] 是一个生态环境多样化地区的中心。它坐落在森林地带的肥沃土地上，北靠热带大草原，南临海岸，附近有尼日尔河大河谷，河谷周围还有较小的数条支流汇入南边的大西洋。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伊费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祭祀中心的。它有一位被普通百姓视为神圣人物的"奥尼"，依靠贡品和地方贸易税为生，凭他在宗教体制中的显赫声望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礼仪权力和超自然权力集于一身的体制有可能形成剥削性质的经济上的至上地位和真正的政治权力。因此，当北方的商业需求开始明朗化的时候，伊费是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地位很可能北方的奴隶掠夺者发现在森林中捕人并非易事，很容易受到伏击，而村庄又有较好地自我防御能力。因此，想获取奴隶的人感到从当地公认的当局手中买奴隶要比捕捉奴隶更加稳妥。后来的大西洋奴隶贩子在沿海的森林地带边缘也同样明白了这个道理。奴隶贸易加强了国内的奴役制度，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本身随着这种制度一起成长发展的"奥尼"及其手下一帮人的财富和权力。在遭受外来贸易猛烈冲击的那些没有黄金之类可供出口的合适自然资源的非洲社会、以及在政治权力集中化进程业已开始的地方，奴隶成了最明显可供出口的商品。[75] 据最保守的估计，在19世纪上半叶，经过撒哈拉出口到北非的奴隶每年达10 000人，[76] 而且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这种贸易已经持续了许多世纪。即使在伊费的全盛时期，贩奴的数字较此为少，奴隶贸易也很可能仍然是伊费财富的主要来源。我们无法断定伊费大量青铜制和赤土烧的被捆绑并被堵住嘴的人俑，无头躯体或与躯体分离的头和肢体，是否都代表奴隶，但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如果奴隶制成了社会和商业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为宫廷、富商和官员们提供劳力，那么奴隶也完全有可能被用作保护国王及其自由臣民健康幸福所需的祭品。卖给北**486** 方商人的奴隶也许是用盐支付，但是随着贸易关系的确立，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奥尼"的财富和权力。因而从北方进口的物品中增添了奢侈品，大量其他当地产品也用来进行

---

[73] R.霍顿，1979年，第101页，引自W.阿宾博拉（W. Abimbola），1975年。

[74] 其可能的重要意义首先由T.肖1973年的著作中指出，后经R.霍顿详细叙述，1979年

[75] J.D.费奇（J. D. Fage），1974年。

[76] A.G.B.费希尔（A. G. B. Fisher）和H.J.费希尔（H. J. Fisher），1970年，第60页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6—10章，又见R.A.奥斯汀（R. A. Austen），1979年。

交换、昂贵的进口品中增添的有紫铜和黄铜制品、纺织品、珠子、手镯、剑和马匹。在12世纪中叶，伊德里西还提到从摩洛哥南部向黑人地区出口的商品中有调料、香料和铁制工具。[78] 至于铸黄铜和玻璃珠的制造工艺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不知道。也许一位“奥尼”要求一位在当地居住的北方商人带来一位师傅向他的家庭奴隶传授技艺；也许另一位商人认定建立本地的制珠业比进口现成珠子的手、脚镯子获利更大。无论我们如何看待“奴隶制”，它的定义又如何确定，[79]把它看作是伊费艺术兴起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基，丝毫不会有损于这种艺术。古希腊艺术以奴隶制为基础，我们并不因奴隶制而蔑视这些艺术品。购买紫铜和黄铜制品必须以同样方式支付。因为尼日利亚几乎没有铜，而且有许多阿拉伯史料表明，铜是从北方沿着代价高昂的商旅线路输入西部非洲的，这一情况在本章提及伊格博－乌库时业已经指出。[80] 其他外来的奢侈品肯定也很贵，但是由于它们绝大多数无法留存，因此购买这些东西是用什么支付的问题便不那么突出地需要解答。柯拉果贸易的历史看来很长，[81] 柯拉果和象牙肯定为支付账单作出了贡献，[82] 但是很难想象，除了奴隶还有什么可作为主要的出口商品。[83] 认为奴隶贸易对伊费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的看法，并不意味着国王的统治是依靠从事这种贸易的人。[84] 尽管如此，一旦对外贸易给当地交换系统输入了多余的财富，它便极大地增强了掌握这笔财富分配权的首领们的权力。

有一些迹象表明来自北方的影响：例如，造物主奥巴塔拉（Obatala）是“白种人”的传说；[85] 人们使用的铸铜技术；[86] 以及在尼日尔河沿岸发现的一批“佐埃德”（Tsoede）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大部分可能来自奥沃，[87] 至少有一件是来自伊费的，但是它们的位置是在靠近约鲁巴兰的北方边境，这可解释为表明来自北方的活动的重要性。[88] **487**

在某些古代伊费的艺术和建筑中也看得出和北方有联系的其他迹象，其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拜占廷的晚期/北非的阿拉伯世界。这种“影响”从建筑采用纽索饰和玫瑰花饰图案[89] 以及按照古罗马“中庭”式建筑同样设计建造的蓄水池式建筑中可以看出，[90] 也可以从与拼花和嵌装图案道路相类似的用石块和陶器碎片铺成的人行道中看

---

[78] N. 来维茨恩，1973年，第141页。

[79] M. 梅森（M. Mason），1973年，第453页。

[80] I. 肖，1970年，第278－279页。

[81] N. 来维茨恩，1973年，第181页。

[82] A. 奥巴耶米（A. Obayemi），1976年，第258页。

[83] A. G. B. 费希尔和H. J. 费希尔，1970年；T. 来维基（T. Lewicki），1967年（b）、1971(b)，第657页；R. 莫尼，1961年，第379页；A. G. 霍普金斯，1973年，第78、83页。

[84] A. 奥巴耶米，1976年，第258－259页。

[85] F. 威利特，1970年，第304页。

[86] D. 威廉斯，1974年，第179－203页

[87] D. 弗雷泽（D. Fraser），1975年

[88] I. 肖，1973年

[89] E. 埃约（E. Eyo），1974年，第379－390页。也可能从约鲁巴和贝宁艺术中出现的鱼腿人看出：D. 弗雷泽，1972年。

[90] F. 威利特，1967年，第126页；G. 康纳赫，1969年，第51页。

出。[91]

这些相同之处或许是偶合，况且诸如纽索饰和玫瑰花饰图案那样的东西也很容易独立地产生。同样，蓄水池式的建筑和陶器碎片铺成的人行道也完全可能出自当地人的设计方案，旨在解决烈日、强光以及季节性大量降雨气候下的建筑设计问题。从总体上看、种种迹象的确表明这里的文化有可能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但它不是老掉牙的、站不住脚的"含米特假设"的复活，没有必要非得是大规模轮番进犯不可。[92] 正确的态度可能是把这些东西连同关于它们起源的传说全都看作是外国统治王朝为政治目的强加的，但即使是这种论点也并非绝对必需是如此 [93] 这种种与远离约鲁巴兰地方有联系的迹象，并不能证明伊费的艺术不是土生土长的。铸铜和制珠很可能一直是王室的一种特权，珠子或许与为约鲁巴兰 16 位统治者提供串珠王冠有关，这 16 位统治者凭仗伊费所具有的权威才有资格戴上这种王冠。[94]

公元 12 世纪是古代伊费顶峰时期的开端，与北方世界形形式式的商业需求渗入约鲁巴兰的可能时间正相吻合，而伊费则从这种局面中捞到好处。看来马里帝国离得太远而无法提供这种促进因素 ，因此我们应该将注意力转向早期的豪萨城邦。在豪萨诸国崛起的过程中，经济因素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95] 我们知道，晚些时候，扎扎乌专门向南方掠夺奴隶，也许在早些时候，如今已被遗弃的图伦库城镇遗址曾担当这一角色。这一遗址位于距尼日尔河仅 300 公里的塔达。遗憾的是，我们在考古方面对早期豪萨城邦的情况了解甚少，而且图伦库遗址迄今尚未挖掘。

---

[91] G. 康纳赫，1969 年，第 50 页。

[92] S. O. 比奥巴库 (S. O. Biobaku)，1955 年，第 21－23 页。

[93] F. 威利特，1960 年，第 232 页；W. 法格 (W. Fagg)，1963 年，第 25 页；D. 弗雷泽，1972 年，第 290 页.

[94] A. 奥当耶米，1976 年，第 215 页。

[95] R. S. 史密斯 (R. S. Smith)，1969 年，第 187－188 页。

17 儿内亚地带：喀麦隆山和象牙海岸之间各族人民

B.W. 安达
J. 安克安达 合作

从狭义的史学角度看，在下儿内亚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历史中，公元 7 至 11 世纪是一段寂静的时期。因为无论欧洲还是阿拉伯的文献都没有什么可供参考 的资料。这些文献开始涉及这一领域的时间是 13、14 世纪和 16 世纪。至于口头传说则是距今天越近越可靠，时间越久疑点越大。 488

对艺术、考古、以及有关的人类学（特别是语言学）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对下儿内亚历史上这一早期阶段有新的了解。下儿内亚一些部族的艺术颇有价值地描绘了各个不同时期人们的模样、衣着、武器和建筑，并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部族历史各个阶段独特的情况。

28

本章下文仔细考察上述各种文献和资料，从中了解下儿内亚地区 7 至 11 世纪期间不同类型的地貌，弄清当时各个语种和社会群体 居民是哪些人，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又如何。同时还将研究这些部族本身相互间以及它们和外族之间的关系形式以及外族又是什么人等等情况。

生态环境

下儿内亚通常指的是从作为利比里亚北部和象牙海岸边界的帕尔马斯角到喀麦隆之间那段海岸，它可分为两块自然地带。西半部从帕尔马斯角至贝宁河，地势平坦几乎毫无特色，而从贝宁河至喀麦隆山（640 公里）却是一段低洼地。那块毫无特色的地带是广阔、几乎完全平坦的沿海平原，而河流的入海口大多由于沿岸洋流从东南至西北的流向而改道。在三尖角与沃尔特河之间，一块低洼的台地连接着海岸，在河湾和河谷出口处到处可见座座沙丘。相形之下，泛滥地带构成了包括有数条出海口的经常淹没水中的尼日尔三角洲，由向东的沿岸洋流形成广阔而不断变形的浅水沙洲，还有象克罗斯河、德尔雷伊河这样沿着连绵不断的沼泽地的河湾。 491

尼日尔河三角洲以西多处沿岸地区峭壁矗立，隆起的沙脊把海洋与礁湖分隔。在加纳和尼日利亚，宽广不一的外延沙洲为礁湖的水道提供了有力的屏障。

礁湖北边的大陆海岸，不少地方岩石重叠，断崖险峻。现代的居民倾向于住在高处，而古老的村庄则常常座落在与礁湖相同的高度。

沿海条状地带后面是加纳阿散蒂南部的平原和高地以及多哥和贝宁共和国的低洼台地。阿散蒂高地很久以来一直是西非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高地水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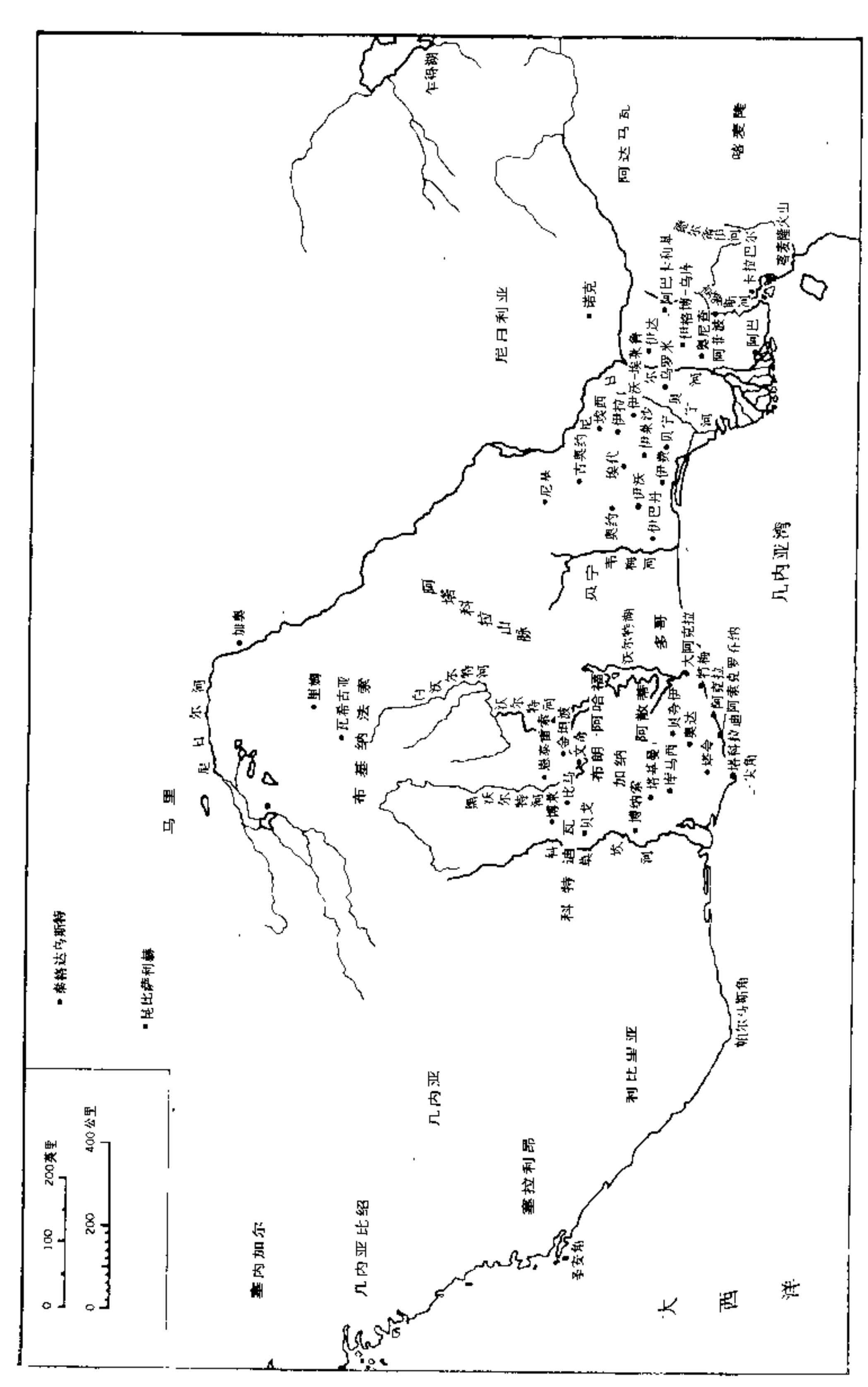


插图17.1 本章所涉及的城镇和遗址

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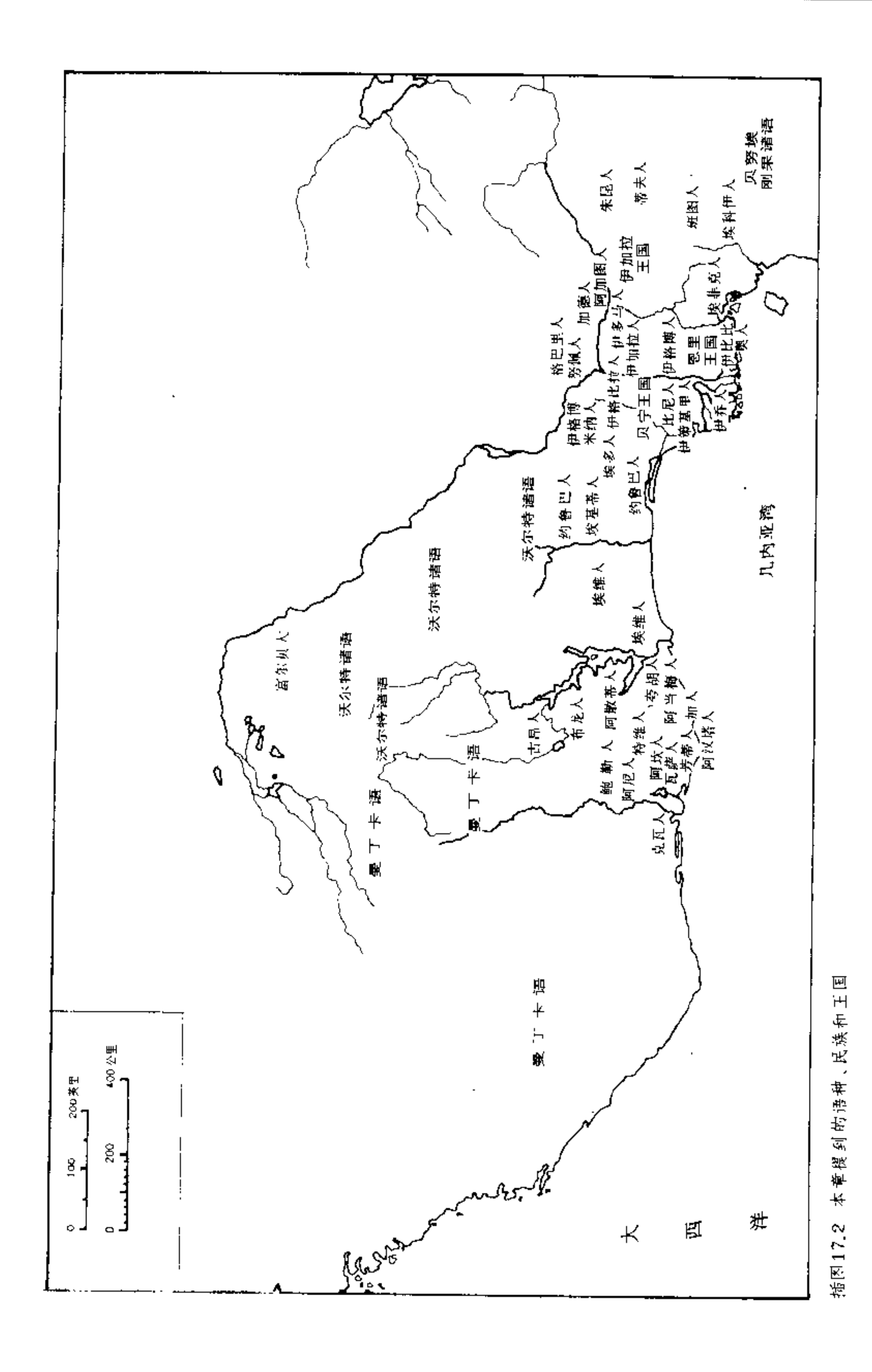


插图17.2 本章提到的语种、民族和王国

源充足，土壤肥沃，并且位于稀树草原林的北部边缘，这片稀树草原林地处沃尔特河流域沙岩陡岸的西边和多哥山脉的南端。从塔科拉迪起始，重新出现稀树草原林，它向东沿着海岸延伸，时出时没，到阿克拉平原才转化成真正的热带大草原，然后顺着干涸的山谷走廊向东北方向伸展。在面积相对而言比较小的沃尔特河三角洲的边缘生长着红树林和沼泽地带的植被。平原上植被稀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雨水缺乏。阿克拉平原与沃尔特河三角洲土壤差异明显，甚至阿克拉平原本身也是如此。

就尼日尔河三角洲总体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混合沉积块，而沃尔特河三角洲与河流长度对比，则面积小得不成比例。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尼日尔河三角洲面积都是大的，尼日尔河的东面有一宽阔的沉积岩地带，以北是阿南布拉河流域，以南是克罗斯河流域。

下几内亚的平原，气候和植被种类远远多于它的地形类别。东面的“干涸走廊”由东北到西南穿过平原，从北部到海边以及在尼日尔河流域，平均年降雨量不足1140毫米。在紧靠多哥阿塔科拉山脉以东的地区，沿分水岭至尼基的年平均降雨量在1270毫米以上，但是往北降雨量就剧减，而走廊东南地区年降雨总量却增至1525毫米以上。降雨量的高低也反映在植被种类的不同。乔木林位于伊巴丹以东和分水岭以南的地区，平原的大部分是空旷的稀树草原林地。植被的稀疏很可能促进了这一地区一些较大国家的发展（诸如约鲁巴兰和如今的贝宁共和国）。

492

语言学和早期历史

考古学的证据，尤其是从地面发现、从神庙（诸如尼日利亚的伊费和贝宁）发现以及从出土文物（诸如加纳的阿索克罗乔纳、金坦波和恩泰雷索；尼日利亚的乌格威勒－乌图鲁、伊沃－埃莱鲁和阿非波石窟遗址）中找到的证据都表明，目前由讲克瓦语和讲贝努埃－刚果诸语的人居住的下几内亚沿海地区和森林地区，过去曾长期是务农者居住的地方，在此之前好几千年则是狩猎者居住的地方。虽然考古学和语言学（同源语言演变史学）证据认为早期居民和如今的居民之间存在着一种总的体形和文化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尚有待于作出精确的判断。之所以要作出这种区分的一个特殊原因是，如今居民中的某些人流传着关于他们来源的某种神话，这种神话倾向于他们来到目前居住地的时间并不久远。

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表明，西部非洲森林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即从利比里亚中部延伸到尼日利亚下尼日尔以远这块1600多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若干部族。他们讲的是一系列相互有联系的语言，其词汇和结构有着根本性的相同之处。这些语言归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中的克瓦亚语系和贝努埃－刚果亚语系。

在中部地区，这些语种中最重要的（即讲的人最多的）是阿坎语（包括特维语、芳蒂语等），在加纳和科特迪瓦占主导地位的是古昂语；加纳南部则是加语和阿当梅语（当梅语）；在多哥和贝宁共和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埃维语，加纳东南部也讲埃维语。按

照 J.H. 格林伯格[①]的说法，在下几内亚东克瓦亚语系的成员包括：约鲁巴－伊加拉语；努佩语族（努佩语、格巴里语、伊格比拉语和加德语）；埃多语；伊多马语族（伊多马语、阿加图语和伊亚拉语）；伊格博语以及伊乔语。克罗斯河正北的地区和沿该河的部分地区讲的是贝努埃－刚果亚语系，后者包括伊比比奥、埃菲克、埃科伊和蒂夫语族。

如果说这些语种都有着词汇和结构的根本性相同之处，这就反映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始语言，也就意味着语言学的证据表明这些地区的早期文化的延续性：——克瓦亚语系在几内亚森林的大部分地区，贝努埃－刚果亚语系在几内亚森林东部和邻近的热带大草原——至于这种早期文化后来出现分化的时间我们还不清楚，但肯定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比较语言学说明，阿坎语以及阿尼语、鲍勒语、查科西语、恩泽马语和阿汉塔语都属于塔诺亚语种，而阿布雷语、贝利比语这类古昂语言则不属于该亚语种。这类研究还表明，沃尔特－科莫埃诸语言（阿坎语族）是其他许多克瓦亚语系语言的真正祖语；多哥相传至今的诸语言与埃维语和加－阿当梅语不相同；阿坎、埃维、古昂和加－阿当梅这些语言形成一个语种与尼日利亚南部的克瓦亚语系关系不那么密切。

尼日尔河与贝努埃河的汇合处被普遍视为可能是东部讲克瓦亚语系语言诸部族的起 **493** 源中心或扩散点，而讲贝努埃－刚果亚语系语言的人据信是后来才从东方来到此地的。克瓦亚语系主要语种的分化肯定发生在很久以前的看法是从同源语言演变史学的探讨性研究中推断出来的。[②]尽管具体时间的推断可谓纯属猜测，但是今天讲这些语言的部族在重要的文化特征上具有相同之处以及表明他们偶尔受到相同影响的证据，都说明该地确实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各个社会平稳分化的时期。[③]除此之外，总的说来，克瓦亚语系诸语有着明显的特色，与其周围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的其他语种十分不同。它们完全有可能是曾经一度被广为使用的语言的残存者。

此外，在 J.H. 格林伯格所说的某些克瓦亚语系语言（如伊格博语）和诸如伊比比奥、埃菲克、克勒等贝努埃－刚果亚语系语言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界线。正如 K. 威廉森所指出，有些贝努埃－刚果亚语系语言（如朱昆语）没有名词系统，而一些克瓦亚语系语言（如多加马语和埃多语）则有名词系统。[④]另一方面，似乎长时期以来关系一直密切的伊格博语和埃菲克语在人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相互大量借用，甚至借用基本词汇。

另外，历史和地理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已经有人居住的森林是后来者渗入的障碍。这种渗入并不是采取大规模迁移的方式，而只局限于一小批一小批的人。尽管这些人带来了重大的文化影响，但很可能在语言方面有时甚至在形体上被当地居民所同化。

除了诸如加纳和科特迪瓦的阿坎－鲍勒人，尼日利亚的比尼人（讲埃多语）、约鲁

---

① J. H. 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1955 年、1963 年（a）。

② 参阅 R. G. 阿姆斯特朗（R. G. Armstrong），1962 年、1964 年（b）。

③ R. G. 阿姆斯特朗，1964 年（b），第 136 页。

④ K. 威廉森（K. Williamson），1971 年，第 252 页。

巴人、伊格博人和伊乔人这些主要族群外，下几内亚地区还有过与上述族群为邻的其他居民。大大小小族群的历史，曾多次交织一体无法分开，有些族群实际上挤进到别的族群之中，大量存在着文化的交叉影响。

公元600年至1100年期间的黄金海岸

在黄金海岸（如今加纳的南部和中部），公元7至11世纪显然是一段形成时期。社会从早于7世纪的史前村庄复合体过渡到公元1200年及此后的城镇化、商业化、具有494 高水平技术的生产复合体。公元600至1100年这段时期表面上暗淡无光，并非是由于这段时期平淡无事（从该地好几个地区收集到的文献详细记述了自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500年这一早期史前时期的情况），而是因为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相对而言不够重视，研究得不够。

史前背景

在基督纪元前最后两个一千年期间，黄金海岸森林地带和热带大草原的各个地区均由村庄居民定居。他们用泥土、木头、石头、铁矾土砖建造房屋，依靠捕鱼、狩猎、采集或“种植”薯蓣、油棕、水果、豇豆、朴树果、橄榄果以及放牧短角牛羊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5] 一方面牧畜的证据众多而且明显，另一方面耕种和栽培的证据却相当之少，这主要是因为热带土壤中很难找到与古代植物学有关的证据。尽管如此，在看到丰富的用于砍树、清林、修地的磨光的石斧和石锄这种技术证据后，人们不得不设想某些块茎植物、诸如当地的薯蓣和某些谷物（几内亚玉米和小米），是很早以前就开始栽培了。

自布龙地区发现原始遗址以来，在被称为“金坦波生产复合体”的所有已知的村庄遗址中，80%已被挖掘。至今所挖掘的村庄面积大小不等，从2000平方米（穆穆泰-布龙遗址）、115 300平方米（库马西附近的博亚西遗址）到21 000平方米（金坦波K1遗址）。就面积和人口而言，其中某些村庄遗址完全可与当今加纳的村庄相比。这些史前村庄的技术和自然经济的状况表示，村庄居民为适应环境作出了巨大努力并进行了专业化分工。有迹象表明，有些特定的地区还被保留着以用来做制陶工场、石器工具工场和粮食磨坊等等。在金坦波生产复合体还发现了黄金海岸雕刻陶器的最早证据。那些以金坦波生产复合体代表其物质文化遗物的人们，正如科林·佩因特在论述古安人与金坦波生产复合体的关系时所断言的那样，并不一定在所有各个地区都讲同一种语言。[6]

确有这种可能性：到了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时，人们已经讲原始阿坎语、原始

⑤ C.弗莱特（C. Flight），1967年、1976年。
⑥ C.佩因特（C. Painter），1966年。

古安语和原始加－当梅语中的一种或多种。从对鲍勒语、阿格尼语、比亚语和阿坎语进行的语言学研究和考古学的相互联系中，有一种越来越大的可能性（但仍待证实），原始阿坎语形成于森林和热带大草原的环境中，横跨于象牙海岸和黄金海岸的中部和南 **495** 部，今天在两地均发现金坦波生产复合体的遗址，很有可能从考古方面证实曾存在着一个适应了生态环境的讲原始阿坎语的群体，在这些人居住的地盘中根本无所谓今天科特迪瓦和加纳之间的领土边界。⑦

对阿克拉平原进行的考古研究表明，晚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和渔民所从事的是捕捉甲壳类动物的经济和制陶的技术。基督纪元前第四个和第二个一千年之间这些人便已活跃于加奥礁湖（特梅）一带；⑧后来他们逐步建造村庄务农定居点，正如加纳大学（莱贡）附近金坦波生产复合体遗址中的克里斯琴村所证实的那样。在拉多库遗址，发现一种与有花纹的陶器有关的晚石器时代的切片工业，紧挨着铁器时代地层下面的一个分层，那里有当梅类型的切雷克切雷特陶器和铝土珠工业，据碳－14测定，年代为1325年至1475年之间。⑨

在绝大多数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小规模的人口流动、贸易来往和文化交流是正常现象，对此必须加以承认。另一方面，除少数特殊情况外，人口从一处向另一处大规模流动的老观点，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部族和文化的起源。在这方面，从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根据看，阿坎人来自埃及或古加纳的老观点，以及加－当梅人来自今日的贝宁共和国和尼日利亚的观点，必须视之为十分牵强附会。⑩

黄金海岸各族人民文化演变的主要里程碑之一便是炼铁技术的开始和发展。对炼铁技术的采用是至关重要的，它使一个社会从农民村舍经济和隔绝于外界的阶段上升为掌握高水平技术，具有大规模农业、多种产业和手工业，建立了复杂的贸易体系和社会－政治体制这些特征的社会。炼铁技术最早的证据发现于贝戈（公元105至255年）和博诺曼索的阿巴姆地方（公元290至350年）。在这些遗址中挖掘到了熔炉的废墟、炉渣和陶器，以及可用于测定年代的焦炭。

公元600年到1100年期间的证据

在黄金海岸的历史上，公元600至1300年这段时期被称为“黑暗的年代”，这样说是因为在近四个一千年的历史中，人们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与其他时期比较，要相对地少得多。但是，所掌握的有些证据使人们得出下述看法：这一阶段基本上属于形成时期，即在这段时间里，开始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相对缺乏重现这一时期历史的 **496** 证据，人们只得根据这一时期之前和之后阶段中的证据作出某些总的推断，并且也允许使用间接证据。

---

⑦ F.多尔芬尼（F. Dolphyne），1974年。
⑧ J. C.东布罗夫斯基（J. C. Dombrowski），1980年。
⑨ J. R.安克安达（J. R. Anquandah），1982年。
⑩ 参阅M. E.克罗普－达库布（M. E. Kropp－Dakubu），1976年；A. A.博亨（A. A. Boahen），1977年。

阿坎兰

博诺曼索附近阿穆奥威的石窟遗址的年代是公元370至510年，略早于本章所论述的时期。但是这一年代与博诺曼索的阿巴姆地方的炼铁年代相吻合。博诺曼索和塔基曼的布龙人的人种历史传说表明，当地人来自阿穆威奥的圣穴或石窟。每年，当塔基曼的布龙人过阿普（*Apoo*）节时，便用歌词来回顾他们的起源的传说：

我们来自阿穆奥威，
祖先的缔造者；
我们是红色母亲大地的儿女，
我们来自阿穆奥威。

从陶器的证据和阿穆奥威出土物的年代表明，约自公元6世纪起，博诺曼索地区的布龙人就在建造永久性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后来发展成为位于博诺曼索的原始城镇和城镇居民区。[11]

博诺索遗址的年代较早，正处于这一时期范畴里。在该遗址开展的发掘工作，[12] 发现了炉渣、铁器和有梳子纹的陶器，表明当时已经存在炼铁业。据碳－14测定，该遗址的年代为660至1085年。文奇的布龙人口头传说断言，其祖先氏族来自文奇附近博诺索地下一个洞里，该洞是被一只称作"万基耶"（*Wankyie*）的长得和猪差不多的四足动物发现的。传说中博诺索象是布龙人祖先建立其核心定居点的地方，后来他们才迁移到阿赫温尼科科（旧文奇），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首都。

属于这一时期的第三个布龙人遗址是位于贝戈的一个原始城镇定居点。据口头传说称，该定居点取名自一个名叫埃富阿·尼亚科的传奇式创始者。尼亚科郊区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碳－14测定的年代为965至1125年。[13] 在该地的挖掘发现了铁器、铜制品、象牙和陶器。陶器的条状花纹和绘画装饰与纽布伊佩出土的9世纪的陶器相似（插图17.3－17.5）。尼亚科的发现反映出公元600至1100年这一时期内的总的倾向，即伴随原始城镇化而出现的工艺和技术专业化，也有可能是在后来几个世纪中变得十分重要的象牙工业和出口贸易的开端。的确，人种考古学的发现表明，布龙地区是阿坎人地区中发展铁器时代农业、冶炼业、城镇化、国家的形成和长途贸易的先驱。[14] 尽管我们对布龙地区公元600至1100年期间的情况掌握很少，但是很明显，这是一段为后来成为布龙文明高潮的时代积极做准备的时期。

499

阿散蒂和瓦萨地区以其显眼的山顶遗址而闻名，这些遗址曾是基督纪元之初到公元1500年期间铁器时代定居点的最佳所在。其中最著名的是（库西马附近的）恩库夸－布奥霍、贝夸伊、夸蓬、奥布阿西猴山、恩苏塔、塔夸、恩蒂里库罗姆和奥杜姆帕拉拉－贝波。这些遗址原是些用栅栏围起来的村庄定居点。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陶器，

⑪　K. 埃法赫－吉亚姆非（K. Effah－Gyamfi），1978年。
⑫　J. 博阿奇－安萨（J. Boachie－Ansah），1978年。
⑬　L. B. 克罗斯兰（L. B. Crossland），1976年。
⑭　J. 安克安达，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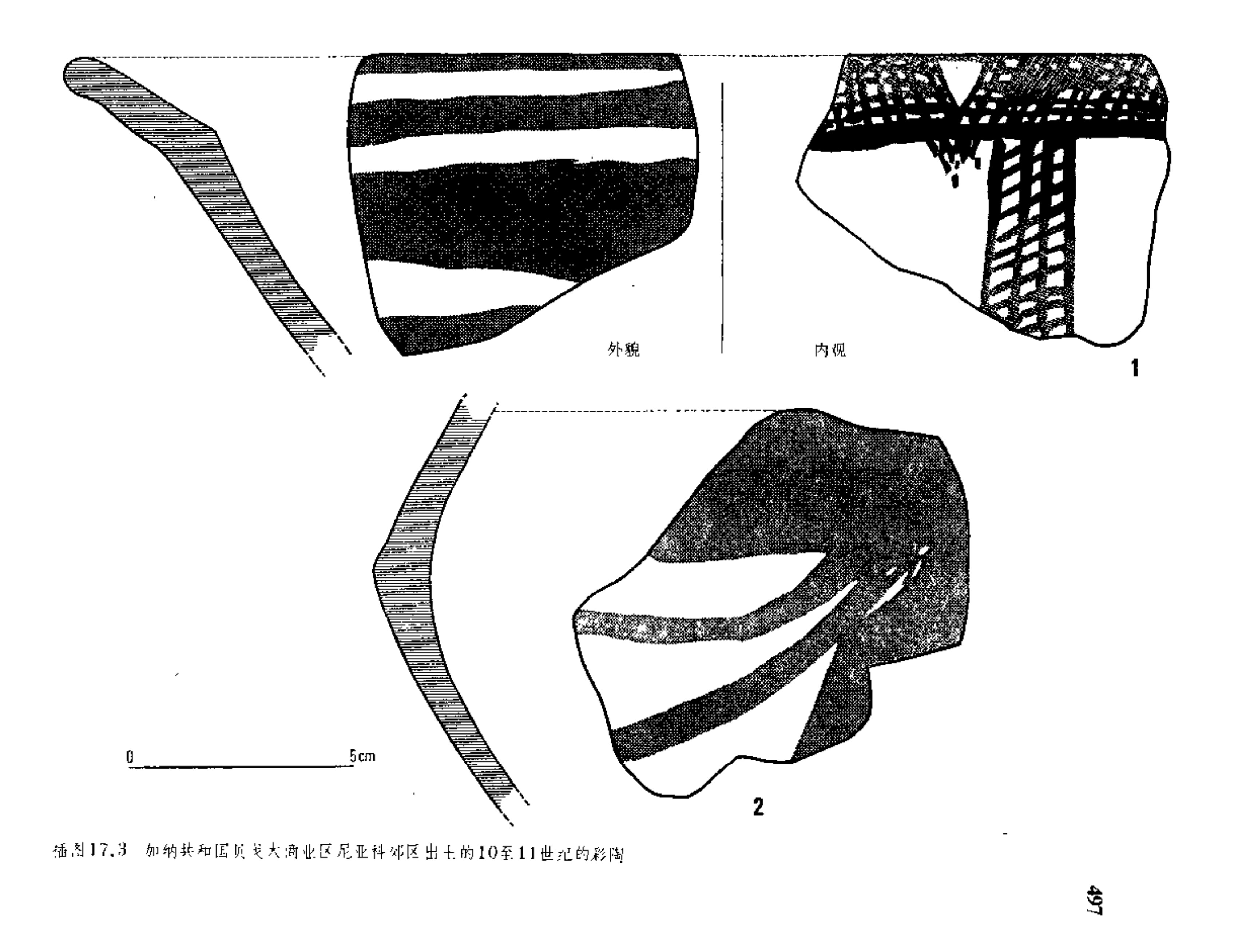


插图17.3 加纳共和国贝戈大商业区尼亚科郊区出土的10至11世纪的彩陶

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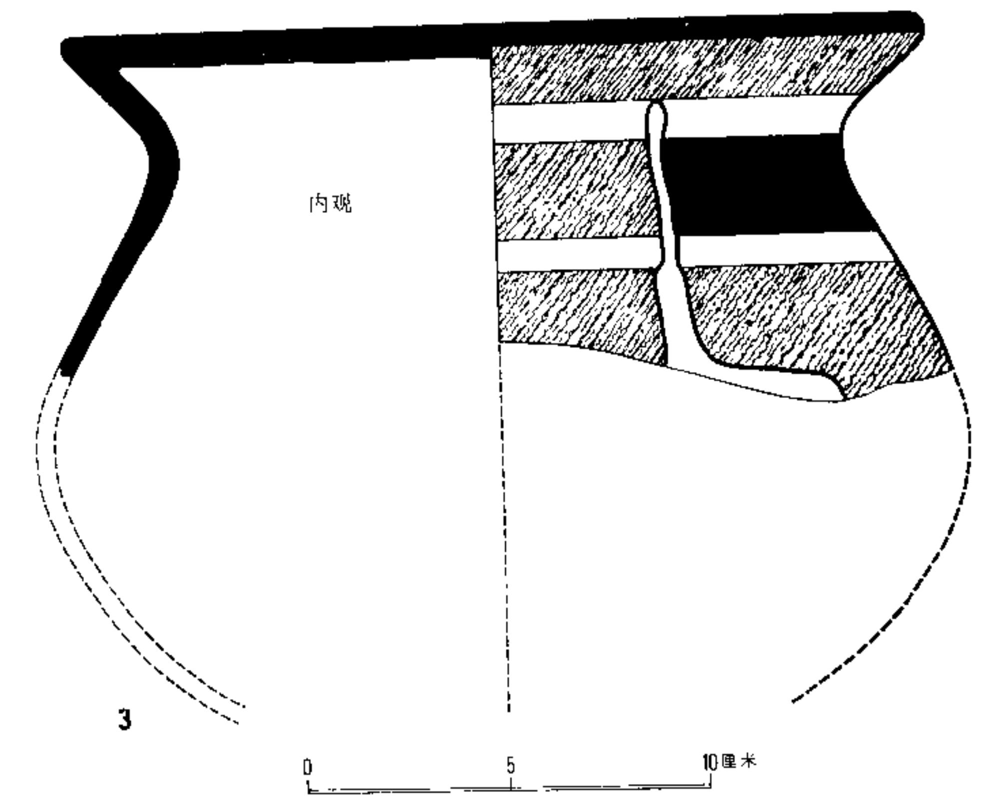


插图17.4　加纳共和国纽布伊佩出土的7至9世纪带有条状和轮盘形花纹的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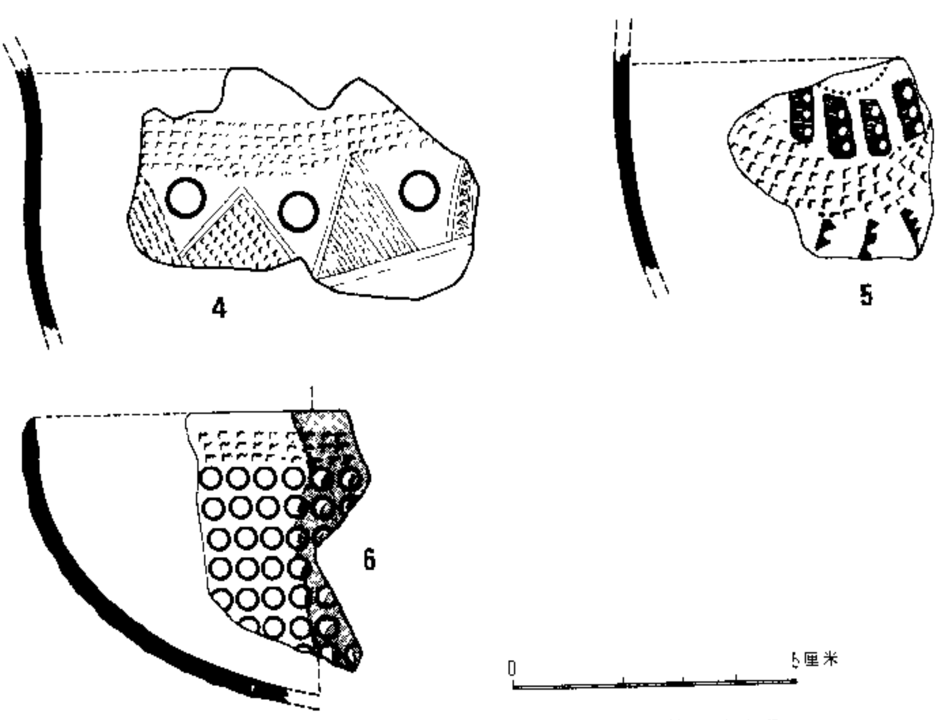


插图17.5　加纳共和国纽布伊佩出土的7至9世纪带有刻印花纹的陶器
（据R·N·约克，R·N·York，1973年）

其边缘外突，主体和边缘均有丰富多采的花纹。在这些陶器的出土处常常可见铁渣、炉体碎片及与年代不符的石器时代遗留物，例如磨光的石斧、石英珠子、细小石器、磨石等，偶尔（如在奥杜姆帕拉拉－贝波）还可见到铝土珠子。尽管尚未对这些遗址中的任何一处进行彻底挖掘，也未曾用碳－14测定其年代，但是根据其独特的古代类型的陶器可以看出它们的年代远远早于公元1600－1900年时期。当时阿坎兰流行的陶器形状是生产复合体用于建筑的罐形工具，用“烟釉”装饰代替了早先生动的主体刻花。奥利弗·戴维斯[15] 把阿散蒂和瓦萨山顶遗址的年代认定为“中世纪”，就非洲传统文化范畴而言，用这样的字眼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库马西附近的恩库夸－布奥霍，山顶生产复合体的陶器看来在年代上是跟随金坦波生产复合体的，这就表明该地区花纹丰富多采的山顶陶器属于公元600至1100年时期或其前后。即使没有其他证据，至少可以说该生产复合体铁器技术的证据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是为在阿丹西、登基拉和阿散蒂等地业已证实的城市化、国家形成和长途贸易这一重要时代作奠基准备的时期。（插图17.6和17.7）

阿基姆曼索和阿夸蒂亚地区以生产值钱的出口矿石而著称。但是该地在考古方面的重要性却在于土筑城堡。[16] 这些城堡的特征是围绕着每个村庄居民点建起一个像防御结构的高大土堤。堤内一边是一条深深的壕沟。这类土筑城堡是阿夸蒂亚、曼索、奥达、阿博敦、科科宾、多米亚布拉等地的共同特征。现已对若干个有土堤围绕的遗址进行了挖掘，试图证实所提出的旨在解释其作用的两种假设之一。第一种假设认为，这些土堤是为了防御目的而建造的。第二种假设认为，它们是给开发比里姆河谷金矿的劳工营地 **501** 建筑的围墙。[17] 似乎持“防御”看法的学派比持“劳工营地”看法的学派更有说服力。最近对阿基姆曼索土筑城堡进行的人种考古学研究，除了发现炼铁的证据、磨光的石斧、珠子和磨石外，还发现了（与阿散蒂和瓦萨山顶生产复合体陶器相似的）边缘外突、花纹丰富多采的陶器。[18]

古安人定居的地方

据口头传说称，夸胡兰在阿丹西人来到该地之前是讲古安语的人定居的地区之一。人们把这些阿坎人之前的古安人称作科迪亚贝人，这是因为他们酷爱建立在油棕种植基础上的自然经济的缘故。传说中提到了带领古安人在该地建立定居点的一些先驱领袖的名字，如阿达穆·扬科、布兰塞姆·迪亚沃、奥迪亚博阿、科萨·布雷蓬和姚·阿韦雷。据说，约在公元1200年，占据着阿夫拉姆平原的古安定居者在加尼博阿福建都，阿塔拉王朝从该地统治着阿夫拉姆平原。当时的人们在朱阿福－阿博坦建立了贸易中心，与苏丹地区展开兴隆的象牙、柯拉果、牛、盐和奴隶贸易。[19] 要弄清这些贸易的性

---

[15] O.戴维斯（O. Davies），1967年。

[16] 同上。

[17] P.奥赞（P. Ozanne），1971年。

[18] D.基亚加－穆廷德瓦（D. Kiyaga-Mutindwa），1976年。

[19] J. R.沃利斯（J. R. Wallis），195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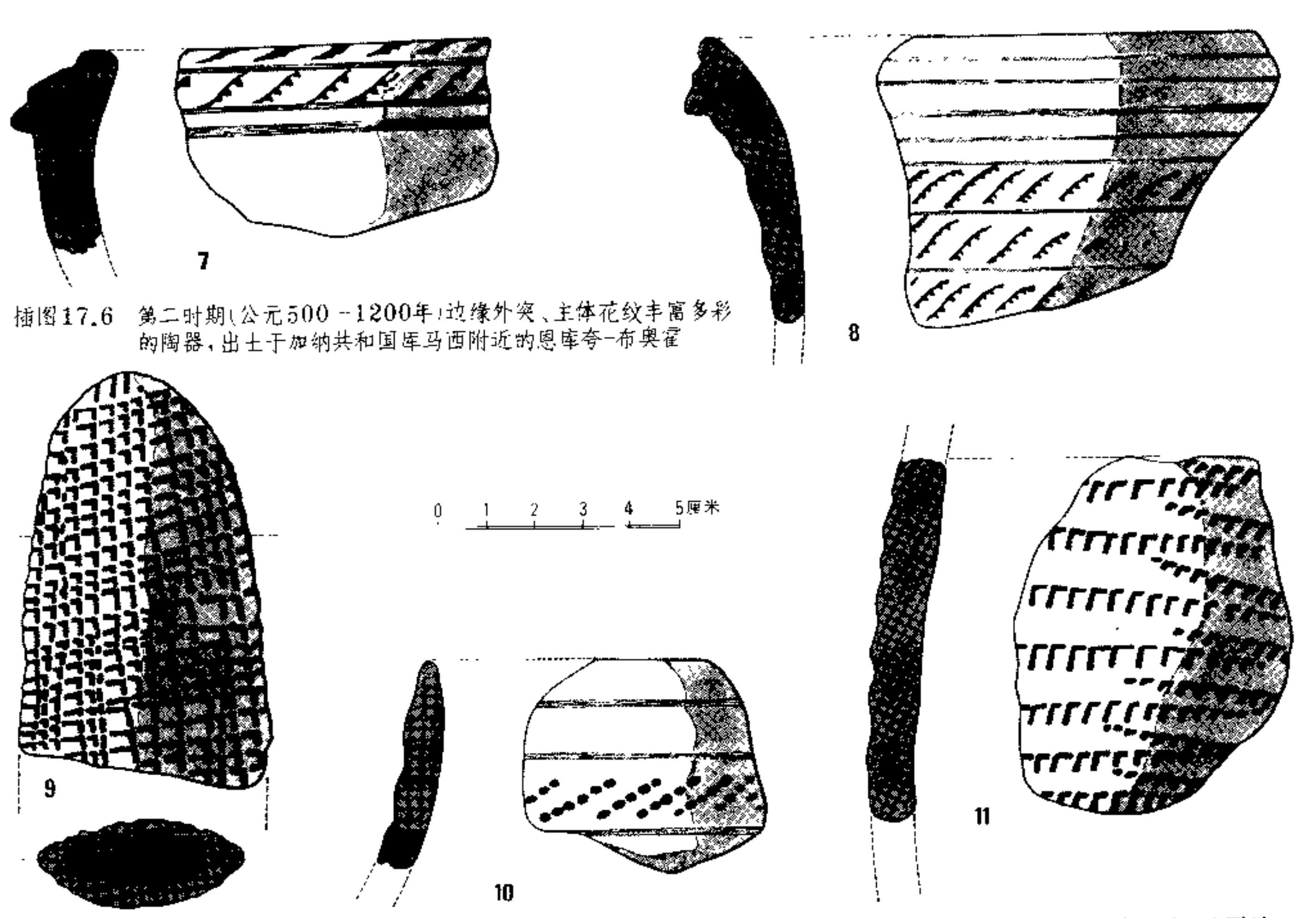


插图17.6 第二时期（公元500－1200年）边缘外突、主体花纹丰富多彩的陶器，出土于加纳共和国库马西附近的恩库夸-布奥霍

插图17.7 第一时期（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500年）金坦波"新石器"时代生产复合体文化的文物，出土于加纳共和国库马西附近的恩库夸-布奥霍。左：锥形工具；右：印花陶器。

质，仍需进行一系列考古工作。尽管如此，在博苏姆帕拉洞穴（这个名称据认为与古安人崇拜的神博苏姆帕拉有联系）以及阿普雷库、泰泰瓦布奥、阿基基乌布奥的石窟还是进行了一些挖掘。[20] 这些考古挖掘工作以及碳－14的年代测定表明，公元1000至1300年期间，在夸胡陡崖居住的是些多面手的狩猎者、渔民、放牧者和油棕开发者，而“烟釉”陶器正出自他们之手。[21]

考古学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古安人时，还有一个人们重视的地区叫基耶雷蓬－达乌。达乌的阿夸彭当地人讲的是古安语，尽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在近代受到阿夸穆和阿夸彭的阿坎人相当大的影响。达乌和阿乌库瓜地区有数不清的大土丘，这是由于当地人长期堆放的垃圾形成的，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1400－1600年。在这些土丘中挖掘到的碎片有：自沙伊进口的陶器、象牙饰品、骨梳、铜和铁制品，以及阿夸巴平顶泥雕。[22] 虽然经测定的这些垃圾堆的年代略晚于本章所论述的时期，但是与遍布阿夸彭 **502** 的土丘有关的文化背景表明，这是预示着阿夸彭丘陵－古安现代国家即将形成的一段奠基进程。

加人和当梅人定居的地方

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和不受偏见影响地对阿克拉平原进行考古和人种语言学研究的话，可以认定加族和当梅族人在该平原定居可能已有一、二千年的历史。[23] 人们甚至可以大胆设想，加人和当梅人是阿克拉平原上土生土长的人。诸如格贝格比、小阿克拉、普拉姆普拉姆和洛洛伏等遗址，虽然年代尚未测定，但所发现的定居点遗迹中有大量并非欧洲进口的陶器，这说明时间是在公元1400年之前的某个时期，而在大阿克拉的首府阿亚瓦索、拉多库和沙伊的一些定居点遗址年代却是公元1550至1900年期间，正值城市化、国家形成和生产复合体贸易体系出现的重要时期（插图17.8）。另一方面，拉多库和沙伊是年代属于公元600至1400年时期的许多村庄定居点的集中处，这些村庄包括切雷克切雷特、阿德武库、泰泰瓦、皮亚诺约和希奥韦约。在阿克拉平原当梅兰的最新研究表明，公元1000年和1300年之间，普拉姆普拉姆、道亨尼亚和沙伊周围的当梅族定居者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放牧、捕鱼、制盐和以种植几内亚玉米为基础的梯田农业），推行一种社会－神权统治的体制，从而导致在公元1300到1900年期间集合城市或双子城镇在沙伊和拉多库纷纷涌现，同时兴起的还有一种以精细的草木植物学、克拉马（*Klama*）谚语式和富有哲理的音乐为特征的文明，以及神权与君权合为

---

[20] F. B. 穆桑达（F. B. Musonda），1976年。

[21] A. B. 史密斯（A. B. Smith），1975年；C. T. 肖（C. T. Shaw），1944年。

[22] T. 肖（T. Shaw），1961年。

[23] 对加人和当梅人的起源问题尚有争议。大力宣传他们来自达荷美和尼日利亚这种观点的人是当梅兰传统的长老们，其中有：卡尔·赖因多尔夫（Carl Reindorf），诺亚·阿库诺·阿瓜伊·阿祖（Noa Akunor Aguae Azu），D. A·普泼拉姆普（D. A. Puplampu），阿达的尼因·洛莫二世（Nene Lomo II），克罗博的S. S. 奥东科尔数长（S. S. Odonkor），沙伊的多里尤穆的拉·尼莫·奥普塔三世（La Nimo Opta III）。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M. E. 克罗普－达库布、E. O. 阿普朗蒂（E. O. Apronti）、艾琳·奥多泰（Irene Odotei）和路易斯·威尔逊（[illegible] Wilson）。

一体的制度。㉔

5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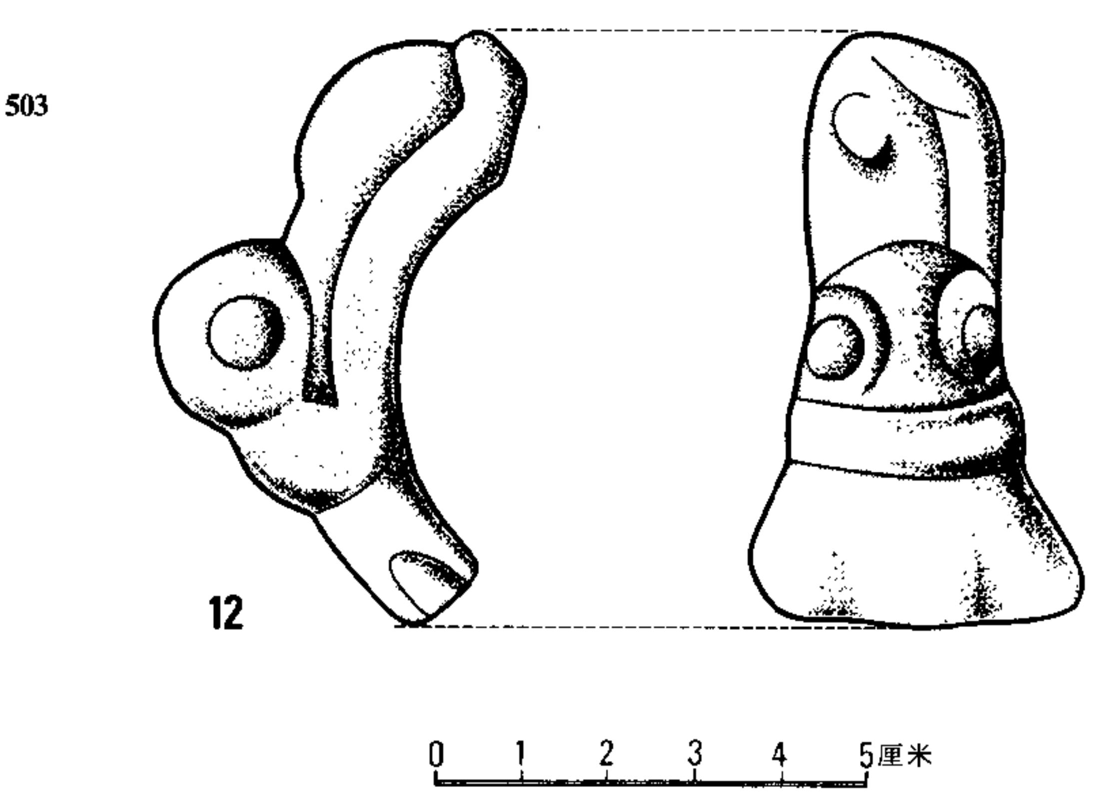


插图17.8 (加纳共和国)阿克拉平原铁器时代中期切雷克切雷特遗址的沙伊地方当梅族陶工,他们是7至11世纪铁器时代居民的遗产继承人,他们制作的陶器饰有风格独特的家畜和人的头像

埃维兰

在埃维兰进行的考察工作，大部分局限于对乌梅－杜加梅、巴托尔、阿梅德佐费－阿代蒂梅、武苏塔和阿帕富等地开展地面勘察。其中有些遗址提供了制作铁器的定居点普遍具有的证据。阿帕富、武苏塔和卡尼埃米遗址有长达许多世纪的时间里传播铁器制作技术的传说，考古发掘获得的证据虽尚未作年代测定，但确实证实了这种传说。尽管如此，正如上文所述，沃尔特河流域的许多遗址都发现细小石器、磨光的石斧和石锄，表明该地很长时间连续有人居住，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会把今天的埃维居民与在古代埃维人定居地区广泛发现的铁器时代和晚石器时代文物联系起来。

早期城镇定居点

据已掌握的证据表明，在如今加纳这个地方，欧洲人到来之前至少存在着两种主要

㉔ J. R. 安克安达，1982年。

类型的城镇定居点：一是商业中心，如贝戈；另一则是国家的首都，如博诺曼索。主要起贸易中心作用的定居点在如今加纳的塔因河－沃尔特河汇合处一带逐渐发展起来。移居来的人们和长途贸易对其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有限的考古勘察表明，在基塔雷、贝戈、比库、古比马和布伊佩等地曾存在过这种定居点。

原来就住在这些遗址的当地人和外来移民双方的演变情况和相互关系，仍有待于通 **504** 过系统的考古挖掘进一步作细致研究。但是目前在诸如贾克帕武阿西之类遗址发现的证据看来是表明，在曼德人到来之前，这个地区人口较多，有一些大的定居点以及一些由几个相互关联的村社组成的群体定居点，这些相互关联的村社已经发展成为以食品和农产品交换为基础交织一体的当地贸易和交换网。

在贝戈的考古挖掘发现，这个城镇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布龙文化，还有证据表明，它受到相当大的外来影响。据M.波斯南斯基描述，这个古城的城区包括常呈“L”形或空心四方形的许多土丘区，这些土丘高一至二米，长达20米。最大的一块城区是布龙人住区，在一公里多见方的地段里有好几百个土丘。城区与城区间相隔一至二公里，由一条露出地面的铁矾土路彼此隔开，据说这便是当时的市场所在地。[25]

还有其他重要的贸易中心，包括比马和博菲，可能是在贝戈存在的那段时间在同一地域发展起来，并主要由于尼日尔河中游贸易而兴旺发达。紧挨着贝戈（比尤）城镇化阶段之前的是早在3500年以前的农业－放牧阶段。所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群体居住于规模相当大的定居点中，使用着金坦波新石器时代的工具。有些证据，特别是陶器，表明在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中期以前（特别是11至12世纪），贝戈周围（以及贝戈城镇化阶段之前）的定居点绝大多数为当地的博诺人群体所占据。

根据M.波斯南斯基的看法，在长途贸易开展起来之前，贝戈也曾作为规模较大些的中心定居点不断发展，其居民为务农而大力开垦肥沃的土地，远在公元2世纪时就这样做了。栽种的作物包括薯蓣和油棕，后来又增添了高粱和小米。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城以布龙（阿坎）人为基础发展起来，兼容了从事各种不同行业的讲沃尔特语和曼德语的人们。[26]

贝戈从11世纪起便成为贸易中心，但一直到14世纪才达到顶峰状态。当时，它拥有500个宅地和5000名居民。它由五块地界分明的城区组成，其中最大的是布龙人居住的城区，方圆足有半公里以上。他们的农田则延伸得更远。

贝戈居民尽管成分复杂，但大部分是当地血统（布龙人和潘特拉人）。除了从一项对后来阿坎人生活的口头传说研究中所推断的情况外，人们对该社会的性质了解甚少。 **505** 尽管如此，口头传说表明，当时已经存在家庭奴隶和活跃的氏族制度。在墓中发现的墓葬品和种种不同的墓葬形式表明，当时对殡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宗教观点。

与许多其他古代定居点一样，博诺曼索（位于塔基曼以北16公里处）是如何建立的，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据口头传说称，博诺遗址最初是由一群住在人们称为阿穆奥威的石窟中的栖居者在公元5世纪前后建立的。按照K.埃法赫－吉亚姆菲的看法，博诺

[25] M.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1973年，第156－162页。
[26] M.波斯南斯基，1980年。

的发展及其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末前后早已在该地存在的各个酋长领地联合成为一个国家的结果。㉗ 博诺曼索并非这个地区出现的最早大村庄和城镇；只不过由于它起着博诺国王驻在地的重要作用，从而第一个取得高于该地区所有其他定居点的地位而已。

博诺拥有适宜于炼铁的丰富的结核状铁矾土矿。考古勘察已至少发现五处铁器制造业遗址，它们离河流的距离都大体相同。其中一处的年代为公元4世纪，另外一些可能属于城镇化阶段。然而，像阿穆奥威那样，在被确定为这一早期年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为数不多的陶器残迹，它们与最早在博诺曼索出土的那些陶器相似，表明比博诺曼索的建都者更往前，还曾有一个社会群体使用过这个地方。

另外，博诺曼索位于热带大草原与森林区连接的地带，热带大草原的物品可以在那里与森林区的物品进行区域性的交换。就国际性贸易而言，此处是载货的牲畜不冒任何健康危险而能到达的最南端的所在，因此它又是外来货物与来自更往南地区的货物进行交换的合适地点。博诺曼索所在的这一地区不仅是曼德商人渴望寻找的产金的源泉，而且也是产柯拉果的源泉。

与贝戈不同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曾存在过一个外来者的城区。这意味着博诺的人口比贝戈的人口在人种成分方面更为单一。博诺的中央机构有效地控制着商业活动，而在贝戈，商业活动则看来是压倒了政治机构。

K.埃法赫－吉亚姆菲通过对陶器的研究推断，博诺曼索可能是一个早期的阿坎人定居点。根据他的观点，博诺曼索地区可能位于南方早期纯阿坎文化群体与北方和西北方早期非阿坎和混合阿坎群体之间的边界上。㉘ 这种看法和语言学方面的证据，说明大致500年以来许多部族和文化群体的延续性。

506

公元600年至1100年期间的约鲁巴兰

在约鲁巴兰，考古研究迄今仍局限于伊费和奥约两地。在这两个地方，只有伊费的城镇化阶段可以追溯到本章所论述的时期。由口头传说证实的考古证据表明，伊费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明显的重要阶段。P.奥赞对此曾作过一些具体的论述。㉙

传说中的约鲁巴城明显地是由好几个村寨所组成，每个村寨包括围绕着一连串面积大小不等的空旷院子建造的房屋，院中一般设置水缸，以便蓄积顺着房顶流下来的雨水。但是城镇与城镇之间有着重要差异，反映出它们在历史上和生态环境上的不同。的确，如果S.约翰逊的看法是正确的话，那么，其中某些差异所反映的可能是各种不同的成长过程。在他看来，伊费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城镇的典型。这类城镇开始时只有一道围墙，四周的农田受一道“伊格博－伊勒”(*Igbo－Ile*) 防护。所谓“伊格博－伊勒”是一道茂密的森林，林中除一些坟地外未被开采过。后来，由于该地的重要性日益增

㉗ K.埃法赫－吉亚姆菲，1975年。

㉘ 同上。

㉙ P.奥赞，1969年。

强，因而受到持续围攻的威胁，于是又建造一道外层防御城墙，以保护农田。[30]

好几位历史学家提出，形成城镇社会和国家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神授王权的制度。P. 惠特利进一步指出，神授王权制度是通过与外界交往的媒介传入，而不是约鲁巴社会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产物。[31] 即便如此，神授王权制度的具体传播方式还不得而知，但人们认为它很可能大大推动了城镇形成的进程。不过，同样是这位学者，却又认为约鲁巴城镇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外界强加的；是内部导致社会分层次的有机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别的地方早已形成的象征性组织结构的延伸。这一论断是否正确，只有进一步通过对该地区有关城镇和村庄遗址进行系统的考古研究才能确定。但是对贝宁和恩里来说，神授王权的观念确实在它们国家体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P. 阿利森认为，约鲁巴兰的石雕和伊费的古典时期有着某种联系，尽管它们在风格上不同于伊费的铜制品和赤土陶器。这一切都发生在伊费周围方圆 100 公里之内的约鲁巴森林中部；埃西则在森林地带的边缘，伊费以北 90 公里左右的地方。在现今热带大草原的九处或更多的遗址里，有两个村庄发现了好几件埃西的雕品。[32]

在内墙和外墙之间的伊费圣林中，竖立着用当地的花岗岩（片麻岩）按照尼格罗种人的模样雕成的逼真雕像。其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伊代纳和奥雷的两座雕像。第三座则在附近一片独立的丛林中，是一个双膝下跪的妇女的皂石雕像。据说，最后这座人物雕像的制作风格与约鲁巴现代木雕的某些手法相同。在两座花岗岩人物雕像周围和奥雷丛林中的空地上还有一组组各种各样的石器。 **507**

在伊费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加过工的立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细长的经过雕刻的花岗岩立柱，被称为“奥帕－奥兰米扬”(*Opa Oranmiyan*)，即奥兰米扬之柱。奥兰米扬是奥杜杜瓦的孩子，是奥约的创始人。该柱曾被修整过（5.5 米高），并饰以成行的铁钉，呈细长的三叉戟形。在中心市场处，竖立着一根高 1.8 米的“奥帕－奥贡”(*Opa Ogun*)，意思是战争与铁之神奥贡的立柱，其形状像一根圆筒形柱子。

伊代纳和奥雷是伊费地区唯一用硬石雕成人物的样品。但在埃基蒂的埃舒雷（伊费东北约 80 公里处）有一组十分相似的雕像，诸如阿巴－伊佩图石雕，共有八座，其姿态相仿，项链和手镯以及服饰也相似，但手法则更具特色。

除了埃舒雷的石雕之外，还在距伊费 50 公里之内的其他一些遗址发现了与伊费文化传统有联系的石雕，如在西边的库塔，北边的伊基伦和西北的埃丰。

在伊费当地还发现了好几个圆锥形的赤陶土头像。所有这一切表明与伊费的石雕传统有着某种联系。现在，有关伊费影响范围更为广泛的证据正渐渐被发现，在东至贝宁、西至贝宁共和国和多哥都发现了典型的伊费陶器碎片铺设的人行道的残存物。但是，P. 阿利森认为那些石雕的起源只能在伊费当地找。

约鲁巴国土上最大的一组石雕是在埃西的伊格博米纳城。该城仍处森林边缘地带之中，尽管向北几英里即是不断推进的热带大草原的前沿，而且森林的许多小块地区已被

[30] S. 约翰逊 (S. Johnson)，1921 年。
[31] P. 惠特利 (P. Wheatley)，1970 年。
[32] P. 阿利森 (P. Allison)，1968 年，第 13 和随后诸页。

草原所吞没。埃西的近代史与其说与伊费有联系，还不如说是与奥约连结在一起的。

但是这些石雕几乎可以肯定是以前的定居者所遗留下来的。埃西人把这些雕像称为“埃雷”（*Ere*），其数目在800以上，尽管谁也说不准究竟有多少，因为有许多雕像的头和胳臂业已残缺不全。所有这些雕像都是用离城不太远的露天的皂石雕制而成。完整的雕像一般高达60厘米，但它们大小不一，从大约20厘米到将近130厘米的都有。

尽管今天热带大草原的伊格博米纳人声称与奥约有着历史上的联系，森林地带的一座伊格博米纳人的大城——伊拉的第一位“奥兰贡”（*Orangun*，头领），传说是当初从伊费离散时奥杜杜瓦的七个孙子之一。与伊巴丹的奥约最后一次冲突中，伊拉站在埃基蒂、伊莱沙和其他森林约鲁巴人一边。

口头传说把上述那些雕像与被奥约征服和殖民化的当地原先的居民联系在一起，这些人是森林居民，受着伊费文化的影响。从好几种常见的雕品特征中都可以察觉到这种影响。

关于伊费自然主义表现手法的赤陶和铜雕，可以有把握地把它们的年代定在公元11世纪。它们肯定是作为对伊费奥尼（*Oni*，国王）的王室祖先的崇拜品而制作的，为此还制做了些很出色的石英凳子和花岗岩独石柱。花岗岩（片麻岩）制作的伊代纳雕像的自然主义手法表现了相同的历史时期和美感。埃西超过800座雕像带有精巧的头饰和其他饰物并大多数是坐在石凳上这一事实，说明它们刻划的也是王室。其创作风格不如伊费雕像那样真实，年代可能也略晚于伊费作品。

问题的关键是找出石雕、赤陶和铜器传统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联系（年代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以及这种石雕传统和西非其他地方发现的雕像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需要在埃西和伊贾拉地区进行考古勘探，以寻找奥约之前的人的定居点，并对这些遗址进行挖掘，还需要对原始材料的来源进行地质考古学的研究。最后，人种志的研究，尤其对木雕和赤陶雕像的研究，将有助于弄清石雕和其他雕像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技术联系。

F.威利特在他关于伊费艺术的著作中注意到了伊费雕品与诺克雕品有许多共同的特征。[33] 他特别着重注意那些自然主义的雕像，并指出，伊费自然主义手法的耳朵造型可能对贝宁自由风格的解释提供一种依据。这一证据，以及其他类似的证据，在他看来是表明了经过两千年以上的西非艺术传统贯穿着时间和空间以及连续性方面的联系。[34] 且不论F.威利特的看法正确与否，约鲁巴显示出是人们研究下几内亚沿海和内地各族人民的合乎逻辑的出发点。他们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城镇定居点类型，讲具有多种不同方言的共同语言，各族都声称来自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崇拜一个共同的众神殿——各地仅仅只是略有差别和强调不同的重点，最后还有一种非常高雅的艺术传统。另外，约鲁巴与随后建立诸如贝宁和努佩这样的邻近王国有关系，并起了重要的作用。 512

---

[33] 某些诺克的特征看来至少在陶器和小雕像传统两个方面是“伊费生产复合体”的预兆。铁器工具和（或）制造铁器的知识甚至有可能是从诺克传来的。与此同时，这类知识最终追溯到来自麦罗埃或西北部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目前掌握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这一观点。

[34] F.威利特（F. Willett），1967年。

看一下尼日利亚南部早期的人口流动状况，便可更清楚地了解约鲁巴人所起的关键性作用。首先，非常明显的是约鲁巴－伊加拉群体早期曾从他们的发源地（后来活动地区的东北）某处向西和向南扩散，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次，伊加拉的传说在叙述他们早期在尼日尔河东岸的扩张时说，这与向东对付伊多马人和向南对付讲伊格博语各族的流动有关。第三，伊索基里人在尼日尔河三角洲西南部所处的位置表明，这一约鲁巴族群的扩张可能发生在讲埃多语的人向海岸扩张之前。

还有人推断讲伊乔语各族早期曾向南渗入尼日尔河三角洲。[35] 这一流动紧接着是晚些时候讲埃多语各族向南和向东曲线移动。再接着是伊格博人向南全面扩张到尼日尔河以西的高地。然后是伊格博人的另一次推向尼日尔三角洲东部沿海地区，后一种流动在奴隶贸易发展时期仍在进行。关于伊格博人为对付克罗斯河以北讲贝努埃－刚果亚语系诸语的人而向东扩张，并可能是在奴隶贸易之后一事，最近才有记载。[36] 这种晚期的伊格博人扩张，部分是与东部高地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有关。上述这些人口流动可能和口头传说中的一系列其他人口流动发生在同一时间，而三角洲地带各个语种混合的现象也暗示了这点。口头传说还表明，埃多人晚期曾向三角洲中部扩张。还表明伊乔人曾从三角洲西部的早期中心地带向东扩散，最后在那里与讲贝努埃－刚果亚语系诸语的伊比比奥人发生了冲突。

关于约鲁巴人起源的口头传说和考古证据都至少表明约鲁巴各族是在伊费地区开始显示出完成族群同一性的可信证明的。上述材料和其他历史资料表明，伊费是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古代约鲁巴人定居点，由奥尼实行统治，这些奥尼们在很长时期内对更大的范围行使着宗教方面的权力。另外，伊费定居点成了随后建立的奥约和其他五个主要约鲁巴城镇的人口疏散地，而且是公元14至15世纪左右贝宁早先的土著王朝的替代者。传说中伊费的建立是由于一支依靠铁制武器优势的入侵族群成功地进入到被称为伊格博的当地族群之中这一事实的结果。

无论对伊费的起源和开端最后作出何种解释，有一点是清楚的：公元7至11世纪，伊费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是约鲁巴人和邻近的比尼人中的佼佼者。某些铜制品明确地把年代定为公元11世纪中期，尽管尚未得到证实，但赤陶艺术的某些作品完全有可能比铜制品的年代更为古老。最近，考古工作正在对我们所掌握的这一关键时期的约鲁巴历史填补空白的环节。 **513**

莱奥·弗罗贝尼乌斯促使人们注意伊费在历史和考古方面的特殊重要性和在那里发现的重要的自然主义手法的雕品，尽管按现代标准衡量，他的考古跟踪工作还不够充分，而且他对伊费起源的解释也不再为人们所接受。[37] 莱奥·弗罗贝尼乌斯主要是在奥格昆丛林进行考古工作，这是一处以制作蓝色玻璃塞青珠为特点的遗址。根据X射线荧光分析，在昆比萨利赫、泰格达乌斯特和加奥都已发现的这类珠子与伊费发现的那

---

[35] R. N. 亨德森（R. N. Henderson），1972年。

[36] G. I. 琼斯（G. I. Jones），1961年。

[37] F. 威利特，1973年，第117页。

些珠子是同样的。[38] 这至少表明伊费和这些苏丹地区的城镇在历史上曾有过某种联系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口头传说支持的考古学证据也表明，伊费的发展有三个明显的主要阶段。从公元前350年起的最早阶段中，伊费只不过是一群零落的小村，按口头传说称，其数目为十三座，[39] 坐落在伊费河谷中的一块土润地带，村民以务农为生。第二个主要阶段是建立中世纪的伊费，这一时期密布该地区的村社肯定有着比早期伊费的自治型村庄更为严谨的社会结构。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城镇化和社会变化究竟是村社之间独立的协议所致，还是由于外部强加的一种新秩序。此外，我们实际上也不清楚，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不过，在伊塔－耶茂的中世纪地层中发现的木炭，经测定年代分别为960年、1060年和1160年。由于这些文物可能是伊费发展过程中早期阶段遗留下来的，因此人们强烈怀疑，伊费城本身及其居民这些早期但却是关键的发展中至少有一些是发生在公元7至11世纪之间某个时期的。显而易见，也是在这一阶段的某个时间，首次建筑而一直保留到今天的道路模式，有通向埃代、古奥约和通过伊莱沙到贝宁的各线

伊费自然主义的雕刻传统至少也可以追溯到960 ± 130年左右。伊费和贝宁还发现精致的玻璃珠工艺品。伊费的本地陶器显得比诺克同类的东西更为精致，特别是花纹多样，包括雕刻（直线、锯齿线、刺印和曲线图案），磨光，绘制，点线压制（用雕好的木头和拧绞着的线）。在制做花纹上还使用或利用圆块石或玉米穗以及泥土条。

514

贝 宁

G. 康纳赫所进行的考古挖掘工作表明，贝宁的围墙是一道划定疆界的蜂窝形土堤，而非防御工事。[40] 这也说明，贝宁城和伊费一样，最初可能是一小群、一小群位于森林中清理出来的空旷地上彼此相邻的小村庄的集聚点。贝宁的每一个居民点都效忠于奥巴（*Oba*），但又各自拥有以其堤防和壕沟围绕起来的农田。环绕城市有一道后来建的内墙和一道年代久远的外墙。挖掘工作表明，内墙建立的年代不可能在14世纪以前，而更像是在15世纪中叶。对该墙所作的剖面研究表明，它掩盖了先前的宅地，横穿了原先的土堤。[41]

另一方面，根据口头传说，外墙是在13世纪晚期由当时的奥巴奥古奥拉所建，考古证据也有把握地确定外墙的年代早于内墙。在地面外表可见的遗迹上进行检定的结果，不仅表明外墙早于最早内的内墙，而且表明外墙的年代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11至15世纪之间。这些防御性建筑的规模，尤其是内墙，意味着在那些日子曾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

从文物中得到的证据，加上口头传说，为了解贝宁历史的这一时期提供了一些有益

[38] C. C. 戴维森（C. C. Davison）、R. D. 吉亚奎（R. D. Giauque）和R. D. 克拉克（R. D. Clark），1971年。
[39] P. 奥赞，1969年，第32页
[40] G. 康纳赫（G. Connah），1975年，第243页。
[41] 同上，第244页。



图片 17.1 一位“奥尼”（国王）雕像上的赤陶土头形，出土于伊费的伊塔·耶莫
（高 26.? 厘米）

510



图片17.2　一座雕像的赤陶土头形，可能是一位王后，出土于伊费的伊塔—耶茂（高23.1厘米）

511



图片17.3 在伊费的伊费瓦拉路旁发现的一个赤陶头形
(高22.5厘米)

的线索，正如P.J.C.达克综合前人研究贝宁艺术和技术状况的努力所作出的颇有裨益的总结那样。[42] 显然，不论是从已知入手进而转向未知(具有强烈贝宁特征的青铜制头像，1897年之后仍在制作，这些头像被认为是年代最近的)，或是一开始就接受下述推测：最早期的贝宁青铜头像与伊费青铜头像的形状最为相似，倘若人们真同意把某些口头传说作为实际情况的标志的话，那么出现的结果往往是几乎相同的。

根据P.J.C.达克的设想，包括木雕在内的本地艺术始于埃雷统治时期，他是第二位奥吉索，属于当时王朝之前那个王朝。研究贝宁历史的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当时这个王朝是奥兰米扬缔造的。后者是伊费的一位王子，也可能是一位虚构的人物，他是在公元1300年缔造这个王朝的，[43] 或者还要早一些。在此之前已有十七位奥吉索的说法被人们接受，[44] 因此（假定每位国王平均在位二十至二十五年）他们中的第二位——埃雷开始统治的年代应在公元900年和980年之间。[45]

515

据P.J.C.达克记载，埃雷采用了木制的纪念头像，放在祖先神龛上面。他还采用了王位（*ekete*），长方形酋长凳（*agba*），羽毛方扇（*ezuzu*），树皮和皮革制的圆盒（*ekpokin*），象征权力的剑（*ada and eben*），串珠踝圈（*eguen*）和项圈（*odigba*）以及一种式样简单、没有花纹的王冠。雕刻师（*igbesanmwan*）和木匠（*onwina*）行会的建立也是在埃雷的时代。[46] 前者被视为木雕和象牙雕的艺术家，后者则被看作是工匠、生产日常用的不带刻花的炊具，如木头盘、碗、臼和杵。[47]

如果上文所说的没有错误，这就意味着贝宁社会在埃雷统治时期已经发展到需要有艺术家和工匠正式组织的地步。除此之外，承认祖先作用对活人事务的影响，似已成为贝宁人信仰的一部分，这从祭祖时制作木头头像作为象征即可见其一般。因此，可以认为制做祭祖头像的习惯，在铸铜工艺于奥古奥拉在位期间传入贝宁之前，已存在了350年或450年左右了，也就是说，在开始制做青铜祭祖头像（作品一直留存至今）之前很久就存在了。尽管人们不能确定贝宁持续制做青铜头像始于何时，但P.J.C.达克指出，如果接受公元950年是奥吉索统治时期开始的年限，那么制做青铜头像开始的年代应该是14世纪的第一个25年前后。如果奥吉索统治时代开始得更早，那么制做青铜头像的年代也可能更早（或许在13世纪）。

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即便目前掌握的关于奥吉索的口头传说不够准确，人们仍有理

---

[42] P. J. C. 达克（P. J. C. Dark），1973年。

[43] R. E. 布拉德伯里（R. E. Bradbury），1959年。

[44] J. 埃格哈雷扶巴（J. Egharevba），1960年，第75页。

[45] 贝宁的宫廷史学家J.埃格哈雷扶巴认为，奥吉索统治时期之始是前一个年份，即公元900年。但他却认为当时这个王朝的开端比P. J. C. 达克提出的公元1300年要早130年。如果J.埃格哈雷扶巴确定每个奥吉索统治的时间的长短以20或25年为单位计算的话，他就会把埃雷开始统治的年代确定为公元850年或720年。如果J.埃格哈雷扶巴对国王在位年代的计算是从葡萄牙人入侵时在位的奥佐卢阿开始到奥冯拉姆温为止基本上是正确的话（大多数人认为可能是正确的），那么二十一位国王统治的时间总共为433年，这也意味着每位国王平均统治二十多年。如果按J.埃格哈雷扶巴所说的那样，时这个王朝最初的二十六位国王是从1170到1914年在的话，那么也会得到同样的平均数。参见J.埃格哈雷扶巴，1960年，同前

[46] P. J. C. 达克，1973年，第8页。

[47] J. 埃格哈雷扶巴，1960年。

由设想，早在当时这个王朝诞生以前雕刻艺术业已巩固地建立起来，而且雕刻家在他们的技艺中已包括为祖先神龛制作木料头像。进而言之，为纪念已故国王们而引入制做青铜头像的阶段也已开始很久。另外，制做青铜头像的技术虽然是在奥古奥拉在位期间传入贝宁的，但口头传说却说青铜艺术品在这位国王在位之前业已由伊费传入贝宁。516 至于这发生在奥古奥拉统治之前多久，目前尚无人知道。但是，在贝宁发现的不是那里收藏的青铜头带有伊费艺术家的印记，而是有少许别的式样的作品，被说成是具有明显的伊费特征，它们可能代表所有留存至今的从伊费运入贝宁的物品。㊽ P.J.C. 达克指出，在伊费没有发现这类物品，但是，找不到存在的痕迹并不说明未曾制作过这类物品。㊾

由此看来，贝宁城的出现显然主要是由于一群铁器使用者极其成功地利用了当地环境的缘故。虽然贝宁城的起源仍难确切断定，但其年代大致是在基督纪元目前这一千年开始的时候。现在人们所知道的线条形土堤和城墙构成复杂的网络，还说明该城和伊费一样可能是经过一个缓慢结合的过程，才把效忠于某一个中央权力的分散的村庄逐渐联合在一起，直到“奥巴”埃乌阿雷在 15 世纪时建立了一个有正式防御体系的真正的城镇单位。

尽管有些口头传说称，埃多人是前不久才从埃及来到目前的居住地，并在那里和来自苏丹地区的人汇合的。但语言学方面的证据却表明，埃多人在目前的居住地居住已有近 4000 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的大多数岁月里，村庄定居点构成基本政治单位，其基础权力格局是男性同龄会组织，这种同龄会组织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都是自主的。

这种格局简单的社会组织后来被发展起来的王权统治和更为复杂的政治单位所代替。至于导致在原来的村庄结构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些权威人士认为，这是受比它古老的而又相当邻近的约鲁巴兰的影响，因为约鲁巴兰多年来一直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位或王国。另一些人则认为，该地区有比较大一点的政治单位独立发展的特点。另外，埃多地区大的定居点的发展是与政治组织层次的演变同步进行的，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人们知道大约在公元 10 至 13 世纪期间，诸如乌多、乌罗米和贝宁这类城镇已朝着城市化的方向发展了。

紧接着这一初期阶段之后，是早期城镇的“拣选清理”阶段，包括某些激烈的政治竞争在内。在各酋长领地激烈竞争的这一阶段（公元 1170 年），其明显结果是约鲁巴兰 517 的一个外来王朝进入了贝宁。这个新王朝明显地是贝宁崛起为该地区的主要城镇居留地这一进程的开端。㊿

贝宁城的兴起，其社会、文化的发展，可以确切地称之谓比尼文明的开始。这一文明的标志包括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有效的防御体系，对外贸易的开展，宗教和——最为重要的——精细的艺术和手工艺。

㊽ F. 威利特，1967 年，图片 89、97－99。

㊾ P. J. C. 达克，1973 年，第 8－9 页。在葡萄牙人到达几内亚海岸之前，铸造者所能获取的铜数量肯定很少，这可能使人们为了得到铸造新物品的原料不得不熔化已制成的东西，因此一方面留存至今的最早期祭祀用青铜头像确有可能是奥古奥拉在位之后铸造的，另一方面把这些物品的年代都确定在奥古奥拉统治时期之前的某个阶段则肯定是不对的。

㊿ A. F. C. 瑞德（A. F. C. Ryder），1969 年，第 7－9 页。

伊格博-乌库和恩里"王国"

尼日利亚青铜器的最早珍品已在尼日尔河以东的伊格博地方出土。在有控制的挖掘过程中，将近上百件的有独特视觉效果的青铜器分别在尼日利亚东南伊格博人居住地北部小型居民点伊格博-乌库和伊格博-乌库以东24公里处的埃齐拉出土。[61]

在伊格博-乌库和埃齐拉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制品带有对应的标记，各种各样被描述为权杖头，带踝圈的人物小雕像和对应的标记，象牙，以及代表飞蝇、甲壳虫、蚱蜢（蝗虫?）卵和豹、象、公羊、猴子、蛇和蟒等动物头像的青铜制品得到发现。还有数以千计的陶器碎片，其中也能找到一些完整的陶器，甚至发现一座墓室，死者埋在包括珠子在内的大量陪葬贵重物品之中，呈端坐的姿态。

伊格博-乌库的青铜制品绝大多数体积小，一些直径约为40厘米的器皿除外。人像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件样品，包括一尊天门神头像，一件脸部垂饰，一尊骑士雕像和两个"祭坛"底座正面的雕像。伊格博-乌库的独特之处，远远不止表面的特色，好几种制品的风格表现了反映尼日利亚东南部地区独特的物质文化趋向

存在许多象征性手法的要素，如花边串珠、新月状和双螺旋状图案、展翼鸟类图等，与西南地区的艺术风格颇为类似。伊格博-乌库存在这类东西，可能是具备西南传统的预兆。这一遗址的年代据测定为公元9世纪，因此就比伊费更早，而伊费又被认定为代表尼日利亚金属制造业的主要传统开端。

此外，伊格博青铜制品的金属成分也颇具特色，其青铜成分中习惯于掺铅，与西南部地区制铜的特点明显不一样。伊格博-乌库全部出土文物——包括陶土、玻璃、铁和铜制品，有可能是一位古代伊格博统治者的陪葬品，他所控制的地区超出了伊格博的北部地域。

520 M.A.翁韦杰奥古关于考古发现和现存文化之间联系的细致研究，说明史前文化和现存文化之间有着某些非常密切的平行发展之处。[62] M.A.翁韦杰奥古确实借助了史前和现存文化这两方面的证据，加上恩里口头传说中零散的证据和已知的恩里人后代在伊格博兰散居的情况，他力图重现从已知的最早时期到18世纪之间恩里人的社会-政治组织状况。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伊格博-乌库及其邻近地区的恩里人曾建立起一种国家体制，之所以能持续存在和制度化靠的是对宗教仪式信条的控制。[63]

考古和非考古途径获取的所有证据都表明，恩里人在伊格博兰建立起来的霸权和优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其控制手法是建立在宗教意识形态、学说和信条之上的。长矛、棍棒、弓箭、短剑和锄头都变成了祭祀用品，而禁忌和厌恶也往往与流血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抑制了黩武主义。恩里王国采取把恩里人大量送往其他居民点的办法成功地进行了殖民和扩张，同时通过举行宣誓仪式获得这些新居民点对埃泽-恩里

---

[61] T.肖，1970年。
[62] M.A.翁韦杰奥古（M.A.Onwuejeogwu），1974年。
[63] 同上。

(*Eze Nri*)的效忠。埃泽－恩里的意志不是通过军事的力量，而是通过宗教的和神秘的制裁来贯彻执行的。

口头传说把地方政治体制的渊源归之于恩里，特别是一种称作奥佐（*Ozo*）社的获得头衔的男人的联合会。至今仍经常进行宗教仪式和授予头衔的纪念活动还对该城表示效忠。权力掌握在称为埃泽－恩里的统治者手中，他与势力范围之间的联系靠专职清除邪恶和授与领导权的巡迴教士维持。恩里政体权力集中的结构在伊格博历史中颇有独特之处，它与所属机体（诸如各奥佐社）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十分清楚。虽然埃泽－恩里的权力结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各头衔社在地方决策事宜中继续起着基础结构的作用，而不顾殖民当局或国家的政府机制。

恩里的影响超出了伊格博北部核心地区而达到了尼日尔河西岸的各伊格博定居点以及历来受贝宁统治的下尼日尔各社会。奥尼查就是其政治体制既受恩里启迪又受比尼影响的典型地方，两者交锋的结果是一种结构上的模棱两可。[64]

在重要人物墓中发现的铃铛，是等级和权力的首要标志。伊格博－乌库和埃齐拉的出土文物突出表明了这一惯例。这种惯例无疑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期。埃齐拉是一个强有力的神殿中心，人们把该地视作是死者灵魂安息之处，这一事实反映各种权力结构都可聚合在铜铃或铜钟这一概念之下。

在尼日利亚东南部毗邻地区存在着一组并行的物品。在北方，伊加拉国王们的墓葬 **521** 中所用的陪葬品中包括一些御用的铃铛。在阿罗人统治下的伊格博东部地区，携带铃架或钟架使者的到来表示重要人物的来临。居住在伊格博和伊加拉边境上头领们所用的是特殊的铃，在这些地区，钟和铃还是神祠摆设中到处可见的东西。

由于受到伊格博－乌库出土文物的启发，根据对文物风格的分析和人种历史调查所作的近期研究表明，的确有可能存在着一个与西南部视觉印象不同的东南部青铜器群。在尼日利亚、美国、英国和欧洲的博物馆中收藏的东南部青铜制品中有些可使人联想到伊格博－乌库的先例，并与传说中的伊格博政治和宗教体制中有价值的物质文化是相符合的。收藏在尼日利亚的那些尚未弄清来源的青铜制品中，钟和铃是最为重要的物品。[65]

伊格博－乌库、伊费和贝宁的青铜浇铸工艺有一些类似之处，例如它们都用公羊头和大象头做主题，但也许从艺术史的角度讲，这些都没有重要的意义。相反，装饰和结构的具体细节可能更为重要些。例如，梯形的连续线条中夹带着长点是伊格博－乌库青铜制品和下尼日尔“猎人”风格青铜制品中很普遍的花饰。值得注意的是，O.维尔纳的分析也表明，柏林博物馆收藏的大多数下尼日尔的人像，与伊格博－乌库的相

---

[64] R. N. 亨德森（R. N. Henderson），1972年，第297页。

[65] N. G. 尼赫尔（N. G. Neaher），1979年。可能性是一东南部的青铜制品是通过某种树胶成型方式制作而成的，这一点应给予认真地考虑，因为确有文献记载着几个族群采用树胶成型方法的证据。伊格比拉人、蒂夫人和伊加拉人都采用从当地的榕属植物品种中采集的橡胶。伊格比拉人和蒂夫人制做的青铜器清楚地反映出一种恰当的溶液的痕迹。耐人寻味的是，最早的有著述的伊格博青铜器研究者推测说，当时人们可能采用橡胶乳来制作模子。胶乳技术采用的中心地区位于盛产橡胶树木的地方，即热带大草原。在尼日利亚一地就发现了二十多种这类榕属植物。

同，是真正的青铜器。[56] 而贝宁的制品则几乎是纯黄铜的，其中锌的含量有与日俱增的趋向。

所有这一切看来都是支持威廉·法格的论断，即西部非洲的金属冶炼工艺中存在着两大类不同的风格。尼日利亚中部的伊费/贝宁/当今的约鲁巴，侧面与采用腊或树乳的细线制作模子的传统相连接。在伊格博－乌库的文物测定年代之前，人们不清楚这些工艺传统中究竟那一种最先确立。现在看来是伊费/贝宁传统侵入到更为古老和不同传统的地区去了。正如业已证实的较晚期的金属冶炼工艺传统那样，伊格博－乌库的铁器制造工艺传统很有可能与伊费/贝宁和诺克的传统不一样。

伊格博－乌库的出土文物清楚表明，尼日利亚东南部铁器制造工艺的年代至少可以早达公元9世纪，而且有一切理由认为比这个时间还要早。铁匠在现在和过去都是一种技术精湛的职业，而且经常被某些社会群体或家族控制。近代最有名的伊格博铁匠来自（奥尼查以东的）阿夸地区。这些人显然最初是从阿夸以东乌进的伊格博炼铁者那里获得铁矿石的，只是很久以后才得到欧洲铁的供应。伊格博的冶炼中心还有阿比里巴（地处伊格博东部克罗斯河一带）的冶炼炉以及铁匠们和铜匠们，坐落在奥基圭－阿罗丘库山岗附近；还有在该地区南部恩奎雷的铁匠们。[57]

522

在阿夸地区进行的一次挖掘出土了十五件铁锣和一把铁剑，它们与阿夸铁匠们仍在制作的东西很相似，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铃铛和其他物品，这些东西不能简单说成是出自阿夸铁匠之手，它们的年代在1495年前后的95年之间。[58]

伊费和伊格博－乌库之间在时间和文化上存在着何种关系，目前我们仍不清楚，尽管F.威利特认为伊费的年代有可能远远早于现在人们所知道的时间。甚至可能比现在的证据（公元10至12世纪）所提示的还要更接近诺克。[59] 的确，如果伊费的珠子就像尼日利亚南部人种志证据和莱奥·弗罗贝尼乌斯所讲的那样，[60] 是与几内亚海岸的“阿科里”珠子相同的话，那么，伊格博－乌库的玻璃珠就有可能是在伊费制作的。情况如果真是这样，就意味着伊费文化的年代至少可追溯至伊格博－乌库文物的年代（公元9世纪）。如果乍得湖流域达伊马的某些陪葬品反映的是伊费和达伊马之间的贸易往来的话，那么文化的对应情况很可能在确定时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伊费的年代就有至少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可能性。[61]

出土的青铜器和珠子反映了当时经济富裕，青铜制作者的高超技艺，也表现出该地卷入国际贸易网络的程度究竟有多深。T.肖曾提出，有些珠子甚至是从威尼斯进口的，但大多数则是经北非来自印度。这类进口物品构成了国际贸易的一大内容，它还涉

[56] O.维尔纳（O. Werner），1970年。

[57] D.诺思拉普（D. Northrup），1972年。

[58] D. D.哈特尔（D. D. Hartle），1966年，第26页；1968年，第73页。

[59] F.威利特，1967年

[60] L.弗罗贝尼乌斯（L. Frobenius），1912年，第318－319页。

[61] G.康纳赫，从第173页起。在此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伊费在石雕、玻璃工业和某些建筑特征（陶器碎片铺的道路）方面的传统存在着中断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年代在公元6世纪和公元9世纪之间的达伊马（小雕像和陶器碎片铺的路）文化上的中断现象非常相似。

及到铜的进口。根据同一作者的看法，青铜器的原料，即铜和含铅青铜，进口自塔凯达以及撒哈拉沙漠中更为遥远的铜矿产地。[62] 一方面这样一种国际贸易完全有可能存在过；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M.A. 翁韦杰奥古曾指出，这种原料在阿巴卡利基和卡拉巴 523 尔就可以得到，因此也有可能是来自这两个地方。[63] 情况如果真是如此，就需要解决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些原料产地中哪一个首先被伊格博－乌库工匠们开发？是当地的还是外国的？又是什么时候开发的？

在没有发现支持相反论点的证据的情况下，T. 肖认为可以合乎情理地推断：伊格博－乌库青铜器的制作或是出自伊格博－乌库当地的伊格博人之手，或是出自伊格博兰其他地方的伊格博人之手，两者必居其一。但是，他强调说，所使用的原料和工艺则是从外界传入的。按照他的看法，青铜铸造中的失蜡浇铸技术十分复杂，可能是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传入西非的。[64]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这一论点的赞同者也还需对此加以证实，他们有责任这样做。问题在于：仅仅由于工艺程序复杂，因而伊格博－乌库或任何西非的青铜铸造者（萨奥、乍得湖以南地区和加纳的铸金地）都没有可能单独发现它，这样的说法并不足以作为证明。

古代伊格博－乌库、伊费和贝宁的物质文化，经常被看作是代表这一地区铁器时代发展的高标志。出土文物揭示当时当地人已经掌握了铁器工具和铁制武器，从而使森林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并卓有成效地利用了城镇化的思想以及社会与宗教组织。除此之外，他们与阿拉伯世界保持着贸易往来，他们有可能是通过这一途径获得失蜡浇铸技术的（当然也可能不是）。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这些高标志很可能更多地是反映我们对历史事实了解不多，因为从某种程度讲，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知识完全是出于偶然。换言之，我们所谓的高标志尚无法与尼日利亚南部铁器时代物质文化总发展的来龙去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如 G. 康纳赫所指出的那样，在尚未这样做之前，我们应当牢记这些“高标志”很可能不是人们达到的最高成就，也不是所取得的唯一成就。[65]

另一处需要勘探的青铜铸造复合体是尼日利亚以东的喀麦隆草原。在整个这片地区，铃铛是酋长身份的象征，并且在当地统治者相互交换礼品中必不可少。许多铃铛的标本具有尼日利亚风格，尤其是那些带有一节节镶边图案的，很像出土于克罗斯河狭长地带的那些郁金花形状的铃铛。喀麦隆的铃铛多半较大也较厚，带有明显的花纹图案。如果说存在着什么与尼日利亚风格的对应物的话，那就是沿喀麦隆边界，尼日利亚东北阿达马瓦地区的青铜制品，它们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最后，在特定的喀麦隆青铜 524 器、萨奥的标本和伊格博－乌库的珍藏之间，确实存在着动人的外观和主题方面的对应之处。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才能弄清尼日利亚东南部文物的意义。[66]

---

[62] T. 肖，1975年（a），第513页。

[63] M. A. 翁韦杰奥古，1974年。

[64] T. 肖，1975年（a）。

[65] G. 康纳赫，1975年，第248页。

[66] N. C. 尼科尔，1979年。

518



图片 17.4 伊格博－乌库的出土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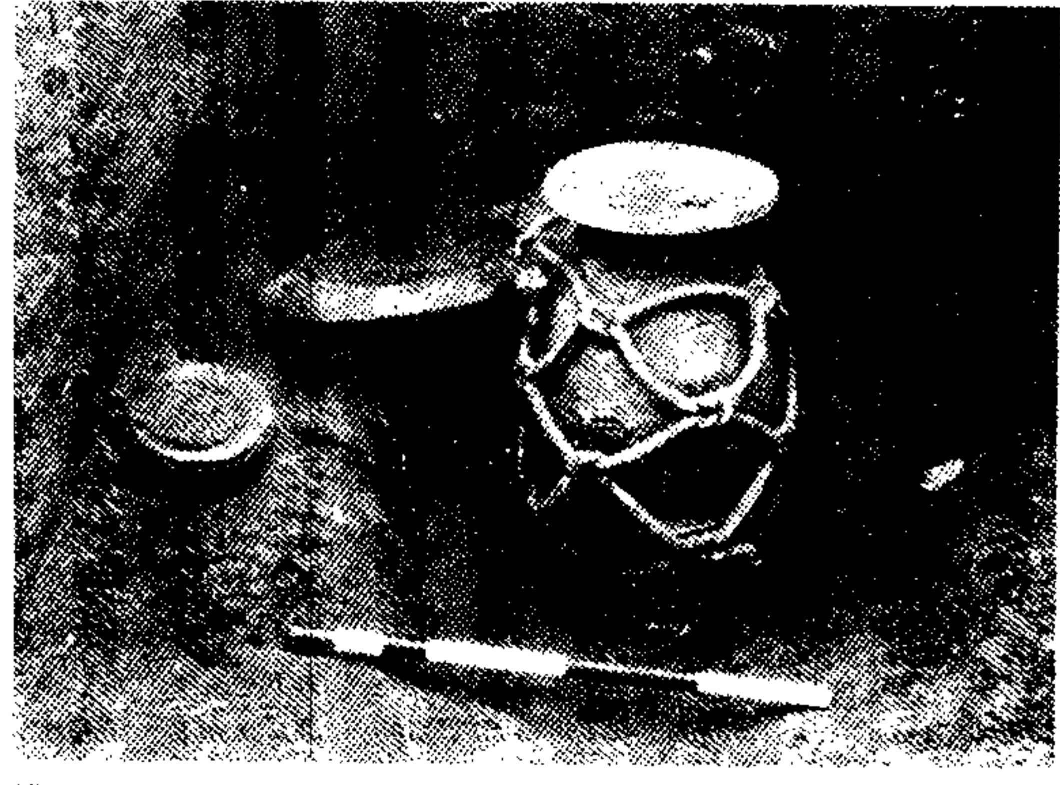
17.4(a) 假设是在伊格博－伊赛亚出土的象头形青铜垂饰装饰品(高7.4厘米)

17.4(b) 假设是在伊格博－伊赛亚出土的青铜权杖饰头(高14.5厘米)

17.4(c) 公羊头形的青铜垂饰装饰品(高8.9厘米)







(d)



(e) (f)

图片 17.4 伊格博—乌库的出土文物：

17.4(d) 王室徽章储藏室中的带套索的青铜壶和青铜祭坛座(后边和左边)
(标尺：一英尺长)

17.4(c) 王室徽章储藏室中的球形壶
(高 29 厘米)

17.4(f) 花纹精细的陶罐，来自伊格博－乌库的垃圾坑
(高 40.6 厘米)

"阿克万希"硬石雕

在克罗斯河谷北部，伊费以东约500公里处，发现了独特的硬石雕艺术遗迹。这些被称为"阿克万希"（*Akwanshi*）的石雕看来是出自居住在北方、特别是恩塔、恩塞勒、恩纳姆、阿巴尼奥姆和阿卡古地方一群为数不多的埃科伊－班图语族的祖辈之手。

一方面确实在西部非洲存在着适宜的石块，天然卵石和碎石常常被当作崇拜物竖在那里。而另一方面的事实是，除了约鲁巴兰有6处外，硬石雕成的人形只限于克罗斯河中游右岸的一块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该地区位于克罗斯河与其一条支流汇合的大拐角处，称作埃瓦永。在该处，P.阿利森在1961至1962年期间曾记载了295块不同程度雕成人形的石块。在这一地区的某些现在住人的地方和过去住人的地方，还发现了一部分小型石雕，其形状一般为圆柱体和椭圆体。[67]

P.阿利森发现的这些石雕位于6个原先独立存在的埃科伊人族群所居住的26处主要遗址和其他9处遗址中，后者每处发现一、两块石雕，共约16块。数目最多而手艺也最高、最富有创造性的石雕则发现于恩塔人居住地（50块）、恩塞勒人居住地（90块）和恩纳姆人居住地（94块）。另外，在阿巴尼奥姆兰的3处遗址中也发现22块，在阿卡古兰的3处遗址中发现19块石雕。不过这里发现的石雕手艺低劣，风格也不是独创的。恩塔、恩纳姆和恩塞勒的最佳石雕都是用玄武岩雕成的，而阿巴尼奥姆和阿卡古的石雕却是用一种片状的石灰石雕成的。在恩塞勒人原先居住过的村庄里也发现了一些石灰石雕品。石灰石雕起来可能容易些，但显示出加工粗糙，易于风化。

恩塔人和恩塞勒人把他们的石雕称作"阿克万希"，意思是"已被埋葬的死人"；而恩纳姆人和别的一些人则把它们称作"阿塔尔"（*atar*），意思是石头，或者"阿塔普塔尔"（*ataptal*），意思是长石。人们业已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石雕风格：（1）恩塔风格是一种圆柱形人体，有一条明显的把头和身躯分开的槽；（2）恩纳姆人选择的是大卵石，上面盖满了大量雕工细腻的表面图案；（3）恩塞勒人倾向于恩塔风格，但偶然也雕出带有个别特点的作品。这些风格也许对年代排列具有某种重要意义。

525

属于阿克万希文化的各族（包括恩德人）讲的是一种各形式之间既有区别又互相关连的埃科伊－班图语。[68] 在殖民前时代的最后一些岁月中，这些人分裂为相互争斗的两派，至今仍相互敌视。在近代，各个社会的事务均由长老管理，在长老的领导下，年轻人组成不同的年龄组。此外，还有"恩图恩"（*Ntoon*），即祭司长们，他们在近代的作用主要是宗教性的和礼仪上的。"恩图恩"的权力范围大小不等，小的仅及一个村落，大的可达到整个群体分支。

P.阿利森力图弄清恩塔人"恩图恩"祭司长们的系谱，他深信辈份是挑选"恩图

[67] 参阅P.阿利森，1968年，1976年。

[68] D.克拉布（D. Crabb），1965年。

恩”的传统标准。P. 阿利森提出，每个祭司占据该位置的期限平均不超过十年左右。他认为人们有理由相信，阿克万希是王朝缔造者们的纪念碑。但是，他提出的朝代年限可达四、五百年之久的看法，则是基于一种认为埃科伊人社会体制相对静止的机能主义观点，即认为这些人的组织形式自始至终停留在主张平均主义的小群体。还有另一种对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更为合乎情理的解释，即认为这些人曾组成一个大规模的王国，与比尼人和约鲁巴兰的王国并无多少差异。的确，建造巨大而古老的阿克万希墓葬纪念碑，意味着社会－政治机构已经发展到如此强有力、集中化和规模大，足以调动足够的劳动力。如果情况确是如此，那么每位国王的平均统治年限应是二、三十年。这意味着阿克万希的起源年代可能是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最后二、三百年至第二个一千年最初的二、三百年之间的任何时间，也就与伊格博－乌库的时间大体相同了。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看来是给这个国家带来不良的影响，导致社会分崩离析和艺术退步。这种石雕 术不断退化直至近代，今天绝大多数雕品采用的是圆柱形木料。

埃科伊人使用的恩西比迪文字（*Nsibidi*）看来是这一地区早期文明的成果之一。恩西比迪符号中，代表原先的马尼拉货币和象征财富的是呈箍形的符号，这在某些石块上可以识别出来。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必定会有可靠的农业和技术基础，并已使用铁器。似乎还有理由设想：长途贸易已是人民生活中的一大特征，它把这个国家和北边（蒂夫人、朱昆人等）及西边（伊格博－乌库、尼日尔河三角洲、比尼和伊费）各族以及东边讲班图语各族连结了起来。上述种种仅仅是根据现有知识进行的猜测而已。十分清楚的是：如果有关阿克万希国家和社会的大片历史空白需要得到填补，那么对该地区进行考古工作就是刻不容缓的。 **526**

早期贸易

本节将探讨这个地区居民所取得的发展程度，特别是那些被普遍观为中世纪产物的著名石、陶土和铜合金雕品，同时也将探讨发展这种艺术的城镇和乡村情况以及社会－政治体制。如果说所提问题恰到好处，根据现有资料所能得出的答案却令人遗憾地并非如此。正如上文已经论述过的那样，据目前所知，大部分阿坎人、埃维人和加－阿当梅人，以及约鲁巴、埃多、伊格博等有关族群，在11至12世纪期间或更早的时候便已占据了与他们如今居住的下几内亚地区大体相同的区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约鲁巴人当时已成为城镇居民，这只要看一看伊费、古奥约和伊莱沙诸城镇出土的文物就清楚了。[69] 在贝宁进行的挖掘工作表明埃多人当时同样也已经是城镇居民。尼日利亚的伊格博－乌库和加纳的博诺曼索则已建立了复杂的国家体系。

上述城镇和别的定居点不可同日而语，其差异反映在规模、居民成分、社会组织、机构和职能等多个方面。它们高度集结的程度更大、人口也更多。这些城镇经过一段发展以后，拥有了各种行业的专家，他们生产的产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地的消费，而且

[69] P. 奥赞，1969年。

还促使人们专职地或近乎专职地从事各行各业。一系列技术复杂的行业的开业，如金属冶炼业、制珠业、染色业，很快成为许多西非城镇的标志。这类城镇迅速成长，其中有许多发展成为居于战略地位和具有大型市场的城市。它们坐落在赖以兴旺昌盛的各种原材料产地之间的交通要道路旁。

位于森林地带、苏丹地区和萨赫勒地区的许多西非城镇（诸如：尼日利亚的伊费、贝宁、乌雄戈、伊达、乌古鲁古和多哥的诺策）都建有围墙或防御壕沟，这为城乡之间提供了一道实实在在的分界线。由于一些城镇的规模以及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缘故，居民很快就出现分裂或多重的效忠。反过来各个村庄倒由于它们只有一个首领单一的政务会议而且共同分享种植经验，因而更趋和谐一致。

综上所述，只有技术和谋生技能达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维持众多的人口，而经济结构中职能专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又必定会促进各种内容的长途贸易。从考古角度看，必须重视的最主要之处不是直接接触的贸易，不是交换缺乏固定的机构，也不是特定原料的标准价格，而是产地（即产地分析）以及这些产地的特点。

在许多早期的西非农业社会中，磨光的石斧（在加纳当地称作“尼亚梅－阿库梅”）通过贸易传到几百公里之外。来自比比亚尼山脉的绿岩石斧在加纳南部的大片土地上被人们所发现了。金坦波文化的石锉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加纳最早期农业活动的证据，它们是用白云岩泥灰制成的。在阿克拉平原和加纳北部都曾出土这种泥灰，显而易见，它们是通过长途贸易才运到此地的。[70] 在库马西、努诺挖掘到一所脉石石斧“工厂”，它在布鲁波罗溪和维维溪的岸边。[71] 该处的主要证据是制作石斧的下角料和磨制石斧所形成的露天岩层中的槽。这些石斧的分布情况仍有待确定。在布基纳法索的瓦希古亚附近的里姆地方，新石器时代晚期/铁器时代的地层与石斧厂的地点有着一定联系，该地似曾成为一个重要的中心，从事向缺乏这种原料的地区贩卖石斧。[72] 总之，绿岩石斧和石锉分布的地区之广，就说明它们来自长途贸易的可能性要大于来自地方性的交换网络。

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在铁器时代加纳曾有过地方性的陶器贸易，在陶器的结构中发现的粘土，并不产于这些陶器出土的地方。R.N. 约克提出，纽布伊佩出土的颇具特色的陶器中，有好几件是用远离该地100公里的粘土产地的原料制作的。例如，在贝戈发现的一件带有含云母胶泥的陶器就是一个例子。[73] B.普里迪称，陶器分布的区域还要大些，加纳上部地区的陶器被贩运到本地几乎不产陶器的北部地区。[74] 这种陶器贸易的重要性可能远远不止表明地区间的文化交往，它还证实了农业社会也不可能完全靠自给。在这位作者的眼里，西部非洲长途贸易的开端与上述种种石、土资源以及金属的利

[70] C.弗莱特，1967年。

[71] R. B.努诺（R. B Nunoo），1969年。

[72] B W.安达（B. W. Andah），1973年。

[73] R. N.约克（R N. York），1973年，第92和150－151页。马修森（Mathewson）和C.弗莱特证实，基索托碗（一种球形小碗，有一条细长的珠子形内边，是用一种颇具特色的灰色粘土制作的）分布在黑沃尔特河和白沃尔特河的汇合处周围90公里的地区。他们把这一特定陶器的年代，确定为公元15世纪到16世纪。

[74] B.普里迪（B. Priddy），1973年，第3页。

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有充分理由认定，从早铁器时代起就存在着一种复杂而又广泛的长途贸易网络，它从位于一些明显生态地带的各中心点向四周扩展，一方 **528** 而把沿海地区各族与内地务农的各族连结起来，另一方面也把南方的人民和北方的游牧民连结起来。

结　论

已证实在伊格博－乌库等地存在种种行业表明，这要耗费相当一大部分社会资产。这种现象同时也表明当时已经存在复杂的技术和财富的积累，并且（可能）还有一种祭司领导的体制，以及对某些贸易的参与。根据T.肖的说法，大量出土的铜可能是当作货币使用，而用于青铜器中的铜则肯定是来自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出土的16万5千颗珠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产自印度，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来自威尼斯，虽然假定公元900年时就和威尼斯有来往似乎太早了些。[75] 能够想象到的最近的铜来源地是尼日尔阿伊尔的阿泽利克地区（塔凯达）和马里的尼奥罗。目前尚无法证实伊格博－乌库青铜器中所用铜的确切来源，也无法知道是否是它们的各种构成成分促成了与北非的长途贸易，或者这些铜有可能来自苏丹地区的某一个产地。实际情况是，在阿巴卡利基出现了铜和铅，在阿菲波和卡拉巴尔出现了锡。[76] 更有甚者，M.A.翁韦杰奥古声称在这些地区还找到了古代开矿的证据。[77] 如果他的判断正确的话，这些距离更近的地区就更有可能是铜的来源地。不管来源地究竟在哪里，尼日利亚南部发现的公元1300年前的大量铜制品表明，贸易当时已在大规模进行，而且可能比上述年代早半个世纪就存在了。从制作工艺之高超，以及所用材料表明来自长距离贸易，两者都说明当时已经存在一个发达的农业社会，也许以狩猎和捕鱼作为辅助手段，已经创造了相当多的社会剩余。伊格博的出土物和M.A.翁韦杰奥古对恩里社会的深层次研究，两者都提供了大量证实上述观点的材料。

贩运奢侈品的长途贸易依赖当时可能已经存在的社会差别，这种差别甚至存在于当地市场之外。例如，可能有一些流动商贩活动于王室和要人的住宅之间，同时在集市开张时又活动于各市场。在上面已讲到的某些地方，围绕着盐、布、金属、珠子、陶器和石器工具这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铁器时代早期的特定货品发展了有规则的地区性贸易。即便这类地区性贸易，也并不总能建立起全新的市场，只是有时在业已存在的定期举办的地方市场之间建立起更加有规则的交流渠道而已。例如，地区性的贩盐至少可追溯到 **529** 晚铁器时代（公元1300至1600年），一条路线是从撒哈拉运向苏丹地区，另一条路线是从沿海运向森林地带。好几位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这种贩运状况肯定反映了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地理需要。[78] 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大片地区是沼泽地和盐碱地，无法种植庄稼，

---

[75] T.肖，1970年，第一卷，第225－267页。

[76] M. A.翁韦杰奥古，1974年。

[77] 同上。

[78] E. J.阿拉戈瓦（E. J. Alagoa），1970年，第325－330页；D.诺思拉普，1972年。

也不适合于饲养牲畜；而另一方面，内地又缺乏盐的资源。因此，以盐和鱼干去交换那里剩余的农产品和牲畜，对两个地区都是有利的。据G.I.琼斯说，“安多尼和邦尼的传说表明，在欧洲商人到达之前，邦尼地区就有了熬盐业。……”[79] 沿海和内地之间的这种贸易，完全有可能与沿海地区作为居住区的历史一样悠久，况且这些居住者本身就有可能来自内陆地区。

为进行三角洲和内地交换产品而发展起来的地区性贸易网中，至少有一条贸易网络导致沿着三角洲支流河叉的条状集市网点的建立。[80]

地区性的珠子贸易与其说是南北走向，不如说是东西走向。有一种叫做“阿科里”的珠子，其形状从来没有人描述得十分清楚过，但这种珠子却长期被人沿着几内亚湾长途贩运。

地区性的贸易网点还在纺织业中心周围建立起来。它们在“伊格博－乌库文化时期”发展相当快，并且一直持续存在到近代。例如，公元16世纪时，贝宁人用的布的样子与描述中的伊格博－乌库出土的布十分相似。公元17世纪时，他们纺织和进出口的布，数量很大。有些布可能产自伊格博（即伊格博南部的阿克威蒂人，他们以其花棉布而闻名已久）。[81]然而自伊格博－乌库时代以来，伊格博内地最重要的地区性网点显然是包括铁和其他金属制品的那些，在那里可能有流动的铁匠。

[79] G. I. 琼斯，1963年，第35页。
[80] 同上；第13页；U. 乌库（U. Ukwu），1967年，第650页。
[81] D. 福德（D. Forde）和G. I. 琼斯，1950年，第43页。

18 上几内亚：象牙海岸与卡萨芒斯河之间的各族人民

B.W. 安达

无论是史前还是有史以来的各个不同时期，上几内亚和西苏丹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紧 **530** 密和十分重要的关系，这一观点普遍存在于许多学者中间，但迄今尚无一人明确分析这种关系在几内亚海岸各个部分各不同时期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过程。当然，正如非洲历史上其他类似的历史现象一样，对这种关系，已经有人提出多种假说，只是这些假说由于所依据的史料各不相同或者因研究工作者解释这类史料的方法不一样而互不一致。

举例而言，有些人认为上几内亚海岸之所以有人定居是由于人口不断从内地向海岸迁移的结果。即使持这派意见的人内部对这种流动何时开始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D. F. 麦考尔把这一进程上溯到5000年之前撒哈拉开始日趋干旱之时，用他的观点说，也就是正当曼德人的祖先往下移动到萨赫勒，并把农业知识介绍到那块地方的时候。[1] A.A.M. 科雷亚认为，西苏丹各国经受了这一严酷的压力。他把人口向海岸流动的开始时间定在公元3世纪。[2] 沃尔特·罗德尼从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丹地区各国的政治事件[3]促成的，因此，不能把时间定在公元10世纪以前。

这种把大多数上几内亚沿岸的人视作被撵出自己原先居住地的移民的观点，无疑是普遍的。但仍有待于具体阐明：在历史的各重要关头，居住在这两大地区的人们是如何在体格上、语言上和文化上相互发生联系，究竟是哪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为了对公元7至11世纪这一时期上几内亚海岸文化史作出评价，人们把书面的和 **531** 口头的史料、考古研究成果、语言学和其他有关人类学的资料都精选出来，力求判明下列情况：地层的特征，尤其是它的资源潜力；该地区的人口，这些人所讲的语言，以及他们是怎样在经济、社会和政治诸方面组织起来的。随后，人们又力图将这段时期里上几内亚各族人民和居住在他们北面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描绘出一个轮廓来。完成这项工作必须对各种假说作出决定性的评价，其目的特别在于说明铁器制造术的传入和组成国家的各个社会的形成。这种社会已有高度发展和复杂化的社会－经济体制，达到能建造巨石纪念碑的程度。

---

① D. F. 麦考尔（D. F. McCall），1971年。
② A. A. M. 科雷亚（A. A. M. Corrêa），1943年。
③ W. 罗德尼（W. Rodney），1967年。

5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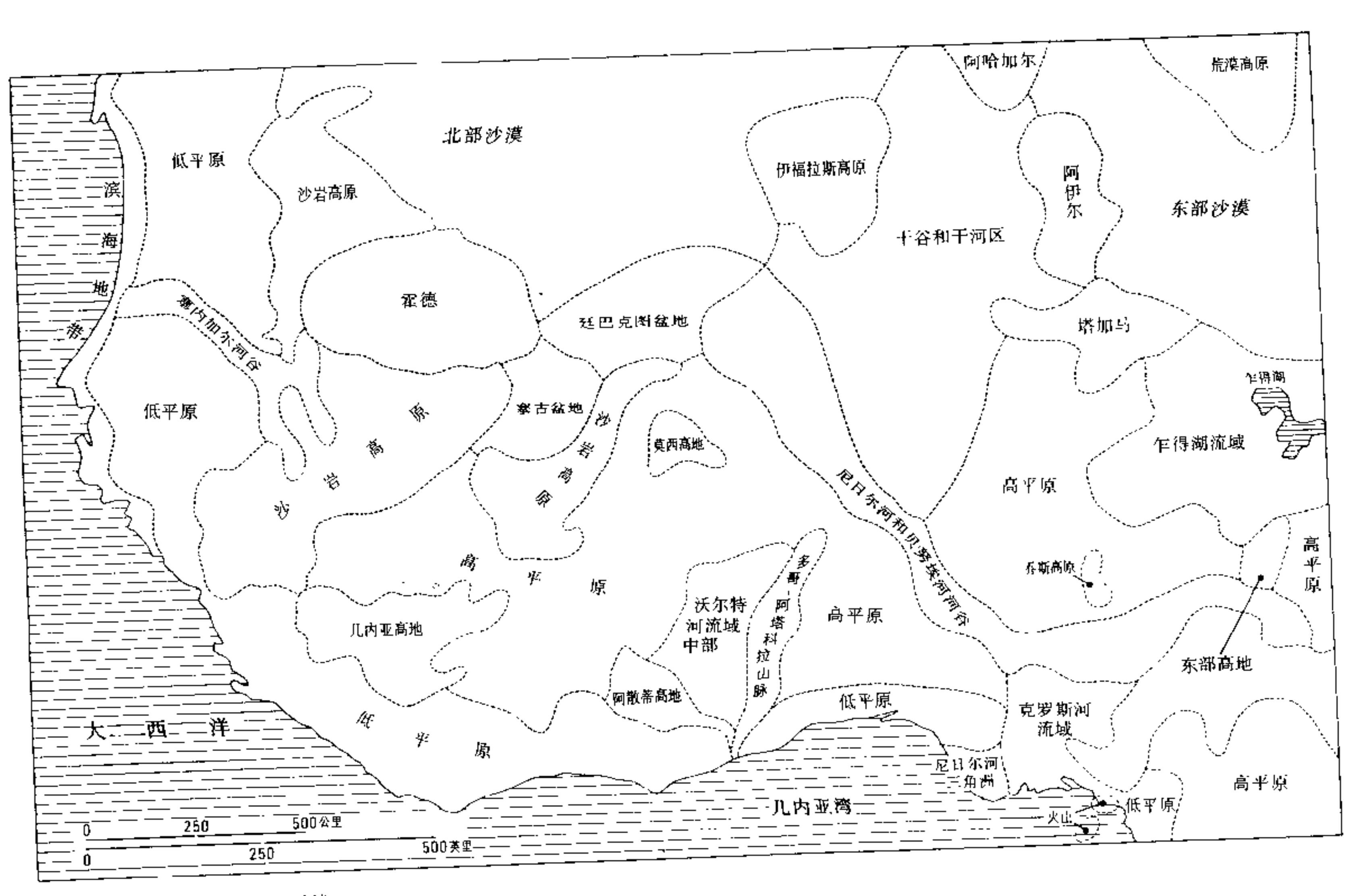


插图18.1 西非主要自然地理区域

生态环境

这里所谓的上几内亚，系指从塞内加尔河至帕尔马斯角的西非海岸地区西半部。人们把从帕尔马斯角延伸到喀麦隆的地区称为下几内亚。这样一来，上几内亚就成了从直布罗陀海峡至利比里亚的西北非海岸的南部地区。这一海岸地区北面主要是山脉、高地和槽谷，沿海一带则是经常有水覆盖的沿海盆地和拱形地貌。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雨量处于中等水平，到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年降雨量增至200多厘米。雨量还反映在排水系统，在塞内加尔南部河流终年有水，并且越向南这样的河流越多，大多数河短而长年有流水。

海岸的表面洋流（主要是加那利群岛）向南沿西北非海岸流向佛得角群岛与向西流的北赤道洋流汇合。更往南，几内亚暖流沿利比里亚海岸向东流。

这一地区得到公认的地理单位有塞内冈比亚、卡萨芒斯和芒特角之间的塞拉利昂－几内亚地区(W. 罗德尼所说的上几内亚)以及芒特角和帕尔马斯角之间的利比里亚地区。

在内地，塞内冈比亚地区地理上的主要特征是塞内加尔河流域。其南北两侧为沿海低平原，西北侧是霍德（豪德）沙岩高原。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地区主要地貌是几内亚高地。其南方是连绵起伏的沿海低平原，不间断地一直延伸到加纳。北面和西面是高平原。上几内亚地区以外，在高平原的东端有沃尔特河流域中部盆地和阿散蒂高地，而中北部的另一面则与塞古盆地和廷巴克图盆地以南的沙岩高原相连接。

塞内冈比亚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大草原，有着苏丹型的气候和植被。冈比亚中部和土地极其肥沃的卡萨芒斯河流域中部的大多地方都是如此。这一地区南部的一些地方是人口稠密地区。下卡萨芒斯降雨最多，也最为潮湿，因而是塞内冈比亚森林最稠密的地方。尽管这里的气温一般不如内陆地区热，但还是湿度很高。尽管如此，自然界仍向各族人们提供了全塞内冈比亚最肥沃的土地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美好景色。这里和谐共处的各族人民多半是曼登人(或称曼登卡人、曼德人、“曼丁哥人”)，迪尤拉人、弗卢普人、拜努克人和巴兰特人。 533

一条蜿蜒起伏的悬崖线标示出上几内亚西部沙岩高原的边界。毛里塔尼亚北部完全是沙漠，但塞内加尔河谷却以冲积平原为其主要特征，吸引人们前来定居。别的适合于人长期居住的地方是悬崖脚下泉水淙淙而流的地方以及悬崖边缘的深谷。沙岩悬崖流下的河水汇合成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

从上几内亚海岸深入塞拉利昂－几内亚地区的腹地是西苏丹。这里的植被，从热带森林大草原到真正的内地稀树草原林，到南方的雨林都有。在海岸边缘一些地方还有红树林沼泽。

这一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成四个自然区。以多山为特点的几内亚平原（或海岸平原），与平原相连接的高地和丘陵地带，富塔贾隆高原以及尼日尔河上游流域。区别海岸平原的主要特点是：海拔在150米以下，年平均降雨量超过250厘米，植被既有森

林，也有热带森林草原和农作物的混合体。其主要农作物是棕榈产品、花生、稻米、柯拉果，这些农作物与自然条件不同的邻近地区的主要产品不一样。

富塔贾隆高原的高度超过1250米，是曼登（曼丁）沙岩高原向西南延伸部分，位于北面的霍德和南面的尼日尔河上游流域之间，几乎完全处于集水区内。人们最初把这个切割高原的谷地当作农耕区，后来它又成为富拉尼养牛人和帝国创建者的通道。

高地以北是尼日尔河上游流域，其水系分别流入尼日尔河和塞内加尔河。这一带黄金分布广泛，蕴藏在前寒武纪的岩层中，长期以来，一直为当地人民所开采。从歇尔布罗岛往南，海岸主要由浅沙滩组成，这里河流的入海流向往往由于沿海洋流的流向而由东南偏向西北。

利比里亚地区的海岸线全长560公里，从马诺河沿大西洋直到卡瓦拉河。这里属热带潮湿气候，沿海雨最多，雨量高达500厘米。就地形而论，与海岸线平行，自东到西可分为三个主要区域：

534 (1) 沿岸或滨海地带，宽64至80公里，地势普遍较低，有浅礁湖，白沙滩，并有红树林沼泽地。

(2) 十分稠密的雨林地带，地势逐渐上升到海拔330多米。

(3) 广阔而地势起伏的高原，海拔为660米左右。其最高点是几内亚北部边界附近的宁巴峰和瓦济山脉。

这里的土壤一般都十分肥沃，但严重淋溶渗水。所有植物都是典型的热带非洲植物，有非洲大陆最大的常青树森林之一，生长大约235种不同的品种。其中有许多自然的或野生的食用作物，包括咖啡、柑桔类水果、可可、菠萝、鳄梨、木薯和稻米。

达喀尔以南的海岸地区，从塞内加尔南部起，穿过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以及塞拉利昂的大部分地方，其特征主要是被向西流的各条河流的河水（诸如：萨卢姆河、冈比亚河和卡萨芒斯河）所淹没而形成的泥泞的河湾。其主要河谷理所当然地人口众多，它有非常辽阔的冲积地，有足够的水源供给像花生和油棕这样的作物生长繁殖。但其河间地红土硬壳化的情况越向内地延伸越显得严重。

几内亚高地和海岸之间的景观由表面倾斜的切割平原组成，其坡面从分水线向北－北－东，再向南－南－西朝海洋方向延伸。弗里敦坐落在一个半岛上（半岛有高达600米的山峰），它是保护海港免遭西南风侵袭的屏障。也许对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地区的历史起过重要影响的地理特征是由为数众多的河流、低平原、沼泽地、大潮汐和一个宽广的大陆架所组成的综合体。在冈比亚和芒特角之间的海岸线上有二十多条重要河流。那些河流的流向一般是向西或西南方向，连同它们的支流，构成了这一地区居民们广泛使用的水路。利比里亚没有一条河流（不管是大河还是小河）能航行到几公里以上的，由于河口的沙洲和险情迭出的岩石构造，船无法从海洋进入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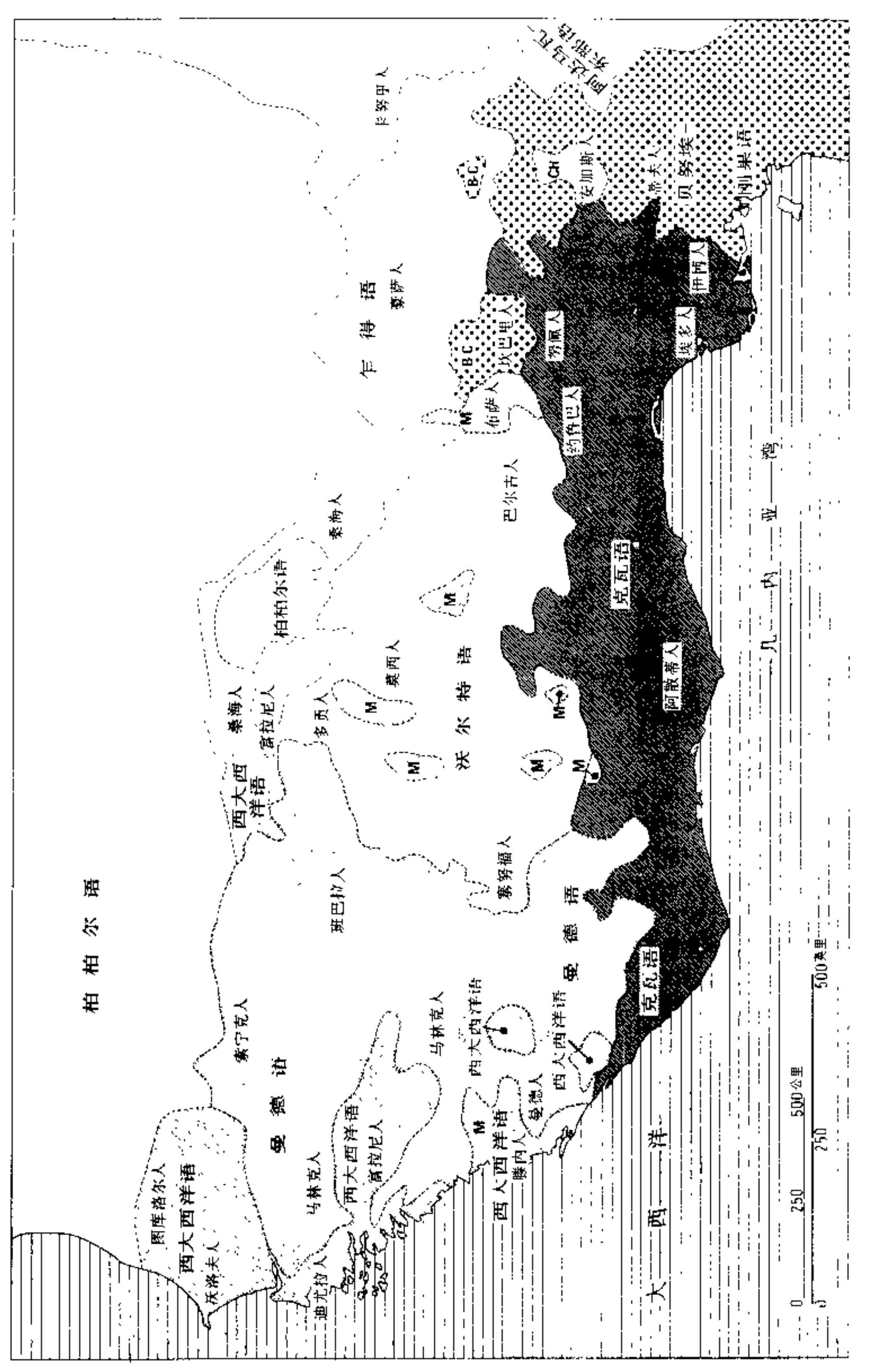


插图18.2　西非语系(简图，只标出了主要的几种语言)

5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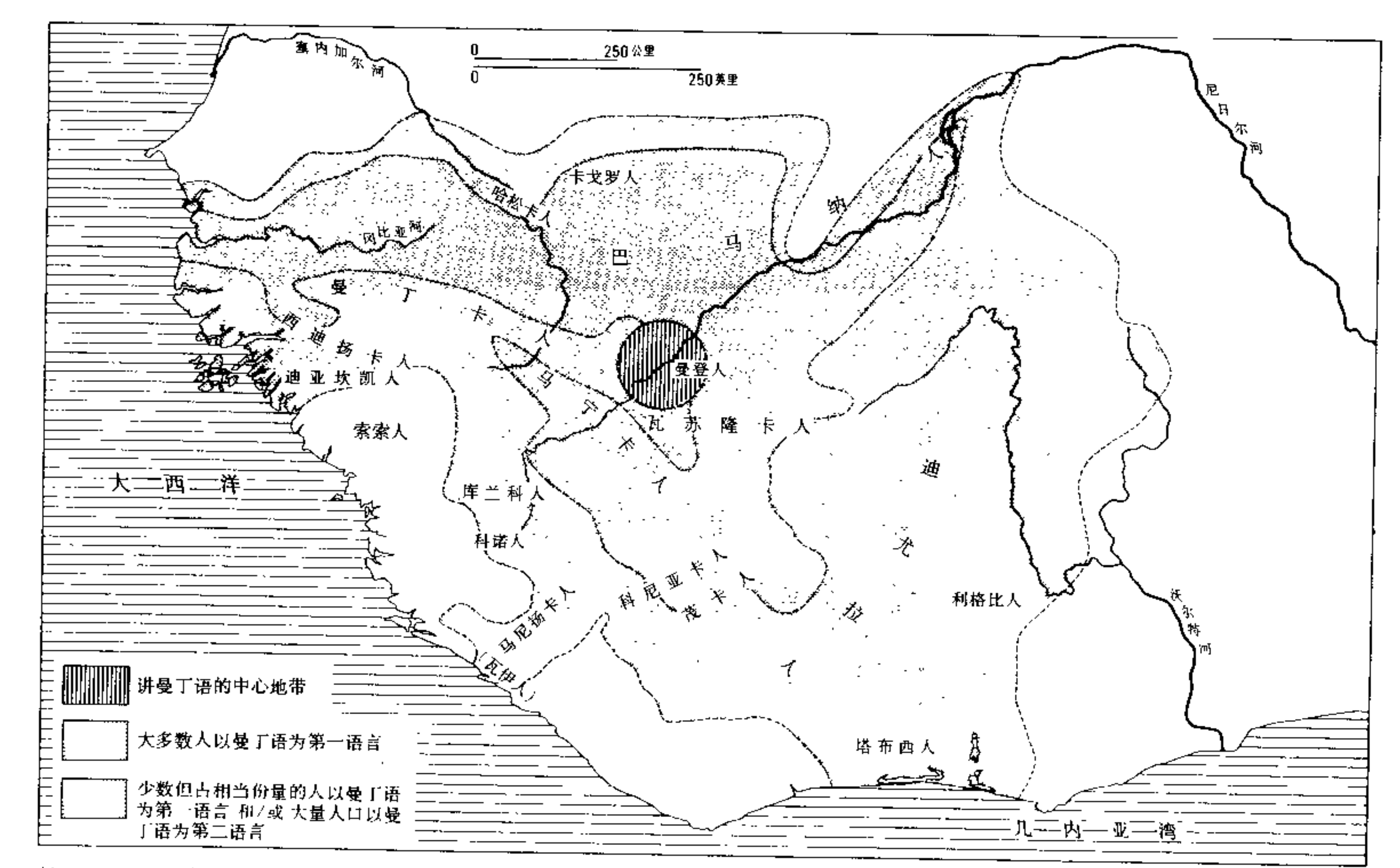


插图18.3 "曼丁"各族人民和他们的语言

语言和部族的形成

上几内亚各族主要讲尼日尔－刚果语系所属的曼德语，西大西洋语和克瓦语三个亚语分支。(插图：18.2)

曼德语

上述亚语分支中最稳定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曼德诸语，这个亚语分支从尼日利亚的布萨语到西边的冈比亚语，从北面的索宁克语到南面的瓦伊－科诺语，包括整整25种具体的语言。曼德亚语系诸语中布基纳法索的博博－芬（锡亚）语的情况有几分令人费解，其余的曼德诸语一般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北或西北曼德语，另一类是南或东南曼德语。[④] 许多具体语言相互关系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西北曼德语的西南分支有：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人讲的曼德语、克佩勒语和洛马语；同一类的北面分支包括：索宁克语、曼登卡语（班巴拉语、马林克语、迪乌拉语等）、索索－雅隆克语、瓦伊－科诺语及其他。直到最近，人们一直把南曼德语看成是由两个各不相同的语言分支所组成。南面的分支包括马诺语和利比里亚、象牙海岸的几个小的语言，东面的分支也包括几个小的独立的语言（布萨语、比萨语、萨摩语），它们散布在布基纳法索、贝宁北部和尼日利亚西部等地。现在已经得到确认，这两个分支是紧密相关的，因而实际上所构成的只是同一分支。[⑤]

曼登卡语是曼德语的一个分支，它有三个独特的特征：讲这种语言的人众多，分布的地区广阔，内在联系紧密。讲曼德语的地区，是早期西苏丹各国的中心，其中最早一个国家——加纳帝国可以上溯达一千年之久。根据口头传说，讲曼德语的人扩张到冈比亚的时间是在13世纪松迪亚塔统治时期。建立南方各贸易定居点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4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对于讲曼德语的人的地理分布情况有着种种历史性的解释。由于把曼登卡人当作多数曼德人的代表，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把如今是马里的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上游地区作为曼德人最早的发源地。并且还进一步推断其他所有讲曼德语的人都是从这一发源地一批接一批往外迁移出来的人们的后裔。[⑥]看来后来的人口流动（也就是人们称为曼德人的第二次迁移）主要是向南和向西进行的。

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假设曼德人（或原始曼德人）是从乍得湖附近某处史前家园开始他们的迁移活动的，他们越过尼日尔河以后，总的说来是继续向西或向西南方向移动。曼德人的迁移肯定早于讲古尔语（沃尔特语）和克瓦语的人们的迁移。比萨人（布

---

④ 参阅C. S. 伯德（C. S. Bird），1970年、W. E. 韦尔默斯（W. E. Welmers），1973年，R. 朗（R. Long），1971年，M. L. 莫尔斯（M. L. Morse），1967年，A. 普罗斯特（A. Prost），1953年、1981年。

⑤ A. 普罗斯特，1981年，第354－355页。

⑥ 参阅J. 范西纳（J. Vansina），R. 莫尼（R. Mauny），L. V. 托马斯（L. V. Thomas），1964年（b），第91页。

538 桑西人）和莫西－达贡巴人的口头传说都表明：远在莫西－达贡巴国家[7]建立之前比萨人就居住在他们目前的所在地。布萨人的口头传说（在尼日利亚）认为他们是从东面迁来的。[8]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现在分散居住在布基纳法索、贝宁和尼日利亚的讲曼德语的人不是曼德人从西开始扩张的最东部的分支，而是曼德人从东向西南迁移的遗留部分，从语言间的紧密联系可以看出这一点。[9]

至于年代顺序结构，W.E. 韦尔默斯认为曼德诸语所代表的是最早从尼日尔－刚果语系分裂出来的一支，他把这一分裂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而把南曼德语和西北曼德语间的分裂确定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10]但是由于这些年代都是以同源语言演变史学为基础的，日益受到语言学家们的批评，所以使用它们必须极其谨慎。

无疑，在本卷所论述的时期里，讲曼德语的人的南支早已居住在利比里亚和象牙海岸的部分地区。其他讲曼德语的人——瓦伊人、科诺人、门德人、索索人、克佩勒/格尔泽人，洛马/托马人等——则是在最近五个世纪或六个世纪分几批向海岸迁移，他们流动的情况将在本书第四卷中描述。[11]

西大西洋语

与讲曼德语各分支的人们有着内在的共性恰好相反，同样也出现在热带大草原地区的J.H. 格林伯格所说的“西大西洋”亚语系则被其他学者[12]认为相互间异点更多，而且是一种历史意义逐渐消失的亚语系，就像梅尔语所处的阶段一样。另一方面，在分类上把它和克瓦亚语系分开也似乎带有随意性，至少有把明显不相关连的关系弄得更加含糊不清的倾向，就像梅尔语和阿坎语之间有些语汇相互一致一样。不过，D. 多尔比关于西大西洋亚语系诸语可能根本就相互无关的结论也是需要商榷的。

如像W.E. 韦尔默斯相当正确的评论所说，如果西大西洋诸语代表的是尼日尔－刚果语系中一支很古老的分支，那么人们就会预期分支内部的某些内在联系必然模糊不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把某些语言包括在这一分支内是值得怀疑的。[13]

539 J.D. 萨皮尔认为，西大西洋亚语系包括沿海地区人们所讲的一系列各式各样的语言，这个沿海地区是指从西北的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交界处到东南的塞拉利昂－利比里亚交界处而言的。[14]只有普拉尔语（或富尔富尔德语）例外，后者是从塞内加尔北部至喀麦隆北部和乍得地区生活在热带草原中的人们所讲的一种语言。J.D. 萨皮尔还进一

[7] 根据传说达贡巴和莫西两个国家是由曼德猎人的儿子和一位沃尔特妇女建立的，表明曼德人在那里的时间较早。参阅A. 普罗斯特，1945年，第50－51页；1981年，第357页；J. 古迪（J. Goody），1964年，第211－212页。

[8] 这一传说与基斯拉传奇有关，参阅P. 梅西耶（P. Mercier），1970年，第317页。

[9] A. 普罗斯特，1981年，第357－358页。

[10] W. E. 韦尔默斯，1958年。

[11]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2章。

[12] 例如，D. 多尔比（D. Dalby），1965年。

[13] W. E. 韦尔默斯，1973年，第17页。

[14] J. D. 萨皮尔（J. D. Sapir），1971年，第46页。

步指出，与普拉尔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并且与塞内加尔的沃洛夫语和塞拉利昂的滕内语在较少的程度上相对照），讲西大西洋亚语系大多数语言的人较少而且经常处于隔离状态，讲这些语言的居民人数最多可达 200 000 人（如迪尤拉人和基西人），少则只有几百人（如科比亚纳人）。[15]除了一些一般类型的特征，如名词类系统和动词词缀外，J. D. 萨皮尔没有发现多少可以用来区分整个亚语系的明显证据。整个亚语系内部存在的差异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有些学者（如 D. 多尔比）会对该亚语系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联系提出疑问。然而 D. 韦斯特曼提出了梅尔语与西大西洋诸语之间的联系。[16] 这种联系内容虽然不多，但足以使这是一个统一的亚语系的假设得以成立，尽管这只是一种在广泛的亲缘关系上的统一。J.D. 萨皮尔报道说，以词形相似的词（指假设同族语的贬义）为基础而得出的词汇数，明确地确定了梅尔语的统一性，并且也区分出这一语言的主要支系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水平。[17]

克瓦语

J.H. 格林伯格把分布于西起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经过象牙海岸、加纳、多哥直到贝宁和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这一条平均宽约 320 公里长约 2240 公里的西非沿海地带的语言，称之为克瓦亚语系。[18] 虽然这种分类法很可能会淹没努佩那样独成一体的语言，而且冲淡了像梅尔语以及阿坎语那些不相邻的语言中词汇方面的一致性。但是，J.H. 格林伯格对中间类语言的分类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例如，依据目前讲这类语言的人数来看，克瓦亚语系四种最重要的语言是有音节的，而且还富有音乐感。[19] 这四种语言是：（1）在加纳占优势的阿坎语（特维语，芳蒂语）；（2）在多哥和贝宁共和国占优势的埃维语，在加纳的东南部也有人讲这种语言；（3）在尼日利亚西部占优势的约鲁巴语；（4）在尼日利亚东部占优势的伊格博语。J.H. 格林伯格把克鲁语和伊乔语归入克瓦亚语系的作法是尝试性的。举例说，伊乔语和约鲁巴语以及阿坎语之间的关系就像约鲁巴语与阿坎语相互间的关系同样密切。固然，深入的研究虽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已表明从 **540** 利比里亚中部到尼日利亚境内的尼日尔河下游地区上千英里的西非森林地带的大部分地方，居住着所讲的一系列语言相互关联的人们，他们的语言在词汇和结构方面有明显的类似之处。如果上述这些情况能反映他们讲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那么这里语言上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森林地带的大部分地方曾存在一个早期的文化上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在目前尚未判明的很早时候就有了分化。看来，上面提到的克瓦亚语系内部的一些关系以及其他某些关系，至少与克瓦语最东面的某些语言以及一些显然属于贝努埃－刚果亚语系的语言的关系同样之远。

---

[15] 同上。
[16] D. 韦斯特曼（D. Westermann），1928 年。
[17] J. D. 萨皮尔，1971 年，第 49 页。
[18] J. H. 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1963 年（a）。
[19] M. H. 斯图尔特（M. H. Stewart），1971 年。

历史和地理的证据进一步表明：森林并非轻而易举能被后来者渗入的，人们渗入森林不是以大规模迁移的方式进行，更确切地说是局限于一批批小的群体。这些人即使在文化上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在语言方面仍被当地居民所吸收同化。只有在最西面，北方人才大举渗入，他们像塞拉利昂的门德人所做的那样，建起了武士酋长国，把曼德语系一直推进到沿海地区。

各种假说

对许多人来说，对这一地区作历史回顾中的主要课题是两个伟大的文化传统势力间划时代的对抗，即海岸地区讲梅尔语各族的祖辈，与从高原内地移来的正在扩张的讲曼德语各族之间的对抗。⑳

这个地区在与欧洲的早期接触中以及以后的几个世纪内，由于内地居民为寻找土地与贸易，向滨海低地森林迁移，从而形成了众多移民边界以及人口增长和不同群体间的竞争。而在此过程中，来自东方的讲曼德语群体的渗透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无庸怀疑的。

然而，把这与15世纪以前更为广泛的地区社会文化史联系起来时，特别是与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后期以及第二个一千年早期联系起来时，仍存在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人们还不清楚，马内人的入侵究竟是像F.B.利文斯通所断定的那样发生在14世纪，还是像F.兰普所提出的发生在15世纪，还是像P.E.H.海尔提出的发生在16世纪呢。㉑此外，对与此有关的发生的形式和对当地居民的影响等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P.E.H.海尔认为这是一场导致入侵者被当地居民同化的短暂的战争，而其他许多人则认为，这是带有决定性意义的、某些情况下对当地居民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大规模迁移。

541

例如，W.罗德尼和F.兰普把以艺术家和手艺人著称的萨佩人（包括布隆人、滕内人、林巴人、巴加人和纳卢人这些如今讲梅尔语的各族）的手艺被摧毁这一严重事件归之于这次入侵。㉒但是，也有人认为“马内人”也带来了许多新技术，例如铁器制造术，纺棉纱的技术以及军事作战的技术，并对早已建立的像波罗、拉格本尔和西莫之类的秘密会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F.B.利文斯通根据对血液的研究，特别是对西非从事集约农业的某些族群镰状细胞平行分布这一特点，提出了最早向西移居的讲曼德语的人（他认定发生在14世纪）主要是猎人和武士的论断。他还提出随后的曼德移民浪潮，引进了水稻栽培技术和在森林地区以刀耕火种办法进行集约耕作所用的铁制工具。根据他的论点这一进程可能从几内亚高地的森林边缘开始，然后在低地森林的居民中缓慢传播开来。㉓

---

⑳ H.鲍曼（H. Baumann）和D.韦斯特曼，1948年；G. P 默多克（G. P. Murdock），1959年；M.德拉福斯（M. Delafosse），1931年。P. E. H.海尔（P. E. H. Hair），1968年（a）；W.罗德尼，1967年。

㉑ F. B.利文斯通（F. B. Livingstone），1958年；F.兰普（F. Lamp），1979年；P. E. H.海尔，1968年（a）。

㉒ W.罗德尼，1967年；F.兰普，1979年。

㉓ F. B.利文斯通，1958年，第553页。

F.B. 利文斯通把这一特点的传播与后来来自西苏丹的讲曼德语的人的迁移联系起来。根据他的论断，传人森林地带的新式农业，创造了有利于疟蚊滋生的环境条件，从而使镰状细胞基因在自然选择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人们普遍认为，在讲曼德语的人们来到之前，海岸地区的居民所知的耕作和冶炼技术寥寥无几。但讲曼德语人们的到来只是公元 16 世纪的事。所有上述这一切导致人口猛增。

这种论点的一个变种认为，曼德人的到来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而且还认为这包含着更多的文明含意。他们把农业、铁器制造、高级的社会政治体制、长途贸易，以及随之而发展的复杂的经济制度和手工行业组织的引进都一概归之于曼德人。在这方面，还有各式各样的多种说法：早在公元 3 世纪，受到柏柏尔游牧民威胁的西苏丹各国就开始施加压力，促使居民向沿海地区移居。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因为如此，这里存在着一系列的居民层。[24] 它们从沿海地区向外分布，第一层是本地居民的遗留部分。在塞拉利昂，这种人是与基西人和克林人有着紧密关系的布隆人，这三者的语言是互相联系的。地名似乎表明许多现在由门德人、科诺人和瓦伊人居住的地方先前曾属于基西人。居住在现在利比里亚边境的戈拉人像其他人那样讲某种南方梅尔语。这种语言的名词分类体系类似班图语。林巴语也有一个名词分类体系，并经常与其他梅尔语一起被归人“西大西洋”亚语系。 **543**

稍后来到这里的是讲北方梅尔语的巴加人和滕内人，两者相互关系密切，定居在稍靠内陆的土地上。滕内人、纳卢人、兰杜马人，以及更北面的科科利人，似乎代表着第二层来得稍晚的居民。这些人一直被称为“曼丁哥之前的人”。滕内人、基西人、林巴人、巴加人和兰杜马人都是富塔贾隆地区最早的定居者。大约 13 世纪，他们最终被讲曼德语的索索人逐出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往西和往南迁移，向海岸的方向占领了更肥沃的土地。索索人在取代他们之后，随着自身的繁衍也开始向海岸方向推移。

萨皮人和兰杜马人仍旧留在内地，紧挨着纳卢人和巴加人之后，滕内人一直推进到塞拉利昂河河口，在 16 世纪，把布隆人切割成两部分，自己成为塞拉利昂海岸地带最强大的部族。

巴加人、兰杜马人和滕内人在索索人长驱直人他们中间之前一直属于同一族群。其中，现在占据几内亚的巴加人渐渐被索索人所同化。与他们原来属于同一部族的滕内人却一直保持自身的特点，并且还把沿海地区的布隆人、洛科人、科兰科人、富尔贝人，甚至更靠内地的索索人，吸收进来。

集中注意力于经济、生态和社会结构的 G.P. 默多克把这一地区划分成两部分：(1) 塞内冈比亚整块地方完全讲西大西洋诸语，其特点是：母系，苏丹型作物的密集分布，具有热带草原环境，有有利的文化接触条件，以及苏丹人的入侵。(2) 从几内亚沿海到萨桑德拉河附近的地区。这里由一群人们称之为“克鲁人和外围曼德人”的人居住，尽管他们讲各种各样的方言，这些方言都属于曼德语，克瓦语（克鲁语）以及西大

[24] A. L. 马博贡杰（A. L. Mabogunje），1971 年，第 7－9 页。

西洋语（梅尔语）系统。这些人在历史上和社会中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25]

W.L.德－阿塞韦多后来指出，后一地区的一小部分地方（在塞拉利昂南部和利比里亚西北部）显示了某些独特之处：多种语言的密集，历史上各种居民的流入，以及存在着跨越不固定的语言界线而建立起来的跨部族联盟。人们称这一分区为“西大西洋地区中央地带”，为的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鲜明的历史和人种的特征上。这些特征使得这一沿海部族文化群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其他各族。[26]

544 另一个显然更言之成理的论点认为，在“曼丁哥人”到来之前，上几内亚部分地区已经有了稳固的铁器制造业和农业生产，“曼丁哥人”的到来，仅仅是在为当地农业体系和社会－政治体制增加苏丹地区成分方面起了先驱作用。显然从上文看，人们仍需要对这一地区文化史上的某些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其中有些问题涉及人们什么时候从西苏丹来到南方，他们是谁，来自什么地区，要去什么地区；流动的特点，流动又引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果确有变化的话。我们尤其想知道这里何时开始种植上几内亚本地作物，苏丹型作物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其相对重要性何在；人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懂得铁器制造和长途贸易的，所引起的后果又如何。

在著名的马内人入侵以前的长时间里，该地区文化交流已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这种交流包括各种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迁入沿海人烟稀少的森林地区和他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公元1440－1700年，欧洲人的记载中所报道过的沿海地区一些人种语言单位，今天多数仍按原来的顺序存在着。虽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为之辩护时注意到了它们的位置和领土的大小在某些程度上有所改变，但他们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不能单纯根据名称、语言和位置相似就把现代的群体当做过去历史上的部族文化在血缘上和文化上的直接传人。因为该地区在几个世纪里经历的变化十分剧烈。

塞内冈比亚

在塞内冈比亚地区考古学的根据表明，下卡萨芒斯的卢贾和沃洛夫地区早在基督纪元前的第一个一千年就已有人居住了。直到公元200年，居民点仍很稀少。居民住在低沙脊上所建的小营地里。

O.利纳雷斯·德－萨皮尔认为，这些人来自东方，因为他们的陶器与广泛分布在从佛得角到阿尔及利亚南部，甚至更远达到中部非洲的新石器时代波状刻纹之类陶器有着相同的装饰技术。[27] 海岸地区的定居者们慢慢适应了海岸地带的生活，这一事实由于软体动物残骸的出土而得到证实，O.利纳雷斯·德－萨皮尔推测人们在这时（即公元

545 前200年到公元200年间）就开始种植水稻了。[28] 这种新的重大的对生活的适应是由新

---

[25] G. P.默多克，1959年。

[26] W. L.德－阿泽韦多（W. L. D'Azevedo），1962年。

[27] O.利纳雷斯·德－萨皮尔（O. Linares de Sapir），1971年，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4章

[28] 根据A.波特雷（A. Portères），1950年，塞内冈比亚是非洲稻米繁殖的第二中心。

5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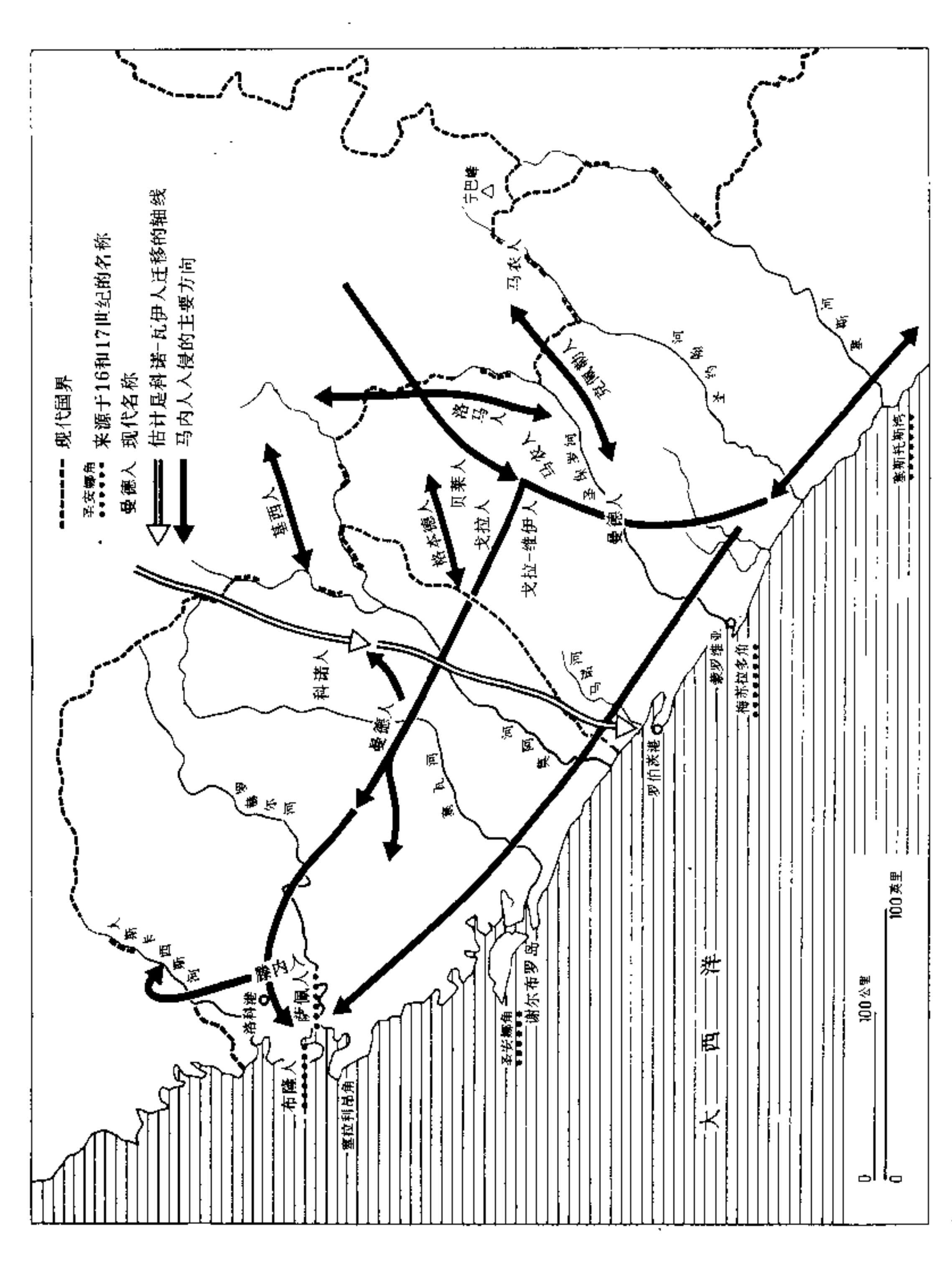


插图18.4　上几内亚地区的人口移动

定居者引入的。他们可能是来自南方并取代了为数不多原有居民的迪尤拉人的祖先。

在定居的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驯养羊和/或山羊，牛继续存在，而鱼已成为常用食品了。

在已识别出的第四个阶段和最后阶段出现了两种新的家畜，猪和狗。陶器与前面时期制作的基本一样。不过，正像今天的迪尤拉人那样，那时的居民已不再制造那种小小的带盖的碗了。O. 利纳雷斯·德－萨皮尔对考古的证据，特别是陶器进行了解释，认为它表明在后面的三个阶段中迪尤拉人已占据了卡萨芒斯河三角洲和松德罗古河之间的所有冲积平原。

除了卡萨芒斯地区外，塞内加尔河口圣路易附近以及辛－萨卢姆三角洲（若阿勒、甘杜尔和班迪亚拉）如果不是更早的时候，也是在同样早的时候已有人居住。O. 利纳雷斯·德－萨皮尔注意到尽管在另一些河湾发现的贝冢有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但绝大多数则属于早铁器时代，而有些地方则是在欧洲人来到时才有人居住。在焦内瓦尔发现一座这样的贝冢居民点的复合体竟然有足足 40 多处墓葬。新近挖掘出土了铁器时代的物品（锄头、珠子、手镯和陶器）。[29]在卡萨芒斯和圣路易地区发现的陶器总的说来是相同的。在卡萨芒斯和佛得角，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装饰技术都持续到早铁器时代。这两个地区器皿的形状（各种型号扁球形、卵圆形，还有中型喇叭口瓶颈的坛子）都有某种隐隐约约的相似处。

没有出现语言方面的证据足以说明迪尤拉人来自东方的说法。人们却是把古代迪尤拉人扩散的中心确定在南方，也就是几内亚－比绍沿海一带 这里还住有曼迪亚克人和巴兰特人，两者在语言上与迪尤拉人有亲缘关系，他们和迪尤拉人一样也种植水稻，并使用一种独特的叫做卡扬多（*Kayando*）的手铲。从考古学角度看也有可以质疑之处，因为采集甲壳类动物的做法（第二阶段陶器上的贝壳纹以及鱼的残骸的存在）表明他们起源地在沿海地区，而不是东方的内陆。

公元 300 年前后，迪尤拉人已在利用红树林带和水中丰富的动物群，那时他们也可能已在从事农耕，有可能水稻栽培已达高级阶段。从定居的第二阶段开始，迪尤拉文化已显示出许多可供辨认的特点了。就像今天一样，他们的群体居住在沙脊上，或者靠近河流的冲击层，把废弃物丢弃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的贝冢中发现陶器碎片和另外一些可以与今天的迪尤拉物质文化相对照的废弃物。现在还不能肯定迪尤拉人是否把罐子同死者一起埋葬，因为在他们的遗址或附近地方都没有发现坟墓。

546

过去八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冈比亚河以北塞内冈比亚地区，从距河口 360 多公里的法拉－芬尼向东一直延伸到塞内加尔的坦巴昆达，方圆 30 000 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发现好多大型的石头（巨石）圈建筑群（见插图 16.2－16.4）。所用石头通常是从分布在这个热带草原地区的低矮红土丘陵中开采来的。最早发现的巨石圈是由竖立的石头和排列成行的红土块组成，石头数目从 8 至 24 不等，高可达 4 米。位于迪亚洛姆贝尔的

[29] C. 德尚（C. Descamps）、G. 蒂尔曼（G. Thilmans）、Y. 托默雷特（Y. Thommeret），1974年；G. 蒂尔曼和 C. 德尚，即将出版。

一组，可能是人类迄今所知道的最大一组，至少有54个石头圈组成，每个圈直径达8米。但圈内部的大小却因石头的大小和数量而异。一般都是两个圈一组或三个圈一组，有些里面是平的，有些是凹进去的，更多的比地面略高，任何圈中石头的大小都是相同的——一般高1－2米不等。石头的形状一般是圆柱形。大多数圈前都有一对面向正东的石头，偶尔也有被雕成"Y"字形的巨石。[30]

考古研究断定这些纪念碑形式的巨石是墓地。看来石头圈原来要高得多，上面还盖有沙和红土。一排排相毗邻的圆圈是各个朝代的国王和祭司的墓地，而较小的那些则是地方上的酋长或祭司的坟。也有人认为面向东的"Y"字形石头和外面的那对可能表示对太阳的崇拜。

从这些巨石圈中出土的陶器与在塞内加尔的拉奥、辛和萨赫勒地区古墓中出土的陶器类似。[31] 虽然过去人们把这些陶器的时间确定为14世纪，[32] 但达喀尔大学在辛－萨卢姆地区的挖掘证明其年代应在公元1000年前后。[33]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4000多座土墩，其中有一些高达5米直径为40米。经过发掘出来的那些表明是群葬墓。在迪奥尤·布马克一地类似的墓就有41处。[34] 随葬品十分丰富，包括金的和用光玉髓制作的串珠、铁制武器、金和铜的首饰；在其中一个墓穴里还发现金胸饰。人们把这个地区金属出现的时间（首饰和其他随葬品）确定为公元4－6世纪。然而，光玉髓串珠出自11世纪前的遗址中，同时也表明这种珠子当时可能是从尼罗河流域传入的。

在尼日尔河上游，主要是在塞古以下地区，发掘出了其他一些具有同样丰富发现物的土墩。在库加，一座与竖立的石头有联系的土墩已确定其年代为公元1000年前后。[35] 所以能出现这种富裕的境况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掌握了矿产资源，同时也由于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农业潜力。 547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巨石建筑者的时期，西苏丹和塞内冈比亚之间有着重要的交往和联系。阿拉伯地理学家巴克里所描述的11世纪一位加纳国王的葬礼在某些方面与塞内冈比亚的墓葬中所发现的非常类似。[36] 某些现代历史学者由此判断，这些证据和对埋葬时间更早的估计都表明它们起源于西苏丹的加纳国家（不排除索宁克人的流动）。从已有证据的分量看，巨石建筑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成就应该归功于今天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主要是曼丁哥人、沃洛夫人和富尔贝人）的祖先们努力的结果。就已知的状况而言，只有迪尤拉人被认为曾在巨石圈建筑群的时代生活在这块地方。然而，在一些建筑群中（如瓦苏）所发现的陶器与其他（如法拉－芬尼）所发现的有很大不同这一事实可以表明许多文化相似的族群都曾使用这样的埋葬方式。此外，

---

[30] G.蒂尔曼，C.德尚和B.哈亚特（B. Khayat），1980年。
[31] M.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1973年。
[32] J.乔伊尔（J. Joire），1955年。
[33] G.蒂尔曼和C.德尚，1974年、1975年。
[34] 同上。
[35] R.莫尼，1961年，第109－110页。
[36] 巴克里（al-Bakrī），1913年，第176页。

石雕风格多种多样表明这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

在塞拉利昂的热带稀树草原林地区，特别是在东北高地上，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洞穴和石窟。从很早年代起，有时甚至远远早于晚石器时代，人们就占据像卡马拜、亚加拉、卡巴拉、卡科亚、耶盖马和布农布那样的洞穴和石窟，在里面生活、居住。J.H.阿瑟顿在卡马拜和亚加拉（芒特角以北不到320公里处的两处石窟）进行考古挖掘以及C.库恩在耶盖马进行的挖掘都揭示：根据其较后期的地层，使用铁器阶段的年代早在公元7或8世纪；石器工具至少使用到14世纪。[37] 新石器时代，这里居民的主要食品肯定包括油棕、角豆、野生薯蓣、猎物、鱼、蜂蜜和小水果。在塞拉利昂东北的科兰科地区发现一些大型冶炼场遗址，遗憾的是未能确定其年代。

卡马拜的两个最近期地层（第三和第四地层）的时间分别属公元6－9世纪和6－10世纪之间。从这些地层中出土的陶器，特别是印有锯齿波浪形三角印记的那些陶器，明显地不同于从科伊杜[38]和东北方的博城[39]周围那些较小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紧接着是铁器时代的地层，至少在博城东北情况是如此。M.H.希尔称这一传统为"塞法杜－坦科罗"传统，其特点为铁器制造冶炼技术（矿渣、吹风管嘴的碎片）。人们在一个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陶熔罐残缺不全的部分和一个铸模，显然是用失蜡的方法铸造铜器。在另一个遗址中，人们同时发现铁制品和切削用的石头工具，M.H.希尔认为这里可能是从事宗教仪式的地方。堆积层是短期内形成的。人们把几座没有发现陶器的遗址和零散发现的石头工具解释为：与耶盖马的下、中耶盖曼洞穴相同或甚至同出一源的工艺在东部和南部各省分布很广。[40]

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上几内亚这一地区住在森林地带和热带草原上的人们相互间在很早以前就有联系。贸易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交流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人们用丝绸、棉花和少量金子换取北方河流里（如斯卡塞斯河及梅拉科里埃河）所产的牡蛎。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森林地带很早就有了繁盛的文化。其中有被人们称之为"诺莫利"（*nomoli*）和"蓬丹"（*pomdan*）的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皂石祖先像[41] 以及上文提到过的巨石建筑群，从几内亚经过塞拉利昂到利比里亚都可以见到这种巨石。有些学者认为这两种文化传统与铁的引进大致属于同一时代，意思就是说铁和这两种传统当时就已引入了森林地区。[42]

一些与此同时期的陶器的特征（诸如目前塞拉利昂北部还在制造的那种瓶颈紧缩边缘张开的球状陶器），看来是新石器时代传统的继续，并且与几内亚富塔贾隆的陶器相

[37] J. H. 阿瑟顿（J. H. Atherton），1972年；C. 库恩（C. Coon），1968年。
[38] P. 奥赞（P. Ozanne），1966年，第15页。
[39] M. H. 希尔（M. H. Hill），1970年。
[40] 同上。
[41] J. H. 阿瑟顿和M. 卡洛斯（M. Kalous），1970年。
[42] A. P. 库普（A. P. Kup），1975年。

仿。不管陶器和铁器制造术是否曾被引入森林地区，塞拉利昂和象牙海岸之间的地区，表现出在有记载的历史以前很久，就存在复杂的国家组织所具有的特点。这些表现在性质上与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的文明很不相同。

利比里亚雨林地带的早铁器时代陶器看上去与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上半期津巴布韦铁器时代的陶器相仿。[43] 这一文明的复合体包括：有刻纹、印花和棱凸纹的呈坛状与碗状的器皿；用柱子支撑并涂泥的草屋；略为升高的平台；炼铁剩下的矿渣；妇女祈求生育的崇拜物；泥制的牛；驼鸟壳做的串珠；铜和青铜制品。后三种人工制品迄今尚未 549 在利比里亚的文化复合体中出土过。利比里亚的陶器与西非其他地区早铁器时代的陶器相同处极其明显。如在马里、塞内加尔和加纳各个遗址中发现的印有花纹的器皿上的那种摇杆纹和锯齿纹，以及器皿的形状、式样在设计上都有特别的相象的地方。

在利比里亚发现的陶器很容易识别出来，因而可以用来对其文化进行有效的分析。关于人种志方面的材料，“曼丁哥”人－洛莫人－克佩勒人－马诺人的制品相象到足以把它们归入同一个在遗传上相互关联的文化传统分支，这实际上是最复杂多样的“曼丁哥”器皿与最简单的马诺器皿所具特征的连续体。在器皿的设计和形状方面“曼丁哥”人的制品品种最多也最复杂，马诺人的最简单。实际上洛莫人－克佩勒人－马诺人的陶器远非如此复杂。根据K.G.奥尔的说法，这符合曼德核心中文化更为先进的“曼丁哥”人及被称为外围曼德人的情况。[44] 博福塔、桑克里一号和班沙的陶瓷看起来与外围曼德人的陶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K.G.奥尔认为，尽管他还没有掌握各种风格的时间顺序，无法说出它们究竟早多长时间，但“肯定”是更早。

从人们已知的“蓬丹”和“诺莫利”人像为例，数以千计的各种各样石雕都使用这两个名字，从歇尔布罗岛向北延伸到几内亚的基西共350公里长的地方以及从利比里亚西部向西延伸到滕内共220公里长的地方内发现了成千这样的雕像，整个地区连续涌现、几乎没有中断之处，尽管在基西发现的“蓬丹”和在塞拉利昂发现的“诺莫利”在风格上颇不相同。这一地区的植被是乔木林，定居的人口务农为生，以种植水稻为主食，但却分属两个不同语种。北面的基西人和沿海的布隆－歇尔布罗人讲同一语种的语言，却基本不同于住在他们中间、把他们分割开来的曼德人和科诺人所讲的语言。除了为数众多和分布广泛的特点外，“诺莫利”和“蓬丹”体积小，易于携带，因而很早就为欧洲人收藏，可用作研究。

虽然一直有一种否定曼德人是这些石雕人像创作者的倾向，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来得晚。尽管如此，J.H.阿瑟顿和M.卡洛斯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两人确信曼德人是由较早的当地居民群和较近期的“曼丁哥人”成分所组成。按照他们两人的观点，被早期来此地访问者称为“萨佩人”（不包括与之有联系的诸如歇尔布罗人那样的沿海居民）的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是“诺莫利”的创作者。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是，“诺莫利”雕像 550 具有北部曼德人的身体特征——大头、独具一格的长而下垂的胡子。[45]

---

[43] K. G. 奥尔（K. G. Orr），1971－1972年，第77页。

[44] 同上。

[45] J. H. 阿瑟顿和M. 卡洛斯，1970年，第307页。

Y.佩尔松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从对当地传统、地方名称和早期欧洲人的编年史的研究中得出推论："诺莫利"出土的地区过去完全是由讲西大西洋亚语系语言的居民所占据。[46] 所有有关的证据都表明，他把曼德人向南迁移到他们目前居住的地方的时间定在四个世纪以前，未免估计得太近。举例而言，住在尼日尔河流域更远处覆盖森林的高地上的基西人，尽管是由非常复杂的部族成分所组成，但是，看起来他们不仅保留了他们所讲的语言，而且还保留了他们许多文化传统，其中包括如今以不如当初那样复杂的方式传流下来的石雕技艺。最近在塞拉利昂的考古发现，说明从6世纪到7世纪，这里广泛流传着一种有着独特制陶传统的使用金属的文化。考古证据也表明，这种铁器文化和"诺莫利"传统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在风格相似的基础上，J.H.阿瑟顿和M.卡洛斯认为第一个"诺莫利"肯定是模仿西苏丹黏土小雕像制成的。按照他们两人的说法，制作"诺莫利"的传统是从西苏丹引进的，时间约在公元6或7世纪，与在卡马拜首次出现一些独特的陶器（还有铁器）是同一时间。[47] 虽然人们确有可能是在早铁器时代就开始制作石雕了，但是这两位学者并没有提供石雕技术是从西苏丹传到北方的证据。实际上，他们宁愿对下列事实充耳不闻：这一带的木雕与石雕（不是泥雕）共同之处很多，因此，完全有可能最初获得石雕技术是通过木雕。从外界引进的说法也没有考虑如下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这一传统的独特之处在于是石雕而不是泥雕，而且这些石雕风格、品种繁多。总之，如果在石雕之前先有泥雕技术，为什么没有发现与之相联系的泥雕人像（陶俑）就难以解释了，当地人是用黏土制作器皿的。

P.阿利森指出，大多数石雕用的是滑石或皂石，少数是用绿泥石页岩和闪石，还有个别用硬石（如花冈岩、玄武岩和沙石等坚硬的岩石）雕刻而成。[48] 由于石雕数量很大，有理由认为它们一般都是在就近尽可能接近丰富的原料来源地的地方制成的。石雕数目之多、分布之广、使用石头和木头而非黏土这一事实，以及形式之多样，所有这一切表明这是一种起源于当地的传统，而不是从外界引入的。它繁衍出如此众多的形式，主要是对当地文化上和生态上的压力和差别做出的一种反应。实际上，如果按照J.H.阿瑟顿和M.卡洛斯的说法，第一个"诺莫利"是模仿西苏丹的泥雕人像制成的话，难以解释的是这些森林地带的居民为什么没有试图制造泥制品呢——这无论如何更容易也更有可能做成——，因为这一带到处都有黏土，并且人们已经用黏土做器皿。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能维妙维肖地模仿别人制品的这些人们，不仅学得快，而且能迅速把新学到的东西转变成当地的风格，并且使用当地的物质，然而他们却没有发现他们自己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原料的潜力，居然要等到潘朵拉盒子在他们面前打开，才看到一两个泥雕小人像。面对上述有说服力的证据，我们应该承认，"诺莫利"是长期居住在这里的人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来的成果。接受这种说法不仅更合乎逻辑，而且对于认真审查这一艺术/科学传统由南向北传播的可能性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这并非一个偶然出现的

551

[46] Y.佩尔松（Y. Person），1972年。
[47] J. H.阿瑟顿和M.卡洛斯，1970年，第312页。
[48] P.阿利森（P. Allison），1968年，第37页。

事件，石雕传统在几内亚地区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例如在约鲁巴兰的埃西、又如在克罗斯河地区埃科伊人中间的阿克万希文化。

年代方面的证据也不足以证实这样一种看法，即"诺莫利"的制作方法是从苏丹地区通过赤陶艺术这一间接途径传入的。在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杰内－杰诺从事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人们在一个已能确定其在年代为公元1000年和1300年之间的场所发现了一个赤陶雕像。[48] 如果这个年代就是该地区这一艺术传统开始的日期，就表明它比塞拉利昂的"诺莫利"石雕传统要开始得晚得多，塞拉利昂的石雕术始于公元6至7世纪。

大多数不同形状的雕像，尽管很少雕出生殖器官，但仍代表着男性。典型的"诺莫利"通常高15－20厘米，"蓬丹"一般在7.5－15厘米之间，虽然在这一地区各处都发现几个高度超过30厘米的样品。典型的"蓬丹"呈圆柱形，基本上是圆柱体裹上一个没有五官的球状的头，这不可避免地被人描绘成男性生殖器。

以这种简化了的外形，石雕雕出了足以表示人体的各个部分。举例而言，克罗斯河的大"阿克万希"，头上有五官，身体上有浅浮雕的手臂，[49] 也发现几个球茎状的女像已经发现的雕工精致的人像男女都有，只是男性数目更多。这些雕品技艺精巧，有头饰 552 或梳理过的头发，也有串珠和作为装饰的纹身花纹。男性雕像经常刻有串珠，有的鼻子刻出线条，露出牙齿，手里拿着棍棒或武器。在那些仍保留着典型圆柱体形状的"蓬丹"中有少数成群的雕像，即几个小雕像围绕着中央一个大雕像。这些制作精致的雕像和雕像群偶尔出现在来自几内亚的基西地区的收藏品中，也许主要起源于塞拉利昂的基西地区南部以及基西和曼德接壤的科诺地区。

虽然基西人的长老们都相信"蓬丹"是由他们的祖先在遥远的年代里制作的，然而这里一般的人们普遍认为雕像起源于敬神，而且总是代表某些特定的祖先。另一方面，在曼德人中间"诺莫利"却被意味深长地同原来的土地占有者而不是同他们的祖先联系了起来。"诺莫利"一般都是在农场的神龛中发现的，之所以放在那里，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的存在会保证稻谷丰收。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从2500年前起，讲梅尔语的人就占据了塞拉利昂南部、利比里亚北部和毗邻的几内亚部分地区，他们的扩张很可能是以牺牲讲克瓦语的人为代价的。约在同一时期，曼德诺语就从原来的马里与几内亚交界处的老家传播开来并日益分化。曼德人祖先的一支往北向科诺－瓦伊人、科兰科人、马林克人和其他人住的地方推移，最终广泛地分布在苏丹地区。后来，科诺－瓦伊人这一支又向西南方向推进，把基西人和戈拉人从讲梅尔语的人群中分离出来。在此之后，也许是在相当近的时候，早已具有自身特色的另一支曼德人向西北推进，把还没有被科诺－瓦伊人先头部队分割开的基西人和戈拉人进一步分开。这一支向西北推进的曼德人（通称为曼德－洛科人）后来又被这一地区[50] 以北讲滕内语人的向东扩张所分开。M.H. 希尔提出这

---

[48] R. J. 麦金托什（R. J. McIntosh）和S. K. 麦金托什（S. K. McIntosh），1979年，第51－53页。
[49] 参阅本书第17章。
[50] P. E. H. 海尔，1968年（a）、1968年（b）。

样一种可能性：塞法杜－坦科罗考古传统的出现与科诺－瓦伊人向西南的扩张有关。[52]然而，这个说法却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一种语言（科诺－瓦伊语）的传播显而易见，而另一种非常相似的语言（曼德－洛科语）的传播却并非如此？

利比里亚西北的瓦伊人（讲北方曼德语）向海岸地区流动和利格比人向象牙海岸东部流动，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尽管他们所讲的语言相似。可能性更大的是瓦伊人与科诺人是一起移入今天的塞拉利昂的。关于科诺人"被留下"的传说容易造成误解。看来更可能是科诺人、瓦伊人和讲现已消失的达马语的人，从塞拉利昂东部到沿海连成了一片，而把戈拉人和基西人与其他讲梅尔语的人隔开。后来（也许是在17世纪中叶以前），这一片人又势必因讲西南方曼德语的人西迁而分裂。

553

瓦伊人的"迁移"所采用的并非大举出走或进行征服的方式，他们很可能是逐步打开贸易通道，由少数讲北方曼德语的人住在沿海地区，多数人则把盐、干鱼以及其他商品从海岸地区贩运到尼日尔河发源处。尽管最后贸易通道在某种程度上遭到破坏，但瓦伊语在海岸附近被保存下来，这既是由于这种语言在贸易中处于重要地位，也是由于与曼登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完全被切断。

M.H.希尔由于也相信在与欧洲的贸易开始前长时间里盐和干鱼在长途贸易中必然占有突出的地位，因而得出如下的结论：(1)讲曼登语的人进人森林地区，最后向海岸扩张，这是与商路的建立紧密联系着的；(2)这些商路又与有关地区人口的不断增长相联系（互为因果?）；(3)人口不断增长为更复杂的政治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适应基本上依赖对外贸易的人们的需要，而且可能是仿效西苏丹政体的模式；(4)曼登语作为商人和统治者的用语而享有声誉。它促使原始科诺/达马/瓦伊语取代了先前的梅尔语。[53]

根据近来的研究，讲北方曼德语的群体不是一下子来到森林地区的，他们是逐步分小批来的，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进人森林地区的时间比人们原来设想的要早。长途贸易在促进社会－政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在这方面对贸易的主要从事者、诸如瓦伊人，所发生的影响看来都是巨大的。现在人们认识到，瓦伊人来到利比里亚的时间比Y.佩尔松提出的1455年这一日期要早几个世纪，则是完全可能的。[54]

语言学的证据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迹象：A.琼斯的报告认为，科诺语和瓦伊语明显地是从西南方曼德语借用了一些字（例如"鱼"、"家禽"、"独木舟"、"紫木"、"棉花"和"铁"），有些字是与梅尔语和西南方曼德语共用，但不同于曼登语（如"短"、"天花"），至少有一个字（"大象"）似乎是只与基西语共用的。这些借用的字可能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如果这样的话，就意味着科诺－瓦伊文明是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经过交叉混同以非常渐进的步伐发展起来的。[55]

554

Y.佩尔松把瓦伊人和科诺人的迁移简单地算作是一场发生于公元15或16世纪的快

[52] M.H.希尔，1972年，第1－2页。
[53] 同上。
[54] Y.佩尔松，1971年。
[55] A.琼斯（A. Jones），1981年。

速入侵，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不能用一次战斗或一个领袖的行为来解释的。同样，新的商路大多数是逐渐演变成的，而不是一场突发的军事征服的结果。

我们更关心的是，人们由于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原因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流动情况。所产生的结果是由于通婚引起了人种的变异、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语言的发展或退化。Y. 佩尔松所描绘的许多事态，其中包括瓦伊人的来到，都可能发生在几个世纪前，而且是以远比他想象慢得多的步伐进行的。

根据 A. 琼斯的说法，讲瓦伊语的人们由于与本地人通婚而人口得以增加。这些本地人不仅有讲梅尔语的人，也有迪耶人。根据 19 世纪的资料，迪耶人原来一直住在沿海地区比现在更广阔的土地上。这样瓦伊人就不会再被认为完全是陌生的外来人了。[56] 如果从商路（有时可能用军事手段去扩充和保护它）的角度看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对关于迁移、征服和领土扩张等口头传说赋以更多的含义。除了沿海少量的地道的瓦伊人外，可能还有大批讲瓦伊语或讲与之相关语言的人，在联接曼登卡地区与海岸地区的一些窄长地带来回移动，并且在这些窄长地带的分叉点上建立起一些居民点；但这种居民点看来并不控制大片领域。

关于通过多方面深入的研究，是否有可能为瓦伊人的起源提供进一步线索的问题，A. 琼斯恰如其分地指出，即使能进一步发现 16 或 17 世纪的书面材料，也不太可能告诉我们这方面更多新情况。他认为口头传说（象关于塞拉利昂东部和利比里亚西北部的口头传说）有可能提供某些帮助。卡马拉人的情况被挑出来作进一步研究，总的说来，如能了解一个特定地区不讲曼登语的人中广泛使用曼登人名的情况肯定是有用处的。与此相联系的是要作社会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这样做可能了解瓦伊人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里保留曼登人特点的程度。

在瓦伊人地区几乎没有进行过考古研究。如果 N.H. 希尔关于各种具有特色的陶器的流入和瓦伊人地区北部新的居民点格局的证据能够得到确认，[57] 对于瓦伊人的起源很可能会作出一些推断，当然如果仅仅以陶器样式为基础简单地划出边界肯定是危险的。17 世纪早期一些地图已经标出海岸地区某些居民点的位置，即使仅仅只是为了能找出它们当时大概有多大规模，也将是值得进行研究的。关于“诺莫利”的研究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了解这一地区早期使用铁的情况则更是十分关键的。 555

但是最主要的贡献必然来自语言学家，过去 15 年间，在把该地区的语言分成几个“语种”或“分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希望人们现在能用一部分精力来填补这些“语种”之间的空白，并且力求发现不同语种的各个语言之间的共同处。在这样做之

---

[56] 同上，162 页。A. 琼斯还指出，为什么北曼德语如此普遍地用于贸易，尽管这可能与其语法简单有关，但这样解释还不能令人满意。需要强调的是：瓦伊语确是被用作贸易语言以及此事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A·琼斯观察到瓦伊语之所以能被采纳为贸易用语，看来是意味着有一个由讲瓦伊语的人所经营的货物市场。也许不讲瓦伊语的人愿意让瓦伊语作为一种通用语言，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瓦伊语作为一种“优越”文明的代表。或许瓦伊语不象有些语言那样带有很强的部族意识。甚至使人想象瓦伊语的传播也使讲瓦伊语的人携带的疾病得以传播，正如对班图语族的扩张也有过类似说法一样。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证实这种看法。

[57] M. H. 希尔，1972 年，第 1—2 页。

前要表明瓦伊语与曼德语或克林语有什么不同是决无可能的。外来语和借用字对进一步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将曼德语、瓦伊语、克林语及戈拉语的各种方言加以比较，也能说明问题。最后，语言学研究，可能会对现代讲梅尔语的人的分布状况和以"*Ma*"字打头的河名的分布之间的明显不同，作出解释。

看起来，很早以前苏丹地区和几内亚森林地区的居民就有联系，这导致苏丹地区的某些居民，如索宁克人和曼德人，向南、向东迁移到低地森林的一些地方。但是如果说这些移入者人口多到足以取代本地人的地步，那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更大程度上本地人并不仅仅是人们想象中从事狩猎－采集或渔业的克瓦人，也不像 G.P. 默多克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与世隔绝的不良生态环境，本地人和移民通常在文化上都处于停滞甚至退化状态。[59] 相反，历史事实揭示，居住在该地区的各个群体，生气勃勃地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区变型。

在各个部族，语言从属关系和文化型式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联系，但并不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密切与经常。广泛分布在海岸地区的讲西大西洋亚语系诸语的人们，诸如沃洛夫人、塞雷尔人、迪尤拉人、纳卢人、滕内人、基西人和戈拉人可能代表这一地区古代居民的剩余部分，但他们并未构成史前时期居住在整个西部非洲当初尼格罗人那种"古代原始"森林文化。因此利比里亚东南和象牙海岸西部讲克瓦语的人们也并非这些群体中最原始的人。事实上，大部分考古成果以及迄今能收集到的与之相联系的证据，都无可争辩地表明：集约农业、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同业工会、世袭等级制、军事机构、贸易及市场系统早在受到苏丹地区人侵与影响之前，无疑是公元 7－11 世纪之间，就已成为这里各族人民的生活特征了。

556

考古学和人类学两方面的证据看来都支持这一论点：这里的一些重大特征，如铁器制造和国家生活等都是不同时期不同族群间相互能动地推动的结果；而不是由来自苏丹地区的文化强加给他们的。这些证据表明在西大西洋沿海地区，水稻是比棉花、小米和高粱更为重要的集约种植的作物。而主张源自苏丹地区的人则把后两者的重要性置于不适当的位置，它们可能是由来自北方的移民或与北方交往时引进的。

利比里亚南部和象牙海岸西部看来是这种农业传统的分界线。把鲍勒人和克鲁人隔开的邦达马河也是薯蓣集约种植的北部分界线。据说在分界线以北农业中出现薯蓣的地方，收获时不进行那种精心安排的典礼。这种典礼仪式却在南方的阿格尼人以及其他讲克瓦语的人中间进行着。

然而，圣保罗河以北和向东沿森林地区边缘，在西大西洋地区中央地带的人们中间，水稻仍是集约农业的基本作物，而苏丹地区的重要农作物如小米、棉花和高粱，很少传入几内亚－利比里亚边界以西的地方，也很少传到滕内人、曼德人、科兰科人和塞拉利昂的科诺人居住地以南。在利比里亚西北部省份，德人、戈拉人和西部克佩勒人都不种植这些农作物。只有相对来说较近的时候有"曼丁哥"人定居的地方，或过去长期受其影响的地方才是例外。后一种情况主要存在于沿圣保罗河向西直到如今博波罗城这

[59] G. P. 默多克，1959 年，第 70－71、259－260 页。

一条窄长的地带，也存在于基西人、洛马人和吉奥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的领土已深入到了几内亚高平原。

结 论

目前，人们已掌握的本卷所论述时期上几内亚地区历史的状况，实在难以令人满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仅仅是把迄今能收集到的在这一地区已进行过的考古和语言方面的探索结果，收集到一起并加以探讨。但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中空白仍多于确切的事实，而且多数仍属尚待证实的假设。此种情况迫切需要制定一个以各方面专家通力合作 **557** 为基础的系统的研究战略。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新的不偏不倚的看法，能使我们正确地看待上几内亚各族人民的历史。不仅把他们当作接受外界影响的对象，这种影响可能来自北方，后来也可能来自南方，总之，应该把他们作为历史进程的积极参与者看待。



非洲之角

T.T. 梅库里阿

558　公元7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地图还没有固定的轮廓。地图上所标的只是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公元6世纪中叶所著《基督教徒分布状况》(*Christian Topograply*) 一书中所提到的为数不多的城镇和地区。但这张地图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以尼罗河、红海和印度洋为界的那些地区的第一手资料。举例而言，它告诉我们“从阿克苏姆……到称作柏培拉的产香之邦，这片处于大海之滨的土地，距埃塞俄比亚最僻远的地区萨苏十分遥远，有40天左右的路程。”①

科斯马斯还写到数以百计的商人在上述那些地区到处奔忙出卖牛、盐和铁，无疑还有拜占廷工艺品，以换取“块金”，同时进行的还有香料、熏香和肉桂的贸易。这位来自亚历山大的作者，他本人就是一个商人。他写道，阿克苏姆国王“通过阿高地区总督的代理，”控制着这些贸易的大部分。当时的两个大城市是阿克苏姆和它的港口阿杜利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到了公元7世纪总的形势有任何重大的变化，阿克苏姆王国在上个世纪已达到其鼎盛时期，虽然没有关于公元7世纪情况的直接资料，无疑它仍然保持了原有的势力。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阿克苏姆王国所面临的险情正在加剧，衰落已接近来到。可是公元8世纪初，伍麦叶王朝的一位哈里发还叫人在约旦的库赛尔·阿姆拉他王宫的墙上绘制了世界上四位国王的画像。他们是西哥特的西班牙国王、拜占廷国王、波斯国王和阿克苏姆国王。这件事充分证明这四个君王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这位有争议的哈里发声称业已征服了他们。②

阿克苏姆王国的衰落

559　历史上首次提到阿克苏姆王国是在公元2世纪初（或许是1世纪末）《红海巡航记》(*Periplus of the Eruthraean Sea*) 一书中有所记载。该王国在公元4世纪伊扎纳国王统治时期享有很高声誉。它的财富来自养牛、务农，特别是来自贸易，最突出的是从象牙贸易中逐步积累起来。阿克苏姆王国通过阿杜利斯港和红海，与地中海沿岸各国和印度洋沿岸某些地方保持贸易联系。这些贸易往来极大地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发展，而经

① 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 (Cosmas Indicopleustes)，1968年，第361－362页。

② U. 莫内勒·德－维拉尔 (U. Monneret de Villard)，1948年，第175－180页；P. K. 希蒂 (P. K. Hitti)，1956年，第271页。

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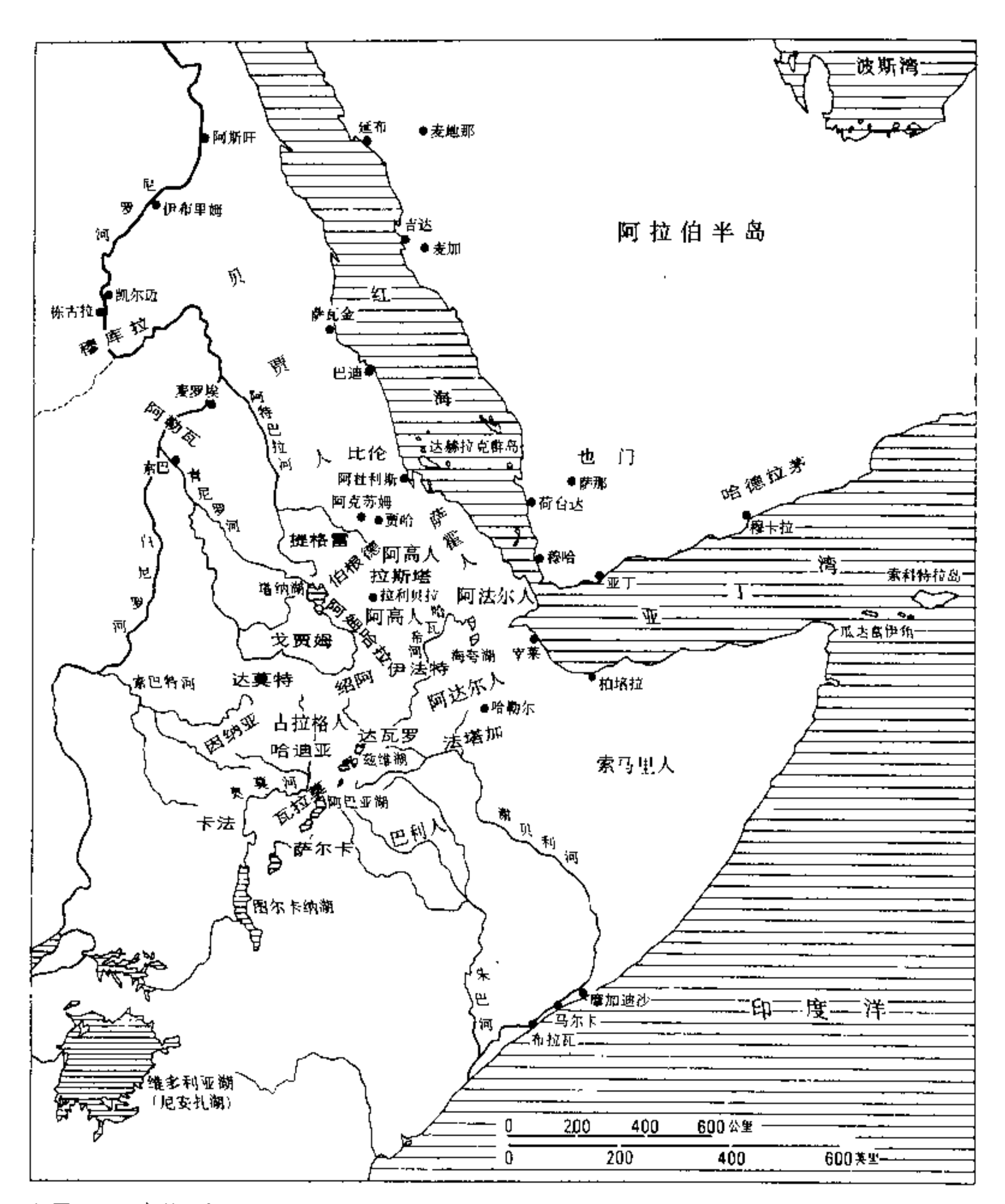


插图19.1 非洲之角

济发展所促成的各种活动又导致不少城镇随之涌现。正如F.安弗雷所指出：这些城镇基本上属于集市城镇。[3]他的话包括一系列古代遗址，其埋藏在地下的遗物遍及整个提格雷和厄立特里亚高原，诸如阿克苏姆、亨扎特、哈盖罗－德拉古埃、德古姆、埃切－马雷、托康达、阿拉图等等。这些遗址目前已逐渐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它们过去都是住屋稠密、人口拥挤的巨大城市中心。

早在公元3世纪，贸易的需要促成了钱币的铸造，而遗留至今的铸币给我们提供了整个阿克苏姆王国时期约20个国王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恩迪比斯到哈塔扎，如果不是名字铸在钱币上，我们对他们必将一无所知。

这些铸币上刻印的文字向我们提示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诸如麦罗埃的毁灭、以及在伊扎纳国王统治时期对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武装入侵。伊扎纳国王人称阿布拉哈，在传统文献中的意思是“先觉者”。刻在铸币上的称号说明他是“阿克苏姆、希木叶尔、卡苏、赛伯伊、哈巴夏特、赖丹和萨尔欣、齐亚莫和贝贾的国王”。[4]

从这个时期开始，基督教成为该国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弗鲁孟提乌斯主教（埃塞俄比亚传统的东正教萨拉马大主教凯萨特·伯汉）创始的福音布道工作，在公元5世纪由拜占廷帝国的修道士接手继续进行下去。

公元6世纪贸易活动并没有减少，相反却日益活跃，现已发现的许多遗址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特别是厄立特里亚高原的边缘地带。在马塔拉发现了大量陶器，其中包括从地中海运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使用的两耳细颈椭圆土罐。这一点已被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证实。他这样描述阿杜利斯港的情况，他说：“这是一座埃塞俄比亚人的城镇……我们这些来自亚历山大和埃拉的商人是来到这里做生意。”他讲到在埃塞俄比亚有无数大象，“这些大象长着长牙，它们被人们从埃塞俄比亚用船运往印度、波斯以及希米亚里特人和罗马人的国家〔即古罗马帝国（拜占廷)〕。”

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在阿杜利斯停留期间注意到卡列布正为远征阿拉伯半岛南部积极进行准备，有许多年阿拉伯半岛南部一直处于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之下。[5]公元6世纪末，希米亚里特文化趋于衰落，波斯的萨珊王朝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并与拜占廷为争夺红海贸易的控制权而发生冲突。[6]这种局势使阿克苏姆失去了一部分出口通道。

560

阿克苏姆王国的西北部，当地古籍称作“索巴－诺巴”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阿洛迪亚、穆库拉和诺巴迪亚建立了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可以设想阿克苏姆与这些国家继续保持着联系。

公元7世纪初是阿克苏姆王国的转折点。阿克苏姆王国权力鼎盛的那页历史已成过去，即将开始的是它日趋衰落的时代。关于它的衰落，历史文献上很少记载，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此事。从考古发现我们知道阿克苏姆城镇仍然持续了一段至今还无法确定长短

---

③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369页。
④ E.利特曼（E. Littman），1913年，第4－35页。
⑤ 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1968年，第368－370页。
⑥ 参阅N. V.皮古莱夫斯卡娅（N. V. Pigulevskaya），1969年。

的时期。从阿克苏姆、马塔拉和阿杜利斯遗址出土的钱币中我们得知在公元7世纪，无疑还包括部分8世纪，曾掌握统治权的国王的名字。他们是：埃拉－贾巴兹、阿纳埃布、阿尔马、耶思利亚、扎·亚－阿比约、拉－马德汉、瓦泽纳、加塞姆和哈塔扎。在钱币上，这些国王头像的周围刻有格埃兹文字，格埃兹语今天仍然是礼拜仪式上的用语。钱币的背面刻有基督教十字架。

埃拉－贾巴兹和阿尔马两位国王在拜占廷和阿拉伯的编年史中有记载，根据塔百里所述，埃拉－贾巴兹是阿尔马的祖父。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阿尔马统治时期的钱币数量很大（图片19.1），在钱币上阿尔马端坐在王位上。[7]

562



图片19.1 基督纪元七世纪阿尔马国王统治时期的货币

[7] C.孔蒂·罗西尼（C. Conti Rossini），1928年，第1卷，第205－210页。

大约公元615年，阿尔马国王在位期间，或者更有可能是在他的父亲埃拉－查哈姆在位期间，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先知穆罕默德的几个追随者在生命遭到威胁时到阿克苏姆朝廷来避难，他们受到热情的接待。先知曾经对他们说，"如果你到了阿比西尼亚，你会见到一位国王在他的统治下没有人遭受迫害，那是一个正义之邦，在那里神将把你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当先知穆罕默德的敌人——麦加的当权者们要求把逃亡者交还时，阿克苏姆国王拒绝满足其要求。国王认为他客人的宗教信仰与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并非毫无相同之处，何况好客的传统必须遵守。[8]

公元7世纪标志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发展，阿拉伯的统一以穆罕默德为中心形成，伊斯兰教沿着红海两岸逐渐扩展。第一批穆斯林对阿克苏姆王国的友善态度只维持了相对而言十分短暂的时间，双方的冲突逐渐加剧。阿克苏姆人屡次侵入阿拉伯海岸，引起穆斯林的报复行动，公元8世纪，穆斯林占领了属于阿克苏姆帝国一部分的达赫拉克群岛。在岛上发现的古陵墓中有刻着古阿拉伯字体的墓志铭，其中一块墓志铭是穆巴拉克的，他是从公元11世纪开始统治该群岛的王朝的创建者。[9]

考古方面提供的证据表明阿克苏姆的海港城市阿杜利斯毁于公元8世纪，长期处于阿克苏姆国王控制下的贸易到此时才完全停顿。可是，该国内地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563 历史全然毫无记载、或者说几乎没有记载，历史只记载了王权陷于衰落。令人奇怪的是，如果我们认真注意两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记述，就会发现王权在一段短时间里甚至还一度中兴。

公元9世纪（回历3世纪）雅库比提到，曾经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国王，统治着幅员辽阔的国土，首都设在卡巴尔或称库巴尔。[10] 到了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马苏迪在前辈作家叙述的基础上作了更详细的说明："阿比西尼亚的首都叫做库巴尔，这是一个大城市，是"纳贾希"（埃塞俄比亚国王"尼格斯"一词的阿拉伯文）的住地，这个国家地域广阔，一直延伸到大海。它的领土包括也门对岸的沿海平原，平原上有众多城市，诸如宰莱·达赫拉克和纳西，城内居住着阿比西尼亚族的穆斯林臣民。"[11] 王国首都库巴尔的确切地点至今仍是个谜。[12]

贝 贾

阿克苏姆王国从公元7世纪开始衰落到公元8世纪彻底消亡，其原因之一无疑是贝贾人入侵了埃塞俄比亚的北部地区。正如历史学家C.孔蒂·罗西尼所指出，贝贾人的"扩张势力"在当时相当强大，最强大的贝贾人族群之一的扎纳非吉人通过拜尔凯河谷

---

[8] 同上，第262页，参阅本书第26章。

[9] 墓志铭上所刻碑文表明穆巴拉克死于公元1093年12月3日（回历486年）。参阅B.马尔穆希（B. Malmusi），1895年；G.奥曼（G. Oman），1974年（a）和（b）；S.泰代斯基（S. Tedeschi），1969年。

[10] 雅库比（al－Ya'kūbi），1883年，第219页

[11] 马苏迪（al－Mas'ūdi），1861－1877年，第3卷，第34页。

[12] C.孔蒂·罗西尼，1928年，第1卷，第51页，认为库巴尔与阿克苏姆是同一个地方，并认为是阿拉伯名字原文拼写有误之故，但是，此时阿克苏姆有可能已不再是首都。

侵入了厄立特里亚高原。

在此之前，贝贾人已建立若干“王国”，占据了从阿克苏姆到上埃及的大片地区。一些拉丁文作家指出，这些贝贾人和布伦米人形成一个单一部族群体。布莱姆人从公元3世纪起就为人们所知，贝贾人的名字也是公元3世纪的碑文上第一次被人提到的，这篇碑文由一位阿克苏姆国王铭刻，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在公元6世纪时把它抄录了下来。

他们的好战精神在公元4世纪伊扎纳国王统治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朝代发布的几篇格埃兹碑文和摹刻的阿拉伯半岛南部文字和希腊文，读起来象是对这些难以驯服的部族发动战争的公告。此外还应该注意到，阿克苏姆国王授予自己的称号之一是贝贾国王。

贝贾人这次对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的侵占——由此产生了现今伯根德这个名字，意思是贝贾的国土——无疑是由于阿克苏姆的力量已经有所削弱，而贝贾人从那时之后施加的压力又加速了阿克苏姆王国的衰亡。

从公元9世纪到11世纪（回历3世纪到5世纪），只有阿拉伯作家提到有关贝贾人的情况，这些作家首推雅库比（公元897年逝世），其次则是伊本·豪卡勒和乌斯瓦尼。这些作家提供了大量资料，谈及活动于埃塞俄比亚北部以及尼罗河与红海之间族群的情况。由于阿拉伯文手写体字迹晦涩难读，以致对他们所记载的资料产生许多不同的解释，大部分族群名称和地名仍然无法理解。虽然不少学者费了很大精力，但只有少数名字得到鉴别。⑬ 564

从尼罗河附近的地区开始，雅库比列出五个贝贾人“王国”的名字，并指出它们的具体位置，次序是从尼罗河到海边，然后向南。第一个王国称作纳基斯，距穆斯林国家阿斯旺最近，在纳基斯居住着几个小部族，作家列举了他们的名字，但人们迄今不知其来龙去脉。靠近这些小部族居住地是第二个王国，它叫巴克林或塔夫林，位于萨赫勒地区的厄立特里亚部分、罗拉高地及巴拉卡特河中游。在巴克林王国以东居住着巴津人，他们的后代大概就是今天的库纳马人，近邻地区的人们称作巴增人。贾林王国从巴迪（马萨瓦）向巴拉卡特河伸展远达巴克林国土。最后一个族群是卡塔阿人，他们的国土从巴迪一直伸延到费坤或称凡坤。这些卡塔阿人信奉基督教并在“纳贾希”（埃塞俄比亚国王）管辖的势力范围之内。阿拉伯商人与这些族群广泛进行贸易，逐渐使他们改信了伊斯兰教。⑭

奇怪的是：阿拉伯文著作中没有提到那段时期生活在厄立特里亚这个地区的提格雷人。但是，正如A.扎博尔斯基指出的那样，很可能雅库比和伊本·苏莱姆·乌斯瓦尼列出的贝贾各部族名单中提到的称作扎纳菲吉人者实际上就是提格雷人。⑮

在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北部仍然存在一些传说，传说中用传奇名称罗姆人和巴芳

---

⑬ 参阅J. H. 克雷默斯（J. H. Kramers），1954年；A.扎博尔斯基（A. Zaborski），1965年、1970年、1971年。

⑭ 雅库比，1883年，第217—219页。

⑮ A.扎博尔斯基，1971年，第118及其后诸页。扎纳菲吉人称他们的神为阿克扎布希尔（*akzabhir*，属闪米特语），而贝贾人则讲库什特语。

人（有时用贝卢·克卢人，主要是在奇姆扎纳语中）称呼这些古老部族。一些地名也表明了他们的存在，特别是贝卢这个名字，说明在五、六百年前他们的统治权一直扩展到海岸地区。如今在厄立特里亚北部和苏丹过着游牧生活的贝尼阿梅尔人就是过去贝贾人的后代。⑯

在这些好战的贝贾人部族压力下，阿克苏姆的国王们和上层领导人纷纷离开阿克苏姆，向未受人侵者蹂躏的南部地区迁徙。以前阿克苏姆统治地区的生活情形便不知其究竟了。

565 如上所述，公元7世纪初，红海周围的政治形势彻底改观。受波斯人威胁的拜占廷帝国本身势力退缩，波斯人显而易见地活动频繁，并在非洲海岸建立基地。尽管考古学家没有特别注意他们，但是在对波斯人的记忆依旧残存的许多地方，尚能发现他们留下来的种种遗迹。当时埃塞俄比亚是不断走下坡路的拜占廷的盟友。阿拉伯人一点一点地迫使拜占廷后退。在埃及，阿拉伯人大获全胜。在埃塞俄比亚，阿尔马国王的继承人遭到孤立。这个国家的情况此后一段时间鲜为人知，其历史只能见到一鳞半爪。公元7世纪和8世纪这段时间，除了一块刻在阿克苏姆王座基座上模糊不清的碑文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碑文。上述这块碑文是用格埃兹文写的，好像属于较晚时期的作品。它提到某一个拥有“哈达尼”（*Hadānī*）称号、名叫达内尔的觊觎王位者，此人背叛君主，阻止国王进城。这块碑文除了提到这个高位者的反叛之外，几乎没有涉及那个时期的其他事件，而反叛一事则表明，传统权力已遭到一定的削弱。⑰

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

公元10世纪下半叶，一件影响这个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事件发生了。两部阿拉伯古籍记述了这一事件：其中之一是《亚历山大主教区历史》（*History of th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另一则是著名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勒的记述。

《亚历山大主教区历史》提到来自南方的某一位巴努－哈姆维亚人的女王，她洗劫了阿克苏姆地区并捣毁了那里的教堂。她驱逐了阿克苏姆国王，后者通过努比亚国王吉尔吉斯（乔治）向科普特教区主教科斯马斯求救，请求他派来一位主教。⑱ 如人们所知，阿克苏姆的主教职位从公元4世纪以来一直是由来自亚历山大的一位科普特教士担任。公元5世纪，埃塞俄比亚接受了科普特教派的基督一性论教义，采用埃及人的礼拜仪式。⑲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伊本·豪卡勒也写下了在埃塞俄比亚发生的同一事件：

> “至于阿比西尼亚人的国土，很多年来一直由一个女人统治着。她杀死了拥有‘哈达尼’称号的阿比西尼亚国王，此后她完全独立地治理她自己的国家和阿比西

⑯ C.孔蒂·罗西尼，1928年，第12章；E.塞鲁利（E. Cerulli），1971年，第42－53页。
⑰ 参阅Y. M.科比什沙诺夫（Y. M. Kobishchanov），1962年。
⑱ J.佩吕琼（J. Perruchon），1894年，第359－362页。
⑲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11卷，第16章。

尼亚以南围绕‘哈达尼’国土的地区。这是地域辽阔的国土，没有明确的边界，其沙漠和荒凉地带人们难以进入”。 566

在伊本·豪卡勒公元977年（回历367年）所写的另一本著作中，他写到这位女王30年前就已掌权。⑳

至于那位不幸的国王被赶下台之后，逃到遥远的绍阿避难，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推翻是因为罢免一个主教而触犯了神怒，正如他在给努比亚国王吉尔吉斯二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写信的时候菲洛西奥斯大主教（菲拉特沃斯，公元979－1003年）正任亚历山大教区的主教。国王在信中写道：

> ……先辈的国王们废黜了按正常手续推选出来的彼得罗斯（彼得）大主教，并接受篡权者米纳斯，从而违背了法律……正因为如此，神对我们发怒了……我们的敌人起来反对我们，并使我们很多人成为俘虏。他们焚烧了这个国家，并捣毁了教堂……我们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上天停止降雨，大地也不再赐给我们果实……现在我们像一群被遗弃的羊群，没有了‘牧羊’人。”㉑

可能是经过努比亚国王吉尔吉斯的干预，教区主教任命了一位叫达尼埃尔的大主教为阿克苏姆主教。但是还没等到这位主教上任，那个在公元970－980年期间一直和女王不共戴天地进行战斗的国王就去世了。㉒

关于这位女王的文献记载是互相矛盾的。有一些文献说她是法拉沙人（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女王和吉迪恩酋长的女儿。另一些文献说她是国王韦代姆－阿斯费雷的孙女，还有一些文献则认为她是阿克苏姆最后一位国王戴尔纳德的女儿，人称“梅索贝珍品”（Mesobe－Work）。㉓

埃塞俄比亚教会仍然记着这位被它称为“古迪特”（凶恶的人）或“埃萨托”（暴躁的人）的女王，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她的真名实姓。同样遗憾的是，上封书信究竟出于哪个国王之手，我们也不知道，尽管作者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位阿克苏姆国王戴尔纳德。

C. 孔蒂·罗西尼认为，女王称号中“哈姆维亚”(*al－Hamwiya*)一词应读作“达莫塔”(*al－Damūta*)，它可能指她的出生地——青尼罗河以南和东南的达莫特地区。㉔如果确是如此，上述事件可以解释为：由于阿克苏姆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们向这个国家以南扩张，从而引起埃塞俄比亚内地小部族的反抗。 567

埃塞俄比亚这段黑暗时期的历史记载包括国王家系这一内容，大部分家系在一位名叫内布雷－伊德·盖卜雷·塞拉西的教会神职人员于公元20世纪初所著的《曼涅里克皇帝统治时期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Menelik*)一书中有

---

⑳ 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1964年，第1卷，第56页和16页。

㉑ 参阅特克勒－査迪克·梅库里阿（Tekle－Tsadik Mekouria），1959年，第334－336页。为11月20日（回历11月12日）节日公众礼拜时讲的圣徒传。

㉒ 根据E. 塞鲁利，1971年，第258－269页，埃塞俄比亚国王给努比亚国王吉尔吉斯写信一事似乎发生在公元978年之前。

㉓ “梅索贝珍品”，意即“镀金篮子”——做工讲究，圆形带底座，用压干的草编制，用来盛国宴上的扁面包（*ingera*）。

㉔ C. 孔蒂·罗西尼，1928年，第1卷，第286页。

记载：

……卡列布……是个好国王。他的儿子叫加布拉·梅斯卡尔，在加布拉·梅斯卡尔统治期间，亚雷德创作了《德古阿》(*Degoua*)。㉕ 也正是加布拉·梅斯卡尔建立起神父阿布纳·阿雷加维的领地：德卜勒－达莫教堂。加布拉·梅斯卡尔的儿子叫科斯坦蒂诺斯；科斯坦蒂诺斯的儿子叫韦森－塞古伊德；韦森－塞古伊德的儿子叫费雷－塞内伊；费雷－塞内伊的儿子叫阿德拉兹；阿德拉兹的儿子叫阿卡勒－韦代姆；阿卡勒－韦代姆的－子叫盖尔马－阿斯费雷；盖尔马－阿斯费雷的儿子叫泽尔加兹；泽尔加兹的儿子叫德格纳·米凯尔……德格纳·米凯尔的儿子叫巴赫尔－伊克拉；巴赫尔－伊克拉的儿子叫古姆；古姆的儿子叫阿斯古阿姆古姆；阿斯古阿姆古姆的儿子叫勒坦姆；勒坦姆的儿子叫特拉坦姆；特拉坦姆的儿子叫奥德－戈什；奥德－戈什的儿子叫艾祖尔。艾祖尔只统治半天就死了。事情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就在他登基的那一天，他声称："不要阻挡任何前来观看我的人，让他们来吧，让他们看看我的脸，让他们来向我致敬！"因而非常众多的人围住他，就这样他被众人踩倒，当场一命呜呼……艾祖尔的儿子叫德德姆；德德姆的儿子叫韦代姆－阿斯费雷；韦代姆－阿斯费雷统治到他105岁，他的儿子叫阿尔马；阿尔马的儿子叫德纳古埃吉；德纳古埃吉的儿子是戴尔纳德。㉖

这份从公元6世纪开始的国王世系表显然不足为凭，它是较后时间才编制的，但是难道它没有任何真实之处可供参考吗？㉗

另外有些传说谈到最后一个国王戴尔纳德曾到南方一个国家避难。据说大约在公元9世纪时，他在哈伊克湖畔建造了圣·斯蒂芬（斯蒂凡诺斯）修道院，还在修道院旁边修建了自己的住宅。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但可能是依据重大事件而产生的传说讲，他的女儿嫁给了布吉纳的王子。布吉纳靠近拉斯塔，在后来公元12世纪时，一个新王朝在此建立。㉘

这些后来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拉斯塔居民属于已在该国西南部生活了几个世纪的阿高族。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在《基督教徒分布状况》一书中提到过一位公元6世纪的阿高人统治者。㉙

传统世系中最后一位阿克苏姆国王逃亡一事以及有关他的女儿"梅索贝珍品"嫁给扎格王朝第一位国王梅拉·特克尔·海马诺的传说，可能是真实历史事件的浪漫化传闻。即使如此，在阿克苏姆的光辉时代消逝之后，这个新王朝还是取代了伊扎纳家族的合法旧王朝，在埃塞俄比亚核心地带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权。

568

经过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新王朝终于在埃塞俄比亚中部各省确立了统治地位，随即又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制，但它仍保持了不少阿克苏姆的传统和文化特征。这个新王朝

㉕ 节日时启应轮流吟唱的颂歌。

㉖ 内布雷－伊德·盖卜雷·塞拉西（Neboure－Id Guèbrè Sellassie），1930年，第16－20页。

㉗ C.孔蒂·罗西尼，1909年。

㉘ 根据一种传说，这个新王朝建于公元10或11世纪。

㉙ 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1968年，第360－361页。

在公元12和13世纪达到其鼎盛时期，扎格王朝一系列伟大的国王经历的并亲手创造了这段历史，其中最为著名的国王是拉利贝拉。

文　学

埃塞俄比亚文学渊源于《圣经》和基督教，教士阶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文学的基本特征。从公元4世纪起，格埃兹语在宫廷和教会占了主导地位，在文学上占重要地位的译作也都是用格埃兹语写的。

最早的一批书是《圣经》的译本，是公元5世纪末以后创建的修道院翻译的。此后若干世纪，翻译工作继续进行，主要译自希腊文。《新约全书》是由经过安条克教区批准的文本翻译过来的，译者是信仰基督一性论教义的叙利亚教士，这些人公元5至6世纪到埃塞俄比亚避难，他们为传播基督教教义做了大量工作。

至于《旧约全书》：除了经特伦托会议认可的正典卷目外，埃塞俄比亚人还翻译了几种被其他教会认为是伪经的外典卷目。这些文本包括：《以诺书》(*Book of Enoch*)、《禧年书》(*Book of Jubilees*)、《以赛亚升天记》(*Ascension of Isaiah*)、赫马的《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和以斯德拉的《启示录》(*Apocalypse*)。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外典只有格埃兹文的完整文本传到今天，其他语种的文本只留下支离破碎的片段。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埃塞俄比亚就这样对基督教文学作出了它的重大贡献。

当时的译作还包括神学论文。其中一本是《奎里洛斯》(*Qerillos*)，根据亚历山大的圣·西里尔的汇编译出。另一部对发扬埃塞俄比亚教士宗教精神起巨大作用的译著是《帕科米乌斯隐修规则》(*The Rule of Pachomius*)，圣·帕科米乌斯是东方基督教集体隐修制的创建人。同一时期还有译自希腊文的《生理学》(*Physiologos*)，这是一本以道德伦理论述动、植、矿物的半传奇性文集。

很明显这些作品都是在公元7世纪之前译成的。但是有理由相信，其中有些版本是在本章所研究的年代里重印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从公元7到11世纪——基督教影响得以不断扩大，如果不是全部，也至少应该主要归功于集体隐修制度，这也许是那段黑暗时期历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30] **569**

那段时期没有原本著作留传到今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在那些世纪里根本没有原始的学术活动。相反，公元14世纪文学欣欣向荣的局面看来还是在这段时间奠定的基础。对于这一繁荣局面，E. 塞鲁利作了确切的评价："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成熟表明，它们完全不是处于摇篮阶段的文学，从作品的水平可以断言，它早已形成一种规范，这种规范没有长期传统的培育，在短期内是决不可能很快形成的。[31]

---

[30] I. 圭迪 (I. Guidi)，1932年，第11－21页。
[31] E. 塞鲁利，1956年，第35页。



569

图片19.2 格里马大主教福音书中的圣马克像（公元11世纪）

建 筑

几种传说都认为，该地区北部的第一批修道院建于公元5和6世纪，随后几个世纪这个地区连续不断的战乱使这些建筑大部分遭到彻底破坏，然而，在某些地区还能或多或少找到重要的遗迹。[57]

570 传说中来自拜占廷的“九圣徒”（泰西图·基度桑）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隐修生活的创始人，他们在阿克苏姆地区的偏僻地方安顿下来。后来在提格雷山区阿杜瓦以东一座高岩石台地上发现了他们建造的修道院的一块最古老的地基，人们称之为德卜勒－达莫。

最近在那地方修复的一座教堂建于十分遥远的过去。它是未遭彻底毁坏而保存下来的极少数教堂之一。专家们估计这教堂建于公元10世纪左右，而根据传说，第一座教堂是在卡列布之子加布拉－马斯卡尔国王创导下，在公元6世纪建于德卜勒－达莫，院址由九圣徒之一的扎－米凯尔·阿拉加威选定。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教堂呈长方形，20米长，9.7米宽，建筑方法严格遵照阿克苏姆木石结构的传统。例如，门窗都采用人们在阿克苏姆通常见到的巨大的石柱框架，其横梁两端有突出的接头和体现阿克苏姆建筑特色的凸出和凹进交替的部位。教堂只有一层，楼座在中堂的上方。最重要的一个装饰特点是木嵌条的天顶，画有公元10世纪末的各种不同的图案，有动物图像和东方色彩的几何图形。在德卜勒－达莫发现的众多文

---

[57] C.孔蒂·罗西尼，1928年，第219—225页。

物古迹证明了这座建筑物年代久远。㉝

虽然这座教堂首次展示了公元10世纪的建筑物是何种风格，但目前它已不是那时期建筑的唯一实例。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发现了埃塞俄比亚北部另外一些教堂，各种出土文物都属于阿克苏姆衰落和新时期开始的那个遥远年代，当时政府所在地南迁，修道院式的生活有所发展，一种新的文化出现了。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特定方面的证物，我们这里应该提及扎雷马、阿戈伍和贝拉基特三地的教堂。㉞

在提格雷高地东部阿茨比以东扎雷马村的教堂形状像个十字架。这座教堂是奉献给圣乔治（凯杜斯·吉奥吉斯）的，可能是现存的阿克苏姆时代有柱廊的方形建筑物的遗迹。侧廊上边木制天花板上的雕刻无论在构图还是在技巧上都特别引人入胜。这种教堂中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漂亮木柱头非常值得人们关注，它上面雕刻着十字架和棕叶。据C.勒帕热称，"这些雕刻来自公元7至8世纪的地中海装饰艺术，特别是科普特埃及的装饰艺术，却丝毫没有伊斯兰装饰艺术的痕迹。"虽然还不是最后定论，根据我 **571** 们用作参考著作的作者的意见，扎雷马－吉奥吉斯教堂的最初年代"非常久远"，"属于公元9或10世纪的可能性很大"。㉟

像扎雷马的教堂一样，阿戈伍的教堂也发现于阿茨比地区。它是一座在凸出岩石下面靠着峭壁建造的木石结构长方形小教堂。同阿克苏姆建筑一样，横梁两端凸出墙外，中殿的天顶有木嵌条，然而上面没有德卜勒－达莫教堂那种图案装饰。东侧的房间也 **572** 有天顶，是用倾斜的桁条和小块木制镶板按原始方式建造的。开在墙上的窗框结构是典型的阿克苏姆建筑风格。这座教堂的名字叫特切库斯（西里阿克）。它最古老的部分可能建于公元11世纪，但在以后的年代里经过修复（图片19.3）。

岩石教堂

上述的德卜勒－达莫、扎雷马－吉奥吉斯和阿戈伍－特切库斯教堂都是用传统方法建造的。在基督教根基很深的埃塞俄比亚北部发现了许多在山岩上雕凿成的教堂，它们在很多方面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它们是在本章所述年代里开始兴建的；它们与阿克苏姆的建筑风格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有几处建造得十分杰出。㊱

默克莱以北的盖拉尔塔地区发现了一大批教堂，另外在泰姆比恩、安帕·塞纳特和阿茨比附近地区也有所发现。这些教堂在岩石上雕凿出与正常教堂相类似的内部结构，照样有柱子、柱头和构架。上述这些地区迄今已发现了120座左右的岩石教堂。其中最古老的包括位于盖拉尔塔地区德古姆－塞拉西的三个地下教堂，其雕凿年代远在公元10世纪，有些考古材料认为可能还更早两个世纪，这三个地下教堂在岩石上雕刻得非常精致，并且互相平行，排成一列。里面有一个带阶梯的深深的地穴，就像阿克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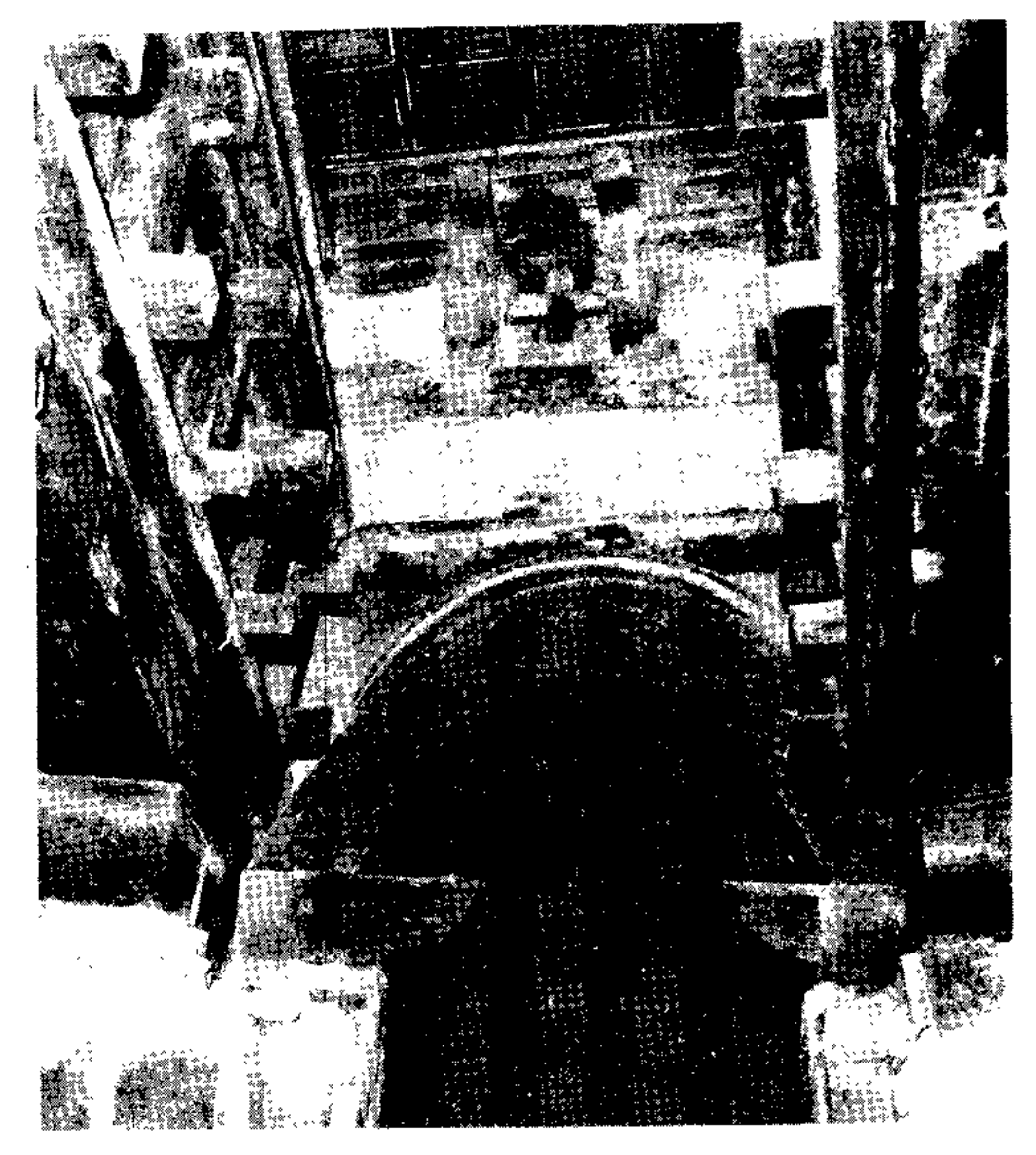
㉝ D.马修斯（D. Matthews）和A.莫尔迪尼（A. Mordini），1959年，第1－59页。

㉞ 在写建筑方面的这几段文字时，我主要是引用C.勒帕热著作中的材料。

㉟ C.勒帕热（C. Lepage），1973年。

㊱ 参阅G.格斯特（G. Gerster），1968年、1970年、1974年。

571



图片 19.3　阿戈伍的特切库斯（圣西里亚克斯）教堂内观，建于基督纪元 9 至 10 世纪

姆、马塔拉和其他地方大型阿克苏姆坟墓的构造一样。附近还有一个同样雕凿在岩石上的洗礼盘，它与 F. 安弗雷在马塔拉遗址发现的凿刻于公元 6 或 7 世纪的那个洗礼盘惊人地相似。[57] 有人认为这些地下教堂曾用作人死后埋葬之处。有意思的是阿克苏姆时代一座建筑物的废墟就在附近。

贝拉基特的马尔耶姆教堂距德古姆 – 塞拉西遗址约 20 公里。它地处盖拉尔塔西北，在阿克苏姆东南约 100 公里的地方，它是埃塞俄比亚岩雕艺术的突出典范。教堂是在山谷中央凸出的岩石上凿出来的。C. 勒帕热为它写了一篇详细的研究论文，指出它是“相当于一种非常杰出的正规阿克苏姆长方形教堂的岩雕作品”。他还认为这座教堂的形状完全可以同德卜勒 – 达莫用木石建造的教堂相媲美。[58]

---

[57] F. 安费雷（F. Anfray），1974 年。

[58] C. 勒帕热，1972 年。

毫无疑问，人们见到这种教堂后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它与阿克苏姆建筑之间的紧密 573 联系。首先，它们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附近有不少现存的阿克苏姆遗迹；其次，在建筑式样上有一些与阿克苏姆传统建筑共同的特征，例如：建筑物纤小，具有科海托、托康达和马塔拉以及阿克苏姆附近恩达－特功库斯等地建于公元6和7世纪的小教堂的长方形典型设计，还有平展的天顶、立柱和柱头。上述这些特点使我们确定有些教堂，如在贝拉基特的那一个，是接近阿克苏姆时代的。

装饰艺术

有些古建筑，包括本章所述的那些建筑，都有雕刻，主要是在天花板、柱头和拱门上。

在德卜勒－达莫的教堂里，门廊的木制天花板上仍可见到雕刻装饰，它们大部分是动物的图像，如狮子、羚羊、犏牛、蛇、骆驼、大象、水牛、山羊、驴、长颈鹿、豹，还有一些想象中的动物，以及植物的图案和几何图形。柱头上也有类似的装饰。十字架通常是中心主题，四周环绕着交织的各种图案和棕叶。这些远古艺术家对地中海国家、特别是科普特埃及流行的各种不同的装饰形式全都十分熟悉。在扎雷马、德卜勒－达莫和阿戈伍的教堂里，岩石上刻有相当于窗户结构的方框架，内有横饰带作为装饰。扎雷马－吉奥吉斯教堂是埃塞俄比亚北部最富装饰的建筑之一。

现在这些教堂里已经没有壁画。也许古代这些教堂的墙壁上曾有过壁画装饰，就像稍后时期的教堂，诸如拉利贝拉的贝特－马尔耶姆教堂那样。但是到了今天，所有已知的最古老的教堂墙上都见不到任何壁画的痕迹，墙壁的小小面积看起来很难有地方容得下装饰画。但仍有这种装饰壁画确实存在过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塔百里曾提及一位亲眼目睹过装饰壁画的妇女的叙述，她作为穆罕默德的随从人员在公元7世纪到过阿克苏姆，回到麦地那后，以赞美的心情回忆起大教堂"墙上了不起的壁画"。但是，没有一幅古代的壁画，甚至没有一丝壁画的痕迹留存到今天。

至于手稿，我们知道从公元5或6世纪以后有几种从希腊文和古叙利亚文翻译过来的古本，很难知道这些手稿有无插图装饰，因为所有古本都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人为的破坏，没有任何古本得以流传至今，唯一例外只有提格雷地区阿杜瓦附近古老的修道院中格里马大主教保存的两本精美的福音书。这两本手稿有几页装饰插图与叙利亚的拜占廷艺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J.勒鲁瓦对这些插图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们完成于 574 公元11世纪（图片19.2）。毫无疑问，这些古代的手稿继承了一种传统，关于这一点的确切证据也许在某一天会从埃塞俄比亚北部山区迄今尚未被人们发现的教堂中找到。[39]

---

[39] J.勒鲁瓦（J. Leroy），1968年；D.马修斯和A.莫尔迪尼，1959年；D. R.巴克斯顿（D. R. Buxton），1971年。

20 埃塞俄比亚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E.塞鲁利

575 从非常早的时候开始，红海两岸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关系，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开始发生变化。自此之后，这种关系就表现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

先知穆罕默德的各种传记中收集了不少传说，记载着有关早期伊斯兰与埃塞俄比亚之间交往的一系列事件：

(1) 穆罕默德写信给"尼格斯"(*negus*，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称号，阿拉伯文为"纳贾希"*nadjāshī*)，动员他加入新宗教，信以摘录古兰经语录(4:169)开头，请"信奉圣经的人们"(*ahl al-Kitāb*)，根据伊斯兰教义重新考虑耶稣其人。[1]

(2) 阿姆鲁·伊本·阿斯由麦加寡头统治集团派遣到埃塞俄比亚，去见"尼格斯"，设法阻止伊斯兰教的发展，但他这个异教徒反而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成为埃及的穆斯林征服者。

(3) 贾法尔·伊本·阿比·塔利布移居埃塞俄比亚。他是穆罕默德的表兄弟和后来成为哈里发的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布的兄弟。为了逃避古莱什人发动的战争，他和一些穆斯林一起到国王的宫廷避难。根据某些传说，他成功地使国王改变了信仰，而国王为了避免其基督教臣民的反对，在宣誓时把上文提到的古兰经语录揣在怀里，表面上则装出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样子。

很可能是贾法尔·伊本·阿比·塔利布的这一举动促使后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君主和领导人纷纷宣称他们是阿比·塔利布家族的后代，正如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的那样。

(4) 另一类早期伊斯兰传说则是关于比拉尔的。他原是埃塞俄比亚血统的一名忠实的奴隶，后来成为阿布·贝克尔(以后是第一位哈里发)的释放奴隶。根据传说，比拉尔是第二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男人，第一个则是阿 576 布·贝克尔本人。其实，真正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是名妇女，那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妻哈迪贾。作为先知的可靠追随者，比拉尔被先知委任为"穆安津"(*mu'adhdhin*，宣礼员)，负责召集信徒们在清真寺做祈祷。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奥马尔就任哈里发。此后，他随穆斯林军队到了叙利亚，后来死在叙利亚，并被葬在那里。

---

[1] V.瓦卡(V. Vacca)，1923-1925年。

还有许多传说普遍提到埃塞俄比亚人比拉尔以及先知对他和像他一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人的钟爱，比如有句谚语说，“谁把埃塞俄比亚男人或女人请人他的房屋，谁就是把上帝的祝福带进家中”。

在这种钟爱埃塞俄比亚人的情感主导下，出现了一系列阿拉伯文学小作品。[②] 伊本·贾乌齐（回历596年/公元1200年逝世）的著作使用华丽的书名：《驱散阴霾，让黑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优良品质发扬光大》（*Tanwīr al-ghabash fī fadl al-Sūdān wa l-Habash*），学识渊博的埃及人苏尤提（回历911年/公元1505年逝世）写了一篇名为《埃塞俄比亚人的地位蒸蒸日上》（*Raf'sha'n al-Hubshān*）的专题论文，后来他在另一本著作《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杰出的几位皇帝》（*Azhār al-'urūsh fī akhbār al-Hubūsh*）中再次对这一论断作了概述。另一部此类作品是《埃塞俄比亚人光彩夺目的优秀品质》（*Al-Tirāz al-mankūsh fī mahāsin al-Hubūsh*）[③]，作者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巴基·布哈里·马基，写于回历991/公元1583年。

在这些著作里插入一章或几章有关埃塞俄比亚词汇的论述曾成为一种时髦风尚，据认为这些词汇见于圣书，也就是见于《古兰经》和《圣训》（即先知言行录）。书中所列举的文字其中有一些并非埃塞俄比亚文，而是源于阿拉伯作家仍不知道的一个语种，但另外许多显然是源于埃塞俄比亚文（格埃兹语），公元7世纪初，格埃兹语在阿拉伯半岛通行。[④]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同词源的埃塞俄比亚文的影响，一个名副其实的阿拉伯词被赋予特殊的宗教含义。阿拉伯作家对语言现象的观察结果，对埃塞俄比亚文的语言发展史也有重大意义，谚语“比拉尔的罪是对上帝的罪”（The **sin** of Bilāl is **shin** with God）中，埃塞俄比亚文 sh 的发音转变为 s，这一点伊本·萨德在回历230/公元844-845年所写的文章中已经提及。[⑤]

穆斯林在达赫拉克群岛定居

577

早期穆斯林国家与埃塞俄比亚的关系并不友善。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期间，一支埃塞俄比亚舰队曾攻击阿拉伯半岛上的舒艾拜港，几年后，由于埃塞俄比亚人在阿拉伯半岛对穆斯林居民犯下了不少罪行，哈里发奥马尔不得不派出4艘船和200名士兵向埃塞俄比亚人反击，[⑥] 但这次对阿克苏姆人的远征所取得的成果似乎不大。

整个公元7世纪，埃塞俄比亚人牢牢地控制着红海，只是到后来穆斯林才逐渐占了上风。埃塞俄比亚人最后一次进攻汉志是在公元702年，他们的舰队曾经一度占领吉达，

---

② B. 刘易斯（B. Lewis），1971年，第37页。

③ M. 魏斯魏勒（M. Weisweiler）翻译的德文本，1924年。

④ 参阅 A. 杰弗里（A. Jeffery），1938年。从《古兰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埃塞俄比亚文（埃文）的词汇：mishkat，源于埃文 maskot——窗；kiflain，埃文 keft 的双数——部分、局部，burkān，埃文——亮光、照明；tâbūt，埃文——约柜、箱子；hawāriyyūn，埃文——门徒、使徒；mashaf，埃文——书，mā'ida，——桌子、祭坛；malak，——天使等等。sana 一词，指比拉尔（埃文 sannay——美丽的）以及 minbar（埃文 manbar）一词，布道坛，也都是埃文

⑤ 伊本·萨德（Ibn Sa'd），1905-1928年，第3卷，第165-170页。

⑥ 塔白里（al-Tabari），1879-1901年，第1卷，第1889页。

在麦加引起一片恐慌。至于这种攻击是阿克苏姆人的正规部队所为，还是埃塞俄比亚海盗干的，迄今尚未弄清楚。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阿拉伯人还是对最后这次进攻进行了报复，他们占领并摧毁了阿杜利斯，⑦而且在与阿杜利斯隔岸相望的马萨瓦湾中的达赫拉克群岛上建立了定居点。这一群岛为阿拉伯人提供了控制埃塞俄比亚海上通道的可能性，因为阿杜利斯是通往东印度群岛航线的中间站，而这条航线上的货运加上去往尼罗河流域的商路是阿克苏姆国家重要的财源之一，这条商路还使阿杜利斯成为从努比亚运来的货物的输出口。从公元8世纪下半叶开始，再没有资料提到埃塞俄比亚人的海上袭击事件，也没有资料提及埃塞俄比亚的一般航海事业。看来埃塞俄比亚舰队是被阿拉伯人摧毁了，再度出现已是公元14世纪之事。在这几个世纪里，红海的海上贸易完全由穆斯林控制，从而进一步使埃塞俄比亚陷于孤立。

占领达赫拉克群岛发生在伍麦叶王朝初期，该群岛当时被用作政治犯的流放地。在哈里发苏莱曼统治时期（回历96/公元715至回历99/公元717年在位），阿拉伯诗人阿瓦斯由于写讽刺诗被流放到该岛便是一个例证。⑧

此后，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达赫拉克群岛成为保障去圣地朝觐者海路安全的一个基地，当时红海海盗成灾。

在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初，达赫拉克群岛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君主国。这个国家在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史上和对该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⑨它接管了阿杜利斯的古老贸易，并与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保持活跃的贸易往来。⑩

578 在开罗的杰尼扎地方发现了法蒂玛时代的一份阿拉伯－犹太文文献，上面记载着达赫拉克素丹国进行商业活动的证据。文献中记述了一个来自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商人（名叫莱卜迪，也就是大莱普提斯地方的人）于回历490/公元1097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从埃及去印度的途中，曾在达赫拉克群岛停留下来办理商务。

在达赫拉克群岛的主岛达赫拉克－凯比尔发现了200多块阿拉伯文的碑文，这些碑文给我们提供了达赫拉克群岛素丹统治时期的丰富资料，并且说明了当地居民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已经达到何等程度。目前，这些碑文收藏在好几个不同的博物馆里（意大利的摩德纳和特雷维索、毛里塔尼亚的巴勒迪克、埃及的开罗和埃塞俄比亚的阿斯马拉）。

这些碑文最早的一块刻于回历298/公元911年，最晚的一块刻于回历946/公元1539年，全是遵循当时伊斯兰邻国通用的规范，使用语法正确的阿拉伯文书写的，其中很多句子引自《古兰经》。⑪这些碑文也给我们创造条件，使我们能部分重现从公元11世纪

---

⑦ R.帕里贝尼（R. Paribeni），1908年。

⑧ 参阅K.彼特拉切克（K. Petráček），1960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史上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也把诺克拉岛作为与它不同政见政治家的流放地。

⑨ 参阅本书第3章。

⑩ 雅库比（al-Ya'kūbī），1883年，第219页。

⑪ 关于这些碑文见B.马尔穆希（B. Malmusi），1895年；G.奥曼（G. Oman），1974年（b）（后者有全套新书目）。

(回历5世纪)以来达赫拉克素丹的世系表和继承顺序。⑫

在重视这些表明阿拉伯人在这一地区持续存在的碑文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广泛流传于从马萨瓦湾到吉布提这一段海岸的种种传说。这些传说认为，大蓄水池中的标石一般都是“富尔人”（波斯人）所建，这些标石的遗迹至今仍能在达赫拉克－凯比尔岛和阿达尔见到。这可以证明波斯商人或商务代理机构曾活跃于非洲这一带的海岸线上，也可以说明红海两岸的当权者都曾雇用波斯工程技术人员建筑这些设施，人们都知道波斯人修建蓄水池和引水工程在穆斯林世界是有声望的。有三块达赫拉克岛上的碑文提到死于该群岛的几个人，他们的“尼斯巴”（*nisba*，指出生地）可一直推算到凯西，这个名称是从阿拉伯的凯斯“部落”演变而来的。凯西继著名要地撒那威之后，成为公元10世纪（回历4世纪）争夺阿拉伯－波斯湾贸易霸权的中心。⑬

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穆斯林国家

尽管处在伊斯兰世界的新经济体制之内，红海的非洲沿岸仍保持着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海上通道的传统作用，但非常自然地，穆斯林商人很快从沿海向邻近的埃塞俄比亚内陆地区迅速推进，为其贸易事业寻找商品。在北部，有文献证明甚至在阿克苏姆王国境 **579** 内也有一处穆斯林贸易中心，这就是位于提格雷地区边缘默勒卜河畔的恩德塔。从回历391/公元987年到回历549/公元1154年的一组阿拉伯碑文记载了这些穆斯林的事迹，可以看出这一年代正好与达赫拉克群岛素丹统治的鼎盛时期相吻合，该贸易中心想必与之有联系。⑭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虽然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国家遏止了伊斯兰教的进一步扩张，但在其南部，伊斯兰教发展的局面则截然不同。它同样从海上开始，沿着由吉布提湾穿过哈瓦希河谷洼地到最富庶的埃塞俄比亚高地南部和西部的自然通道向前推进。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再次沿着商路传播；甚至到今天，阿姆哈拉语中“商人”一词——“纳嘎迪”（*naggadie*）在埃塞俄比亚南部奥罗莫（加拉）人的语言中的意思是“穆斯林”。⑮

从红海沿岸和亚丁湾直至青尼罗河，埃塞俄比亚南部各色各样的居民就是通过这一方式皈依了伊斯兰教；许多穆斯林素丹国也是通过这一方式逐步形成；过去的一些地方国家组织大概也是这样逐步演变为伊斯兰国家的。在这些素丹国中世袭的贵族阶层居统治地位，这些贵族是（或者装成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而大多数居民则是埃塞俄比亚人，可能属于库希特族群的锡达莫人。在有文献可以参考，供我们了解这些素丹国的这段历史时期，虽然各个素丹国彼此之间战事连续不断，但它们全都处于其中一个素丹国的霸权统治之下，这个国家强行统治其他各国；另一方面，这些素丹国和信奉基督

⑫ 参阅R.巴塞（R. Basset），1893年；G.维厄（G. Wiet），1953年；S.泰代斯基（S. Tedeschi），1969年。
⑬ G.普利西（G. Puglisi），1969年、1953年。
⑭ C.潘塞拉（C. Pansera），1945年；M.施奈德（M. Schneider），1967年、1969年。
⑮ 参阅本书第3章。

教的埃塞俄比亚虽不太友好，但继续保持关系，而后者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那样，通过扩张行动，离这些素丹国越来越近了。

这些素丹国中首推达莫特最为强盛，正如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哈勒敦所记述，它的霸权统治一度伸展到伊法特（也就是远达今日的绍阿和丹卡利亚低平原之间的地区）。它的确切位置很难确定，因为今日的达莫特是青尼罗河以北和戈贾姆以南的一处地方，而在东部非洲，已经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情况，那里被迫迁移的居民把原来地方的名称带到新的领地，并以此命名他们的新家园。无论如何，达莫特肯定是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最靠近青尼罗河的部分。

伊本·哈勒敦详细叙述了达莫特怎样受到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国王的袭击和占领，并讲述了瓦拉斯玛人如何在达莫特生活，后来又如何不得不迁徙到更东边的伊法特，并建立了另一个素丹国。[16]

580 对统治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绍阿素丹国，我们掌握有更详尽的史料文献。该素丹国至少包括今日绍阿的东部地区，由自称为麦克朱米王朝的素丹们进行统治，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个王朝是著名麦加“卡比拉”（父系氏族群体）巴努－麦克朱姆的后裔，叙利亚的第一位穆斯林征服者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就是属于这个“卡比拉”的。上述史料文献中保存的一系列素丹名字用的是一种属于闪米特语族的埃塞俄比亚文，它与人们现在知道的埃塞俄比亚文不一样。但是，应该考虑这样的假设，即《编年录》(*Chronological Repertory*) 收集的只是正式的“王名”，而素丹们往往还有穆斯林个人名字（埃塞俄比亚西部的穆斯林居民如今仍保持这样一种习惯）。举例而言，杰尼纳素丹 1928 年的奥罗莫（加拉）语名字是阿巴·杰法尔，意为“花纹骏马之主”，可是他的穆斯林名字叫作穆罕默德·伊本·达乌德。

根据上述史料文献，麦克朱米王朝最迟从回历 283/公元 896－897 年起就开始统治绍阿，该王朝占据王位，世代相传达 4 个世纪之久，直到回历 684/公元 1285 年最后一个素丹及其家族被伊法特素丹废黜并杀害。[17] 在保存迄今的麦克朱米素丹的名单中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值得一提：吉拉姆加兹（“凶猛的君主”），从回历 660/公元 1262 年统治到回历 662/公元 1263 年，然后让位给其弟迪尔－加米斯。后者的名字作为一个帝王称号在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同样得以使用，可以译作“胜利的水牛”或“不断取得胜利的水牛”。[18]以此类推，哈尔布－阿拉德素丹的名字意为“恐怖的梭镖”，这也是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常用的一个帝王称号。最后只要再提一下国王赛义发·阿拉德的名号为“恐怖的宝剑”就足够了。哈尔布－阿拉德是在回历 502/公元 1108 年统治穆斯林绍阿的。

根据上述史料文献还应该指出，妇女在绍阿素丹国的政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更符合埃塞俄比亚的传统，而不是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正式场合。绍阿的《编年录》以记载一位女王的统治年代作为开端；接着又记载两位素丹的婚事。第二桩婚事是迪尔－马拉赫素丹于回历 669/公元 1271 年娶伊法特素丹的女儿，这是缔结婚姻联盟的

---

[16] 伊本·哈勒敦 (Ibn Khaldun)，1925－1956 年，第 2 卷，第 108 页。

[17] 参阅 E. 塞鲁利 (E. Cerulli)，1941 年。

[18] 迪尔－加米斯的统治年代从公元 1263 年到 1269 年

一次尝试，当时伊法特对绍阿的威胁越来越大。

根据《编年录》记载，绍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系列统治者之间的内讧和对外向穆斯林邻国进行袭击和战争，特别是与伊法特之间。该文献中还记述了迪尔－马拉赫素丹于回历 677/公元 1278 年被其内部政敌所击败并遭到废黜，他逃到基督教埃塞俄比亚 **581** 的国王那里避难。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佐证，证明在所罗门王朝统治初期，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国家已经得到巩固和加强，且已开始对绍阿素丹国施展影响，此时后者在内部自相残杀的情况下日趋衰弱。应当更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编年录》在记载绍阿素丹们当政年代的同时，也记载了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王朝第一位君主耶库诺·阿姆拉克国王的去世日期。同样，由于相反的理由，该文献也记录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国于回历 656/公元 1258 年被蒙古人推翻的日期。

在邻国伊法特素丹国的进攻下，绍阿素丹国最终丧失了独立。从回历 675/公元 1276 年至回历 678/公元 1280 年，内战一直使穆斯林绍阿陷于困境，到内战最后阶段，伊法特素丹国对衰弱的绍阿国直接进行干涉，公元 1280 年 4 月 26 日（回历 678 年 12 月 19 日）占领了绍阿中心地带，绍阿素丹国遭到灭亡。

由于穆斯林向外扩张迅速得到发展，并日益巩固，经过尼罗河流域的商路对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已是完全封闭，通往东印度群岛的海上通道也一蹶不振，以前所谓的阿克苏姆基督教王国不得不转而向南面发展，即向埃塞俄比亚高地的中心地带寻找出路。王国都城相应地先是从阿克苏姆迁移到拉斯塔中心地区，所罗门王朝建立之后，又迁往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绍阿的边界，甚至当时被公认为基督教宗教中心的、位于海夸湖畔的圣·斯蒂芬修道院也迁到了阿布斯博（又名巴布拉·巴尔坎），该地也处于绍阿所征服的领土上。这种局面非常自然地促使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对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穆斯林诸国施加强大压力，因此这些国家受到了直接威胁。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下文即将看到的，南部穆斯林诸国的素丹也都分别采取了防卫措施，由穆斯林宗教领袖领导的独立运动也由此触发而纷纷涌现。我们所知最先开展起来的是回历 693/公元 1298－1299 年由穆罕默德·阿布·阿卜杜拉教长（谢赫，*shaykh*）领导的那次运动，此时正是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国王韦代姆·拉阿德统治的时期。这一事件由埃及编年史学家穆法德勒记载了下来，虽然其中添加了一些在群众中广泛流行的传奇细节。国王运用老练的政治手段，成功地离间了穆罕默德谢赫和他一些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最后国王把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控制下的一块领地赐给了这位穆斯林鼓动家和仍忠于他的那些人定居，穆罕默德·阿布·阿卜杜拉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这样以失败告终。[19]

正是这同一个时候，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穆斯林地区，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穆斯林绍阿的霸权被伊法特取而代之。

---

⑲ 参阅穆法德勒（al-Mufaddal），1919－1920 年。

582

伊法特素丹国

取代绍阿成为埃塞俄比亚南部各伊斯兰国家霸主的伊法特素丹国由一个名为瓦拉斯玛（源于当地语）的王朝统治。据伊本·哈勒敦考证，瓦拉斯玛人当初是作为从穆斯林古国达莫特逃亡出来的难民进入伊法特的。但是，瓦拉斯玛王朝的统治者也自诩拥有古老的阿拉伯血统，根据流传至今的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是阿基尔·伊本·阿比·塔利布，此人是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布和贾法尔·伊本·阿比·塔利布的兄弟，前者是哈里发，后者如我们所知是第一批到埃塞俄比亚避难的穆斯林中的一员。相反，根据辩解性质的著作《瓦拉斯玛史》（*History of the Walasma'*），该王朝的创始人奥马尔·伊本·杜尼亚－豪兹[29]是哈里发阿里两个儿子之一哈桑的后代。

可是《瓦拉斯玛史》此书的第一部分似乎是传奇故事；比如书中说，奥马尔·瓦拉斯玛的寿命长达120年，当政竟达80年之久；关于神圣的素丹贾迈勒·丁·伊本·巴齐尤的传说称，他有一批神灵听他指挥，其中一个在短短的一小时内替他从尼罗河畔捎来一封信，另一个则给他送来哈瓦希河水（这可能是吸收了埃塞俄比亚“异教”教义中有关生活在流水中的小神灵的内容）。

《瓦拉斯玛史》中提到的第一个年份是回历778/公元1376－1377年；但与埃塞俄比亚编年史和阿拉伯史学家的史实年代对照之后，我们认为年代应是更早一点。举例而言，素丹萨布尔·丁长期与国王阿姆达·塞约恩（后者公元1314－1344年在位）打仗。所以，不管怎么说，由于传奇史料把素丹萨布尔·丁到奥马尔·瓦拉斯玛两者的统治年代估算总共相距96年，如果我们坚持以这个年代作为笼统假设的依据，就只能把伊法特的瓦拉斯玛王朝的创建年代定在公元12世纪末，由于我们引用的文献不够完备，对这个年份就存有必要的怀疑与保留。

同基督教埃塞俄比亚长期作战的萨布尔·丁被认为是南方最重要的穆斯林君主，埃塞俄比亚编年史就是如此说的。事实上他被称作“异教徒之王”，这一点证实了伊法特在公元14世纪上半叶绍阿素丹国衰亡后处于霸主地位。[30]但埃塞俄比亚编年史对素丹

583

萨布尔·丁那次战争还提供了两条更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第一件是首次记述了埃塞俄比亚穆斯林饮用“卡特”（*kāt*）。“卡特”（这是阿拉伯语词汇，在阿姆哈拉语中应读作“查特”）是一种灌木，它的叶子有轻微刺激作用，饮用“卡特”是埃塞俄比亚穆斯林的特色，据一首流行歌曲说，“卡特”可使一家人在夜晚保持不倦。对它的饮用是如此之广泛，以致萨布尔·丁在一次好战的夸口中宣称他将占有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首

---

[29] 奥马尔·伊本·杜尼亚－豪兹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与埃塞俄比亚（格埃兹）语相对应的闪米特－埃塞俄比亚语的一个词：“豪兹”（*hawz*）据此可以将杜尼亚－豪兹（Dunyā-hawz）这个名字译成门迪·苏阿维塔斯（Mundi Suavitas）。这是埃塞俄比亚古代传说中瓦拉斯玛诸主公名字的残留遗迹。在任何情况下，瓦拉斯玛这个名字都不是阿拉伯名字，但是，我至今没有能力把它改写为埃塞俄比亚词，它恐怕是由古闪米特语“WA”（意为“属于”）和“AL'ASMĀ'”（意为“峡谷”）所合成。

[30] 参阅J.佩吕琼（J. Perruchon），1889年。

都，并“在那里种植卡特，因为穆斯林都很喜爱这种植物。”

编年史中引用的关于埃塞俄比亚历史的第二个重要资料是编年史学家提到了下述事实：在国王打败穆斯林后，当这位基督教君王希望利用胜利的有利机会，进军穆斯林国家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军队时，他遭到了他的士兵们的反对。已经获得胜利和战利品的士兵迫切要求返回故乡享受胜利成果，他们无法理解永久占领敌国的必要性。这是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因为我们在两个世纪后（公元16世纪）再次发现类似的情况，这次是伊玛目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的穆斯林士兵，他们同样反对永久占领战败国的领土。根据埃塞俄比亚编年史学家的记述，士兵们对这位基督教君主说：“国王陛下啊，您已经通过战斗把我们从异教徒手中拯救了出来；现在请您同意我们回到自己的村庄去吧。”国王回答道：“只有动物才热衷于返回它们自己的草场。”两个世纪后，阿拉伯编年史学家同样如此描写穆斯林士兵，他们在得胜后恳求其领袖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说：“穆斯林的伊玛目啊，您已经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士兵有很多人战死疆场，还有很多人不幸负伤，我们还缺乏给养，请带领我们回归祖国吧。在那里他们将把我们重新整顿，我们将重新编组队伍。”但上述两件事情的最终结局是，尽管士兵们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但他们还是服从领袖的命令。[22]

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新建的所罗门王朝不断向南挺进，穆斯林伊法特则在绍阿地区扩张，结果必然导致两国间的尖锐斗争。第一次两国间开战记载在埃塞俄比亚国王阿姆达·塞约恩一世的编年史中，这位君王声称，在他继位的时候，他打败了伊法特素丹哈克·丁，并且杀死了其兄弟穆斯林王公达拉德尔。[23]这里应当指出，阿拉伯文《瓦拉斯玛史》一书中并没有提及哈克·丁或这场战争，然而，穆斯林编年史学家把这场基督徒战争的起因归咎于哈克·丁二世（公元1376－1386年在位，比哈克·丁一世晚几十年），这或许是编年史学家疏忽或他的材料有误。 **584**

已经具有充分史料的埃塞俄比亚和伊法特之间的第一场战争是公元1332年在国王阿姆达·塞约恩一世（1314－1344年在位）和素丹萨布尔·丁一世之间进行的。[24]萨布尔·丁攻击进入绍阿的国王军队，一场血战后他遭到惨败，被迫投降。国王任命萨布尔·丁的兄弟贾迈勒·丁王公为伊法特素丹，但由于他权力的非正常来源，他毫无权威，很快就被一场大规模的穆斯林抵制运动所驱逐，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个叫执法官萨利赫的宗教鼓动家。后者设法组建了一个穆斯林王公联盟，在联盟中阿达尔素丹（阿达尔位于伊法特以东）表现杰出，此时位居首席。然而，国王再次取得胜利，这次胜利使南部一些穆斯林小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为从此时起阿达尔素丹国取代伊法特成为霸主，虽说仍是瓦拉斯玛王朝的王公掌权。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两个世纪内（公元13和14世纪），埃塞俄比亚伊斯兰教的政治中心总共转移过三次，并且总是由西向东朝着高地边缘方向移动：首先是从达莫特转移到绍阿，接着又从绍阿转移到伊法特，然后再从伊法特转移到阿达尔。

---

[22] W. G. 孔泽尔曼（W. G. Conzelman），1895年。
[23] G. W. B. 亨廷福德（G. W. B. Huntingford），1965年。
[24] 参阅 J. 佩吕琼，1889－1890年。

国王阿姆达·塞约恩所取得的胜利使他的后继者不得不在南部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国王达维特一世（公元1382－1411年在位）于回历776/公元1376－1377年在战斗中击败并杀害了素丹哈克·丁二世；他的继承者国王叶沙克又打败了哈克·丁二世的继承者素丹萨阿德·丁，并继续向海滨推进远至宰莱。关于国王叶沙克的多次胜利如今还留下了他的士兵唱的一首很长的胜利之歌，由于歌词中保留众多穆斯林国家的名字，因此对我们很有价值，歌词中所列举的地方都是国王对萨阿德·丁作战中占领后任其荒芜的。歌中还列举了约一个世纪前由执法官萨利赫为反对国王阿姆达·塞约恩而鼓动组织起来的伊斯兰联盟中所有穆斯林国家的完整名单。在穆斯林方面，素丹萨阿德·丁由于在公元1415年对基督徒的战争中阵亡，因而成了抗击几个埃塞俄比亚国王入侵的英雄而留芳后世，自那时之后保持独立的穆斯林南部一直使用“萨阿德·丁之邦”的名称。

然而几十年后，作为埃塞俄比亚伊斯兰教首领的阿达尔素丹国再度复兴，随之产生一种强烈而复杂的进攻绍阿的企图，这不单是针对基督教势力，而是打算推翻国王的王位。率领穆斯林军队的是素丹希哈卜·丁·艾哈迈德·巴德莱（他在埃塞俄比亚编年史中被称为：“阿尔韦巴德莱”，意即“野兽巴德莱”）。开始他取得了一些初步的胜利，但在公元1445年12月29日与国王扎雷阿·亚戈布于埃古巴的血战中却遭到惨败，本人也阵亡。国王追逐穆斯林军队远至哈瓦希河，还缴获大批战利品，价值之大使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大为惊愕。这是因为阿达尔素丹国与阿拉伯半岛君主们的商业关系使穆斯林能够获得各种精美物品，而依旧与世隔绝的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尚无法得到。难怪一份基督教方面的文献这样记载：

> 素丹和他的大臣们的长袍是用银线绣的花，它向四面闪闪发光。素丹佩带的短剑上镶满了各种宝石和金子；他的护身符用一粒粒的黄金装饰；护身符上的字也是用金漆写的。他的伞是叙利亚的制品，上面画着狂舞的金蛇，其工艺之精湛令见者惊叹。

埃古巴战役之后，阿达尔的素丹们把首都建在东部低平原边缘的达卡尔，那里瓦拉斯玛王朝继续存在。但几年之后，国王埃斯肯德尔又主动进攻，侵入阿达尔，占领并摧毁了达卡尔。可是，在他班师回绍阿的途中，这支基督教军队于公元1475年遭到了阿达尔素丹沙姆斯·丁·伊本·穆罕默德的突然突击，国王埃斯肯德尔大败，战死在沙场。但是，当时阿达尔的埃米尔们互相争夺最高统治权，国家被内讧弄得虚弱不堪，处于瘫痪状态，因此穆斯林并未能乘胜追击。

此后首都又向东迁到处于低地的奥萨，直到最后素丹阿布·贝克尔·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爱资哈尔·丁于回历926/公元1520年从阿达尔迁移到哈勒尔。他建立了哈勒尔埃米尔统治下的王朝。从那时起，这个王朝统治哈勒尔酋长国达三个世纪之久。这是因为阿布·贝克尔·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爱资哈尔·丁出于安全原因向南迁都之后，仅仅只是名义上掌握最高权力。他保留瓦拉斯玛王朝王公们的地位和权力，继续让他们持有素丹的头衔，这样他既避免了被人视作篡位的嫌疑、也有效地保持了老王朝的名义上的权力。他的继承者继续采用同样的方法，直到瓦拉斯玛王朝在含糊

不清的情况下消亡为止。

哈勒尔新的素丹国很快又被内讧弄得四分五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他就是后来成为伊玛目的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他逐步取得了优势，并把所有权力集于一身。

21 非洲东海岸和科摩罗群岛

F.T. 马萨奥
H.W. 穆托罗

586 本章试图对公元7世纪至11世纪期间非洲东海岸和科摩罗群岛的历史重新作出评价，下文为方便起见将称其为非洲东海岸及毗邻地区，其目的在于纠正那些具有殖民学派思想的历史学家和（或）考古学家所提供的虚伪蓝图。这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依靠外部的资料、不完全的材料或仅仅是些谣传，拼凑成一部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外国商人和殖民者的历史，并把沿海的文明归之于这些人。固然在非洲东海岸的早期历史中，外来者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把他们作为变革进程中的一个因素是一回事，而把这一进程的功劳归之于他们则是另一回事。近期根据新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在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种学方面不断推出的研究成果，[1]不仅扩大了我们的资料基础，同时也逐渐而又肯定地表明：非洲东海岸及其毗邻地区的历史是非洲当地居民与他们所处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地理背景

这里所说的非洲东海岸及其毗邻地区是指大致位于东经38°至50°，北纬11°至南纬25°之间的地区，即从北方的索马里沿海地区延伸到南方的莫桑比克沿海一带。这是一个受季风体系影响的地区，季风这一因素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着沿海社会的历史发展。除肯尼亚北部和索马里之外，这一地区绝大多数地方都雨量充足、土壤肥沃、适宜于农业活动。587 这一地区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三个主要经济地理区：岛屿（拉穆、帕塔、曼达、阿尔达布拉、科摩罗群岛等），半岛以及内陆。这三个经济地理区的居民点遗址都各具特色。这些定居点独特的文化使人认为它们很可能是一种非洲当地居民的产物。尽管它们今天已被废弃，但不少遗址的形体仍作为废墟矗立在地面上，可从空中摄影和地形图上识别出来。至于那些未能保存下来的，其存在也已由考古纪录或通过柱洞和高出平地的土墩表现了出来。这种土墩往往为植被所围绕，有些植被丰盛、高大，有些则贫瘠、低矮。

虽然这些定居点所在的经济地理区今日的特征是植被贫乏、动物稀少，但化石中的花粉和遗骨却充分证明这些地区在开始有人定居的形成年代中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像拉

---

[1] 举例而言，我们指的是：J.德·V.艾伦（J. de V. Allen），1982年；M.霍顿（M. Horton），1981年；H.W.穆托罗（H.W. Mutoro），1979年、1982年（b）。

穆、曼达、帕塔、尚加等岛屿定居点所在的港湾结构，两侧都有茂密的红树林，这不仅为定居点的居民提供了安全和庇护，而且也成为他们的一种收入来源（即出售红树条）；今天这里却几乎完全坍塌了。又如盖迪、姆瓦纳、恩特瓦帕等定居点所在的大陆沿海半岛上的地方，今天只剩下为刺丛所间隔的一片片湿润的稀树草地。这无疑是从过去的茂密森林或林地演变而成，而这种类型的森林或林地今天仍有内陆的卡亚森林为证。内陆经济区的典型则是各卡亚定居点。这种定居点可能是我们所研究的这一地区早期定居时期经济体系的唯一现存实例。越过卡亚森林的山脊，植被属贫瘠草原，它又退化为今日瓦塔狩猎采集者和奇维游牧民赖以为生的泰雷沙漠植被。

东非沿海各定居点以及和它们相联系的文明，就是在这些生态环境区涌现出来的，并且及时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这些定居点（米齐 *Midzi* 或米吉 *Miji*——即城镇）在其强大和繁荣的顶点时，占地可达50公顷之多。[2]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们缓慢而平稳地衰落了，最终为他们的主人弃诸大自然。它们的废墟及纪念碑零乱地散布在我们所研究的整个地区。对它们的分布及所处地理位置作仔细的考察，再结合近期的考古发现，可以毫不迟疑地断言：这些定居点的各个居民社会间、以及与较近处的邻居之间，曾不断地相互影响。因此要重现这些社会的历史需要有一个地区性的、多学科的、能说明共生关系的参考材料的框架。

问　题

588

绝大多数关于非洲东海岸殖民前历史的著作，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其未能奏效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即研究工作所依赖的传统方法论，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所采取殖民主义做法。这种方法论之所以被视为传统的，是因为它并未明确规定考古学家所要解决的研究课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课题的方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地包括更多的地域，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域过去从未进行过调查。由于它们明显地是匆匆包括进来的，有些定居点只经过肤浅的调查，有些则完全被忽略，就不足为怪了。

许多时候，对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点只挖一、两个洞就算万事大吉。这有遗址报告和出版的著作为证。在这种情况下，从仅仅一个洞中所得到的材料就被用来作为整个定居点的规范模式。这种做法实在不恰当，因为从所发掘的一个或两个洞中的材料得出的人的行为模式并不能代表整个定居点所有人的行为模式。历史编纂中的殖民主义态度则反映在对所发现的资料的理解与解释之中。首先，沿海文化是通过把人们有代表性的思想、信仰、心理样板或规范的种种特征列表并追根溯源而得出的。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解释，特别是关于文化上的变异和改变，都被解释为是从中东或更远地方某种更高级的文化中心传播过来的，而不认为是当地人民适应变化中的环境的结果。这种对于非洲东海岸及其毗邻地区定居点历史的传统解释，正如下文将要叙述的，可以在许多学者的著作中找到。

---

[2] 卡亚定居点穆齐·姆韦鲁占地32公顷，卡亚定居点辛瓦亚占地20公顷，卡亚定居点博穆占地24公顷

按照F.B.皮尔斯的说法，这一地区的定居点是由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建立的。证据是那些他所谓的设拉子和阿拉伯式的建筑物。③ W.H.英格拉姆斯甚至进一步认为，如果这些定居点的创建者是波斯人的话，他们肯定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信徒。④ L.W.霍林斯沃思甚至更进一步强调说：除了这些移民是设拉子人，从而是来自波斯这点外，他们还引进了石头建筑物以及制造石灰与水泥的想法，而且引进了木刻与棉纺工艺。⑤ 詹姆斯·柯克曼在访问了这里一些定居点后，也表示了类似的情绪，他得出结论，认为

589 "东非的历史纪念碑不属于非洲人而属于阿拉伯人和与非洲人混血而在文化上与周围的非洲人不同的阿拉伯化了的波斯人"。⑥ F.B.皮尔斯与J.柯克曼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设拉子式或波斯式的建筑早于阿拉伯的式样，而后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持同类观点的还有内维尔·奇蒂克。⑦ 他不仅认为这些移民是来自设拉子（撒那威）的绝大多数男子所组成——正是这些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居民点——，他还强调，甚至作为该地区建立居民点基础的经济也是外来的："虽然这些文明位于它们在经济上所依赖的那些陆地，但是沿海的城市却永远是面向海洋、注视着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所构成的巨大的海上区域"。⑧

主张本章所论述地区各定居点起源于国外学说的首创者们竭力利用碑铭、文献证据以至地名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的证据还是不充分，并且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如，在摩加迪沙确实发现了两块公元13世纪的刻有波斯人名字的碑文，但这远不足以构成任何牢靠结论的基础。另外，到13世纪，这一地区的定居点已经早就兴旺发达了。

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地名相仿的那些地名（如：卡塔尼、哈德拉米等等）也被用来作为非洲东海岸定居点起源于阿拉伯－波斯的证据。据报道，从摩加迪沙直到坦桑尼亚北部的通戈尼都有这样的地名。⑨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对在摩加迪沙所发现的13个名字或碑文，经精密研究，其中只有两处提到了可以认为是来自波斯的人。⑩ 虽然伯顿所报道的来自通戈尼的一块瓦片迄今仍无定论，但这一瓦片极不可能来自波斯。即使它是来自波斯的，单独这样一片瓦也不足以证明通戈尼就是一个波斯人的定居点。最后，文献证据也被引用来支持非洲东海岸及其毗邻地区的各定居点起源于波斯的理论。例如，在B.G.马丁所收集的长长的单子中，没有发现任何一处是能令人信服的，也没有一处能表明这些定居点在公元1750年以前就已存在。⑪

为了试图确定外来者创建这些沿海城市的年代，曾把进口陶器作为确定年代的最好

③ F. B. 皮尔斯（F. B. Pearce），1920年，第399页。
④ W. H. 英格拉姆斯（W. H. Ingrams），1931年，第133、153页。
⑤ L. W. 霍林斯沃思（L. W. Hollingsworth），1974年，第39－40页。
⑥ J. 柯克曼（J. Kirkman），1954年，第22页。
⑦ H. N. 奇蒂克（H. N. Chittick），所有他的著作。
⑧ H. N. 奇蒂克，1974年，第一卷，第245页。
⑨ 参阅E. 塞鲁利（E. Cerulli），1957年，第一卷，第2－10页；B. G. 马丁（B. G. Martin），1974年，第368页。
⑩ J. 德－V. 艾伦，1982年，第10页。某些较晚的碑文表明来源于阿拉伯人。
⑪ B. G. 马丁，1974年，第368和随后诸页。

证据。我们被告知：曼达建于3/9世纪，塔夸建于10/16—11/17世纪，基尔瓦建于4/10—5/11(或6/12)世纪。⑫ 在这个问题上，碳－14的年代测定（这种测定基于科学，因而更为客观）竟然被忽略了，原因是这一测定得出的年代被认为太早。并且，当地的陶器，它们既可以与邻近地区发现的陶器相互对照测定年代，又能利用热释光来确定年代，但却被孤立地进行处理。这似乎是为了暗示：它们不是这些定居点所生产的，即使它们是这里的产物，它们的年代也与已经得出的结论相矛盾。这些结论认为，在来自设拉子等地的外来者到来之前，这个地区根本不存在定居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一定会发现这一地区有一系列遗址，里面的陶器与当地陶器全然不同，十分异样，特别是从地层角度来比更是如此。但是实际上，这类情况迄今没有出现过。例如，在塔夸进行考古发掘，挖出了500万块当地制造的陶器碎片，而进口陶器只发现500块。⑬ 在其他遗址（只提其中几个名字，诸如曼达、卡亚定居点辛瓦亚、卡亚定居点穆齐－姆韦鲁、盖迪、基尔瓦、尚加、穆齐－姆韦鲁和丰戈）的考古发掘，同样也表明那里发掘出来的当地产陶器，其数量大大超过了进口的陶器。⑭ 根据上述背景情况，人们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怎么能说这样的定居点是属于外国人的呢？首先是并没有证据；其次是这里遗留至今的物质文明占绝对优势的属于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 590

另一个方法论方面的缺点应该加以分析，即这些定居点的年代完全是按照符合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到来的时间加以测定的。所有沿海城镇一概都根据进口陶器来确定年代。并且，这种测定所根据的往往仅仅是一个单一坑道中的一块陶器碎片。其实对这些定居点坚持进行发掘，已经陆续发掘出一些比上文所引用的年代更早的陶器碎片。以塔夸遗址为例，按照进口陶器确定的年代为10或11/16或17世纪。

但是，这个遗址中也出土了5/11世纪至7/13世纪的中国青瓷和伊斯兰单色画。⑮ 人们要提出问题：确定该遗址的年代究竟用的是什么标准？为什么没有考虑5/11世纪至7/13世纪的陶器碎片呢？难道我们可以忽视碳－14测定的年代日期，仅仅因为它们不符合预期的人群迁移的设想？

在这里，我们愿意指出：早期研究工作者提出的以进口陶器来确定非洲东海岸各定居点的年代，是以不完全的资料为基础的。我们自己对进口陶器所提供的和碳－14(即塔夸第三地层1195 ± 135的数据)测定的年代相比较，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务必比过去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所有关于沿海的进口陶器的年代。我们希望强调指出，进口陶器和玻璃饮料杯、珠子、酒杯、布匹等其他交换来的进口奢侈品一样可以给我们透露许多这一社会当年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情况。同时也可以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同邻居们相互影响的程度。我们在写出这一遗址的编年史时确实需要考虑它们。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没有必要排除其他像碳－14那样更客观、更科学的测定年代的方法。以进口陶器为基础所确定的年代，不能像人们过去经常做的那样，把它当作定居点建立年代的标志。 591

---

⑫ J.柯克曼，1954年，第174—182页；H. N.奇蒂克，1974年，第一卷，第235—237页。

⑬ H. W.穆托罗，1979年，第68—110页。

⑭ J.柯克曼，1954年；H. N.奇蒂克，1967年；M.霍顿，1981年，H. W.穆托罗，1982年(a)，1982年(b)。

⑮ H. W.穆托罗，1979年，第111—121页。

其次，对任何实地调查，人们需要弄清用来进行分析或测定年代的材料的取样过程。从一个定居点中一、两个试验性坑道中出土的某一块陶器碎片，不能用来当作该遗址所有陶器碎片的样品。我们也应该重视这样的事实，即人类的定居体系往往可以是从极为简陋开始，逐步向错综复杂的方向发展。一旦达到这一阶段，这样的定居点一般会跨越更广的生态区域，从而也变得更为复杂，分布也更为广泛。要了解这类定居点内部文化的演变和变革过程，我们务必首先要注意到这个已经灭绝了的社会的各种行为模式，并且要注意到对一个定居点相当大的部分进行取样和发掘，才能得到有助于我们自己用来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典型材料。当然，我们不可能发掘整个定居点，但是我们对该定居点哪些地区需要进行发掘的判断，必须尽可能明确无误。至少该定居点的所有地点应该都具有被选作发掘点的平等机会。

殖民主义偏见的另一方面在选择进行调研的定居点的类型上也反映出来。当然，用不着说，过去的努力实际上都局限于像曼达、基尔瓦
建筑的定居点。而这些定居点，正如我们在前文早已指出的，往往被归之于外来者，并被视为属于外国人的。那些没有石头建筑的定居点却被忽视了，不仅仅因为人们对它们不感兴趣，而且也由于它们还称不上完全意义上的“建筑学”。这里要强调的是，定居点是一种文化体系，它既不是不可变的，也不是可以把它的功能理解为只有一种可变性，即思想的转移在空间和时间上只是从高文化中心向低中心转移。它们更应该被看作一系列五光十色的事件。它们的活动只能被理解为许多相互关联的可变因素，或是相互依赖地、或是不同程度相结合地起作用。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人员把这些相关连的可变因素分离出来，力求找出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跨出美化殖民主义者的种族优越论的规范，而采用一种充分利用参考资料客观地进行研究为框架来解决问题的新的规范。

592

由于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资料来支持非洲东海岸各定居点是由外国人创建的观点，因此，沿海地区的原始祖先完全有可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这种想法并非不切实际的想人非非。他们的存在以及参与建立这些定居点的可能性，正为我们将要引用的考古发掘成果以及文献资料所证实。

资料来源

考古发掘

尽管对这一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仍处于婴幼时期，但业已发现了大量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在各个不同阶段存在着被称为早石器、中石器和晚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它们随后又为早铁器和晚铁器时代的居民所接替。已在几个遗址发现了关于这一地区早、中、晚石器时代定居点的证据。[69] 肯尼亚南部，距通向today莱的大路不远处的姆遅

[69] G.奥米（G. Omi），1982年；H. N.奇蒂克，1963年。



592

图片 21.1　曼达遗址的发掘

韦，是由来自名古屋大学的日本考察组进行过认真发掘的几个遗址之一。遗址位于尚加书台地上，定居点面积长 800 米，宽 300 米，有 30 个住区。[37] 详细讨论这里遗留下来的原始工具以及生产这些工具的居民的行为模式，不仅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且也超出了本章的范围。然而，我们还是要提醒一点，这就是所发现的大量文物都能证明：在这一地区不仅有人类的活动，而且有人类的定居点，其时间都早于经常被引用的公元 9 世纪。593

这一地区早期铁器和晚期铁器时代人类定居的证据也很丰富。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今日城镇夸莱约 6 公里的基南戈公路上的夸莱遗址。这一遗址是 60 年代中期由罗伯特·索珀发掘的，从中回收了品种繁多的陶器、铁渣和工具等等，证明了在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的头四分之一时间里存在过一种铁器时代的居民。[38] 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中部和沿海的一系列地区所进行的考古发掘以及一些地面上的遗址，都发现了与此相关的属于同一时代的文化物质遗物。这样的地区有乌桑巴拉山区、南帕雷丘陵地区以及米杰肯达的各卡亚定居点（即卡亚定居点穆齐－姆韦鲁、卡亚定居点丰戈、卡亚定居点齐威亚等），只要举出几个名字就足够了。

以盖迪为例，在城市地基下的地层中挖掘出了属于 6/12 世纪的一种有特殊图案的器皿。这一器皿被称作肋条状花纹器皿，可以与在大津巴布韦上层所发现的肋条状花纹黑陶碎片相比较。其修饰与风格均属非洲式是无可争辩的，但这些碎片在反对意见一方

[37] G. 奥米，1982 年。

[38] R. 索珀（R. Soper），1967 年，第 1 页。

的论据中却被当作是奥罗莫(加拉)人的，而不是班图人或斯瓦希里人的。[19] 在温古贾－乌库和曼达都发现了3/9世纪的遗址。但是，据H.N.奇蒂克报道，那里的伊斯兰式青釉器皿是最普通的进口品，不幸的是他没有提供统计资料，所以未能与当地生产的器皿作比较。[20]

在科摩罗群岛上的恩兹瓦尼发现了各式各样可测定年代为430 ± 70的陶器碎片，表明该群岛在阿拉伯人来到以前已有人定居，很可能是非裔印度尼西亚人，尽管还不清楚他们是来自马达加斯加还是来自一个非洲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定居点。不过G.谢泼德曾恰当地指出，由于科摩罗人是讲班图语的，因而后一种假设似更接近事实。[21] 另外，恩加齐贾人（岛民）的传说也认为他们是来自大陆。

594 在基尔瓦，早在设拉子王朝以前的Ia和Ib时期（9－12世纪）都存在着一种具有同样文化特性的物件，其中包括作为炼铁证据的铁渣以及制作珠子、陶器和鱼器证据的碎片。[22] 但是H.N.奇蒂克却根据对他来说"显示了相当程度技巧"的那些陶器，提出了基尔瓦居民点不属于当地人的论点。对于这种偏颇之见不必过于认真，因为不仅各种编年史都肯定了当时基尔瓦的居民为当地人，而且同样的红色细陶在温古贾－乌库和曼达这类沿海遗址也有所发现。[23] 目前还没有来自内陆发现此类陶器的报道，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技术上的创造不能独立地在沿海城镇发展起来。况且，内陆地区迄今尚未经全面考察，在考察完成前就断言陶器仅限于沿海地区才有就未免过于武断了。

这一阶段有特征的当地陶器有两种：边缘或凸出部分都刻有花纹的袋状煮食锅以及红色磨光陶器，也发现过边缘内卷的浅碗。进口陶器有五彩拉毛粉饰陶器和白色锡光波斯陶瓷的碎片。[24] 有趣的是看到I型罐颈部的刻纹和来自乌桑巴拉山区被称作C群的陶器有某些相似之处。乌桑巴拉山区的陶器虽未确定年代，但明显地晚于早期铁器时代的陶器。[25] 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考古发现物还有：刀、箭头、鱼钩、空心管、铁尖和铁钉、以及玛瑙珠。在曼达，没有发现4/10世纪以前的玻璃珠。[26]

在桑给巴尔岛上的温古贾－乌库，最早的当地产陶器的年代是4/10世纪左右，或是相当于曼达Ia期的年代。[27] 尽管盖迪据说是建立于6/12世纪，因而不在本章的年限范围，但是提出当地产陶器的碎片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进口陶器的碎片这一事实仍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陶器素坯，因而从特征角度讲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总之，当地产的陶器不上釉，刻纹稀疏而呈交错状，实用而较少采取彩色装饰。线状刻纹装饰被当地人认为是斯瓦希里、瓦桑亚和奥罗莫陶器的特点。交错的指甲纹装饰被认为起源于

[19] J.柯克曼，1954年，第73页。
[20] H.N.奇蒂克，1975年，第37页。
[21] G.谢泼德（G. Shepherd），1982年，第7页。
[22] H.N.奇蒂克，1974年，第一卷，第235页。
[23] 同上，第237页。
[24] 同上，第2卷，第319页。
[25] 同上，第一卷，第237页。
[26] 同上，第2卷，第482－483页。
[27] H.N.奇蒂克，1975年，第37页。

万尼卡，实用性装饰则被视为奥罗莫陶器的典型。[28] 非洲的因素即：从最早的地层中发现的肋条状花纹陶器和半球形陶碗是不容争辩的。并且正如早已见到的那样，这批陶器 595 的年代至少在公元10世纪，与中部非洲大津巴布韦和马庞古布韦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相类似。

很少发现在城市建立后制的肋条状花纹陶器。这说明在阿拉伯人来到之前这里已经有当地的居民，而当地的制陶技术则逐步为外来技术所取代。结果是在城市建立之后，青、绿釉陶器（伊斯兰）、"黄黑"釉陶器和瓷器、以及青白瓷器（中国）的数量日益超过当地陶器。[29] 用指甲纹装饰的食品锅可能成为说明人们迁移的证据而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迄今，吉利亚马人仍在制造的这种食品锅是在盖迪发现的。这种特定的装饰现在被认为是万尼卡人[30]制品的特征。斯瓦希里人则相反，他们的花纹是雕刻成的。[31]

整个东海岸的考古证据，无疑是证明了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在所有情况下这里都有本地的居民和他们自己的文明。有大量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论点：至少沿海地区中部和南部的居民是班图人。

书面资料

上述关于本章所论述时期这一地区居民点起源于当地的考古证据又进一步为一系列书面资料所证实。这方面的书面资料大部分是由阿拉伯作者所提供，但也有一些零星的中文片段。不过对中文资料中所提到的一些地名的解释，以及由此而对其地理位置的考证，都还不能十分肯定。因此，使人们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把非洲东海岸看作是阿拉伯－波斯殖民地，或者说把它当作一个当地人作用微不足道的大伊斯兰世界的附庸，这主要是由于占优势的阿拉伯文资料所造成的。但是仔细阅读那些最重要的阿拉伯文著作，并对之作不偏不倚的解释，就会得出一幅与以前的史料编纂学派截然不同的景象。

阿拉伯人称朱巴河以南的东非居民为僧祇人（或津祇人）。这一名词的词源迄今不明。[32] 无疑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们都懂得这一称呼是指居住在东非沿海和内陆的尼格罗种人以及讲班图语的各族人民。阿拉伯作者所引用的僧祇语清楚地表明它们来源于班 598 图语：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著于280/902－3年左右）是第一个提到上帝的名字在僧祇语中是："尔－马克卢朱卢（*l－makludjulu*），[33] 马苏迪（死于345/956年）提供了另一个相似的字眼："马尔肯朱卢"（*malkandjulu*），而穆塔哈尔·马克迪西（355/966年在世）把这个字写作"马拉库伊"（*malakui*）和"贾卢伊"（*djalui*）。[34]所有这些形式，

---

[28] J.柯克曼，1954年，第71页。

[29] J.柯克曼，1954年，第94页。

[30] 万尼卡人是对米杰肯达族群人们的通称。

[31] J.柯克曼，1954年，第75页。

[32] 关于僧祇人的最早历史，参阅L. M.德维克（L. M. Devic），1883年，第15－35页；E.塞鲁利，1957年，第一卷，第233－237页。

[33] 伊本·法基赫（Ibn al－Fakīh），1885年，第78页。

[34] 马苏迪（al－Mas'ūdī），1861－1877年，第3卷，第30页；穆塔哈尔·马克迪西（Mutahhar al－Makdīsī），1899－1919年，第一卷，第63页。

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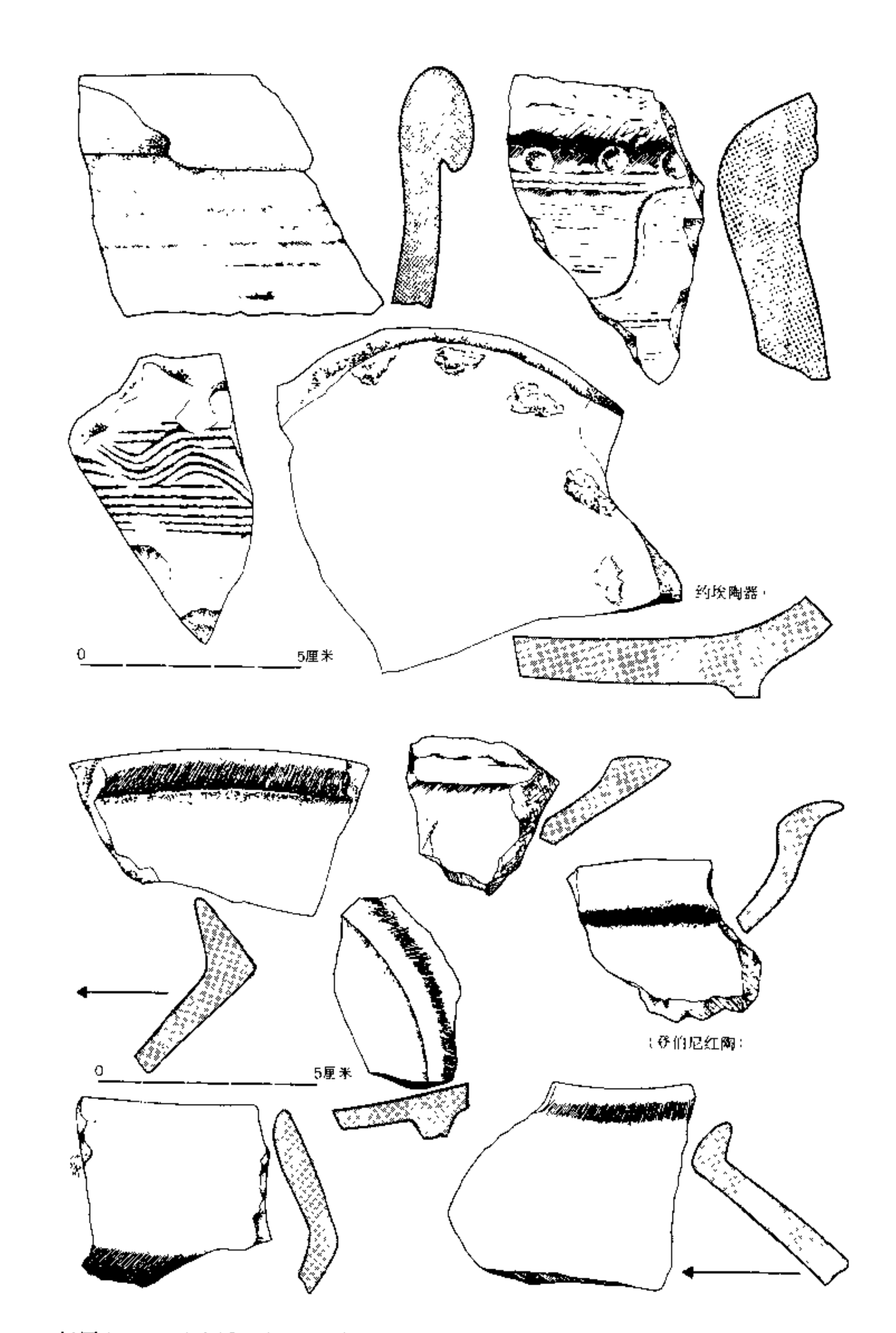


插图21.1 科摩罗群岛姆罗-代乌阿出土的陶器：上方：中东和约埃陶器；下方：登伯尼红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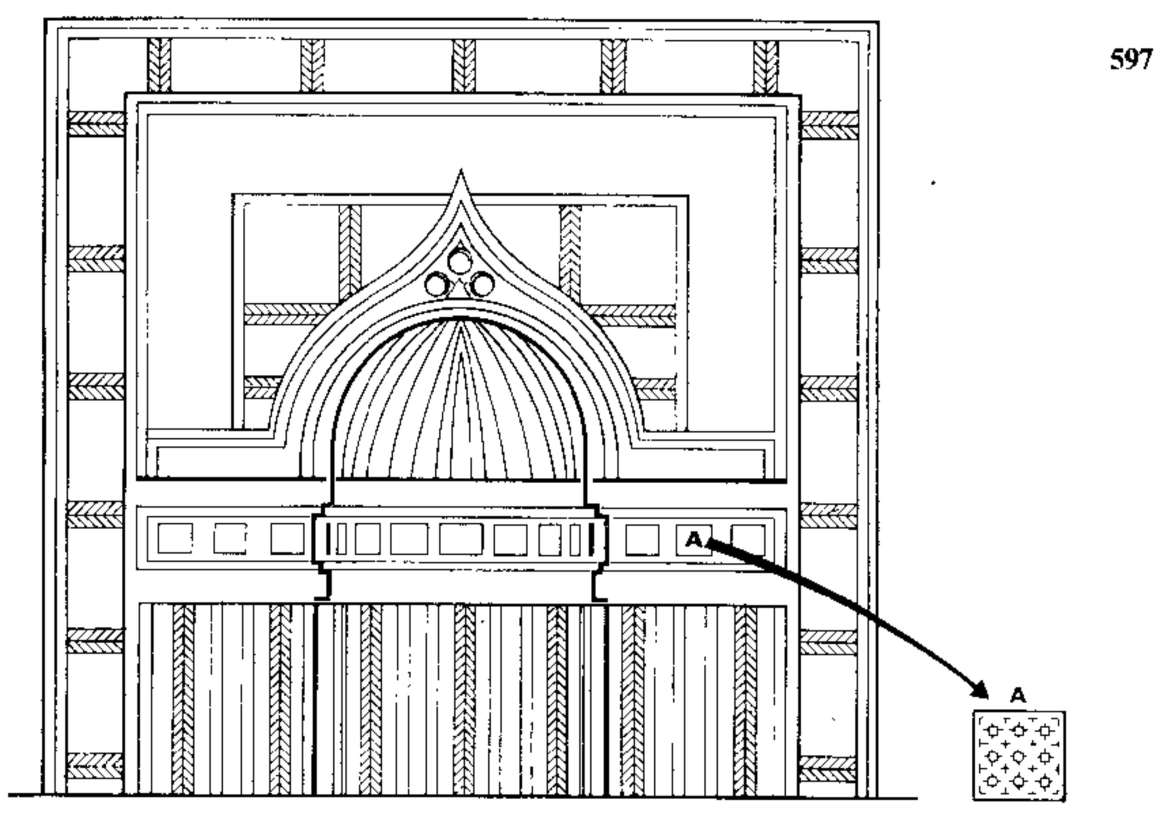


插图21.2 科摩罗群岛多莫尼-昂儒昂的古设拉子清真寺

对插图 21.1 和 21.2 的注解：

自 F. T. 马萨奥（F. T. Masao）和 H. W. 穆托罗（H. W. Mutoro）完成本章之后，人们在科摩罗群岛进行了重要的考古发掘，特别是 1984 年 H. T. 赖特（H. T. Wright），1983 年 C. 阿利伯特（C. Allibert）、A. 阿尔根（A. Argan）和 J. 阿尔根（J. Argan），以及 1983 年 C. 沙尼德（C. Chanudet）和 P. 韦兰（P. Vérin）进行的发掘。

现在清楚了，科摩罗群岛早在公元 9 世纪即已有人居住。四个岛上的居民制造一种被称为登伯尼（Dembeni）的红黑色陶器。这种陶器与 H. N. 奇蒂克（H. N. Chittick）在同时期基尔瓦和曼达较深的地层中所发现的陶器相类似。另一种传统的当地陶器被称作马吉卡沃（Majikavo）饰以贝壳形的花纹，与马达加斯加北部诸遗址所发现的陶器有某种相似之处。

科摩罗群岛的首批居民与外界进行贸易，特别是与撒那威和索哈尔等城市进行贸易。通过这些城市、东方的约埃陶器、中东的（不透明的涂锡的）陶器、以及玻璃器皿和其他的奢侈品来到了这里。

具有登伯尼文化的科摩罗人知道如何冶炼、捕鱼和种植水稻。

重大的文化上的变化发生在 11 世纪，石头建筑物出现了。最早的清真寺之一无疑就是多莫尼的那个，该寺多次重建。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中东陶器，即彩色刻花陶器。而马吉卡沃陶器也采用了一种更加简单的花纹，被称为汉荣德罗。这一时期从马达加斯加进口的皂石煮食锅看来也极普遍。纺锤证明了服装制作业已存在。

都起源于班图语"姆库卢"（*mkulu*）（伟人），而其派生词"姆库降库卢"（*mkulunkulu*）则是指极其伟大的人物。最接近这一古语的是祖鲁语"恩库隆库卢"（*unkulunkulu*）。僧衹语的班图特性进一步为诸如"瓦弗里米"（*waflīmī*）（意为国王或酋长）这类词所支持。这个词与班图/斯瓦希里语中的"姆法尔米"（*mfalme*,复数为瓦法尔米 *wafalme*）㊺ 完全相符。又如"因比拉"（*inbīla*,犀牛）起源于班图语的"姆皮拉"（*mpela*）（斯瓦希里语作皮拉 *pera*,或皮 *pea*），而"马克旺朱"（*makwandju*,一种罗望子树）来源于斯瓦希里语"姆克旺朱"（*mkwandju*）。这两种字都被著名的科学家比鲁尼（死于 442/1050－1 年）引用过。㊻

从这个时期以来的任何阿拉伯文资料中，我们都未能找到有关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建立大型居民点或殖民地的材料，虽然我们掌握有伊本·法基赫、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马苏迪、比鲁尼，以及稍后的伊德里西等人的大量报道。根据记述，沿岸地区居住着当地的僧衹居民，而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特别是在马苏迪的报道中，强调了僧衹国的非穆斯林特性，他最后一次对这一海岸的访问是在 304/916－7 年。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关于阿拉伯奴隶提供者绑架僧衹国王的著名故事，进一步提供了沿岸班图居民独立发展的证据。㊼ 即使从相对来说较晚的伊德里西（死于 560/1165 年）的报道中，我们得到的印象也是，所有沿海居民点的政权都掌握在当地的非洲人手中，伊德里西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归纳采用了更早时期的材料。

另一方面，所有阿拉伯文资料都讲到了非洲东海岸和印度洋沿海各地不断扩大的贸易，也讲到了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商人的经常来访。这种交流并非新现象，因为在前一阶段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者们早已描述过这一地区与印度洋其他地区间的商业联系。㊽ 我们现在要论述的是，国际贸易在非洲东海岸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它对非洲各族人民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影响。

599 过去史料编纂学派的谬误在于把商业上的联系与来访者的永久定居和（或）在政治上的统治权混为一谈。既然现代的殖民过程是沿着贸易→政治上的统治→文化上的演变这样一条线进行的，从而推论出非洲东海岸在历史上想必也是如此的错误结论。尽管并没有任何一点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至于有关阿拉伯－波斯成分在沿海各居民点大量地长久存在一事，以及关于这些居民点是由这些人建立起来的说法，在这一时期只有一个地方提到过，而且即使这一处也是非常含糊不清的。马苏迪曾经说过：坎巴鲁岛（奔巴岛）居住着穆斯林居民，虽然他们讲的是僧衹语。他还说：穆斯林征服了该岛，俘虏了当地居民，同一材料在另一处提到坎巴鲁岛是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僧衹人杂居的，国王来自穆斯林。㊾ 作者没有在

㊺ 马苏迪，1861－1877 年，第 3 卷，第 6 及 29 页。

㊻ 比鲁尼（al－Birūnī），1887 年，第 100 页；比鲁尼，1941 年，第 126 页。

㊼ 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Buzurg ibn Shahriyār），1883－1886 年，第 50～60 页；G. S. P. 弗里曼－格伦维尔（G. S. P. Freeman－Grenville），1962 年（b），第 9－13 页，并参阅 P. 昆内尔（P. Quennell），1928 年，第 44－52 页

㊽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I 卷，第 22 章。

㊾ 马苏迪，1861～1877 年，第一卷，第 205 页，第 3 卷，第 31 页。

任何地方说这些穆斯林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而他们用的僧祇语毋宁指出这是一群伊斯兰化的讲班图语的人。无论如何，该岛在被穆斯林征服前是由僧祇人居住的。

口头传说

非洲东海岸历史的第三种主要资料来源是口头传说。它是由帕塔、拉穆、基尔瓦和其他一些城市以地方编年史的方式保存下来的。这些编年史的大部分一直到 19 世纪才用斯瓦希里文或阿拉伯文记述下来。基尔瓦编年史（*Kilwa Chronicle*）较早的版本被收在 16 世纪若昂·德－巴罗斯的《亚洲数十载》（*Decadas da Asia*）一书中，而因在时间上更接近于早期。许多传说都力图把统治王朝或统治阶级与中东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城市联系起来。几乎所有非洲伊斯兰化社会的传说都有这种倾向。其结果是不必要地把传说的真实年代提前了几个世纪，并且用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显赫人物来加以点缀。

口头传说对研究尚未形成文字的民族的历史往往很有助益，但历史学家却往往倾向于依赖书面材料而未能充分利用它们。虽然由于本章论述的时间过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的口头传说相对而言可靠性较差，但是它确实为蒙巴萨的三个族群——钦根书人、基林迪尼人和坦加纳人——的情况提供了资料。这三个族群的传说都声称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直到公元 13 世纪后半叶，他们的统治才被设拉子统治者们所篡夺。[40]

长期以来，多数历史学家仅仅只是在探讨各个群体向非洲东海岸迁移和各种思想在 **600** 非洲东海岸传播这一课题时利用口头传说资料，并且从中归纳出这块海岸的历史和文明是外来的结论。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以一种崭新的观点重新审查它的历史，从而辨认出在非洲东海岸文明萌发之初的当地因素，并阐明这里的人们及其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而且是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这并非否认确有来自外界的因素，因为我们不是在处理一种封闭的文化。

沿海各族人民

阿拉伯地理学家们把非洲东海岸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北方巴尔巴尔人的土地（巴尔巴尔人地区）；二是僧祇人的土地（僧祇人地区），从谢贝利河到桑给巴尔岛对面的沿海各点之间的地区；三是南方苏法拉地方（苏法拉地区）。至于神秘的瓦克瓦克国土究竟是在非洲大陆更往南的地方，还是指的马达加斯加，由于众说纷纭难以确定。

巴尔巴尔人地区大致包括今天索马里的沿海地区，既包括濒临亚丁湾的北部地区，即今天伯培拉城所在之处，也包括由此往南的瓜达富伊角一带。阿拉伯人用巴尔巴尔人这一名称来指索马里人和非洲之角其他讲库希特语的各族人民，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这些人有时被称为“黑柏柏尔人”以有别于北非的柏柏尔人。“柏柏尔”这一名称早已为《红海巡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一书、克劳迪乌斯·托勒密和

[40] J. S. 特里明厄姆（J. S. Trimingham），1964 年，第 14 页。

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两人以相同的意义采用。㊶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巴尔巴尔人地区与僧祇人地区之间的分界线是在朱巴河，㊷但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班图人所居之处远达北面的谢贝利河。现在谢贝利河下游仍居住着希德拉人、沙贝利人、杜贝人和伊莱人等讲班图语的族群。一个被称为戈沙人的族群至今还居住在朱巴河北岸。居住在布拉瓦的人现在仍讲钦巴拉齐语，这是斯瓦希里北部方言之一。但是，看来某些索马里成分已经在4/10或5/11世纪时渗透到摩加迪沙和布拉瓦之间的沿海地区。伊德里西早在6/12世纪中叶，在一条他不知其名的河边找到了50个哈威亚人村庄的位置。哈威亚人是索马里人的一支，这条河可能就是谢贝利河。㊸他还提到梅尔卡是巴尔巴尔地区的最后一个城镇。

601 看来僧祇人地区比沿海所有其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这主要是由于该地区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兴旺发达的贸易。阿拉伯作者们所提供的描述使人对沿海地区的居民是黑人这一点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即使伊斯塔赫里（340/951年在世）曾经提到过在东非比较凉爽的地方住着“白僧祇人”。㊹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为他提供这项资料的人（因为他本人从未访问过非洲）是否指的是居住在内地山区的肤色上不同于其尼格罗邻居的讲库希特语的某些人。

6/12世纪以前的作者并未提到过任何沿海地名，只是提沿海岛屿上的居民点。除了马苏迪访问过的坎巴鲁（极其可能是奔巴岛），早期作家曾经提到过的只有一个另外的名字。贾希兹（死于255/869年）把僧祇人地区划分为坎巴鲁和龙朱亚两部分。龙朱亚显然是桑给巴尔一字在班图语中的名称翁古贾的讹传。㊺他还讲到一个在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过的饶有趣味的故事：一位阿曼王子率领了一支海上远征队——可能是在公元7世纪末——来到僧祇人的国土，但被当地人在那里消灭了。

伊德里西是阿拉伯文作者中第一个提供僧祇人地区和苏法拉地区一些沿海居民点名称的人。继巴尔巴尔人地区最末一个城镇纳贾之后，他谈到了与僧祇人地区接壤处的巴德霍纳和卡尔库纳。从他的原文中看不出这两个居民点究竟是由僧祇人还是由巴尔巴尔人居住的，但他明确声称巴德霍纳的居民是受僧祇国王统治的。接着，按由北往南的次序是马林迪、曼巴萨（蒙巴萨）、后者是僧祇国王的居住地，以及巴纳斯（或巴亚斯），这是僧祇人地区最靠南的一个地方，已经和苏法拉地区接壤了。巴纳斯的位置还不能确认，但看来它处于坦噶和萨达尼之间的某个地方。㊻

僧祇人地区以南是苏法拉地区。这被阿拉伯人称为“僧祇人的苏法拉”，以区别于

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2章。

㊷ V. V. 马特维耶夫（V. V. Matveyev），1960年。

㊸ E. 塞鲁利，1957年，第一卷，第41—45页。

㊹ 伊斯塔赫里（al-Istakhri），1870年，第36页。

㊺ 参阅贾希兹（al-Djāhiz），1903年，第36页。龙朱亚也可读作拉恩朱亚，而“拉”是班图语的前缀。

㊻ 伊德里西（al-Idrīsī），1970年，第59页，把蒙巴萨与巴纳斯之间的距离说成是海路一天半的路程。按照当时阿拉伯帆船的平均速度为3海里（参阅G. F. 胡拉尼G. F. Hourani，1951年，第110—111页）计算，则大约相当于108海里（200公里）。

孟买附近的“印度的索法拉”。[47] 由于非洲的苏法拉以产金著称，因此又被称为“产达哈卜金的苏法拉”或“产提卜尔金的苏法拉”。虽然一些晚期的作者提到了苏法拉城，但早期的地理学家却把这一名称（意思既是指低地，也可以指沙滩）理解为从潘加尼到莫桑比克南部的整个沿海地区。根据他们的记载，索法拉人与僧祇人是近亲，他们与来 602 自阿拉伯各国和印度的商人有着商业上的往来。比鲁尼记述的总调门给人的印象是：苏法拉是一个众所周知而经常有人访问的地方，而不是人们心目中遥远的异国他乡。它代表着航程的终点。由于海路艰险莫测，船舶不敢再往前驶。高度有意思的是比鲁尼的下述说法，他认为从苏法拉再往前，印度海汇入了西部海洋（大西洋）。[48]

整个海岸线上必然都分布着居民点，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红海巡航记》一书中只提到了拉普塔和默努西亚斯，但是人们有理由相信，有一些用泥和树枝修筑的小村庄逐步发展成为诸如摩加迪沙、盖迪、曼达、基尔瓦、以及坎巴鲁那样的著名大城市。

到 3/9 世纪时，非洲东海岸绝大多数城市由斯瓦希里人居住。各城的富裕程度不相同，根据它们的社会组织和经济活动的情况而定。在开始阶段只有极少数是石头建造的，但随着居民点兴旺发达的结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石头建筑。考古发掘表明，基尔瓦与马菲亚的特征是：泥土与树枝建的房屋、渔业经济、当地产陶器、铁制品以及有限的当地贸易。[49]

社会组织

《红海巡航记》一书提到身材奇特的野蛮人，各处都分别组织在各自酋长的统治之下。[50] 由于资料没有明确他们讲何种语言，因此这些人既有可能是讲班图语的，也有可能讲其他语言。

沿海各居民点通常是自治的，而且一般说来甚至是独立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根据结盟和敌对而有不同的模式。基尔瓦、帕塔和蒙巴萨在强大到足以征集贡赋时，不时享有某种不稳定的霸权。[51]

在任何地方伊斯兰教的影响都与政府类型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政府类型的发展是根据形势自然形成的。在埃塞俄比亚沿海早已存在一些沿海地带的城邦，以海洋经济为基础在东非沿海存在下来的居民点要求有广阔的眼界和能够征收税款和贡赋的集权。

在贝纳迪尔诸邦整个独立的历史中，情况与摩加迪沙、布拉瓦和锡尤一样，权力原来是由世系头人们所组成的理事会行施；头人之一被承认为“同辈之首”，但是大多数 603 沿海城镇，经常像帕塔所做的那样，自愿从外面迁居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挑选首领。这可能是由于他置身于氏族对立之外的缘故。[52]

[47] 印度的索法拉相当于古代苏帕拉卡港。
[48] 比鲁尼，1934 年，第 122 页；比鲁尼，1933 年，第 711 页。
[49] H. N. 奇蒂克，1974 年，第一卷，第 36 页。
[50] J. W. T. 艾伦（J. W. T. Allen），1949 年，第 53 页。
[51] J. S. 特里明厄姆，1964 年，第 11 页。
[52] 同上，第 14 页。

当地居民与移民的混杂，导致种族上的混合以及经济专业化社会的产生。这又造成社会－经济分化与社会阶层化的特征。各个群体都各自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和地方（姆塔阿，mtaa）。不同群体按层次分区排列。[53]早期的阿拉伯作者贾希兹和马苏迪，都指出居民点是由当地的国王统治的。这些国王显然是由选举产生，且有各自的军队。

T. 斯皮尔正确地指出：一部强调阿拉伯根源和阿拉伯文化的斯瓦希里历史仅仅是扎根于公元 19 世纪事态发展这一层次的。有必要透过它去发掘更深的层次。举例而言，有关帕塔的桑耶人和巴塔维人的历史几乎都（但也没有全部）被后来的社会发展和传说所淹没了。我们如果要想重现真实的历史，我们必须设法揭示斯瓦希里历史学家的想法。[54]

斯瓦希里语

我们应该肯定，沿海地区的居民点或小城镇把各种人群集合在一起，他们多数是班图血统。这一情况想必为斯瓦希里语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斯瓦希里”(Swahili) 一词来源于阿拉伯文的 *sāhil*(复数为 *sawāhil*),意即“沿岸”，最早用来称呼从摩加迪沙到拉穆这一带地区。当然，斯瓦希里语（按字义为“沿岸的语言”）是伴随着伊斯兰教在沿岸人民中的推广而借用了许多阿拉伯和波斯词汇才发展起来的。因而，更确切地讲，把原始斯瓦希里语——至少在 6/12 世纪以前——说成班图语，在这一基础上发展成后来的斯瓦希里语。许多权威作者认为，斯瓦希里语最初集中在塔纳河三角洲以北和沿索马里海岸的地区，然后再从那里向南扩散。[55]

马苏迪所引用的一些僧祇语词汇[56]，使人对他们语言的班图特点无可怀疑。因而，很可能沿海地区原来讲的是某种形式的原始斯瓦希里语。这种语言决非是一种洋泾浜语。同一作者曾经提到当地人民的丰富语汇，并且他们之中有着博学多才的演说家。

604 已有报道：从公元 800 年到 1300 年在塔纳河以北约有 19 个居民点，而在河的南边则有其他居民点，诸如蒙巴萨、马林迪、桑给巴尔、奔巴、基尔瓦和坎巴鲁。[57] 这些城镇为斯瓦希里语的发展提供了环境，而以后从中心地区向外扩散的移民又使这一语言得以推广传播。

德里克·努尔斯所收集的语言学上的证据，更加清楚地表明，在北部沿海地区存在着一种斯瓦希里综合语。进一步的研究无疑表明斯瓦希里语是一种与以前在索马里以及在肯尼亚北部沿海地区流行的波科莫语和米杰肯达语非常接近的班图语。看来似乎是讲米杰肯达语、波科莫语和斯瓦希里语三种语言的前身语言的人们发生分裂时斯瓦希里语在该地区有了发展，这些人所讲的语言也随之分裂为不同的方言，然后又发展成为不

---

[53] T. 斯皮尔（T. Spear），1982 年，第 6 页

[54] 同上，第 19 页.

[55] J. 德－V. 艾伦，1981 年，第 323 页；T. 斯皮尔，1982 年，第 16 页；1978 年，第 25 页.

[56] 参阅本书第 598 页（英文原书页码）。

[57] J. 德－V. 艾伦，1981 年，第 323 页。

同的语言。[58]

当讲斯瓦希里语的沿海城镇居民的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化时，并且当商业日益显示其重要性时，他们与阿拉伯商人的相互影响也日益增加了；其结果是一些阿拉伯词汇和阿拉伯书写法被吸收进斯瓦希里语。最终，在公元9世纪前后，这种语言被来自索马里和来自肯尼亚北部的商人传播到了南方。当这些商人沿着海岸向南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时，他们又建立了新的居民点，并进一步与他们定居其中的社会相互影响，逐渐促使伊斯兰教成为统治者的宗教。[59]

这种观点与某些认为非洲东海岸讲斯瓦希里语的人是阿拉伯人分支的历史学家们的观点是相反的。那些历史学家认为阿拉伯人这个分支是在最近两千年内由于贸易关系而散布到整个东海岸的。他们的论点是：斯瓦希里文化具有浓厚的阿拉伯成分，这一语言使用了阿拉伯书写体，石头建筑物及清真寺是按阿拉伯方式修建的，伊斯兰教在沿海地区占统治地位，并且斯瓦希里人温文尔雅的举止也完全是阿拉伯的，特别是与内陆的非洲文化相比更是如此。

这种看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传播主义的论据。它以东非的文化创新和历史发展只能来自外界为前提。它也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论据，因为它假设种族和文化是如此之不可分割，以致个别的移民“种族”必然随带着新思想。这些历史学家未能研究从语言、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反映出来的可能存在的斯瓦希里文化的非洲根源。[60]

关于斯瓦希里文化和斯瓦希里社会的最新研究表明其非洲成分远比传播主义者论据所能允许的更为突出：

(1) 斯瓦希里语的语法结构及其大部分语汇与米杰肯达语和波科莫语紧密相联。而它的文学反映了非洲口语的法则。 605

(2) 斯瓦希里的物质文化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都找不到相似物。斯瓦希里石头建筑没有具体的共同点足以说明其起源于近东、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结论是有道理的。相反，它是由于财富增加和社会经济分化而在沿海一带颇具特色的泥土和树枝建筑技术上发展起来的。[61] 沿海一带的建筑物曾被如此之多地用来证明沿海城市中心是由阿拉伯人建立的。但是这些建筑所使用的材料，没有一样是当地不能获得的。建筑物上占突出地位的珊瑚以及珊瑚色石灰石也是在当地开采的。胶泥和抹墙的灰也是来自当地可以得到的珊瑚和石膏。

(3) 即使是伊斯兰教，在东海岸也带有强烈的非洲宗教历史传统的痕迹。其突出之处有：信仰神灵和神灵附身、崇拜祖先、巫术和卜卦。这一切都可以

[58] T. 斯皮尔，1982年，第16页。
[59] 同上，第17－18页；T. 斯皮尔，1978年，第25页。
[60] T. 斯皮尔，1982年，第2页。
[61] 同上、P. S. 加莱克（P. S. Garlake），1966年，第113页。

在伊斯兰教当地传统中找到，而且与那更正统、更合法的传统同时并存。[62]

伊斯兰教

看来对伊斯兰教的作用，以至教徒人数，都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夸大。这种偏见可能来源于下列事实：10/16世纪以前的大部分文字资料都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尽管伊斯兰教大约在2/8世纪前后就已传到非洲东海岸的北部，而且早在5/11世纪之前就已传到了非洲东海岸的南部，但是直到8/14世纪才出现一种显示自己有所不同的，可以称之为设拉子式的，独特的伊斯兰沿海文明。[63]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只有定居在沿海城市的来自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移民才信奉伊斯兰教。看来这些外来的商人并没有开展任何大规模的使人改变宗教信仰的活动，因而当地居民中的穆斯林人数仍然相当有限。逐渐地移民们的某些切身随从，以及那些对与外国人进行商业交往感兴趣的非洲人，接受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宗教。前文已引用过的马苏迪的证据，[64] 指出坎巴鲁岛上居住着讲僧祇语的穆斯林。人们普遍同意的是：伊斯兰教先移植到东非沿海诸岛，然后再传播到大陆本身。

606 伊斯兰教传播的全貌是相当含糊不清的。但看来直到6/12世纪或更晚的时期，伊斯兰教，在任何值得注意的程度上，对形成及影响东海岸各社会来说都不是一个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正如许多阿拉伯作者所亲眼目睹的那样，当地居民的大多数仍信奉他们的传统宗教。

伊斯兰教的传播与设拉子问题密切相关。口头传说以及较晚时期用斯瓦希里文写成的编年史，都坚持认为：来自波斯湾、尤其是来自著名城市设拉子（位于波斯的法尔斯省）的港口——撒那威的一些商人，是在公元9世纪到10世纪来到东非的。这种说法为从曼达和温古贾－乌库出土的陶瓷所证实。[65] 这种进口陶瓷有一些已知为伊拉克产品。伊拉克的部分地方曾在290/902－3年为卡尔马特教派所征服，这是一个以阿拉伯半岛邻近波斯湾的艾赫萨地区为权力中心的一个极端的什叶派教派。虽然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看来卡尔马特教徒参与了东非的贸易。一些来自基尔瓦的报道表明，有可能在公元10世纪时，非洲东海岸的北部（贝纳迪尔海岸）有过一个卡尔马特教派的殖民地。考古方面的证据看来支持与七兄弟故事相联系的传说中的年代。七兄弟故事有一部分假设是与卡尔马特教徒有关，并且把时间确定为274/887年和312/924年之间作为非洲这一海岸出现殖民现象的年代。[66] 传说声称，艾赫萨地区的卡尔马特国家和摩加迪沙、布拉瓦、马尔卡，可能还有拉穆群岛和桑给巴尔等城邦的建立之间,互相有着联系。它也声称基尔

---

[62] T.斯皮尔，1982年，第2页。

[63] J. S.特里明厄姆，1964年，第11页。

[64] 参阅本书第598页（原书英文页码）。

[65] 但是，同样的产品不仅可以通过撒那威商人，也可以通过来自其他主要商业中心的人，传到非洲东海岸，参阅R. C.普威尔斯（R. C. Pouwels），1974年，第67页。

[66] 同上，第68－69页。

瓦是与贝纳迪尔诸城是在同一时期（公元10世纪）建立的。但是，对这类假设不能过于认真对待，因为按照H.N.奇蒂克[67]的主张，基尔瓦是在公元13世纪末，作为起源于南阿拉伯半岛的一个王朝，才涌现为这里的主要国家的。贝纳迪尔沿海诸城出现的年代至少比基尔瓦、苏法拉、以及科摩罗群岛上的诸城要早200年。[68]

设拉子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非洲东海岸定居的设拉子商人是作为个人，而不是家族迁移来的。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某一种班图语，同时仍保留着他们不同于非洲人的特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斯瓦希里语言是在贝纳迪尔海岸发展起来的，而各居民点之间普遍进行交往，保证了这一语言的一致性，虽然各居民点又发展起了各自的方言。相互作用的结果，产生了一种以阿拉伯－波斯因素为模式，并保留了班图特色的班图－伊斯兰文明。 607

过去曾经把高水平的石头建筑术、石灰和水泥的利用、多种水果的种植、木工和棉纺技术的引进，以及包括波斯历法等各种科学的传入，都归功于设拉子人。但是现在则认识到并非设拉子人引进所有这一切，而应该说是贸易所带来的繁荣加速了这一切的发展，毋容置疑，某些水果树必然是由阿拉伯－波斯人引进的。在设拉子人到来之前，东非沿海一带已经掌握了石工及木工技术。

关于波斯对贝纳迪尔海岸地区影响的口头传说，是有其事实依据的：摩加迪沙的阿尔巴－鲁昆清真寺内一座667/1268－9年的碑文，上刻一个名叫胡斯罗·伊本·穆罕默德·设拉子的名字；[69]更早一块614/1217年的墓碑刻有一个人名，他出生在呼罗珊的尼萨布里，这表明他也是来自波斯的。[70]但是对于索马里沿海以南的地区却缺少关于波斯人活动较为直接的证据。当然，有资料表明：从12世纪开始，成群结队的商人——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波斯人与贝纳迪尔海岸地区当地居民相互通婚所生的后代——开始南迁，并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带到了桑给巴尔、奔巴、基尔瓦和马菲亚诸岛。这些地方以及奥济、马林迪和蒙巴萨诸城邦仍在设拉子人手中，直到被葡萄牙征服为止，虽然它的班图化程度不断地在增加。[71]

建　筑

沿海居民点中的石头建筑物，看来最初是集中于塔纳河三角洲以北的地区。这一地区一直被称作斯瓦希里尼。但是，在3/9世纪以前，许多居民点的大部分房屋，正如上文业已指出的那样，是用泥土和树枝建造的。房顶用草覆盖，像今天一样，有的用棕榈叶，也有的用成捆的椰子树叶。即使在以后各个时期人们仍在修建这类房屋，直到今天

---

[67] H. N. 奇蒂克，1970年，第274页。
[68] R. C. 普威尔斯，1974年，第70－71页；J. S. 特里明厄姆，1964年，第3－4页。
[69] E. 塞鲁利，1957年，第一卷，第9页；这个名字的当地发音为基萨尔瓦。
[70] 同上，第2－3页。
[71] 参阅J. S. 特里明厄姆，1964年，第10－11页。

在沿海城镇，也依然如此。虽然也发现过一段段的石头短墙，但不能肯定它们是否更大建筑物的一部分。⑫

有关沿海地带石头建筑的起源问题，许多历史学家都归之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但是我们不采纳这种传播主义的观点，而更赞成能为较多人接受的解释。前文业已指出：在近东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找出足够的和具体的相似之处，足以导致作出起源波斯或阿拉伯的结论。所使用的原料（珊瑚石、石灰石、珊瑚、胶泥和抹墙的灰）一贯为当地所盛产，因而没有什么因素能够妨碍这种建筑上的创新由当地发展起来。当然，这并不是排除外来商人和其他移民确有某些影响。⑬

经济活动

农业

用经济术语讲，非洲东海岸的社会是一种城乡统一体，许多人以农业为生。⑭无疑，那里还有牧民，尤其是在北方，在贝纳迪尔海岸一带。中文资料早在公元9世纪就告诉我们，巴尔巴尔沿海居民靠肉、乳为生，并吸食从牛身上得到的血。这种喝新鲜牛血的做法，直到今天仍在马萨伊人中盛行。

大多数斯瓦希里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中小型居民点的人，也有些人住在大居民点里，他们主要是务农。据M.伊尔维萨克报道，城市居民每年有3至4个月到乡下去耕种庄稼的习惯，这一点可能在更早一些的世纪里在斯瓦希里世界中广泛盛行。⑮

我们在阿拉伯文资料中找到了一些零星的有关农作物和耕种办法的记载。主要作物看来是高粱（*dhurra*）和薯蓣。薯蓣在当地叫做“基拉里”（*al-kilārī*），这一点已被马苏迪所证实。僧祇人种植的另一种可以吃的植物叫“拉桑”（*al-rāsan*），这已被识别为锦紫苏（*coleus*）。⑯ 沿海人民的主食还有香蕉、椰子、大米、罗望子果，有些地方甚至以葡萄为主食，也有提到甘蔗的。蜂蜜究竟是家养蜂的产品还是采集野蜂的蜜，现在还不清楚。

中国旅行家兼作家段成式（死于公元863年）注意到巴尔巴拉人不食五谷；而汪大渊则注意到在桑给巴尔人们以薯蓣代替谷类；费信看来对布拉瓦的居民种植洋葱和大蒜以代替葫芦属作物感到奇怪。⑰

对基尔瓦的考古调查表明，那里唯一生长的谷物是高粱，这有碳化了的种籽为证。没有发现早期用来研磨谷物的工具，不过在后期也使用和今天一样的旋转磨，可是这类

⑫ H. N. 奇蒂克，1974年，第一卷，第235页。
⑬ J. M. 格雷（J. M. Gray），1951年，第5页；P. S. 加莱克，1966年，第113页。
⑭ J. 德-V. 艾伦，1981年，第330页。
⑮ 同上，第329页。
⑯ 马苏迪，1861－1877年，第3卷，第30页。
⑰ P. A. 惠特利（P. A. Wheatley），1975年，第93页。

东西在考古记录中却消失不见。[78]

渔业与航海

各个沿海社会显然都从事相当大量的海上活动（捕鱼、制造独木舟、航海）。许多阿拉伯作者都认为僧祇人是食鱼者，并且认为他们为此目的磨利了自己的牙齿。在整个沿海地区人们都积极地捕鱼，有些地方甚至把它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例如在马林迪，居民输出他们的捕获物。看来海岸线越往南对海产食品的依赖越大，不仅靠鱼，而且还靠龟和软体动物。在僧祇的某些岛屿，采集贝类是当作装饰品来用而不是食品。在苏法拉，人们潜水采摘珍珠。

尽管造船和航海与渔业不可分割，但阿拉伯作者对僧祇人生活的这个方面却都保持沉默。只有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提到在苏法拉海岸附近有许多船只（"扎瓦里克"，*zawārik*）围绕着阿拉伯航船。同一作者写道：在印度洋航行的船长有一些是僧祇人。这表明，东班图人不仅熟悉近海航行，而且也熟悉远洋航行。[79] 在《红海巡航记》[80] 中明确提到，公元1世纪时在贝纳迪尔海岸和今日的坦桑尼亚海岸所使用的船被称为"道·拉·姆泰佩"（*mtepe*）。[81] 除了"姆泰佩"外，还有一种叫"恩加拉瓦"（*ngalawa*）的船只。后者是一种狭窄的独木舟，它本身在开阔的海面上是不稳而危险的。不过缺乏稳定性的缺点可以由舷外的平衡装置来克服。[82] 除东非外，这种形状的船在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西部和马达加斯加均有发现。在科摩罗群岛，由单侧和双侧的舷外装置平衡的船均有发现。但是，双侧舷外装置在东非只分布在个别地方，仅仅在桑给巴尔和坦桑尼亚中部沿海非常普遍。

对"恩加拉瓦"的起源人们是有争议的。但是从语言学和具体的构造来看，"恩加拉瓦"是在非洲东海岸发展起来的，很可能起源于葡萄牙人来到之后的科摩罗群岛，从那里传到东非的其他地区。[83] 610

缝合起来的"姆泰佩"，以及比它小一些的各种"道·拉·姆泰佩"存在时间更为久远些。它们长期往返于沿海地区，现在除了博物馆收藏的几个样品外已绝迹了。对它们的起源人们也是有争论的，从语言学上讲，看来"姆泰佩"起源于东非当地，但它构造的细节，又给人以出自印度原形的感觉，"姆泰佩"是这种原形的波斯－阿拉伯化。[84] 格拉非蒂在盖迪遗址的一面墙上发现了画着的一只明确无误的"姆泰佩"，已暂定其年代为公元15或16世纪。其他在基尔瓦、松戈－姆纳拉和翁格瓦纳发现的雕刻，其年

---

[78] H. N. 奇蒂克，1974年，第一卷，第236页。

[79] 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1883－1886年，第54页；另一方面伊德里西，1970年，第60－61页，断然否认有能远洋航行的僧祇船只的存在。

[80] "姆泰佩"（*Mtepe*, 一种缝合起来的船）分布于整个沿海地区，但是非洲东海岸的中部和南部则更为常见。

[81] J. T. 米勒（J. T. Miller），1969年，第168页。

[82] A. H. J. 普林斯（A. H. J. Prins），1959年，第205页。

[83] 同上，第205－210页。

[84] 同上，第210－213页。

代处于公元13至18世纪之间。[65] 可能这些刻画是为了强调船只的作用以及从而强调这些居民点的繁荣如此之依赖于贸易。"姆泰佩"和"道·拉·姆泰佩"两者在雕刻中已被描画了出来。在法尔今和耶稣堡还发现了其他雕刻。[66]

畜牧业

自古以来朱巴河以北地区就存在畜牧业，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河南面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一方面马苏迪报道了僧祇人骑牛（加鞍与缰绳）作战的情况——姆法利米（mfalīmi，国王）有30万骑兵，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则提到过绵羊和其他家畜。[67] 另一方面伊德里西则断然坚持：非洲东海岸人民没有什么用以负重的牲畜或牛，而且其他阿拉伯作家也完全没有提畜牧业。[68] 众所周知，目前东非沿海地区采采蝇肆虐为患，很不适合于开展养牛业；但在较早时期某些地段未遭其害，因而有可能从事畜牧业，这也不是不可能的。[69]

狩　猎

611　虽然狩猎必然是基础经济的一部分，但有关它的直接证据却非常少。阿拉伯作者们主要醉心于猎象，甚至对猎象技术记述了某些细节。特别是在使用毒药方面，或是在这种动物的饮水中下毒（见马苏迪），或是在武器的尖端放上毒药（见比鲁尼）。猎取的其他动物，有豹、狮、狼（显然是豺狗）和猴。猎取野物的目的大多数是为了出口（象牙、皮毛）。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为食物而狩猎的记载，但看来吃掉被打死的动物（大象）的肉是极有可能的。

采矿业

在矿产品中，吸引阿拉伯作者主要注意力的是黄金，而苏法拉则被认为是世界上已知最著名的黄金产地之一。虽然伊德里西把沿海城市贾斯塔和达古塔作为发现黄金的地方（其位置尚未确定，肯定是在莫桑比克沿海某处），但从所有其他书面资料看，显然金矿主要还是分布在苏法拉地区的内地，而沿海居民点不过是输出的口岸而已。比鲁尼提到苏法拉找到的黄金呈颗粒状；在大津巴布韦考古综合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黄金。

黄金在非洲东海岸居民中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交换手段，但该地区的人们清楚地

[65] 同上，第211页；P. S. 加莱克，1964年，第197页。

[66] P. S. 加莱克，1966年，第197、206页；J. 霍内尔（J. Hornell），1942年。

[67] 马苏迪，1861－1877年，第3卷，第6－7页；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1883－1886年，第151页。

[68] 伊德里西，1970年，第60页。

[69] H. N. 奇蒂克，1977年，第188页，错误地坚持马苏迪所说的养牛（或骑牛）的人是埃塞俄比亚（库希特）血统。但是从马苏迪作品的全文以及所有他关于牛的零星记载都明确无误地指的是非洲东海岸南部的"黑色僧祇人"。

懂得黄金可作为货币和出口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当地人对铁和铜的价值更为重视。马苏迪说：他们用铁作装饰品，以取代金、银。

开采铁矿的主要证据是由伊德里西提供的。他指出主要产铁中心在北方是马林迪和蒙巴萨，在南方则是詹塔马和丹达马。[90] 铁成为这些地方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并且是岁收的主要来源。虽然对伊德里西所说情况的真实性没有理由表示怀疑，但他的记载存在着某些问题。在蒙巴萨和马林迪附近尚未发现大型的炼铁炉；[91] 而且所有阿拉伯作者都未曾提到过铁的冶炼或生产铁制工具及武器的情况。对一个被称作铁矿丰富的地区，这类活动本应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沿海地区不存在这类活动，但看来这类活动仅仅是地方性的，小规模的。伊德里西提示过这一点，他注意到尽管僧祇人地区的人口众多，但却很少有武器。[92] 要阐明这一重要问题，需要在考古方面进一步作调查研究。

商业活动

612

非洲东海岸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很早就与外部世界发展持续贸易关系的少数地区之一。[93] 公元7世纪以来，一个强大的伊斯兰帝国在中东的涌现，极大地推动了包括非洲东海岸在内的印度洋贸易的发展。在本章所述的时期内，伊斯兰国家间建立的不断扩大的市场，为沿海各居民点提供了发展对外贸易的新的可能性。不仅贸易量有了增加，而且在传统商品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商品，这样就促进了沿海各城镇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同样也是贸易使那些相对成功地成为贸易中心的城镇得到不同的发展。移民和贸易的节奏看来是在9世纪及10世纪加快的，沿海的一些贸易中心如摩加迪沙、马尔卡、布拉瓦、蒙巴萨、曼达以及温古贾－乌库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内建立与发展起来的。随着贸易的变化，一些城市兴起了，一些又衰落了。一代人用石头建造高雅的建筑物，而另一代人又回到了用泥土和树枝。但是在本章所述的时期里，可能只有拉穆群岛上的曼达以及坎巴鲁是城市中最突出的，其他城市似乎只是在公元11世纪之后才获得突出的地位。[94]

沿海城市的商业和贸易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与外国人的贸易，沿海各居民点之间的贸易以及与内地的贸易。

与外国人的贸易

吸引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到沿海城市来交易的商品品种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是象牙、玳瑁、龙涎香、薰香、香料、奴隶、黄金和铁。尽管还没有

---

[90] 伊德里西，1970年，第59－60，68－69页。
[91] 当然，也可能伊德里西所说的马林迪指的是考古发掘曾发现过炼铁留下炉渣的曼达地区。
[92] 伊德里西，1970年，第61页。
[93]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2章。
[94] T.斯皮尔，1982年，第5页；G.谢泼德，1982年，第7－10页。

直接接触的证据，但某些非洲产品在唐代（公元618－906年）就为中国所知，并有所需求。非洲东海岸以盛产龙涎香而知名，该产品在唐代末年被引进到中国。[55] 公元7世纪时，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苏合香油、巴尔巴拉玳瑁、“龙血”（龙血树脂和朱红龙血树）和芦荟（一种植物汁）。[56]公元9世纪的中国文献，也提到巴尔巴拉的居民有把自 613 己的妇女卖给外国商人的习惯。后来赵汝适也曾讲到库默尔－桑给（桑给巴尔）皮肤漆黑的野人可以用食物引诱而捕获的情况。[57] 根据伊德里西所述，阿曼的阿拉伯人也用枣椰果为饵引诱儿童，并拐骗为奴。[58] 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关于僧祇国王被绑架的著名故事，使人对另一种获得奴隶的方式开了眼界。[59]

这种奴隶贸易提出了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因为在公元7世纪到12世纪这段时期里，实际上从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关于非洲东海岸奴隶贸易的直接证据。上述各种事件表明，奴隶并不是买来的，而是通过捕获或诱骗当地人民得来的。从长远看这种方法不见得有效，而且只能偶尔使用，因而只能提供有限数量的奴隶。定期或长期使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引起沿海人民的敌视，对正常的商业交往的发展会起反作用。

另一方面，下伊拉克灌溉工程所使用的大量所谓僧祇奴——他们在公元9世纪时领导了著名的奴隶起义——又表明：必然有一支持续不断的在奴役下的人民从东部非洲流向伊斯兰各国。[60]

解决这一明显矛盾的可能性在于：尽管伊拉克南部的黑奴来源各不相同——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有来自非洲之角或非洲其他部分的，其中有一部分来自东非，但他们由于某种原因一概都被统称为“僧祇人”。这并不意味着非洲东海岸不存在奴隶贸易，它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数量不会太大，否则不会逃过阿拉伯作者们的注意力。阿拉伯作家对所有进出口商品都作了详尽的记载，唯独没有提到奴隶。

东非各港口很早就以其出口品而闻名于世，其中大多数是久享盛名的天然产品：象牙(甚至远销中国)、龙涎香、豹皮和玳瑁。南部各地从4/10世纪起出口黄金，而伊德里西认为，6/12世纪沿海许多城市的主要出口商品是铁。贝纳迪尔海岸以出口薰香、香料以及香膏、没药之类芳香油料而著名。

这里进口的商品，根据阿拉伯文和中文资料的记载，主要有陶瓷（伊斯兰的和中国的）、布匹、珠子和玻璃制品。公元12世纪初，那些早在几个世纪以前从南亚迁到马达 614 加斯加北部和科摩罗群岛的移民们，向基尔瓦、曼达和更远的地方出口皂石器皿。[61]

在基尔瓦，对王朝之前时期（可能是6/12世纪末年）的考古发掘表明：进口物中（伊斯兰陶器和玻璃珠）玻璃制品和外国陶器相比，其比重远比后来的时期为大。除玻璃珠外，还找到了印度坎贝的玉髓珠。最早输入到东非的陶器是伊斯兰五彩拉毛粉饰刻

[55] P. A.惠特利，1975年，第105页；J.柯克曼，1954年，第95页。
[56] P. A.惠特利，1975年，第105页。
[57] 同上。
[58] 伊德里西，1970年，第61页。
[59] 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1883－6年，第51－60页。
[60] 参阅本书第26章。
[61] G.谢泼德，1982年，第15页。

花陶，一种在浅浅的泥釉上闪着斑驳色彩的器皿，这是 3/9 世纪到 10/16 世纪萨迈拉（在伊拉克）特有的伊斯兰器皿。在东非，五彩拉毛粉饰刻花陶可能是 7/13 世纪时的最大特色。[102] 但是，五彩拉毛粉饰刻花陶是发现物中最不普遍的。数量最大的进口货，特别在盖迪，是来自中国的青绿釉陶器，以及黄黑、青蓝和白色的瓷器。[103] 根据 J. J. L. 杜文达克的记载，在 5/11 世纪时，中国的出口品主要有：黄金、白银、铜、硬币、丝绸和瓷器。在非洲东海岸许多地方都能找到中国钱币，而且直到 7/13 世纪，它们继续在流向东非。[104]

沿海各居民点之间的贸易

大一点的城市，比主要依靠农业和渔业的小城市，更倾向于国际性的海上贸易。但与此同时，不管居民点的大小如何，它们间必然有着经常的相互影响。尽管迄今还没有找到多少关于本章所述时期内沿海地区相互间贸易的记载，但从已发表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基尔瓦已经在同诸如曼达这类城市进行贸易。[105]

对可以确定为公元 9 至 10 世纪的地层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曼达和基尔瓦一样，没有发现玻璃珠。无论是曼达还是基尔瓦，看来都没有与内地进行任何重要规模的贸易。结果，早期的玻璃珠在内地极为少见。[106]

与内地的贸易

沿海居民点与内地间早期接触的情况，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它们间一点交往也没有，那是不可思议的，但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考古发掘才能找到证据）。唯一与内地有重要贸易关系的地区，看来是苏法拉海岸；从这个地区出口的黄金主要来自今日的津巴布韦。但是，现在要得出沿海地区的人在如此早的时期就冒险远涉内地的结论，条件还不成熟。 **615**

那里可能不存在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长途贸易。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多是：来自远距离的货物是由一个族群的人向另一个族群的人以货易货得来的，而不是像公元 19 世纪时那样由商队贩运的。沿海城镇必然要依靠其内地的紧邻提供农产品。在交换农产品以及象牙和皮毛时，农民们得到了鱼干或贝珠。也有可能是：内陆人民把产品带到城镇，或者带到沿岸背后的定期集市上；这类接触未能留下耐久的痕迹，沿海地区当地产的陶器与内地的陶器没有关系。

---

[102] P. S. 加莱克，1966 年，第 53 页。
[103] J. 柯克曼，1954 年，第 94 页；1966 年，第 18－19 页。
[104] G. S. P. 弗里曼－格伦维尔，1959 年，第 253 页。
[105] H. N. 奇蒂克，1974 年，第 1 卷，第 236 页。
[106] 同上，第 2 卷，第 483 页。

结 论

在本章所论述的时期里，许多种历史进程在非洲东海岸开始起步，其后果到公元12世纪以后才充分显示出来。但可能就在这一时期为一种非洲文化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斯瓦希里文化。沿海讲班图语各族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开始受到在印度洋上兴起的国际贸易的影响。起初，其影响只能在经济领域里觉察到，即某些沿海居民点越来越面向对外贸易。但逐渐地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领域中也渗透了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们所带来的一些准则。朱巴河以北地区是接受这种外界影响最早的地区。在以后的世纪中，移民的新浪潮从这里带着混合文化的因素又冲向更南方。与此同时，所有的移民本身（人数从来并不太多）也经历了班图化的过程。这种交换与通婚进程的最突出的结果，就是融合了非洲与来自东方一些特点的斯瓦希里语言与文化。

22 东部非洲内陆地区

C. 埃雷特

总的说来，公元7世纪到11世纪，是东非内陆地区以往发展趋势的巩固时期。在 616 公元前的好几个世纪中，东部非洲处在铁器时代最早期部族和经济的明显变化之中。进入基督纪元及之后的两三个世纪中，讲班图语的社会群体向各地广为扩散，冶铁技术开始被广泛采用，而下一个类似的大变化时期可能还要经过好几个世纪才能到来。但这绝不是说，公元7世纪至11世纪这段时期就不值得注意了。新的部族扩张改变了语言的分布，对原有的各社会群体形成新的挑战，有时，一些细微变化的积聚逐渐导致新事物的形成，这与仅仅是各部分的综合有着质的区别。

人口流动

公元7世纪初，讲南库希特语各族和讲班图语各族两大类人在极大的范围彼此相遇。此外，基督纪元的第一个一千年中期发生的诸事中，讲尼罗特语各族和讲科伊桑语各族也扮演了数量上虽不如前两者但仍颇为重要的角色。

库希特人

基督纪元前第三个一千年间，首批南库希特人就已定居于肯尼亚北部，一些讲这种语言人的后裔向更往南的方向扩散，在基督纪元前第二个一千年之末，已远抵北坦桑尼亚的中部，讲早期南库希特语的各族被认定是属于东部非洲这一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草原畜牧新石器传统的各种文化的创造者。[1] 考古学名词显示，南库希特人在定居之初就饲 617 养牛和小家畜，显然还有驴。虽然尚无足够的考古证据可确定，不过在语言的记述中已清楚表明，许多南库希特人也是谷物种植者。[2] 其中有些人很早就使用灌溉技术和粪肥来增加产量。

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初期的南库希特人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沿塔纳河和肯尼亚海岸靠近内陆的一些地区居住的是达哈洛人。那些沿塔纳河畔居住的人显然以种植为生，和讲班图语的帕科莫人及埃尔瓦纳人一样。基督纪元目前这一千年中，他们逐渐被后两

---

① S. H. 安布罗斯 (S. H. Ambrose)，1982年。

② C. 埃雷特 (C. Ehret)，1980年 (a)。

者所同化并取代③。在如今的维图地方，至少还有一个讲达哈洛语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群体，他们不再使用他们原来讲的科伊桑语，不过他们在新用语中仍保留了许多科伊桑语词和它惯用的啧啧声。④

更往内地，主要居住着裂谷南库希特人。据民间口头传说称，在泰塔丘陵住着一个名叫姆比塞的群体。⑤在乞力马扎罗山周围和再往南的马萨伊草原上，居住着讲古阿萨语的群体，而在坦桑尼亚中部的一些地方，则居住着与古夸德扎人和伊林加人有密切关系的南库希特人（见插图22.1）。在那时，后三个群体讲的很可能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多少带点不同的方言色彩。古阿萨和古夸德扎两个社会显然是同时并存的，犹如后来那些地区的粮食生产者和狩猎－采集者同时共存一样，他们中的某些人由此而改用了占主导地位的农民或牧人所讲的语言。⑥在坦桑尼亚大裂谷以西，是被恰当地称为西裂谷的人的居住地，他们往南一度可能扩展到肯尼亚的马乌林区以南的地方，向西则远达维多利亚湖地区的西南面。但到公元600年左右，他们大概是集中于塞仑盖蒂和恩戈罗恩戈罗地区。公元7世纪时，许多裂谷南库希特人在经济上似乎是以畜牧为主。不过，住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住在乞力马扎罗山周围、泰塔丘陵和裂谷边缘地带的南库希特人，则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种植业上。

本章所述时期其他重要的南库希特人群体讲姆布古安语，根据语言记录该群体可分为两支，一支是基林亚加库希特人，显然在肯尼亚山一带的班图定居者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可能就是今日该地区传说中的贡巴人，其成员大概包括农民、猎人和以采集为生的人等。⑦讲姆布古安语的第二支是古马阿人，此时显然集居于坦桑尼亚东北部、可能达到古阿萨人居住地的东面、潘加尼河的南面、和瓦米河流域上游的部分地区，因为这一带的生态条件适宜大量饲养牲畜。按照当今马阿人的口头传说，他们是在17世纪之前的某一时刻从肯尼亚一带迁移到这一地区的。⑧显然，马阿人在有更详尽叙述的近代历史的初期，已经有一种十分古老而可信的传说。语言学的证据与传说是一致的，只是认为来自北方的人口流动要更早于17世纪而已。⑨

619

科伊桑人

基督纪元前第三个一千年期间，不断扩张的南库希特人已完全吞并了科伊桑人的许多群体，剩下来的科伊桑群体继续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与从事粮食生产的库希特人住地相邻，不过他们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邻居的语言。我们已知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晚期，多数讲南库希特语的群体中似乎都包括上述那种相伴为生、但经济上却大有区别

③　已有的证据中包括帕科莫语的种植词汇，这显然是从达哈洛语借用来的。
④　C.埃雷特，1974年（a），第10－11页，第67页。
⑤　C.埃雷特与D.努尔斯（D. Nurse），1981年（a），1981年（b）。
⑥　C.埃雷特，1974年（a），第15页。
⑦　同上，第27－28页；现在已有确凿证据把这种语言归属于南库希特的姆布古安语分支。
⑧　S.菲尔曼（S. Feierman），1974年，第74、75页。
⑨　C.埃雷特，1974年（a），第13页。

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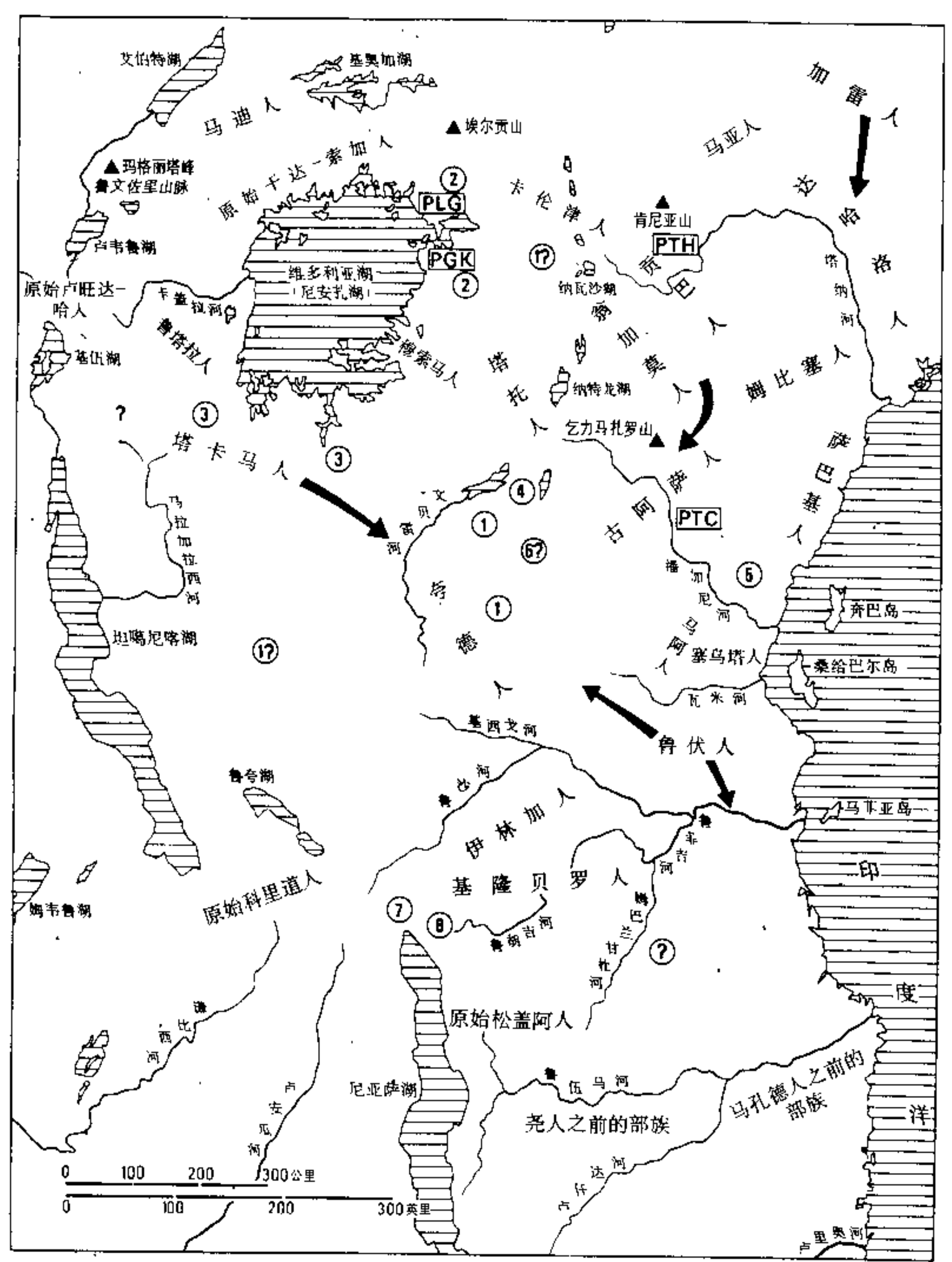


插图22.1 公元7—9世纪左右东部非洲的主要社会群体

- ➡ 7—9世纪期间以及7—9世纪之后这段时间里各个族群进行扩张的可能方向
- ① 科伊桑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者
- ② 高原南库希特人
- ③ 尼安扎南库希特人
- ④ 原始西裂谷南库希特人
- ⑤ 阿苏人之前的部族
- ⑥ 兰戈人之前的部族
- ⑦ 尼亚库萨人之前的部族
- ⑧ 原始恩乔姆贝人
- PGK 原始古西-库里亚人
- PLG 原始卢伊亚-古西人
- PTC 原始泰塔-查加人
- PTH 塔吉库人之前的部族

[注]：尽管两个族群自己命名的名称十分相似，但马阿人(Ma'a)属南库希特人，与讲东尼罗特语的马亚人(Maa)根本不同。

的格局。不过在坦桑尼亚中部南库希特人住地的边缘地带，至少有两个科伊桑群体至今还保持着他们自己的语言。其中一个群体是埃亚西湖畔的哈扎人，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住在采采蝇为害、不宜饲养牲畜、仅勉强可供种植的土地上。即使是他们，公元 7 世纪时，在物质文明方面也受到附近西裂谷人的巨大影响。例如他们已从南库希特人那里学到制造草原畜牧新石器传统陶器的方法。[10]另一个群体是桑达维人，他们已经转而以务农为生，这样才能在同其他粮食生产者的竞争当中成功地生存下来。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显然来源于生活在孔多阿地区及其附近和生活在如今的桑达维地区的讲古夸德扎语各族。[11]（620）遗憾的是桑达维人转业务农的时间尚难确定，看来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认为的要晚到 18 世纪。[12] 桑达维人转向生产粮食有可能始于公元 7－11 世纪这段时期。那时，古夸德扎人大概早就生活在那里。不过这种转变也有可能发生在公元 1100 年到 1700 之间。

讲中苏丹语各族

在更遥远的西方，讲中苏丹语各族在大湖地区看来同生活在东非中部和东部的南库希特人拥有类似的历史地位。大约在基督纪元前第三个一千年，作为高粱和 穇子的栽培者、牛和小家畜的饲养者以及热心的捕鱼者，中苏丹人首次崛起于苏丹地区最南端和乌干达最北端的尼罗河地区。他们新定居点的前沿后来向南一直推进到维多利亚湖盆地。对这一扩张尚少调查研究，其迹象有二。对花粉的研究发现盆地内的农业活动引起的植被变化，在西面和维多利亚湖以北地区，农业时代的开端不会晚于三千年以前。[13]在考古方面，可以反映中苏丹人这种文化和经济扩张的是甘雪雷陶器。

像他们的同时代人——住在大湖区东边的南库希特人那样，在基督纪元前第三个一千年间，中苏丹的农民和牧人已和那些以采集为生的毗邻群体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从生活在维多利亚湖西边和南边的狩猎－采集者广泛使用甘雪雷陶器一事，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关系。[14] 中苏丹人仅仅以打鱼为副业，必然要直接抢夺这一盆地中比他们先来者的重要食物资源，从而可能比南库希特人更快和更彻底地把那些狩猎－采集者同化并吸收到自己的社会中来。

尼罗特人

在维多利亚湖东边，最早向农民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是南尼罗特人，他们大约在

---

[10] S. H. 安布罗斯，1982 年。

[11] 桑达维人粮食生产词汇中，借用了许多古夸德扎人的语词，两者关系很明显；不过尚无专门论述这些证据的著作出版。也见《非洲通史》，第 IV 卷，第 19 章。

[12] 例如 J. L. 纽曼（J. L. Newman），1970 年。

[13] 例如 R. L. 肯德尔（R. L. Kendall），1969 年；M. E. S. 莫里森（M. E. S. Morrison），1968 年；M. E. S. 莫里森和 A. C. 汉密尔顿（A. C. Hamilton），1974 年。对这些资料的历史性解释，见 D. 舍恩布伦（D. Schoenbrun），1984 年，注 47。

[14] S. H. 安布罗斯，1982 年，第 133 页。

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的中期开始从乌干达－苏丹边境一带向南迁移，已证实他们是埃尔曼泰塔考古传统的创造者。[15] 南尼罗特人沿着肯尼亚中部裂谷及以西的高地上定居下来，把相当部分的南库希特人吸收进自己的社会，并且与裂谷边缘森林区的狩猎－采集群体和继续住在裂谷底部、完全过着放牧生活的南库希特人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16] 他们从狩猎者那里，换得像蜂蜜、蜂蜡、兽皮之类产品，同时从裂谷的牧民那里用粮食换取牲畜。公元7世纪前后，早期南尼罗特人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后裔社会，即马乌以北形成部族前的卡伦津人和山脉南面的塔托人，现代达多加人即起源于后者。塔托人看来最初集居在洛伊塔高地，后来某个时期才向外扩散，公元1100年前转向东南方向，并进入马萨伊草原古阿萨人的居住地。[17] 621

班图人的扩张

但是对早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更为严重的挑战还是来自已进入早铁器时代的讲班图语各族向东非的扩张。这种挑战并不总是马上就显而易见的，班图移民对其定居区域最初是颇有选择的。

东部非洲新的农业社会最早出现于大湖地区的最西面，人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当今的学者称之为原始东班图语。比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中叶更早的时候，他们就已在湖区西部、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地方定居下来[18]。当时，东非西北部正经历着两大经济变化。一是炼铁术的传播和随之而来的工具制造技术的改进，石器工具时代的结束在这里远比东部非洲其他地区要早。另一可能具有更为重大深远意义的变化，则是在主要讲原始东班图语的社会中出现了种植多样化的农业。开始以栽培薯蓣为生，继而从先于他们进入农业社会的非洲大陆东部各社会群体引进了谷物种植，从而获得了能适应东非环境的千差万别的新的应变能力。[19] 在这一时期快结束时，一些讲东班图语的社会群体，在他们的邻居中苏丹人和住在维多利亚湖以南的南库希特人的影响下，开始增加对饲养家畜的兴趣。此外，由于吸收了许多原本是讲苏丹语方言的人以及本身人口的自然增长，讲东班图语方言的人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中大量增加[20]。进入公元初时，生活在湖区和毗邻的东扎伊尔地区的讲东班图语的人增加到如此程度，足以使他们向遍及非洲东部和东南部新的遥远的定居点进行又一次大规模迁移。 622

在东非，一些新移民远抵东方，到了肯尼亚南部的沿海地区和坦桑尼亚东北部的部分山区，特别是在帕雷和恩古鲁山区。他们是夸莱陶器的制作者。稍后，约在公元5世纪，其中一个分支迁抵肯尼亚山，大概就是这部分居民带来了东班图语方言，今日肯尼亚东部高原普遍讲的塔吉库语即源于此。尽管尚未得到考古学的充分证实，从夸莱陶器

[15] 同上，第139－144页。

[16] C.埃雷特，1971年，第39、114页。

[17] 同上，第55－57页；C.埃雷特，1980年（b）。

[18] C.埃雷特，1973年；并见J.范西纳（J. Vansina），1984年，关于近期有关书目和各种观点。

[19] C.埃雷特，1974年（b）。

[20] C.埃雷特，1973年。

与肯尼亚山出土的12世纪时的加通甘加陶器和近期陶器之间的连续性看，作这种假定看来是有道理的[21]，并且与语言的证据也相吻合。可以设想，定居于帕雷山区的移民所讲的就是这种关系密切的方言。后来的奋加语、达维达语、和萨加拉语就是从这种方言发展而来的。[22] 虽然今莱陶器是在乞力马扎罗峰附近地区发现的，但极可能是从早期生活在帕雷地区的班图居民那里贩运去的。很久以来人们就一直从帕雷进口陶器，因为乞力马扎罗山一带缺少合适的粘土。

第二批迁移到东非沿海一带的早期讲东班图语的人是东北海岸人，时间大致在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的中期或在此之前，这次迁移始于何时尚待考古验证。到了公元7世纪，已有一大批东北海岸人从塔纳河口以北扩散到了当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的腹地，并结合成4个社会群体：即肯尼亚的萨巴基语族；在他们南边的塞乌塔语族；生活在坦桑尼亚中部沿海及其内陆地区的鲁伏语族；和大概早已生活在帕雷山区南部的形成部族前的阿苏人。[23] 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在潘加尼河以北，这种扩散很可能把过去生活在沿海腹地的今莱人也吸收了进来[24]。

623

一些早铁器时代讲班图语的人的定居点已远达东非南部。基隆贝罗人已经在基隆贝罗山谷及周围地区定居下来，而那些从语言角度看应是现在住在坦桑尼亚南部人们祖先的族群则定居在更往南的地区，即在松盖阿高地和鲁伍马河以南。还有一些定居区出现在马拉维湖的北端，从其中一些居民的方言中衍生出尼亚库萨语、科里道语（包括菲帕、尼扬万加、尼哈、曼布韦），和姆乔姆贝语（包括赫赫、贝纳、金加）的种种分支。这三个定居点的存在，迄今还只能凭借语言学的证据来肯定。[25]

最后一个值得提到的讲东班图语的重要早期定居区域是沿维多利亚湖西岸一带、特别是瓦米湾北部和坦桑尼亚中北部西半边。瓦米湾的移民是乌雷韦陶器一个品种的制造者，可能是后来出现的卢伊亚－吉苏人社会的基地。至于坦桑尼亚中北部西半边的定居区可能为时短暂，他们是莱莱苏陶器的制造者，另一可能是莱莱苏陶器是出于今日生活在坦桑尼亚中部孔多阿地区的伊兰吉人祖先之手。

从那些继续居住在大湖地区的讲东班图语的人的社会群体中又形成了其他社会。语言、口头传说和考古发现都表明了居民的延续性[26]，在进入这一时期时，原始湖区人最大可能是布科巴地区的居民，而原始塔卡马人可能生活在他们的南面，另外一些在不同时期被纳人处于扩张中的湖区人社会的群体则居住在卢旺达和布隆迪以及这一地区西部的其他地方。

---

[21] R 索珀（R. Soper），1982年，第236－237页。

[22] C 埃雷特和D. 努尔斯，1981年（b）。

[23]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9章的论点。萨巴基和鲁伏是学者们根据地名为那些已在历史长河中失去自己名称的群体所起的名字，在本章中此类名字还有塔卡马、恩乔姆贝、基林亚加、伊林加等。

[24] 本结论的依据包括，在萨巴基人的语言中发现有很早就从塔吉库语——或是与泰塔－奋加语有关的语言中借用来的词汇，这一现象尚难归因于最近几个世纪接触的结果，在某些南索马里语中也有这种借用外来语的现象。

[25] D. 努尔斯，1982年，并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9章。

[26] P. R. 施密特（P. R. Schmidt），1978年。

因此，到了公元7世纪，讲东班图语的人的农业社会已零星地和很不均匀地散布在大湖区的中部和南部，可能还一直延伸到：与之相邻近的坦桑尼亚中北部内陆腹地和肯尼亚沿海一带；帕雷山区；肯尼亚山坡地的一些小块地区；维多利亚湖西岸；坦桑尼亚中南部一些毗邻的丛林；也许还延伸到坦桑尼亚中北部的一个地区。讲班图语的人的居民区分布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常常与当地年降雨量超过900～1000毫米这一因素有关，偶尔也在年降雨量低于900毫米的高地中地势稍低的区域出现，那里的水分蒸发率较低，可弥补降雨不足。换言之，在早铁器时代，讲东班图语的人的定居点已扩散到情况与他们原来住地相近的很多地区。这些都是雨量充沛的丛林或森林地带，适宜以种植薯蓣为主的农业。这是促使最早的讲班图语的移民迁离西非的原因。[27] 确切地说，在这时期，所有东非讲班图语的人已知种植非洲粮食作物，但其定居方式表明，薯蓣作物的种植依然举足轻重。 624

令他们加倍向往的是，这些气候湿润地区尚未被早就住在那里从事粮食生产的南库希特人和尼罗特人利用或充分利用，从而避免了直接争夺土地的危险。东非沿海一带有很多地区遭受采采蝇之害，故对饲养牲畜的库希特人和尼罗特人缺乏吸引力。在坦桑尼亚南部，讲班图语的人的居民点往往设在不宜饲养牲畜的地区，而且不管怎样，总是南库希特人扩张所尚未到达的地区[28]。可以想象，那时在帕雷山区和肯尼亚山一带，讲班图语的移民搬迁到了森林覆盖的高地，而平原和林区边缘，则早已被库希特人开发了。在许多这样的地区，尽管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群体也在活动，他们在同不断迁来的粮食生产者争夺资源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不消许多世纪，除了居住在较冷的高原森林地区的人外，狩猎－采集群体就被入侵的讲班图语的社会同化了。

同讲班图语的人定居点的格局比较，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莱莱苏陶器的制造者迁到了相当干旱的坦桑尼亚中部。如果说这个群体能在以后的世纪中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生存下来，它必然具备别的讲班图语的人的定居点所不需具备的迅速而切实的适应能力，能在耕作中完全转到种植谷物，可能使通过狩猎得的食物在整个食品中所占比重大为增加。至今仍然缺乏把莱莱苏人与后来讲班图语的社会联系起来的证据，因此目前尚难追踪这一引起人们兴趣的有可能是事实的历史。

公元7世纪时，东非内陆仍有一些地区尚未由从事粮食种植的社会群体定居，这些地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坦桑尼亚西部的一大块地方。第二个大地块位于坦桑尼亚西南部的核心地带，据估计，科伊桑人以狩猎和采集食物为生的群体仍在这些地块独立生存，甚至到很晚的时期仍沿袭这种方式生活。但是这一判断还需作必要的考古研究来加以证实。

某些东库希特人社会也占重要地位，他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肯尼亚北部。肯尼亚山北面居住着讲早期亚阿库语的人群，大概早在基督纪元前一、二千年时，东库希特人中讲亚阿库语者就可能已经来到这一地区。他们显然以牧民为主，虽然也知种植谷物，他 625

---

[27] C.埃雷特，1982年（a）。

[28] G.韦特（G. Waite）和C.埃雷特，即将出版。

们吞并了先来到肯尼亚中北部的南库希特人中讲姆布古安语者，㉙ 其语言至少为一个生活在肯尼亚山北坡原讲科伊桑语的狩猎采集者群体所采用㉚。

其他东库希特人生活在图尔卡纳湖盆地，其后裔与如今住在湖北端的达内内乞人和阿尔博雷人有血缘关系，这些人在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间，就已广泛扩散到整个盆地。当今学者把这些不同的本来未曾命名的群体统称为巴兹人。㉛ 他们可能是图尔卡纳湖地区古天文遗址的创造者。㉜

早期索马里人和伦迪利人

再往东面，就是从塔纳河延伸到索马里境内谢贝利河流域的一大片低地，在好几个世纪前这里就已成为早期索马里人和伦迪利人的家园。㉝ 有迹象表明，他们大概在公元初开始扩张到这里，在扩张过程中不但牺牲了相当多语言关系难以确定的狩猎－采集者的利益，而且连从事畜牧的达哈洛群体也未能幸免。㉞ 到了7世纪，朱巴河地区和谢贝利河流域即使没有完全也已部分成为讲索马里语的人们所拥有。㉟

东非内陆的东北部地区，远离于其他地区经济之外。这一地区包括东部非洲最干旱的地区，7世纪时已是一种新形式的放牧中心，骆驼由于更能适应这里的水土，取代了牛成为主要的饲养牲畜，伴随骆驼饲养业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即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东部非洲任何更南的地方，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都未有过这种生活方式。626 在7世纪以前，这种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改变范围有多大尚不清楚。语言学的证据表明，对于住在最干旱地区的形成部族前的伦迪利人和某些讲索马里语的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已发展到很高的程度。㊱ 另一方面，许多居住在水源较好地区的索马里人群体，把牛和骆驼放在一起饲养，即使在这几个世纪中，讲索马里语的地区，已包括那些在朱巴河和谢贝利河流域定居的农业社会。对他们来说，牛一直是更为有用的牲畜。㊲ 可以设想，生活在图尔卡纳湖盆地的巴兹人也养骆驼，虽然他们不像居住在湖东面地区的人那样重视。

关于印度尼西亚成分的问题

最后一个种族成分是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并未出现于东非内陆地区，然而从长远角度看，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大约在公元3至6世纪期间，形成部族前的马尔加什人

㉙ C.埃雷特，1974年（a），第33页，但此处并未考证出这些南库希特人的语言关系。
㉚ 同上，第33、88页。
㉛ B.海涅（B. Heine）、F.罗特兰（F. Rottland）和R.福森（R. Vossen），1979年。
㉜ S. H.安布罗斯，1982年。这些人可能是早期尼罗特人。
㉝ B.海涅，1978年。
㉞ 根据M. N.卡利（M. N. Cali）和C.埃雷特目前从事的对索马里历史的研究计划中一些初步迹象。
㉟ M. N.卡利，1980年。
㊱ B.海涅，1981年。
㊲ M. N.卡利，1980年。

经过印度洋海路抵达非洲东海岸，最后在马达加斯加找到了永久生息之地。他们大概随身带了一部分适应东非当地气候的东南亚农作物品种，其中最重要的新作物是香蕉。时间证明，香蕉特别适宜于较温暖的高原水土，其他像香蕉那样需要允沛雨量或灌溉的农作物有亚洲薯蓣、芋头和甘蔗。稻米也可能是形成部族前的马尔加什人引进的，但它不像其他作物，直到19世纪才大量地引种到沿海地带以外的区域。[38]

部族演变的过程

许多方面的事实都能说明，公元头600年中已经确定的种种趋势，在7到11世纪时期继续得到发展。

从地理学的观点看，许多讲班图语的社会由于受生态环境的限制，绝大多数仍生息在他们早铁器时代就定居的区域中，固然他们的人数在这些地区范围内必定继续增加，他们更有效地利用本区潜力的能力也有所提高。举例而言，他们在高地各个地方可能砍伐了更多的森林，把适宜居住的环境尽可能扩展到高地以外地区。语言学的证据也表明，许多地区不断进行着把非讲班图语各群体加以同化的进程。例如，在坦桑尼亚东北部，作为塞乌塔族在恩古鲁山区和乌济古拉地区进行领土扩张的一部分，原来讲古马阿语的人中相当大一部分显然被吸收入原始塞乌塔社会之中。[39] 627

各个讲班图语的社会间的差异和不同也在继续扩大。基督纪元之初，东部非洲各族讲的是单一的东班图语中的不同方言。到7世纪时，不同方言之间能互相听懂的状态多数想必已告结束。到了公元11世纪，彼此间的差别已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可以识别出许多独成一体的语言——东北沿海地带语言，它本身就包含4种不同的方言或方言群：塞乌塔语、萨巴基语、鲁伏语和阿苏语；大湖区中部的湖区居民语，其中至少又可分为3种方言，相互间明显差别的程度已接近于不同的语言；住在维多利亚湖南面某些地区的居民所讲的塔卡马语，也有几种方言；湖东南岸居民所讲的原始古西－库里亚语；湖东北岸的原始卢伊亚－吉苏语；可能是居住在肯尼亚山的加通甘加陶器制造者所讲的塔吉库语；在帕雷山区北部、乞力马扎罗山区和泰塔丘陵区与奥雷陶器首创者所讲的原始泰塔－查加语（这一语言有3种方言，其中两种在泰塔地区讲）；此外还有住在坦桑尼亚南端的群体讲的几种语言[40]。11世纪以前，东北沿海地带班图人讲的萨巴基语和鲁伏语又分化出不同的方言群，原来讲萨巴基语的社会分裂为讲原始斯瓦希里语、原始帕科莫语、原始米杰肯达语和讲埃尔瓦纳语的群体，而某些讲鲁伏语的人群向内地扩展，到了今日的乌卡古鲁地区，结果形成了不同的东鲁伏人和西鲁伏人。

这几世纪中的人口流动使泰塔－查加人也分化成为三个社会。原始泰塔－查加人被认为也是马奥雷陶器早期制作者之一，这种陶器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后半期出现于

---

[38] C.埃雷特，即将出版。

[39] C.埃雷特，1974年（a），第13页。

[40]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9章。

帕雷山区北部。[41] 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晚期某个时候，泰塔-查加群体出现第一次分裂，一小部分人迁入泰塔丘陵区；他们讲的泰塔-查加语方言演变成今日的萨加拉语。接下来从帕雷山区北部到泰塔丘陵的一次迁移，又为这一地区带来了第二种方言，它是现代达维达语的祖先。这两次讲班图语的人的迁移都使他们进入一个与早已定居在丘陵及其周围，属于裂谷库希特人的姆比塞人进行长期文化交流的时期。[42] 在帕雷山区北部留下的泰塔-查加人，则于目前这个一千年的初期直接发展成原始查加人，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其后裔成为乞力马扎罗山区内社会和经济重新组织的关键。[43] 628

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后半期，大湖地区也发生了讲班图语各族的重要流动，湖区居民群体居住的疆域大为扩大。湖区最早的社会大概是居住在沿维多利亚湖西岸和西南岸当时还是茂密森林地带的早铁器时代讲班图语的人形成的。他们被认为是布科巴地方乌雷韦陶器的制造者，显然也同该地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炼铁遗址有关。在进入这个时期时，他们的毗邻部族包括了南库希特人，可能还有已扩展到维多利亚湖南面的裂谷各族以及中苏丹人，湖区居民语言中的某些字（诸如"牛"字）即来源于中苏丹语。早在公元头几个世纪时，湖区居民就已有过几次外迁运动，在西面的地区，即把刚果河流域同维多利亚湖盆地分开的西裂谷附近地区，传入的湖区居民方言在一定时期后演变为卢旺达-哈语和孔乔语。语言学的证据表明，外迁的第二个时期发生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中间偏前时期，具有湖区居民背景的人扩展到维多利亚湖北面。这些外迁运动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农业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以及可能最重要的是为了炼铁。考古研究充分证实，该地区已出现一种初期的专业——过度砍伐森林以炼焦炭从而造成对环境的过度利用。[44] 随着这第二期向外扩展，留在大湖地区的各个社会开始分散，演变为一批批独立的鲁塔拉人和干达-索加人社会群体，显然这是由于沿着大湖北岸与北岸向北扩散的人口大量外迁的结果，兼并了早先住在这里的各个中苏丹人社会群体，并在这一进程中演变成为今日干达族和索加族的远祖。留下来的人在数量上可能有所减少，其中鲁塔拉社会在布科巴地区及其周围得到发展。[45]

最后一次沿维多利亚湖西岸的外迁运动很可能开始于本章所述时期的末期，它使鲁塔拉语言和文化向西北扩展到了后来称作恩科雷、姆波罗罗和布尼奥罗的一些地区。这 629 次思想上的和实际行动上的外迁运动很可能标志着"巴奇韦齐"时代的起始。这是一个仅在后来的口头传说中模糊地神话般地提到过的时期，但后来的各个王国的关键性政治主张和经济结构最早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付诸实施的。

在这整个时期，东非中部内陆地带草原和高原的居民主要是讲尼罗特语和库希特语的人们，但是南尼罗特人的地盘显然在扩大，而南库希特人的领地则大为缩小。达多加人可能也形成于这个时期，这是一种虽不完全但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分布在肯尼

---

[41] C.埃雷特和D.努尔斯，1981年(b)。

[42] 同上。

[4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9章。

[44] D.舍恩布伦，1984年；M.C.范-格伦德贝克（M. C. van Grunderbeck）等人，1983年(a)、1983年(b)。

[45] 同上。

亚南端大裂谷西侧到坦桑尼亚的马萨伊草原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46] 看来他们的扩张是以牺牲讲古阿萨语和古夸德扎语密切有关的群体为代价而进行的。[47] 在马萨伊草原中部他们与专门从事狩猎和采集的群体并存。这些群体一直到几十年前仍讲东裂谷语系中的阿萨语（切勿与班图语系中的阿苏语混淆。）[48]其他讲塔托语的南尼罗特人居住在条件优越、紧接着马乌林区南端的畜牧地带。一个是当今松乔人祖先的讲班图语的社会群体，似乎在讲塔托语地区中找到了一块栖息地。因为现代松乔语中含有由于和早期达戈加人接触而借用的词汇。他们很可能像他们近代的后裔那样，从事依靠裂谷悬崖水系进行灌溉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繁衍下来。[49]

原始的卡伦津部族形成于生活在马乌林区北部的南尼罗特人中。公元1000年以前的若干世纪中，南库希特人之间长期的互相融合推动了社会的进化。[50] 一个引人注目的讲班图语的成分也被融合进来，看来这主要是通过卡伦津族的男子和讲早期卢伊亚-吉苏语的女子通婚实现的。[51] 从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末开始，卡伦津人开始扩展到相当大的新地区，从西北部的埃尔贡山一直到尼扬达鲁瓦山脉南部以及肯尼亚中部和南部的大裂谷地区。在这个时期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是，卡伦津语被当时居住于同裂谷相接的森林地带和马乌林区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们所接受，其他卡伦津人则向西扩展，进入位于埃尔贡山以南如今讲卢伊亚语人的地区，显然讲班图语和讲南库希特语的社会群体在他们之前就生活在那里了。[52]

另一个在公元1100年以前出现重大部族重新组合的地区是乌干达北部。在西面，马迪人（中苏丹人的一支）沿爱德华湖东和东北方进行扩张，他们最终成为乌干达西部居民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这些西乌干达人是在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的前半期被扩张中的鲁塔拉社会所同化的。[53] 其余的马迪人，直到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中期卢奥人扩张的时代，仍是乌干达中北部的主要部族。[54] **630**

公元7世纪时，住在北乌干达东面的主要部族是西库利阿克人。他们占据着南到莫罗托山和纳帕克山，北到今天苏丹边界的地区。公元一千年前后，西库利阿克人的统一由于一个讲东苏丹语的部族——阿泰克尔人入侵该地中心地带而解体。西库利阿克人的词汇作为外来语在阿泰克尔语中的频繁出现，说明了这次入侵的结果是原库利阿克人大量地被吸收进了早期阿泰克尔人的社会。[55] 这种融合进程在11和12世纪以前达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但在那个时期，尚存的库利阿克人可能为数仍众，而且并不像今天这样

---

[46] C.埃雷特，1971年，第55-57页。

[47] 达戈加语中有大量东裂谷外来语，东裂谷人是南库希特人的一个分支，阿萨人和夸德扎人也归属于南库希特人。

[48] C.埃雷特，1974年（a），第14-15页。

[49] C.埃雷特，1971年，第55页。

[50] 同上，第48页。

[51] C.埃雷特，1976年，第13页。

[52] C.埃雷特，1971年，第50-51页。

[53] 在北鲁塔拉方言中存在马迪外来语，可作证据。

[54]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20章。

[55] C.埃雷特，1982年（b），第25页。

只居住在山上的堡垒中。

阿泰克尔移民的到来，在东乌干达引发了部族结构的变迁，这种变迁显然发生在原住苏丹南端，也就是今天乌干达边界以北地区的东尼罗特人中。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前期，这里的居民从文化和语言角度看包括今天仍住在该地区的巴里人和洛图科人的祖先，也包括原始马亚－翁加莫人和阿泰克尔人。在同一时期，迪丁加－穆尔勒人的祖先也居住在紧邻东尼罗特人的东北方以及苏丹南端的平原上。在阿泰克人向南扩展到东乌干达之前，他们就对阿泰克尔人有过影响。[56] 但他们一直没有直接卷入到北乌干达的事务中去，直到公元 1100 年以后的时代。另外一批对东部非洲晚期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是卢奥人，他们在 7－11 世纪就居住在东尼罗特人的北面，不过显然是在形成部族前的迪丁加－穆尔勒人住地的西面，在苏丹南部的尼罗河附近和以东的苏德沼泽某些地区。

与这些缓慢的部族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群体逐步扩大地盘明显不同的是一个全新的部族成分在东非中部的舞台崛起，这就是马亚－翁加莫人（马亚人包括如今居住在马萨伊草原上的人，切勿把它同上文提及的南库希特人中的马阿人相混淆！）。约在公元 8 世纪，原始马亚－翁加莫人从邻近苏丹最南端洛图科地区的发源地向南扩散到肯尼亚山以北和西北的巴林戈地区和莱基皮亚高地。他们最初向南扩展时，融合了许多原先居住在图尔卡纳湖盆地的巴兹人，他们是低地东库希特人。[57] 在巴林戈以南和莱基皮亚高地占统治地位的本来是讲南尼罗特语和南库希特语的人们。[58] 原始马亚－翁加莫文化明显受到南尼罗特文化的重大影响，尤其是马亚－翁加莫人实行割礼制度以及使用长椭圆形的南尼罗特式盾牌。[59] 到达肯尼亚山区以后，原始马亚－翁加莫人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分裂成两个社会，马亚人统治巴林戈地区和莱基皮亚山区，并且在文化上继续受位于其南方和西方的卡伦津人影响。[60] 古翁加莫人则向南扩展，越过裂谷，还可能越过了肯尼亚山和尼扬达鲁瓦山脉间的谷地，最后聚居在乞力马扎罗山和帕雷山地区的平原上。[61] 在这里，他们影响了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后期生活于此地的、以饲养牲畜为生的泰塔－查加人。在目前这个一千年开始之初，大批翁加莫人又被原始查加社会所同化。

631

经济活动

在经济方面，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早期形成的活动格局，在公元 7－11 世纪继续

---

[56] G. J 迪门达尔（G. J. Dimmendaal），1982 年。

[57] C. 埃雷特，1974 年（a），第 40、41 页；B. 海涅、F. 罗特兰和 R. 福森，1979 年。

[58] C. 埃雷特，1971 年，第 52－54 页，认为其定居点比目前看来可能栏较大的地区更往南。由于迄今尚未对马亚人语言中的南库希特外来语作应有的仔细研究，从而对它消失中的语源在南库希特语系中的地位也难以确定。

[59] C. 埃雷特，1971 年，第 53 页。

[60] C. 埃雷特，1971 年，第 74－75 和 166－171 页，综合了当时及后来他们之间接触的证据，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V 卷，第 19 章。

[61] C. 埃雷特，1974 年（a），第 40－41 页；R. 福森，1978 年。

左右着变化的方向。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部族地位和粮食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并且继续发挥其作用。南尼罗特人在一千年前，进入肯尼亚西部时就以游牧为主，同时也种植一些谷物。从塔托人和卡伦津人所喜爱的居住地点和他们相互间以及与他们的邻族之间借用的词汇来看，[62] 他们的谋生方式直到公元1000年总的说来仍未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东尼罗特人的一支，马亚－翁加莫人扩展到东非中部，只不过是加强了尼罗特语以及家畜 632 饲养和种植谷物作为主食两者相结合的经济。可以想见，尼罗特人的这种经济肯定要同更具有游牧特色的南库希特人为争夺土地发生直接冲突，而南尼罗特人扩张的成功意味着原来占统治地位的库希特群体遭到兼并。同样道理，马亚－翁加莫人在扩展中又兼并了南尼罗特人。

讲班图语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从事一种与当地其他各族不同的种植农业，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主要作物的繁殖不是通过种子，而是通过用作物本身的一部分作为栽培种再种到地里来实现的，讲班图语的各社会知道并且也播种了一些种子作物，其中包括高粱和在高原地区种植的穇子，同时也经常养牛，[63] 但直到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晚期，西部非洲种植农业中古代的主要作物——各种非洲品种的薯蓣，对东非内陆几乎所有讲班图语的社会来说，很可能仍然是重要性压倒一切的食物来源。东南亚很早就栽培成功的作物群也是通过栽培种来种植的，这需要大量雨水。由于气候的因素和对种植农业已经掌握相当的知识，对讲班图语各族来说，种植包括亚洲薯蓣、芋头和香蕉在内的作物，一定是相当容易的。作物品种的增加促进了班图经济的繁荣，并且拖延了使其农业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

也有一些与此总趋势大相径庭的现象，上文曾经提到过一个叫松乔人的讲班图语社会群体在本来贫瘠的土地上广泛运用灌溉和施肥的方法种植了多种农作物。他们采用的方法可能是受到南库希特人的启发，而且早在公元 1100 年以前就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在肯尼亚中部凯里奥河谷的陡坡地带，居住着几个小社会群体，在公元 1100 年左右，他们讲的是各种早期卡伦津语（这些早期卡伦津语后来演变成今天的马拉奎特方言）。这几个小社会群体可能也采用相似的方法对他们的土地进行灌溉和施肥，并且主要靠精耕细作而不是靠饲养家畜来谋生。到了公元 600－1100 年期间，在坦桑尼亚一些地区的讲班图语社会中，食品中谷物和其他种子作物的比例大大超过了薯蓣类植物。其中之一是西鲁伏人社会，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分裂出来到了西部，搬到既适于饲养家畜也能够种植谷物的较高而且更为干燥的地带，很可能是坦桑尼亚中东部的卡古卢地区。在讲班图语的人中更早适应了干燥环境的是原始塔卡马人，如今的金布语、尼扬韦齐－苏库马语、里米（尼亚图鲁语）和伊兰巴语都源自他们的语言。他们最早的定居点可能靠近或者位于坦桑尼亚中西部的文贝雷河西面或西北面，由于薯蓣类作物只能在 633 湿润的土地上生长良好（诸如文贝雷河沿岸地区），所以对向外扩张的早期塔卡马人来

[62] C.埃雷特，1971 年，第 144－162 页。

[63] C.埃雷特，1974 年（b）。

说，对谷物的依赖势必越来越大，这种对谷物依赖的增加在11世纪就已开始。[64]

在一个情况下，从原先生产方式趋势的发展中涌现出一种新的种植方法，这就是高地种植农业，它把当时已有的作物和生产实际综合成当时东部非洲最具生产力的体系，新的主要作物是香蕉。关于香蕉的种植知识，显然是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后半期传入东非内陆的，它途经帕雷山区，最后传到肯尼亚山。因为泰塔－查加语和塔吉库语中该作物用的是同一个词根，该词根又是住在肯尼亚山区的原始马亚－翁加莫人在公元10世纪前后从原始塔吉库语中借用来的。[65] 但是只是在帕雷山区才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末期，使高地种植农业趋于成熟。从原始查加人中分裂出来的达维达人大约在10或11世纪时离开帕雷山区北部来到泰塔丘陵地带定居下来，他们直到近代仍把薯蓣种植放在首位。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原始查加人却创立了一套相当复杂的关于各种香蕉和香蕉种植的术语体系。这表明他们用香蕉取代薯蓣作为主要食物的过程是与此同时发生的。坦桑尼亚东北部的高地种植农业之所以特别富有成效，是由于他们系统地使用了灌溉技术和粪肥。南库希特人对农作物的种植程序，后来被一些具有种植农业传统的人们用于种植原产于东南亚的作物。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讲查加语的社会群体扩散遍及乞力马扎罗山的东面和南面，这很难说仅是一种巧合。

种植香蕉的知识传入东部非洲内陆地区不仅仅是通过肯尼亚或坦桑尼亚北部海岸。事实上，这些途径只能是较为次要的来源。语言方面的证据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香蕉从南方以马拉维和赞比西河流域为起点，直接传入大湖地区的景象。这仅仅是该作物从赞比西河下游经过刚果河流域传入整个西部非洲的更大范围扩散的一个部分。植物学家在研究中已承认了香蕉这种大面积传播的过程。[66] 该作物从南方传入，经过较为湿润的东非西部边缘，可能在公元1000年以前早就把种植这一作物的知识传给了大湖地区的讲班图语各族和埃尔贡山区各族。就像坦桑尼亚东北部的高地种植农业一样，香蕉种植终于在几个种香蕉富有成效的地区以相似的情况发展起来，其中包括埃尔贡山区，从那里这种种植方法后来又传到了布索加和布干达、[67] 布科巴地区，以及远在南面的马拉维湖以北一带。所有这些地区都有大规模种植香蕉的类似环境条件，又都有发展食物生产力的共同需要作为动力，但它们所创造的耕作技术却似乎是各自独立发展得来的。时间普遍比查加人晚，通常都发生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年代里，唯一的例外可能只有埃尔贡山区。

铁器工具取代石器的趋势继续贯穿于从7世纪到11世纪的年代里。金属似乎是在纪元初从两个方向传入东部非洲内陆地区的，一是从西南或西北面经过大湖区传入，另一则是从东海岸。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初期定居下来的讲班图语的社会群体中，经常有一些人是铁匠。几乎与此同时，冶铁知识传遍了埃尔贡山以北地区，并一直传给大

[64] 又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9章。

[65] 原始查加－达维达语称香蕉为 *marau*，原始塔吉库语称香蕉为 *marigo*，原始马亚－翁加莫语称香蕉为 *mariko*。

[66] 特别参阅N. W. 西蒙兹（N. W. Simmonds），1962年；也见J. 巴罗（J. Barrau），1962年。本书编者注：J. 巴罗现在意见略有变化。

[67] 又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19章。

裂谷以西的南尼罗特人。[68] 在坦桑尼亚北部，一些南库希特人早在讲班图语各族定居下来的时候似乎就已懂得如何使用铁器，[69] 他们对金属的知识可能来自印度洋沿岸，来自近东的商人早在公元 1 或 2 世纪就在那里从事铁的易货贸易。[70] 但是在内陆地区，铁器生产的确立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许多地区，铁器长期被视为稀有商品，只用于作装饰品，由于它实在太贵重，因此不能浪费在制作工具上。只有到了 8 至 10 世纪期间，当新来的使用铁器的移民马亚－翁加莫人的影响日益增加时，可能是属于讲南尼罗特语的中肯尼亚人的传统埃尔曼泰塔工具才最终崩溃消失。在坦桑尼亚北部西裂谷各族中，铁器完全取代石器工具恐怕也是在较晚时候。但是可以断定，到公元 1100 年时，石器工具在东部非洲内陆所有各个地区已变得非常稀少，只有坦桑尼亚东南部鲁阿哈盆地较为干燥的地方和坦桑尼亚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例外。在那里，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者在以后的好几个世纪中仍继续使用石器工具。

从公元 600 年至 1100 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只是作为一项无规律的仅仅用来满足人们某些特殊的有限的需要而从事的活动。比如在灾年里供应食物，或者把偶尔的剩余物进行处理，再比如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收集到鸵鸟蛋壳，许多人就换取它用来制作串珠 当时也存在着一些反复出现的交换格局，比如肯尼亚中部的产地输出黑曜石，人们一直到 8 或 9 世纪仍用它制作埃尔曼泰塔石刀，又比如从东海岸向内陆地区贩运玛瑙贝。[71] 但是这一类交换只是在一个社会群体同其相邻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不存在重要的长距离货物贩运，也不存在固定的市场和商人。

635

在 7 世纪，只有一种专业职业——铁匠。但这个行业在东非内陆地区的社会中还不普遍。由于许多社会群体是依靠贸易来换取铁器，因此炼铁和锻造技术对他们来说是很遥远的事，或者是今后几世纪才能懂得的事。

另一种专业性职业大概出现在公元 8 或 9 世纪，在南尼罗特人和入侵的马亚－翁加莫社会群体居住的肯尼亚中部地区，具有部族特点的陶器制造日趋衰退，被一种单一的称作拉内特的陶器所取代，许多讲尼罗特语的群体都使用它。[72] 可能就在这个时期，制陶作为一种专业职业出现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从事该职业的主要是住在裂谷和马乌林区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们。其结果导致了这些人对同尼罗特人进行交换的依赖大为增加，这可能就是原始卡伦津人在公元 1000 年以后的扩展为什么会使整个裂谷地区的食品采集者随之更广泛地改讲卡伦津语的原因。

如前所述，帕雷山区北部和乞力马扎罗山之间也很可能存在陶器交易，卖方是讲班图语的社会群体，而买主很可能是当时生活在乞力马扎罗山附近的古阿萨人。在帕雷和大裂谷的狩猎者中，制陶常常是人们业余时间从事的职业。他们大部分时间要为自己一家的需要奔忙，因此专业化的形成并未立即导致出现制度化和正规化的市场，不过有可

[68] 这一时间是 C. 埃雷特提出的，1971 年，第 44 页。

[69] 在泰塔－查加人、松乔人和塔吉丹人的语言中，关于铁和冶铁的一些关键用词是南库希特外来语 见 C. 埃雷特，未出版（b）。

[70] 《红海巡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描述了这一贸易。

[71] S. H. 安布罗斯，1982 年。C. 埃雷特，1971 年，第 98 页。

[72] S. H. 安布罗斯，1982 年。

能在东非中部的几个特定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的交换点，人们习惯于在那里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乞力马扎罗山和帕雷山区北部两者之间的地区是铁和陶器的主要产区。[23] 这一进程可能进一步发展，在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早期，终于出现了真正的固定的市场。[24]

社会组织

636　公元7到11世纪期间，东部非洲内陆地区各社会的共同特点是：尽管各族人民有各自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他们的居住单位和政治单位都是小规模的。内陆缺少沿海地区那种有利于城镇发展的商业条件，也不存在能支撑较大政治实体的经济基础。

在内陆北部，最常见的居住单位是分散的家宅组成的聚居点。这是一种古老的、可以追溯到早期南库希特人定居点的居住格局，同时也具有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间南尼罗特人居住格局的特点。公元初，讲班图语的移民已不再局限于这种村居方式，但班图语言的扩散并非必然导致村庄的建立。在讲班图语各族接触并同化了库希特或尼罗特社会群体的地方，古老的居住格局往往能够保存下来，诸如在肯尼亚高地和坦桑尼亚北部某些地区。但在更往南的地方，村庄已成为讲班图语的人们普遍的居住模式。

南库希特人社会通常是由几个自治的氏族联合组成，每个氏族有一头人。早期讲班图语各族居民也有类似的结构格局，每个氏族有一世袭酋长，这可以设想为他们的典型组织形式。[25] 不过班图氏族的酋长看来是一个颇具积极意义的政治地位，对所属群体的很多方面负责。而库希特人的氏族头人很可能仅仅只主管土地的分配，在那人口密度稀少的岁月里，土地是一种极易获得的商品。在东非内陆使用的班图语中表示酋长之意的古老词根 -*kumu* [26] 出现频率的明显下降，说明在讲班图语的人和非讲班图语的人进行文化融合过程中，酋长的地位大大削弱了，即使东班图语有可能成为新社会的用语，情况也是这样。这种演变发生的时间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有些事例可能发生在公元600－1100年间，诸如塔吉库人氏族的头人（吉库尤语中称 *muramati*）看来更像南库希特人"首领"一词的变形，与讲班图语各族原来的首领形象相去甚远。[27] 在塔吉库人中，这种体制可追溯到公元1100年以前，它很可能来源于有塔吉库背景的贡巴支系，并且反映了该时期生活在肯尼亚山的南库希特人社会和讲班图语的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

有两件事表明在讲东班图语的社会群体中出现过一种新型酋长。这种酋长的职权不
637　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氏族，而是掌管着居住好几个不同氏族的一个地区。这种事例最早是发生在大湖区的居民中，时间可能在本章所述时期之前。在本章所述时期开始时，在大湖区的原始语言中，原来的班图语中表示"酋长"一词的词根早已被用来称呼神医（即

---

[23] 参阅I. N. 基曼博（I. N. Kimambo），1969年，第4章及其他各处。

[24] L. J. 伍德（L. J. Wood）和C. 埃雷特，1978年。

[25] J. 范西纳，1971年，第263页，认为这种亲属关系比想象的要疏远。

[26] 它演变为 -fumu，指"巫师"，而非"酋长"，见下文。

[27] G. 穆里乌基（G. Muriuki），1974年，第75页。

所谓巫医），而对社会中的政治首领则已经使用另一个称呼了。一种似乎说得通的解释是，在大湖区的原始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首领阶层，以前的小酋长已在很大程度上降为宗教和治病的角色，在后来的大湖地区历史上，这种政治变化的模式并不少见。[68] 在公元之前，就已存在着出现较大规模领导职务所需的经济基础，它以取得对新的重要的物资——铁的控制为标志。基督纪元前第一个一千年的后半期，在被认为生活着大湖区原始居民的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冶铁工业。[69] 大湖区原始居民生活在各个部族相互接触的情况下，新的酋长阶层就能通过在不同部族的不同家族集团之间充当仲裁角色来提高其地位，进而成为由中苏丹人、南库希特人和大湖区原始居民相互融合而成的统一体的核心人物。[70] 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期间，大湖地区居民的扩展之所以能节节胜利，或许也可用存在这种体制来作解释。

然而，在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早期鲁塔拉人进行扩展时，一种新的、能维持更大规模政治结构的酋长权力体制（甚至是王权体制）的基础，正在大湖地区西部站稳脚跟。这种基础主要是占有和重新分配剩余牲畜的酋长权或王权。[71] 建立在这种政治经济基础上的真正具有规模的政治实体，显然是在公元1100年之后才首次涌现出来的。[72]

12世纪以前，以地区为基础的酋长权力的第二次发展发生在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初期出现的原始查加人中，规模不大。这一发展显然和出现成熟的高地种植农业的时间相吻合。从语言学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帕雷山区北部和乞力马扎罗山区某些部分社会发展中的特有现象是：相当大的古阿萨人和古翁加莫人的群体被并入原始查加人社会。可以认为，高地种植体系为早期查加人提供了决定性的生产优势，促使他们进行扩展。同时酋长权力也形成了新的模式，这种模式为不同部族和不同家族之间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结合中心。由此产生的新的酋长权力，其统治的人口必定比过去典型的氏族单位要多得多，不过同近几个世纪东非各王国相比，仍相当之小，并且它很可能也小于同时代典型的湖区酋长权力之所及。 **638**

但是，同南尼罗特人和马亚－翁加莫人相比，东非内陆地区拥有世袭酋长的各个社会群体在那时候可能尚未形成大规模的潜在的社会和政治合作。这些社会群体中都有按年龄分组的机制，尽管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各有特色，但都具有同样的社会效果，那就是能把散布在一个较大地区内相邻家庭中的所有青年人集中起来，吸收一个特定年龄组成员的界限常常与这一社会的界限相同。本来相距甚远的人们，由于属于同一年龄组，年轻时因袭击其他氏族找到合作的基础，而到壮年时同龄人又和睦相处。尼罗特语之所以能最终取代南库希特语，尼罗特人能最终排挤掉南库希特人，恐怕同得益于这种组织机制有关。一旦发生了冲突或出现诸如饥荒之类的麻烦时，尼罗特人起码能从更广泛的群体中取得支持。

---

[68] I. 伯杰（I. Berger），1981年。在近几个世纪在湖区兴起的一些国家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种特点的某些方面。

[69] P. R. 施密特，1978年，第278页及其他各处。

[70] A. 苏塔尔（A. Southall），1954年，表明在湖区西北的阿卢尔人中近期也发生过类似情况。

[71] C. 埃雷特等人在1972年写的一篇未曾发表的论文中早就提出了这种假设，I. 伯杰则在1981年为同一假设独立提供了另外的证据。

[72]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V卷，第20章。

这样，东非许多讲班图语的社会按年龄分组和割礼传统的消失就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语言的构成清楚地表明，在东非内陆地区，早铁器时期的居民给他们的男孩行割礼，并把他们按年龄分组，[67] 虽然和讲尼罗特语的部族相比，他们可能仅在当地吸收成员，也不像尼罗特人那样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社会任务。不过，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中，生活在坦桑尼亚南部的一些讲班图语的社会——他们常保留着一些在北方业已消失了的诸如母系血统制、氏族酋长制之类古老文化传统——却废弃了割礼和按年龄分组的体制，具体时间虽然还难以确定，不过很可能是在他们历史上相当早的时期。只是在邻近南库希特和南尼罗特人社会的地区，割礼继续实行，因为后两者也有这种风俗。至于按年龄分组的体制，则一直在东非内陆北部地区讲班图语的人们中流行，尼罗特人的例子进一步证实了这点。

639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十分强烈，并且在7至11世纪期间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事例之一：肯尼亚山一带塔吉库人按辈分组的制度，他们很可能是吸取了南尼罗特人的部分想法，产生的时间可以假设为最晚在原始塔吉库人时期。[68]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事例是关于查加人的，他们按年龄分组的想法看来是受到马亚－翁加莫人的巨大影响，很可能是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末期（原始查加人时期）专门从古翁加莫人那里学来的。[69] 在查加人社会中，经过演变的年龄组合由新型的非氏族的酋长掌握。他们将此体制用于防御或作为劳动力的源泉，而在肯尼亚山一带，按辈分组的制度成为政治活动的核心，成为缺乏世袭政治首领的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较大范围合作的基础。可以认为，在更往南的地区，讲班图语的移民来到时只居住着零星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他们并不迫切需要按年龄分组的体制。然而在更往北的地方，按年龄分组的习俗在相邻的粮食生产者中得到了强化，或导致了讲班图语各族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采用了尼罗特人的模式后，有时人们以此作为新的有效方法来把非讲班图语的人纳入讲班图语的社会，并且得以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后半期和第二个一千年初期对付尼罗特人的新扩张的压力。

宗教体系

公元7至11世纪期间的大部分居民都信奉两大宗教体系中的一种。

在肯尼亚内地的许多地区以及更往南越过坦桑尼亚中部，单神教的信仰流行，这个

---

[67] 在原始东班图语中，表示割礼的字根包括－al－（－aluk－，－alik－，－alam－）和－tiin－（在查加语、塞乌塔语和扎伊尔的芦戈语中保留了这个词根）；古班图语中表示按年龄分组的词根 kula，今天只在东非的古西－库里亚语和卢伊亚－吉苏语中保留了下来，但在某些西北班图语中也有出现。（C.埃雷特，1976年，第19页，注33的解释有误）

[68] C.埃雷特，1971年，第43页。

[69] 查加人的按年龄分组体制和马亚人十分相似，它不可能专门来自马萨伊人，从而只剩下与马亚－翁加莫人早期有接触这一点：一种可能是早期查加人和古翁加莫人接触中受其了影响，另一种可能是查加人保留了在翁加莫人的体制影响下有所调整的旧班图体制。

神通常暗指上天。这种宗教把灾祸看作是神的审判或惩罚。[66] 祖先的精灵不是重要的宗教膜拜对象。讲库希特语各族有时在他们的宗教观中添加一些能给人以伤害的小精灵，而裂谷南库希特人则创造了另一种暗指天体的崇拜。他们膜拜的是太阳而非泛指上天。这后一种宗教变种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中被南尼罗特人中塔托人和卡伦津人的祖先所信奉。

在东部非洲内陆地区南半部以及大湖区的许多地方，流行着另一种宗教。它是在进入早铁器时代时由讲班图语的移民传到这里的。这种宗教相信创世主的存在，但其主要的宗教仪式却是祭祀他们的祖先。灾祸往往被归因于人类的邪恶和嫉妒，归因于某些人的作祟，按照欧洲人的翻译，这种人被称作"巫师"或"术士"。后来在大湖区还出现了另一层次的精灵崇拜。今天生活在该地区的信徒普遍认为，精灵比祖先的地位更高，影响也更大。这种水平的宗教实践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初的原始湖区人时代，[67] 不过直到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中它才真正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由于后来时期中政治规模的发展需要在宗教上有相应的东西与之配合而造成的。

在东部非洲内陆地区中部，两种宗教同时存在，过去两千年来，这两种宗教哲学的各种因素趋于混同。这一趋势从7至11世纪发生的许多大事表现了出来。在肯尼亚西部地区，很可能是在那一时期，形成部族前的卢伊亚－吉苏人把祖先作为膜拜对象的观念向东传播给形成部族前的卡伦津人，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末期，卡伦津人显然也把巫术作为灾祸来源的部分原因。[68] 大概在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初期，在帕雷山区北部和邻近的乞力马扎罗山一带，对太阳神的崇拜在原始查加人的宗教思想中扎下了根。[69] 原始查加人对古阿萨人的吞并，显然把南库希特人心目中神的概念纳入了查加人过去继承的、当时依然流行的讲班图语各族对祖先的膜拜，这与当时古翁加莫人的被同化促使该社会按年龄分组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很相似。但是在其他地方，这一时代看来并没有发生价值观念和信仰的重大变化。

结 论

如果说公元600年到1100年之间的500年不是东非内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它依然是一个在较大区域内不同地区发生各式各样次一级变化的时期。内部经济的演变仍按照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形成的部族的和地理的分布格局继续进行。在水源条件较好、林木茂盛的地区，讲班图语的人从事种植农业，播种谷物。在较为干旱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尼罗特人和库希特人推行各种不同形式的将谷物种植和家畜饲养两者结合的经济。讲科伊桑语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者可能仍然几乎独占着坦桑尼亚的西部和东南部。

---

[66] 有关这种宗教一个支派的详细描写，见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1956年。

[67] I.伯杰，1981年；P. R.施密特，1978年。

[68] 参阅C. 埃雷特，1971年，第157页。在原始卡伦津词汇中可以系统区别出巫术与使用有益于健康的药物方法的不同，但是在原始南尼罗特人语言的较早阶段则看不出这种区别。

[69] 所有查加人都用古老的班图语中"太阳"一词来称呼他们的神，而达维达人和萨加拉人则仍保留了古老的东班图语词根 Mulungu 来称呼神。由此可见，膜拜偶像的变化发生在达维达人从原始查加人分裂出来之后。

但与此同时，各社会之间显然已出现了相当可观的、非物质的、甚至是物质文化的交流，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经济专业化，并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新的各群体融合的事例。最引人注目的事例是尼罗特人、南库希特人和讲班图语的人融合成原始查加人，三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基本思想和实际相互结合，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新的社会。查加语成为这一新社会的语言，这可能是由于讲形成部族之前查加语的人开创了查加经济的基础——高地种植农业的缘故。

本时期的特点之一是：东非内陆仍突出地孤立于印度洋上明显变化的潮流之外。只有一些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作物，例如香蕉，在7世纪前开始传入内陆地区，除此之外在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7至11世纪中没有受到明显影响。诚然，在10或11世纪形成的高地种植农业把香蕉当做主要作物，这显然是由于当地条件适宜所致。而农业本身则依然建立在非洲自己的观念和实践的基础上，并未受到当时来自印度洋的影响。

在沿海地区，商业活动的大发展大致发生在9和10世纪。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东部非洲直接参与西印度洋日益扩大的贸易往来的是原始斯瓦希里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沿海居民点的居民。这些居民点很可能是位于肯尼亚北部和索马里南端的沿海一带。当时的商人沿着海岸向南扩大活动范围，远达林波波河流域。早在11和12世纪，那里就已有一个以马庞古布韦为中心的王国，并开始从津巴布韦黄金的贸易中获利。[90] 但商业活动似乎尚未渗入东非内陆。只有少量贝壳通过社会群体之间的小规模区内交换，传入内陆腹地。很明显，东非内陆地区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印度洋商业活动参与者的兴趣。这种商业活动仅限于离海岸几公里的地方。总的说来，该时期以及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东非内陆各族人民在他们能意识到的物质需要方面，都能做到自给自足。

642

东非内陆另一个具有长期重要意义、虽然并不明显可见的变化发生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后半期。当时绝大多数讲班图语的社会在农业实践中更加趋向于精耕细作，这意味着讲班图语各族的居住区已成为人口繁衍的地区，到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时，那些地区进一步成为人口储存地，许多重大的人口迁移运动和重大变化潮流都来源于此处。

---

[90] T. N. 赫夫曼（T. N. Huffman），个人通讯，1981年7月。

23 中部非洲——赞比西河以北

D.W. 菲利普森

铁器时代的开始

643

本章主要论述的时期开始之初，几乎我们所研究的地区都居住着早铁器时代的居民，其中有许多可能是讲各种班图语的人。在许多地区，技术水平不同的更早时期居民的残余，仍继续与早铁器时代的居民共存，这些人也可以从语言上区分出来。[1] 这一带铁器时代最初阶段的情况在这套《非洲通史》前面一卷（第二卷）中已有所论述，[2] 我们在这里不妨再略加重复：考古学家有充分信心把热带森林以南地区早铁器时代的工艺归纳为一个单一的工艺体系。考古学家对早铁器时代各种工艺进行分类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里为方便起见，简要介绍一下本章作者所采用的分类术语。作者把整个文化实体称为早铁器时代工艺体系（Industrial Complex），又把这一体系划分为一个东支与一个西支。在每个分支（stream）中，再以陶器的不同类型为基础，识别出仅限于一定地理区域内的若干类别（group）（见插图 23.1）。而各个类别的名称，则按照已为非洲考古学家所接受的做法，都是以最早确认出与之相联系的陶器遗址来命名的。在个别的居民群体住地内，在某些情况下，早铁器时代又可进一步按年代顺序划分为若干阶段（phase）。这里有必要重申：根据这个体系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暂时区分出两个分支。以这两个分支的传播进程和与之有关的年代顺序为一方，以从语言学角度重现班图语言的扩散进程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可以看到某种联系。[3] 看来两个分支都是在基督纪元前最后一千年的最后几个世纪中起源于内湖地区的乌雷韦诸居民点，至少它们中一部分是如此。东支的传播看来是在公元 2 世纪开始，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沿海地区夸莱陶器传统的开始时期同时发生。但是它向南方的主要扩展，都是直到公元 4 世纪当早铁器时代的文化推进到赤道非洲东部以南，远达德兰士瓦和南莫桑比克时，才完成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这一地区的最东部分，即马拉维以及赞比亚位于卢安瓜河以东的地方，出现了东支的早铁器时代居民点，本章所要论述的即是上述地区。东支后来的一次传播是来自赞比西河以南的一个中心，即今日的津巴布韦共和国，这大约发生在公元 6 世纪。但其影响只限于我们所述这一地区的很小一部分，即赞比亚最南部的维多利亚瀑布地区。

644

[1] 关于两种人之间相互影响过程的研究见 S. F. 米勒（S. F. Miller），1969年；又见 D. W. 菲利普森（D. W. Phillipson），1977年（a），第 10 章。

[2]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I 卷，第 21,23,25,27，及 29 各章。

[3] D. W. 菲利普森，1976年（b），1977年（a），第 8 章。

本章作者认为，最好把纳塔尔以及德兰士瓦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划入早铁器时代的西支。确实，我们在这里所论及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早铁器时代的西支。西支的考古成果绝大部分远不如东部的那样知名。有意见认为，西支是基督纪元初在下刚果以南的地方出现的，是显然属班图语系的居民相互融合或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的一支看来是从班图语的原生中心，即今日的喀麦隆直接穿越赤道森林南下的。在考古学资料中，它很可能就是以下扎伊尔的“利奥波德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代表，这一文化最近由皮埃尔·德-马雷重新进行了研究。[4] 第二支讲班图语的人群，像是后期东支，是内湖地区乌雷韦居民点的一个分支。在考古学上它可能为乌雷韦式陶器和总的乌雷韦型西支陶器传统所代表，曾有人报道在开赛南部的奇卡帕附近找到乌雷韦式陶器（不幸的是记载极差而且未注明日期）。[5] 饲养牛羊、种植谷物、以至冶炼金属的技术很可能都是通过这种沿着森林边缘向南、向西发展的途径，传到热带大草原的西南部的。这些发展可能导致铁器时代文化从刚果地区向南传播，通过安哥拉进入纳米比亚北部，随之传播的还有作为现代蒙杜语及赫雷罗语的祖先的班图诸语。贝恩特·海涅[6] 把这些语言归入西部高原语系。可以归之于这种早期阶段传播的唯一已确定年代的考古遗址是罗安达附近大西洋沿岸的本菲卡。这里的陶器与公元2世纪其他早铁器时代西支遗址所发现的极其相像。[7] 而且，早铁器时代文化的某些因素，如陶器的制作、牛羊的饲养，看来是在公元2或3世纪传播到纳米比亚南部和开普西部讲科伊桑语的人群之中的。这比班图人向南渗透的极限更遥远。因为对于这些创新除起源于早铁器时代的西支外，找不到其他渊源，因此其年代可以解释为西支传播到安哥拉南部的终止期。[8] 关于西支早期传播的细节，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材料。我们迄今掌握的考古资料都属于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的后半叶，而且大部分来自西支地区的东部——沙巴和赞比亚西部。在那里这种工艺的出现一直延迟到公元5世纪或6世纪前后。

646

上面所提供的概要，与从事班图语比较的语言学家用来作为历史地重现班图语发展过程的基本结论并不矛盾。诚然，本章作者一贯认为，西支原来是从刚果地区向南传播到刚果河下游以南地方的。这种传播可能是与贝恩特·海涅与戴维·多尔比近年的语言学研究把这一地区当作班图语扩散的第二个中心的看法相联系的。[9] 他们的论点是：班图语是从它所产生的喀麦隆，或是沿海岸或是沿河流，直接向南传播到现在的下扎伊尔地区的。这种运动是独立于另一场把班图语沿森林北缘传播到内湖地区的运动之外的。近代赤道森林以南所讲的各种班图语，看来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下扎伊尔附近的一个中心传播出来的。从这一中心向外传播的第一阶段看来产生了被B.海涅称之谓西部高原语系各种语言的祖先。今天从安哥拉高原向南直至纳米比亚北部所讲的都属西部高原

4　P.德-马雷（P. de Maret），1975年。

5　J.南昆（J. Nenquin），1959年。但是，最近事态的发展表明，此物究竟是在哪里找到的还大可怀疑。

6　B.海涅（B. Heine），1973年，B.海涅；H.霍夫（H. Hoff）和R.福森（R. Vossen），1977年。

7　J. R.多斯-桑托斯（J. R. dos Santos）和C. M. N.埃弗多萨（C. M. N. Everdosa），1970年。

8　在D. W.菲利普森，1977年（a），第6和10两章中对此论点作了进一步阐述。

9　B.海涅，1973年；B.海涅、H.霍夫和R.福森，1977年。关于其他观点和本章作者更全面的叙述，见L.布吉奥（L. Bouquiaux）（主编），1980年。

语。下一阶段的传播基本上是向东，我们将在下文加以叙述。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一大纲，有必要把这些地区有关该阶段讲班图语的人们的扩散在考古学上的证据加以总结。为方便起见，我们先从下扎伊尔和安哥拉开始，然后向东逐一进行考察。 648

645



插图23.1 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考古文化

6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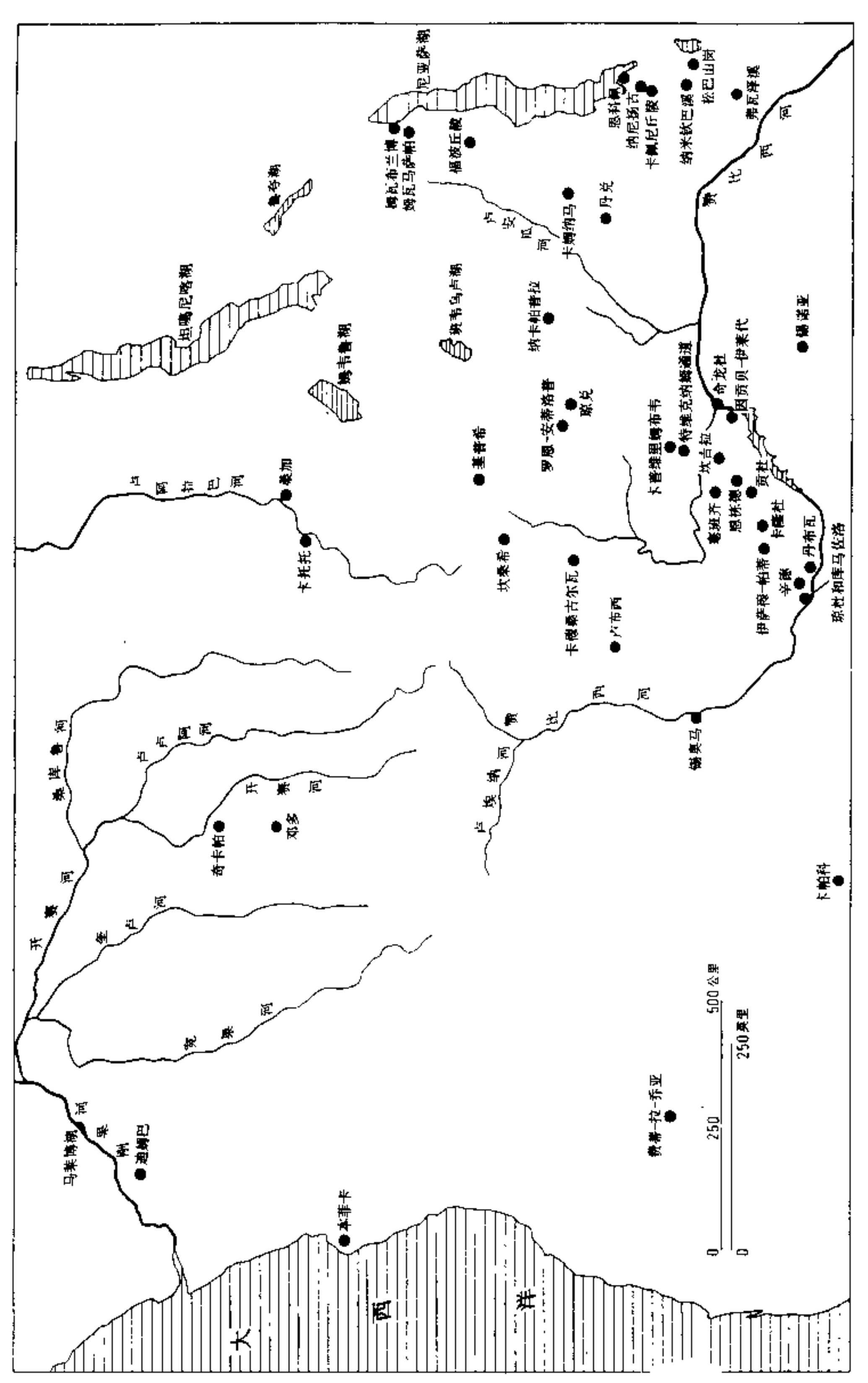


插图23.2 中部非洲的考古遗址

早铁器时代的西支

从编年顺序来看、最早的与之有关的史前工艺是来自下扎伊尔、被传统地称作“利奥波德新石器时代”物品的工艺。这一工艺的特点是带有精致沟纹的有颈的陶器。这使人想起其他地区一些早铁器时代的陶器。在这里没有发现与这种陶器相联系的金属制品，反而存在着大量的磨光石“斧”。皮埃尔·德－马雷近来对与这一工艺有关的几个遗址进行了考察，他用碳－14测出的年代属公元前的4个世纪。⑩与这一工艺相关的物品有从马莱博（斯坦利）湖南岸金沙萨地区以及向西靠近大西洋海岸出土的。其中主要是从下扎伊尔省的洞穴和石窟中发现的，尽管也有少数发现于野外的报道。有意思的是，迄今尚未在安哥拉北部更为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发现其痕迹。这一情况，再加上在这一地区如此狭窄的地段内突然发现磨光石器（这种石器本来在这里应该是罕见的），以及森林以北，在西部非洲和费尔南多波岛，也发现相似的工艺，⑪都导致对“利奥波德新石器时代”物品主要是从北方传入下扎伊尔地区的主张的支持。

在下扎伊尔地区发现的其他物品，虽还不能肯定其确切年代，但可以假设其年代在上面所说的“新石器时代”物品之后，这里发现的品种繁多的陶器，表明与已知的更东边的早铁器时代的陶器极为相像。特别是，这种器皿与内湖地区的乌雷韦陶器，尤其是从姆班扎－恩贡古附近迪姆巴洞穴出土的陶器，其相像的程度似乎胜过了与“利奥波德新石器时代”的陶器。⑫如上所述，再往南从本菲卡出土的陶器也表现出与早铁器时代陶器强烈相似之处。本菲卡陶器的年代为公元2世纪，这也可以作为下扎伊尔出土物看起来讲得通的年代。

我们对安哥拉内地及其邻近的扎伊尔开赛省这些地区早铁器时代的情况甚至了解得更少。靠近开赛省南疆的奇卡帕附近，曾有人声称在卢彭贝谷地采矿时发现了4个近乎完整的陶器，在分类学上它们不会超出内湖地区乌雷韦陶器的范畴。⑬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发现它们的情况的记载残缺不全，在保存这些陶器的地点周围也找不到可以判断其绝对年代的根据。离此不远，向南越过安哥拉边境，在邓多地区发现的两小堆陶器，年代被确定为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最后四分之一的时期内。⑭残片与（假定时间较早的）奇卡帕样品明显不同，但仍表现出某些类似早铁器时代形象的特征，并且为安哥拉北部的近代陶器所继承。从安哥拉南部到纳米比亚北部发现了广泛的较近时期遗址，虽然所知有限。约在公元7世纪或8世纪，在库内内河与昆永高纳河汇合处附近的费蒂－拉－乔亚建立过一个相当规模的铁器时代居民点。但已发表的与此相关的原始工具的情况，还不足以具体到使我们能确定其类别。在纳米比亚最北部，靠近卡普里维地峡西端的卡帕

649

⑩ P.德－马雷，1975年。
⑪ A.马丁·德尔·莫利诺（A. Martin del Molino），1965年。
⑫ G.莫特尔曼斯（G. Mortelmans），1962年。
⑬ J.南昆，1959年。这些物品究竟是否确实是在奇卡帕发现的，还值得怀疑。
⑭ J. D.克拉克（J. D. Clark），1968年，第189－205页。

科，⑮有一个带有炼铁痕迹的遗址。发掘者认为那里出土的陶器与早铁器时代西支的陶器，尤其是与卡普维里姆布韦出土的陶器有联系。关于卡普维里姆布韦陶器我们将在下文加以叙述。在纳米比亚较南的部分还没有关于早铁器时代遗址的报道。但也应该着重指出，对那里的绝大部分地区迄今尚未进行应有的考察研究。

我们关于早铁器时代西支的最详细的考古知识，是来自沙巴的卢阿拉巴河上游的乌彭巴洼地。⑯在这一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铁器时代居民点坐落在卡米兰巴，其年代约为公元6世纪或7世纪。这里的陶器与赞比亚西部出土的同时代的陶器极为相似。约在公元10世纪或稍早一些时候开始广泛使用的一系列墓地，在最近20年间人们曾数度对之进行考察，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基萨尔湖畔的桑加。桑加墓地看来一直使用到17世纪或18世纪。但在这整个过程中与此相关的陶器，按本章作者的看法，是扎根于早铁器时代的传统之中。

死者埋藏时的姿势是伸展的，或略呈弯曲状，并有大量随葬品。最常见的是陶制器皿，其制作大约在公元1300年之前，被称作基萨尔陶器，随后的属卡班比传统。还有大量金属制品，包括诸如锁练、镯子和几股拧在一起的腰带以及项圈等精致的铜制装饰品。具有代表性的铁器则是锄和斧而不是武器，还有一些边缘焊接的钟。各种大小不同的十字形铜锭，常见于卡班比型的墓穴，而在基萨尔型的墓穴中却少见。有证据表明这些铜锭可能用作某种形式的货币。

650

沿卢阿拉巴河上溯约140公里处为卡托托遗址。这里有一处墓地在许多方面都可与乌彭巴洼地的相比。这里的陶器虽然在类别上有所不同，但同样也属于一种早铁器时代的传统，尽管它比基萨尔陶器更接近于乌雷韦陶器和从赞比亚西部出土的陶器。很可能卡托托墓地的年代将被证明比桑加墓地的更早。

651

令人遗憾的是还没有发现使用卢阿拉巴河上游那些墓地的居民们生活的地方。但后来的遗址确实表明了，在基督纪元当今这一千年开始时，这一地区所达到的物质上的富裕情况和技术上的复杂程度。显然，那时的人口密度相对说来是比较高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因素，无疑可归之于南面不远处铜带丰富矿藏的出现。我们将在下文说明，这一矿区在早铁器时代的居民中吸引着大范围的贸易往来，尽管当时开采的规模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小的。这种因果关系特别重要而且有意思。因为正如P.德－马雷所指出的：它发生在这样一个地区，这里的“口头传说把中部草原上许多王国的起源都追溯到卢巴王权”。

铜带考古迄今还局限在赞比亚境内。已找出了许多早铁器时代居民点的遗址，这些遗址都被归入琼兑类，琼兑是以恩多拉南面45公里处一个遗址得名的。⑰琼兑类村落一般都位于河畔或溪旁，其中之一位于卢安夏附近的罗恩－安蒂洛普，和一个史前的铜矿毗邻。在琼兑的一个公元6至8世纪的地层中发现了铜镯；这种镯子常被印在陶器上

⑮ B.桑德洛夫斯基（B. Sandelowsky），1973年。

⑯ J.南昆，1963年，J.希尔诺（J. Hiernaux）、E.德－隆格里（E. de Longrée）和J.德－布伊斯特（J. de Buyst），1971年；J.希尔诺、E.马凯（E. Maquet）和J.德－布伊斯特，1973年；P.德－马雷，1977年。

⑰ E. A. C.米尔斯（E. A. C. Mills）和N. T.菲尔默（N. T. Filmer），1972年；D. W.菲利普森，1972年。



图片23.1　基萨尔时期早期的墓穴（公元8－10世纪），卡米兰巴遗址。特别有意思的是用于仪式的短柄小斧和颈骨边的砧。

6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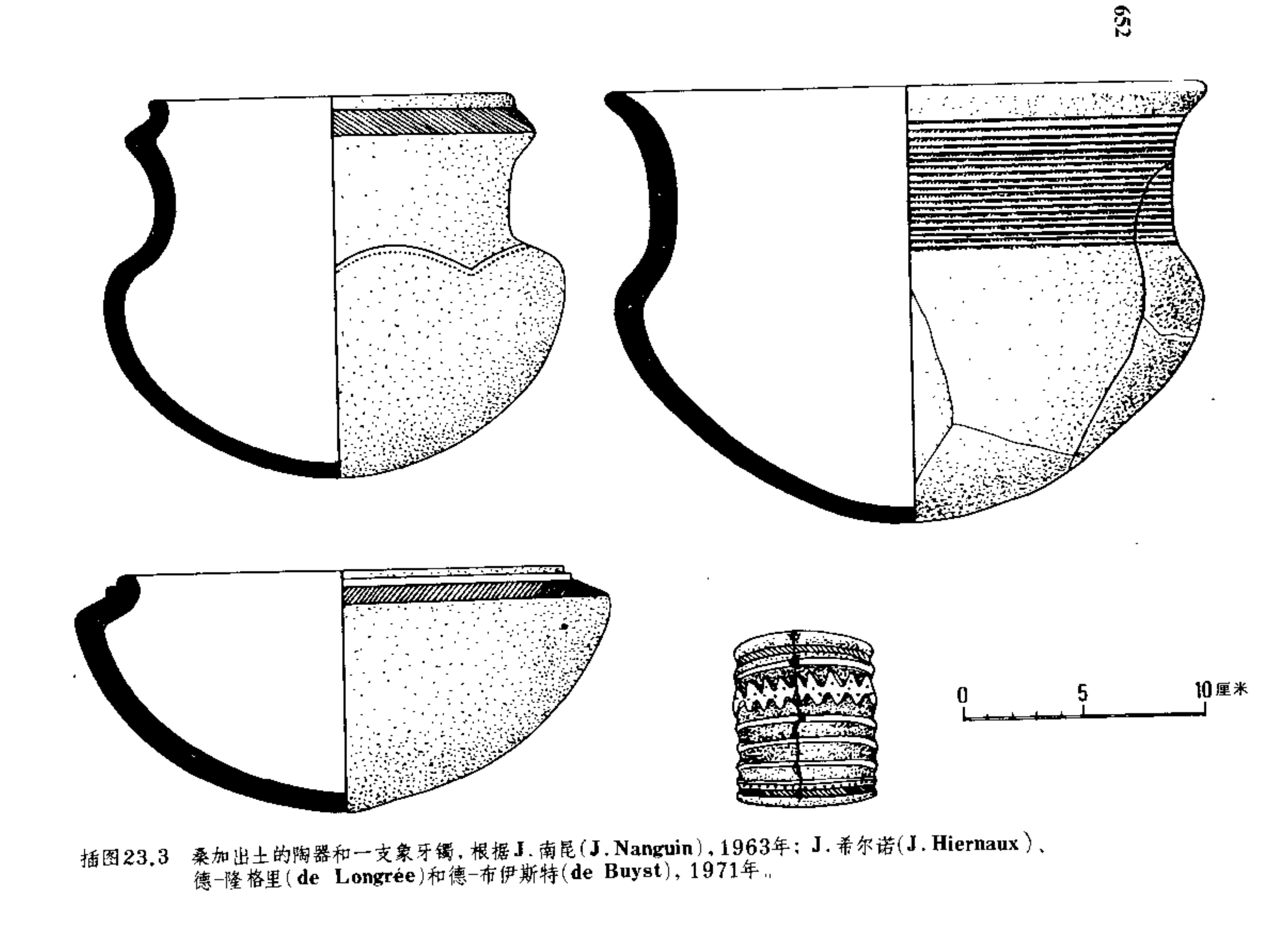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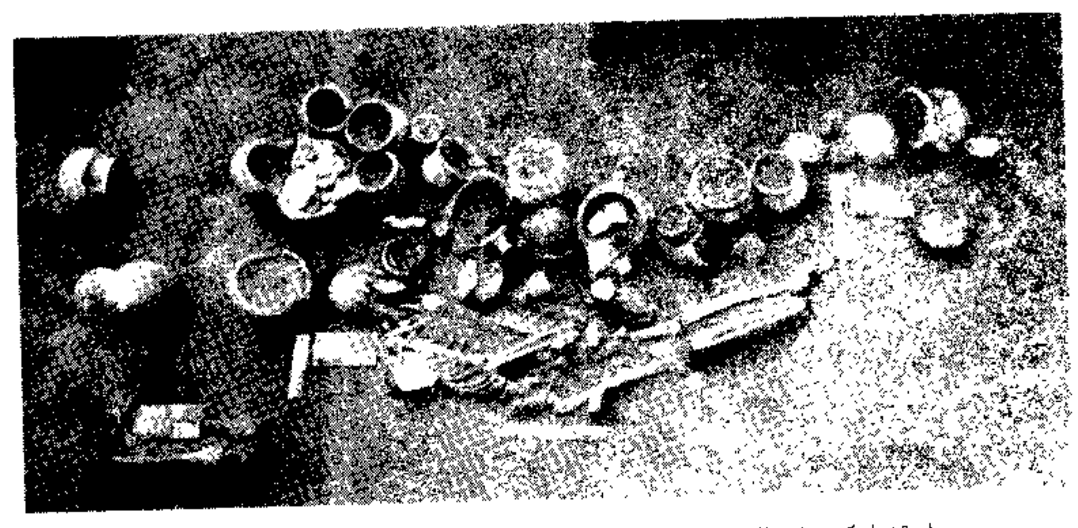


插图23.3 桑加出土的陶器和一支象牙镯，根据J.南昆(J.Nanguin)，1963年；J.希尔诺(J.Hiernaux)、德-隆格里(de Longrée)和德-布伊斯特(de Buyst)，1971年。



651

图片 23.2 典型的基萨尔时期的墓穴（公元 10－14 世纪），桑加遗址

作装饰用。这强烈地表明：铜的使用极有可能追溯到公元 6 世纪初这一地区第一个早铁器时代的居民点。 653

对某些遗址的存在，包括像罗思－安蒂洛普那样的遗址，应给以特别的注意。散布在这些遗址中的早铁器时代的陶器碎片，带有远方地区——诸如赞比西河中游以及马拉维南部——的传统特征，而不是当地琼兑类陶器的传统。这些情况极可能解释为群体间相互接触的证据。这种接触的最可能的方式是：男人们（见下文，英文原书第 656 页）远道旅行来到产铜地区以便得到金属。因为有理由相信，在早铁器时代非洲的这一部分地区，制陶罐是男人们的工作。很可能上文提到的"外来"陶器就是由这些来访者制造的，没有必要进一步设想,究竟是人们携家带眷地旅行到矿山来寻求金属呢，还是像陶罐这样易碎物品是长途贩运来的。

在铜带主要地区西部，迈克尔·比松新近对位于赞比西河与刚果河分水岭处索卢韦齐附近的史前矿区坎桑希进行了调查。㊳ 在这里发现了大约公元 5 世纪时铁器时代最早的居住地以及与炼铜有关的证据。这里的陶器不同于琼兑类（虽然两者都属于早铁器时代的西支），却带有某些在赞比亚西部卡拉哈里沙漠地带出土的器皿所具有的那些特征，而这类遗址在赞比亚西部分布极为广泛。这里资料最丰富的遗址是在赞比西河上游，离巴罗策泛滥平原以南不远处的锡奥马以及在卡奥马地区的卢布西。㊴ 与冶炼铁、铜有关系的早铁器时代居民点（从陶器上的镯子纹来判断），可以认定其年代，如果不能说是公元 5 世纪末的话，至少也应是公元 6 世纪。只有在赞比西河流域一带,其研究工作覆盖率的广泛程度才谈得上对这些遗址的分布情况作出較确切和全面的标定。N. 卡塔尼克韦近期所做的研究表明早铁器时代西支建立的居民点并未深入到远达锡奥马的下游。

赞比亚其他地区，只有卢萨卡和南方省高地有西支的居民点，在那里的早铁器时代

㊳ M. S. 比松（M. S. Bisson），1975 年；以及即将出版的报告。

㊴ J. O. 沃格尔（J. O. Vogel），1973 年（a）；D. W. 菲利普森，1971 年。

遗址，分别属于卡普维里姆布韦类和卡隆杜类。[20] 其中前一类的陶器，像卢萨卡附近一个以人名命名的村落遗址出土的那样，与铜带的琼兑类有许多相像处，该村落住人的时间较短，约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在卡普维里姆布韦，从柱子洞看出业已存在半固定性住房，但还辨认不出每一房舍的布局。从“达加”（*daga*，一种搅和的胶泥）结构上坍塌下来的大量碎块，似乎是炼铁炉的残留物。炼铁活动看来曾广泛地在村内或村外毗邻地区进行过，但还没有铜。卡普维里姆布韦的居民饲养牛，因为在发掘过程中曾发现牛骨。

654

通过卢萨卡郊区特维克纳姆通道的一个遗址，能极好地了解卡普维里姆布韦类后期阶段的情况。公元9世纪到12世纪初之间的某段时间里，这里使用一种精致的经过修饰的陶器，这种陶器显然与卡普维里姆布韦陶器是从同一种传统发展而来的。这里的人们也已知道饲养羊和猎取野兽，与卡普维里姆布韦一样，人们也曾大规模炼铁。但只有在特维克纳姆通道早铁器时代的最后阶段才出现铜。值得注意的是，卢萨卡系列陶器正是在这个时候最接近于琼兑类陶器，这是很有意思的。在卡普维里姆布韦和特维克纳姆通道都发现了带孔的陶制漏勺，它们很可能是用来制盐的。

卡普维里姆布韦类原来的范围不易确定，但西南远到蒙布瓦洞穴以及赞比西河流域的奇龙杜地区都有记载发现过与之有密切联系的陶器。津巴布韦的洛马贡迪和乌伦圭地区发现的早铁器时代“锡诺亚传统”的陶瓷，与来自卡普维里姆布韦和特维克纳姆通道的陶器是如此地相像，因此最好也把它们归入同一类。[21] 这些遗址与津巴布韦其他地方所发现的同一时代的遗址极不相同，它们是早铁器时代西支在赞比西河以南迄今唯一尚能确认的代表。

在南方省或卡富埃以南的巴托卡高地，第一批卡隆杜类居民点可能在公元4世纪末以前就建立起来了。某些遗址被反复利用或长期利用以致积累了厚厚的考古地层。这里的陶器和其他代表物质文明的物品与卡普维里姆布韦类有许多共同点。在卡洛沃附近的卡隆杜土墩，在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牛及绵羊、山羊这类家畜的骨骼不到五分之二，说明狩猎在经济中仍起着重要作用。至此，我们就以卡隆杜类结束对早铁器时代西支在中部非洲表现形式的考察。

铁器时代早期的东支

在马拉维和赞比亚东部，早铁器时代的工艺尽管与上文所述较西地区明显地同属一种工艺体系，但仍明显地存在着不同处。它们属于东支，而且看来有理由相信它们直接来源于内湖地区的乌雷韦类各居民点。

655

对陶器分类的研究，使我们得以识别出马拉维早铁器时代的陶器有两个不同的种类，北方是姆瓦布兰博类，南方是恩科佩类。前者以卢菲利亚河边的一个遗址命名，后

[20] D. W. 菲利普森，1968年，1970年（b）；B. M. 费根（B. M. Fagan），1967年。
[21] P. S. 加莱克（P. S. Garlake），1970年；T. N. 霍夫曼（T. N. Huffman），1971年。

者以曼戈切以北马拉维湖岸上的一个地方命名。㉒尽管在马拉维发现了大量早铁器时代的遗址，但我们仍弄不清楚上述两类遗址的特性及其位置在地理上的分界线。恩科佩类陶器的分布一直向西延伸，越过河流的分水岭直达卢安瓜河以东赞比亚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延伸到莫桑比克的毗邻地区，这一点已为卡尔·维泽 1907 年收集到的物品所证实，这些实物现存于柏林的民族学博物馆㉓。对马拉维早铁器时代诸遗址进行的碳－14 测定表明，早在基督纪元第 4 世纪这些地方就已开始进入全盛时期。而且统计数字表明，姆瓦布兰博类的建立年代，可能略早于它南面的恩科佩类。㉔

迄今人们对已发现的马拉维早铁器时代诸遗址只进行过小规模的试验性发掘，从而提供的资料也相应地显得贫乏。卡祖尼湖附近的福波丘陵保存了一些在木结构上（柱子和胶泥）用泥土修建的真正的房屋的遗迹。从一些遗址中发现了铁的熔渣和制成品，特别是在松巴山岗和恩切乌地区的纳尼扬古。但是另一方面，却没有发现铜。与恩科佩类陶器一起发现的贝珠，则是在奇夸瓦地区弗瓦泽溪的一个公元 5 世纪或 6 世纪的贮物坑中见到的。在马拉维发现的唯一来自沿海地区的可以纳入早铁器时代范围的物品是一个破碎了的玛瑙贝壳。这是从姆方耶的纳米钦巴溪一个晚期恩科佩类遗址中发现的。从这些遗址中发现的骨头，经辨认都是野生动物的遗骨。㉕

在赞比亚东南部的奇帕塔地区，所发现的早铁器时代遗物相对稀少，看来它们在公元 4 世纪初左右业已存在，尽管一种使用石器的土生土长的居民直到基督纪元当今这一千年还在这块地方生存着。这个地区唯一经过考察的早铁器时代村落遗址是奇帕塔以北马拉维边境上的卡姆纳马。这个居民点占地约 5 公顷，但居民居住在这里的时间却明显地短暂，大致是在公元 3 世纪至 5 世纪之间。㉖

赞比西河以南的东支居民点，已超出本章所讨论的地理区域之外。因此，我们可以 656 把注意力转向探讨赞比亚南部维多利亚瀑布地区的早铁器时代情况。这里的陶器被人们称为丹布瓦类，是以利文斯顿郊外的一个遗址取名的。㉗丹布瓦类的分布沿着赞比西河流域从奇龙杜附近上溯几乎远达锡奥马，并向南至少达到今日津巴布韦的万基地区。其北部边界与上文所述其工艺被纳入早铁器时代西支的地区相接壤。毫无疑问，丹布瓦类源自早铁器时代东支居民从津巴布韦高地向西北方向扩张的结果。碳－14 测定表明维多利亚瀑布地区的丹布瓦类直到公元 6 世纪才开始进入其主要兴盛时期，明显地迟于离此不远北面的西支定居点。

丹布瓦类最知名的遗址是公元 5 至 7 世纪期间为人们所居住的库马佐洛以及居住时间稍晚一点的丹布瓦类居民点。以陶器分类为基础可以识别出四个连续的阶段，但都属于同一个被称为雄圭的发展中的陶瓷传统。㉘

㉒ P. A. 科尔－金（P. A. Cole-King），1973 年。
㉓ D. W. 菲利普森，1976 年（a），第 17 页。
㉔ D. W. 菲利普森，1975 年。
㉕ K. R. 鲁滨逊（K. R. Robinson），1970 年、1973 年，1976 年。
㉖ D. W. 菲利普森，1976 年（a），第 38－45 页。
㉗ S. G. H. 丹尼尔斯（S. G. H. Daniels）及 D. W. 菲利普森，1969 年；J. O. 沃格尔，1971 年。
㉘ J. O. 沃格尔，1972 年（a）。

丹布瓦类的遗址中，除野生动物的骨骼外，还出土了家牛及其他小家畜的骨头。人们把库马佐洛遗址里建筑物的遗迹解释为当初是一种非常小的长方形的用柱子和胶泥建的房屋。与东海岸贸易的联系开始于公元7世纪，因为从库马佐洛一座房屋废墟中发现的进口玻璃碎片和附近的琼杜农场遗址中发现的一些玛瑙贝壳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这个地区早铁器时代的遗物中并没有发现玻璃珠。当地生产的铁制工具有锄、斧、刀、枪尖与箭头。还发现了一根铜条和一些铜镯，表明与卡富埃地区的胡克或者津巴布韦的万基地区等产铜地区有着贸易关系。

对琼杜农场的发掘，使我们了解很多当地早铁器时代的葬礼习俗。这也许可与上文描述过的在较晚时期流行于卢阿拉巴河上游的墓地习俗进行比较。将死者紧紧地缩作一团单独埋葬在一个单人的坑状坟墓中，同时在旁边还挖了一些同样的坑放置随葬品。这类东西通常是一对对陶皿作为有盖的容器，以存放铁锄、斧、铁制或铜制的镯子、玛瑙贝或贝珠。有一个容器中还有两颗种子，初步认定一颗是南瓜种、另一颗是豆种。琼杜农场遗址的年代是公元8世纪。㉙

657

从早铁器时代向晚铁器时代的过渡

在非洲许多讲班图语的地方，考古学家对晚铁器时代社会的研究没有像对早铁器时代的研究那样深入。其结果，至少对本章正在讨论的这段时间，即11世纪起始之后，口头传说尚未成为重要史料的这个阶段，我们对中部非洲历史的知识实际上是一片空白。尽管缺乏充足的资料，但早在公元11世纪这里绝大部分地区的当地陶器传统突然中断的现象却已开始呈现出来。㉚ 只有少数地区某种程度上在这一阶段还有连续性的表现，其中之一便是赞比亚的南部，这是一个可以着手以下调查的合适之处。

这里已发现的考古材料是属于卡洛莫工艺的。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卡洛莫陶器传统是由维多利亚瀑布地区丹布瓦类系列的后期阶段发展而成的。㉛ 由此，从事这一工艺的人看来在公元9世纪末开始向北方和西北方推进而抵达巴托卡高地。他们的典型陶器在该高地迅速取代了早铁器时代的卡隆杜类陶器。这种变化最早是在卡洛莫附近的卡隆杜遗址发现的，不过由于地层被打乱而使情况模糊不清。在更北的乔马地区的贡杜和恩东迪也显示出同样情况。㉜ 但是，卡洛莫工艺作为一个整体，在卡洛莫以西的伊萨穆－帕蒂显示出它最清晰的图像。这一遗址以前没有作过早铁器时代的居住地。㉝

某些属卡洛莫工艺的村落看来是由一块空地周围盖起一圈圈不结实的圆形房屋所组成，这可能是作畜栏用的。这样的村落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连续或反复地使用着。

这种卡洛莫工艺遗址的居民似乎已能冶炼铁矿，其规模则比他们早铁器时代的前辈

㉙ J. O. 沃格尔，1972年（b），1973年（b）。
㉚ J. E. G. 萨顿（J. E. G. Sutton），1972年；D. W. 菲利普森，1975年。
㉛ J. O. 沃格尔，1975年。
㉜ B. M. 费根未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D. W. 菲利普森，1970年（a）。
㉝ B. M. 费根，1967年。

要小。虽然也发现了斧和锄，但数量极少。经常遇到的工具是刀、剃刀以及矛和箭的头。铜主要是用来做镯子。狩猎的重要性稳步下降，明显的表现是所发现的家畜骨头数量业已超过了野生动物的骨头。已经发现种植高粱的证据，但是人们得出的印象，与非洲东部和南部其他地区一样，这里在晚铁器时代开始的时候，其经济严重依赖于饲养家 658 畜，主要是养牛。至于玻璃珠、玛瑙贝和螺旋贝的出现，则表明与东海岸的贸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

大约在公元 11 世纪后半叶，巴托卡高地上的卡洛莫工艺，突然被一种向南扩散的、人们称作坎吉拉工艺的更为独特的工艺所取代。坎吉拉工艺看来是发源于卡富埃河下游或其邻近地区，并传播到维多利亚瀑布地区。它在这一地区的辛德与卡洛莫工艺接触的年代大约比它在高地上的相应事件要晚 100 年。这种时间上的延迟可以解释为坎吉拉工艺向南扩散的速度相当迟缓。[34]

我们对坎吉拉工艺早期发展的考古证据还难以作出解释。因为这种证据仅仅是基于对两个遗址的发掘：即蒙泽附近的塞班齐遗址和离赞比西河与卡富埃河汇合处不远的因贡贝-伊莱代遗址。后者有人居住的年代可能始于公元 7 世纪或 8 世纪，塞班齐遗址发生相应事件可能更晚。这两个遗址的地层情况和编年顺序都还没有弄清楚，但其陶器则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是马扎布卡附近高地上在坎吉拉所发现的陶器的祖先。坎吉拉村本身有人短暂居住过的时间大约是公元 15 世纪，因此它代表的是以坎吉拉命名的工艺的晚期阶段。除陶器外，当地居民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情况看来和卡洛莫工艺非常相像。[35]

南方省之外，在赞比亚传播得最广、为人们所确认的晚铁器时代陶器属于卢安瓜传统。其分布范围遍及从卡富埃河下游到卢本巴希一线从北到东的整个赞比亚地区，并延伸到与之毗邻的扎伊尔、马拉维、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卢安瓜传统就这样出现在早铁器时代原属于卡兰博类、恩科佩类、琼兑类和卡普维里姆布韦类的地区，既代表着东支，也代表着西支。它在考古资料中第一次出现是公元 11 世纪，突然地、全面地与早铁器时代以前的各个传统决裂。关于这种交接的性质和时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特维克纳姆通道遗址和琼兑遗址的发现。与此同时，在北方和东方的石窟遗址——诸如纳卡帕普拉遗址和丹兑遗址——也提供了可供印证的证据。在其所分布的整个地区里，卢安瓜陶器传统直到近代仍在诸如本巴人、切瓦人、恩森加人和北方隆达人中继续保存。[36]

卢安瓜传统的陶器与在它之前的早铁器时代陶器之间差异十分明显，却没有从其中 659 一种发展到另一种的逐渐演变迹象。然而，早铁器时代的陶器，按类别区分与卢安瓜传统最接近的是琼兑类陶器。曾有人认为：人们很可能有一天会证明，与目前已知的任何其他早铁器时代类别的陶器相比，卢安瓜传统的祖先更接近于琼兑类。[37] 对于这些考古学

---

[34] J. O. 沃格尔，1973 年 (c)。他把坎吉拉传统归作“早期通加人”，但本章作者宁愿避免对史前物质采用部族名称。

[35] B. M. 费根和 D. W. 菲利普森，1965 年；B. M. 费根，1969 年 (b)；D. W. 菲利普森和 B. M. 费根，1969 年。

[36] D. W. 菲利普森，1974 年。

[37] D. W. 菲利普森，1972 年。

现象最适当的解释可能是：卢安瓜传统的开端，是由人们拖儿带女全家从赞比亚/沙巴铜带北方或西北大规模迁移触发的。如果说卢安瓜传统的陶器当时（如同今天一样）是由妇女制做的，那么它的突然出现可以假定为：早铁器时代的陶瓷是由男人制做的。[38]

马拉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大约在公元11世纪开始前后，恩科佩陶器被恩切乌地区一种以卡佩尼丘陵命名的陶器所取代。大约与此同时，姆瓦马萨帕陶器（它是以卡龙加附近的一个遗址命名的）继承了姆瓦布兰博陶器而成为马拉维北部地区的陶器典型。马拉维这两种晚铁器时代的陶器似乎都在某些方面与卢安瓜传统有联系。正如和赞比亚一样，我们对这些最早的晚铁器时代居民群体从考古角度实在知之甚少。某些遗址表明房屋是用柱子及“达加”（*daga*，一种搅和的胶泥）建造的，也有一些定居色彩更差的蜂窝状建筑。遗址自始至终都使用铁制品，偶尔也使用铜制品，原来较少见的进口玻璃珠也变得更加常见了。与姆瓦马萨帕陶器同时发现的有高粱种子。在几个晚铁器时代遗址中还发现了牛骨，这类遗址遍及整个马拉维地区。[39] 我们将留待本章后面部分考察马拉维和东半部赞比亚晚铁器时代各居民群体的情况，目前我们先简要叙述同一时期在更往西的地区所存在的截然不同的情况。

比卢安瓜传统工艺更往西的地区，从早铁器时代一直到基督纪元且前这一千年，陶瓷工艺呈现出更大程度的连续性。举例而言，在赞比亚西部的芒古、卡邦波、赞比西、姆维尼伦加和卡奥马地区，被命名为伦圭本古传统的现代陶器传统，显示出许多与当地早铁器时代陶器（以上文所述的卢布西遗址为典型例子）相同的特征。[40]近期研究表明，

661 这种连续性可能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直接。[41] 不过，基督纪元且前这一千年初期的考古资料中，确实没有发现东部地区晚铁器时代到来前出现的那种明显中断的现象，在伦圭本古陶器传统地区和卢安瓜陶器传统地区之间，在现在卡翁德人居住的地方，在诸如卡穆桑古尔瓦和坎桑希这类遗址中，还确认出另一种陶器类型，其年代在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42]

公元11世纪时中部非洲的整个格局呈现出一种明显地东、西各为一方的情景。在东部，早铁器时代的工艺突然终止并被取代；在西部，这种工艺得到延续只是略作修改。前文叙述过的上卢阿拉巴的桑加墓地和卡托托墓地为这个地区西部这种延续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从分类角度说，它们属于早铁器时代的工艺体系，但它们在年代顺序上填补了空白，进入了在别处已是晚铁器时代工艺的时期——实际上这些墓地的主要使用时期就属于这一时期。下面，我们有必要离开纯属考古学上的论证，而对上述现象用历史的术语来考虑其意义和重要性。

第一点要强调的是，在中部非洲的西半部，从早铁器时代发展到晚铁器时代，延续性的程度非常之大，这一点与东半部的情况是颇不相同的。有趣的是，这种东、西间的划分，与口头传说中反映出来的这一地区的“部落”划分并不一致。例如，我们发现在

---

[38] D. W. 菲利普森，1974年。

[39] P. A 科尔－金，1973年；K. R 鲁滨逊，1966年（c），1970年。

[40] D W. 菲利普森，1974年。

[41] R M. 德里考特（R. M. Derricourt）和R. J. 帕普斯坦（R. J. Papstein），1976年。

[42] M. S. 比松，19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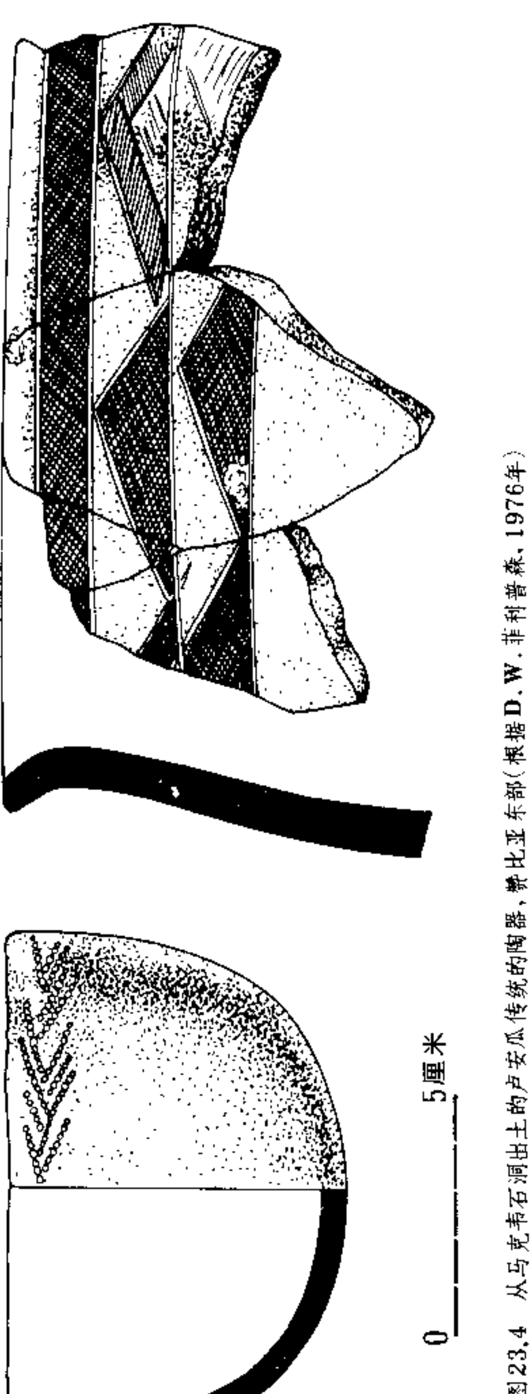


插图23.4 从马克韦石洞出土的卢安瓜传统的陶器，赞比亚东部（根据D.W.菲利普森，1976年）

6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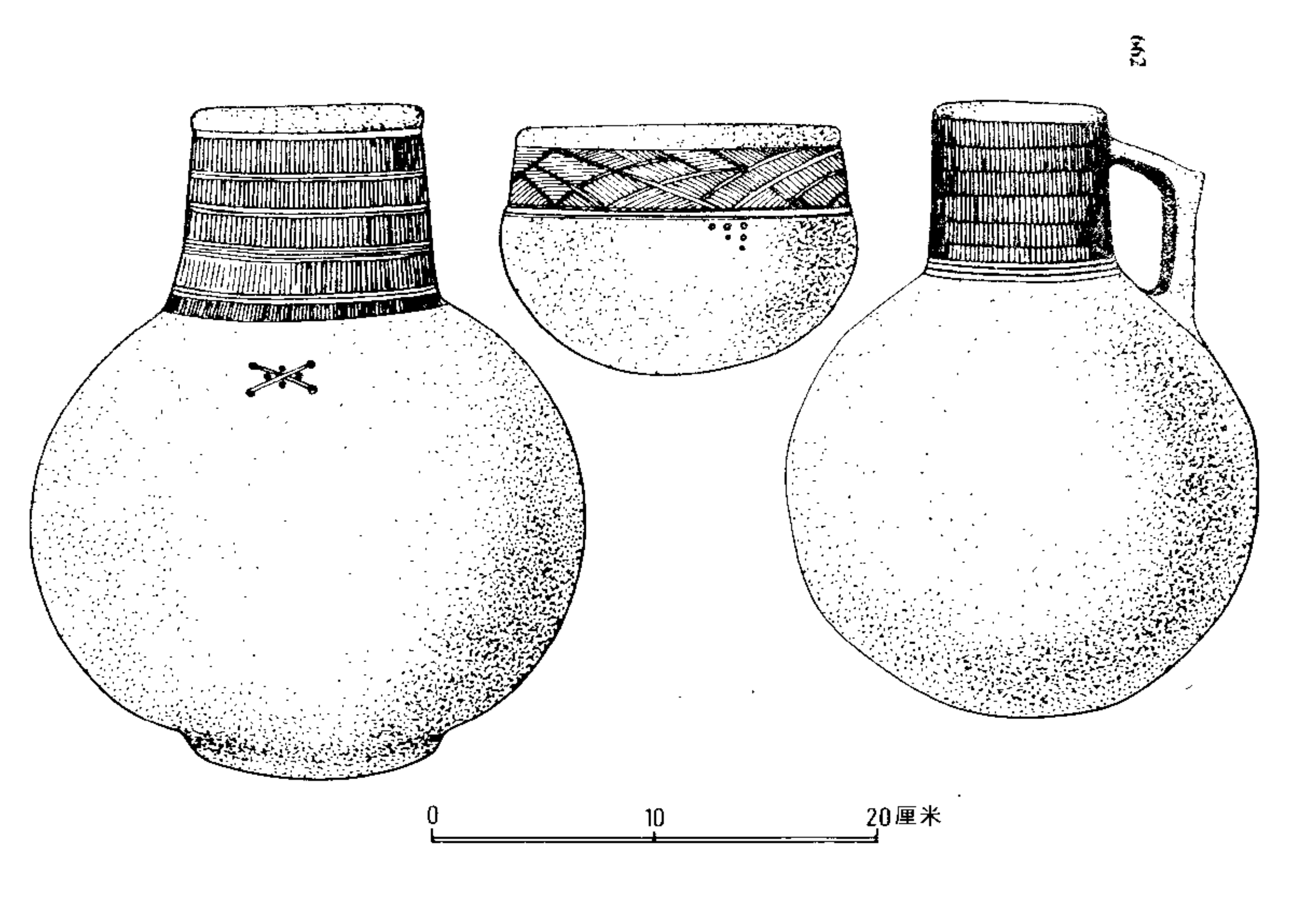


插图23.5 现代伦圭本古传统陶器（根据D.W.菲利普森，1974年）

东、西两个区域内，都有按照传统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隆达帝国和卢巴帝国的人们。更有甚者，今天冠有隆达名称的各“部落”，其中之一制作的是卢安瓜陶器（这指的是卢阿普拉河流域卡曾贝地方的隆达人），而另一个的陶器却来源于早铁器时代的伦圭本古传统（这指的是赞比亚西北部隆达人的西支）。[43]这样就清楚了，晚铁器时代的开端与组成晚铁器时代各社会在传说中的涌现，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进程。这已为对口头传说的最新解释所提供的年代顺序的推论所证实。这些推论把促成卢巴帝国兴起的政治发展定在公元14世纪（或者是公元13世纪），这个年代明显晚于考古学所确认的晚铁器时代开始的年代。[44]

把考古学的资料与语言学方面的情况相比较，我们就有可能得出一种意味深长而又互为补充的假设。我们的注意力被引向班图语的西部高原语系。贝恩特·海涅和戴维·多尔比都认为这一语系是从下刚果附近的一个中心传播出来的，随着各种西部高原语的确立，它们又在沙巴地区自行形成第三代传播中心。多数语言学家把这个中心作 **663** 为最后一个班图语向外传播的主要中心，从这个中心它发展到班图非洲的整个东半部，成为一种相互联系极为紧密的被贝恩特·海涅称作东部高原语系的语言。[45]本章作者在其他著作中曾说过：有充分理由把东部地区晚铁器时代工艺的发端与讲东部高原语人们的扩散联系起来。[46]西部更为古老和多种多样的语言，其延续性可以与西部地区从早铁器时代到晚铁器时代更大程度的延续性相比。各种东部高原语在地理上的分布正好与晚铁器时代开始时考古学上的系列突然中断的地区相吻合。同样地，各东部高原语起源于西方的论点与一些晚铁器时代的工艺，特别是卢安瓜传统的起源相一致。

这就是考古学与语言学相结合所能提供的公元7世纪至11世纪的中部非洲的情景。在这一阶段开始时，整个中部非洲地区已为早铁器时代居民——可能是讲班图语各族——所占领，尽管那里仍在使用石器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们在许多地区继续生存了下来，但这些人与从事农业的邻居的关系往往是一种依附的关系。这些早铁器时代居民群体的情况几乎只能通过考古研究来了解。他们可能是分为两支——东支与西支。两支明显不同，但其起源又相互关联。他们显然是属于从事耕作的农业社会，可能没有任何大规模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体系。在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的末期，我们已能在卢阿拉巴河上游地区，看到财富、贸易活动和人口密度的显著增长。[47]大致在公元11世纪，也正是大体上从这一地区开始了人口的扩张过程，其结果是把晚铁器时代的文化传播到中部非洲东半部的大部分地区。从这样定居下来的人口中后来又涌现出更为发达的晚铁器时代的社会。

---

[43] D. W.菲利普森，1974年，1977年（b）。

[44] J. C.米勒（J. C. Miller），1976年；D.伯明翰（D. Birmingham），1977年。

[45] B.海涅、H.霍夫及R.福森，1977年；D.多尔比（D. Dalby），1975年，1976年。

[46] D. W.菲利普森，1976年（c）；1977年（a），第8章。

[47] 参阅M. S.比松，1975。

24 南部非洲——赞比西河以南

T.N. 赫夫曼

664 南部非洲铁器时代史前史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发生在1000年以前的沙希-林波波河流域，就在这个地方讲班图语各族孕育并形成了津巴布韦文化。为了阐明这段历史和这个事态发展的重大意义，我将首先论述如何通过陶器风格识别部族的分布与迁移以及如何从人类居住布局辨认文化体系。然后，再讨论对外贸易对本地政局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与晚古布韦的津巴布韦文化随之发生的演变。

部族迁移和文化体系：公元700－1000年

南部非洲的考古学家利用陶器的风格类型来探索铁器时代部族的分布与迁移。因为通过陶器的风格类别可以判断各个部族实体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分布情况。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1) 作为人类行为模式一部分的陶器风格类别是通过各个群体创造和传播的；(2) 风格的传播必然要通过人们口头交流才能做到；(3) 只要这种风格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身份相同，这种风格陶器的分布情况也必定代表着讲同一种语言的群体的分布情况。当然，这一前提决不意味着使用另一种风格陶器的群体就不能讲与之相同的语言。

以此前提为依据，根据陶器风格的证据可以很有把握地肯定铁器时代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人们使用的语言是属于班图语系的。因为这个地区铁器时代初期的陶器属于一种单一风格的复合物；[1] 还因为这些风格之一可以直接追溯到当代讲绍纳语各族人们的陶制品，[2] 班图语肯定一直是早铁器时代所有族群的主要用语。鉴于上述理由，这一种陶器的连续性足以肯定铁器时代部族实体与班图语言之间的联系。

665 早在基督纪元8世纪初，讲班图语的几支族群就已经居住在南部非洲（见插图24.1），其中一支以如今的锡诺亚成为名者直到近期才迁移越过赞比西河，[3] 可是其余

1　T. N. 赫夫曼（T. N. Huffman），1982年；T. M. 马格思（T. M. Maggs），1980年（a）、1980年（b）；D. W. 非利普森（D. W. Phillipson），1977年（a）。

2　T. N. 赫夫曼，1978年。

3　P. S. 加莱克（P. S. Garlake），1970年；T. N. 赫夫曼，1979年；D. W. 非利普森，1977年（a）；K. R. 鲁宾逊（K. P. Robinson），1966年（b）。

6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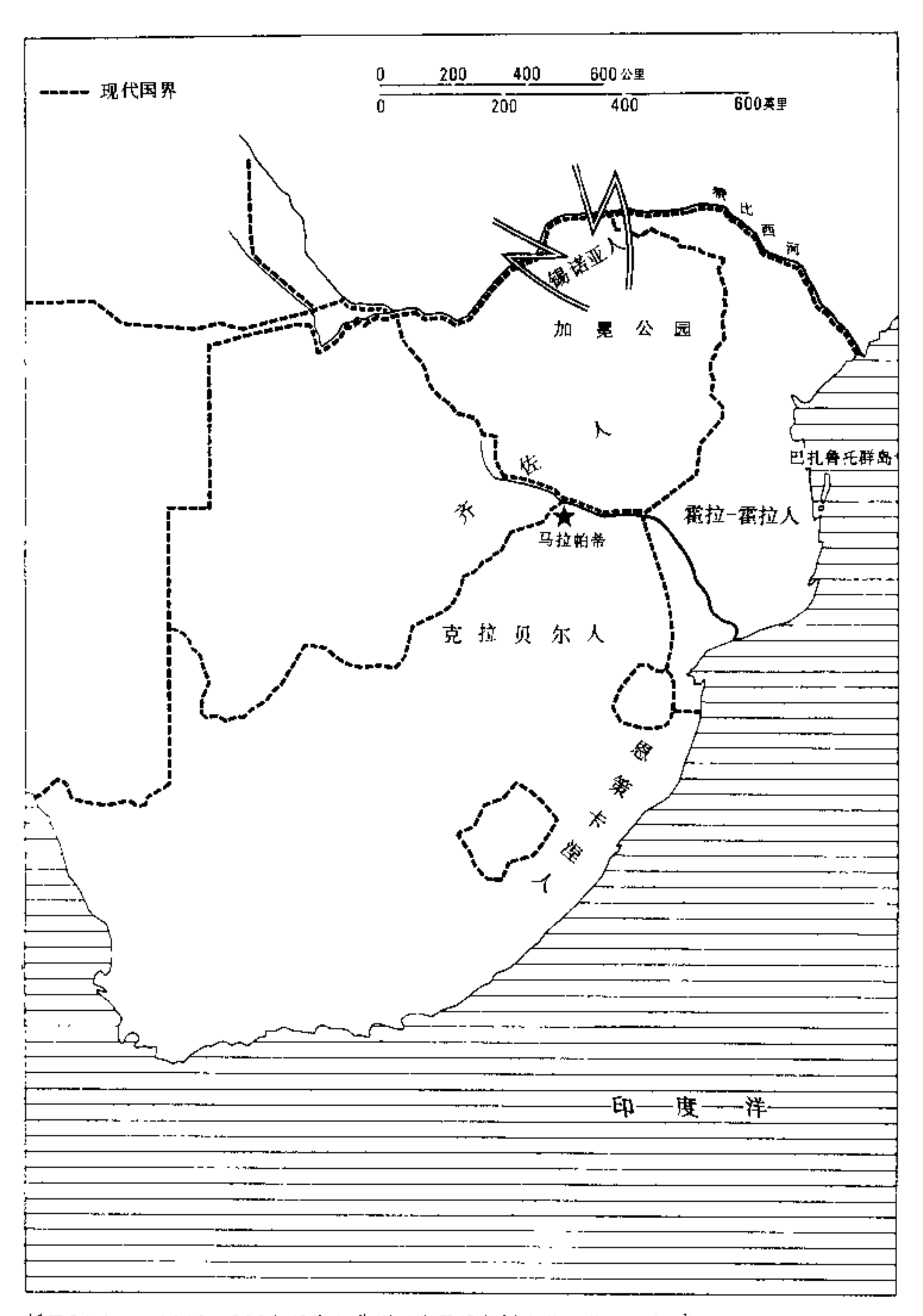


插图24.1　公元700—900年间南部非洲以陶器风格划分的一些族群(图中标名者为本章提及的族群,★处表示施罗达的齐佐人遗址)

儿支的祖先自铁器时代开始以来就遍布各地。[4] 本章最关注的地区——如今的马塔贝莱兰的西南部、博茨瓦纳的东中部以及德兰士瓦的最北部——主要由齐佐人聚居。对陶器年代顺序的研究表明：齐佐人在这个地区居住了250年后，一种叫豹地人的新来者才进入津巴布韦西南部。这后一次部族迁移可从齐佐陶器与10世纪豹地陶器之间风格的重大突变中观察出来。[5] 齐佐陶器包括陶罐，罐的边口中有突出来的印记，下部的底边有刻纹，罐肩有一条纹理，而豹地陶罐在颈上饰有三角形刻纹以及环形和波形花纹。这次陶器风格的突变与博茨瓦纳被称作图兹维的晚期齐佐人定居点人口猛增三倍发生在同一时期。[6] 很明显，许多齐佐人宁愿离开那个地区也不愿被新来的豹地族群所吞并。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公元11世纪初豹地人的扩展是讲班图语各族从中部非洲横跨次大陆进行单独扩张的一个部分。[7] 但是，豹地陶器与同时代的赞比亚或马拉维陶器风格上没有紧密关系，与10世纪在纳塔尔沿海布莱克伯恩遗址出土的新风格也没有紧密关系。[8] 实际上，豹地陶器构成了包括公元8、9世纪克林贝尔陶器[9] 以及公元5至7世纪德兰士瓦中部陶器在内的风格连续体的第三个阶段。[10] 另外，公元10世纪时豹地人在津巴布韦西南部取代齐佐人，以后公元11世纪与豹地人有血缘关系的名叫古曼耶的族群（前称津巴布韦第二时期和下津巴布韦）在津巴布韦北部取代马克斯通人，由此可以看出，这些豹地人是跨过林波波河向北迁移，而不是跨过赞比西河向南迁移。[11] 此667 外，与豹地人有血缘关系而没有向北迁移的一些部族诸如埃兰人继续居住在那块地方的某些地区直到14世纪。[12] 总之，南部非洲人口的替代发生在好几个不同的时期，而且它渊源于中部非洲以外的其他地方（见插图24.2）。

豹地人和古曼耶人是上述联接班图语言与铁器时代各部族的陶器风格连续体的一部分，所以豹地人和古曼耶人是如今许多讲绍纳语人们的祖先。

无论如何，像豹地陶器那样的陶器类别只能识别族群。要了解这些人如何生活，我们必须借助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资料。铁器时代遗址的位置和类型以及相关的原始工具可以说明这些人是从事各种劳动的农民。例如，铁器时代最早的定居点都位于起伏不平的地带，那里从事各种劳动的农民所需要的资源——水、树木、可耕地和牧场——都相距很近。比较起来，牧民们宁愿选择像卡拉哈里那样的开阔草原，而狩猎者－采集者一度占据了几乎所有各式各样地形的地带。此外，铁器时代的定居点比起放牧者和狩猎－采集者的临时营地要相对固定。用柱子和“达加”（泥土和畜粪的搅合物）建造的

---

[4] T. M. 埃弗斯（T. M. Evers），1980年，E. O. M. 哈尼施（E. O. M. Hanisch），1980年，1981年；T. N. 赫夫曼，1974年（b）；T. M. 马格思和M. A. 迈克尔（M. A. Michael），1976年；D. W. 菲利普森，1977年（a）；K. R. 鲁滨逊，1966年（a）。

[5] T. N. 赫夫曼，1974年（b）。

[6] J. R. 丹鲍（J. R. Denbow），1982年，1983年。

[7] D. W. 菲利普森，1977年（a）。

[8] O. 戴维斯（O. Davies），1971年；T. M. 马格思，1980年（a）；T. 罗比（T. Robey），1980年。

[9] T. M. 埃弗斯，1980年。

[10] T. M. 埃弗斯，1982年；R. R. 英斯基普（R. R. Inskeep）和T. M. 马格思，1975年。

[11] T. N. 赫夫曼，1978年。

[12] J. R. 丹鲍，1981年。

6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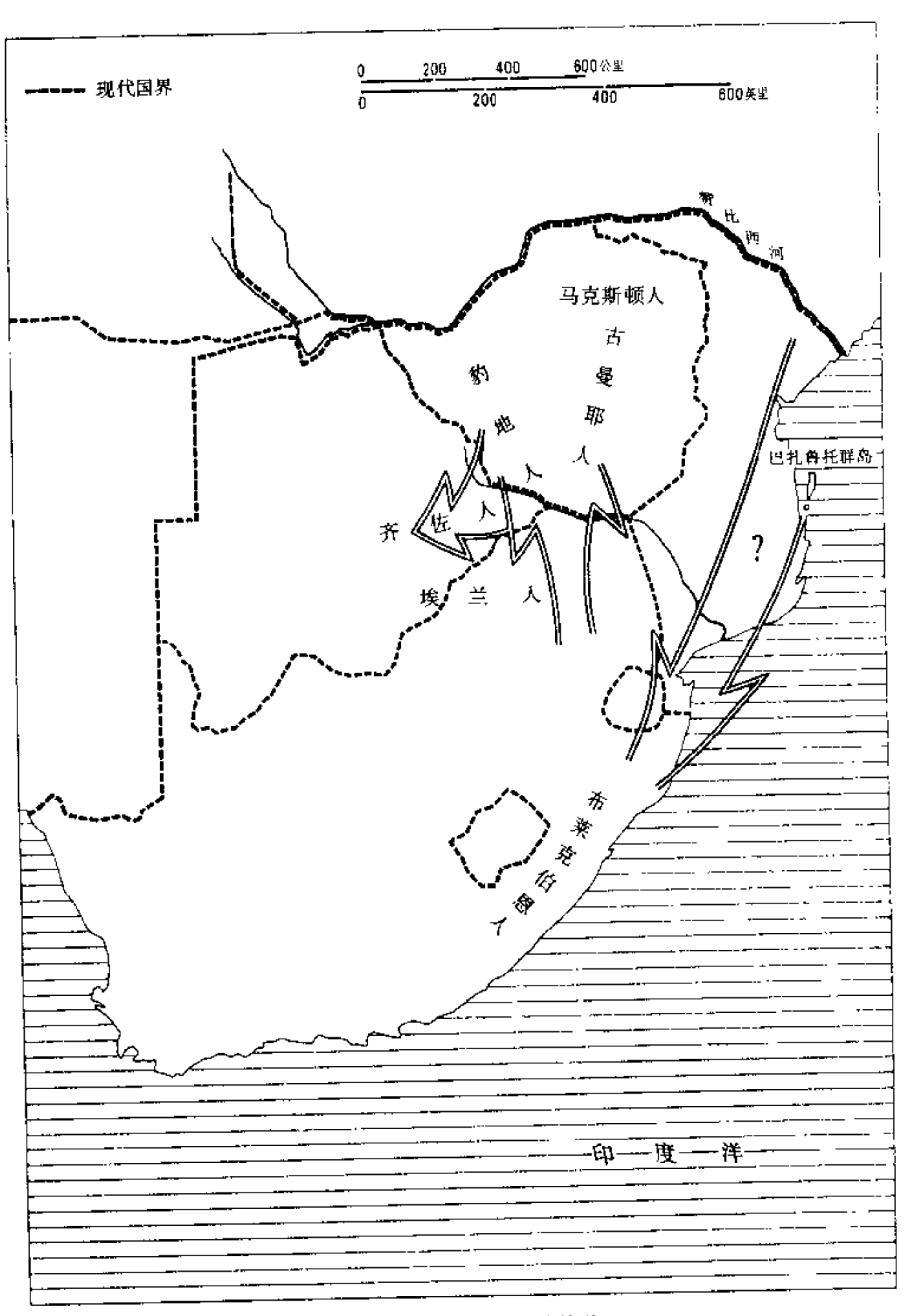


插图24.2 公元950—1000年间南部非洲的族群及其迁移情况

房屋残址比比皆是，所积累的垃圾数量表明，甚至最小的住所通常也使用过好多年。这些半固定性定居点的残存结构和其中发现的原始工具包括地下储粮仓、高出地面的储粮库、石磨和铁锄，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时已经有了适应于种植谷物的技术。在这些居民点中发现的陶器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和大小，这样的多样化也证明它们是为耕种使用的。因为大多数狩猎－采集者根本不使用陶器，而牧民们用的陶器一般只限于少数小型可搬动者。另一方面，务农者却需要各式各样形状和大小的陶器，用来烧煮和装用谷物做成的食品，如麦粥、啤酒。在这个地区的铁器时代遗址里也发现了一些保存至今的农作物，如在齐佐人[13]、图兹维人[14] 和豹地人[15]的遗址中找到碳化的高粱；同时，在豹地人[16] 的遗址中发现 稷子和御谷；在锡诺亚人 [17] 和豹地人[18] 的遗址中还发现多种豆类这些种子补充了其他资料的不足，合起来证实铁器时代经济中确实存在种植业的成分。

669 有关公元 7 至 11 世纪的考古资料也有力地证明当时经济中存在畜牧业的成分。家养牲畜（绵羊和山羊）和牛的骨骼实际上在这个时期每一个我们知道的铁器时代族群中都有发现。[19] 直到最近人们还普遍认为：豹地人是南部非洲第一个从事大规模饲养牲畜的族群，由此人们又相信，铁器时代存在两种不同经济成分：一种是以耕种为中心的早铁器时代经济、另一种是以畜牧为基础的晚铁器时代经济。[20] 可是，最新的研究否定了这种经济区分。

沿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东部边缘广泛勘察发现：[21] 8－9 世纪的齐佐人遗址和 10－11 世纪的图兹维人遗址都有厚厚的家畜粪堆积，堆积层如此之厚以致有时由于内部燃烧而转化成一种玻璃状的物质。[22] 由此可以判断，这些齐佐人的畜群规模与后来豹地人的畜群一般大。尽管津巴布韦找不到可以与之对比的资料，但是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的齐佐人所饲养的畜群肯定超过住在卡拉哈里东部的齐佐人。不论是那种情况，这一研究结果都说明：铁器时代社会群体之间经济状况的不同，可能更多地起因于是否善于开发和利用环境以及能否抓住政治良机，要勇于作出决策，而不是一味墨守历史和文化的传统。

其他最新的研究着重表明，南部非洲铁器时代最早和早晚时期的各个人类社会有共同的文明，同时说明几乎整个铁器时代的人对饲养牲畜抱有同样的态度，不论他们本身是否饲养大群牲口。下面我们通过分析居民点的结构来评价牛对于铁器时代社会的重要

---

[13] E. O. M. 哈尼施，1980 年、1981 年。

[14] J. R. 丹鲍，1983 年。

[15] T. N. 赫夫曼，1974 年 (b)；A. 迈耶 (A. Meyer)，1980 年。

[16] E. O. M. 哈尼施，1980 年；T. N. 赫夫曼，1974 年 (b)。

[17] T. N. 赫夫曼，1979 年。

[18] T. N. 赫夫曼，1974 年 (b)。

[19] 参阅 J. R. 丹鲍、T. M. 埃弗斯、E. O. M. 哈尼施、T. N. 赫夫曼、J. H. N. 卢布瑟 (J. H. N. Loubser)、T. M. 马格思、M. P. J. 穆尔 (M. P. J. Moore)、T. 罗比、K. R. 鲁滨逊、E. A. 沃伊特 (E. A. Voigt) 和 R. 韦尔伯恩 (R. Welbourne) 列在参考书目中的著作。

[20] R. 奥利弗 (R. Oliver)，1982 年；R. 奥利弗和 B. M. 费根 (B. M. Fagan)（合编），1975 年；D. W. 菲利普森，1977 年 (a)。

[21] J. R. 丹鲍，1982 年、1983 年。

[22] J. S. 巴特沃思 (J. S. Butterworth)，1979 年；J. R. 丹鲍，1979 年。

意义。

运用居民点的空间结构来确定铁器时代部族群体的文化体系是有可能的，因为空间的使用情况是文化的变数：每个社会把它的空间环境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进行特定范围内的与文化有关的活动。很幸运，考古学家对铁器时代的研究最近已经解开了空间密码，并已确定南部班图人的基本文化体系。[23]

这种班图牧牛文化的特点是：男人担负政治任务、重视祖先神灵的保佑以及牛的媒介作用这一串相互关连的价值观。在这个文化体系中人们所饲养的牲畜是属于男人的产业，它们是财产的主要形式，是得到妻子和儿女的主要手段，也是成功、地位和权力的 **670** 基础。由这些观念产生一种特定的空间安排格局，在这种格局中，男人活动的庭院位于居民点的中央，与头人的畜栏在一起或在附近。头人和其他主要成员死后就埋葬在这个畜栏之中，在这里还挖有公共地下储粮仓（或建有特制的储粮库）以防饥荒。妻子们所住的草屋建在这个中央地区的周围，其位置根据丈夫的身份按制度轮流在左边、右边安排。自成一体的家庭也根据这种身份制度确定房舍在头人周围的位置，单人居住的房舍根据同样的原则一边住男人、一边住女人。但是，举行世俗活动和祭神活动则按前方、后方区分。房舍和居民点的前方是用作公共和世俗活动的场所，而背后则用于私人活动和祭神活动。例如，祖先的遗物放置在房屋的后边，私人所有（与公有相对）的储粮库设在物主茅屋的背后，而求神降雨的地方设在居民点后面头人庭院的背后。因为这种祭神和世俗活动所需面积的大小或多或少是按照人们身份确定的，所以最主要的人物住在居民点的后边处于最安全的位置。如果居民点前方面临下坡，那么身份和仪式的重要性 **671** 以高度来表示。（见插图 24.3）

尽管相互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南部非洲的许多族群一般都采用这种格局，但是这种格局在中部非洲母系班图人中却见不到，中部非洲的班图人不饲养牲畜，有牲畜的为数极少；东部非洲不讲班图语的族群固然饲养牲畜，但也不采用这种格局。这种格局的使用似乎只限于以牲口交换妻子的父系班图人社会。[24] 假如两者的这种相互关系是正确的话，考古资料中这种格局的存在是班图人关于政治和牲畜的与众不同的价值体系的确切凭据。

虽然在史前史的范围内不可能完全恰如其分地揭开这种空间安排格局的全貌，但是要找出班图牧牛文化独有的特征还是办得到的。畜栏位于中央、附有地下储粮仓和人的坟地，仅仅这一特征就够典型的了。用这类证据，可以把南部非洲班图牧牛文化的历史直接追溯到公元 7 世纪。以此类推，空间安排格局中可供作出判断的特征还有：公元 18 世纪德兰士瓦北部恩德贝勒人的带有石头围墙的居民点；[25] 公元 14－16 世纪与讲索托－茨瓦纳语各族相联系的带有石头围墙的居民点；[26] 公元 14－16 世纪莫洛科人(索托－

---

[23] A. 库珀（A. Kuper），1982 年（a）。

[24] 同上

[25] J. H. N. 卢布瑟，1981 年。

[26] D. P. 科利特（D. P. Collett），1979 年、1982 年；T. M. 埃弗斯，1981 年、1984 年；S. L. 霍尔（S. L. Hall），1981 年；T. M. 马格思，1976 年；R. J. 梅森（R. J. Mason），1968 年、1969 年、197. 年；M. O. V. 泰勒（M. O. V. Taylor），1979 年、1984 年。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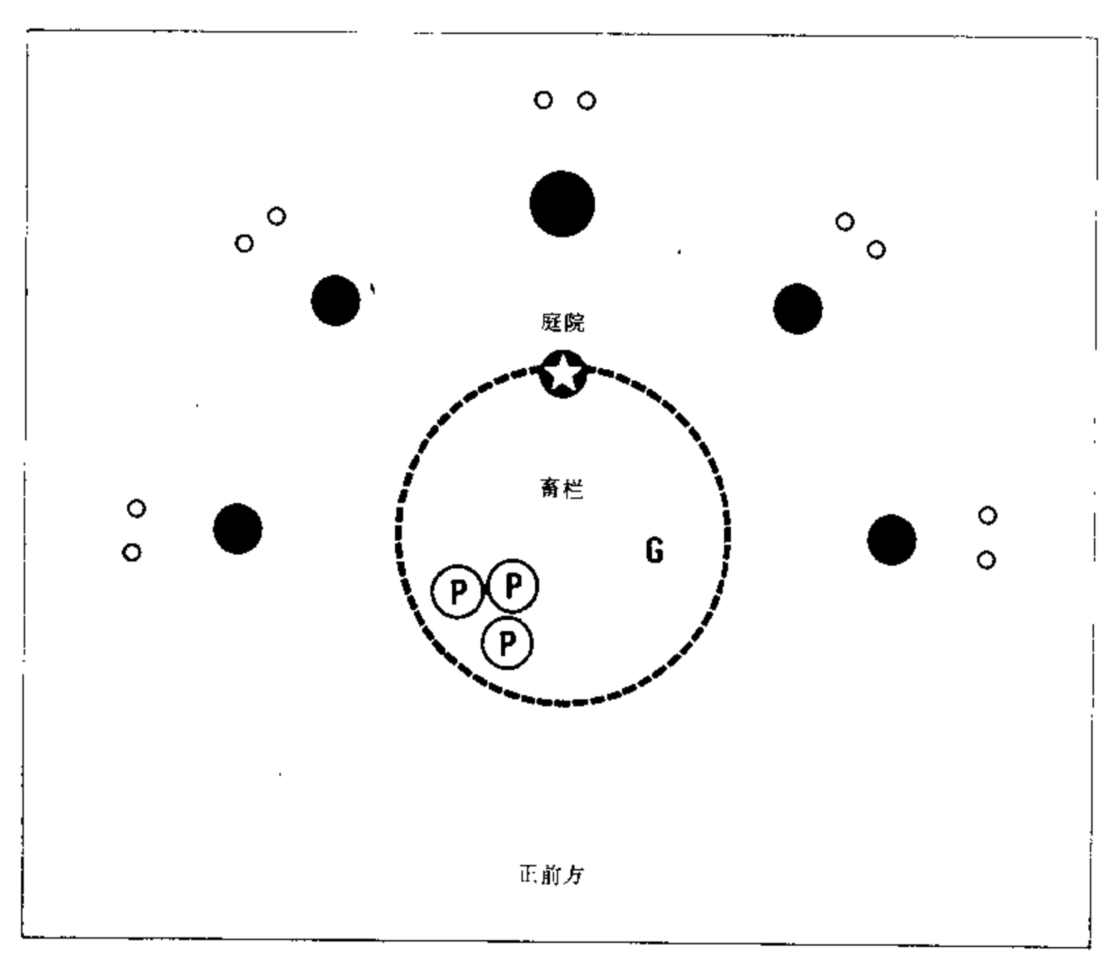


插图24.3 班图牧牛文化的生活居住布局：长者、家属一般住在坡上，在男人们的庭院和畜栏的后面。畜栏中有地下贮粮仓(P)，还有坟墓(G)。小圈表示各户背后高出地面的贮粮库。

茨瓦纳陶器复合体的考古学名称）不带石头围墙的居民点；㉗ 公元12－14世纪的伍兰代尔遗址；㉘ 公元10－12世纪豹地人、㉙ 埃兰人、㉚ 和图兹维人㉛的遗址以及公元7－10世纪齐佐人的居民点（包括那些显然只有小量牧群的居民点）。㉜的确，所有上述这些可以据之作出判断的特征都表明，齐佐人在早铁器时代对牛的态度和历史上恩古尼人一样。

考古学家以前低估了牛对齐佐人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大部分考古发掘者都旨在取回陶器样品，而不是取得经济资料，因而考古学家很少认识畜粪沉积也很少理解族群活动范围对解释经济资料的重大意义。专门考察人类生活方式的研究项目所取得的结果表明，畜牧和耕种是同一经济制度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早铁器时代和晚铁器时代截然分开的经济类型。 **672**

现在齐佐人社会和豹地人社会的文化背景已经明确了。我们对班图牧牛文化的了解可以用来说明发生在沙希/林波波河地区的种种重大事件与变化。下面首先让我们集中观察一下最大的几个居民点。

班图牧牛文化中居民点的大小是政治权力的直接结果：居民点越大说明领导人的地位越举足轻重，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大和政治上最重要的齐佐人居民点是施罗达，它在如今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南非交界处的东南面。㉝ 已知的最大豹地人居民点是 K_2 ㉞，位于齐佐人早期首都西南大约6公里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 K_2 被看成不是班图人的居民点而是科伊桑人的居民点。㉟这种看法很大程度是受了骸骨分析的影响，过去的骸骨分析把 K_2 墓葬中的骸骨当作没有尼格罗人种特点的博斯科普－布须人。㊱ 可是近期的分析结果表明，K_2 人像另外的豹地人、埃兰人、齐佐人社会（包括施罗达）一样 ㊲，实质上属于尼格罗人种的血统 ㊳。这种对铁器时代居民群体与前完全不同的解释是更好地对考古收集物进行认真比较和采取更佳分析方法的结果。早期的分析集中注意力于几个被认为有意义的特征上，而最近的研究则试图通过多种不同程度对各个事物鉴定其全部形态学的模式。目前骨骸分析的证据又补充以从陶器风格和居民点结构中得出的证据，说明 K_2 人和施罗达人像大多数其他史前南部班图人一样全部是尼格罗人。

K_2 人和施罗达人很可能是被沙希/林波波地区的自然资源吸引而来的。在降雨量充

㉗ B. N. S 福代斯（B. N. S Fordyce），1984年；E. O. M. 哈尼施，1979年；R. J. 梅森，1974年。
㉘ T. N. 赫夫曼，1984年；K. R. 鲁宾逊，1966年（a）。
㉙ G. A. 加德纳（G. A. Gardner），1963年；E. O. M. 哈尼施，1980年；T. N. 赫夫曼，1974年（b）。
㉚ J. R. 丹鲍，1981年；J. H. N. 卢布瑟，1981年；M. P. J. 穆尔，1981年。
㉛ J. R. 丹鲍，1982年、1983年。
㉜ 同上；E. O. M. 哈尼施，1980年、1981年；T. N. 赫夫曼，1974年（b）、1984年。
㉝ E. O. M. 哈尼施，1980年、1981年。
㉞ J. F. 埃洛夫（J. F. Eloff）和A. 迈耶，1981年；G. A. 加德纳，1963年；A. 迈耶，1980年。
㉟ G. A. 加德纳，1963年。
㊱ A. 盖洛韦（A. Galloway），1937年、1959年。
㊲ G. P. 赖特迈尔（G. P. Rightmire），1970年。
㊳ E. O. M 哈尼施，1980年；T. N. 赫夫曼，1974年；J. H. N. 卢布瑟，1981年。

足的情况下，这个地区的条件对从事混合农业十分理想：碎沙岩山岗提供可以耕种的土壤和多种混合的林地；温暖的气候和相对少的降雨量有利于各种肥嫩的热带草原草料茁壮成长；沙希河和林波波河保证或多或少固定的水源供应。另外，这两条河之间的莫帕尼林地是大象的家园，象牙一直容易得到，即使到今天这个地区大象仍然很多。更有甚者，有几条接受津巴布韦西部金矿脉水的河流在沙希河和林波波河汇合处附近注入这两673 条河流；所以在施罗达和 K_2 一带筛选金沙一向是可行的。[39] 下面让我们说明对外贸易如何导致津巴布韦文化的演变，然后再说明这种贸易对文化产生促进作用的假设为什么比强调宗教和牛产生促进作用的论断更加强有力的道理。

贸易与政治：公元1000－1075年

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沿海商人与沙希/林波波地区铁器时代居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触。实际上，9世纪的施罗达是南部非洲发掘出大量玻璃珠和象牙制品的最早遗址，K_2 所提供的象牙和玻璃珠比所有其他同时代居民点合起来的数量还要多。[40] 更有甚者，考古学家最近确定莫桑比克8－12世纪一些沿海贸易站的确切位置，可能当时是从那里先向施罗达，而后向 K_2 提供玻璃珠的。

在维兰库卢什湾周围沿海平原和巴扎鲁托群岛进行勘察（海湾和半岛均见图24.1，与霍拉－霍拉毗邻），发现有波斯陶器和伊斯兰玻璃的遗址。[41] 对遗址之一奇布埃内的初步挖掘，[42] 发现了公元8－9世纪含有上釉和未上釉陶器的沉积物，这些陶器近似非洲东海岸更往北基尔瓦和曼达早期发现的陶器。在这批早铁器时代的沉积物中还找到几百颗破损的扭歪的黄色、绿色和蓝色的玻璃珠，其外形与从施罗达和 K_2 出土的玻璃珠料仿。实际上，这批珠子中有一些管形的蓝色玻璃珠和在津巴布韦任何地方发现的最早的玻璃珠属于同一类型。就此看来，维兰库卢什地区是非洲东南部最早设有沿海贸易站的地方，而沙希/林波波地区则是南部非洲内陆第一批纳入印度洋商业网络的地区之一。

最近发现的沿海贸易站连同施罗达与 K_2 是马苏迪在10世纪提及的贸易网的组成部分。他当时写道：

> 阿曼的水手们……在僧祇海上航行，远达坎巴鲁岛和僧祇地区最远点丹德马的苏法拉及更靠南的一些地方。撒那威的商人们也习惯在这片海洋上航行……僧祇海可以通到苏法拉地方和瓦克－瓦克地方，这些地方盛产黄金和其他珍奇物品……僧祇人虽然经常从事猎象和采集象牙，他们自己家中并不使用象牙。他674 们戴铁制品以代替金银制品，……〔象牙〕……通常运往阿曼，从那里转运到中

---

[39] T. G. 特雷弗（T. G. Trevor）和E. T. 梅勒（E. T. Mellor），1908年，M. 沃特基斯（M. Watkeys），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地质系个人通信。

[40] E. A. 沃伊特，1983年。

[41] P. J. J. 辛克莱（P. J. J. Sinclair），1981年。

[42] P. J. J. 辛克莱，1982年。

国和印度。[39]

现在我们从其他资料中得知玻璃珠、布，有时还有上釉的陶器是以黄金和象牙作为交换从中国和印度运回南部非洲的。有意义的是，这些输入的商品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传统的牛的财富不同。

在齐佐人和豹地人的传统经济中，为了维持原有的制度，不得不让牛经常处于流通状态。富人把他们的牛租给穷人，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用牛换取妻子。因此，不消灭这种流通制度，传统财富是没法积聚的。与牛不同，黄金、象牙、玻璃珠和布的分配可以完全处于控制之下而无损于其经济价值，因为这些商品可以储存。除了能够储存这一特性外，贸易货物是大批量输入的。由此，世袭的领袖能够变得极度富有。财产和政治权力在传统制度中是连结在一起的，因为除别的原因外，一个酋长娶的妻子越多，租出的东西越多，能够得到的同盟者和追随者也就越多。根据后来的葡萄牙文献的记载，有些贸易商品用来作为娶新娘的彩礼，所以一旦这些商品转化为传统经济价值，贸易财富也就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权力。

豹地人迁入沙希/林波波地区时，他们很可能是在贸易财富尚未对齐佐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以前，就在施罗达接手象牙贸易。可是 K_2 的酋长政治权力猛增，这反映在酋长庭院中的贝冢上。班图牧牛文化中的庭院贝冢颇有特色地含有破碎的啤酒罐、集会火堆的灰烬、被当作罚金或贡品而屠宰掉的牛的残骸、人们共有的或者专门贡奉给酋长的野兽残骸。这类残留物或者被扔进中央牛栏或者保存在靠近庭院的地方，而不与别处的其他垃圾混杂一起。因此，可以看出庭院贝冢的堆积规模正是人们在那里集会活动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的直接写照。最初，K_2 地区的居住结构和施罗达一样：带有牛栏的小小家宅建造在酋长中央庭院两侧。但是到公元 1020 年，K_2 的庭院贝冢越堆越大，以致侵占附近的畜栏，大概就在同一个时候畜栏被搬出了中央地区（见插图 24.4）。中央畜栏的搬迁是班图牧牛文化空间安排结构的首次变动，它是政治活动越来越频繁和随之而来的牛的相对经济价值发生变化的直接结果。

到公元 1075 年，庭院贝冢堆积得比原来的畜栏高出 6 米，K_2 所在地升起的山谷完全被占满了，近期的发掘和碳－14 测定[40]都表明，K_2被突然放弃，与不足一公里以外的马庞古布韦山一带的 K_2 人突然猛增，发生在同一时间。由于在马庞古布韦可以得到 2 至 3 倍的生活空间，我们有充分理由假设当时的人们是为了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才把首都迁到那里去的。在马庞古布韦山脚下有一个天然圆形剧场，很可能是新建庭院的所在地，因为在该城中心它是唯一没有发现居民垃圾的广阔地带。（见插图 24.5）在附近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畜粪，说明畜栏没有与庭院建在一起；因此，K_2 以前的空间安排格局的变化在马庞古布韦固定了下来。随后的空间安排格局的改变说明，津巴布韦文化发源于此，而不是发源于大津巴布韦本身。 **676**

[39] 引用于 B. 戴维森（B. Davidson），1964 年，第 115－116 页。

[40] J. F. 埃洛夫和 A. 迈耶，1981 年；M. 霍尔（M. Hall）和 J. C. 沃格尔（J. C. Vogel），1980 年；A. 迈耶，1980 年。

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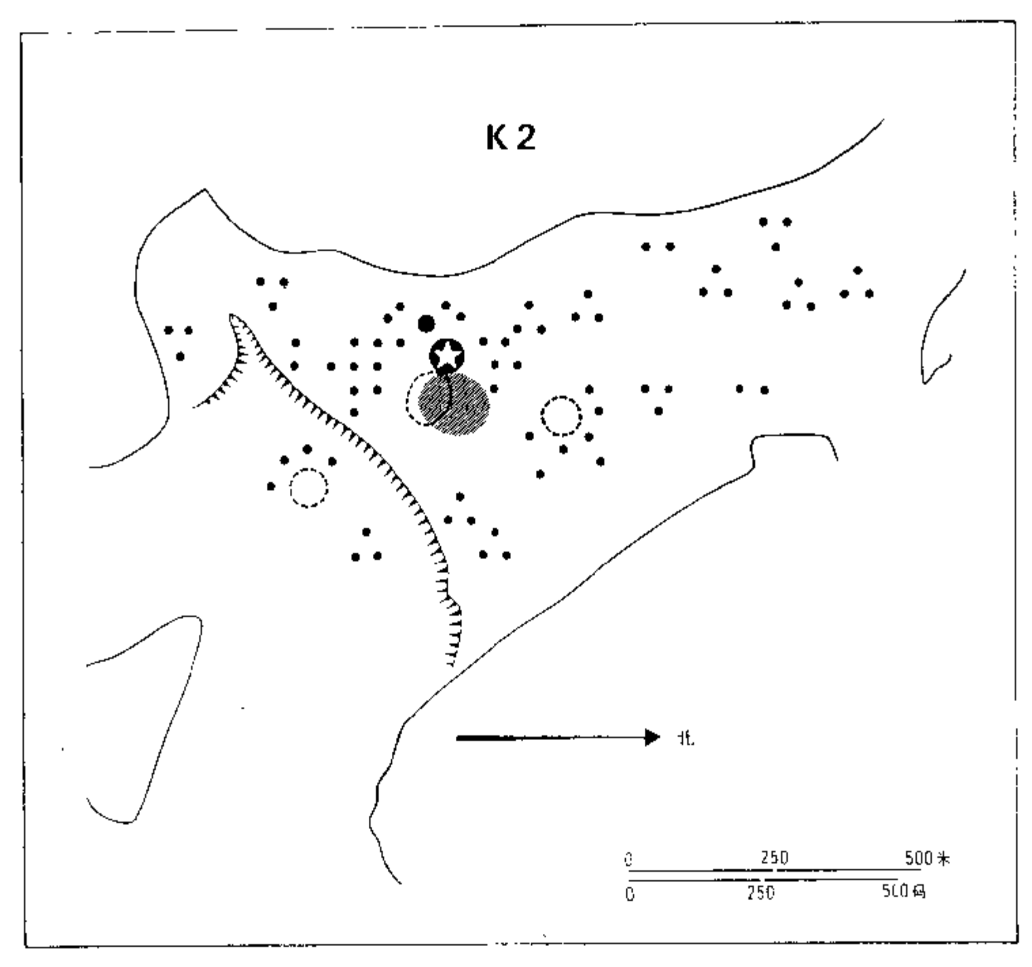


插图24.4 按照公元1050年前后的形式再现的K2遗址，"★"表示男人们的庭院，庭院下方巨大的贝冢（划有影线处）复盖住了早先的牛栏（虚线画的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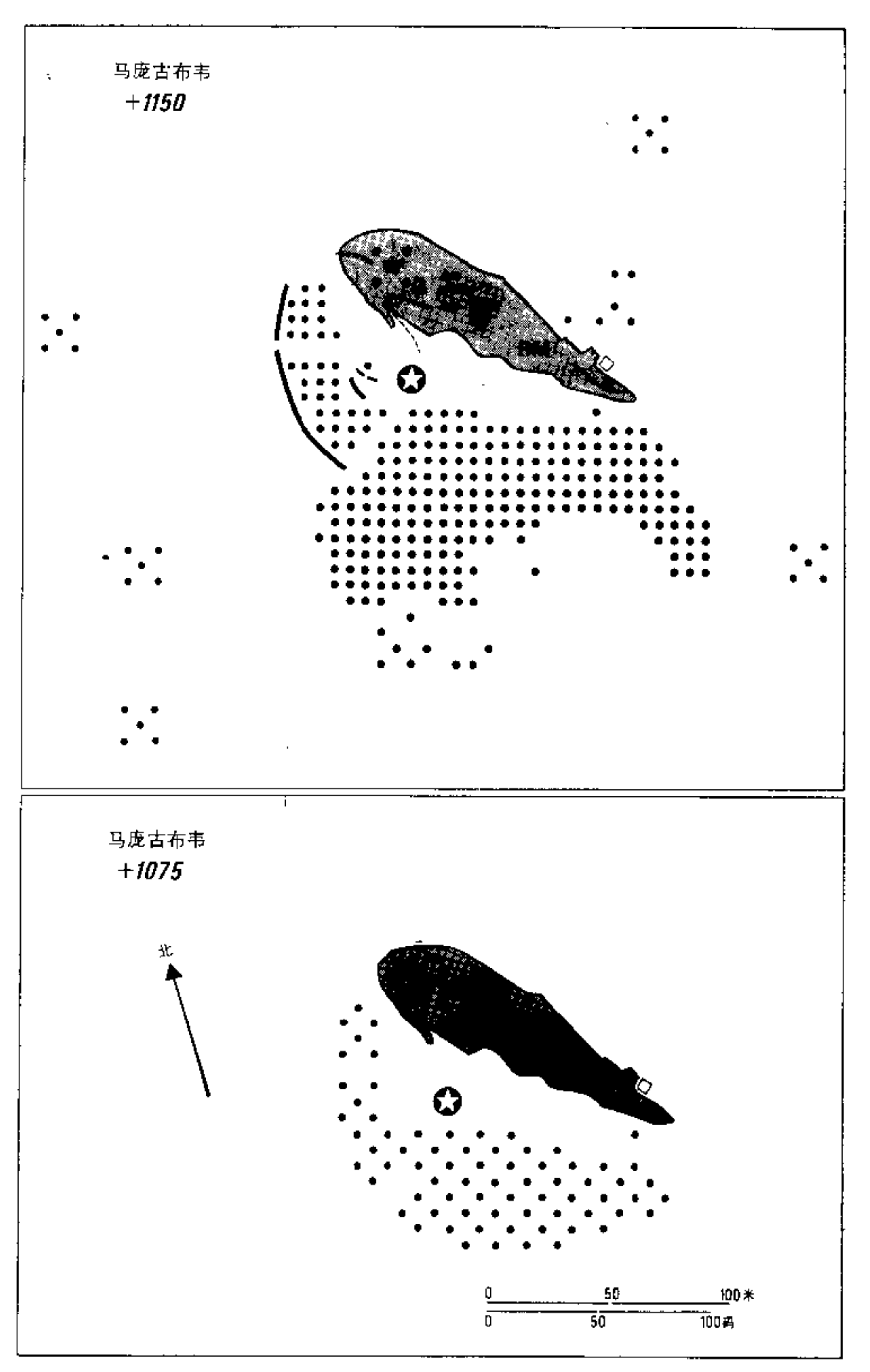


插图24.5 公元1075年和1150年马庞古布韦形式的再现；★表示男人们的庭院；W表示妻子们的住区；G表示坟地；RM表示求雨的地方。

马庞古布韦：津巴布韦的第一个首都，公元1075－1220年

津巴布韦文化的空间安排结构在有些方面不同于班图牧牛文化的格局：国王住在庭院上面山上的石头围墙里，而不是住在山脚下；上层人物死后埋葬在山上，不是埋在畜栏里；国王的妻子们住在她们自己的地方，而不与国王住在一起；重要人物在首都的边缘拥有与众不同的住宅。[39] 下面让我们谈一下这些和另一些特征在马庞古布韦首次出现的情况。

当首都迁到马庞古布韦的时候，有些人搬到庭院上面的山上去住（见插图 24.5）。人们有理由假设，这些人中包括酋长及其家属，因为他们在 K_2 时就一直住在山坡上和庭院的后面，这次从山坡搬到山上在南部非洲史前史中是首次。于是，领袖们在形体上脱离了他们的追随者，这是制度化阶级结构的最初标志。

首都从 K_2 移到马庞古布韦之后不久，K_2 的陶器式样开始有所变化。有一些人也许会说，这种变化是出现新的族群的信号，但是这次陶器式样的差异不是风格上和数量上的突变，实际上只是外表润色得更精致了，原先的 K_2 陶器图案仅仅是变得更加复杂了，而且新的式样仅仅是逐渐取代别的式样。这些变化并非由于族群的交替，可能只是因为出现了专业的制陶专家，他们是人口急剧增长和阶级结构发展的产物。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澄清社会变化对陶器风格的影响。

678 其他的手工制品表明，这里的人们与沿海商人继续保持接触。马庞古布韦约在公元1100年出现纺纱锭盘，[40] 把中央凿孔的平圆盘用作纺棉线的纺锤。[41] 由于纺棉纱在当时一些斯瓦希里城镇已是一种久已确立的手艺，迄今人们所知内地最早的这种纺纱锭盘标志着由沿海商人把纺织技术引进内陆，也许还标志又一种手工艺专业的开端。

在贸易开始时，黄金也许是比财富本身更重要的财富手段，但是到公元1150年左右，当地已能制造黄金制品。在王室居住的山上的上层人物墓葬里发现了一些罕有独特的东西，诸如用黄金薄片制成的嵌在木制盘中的犀牛和王笏。[42] 黄金用来制作象征身份的东西，这在南部非洲铁器时代还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是黄金已经获得当地固有价值的最早证明。

此时马庞古布韦的空间结构已经转化成一种崭新的格局，即用石头墙划出重要的地区（插图 24.5）。在山脚下庭院边上筑起一处由石墙围住的住宅，该住宅很可能是主要大臣的住所，在津巴布韦文化中此人与国王共理朝政并任命官吏。从该处有一条阶梯沿着狭窄的山谷直通山顶；沙岩石上一对对的石槽或许是安置木制步阶的，有一段短短的横截墙表示山路到达终端。在山顶上有更多石槽估计是用来支撑围绕山头筑起的有木桩

[39] T. N. 赫夫曼，1981年，1982年。
[40] A. 迈耶，1980年。
[41] P. 戴维森（P. Davison）和 P. 哈里斯（P. Harries），1980年。
[42] L. 富歇（L. Fouché），1937年。

的栅栏，它把行人导向墓地的右边。在右边有几间小屋建在一堵巨大弧形石墙的前面，石墙内则是一片特殊屋群。从这群特殊房舍中发现珍贵的中国青瓷连同这堵石墙表明，国王就住在此地。在屋群最前边的屋子里有供男人们娱乐的石板，它告诉我们，国王的男性侍从，如卫队、弄臣、乐师等住在这个地方，较晚期的葡萄牙文献对其他津巴布韦国王的描述与此相同。在墓地的对面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路可通到小山的西北端。山上仅有的一些磨石就出土于这里山顶上一些小屋内，这儿可能是王妃们的住所。所以，新格局是把王妃住所与国王及其侍从住所严格区分开来。

其他特征则是先前班图牧牛格局的继续。例如，在先前格局中，放在酋长住宅后面的仪式上用的盛雨罐与酋长住宅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这些盛雨罐可能是王室从 K_2 迁出时搬到山顶上来的。在马庞古布韦山上的相应地区没有发现正常的有人居住过的残留物痕迹，而且这个地区有一条特殊的用石墙遮掩的小路通往山的东端。很可能这里就是王宫后面的国家求雨中心，与大津巴布韦的东围场起同样的作用。因此，山上的东边小道可以说是划分城镇后部的分界线，而对面长长的石头墙，如在大津巴布韦一样，是它前部的标志。 679

人们居住后残留物的分布说明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西部城墙内，只有少数几个家庭住在城中心外面的高处（插图 24.5）。在班图牧牛格局中，凡有资格竞争酋长职位者，诸如酋长的兄弟、叔伯和主要姻亲通常住在由酋长亲密支持者形成的保护圈的外边。[59] 由于马庞古布韦也存在着同样性质的竞争，所以围绕城市边缘与众不同的住宅很可能是这一类重要人物居住的。

这些重要的住宅和距马庞古布韦有相当路程的一些上层人物的山头住宅区十分相似。举例而言，13 公里外的利特尔·穆克；西边 40 公里处的姆曼格瓦；[60] 西北 85 公里处的马佩拉山丘；[61] 和东北 96 公里处的马赛纳山丘。这些住地全都邻近地势低洼的马庞古布韦型村庄，后者的结构仍是以牛栏为中心进行安排，例如姆泰滕格韦就是那个样子。[62] 这些不同类型的居民点为三层政治等级制度提供最好的考古证据：低洼地遗址可能是普通人的住所；小山头遗址可能是地区领导人的住宅；马庞古布韦作为首都则具有最高权威。首都城外上层人物的宅第可能是这些地区领导人在城市的住宅。因此，马庞古布韦社会的阶级结构在居住区的地区分布上以及在首都的空间结构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从 K_2 到马庞古布韦的演变顺序和马庞古布韦和大津巴布韦之间的相似处，充分说明津巴布韦文化是从沙希/林波波地区的班图牧牛文化进化而来的。因而，马庞古布韦可以说是津巴布韦的第一个首都。

这种顺序也阐明了宗教和牛在津巴布韦文化的演变中所起的作用。某些历史学家认为姆比雷人在沿海地区发展黄金贸易之前就向南越过赞比西河，并通过他们的宗教力量

[59] I. 沙佩拉（I. Schapera），1970 年。

[60] M. J. 坦普林（M. J. Tamplin），1977 年，第 38 页。

[61] P. S. 加莱克，1968 年。

[62] K. R. 鲁滨逊，1968 年。

创建了津巴布韦王国。[53] 但是，考古学的证据却是一清二楚的，重要的部族迁移来自南方，而围绕国王进行的精心安排的仪式是与对外贸易及政治力量的增长同时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在它们之前。因此，津巴布韦文化的兴起并非由于出现了新的宗教力量。

680 还有一些非洲问题学者相信，津巴布韦文化的兴起是通过畜群个人所有制的确定和随后在这片广阔地区实行特定放牧战略的结果。这些人强调说：随着畜群的自然增长，私有财产观念围绕牛而产生。由于大畜群的最佳放牧战略是循环的季节性迁移放牧，根据这种假设，控制远距离的牧场成为必不可少，这样就不得不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权。[54] 反对这种论点的第一个理由是，在津巴布韦文化形成以前，那里的畜群没有迅猛增长，因为厚厚的畜粪沉积和7世纪齐佐人居民点的空间结构都说明，在马庞古布韦出现之前，从事畜牧的社会最少已经存在了400年之久。我的第二个反对意见是针对循环的季节性迁移放牧的说法，在马庞古布韦地区许多普通人住所遗址中有大量畜粪沉积，这一事实否定了牲畜和人正常地大规模流动到远地牧场的可能性，因为物质的残留物表明，这些居民点像早铁器时代的社会那样是固定的。

但是，比这些实质性错误更严重的是这些学者混淆了政治集中化与文化演变之间的区别。南部非洲许多以牧牛为基础的社会在政治上已经高度集中，诸如巴曼瓜托人、马塔贝勒人、祖鲁人和斯威士人的社会，但是这些社会仍旧与其他南部班图人具有同样的文化价值观，因此，他们的居民点仍旧依照 K_2 和施罗达同样原则进行组织安排。应该说，牛作为私有财富可能是津巴布韦进化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仅仅这个前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不论牛还是宗教因素都不足以解释现有的资料。但是另一方面，全面的贸易假设却能够说明在马庞古布韦兴起之前饲养牲畜已有很长一段时期，说明 K_2 庭院中的畜粪沉积为什么日益增多，说明首都自 K_2 到马庞古布韦进行迁移的背景，说明随后马庞古布韦空间结构为什么发生变化，说明为什么南部非洲其余部分班图牧牛文化继续保留。正像本章已经进行阐述的那样，K_2 和马庞古布韦演变到津巴布韦文化是象牙和黄金贸易引起的政治权力增长的结果。

---

[53] D. P. 亚伯拉罕（D. P. Abraham），1962年、1966年；P. S. 加莱克，1973年。

[54] P. S. 加莱克，1978年。

25 马达加斯加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

681 人们常常把公元10世纪以前、有时甚至是15世纪以前马达加斯加的历史视作是无法确知的领域，几十年来提出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假设而从来没能取得一致看法。[1]迄今在本岛发现的文字记载最早也只追溯到12世纪，而考古学的发展还只是最近的事，[2]其手段还十分有限，不能提供给我们可靠的统计数字和按年代顺序排列的研究成果，[3]以便把历史的重现建立在完全可靠的基础之上。自从G.费朗撰写年代久远的著作以来，对非马尔加什文的资料的使用实际上仅仅局限于阿拉伯文的著作；无论如何，使用这类资料涉及到对多种语言的知识（研究马达加斯加的专家一般都不熟悉这些语言），而且，还要掌握人数不多的现有研究人员能力通常所远远不及的知识。因此要依据本岛积累的资料撰写马达加斯加从基督纪元7世纪到11世纪的历史无疑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开始利用当前在马达加斯加能够找到的各种形式的口头资料是可取和吸引人的，这也是我们撰写本章时采用的办法。这些资料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得到保存。它们，特别是在东南部，有时附属于用阿拉伯文－马尔加什文[4]书写的文献（"沃兰－翁吉齐" *Volan' Onjatsy* 或 "索拉贝" *Sorabe*）；有时被吸收进经过重新改写的资料中，以一鳞半爪的形式出现，很难释读；[5]也有时是具有非常正式性质的文本，在迄今尚在实行的典礼中使用；682 [6]最后，它们有时还可能是零星分散的资料，目前正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地加以搜集，但其来龙去脉不太容易弄得清楚。

我们认为意义重大的是表明研究工作如何在本岛取得进展并已开始开辟了新的前景，它不受成问题的殖民主义的限制，也不为以种族主义为基础或者更坏的以进化论为

---

[1]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8章和参考书目。又见E.腊莱米霍阿特拉（E. Ralaimihoatra），1971年（b），1974年。

[2] J. P. 多梅尼契尼（J. P. Domenichini），1981年（b）。

[3] 对该问题的一次有意思的调查，见D.拉萨缪尔（D. Rasamuel），1985年，1986年。

[4] 在路德维希·蒙特（Ludwig Munthe）教授指导下，目前马达加斯加本身正在进行大量与此问题有关的重要工作。

[5] 举例而言，B.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B.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最近在马南扎拉河下游找到一份资料，这是在一个很小的族群腊沃奥梅纳·安德里亚－马纳瓦纳纳那里找到的，该族群自称是扎菲（n－d）－拉米尼亚人来到之前存在于当地的一个旧朝的后裔，11世纪后期来到本岛的东北部。这些人的口头传说几乎在整整1000年期间实际上占有连续统治地位，把更早一些族群的传说大部分都湮没了。

[6] 对此我们将提供一些例子。

基础的论断寻求合法性。它恰当地利用口头资料和多学科研究的丰富文献。[7] 在这里，我们不介入短年代学的支持者（人数越来越少）[8] 和长年代学的支持者[9] 之间至今仍然进行得非常热烈的讨论；也不介入人类以何种方式和分几个阶段在本岛居住下来这个含有高度意识形态内容的辩论；我们不试图为"瓦津巴"人（*Vazimba*）是什么下断语，关于"瓦津巴"人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发现；我们也不谈"阿拉伯人"殖民的种种传闻，长期以来确有不少人把这些传闻看成是对许多马尔加什族群起源的叙述。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进行大量认真的调查研究才有条件进行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宁肯使用另外的资料来源开展讨论其他的问题。[10]

口头资料的释读问题

在马达加斯加，人们正大力搜集和研究本地区一切可能得到的原始资料。像别的地方一样，它们需要一套精确的方法；在马达加斯加的情况下，语言对开展这些资料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的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路德维希·蒙特最近编辑和释译的一份手稿[11] 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套有关名叫达拉菲菲（*Darafiqy*）[12] 的"巨人"的资料全集，这套资料散见各处，对它需要给予非常密切的重视。[13] 首先是要弄清楚其中为这些"巨人"提供的名字是否确有历史价值。马尔加什语言意味深长的同一性来自它源起的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基础的统一性[14]，而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始自 18 世纪和 19 世纪梅里纳人的扩张，这种同一性使人们不但有可能相当容易地识别出来自别的语言的借用语，并能按年代顺序确定其在本国文化史上的位置，而且还能至少暂时地以同样的方法处理在马尔加什流传下来的任何口头传说。

由于掌握了奥斯陆 A_6 手稿，我们终于有了一部用马尔加什文书写的文献。它的内

[7]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和 J. P. 多梅尼契尼，1979 年和 1983 年。

[8] 见 J. 普瓦里耶（J. Poirier），1965 年；P. 奥蒂诺（P. Ottino），1974 年（a）；P. 韦兰（P. Vérin），1974 年。

[9] H. 德尚（H. Deschamps，1972 年，第 35 页）引用 H. 佩里耶·德－拉－巴蒂（H. Perrier de la Bathie）提出的中央高原地带的森林遭到破坏已有 500 到 4000 年的论点，以此为据，中央高原地带可能是本岛人们迁入定居的最后地区。

[10]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和 J. P. 多梅尼契尼，1984 年。本文第一稿（1983）发展了注 7 所提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因而成为专家们一系列讨论的焦点。这些专家不仅有研究马达加斯加的，而且有研究东非和西印度洋以及研究东南亚和澳斯特罗尼西亚的。

[11] L. 蒙特，1982 年。出版的手稿是阿拉伯文－马尔加什文（"索拉贝"），它的科学查看符号是 A_6，保存在奥斯陆。

[12] 系统搜集有关达拉菲菲和其他"巨人"的资料，这项工作才只刚刚开始。它显示了在整个东部和南部口头流传下来的记忆非常丰富。

[13] 从全集的状况看，在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文件里，它们不仅与上下文割裂开，而且在誊抄和释译中被改动并在被曲解。做这种手脚的人一般对口头文化（特别是对马尔加什文化）的了解十分明显地不足或者甚至根本不了解。似乎可以这样推理，用语言考古学来进行研究（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1983 年和 1985 年），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提供全部保证，但是，它能够在以有关族群的母语构成传说的情况下提供保证，并能在他们展开的正常范围内用有条不紊的方法加以搜集。语言考古学是这个词最广泛意义上的语言学方法，在语义分析中借助于词源学和方言比较，并破译文化上象征符号的代号，这表现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操纵语言资料的传统技术。

[14]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197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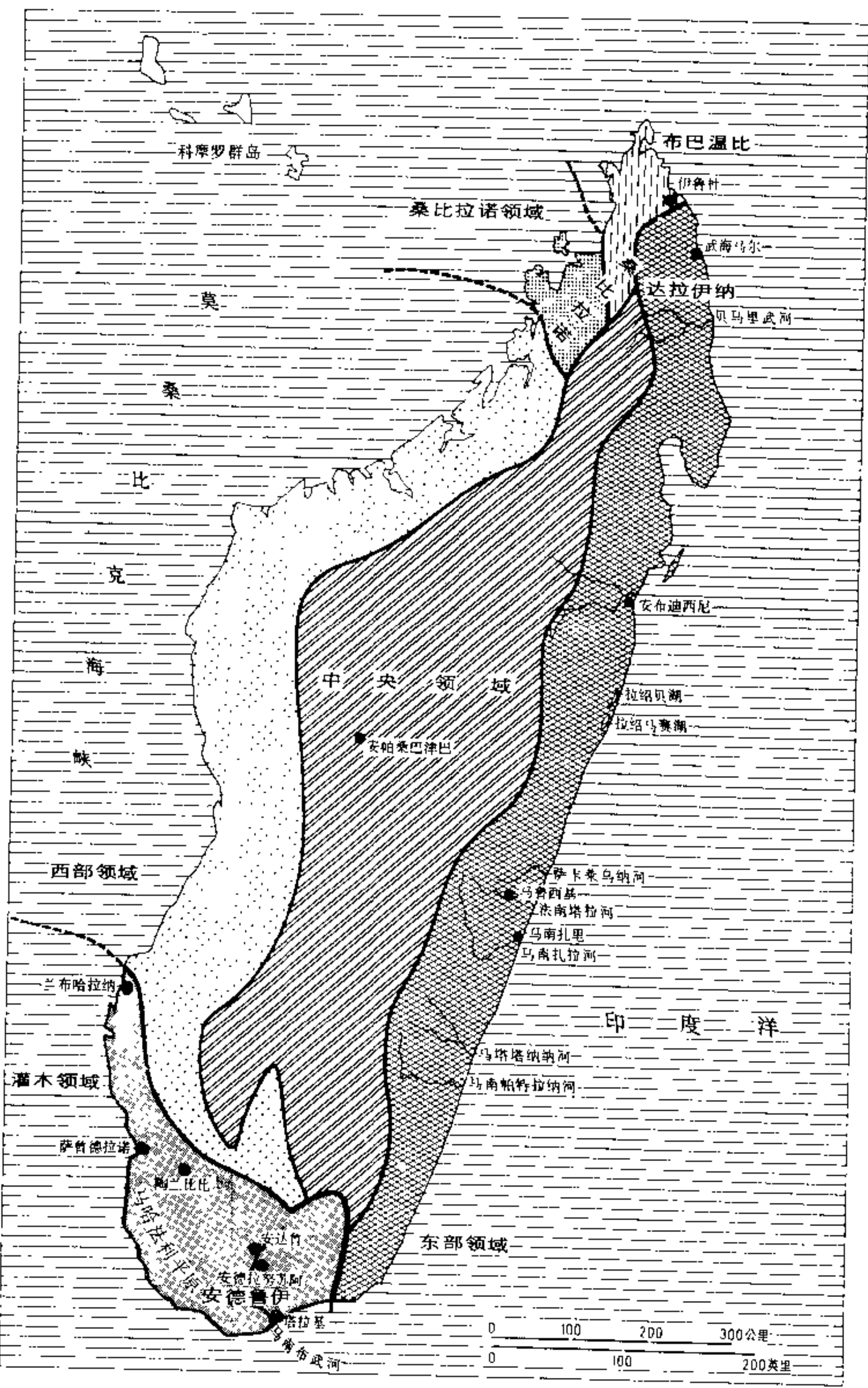


插图25.1 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

容是关于达拉菲菲的故事和他介入一个特定地区情况最完整和首尾一致的版本。对它的分析使我们不仅能够了解这个手稿传入时的一些政治和社会背景，而且能够作出结论：东南部负责保存传说的书吏（卡蒂博，*katibo*）非常小心地尊重其正规语的特点，尽管他们毫不犹豫地去掉了手稿中可能有损作为这个地区最早“教化者”声誉的内容，所谓教化者通常指的是他们“来自阿拉伯半岛”的祖先。因此作为第一步对名字进行研究，就有了可能。根据马尔加什语的习惯用法，每一个名字都是按照精确的规则构成的，而这些规则是完全“可以破译的”。

这些“巨人们”的名字所提供的第一个清楚的信息是这些名字是由来自澳斯特罗尼西亚语、梵语或波斯语的词巧妙地组成的混合体，但是都与芳香植物、调味品、香料和药用植物的贸易有关。[15] 这些不同的词所采取的形式，使得接受这一整套专用名词作为新词成为可能，它们是在马达加斯加同有关地区进行接触的时期（在伊斯兰教成立以前）出现于本岛的，同时提出假设。根据这个假设，马达加斯加的有关地区早在公元7世纪以前就参加了印度洋贸易。

685　*Darafify, Darafipy, Darafely, Fatrapaitañ(ana)* 都由简单的词组成，除 *dara* 外，这些词至今还在马尔加什语中使用。让我们看一看人们是怎样使用这些词的。*Fi(m)py–fify* 与食品、化妆品和医药制品有联系，这些物品中无疑有艾蒂安·德－弗拉库在17世纪时就确定是马达加斯加闭鞘姜（*Costus*）[16]的东西。从物种科学的角度讲，这*fi(m)py–fify* 类物品的第一组包括主要来自贝壳属的骨螺（*Murex*）的瘠，特别是 *Murex trunculus* 的瘠，至今西南部还把它磨成粉在使用。这类物品的第二组是植物产品，主要来自某些肉豆蔻科植物（*Haematodendron* 或 *Mauloutchia sp.*，的皮和胶浆[17]），但也有可能来自一种草本植物的根[18]。同样属于这 *fi(m)py–fify* 类的还有各种野胡椒的变种，现称“粉红色胡椒”，也源自 *Darafely* 一词[19]。在19世纪初，巴泰勒米·于贡[20]确定它们就是“阿拉伯人的真正荜澄茄”，而阿拉伯人是荜澄茄（*cubeb*）最大的消费者，后来又将它转手出口。

最后，“巨人”法特拉帕伊塔纳纳（*Fatrapaitanana*）的名字让人联想到本杰明延龄草，但是当时它似乎并不是马塔塔纳纳河一带主要的出口物品，因为从这个名字看，本杰明延龄草（*fatra*）的量器是作为礼物在一宗买卖成交（*paitanana*）时送给买主的。就目前与我们有关的领域而言，主要出口物品应该是植物学家公认在东南部产量丰富的 *fimpy* 类物品。至于本杰明延龄草本身，它是当作极易挥发的香精的防挥发剂，主要用于增加香精的价值，因而它无疑在马塔塔纳纳河的贸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J.I. 米勒[21]

---

[15] 同上。

[16] E. 德－弗拉库（E. de Flacourt），1661年，第131页。

[17] P. 布瓦托（P. Boiteau），1976年，第71页。

[18] 同上，第69页，参阅：*fifinatsy* 或 *Bulbostylis firingalavensas* Cherm 的名字。

[19] 胡椒在马达加斯加的旧名称是 *Voamperifery* 和 *Tsimperifery*，来源于语言史的小亚细亚语时代从梵文借用字。在更近的时期，它的名称又叫 *Daraflo flo*，这个字只在北部使用。

[20] E. 黑克尔（E. Heckel），1903年，第130页。

[21] J. I. 米勒（J. I. Miller），1969年，第39页。

认为它就是为古典权威作家提到的 *cancanum*。《红海巡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一书，把它包括在阿拉伯半岛从马劳（在当今索马里境内）进口的物品中。据 J.I. 米勒说，*cancanum* 就是沿着这条“香樟之路”而达到这个港口的，他认为，这条路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 29 年到公元 641 年）经过马达加斯加和东非。

另外还有出现在“达拉非菲故事集”中的一些物品，但是它们的名称没有像上面提到的那些名称一样成为“巨人”们的名字。让我们列举这些专用名字，(*ha*) *ramy*(马达加斯加橄榄，*C.boivini* 和 *C.multiflorum* Engler) 如今叫“马达加斯加香”或“白色非洲香”；至于以地名安布迪西尼（*Anbodisiny*）命名的香樟，它可能是原来安达拉西尼一词的仿造词，今天仍然保留着它们在古代时某些重要性的痕迹：在有些族群中，一个家庭生第一个儿子时要庄严地栽上一棵香樟根。[22] 686

从而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是体现非常抽象的古代历史“传说中”人物的名字，另一方面是马达加斯加（特别是本岛东部）的植物和珍贵产品的名字，两者之间有着一种联系，这一点人们可能是已经意识到了。

对历史学家来说，下一个阶段的困难要多得多。一方面，我们需要断定，他所收集到的非常间接的暗示是否具有任何真正的历史内涵，有无可能把它们按年代编排，这样的年代编排能否逐个吻合确切可靠的印度洋贸易的年表。上述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讨论。另一方面——与本岛的内部历史关系更为密切——我们需要（还是在尽可能确切可靠的年代排列中）弄明白古代本岛人民生活中各个族群力量对比关系的历史，这肯定是一种极为艰巨的研究，但同时也是像我们这类书的内容中最不引人注目的研究；在这部《通史》中我们将对它略而不谈，因为已能得出的结论和出版过程中有可能得出的结论在别处也可以读到。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提一提对历史学家十分有用的一些一般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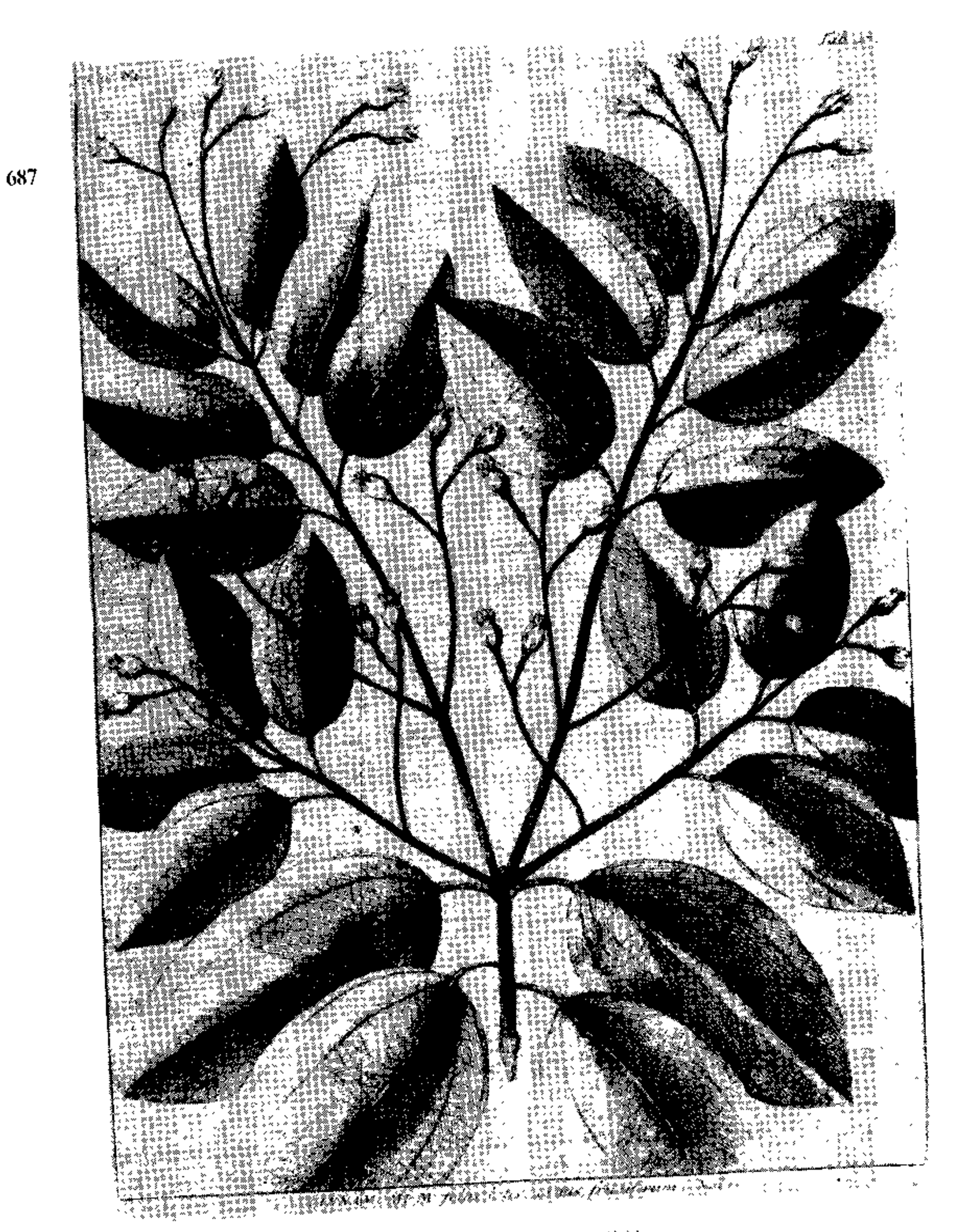
首先，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些名字作为实际的历史现实来使用有困难。每一个名字所构成的是一个集体的象征而不是“历史上英雄”个人的名字；当有人讲到“the *Darafify*”、“the *Darafipy*”等等名字时，他所讲的只是本岛历史中的一些情节，可能发生在 11 世纪以前。但是，这也是描述**本岛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个特定族群**，譬如在它企图垄断某些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的时候；在另外的时间和场合，同一个族群或许又被叫做另外一个名字。

把族群叫做“巨人”，就如把他们叫做“矮子”一样都是代号，解开这些代号的钥 688

---

[22] 如今在本岛，樟属乔木（Cinnamon）包括引进的 *Cinnamona* 和当地特产的 *Cinnamosma*，其中有经常被庸医和占卜者用在处方中的著名的“万灵药”(*mandravasarotra*, *Cinnamosma fagrans* Baillon)。当它们还没有被称作 *Kanely* / *Kanelina*(即法文 *cannelle*)，以与殖民时期随着使用增多而广为传播的名字——桂皮区分开时，在日常生活用语中，除北部外，Cinnamon 一词通常使用于源自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的名称，如 *hazomanitra*（香木）和 *hazomamy*（甜木）。尽管那里的语言极其开放，向法语借用了不少词，但人们继续以怀乡的感情称它为 *darasiny*，这与波斯语和直接或通过阿拉伯语借用波斯语中这个词的其他语言相同（波斯语 *dār čini* “*cinnamon*”，直译为“来自中国的木或树”或者“中国的大门”）。正由于间接使用了后一个名称，在达拉非非故事集中，通过安布迪西尼这个地名提到了这个词（在 cinnamon 树下/在 cinnamon 树附近）。

687



图片25.1 植属乔木：香樟树

些需要我们去发现，决不能抱着把这些事实当成实际的历史现实来使用的想法。正如马东加什口头传说把瓦津巴人作为“矮子”看待以表明他们在本岛各地政治上沦为湮没无闻的境地，同样也把达拉菲菲的族群作为“巨人”看待（对他们的对手也称为“巨人”），以使这些族群在人们的心目中永垂不朽，他们的威望是如此之高，许多本地传说都力图保持人们对他们的怀念。

传说的重新撰写、它们相互间的矛盾和它们各自都企图取得相对立的合法性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以人类学和语言学起主要作用的长期调查研究，也就不可能根据几个不容否认的历史特征（这种特征肯定能在“达拉菲菲故事集”中找到并且与本岛的内部历史有关），就匆忙而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认为本岛历史的一部分已经可以根据这些特征来书写了。这些特征只是构成了潜在的不能替代的要素。然而究竟谁是这些“达拉菲菲”？他们来自东北部，在难于确定的某个时间据说他们力求逃避口头资料里强调的那种牧牛人的传统地位。以后据说他们或是通过机智的策略，或是通过使用武力（视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各异）参与了贸易至于是否经常、规模多大，我们尚没有掌握资料。这种贸易很可能（似乎是通过澳斯特罗尼西亚的或波斯的中间人）把世界各地需要的物品运到马达加斯加的北部。应该提醒一下，卷入这些我们目前还了解得不太清楚的贸易的地区是本岛东部沿海一带和南部。

强大的达拉菲菲族群参与并企图垄断这种贸易的地理区域，从广义说，大致可以确定是那些能够收集到形成达拉菲菲故事集传说的地方，把范围更缩小，可以说是那些发现有事实和事件记载的地方以及发现人类活动取得具体成就的地方，后者几乎都与加工绿泥片岩的活动（采石场和已制成的产品）有关。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这个地理区域主要是从本岛最北端一直延伸到马塔塔纳纳河流域这一大片土地，虽然有一个延伸部分插入西南部的马哈法利平原（我们设想它是一次迁移达到的最后区域，这次迁移在马南帕特拉纳河以南某地离开东海岸而横贯全岛）。[29] 总之，这个地理区域包括除了南端以外本岛的整个东部沿海，那块地方芳香植物、调味品、香料和药用植物正好特别丰富；开发（包括生产和销售）它们的条件可以从破译它们的专用名字，特别是奥斯陆 A_6 手稿中记录在案的所有那些名字时，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沿马南扎拉河下游进行的调查充分显示了，在扎菲（n－d）－拉米尼亚人到达时，腊沃奥梅纳·安德里亚－马纳瓦纳纳族群的传说遭到意识形态上改动的规模有多么严重。 **689**

扎菲（n－d）－拉米尼亚人到来后，马南扎拉河下游那一段历史很可能应该确定是在11世纪结束之后。然而，这一段历史对于想了解后来本岛各地区政治、社会体制演变情况的任何人看来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希望更好了解出口贸易发展范围的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出口贸易的兴衰起伏无疑深刻地标志着早期历史的特点。

通过揭示达拉菲菲和扎菲（n－d）－拉米尼亚王公贵族相互间血统的同源和他们的团结对马达加斯加历史产生的影响，这一段历史又促使我们转向扎菲（n－d）－拉米

---

[29] 关于从东向西或从西向东的流动中，马鲁派卡门的重要性，见E.腊莱米霍阿特拉（E Ralaimihoatra），1966年，第54页。

尼亚人来到之前马尔加什史前的状况。人们对此已经花费了许多笔墨，但迄今仍是知之不多。根据比较可靠的资料，已经能够肯定的是：在确定这些伟大的澳斯特罗尼西亚商人的活动区域时（它包括海路经过的印度洋大部分地区），扎非（n-d）-拉米尼亚人从苏门答腊到红海沿岸，从那里到印度（曼加洛尔），然后再到马达加斯加，这种连续的移民浪潮可能同样反映了澳斯特罗尼西亚人海上贸易的总体动向，这至少部分包括了从7世纪到11世纪马尔加什人的对外贸易情况。但在试图阐明这一点之前，通过主要来源不属语言科学的各学科的成果去完成我们对马达加斯加人生活的调查，这无疑是合乎需要的。

物种植物学或考古学所提到的物品有可能是出口的吗?

马达加斯加的植物普遍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大约在目前这一千年（即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开始时，起源于这个环境的某些动物的绝迹（大狐猴、大鸵鸟、大陆地龟、巨鳄、矮河马等等），它们的骨骸常在干涸的水源周围发现，这都表明在森林覆盖下出现过重大的变化，甚至也可以设想这里曾有过降雨量较少的时期以解释某些地区变得干旱的原因。此外，也应该注意，某些属于本卷所述时期的遗址（兰布哈拉纳+730年± 80年；陶兰比比+900年±150年；安帕桑巴津巴+915年±50年），发现人类制造品的踪迹（作为装饰用的钻孔牙齿、陶器等）同这些动物的亚化石遗骸混杂在一起；由于我们不能肯定它们各自在地层[24]中的位置引起它们是不是确实属于同一时代的怀疑。

690

正如人们经常说的那样，不管是对植物群还是对动物群，人类在历史各阶段的活动并不只是消极的。在植物群的范畴内，丰富的当地品种（86%）和稀少的特殊类型（少于8%）那就是马尔加什植物群的典型特色，这既证明马达加斯加成为一个岛屿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岛屿曾经和大陆相连；今天从大陆分离出来的这部分土地上仍布满同样的原来的植物群。这一情况使人联想到，来到马达加斯加的移民，不管来自哪里，都会发现这里的植物同他们自己出生或祖居的国家的植物相同或者非常相似；它们中的许多是已经投人贸易或者不久可能投人贸易的植物。要证明这一点，只要研究一下E.德-弗拉库[25]列出的植物目录就足够了；他自然特别注意已投人贸易的商品植物，并把它们与从埃及、古罗马帝国和波斯进口的植物的名单相对比。

从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口头资料，特别是本岛东部口头资料中提到的那些植物和以动物为原料的制成品在古时候是否已被搜集起来出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马上就进行分析。另一个问题，这些植物和以动物为原料的制成品在伊斯兰教成立以前或在它起始时期是不是已被纳人包括整个或部分印度洋在内的贸易区？我们将在以后

[24] J. P. 多梅尼契尼，1981年（a），第70页。
[25] E.德-弗拉库，1661年，第111-146页。

再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根据H.佩里耶·德－拉－巴蒂所作的统计[26]，马尔加什48%的非当地产植物是由人引进来的。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事情是生物地理学所无法解释的：在正常情况下，生物地理学肯定会预期，与东非大陆只有莫桑比克海峡一水之隔的西部，应该比被浩瀚的印度洋与其他任何大陆隔开的东部，能找到更多当地产的植物，但事实上，这种植物的57.14%却在迎风的地区发现(西北部的桑比拉诺例外)，而只有14.28%在背风的地区发现，其余28.75%两个地区都一样普遍。H.佩里耶·德－拉－巴蒂认为，这些植物是在马达加斯加与原来所属大陆发生断裂后才引进的，这种现像是通过人的活动间接形成的。他还用这种现象顺便证明本岛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存在。[27] 栽种有价值的品种并使新植物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无疑是在森林被破坏之前，由造林专业人员或者至少是由真正到处飘泊的清理土地者进行的，他们一般对恢复土壤和植物的构成十分关心。考古学研究比生物地理学或者古生物学的研究开展得更少，至今只发掘了一处本卷所述时期以前的遗址（西南部的一个渔民遗址萨拉德拉诺，+490年±90年)[28]，但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发现几处确实属于本卷所述时期的遗址。至于植物的构成，这些遗址事先就证实了最近通过破译口头传说才肯定的某些事实，而口头传说又反过来对考古研究和发掘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更为可靠的解释。 **691**

在传说中是达拉菲非族群发源地的北部地区，布巴温比和达拉伊纳之间，由瓦拉苏拉岛（"使节驻地岛"或"遗骨岛"[29]）、非海雷纳纳岛（"回归岛"）、科曼科里岛（"猪岛"）和安康巴岛（"狐猴岛"）卫护外洋汹涌波涛的一个海湾底部，人们可以在流入该海湾的一条河岸旁，根据当今一个村庄的名字找到伊鲁杜这个地方。由于没有做过花粉分析，因此尚无法肯定或者否定那里曾经开发过当地称为达拉伊纳（Daraina）的达拉（*dara*）和其他商品植物（达拉伊纳是用来制造达拉的，那地方盛产达拉）。但是R.巴蒂斯蒂尼曾报道，人们发现过大鸵鸟（*vorompatra*、所谓"森林被砍光地区的鸟"）蛋壳的沿海平原"几乎完全覆盖着一种'萨特拉纳'*satrana*草原（肯定是由一种退化的地表所构成[30]）"，这个位于安帕西梅纳以南的地区叫做安凯贝，意思是被清理土地的人或牧人烧过荒的地方。

根据P.韦兰的见解，曾经作为调查对象的三处沿海遗址，使我们发现了一种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居民，这种文化特征表现在"陶器的风格（盆、坛、带足碗）、使用绿泥片岩（盆、碗）和食用塔螺"。考古学家们估计，这座遗址至少被人们使用到15世纪中叶，而且早在9世纪甚至7世纪时就有人居住。[31] 在那些早期年代里，渔民已经懂得

---

[26] H.佩里耶·德－拉－巴蒂，1936年。

[27] 同上，第143－144页。最近一次调查见C.沙尼德（C. Chanudet），1979年。

[28] R.巴蒂斯蒂尼（R. Battistini）和P.韦兰，1971年，特别是年代的测定。参阅R.巴蒂斯蒂尼，1979年。

[29] 考虑到在北部经常把岛屿当作牛栏，人们真想把*Nosy Valasolo*译成"一个替代围栏的岛"，但如是这样，正常情况就应是*Nosy Solovala*，因为solo只作为名词用。

[30] R.巴蒂斯蒂尼和P.韦兰，1967年，第xix(a)页

[31] 碳－14年代测定：基戈希（Kigoshi）：GAK380：1200年±140基点；GAK692：1090年±90基点；GAK350b：980年±100基点：最大范围为+610年到+1070年。

如何炼铁和制玻璃，而且与阿拉伯－波斯贸易区有联系。[32]已发现的贝壳（塔螺、牡蛎、蝾螺等）有些肯定主要是供食用和作工艺品用的（如用蝾螺雕刻的汤匙），但数量较少，而能制香料*fimpy*的骨螺如今仍然是马达加斯加穆斯林“印度人”搜求之物，而它的名字正如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在达拉菲菲这一名字中可以找到。（692）

另外几处至少部分地属于本卷论述时期的遗址在本岛南端当今安坦德鲁伊地方发现。由于从来没有欧洲人的资料提到过这里有人类早期居住的明显迹象，人们一直到最近还认为这些遗址到18至19世纪才有人居住，尽管这里的人口相对稠密并且似乎一直延续到16世纪。这些遗址基本上分为两组，都位于马南布武河（“充满陷阱和漩涡”之河）两岸，其中塔拉基[33]（“好景”）遗址横跨河口，另一处安德拉努苏阿（“清泉”）遗址[34]位于马南布武河与安德拉努苏阿河的会合处，部分地被宏伟的曼达（n－d）－雷菲拉哈特拉（“建立等级和秩序的伟大人物的石堡”）所占（46公顷）。在这两组遗址之外还有河流上游的安达鲁（“树皮、毛皮、皮革”或“达鲁之脚”）遗址[35]，它是由马西拉内（“卓见、智慧、聪明人物”）遗址（25公顷）和安布尼法纳内（“高踞于水蛇、蛇、坟墓之上”或“与居统治地位的九头蛇、蛇、坟墓同在”）遗址（6公顷）组成。这一组遗址没有得到确认的绝对年代，但是明显地与诸如曼达(n－d)－雷菲拉哈特拉－安德拉努苏阿这种河旁遗址和石堡属于相同的文化，在当时已有人烟的地方可以追溯到现在已经发现各种动物物种亚化石的时期。

口头资料（包括“达拉菲菲故事集”）像文字资料一样没有提到这些遗址，那里的居民，诸如住在安德拉努苏阿的居民，是主持各个群体都参加的典礼仪式的当地组织的一部分（参考在安德拉努苏阿垃圾堆中发现的瘤牛遗骸的性质[36]），但是他们已在这个地区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那里的居民对于久远以前的前人已是毫无所知。碳－14年代测定所得出的结果令人感兴趣[37]：它们指出的最大极限时间是＋940年到＋1310年，较大的可能是11世纪。仍然留待进一步作出解释的是，哪些从塔拉基输出的财富是由定居在内地的居民开发的。迄今为止，所有的观察报告都未能提供出确切的答案。

南部在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开始受到干旱的影响。10世纪时的气候条件肯定和11世纪时不一样，这可能意味着马南布武河曾经是流量比较大的河流，也没有像今天那样巨大的季节性变化。（693）当时河的上流穿过森林地带，这就使部分依靠金属制造的当地经济生活有了发展的可能，金属制造是需要耗费大量燃料的。这里的金属制造包括铜和铁，古时使用的矿藏已经发现，与北部贝马里武河一带的铜矿石颇不相同，并且还发现了古代采矿的遗迹。然而，后来大走红运的铜最初似乎只用于手工装饰品，主要是用于制造带有一个断口环的“万戈万戈”（*vangovango*）手镯。这种手镯远在伊鲁杜也有发现，甚

---

[32] R.巴蒂斯蒂尼和P.韦兰，1967年，第xix(a)页。P.韦兰，1975年，重复1967年文本的内容，但用“9到11世纪”代替了“7到9世纪”，而未作进一步说明。

[33] R.巴蒂斯蒂尼、R.韦兰和R.拉松（R. Rason），1963年。

[34] C.拉迪米拉希（C. Radimilahy），1980年，1981年。

[35] C.拉迪米拉希，1980年。

[36] D.拉萨缪尔，1983年。

[37] GIF　4571：920年 ± 90基点；GIF　4570：730年 ± 90基点；对塔拉基：840年 ± 80基点。

至当它已经用银制作时仍然称为哈巴（*haba*），这里物品名称与语言的关系再一次使人深感兴趣，在非洲大陆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范畴中，古语的“哈班”（*haban*）一词和库鲁语的“萨班”（*saban*）一词都是铜的意思[38]；在马尔加什语和科摩罗语中今天“萨巴”（*saba*）一词仍然指铜[39]。

铁的开采量很大。但铁器制造似乎不是在当地进行，因为物种史研究说明铁的一般间炉做法不足以解释一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大量的矿石开采遗迹（灰烬、木炭和铁渣），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发现铁制品；在那个时期的遗址里，迄今只发现一个手镯（在安德拉努苏阿遗址），一个鱼叉和鱼钩（在塔那基遗址）。此外再加上——在尚未证实存在石制工具的地方——脊骨上有刀和斧的痕迹（安达鲁遗址、安德拉苏努阿遗址）。毫无疑问，冶炼制品大部分是通过塔拉基出口；塔拉基的发展（姑且不提它的建立），看起来与它作为内地出口物品出海口的作用有联系，而且它显然也不限于出口冶炼制品。

安达鲁[40]这个地名和在那里发现的许多幼畜的骸骨说明当地的人们曾大量食用幼畜。毫无疑问这与当地居民的烹调口味关系不大，而是需要在这些幼畜的皮毛（*daro*）被荆棘和树刺划破弄坏之前就赶快把它们杀掉。羊皮可能是当时位居第二的出口物品。很有可能为取羊皮而出现的大量剩余羊肉只能用当时已为人所知的盐腌和烟熏技术保存起来，这些保存起来的羊肉自然而然有可能成为位居第三的出口物品。在海运繁忙的时候，这种肉很可能绝大部分是用来装船，但其中有一部分用于满足当地消费也完全是可能的。现在已相当肯定，南部的内地居民是按照传统的马尔加什方式制作食物[41]的，他们在煮熟和精致地切割好肉的基础上，[42] 采用非常高超的烹调技术，他们不缺动物蛋白质。 **694**

除绵羊外，人们还饲养山羊与牛，只是数量似乎较少。这些牲畜供食用已为当时人们饮食的残余物所证明。残余物还包括人们当时食用的各种猎物（鸟类、豪猪和一些小的啮齿动物的骨头）和水产品（鱼骨头、蟹爪、海胆壳、淡水和海水贝壳）。至于人们食用何种植物，在历史传说中没有提到，也没有这方面的考古证据；无疑，至少应包括当时这个地区已有而本岛最早栽培的那些植物：薯蓣、芋头和类似的植物；这些植物今天仍能在树林里采集到。除了那里到处可以找到并有多种用途的葫芦外，食用植物还可以加上天意安排的马达加斯加长春花。自古以来马尔加什水手就知道这种长春花，从很早很早的年代开始它就在各个地方的水手中传播开了[43]。严格地讲，长春花根本算不上可以食用的植物，但是它的叶片能够使人减少食量、消除饥饿的折磨，从而在南方赢得了“通加”（*tonga*）——“保证我们能到达目的地”的美名。的确，人们无需深入内陆腹地就能得到长春花，因为它是在海岸边随处生长的品种，甚至在盐碱地区也能成活。

---

[38] G. 费朗（G. Ferrand），1909 年。

[39] M. 艾哈迈德·沙曼加（M. Ahmed Chamanga）和 N. J. 盖尼埃（N. J. Guenier），1979 年，但要注意，在马尔加什语中，萨巴（*saba*）有时也有银的意思。在斯瓦希里语中，沙巴（*shaba*）才是铜的意思

[40] 这个名词也可能指在上文讨论口头资料时提到的可以出口的植物。

[41]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1977 年、1981 年。

[42] D. 拉萨缪尔，1983 年。

[43] P. 布瓦托，1977 年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船能轻易驶进塔拉基，把长春花带上，就像今天独木舟做的那样。

位于东海岸的塔拉基一块地方经过勘探只发现渔民的一个居住点（外加鱼叉、鱼钩和使鱼线或鱼网下沉的坠子）；屋内的日常用品都是十分简单的用具，无法和内地遗址发掘出来的东西（多种多样和非常华美地绘饰的陶器、各种手饰等）相比较。但是，正如在伊鲁杜遗址一样，发现用蝾螺壳雕成的汤匙，也如在安达鲁和安德拉努苏阿的遗址一样，当地陶器上涂有并无明显使用目的的石墨痕迹。这种涂饰的陶器（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陶器）在马达加斯加以外地区，似乎只在东非（莱莱苏传统）和南部非洲（戈科梅雷－济瓦－齐佐传统）的某些陶器以及在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地区的沙萤－卡拉奈传统（特别是古占婆）的陶器上发现过。[44] 在马南布武河上游一带的遗址发现有绿泥片岩做的使鱼网下沉的坠子和模仿石器的陶器以及海生物和来自海外的产品（尚未确定确切日期的阿拉伯半岛刻花陶器和其他进口陶器，非洲和亚洲的象牙耳环）。这构成了最后的证据，说明塔拉基并不是一个萨鲁德拉诺型的渔民基地而必然是上述所有物品的转运点。进而言之，我们姑且不提西海岸那些遗址；即使是这些位于高原、俯视业已进行过勘探的沙丘遗址的遗址群，对于仅仅以捕鱼维持生计的人来说离海实在太远了，而它又占有如此庞大的面积，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人联想到必然存在另外一种类型的生产活动，譬如进行大规模的捕鱼，其产品必然有一部分像羊肉那样烟熏和出售。但是这些设想尚有待证实。

695

这种缺乏资料的状况从单个遗址水平上已经可以感觉到，如果考虑到全岛范围，情况就更加突出。但是，只要进一步系统地针对河口各个遗址、上游各地、以及整个流域两岸具有经济战略地区进行认真、深人的研究，无疑很快就能逐步重现马达加斯加生态和政治史上这一关键时期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情况。目前已经掌握的考古资料以及从物种史研究和口头传说中得到的资料加在一起已经表明这里存在引人注目的文化上和物质上的统一，它来自马尔加什文明中至今仍然充满压力的那些观念以及这个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物质文化的特征。其中某些东西——特别是进口的陶器——清楚地证明马尔加什的有些族群是整个关系网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关系网包括传统研究先前未曾涉及的一些地区：一边是沿南中国海大陆的那些国家，另一边则是莫桑比克海峡沿岸的那些国家。而这必定使得资料的搜寻工作也扩大到这些“新”地区，只有掌握这方面的资料才能真正弄清楚马达加斯加的历史。

国际范畴中的马达加斯加

从详尽的口头传说资料到由考古研究提供的更为直接的材料，已经为本卷论述时期

---

[44] 关于东部非洲，请特别参阅R. 索珀（R. Soper），1971年；关于南部非洲，则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7章；关于东南亚大陆，阅W. G. 索尔海姆（W. G. Solheim），1965年；对资料总的看法，阅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和J. P. 多梅尼契尼，1983年，第12－15页。在奢侈产品上涂有石墨的技术在大湖地区也有发现，但这是1450年以后的。

的马达加斯加地区与海外广大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多种线索，其中有的只不过是偶尔提及、也有的则是着重论述。但是，就目前掌握的文件中存在的空白点来看，现在还无法推断出本岛与世界各地间关系的真正性质或者关系的密切程度。口头资料的研究和考古研究工作提供的线索使我们有可能最后舍弃——但愿如此——短年代学的假设，它把马达加斯加有人居住时间确定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千年期结束的时候[45]；根据同一理由我们也可以随之而否定以此论点为基础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46]。早在公元1000年之前 **696** 很久马达加斯加就有人居住，至少在新近研究已发现新证据的地区是如此，这一点已不容再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如果把非马尔加什文资料包括在内(当然这类资料必须非常郑重地加以处理，因为马达加斯加这个名字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公元7世纪到11世纪这段时间（尽管关于时间也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再也不能被接受为马尔加什历史中开始有人居住的时间。就马尔加什的历史而言，由于人们对澳斯特罗尼西亚世界的知识贫乏而引起的一切争论确是到了应该永远平息的时候了。看来，用不到重新检查我们手中掌握的证据，人们就公认马达加斯加本岛是广阔海洋范畴的一个环节。

印度洋的航海史仍然有待书写；目前只有局部的研究成果，要据以作出完整可靠的综合尚有困难。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从11世纪以后的海路扩张（有多如繁星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至少可以使其他民族和其他地区在最早的航海业迹中所起的作用黯然失色。可能我们需要比以往更加注意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人在“昆仑”(*Kun－lun*) 的名义下集结的那些人，他们的航海技术在公元开头的几百年里，已经达到完美的地步，其中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的人可能占了大多数或者至少也是为数众多。但是这里所指的看来主要是东南亚大陆或岛屿以航海为生的民族。[47] 这些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的人是人们所公认的远洋航行大型帆船最初的建造者。从公元3世纪到9世纪的中国作家称这种船为“昆仑舶”（*Kun－lun bo*）并描述这种船装有平均50米长的编织风帆，可以载运500到1000人和250到1000吨货物。[48] 木筏和装有支桨托架的独木舟可能在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期末还继续把一些澳斯特罗尼西亚语系的移民载运到马达加斯加来，贫穷、勇气和对冒险的嗜好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然而，到了3世纪以后（甚或比这个时间更早一些[49]），要再把本岛有人类居住的时间同那些“脆弱的小船”的航海能力联在一起已 **697** 不可能。有些短年代学的支持者，无视G.东奎的警告[50]和保罗·亚当[51]所证实的通过锡兰、马尔代夫群岛、查戈斯群岛到达马达加斯加东海岸的迅捷途程，在沿印度洋海岸多少是长期性的定居点纷纷建立使长达几个世纪的缓慢进展告一段落之后，仍然把偶然

---

[45] 参阅J.普瓦里耶，1965年；P.奥蒂诺，1974年（a）；P.韦兰，1974年。

[46] 例如，参阅J.伯纳德（J. Bernard），1983年。

[47] 中国人最熟知的无疑是印度化的未来澳斯特罗尼西亚王国占婆的那些创建人。该王国诞生于公元137年，当时昆仑（*Kun－lun*）战胜了中国的日南（*Je－Nan*）郡；此后，占婆一直不服统治，并四出征战，包括反对中国，从理论上说占婆是中国的纳贡国。

[48] P. Y.曼古因（P. Y. Manguin），1979年。

[49] 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派遣到海外去的僧 都乘坐昆仑的船出海（见G.费朗，1919年3－4月，第245－246页）。因此，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186年）中国使节理所当然是乘“蕃人”的商船旅行的。

[50] 见G.东奎（G. Donque），1965年，第58页，他提出证据“证明根本不存在地理宿命论”。

[51] P.亚当（P. Adam），1979年。

事件视作普遍。固然，那些定居点确实可能存在；但是从很早时候起，它们的建立就不再是技术知识所促成的不可避免的需要，而是出于大洋空间使用者的战略和选择结果，这些大洋的航道许多年来就已经是人所周知，而它形成的经济与政治地理格局也已为人们所认识。因此，我们今天体会到，对于古时候的澳斯特罗尼西亚人来说，向马达加斯加移民（如果不一定是发现它）很可能已经是主观无法控制的必然趋势。

如果人们同意是澳斯特罗尼西亚人最早驶向马达加斯加（该岛的居民、语言和文化都打上了澳斯特罗尼西亚人的烙印，近年来的研究工作中从来没人对这一点产生过怀疑），根据上面谈到的证据，人们有充分理由认真考虑这个岛当时已被纳入供应多种贵重物品的区域间贸易体系的假设[52]。木材、堵缝胶、芳香植物和调味品从非常早的时候起就由本岛通过采集技术提供各地；所供应的物品包括看来是这种贸易中最赚钱的物品之一的香樟。用保护性的采集技术来开发香樟是古代占婆的专长[53]。

无可否认，这一假设与许多已被人们接受的观点有矛盾，它包含的特征和那些已经牢固确立起来的假设相比还非常脆弱。这个假设首先立足于澳斯特罗尼西亚人在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开始时就已经参与了在西印度洋运送人员和货物的活动。多种证据表明，非洲周围可能出现过“黑人船”[54]、《红海巡航记》一书提到阿扎尼亚北部海岸装有编

698 织风帆的大型帆船[55]；托勒密提到非洲南部海岸有高大“吃人的埃塞俄比亚人”[56]；6世纪时红海出现过可能属于占族[57]人的单舵帆船[58]。这一连串J.I.米勒提出的事实还可以加上下列事实：在东非种植来自东南亚的香蕉树已是历史十分悠久；椰子油在《红海巡航记》一书所说的年月是通过拉普塔出口的；塞雷斯人[59]乘骑的战象早在公元3世

---

[52] B.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和J. P.多梅尼契尼，1983年和1984年。

[53] G.孔多米纳斯（G. Condominas）的个人通讯，根据路易斯·孔多米纳斯（Louis Condominas）收集的文件《Les Moïs de Haut Son－Tran》

[54] 见*kolandio phonta*一词。此词在《红海巡航记》一书指的是，“航行在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船”（Chryse）（P. Y.曼吉因，1979年）。某些学者把此词和*Kun－lun bo*联系起来。此词前部与*Kuladan*或*Koladya*有关，许云樵（Xu Yun－qiao，音译）根据陈钦和（Chen Ching－ho，音译）的一篇文章提出，这二字专用于林邑王国（占婆的古代名称）的开国元勋们，意思是“黑人地区”，因而与昆仑的移民有关系。

[55] 但这些可能来自埃及船舶。

[56] 见H. N.奇蒂克（H. N. Chittick），1968年（b），第103页。在10世纪《印度奇闻》（*The Book of the Marvels of India*）一书中仍然谈到苏法拉地方的“吃人的僧祇人”，见A.米凯尔（A. Miquel），1975年，第172页。但是据皮埃尔·亚历山大（Pierre Alexandre）说，吃人的习性只限于很少数非洲族群才有，而且只是在中部非洲发现。

[57] P. Y.曼吉因，1979年，认为是属于“大陆人”，但同一位作者（1972年，第44页）却说越南人“从来不是航海民族”。

[58] 见H. N.奇蒂克，1979年（b）。

[59] 尽管“塞雷斯人”这个名称通常是指中国人，而李约瑟（J. H. Needham），1970年，第140－141页（他按照佩利奥的观点不恰当地把中国南部和东南部包括进去），也并不排除古代有“中国人”海上航行达到阿杜利斯港的可能性，但这些塞雷斯人并不是中国人，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战象，皇帝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驯象，就像从南部的“蛮人”那里得到丝、芳香植物、调味品等作为贡品一样。被怀疑支持塞雷斯人的占族人有战象，他们像印度人一样多次使用过这种“坦克”，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还在中国军队中引起恐怖。见M.马斯佩罗（M. Maspéro），1928年，第72页。

纪以前就出现于“埃塞俄比亚”军队中[60]；善长航海的占族商人参与了运往亚洲和中东[61]的僧祇奴贸易[62]；贾希兹认为僧祇人当时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黑人世界的团结和力量[63]。上述这些众多的因素再加上其他许多因素都说明人类相互间的接触历史悠久，并且已经持续很长时间。 699

另外一系列因素在质和量方面的重要性尚需一段岁月才能作出评价，它们是关于澳斯特罗尼西亚人的船舶向西航行这一极可能出现过的活动中马达加斯加究竟扮演什么角色。J. I. 米勒在一部遭到不少批评的著作中把本岛纳入这一贸易的时间定得非常之早[64]。在我们看来，根据口头资料和考古研究发现的证据（正如J.I. 米勒所认为的那样），马达加斯加不仅是保持香樟和肉桂之乡商业秘密的屏幕（人们错误地以为它在非洲之角），而且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还是盛产古代和中世纪鼎盛时期国际贸易中许多重要物品的地方（主要包括沉香木[65]。此物J.I. 米勒认为就是来自“香樟之路”的 *tarum*。此外马达加斯加的优势在于一方面远离竞争激烈的船队穿梭航行的地区，另一方面却又靠近一些重要口岸，特别是靠近供应埃及货物的非洲港口并通过埃及供应地中海地区[66]。毫无疑问，马达加斯加东海岸在本卷论述的时期里向外供应大量物品。非洲海岸不出产某些具有重要栽培价值的植物，譬如胡桐[67]，我们甚至更倾向于相信澳斯特罗尼西亚人是先

---

[60] 见埃利奥多鲁（Héliodore或Heliodorus），1960年，第3卷，第59－61页。有关象的贸易，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185页。

[61] G. 马斯佩罗，1928年，第34页，翻译《岭外代答》（*Ling Wai Dai Da*）第2卷，第11页中说，“许多占族人是奴隶贩子，他们的舢板船用于运人而不是运货”。占族人出卖的奴隶或是他们抢劫所得的、或是出非常高的价格买来的、或是用“香木”交换来的，见G. 马斯佩罗在同一页引用赵汝适（Chao Ju－Kua）所写的《诸蕃志》（*Zhu Fan Zhi*）。这些奴隶一部分来自澳斯特罗尼西亚东部各岛（摩鹿加群岛等）；但周去非（Zhou Qu－fei）在1178年出版的同一本《岭外代答》中又断言有些人来自昆仑僧祇即“西南海中”的“昆仑的僧祇地方”。

[62] 据我们知道，自公元724年起中国就出现僧祇奴（室利佛逝帝国的努山塔里亚统治者向中国朝廷进的贡），其中许多人原来预定是给阿拉伯人的。据周去非说，阿拉伯人出高价购买僧祇奴，专门把他们当作搬运夫使用（见G. 费朗译文，1919年，3－4月，第253页）。

[63] 《黑人比白人优越书》（*Livre de la Supériorité des Noirs sur les Blancs*），由让·德维斯（Jean Devisse）提供的未曾发表的译本。其中所指的黑人世界包括非洲的僧祇人，扎巴杰的澳斯特罗尼西亚人（在那里称为努山塔里亚人）以及中国东南部的“华人”。（关于这点见A. 米凯尔，1975年，第78页，他把扎巴杰（Zābadj）看成是Djāvaga的同源词，也把它看成是整个苏门答腊－爪哇联合体或单独指苏门答腊）。但是Zābadj在梵文中相当于Suvarnadvipa。见比鲁尼（al－Bīrūnī）、G. 克代斯（G. Coedès），1964年，第264页引用他的话，它有时指大陆的部分（见G. 克代斯，1964年，第160页），此词或许和托勒密所说的Za Bai有关。一些学者认为Za Bai就是占婆（见G. 马斯佩罗，1928年，第2页）。

[64] J. I. 米勒，1969年，他在171页中把马达加斯加有人类居住的时间说成是基督纪元前第二个一千年。肯定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认定这样早的日期，一些人体人类学家提出的时间最早，从A. 拉库图－腊齐曼南加（A. Rakoto－Ratsimananga）在1939年确定为公元前550年到R. 富尔凯（R. Fourquet）等人1974年在巴斯德学会提出一个“前达罗毗荼人－原始澳大利亚种人血统”假设。也见注9。J. I. 米勒在他的书中并未论述本卷所述时期。

[65] 见E. 德－弗拉库，1661年，第131页。

[66] 例如见J. 勒克朗（J. Leclant），1976年，第270页。他在从东非进口的物品中提到香樟，埃及在第二十五王朝时期（公元前664－525年）转手向地中海再出口。

[67] 胡桐树在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各地均可找到，只有非洲除外，这一空白导致H. 佩里耶·德－拉－巴蒂把这次海洋移民定在非常早的时期，见Y. 卡巴尼斯（Y. Cabanis）等人，1969－1970年，第280页。但这种树也为船舶提供木板和堵缝胶，它是印度化的族群为了宗教仪式和王室典礼的需要而有计划地种植的一种植物，见A. G. 豪德里库（A. G. Haudricourt）和L. 海丁（L. Hédin），1953年，第541页。关于这种树在马尔加什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见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1983年，第483－486页。

到出产这种植物的马达加斯加而后才到的东非。他们带来了新的移民和马达加斯加没有的货物，以供当地消费和作对外贸易之用。

当然，上面我们所谈的，全是本卷所述时期之前的情况。我们相信早在这个久远的时候，马达加斯加就已经大量参与印度洋贸易，很明显下一步是进而了解 7 世纪和 11 世纪之间它参与印度洋贸易的各阶段。我们这样做并没有向我们自己或读者掩盖这样一 700 个事实，即这个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框架所根据的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假设。我们肯定（以在马达加斯加进行的调查为基础）本岛在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期开始时就已经积极参与了海洋贸易。

马达加斯加商人遇到的第一个困难看来与阿克苏姆和拜占廷因反对波斯萨珊王朝结成的联盟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有关。萨珊王朝征服了阿拉伯半岛南部（公元 570 年）并将其控制到公元 628 年它最后一位总督皈依伊斯兰教 ㉘，这样就成功地部分接管了南阿拉伯半岛在印度洋（包括红海在内）的海上贸易的遗产。波斯在被征服（很快也就改宗伊斯兰教）之后，某种程度上被纳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主义政策。在阿拉伯征服埃及（公元 641－642 年）之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终于完成了对西方的贸易通道的全面控制。

马达加斯加本岛对这一局势的最初适应（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与讲波斯语的进口商人发生关系上明显地表露出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马达加斯加出土的资料中能够察觉得到他们的影响。加之，他们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非洲海岸。但是，由于贸易伙伴的部分变化以及跨越陆地的商道的中断，不仅香料贸易日趋衰落，其他与阿拉伯－波斯世界激烈竞争的产品的贸易无疑也同样趋于衰落，这大概也妨碍了香樟贸易，这种商品一直与从 4 世纪以来始终得到萨珊王朝支持的锡兰进行竞争。当 7 世纪末和 8 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南部发生骚乱 ㉙ 时，库默尔人（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看来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登上装有舷外桨架的船去征服亚丁，这事件或者应该看作是目的在于恢复局势的一次部分成功的尝试。这些征服者中的有些人在也门定居下来，并且把亚丁变成他们的起始港，每个季节都有人从那里出发，“顺着季风出航”，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与他们出生地方之间建立起一条直接航道。据伊本·穆贾维尔称，在 13 世纪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要用三次季风才能完成这条航道的航行。因此，不管怎样，他们有能力和他们的对手竞争，因为阿拉伯和波斯的航海者在 10 世纪以前似乎根本不知道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只是到 12 世纪时才对这两个地方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虽然他们经常沿着东非海岸航行，并且不断在那里购买马尔加什的产品。

701　9 世纪一系列严重的动乱影响了西印度洋的正常生活。目前，弄清楚当时具体的贸易状况一时还有困难。在这个世纪和紧接着的几个世纪里，阿拉伯文提供的资料使人感到，马尔加什航海者一般似乎仅仅航行到亚丁为止。这些人长期与穆斯林国家接近，导致其中某些人皈依伊斯兰教，人们甚至设想，有些从库默尔到亚丁和进入波斯湾的航行最

㉘　见 J. L. 米勒，1969 年，第 220 页。

㉙　我们赞成 O. C. 达尔（O. C. Dahl），1951 年和 H. 德尚，1972 年，认为“法老的帝国”就是“古罗马在埃及的统治”。

终是否成了阿拉伯－波斯贸易网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看来已能肯定，那就是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马尔加什航海者指引下，阿曼和撒那威的水手知道了通向本岛北部的直达航道，在本岛北部翁贾齐人那里仍能找到他们最早的定居点⑳；同时这些水手也来到坎巴鲁岛。据马苏迪称，该岛“居民相当混杂，既有穆斯林，也有崇拜偶像的僧祇人”，不能排除这个岛就在库默尔境内某处，应该向西北面寻找㉑。但是，不管坎巴鲁岛的准确位置在何处，它清楚说明，至迟到10世纪开始时，马尔加什人就不再那么强烈地感受到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竞争的压力了。当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昆仑人利用穆斯林在广州遭到屠杀（公元878年）所造成的局势和室利佛逝王国国力上升的有利条件，通过对海峡的控制，赢得了对对方海上力量（一面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另一面是中国人）的真正优势。但事情并非就此停滞不变。

对海峡控制，可能一直延伸到巽他海峡，从而成功地把室利佛逝王国境内的马六甲半岛变成来往中国所有船舶的终点站。中国已成为当时最大的市场之一，印度洋西南各国被切断与地中海的贸易后纷纷转向中国。马达加斯加，至少它的东部继续是属于昆仑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自然参与了这一贸易。对公元945年进攻坎巴鲁岛的事件，有人认为阿拉伯文资料中称为瓦克瓦克的进攻者来自马达加斯加㉒。伊本·拉基斯在《印度奇闻》(*The Book of the Marvels of India*) 一书中对这次进攻的解释人们是满意的他认为，远征的目的是为了俘获僧祇人充当奴隶，并找寻适合于他们国家和中国的产品（象牙、玳瑁壳、豹皮和龙涎香）。事实上，这个解释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不在于进一步追究这些众所公认的动机是否合适，而在于它引出这样一个事实，即马达加斯加本岛确实存在一个通过与非洲大陆贸易而得到供应的市场，它从非洲大陆得到象牙和豹皮——也许还有僧祇俘虏——。把这次远征放在马尔加什与中国贸易发展的来龙去脉中去解释远远不如放在穆斯林世界与伊本·拉基斯称之为瓦克瓦克的昆仑世界激烈竞争的来龙去脉中去解释更为合适㉓ **702**

尽管在整个这一时期海上掠夺和袭击经常发生，尽管更近一些时期的马尔加什历史也提供这方面突出的例子，然而这次从南面进攻坎巴鲁岛却是一个有“一千艘船”参加规模庞大的远征，不单是马尔加什人从东海岸发动，而且也包括来自远东的瓦克瓦克人，后者对遥远南方的远征（到处都有证据）㉔，其动机不可能单纯是寻找物品，这事他们可以交给他们在马达加斯加的盟友去照管，况且这些物品在他们自己地区也很丰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他们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商品。所有这一切都向我们说明，对昆仑或瓦克瓦克说来，最重要的是抵制得到已经伊斯兰化的马尔加什人支持的穆斯林向南

⑳ 翁贾齐人的历史目前还没有弄清楚，他们在局势紧张的时期被当作“非阿拉伯人”遭到排挤，并被描述成“来自麦加沙漠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在扎非（n－d）－拉米尼亚人之前来到本岛北部的 目前从词源学角度看，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仍然认为这个名字和来自阿曼的水手们所称呼的 Azd 一词有关系。

㉑ A 米凯尔，1975年，第171－172页，他只排除坎巴鲁岛位于马达加斯加的可能性，因为他看不到这种航行具有什么经济利益，而我们则认为，可以排除坎巴鲁岛位于库默尔境内的可能性，库默尔包括科摩罗群岛在内

㉒ 同上，第173页，反对这种解释的是R 莫尼（R. Mauny），1965年，第7－16页。

㉓ 详细的解释见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和J. P. 多梅尼契尼，1983年和1984年。

㉔ 见A. 米凯尔，1975年，第173页。

推进，并且保护运输金矿及其他金属矿产的通道。人们也许可以接受这个看法，马达加斯加南部的铁，被开采它的人保护得如此周密，可能这种保护措施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值得为垄断它而作战的资源[8]。

像公元945年那样的远征似乎在一个长时期内延缓了穆斯林海上力量向前推进，但是昆仑世界的一致性已经受到改信伊斯兰教的冲击。可能正是这个时候，像扎非(n－d)－拉米尼亚人那样的迁移人群离开了红海海岸。在这同一时期，本岛开始与东非发展关系（东非本来情况不一样，但当时也伊斯兰化了），并且可能也向那里出口它生产的绿泥片岩制品，正像10世纪以后基尔瓦的进口品那样[9]。

一方面是马达加斯加与昆仑世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本岛与阿拉伯－波斯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两种经济和海上关系的新估价对本岛内部生活提出了新的问题。《世界边缘》（*Hudūd　al－'Alām*）和舰船司令西迪·阿里·塞莱比的观察报告（两者相隔六个世纪，但观点却十分一致）表明，南部的古老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坚决地抵抗新的影响。这种情况应当导致研究马达加斯加的专家重新审查“阿拉伯”影响问题，这种影响已经使用得非常惯常，用来解释古代马尔加什文化的各种特征，但是这种审查主要是关系到11世纪以后时期的研究，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中需要作出观点上重大改变的主要是必须及时综合写7世纪到11世纪这一时期历史目前能够得到的全部资料的成果。这样做时，有许多事需要认真对待，人们不仅要认识我们目前所掌握这个时期的资料还存在不少空白点，同时还要认识我们对以前时期无知的严重程度。

703

迄今为止，我们把过多的影响一概说成是阿拉伯的影响，这反而引起人们的怀疑。因此我们能够预见到印度洋上马达加斯加7世纪到11世纪之间的历史中，必然有许多地方（在本章中，我们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今后要加以修改。于是有一种巨大的诱惑力让我们说——其实，这也是我们得出的结论——在最近的将来，我们研究工作中最紧要的问题恐怕不在于确认本岛过去的历史中哪一页是重要转折点，也不在于确认历史上已有定论的或者实际上已有定论的事实，而在于确认“通过实验”才能确定的事实，以及认识不同种类的原始资料鲜为人承认的同等重要性，并且应该平等地系统地全面加以利用

---

[8] 古人在公元974年的进贡，包括“40磅铁”（见G. 乌斯佩罗，1928年，第121页）。

[9] 见P. 韦兰，1975年，第937页，在讨论H. N. 奇蒂克的假设时，他同意J. 德维斯曾多次表示过的意见，H. N. 奇蒂克只注意到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进口物。

26 散居在亚洲的非洲人

Y. 塔利布
根据 F. 萨米尔供稿编写

虽然有证据表明，早在远古时代，非洲人就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其他大陆，但是直到本章所述的时期，他们在中东穆斯林国家、印度次大陆、马来群岛和远东各地人类活动各种领域中的作用才渐见重要。不幸的是，有关这些活动的材料目前甚少掌握，且散见于用各种语言（主要是各种东方语言）写成的著作和文件中。此外，对非洲人移居亚洲的问题，迄今尚无系统的学术研究[1]。因此，本章只是把记述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早期关系的资料以及非洲人在上述各地区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从事活动的现有资料汇集在一起的一种初步尝试。 704

非洲同阿拉伯半岛的早期接触：伊斯兰纪元前的时期

大致是在公元1世纪后期或2世纪初期，某一位佚名作者写了《红海巡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2]一书，描述了此前几个世纪中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同东非沿海地带的商业联系。书中讲到也门有个富裕强盛的奥桑王国[3]，因同东部非洲有广泛的商业来往，成为一大贸易中心。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它沦为卡塔班的藩属，从此一蹶不振。

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确定这些贸易往来最早建立的时间，也不清楚古罗马之前时期的贸易往来向东非沿海地带究竟延伸到多远。A.M.H.谢里夫[4]令人信服地指出，其大致年代是公元2世纪。在古罗马时期整个东非海岸地带的贸易往来实际上处于垄断之下。 705

古罗马帝国经济上趋于统一和富裕，给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商业活动增添了活力。国内市场对象牙等异域物产的需求日益增长，"通过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希木叶尔国"，东部非洲必然被吸收进"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5]。这种状况加上"政治统治"和"社会渗透"，造就了一种众多血统混杂、善于漂洋过海做生意的人，这种人充

---

(1) 本章草稿写就后，伊万·塞蒂玛（Ivan Sertima）主编的关于古代非洲人在亚洲状况的著作于1985年出版。
(2) 见G.W.B.亨廷福德（G.W.B. Huntingford），1980年。
(3) 详见H.冯－维斯曼（H. Von Wissman）和玛里亚·赫夫纳（Maria Hofner），1952年，第[illegible]页。
(4)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2章。
(5) 同上，第561页。

当了盛行一时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走卒和当地代理商的角色[6]。

公元4世纪上半叶，阿克苏姆正式皈依基督一性论教派，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7]，使该地和当时主要的基督教强国——拜占廷帝国——建立了极为紧密的联系。其结果是阿克苏姆人成为拜占廷外交政策、尤其是商业和宗教政策的鼓吹者。这促使埃塞俄比亚深深卷入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事务，最重要的一个表现是，埃塞俄比亚于公元525年入侵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8]。

早期的阿拉伯半岛[9]和基督教[10]作家猜测，这次入侵也门，主要是由于也门的基督 706 教徒普遍受到迫害，发展到希木叶尔国王进而大批屠杀奈季兰[11]城中主要的基督一性论教徒居住区的居民。国王祖·努瓦斯[12]改变原来的信仰，皈依犹太教，并成为该国亲波斯派的领袖。为替教友报仇，阿克苏姆国王埃拉·阿什巴在拜占廷怂恿下，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讨伐，远征军越过曼德海峡。祖·努瓦斯被推翻，一个叫苏迈法·阿什瓦的当地基督教徒被立为统治者[13]。

然而，正如阿拉伯半岛南部发现的碑文所载和普罗科皮乌斯所指出的那样[14]，入侵的真正动机是经济性的。拜占廷社会对奢侈品的需求十分之大。而这些稀有、珍贵的商品、尤其是丝绸的贸易，实际上掌握在波斯人手中，他们不但索价很高，而且一定要用罗马黄金付款。如果这种贸易方式继续下去，将会导致罗马财富的大量流失，转而成为其对手波斯的利润。

因此，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公元527—565年在位），拜占廷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以埃塞俄比亚为媒介，建立起通向更遥远东方的南面海路，并力求防止这条海路落入波斯人或阿拉伯半岛南部亲波斯的人手中，以打破波斯对贸易的垄断。这一

---

⑥ “从这里起，离大陆两天水路航程，有一处叫拉夫塔的地方(取名自前述的搁浅船只)，这是阿扎尼亚的最后一个市场，那里经营大量的象牙和海龟壳。该地土人躯体魁梧，抢掠成性，各地都有自己的酋长。该市场由莫法里特酋长根据协定进行统治，该协定使它成为隶属于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王国的市场。毛扎人通过向国王纳贡而据有该市场，他们派出船只，船上的船长和代理人大多数为阿拉伯人，这些人与当地人一起居住并互通婚姻，从而熟悉这些地方的习俗和当地人的语言。”见G. W. B. 亨廷福德，1980年，第30页。

⑦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16章。

⑧ 这个日期系根据在古拉卜堡发现的碑文判定，该要塞卫护着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的古代港口和贸易城市卡纳。具体细节参阅K. 姆拉克（K. Mlaker），1927年。

⑨ 伊本·伊沙克（Ibn Ishak），1955年，第14-33页。

⑩ A. 穆贝里（A. Moberg），1924年，F. M. E. 佩雷拉（F. M. E. Pereira），1899年。

⑪ 关于公元6世纪时阿拉伯半岛南部发生的大事，见D. S. 阿特马（D. S. Attema），1949年；J. 里克曼斯（J. Ryckmans），1956年；S. 史密斯（S. Smith），1954年；N. V. 皮古莱夫斯卡娅（N. V. Pigulevskaya），1960、1961年。

⑫ 阿拉伯传说中以“卷发大公”的绰号称他，在其他材料中称他为“杜纳安”（Dunaan）（A. 穆贝里，1924年，第xlii页）。在《希米亚里特人》（*Book of the Himyarites*）一书中，他的名字叫“马斯鲁克”（Masruk），还有两种资料也用这称号。见D. S. 阿特马，1949年，第7页注（32）。在基督教文献中，他被称为“迪姆努斯”（Dimnus）、“达米安”（Damian）、“迪米亚诺斯”（Dimianos）或“达姆努斯”（Damnus），在阿比西尼亚文献中，他被称为“芬哈斯”（Phin'has）。贾瓦德·阿里（Djawād ʻAlī），1952—1956年，第三卷，第190页。在他皈依犹太教时的真名叫优素福·阿沙尔（Yūsuf Ashʻar）。S. 史密斯，1954年，第456页。

⑬ 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1954年，第189页，他在此处叫埃西米法斯（Esimiphaeus）。

⑭ K. 姆拉克，1927年，第60页；普罗科皮乌斯，1954年，第193—194页。

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公元535年，当地居民废黜了苏迈德·阿什瓦，拥立阿布拉哈⑮为王，此人曾是一名阿杜利斯⑯罗马商人的奴隶。阿布拉哈在位的绝大部分岁月，对当时敌对大国之间的长期纷争采取中立立场，使查士丁尼颇为失望。只是在他统治末期，才转而倾向拜占廷，于公元570年充当讨伐汉志的远征军先锋，向北进军⑰。这是一次注定要倒霉的行动。他的军队被击溃，且大批死于疫病⑱。这一年在阿拉伯经典文献中称"象年"⑲，据称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之年⑳，也就是在这一年，瓦赫里兹统率的萨珊王朝军队击败了埃塞俄比亚，结束了它对他们的统治㉑。 707

伊斯兰纪元前的时期和伊斯兰纪元早期

伊斯兰纪元前阿拉伯半岛上的黑人

阿拉伯半岛在地理上邻近非洲，两地通过红海很久就有联系，非洲人很早就大量出现于阿拉伯半岛。他们有男有女，血统也各不相同，不过绝大部分来自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努比亚和非洲东海岸，这些人来到这里时身份各别，但绝大部分是奴隶。另外还有随入侵军队来到这里的大批埃塞俄比亚战士，肯定是留在了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其他地方，到一定时候，就被数量上占优势的阿拉伯人同化了。阿拉伯文学古籍保存着一些关于在伊斯兰教诞生前生活在阿拉伯半岛上的非洲血统的人的种种分散的记载。

在伊斯兰纪元前的时期（蒙昧时代，*Djāhiliya*），有几个诗人被通称为"'*Aghribat al-'Arab*"（阿拉伯的乌鸦），这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把黑皮肤遗传给了他们。其中最有名的是：安塔拉·本·沙达德㉒、胡法夫·伊本·纳德巴㉓和苏莱克·本·苏莱卡㉔。

⑮ A. F. L. 比斯顿（A. F. L. Beeston），1960年，提到穆斯林历史学家所叙阿布拉哈的生活细节大部分系出于随意加在著名人物头上的民间传说。更确切的资料还是应参照普罗科皮乌斯的叙述，1954年，第191－194页，和阿拉伯半岛南部出土的碑文残片。S. 史密斯对阿布拉哈或阿布拉莫斯身世的现存资料曾作过去伪存真的研究，1954年，第431－441页。

⑯ 普罗科皮乌斯，1954年，第191页。

⑰ 穆斯林经典文献把这次讨伐的动机说成是阿布拉哈对圣地麦加的妒忌以及他妄图把他在萨那的教堂取代麦加成为全阿拉伯半岛的朝觐地。见A. F. L. 比斯顿，1960年，第103页。并见P. K. 希蒂（P. K. Hitti），1970年，第64页。

⑱ 伊本·伊沙克，1955年，第26－27页。

⑲ 塔百里（al-Tabarī），1329AH，第30卷，第195页。C. 康蒂·罗西尼（C. Conti Rossini），1921年，对阿比西尼亚人带着象队进攻汉志这种说法提出异议。

⑳ M. 罗丹松（M. Rodinson），1971年，第38页。书中认为这不大可能，通常公认的年份是571年。

㉑ A. 克里斯滕森（A. Christensen），1944年。

㉒ 如欲详细研究安塔拉，请见下列著作：A. 托尔贝克（A. Thorbecke），1867年；H. 德朗堡（H. Derenbourg），1905年，第3－9页；伊斯法哈尼（al-Isfāhānī），1868－1869年，第8卷，第237－246页。

㉓ 他父亲是巴努·苏莱姆的阿拉伯人，他母亲是一名叫纳德巴的黑奴。他举着他所属部落的旗帜，与伊斯兰教徒同时凯旋进入麦加。见伊本·库泰巴（Ibn Kutayba），1850年，第126页；伊斯法哈尼，1868－1869年，第20卷，第2－9页。

㉔ 见伊斯法哈尼，第18卷，第133－139页。他们之中还有萨比特·伊本·贾比尔，人们更惯常地称他为法赫姆部落的塔巴塔·沙兰。他的母亲也是黑人。

后一位属于有名的行踪不定的“游侠”帮——“萨阿利克”*ṣa'ālīk*[26]，这个帮尽管有劫掠行为，仍以有骑士气概和荣誉感著称。但是，这批“乌鸦”中最卓越的还是阿卜斯氏族群体的安塔拉，他的母亲是一名叫扎比巴的阿比西尼亚女奴。

708　在安塔拉的父系部落同阿布·祖卜扬部落发生达希斯－加布拉[27]冲突的年代里，他正处于精力旺盛时期。他以勇猛有力而出类拔萃，为亲族争了光，终于获得自由，成为部落中受尊敬的一员。他创作的描述他所参加的历次战斗、世事盛衰和对阿布拉爱情的诗篇，被认为是伊斯兰纪元前时期诗歌中的最佳作，因此使他赢得穆阿拉卡特诗人[28]中最倍受尊敬的地位。由于他声誉远扬，以致在后来伊斯兰时期，出现了一首名叫“西拉特－安塔尔”（*Sirat Antar*，安塔拉的故事）[29]的非常流行的传奇文学组歌，其主题是赞颂他的功勋。他成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英雄。

麦加是商人之城，雇佣一支名为“阿哈比什”（*Ahābīsh*）的军队担负保护商路的责任，这一称呼同阿拉伯人称埃塞俄比亚人为“哈巴什”（*al－Habash*）有密切关系。虽然埃塞俄比亚人看来构成这支军队的中坚，但其中也有来自帖哈麦（沿红海海岸的平原）和也门的非洲奴隶和阿拉伯牧民[30]。很多阿拉伯资料都证实，“阿哈比什”充当城里贵族家庭的随从和护兵，起了作为重要军事力量的主导作用。这些资料还一再强调这些非洲“幸运士兵”的军事技巧、纪律和勇猛作风。

主要因为麦加居民属于古莱什族，人数不多，无法从本族募集一支大军保卫城市并保护他们广泛的商业利益，因此造成他们对雇佣军的严重依赖。许多“阿哈比什”军人后来积极参加了对新成立的麦地那穆斯林国家的讨伐，并参加了巴德尔和乌呼德两个战役。[31]

穆罕默德随从人员中的黑人

根据口头传说，在麦加首批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中有许多奴隶，其中有些是非洲人血统[32]。在穆罕默德布道的新宗教教义中，这些饱受社会歧视的人发现有可能获得人的尊

709　严和自尊，有机会加入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社会群体中，评判某个人主要看他对宗教的热忱和虔诚的行为，而不只是看他的社会或种族出身。因此，在先知传教困难的

---

[26] Y 哈利夫（Y Khalīf）对此作了详细叙述，1959年。

[27] “冲突是由于名叫达希斯和加布拉的两匹马之间的比赛引起的，在比赛进程中，阿卜斯部落遭贞祖卜扬部落奸计，后者的马才能获胜。”见 I. 戈德济赫尔（I. Goldziher），1966年，第14页。

[28] “该词直译为‘悬挂’，迄今尚无一满意的解释。后来编造的故事断言，那是指在乌卡兹市集上的诗歌比赛中获奖的诗歌，这些诗歌用金粉书写后挂在麦加的天房内”。H. A. R. 吉布（H. A. R. Gibb），1963年，第22页；J. 伯克（J. Berque），1979年。

[29] 参阅 G. 鲁热（G. Rouger），1923年；B. 赫勒（B. Heller），1931年。

[30] 参阅拉孟斯（Lammens），1916年；W. M. 瓦特（W. M. Watt），1953年，第154—157页；M. 哈密杜拉（M. Hamidullah），1956年，第434—437页。

[31] 名叫瓦赫希·本·哈卜的阿哈比什士兵是埃塞俄比亚奴隶，在乌呼德战役中杀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哈姆扎。

[32] “阿玛尔·伊本·雅西尔对我说，他见到真主的使徒时，使徒身旁仅有5名奴隶，2名妇女和阿布·贝克尔。”见布哈里（al－Bukhārī），1978年，第5卷，第24—25页。

早期岁月中，就有不少黑人和祖先是黑人的人皈依先知，他们在刚建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阿玛尔·伊本·雅西尔就是一名早期皈依的教徒。他的母亲苏迈娅，原是巴努·麦克木姆的古莱什族奴隶。他本人参加了去埃塞俄比亚的首批移民队伍，后来又回到麦地那，参与了先知领导的所有各项战斗活动。奥马尔一世哈里发（3/634－23/643年在位）任命他为库法城的总督，这是伊斯兰国家早期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作为热忱追随阿里使命的人，他后来在第一次内战期间的绥芬战役（37/617年）中死去。他也是伊斯兰圣训（*hadīth*，穆罕默德言行录）的传达者之一。[32]

早期追随先知的黑人中，最有名的是比拉尔·本·拉巴赫。他是一名埃塞俄比亚奴隶，母亲哈玛玛赫和兄弟哈立德也是麦加的奴隶。据早期的穆斯林资料记载，他"又瘦又高，双颊深陷，声音洪亮"。在被阿布·贝克尔哈里发买下并解放以前，他因宗教信仰遭主人迫害和拷打。他成为伊斯兰教第一个呼唤大家做祷告的宣礼员（"穆安津"，*mu'adh dhin*），参加过伊斯兰早期的所有战斗活动，包括在叙利亚进行的战役，最后在大马士革死于瘟疫（20或21/640－641年）[33]。他和其他黑肤"依附平民"（"马瓦里"，*mawālī*）对伊斯兰教的贡献，可用写先知传记的一位现代作家的话加以概括："担任平凡但又决不可少的普通教徒的任务外，他们始终不懈的虔诚、完全彻底的忘我，绝对没有思想上的怀疑和灵魂上的摸索，连同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不要求任何代价的服务，使他们成为在抨击对手时人们高举的典范。"[34]。

另一位早期皈依伊斯兰教并在军事上有过极大贡献的黑人是米克达德·本·阿姆鲁·阿斯瓦德，他也是先知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参加了所有的战斗活动。在巴德尔战役中，他是唯一骑着马打仗的穆斯林，因而被授予伊斯兰骑士（*Faris al－Islam*）的称号[35]。

信奉伊斯兰教的奴隶获得解放，成为先知和其他穆斯林显贵的依附平民。伊斯兰早期著作中不乏这一类的名字：拉艾·阿斯瓦德·哈巴希[36]；在巴德尔战役中倒下的米赫贾[37]；努比亚血统的阿布·拉基特，他被奥马尔·本·哈塔卜任命为"迪万"（*dīwān* 大臣公署）中的官员[38]；先知的一名信使拉巴赫[39]；好几次伊斯兰圣训的传达者阿布·穆瓦伊希巴赫[40][41]，和奥马尔哈里发的一个亲密助手萨利赫·本·舒克兰、 **710**

---

[32] 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131—132页，伊本·希沙姆（Ibn Hishām），1936年，第1卷，第279页，伊本·萨德（Ibn Sád），1904－1940年，第8卷，第1章，第165－176页。

[33] 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88页，伊本·萨德，1904－1940年，第3卷，第1章，第165－170页。

[34] M 罗丹松，1971年，第130页。

[35] 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134页。

[36] 伊本·萨德，1904－1940年，第3卷，第1章，第33页。

[37] 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78页

[38]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djar al－'Askalānī），1970年，第7卷，第352页

[39] 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72页；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1970年，第2卷，第452页

[40] 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73页。

[41] 同上，第72页。

穆斯林早期社会中还有一些解放了的女黑奴。如先知幼时的奶妈乌姆·艾曼·巴拉卡[42]，她是家中倍受尊敬的成员；先知女儿的婢女富达[43]；先知叔父阿布·塔利卜的女奴娜巴阿，据信她在穆罕默德夜间旅行去耶路撒冷时曾传达一条夜行（*isrā'a*）的[44]圣训。

穆斯林与埃塞俄比亚的联系

伊斯兰教创建（公元615年）5年之后，许多穆斯林为躲避麦加的古莱什族的迫害，逃难到邻近的埃塞俄比亚[45]。他们受到国王（*negus*，阿拉伯语称纳贾希 *nadjāshī*）[46]及其朝廷的热烈欢迎，开创了两大宗教群体间和谐关系的时代。伊斯兰早期传说中反映了这一情况。

根据一种记载，埃塞俄比亚国王（指阿沙玛·本·阿卜贾尔）正式宣告他信仰先知的使命[47]。该记载还提到这位国王派其子和一个约60名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代表团去觐见先知穆罕默德[48]，他们在海上半途时船只沉没，人员全部死亡。报道还说，先知获悉王子死讯时深感悲痛，为其灵魂超生作了特别祈祷[49]。

客居埃塞俄比亚，给这些穆斯林早期移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对他们新信仰的发展 711 产生影响。穆斯林古代传记资料“塔巴卡特”（*tabakāt*）列举了不少移居麦地那的埃塞俄比亚人皈依伊斯兰教，加入了追随先知的行列。他们被称为“埃塞俄比亚僧侣”（*ruhbān al－habasha*）[50]。其中有4个人的名字叫阿布拉哈，据说有一人是入侵麦加的阿布拉哈的孙子[51]。另外还有一人叫乌姆·哈比巴[52]，她是先知的配偶之一，流亡埃塞俄比亚时是一个女奴。还有记载称先知在麦地那时，身边有埃塞俄比亚国王的儿子和侄子[53]。有趣的是，这些穆斯林移民的孩子有许多都有埃塞俄比亚血统。

这些传说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穆斯林对埃塞俄比亚的态度。从而产生了许多颂扬文章，如伊本·贾乌齐（1208年逝世）写的《驱散阴霾，让黑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优良品质发扬光大》；苏尤提（1505年逝世）写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地位蒸蒸日上》和穆罕默

---

[42] 同上，第70－71页。

[43]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1970年，第8卷，第75页

[44] 同上。

[45] 首次迁移（希志来 hidjra）共有11个男人和4个女人。其中的著名人物是奥斯曼和他的妻子鲁卡娅，她是先知的女儿（见伊本·萨德，1904－1940年，第1卷，第136页）。几年以后，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迁移——83个男人和若干女人（伊本·希沙姆，1936年，第1卷，第353页）。

[46] 伊本·希沙姆，1936年，第1卷，第353页。

[47] 同上，第35和359页。M.哈特曼（M. Hartmann），把他的阿比西尼亚名字译成埃拉·萨哈姆（Ella Saham），见M.哈特曼，1895年，第299、300页。

[48] 伊本·希沙姆，1936年，第1卷，第366页；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19 0年，第1卷，第300页，

[49] 见瓦希迪（al－Wahidī）1315A.H.，第103－104页。

[50]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1970年，第1卷，第22页。

[51] 同上，第7卷，第476页。

[52] 同上，第1卷，第21页；第2卷，第417页。

[53]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第4卷，第575页。

德·伊本·阿卜德·巴基·布哈里·马基（16世纪）创作的《埃塞俄比亚人光彩夺目的优秀品质》[54]。

非洲人在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

古兰经的说法

古兰经——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自然成为研究穆斯林对种族和肤色的态度的基础。正如伯纳德·刘易斯[55]所指出，令人惊奇的是，古兰经中仅有两段文字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第一段见于古兰经第30章第22节，其中称：在真主的圣迹中包括“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这段文字是一大节列举真主圣迹和奇迹中的一个段落。举出“语言和肤色”的多样只是为了说明造物主的万能和多才多艺。

另一段文字见于第49章第13节，语气更为肯定：“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真主确是全知的，确是彻知的。”

总之，古兰经中找不到种族或肤色偏见的片言只语，甚至连偏见的意识都没有。然而，上述段落确实表明存在着“差异的意识”，上引第二段文字强调的是虔诚而非出身。显然，在古兰经中，种族问题从未成为一个问题[56]。 712

阿拉伯语对黑人的种种称呼

中世纪中阿拉伯资料通常将热带非洲的居民分为4大类：苏丹人，哈巴夏人，僧祇人和努巴人。

最普通的称呼是黑苏丹人（*as-Sūdān*），复数称（*al-aswad*，“黑人”），它用于称呼所有黑皮肤的人而不问其出生地点。有时，甚至把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种也包括在这一类中。狭义的苏丹人则逐渐成为专指那些生活在马格里布以南的黑非洲人，也即指黑人地区（*Bilād al-sūdān*）的典型居民。

至于哈巴夏人（埃塞俄比亚人），地理上的邻近和同穆罕默德早期历史的关系使他们成为人们最熟知的非洲人群体。不过，有些学者也广义地使用这个名称，甚至把居住在尼日尔河流域或埃及边境一带的人也称为哈巴夏人。[57]

---

[54] B.刘易斯（B. Lewis），1971年，第37页，注45；参阅G.杜卡特兹（G. Ducatez）和J.杜卡特兹（J. Ducatez），1980年。

[55] B.刘易斯，1971年，第6—7页。

[56] 好几个圣训都明确谴责种族偏见和歧视，强调首要的是虔诚，而不是“高贵或纯粹的阿拉伯血统”。见布哈里，1978年，第79页。在这些圣训中提到，有些人反对讨伐乌萨马·本·扎伊德，因为他从母亲乌姆·艾曼那里遗传到黝黑的肤色，但先知还是下了讨伐令。

[57] 把更往西和更往北的人也称哈巴夏人，可能是渊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的说法，他们提到更加深入西方的埃塞俄比亚人。参阅J.德桑热（J. Desanges），1962年，第16页。

僧祇人(或津祇人)主要指东非海岸讲班图语的族群。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时期，他们就被带到阿拉伯半岛、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充当奴隶[58]。他们在这些地方人数众多，不久就使这个名称扩大化含有“黑色”和“奴隶”的广义意思。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方知道努巴（努比亚）人。不过这一名称也完全可以指努比亚本土以南诸国出生的所有非洲人，也即讲尼罗特语各族和讲东苏丹语各族。他们穿过努比亚来到了哈里发统治的国土[59]。

奴隶的起源

714 阿拉伯穆斯林并不是经营非洲黑奴贸易的发轫者。早在法老时代，就有把努比亚人和其他非洲人作为奴隶的事。这可以从古代埃及艺术中多次出现奴隶的画面得到证实[60]。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同样可以见到黑奴[61]。但是，根据莫里斯·隆巴德的看法[62]，穆斯林经营的黑奴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商业意义：

> 穆斯林社会内部并不产生奴隶。因为一旦征服阶段过去，在疆域之内除了穆斯林或被保护的附庸者诸如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袄教徒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容身之地。这两种人都不可能沦为奴隶，仅有少数的例外（如尼罗河三角洲的科普特人叛乱时，有人沦为奴隶）。因而，奴隶的来源要到其他国家去找，要向那些衰弱的、社会结构不严、无力自卫的地方去抢劫或购买。

黑人居住的非洲各地区，如东海岸，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中苏丹、西苏丹，都是获得奴隶的主要地区[63]。

早在伊斯兰教传人之前很久，东海岸的奴隶贸易即已开始[64]。公元8、9世纪时，随着下伊拉克农业的发展和印度洋国际贸易的扩大，对奴隶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讲班图语各族——越来越多地被称为僧祇人——遭到袭击和捕捉，或被内陆上邦国王用来交换劣质商品而沦为奴隶。然后他们被从海边的统计人数小屋运到索科特拉岛和亚丁商业中心的集散地，再从那里分别经红海和波斯湾运抵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目的地。所以，就是在伊拉克，人们才能发现最大的黑奴集中营。这种情况终于导致僧祇人起义的爆发，成为伊斯兰历史上流血最多、破坏最烈的起义之一[65]。

向穆斯林世界提供奴隶劳动的另一主要渊源是努比亚。据优素福·法德勒·哈桑称，在伊斯兰教早期，阿拉伯人主要出于商业原因进人穆库拉和阿勒瓦地区，阿拉伯商

---

[58] 僧祇人一词的起源和意义尚待查清，通常认为此词源自埃及语 Zink，指埃及及蓬特地区的人。其他解释参阅 P. 佩利奥（P. Pelliot），1959年，第598－603页，并见本书第21章。

[59] 参阅 Y. F. 哈桑（Y. F. Hasan），1967年，第42－46页。阿拉伯资料中对这些奴隶来自何地谈得不多。

[60] 见 J. 韦科特（J. Vercoutter），1976年。

[61] F. M. 斯诺登（F. M. Snowdon），1970年，散见各处。

[62] M. 隆巴德（M. Lombard），1971年（b）。

[63] 因对西部非洲的奴隶贸易缺乏研究，其规模和是否真有过这种贸易都难以确定。

[64] A. 波波维奇（A. Popovic），1976年，第53和随后诸页（关于僧祇人一词），第62和随后诸页（关于僧祇人一词的最早出处和僧祇人起义）。

[65] 见 M. 隆巴德，1971年（b），第153页。



图片 26.1　氏族战斗，取自尼扎米（Nizāmī）的哈姆）（Khamsa），866/1461 年一手稿，巴格达

715 人带来粮食、珠子、梳子，带回象牙、鸵鸟毛、牲畜和奴隶。奴隶可能是他们经营的主要项目。[66] 有些奴隶是作为努比亚（根据巴克特条约）向穆斯林埃及的统治者交纳的年贡[67]。由此获得的大部分奴隶被运往埃及市场，主要用于军事[68]。

进口埃塞俄比亚人的通道是沿着青尼罗河和尼罗河河谷，或经过红海的非洲海岸转口港阿伊达布和宰莱进入埃及或阿拉伯半岛。柏培拉地区的索马里人经过宰莱把他们运到亚丁和大集散中心扎比德，再从那里供应汉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奴隶市场[69]。

最后一个供应奴隶的来源是西苏丹。萨赫勒地区（加纳、加奥、加奈姆、扎加瓦）的奴隶，或经努尔·拉姆塔和锡吉勒马萨运到马格里布和穆斯林西班牙的主要城市中心，或经中撒哈拉运到瓦尔格拉和杰里德，再取道伊弗里基亚、费赞、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去埃及和穆斯林世界东部的其他地方[70]。这类贸易，由于穆斯林商人在撒哈拉以南几个国家、特别是在加纳和加奥有聚居点，从而大为便利[71]。他们同当地土王做生意，并起到穿越撒哈拉的黄金、食盐、奴隶贸易的桥头堡作用。其他非伊斯兰群体，例如扎加瓦人，也同霍加尔或昔兰尼加内地业已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保持来往。这些柏柏尔人是经营这一穿越大陆的赚钱生意的运输商[72]。

奴隶市场（Sūk al－rakīk）

关于穆斯林世界这一时期奴隶贸易组织的详情，我们尚未全部掌握。不过对它的某些显著特征已有所了解。

穆斯林帝国的每个大城市都有奴隶市场，有些国家称它为“展销场”（*mā'rid*）。公元9世纪时，这类市场有些就位于主要的国际商路的起点，起集散中心的作用。布哈

716 拉、撒马尔罕、内沙布尔、赖伊、巴尔赫和马尔伍的市场是贩卖成批斯拉夫或突厥奴隶的终点站。也门的扎比德和亚丁以及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巴士拉则是转口黑奴的中心。还有一些市场设置在人口稠密的中心，那里最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它们是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和麦加。雅库比（3/9世纪）描述最有名的奴隶市场之一萨迈拉城为一个巨大的四边形体，城内大街小巷交织，房屋分上层房、下层房和关奴隶用的棚屋。[73]

奴隶买卖的过程十分复杂。奴隶在市场展出待售之前，必须先经接生婆有时还须受医生的仔细检查。每个奴隶的优缺点、他们最适合于做何种工作，都须在说明书中分类

---

[66] Y. F. 哈桑，1967年，第42页。

[67] 关于巴克特条约，见本书第7、8两章。

[68] 虽然努比亚奴隶主要是供应埃及市场，但并不局限于埃及。也门境内有一个以扎比德为中心的王朝，其统治者伊本·齐亚德在公元977年从达赫拉克群岛统治者那里得到的贡品中，有“奴隶1000头，其中500头是阿比西尼亚和努比亚女奴”。见哈卡米（al－Hakamī），1892年、第6页。

[69] M. 隆巴德，1971年（b），第200页。

[70] 同上，第201页。

[71] 见A. 梅茨（A. Mez），1922年，第444页，谈及这些穆斯林聚居点的商业作用。

[72] 参见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1938年，第61页和1964年，第153页。

[73] 雅库比，1892年，第259页；A. 梅茨，1922年，第156页。

介绍。5/11世纪时，有一名基督徒医生伊本·布特兰，写了一本供奴隶买主参考的袖珍手册，书名叫“*Risāla fī shirā al-rākīk wataklīb al-‘abīd*”[74]。他收集了、并至少在买奴隶的主顾中广泛散布了从希腊文和拉丁文文学书籍以及部分医书中抄来的大量偏见。这些偏见在公元5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相士的谬论影响下，企图把由于环境条件形成的身体外表征状同内在的性格、品质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本·布特兰在谈论有色女奴的相对优点时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论点。例如，他关于僧祇妇女的评语是：

> 她们的缺点无数；越黑越丑；她们会做的事寥寥无几……跳舞、打拍子倒是她们的天性。因其讲话姿势莫明其妙，她们只好吹奏乐器和舞蹈。据说，如果僧祇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们打起拍子来也是降调[75]。

伊本·布特兰学着许多相士的陈词滥调不断重复：“厚嘴唇是愚蠢的标志”[76]，“眼睛乌黑标志懦怯，如果长得像山羊眼睛，那标志着无知”[77]。

比伊本·布特兰早一个世纪的马苏迪则重复了加伦一段著名的话，认为黑人有十点不太有利的特性，特别是最后一点“性格暴燥”。马苏迪还说加伦把这种显著的性格归因于大脑组织不健全，从而造成智力低下[78]。

其他许多学者的作品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论断；它助长散布一种有害的观点，迄今尚难肃清。这种观点认为，黑人无忧无虑是由于受环境和日照强度的影响。总之，这种判断以由气候和环境引起的差异为基础[79]。在用阿拉伯文写作的作家以及后来的欧洲作家中，这种气候理论久久不衰，还颇有市场[80]。 **717**

奴隶市场受到国家的严格管制，以保护买主不受不合道德规范的买卖做法之害。交易并不单限于公开进行，也可以通过经纪人（*dallāl*）服务、付给佣金的办法得到奴隶。被称作奴隶进口商（*djallāb*）或奴隶贩子（*nakhkhās*）的绝大多数奴隶商人，引起人们既蔑视他们的职业，又嫉忌他们的财富[81]。

奴隶的价格，视他们的出生地、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和能力而定。一般说，白人比黑人的价格要贵。在古代阿拉伯的书面记载中，可看到奴隶的不同身价。在大约2/8世纪中叶，一名奴隶的平均价格为200迪拉姆（dirham）。在阿曼，花25到30第纳尔（dinar）可买到一名上好的黑奴。300/912年左右，一名迷人的女孩值150第纳尔。阿比西尼亚人阿布尔·米斯克·卡富尔，后来当了埃及的摄政（334/945－356/966年）。有记载说，尽管他是个阉人，在312/924年被卖时的身价是18第纳尔。萨希布·本·阿

---

[74] 被阿卜德·萨拉姆·哈伦（Abd al-Salām Hārūn）编在《*Nawādir al-Makhtutāt*》一书的4、6两版中，开罗，1373/1954年。如欲对该手册作全面研究，请阅F.萨那古斯丁（F. Sanagustin），1980年。并参阅H.米勒（H. Müller），1980年。

[75] F.萨那古斯丁，1980年，第233页。

[76] 同上，第227页。

[77] 同上，第226页。

[78] 马苏迪（al-Mas‘ūdī），1962年，第69页。

[79] 对北方人（突厥人、斯拉夫人等），也同样说成是具有不良的特性，从住在温带的人看来，他们也生活在不正常的条件下。

[80] 举例而言，见M.贝尔热（M. Bergé），1972年，第165－176页。

[81] F.萨那古斯丁，1980年，第168－169页。

巴德大臣花了400第纳尔买了一名努比亚奴隶，这个价格被认为太高，因为当时只需花200第纳尔，就能买到一名漂亮的黑肤努比亚妇女[62]。不过，赋有特殊才能的奴隶可以卖到极高的价钱。训练有素的跳舞女郎，标价从1000到2000第纳尔不等。公元918年，巴格达的歌手几乎都是奴隶出身。公元912年，在贵族社会中出售的一名歌女，价格高达13 000第纳尔[63]。

印度洋区域的伊斯兰教和奴隶制度

718

伊斯兰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因此，它不可能压制作为一种体制的奴隶制度，也不会号召人们起而批判作为一种理论的奴隶制。不过，它致力于使奴隶制温和化，减少它在道德和法律方面的严酷性。在这样做的时候，伊斯兰教接受一种经过改良的奴隶制形式，以某种对人的尊重作为制度的基础；战争中被打败的敌手不再被杀死，而是作为俘虏。这与过去的做法有明显的不同，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今天，人们对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都会感到震惊。然而，对生活在完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过去的世世代代说来，情况并非如此。那时，甚至连自由这种概念都不存在。同一个世系范围里的群体观念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离群索居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脱离群体的个人，只能依附他人而存在于社会。因此，我们对本章所述时期的奴隶制度进行道德评判时必须谨慎[64]。

古兰经（第4章第36节）教导信徒应该宽待奴仆（*ihsān*），并指出释放奴隶值得去做，是行善之举（第2章第177节；第90章第13节）[65]。

“传说乐于断言，奴隶的命运是先知最后全神贯注的事情之一。有关先知或其同伴的大量传说和轶事，都叮嘱人们对这一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应怀有真诚的仁慈。”[66]

应把奴隶视为兄弟。不应用轻蔑的口吻对他们讲话。奴隶和主人应同桌用餐，穿同样的衣服。主人不应要奴隶做过于繁重的工作，如果奴隶犯了过失，惩罚不应粗暴和过度。倡导释放奴隶可取，是一种愉快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主人惩罚奴隶过度的补救办法。反过来，奴隶的责任是对主人的始终忠诚[67]。从上述诸点可以看到，穆斯林的宗

---

[62] A. 梅茨，1922年，第153－154页，有一轶事讲到，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阿卜德·阿齐兹·伊本·马尔万，曾下令要估价人估计著名黑诗人努赛布的身价。该故事为我们提供了盛行于当时的奴隶价格大致范围的宝贵资料。一名黑奴值100第纳尔，如果他是个好的牧人，值200第纳尔。能削箭并在箭上贴羽毛的奴隶值300第纳尔，一名优秀射手值400第纳尔。一名能朗诵诗的奴隶可值500第纳尔，而有才华的诗人价达1000第纳尔。见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ān），1843－1871年，第3卷，第626页，注13。如欲对价格作全盘研究，可参阅E. 阿什托尔（E. Ashtor），1969年出版的研究著作

[63] A. 梅茨，1922年，第154页，并见S. D. 戈伊坦（S. D. Goitein），1963年；S. 拉希德（S. Rasheed），1973年；C. 佩拉特（C. Pellat），1963年。

[64] F. 萨那古斯丁，1980年，第17、18页。

[65] R. 布伦什维格（R. Brunschwig），1960年；R. 罗伯茨（R. Roberts），1908年，第41－47页。

[66] R. 布伦什维格，1960年，第25页。

[67] 穆斯林圣训中有关奴隶的论述，见塔哈维（al－Tahawi），1950－1951年，第368、377、378页。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1970年，第4卷，第320页。加扎利（al－Ghazālī），1861年，第2卷，第199页。

教伦理牢牢遵循"古兰经教导的方针，它甚至毫不含糊地强调古兰经在对奴隶制问题上的人道主义倾向"[88]。

征服和贸易的不断发展，导致穆斯林国土上奴隶劳动日趋重要，直到它成为至关重要的社会现象。逊尼派穆斯林的法理学家因而主张研究这个问题。关注的领域有：奴隶的来源，奴隶在新社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作为既是物又是人的奴隶的综合性质，以及奴隶的解放。

R.布伦什维格指出，不管某些法学博士说得多么声色俱厉，马立克教派的法学体系（*fikh*）从未演化成充分明确的制裁制度，也从未用来压制绑架和贩卖穆斯林或非穆斯林人口的行为。至于积极谴责阉割年轻奴隶的行为就更为少见，尽管在原则上，这种行为受到谴责[89]。 **719**

与承认奴隶的形成可以有好几个途径的古代巴比伦法律不同[90]，穆斯林法律只承认奴隶的两个合法来源，出生就是奴隶或战争中被俘为奴者[91]。第一种情况是：父母是奴隶，生的孩子也是奴隶。孩子出生时，接受其母亲的身份，决定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自由妇女生的孩子是自由人，即使其父亲是奴隶也罢。但也有重大例外，自由人和其女奴生的孩子，可以被认为是自由人，如果不是这样，他本来会被当作是主人的奴隶。这类情况十分普遍[92]。

可是，出生奴隶无法成为提供奴隶劳动的不竭源泉。由于纳妾制度合法，使孩子生下就是自由人，加上广范围的释放奴隶，以致奴隶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因此，伊斯兰社会要维持奴隶制度，必须依赖"其周围和外界经常更新的供应，或是直接从战争中俘获，或是在圣战的外衣下从战争地区（*dār al-harb*）[93]作商业性的进口。

从法律和宗教的观点来看，奴隶具有"一种综合性质。即既有物的性质，又有人的性质。作为物，他属于某个男人或女人所有，因而他是根据这种地位的一切合法活动——出售、赠送、雇用、继承等等——的物件"。[94]

伊斯兰宗教法规把奴隶降为"单纯是商品"，这样就必然将奴隶置于和驮畜（*dawābb*）一样的地位[95]。这一点，在当时公法的理论论文中时有表述，尤其是关于在保证主人合理对待其牲口和奴隶的 *muhtasib* 作用中表示得更为明白无误。[96]

作为人，奴隶原则上有一定的权利和责任，当然，其权利和责任显然无法与自由人相比。然而，穆斯林社会实行的奴隶制有其独特的特点：尽管奴隶基本上属于其主人， **720**

---

[88] R.布伦什维格，1960年，第25页。

[89] 同上，第26页。阉割的做法违背了伊斯兰教教义，见古兰经第4章第18节。关于阉人，见C.奥尔汉卢（C. Orhanlu），1978年。

[90] 巴比伦法律规定：1.出生时就是奴隶；2.因债务自卖为奴；3.出卖尚未成年的人；4.拐骗未成年的人；5.战俘。详见I.门德尔松（I. Mendelsohn），1949年，第1－23页。

[91] R.布伦什维格，1960年，第26页。

[92] 同上。

[93] 同上。

[94] 同上。

[95] 见马瓦尔迪（al-Māwardi），1922年，第257页。

[96] R.布伦什维格，1960年，第26页。

但仍允许他经营财产、做生意和储蓄金钱。在某些情况下，他还可以发财、高官厚禄。不过，奴隶既是财产的所有者又是他主人的所有物，这种含糊不清的身份是出现困难的经常根源。

经主人的同意，穆斯林奴隶准许结婚，他可以有自己的家庭，但无权当他孩子的监护人。奴隶之间的结合，奴隶同除其女主人以外的自由妇女的结合，女奴同自由男子的结合都是可以获准的。然而，禁止自由男人或女人与他们自己的奴隶结婚。马立克教派的法律体制给予奴隶最多娶4个妻子的权利，与自由的教徒一样。其他伊斯兰学派的法律准许奴隶最多可娶2个妻子。奴隶也同样有休妻（*talak*）的权利。[97]

不过，合法纳妾制度，考虑到它广泛实行和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不论伊斯兰纪元前时期的阿拉伯风俗还是古兰经，都承认主人有权纳其女奴为妾，为主人生了孩子的女奴叫乌姆·瓦拉德（*umm al-walad'*）。[98]这样同居所生的孩子有无自由，是否合法，完全取决于他父亲（主人）的承认。通常，做父亲的似乎都会给予承认。

另外，主人有鞭笞奴隶的权利（*tadhīb*），如奴隶遭受虐待，达到身受重伤的程度，普遍认为将其出卖或释放是可取的[99]。

在理论上，不论当众或私下场合，奴隶都不能擢升到有权力的地位（*wilāyāt*）。不过在实际上，执行这条规定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显贵们在一些次要的职务中使用奴隶，并把本身权力的一部分授予奴隶是极为常见的。事实上，哈里发或王公的奴隶，其权力可能比自由人要大得多[100]。

奴隶有与其他穆斯林一样的宗教义务（*'ibādāt*）。话虽如此，奴隶由于处在被奴役状态，使他可以不必谨慎遵守某些必须行动自由才能做到的宗教义务，诸如礼拜五祷告、朝圣和圣战。他也没有资格担任宗教职务[101]。

721 原则上，奴役状态永存，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变动和终止。有不同方式实行这种改变，第一，释放奴隶（*'itk*），这被看作是一种虔诚行为，只能由主人单方面赐予，是不可撤回的[102]。第二，主人答应给奴隶自由，在他死时生效，这种死后赐予称作"塔德比尔"（*tadbīr*），受惠奴隶称为"穆达巴尔"（*mudabbar*）[103]。第三，给予奴隶和主人订约赎身（*kitāba*）的权限。古兰经第24章第33节认可这种做法。订约规定，主人向奴隶提供机会，让奴隶用自己的积蓄分期缴款，赎回自由。当金额最后付清，他即具有出生自由人的全部权利[104]。最后，还有上文已经提到的法律条款。给予女奴（婢妾）和主人生的孩子以自由和合法性。

[97] 同上，第27页。

[98] J. 沙赫特（J. Schacht），1950年，第264页。古兰经第4章，第3节、第24节；第23章，第6节、第50节、第70章、第30节。

[99] R. 布伦什维格，1960年，第27页　关于伊斯兰刑法中奴隶的地位，见同上书，第29页。

[100] E. 萨那古斯 I，1980年，第23页。

[101] R. 布伦什维格，1960年，第27页

[102] 同上，第30页。

[103] J. 沙赫特，1950年，第265页，注8；并见R. 布伦什维格，1960年，第30页。

[104] 见J. 沙赫特，1950年，第111－112页。

奴隶获解放后，尽管享有自由人的一切民权，他和他的男性后裔仍按“依附关系的纽带”（“瓦拉”，*walā*）永远依附于如今称为“保护人”的前主人和其家庭。“保护人”和“依附者”均称平民——单数：“马乌拉”（*mawlā*）、复数：“马瓦里”（*mawālī*）。[105]

就业和社会条件

正如A.梅茨所恰当地指出的，尽管伊斯兰价值观主体中不存在对种族或肤色带有偏见的实例，尽管存在法律保证的规定和财产上的照顾，人们不应把穆斯林黑奴在伊斯兰早期的社会地位描绘得过于美好[106]。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现实中，偏见广泛存在，虽然不限于对待非洲人。

对黑色以及后来对黑皮肤人的明显嫌恶，成为许多穆斯林地理学家，风雅文学（*adab*）作家，诗人以及在当时民间传说中提到的那些普通老百姓的共同看法。对黑人卑贱地位的早期解释源自圣经故事，诺亚的一个儿子哈姆因“负罪”而被诅咒为黑色。对黑色以及与黑有关的奴隶制的咒骂，于是落到了哈姆后代的全体黑人身上。这种见解，在讲述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职业艺人（*kussas*）中间特别流行，甚至在治学严谨的学者如雅库比（3/9世纪）等人中间也造成影响，但未被普遍接受。哈姆达尼就明确驳斥这一传统看法，他认为这种看法源于犹太人，他引用了古兰经第6章第164节的诗句：“各人 **722** 犯罪，自己负责。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他的结论是：人的肤色或黑或白或棕，完全是由于我们在这本书中提到的气候原因，又一次归因于环境因素。[107]

伊本·哈勒敦也驳斥了这一长期因袭下来的诅咒说法：

> “宗谱学家完全不懂事物的本质，想象黑人是诺亚之子哈姆的后裔，他们的肤色是由于诺亚诅咒的结果，他的诅咒使哈姆的皮肤变黑，上帝使他的子子孙孙成为奴隶。如果希伯来圣经称诺亚咒骂了他的儿子哈姆，可并未讲到哈姆的肤色。他的诅咒仅仅只使哈姆的儿子成为他兄弟后裔的奴隶。把黑人的肤色同哈姆连在一起，表明了对冷与热的真正性质以及它们对气候和万物的影响的无知”。[108]

在中世纪穆斯林社会中，黑奴有多种用途可供雇用；主要当奴仆、婢妾或被阉后服侍于闺房之中，也当匠人、商店伙计和国家工程强迫集体劳动中的一分子或当兵。他们对建设中世纪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的贡献巨大。

主要由东非奴隶构成的“僧祇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下美索不达米亚广袤的盐碱平原沼泽地带，他们以500名到5000名为一队，干着苦活，把表层的硝土（*sebākh*）挖走，露出下面的肥土用于种植（可能是种糖料作物），或是收集表土上层的硝，归拢成堆。带队和督工监督他们劳动。盐碱低地和沼泽地带的生活状况，以及这些苦力

---

[105] R.布伦什维格，1960年。

[106] A.梅茨，1922年，第161－162页。关于中世纪穆斯林社会黑奴地位问题的深入研究见G.罗特（G. Rotter），1967年。

[107] 哈姆达尼（al－Hamdānī），1954年，第1卷，第29－31页；B.刘易斯，1971年，第29－38页；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13－14页；马苏迪，1861－1877年，第1卷，第75－80页；G.沃伊道（G. Vajda），1971年。

[108]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1967－1969年，第1卷，第167－168页。

(*kassāhīn*) 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当然不堪入目。据穆斯林编年史的大学者塔百里称，这些命运悲惨的人食不果腹，常死于不时流行的疟疾传染病和其他疾病。加上监工的粗暴虐待，产生了积郁在内心的愤怒火焰，导致此起彼伏、不断爆发的暴动。⑨

723 在大工程中使用集体强迫劳动并不局限于下伊拉克的阿拉伯盐湖地区，在巴林省也同样存在⑩。11世纪中，有支3万黑奴组成的队伍在卡尔马特教徒的监督下被迫干着苦役⑪。根据伊本·穆贾维尔记述，亚丁的采石场也大批购买僧祇奴进行劳动⑫。

不过，绝大多数奴隶还是用于家务劳动和军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较容易忍受一些。许多中等或小康之家，常使用一个或几个奴隶（包括已得到释放者）照料家务。⑬ 他们从事厨师、使女、奶妈、看门人、挑水夫之类工作。吸引人的女奴则作妾，满足其主人寻欢作乐的淫欲。在富豪的内室，有才华的女奴还可当歌女、乐师、舞伎和诗人，用娱乐来供她们的老爷们消磨光阴。

在伊斯兰纪元前的时期，就有阿拉伯男人和黑人妇女的结合，女的通常为努比亚人或苏丹人。不过，埃塞俄比亚姑娘也颇受看重。这种男女间的关系是侍妾而非婚配⑭。在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代，纳妾是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做法⑮。不少阿拉伯诗人被他们的黑奴婢迷住了。例如，阿沙·苏莱姆和一名叫达娜尼尔的肤色漆黑的奴婢同居⑯。著名的游唱诗人费拉兹达克，(114/732年逝世)，娶黑女乌姆·马基雅为妻，成为难舍难分的一对⑰。阿拔斯王朝的盲诗人巴沙尔·伊本·布尔德（167/783年逝世），作诗歌颂他的黑肤终生伴侣的美德⑱。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阿布·什斯（196/811年逝世），把他乌鸦般肤色的配偶比喻为“带着甜蜜微笑的麝鹿”⑲。

有本写于3/9世纪的著名著作——贾希兹写的保护黑人反对其诋毁者的书——⑳明

724 确表明，在社会各阶层中，多数黑人和白人惯常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在巴士拉）。此外，该书作者还提到来自非洲和印度洋区域的人们受到重视的许多事例，至少在僧祇人起义引起态度变化之前情况是如此㉑。

---

⑨ “他们吃的只有‘儿把’面粉、粗麦粉和椰枣”。引自B刘易斯著作中引用的话，1971年，第66页。我们对僧祇人劳动场所的了解不够，主要根据塔百里的记述。1879－1901年，第3卷，第1747－1750页。

⑩ 巴林省包括如今的科威特和卡塔尔之间的海岸和内陆。

⑪ B.刘易斯，1971年，第66页

⑫ 伊本·穆贾维尔，1957年、第1卷、第126页。

⑬ 见C.佩拉特，1953年，第234页。

⑭ B.刘易斯、1971年，第93页

⑮ 像诗人里亚希（al－Riyāshī）在下面诗中表达的：（见穆巴拉德 al－Mubarrad.1864年，第1卷，第302页。）

妾生的孩子

我们中比比皆是；

啊，真主，指引我去净土，

那里见不到混血儿的踪迹

⑯ 贾希兹（al－Djāhiz），1964年，第1卷，第214页。

⑰ 同上。

⑱ 伊斯法哈尼，1868－1869年，第8卷，第46页。

⑲ 阿明·艾哈迈德（Amin　Ahmad），1969年（b），第1卷，第46页。

⑳ 贾希兹，1903年。

㉑ 贾希兹的书“kitāb　fakhr　al－Sūdan　'ala'　l－Bīdān”即将由A.米凯尔（A. Miquel）、G.杜卡特兹、J.杜卡特兹和J.德维斯（J. Devisse），编译成法文。

穆斯林制度赞成纳妾，导致种族混杂，不论城乡居民，纳妾都成了生活的重要部分。虽然非洲血统的人源源不断地流人穆斯林国家，由于他们易被同化于已存的社会结构之中，与同样有许多非洲人散居的其他地区对比，该地区的居民构成特征也就颇不相同了。这种同化进程中最突出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存在有时可在南北美洲看到的那种具有自己单独的历史和文化体系的巨大同质的种族集团。

中世纪穆斯林社会上层纳非洲血统的女奴为妾，已不是什么稀罕之事。特别是阿拔斯王朝时代，许多王公和哈里发都有奴隶母亲，其中有些是非洲黑人。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易卜拉欣·伊本·马赫迪王子和穆克塔菲哈里发（555/1160年逝世）的母亲分别是黑人和努比亚人㉒。查希尔的侍妾是苏丹女奴，生了后来法蒂玛王朝的穆斯坦西尔哈里发。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查希尔死后，其子尚未成年，由她统治埃及㉓。在法蒂玛王朝的历史中，这段时间特别重要。查希尔的母亲十分喜爱黑人武士，于是这些人对埃及政策的影响也相应大为增加。这种情况引起第二类外来武士集团突厥人的敌意反应，从那时起，黑人和突厥人之间不时发生磨擦。古兰经禁止娼妓，穆斯林社会中命运最差的女黑奴是那些被迫为娼的人。

被阉割的男黑奴，充斥于国家权贵的宫中，主要充当后宫的守卫㉔。中世纪时，其中一些人爬到高位，在国家事务中起关键作用。兹举数例说明：黑人太监卡富尔·伊赫什德（356/966年）升任埃及摄政㉕，穆夫利赫（外号“黑家伙”）是拉迪哈里发(329/940年逝世）的宠臣，负责国家政策的制订㉖。白益王朝阿杜德·道拉王子（372/982年逝世）的管家是外号叫“甜人”（shakr）的黑人太监。他也是唯一能赢得那位既多疑又残暴的主子信赖的人，令有些人羡慕不已。

725

不在住家或宫中干活的黑奴，往往是当商店助理，或自己做生意，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贾希兹谈到一个名叫胡莱达的黑人妇女，她向到麦加朝圣的人出租住房㉗。有的黑奴替主人种田或者看果园，有文字记述一名黑奴整天当门卫，报酬是一天三个面饼㉘。伊斯兰教四大法学派之一的创建者沙斐仪（204/819年逝世）有几个奴隶，其中有个努比亚人当面饼师㉙。拜拉祖里谈到，库法城一个地段称作安塔拉，那是取名于一位叫安塔拉的黑人放血医生。还有一些黑奴被主人雇出，其收人的三分之二归主人。有一个叫阿姆鲁·本·瓦巴拉的人㉚（2/8世纪）就是做这种生意牟利。诗人阿布尔·阿塔希耶（211/826年逝世）以制陶为业，用几名黑奴当助手㉛。

㉒ 伊本·哈利坎，1843－1871年，第1卷，第16－20页。

㉓ M.隆巴德，1971年（b），第150页。

㉔ 在阿拔斯王朝穆克塔迪尔（al－Muktadir）哈里发（295/908－320/932年在位）统治期间，宫中太监数多达11 000名，其中黑人7000名，白人4000名。详见萨比（al－Sàbi'），1964年。

㉕ 伊本·哈利坎，1843－1871年，第2卷，第524－528页。参阅本书第7章。

㉖ 米斯卡瓦伊赫（Miskawaih），1914年，第1卷，第104页。

㉗ 贾希兹，1964年，第2卷，第130页。

㉘ 易卜施希（al－Ibshīhi），1851－1852年，第1卷、第140页。

㉙ 沙斐仪（al－Shàfi'ī），1903年，第4卷，第48页。

㉚ 塔百里，1879－1901年，第6卷，第153页。

㉛ 伊斯法哈尼，1868－1869年，第3卷，第129页。

奴隶在军事上起作用是伊斯兰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对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内外政策有巨大影响[132]。伯纳德·刘易斯指出："阿拔斯王朝初期，黑人士兵并不多见，在伊拉克发生奴隶暴动时，黑人表现出惊人的军事威力，之后，他们大批被征召入伍"[133]。据说，在阿拔斯王朝的阿明哈里发（198/813年逝世）统治下，组成一支番号为"乌鸦"的埃塞俄比亚人警卫特种部队[134]。在穆克塔迪尔（320/932年逝世）统治时爆发的激烈夺权斗争中，有7000名黑人站在哈里发一方作战[135]。埃及总督，后来成为实际统治者的艾哈迈德·伊本·图伦（公元884年逝世），结集一支主要由努比亚人组成的黑奴大军。据说他死时遗下的财产中，有24 000名马木路克兵团的士兵和45 000名黑人士兵。他们各自单独组成兵团，居住在兵营内分开的营地里[136]。

根据那个时期阿拉伯编年史的记述，由"沙拉阿"奴隶（*'abid al-shirā'*，买来的黑人）组成的几个团是法蒂玛王朝军队的重要骨干。穆斯坦西尔哈里发（公元1035－1094年）在位期间，由于他们得到母后——一名具有坚强性格、苏丹女奴出身的妇女——始终不懈的支持，其作用显得十分突出。他们在全盛时期人数多达5万名[137]。

726

僧祇人起义

僧祇人曾几度拿起武器，反抗哈里发的统治[138]。第一次起义（70/689－690年）发生在哈立德·伊本·阿卜杜拉在位期间的巴士拉。这次起义的重要性不大，只有一些小股奴隶在幼发拉底河一带抢掠和破坏财产，很容易就被哈里发的军队镇压了下去，其中一些领头的成员被处死[139]。

75/694年爆发的第二次起义意义较大，组织较好，领导有方，为首的是僧祇酋长里亚赫，常以"僧祇之狮"（*Shīr Zandj*）为人们熟知。他使整个幼发拉底河地区和乌剌港笼罩着一片恐怖。从这些起义者对政府军发动的一连串战斗来判断，参加起义的人数必定很多。直到巴士拉志愿军增援哈里发军队，这场起义才被镇压下去[140]。

阿布·阿巴斯·萨法赫哈里发在位的132/749－750年，一支4千人的正规军讨伐

---

[132] 详见D.派普斯（D. Pipes），1980年。

[133] B.刘易斯，1971年，第69页。

[134] 萨比，1958年，第16页。

[135] 同上，第8页。

[136] B.刘易斯，1971年，第69页；M.隆巴德，1971年（b），第195页。

[137] 伊本·穆亚萨尔（Ibn Muyassar），1919年，第16－17页。

[138] 详细研究僧祇人起义的第一位学者是T. H.诺尔德克（T. H. Nöldeke），1892年。接着出现其他学者用阿拉伯文或欧洲文字写的研究著作。阿拉伯文的详细研究著作是F.萨米尔(F. al-Sāmir)，1971年。不过，研究起义迄今最完整的著作是A.波波维奇（A. Popovic），1976年。

[139] 见A.波波维奇，1976年，第62－63页；F.萨米尔，1971年，第19页；拜拉祖里，1883年，第11卷，第305页。

[140] 伊本·阿西尔（Ibn al-Athīr），1855－1856年，第4卷，第188、314－315页。

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摩苏尔地区的造反者，造成据说有一万多居民——男、女、儿童丧生的大屠杀[41]。

紧接阿利德反对麦地那阿拔斯王朝曼苏尔哈里发军队的反叛（145/765年）失败之后，又出现另一次僧祇人起义。反叛失败的人员煽动他们的黑奴和依附平民攻击城里阿拔斯王朝军队的要塞，引起了混乱。总督被废黜，造反的黑人占领了军火库。惧怕局势更加恶化，保护人出来安抚奴隶，使阿拔斯王朝的权力再次得到恢复。可是，僧祇一方的领导人物却遭到残暴的惩罚[42]。

255/869年爆发的僧祇人起义，无疑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大的一次非洲黑奴起义。它持续了14年之久，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255/869－266/879年和266/879－270/883年）。前一阶段是起义者发展和取得巨大胜利的阶段，第二阶段则是持久抗击占优势的敌手和僧祇国最终溃败的阶段。战场在下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南部一带[43]。

727

这次起义的领袖是阿拉伯人阿里·本·穆罕默德，人们普遍称他为“僧祇人之狮”（*Sāhib al－Zandj*）。[44] 他曾到该地区许多城市和省份煽动造反，都未成功，“在巴士拉，他几乎被抓入狱，后来到了盐碱地区[45]，终于在回历255年斋月（9月）26日、即公元869年9月7日唤起了僧祇奴起义[46]。

初期，为谋取事业的合法性和寻求支持，他自称阿利德是其祖先。可是他不坚持什叶派教义，相反却坚持哈列哲教派的教义。这种教义的平等原则甚至允许埃塞俄比亚人当哈里发[47]。

起义一开始是一场被剥削的僧祇奴与他们的主人之间的阶级冲突。然而，很快就转为反对哈里发统治的公开暴力战争。所以，与其说它是一场种族斗争，毋宁说它是一场政治和社会斗争[48]。关于这一运动的规模、组成、组织机构之类情况，我们掌握的资料既少且叙述得含糊不清，甚至往往不可靠，必须小心筛选。另一个难点是，当时及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把注意力主要局限于军事战役，而且公开敌视起义者，把他们说成是一群不信宗教、无法无天的“真主的死敌”[49]。

T.H.诺尔德克正确地指出：“黑人领袖声称有30万大军，这未免有点夸大。在斗争开始时，敌方人数是5万，僧祇人肯定远远超过此数；然而总的说来，敌人装备精良，吃得又好，还有不断增援的生力军。”[50]

参与起义的黑奴，以500名到5000名劳动者组成一队，分散在下美索不达米亚和

---

[41] 同上，第5卷，第340－341页。
[42] 塔百里，1879－1901年，第3卷，第286页。
[43] A.波波维奇，1976年，第83页。
[44] 有关阿里·本·穆罕默德的详情，见上书第71－81页。
[45] B.刘易斯，1950年，第104页；F.萨米尔，1971年，第102－103页。
[46] A.波波维奇，1976年，第79页。
[47] T.H.诺尔德克，1892年，第151页；F.萨米尔，1971年，第82页。
[48] 见F.萨米尔，1971年，第59页；L.马西尼翁（L. Massignon），1929年。
[49] A.波波维奇，1976年，第157页。
[50] T.H.诺尔德克，1892年，第167－168页；伊本·阿西尔，1885－1886年，第11卷，第41页。

波斯南部广大地域[51]。阿里·本·穆罕默德率领的僧祇人武装力量，由下列各主要族群组成：

728 **僧祇人**：来自东非沿海的讲非阿拉伯语的奴隶，他们从难以确定的时期起，就被运进这个地区。贾希兹把他们区分为4个分支：昆布拉人，兰贾维亚人，纳姆尔人，和基布拉人。[52] 只有通过翻译，他们才有可能和他们的头领交谈。

卡尔马蒂亚人：这些是很难确定其归属的非洲奴隶群体，很可能是来自苏丹地区。他们讲的是阿拉伯语。与卡拉米塔运动没有关系。[53]

努巴人：这些人中不仅包括努比亚人，而且还包括尼罗特各族人，他们讲的也是阿拉伯语。[54]

富拉蒂亚人：居住在瓦西特城以南幼发拉底河下游两岸的奴隶。他们可以和僧祇人明显区分出来，他们讲阿拉伯语。[55]

舒里吉亚人：这些是在下美索不达米亚的盐碱低地上干活的苦力（*kassāhīn*）。他们的称呼系从波斯语"舒拉"（*shōra*，硝土）转化而来。[56] 在这群人中还包括一些自由人和释放奴隶以及受雇于椰枣种植园和蔗糖种植园中的劳工[57]。

最后，还有住在瓦西特城以南沼泽地带的贝都因人。起义队伍中也还有许多从哈里发的军队中叛逃过来的黑人士兵。

我们在这里不拟详述僧祇人起义的历次军事战役，仅就主要战事作一概括介绍。

僧祇军队于256/870年征服并摧毁了繁华的乌剌港。[58]这个港口的陷落，吓坏了位于阿拉伯盐湖地区东岸波斯的阿巴丹港的居民，他们不得不举起降旗。[59] 这又为僧祇军队同年入侵邻省胡齐斯坦铺平了道路。接着，僧祇人又成为朱巴和省会阿瓦士的主人[60]。第二年（257/871年）僧祇军又占领和洗劫了伊拉克的主要港口巴士拉。这是僧祇人取得的最巨大胜利，给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以沉重打击。在后代人的心目中，巴士拉的可怕遭遇是永世难忘的。[61] 然后，僧祇军队又成功地向北进军，占领并洗劫了沿路的瓦西特（264/877－878年）、努马尼耶（265/878年）和贾尔贾拉伊诸城，北距巴格达仅110公里。这是他们北征的最远点。[62]

729

---

[51] 塔百里，1879－1901年，第3卷，第1747－1750页。

[52] C.佩拉特，1953年，第41页，塔百里，1879－1901年，第3卷，第1756－1757页。

[53] 塔百里，1879－1901年，第3卷，第1749页。

[54] 同上，第1745页。

[55] 同上，第1757页。

[56] 见L.马西尼翁，1929年。

[57] 塔白里，1879－1901年，第3卷，第1753页。

[58] 伊本·阿西尔，1885－1886年，第7卷，第94页。

[59] 塔百里，1879－1901年，第3卷，第1837页。

[60] 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i），1868年，第1卷，第234页。

[61] 塔百里，1879－1901年，第3卷，第1847－1857页；马苏迪，1867－1877年，第4卷，第207－208页。伊本·鲁米（Ibn al-Rūmi 283/896年?）著作中的描述使巴士拉的悲惨遭遇永记人心。见伊本·鲁米，1924年，第419－427页。

[62] 伊本·贾乌齐（Ibn al-Djawzi），1938－1940年，第5卷，第45－50页

从 267/881 年到 270/883 年，阿拔斯王朝的太子穆瓦法克采取攻势，迫使人侵军向南退却，最后对他们的首都穆赫塔拉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63] 经过整整 3 年的围攻，该城于回历 270 年狩猎月（2 月）2 日、即公元 883 年 8 月 11 日在攻击下陷落，起义军领袖和许多指挥员惨遭杀害 [64]

无疑，这次长时间起义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使穆斯林对非洲和一般非洲人有更为强烈的反感，进口僧祇奴似乎随之受到限制或严加管制。另一个后果是，在伊斯兰国家中，种种有损黑人形象的说法，从诺亚的诅咒到伊本·布特兰所宣扬的偏见广泛传播。

伊斯兰社会中非洲人在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在文化领域中，非洲人作为诗人、作家、音乐家，和作为注释古兰经、传播宗教传统和宗教法规等伊斯兰学科方面的专家，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65]

阿拉伯经典作家公开承认，非洲人天生有辩才。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有许多杰出的黑人诗人。诸如诗人伊拉尔·伊本·阿姆鲁是女奴的儿子，他创作的诗篇就保存在《阿加尼书》（*Kitāb al-Aghānī*）和《英武诗集》（*Hamāsa*）中流传后世。[66] 他在阿卜德·马利克（86/705 年逝世）在位时期最为活跃，效力于伊拉克省总督哈吉贾吉（95/714 年逝世）门下。该时期另一才能卓著和口若悬河的诗人是海卡丹。[67] 不过，最为有名和杰出的诗人还数阿布·米赫贾恩（108/726－727 年逝世）。他生于汉志，父母都是埃塞俄比亚人，他本人年轻时当过牵驼夫。他志向不凡，向伍麦叶王朝的阿齐兹·伊本·马尔万王子献上了一系列颂诗，王子大为称赞，遂以 1000 第纳尔从旧主人手中买下他并给予自由。[68] 阿拔斯王朝早期，库法有个黑诗人叫阿布·杜拉马（161/778 年逝世），以机智、善讲令人高兴的冒险故事、熟谙文学并有赋诗才能而闻名。这位富有才华、喜好饮酒、举止轻佻的宫廷黑诗人兼弄臣，使曼苏尔哈里发大为开心。[69] **730**

阿拉伯文艺术性散文作家中第一位真正伟大的代表是巴士拉的阿姆鲁·巴赫尔·贾希兹（眼珠突出者）（255/868－869 年逝世），他在巴士拉活到 96 岁高龄。[70] 他的祖父是个名叫法扎拉黑人牵驼夫，是阿姆鲁·伊本·基拉的“依附平民”。[71] 尽管贾希兹

---

[63] 据 T. H. 诺尔德克称：僧祇人的国都“面积很大、内有广阔的田园和棕榈林 它位于巴士拉以南，紧靠底格里斯河西岸，阿比·哈希布河从中穿过。”T. H. 诺尔德克，1892 年，第 156 页。

[64] F 萨米尔，1971 年，第 151－152 页；A. 波波维奇，1976 年，第 152－155 页；T. H 诺尔德克，1892 年，第 174 页。

[65] 见 A. 巴达维（A. Badāwi），1976 年，S. S. 哈斯（S. S. Haas），1942 年。

[66] 伊斯法哈尼，1868－1869 年，第 10 卷，第 65－66 页，塔马姆（al Tammām），1828－1847 年。

[67] 贾希兹，1964 年，第 1 卷，第 182 页

[68] 参阅 U. 里齐塔诺（U Rizzita o），1938 年，第 316－318 页；D. 萨卢姆（D. Sallūm），1967 年

[69] 伊本·哈利坎，1843－1871 年，第 1 卷，第 534－539 页；伊斯法哈尼，1868－1869 年，第 1 卷，第 199 页；第 10 卷，第 245 页；M. 谢纳布（M. Cheneb），1922 年。

[70] I. 戈德济赫尔，1966 年，第 81 页。

[71] 见 C. 佩拉特，1953 年，第 51－54 页。

长相难看（从他的绰号即可知道），但他思想敏捷，富有远见。[72]他学识丰富，几乎无所不晓，是位博学多才、著作主题包罗万象的作家。《动物书》（*Kitāb al－hayawān*）是他最精彩的作品之一。[73]他作为自由思想家同样有名，写过一篇论宗教原理的论文。穆尔太齐赖派有一分支叫贾希兹亚派（al－Djahiziya），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74]

非洲人也擅长音乐艺术，在伊斯兰时代的最早两个世纪中，有几位黑人的演奏技巧在音乐舞台上占有突出地位，尤其是汉志的“宫廷和贵族、富豪之家，特别纵情于音乐和音乐家的表演”[75]。黑人阿布·奥斯曼·赛义德·伊本·米斯贾赫（715年逝世）是当时居首位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学习异域音乐技巧的愿望使他去了波斯和叙利亚。回到汉志后，他把拜占廷和波斯的音乐旋律引进阿拉伯歌曲的歌唱中。伍麦叶王朝的阿卜德·马利克哈里发在位年间（公元684－705年），他的音乐造诣达到顶峰，被称赞为当时四大歌手之一[76]。

另一位驰名乐坛的黑人音乐家是阿布·阿巴德·马巴德·伊本·瓦赫卜（126/743年逝世）。他是麦地那的一位黑白混血儿，伍麦叶王朝三位哈里发在位期间，都是他创作旺盛时期，被称颂为麦地那的歌唱王子。他的弟子中有个萨拉马·卡斯，她是位黑白混血女歌手，得到亚齐德·伊本·阿卜德·马利克哈里发的宠爱。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治时期，许多黑人音乐家和歌唱家都获得了荣誉。

阿拉伯古代传记资料（*tabakāt*）提到了许多非洲的宗教传统研究者和学者。其中最杰出人物之一是个黑人“依附平民”阿布·阿卜杜拉·赛义德·伊本·朱巴尔·伊本·希沙姆（约94/712年逝世），他是讲解朝圣礼仪、古兰经注释、离婚法、宗教仪式问题的权威。[77]另一位名阿布·阿塔·伊本·拉巴赫（115/733－734年逝世），他被形容为“黑皮肤、独眼龙、塌鼻子、单胳臂、一腿瘸和卷头发。”[78]人们公认他是讲解宗教传统的权威，“麦加的伊斯兰法典阐述法庭由他负责。”然而他却从不高傲夸耀，仍过着虔诚的苦行者生活。[79]在伊斯兰埃及讲解圣训和马立克教派法学体系最杰出的人物是亚齐德·伊本·阿比·哈比卜（128/745年逝世），他是一个努比亚战俘的儿子。[80]贾希兹高度评价巴士拉的黑人依附平民法拉吉·哈贾姆，认为他作为宗教传统讲解人的作用是无可非议的。[81]黑阉人阿布尔·哈桑·巴格达迪，人们一般称他为海尔·纳萨杰（322/934年逝世），是位著名的苦行者和伟大的苏非派博士。在主人解放他之前当过织绸工。他还具有“公道证人”（‘adl）的美称。[82]

731

---

[72] 同上，第56－58页。
[73] 1323－1325年/1905－1907年开罗版两卷集。
[74] 伊本·哈利坎，1843－1871年，第2卷，第405页。
[75] H. G. 法默(H. G. Farmer)，1929年，第43页。
[76] 同上，第77－78页。
[77] 伊本·库泰巴，1850年，第227页。
[78] 同上。
[79] 同上，第203页。
[80] I. 戈德济赫尔，1971年，第2卷，第77页。
[81] 贾希兹，1964年，第1卷，第182页。
[82] 伊本·贾乌齐，1938－1940年，第6卷，第304页。

印度、东南亚和中国的非洲人

非洲人这段时间出现于印度的证据不足。正如J.伯顿－佩奇所指出：“有关穆斯林初期哈布希人的数目、社会地位和作用等资料很少。”[43]如能彻底和系统地查找印度国家档案馆资料以及印度南部和西部丰富的方言文学宝库，很可能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目前，关于非洲黑奴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情况，由于有简明的历史记要、古代手抄本和古肖像画等资料可查，我们的处境要好得多。

早在公元8世纪上叶，马来群岛上就出现了非洲黑奴，一般称作“僧祇”。[44]与该地区有联系的中国人把黑奴带入中国，在中国唐朝的编年史中，在公元724年大事记内，记载着接待以苏门答腊岛上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国王派来使节的情况，进献的异域贡物中有一名僧祇女郎。[45]这并非个别事例，从公元813年到818年间，另一个印度尼西亚王国、爪哇的诃陵国，曾三次派出使节，觐见唐朝宪宗皇帝，进贡的稀世奇珍中有数名僧祇少男少女。[46]宋史也记载了公元976年一名阿拉伯商人向朝廷进贡了“一个眼深门、体黝黑的昆仑黑奴”。[47]

732

这些“黑肤青年男女”不过是“8、9世纪高雅宫廷中的玩物而已”。但是他们实际上只是阿拉伯商人向这一区域大量输入非洲奴隶的一小部分。一名中国官吏周去非1178年在桂林写了一本叫《岭外代答》的书，书中表明他知道这种贩卖非洲奴隶的事，他写到“东非沿海某段”他称之为“昆仑层期”的地方，指出：“野人身如黑漆，卷发，诱以食而擒之”，[48]他进而指出，“动以千万，卖为蓄奴”。[49]看来，阿拉伯商人把一部分人口货物经过马来群岛，再用船送到中国。广州是主要进口港和集散中心。[50]

对非洲奴隶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中担任的角色也有证据可循。《萍洲可谈》一书在另一个段落中谈到这些“鬼奴”擅长游泳，入水眼不眨，船户用之，使其在船外堵塞船舷

---

[43] J.伯顿－佩奇（J. Burton－Paqe），1971年，第14页。

[44] “僧祇”一词传到印度尼西亚、中亚细亚和远东带有‘黑人’、更常是‘黑奴’的含义。爪哇有块立于公元860年的碑刻，文中有僧吉（Jèngi）一字，在公元1135年、1140年和1294年立的几块碑文中，该字拼成给吉（Jangi）和吉尼（Jeni）。如今马来人仍把黑人称为‘给吉’或‘僧吉’，而印尼的巴塔克人则称黑人为琼吉（Jongi）” P.佩利奥，1959年，第598页。中国文献中所用的同一个词汇见同书第599－601页。把黑奴或非洲人奴隶称作哈布希人（Habshi）是后来才有的。例如在18世纪马来的法律文摘中所刊登的事例，见R. J. 马克斯韦尔（R. J. Maxwell），1932年，第254页

[45] G.费朗（G. Ferrand），1922年，第7－8页，P.佩利奥，1959年，第599页，提到的是两名僧祇女郎。

[46] P.佩利奥，1959年，第599页。

[47] 赵汝适（Chao Ju－Kua），1911年，第32页。

[48] P.惠特利（P. Wheatley），1961年，第54页。

[49] 同上。

[50] 这已经中国宋代学者朱彧（Chu Yu）证实，其著作《萍洲可谈》（P'ing chou k'o tan）（119年）载：“广州，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卷发而黄，有牝牡……生于海外诸山中”。P.惠特利摘引，1961年，第54－55页。同见张星烺（Chang Hsing－Lang），1930年。

水线以下的裂缝[191]，他们在大城市一些富有的家庭中充当仆役似乎也较常见。[192] G.费朗引用中国经典资料，还提到这些人在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国充当音乐伎师。[193]

总之，非洲人出现在全世界，并非由大批被迫运往美洲开始。人们已经注意到，从8世纪到11世纪，亚洲许多地方早已存在非洲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各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遗憾的是，这种非洲对亚洲的影响虽具重要历史意义，但其图象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且都不是出自非洲本身的资料。为了全面和公允地作出介绍，迫切需要研究非洲人流落异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是怎样看待他们自己的。

[191] P.惠特利引用，1961年，第55页；并见赵汝适，1911年，第31－32页。

[192] 赵汝适，1911年，第32页，"(中国有)许多家庭买黑人托以管钥，称作鬼奴或黑小厮。"

[193] G.费朗，1922年，第16页"昆仑奴能歌善舞，为当地人演出音乐节日。"

27 非洲各地区间的相互关系

A. 巴思利
C. 梅拉苏 合作

公元7至11世纪这段时间，非洲各个地区的相互关系有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恰巧与穆斯林的扩张处于同一时间。于是，如雷蒙德·莫尼这样的一些作家就认为：是阿拉伯的征服和伊斯兰化使热带非洲脱离与世隔绝的状态，与世界其他地区重新连在一起。[1] 然而，尽管原始资料really缺—— 近年来日益增加的考古发现已作部分填补 ——现有资料证实了卡特琳·科奎里·维德罗维奇的论断："非洲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从未处于隔绝状态。非洲大陆一向有两大现象：人口的流动性和大量的长距离贸易"。[2] E.W. 博维尔[3]、C.A. 迪奥普[4] 和 T. 奥本加[5] 等人的著作都表明，自古代起，撒哈拉沙漠南北之间的关系就充满生气。[6] 同时也有充分资料恰当地表明，埃塞俄比亚、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贸易发展，对促使伊斯兰教诞生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何产生强烈的影响。[7] 话虽如此，人们也须承认，非洲某些部分并入7世纪建立的阿拉伯帝国版图一事[8]，确实给予非洲各地间相互关系以新的推动。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影响产生连锁反应，席卷非洲大陆，从8世纪起成为马格里布、埃及以及撒哈拉各族人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9] 在非洲其他地区，它作为一种外来力量起作用，根据各地地理位置与穆斯林渗透路线距离远近的不同，其重要性也因之而异。[10]

734

736

地区间贸易的增长

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旅行日记是8世纪以来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贸易发展的证据。阿拉伯征服不仅带来了地中海世界——7－11世纪该地域受穆斯林帝国统治——的政治地理的深刻变化，而且特别给"国际"贸易带来了不寻常的动力。甚至在帝国解体之后情况仍是如此。尽管出现作为帝国上层建筑特征的动乱连续不断（造反、教会宗派分裂、等

---

1. R. 莫尼（R. Mauny），1970年，第138页。
2. C. 科奎里－维德罗维奇（C. Coquery－Vidrovitch），1974年，第349页。
3. E. W. 博维尔（E. W. Bovill），1935年、1958年。
4. C. A. 迪奥普（C. A. Diop），1955年、1967年。
5. T. 奥本加（T. Obenga），1973年；并参阅 R. C. C. 劳（R. C. C. Law），1967年（b）。
6.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II卷，第20和22章。
7. E. R. 沃尔夫（E. R. Wolf），1951年，并见 M. 罗丹松（M. Rodinson），1968年。
8. 关于穆斯林的扩张，见 R. 曼特兰（R. Mantran），1969年；也见本书第2、3章。
9. 参阅本书第7到12章。
10. 例如，见本书第19到21章。

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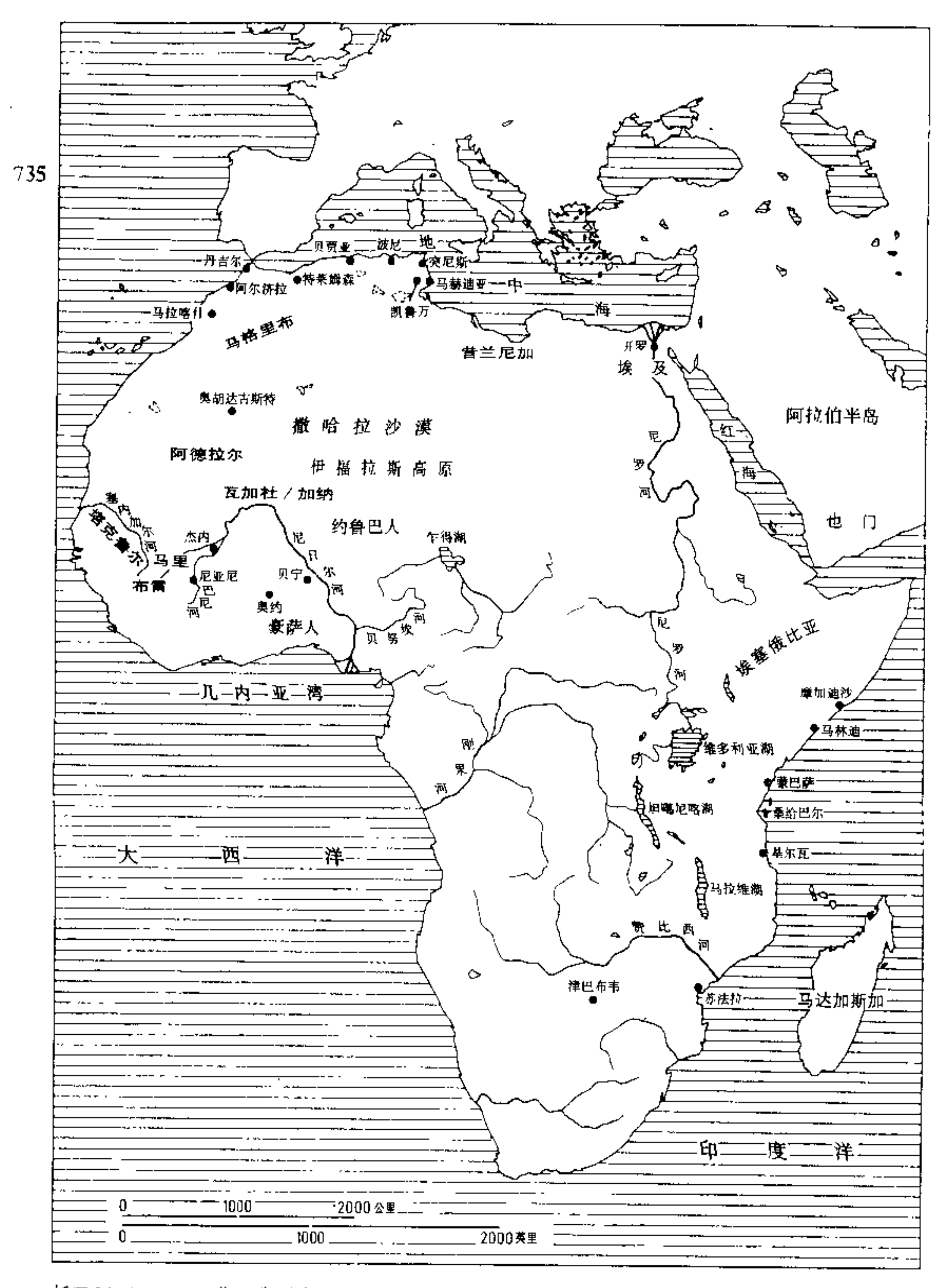


插图27.1 9—11世纪非洲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等)，在13世纪之前，穆斯林社会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主要动力。莫里斯·隆巴德的经典著作阐述了非洲黄金在穆斯林国家创建过程中所起十分重要的作用。⑪ 直到15世纪欧洲人的扩张之前，非洲的命运和阿拉伯世界一直紧密连在一起。⑫

本章所述时期的非洲地区间贸易具有三大基本特点：交通工具的改进；商业网的扩大；以及贸易量的增加。虽然据我们所知，对这个时期的非洲经济尚无系统的著述，但阿拉伯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提供的一些线索充分证实了上述观点。

交通工具的改进

阿拉伯的征服加强了北非和西亚的持久联系，为大规模使用骆驼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有些作者记述，大致在公元1世纪，骆驼这一最适合于从事沙漠地区运输的动物传入了非洲，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已经绝种的某些品种的骆驼，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曾生存于非洲大陆。⑬

无论骆驼来自何处，学者们大体上同意从伊斯兰时期开始这种负重的牲口就在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中广泛使用。摩洛哥用中亚的双峰骆驼与阿拉伯骆驼（或单峰骆驼）杂交，并使用选种技术培育出两个品种。一种行走速度慢，但载重量大，用于贸易；另一种走路轻快，用于作战和送信。⑭ 西撒哈拉也以饲养骆驼闻名。据巴克利称，桑哈贾国王拥有10万头良种骆驼供军用。⑮长年来往于苏丹、马格里布和埃及之间的各种商队拥有的骆驼数以千计。 737

穆斯林扩张的另一个积极方面是大大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开展。在阿格拉布王朝和法蒂玛王朝命令下，建造起强大的舰队，使穆斯林商人能够维持东部非洲与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国家之间贸易的畅通。马格里布兴建了设有造船厂的大港口，如突尼斯（8世纪）、贝贾亚（布日伊）和马赫迪亚（915年）、阿尔及尔（946年）、奥兰（902年）以及阿尔济拉（10世纪）。在埃及，原来的亚历山大港得到复苏。就在8到11世纪期间，一种高船身、装有三角帆双桅杆的典型的地中海大商船，在穆斯林海军的保护下盛极一时；在技术上，那是一种地中海古代商船和设计在印度洋航行的船只的混合体。⑯远在使用罗盘和别的航海仪器以前，穆斯林海员就能用一种称作“星座刻度盘”⑰ 的方法在海上远航；罗盘和天文表使这些航行更为安全。

---

⑪ M.隆巴德（M. Lombard），1947年；参阅M.马洛维斯特（M. Malowist），1966年和R. A.梅西耶（R. A. Messier），1974年。近年来，M.隆巴德的论点遭到C.卡亨（C.Cahen）的严厉批判，C.卡亨，1977年，第323－357页、1981年。

⑫ E. F.戈捷（E. F. Gautier），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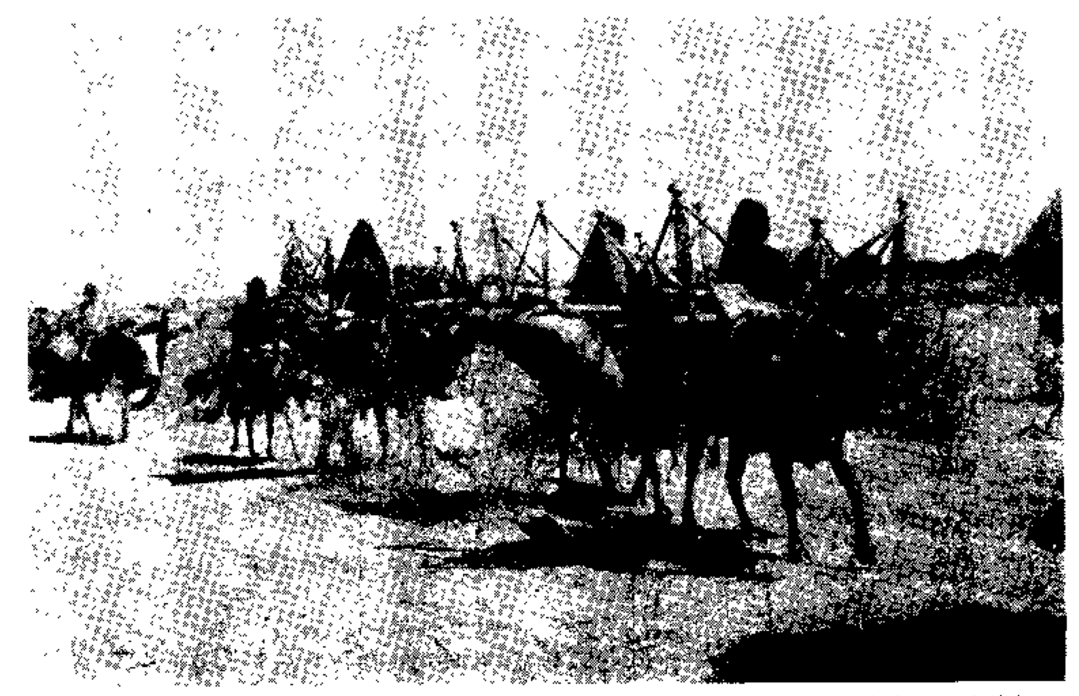
⑬ 参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有关论述，第11卷，第20章。

⑭ N.帕夏（N. Pacha），1976年，第49页；亦参阅本书第14章。

⑮ J. M.库奥克（J. M. Cuoq），1975年，第2页；N.莱维焘恩（N. Levtzion）和J. F. P.霍普金斯（J. F. P. Hopkins）合编，1981年，第69页。

⑯ M.隆巴德，1971年（a），第67页；A. R.刘易斯（A. R. Lewis），1951年。

⑰ V. A.特谢拉·达－莫塔（A. Teixeira da Mota），1963年；并见G.蒂贝茨（G. Tibbetls）编，1971年。



图片 27.1　营地搬迁：马里境内萨赫勒地区（萨赫勒的贡布附近）的牧民季节性迁移放牧

738 商业网的扩大

公元 7－11 世纪，非洲大陆各地区间的贸易兴旺。这种商业活动发达的最显著标志是城市的兴起。公元 757 年左右，塔菲拉莱特地方一个赶骆驼牧民的集市发展成为称作锡吉勒马萨的市镇，直到 11 世纪，它一直是西苏丹和西马格里布之间穿越撒哈拉贸易的主要补给站。[19] 后来，取代古城迦太基的凯鲁万建立起来了。到 8 世纪中叶，马格里布中部出现了塔哈尔特城。[20] 公元 800 年左右，伊德里斯王朝把非斯开发成繁荣的城市。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开罗成为穆斯林世界东部、穆斯林世界西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枢纽。在撒哈拉西部，桑哈贾柏柏尔人的政治首都奥胡达古斯特，[21] 像撒哈拉中部的宰维莱[22]一样，成为连结黑非洲和巴巴利地区的市场中心。一条条商路把这些市场中心与撒哈拉以南的市场中心连结起来，至于各条商路使用率的或高或低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利与否。这样，塞内加尔河旁的加纳/瓦加杜帝国的首都加纳/昆比萨利赫、锡拉和亚莱希，以及尼日尔河旁的考考，把穆斯林世界同热带大草原和西非林区大草原连结起来。在东非海岸，穆斯林商人在非洲大陆兴建了摩加迪沙、巴拉瓦（布拉

---

[19]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71 页中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的论述；N. 莱维茨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45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95 页中巴克利（al-Bakri）的论述；N. 莱维茨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64－66 页。

[20]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55－56 页引述伊本·萨吉尔（Ibn al-Saghīr）的话；N. 莱维茨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121－122 页；T. 莱维基（T. Lewicki），1962 年。

[21]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76 页中引述穆哈拉比（al-Muhallabi）的话；N. 莱维茨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168 页；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81－82 页中引述巴克里的话。

[22]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81－82 页中引述巴克里的话

瓦)、马林迪、蒙巴萨、基尔瓦、苏法拉等贸易中心，又在帕泰、坎巴鲁（奔巴）、基津卡济（桑给巴尔）诸岛上也建立了贸易中心。[22] 到11世纪，这些中心发展成国际性的大市场，专营来自东部非洲（津巴布韦）、东亚和南亚、以及穆斯林世界货物的转口贸易。

这样，从7世纪起因贸易发展而出现的城市的兴起，导致贸易网的扩大，从而加速了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当地经济的一体化。

贸易量的增加

城市的兴起、某些地区（如马格里布地区和班图地区）人口的增长以及国外市场（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帝国市场）的扩大而所造成的迫切需求是贸易量猛增的直接原因。这个时期的大宗交易商品可分为4大类：原料；生活必需品；家用贵重物品；和奢侈品。根据环境和地点的不同，同一商品可能列在这4类中的不同类别。 **739**

原料

最重要的原料是铁、亚麻、棉花、树胶和靛兰。加纳帝国制造的铁（产区很可能是在法莱梅河和塞内加尔河之间地带）向塞内冈比亚和尼日尔的其他地区输出。已确知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向印度供应铁。尼罗特地区诸国无疑参与了同印度甚至同穆斯林世界的这宗贸易。在马格里布，位于萨勒和马拉喀什之间的休达和奥兰地方的铁矿，到11世纪仍在开采。[23]

亚麻、棉花、树胶和靛兰的贸易与纺织业的发展有关。据记载，马格里布产亚麻，有些地区（塞内加尔河流域、埃塞俄比亚、马格里布等）产棉花。用于纺织最后一道工序的树胶，来自撒哈拉西部或科尔多凡的树胶林。靛兰可能渊源于亚洲（印度），马格里布从11世纪引进种植，肯定供应过西苏丹。

生活必需品

在非洲地区间的贸易中，生活必需品的贸易量占第一位。马格里布的小麦，由商队输出经过锡吉勒马萨，运往撒哈拉西部和苏丹地区。尽管埃及的国内市场很大，它仍有余粮由商队向利比亚和努比亚输出，或用船输到昔兰尼加。据巴克利称，伊弗里基亚的贝贾地方一直依赖小麦的好收成；年景好时，该城每天可向凯鲁万和突尼斯等城市供应一千头骆驼驮的小麦。[24]

---

[22] 见本书第21章。
[23] N.帕夏，1976年，第60页；B.罗森伯格（B. Rosenberger），1970年（a）。
[24] 巴克里，1913年，第120页。

西苏丹的小米、高粱、大米、牛油果油以及马格里布的橄榄油输向四面八方。沿海或沿河国家产的熏鱼干运往内陆。食盐买卖是必需品贸易中的重要分支。撒哈拉地区 740 (塔加扎)的岩盐和海盐在内陆相互竞争;但这种价值甚高的商品从来未能满足强烈的需求,据伊本・豪卡勒称,一匹骆驼所驮的盐块能值 200-300 第纳尔。㉕

家用贵重物品

家用贵重物品主要指奴隶和骆驼。那时,奴隶制在整个非洲大陆是社会上合法的习俗。阿拉伯文献强调穆斯林商人经营黑奴贸易的重要性,不过这一贸易实际上是双向的。在苏丹的宫廷里,有柏柏尔人奴隶和阿拉伯人奴隶,无疑也有欧洲人血统的奴隶。㉖ 有理由相信,经济增长及其必然结果(城市发展和宫廷生活显赫),造成黑非洲和穆斯林世界东部和西部都迫切需要人力。于是在那时的阿拉伯编年史中记载有大规模的奴隶贸易。

尽管这样,像 R. 莫尼和 T. 莱维基那样提出从黑非洲输到阿拉伯世界的奴隶具体估计数字,还是非常冒险的。R. 莫尼认为,中世纪时黑奴输出的数目大约每年 2 万上下,或一个世纪为 200 万人,㉗ 而 T. 莱维基的估计,单在 16 世纪,经过开罗输出的黑奴就达 1200 万到 1600 万人。㉘ 这些估计显然夸大。至少有三点理由能说明奴隶贸易量到不了上述数目:

那时的穆斯林经济发展水平仍低,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奴隶。除了下伊拉克的僧祇人(黑奴)外,㉙ 阿拉伯世界的任何地方不存在历史上与穿越撒哈拉奴隶贸易有联系的大批黑人。

由于穿越沙漠孕育着危险,所以奴隶的价格很高,不允许如此大规模贩运出境。㉚ 关于这点,颇有意思的是,那时的阿拉伯肖像画常把奴隶贩子画成钱袋上有个漏洞的人。

十字军之前,穆斯林世界从两个主要来源取得奴隶:东欧和中欧(斯拉夫人)以及土耳其斯坦。非洲的苏丹地区只占第三位。但也须指出,黑奴充作家庭仆役——阉 741 人、侍妾、奶妈、厨师等——最受赏识,㉛ 这些侍妾和奶妈的后裔,被视为全权公民同化于穆斯林社会,这从伊萨・伊本・亚齐德和阿布・亚齐德的事例得到充分证实、前

㉕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75 页;N. 莱维察恩和 J. F. P. 霍普金斯合编,1981 年,第 49 页。

㉖ 虽然这是 14 世纪文献(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316 和 390 页中引述的伊本・巴图塔的作品)中描述的习俗,可能在以前几个世纪就存在了。

㉗ R. 莫尼,1961 年。

㉘ T. 莱维基,1967 年(b)。

㉙ 参阅本书,第 26 章。

㉚ 关于伊拉克市场上奴隶的价格,见 E. 阿什托尔(E. Ashtor),1969 年,第 88 和随后诸页以及 361 和随后诸页。

㉛ 据巴克 记述,在奥胡达古斯特,一名出色的黑人厨师值 100 个“米特卡尔”(mithkāl,货币单位)以上,见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84 页。

者是人们心目中兴建锡吉勒马萨城[32] 的外来者领袖，后者出生于加奥，母亲是黑人、父亲是柏柏尔人，他成为有名的传教士，把法蒂玛王朝导向差点崩溃的边缘（10世纪后期）。[33]

由于黑非洲与穆斯林世界贸易的发展，阿拉伯马在没有锥体虫病危害的热带草原上繁殖起来。由苏丹地区各国垄断的阿拉伯马（巴巴利马）贸易，导致当地的小品种马逐步消灭，11世纪时，巴克里还提到过存在这个品种。[34] 努米底亚和努比亚后来逐渐专门繁育巴巴利马，并向西苏丹和中苏丹输出。

奢侈品

当时的奢侈品主要有纺织品、贵金属、珍珠和象牙。那时的旅行日记特别重视报道马格里布和埃及纺织手工艺品的盛况。加贝斯的丝绸制品和凯鲁万的羊毛织物，在所有市场都被视为珍品。奥胡达古斯特输出染成红色和蓝色的服装。[35] 塞内加尔中部的塔兰卡城以产细棉缠腰布（或称 *shakkiyyāt*）而闻名，由商人运到北方和邻国销售。[36] 根据夏尔·蒙泰伊的著作，某些历史学家把纺织手工艺品和纺织品贸易的发展看作是伊斯兰教扩张的结果。实际上，社会变化（城市的发展、对外贸易促使统治阶级财富大增以及人口的增加）看来才是各地纺织手工艺日益发达的根本原因。显然，新的条件意味着人们无需再依赖兽皮或某些树皮制成的织品充当蔽体之衣，像他们在往昔因人口稀少分散，社会组织水平不高，因而某些道德观尚不流行的那样生活。

至于贵金属，第一位当然数黄金。在我们讨论的这段时间里，存在几个产区，从那里向非洲其他地区和国外市场不均等地供应。按重要性递降排列为：西非的班布克/加拉姆和布雷地区；南部非洲；及努比亚。

铜是制造艺术品和其他奢侈品的原料，在某些地方（如塞内加尔河畔的锡拉，把铜 742 制成圈环当货币用。[37] 总之，在产铜区（加丹加、阿伊尔、撒哈拉西部）与因艺术发展引起对铜迫切需要的约鲁巴诸国及北部非洲之间，铜的贸易量很大。[38]

马格里布南部和中苏丹以出产珍珠和宝石（玛瑙、天河石等）闻名。位于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贝贾地方，蕴藏着珍贵矿和绿宝石，由穆斯林开采加工。[39]

---

[32] 巴克里，1968年，第43页。

[33] 关于阿布·亚齐德，见R.勒-图尔诺（R. Le Tourneau），1954年，及本书第12节

[34] J. M.库奥克，1975年，第102页；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89页；H. J. 费希尔（H. J. Fisher）论述了苏丹马的问题，1972年，1973年（a）。

[35] 巴克里，1913年，第159页。

[36] C.蒙泰伊（C. Monteil），1926年。

[37] J. M.库奥克，1975年，第97页中引述巴克里的话；N.莱维蔡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78页。

[38] 参阅本书第16章。

[39] J. M.库奥克，1975年，第50页中引述雅古比（al-Ya'Kūbi）的话；马苏迪（al-Mas'ūdi），1861-1871年，第3卷，第43-50页。

技术的传播

贸易和与之同时发生的人口流动，起着推动技术传播的作用。但是，我们所掌握的这方面材料甚至更为缺乏。我们当作资料来源提供者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更关心的是货物的分配机制而不是生产过程。考古资料相互间有很大矛盾，使我们难以对我们所论述时期的技术发展情况提出正确的见解。我们现在已知的情况表明，有5个领域取得了技术进步并传播全洲。它们是：采矿和冶炼；农业；手工业；贸易技术；作战技术。

采矿和冶炼

各地都兴起了采矿和金属冶炼。S.格赛尔认为，马格里布采矿业最兴旺时期不是古代而是中世纪。[40] 在穆斯林世界西部，多次改良炼矿石的技术。在穆斯林西班牙，人们采用了从蓝铜矿中分离尾矿的新工艺。这一工艺是将矿石泡入油中、然后投入急流，金属细粒随油浮起并由水带走，而杂质则沉底。马格里布地区很有可能也用此法。[41] 关于铁在非洲大陆传播问题的辩论还未得出结论，不过，L.M.迪奥普认为炼铁技术最早发源于本地的观点，[42] 比有些历史学家提出的从外部传入的假设似乎更为可取；不管怎样，现在人们公认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千年中，许多非洲民族已自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这点对班图人[43]和生活在加纳帝国西部大西洋海岸一带的人看来确实如此。[44] 无论如何，非洲大陆总的进程极可能加强甚至改进金属冶炼技术。

743

农业

在农业领域，这一时期中耕作技术和新作物的传播十分突出。马格里布和撒哈拉绿洲采用了“福加拉”(石砌灌溉渠道)(*foggāra*) 新技术，使得扩大大米、棉花、甘蔗等新作物的种植有了可能。[45]

甘加拉农耕区（毛里塔尼亚的阿萨巴地区）有墙的农田和梯田，其残迹至今可辨，无疑建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治时期。[46] 至于东部非洲在灌水的农田里种水稻看来是通过亚洲移民传入的。

在地区间贸易的促进下，作物和新的品种自原产地向外扩散。亚洲水稻的一些变种传

[40] S.格塞尔（S. Gsell），1913—1928年，第8卷，第16页。
[41] N.帕夏，1976年，第60页。
[42] L. M 迪奥普（L. M. Diop），1968年。
[43] G. W. B.亨廷福德（G. W. B. Huntingford），1963年；G.马修（G. Mathew），1963年；P. L.欣尼（P L. Shinnie）1971年，并见本书第6章、第23章。
[44] J. M.序奥克，1975年，第120页；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98页。
[45] N.帕夏，1976年，第46页。
[46] C.图佩（C. Toupet），1966年，第19页。

到近达埃及绿洲和摩洛哥南部。高粱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作物，传播到上埃及、昔兰尼加、阿尔及利亚的特勒，甚至在叙利亚和欧洲南部种植。瓦加杜的索宁克人口头传说中称作 *darma yill*(阿德拉尔小米)的小麦品种，向南传入萨赫勒地区。

橄榄树的种植在马格里布有很大发展，几乎到了使该地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的地步。原产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枣椰树，早在法老时代已出现于埃及；但只是到了7－11世纪才大量发展。突尼斯南部和撒哈拉西部成为枣椰树的主要产区。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商业社会把在菜园中种植的瓜和黄瓜等蔬菜引入苏丹地区的城镇（加纳、加奈姆）。随着印度洋贸易的发展，香蕉和椰子的栽培也在扩大。

手工业

手工技艺的传播过程更是鲜为人知。有两事值得一提。据巴克里称，以印刷品闻名的斯法克斯，受惠于亚历山大居民印刷的方法。[47] 744

仿效中国先是用亚麻后来则用棉花造纸。从10世纪末以后带来了真正的革命。在此之前，使用羊皮或纸莎草来传播文件，无法提供促使知识大众化的条件，用新方法造成的廉价纸，广泛推动了知识性活动的开展。[48]

贸易技术的进步

贸易的发展和由此造成的货物量增加导致采用日益先进的支付手段。这一发展最显著的特色是地区间经济来往逐渐货币化。虽然马格里布的货币制度与穆斯林世界的货币制（以金第纳尔为基础）连结在一起，然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则存在多种货币形式：各种贝壳（包括马尔代夫群岛的玛瑙贝）、铜环、盐块，布料，都可同时用于交换。

贸易技术在穆斯林世界尤有显著进步。那里的商人已经使用付款通知单、汇票和付款凭证（或支票）。所以，伊本·豪卡勒于10世纪末的作品中说，他在奥胡达古斯特见过一张面额为4000第纳尔的支票，是该城某个商人开出付给锡吉勒马萨的一个人的。[49] 那时从事穿越撒哈拉贸易的商人，在家庭或合股公司的基础上建立起十分有效的商业网，并在所有重要地方都有客户。正如雅库特所确切地指出的，在诸如加纳、昆比萨利赫之类城市那样的货物集散中心，这些商人聘用中间人（翻译），通过他们的帮助，同穆斯林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做生意。[50] 希罗多德之后有许多编年史学者提到的"无声贸易"，[51] 看来是（如保罗·法里亚斯所说的）一个难以绝迹的神话。[52]

---

[47] 巴克里，1913年，第46－47页。

[48] 有关这个问题参阅本书第1章。

[49] J. M.库奥克，1975年，第71页；也见N.莱维茨恩，1968年（a）。关于穆斯林世界的贸易和货币，参见M.隆巴德，1971年（a），第5－8章。

[50] J. M.库奥克，1975年，第183页；N.莱维茨恩和J. F. P.霍普金斯合编，1981年，第172页。

[51] 希罗多德（Herodotus），1872年，第IV集，第237页。

[52] P. F.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P. F. de Moraes Farias），1974年。

745 作战技术

在苏丹地区热带草原的一些国家中，一方面由于阿拉伯马的输入增加和冶铁业的发展，另方面由于各社会内部的进化，使军事战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骑兵开始取代步兵在作战中起决定性作用。兵器技术也有变化。弓和箭是平均主义社会特有的"平民武器"，[53]人人都能制造，此时逐渐被需要较发达的社会结构才能制造的铁制兵器所取代。盾牌制作在这时期也有长足的进步，有一种叫"拉姆塔"(*lamta*)的盾牌(由撒哈拉的拉姆塔氏族群体制造)享有盛誉，远到马格里布都有所闻。[54]总之，由于更迅速的运动手段(马、骆驼)和改良的兵器，从此以后，非洲社会群体之间的战争在非洲社会的进化过程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伊斯兰教扩张及其社会意义

从意识形态活动的角度看，公元7—11世纪这段时期的特点是：伊斯兰教在基督教、犹太教和多神教遭到削弱的情况下取得发展。7世纪末，马格里布和埃及还只有包括阿拉伯征服者在内的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但到11世纪末，整个马格里布、埃及和撒哈拉西部以及西部非洲、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许多人都皈依该教。伊斯兰教这种异军突起有种种原因。根据R.莫尼的见解，伊斯兰教在西部非洲的成功归因于采取强迫手段使人改宗和该教教义简明易懂，"容易被黑人接受"。[55]

这种解释是肤浅的。虽然古罗马、拜占廷以至更近的殖民主义都自愿成为推广基督教的工具，并同时使用暴力，但是伊斯兰教席卷热带非洲的扩张，所采取的却是商人大批不断涌入的形式。另外，所谓伊斯兰教教义比基督教要简明的论断，并非基于对两种宗教的客观分析，更多的是出自偏见。

746 让我们概括地说，阿拉伯帝国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扩张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和社会新情况，及其与非洲社会内部发展过程的交互作用，才促使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张。[56]

7-11世纪非洲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这个时期的社会变化有三大基本特征：人口的大批流动；因分工引起的社会差别加速扩大；以一些国家中的起义、内战为标志的阶级斗争的发展。

---

[53] J.古迪(J. Goody)，1971年，第43页。

[54] J. M.库奥克，1975年，第49页中引述雅库比的记事；和同书第54页中引述伊本·法基赫(Ibn al-Fakih)的记事。

[55] R.莫尼，1961年，第520页。

[56] 见本书第3、4章。

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显著改变了非洲的人文地理，不管关于班图人大迁移的争论结果如何，该族大规模流动在本章论述时期内连续不断地穿越中部非洲、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57] 阿拉伯征服初期的政治纷争，特别是穿越撒哈拉贸易的发展，导致把一些柏柏尔人部族赶入撒哈拉。可能正是由于这些新来者的压力，使某些黑色人种如原始沃洛夫人、塞雷尔人从塔甘特（毛里塔尼亚）向西南迁移（塞内加尔西部）。加纳的索宁克商人成为穿越撒哈拉贸易的中间商，在尼日尔河及其支流沿岸建立了一连串商业中心，其中最繁荣的是迪亚和杰内。[58] 从阿拉伯半岛、印度、亚洲西部和印度尼西亚来的移民一批接着一批，东非海岸和马达加斯加的人口明显膨胀。[59]

社会差别

较为先进的劳动分工带来了社会差别发展过程的加速，而劳动分工又是贸易发展的结果。其主要特征是，马格里布和苏丹出现了沟通各个地区间贸易的专业中间商阶级。这些经纪商设法超越他们的种族差异（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黑人），形成了一个能够充分意识到其利益之所在的真正的阶级。他们在各地社会的经济中据支配地位，甚至渴望接管政权，至少想利用国家作为保障其经商安全的警察机构。 747

至于掌握政权的军事贵族，对外贸易使它能够获得额外的统治手段（在苏丹地区各国中是兵器和马匹，在穆斯林国家中是黄金），有利于加强它对普通老百姓的统治。这样，在大多数国家中，区分这些贸易的受惠者（贵族和商人）与普通百姓（农民和城镇小手工业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贸易发展的普遍后果是，建立在亲属和部族关系上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出现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在马格里布诸国是土地私有）和贸易为基础的社会新秩序。11 世纪时津巴布韦的形成，刚果王国的建立（最后完成于 14 世纪），以及豪萨诸邦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受东非沿海、埃及和撒哈拉地区发生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贸易兴旺的结果。新近关于 13 世纪时著名的曼德族皇帝松迪亚塔传说的提法，认为是马林克族王公联合索宁克商人一起进行猎取奴隶的远征，起了促成马里帝国兴起的作用。[60] 但是，与许多作家看法不同，我们并不认为贸易是形成这些国家的动力。[61] 其动力应该是这些社会的内部力量，它已达到成熟阶段，能够对外来的压力作出有利反应，而贸易只是加速了这一发展进程。特

[57] B. A. 奥戈特（B. A. Ogot）编，1974 年；并见本书第 5、6 章。

[58] 关于杰内的建立见 C. 蒙泰伊，1903 年。但是 S. K. 麦金托什（S. K. McIntosh）和 R. J. 麦金托什（R. J. McIntosh）最近的研究证实，该城的起源更早。

[59] B. A. 奥戈特，1974 年；并见本书第 4、5 章和 21—25 章。

[60] W. 卡米索霍（W. Kamisokho），1975 年。

[61] 参阅“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中心”，1974 年，特别是 J. 絮雷－卡纳尔（J. Suret-Canale），1974 年。

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才提供了与外界社会进行贸易的基础。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现象乃是生产和产品分配辩证关系的结果。即使是这样，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的扩张是经济转化和社会变化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变化席卷了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马格里布、埃及、撒哈拉、东部非洲、中苏丹和西苏丹。同古老的多神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基督教、犹太教各部族的变种相比，伊斯兰教及其普济主义教义的价值更大。前者对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说法已经不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要求。所以，在本章论述的时期冲击马格里布诸国的哈列哲教派的运动、阿布·亚齐德的起义和其他救世运动，代表了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反对，首先是要求结束社会不公的决心。[62] 阿尔莫拉维 748 德运动一开始即以暴力攻打穆斯林商人的城市奥胡达古斯特，主要并不是因为该城接受了非穆斯林加纳的卵翼，[63] 而是因为撒哈拉西部的柏柏尔群众要求诉诸真理，纠正社会不正之风和废除不公正的税收。[64]

在西苏丹和中苏丹各国（加纳、加奥和加奈姆），穆斯林在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这使他们在总体上逐渐上升到社会高层。在加纳，皇帝所挑选的翻译和大部分大臣都是穆斯林。在加奥，不皈依伊斯兰教难以行使其统治权。[65] 11 世纪时有一位马里国王，在一名据说用祈祷解除了旱灾[66] 的穆斯林影响下，改信伊斯兰教。这件事表明，在苏丹地区的社会中，伊斯兰教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塔克鲁尔国王沃尔·迪亚比 [67] 改变宗教信仰，是又一个说明伊斯兰教吸引力的实例。所以，穆斯林在经济中的作用和社会上的声誉，才是他们的宗教得到成功的决定性原因。

阶级斗争的发展

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特点以及各个社会群体内部统治和剥削程度的差异，阶级斗争和一般社会冲突的紧张程度也有所不同。C.A. 朱利安、A. 拉鲁伊，还有较少程度上的 G. 马尔赛都曾分析那时马格里布此起彼伏的起义和教会分立运动都是阶级斗争的插曲。[68]

在苏丹地区各国，阶级斗争的画面不太清楚。但是 11 世纪末加纳/瓦加杜帝国的覆灭可能是内部腐朽发展的最后结果。根据我们的设想，这种腐朽是由于加纳统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的冲突而造成：其中一个集团已经伊斯兰化，同商人结盟，另一个集团仍忠于传统宗教和农村社会。随着人民作为整体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两个集团间的不和加剧。[69] 不管这种假设的可取之处究竟有多大，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地区间贸易对

---

[62] C. A. 朱利安（C. A. Julien），1952 年，第 63 页。
[63]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92 页中引述巴克里的见解。
[64] 同上，第 86 页。参阅本书第 13 章。
[65] J. M. 库奥克，1975 年，第 109 页中引述巴克里的话。参阅本书第 3 章。
[66] 同上，第 102—103 页。
[67] 同上，第 96 页。
[68] C. A. 朱利安，1952 年，第 28 页；A. 拉鲁伊（A. Laroui），1970 年，第 91—92 页；G. 马尔赛（G. Marçais），1946 年，第 34—44 页。
[69] 见 A. 巴思利（A. Bathily），1975 年，第 34—44 页。

大陆各社会群体施加互相矛盾以至对立的影响。在有些事例中，它有利于政治的一体化(如阿尔莫拉维德帝国和法蒂玛帝国，以及后来的马里和桑海帝国)；在另一些事例中，它相反导致长期沿袭下来的国家结构的瓦解（如加纳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帝国)。

结 论

749

7－11世纪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是个独特的时期。现已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使我们了解当时发展的每个方面，但已有把握可以断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肯定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上文对贸易关系以及技术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就是为了阐述那个时期非洲社会历史而提出的两个基本论点。

第一，就总体而言，非洲经济是一种自给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生产力水平随消费水平而定。商品交易不是根据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是根据其使用价值。不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建立在各自所产商品之间互补性的基础上；面这些在当时比现在更加受自然条件的局限，因为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但是把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它们的发展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由一个事实来说明，即有些社会社会差别已发展到相当突出的程度，具备了向建立市场经济迈进的相当复杂的经济结构（马格里布地区和苏丹地区)，而另一些社会仍处于成群结队地采集食物和狩猎的阶段。所以，把非洲作为整体，历史学家是难以确定其具体的生产方式的。[70]

第二，本章对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进行概括分析后得出一个主要论点。非洲在7－11世纪期间，由于地区经济朝经济一体化进展，能满足大部分自身对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要。在那时由地中海和印度洋体系构成的世界经济范畴中，非洲、特别通过它的黄金输出，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

[70] 见“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中心”对这个主题的讨论，1974年，特别是J.絮雷－卡纳尔，1974年；又见卡特琳·科奎里－维德罗维奇，1976年。

28 公元7至11世纪——非洲形成期的五个世纪

J. 德维斯
J. 范西纳

750

导　言

近三十年来的历史学研究告诫我们，尤其是对于非洲，没有可以放心使用的统一模式，也没有可以自动区分的历史阶段，本章所述的这个阶段更是如此。甚至对本卷所选用的基督纪元第7至11世纪这一广泛的时间界限也大有可以提出怀疑的余地。起始的时间对非洲大陆的北部确有某种实际的意义，至少在该世纪中叶之后在非洲大陆北部出现了伊斯兰教。对于其他地区，这个时间也同样是有意义的，但与伊斯兰教并无关系。就我们目前所知，在公元6、7世纪时，确有一些新的特征出现。这些新特征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得到了发展，特别在非洲的中部和南部更是如此。如果再联想到这个时间——公元7世纪或穆罕默德纪元1世纪——曾一直被认为对西部非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上述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但现在情况已不再是如此，调查研究"赢得"了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在西部非洲，本卷所考察的巨大变化起源于基督纪元前第一个甚至第二个一千年。[①] 对公元11世纪这个时间来讲，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它对西部非洲之所以很有意义，是因为它标志着马立克学派逊尼教义的确立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明显更迭，但对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这个时间也许就并不同样重要了。不过，仍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公元1100年以后，一个新的世界即将在非洲大陆的某些部分形成，例如约鲁巴诸城市和东非沿海诸城市的繁荣兴旺，以及马里帝国的诞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王国在中部非洲的发展成长，以及西部非洲一些新王国的出现和游牧民们如科伊人、富拉尼人和巴卡拉人的扩张。

751 我们曾多次试图找出几个共同的特征以概括非洲大陆在这五个世纪里总体上的演变特点。但没有能真正经得起检验的结论，不论是把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或者是从它的任何特殊部分来考虑都是如此。无论是赤道以北颇具特色的穆斯林扩张，还是所谓的"第二铁器时代"（我们在后文还将细述）都不能构成上述那种无可置疑的共同特点。

上述这些简要的分析应能提醒我们务必小心谨慎。研究工作正在迅速取得进展，它的每一个发现都有可能对我们以前肯定的一切提出疑点。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还会变得更加突出。这就表明，我们今天从分析这五个世纪所得出的结论竟

① 最重要的新近著作是：S. K. 麦金托什（S. K. McIntosh）和R. J. 麦金托什（R. J. McIntosh），1980年（b）；J. 德维斯（J. Devisse），1982年。

是如此地具有假设性，其中有一些是如此地脆弱，而且肯定是临时性的。但是我们仍然必需把这些结论放在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面前，供他们考虑，这样做仍是正确的。首先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对这五个世纪，我们第一次可以如此明确地说：尽管在方法论上务必小心谨慎，尽管各个地区之间有着必然会有的细微差别，人类仍然有可能探索出一系列贯穿整个大陆，可资比较的发展特征。

在上述五个世纪里，非洲主要社会文化景观的地理布局业已固定成形。人们可以从中看出，经济的成熟、社会－政治体制的形成和集体主张的体现，凡此种种均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五个世纪里，非洲正在缓慢地萌芽，随之而来必有开花结果、兴旺发达。

其中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在农业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地区逐步实现了定居，这种趋向某些地区远在7世纪之前就已开始。技术的发展构成了第二个主要特征，这种发展包含更好地利用资源、劳动力的分工和贸易的开展。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已为历史学家所识别。同时，集体主张的体现、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及整套文化表达手段也都已形成。这一切保证了人们的再生产并得以代代相传。

定居空间的构成

定居本身并不一定是进步的标志，它并非如经常所说的那样，是和半游牧或游牧的牧人或者不定居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那种自由地位相对立的。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它是与环境发生一种新关系的结果。气候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不利的）、人口的增长、以及人们在谋求开发赖以生存的土地时造成的社会日益复杂化，都必然导致定居生活。而非常可能的是定居又导致人口进一步增长，并且促进劳动分工，从而使农业的进步更显得迫切。这种相应地使生产食物所需的劳动力总量上升的增长，成为人类群 **752** 体最佳的生存战略，这在非洲也和其他大陆完全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并非所有地方都能找到适合于推行这种生存战略的条件。对本卷所述时期发生的这些变化的研究，还仅仅处于开始阶段，远不能为整个非洲大陆提供明确的答案。不过，所有进行过调查研究的地方（主要的是属于考古范畴）都表明对食物格局的各种模式进行定量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在所发现食物的痕迹中观察到的数量、性质和质量方面所存在差异的意义。

中部和南部非洲

讲班图语各族的扩张约在公元6世纪真正告一段落。[2]次大陆从那时起凡气候条件允许的地方全被农民占据了，到处都建立了适合当地的食物生产复合体。在中非森林地带推广一种每年清理一块田地为基础的农业技术，这种土地上种出了薯蓣、大蕉和蔬

---

[2] J.范西纳（J. Vansina），1984年；D. W.菲利普森（D. W. Phillipson），1977年（a）；T. N.赫夫曼（T. N. Huffman），1982年，第133－138页，并见本卷第6章。

菜，但在一个仍以诱捕和采集为重要手段的生产复合体中，种植食物仅仅是因素之一。从森林地带往南，在采采蝇横行的热带大草原，[3] 农业体制建立在一年围绕两块田地的办法之上，一块是海边森林中清理出来的田地，另一块是热带大草原的田地。此处谷物种植占重要地位，这种复合体主要从事狩猎而非诱捕，采集则仅仅是一种补充手段。在非洲的东部和东南部，以及中非的南部，食物生产建立在畜牧和种植适于在热带大草原生长的谷物为基础的农业上，主要农作物是小米、高粱或粟，这要根据当地湿度的变化而定。在这里，狩猎、诱捕、采集和小规模的捕鱼活动都不如在中部非洲那样重要。正如其他许多地区，畜牧业在较干燥的地方占统治地位，博茨瓦纳、乌干达北部和苏丹南部，以及与肯尼亚毗邻的地区均属此类。不过，这里并不总是推行一成不变的古老畜牧方法。公元800年以后，养牛业有了惊人的进步。在公元600年时，完全过着养牛牧畜生活的仅限于非洲之角、撒哈拉沙漠边缘的萨赫勒地区（特别是毛里塔尼亚）以及可能还有从苏丹南部白尼罗河以东一直延伸到坦桑尼亚中部的地区。但是，从公元9世纪起，一 753 种新的东南非经济复合体的变种在博茨瓦纳得到发展，[4] 其中养牛业居统治地位。为完善这种牧畜体制经历了好几个世纪，这才使科伊科伊人得以占据纳米比亚和开普省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的所有场所。他们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做的。

东部非洲

在最广义的非洲东部，牧民扩张这一历史性运动可能与传播背部有隆肉的牛（瘤牛和桑加种牛）有联系，这种牛比其他品种对干热有更强的适应性。这类品种在埃及和阿克苏姆久享盛名，在基督教努比亚也能看到，但是，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白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一带却是公元1200年之后才有这种牛。有位作者[5] 把尼罗特牧民们的扩张和公元1200年之后获得这一品种的牛一事相联系，并且还认为这也是公元1200年以后推动东非马萨伊语族和尼罗特苏丹讲阿拉伯语的巴卡拉人扩张的原因。但是桑加品种的出现要比瘤牛品种早，[6] 在远至南非都可看到的这种品种却在那里又产生了另一个品种。也许正是在本卷所述的这些世纪里它传播了开来，甚至很可能这确实与科伊人的扩张有着某种关系，整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除上述情况外，这类品种可能对大湖地区牧民的形成也起了作用。这同样发生在本卷所讨论的

3　需要对采采蝇从历史角度作更为细致的研究，见J. 福特（J. Ford），1971年

4　J. R. 丹鲍（J. R. Denbow），1979年，1984年。

5　N. 戴维（N. David），1982年（a），第86－87页，1982年（b），第54－55页。

6　关于这一品种请参阅H. 爱泼斯坦（H. Epstein），1971年。在今日卡拉哈里沙漠西北角的措迪洛发现了桑加种牛的胸椎骨。其生存年代约为公元1000年，参阅J. R. 丹鲍，1980年，第475－476页。有些骨架属于一头带隆肉的牛，可能是桑加种牛，是在赞比亚的克拉莫莫遗址发现的，其生存年代约为公元1000年。曾经宣布过瘤牛远在公元1000年以前已传到了马达加斯加，见B. 费根（B. Fagan）和J. 南昆（J. Nenquin）（合编），图片Z，插图1，1966年。又见J. O. 沃格尔（J. O. Vogel），1975年，第91页，插图93，并与同页的其他插图比较；B. 费根，1967年，第65－70页，插图67。至于雄性的（马达加斯加），见C. 拉迪米拉（C. Radimilaby），1981年，第63页。

时期[7]。更为重要的是，此事可能导致更为集约地使用东部非洲所有干旱、贫瘠的土地。非洲的西南部对开展农业来说实在是太干旱了，未曾经历过很深刻的变化，即使如此，基督纪元之初那里也曾出现羊的饲养。

西部非洲

西部非洲经历了一种既相似又不同的演变。在森林区和肥沃的大草原，发生的现象与我们前面讲过的相类似。人口的增长可能已经带来了破坏森林植被的危险，我们手头 756 有关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少得可怜的资料，导致人们假设该地区的最早占有者是务农的；在贝宁（尼日利亚）的森林地区，务农者向森林进军之事有相当多的文献记载[8]。

在热带大草原比较干旱的部分和萨赫勒地区，气候经过连续好几个世纪的变化，其恶化的影响在《非洲通史》第 II 卷所叙述的时期已能局部地感觉到，而到本卷所述时期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我们尚不能确切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但人们多少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即有一些正在成为定居者并从事植物栽培的人群逐渐地从东北向西南或是南方迁移。在那些没有河流可以贮存用水的地方，人们也经历了数千年的组织过程，[9]他们靠下雨和最低限度的必需品来发展真正的农业。在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泛滥平原上各种形式的定居点所形成的复合体逐渐一清二楚。由于众多的原因——并非所有的原因都是经济的或气候的，这两个地区在河流环绕中的土地成为基督纪元前人口密度很高和经济结构错综复杂的地区。[10]随着两河北岸与撒哈拉沙漠之间的地区日益变干而来的是人们拼命挖掘深井，[11]务农者纷纷撤走，而为放牧者所取代，后来又来了赶骆驼的人。这一切似乎是与两河南岸继续保持丰富水源的土地上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的现象同时存在。

我们现在多少有可能对几个典型的区域勾画出它们的轮廓。萨赫勒是一个畜牧地区，那里的人们依靠牛奶维持生存，以采摘野生谷物作为补充，并以狩猎来完善他们的食物，而耕作一事只在那些地下水位允许引水灌溉的地方才有可能。新石器时期曾有过的渔业[12]已经无处可见了，这种重大的变化使那里的居民丧失了他们最经常、最丰富的基本食物来源，这类食品现在只有在河谷中才能找到。也许是因为对"吃鱼的爱好"才导致萨赫勒地区从南方购买干鱼或熏鱼，不过这一点至今尚未为考古学的证据所证实 757

---

[7] 如果我们从陶器式样的变化来识别他们的到来，那么他们来到日期可能会在公元 8 世纪。见 F. 范－诺坦（F. Van Noten），1983 年，第 62 页；M. C. 范－格伦德贝克（M. C. Van Grunderbeck）、E. 罗奇（E. Roche）和 H. 杜卡勒蓬（H. Doutrelepont），1983 年（a），第 44 页，1983 年（b）。

[8] P. J. 达林（P. J. Darling），1979 年。

[9] J. 德维斯，1985 年（b）。

[10] 《塞内加尔全国地图集》（Atlas National du Sénégal），1977 年，图 18 和按语。

[11] 根据 J. M. 库奥克（J. M. Cuoq），1975 年，第 147 和 152 页，伊德里西（al－Idrisi）说（这是少有的说法），公元 12 世纪时塞内加尔河湾以北……"有着道路，但留下痕迹的人已不可考，而道路也正在逐步消失，因为旅行者实在太少了，地下水位则越来越深……"（重点是我们加的）；考古学已证实了这种说法。

[12] V. 鲁（V. Roux），1980 年。

754




(e)


(f)


(g)

图片28.1 非洲牛的品种
(a) 南非乳牛群，卢巴姆巴（洛马米，扎伊尔）；
(b) 存（扎伊尔）阿鲁营地的卢格韦尔种黑白公牛；
(c) 来自卢旺达的公牛；7岁，体重550公斤（这是该地区牛很少达到的重量）；
(d) 德克斯特牛与南非乳牛杂交的母牛；
(e) 恩达玛公牛，基桑巴，扎伊尔；
(f) 弗里斯兰乳牛群（加丹加饲养与食品公司，沙巴，扎伊尔）；
(g) 泽西种母牛，卡塞塞（沙巴，扎伊尔）。

狩猎本身看来不能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资源。[13] 当各种经济上的迫切需要迫使人们非得在一个资源不充足的生产环境中维持生计时，进口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14]

两河流域是经济结构错综复杂的地区。在沿河的条状地带，由于居民人数、劳动分工及权力机构的发展，很可能已经形成对土地的激烈争夺。当地水域是古老的久已确立的渔民居住地。[15] 在公元 7 世纪，渔民们肯定已经从事把鱼晒干——甚至可能熏干——并出口的行业。[16] 河流还提供其他食物：海龟，甲壳类动物，河马和鳄鱼的肉。[17] 在沿河地带之外则是狭长的相互补充的地带，那里有不需要过多水分的农作物、以及那些如果被人们从河流区移开是很难生长的作物。当本卷所述时期开始之前，这里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是最卓越的定居地区了。[18] 当人们认真观察农民如何在最不干旱的土地定居的过程时，就会发现大规模清理土地对环境破坏的影响确是十分巨大的。[19]

离开河流周围享有特殊优势的地区只有几公里的地方，特别是辽阔的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发现了具有非常严密的农业组织形式的证据，节约用水并擅长利用一切对生命有用的作物。虽然并非这种熟练农业技术的所有方面在公元 7 世纪以前都已具备（我们还没有在这里进行考古研究），但是有很大可能，那些开发土壤的精致技术（后来著名的"族群"，诸如塞雷尔人，即以此为生），有许多正是在公元 7 世纪到 9 世纪之间产生的。

位于两河北岸的土地，由于缺乏雨水逐渐被务农者所抛弃，而逐步变成放牧地区。在公元 11 世纪或者更早一点的时间，富拉尼人从现在的塞内加尔开始向外扩张，极其可能正是从这些地区开始的。也许这也和获得瘤牛一事有联系。

撒哈拉

758　在二、三千年以前，撒哈拉及其边缘以北和以南的地区逐渐被它原来的居民所抛弃，原因是渐趋枯竭的资源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食物。从基督纪元 3 世纪起，骆驼的传入在这里形成了一场食物供应和运输的革命。[20]

撒哈拉及其周围地区广阔的地理空间全部进行了重组。沙漠中的绿洲已不再仅仅是供人们居住的地方，而变为季节性迁移放牧体制的集散地，一切具有充足井眼的道路均得到充分利用。骆驼的使用使长距离载重运输成为可能，这是一个讨论任何有关撒哈拉对外联系问题时都要考虑的因素。这种现象到拜占廷时期结束时规模更大了。

---

⑬ A. 霍尔（A. Holl），1983 年。

⑭ 巴克里（al－Bakri），1913 年，第 158 页，提供了关于这种进口的资料。

⑮ G. 蒂尔曼（G. Thilmans）和 A. 拉维塞（A. Ravisé），1983 年；J. 加莱（J. Gallais），1984 年；S. K. 麦金托什和 R. J. 麦金托什，1980 年（b）。

⑯ S. K. 麦金托什和 R. J. 麦金托什，1980 年（b），关于杰内－杰诺考古遗址。

⑰ 巴克里，1913 年，第 173 页，对住在塞内加尔河岸边的人猎取河马作了精彩的描写。

⑱ 稻米（*Oryza glaberrima*）种植已为杰内－杰诺考古遗址的发掘所证实，但还不能肯定这究竟是用水灌溉而种植的水稻还是旱稻。

⑲ B. 沙瓦纳（B. Chavane），1985 年。

⑳ R. W. 布利特（R. W. Bulliet），1975 年，第 111－140 页。

仅仅几个世纪的时间，饲养骆驼的集团和掌握道路的那些人控制了撒哈拉沙漠　撒哈拉人，绝大多数讲柏柏尔语，在几个世纪的沉寂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移到了沙漠的边缘，重又起着一种十分活跃的作用。沙漠主人的这种复苏，正巧和北方的穆斯林国家对黄金需求的增长相吻合。于是，公元10到11世纪这段历史赋予撒哈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这件事（和其他一些事）都说明了"阿尔莫拉维德人冒险"的内在原因。

北部非洲

在北部非洲要看清各个生产区域的演变就更加困难了，这很可能部分是由于受古代殖民城市居住地长期影响的结果。一般更为人知的是农村与这些城镇间的关系，包括其抵制和反抗的情况，而不是从事生产的村社组织本身。举例而言，人们充其量能从资料中知道巴尔哈瓦塔人在摩洛哥推行一种有条理的经济，这种经济以小麦为基础并能出口，阿拉伯文的资料提到此事的时间是在公元10到11世纪；人们也能从资料中知道苏斯人在公元9世纪制作蔗糖（但起于何时、处于何种环境则不得而知）；人们同样知道伊弗里基亚曾是一个非常大的生产基地（这时候我们已掌握公元9世纪对它的描述），它的产品主要面向从海上出口。但是只有全面进行考古发掘，我们才有可能掌握可与非洲大陆其他部分相比拟的情况。

在尼罗河流经的各个地区，自有组织以来没有明显可与比拟的情况可供记述。至少在埃及，食物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产问题，而是一个城市消费过量的问题。在本卷所述的这段时期里已出现了小麦供应的深刻危机，这是一个新的经济纪元开始的标志。要供养像开罗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它在公元11世纪时已有数十万居民，759
对黑非洲那些面临着生产和消费的村社来说，所提出的问题与他们是极不相称的。[20] 这些危机是如此地严重，以致人们总是对当政的统治者——不管这些统治者是谁——所采取的政策大肆攻击，并使大量进口成为必需。供养埃及的居民是件全国性的大事，它包含着需要在全国范围推行的生产、财政和进口政策。因此它几乎完全超出我们正在讨论的非洲其他地区问题的范畴之外了。

法蒂玛的使臣乌斯瓦尼在完成努比亚之行（约在公元976年左右）后，给栋古拉（顿库拉、Dūnkūla）[21]统治者作了如下的描述：我们现在谈论的地区，在横跨河流的不同地段，情况都各不相同。努比亚北方，即第二瀑布以北的巴滕哈杰尔地区已纳入埃及的经济，尽管它仍处于栋古拉基督教统治者的牢固控制之下。第二瀑布以南的地方却是

[20] 关于饥荒的论述，请阅T.比昂基（T. Bianquis），1980年，和本卷第7章所举的事例。

[21] 这里我们采用了这个地名的阿拉伯文词形，栋古拉经常由这种词形来代表。这是一个重要的遗址，考古学近来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情况。

一个新的经济世界。[23] 这位旅行者告诉我们，那里有无数从事生产的村庄。[24] 逐渐地，当他经过最后的几个瀑布向南到达最远的王国阿勒瓦时，他进入了一个没有棕榈树或葡萄藤的区域，这里只有白高粱，“它看起来好像大米，人们用它来做面包(?) 和啤酒”，[25]肉类很丰富，因为有大量的畜群。我们已经身处黑非洲的社会之中，何况这位作者表明，尽管他好奇并负有使命，但他几乎得不到任何他所寻觅的信息。[26]

在目前的研究状态下，我们难以下断语，说埃塞俄比亚或者马达加斯加是否有过类似的发展，也无法说明它们的发展阶段是更早些（如埃塞俄比亚）或更晚些。

非洲各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公元 7 世纪至 11 世纪，非洲各个社会的一般进程总是因时间、地点之不同而其形式各不相同。概括说来都是朝着巩固其早期地位，调整和完善食物生产复合体，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的方向发展。在这几个世纪里，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肯定无疑的。但即使是增长得非常缓慢，即使是我们对此知道得非常之少，我们也不能加以忽视。因为在许多地区，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周围环境的日益恶化。这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也许就引起了人口的缓慢流动。这还不是迁徙，而当今的研究逐渐使人们看清了这一点。从德兰士瓦向津巴布韦相反方向转移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它明显地是从公元 8 世纪或 9 世纪开始的，它似乎与该地区人口过剩的结果有关。尼日尔河内陆三角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公元 10 世纪和 11 世纪，原来泛滥平原上未开垦的小丘也住上了人家。[27] 更进一步对气候变化作精确研究肯定会大大加深我们对上述问题的了解。即使是温和而短暂的变化也可能突然使人口出现相对过剩的现象，或者相反地产生暂时性的更有利的环境条件。[28] 近年来曾多次做出努力以解释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的迁徙是环境所致，但尚未得出最后结论。[29]

新的生产动力势必导致社会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各个群体合并成为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的主要进程发生在这个阶段。这确实是“族的形成”时期，它把旧有的群体吸收进入一些较大的群体和语言相近的整体之中，至少在当地是如此。所有这一切远非平淡无奇和没有经过斗争的。

在中部非洲的森林里，仍有专门从事狩猎和采集的人，而狩猎者仍保持着他们俾格

---

[23] 据 G. 特鲁波（G. Troupeau），1954 年，第 282 页称，乌斯瓦尼说：“人们再也看不到在第二瀑布以下广泛流通、用来与穆斯林商人贸易的那些货币——第纳尔或迪拉姆。……在第二瀑布以上，居民们并不从事买卖。”（原文如此）

[24] G. 特鲁波，1954 年，第 283 页：他看到了棕榈树、葡萄藤、菜园、和放牧着骆驼的草场。

[25] 同上，第 188 页。

[26] 关于这一段的情况见 W. Y. 亚当斯（W. Y. Adams），1977 年；关于阿勒瓦及新近的发掘见 D. A. 韦尔斯比（D. A. Welsby），1983 年。

[27] R. M. A. 贝多（R. M. A. Bedaux）、T. S. 康斯坦德塞－韦斯特曼（T. S. Constandse－Westermann）、L. 阿奎博尔（L. Hacquebord）、A. G. 兰格（A. G. Lange）和 J. D. 范－德－瓦尔斯（J. D. Van der Waals），1978 年。

[28] 在公元 8 至 11 世纪，人们常常把津巴布韦中央高地发生的种种事情归之于气候的原因，见本卷第 24 章。

[29] J. 德维斯的书目，1972 年，第 67－69 页。

米人的体型。但是他们的生活与务农者有很密切的共生现象，采用务农者所讲的语言，并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被吸收成为大的群体中的一个“等级”。在绝大多数地区，土生居民到公元11世纪末已被全部吸收，在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就是如此。[30]吸收的进程在安哥拉东部和毗邻赞比亚的地区要缓慢得多，公元15世纪时，那里还处于晚石器时代。在上述地区中，狩猎－采集者慢慢地后退，特别是由于人口密度的增长影响了猎物的分配。他们在安哥拉南部的土地上保持着原状，因为那里是讲班图语的务农者未曾闯入的地方。

在西部非洲，人们已经结合为复合体村社，沿着森林地带的边缘和林区建立起来。它们对空间的利用使狩猎者、采集者和务农者都组合在一起成为更加复杂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的内部发展起一种虚构的血亲关系的网络，在外部则结成广泛的同盟，目的在于通过地区性的力量平衡来保证每个族群的生存。在河边地区事情甚至更为错综复杂，生产有了剩余就使得进行中等距离的贸易成为可能，[31] 专业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显得更为明确，即虽然狩猎者、采集者、渔民和务农者之间旧有的互补关系保留了下来，权力的性质还是更趋复杂了。

761

这种定居性更强的群体居住在环境开发得较好的土地上，直到人口的压力迫使其进行各种各样的分裂为止。在这种群体中，非洲人社会发展了新的技术，而不仅是为了生产食物。这时候，非常明显地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已成为一种目的，泥淖居住地的考古发掘尚未提供足以向我们说明问题的更多材料。但是，关于西部非洲，至少已经有B.沙瓦纳[32]和W.菲利波维亚克发表的论点。[33] W.菲利波维亚克认为——从我们看来这是错误的——粉刷技术是穆斯林传入之后才在尼亚尼使用的，但是他也认为早在公元6世纪就已出现在木框架上抹上当地的泥土、制成泥墙的作法。S.K.和R.J.麦金托什关于杰内－杰诺在与北方接触之前就已掌握泥土建筑技术的研究是结论性的。[34]此外还有R.贝多关于班迪亚加拉地区的研究成果[35] 和L.普吕辛对热带大草原建筑技术的结论，[36] 故且不谈在泰格达乌斯特[37]和昆比萨利赫[38]发现的用晒干的砖造的建筑物，因为这是与伊斯兰发生的接触属于同一时代而被忽视，尽管那些发掘它们的考古学家肯定它们不属于进口技术之列。在这个领域和许多其他领域里，许多工作都有待进一步开展，才能使

---

[30] R.格哈尔兹（R. Gerharz），1983年，第26页；D. W.菲利普森，1977年，第247－252页。

[31] S. K. 麦金托什和R. J. 麦金托什，1980年（b）。关于基督纪元以前的时期，也见R.哈兰德（R. Håland），1980年。关于伊费，则见本卷第16章。

[32] B.沙瓦纳1985年从土壤分析中得出如下结论：他所发掘的那些住所的居民肯定是公元9至10世纪住在塞内加尔河左岸离河不远的地方，这些居民用泥墙建筑房屋。也可参阅关于公元7世纪在通迪达鲁使用泥土的著作，P.丰特斯（P. Fontes）等，1980年，和R.哈兰德，1980年。

[33] W.菲利波维亚克（W. Filipowiak），1979年。

[34] S. K. 麦金托什和R. J. 麦金托什，1980年，参阅R. J. 麦金托什，1974年。

[35] R. M. A.贝多，1972年。

[36] L.普吕辛（L. Prussin），1981年。

[37] J.德维斯、D.罗贝尔－沙勒厄（D. Robert－Chaleix）等，1983年，第85－93页。

[38] S.贝尔捷（S. Berthier），1983年。

非洲本土提供出我们需要的资料。只要回顾一下埃及古王国著名的"努比亚圆顶"、[17]
762 在公元10到11世纪时重又引人注目地成为努比亚基督教诸王国许多教堂的屋顶形式这一进程，就可以意识到对非洲建筑的研究大部分仍像是一本尚未打开的书，但它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它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18]当然，一旦研究作为生活空间的住所这种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全面展开，必将直接导致技术史、也即社会史的研究。

技术以及为什么应该研究它

非洲的技术史尚有待书写，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比能够解决的问题还多。有些工艺技术，诸如制陶、编织、制革、木器工艺、石器工艺、或许还有盐的提炼，在公元6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在公元600年之前或之后的时间里，上述的各种技术都处在变化之中：例如制作狩猎罗网的技术肯定很早就有，但明显地进步了，因此研究这种演变，例如，把埃及、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所猎得的动物、所使用的狩猎技术以及社会和食物的类型进行比较研究，将会是很有用的。再如，所有人类学的研究都显示出，任何情况下，在织网的方法、网和网眼的大小、如何保存和使用网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之间总有一种相互联系。但是我们只知道延续几个世纪之久的演变中很少几个显著的特点，而不了解整个延续状况。同样，我们对提炼盐的技术的演变也一无所知，甚至连生产和消费的数量长期以来的变化情况也不知道，尽管我们相当肯定后者的变化和人口压力与食物类型的作用成正比。[19]

非洲历史和考古研究中最迫切的需要之一就是对技术的变化以及促成或推动这些变化的环境作小心详尽的考察。对陶器、金属和纺织的研究，虽然还很不齐全，但可以作为典型例子，有助于对非洲大陆历史的了解。

陶　器

陶器在非洲某些部分已有9000年的历史，诸如在当今尼日尔境内的阿伊尔，[20]它的使用越来越多地和明显的定居形式有关，而往往并不和农业的出现相联系。用陶器出土的主要遗址的名字来命名它们所属的类型已经成为惯例，尤其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更是如此。发掘者们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定出各种类型陶器的年代，后来就被用来当作编年
764 顺序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从陶器类型的出现与相继而来的铁器时代的出现

---

[17] G.热基耶（G. Jéquier）清楚地论述了"努比亚"圆顶的非常独特的建筑技术，1924年，第303—306页。U.莫内勒·德-维拉尔（U. Monneret de Villhad）提供了基督教时期的一些例子，1935—1957年。哈桑·法特希的著作又使建筑师的注意力重新引向它们，见H.法特希（Hassan Fathy），1981年，第60—61页。开罗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新近在拜拉特绿洲的发掘，发现了从古王国末期到中王国时期许多这种类型的圆顶。这种方法又成功地在11世纪和12世纪应用于努比亚一些用晒干的砖修建的教堂。见F.丁克勒（E. Dinkler）（编），1970年。

[18] J.德维斯，1981年（b）。

[19] 见J.伯纳德（J. Bernard），1982年。

[20] M.科纳万（M. Cornevin），1982年；J.-P.罗塞特（J.-P. Roset），1983年。

763



[illegible] 28.2 [illegible]

两者之间找出一种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要再谈），而且经常还与携带它们的人群的迁徙相联系，把铁器、农业和陶器放在一起来讨论。[37] 今天的趋势正好相反，实验室的研究补充了从外形的观察和分类。[38] 陶器制作不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已成为一种人口和经济指标——提供了贸易和它流通地区的资料，[39] 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的指标。考古发掘近年来的一系列发现充分说明对非洲陶器的考古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多么丰富的宝藏：发现赤土陶俑的有伊费、奥沃、接着还有诺克；[40] 在上尼日尔一带还有与此同样令人惊奇的陶器制品；[41] 尼日尔还只刚刚开始挖掘出土；[42] 毛里塔尼亚则已挖掘出十分稀有而引人注目的人工制品，[43] 另外还有布满着陶器碎片的房屋和庭院，[44] —— 这些是大量陶器中最令人叹绝的部分，而且这种宝藏还在不断得到补充。对制陶过程进行详细叙述（泥土是如何备料，如何烧制，又是如何防水的），可以推动技术变化，可以当作各种不同风格的标志，而且也可以作为生产者生活中常用装饰品的标志。以上种种加在一起又可作为财富的标志。作为家具的主要部分，陶器在住所中的位置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因此成为我们了解非洲过去情况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对象，尤其对本卷所研究的这个时期更是如此。因为，几乎可以肯定从该时期直到今天，事态的发展必然有其延续性。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学会以迥然不同于过去的方法来处理这种"货色"了。过去的方法是非常不系统的。

豹地陶器以它在津巴布韦被发现的遗址而得名。这类陶器是创立一个结构更为复杂的社会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社会又在公元900年前后或更早的时间导致了国家的形成。[45]
766 相反，公元8世纪在扎伊尔南部桑加出现的基萨尔陶器就没有伴随任何这类现象。[46] 它更像是一种新类型的渔民－农民村社出现的标志。在同一时期或后一世纪在卢旺达出现的新陶器，则代表着一种虽然放弃了熔铁炉集中但变化却不大的信号。它也可能标志着专业放牧者与社会合并成一体的浪潮所引起的更加深远的变化。

768 金　属

数十年前，有许多关于非洲金属生产情况的著述。当时争论格外激烈，因为这些著

---

[37] D. W. 菲利普森提供了很好的资料，1977年（a）。关于错误运用对陶器和讲班图语各族人扩张的系统化论述，参阅P. 德－马雷（P. de Maret），1980年。

[38] J. 德维斯，1981年（a）；D. 罗贝尔（D. Robert），1980年。

[39] A. 卢希奇（A. Louhichi），1984年，通过实验证明陶器是从当今的突尼斯或阿尔及利亚经过撒哈拉沙漠运到萨赫勒的，也可参阅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人，1983年。

[40] E. 埃约（E. Eyo）和F. 威利特（F. Willett），1980年，1982年。

[41] B. 德－格鲁纳（B. de Grunne），1980年。

[42] B. 加多（B. Gado），1980年，第77－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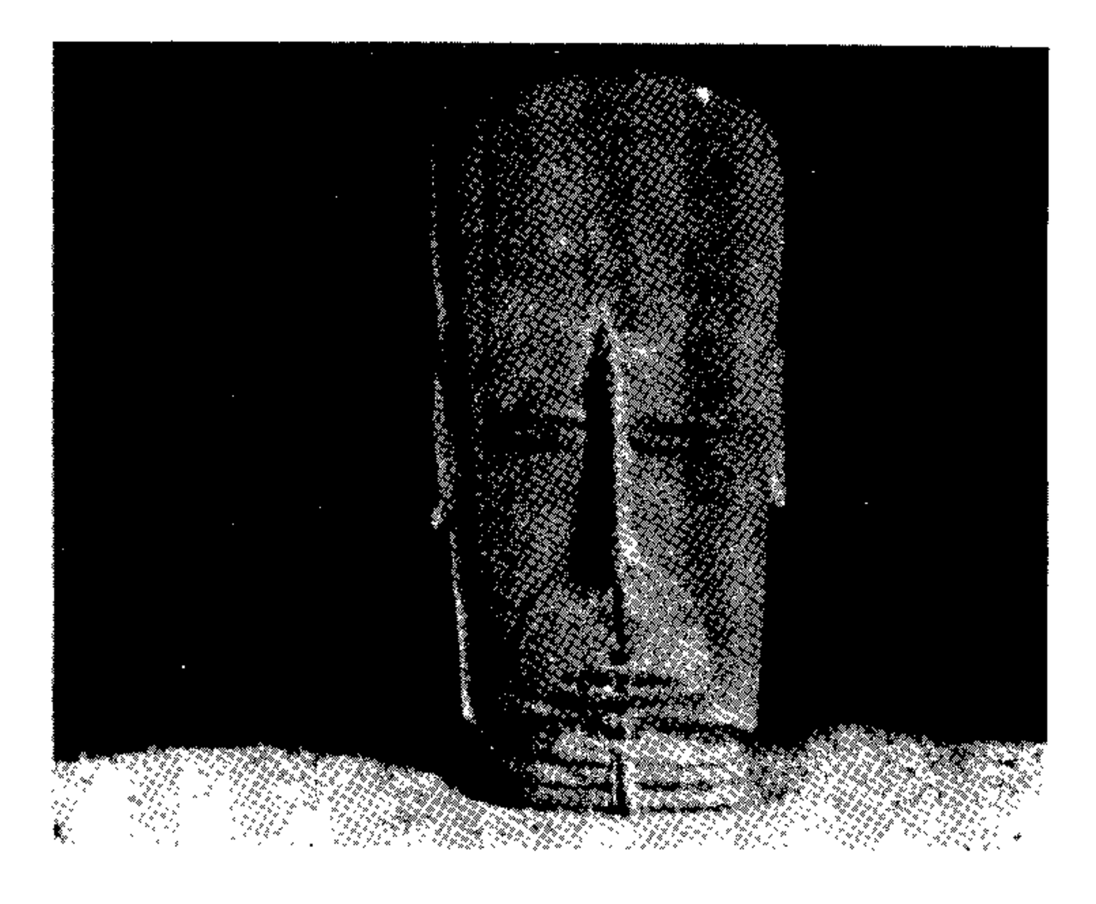
[43] 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厄等，1983年，第188页；D. 罗贝尔，1980年。

[44] 关于这些覆盖层的情况，见F. 威利特，1967年、1971年及G. 康纳赫（G. Connah），1981年。最近在布基纳法索和贝宁也发现了其他例子。

[45] 见本卷第24章。

[46] F. 范－诺顿，1982年。

765





图片28.3 公元6世纪到10世纪之间在当今尼日尔共和国境内制作的赤土陶俑，这是1983年大量发掘中的一例，迄今未发表过。

766



图片 28.4 赭色泥土制作的[illegible]女性[illegible]。[illegible]1972年在[illegible]进行的实验性发掘。

述所依据的资料基础十分脆弱。

非洲黄金长期以来一直笼罩着一层神话和历史瞎说的色彩，今天我们对它知道得稍多一点了，我们终于排除了幻想色彩，进一步从量的角度作出了估价。如今的津巴布韦在当时变得十分突出，成为继努比亚和西部非洲之后又一个古老产区。在这矿区里，

[illegible] 以铁为例，关于[illegible] N. J. Van Der Merwe，1980年，[illegible] 1984年[illegible] P. L. Shinnie，1971年，[illegible] 1980年，[illegible] 1985年(a)。

[illegible] 本卷有好几章都涉及这方面的资料。



图片28.5 陶器碎片覆盖层：庭院的一角，出土于伊费的伊塔-耶茂，比例以英尺计

沙金肯定和公元600年之前的努比亚一样得到开采，销路可能就在当地，也可能运往非洲大陆的北方；现在看来这也同样发生在菲吉廷时期。这里出品数量不大，而且不像是用采掘矿物的办法开采的。由于穆斯林诸国的建立，第一批黄金享用者之一肯定是阿格拉布王朝，在本卷所涉及的整个时期内对黄金的需求不断增长，黄金的出口量也越来越大。很难断定公元10世纪之前就已经有包括系统采掘的采矿技术，即使努比亚的情况也是如此。不断发现越来越广为分布的可供积极淘金的地区，似乎是足以在较长时期内满足人们的需求。现在已能肯定公元1100年前后，从西部非洲森林地带出产的黄金已经用于出口，也在运向北方。文字记载的资料确认，公元14世纪时已进行采矿。考古发掘也提供了证据，证明津巴布韦高地也是如此。姑且把需求量真正增长的时间放在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即使至今还没有人能证明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之间运输的数量确有增加，但是认为早在公元10世纪时人们已进行采矿这一点还是合乎情理的。此外，长期流传的黄金是在植物根部发现的传闻，也完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实（想一想淘金的情况就行了），并且也反映了当时人们不愿多谈非洲产金地实际情况和**769** 确切地点的愿望。开采金属的地区肯定知道冶炼金属；要断定生产黄金的地区并不存在炼金技术这是困难而且未免是轻率的。公元10世纪时在安达卢西亚和北非分布很广的金银抽丝工艺可能是从这些地区传到了南方；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金丝装饰品是公元11世纪或12世纪制作的。在尼日利亚的伊格博－乌库，抽丝术被用于铜的合金物。

在撒哈拉以南曾有相当长的时期，铜往往是一种可以与黄金媲美的受人喜爱的金属，并且被用来作为制作奢侈品的原料。近年来在这一领域里也曾有许多令人吃惊的发现，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公元7世纪（有不少地方比这还早）生产这种原料和冶炼这一金属的地区，其数目远比原先设想的要多。毛里塔尼亚、尼日尔（还是在阿伊尔）、扎伊尔和赞比亚的铜带、德兰士瓦（帕拉博鲁瓦）对铜的生产和出口贯穿于本卷所述的各个世纪。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的阿拉伯文资料和一系列考古发现都证明：铜的贸易肯定把铜和铜合金从北方带到了撒哈拉以南的地区。但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贸易的实际情况要比原来设想的复杂得多；过去作为定论被接受的东西目前已被否定，许多产品和技术完全是来自北方的。在中部非洲，从公元900年以来铜一直是标准的**770** 通货。虽然在德兰士瓦尚未发现铜制装饰品和镯子，但帕拉博鲁瓦矿当时是生产铜的，而且毫无疑问它并不是德兰士瓦唯一的铜产地。

提炼技术似乎一直是局限于挖坑和水平巷道。对于这种金属如同黄金一样，深入地

见T. F. 加勒德（T. F. Garrard），以古钱币和计量学为根据。

欧麦里（al-'Umari），1927年，第81页："这位素丹（穆萨－曼萨）告诉我，在他的帝国内有一些异教徒……他利用他们在矿中采金，他还告诉我，金矿是由一个个一人深或将近一人深的洞所组成的。"

R. 萨默斯（R. Summers），1969年。

关于泰格达乌斯特，可见本卷第14章。

瑟斯顿·肖（Thurstan Shaw），1970年。

E. 赫伯特（E. Herbert），1984年。

最近的重要论述有：N. 埃沙尔（N. Echard）（主编），1983年。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D. 格雷贝纳特（D. Grebenart）的近作出版。也可参阅P. 德－马雷，1981年，关于扎伊尔的乌彭巴

下的巷道当时是很少的，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雨季地下水位上升的缘故。基督纪元前很久毛里塔尼亚和阿伊尔的人们就已知道如何铸造铜了，到公元 5 世纪至 6 世纪铜带的人们也已掌握了这种技术。在泰格达乌斯特（毛里塔尼亚）进行的考古发掘已经发现属于公元 8 世纪至 9 世纪的失蜡铸模，[illegible] 在伊格博－乌库，人们业已辨认出适合各种类型金属的制作法，那里大戟胶乳代替了蜡。[illegible]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全部情况，足以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公元 6、7、8 三个世纪，在赤道非洲，人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铜及其合金的冶炼术，并已能使用锤击、冷铸和失蜡铸造等工艺程序。各道工序都用适当的金属和锌以及用铅胚的青铜和黄铜（锡可能是来自当今的尼日利亚中部），为生产不同的物体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已知其用法的金属，甚至可以对已知其属性的一些金属进行焊接。传播这一资料时应该注意，某些西部非洲的铜和铜合金中含有大量的砷，这一情况也许能为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量文物究竟来自何处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illegible]

与所有已为人们接受的观念相反，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在古代非洲就已存在熟练的炼铜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与地中海或亚洲冶金术间多种形式的关系，而且肯定我们的金属图表还会作出许多必要的修改，特别是在实验室研究给了我们越来越多信息之后。

铁的情况也是一样。过去，人们曾拟订一种所谓两个“铁器时代”前后紧密相连的年表，并且希望这种年表能对整个黑非洲都适用，而所谓“第二铁器时代”恰好是本卷所述的那几个世纪。人们曾力图表明第一个铁器时代向第二个铁器时代过渡显示出巨大的差别，主要是：产品数量有明显增加，产品质量有改进和多样化，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生产各具特色的陶器的新型居民点。但是，更近期的研究却无情地彻底推翻这一“模式”[illegible] 继续谈论两个明显不同的“铁器时代”看来是危险的，尤其是把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谈更是如此。人们有必要再次强调：需要进一步作更细致的分析；应该承认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复杂性；同一年代对不同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illegible]　772

尽管对西非、东非和帕拉博鲁瓦[illegible]的某些冶炼遗址曾作过详细研究，但人们仍然对非洲铁技术史所知甚少。也许当时已经能生产不同种类的铁，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当时的人们对生产和各个生产环节（从建立炼铁炉开始，经过提炼，到最后出成品）究竟能掌握到什么程度。设计改变了，使用它们的方法也就不同，燃料变换了，对原料的处理方法也就不同，并且所有工具也都随之而发展。我们甚至对当时的工业是集中还是分散也不了解。我们知道在卢旺达和布隆迪有一种炼铁炉在本卷所述时期被废弃了，而且工业也因之而分散。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取代这种炼铁炉的是什么类型，也不了解工业处

[illegible] D. 罗贝尔，1980 年（即将付印，见 D. 罗贝尔－沙勒厄，即将出版的著作）。

[illegible] 这一点使人设想，这种方法可能是在萨赫勒地区最先采用的，那里富产大戟。

[illegible] C. 瓦纳克尔（C. Vanacker），1983 年（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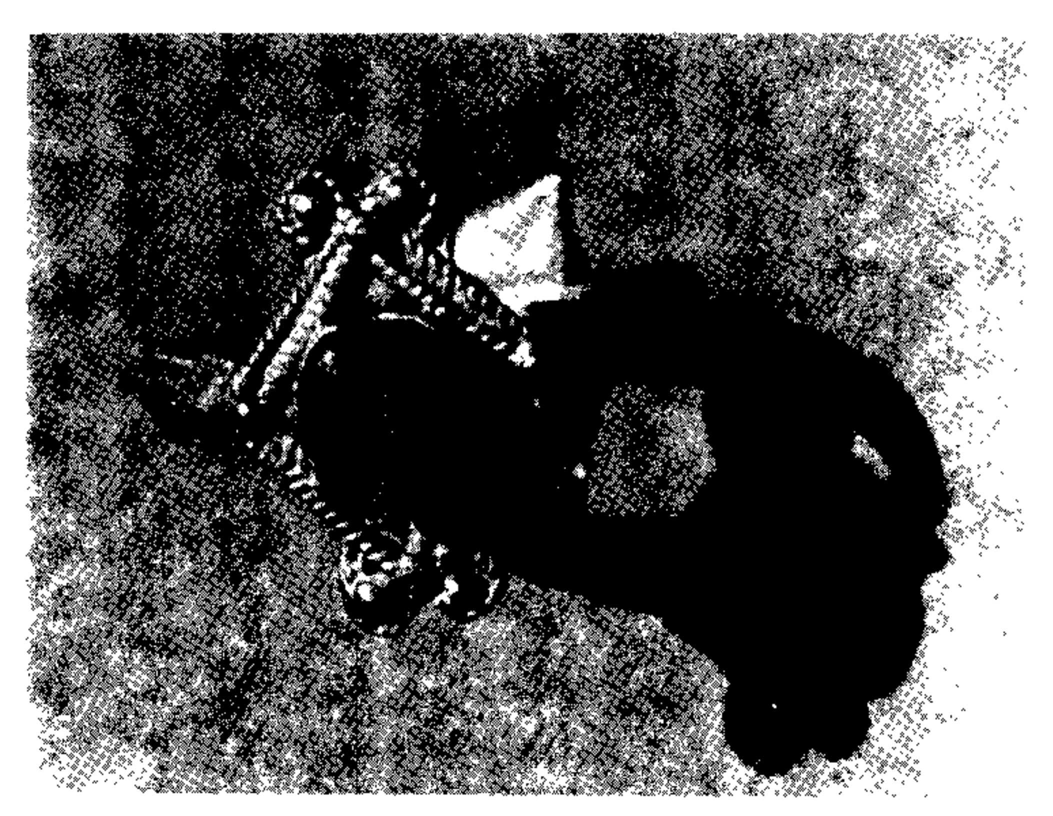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近期对这种见解提出质疑并阐明理由的主要著作有：P. 德－马雷，1979 年，第 233—235 页；M. C. 范格伦德贝克，E. 罗奇和 H. 杜特勒蓬，1983 年（b）；更早的有 P. 施密特（P. Schmidt），1978 年。

[illegible] 直接还原法炼铁术讨论会。巴黎第一大学，EHESS，巴黎，1983 年。会议纪录将于 1985 年出版，会上有来自非洲的主要发言。又见 J. 德维斯，1985 年（a）。

[illegible] 帕拉博鲁瓦遗址坐落在德兰士瓦，位于马庞古布韦东南、莱登堡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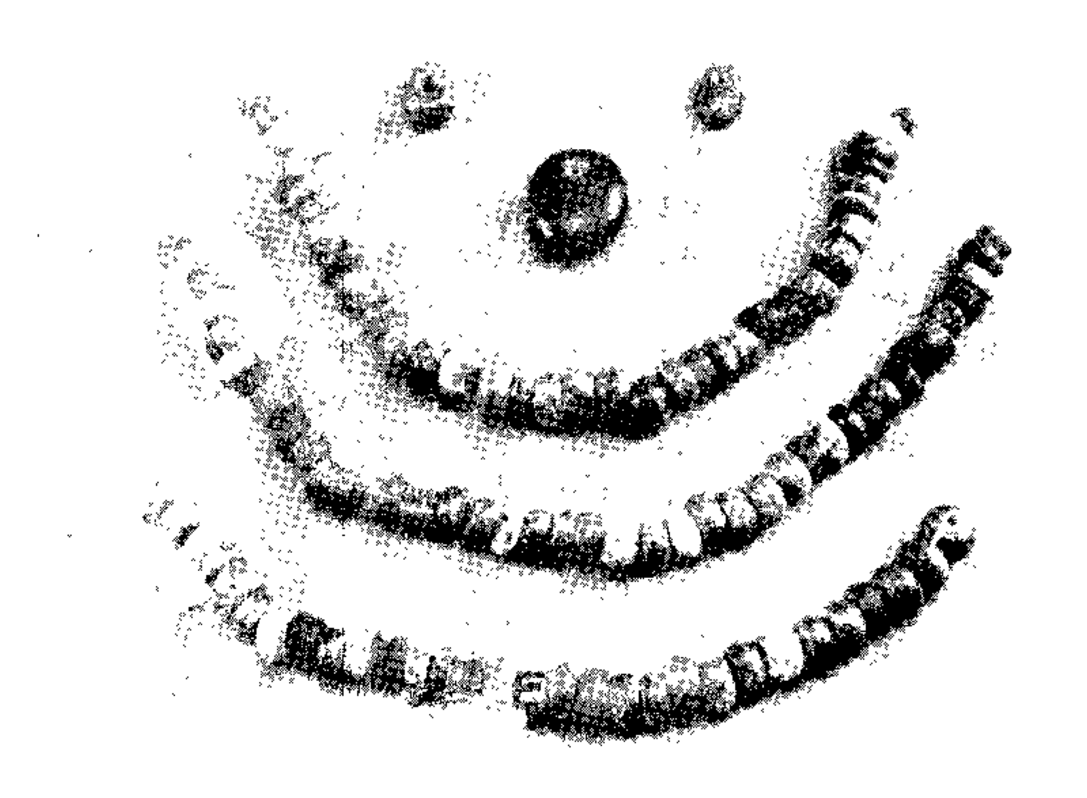
于分散状态之后对生产和产品质量有什么影响。当时的炼铁炉类型和所使用的设备（风箱、铁锤、大木槌、铁砧、拉丝板等等）的分布格局以及燃料及其使用方法，都说明曾经有过重大的技术活动。[illegible] 但是，所有这方面的资料仍属偶尔发现，彼此很少有机联系，因此不能使我们弄清楚当时技术演变的全局。人们可以猜测、假设，但并不真正了解。我们知道在很多地区铁的出现是从公元7世纪开始的，并为下列制品提供了原料：如斧子、锄头等工具；弯刀、标枪、箭头、鱼叉头、短刀等武器；剪刀、针等各类用品；还有项练、手镯、指环等装饰品。我们也知道当时已有库存，一批大锄的发现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这种大锄往往呈铁锭形，库存的证据有时在字里行间有所发现，不过不幸的是至今未能确定其年代。人种史的资料至少使提出一定数量的问题成为可能——铁是用来做什么的？它的真正重要性何在？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和阶段，它与铜及其他昂贵物品（诸如珠宝）或者可交换材料又是什么关系？掌握一部铁的冶炼史和铁制品的使用史，无疑地肯定会部分推翻目前已被人们公认的许多说法。

7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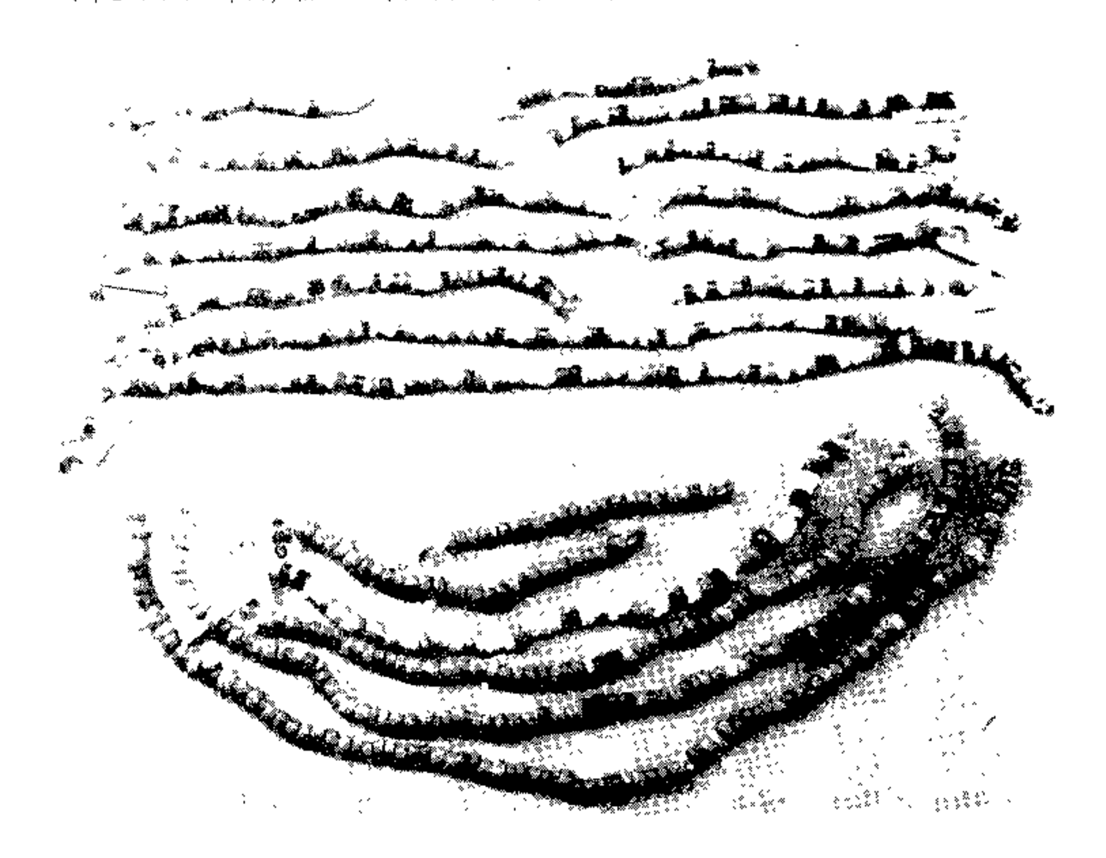
图片28.6　在毛里塔尼亚的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金丝珠宝饰品（德巴兹·罗贝尔发掘物）。

[illegible]　见：例如W. 克来因（W. Cline），1937年，或L. 弗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和R. 冯－维尔姆（R. von　Wilm），1921－1931年



图片28.7(a)（上图）出土的首饰、串在绳子上的玻璃珠串，来自伊格博－乌库墓穴，珠由来自伊格博－理查德。

图片28.7(b)（下图）由多色玻璃珠做成的绳子，来自伊格博－乌库的王位标志储藏室



纺织品

773 纺织在埃及和努比亚已有数千年历史。基督纪元开始以后，科普特人的技术就达到后来未曾超过的顶点。不过以棉花作为原料却是较近的事，这种作物曾输入麦罗埃。[69] 没有人对埃及纺织的重要意义及其影响提出异议，特别是在公元7世纪至11世纪这段时期。[70] 现在再次热烈辩论的是关于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纺织业，特别是使用棉花的纺织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71] 有关资料和考古发现提供了起关键作用的材料。棉花约在公元10世纪出现于塞内加尔河泛滥平原上的村庄里；[72] 在特勒姆岩洞里已发现公元10至11世纪的用窄条布做的衣服。[73] 指出下列情况是重要的，棉花和棉织品早已遍布埃塞俄比亚全境，而且早在公元900年就传播到莫桑比克南部和马庞古布韦。[74] 公元9世纪到10世纪热带非洲已经种植棉花和织布了。织布需要两项关键技术：纺织用的纺锭和织布机。迄今为止，这两方面的考古发现还是极为稀少，对此人们仍感难以解释。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大量公元14至15世纪的纺锭，[75] 就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言，更早阶段的纺锭实在少见。至于织布机，莫桑比克的织布机肯定不同于西部非洲，不过我们掌握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实在有限，我们现在已能用出土的零件把西非当时的织布机重新组装起来。当时使用有两块综片的窄面织布机，今天还在使用。这种机子可以纺织宽30公分左右的长条布，可能是公元1000年前从尼罗河流域传进来的。[76]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纺织和出售布料在经济上日趋重要，并且促使其副产品——靛青的大量种植。因此，肯定纺织究竟起源于何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纺织不仅提供了新的穿着物，使衣物成为可用于交换和贮存的物品，而且还迅速成为社会地位优越的标志。

在这里必须给那些制作垫子和地毯的行当以重要的位置，因为当今的突尼斯从公元9世纪起就向东方大量出口这类产品，不过对他们的技术我们所知甚少。

776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仅能纺棉花，[77] 而且还能纺酒椰叶的纤维。[78] 在生长酒椰树的西部非洲和中部非洲，这种纤维是在相当宽的竖立的或横卧的织布机上织成的，这种织布机只有一块主要的综板。我们不知道这种纺织法有多久的历史，很可能比西非的织布机历史还要悠久，但也可能是较近期的发明。[79] 诺克陶俑中有一具看来肩膀上披着一块布，但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这确实是块布。

---

[69] W. Y. 亚当斯，1977年，第331、371页(织布机)

[70] M. 隆巴德 (M. Lombard)，1978年，第151－174页。

[71] R. 博泽尔－萨里瓦克色瓦尼 (R. Boser－Sarivaxévanis)，1972年，1975年。

[72] B. 沙瓦纳，1980年。

[73] R. M. A. 贝多和R. 博兰 (R. Bolland)，1980年。

[74] P. K. 戴维森 (P. K. Davison) 和P. 哈里斯 (P. Harries)，1980年（马庞古布韦的纺锭，公元10及11世纪）

[75] 某些古老的纺锭与其他一些用途完全不同的物件在形态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76] M. 约翰逊 (M. Johnson)，1977年。

[77] J. 皮克顿 (J. Picton) 和J. 麦克 (J. Mack)，1979年。

[78] H. 卢瓦尔 (H. Loir)，1935年。

[79] 把这方面的研究与正在进行的对马达加斯加纺织丝绸的机子的研究相对比，可能会是很有意思的。

酒椰叶的纤维在中部非洲所占地位特别重要，公元 16 世纪以前用它来作装饰的技艺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而且那里还把酒椰块用作货币。在森林地带，虽然与严格意义上的纺织一词并不真正相符，用槌子槌树皮制成的衣料却高度发达。在开阔的热带大草原上，仍然以皮革作为主要的衣着材料。这些事实正好与下述的论点背道而驰，即认为棉花纺织的传播是穆斯林影响的结果，是一种反对赤身露体的愿望的结果。人们一旦知道还有其他种类的衣着时，这一系列的推论就不能自圆其说，不再令人信服了。

目前，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说明一部技术史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这部历史实际上还是未知数　这是非洲史的关键性空白之一。考古发掘与人种学研究相结合，必将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

盐

在本卷所述的时期里，所有产量最可能有所增长的商品中，[80] 盐扮演着特别有意思的角色。关于盐的生产和消费的技术贯穿着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各个方面，后面我们还将讨论与商品化有关的问题。盐是从萨赫勒地区、埃塞俄比亚和东非的盐矿中得到的。这是一种棒状的岩盐，有许多作品都写到过这点。[81] 盐还可以从蒸发海水和礁湖水然后收集沉淀物中得到，[82] 如在塞内加尔的辛－萨卢姆河下游。盐的采集经过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是用适旱植物的灰沥滤而从中提取的。[83] 另外，在那些得不到岩盐和海盐的地方，特别是在沼泽地带，人们已成功地通过种植植物来生产盐。不过，海盐或撒哈拉盐是如此之优越，因而输出到很远的地方。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在特定时期内盐还曾被当作货币使用。对沿海居民来讲，盐是比鲜鱼或鱼干和甲壳类动物干更大的收入来源；人们用盐可以换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种类的物品。很难想象尼日尔河三角洲有盐地区居民点的人民一旦中断靠内地供应的粮食和用具会陷入何种境地（这在本卷探讨的时期完全可能出现）。但正因为有盐，这种供应匮乏就决不至于发生。[84]同样，撒哈拉的居民要得到他们所需的谷物就用他们矿山中出产的盐到萨赫勒去换取。盐的实例就这样把我们从对技术的考虑转到了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从而促成的贸易，　777

---

[80] B. M. 费根和 J. E. 耶伦（J. E. Yellen），1968 年；J. E. G. 萨顿和 A. D. 罗伯茨（A. D. Roberts），1968 年；J. 德维斯，1972 年；D. W. 菲利普森，197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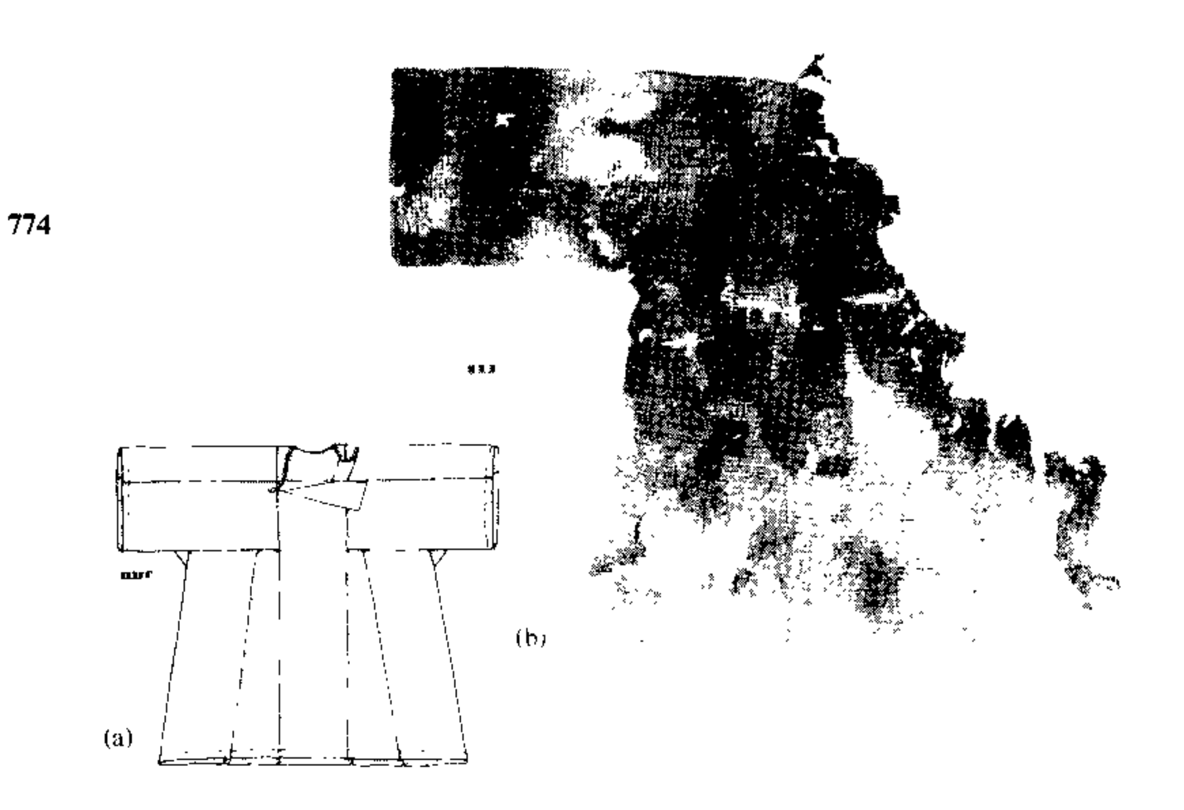
[81] 见：例如 D. W. 菲利普森，1977 年（a），第 110 和 150 页。

[82] 有关由此而引起的人类学研究，见 J. 里瓦莱恩（J. Rivallain），1980 年。

[83] L. 恩多里辛帕（L. Ndoricimpa）等，1981 年；E. 托尔戴（E. Torday）和 T. A. 乔伊斯（T. A. Joyce），19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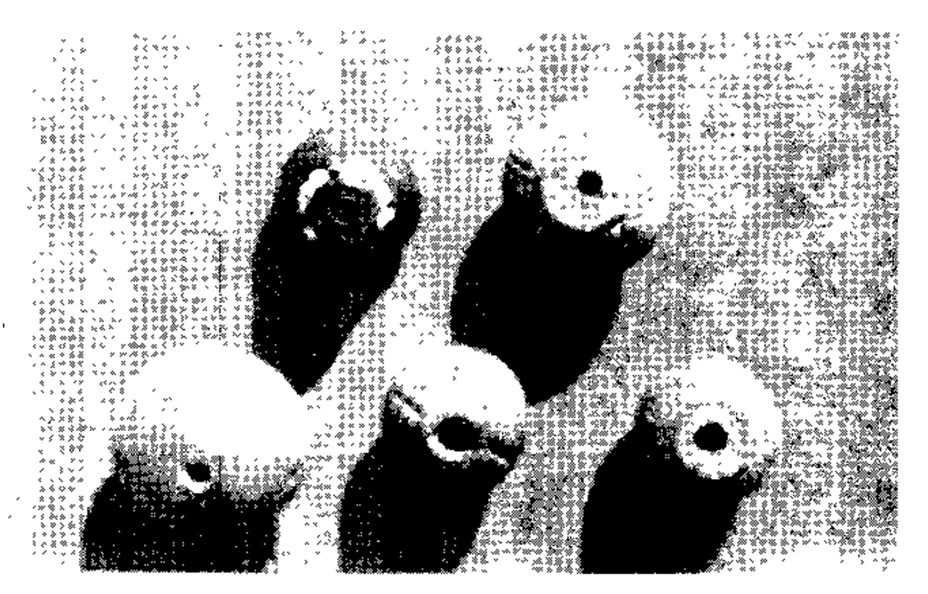
[84] 从公元 9 世纪以来：M. 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和 R. J. 麦金托什，1976 年，第 170 页，O. 伊基默（O. Ikime）（编），1980 年，第 68—72 页。

774



图片28.8(a)（上，左）梯形外衣原来形状的再现，出土自Z号洞穴（公元12至13世纪）
图片28.8(b)（上，右）梯形棉布外衣，出土自C号洞穴（公元11至12世纪）
图片28.8(c)（下图）头上包着棉布套的特勒姆人颅骨，出土自C号洞穴（公元11至12世纪）





照片 28.9 在泰格达乌斯特发现的纺锤瓷盘。



照片 28.10 在塞内加尔北部发现的镀青铜盆。

777



图片28.11　盐的生产——瓦拉塔，一支从伊吉勒（毛里塔尼亚）盐沼载着棒状盐块的商队

多种形式的贸易

地方贸易，区域有大有小，肯定已进行了很长一个时期，用的是像盐或金属甚至珠宝和装饰品这类重要产品，它们有时被运输到很远的地方去。

778　某些技术力量密集的地区成为原料高产和成品精制的地带，它们之间沿着逐渐形成的贸易网络，在运输这些产品时发展了中途集结点。近年来的考古研究充分揭示出：在塞内加尔和尼日尔两河以南确实存在过这种网络，而其他所有材料却都未曾提及此事，[1]这使诸如塔克鲁尔、加纳或加奥这些政治实体的成因更加清楚。在本卷所述的五个世纪中，贸易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而其发展的高峰则是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在本阶段开始以前，这里已存在着萨赫勒地区内部的贸易，它无疑与尼罗河流域及北非有联系，特别是沿着乍得湖、卡瓦尔和费赞的那条线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计量学、古钱币学和在西部非洲的发现），有可能做如下的假设：由于采用了骆驼运输，才使得穿越沙漠的长途贸易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但是从公元800年起，这种贸易发生急剧增长一事，却是千真万确的。撒哈拉的传统体系是向北方输出黄金和食品来换取从沙漠地带输入的盐和从北方输入的制成品。这种体系是在本卷所述时期建立起来的。[2]这项贸易在南方扩展到很远的地方。公元9世纪时，这种贸易把成千上万的串珠传到了伊格博－乌

[1] S. K. 麦金托什和R. J. 麦金托什，1980年（b）；J. 德维斯，1982年。
[2] 参阅本卷第11、12、13、14、15和27各章。

库，这个地方向南可以和大海相连。[87] 公元1100年前后，这种贸易已经扩展到了该地区的森林边缘，即后来人们称为黄金海岸（当今加纳）的地方。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对沙漠南北两方的影响是同样重大的。其中居于首位的是国家体制的发展，北方公元8至11世纪从摩洛哥到埃及都是如此，南方从大西洋到乍得湖的情况在这些世纪中也是一样。其次当然是贸易引起的经商集团的发展，他们或多或少组织得很好，并且或多或少依赖于政治当局。

埃塞俄比亚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在公元6至8世纪印度洋贸易的剧变中垮掉了：阿杜利斯失去了原有的作用，阿克苏姆逐步走向衰亡。相反地，东非沿岸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即使到目前，我们所掌握有关公元12世纪以后的变化情况也远比以前的要多。

从索马里到莫桑比克南部的整个沿海地带都发现公元8世纪商品进口的痕迹。[88] 这里，黄金也起着主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南方。这里，国际贸易同样是在活跃的地区贸易结构中进行，输出的商品有：黄金、象牙、木材和奴隶，还有少量奢侈品，输入的商品中也包括奢侈品，诸如串珠和布匹。这已经不是一种平衡的交易，但这种不平衡交易却促进了内部交往的发展，目前正在努力对林波波流域的这种发展加以证实，[89] 因为这种贸易在该地区加快并加强了较大政治实体的建设。

779

全面的经济增长和商业扩展，在非洲大陆的各个社会中无论如何是各不相同的。在本卷所述的这几个世纪里，北非属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在那里，各种技术通过从穆斯林世界的一端传向另一端而得到发展，一些特殊的生产体系（诸如甘蔗或枣椰树的种植）也随之传播。[90] 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在文化方面的创造力，对于促进和加强相互接触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治统一的努力。埃及、突尼斯以及摩洛哥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城市成为巨大的制造业中心，它们的出口，特别是向西部非洲的出口引人注目。东部非洲则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与穆斯林世界的经济相连接，同时也和亚洲，如中国、印度、[91] 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相联系。

另一方面，仍有一些地区难以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或者甚至一点也受不到。南部和中部非洲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虽然在中部非洲有一个以铜带为中心的地区性商业区在公元1100年以前就和印度洋有间接交往，但这种交往以交换来自不同环境和来自盐矿的产品为基础。从以后各个阶段的情况来判断，这种交换包括盐和铁，鱼类和酒椰纤维布，棕榈油和姆巴夫油（*mbafu* oil），以及红色染料木。通常的活动是从北方到南方，跨越不同的生态区域。仍以中部非洲而论，扎伊尔河及其各条支流肯定都已用来作为廉价的交通工具了，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在本卷所述阶段之前的有关证据。

东部非洲的内陆地区仍然是个谜。在那里找不到进口产品的痕迹，从而人们曾经得

---

[87] 瑟斯顿·肖，1970年。

[88] 见本卷第22及26章，以及P. J. J. 辛克莱（P. J. J. Sinclair），1982年。公元700年后不久僧伽人出现在中国和印度一事表明，甚至在发现有城镇前，已经开展这种贸易了。

[89] 见本卷第24章。

[90] A. M. 沃森（A. M. Watson），1983年，提供最近的但也许是夸大的概括。

[91] 伊德里西在公元12世纪记载道，铁从当今的肯尼亚沿岸出口到印度。见本卷第1及21章。

出这些地区与邻近的沿海地带互无关联的结论。[46] 但难以令人相信实际情况真是如此有可能进口产品只限于盐和布，而输出的产品除象牙外，还有其他奢侈品，诸如法蒂玛王朝最喜欢的那种大水晶石。[47] 不论真相究竟如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充其量也不过是间接的。况且，上述地区未能形成一个单独的区域性贸易区。能找到少量小型的生产中心（主要是生产盐），无疑只是为小范围服务的。在更靠北的埃塞俄比亚，区域性贸易肯定存在，而且可能随着修道院基础的扩大和王国中心转向拉斯塔而有所扩展。埃塞俄比亚南部，特别是绍阿，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开展。在那里定居的穆斯林商人，经过非洲之角的沿海地区出口产品。尼罗河流域诸基督教王国则孤立于洲际贸易之外。这一带同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一种是包括绝大多数人口的自耕自给的农业，像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它并不一定非停滞不可。另一种经济则具有两重推动力量。这种推动力一部分由与穆斯林复杂的贸易安排所组成，这些穆斯林向努比亚朝廷和特权阶层供应地中海的产品，如衣料、酒和谷物，以换取奴隶。[48] 为了获得后者必需要有第二部分动力，这包括与乍得湖流域和直到努比亚南方的大陆深处广大地区发展商业关系。努比亚陶器在乍得湖东北的达尔富尔和科罗托罗流传就提供证据，说明上述关系确实存在。令人吃惊的是乌斯瓦尼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情况。[49] 虽然法蒂玛王朝这位使臣提到了栋古拉通过由尼罗河形成的巨大河湾地带与红海的联系，"这个国家有着大河马，从这里有道路通向萨瓦金、巴迪、达赫拉克和红海诸岛屿"。[50]

以上关于商业活动的概述说明当时非洲大陆的一多半已经卷入大规模的贸易之中，而剩下部分的绝大多数地区的区域性网络也在形成之中。完全没有贸易网络，甚至没有地区网络的地方是少见的，可能只在少数孤立的袋形地区，如：纳米比亚和开普地区，利比里亚森林及其毗邻地区，以及东非内陆和喀麦隆与白尼罗河之间的部分热带大草原地区。但是，这种印象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缺乏资料的产物。

事实上非洲大陆总的情况比前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变革。将撒哈拉、西非、东海岸以及津巴布韦和德兰士瓦部分内陆结合在一个全洲范畴的贸易网络之中乃是新的现象，而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发展也是焕然一新。这种商业的活力是定居和我们业已描述过的生产体系调整的第一个成果，尽管还有许多空白，就我们今天所能掌握的材料而言，已足以断言：这一阶段代表着一个新的起点，它使经济和贸易在公元1100年至1500年之间得以更加迅猛，更加大量和更加复杂地发展起来，区域性的网络也必能得到发展和联合，但与从事国际贸易的地区发生关系时却经常处于从属地位。到公元1500年前后，非洲大陆所有各个部分几乎没有还置身于区域性贸易之外的。因此正是在本卷所述的时期，非洲大陆广大地区间的交流格局得以形成，把人们的居住点彼此连接起来，随着货物的贸易，传播

[46] 尽管仍然存在着内地的陶器和沿海当地生产的陶器有相似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见H. N. 奇蒂克（H. N. Chittick），1974年，论及曼尔虎。

[47] 它可能来自米基皮亚高原，在那里这种大水晶石极为普遍。引自J. 德·维尔·艾伦（J. de Vere Allen）个人通讯。

[48] 关于这方面的贸易，见L. 特勒克（L. Török），1978年。

[49] G. 特鲁波，1954年。见本章。

[50] 同上，第285页

各种思想和社会习俗

社会与权力

本卷所述的这段时期，非洲大陆的社会史还有待于写作。对这段时期人们的实际生活，诸如血亲关系、生活和工作的种种安排，我们事实上一无所知。甚至构成这些关系的机制，如家庭、大家族（经常称作世系）[97]、家属、婚姻，以及工作集体的历史，我们也都一无所知。在文字记载或考古资料中也没有留下多少有关这方面的线索。况且，尽管这些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但由于它们的持续性，因而能见性极差。从外观所表现出的情况看，它们带有一种与人类本性相关连的稳定的特征。但也不尽如此，尽管许多研究工作者已使自己陷入其中，在他们看来似乎氏族、世系和婚姻都永远是一成不变的。

劳动分工的影响则能见性较强，尽管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把我们引入特定的系统性安排之中。相当肯定的是，在公元7至11世纪之间劳动分工有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各个社会都分成了阶层。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和分类的做法尚处在很初级的阶段。要指出在这个阶段中，非洲大陆的某些部分，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差别，即出现了阶级这一点，要比用抽象的原理去理解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实际起作用的要容易些。在北非、在努比亚、在埃塞俄比亚，贵族所拥有的地产就是他们权力的基础，不管这些土地是通过何种手段获得的。在北部非洲，这个贵族阶层周围有大量门客——马瓦里（*mawālī*）；它有时保护非穆斯林集团，并且拥有奴隶、仆从、工人或武士；它有足够的权力使它有时能强迫官方的领导人和它商议问题。努比亚或埃塞俄比亚的贵族阶层几乎与此大同小异。更进一步往南，情况就不太清楚了；研究人员仍在激烈争辩这个时期阶级区别是否明显存在的问题；甚至更激烈地争论究竟是否存在不公开的等级的问题（如非洲在更近时期偶然发现的那样）。马苏迪经常提到，那些告诫群众和王子按照祖先和早期国王榜样生活的人，[98] 既不该让我们认为这都是些“吟游诗人”、**782** 也不该让我们认为他们是某个“等级”的成员。同样经常提到的是公元13世纪松迪亚塔随员中的“吟游诗人”，这只能证明：在提到他们的传说已经固定不变或重新撰写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确实存在过。至于这些传说得到固定或重新撰写究竟是什么年代，争论也远未结束。

专家最近的研究成果，至少就西部非洲而言倾向于下述看法：即等级是在近代而不是在古代出现的。[99] 因此，对正处于变化中的社会，把不同地点和不同阶段的变化，不成熟地肯定下来之前，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对研究工作中一切具有可能性的假设都进行一清二楚的检验。

让我们现在把话题转向公元7至11世纪在中部非洲可能发生过的情况。那里的情

---

[97] 世系（lineage）一词更多地是一个意识形态词汇，而不是描述社会实际情况的概念。见A. 库珀（A. Kuper），1982年（b），第71—95页。

[98] 马苏迪（al-Mas'ūdī），1965年，第330页。

[99] 见A. R. 巴（A. R. Ba）作品中引人注目的观点，1984年。

况和非洲大陆的北部和西部很不一样。在赤道非洲，有些劳动分工看来部分地是由务农者和狩猎采集者之间不断增长的共生现象来调节的。森林居民在某些情况下把自己隶属于狩猎群体（特别是俾格米人），向他们提供食物（特别是大蕉）和铁制工具，后来也提供诸如沉重的猎网等装备，以换取猎物和蜂蜜。这种共生必需具备大量的食物剩余，在大蕉成为基本作物之前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务农者人口密度增加到足以干扰狩猎者之前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由于这种原因，我们认为上述共生体系是在本卷所述的时期里得到发展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安排与森林中的务农者和专业渔民间正规的商业关系完全不同，后者以鱼类、陶器和食盐供给前者以换取植物性食品。这种关系早在这些区域被占据时就开始形成了。它们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关系，而共生关系并非如此。

自然，当考古研究使我们能进行严密的测定时，最能看清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变化的地方是城市。那些变化在泰格达乌斯特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100] 此外，如果考察桑加墓地，也可以清楚看到不平等现象，而且这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城市化过程的历史也在不断地进行根本性的修改。[101]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城市化完全是和穆斯林的影响有关系。固然，穆斯林在他们住过的所有地方也确实是城市的伟大建造者，不论是在**783** 本卷所述的这段时期，还是更晚的时期都如此。但是，今天越来越清楚的是：城市的形成却早发生于伊斯兰传入之前，杰内－杰诺业已引人注目地显示了这一点，[102] 非洲大陆东南部也是如此。[103] 这些例证比穆斯林定居起了明显作用的城市（如：昆比萨利赫、[104] 泰格达乌斯特[105] 和尼亚尼）[106] 更能说明问题。在伊费、[107] 伊格博－乌库、[108] 贝宁、[109] 贝戈和孔城[110]进行的硕果累累的关于城市化的研究工作，对今后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意义，应该继续进行并加以发展。与此相似，在尼亚科进行的研究也应继续进行。[111] 尼亚科位于当今加纳林区产金地带的边缘，早在公元11世纪时已经成为城市了。毫无疑问，肯定还会有本卷所述时期建立的雏型城市或城市中心在今后陆续被发现。人们联想到卡诺、扎里亚、图伦库和沙里河下游一系列最古老的城市。

西部非洲的这种城市化进程引起了对一系列已被完全接受的观念的怀疑，特别是那

---

[100] 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尼等，1983年。

[101] 例如，J. 德维斯，1983年。

[102] S. K. 麦金托什和R. J. 麦金托什，1980年（b）。

[103] 见本卷第24章。

[104] S. 贝尔捷，1983年。

[105] J. 德维斯、D. 罗贝尔－沙勒尼等，1983年，第169页。

[106] M. 菲利波维亚克，1979年。

[107] F. 威利特，1967和1971年。一般说来，已经开始进行的对约鲁巴各居民点——包括城镇和村庄——发展史的研究，值得进行下去。参阅有价值但极少为人知道的J. O. 伊盖（J. O. Igué）、1970－80年的著作。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A. L. 马布贡杰（A. L. Mabogunje）、1962年的著作。

[108] 瑟斯顿·肖，1970年。更近的，见本卷第16章，和E. 埃约及F. 威利特，1980年，1982年。

[109] G. 康纳赫，1972年

[110] 在维克托·T. 迪亚巴特（Victor T. Diabaté）指导下，由阿比让大学文艺、考古及历史研究所进行的研究

[111] J. 安阔达赫（J. Anquandah），1982年，第97页。一般说来，加纳的城市化也值得研究。阿克拉附近在公元16世纪已经繁荣的拉多库镇究竟已存在多久？（J. 安阔达赫，1982年，第70页）

种认为城市的现象或多或少是来自北非的商贩们在近期输入的。恰恰与绝大多数人种学著作或直到最近的社会人类学家的著作所留下的印象相反，西部非洲并不是由有着独特的乡村文化与语言、各自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互不影响的族群组合成的村庄集合体。一旦城市出现，它们就自然成为文化的中心而对周围广大地区发生影响。复合的文化和社会空间形成于公元 11 世纪以前，被解释为语言（诸如曼德人的各种语言、约鲁巴语和豪萨语）得到传播的原因。长期以来，这些社会的规模、它们内部的动力以及它们的演变进程就这样被误解了。

沿着同样的线索还可以提出许多新的疑问，涉及东海岸和马达加斯加贸易站的情况，它们的非洲和马尔加什基础，以及穆斯林商人在它们的发展中所处地位。⑫ 人们问 **784** 道：在东部非洲（往北和往南各延伸多远？），与城市发展似乎同步的斯瓦希里文化，是否从一开始不是一种城市文明？这方面的辩论迄今还没有结束。⑬ 位于当今莫桑比克的一些贸易站，⑭ 与林波波河流域保持着联系，并为马庞古布韦第一个雏型城市中心的兴起作出过间接的贡献。马庞古布韦是一个行政中心，而且是某种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发展在公元 13 世纪时达到最高峰，其表现形式为津巴布韦的创建。

大陆北部这个时期一系列重要城镇的创建也同样值得注意，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极其有限。固然，非斯、凯鲁万、马拉喀什和拉巴特这些城市的演变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对锡吉勒马萨或塔哈尔特（公元 7 世纪时创建）、萨德拉塔和整个姆扎布绿洲、古达梅斯，以及尼罗河流域中部的埃及和努比亚诸城市却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研究。⑮ 实际上，这种形成期也正是新的城市化再次重新规划空间的时期。这种现象充其量也只影响到非洲大陆的一半。但是，它仍然是整个大陆的特征，这是确定无疑的。

穆斯林征服了非洲大陆的北部，在东方哈里发的统治下经过短暂的理论上的统一后，终于导致政治上的分裂，这对非洲的未来至关重要。新的国家在埃及和当今的突尼斯出现了，而且也在一些重要城市诸如非斯、塔哈尔特和锡吉勒马萨的周围形成。这些国家到公元 9 至 10 世纪时日趋巩固，并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它们几乎经常用西非的黄金来确保它们货币的价值。这种国家组织的领土基地也日益强固，最早是在伊弗里基亚，随后是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⑯ 即使在公元11世纪最不安定的那段时间里也没有使下面这一逐渐确立起来的事实成问题：穆斯林王朝统治下的领土基地，尤其是在突尼斯和埃及，继而在公元 11 世纪阿尔莫拉维德统治下的摩洛哥，已经成为颇为稳定和颇为持久的实体。穆斯林国家及其职能和机制在这个时期里确立了起来，即使王朝

---

⑫ 见本卷第 13、14、15、21 和 25 各章。公元 8 世纪贸易站就已出现在远至南方的萨比河一带（P. J. J. 辛克莱，1982 年）。

⑬ T. H. 威尔逊（T. H. Wilson），1982 年。

⑭ 见本卷第 22 章。也见“考古学的作品……”1980 年；P. J. J. 辛克莱，1982 年。

⑮ 关于库斯，上埃及的一个商队中心，见 J. C. 加尔桑（J. C. Garcin），1976 年。关于殡葬石刻作为人口、经济和文化史的文献的重要意义，见 M. 塔瓦布（M. al-Tawāb）和阿卜德·拉赫曼（'Abd ar-Rahmān），1977 年。关于努比亚的诸城镇，特别是波兰人在法拉斯和栋古拉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见本卷第 8 章。关于最近对努比亚最南边的王国首都苏巴的发掘，见 D. A. 韦尔斯比，1983 年。

⑯ 见本卷第 7、10 和 12 各章。

785 更迭，即使发生了种种严重的事件（诸如阿布·亚齐德的起义，[67]"希拉利人的入侵"[68]，或基督教势力来自西西里的进攻）。这类事件时时干扰着国家对领土的控制和王朝延续的机会，有时这种干扰是极为严重的。

在西部非洲，国家组织可能在公元600年前就已开始出现，不过到本卷所述时期国家组织的存在变得明显起来。加奥、加纳和加奈姆如今已为人们所熟知，虽然有关这三个地方，国家起源问题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另外还有许多地方，迄今进行的研究工作更是少得多。但在本卷所述的时期内，这里已经存在着国家政权这一点，则是众所公认的结论。塔克鲁尔的情况就肯定是如此，最近有一篇论文为其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69]由于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极不充分，我们有些人一度偏离了这些肯定的事实，而去相信非洲政权无非是一些"酋长领地"，没有什么长期固定的领土。请问，如果我们用这种看法来看伊费，难道是合理的吗？同样，难道我们应该相信长期是加纳竞争对手的索索人国王苏马奥罗·坎特的政权以及在13世纪被松迪亚塔击败前曼德人的"曼萨亚"（Mansaya）都还不成其为国家？总之，在这个领域里研究工作仍大有可为。再说，在豪萨人中间、在约鲁巴人中间当时又发生着什么呢？

尼日尔河下游以西、在后来成为贝宁王国的土地上，出现了防御工事这一事实，不仅仅说明当时存在一个有着相应领土的集中的政权，而且也反映出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各国为扩大领土基础而进行的斗争是何等剧烈。在尼日尔河下游以东的地区情况恰好和上面所说的相反，那里并没有发现任何防御工事。这可能正好说明那里以伊格博-乌库为首已经实现了领土的统一；或者说明那里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土地占有方式和政治结构。从政治角度说，对在伊格博-乌库发现富丽堂皇的坟墓又该作何解释呢？

非洲东北部，公元6世纪形成的一些基督教王国，在本卷所述的时期里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在努比亚的三个部分，那里经济和文化上的成就在公元11世纪时仍很明显。[70]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却有所恶化。但在阿克苏姆崩溃之后，君主政体又于公元11

786 世纪在拉斯塔重建。同一时期，一系列穆斯林君主国在其东方和南方建立起来，直达埃塞俄比亚的湖区。

在东部沿海地区，各个城市自行组织一个统治当局似乎已成为一种惯例。在当今的津巴布韦境内，公元10世纪时成立了一个国家，其首都设在马庞古布韦，而大津巴布韦则出现在公元13世纪。在中非或者在东非内地尚未观察到统一大面积领土的情况，人们只能说有关资料表明桑加正在缓慢地向"酋长领地"演变。这种演变在公元10世

[67] 一位阿尔及利亚的研究工作者纳饮达·拉菲夫人（Mrs. Nachida Rafaï）即将完成的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新作，使用了译自阿拉伯文的新材料，充分揭示出阿布·亚齐德和法蒂玛王朝之间斗争的艰苦和剧烈。

[68] 关于这次"入侵"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仍有争论，伊德里西著作关键性文本的新译文，哈吉·萨多克（Hadj Sadok），1983年，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素材。

[69] A. R.巴，1984年。

[70] 人们只要列举考古发掘者在栋古拉发现的遗迹为例，特别是那些教堂和一座王宫，就可以了解，尽管在比较穷的地方，努比亚国家仍拥有重要的资产，并起着国际性的作用。关于阿勒瓦及最近的考古发掘见D. A.韦尔斯比，1983年；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努比亚在公元11世纪所具有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活力。

纪末才明显地固定下来。[21]

除上述发展外，我们还没有掌握其他类型政治组织的证据。有人主张：在非洲的东部和东南部，人群聚居地的有形组织表明：在那里由各个大群体的领导人，以血亲关系的理论为基础，实行集体统治。但近来人们已对这种论点提出质疑。[22] 质疑者认为，这一论点过于依靠上两个世纪人种学文章的推理。就我们目前手头掌握的资料而言，我们只能说：继续保存下来的统治者的权力肯定建立于公元 7 世纪之前。在上述情况下，没有王朝的显赫，没有统治阶层，也没有显著的生活水平上的差别。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遗址，从整体上看，确实很像是一种集体统治的政体。资料也很可能是表明，以这种方式控制的领土非常小，也许仅仅相当于一个村。能与之相对比进行研究的只有西部非洲森林地带的情况。

集体主张的体现：宗教、思想、艺术

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为两个一神教所瓜分。伊斯兰教在公元 7 至 11 世纪期间继续发展。[23] 基督教在整个北部非洲消失了。[24] 它原是古罗马时期在那里确立的，但后来只在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牢固地站住脚跟，一个庞大的信基督教的少数集团在埃及幸存下来。这两个一神教都建立起了世界性的文明，力图取代在它之前存在的文化。当然，其取代的多或少，取决于不同的地点与时间。基督教无法克服其内部分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与古罗马之后的一些政权紧密相连所造成的。不论是科普特人也罢，努比亚人或埃塞俄比亚人也罢，都没有和罗马或者拜占廷发生关系。但是不管这些非洲的基督教曾何等的辉煌（它们的突出之处是修道院特别众多和宏伟），它们和外部世界却并未进行多少交往，至少就地中海地区而言是如此。需要研究在本卷所述的时期内它们与亚洲基督教的关系（亚洲基督教同样也独立于罗马和拜占廷之外），特别是它们与聂斯托里教派的关系。这一教派的教会组织一直发展到远至中国，迄今人们在这一领域里提出的问题实在太少了

787

作为一种宗教和文化的伊斯兰教影响传播到从亚洲至大西洋的大片已知世界。在非洲，它长期把黑人与北方地中海地区的各族人民隔离开来。随着它内部团结的加强，它日益壮大起来，到公元 10 世纪，由于法蒂玛什叶派在穆斯林非洲到处都取得暂时性的胜利，这种团结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公元 11 世纪时以马立克学派的教规为基础的逊尼派开始在非洲取得进展。这种由法规和社会戒律以及尊重伊斯兰基本法为基础的生活方式逐渐占了统治地位。在伊斯兰深入人心的地区，穆斯林准则逐渐战胜了旧有的文化方式。从广义上讲，估计整个非洲大陆的北部这种情况在公元 11 世纪末期席卷大地，[25] 伊

---

[21] P. 德－马雷，1977－1978 年。

[22] M. 霍尔（M. Hall），1984 年的批评。

[23] 见本卷第 3、4 及 10 各章。

[24] 它在文化上的最后表现和它的最后的痕迹都发生在公元 11 世纪。见本卷第 3 章。

[25] 见本卷第 2、4 两章，在统一的外表下，有趣的是各种各样诸如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哈列哲教派等诸说混杂的派别仍然存在了下来。此处不是讨论它们的地方。

斯兰教在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东海岸也取得进展。但是那两块地方伊斯兰教真正在文化上取胜则还是下个阶段的事。下面我们要更多地注意萨赫勒等地的掌权者们在皈依伊斯兰教时是如何被迫作出妥协的。因为他们社会中起作用的是崇拜祖先的宗教准则，这与伊斯兰教的某些要求是不相容的。[56]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教在有些地区进展缓慢，为什么伊斯兰化长时期具有城市化的特色，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虔诚的法学家们对“懈怠”的统治者的反对会爆发成为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的后果在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是在公元14世纪以后仍能感觉到。这种暴力行为的早期事例可以在公元11世纪末阿尔莫拉维德人对西部非洲某些地区的伊斯兰化中看到。

对历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了解当时的非洲宗教。更近期的资料难以给我们多大帮助，我们所能引用的材料寥寥无几，而且十分零碎。谈论“祈雨法师”、“符咒”、788 “祖先崇拜”、“偶像”（此字来源于一神教）和“巫术”的人不少。其实，这不过是掩盖人们的无知，强调了延续性的可靠而排除了任何进化。它停留在危险的含糊不清的状态。这里我们面临着对古代非洲研究的又一个巨大空白。这样的空白只有在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后才有可能部分地得到填补。

不同的文化对领导社会的政权的理解，肯定是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密切相连的。我们从上文看到了可能有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权。一神教把所有政权都看作是为造物主服务的，并且是由造物主委派的。即使塔哈尔特伊玛目的权力不同于法蒂玛的伊玛目，即使法蒂玛的伊玛目自认为比阿格拉布王朝的埃米尔或伊德里斯王朝的王公贵族更接近真主，也更接近先知的哈里发，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王朝都以真主和古兰经的名义进行统治。努比亚的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的皇帝与上帝的关系完全与此相同，尽管我们现在还很少知道如何从理论上分析这段时期里与上帝的这种关系。[57]

在非洲有些地方，情况与此不同。人们仍坚信他们赖以兴起的宗教和社会经济结构。庞大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有趣的、新颖的权力观念，它往往被不恰当地称作“神授王权”。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注意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一端到另一端，对王权的看法惊人地相似。掌握权力的人是“神圣的”，只要他恪守把他与他所治理的群体束缚在一起的人间契约所规定的条件，他就受到尊敬；同时当他——也只有他——如果侵犯了社会生活的一般准则，那就会使人们恐惧不安，最常提到的这种侵犯的例子就是乱伦。掌握权力的个人对环境、土地肥力、雨和水、食物、社会的和谐、人们的生活都有积极的影响。人们一般都默认，由于他的职能，他天生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者来自各种魔力的积聚）。母后、国王的姐妹或者甚至他的妻子都在宗教仪式中起着重要作用。某些与王权有关的仪式和象征，各地都极为相像。国王必须没有生理上的缺陷。他的脚不能接触没有铺任何东西的土地。他不能看见血或尸首；他不能让百姓见面，因此将他的脸遮起来；他只能通过中间媒介与人交谈。他单独进食并且不能让人看到他喝水。G.P.默多克甚至说，所有非洲的王国都像一个豆荚里的豌豆那样彼

---

[56] 欧麦里在公元14世纪时引述这种妥协的一个例子：马里的穆萨曼萨在开罗透露，他的帝国境内存在着“异教徒，他并不强迫这些人交纳异教徒们应交纳的税款，而是让他们从金矿中采金。”参阅本卷第3章。

[57] 尽管分析罗马天主教很容易。例如，见J.德维斯，1985年（b）。

此十分相似。㉘ 如果他在某一个问题上严重失职，特别是在协调农业收成方面，如果他身体的完好受到损伤，如果他滥用权力，他这样的个人就或多或少等同于肉体上遭到消灭。㉙ 无疑地，这里行使权力的情况与地中海世界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 789

一般总是用起源于同一个共同的法老来解释非洲各个政权的相似之处。今天这种观点已不再被如此普遍地接受了，而是更多地强调其古老、起源于当地、以及扎根于当地惯例的特点，并且相信这些政权具有一些典型的特征，诸如它们与土地、食品来源、狩猎和雨水的关系。也可能这些政权相互借鉴它们最吸引人、最令人难忘的特征，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很可能就来自这种借鉴。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即以单边或双边的不发声音的铁铃为例。这是一种在西部非洲发展起来的标志，但在公元 1200 年前后在沙巴的卡托托墓地发现了单边铃，而公元 15 世纪又在津巴布韦出现了双边铃。单边铃与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的权力相联系，而双边铃则与王权本身相联系。因此，这种传播是公元 1500 年以前由尼日利亚传到津巴布韦（再传到刚果王国），公元 1200 年以前由尼日利亚传到沙巴的，而且很可能就发生在本卷所述的这几个世纪里。㉚ 此处所述是传播“神授王权”原则的一个有形信号，至于其传播渠道我们还不清楚。

王威的思想肯定也是与马庞古布韦创建王国相联系的。我们认为，在这里国王与雨的联系是关键性的。国王是最高的祈雨法师，他控制着雨量。显然，在一个降雨量多变而所有作物又都依赖于雨的地方，祈雨的能力是一种关键性的权威标志，虽然我们对于这一思想的其他组成部分实际上一无所知。津巴布韦的王威可以溯源于它，而且当我们掌握了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以后——那已是五个世纪之后了——发现在西部非洲存在的相当一部分因素也同样存在于津巴布韦。

这样，有利于促成“神授王权”思想这一种或那一种特征的条件因时间与空间之不同而极不相同。关于这一问题人们仍然必须小心谨慎，以避免过于系统化的偏向。仪式、典礼、信仰和标志的形式，在不同的世纪和不同的地方都是颇不相同的。即使到了公元 19 世纪，一个王国和另一个王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可以列出一整张“神授王权特征”的单子，而所有这些特征在同一个王国同时并存的事例是根本没有的。因此，G.P. 默多克所谓非洲各王国彼此十分相似的说法至少有相当部分并非真实。 790

在本卷所述的时期里，政权多方面的复杂情况看来几乎全部是有形的。在那些贸易成为必不可少的地区，政权对控制贸易的方式是不能无动于衷的。同时，它对诸如黄金、铜或铁的控制也必然十分重视。政权的这些方面在狩猎－采集者的社会里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在一个单纯务农的群体里同样不可能出现。

加纳的统治者们，像其他统治者一样，被人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是体质强健的。巴克里的报道对他们中的一人设法掩饰自己失明的欺骗性行为的描述足以证明这一点。㉛ 但

㉘ G. P. 默多克（G. P. Murdock），1959 年，第 37 页。

㉙ 一个例子：马苏迪，1965 年，第 330 页：“一旦（僧祇人的）国王实行暴政并背离公正的原则，他们就把他处死，并剥夺他后代的继承权。”大量的文艺作品以处死国王为题材，或者因为他有生理缺陷，或者是在他统治了若干年之后。但尽管许多王国都存在着这种规定作为思想准则，目前还没有一个例子得到证实。

㉚ J. 范西纳，1969 年。

㉛ 巴克里，1913 年，第 174－175 页。

是最吸引阿拉伯作者们注意的仍然是这些国王经商的权力。

因此，归根结底，非洲政权的历史正如其他地方一样，与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关系多于意识形态方面。意识形态，在需要的时候，创造出使统治者地位稳定和合法化所必需的正当理由和礼仪。那么，当两种合法性相对峙时又该如何呢？例如，归顺真主的国王应具的合法性，和一个与古老魔法联系在一起的铸铁大师的合法性，如果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该如何呢？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也就在其中了。非洲的政权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区的政权一样，在公元7世纪以前和公元11世纪以后，以及在公元7世纪至11世纪之间的各个世纪中，都面临着冲突、紧张、抉择和演变。今天在这个领域里最使历史学家吃惊和最使他们感到困惑的，可能是：那种能缓解矛盾和冲突的极端灵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适应性，至少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没有额外提出规定时是如此。

宗教和意识形态涉及文化的实质。而艺术则是这种实质的表现。在这一层次上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传统，即奥依科曼尼（*oikoumene*）⑫的传统以及地区艺术的传统。关于后者我们只能从目前能看得到的遗迹中得到直接的知识。

穆斯林世界把艺术从属于伊斯兰社会的生活。一些共有的纪念碑，即使是按照政治当局的意图建立的，它们一般都建立在公众聚集在一起进行祈祷和表达信仰虔诚的地方。清真寺是穆斯林建筑的中心，当然它们也有不同的风格，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是由于流行的样式、当时的风尚或者该建筑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不同的功能所造成的。还可以肯定的是：每个朝代都力求在它的清真寺上加上自己的印记。无论是开罗旧城的图伦王朝、凯鲁万的阿格拉布王朝、马赫迪亚或开罗的法蒂玛王朝、还是摩洛哥和西班牙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和阿尔莫哈德王朝都没有例外。但是尽管在这些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清真寺还是显示出了穆斯林乌玛（*umma*，即穆斯林社会）的一致性。

791

在其他领域，政府里贵族阶级小心翼翼的奢侈以及战争和贸易都可能得到发展。这个阶级从来不是徒有其表的，它在这些世纪中发展起一种对奢侈的强烈爱好。这可以从当时生产的衣料、象牙雕刻、木器雕刻、陶瓷、镶嵌细工或一些壁饰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一领域中，和建筑一样，仿制的流行款式从一个大陆传到了另一个大陆。对奢侈的爱好如此之明显，以致定居在撒哈拉以南从事贸易的“外来者”把其中最美的样式和产品随身携带。⑬

公元11世纪结束之前，穆斯林世界已在生产奢侈品和一些卖好价而做工精致的物品。例如：开罗旧城在公元10世纪末已在仿制迄今仍以高价进口的中国青瓷。

本卷前文已提到过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艺术。它们更多的是自己创造的。但仍有借鉴了地中海地区之处。基督教壁饰与穆斯林壁饰形成尖锐对比，但值得强调的是它们间又有微弱的相互影响，不论是穆斯林艺术对基督教艺术，还是基督教艺术对穆斯林艺术都有某种影响。这反过来证明风格不是自动传播的，而是按照宗教和政治力量的路线进行传播。从这一意义上讲，观赏艺术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一种表现。

---

⑫ 见本卷第8章，注94。

⑬ 参阅一位突尼斯研究工作者关于这个问题的值得称道的近作：A. 卢希尔，1984年。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并且也是这么写成文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观赏艺术在世上已经绝迹，其原因是作为这种艺术的常用材料——木材经不起风吹雨打和时间的摧残！而且，即使这种艺术品存在了下来，它们也不过被蔑视为“部落性”的。传遍全世界的尼日利亚古代珍品的精彩展览[34]否定了这种观点，这个展览以及其他近期的发现物和展览品向人们重提老问题。诺克文化多年来已使许多人对之留下深刻印象。[35]诺克的陶俑艺术，它那形式多样的产品，几乎贯穿从公元前 7 世纪开始的几乎整整一千年时间。它一举揭示出非洲艺术经历的历史深度。过去曾经有过一种从诺克直接转向公元 12 世纪伊费艺术品的倾向。伊费被当作是诺克文化的继承者。错误在于认为在这两种艺术表现之间的时期内不存在多少其他的艺术，并且相信陶瓷艺术仅限于尼日利亚。今天我们已能看得清楚，诺克并非一个封闭的实体。发现陶俑艺术的地方已超出它的范围。在本卷所述的时期里，从泰格达乌斯特到杰内－杰诺，在尼日尔，[36]乍得湖以南[37]，甚至 **792** 无疑在其他一些地方，最明显的是在伊格博－乌库都可以看到雕塑艺术的发展。它们之间的风格各异。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人们可以说尼日尔河上游地区的传统不仅表现在陶瓷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小的金属制品方面，在公元 1100 年前后的班迪亚加拉还表现在木制品方面。很可能，这一阶段还雕塑了许多其他题材的木制品，但随着时间的变迁都已消失无遗了。班迪亚加拉的木制领圈和少数几个木制小像是在特殊条件下保存下来的。这种保存方法也有可能会在其他地方找到。

在整个西部非洲存在着一种用烘干的泥土保存产品的造形方法。这种产品和技术已存在了许多世纪，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 7 世纪以前。今天，必需协调对它们的研究，并使之合理化。我们顺便也应该提一下，在塞内加尔的辛丘－巴拉地方发现的公元 6 世纪制造的艺术性极高的陶瓷瓶，看来可以视作更广泛的地理范围内文化的标志。[38]这种艺术品与什么背景相联系？作为美学上的需要它代表着什么？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物，它又代表着什么？谁命令它的制造？迄今，所有这些问题仍然还没有答案。

中部非洲留下了两件木制品。一件是代表一种动物的面具，另一件是基督纪元第一个千年末期制造的刻在柱顶上的头。它们至少表明安哥拉有着木雕行业。安哥拉的岩画十分丰富，中部非洲甚至更多。不幸的是它们从未被人认真地收集、研究过，更不用说标明年代了。[39]在东部非洲，则有来自白尼罗河的少数几个同一时期的牛的塑像和来自乌干达的人的塑像。在南部非洲，德兰士瓦陶器面具的制作约在公元 800 年前后停止了。这与在马庞古布韦发现的一些镀金物品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这些物品肯定是后来在津巴布韦发展起来的石雕的前驱。但是马庞古布韦仅仅只是该地区许多实例中的一个。在豹地传统的遗址中都发现本卷所述时期牛和其他家畜的土制塑像和妇女塑像。在津巴布韦（戈科梅雷）较古老的遗址中也有发现。在赞比亚中部（卡洛莫）同样发现这

---

[34] E. 埃约和 F. 威利特，1980 年、1982 年。

[35]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II 卷，第 24 章。

[36] B. 加多，1980 年。同一位作者在更近一些时候还有其他发现。

[37] G. 康纳赫，19 1 年，第 136 及随后诸页。

[38] G. 蒂尔曼和 A. 拉维西，1983 年，第 48 及随后诸页。也见本卷第 13 章。

[39] 关于安哥拉的岩画，参阅 C. 埃尔韦多萨（C. Ervedosa），1980 年及所附的详尽书目。

一时期相类似的塑像，经研究表现与在津巴布韦所发现的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最后，我们切勿忘记，津巴布韦丰富的岩石艺术在公元11世纪消亡了，而一种比它简单的岩石艺术在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继续存在下来。这无疑是桑族人的作品。

关于雕塑艺术在奥依科曼尼以南遍地皆是的问题已经说得够了。但迄今仅仅还只是793 一鳞半爪地发现了它们的一些痕迹。各种风格的分布范围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目前只有关于这些作品所起作用以及它们的目的方面的一些模糊概念。即使是像南部非洲那样已经发现物品实例的情况下，研究工作也还远远不够。但是总有一天可以预期某些空白必能得到填补，我们将能为带有地区传统的艺术重新勾划一部历史，正像我们已经为奥依科曼尼艺术所作的那样。与人们经常所说的并一再得到重复的相反，现在还完全不能肯定：这些古老的非洲艺术，像在奥依科曼尼那样，是强烈地受宗教的需要和宗教思想支配的。当然，除非把任何一种以及每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都称作宗教。

结　论

这五个世纪是各方面日益稳定、社会得到扎根以及在最广泛意义上有所发展的五个世纪。这五个世纪既标志着对各种环境的更为连贯的开发，也标志着伊斯兰教的出现。而后者，从长远看，改变了原有的力量对比关系。这是不均衡发展的五个世纪。非洲大陆的某些地区从文献的阴影中崭露头角，使我们经过耐心的工作和方法论上的创新，可以把当时正在进行的技术、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勾划出来。同时，我们迄今对这五个世纪中另外一些地区的了解仍然极不充分。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中部非洲在这段时期里肯定正在经历一场社会、政治进行结构组织的紧张过程。人们几乎到处都可以感觉到这种过程，但仍往往缺乏证据。

当人们评估过去二十年中研究工作，特别是关于这五个世纪的研究工作，所取得的进展时（本卷带有这一进展的印记），不得不认识到这是必须非常认真地集中精力进行研究的阶段之一。我们必须在所有各个领域全面开展研究，以使我们已有的如此纠缠不清的和不完全的知识能得到补充。

一个生活在公元600年的观察家，即使是视野最广阔的观察家，也不能预见到非洲在公元1100年时的情景。但是一个生活在公元1100年的观察家却能大致预见到公元1500年非洲大陆上人们的处境，甚至可以预见到公元1900年的文化层次。这就是研究本卷所提供的这五个世纪形成期的意义所在。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所述日期指的是参加该委员会的日期

J. F. A.阿贾伊 (J. F. A. Ajayi) 教授
(尼日利亚), 自 1971 年起
第六卷主编

F. A.阿尔布凯克·莫朗 (F. A. Albuquerque Mourao) 教授
(巴西), 自 1975 年起

A. A.博亨 (A. A. Boahen) 教授
(加纳), 自 1971 年起
第七卷主编

布布·阿马 (Boubou Hama) 阁下
(尼日尔), 1971－1978 年 (已辞职)

M.布尔 (M. Bull) 阁下
(赞比亚), 自 1971 年起

D.查奈瓦 (D. Chanaiwa) 教授
(津巴布韦), 自 1975 年起

P. D.柯廷 (P. D. Curtin) 教授
(美国), 自 1975 年起

J.德维斯 (J. Devisse) 教授
(法国), 自 1971 年起

M.迪富伊拉 (M. Difuila) 教授
(安哥拉), 自 1978 年起

H.贾伊特 (H. Djait) 教授
(突尼斯), 自 1975 年起

已故谢赫·安塔·迪奥普 (Cheikh Anta Diop) 教授
(塞内加尔), 自 1971－1986 年; 1986 年逝世

J. D.费奇 (J. D. Fage) 教授
(联合王国), 1971－1981 年 (已辞职)

M.埃尔·法西 (M. El Fasi) 阁下
(摩洛哥), 自 1971 年起
第三卷主编

J. L.佛朗哥 (J. L. Franco) 教授
(古巴), 自 1971 年起

已故 M. H. I.加拉勒 (The late M. H. I. Galaal) 先生
(索马里), 1971－1981 年; 1981 年逝世

V. L.格罗塔内利 (V. L. Grottanelli) 博士, 教授
(意大利), 自 1971 年起

E.哈贝兰德 (E. Haberland) 教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自 1971 年起

A.哈普特 (Aklilu Habte) 博士
(埃塞俄比亚), 自 1971 年起

阿马杜·哈姆帕特·巴 (Amadou Hampate Ba) 阁下
(马里), 1971－1978 年 (已辞职)

I. S.哈雷尔 (I. S. El－Hareir) 博士
(利比亚), 自 1978 年起

I.赫尔贝克 (I. Hrbek) 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 自 1971 年起
第三卷助理主编

A.琼斯 (A. Jones) 博士
(利比里亚), 自 1971 年起

已故阿贝·亚历克西·卡加梅（The late Abbé Alexis Kagame）先生
（卢旺达），1971－1981年；1981年逝世

I. N. 基曼博（I. N. Kimambo）教授
（坦桑尼亚），自1971年起

J. 基－泽博（J. Ki－Zerbo）教授
（上沃尔特），自1971年起
第一卷主编

M. D. 拉亚（M. D. Laya）先生
（尼日尔），自1979年起

A. 列特涅夫（A. Letnev）博士
（苏联），自1971年起

G. 莫赫塔尔（G. Mokhtar）博士
（埃及），自1971年起
第二卷主编

P. 马蒂布瓦（P. Mutibwa）教授
（乌干达），自1975年起

D. T. 尼昂（D. T. Niane）教授
（塞内加尔），自1971年起
第四卷主编

L. D. 恩康科（L. D. Ngcongco）教授
（博茨瓦纳），自1971年起

T. 奥邦加（T. Obenga）教授
（刚果人民共和国），自1975年起

B. A. 奥戈特（B. A. Ogot）教授
（肯尼亚），自1971年起
第五卷主编

C. 拉沃雅纳哈里（C. Ravoajanahary）教授
（马达加斯加），自1971年起

已故W. 罗德尼（The late W. Rodney）教授
（圭亚那），1979－1980年；1980年逝世

已故M. 希贝卡（The late M. Shibeika）教授
（苏丹），1971－1980年；1980年逝世

Y. A. 塔利布（Y. A. Talib）教授
（新加坡），自1975年起

已故A. 特谢拉·达莫塔（The late A. Teixeira da Mota）教授
（葡萄牙），1978－1982年；1982年逝世

T. 齐邦古（T. Tshibangu）主任
（扎伊尔），自1971年起

J. 范西纳（J. Vansina）教授
（比利时），自1971年起

已故E. 威廉斯（The late E. Williams）博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6－1978年；1978年辞职；1980年逝世

A. A. 马兹鲁伊（A. A. Mazrui）教授
（肯尼亚）
第八卷主编
非本委员会成员

C. 旺济（C. Wondji）
（科特迪瓦）
第八卷助理主编
非本委员会成员

国际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M. 格莱莱（M. Glélé）
教科文组织文化研究处主任，法国巴黎米奥利斯街

地址：M. Glélé, Director, Division of Studies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s, 1, rue Miollis, 75015 Paris, France

作 者 简 历

第一章　I. 赫尔贝克（I. Hrbek，捷克和斯洛伐克），研究阿拉伯史、非洲史和伊斯兰史的专家，主张非洲历史源于阿拉伯人之说；曾就上述各领域的有关问题发表过许多著作和文章；现在是布拉格东方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捷克和斯洛伐克科学院科学顾问。

第二章　M. 埃尔·法西（M. El Fasi，摩洛哥）：发表过多种语言史和文字考证方面的阿拉伯文和法文著作；曾任位于非斯的卡拉维因大学副校长。

第三章　I. 赫尔贝克（I. Hrbek）；
M. 埃尔·法西（M. El Fasi）。

第四章　Z. 德拉马尼－优素福（Z. Dramani－Issifou，贝宁）：黑非洲与马格里布关系问题专家；有关这一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和许多论文的作者。

第五章　F. 德－梅德罗斯（F. de Médeiros，贝宁）：非洲史料编纂专家；有关黑非洲和其他各族人民关系问题的多种著作的作家。

第六章　S. 卢旺加－卢尼伊戈（S. Lwanga－Lunyiigo，乌干达）：研究非洲古代史（特别是非洲铁器时代历史）的专家；发表过多种有关这一领域的著作。
J. 范西纳（J. Vansina，比利时）：非洲史专家；发表过许多关于殖民统治时期之前非洲历史的著作和文章；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

第七章　T. 比昂基（T. Bianquis，法国）：研究十至十一世纪阿拉伯东方史的专家；《法蒂玛王朝统治下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历史》（Histoire de Damas et de la Syrie sous la domination fatimide）一书的作者；曾任位于大马士革的法国阿拉伯研究所所长；现在在吕米埃－里昂第二大学讲授伊斯兰历史和文化。

第八章　S. 贾科别尔斯基（S. Jakobielski，波兰）：基督教古代文化遗迹考古专家；发表过专门研究科普特手稿的著作；在华沙的天主教神学院讲授努比亚古代文化；是位于开罗的波兰地中海考古中心成员。

第九章　H. 莫纳（H. Mones，埃及）：伊斯兰通史专家；发表过有关这一主题的多种著作；开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教授；位于开罗的阿拉伯语言研究院成员。

第十章　M. 塔尔比（M. Talbi，突尼斯）：伊斯兰问题专家；曾就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发表过许多著作和文章；并曾在突尼斯大学文学院任教。

第十一章　T. 莱维基（T. Lewicki，波兰）：研究马格里布史和苏丹地区中世纪史的专家；曾就这些领域的有关问题发表过多种著作；现在是位于克拉科夫的耶格隆大学的教授。

第十二章　I. 赫尔贝克（I. Hrbek）。

第十三章　J. 德维斯（J. Devisse, 法国）；研究四至十六世纪西北非历史的专家；考古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洲史的文章和著作；巴黎第一大学万神殿神学院非洲史教授。
I. 赫尔贝克（I. Hrbek）。

第十四章　J. 德维斯（J. Devisse）。

第十五章　D. 兰格（D. Lange,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中苏丹殖民统治时期之前历史的专家；发表过多种有关这一主题的著作；曾在尼亚美大学任教。
B.W. 巴尔金多（B. W. Barkindo, 尼日利亚）；研究乍得湖流域殖民统治以前和殖民统治初期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专家；是该主题多种著作的作者；现任位于卡诺的巴约罗大学历史学讲师。

第十六章　瑟斯顿·肖（Thurstan Shaw, 联合王国）；西非史前史多种著作的作者；考古学教授；泛非史前史大会副主席；史前史学会主席。

第十七章　B. W. 安达（B. W. Andah, 尼日利亚）；非洲史专家、考古学和人类学家；上述各领域有关问题许多专著的作者；伊巴丹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
J. R. 安匡达赫（J. R. Anquandah, 加纳）；研究从金属时代早期起到公元1700年非洲历史的专家和考古学家；上述领域许多专著的作者；现任位于莱贡的加纳大学考古学讲师。

第十八章　B. W. 安达（B. W. Andah）。

第十九章　特克勒－查迪克·梅库里阿（Tekle－Tsadik Mekouria, 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作家；研究埃塞俄比亚自起源至二十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史的专家；已退休。

第二十章　E. 塞鲁利（E. Cerulli, 意大利）；人种学和人类文化学家；上述主题多种著作的作者。

第二十一章　F. T. 马萨奥（F. T. Masao, 坦桑尼亚）；考古学家；研究石器时代后期历史和史前石雕艺术的专家；上述主题多种专著的作者；坦桑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
H. W. 穆托罗（H. W. Mutoro, 肯尼亚）；非洲文物考古专家；上述主题多种专著的作者。

第二十二章　C. 埃雷特（C. Ehret, 美国）；东非语言学和历史学家；发表过多种关于东非殖民统治之前和殖民统治时期历史的著作；现在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

第二十三章　D. W. 菲利普森（D. W. Phillipson, 联合王国）；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史前史专家，以非洲东部和南部为研究重点；上述主题多种著作的作者，《非洲考古评论》杂志编辑；剑桥大学讲师。

第二十四章　T. N. 赫夫曼（T. N. Huffman, 美国）；研究社会与文化人类考古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专家；上述主题多种著作的作者。

第二十五章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女士（Mme B.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马达加斯加）；研究马尔加什语言和文学的专家；关于马达加斯加文明的多种著作的作者；马尔加什研究院语言、文学和艺术部副主席；在马达加斯加大学讲授口头文学和文化史；巴黎全国科学研究中心语言学高级研究员。

第二十六章　Y. A.塔利布（Y. A. Talib，新加坡）：研究伊斯兰、马来民族和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专家；上述主题多种著作的作者、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马来民族研究系系主任。

E.埃尔－萨米尔（E. El-Samir，伊拉克）：研究伊斯兰历史的专家，上述主题多种著作的作者。

第二十七章　A.巴思利（A. Bathily，塞内加尔）：研究八个十九世纪西苏丹历史的专家；曾发表过上述领域有关问题的多种著作。

C.梅拉苏（C. Meillassoux，法国）：研究西部非洲经济和社会史的专家；上述领域多种著作的作者；巴黎全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第二十八章　J.德维斯（J. Devisse）；

J.范西纳（J. Vansina）。

参考文献目录

本书出版者谨指出，尽管参考书目已力求准确无误，但由于本著作的复杂性和国际性，错误在所难免

Abbreviations and list of periodicals

A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Washington, DC
AARSC *Annal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Brussels
AAW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AB *Africana Bulletin*, Warsaw: Warsaw University
Actes Coll Bamako I *Actes du 1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Bamako, organisé par la Fondation SCOA po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n Afrique noire*. (Projet Boucle du Niger), Bamako, 27 January–1 February 1975. Paris: Fondation SCOA, 1976
Actes Coll. Bamako II *Actes du 2è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Bamako, organisé par la Fondation SCOA po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n Afrique noire* (Projet Boucle du Niger), Bamako, 16–22 February 1976. Paris: Fondation SCOA, 1977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Actes du Premi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Archéologie Afrique*. (Fort-Lamy, 11–16 Décembre 1966). Fort-Lamy: Inst. National Tchadien pour les Sciences Humaines, 1969
Actes Coll. Intern. Biolog. Pop. Sahar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Biologie des Populations Sahariennes*, Algiers, 1969
Actes VIe Congr. PPEQ *Actes du Sixième Congrès Pan-Africain de Préhistoire et des études du Quaternaire*, Dakar: Cambéry, 1967
AE *Annales d'Ethiopie*, Paris
AEH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Madison, Wisconsin
AES *Afrikanskiy etnograficheskiy sbornik*, Moscow-Leningrad
AF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Schrift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Alten Orients*,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DDR, Berlin
AFLSHD *Annal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Université de Dakar
Africa (IAI) *Africa*,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London
Africa (INAA) *Africa*, Institut National d'Archéologie et de l'Art, Tunis
African Arts *African Arts*, Afric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HES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AHS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ecame *IJAHS* in 1972),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AI *Annales Islamologiques* (earlier *Mélanges*),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AIEOA *Annales de l'Institut d'Etudes Orientales de l'Université d'Alger*, Alger: Faculté des Lettres
AIMRS *Annales de l'Institut mauritanien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Nouakchott
AION *Annali dell' 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Naples
AJ *Africana Journal*, New York
AJP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AKM *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Deutsche Morgenlandische Gesellschaft, Leipzig
AL *Annali Lateranensi*, Vatican
ALR *African Language Review* (now) *African Languages*, London: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ALS *African Language Studie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M *Africana Marburgensia*, Marburg
AMRAC *Annales du Musée Royal d'Afrique Centrale*, Sciences Humaines, Tervuren, Belgium
AN *African Notes*, Ibadan: University of Ibad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NM *Annals of the Natal Museum*, Durban
Annales ESC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Paris
Ann. Rev. Anthropol.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YA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New York
AQ *Africa Quarterly*, New Delhi

Arabica *Arabica: Revue des études*, Leiden: Brill
Ar. Anz. *Archäeologischer Anzeiger*, Berlin (West)
ARB *Africana Research Bulletin*, Freetow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Boston: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America
Archaeometry *Archaeometry*, Oxford: Research Laboratory of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Arts
Archeologia *Archeologia*, London
Archeologia *Archéologia*, Paris
AROR *Archiv Orientalní, Oriental Archives*, Prague
Ars Orientalis *Ars Orientalis: the Arts of Islam and the East*,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S *African Studies* (continues as *Bantu Studies*), Johannesburg
ASAG *Archives Suisses d'Anthropologie générale*, Geneva
ASR *African Studies Review*, Camden, New Jersey
Atti IV Congr. Int. Studi Etiop. *Atti de IV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etiopici, Roma 10 15 Aprile 1972*, Roma: Accad. Naz. dei Lincei
AuÜ *Afrika und Übersee*, Hamburg
AUA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Abidjan*, Abidjan
AUM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Madagascar*, Tananarive.
Azania *Azania: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Eastern Africa*, London
BA *Baessler Archiv*, Berlin, Museum für Volkerkunde
BAB *Bulletin Antieke Beschaving. Annual Papers on Classical Antiquity*, Leiden
BASEQA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sénégalaise pour l'étude du Quarternaire africain*, Dakar-Fann
BASP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apyrologists*
BCCSP *Bolletino del Centro Camuno di Studi Preistorici*
BCEHS *Bulletin du Comité d'E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Dakar
BEO *Bulletin d'Etudes Orientales*, Damascu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BGA *Berliner geographische Abhandlungen*, Berlin: Freie Universität
BIE *Bulletin de l'Institut d'Egypte*, Cairo
BIFAN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later Fondamental) de l'Afrique Noire*, Dakar
BMAPM *Bulletin du Musée d'Anthropologie Préhistorique de Monaco*
BMNV *Bulletin du Musée National de Varsovie*, Warsaw
BNR *Botswana Notes and Records*, Gaborone
BS *Bantu Studies*, Johannesburg
BSA Copt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Archéologie Copte*, Cairo
BSARSC *Bulletin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Brussels
BSGAO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et Archéologie d'Oran*, Oran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BSPF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 Paris
BUPAH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in African History*,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yzantion *Byzantion*, Brussels
Cahiers du CRA *Cahier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Africaines*, Paris
CAMAP *Travaux du Centre d'Archéologie Méditerranéenne de l'Acade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Warsaw
CCM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
CEA *Cahiers d'Etudes Africaines*, Paris: Mouton
CHM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Paris: Librairie des Méridiens
CORSTOM *Cahiers de l'Office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Technique d'Outre-Mer*, Paris
C-RAI *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CSSH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T *Cahiers de Tunisie: 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Tunis: Faculté de Lettres
CU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HA *Etudes d'Histoire Africaines*, Kinshasa
EP *Etnografia Polska*, Wroclaw
EUP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FO *Folia Orientalia*, Krakow
GNQ *Ghana Notes and Queries*, Legon
GSSJ *Ghana Social Science Journal*, Legon
HA *History in Africa: A Journal of Method*, Waltham, Massachusetts
Hespéris *Hespéris*, Rabat: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Marocaines
L'Homme *L'Homme. Cahiers d'Ethnologie, de Géographie et de Linguistique*, Paris

HT *Hespéris-Tamuda*, Rabat: Université Mohammed V, Faculté de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Humaines
HU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AI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London
IC *Islamic Culture*, Hyderabad
IFAN Institut fondemental de l'Afrique noire
IJA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IJ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IRSH Institut de Recherches Humaines, Niamey
Islam *Der Islam: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islamischen Orients*, Berlin
J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AH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L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London
J. Afr. Soc. *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 London
JAR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Boston, Massachusetts
JAS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Los Angeles
JEA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London
JES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JESHO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Leiden
JHSN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S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 Paris
JSAIMM *Journal 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Johannesburg
KHR *Kenya Historical Review*,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Kenya, Nairobi
KS *Kano Studies*, Kano, Nigeria
KSINA *Kratkiye Soobcheniya Instituta Narodow Azii Akademii Nauk SSSR*, Moscow-Leningrad
KUP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Kush *Kush*, Journal of the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Khartoum
Likundoli *Likundoli*, Sér. B, Archives et Documents, Lubumbashi
LNR *Lagos Notes and Records*, Lagos
LSJ *Liberian Studies Journal*, Newark, Delaware
MAIB-L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de Belles-Lettres*, Paris
Man *Man*, London
MBT *Madjallat al-buhūth al-ta'rīkhiyya*, Tripoli
MHAOM *Mélanges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de l'Occident Musulman*, Algiers, 1957, 2 vols
MLI *Mare-Luso-Indicum*
MSOS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u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 Universitat zu Berlin*
NA *Notes Africaines*: Bulletin d'Information de l'IFAN, Dakar
NAA *Narodui Azii i Afriki*, Moskva
Nyame Akuma *Nyame Akuma*,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NC *Nubia Christiana*, Warsaw, Academy of Catholic Theology
NCAA *Nouvelles du Centre d'Art et d'Archéologie*, Antananarivo, Université de Madagascar
NUP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Odu, *Odu*, Ife
OH *Orientalia Hispanica*, Leiden: Brill
Omaly sy Anio *Omaly sy Anio*, Antananarivo
OU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 *Présence Africaine*, Paris-Dakar
Paideuma *Paideuma. Mitteilungen zur Kulturkunde*, Frankfurt
PBA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London
Proc. KNAW *Proceedings-Koniglijke Nederlansch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en*, Amsterdam
Proc. Preh. Soc.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Cambridge
PS *Palestinskiy Sbornik*, Moscow-Leningrad
PUF Presses Univeritaires de France
PU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 *Revue Africaine*. Journal des travaux de la 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 Alger
RAC *Rivista di Archeologia Cristiana*, Pontificia Commissione di archeologia sacra, Rome
RAI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ondon
Radiocarbon– *Radiocarbon, Annual 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s*, New York
REI *Revue des Etudes Islamiques*

RFHOM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aris
RHES *Revue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RHM *Revue d'Histoire Maghrébine*, Tunis
RHPR *Revue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religieuse*, Strasbourg
RIE *Revista del Instituto Egipcio*, Madrid
RMAOF *Revue militaire de l'A O.F*
RMN *Rocznik Muzeum Narodowego w Warszawie, Annuaire du Musée National de Varsovie*, Warsaw
RO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Polish Archives of Oriental Research*, Warszaw
ROMM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Aix-en-Provence
RPAR *Rendiconti della Pontificia Accademia Romana di Archeologia*, Rome
RPC *Recherche, Pédagogie et Culture*, Paris: AUDECAM
RS *Revue Sémitique*, Paris
RSE *Rassegna di studi etiopici*, Rome
RT *Revue tunisienne*
SAAB *South African Archeological Bulletin*, Cape Town
SAJ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Johannesburg
Sankofa *Sankofa: The Lego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Studies*, Legon
SE *Sovietskaya Etnografiya*, Moscow
SFHOM Société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aris
SI *Studia Islamica*, Paris
SJE *The Scandinavian Joint Expedition to Sudanese Nubia Publications*, Uppsala, Lund, Odense, Helsinki
SLLR *Sierra Leone Language Review*, Freetown
SNR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Khartoum
Sources Orales et Histoire - *Sources Orales et Histoire*, Valbonne, CEDRASEMI
STB *Sudan Texts Bulletin*, Coleraine, New University of Ulster
SUGIA *Sprache und Geschichte in Afrika*, Cologne, Institut für Afrikanistik der Universität zu Koln
SWJA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now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lbuquerque, New Mexico
Taloha *Taloha*, Tananarive
Tarikh *Tarikh*,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THSG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 Legon
TIRS *Travaux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Sahariennes*, Alger
TJH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Nairobi: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TNR *Tanganyika Notes and Records* (now *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 Dar es Salaam
UJ *Uganda Journal*, Kampala
UWP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WA World Archaeology, Henley-on-Thames, England
WAAN *West African Archaeological Newsletter*, Ibadan
WAJA *West Af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Ibadan
WZHU-S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Humboldt Universität Ges. Sprachwissenschaft*, Berlin DDR
WZKM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 Vienna
YUP Yale University Press
ZÄS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Leipzig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Bibliography

al-'Abbādī, A. M. (1960) 'Dirāsa hawla Kitāb al-Ḥulal al-Mawshiyya ...', *Tiṭwān*, 5, 1960, pp. 139–58.

al-'Abbādī, A. M. and al-Kattānī, M. I. (1964) *Al-Maghrib al-'arabī fi l-'aṣr al-wāsiṭ* (Dar al-Bayḍā).

Abdalla, A. M. (ed.) (1964) *Studies in Ancient Languages of the Sudan*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Sudan, 7-12 December 1970, Khartoum: KUP).

'Abd ar-Raḥmān, M. 'Abd al-Ṭawāb (1977) *Stèles islamiques de la nécropole d'Assouan. I* (Cairo: IFAO)

'Abd al-Wahhāb, H. H. (1965-72) *Al-Waraḳāt* (3 vols, Tunis).

Abimbola, W. (1975) *Sixteen Great Poems of Ife* (Niamey).

Abir, M. (1970) 'Southern Ethiopia' in R. Gray and D. Birmingham (eds), pp. 119–38.

Abitbol, M. (1979) *Tombouctou et les Arma. De la conquête marocaine du Soudan nigérien en 1591 à l'hégémonie de l'empire peul du Macina en 1833* (Paris: Maisonneuve-Larose).

Abitbol, M. (1981) 'Juifs maghrébins et commerce trans-saharien du VIIIe au XVe siècle'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Vol. 2, pp. 561–77.

Abraham, D. P. (1962) 'The early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Mwene Mutapa (850–1589)' in *Historians in Tropical Africa* (Salisbury: 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pp. 61–91.

Abraham, D. P. (1966) 'The roles of "Chaminuka" and the Mhondoro-cults in Shona political history' in E. Stokes and R. Brown (eds), pp. 28–46.

al-Abshīhī, A. (1872) *Kitāb al-Mustaṭraf fi kull fann al-mustaẓraf* (Cairo).

Abu l-'Arab Tamīn (1920) *Kitab Tabakāt 'Ulamā Ifrīkiyya*, ed. by M. Ben Cheneb (Algiers: Publ. de la Fac. des Lettres).

Abu 'l-Fidā (1840) *Géographie d'Aboulféda*, Arabic text ed. by M. Reinaud et M. G. de Slan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Abu 'l-Fidā (1848–83). *Géographie d'Aboulféda* trans. by M. Reinaud et S. Guyard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Abu Ṣāliḥ (1969)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of Egypt and som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r. by B. T. Evetts and A. J. But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eprint).

Abu Tammām (1828–47) *Ḥamāsa*, ed. by G. Freytag (2 vols, Bonn).

Abun-Nasr, J. M. (1971)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Cambridge: CUP).

Adam, P. (1979) 'Le peuplement de Madagascar et le problème des grandes migrations maritimes' in M. Mollat (ed.), pp. 349–56.

Adams, R. McC. (1966)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Adams, W. Y. (1962a) 'Pottery kiln excavations', *Kush*, 10, pp. 62–75.

Adams, W. Y. (1962b) 'An introductory classification of Christian Nubian pottery', *Kush*, 10, pp. 245–88.

Adams, W. Y. (1964)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excavations at Meinarti, 1962–3', *Kush*, 12, pp. 227–47.

Adams, W. Y. (1965a)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excavations at Meinarti 1963–4', *Kush*, 13, pp. 148–76.

Adams, W. Y. (1965b) 'Architectural evolution of the Nubian church 500–1400 AD', *JARCE*, 4, pp. 87–139.

Adams, W. Y. (1966) 'The Nubian Campaign – a retrospect'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K. Michalowski* (Warsaw: PWN), pp. 13–20.

Adams, W. Y. (1967–8) 'Progress Report on Nubian pottery, 1. The native wares', *Kush*, 15, pp. 1–50.

Adams, W. Y. (1970) 'The evolution of Christian Nubian pottery' in E. Dinkler (ed.), pp. 111–128.

Adams, W. Y. (1977) *Nubia – Corridor to Africa* (London: Allen Lane).

Adams, W. Y. (1978) 'Varia Ceramica', *Etudes Nubiennes*, 1978, pp. 1–23.

Adams, W. Y. (1982) 'Qasr Ibrim, an archaeological conspectus'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25–38.

Afigbo, A. E. (1973) 'Trade and trade rout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Nsukka' *JHSN*, 7, 1, pp. 77–90.

Ahmed Chamanga, M. and Gueunier, N.-J. (1979) *Le dictionnaire comorien-français et français-comorien du R. P. Sacleux* (Paris: SELAF).

Aḥmad, K. (1976) *Islam, Its Meaning and Message* (London: Islamic Council for Europe).

Ajayi, J. F. A. and Crowder, M. (eds) (1971, 1976, 1985) *History of West Africa*, Vol. 1 (London: Longman, 1st edn 1971, 2nd edn 1976, 3rd edn 1985).

Alagoa, E. J. (1970) 'Long-distance trade and states in the Niger Delta', *JAH*, 11, 3, pp. 319–29.

Alexandre, P. (1981) *Les Africains. Initiation à une longue histoire et à des vieilles civilisations, de l'aube de l'humanité au début de la colonisation* (Paris: Editions Lidis).

Al-Hajj, M. A. (1968) 'A seventeenth-century chronicle on the origins and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Wangarawa', *KS*, 1, 4, pp. 7–42.

'Alī, Djawād (1952–6) *Ta'rīkh al-'Arab kabla 'l-Islām* (8 vols, Baghdād).

Alkali, N. (1980) 'Kanem-Borno under the Safaw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Allen, J. de V. (1981) 'Swahili culture and the nature of East coast settlement', *IJAHS*, 14, pp. 306–34.

Allen, J. de V. (1982) 'The "Shirazi" problem in East African coastal history', *Paideuma*, 28, pp. 9–27.

Allen, J. W. T. (1949) 'Rhapta', *TNR*, 27, pp. 52–9.

Allibert, C., Argan, A. and Argan, J. (1983) 'Le site de Bagameyo (Mayotte)', *Etudes Océan Indien*, 2, pp. 5–10.

Allison, P. (1968) *African Stone Sculpture* (London: Lund Humphries).

Allison, P. (1976) 'Stone sculpture of the Cross River Nigeria', *BCCSP*, 13–14, pp. 139–52.

Amari, M. (1933–9) *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 (2nd edn, 3 vols, Catania: Prampolini).
Amblard, S. (1984) *Tichitt-Walata (R.I. de Mauritanie). Civilisation et industrie lithiques* (Paris: ADPF).
Amilhat, P. (1937a) 'Les Almoravides au Sahara', *RMAOF*, 9, 34, pp. 1–39.
Amilhat, P. (1937b) 'Petite chronique des Id ou Aïch, héritiers guerriers des Almoravides sahariens', *REI*, 1, pp. 41–130.
Ambrose, S. H. (1982) 'Archaeology and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s of history in East Africa' in C. Ehret and M. Posnansky, (eds), pp. 104–57.
Amīn, Aḥmad (1969a) *Fadjr al-Islām* (Beirut, 10th edn).
Amīn, Aḥmad (1969b) *Ḍuḥa al-Islām* (3 vols, Beirut, 10th edn).
Andah, B. W. (1973)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of Upper Volt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erson, R. (1981) 'Texts from Qasr Ibrim', *STB*, 3, pp. 2 4.
Anfray, F. (1974) 'Deux villes axoumites: Adoulis et Matara' *Atti IV Congr. Intern. Studi Etiop.*, pp. 725–65.
Anquandah, J. (1976) 'The rise of civilisation in the West African Sudan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ankofa*, 2, pp 23–32.
Anquandah, J. (1982) *Rediscovering Ghana's Past.* (London: Longman).
Arkell, A. J. (1951 2) 'The History of Darfur: 1200–1700 A.D.', *SNR*, 32, pp. 37 70, 207–38; 33, pp. 129–55, 244–75.
Arkell, A. J. (1961) *A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20* (London: Athlone Press, 2nd revised edn).
Armstrong, R. G. (1960) 'The development of kingdoms in Negro Africa', *JHSN*, 2, 1, pp. 27–39.
Armstrong, R. G. (1962) 'Glottochronology and African linguistics' *JAH*, 3, 2, pp. 283–90.
Armstrong, R. G. (1964a) *The Study of West African Languages* (Ibadan: Ibadan UP).
Armstrong, R. G. (1964b) 'The use of linguistic and ethnographic data in the study of Idoma and Yoruba history' in J. Vansina *et al.* (eds), pp. 127–44.
Arnold, T. W. (1913) *The Preaching of Islam. A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the Muslim Faith* (2nd edn, London: Constable)
Ashtor, E. (1969) *Histoire des prix et des salaires dans l'Orient médiéval.* (Paris: SEVPEN).
Ashtor, E. (1976)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Collins).
Assimi, K. (1984) 'Les Yarsé. Fonction commerciale, religieuse et légitimité culturelle dans le pays moaga (Evolution historique) (Thèse de doctorat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Atherton, J. H. (1972) 'Excavations at Kamabai and Yagala rock shelters', *WAJA*, 2, pp. 39–74.
Atherton, J. H. and Kalous, M. (1970) 'Nomoli', *JAH*, 11, 3, pp. 303–17.
Atlas National du Sénégal (1977) (Dakar).
Austen, R. A. (1979) 'The trans-saharan slave trade: a tentative census' in H. Gemery, and J. Hogendorn (eds), pp. 23–76.
Azaïs, R. P. and Chambord, R. (1931) *Cinq années de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n Ethiopie, province du Harar et Ethiopie méridionale* (Paris).
d'Azevedo, W. L. (1962) 'Some historical problems in the delineation of a central West Atlantic region', *ANYAS*, 96, art. 2.
Asin-Palacios, M. (1914) *Abenmasarra y su escuela; orígenes de la filosofía hispano-musulmana* (Madrid: Imprenta Ibérica).
Attema, D. S. (1949) *Het Oudste Christendom in Zuid-Arabië* (Amsterdam: Noord-Hollandsche).

Ba, A. R. (1984) 'Le Takrūr des origines à la conquête par le Mali, VIe XIIIe siècle' (Thèse de doctorat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Jussieu).
Badawi, A. (1976) *Al-Sūd wa'l-haḍārah al-'Arabiyah* (Cairo).
al-Bakrī (1911)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Arabic text ed. by Baron Mac Guckin de Slane (2nd edn, Algiers: Adolphe Jourdan).
al-Bakrī (1913)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par el-Bekri*, tr. by Baron Mac Guckin de Slane (revised and corrected edn of 1859 1st edn, Paris: Geuthner).
al-Balādhurī (1866) *Liber expugnationis regionum ... [Kitāb Futūḥ al-Buldān]*, ed. by M. J. de Goeje (Leiden: Brill).
al-Balādhurī, Aḥmad b. Yaḥyā (1883) *[Ansāb al-Ashrāf]. Anonyme arabische Chronik. Bd. XI, vermutlich das Buch der Verwandschaft und Geschichte der Adligen* ed. by W. Ahlwardt (Greifswald).
al-Balādhurī (1957) *Futūḥ al-Buldān* ed by Ṣalāḥ al-Munadjdjid (Cairo).
Balog, P. (1981) 'Fāṭimid glass jetons: token currency or coin weights?', *JESHO*, 24, pp. 91 109.
Balogun, S. A. (1980) 'History of Islam up to 1800' in O. Ikime (ed.), pp. 210–23.

Barcelo, M. (1975) 'El hiato en las acunaciones de oro en al-Andalus, 127–317/744–5–929', *Moneda y Credito*, **132**, pp. 33–71.

Barcelo, M. (1979) 'On coins in al-Andalus during the Umayyad Emirate (138–300)', *Quaderni ticinesi di numismatica e antichità classiche*, Lugano, pp. 313–23.

Barkindo, B. (1985)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Central Sudan: Kanem, Borno and some of their neighbours to *c.* 1500 A.D.'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1985), pp. 225–54.

Barns, J. (1974) 'A Text of the Benedicite in Greek and Old Nubian from Kasr el-Wizz', *JEA*, **60**, pp. 206–11.

Barrau, J. (1962) 'Les plantes alimentaires de L'Océanie, origines, distribution et usages', *Annales du Musée colonial de Marseille*, **7**, pp. 3–9.

Barreteau, D. (ed.) (1978) *Inventaire des études linguistiques sur les pays d'Afrique Noire d'expression française* (Paris: SELAF).

Barros, João de (1552) *Decadas da Asia* (4 vols, Lisbon, 2nd edn, 1778).

Barth, H. (1857–8) *Reisen und Entdeckungen in Nord und Central Africa in den Jahren 1849 bis 1855* (5 vols, Gotha: J. Perthes).

Barth, H. (1857–9)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3 vols, New York: Harper).

Barth, H. (1860–1) *Voyages et découvertes dans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et central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9 à 1855* (4 vols, Paris-Brusells: A. Bohné).

Bascom, W. R. (1955) 'Urbanization among the Yorub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pp. 446–53.

Basset, H. (1920)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des Berbères* (Algiers: Carbonel).

Basset, H. (1952) *Les langues berbères* (London: OUP).

Basset, R. (1893) 'Les inscriptions arabes de l'Ile de Dahlak', *JA*, 9th series, **1**, pp. 77–111.

Bastin, Y., Coupez, A., and de Halleux, B. (1981) 'Statistique lexicale et grammaticale pour la classification historique des langues bantoues', *BSARSC* (forthcoming).

Bates, M. L. (1981) 'The function of Fāṭimid and Ayyūbid glass weights', *JESHO*, **24**, pp. 63–92.

Bathily, A. (1975) 'A discussion of the traditions of Wagadu with some reference to ancient Ghāna', *BIFAN* (B), **37**, 1, pp. 1–94.

Bathily, I. D. (1969) 'Notices socio-historiques sur l'ancien royaume soninké du Gadiaga, présentées, annotées et publiées par Abdoulaye Bathily', *BIFAN* (B), **31**, pp. 31–105.

Batrān, A. A. (1973) 'A contribution to the biography of Shaikh Muhammad ... al-Maghīlī', *JAH*, **14**, 3, pp. 381–94.

Battistini, R. (1976) 'Les modifications du milieu naturel depuis 2000 ans et la disparition de la faune fossile à Madagascar', *BASEQA*, **47**, pp. 63–76.

Battistini, R. and Vérin, P. (1967) 'Irodo et la tradition vohémarienne', *Taloha*, **2**, pp. xvii–xxxii.

Battistini, R. and Vérin, P. (1971) 'Témoignages archéologiques sur la côte vezo de l'embouchure de l'Onilahy à la Baie des Assassins', *Taloha*, **4**, pp. 19–27.

Battistini, R., Vérin, P. and Rason, R. (1963) 'Le site archéologique de Talaky, cadre géologique et géographique, premiers travaux de fouilles', *AUM* (Série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1**, pp. 112–53.

Baumann, H. and Westermann, D. (1948) *Les peuples et les civilisations de l'Afrique* (Paris: Payot).

Bazuin-Sira, B. T. (1968) 'Cultural remains from the Tellem caves near Pégué (Falaise de Bandiagara), Mali, West Africa', *WAAN*, **10**, pp. 14–15.

Beale, P. O. (1966) *The Anglo-Gambian Stone Circles Expedition 1964/65* (Bathurst: Government Printer).

Beale, P. O. (1968) 'The stone circles of the Gambia and the Senegal', *Tarikh*, **2**, 2, pp. 1–11.

Beale, T. W. (1973) 'Early trade in highland Iran: a view from a source area', *WA*, **5**, 2, pp. 133–48.

Becker, C. H. (1902–3)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Ägyptens unter dem Islam* (2 vols, Strassburg: Trubner).

Becker, C. H. (1910) 'Zur Geschichte des östlichen Sudan', *Der Islam*, **1**, 2, pp. 153–77.

Bedaux, R. M. A. (1972) 'Tellem, reconnaissance archéologique d'une cultur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 Âge: Recherches architectoniques', *JSA*, **42**, pp. 103–85.

Bedaux, R. M. A. (1974) 'Tellem, reconnaissance archéologique d'une cultur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 âge: les appuie-nuques', *JSA*, **44**, pp. 7–42.

Bedaux, R. M. A. and Bolland, R. (1980) 'Tellem, reconnaissance archéologique d'une cultur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 âge: les textiles', *JSA*, **50**, pp. 9–24.

Bedaux, R. M. A., Constandse-Westermann, T. S., Hacquebord, L., Lange, A. G. and Van der Waals, J. D. (1978)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dans le Delta intérieur du Niger', *Palaeohistoria*, **20**, pp. 91–220.

Beeston, A. F. L. (1960) ''Abraha' in H. A. R. Gibb *et al.* (eds), pp. 102–3.

Békri, C. (1957) 'Le Kharijisme berbère: quelques aspects du royaume rustumide', *AIEOA*, 15, pp. 55–108.
Bel, A. (1903) *Les Benuou Ghânya, derniers représentants de l'empire Almoravide et leur lutte contre l'empire Almohade* (Paris: Leroux).
Bello, M. (1951) *Infaku'l maisuri*, ed. by C. E. J. Whitting (London: Luzac).
Ben Achour (1985) 'L'onomastique arabe au sud du Sahara: ses transformations' (Thèse de doctorat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Ben Romdhane, K. (1978) 'Les monnaies almohades, apsects idéologiques et économiques' (2 vols, thèse de doctorat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
Berchem, M. van (1952) 'Deux campagnes de fouilles à Sedrata en Algérie', *C-RAI*, pp. 242–6.
Berchem, M. van (1954) 'Sedrata. Un chapitre nouveau de l'histoire de l'art musulman. Campagnes de 1951 et 1952', *Ars Orientalis*, 1, pp. 157–72.
Bercher, H., Courteaux, A., and Mouton, J. (1979) 'Une abbaye latine dans la société musulmane: Monreale au XIIe siècle', *Annales, ESC*, 34, 3, pp. 525–47.
Bergé, M. (1972) 'Mérites respectifs des nations selon le Kitāb al-Intā 'wa-l-Mu'anasa d'Abu Ḥayyān al-Tamḥīdī (+414 H/1023)', *Arabica*, pp. 165–76.
Berger, I. (1981) *Religion and Resistance in East African Kingdoms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Tervuren: Musée Royale de l'Afrique Centrale).
Bergman, I. (1975) *Late Nubian Textiles* (Uppsala: SJE, 8).
Bernard, A. (1932) *Le Maroc.* (8th edn, Paris: Alcan).
Bernard, J. (ed.) (1982) 'Le sel dans l'histoire', *Cahiers du CRA*, 2.
Bernard, J. (1983) *Le sang et l'histoire* (Paris: Buchet-Chastel).
Bernus, S. and Gouletquer, P. (1974) *Approche archéologique de la région d'Azelik et de Tegidda N-Tesamt (Agadez)* (Niamey: CNRS).
Bernus, S. and Gouletquer, P. (1976) 'Du cuivre au sel: recherches ethno-archéologiques sur la région d'Azelik (campagnes 1973–75)', *JSA*, 46, 1–2, pp. 7–68.
Berque, J. (1979) *Les dix grands odes arabes de L'Anté-Islam. Les* Mu'allaqât *presentées et traduites de l'arabe* (Paris: Sindbad).
Berthier, P. (1962) 'En marge des sucreries marocaines: la maison de la plaine et la maison des oliviers à Chichaoua', *HT*, 3, pp. 75–7
Berthier, S. (1976) 'Une maison du quartier de la mosquée à Koumbi Saleh' (2 vols, Mémoire de maîtrise, Université de Lyon II).
Berthier, S. (1983) 'Etude archéologique d'un secteur d'habitat à Koumbi-Saleh' (2 vols, thèse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Lyon II).
Beshir, I. B. (1975) 'New light on Nubian–Fatimid relations', *Arabica*, 22, pp. 15–24.
Bianquis, T. (1980) 'Une crise frumentaire dans l'Egypte fatimide', *JESHO*, 23, pp. 87–101.
Biobaku, S. O. (1955) *The Origin of the Yorubas* (Lagos: Government Printer, Lugard Lectures)
Biobaku, S. O. (ed.) (1973) *Sources of Yoruba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ird, C. S. (1970) 'The development of Mandekan (Manding): a study of the role of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in linguistic change' in D. Dalby (ed.), pp. 146–59.
Birmingham, D. (1977) 'Central Africa from Cameroun to the Zambezi' in R. Oliver (ed.), pp. 519–66.
al-Bīrūnī (1887) *Alberuni's India* ..., Arabic text ed. by E. C. Sachau (London: Trübner).
al-Bīrūni (1888) *Alberuni's India* ..., English text ed by E. C. Sachau (2 vols, London: Trübner).
al-Bīrūnī (1933) in Y. Kamal (ed.)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Africae et Aegypti*, Vol. 3 (Leiden: Brill).
al-Bīrūnī (1934) *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 by al-Bīrūnī*, tr. by R. Wright (London: Luzac).
Bisson, M. S. (1975) 'Copper currency in central Africa: the archeological evidence', *WA*, 6, pp. 276–92.
Bivar, A. D. and Shinnie, P. L. (1970) 'Old Kanuri capitals' in J. D. Fage and R. A. Oliver (eds), pp. 289–302.
Blachère, R. (1966) *Le Coran* (Paris: PUF).
Blachère, R., Chouémi, M., Denizeau, C. (1967–) *Dictionnaire arabe français–anglais*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Blanck, J.-P. (1968) 'Schema d'évolution géomorphologique de la Vallée du Niger entre Tombouctou et Labhérange (République du Mali)', *BASEQA*, 19–20, pp. 17–26.
Blau, O. (1852) 'Chronik der Sulṭāne von Bornu', *ZDMG*, 6, pp. 305–30.
Bleek, W. H. I. (1862–9) *A Comparative Grammar of South African Languages* (2 vols, Cape Town: Juta/London: Trübner).
Bloch, M. (1977) 'Disconnection between power and rank as a process: an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kingdoms in Central Madagascar', *AES*, 17, pp. 107–48.

Boachie-Ansah, J. (1978) 'Archae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Wenchi history'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

Boahen, A. A. (1977) 'Ghana before the Europeans' *GSSJ*, 1.

Bohrer, S. P. (1975) 'Radi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human bones' in G. Connah, pp. 214–17.

Boiteau, P. (1974–9) 'Dictionnaire des noms malgaches de végétaux', *Fitoterapia* (Milano) 1974, 2, p. 39; 1979, 4, p. 192.

Boiteau, P. (1977) 'Les proto-Malgaches et la domestication des plantes', *Bull. de l'Académie Malgache*, 55, 1–2, 1979, pp. 21–6.

Bolens, L. (1974) *Les méthodes culturales au Moyen Age d'après les traités d'agronomie andalous: traditions et techniques* (Geneva: Editions Médecine et Hygiène).

Bomba, V. (1977) 'Traditions about Ndiadiawe Ndiaye, first Buurba Djolof. Early Djolof, the southern Almoravids and neighbouring peoples', *BIFAN*, (B), 39, 1, pp. 1–35.

Bomba, V. (1979) 'Genealogies of the Waalo matrilineages of Dioss Logre and Tediegue. Versions of Amadou Wade and Yoro Dyao', *BIFAN* (B), 41, 2, pp. 221–47.

Bonnassié, P. (1975) *La Catalogne du milieu du Xe à la fin du XIe siècle. Croissance et mutations d'une société* (2 vols, Toulouse: Université de Toulouse-le-Mirail).

Boser-Sarivaxévanis, R. (1972) *Les tissu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Basel: Basler Beiträge zur Ethnologie).

Boser-Sarivaxévanis, R. (1975)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s textiles traditionnels tissés et teint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Basel: Basler Beiträge zur Ethnologie).

Boulnois, J. (1943) 'La Migration des Sao du Tchad', *BIFAN* (B), 5, pp. 80–121.

Boulnois, J. and Hama, B. (1954) *L'empire de Gao* (Paris: Miasonneuve).

Bouquiaux, L. and L. Hyman (eds) (1980) *L'expansion bantoue* (Paris: SELAF).

Bovill, E. W. (1933) *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 (London. OUP).

Bovill, E. W. (1958)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London: OUP).

Bradbury, R. E. (1959) 'Chron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Benin History', *JHSN*, 1, 4, pp. 263–86.

Brett, M. (1969) 'Ifrīqiya as a market for Saharan trade 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A.D.', *JAH*, 10, 3, pp. 347–64

Brett, M. (1972)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light of some recent publications', *JAH*, 13, 3, pp. 489–506.

Brett, M. (1975) 'The military interest of the Battle of Haydarān' in V. J. Parry, and M. E. Yapp (eds), pp. 78–88.

Brothwell, D. R. (1963) 'Evidence of early population chang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doubts and problems', *Man*, 63, pp. 101–4.

Browne, G. M. (1979–81) 'Notes on Old Nubian', I–III, *BASP*, 16, 1979, pp. 249–56; IV–V, *BASP*, 17, 1980, pp. 37–43; VI–VII, *BASP*, 17, 1980, pp. 129–41; VIII–X, *BASP*, 18, 1981, pp. 55–67.

Browne, G. M. (1982a) 'The Old Nubian verbal system', *BASP*, 19, pp. 9–38.

Browne, G. M. (1982b) *Griffith's Old Nubian Lectionary* (Rome-Barcelona: Papyrologica Castroctaviana, 8).

Browne, G. M. (1983) *Chrysostomus Nubianus. An Old Nubian Version of Ps.- Chrysostom 'In Venerabilem Crucem Sermo'* (Rome-Barcelona: Papyrologica Castroctaviana, 9).

Brunschwig, R. (1942–47) 'Ibn 'Abd al-Hakam et la conquêt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 les Arabes. Etude critique', *AIEOA*, 6, pp. 108–55.

Brunschwig, R. (1947) *La Ber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Hafsides.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Brunschwig, R. (1957) 'Fiqh fatimide et histoire d'Ifrīqiyya', *MHAOM*, 2, pp. 13–20.

Brunschwig, R. (1960) ''Abd' in H. A. R. Gibb *et al.* (eds) (1960) pp. 24–40.

Brunschwig, R. (1967) 'Conceptions monétaires chez les juristes musulmans', *Arabica*, 14, pp. 113–43.

Brunschwig, R. (1974) 'L'Islam enseigné par Ḥāmid b. Ṣiddīq de Harar (XVIIIe siècle)', *Atti IV Congr. Int. Studi Etiop*, 1, pp. 445–54.

Bryan, M. A. (1959) *The Bantu Languages of Africa* (London: IAI).

Budge, E. A. W. (1909) *Texts relating to Saint Mena of Egypt and Canons of Nicaea in a Nubian Dialect* (London: OUP).

al-Bukhārī (1978) *Kital al-jāmi' al-ṣahiḥ* (tr. and notes by Muḥammad Asad (New Delhi).

Bulliet, R. W. (1975) *The Camel and the Wheel* (Cambridge, Mass.: HUP).

Burke III, E. (1975)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Middle Eastern Studies*, 2, 3, p. 306.

Burton-Page, J. (1971) 'Habshī' in B. Lewis *et al.* (eds), pp. 14–16.

Butterworth, J. S. (1979) 'Chemical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deposits from Thatswane Hills, Botswana', *SAJS*, 75, 9, pp. 408–9.

Buxton, D. R. (1971) 'The rock-hewn and other medieval churches of Tigré Province, Ethiopia', *Archaeologia* (London), 103, pp. 33–100.
Buzurg Ibn Shahriyār (1883–6) *Kitāb 'Adjā'ib al Hind*; 1883 edn. ed. by P. A. van der Lith (Vol. 1) and 1886 French transl. by M. Devic (Vol. 2), *Livre des merveilles d'Inde* (Leiden: Brill)

Cabanis, Y., Chabonis, L. and Chabonis, F. (1969–70) *Végétaux et groupements végétaux de Madagascar et des Mascareignes* (Tananarive: BDPA).
Cahen, C. (1961) 'La changeante portée sociale de quelques doctrines sociales' in *L'Elaboration de l'Islam*, pp. 5–22.
Cahen, C. (1965) '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expansion économique musulmane au haut moyen âge', *Settimani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12, pp. 391–432
Cahen, C. (1968) 'Quelques mots sur les Hilaliens et la nomadisme', *JESHO*, 11, pp. 130–3.
Cahen, C. (1970) 'Le commerce musulman dans l'Océan Indien au Moyen âge' in *Sociétés et Compagnies de commerce en Orient et dans l'Océan Indien.* (Paris: SEVPEN), pp. 180–93.
Cahen, C. (1972) 'L'administration financière de l'armée fatimide d'après al-Makhzumi', *JESHO*, 15, 1–2, pp. 305–27
Cahen, C. (1977) *Les peuples musulmans dans l'histoire médiévale* (Damascu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Cahen, C. (1979) 'L'or du Soudan avant les Almoravides, mythe ou réalité?', *RFHOM*, 66, pp. 169–75.
Cahen, C. (1980)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ar East and the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VIIth to the XIth century' in K. I. Semaan (ed.) pp. 1–25.
Cahen, C. (1981) 'L'or du Soudan avant les Almoravides: mythe ou réalité?'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Ecrit*, Vol. 2, pp. 539–45.
Cahen, C. (1983) *Orient et Occident au temps des croisades* (Paris: Augier).
Cali, M. N. (1980) 'Outline of early Somali history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Paper deliver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mali Studies, Muqdishu, July 1980).
Calvocoressi, D. and David, N. (1979) 'A new survey of radiocarbon and thermoluminescence dates for West Africa', *JAH*, 20, 1, pp. 1–29.
Camps, G. (1969) 'Haratin-Ethiopiens, réflexions sur les origines des négroides sahariens' in *Actes, Coll. Intern. Biolog. Pop. Sahar*, pp. 11–20.
Camps, G. (1970) 'Recherches sur les origines des cultivateurs noirs du Sahara', *ROMM*, 7, pp. 35–45.
Camps, G. (1979) 'Les relations du monde méditerranéen et du monde subsaharien durant la préhistoire et la protohistoire' in *Recherches Sahariennes*, 1, pp. 9–18.
Camps, G. (1980) *Berbères, aux marges de l'histoire* (Paris: Hespérides).
Canard, M. (1942–7) 'L'impérialisme des Fāṭimides et leur propagande', *AIEOA*, 6, pp. 162–99.
Canard, M. (ed.) (1958) *Vie de l'ustadh Jaudhar* (Algiers: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tudes Oriental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Alger).
Canard, M. (1965) 'Fāṭimids' in B. Lewis *et al.* (eds), pp 850–62.
Cancellieri, J. A. (1982) *Economie génoise et or du Soudan aux XIIe et XIIIe siècles* (Rome: 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néo).
Carbou, H. (1912) *La région du Tchad et du Ouadai* (2 vols, Paris: Leroux).
Castiglione, L., Hajnóczi, G., Kákosy, L. and Török, L. (1974–5) *Abdallah Nirqi 1964, The Hungarian Excavations in Egyptian Nubia* (Budapest: Acta Archaeolog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6–27).
Castro, R. (1974) 'Examen de creusets de Marandet (Niger)', *BIFAN* (B), 36, 4, pp. 667–75.
Caudel, M. (1900) *L'Afrique du Nord. Les Byzantins, les Berbères, les Arabes, avant les invasions* (Paris: Leroux).
Cenival, P. de and Monod, T. (1938) *Description de la côte d'Afrique de Ceuta au Sénégal par Valentin Fernandes* (Paris. Larose).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 Marxiste (1974)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2nd edn,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Cerulli, E. (1936) *Studi Etiopici* (Rome: Istituto per l'Oriente).
Cerulli, E. (1941) 'Il sultanato dello Scioa nel secolo XIII secondo un nuovo documento storico', *RSE*, 1, pp. 5–42.
Cerulli, E. (1956)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etiopica* (Milan: Nuova Accademia Editrice).
Cerulli, E. (1957–64) *Somalia. Scritti vari editi ed inediti* (3 vols, Rome: Amministrazione Fiducitaria Italiana di Somalia).
Cerulli, E. (1971) *L'Islam di ieri e di oggi.* (Rome: Istituto per l'Oriente).
Chamla, M.-C. (1968) *Les populations anciennes du Sahara et des régions limitrophes. Etudes des restes osseux humains néolithiques et protohistoriques*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Champault, F. D. (1969) *Une oasis du Sahara nord-occidental: Tabelbala*. (Paris: CNRS)

Chang Hsing-Lang (1930) 'The importation of Negro slaves to China under the T'ang Dynasty'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7, pp. 37–59.

Chanudet, C. (1979) 'Problèmes actuels de biogéographie malgache', *Ambario* (Antananarivo), 1, 4, pp. 373–8.

Chanudet, C. and Vérin, P. (1983) 'Une reconnaissance archéologique de Mohéli, *Etude Océan Indien*, 2, pp. 11–58.

Chapelle, J. (1957) *Nomades noirs du Sahara* (Paris: Plon).

Chapelle, J. (1980) *Le peuple tchadien, ses racines et sa vie quotidienne*. (Paris: L'Harmattan and ACCT).

Chapelle, J. (1982) *Nomades noirs du Sahara. les Toubous* (Paris: L'Harmattan)

Charnay, J.-P. (1980) 'Expansion de l'Islam en Afrique Occidentale', *Arabica*, 28, pp. 140–53.

Chavane, B. (1980)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sur la moyenne vallée du Sénégal' (Thèse de 3e cycle, Université d'Aix-Marseille, 2 vols).

Chavane, B. (1985) *Villages anciens du Takrūr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dans la vallée moyenne du Sénégal* (Paris: Karthala)

Cheneb, M. (1922) *Abu Dulama, poète-bouffon de la cour des premiers califes abbasides* (Algiers).

Chittick, H. N. (1959) 'Notes on Kilwa', *TNR*, 53, pp. 179–203.

Chittick, H. N. (1963) 'Kilwa and the Arab settlement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JAH*, 4, 2, pp. 179–90.

Chittick, H. N. (1965) 'The "Shirazi" colonization of East Africa', *JAH*, 6, 3, pp. 275–94.

Chittick, H. N. (1966) 'Unguja Ukuu: the earliest imported pottery, and an Abbasid dinar', *Azania*, 1, pp. 161–3.

Chittick, H. N. (1967) 'Discoveries in the Lamu archipelago', *Azania*, 2, pp. 46–67.

Chittick, H. N. (1968a) 'Two traditions about the early history of Kilwa', *Azania*, 3, pp. 197–200.

Chittick, H. N. (1968b) 'The coast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in B. A Ogot and J. A. Kieran (eds), pp. 98–114.

Chittick, H. N. (1969) 'A new look at the history of Pate', *JAH*, 10, 3, pp. 375–91

Chittick, N. H. (1969) 'An archaeological reconnaissance of the southern Somali coast', *Azania*, 4, pp 115–30.

Chittick, H. N. (1974)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2 vols,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Chittick, H. N. (1975) 'The peopling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in H N. Chittick and R. I. Rotberg (eds), pp 16–43.

Chittick, H. N. (1977) 'The East Coast, Madagascar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R. Oliver (ed.), pp. 183–231.

Chittick, H. N. (1979a) 'The Arabic sources relating to the Muslim expansion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in *Mouvements de Populations dans l'Océan Indien* (Paris: Champion), pp. 27–31.

Chittick, H. N. (1979b) 'Sewn boats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and a Survival in Somalia' in *ICIOS*, 3, *History of the Commercial Exchange and Maritime Transport* (Perth).

Chittick, H. N. (1980) 'L'Afrique de l'Est et l'Orient: les ports et le commerce avant l'arrivée des Portugais' in Unesco (1980), pp. 15–26.

Chittick, H. N. and Rotberg, R. I. (eds) (1975)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Chou Ju-Kua (1911) *Cho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tr. by F.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t Petersburg: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Christensen, A. (1944) *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 (Paris-Copenhagen: Geuthner).

Christophe, L.-A. (1977) *Campagne internationale de l'Unesco pour la sauvegarde des sites et monuments de Nubie. Bibliographie* (Paris: Unesco)

Churakov, M. (1960) 'Maghrib nakanune kharidjitskogo vosstaniya' [The Maghrib at the dawn of the Kharidjite revolt], *Palestinskiy Sbornik*, 5, 68, pp. 66–84.

Churakov, M. (1962) 'Kharidjitskiye vosstaniya v Magribe' [The Kharidjite revolts in the Maghrib], *Palestinskiy Sbornik*, 7, 70, pp. 101–29.

Churakov, M. V. (1966) 'Borba Kharidjitov Sidjilmasūi' [The struggle of the Kharidjites of Sidjilmāsa] in *Arabskie strany: Istoriya, Ekonomika* (Moscow: Nauka).

Cipolla, C. (1961) 'Appunti per una nuova storia della moneta nell'alto medioevo', *Settimani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8, pp. 619–25.

Cissoko, S. M. (1975) *Tombouctou et l'empire songhay*. (Dakar-Abidjan: Nouvelles Editions Africaines).

Clark, J.D. (1968) *Further Palaeo-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Northern Lunda*. (Lisbon: Publicacoẽs cult. Co. Diam Angola, 78).
Clark, J.D. (1970)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Thames & Hudson).
Clark, J.D. (1976) 'Prehistoric populations and pressures favoring plant domestication' in Harlan, J. R. *et al.* (eds) pp. 67–105.
Clarke, S. (1912) *Christian Antiquities in the Nile Valley: A Contribution towards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urch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line, W. (1937) *Mining and Metallurgy in Negro Africa* (Menasha: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Coedès, G. (1964) *Les Etats hindouisés d'Indochine et d'Indonésie* (Paris, de Boccard).
Cohen, R. (1962) 'The Just-so So? A spurious tribal grouping in Western Sudanic history', *Man*, **62**, pp. 153–4.
Cohen, R. (1966) 'The Bornu king lists', *BUPAH*, **2**, pp. 39–84.
Cole-King, P. A. (1973) *Kukumba mbiri mu Malaŵi: a summary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o March, 1973* (Zomba: Government Press).
Colin, G. S., Babakar, A. O., Ghali, N. and Devisse, J. (1983) 'Un ensemble épigraphique almoravide: découverte fortuite dans la région de Tikjikja: chaton de bague découvert à Tegdaoust' in J. Devisse, D. Robert-Chaleix *et al.* (eds) pp. 427–44.
Collett, D. P. (1979) 'The archaeology of the stone walled settlements in easter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unpublished MSc thesi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Collett, D. P. (1982) 'Excavations of stone-walled ruin types in the Badfontein Valley, easter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SAAB*, **37**, 135, pp. 34–43.
Colloque de Nouakchott (1976) *Colloque de Nouakchott sur les problèmes de la desertification au sud du Sahara* (17–19 December 1973) (Dakar: NEA).
Colloque de Saint-Denis (1972) *Colloque de Saint-Denis (Réunion) sur les mouvements de populations dans l'Océan Indien.*
Condé, A. (1974)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elles mandingues* (Niamey: CRDTO).
Condominas, G. (1965) *L'exotique est quotidien* (Paris: Plon).
Connah, G. (1968) 'Radiocarbon dates for Benin city and further dates for Daima, N. E. Nigeria', *JHSN*, **4**, pp. 313–20.
Connah, G. (1969) 'Ife' in T. Shaw (eds), pp. 47–53.
Connah, G. (1971)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Bornu chronology', *WAJA*, **1**, pp. 55–60.
Connah, G. (1972) 'Archaeology in Benin' *JAH*, 13, 1, pp. 25–39
Connah, G. (1975) *The Archaeology of Ben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nnah, G. (1976) 'The Daima sequence and the prehistoric chronology of the Lake Chad region of Nigeria', *JAH*, **17**, 3, pp. 321–52.
Connah, G. (1981) *Three Thousand Years in Africa. Man and his Environment in the Lake Chad Region of Nigeria* (Cambridge: CUP).
Conrad, D. C. and Fisher, H. J. (1982) 'The conquest that never was: I. The external Arabic sources', *HA*, **9**, pp. 21–59.
Conrad, D. C. and Fisher, H. J. (1983) 'The conquest that never was: II. The local oral sources', *HA*, **10**, pp. 53–78.
Conti Rossini, C. (1909) 'Les listes des rois d'Aksum', *JA*, **14**, pp. 263–320.
Conti Rossini, C. (1921) 'Expeditions et possessions des Habašat en Arabie', *JA*, July/September, pp. 5–36.
Conti Rossini, C. (1928) *Storia d'Etiopia* (Bergamo: Istituto Italiano d'Arti Grafiche)
Conzelman, W. E. (1895) *Chronique de Galâwdéwos, roi d'Ethiopie* (Paris: Bouillon).
Coon, C. (1968) *Yengema Cave Repor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Museum Monographs).
Coppens, Y. (1969) 'Les cultures protohistoriques et historiques du Djourab' in *Actes I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129–46.
Coquery-Vidrovitch, C. (1969) 'Recherches sur un mode de production africain', *La Pensée*, **144**, pp. 61–78.
Coquery-Vidrovitch, C. (1974) 'Recherches sur un mode de production africain' in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 Marxiste, pp. 345–67.
Corippus (1970) *Flavii Cresconii Corippi Iohannidos, seu De bellis Libycis, libri VIII*, ed. by J. Diggle and F. R. D. Goodyear (Cambridge: CUP)
Cornevin, M. (1982) 'Les Néolithiques du Sahara australe et l'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BSPF*, 79, pp. 439–50.
Cornevin, R. (1960) *Histoire des peuples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Berger-Levrault).
Corrêa, A. A. M. (1943) *Raças do império* (Oporto: Portucalense Editora).
Corso, R. (1949) 'Il velo dei Tuâregh' *Annali, Istituto Orientale di Napoli*, 3, pp. 151–66.

Cosmas Indicopleustes (1968) *Topographie chrétienne.* (Paris: Le Cerf)
Coulon, C. (1983) *Les musulmans et le pouvoir en Afrique noire* (Paris: Karthala).
Couper, A., Evrard, J. B. and Vansina, J. (1975) 'Classification d'un échantillon de langues bantoues d'après la lexicostatistique', *Africana Linguistica*, 6, pp. 131-58.
Coursey, D. G. and Alexander, J. (1968) 'African agricultural patterns and the sickle cell', *Science*, 160, pp. 1474-5.
Courtois, C. (1957) 'Remarques sur le commerce maritime en Afrique au XIe siècle', *MHAOM*, 2, pp. 51-9.
Crabb, D. (1965) *Ekoid Bantu Languages of Ogoja* (London: OUP)
Crossland, L. B. (1976) 'Excavations at Nyarko and Dwinfuor sites of Begho–1975', *Sankofa*, 2, pp. 86-7.
Crowfoot, J. W. (1927) 'Christian Nubia', *JEA*, 13, pp. 141-50.
Cuoq, J. M. (1975) *Recueil des sources arabes concernant l'Afrique occidentale du VIIIe au XVIe siècle (Bilād al-Sūdān)* (Paris: CNRS).
Curtin, P. D. (1971) 'Pre-colonial trading networks and traders: the Diakhanké, in C. Meillassoux (ed.), pp. 228-39.
Curtin, P. D. (1975) *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Senegambia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 (Madison: UWP).

al-Dabbāgh (1901) *Ma 'ālim al-Īmān* (4 Vols, Tunis).
Dachraoui, F. (1961)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Fatimides en Ifriqiyya', in *Arabica*, 8, 2, pp. 141-66.
Dachraoui, F. (1964) 'Le commencement de la prédication Ismailienne en Ifrīqīyya', *SI*, 20, pp. 92-109
Dachraoui, F. (1981) *Le Califat fatimide du Maghreb. Histoire politique et institutions* (Tunis: STD).
Daghfūs, R. (1981) 'Al-'awamīl al-iktiṣadiyya li-hidjra Banī Hilāl wa-Banī Sulaym min Miṣr ilā Ifrīkīya' [The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B. Hilāl and B. Sulaym emigration from Egypt to Ifrīkīya], *Awraq* (Madrid), 4, pp. 147-63.
Dahl, O. C. (1951) *Malgache et Manjaan. Une comparaison linguistique* (Oslo: Egede-Instituttet)
Dalby, D. (1965) 'The Mel languages: a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Southwest Atlantic', *ALS*, 6, pp. 1-7.
Dalby, D. (ed.) (1970)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Africa* (London: Cass)
Dalby, D. (1975) 'The pr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Guthrie's *Comparative Bantu*. Part I: problems of internal relationship', *JAH*, 16, 4, pp. 481-50.
Dalby, D. (1976) 'The pr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Guthrie's *Comparative Bantu*. Part II: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vocabulary', *JAH*, 17, 1, pp. 1-27.
Daniels, C. M. (1968) 'Garamantian Excavations: Zinchecra, 1965–1967', *Libya Antiqua*, 5, pp. 113-94.
Daniels, S. G. H. and Phillipson, D.W. (1969) 'The Early Iron Age site at Dambwa near Livingstone' in B. M. Fagan, D. W. Phillipson and S. G. H. Daniels (eds), Vol. 2, pp. 1–54.
Dark, P. J. C.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Benin Art and Technolog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Darling, P. J. (1974) 'The earthworks of Benin', *Nigerian Field*, 39, 3, pp. 128–37.
Darling, P. J. (1976) 'Notes on the earthworks of the Benin empire', *WAJA*, 6, pp. 143-9.
Darling, P. J. (1979) 'Fieldwork surveys in the Benin and Ishan kingdoms', *Nyame Akuma*, 15, pp. 35-9
Datoo, B. A. (1970) 'Rhapta: the location and importance of East Africa's first port', *Azania*, 5, pp. 65-76.
Daveau, S. (1970) 'Itinéraire de Tamadalt à Awdaghust selon al-Bakri' in D. Robert, S. Robert and J. Devisse (eds), pp. 33-8.
Daveau, S. and Toupet, C. (1963) 'Anciens terroirs Gangara', *BIFAN* (B), 25, pp. 193–214.
David N. (1982a) 'Prehistory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n Central Africa: points of contact' in C. Ehret, and M. Posnansky (eds), pp. 78-95.
David, N. (1982b) 'The BIEA Southern Sudan Expedition of 1979: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data' in J. Mack and P. Robertshaw, pp. 49–57.
Davidson, B. (1964) *The African Past* (London: Longmans).
Davies, O. (1967) *West Africa before the Europeans* (London: Methuen).
Davies, O. (1971) 'Excavations of Blackburn', *SAAB*, 26, 103-4, pp. 165-78.
Davison, C. C., Giaque, R. D. and Clark, J. D. (1971) 'Two chemical groups of dichroic glass beads from West Africa', *Man*, (ns) 6, 4, pp. 645-59.
Davison, P. and Harries, P. (1980) 'Cotton weaving in south-east Africa: its history and technology', *Textile History*, 11, pp. 176–92.
De Heinzelin, J. (1962) 'Ishango',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pp. 105-18.

Delafosse, M. (1912) *Haut-Sénégal-Niger (Soudan français)* (3 vols, Paris: Larose).
Delafosse, M. (1924) 'Les relations du Maroc avec le Soudan à travers les âges', *Hespéris*, 9, pp. 153-74.
Delafosse, M. (1924) 'Le Ghana et le Mali et l'emplacement de leurs capitales', *BCEHS*, 8, pp. 479-542.
Delafosse, M. (1931) *The Negroes in Af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Washington, DC: Associated Publishers).
Delibrias, G., Guillier, M. T. and Labeyrie, J. (1974) 'Gif natural radiocarbon measurements, VIII', *Radiocarbon*, 16, 1, pp. 15-94.
Denbow, J. R. (1979) 'Iron Age research in eastern Botswana', *Nyame Akuma*, 14, pp. 7-9.
Denbow, J. R. (1979) '*Cenchrus ciliaris*, an ecological indicator of Iron Age middens using aerial photography in eastern Botswana', *SAJS*, 75, 9, pp. 405-8.
Denbow, J. R. (1980) 'Early Iron Age remains from Tsodilo Hills', *SAJS*, 76, pp. 474-5.
Denbow, J. R. (1981) 'Broadhurst – a 14th century AD expression of the Early Iron Age in south-eastern Botswana', *SAAB*, 36, 134, pp. 66–74.
Denbow, J. R. (1982) 'The Toutswe traditions: a study in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Botswana Society', in *Settlement in Botswana* (London: Heinemann), pp. 73–86.
Denbow, J. R. (1983) 'Iron Age economics: herding, wealth and politics along the fringes of the Kalahari Desert during the Early Iron Ag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Indiana University).
Denbow, J. R. (1984) 'Prehistoric herders and foragers of the Kalahari: the Evidence for 1500 years of 'interaction' in C. Schrire (ed.), pp. 175–93.
Derenbourg, H. (1905) 'Le poète antéislamique Antar' in Derenbourg, *Opuscules d'un Arabisant* (Paris: Charles Carrington), pp. 3-9.
Derricourt, R. M. and Papstein, R. J. (1976) 'Lukolwe and the Mbwela of northwestern Zambia', *Azania*, 11, pp. 169–76.
Desanges, J. (1962) *Catalogues des tribus africaines de l'antiquité classique à l'Ouest du Nil* (Dakar University of Dakar, Section d'Histoire).
Desanges, J. (1976) 'L'Iconographie du noir dans l'Afrique du nord antique' in J. Vercoutter, J. Leclant, F. Snowden (eds).
Descamps, C., Thilmans, G. and Thommeret, Y. (1974) 'Données sur l'édification de l'amas coquillier de Dioron Boumak', *BASEQA*, 41, pp. 67-83.
Deschamps, H. (1960), *Histoire de Madagascar* (Paris: Berger Levrault).
Deschamps, H. (1968) *Le Sénégal et la Gambie* (Paris: PUF).
Deschamps, H. (ed.) (1970-1)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2 vols, Paris: PUF)
Deschamps, H. (1972) *Histoire de Madagascar* (Paris: Berger Levrault).
Despois, J. (1965) 'Fazzān' in B. Lewis, C. Pellat and J. Schacht (eds), pp. 875-7.
Deverdun, G. (1959-66) *Marrakech des origines à 1912* (2 vols, Rabat: Ed. Techniques nord-africaines).
Devic, L. M. (1983) *Le Pays des Zendjs ou la côte orientale d'Afrique au Moyen âge* (Paris: Hachette)
Devisse, J. (1970) 'La question d'Audagust', in D. Robert, S. Robert and J. Devisse (eds), pp. 109-56.
Devisse, J. (1972) 'Routes de commerce et échanges en Afrique occidentale en relation avec la Méditerranée. Un essai sur le commerce africain médiéval du XIe au XVIe siècle', *RHES*, 50, 1, pp. 42-73; 50, 3, pp. 357-397
Devisse, J. (1974) 'Une enquête à developper, le problème de la propriété des mines en Afrique de l'Ouest du VIIIe au XVIe siècle' in *Miscellanea Charles Verlinden* (*Bulletin de l'Institut Historique Belge de Rome*, 44), pp. 201-19.
Devisse, J. (1979a) *L'image du Noir dans l'Art Occidentale, Vol. 2, part 1, Des premiers siècles chretiens aux 'Grandes Decouvertes'. De la menace demoniaque à L'incarnation de la sainteté* (Fribourg: Office du Livre).
Devisse, J. (1979b) 'L'arrière plan africain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u Xe siècle' in *Occident et Orient au Xe siècle, Actes du IXe Congrès de la Société des historiens médievistes (Dijon 2-4 June 1978)* (Paris: Société les Belles Lettres), pp. 145-65
Devisse, J. (1981a) 'Pour une histoire globale de la céramique africaine'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ecrit*, pp. 179–203.
Devisse, J. (1981b) 'L'Afrique noire' in 'Le grand Atlas de L'architecture mondiale', *Encyclopedia Universalis* (Paris), pp. 72–83.
Devisse, J. (1982) 'L'apport de l'archéologie à l'histoir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entre le Ve et le XIIe siècle', C-RAI, pp. 156-77.
Devisse, J. (1983) 'Histoire et tradition urbaine du Sahel' in *Lectures de la ville africaine contemporaine* (Actes du 7e Séminaire consacré aux transformations de l'architecture dans le monde islamique, Dakar, 1983). pp. 1–10.

Devisse, J. (1985a) 'Les Africains et l'eau, la longue durée' in *Actes du Colloqu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I sur la Politique de l'eau en Afrique* (1983).

Devisse, J. (1985b) 'Fer et espace dans l'histoire de l'Afrique', *Annales ESC* (forthcoming).

Devisse, J., Robert-Chaleix, D. *et al.* (1983) *Tegdaoust III. Recherches sur Awdaghust* (Paris: ADPF).

Diallo, T. (1972) 'Origine et migrations des Peul avant le XIX siècle', *AFLSHD*, 2, pp. 121–93.

Dictionnaire archéologique des techniques (1963) (2 vols, Paris: Edition de l'Accueil).

Didillon, H., Didillon, J.-M., Donnadieu, C. and Donnadieu, P. (1977), *Habiter le désert, les maisons mozabites. Recherches sur un type d'architecture traditionnelle pré-saharienne* (Brussels).

Diehl, C. (1896) *L'Afrique byzantine* (Paris: Leroux).

Dimmendaal, G. J. (1982) 'Contacts between Eastern Nilotic and Surma groups in linguistic evidence' in J. Mack and P. Robertshaw (eds), pp. 101–10.

Dinkler, E. (ed.) (1970) *Kunst und Geschichte Nubiens in Christlicher Zeit,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auf Grund der jüngsten Ausgrabungen.* (Recklinghausen: Verlag Aurel Bongers).

Dinkler, E. (1975) 'Beobachtungen zur Ikonographie des Kreuzes in der nubischen Kunst' in K. Michalowski (ed.), pp. 20–30.

Diop, C. A. (1955) *National nègre et culture* (Paris: Editions Africaines).

Diop, C. A. (1960) *L'Afrique noire précolonial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Diop, C. A. (1967) *Antériorité des civilisations nègres: Mythe ou vérité historiqu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Diop, C. A. (1972) 'Datations par la méthode du radiocarbone, série III', *BIFAN*, (B), 34, 4, pp. 687–701.

Diop, C. A. (1981) *Civilisation ou barbari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Diop, L. M. (1968) 'Métallurgie traditionelle et âge du fer en Afrique', *BIFAN* (B), 30, 1, pp. 10–38.

al-Djaddawī, M. (1963) *Al-Rakīk fi 'l-ta'rīkh wa-fi 'l-Islām*, Vol. 1 (Alexandria).

al-Djāhiẓ Abū 'Uthmān 'Amr (1903) *Tria opuscula*, ed. by G. van Vloten (Leiden: Brill).

al-Djāhiẓ Abū 'Uthmān 'Amr (1964) *Rasā'il al-Djāhiẓ: Risāla Fakhr al-Sūdān 'alā' l-Bīḍān* (ed. by 'A Hārūn, 2 vols, Cairo).

Djaït, H. (1973) 'L'Afrique arabe au VIIIe siècle (84–184/705–800)', *Annales ESC*, 28, 3.

Djait, H., Talbi, M., Dachraoui, F., Bouib, A. and M'Rabet, M. A. (n.d.) *Histoire de la Tunisie: le Moyen âge* (Tunis: Société Tunisienne de Diffusion).

al-Djanhānī, H. (1968) *Al-Kayrawān 'abra 'usūr izdihār al-haḍārat al-islāmiyya fi l-Maghrib al-'Arabī* (Tunis).

Dobrzeniecki, T. (1973–5) 'Maiestas Domini', I, *RMN*, 17, 1973; II, *RMN*, 18, 1974, pp. 216–308; III, *RMN*, 19, 1975, pp. 5–263.

Dobrzeniecki, T. (1974) 'Maiestas Crucis in the mural paintings of the Faras Cathedral. Some iconographical notes', *BMNV*, 15, pp. 6–20.

Dobrzeniecki, T. (1980) 'Nubijska Maiestas Domini z katedry w Faras w Muzeum Narodowym w Warszawie' [Nubian Maiestas Domini of the Cathedral of Faras in the Warsaw National Museum], *RMN*, 24, pp. 261–341.

Doke, C. M. (1938) 'The Earliest records of Bantu', *Bantu Studies*, 12, pp. 135–44.

Dolphyne, F. (1974) 'The languages of the Ghana Ivory Coast border', *Actes du Colloque interuniversitaire Ghana–Côte d'Ivoire* (Abidjan: Université Nationale).

Dombrowski, J. C. (1980) 'Early settlers in Ghana' (Legon: University of Ghana, Inter-Faculty Lecture).

Domenichini, J.-P. (1978), 'Antehiroka et Vazimba.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du XVIIIe au XIXe siècle', *Bull. Ac. Malg.*, 56, 1–2, (1982), pp. 11–21.

Domenichini, J.-P. (1981a) 'La plus belle énigme du monde, ou l'historiographie coloniale en question', *Omaly sy Anio*, 13–14, pp. 57–76 and 84–5.

Domenichini, J.-P. (1981b) 'Problématiques passées et présentes de l'archéologie à Madagascar', *RPC*, 55, pp. 10–15.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1976) *Le Malgache, Essai de description sommaire* (Paris: SELAF).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1977) 'Malagasy cooking' in J. Kuper (ed.), pp. 111–15.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1978) 'Qu'est-ce qu'un hainteny?' in R. Etiemble (ed.) *Colloque sur la traduction poétique* (Paris: Gallimard) pp. 103–6.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1981) 'La Cuisine malgache' in J. Kuper (ed.), pp. 120–5.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1983) *Du Ohabolana au hainteny. Langue, littérature et politique à Madagascar* (Paris: Karthala/CRA).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1984) 'De la légende à l'histoire: le cycle de Darafify ou le

commerce des aromates, épices, parfums et simples', *Communication à l'Académie Malgache*, séance de section du 28 Juin 1984.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1985) 'Madagascar dans l'Océan Indien du Haut Moyen âge d'après les traditions de la côte orientale', *Sources Orales et Histoire*, 1, (forthcoming) (Valbonne: CEDRASEMI).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and Domenichini, J.-P. (1979) 'La tradition malgache, une source pour l'histoire de l'Océan Indien', *Taloha*, 8, pp. 57–81.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and Domenichini, J.-P. (1983) 'Madagascar dans l'Océan Indien avant le XIIIe siècle', *NCAA*, 1, pp. 5–19.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and Domenichini, J.-P. (1984) *Les premiers temps de l'histoire malgache. Nouvelle définition d'un champ de recherche* (Antananarivo: forthcoming).

Donadoni, S. (ed.) (1967) *Temit 1964. Missione Archeologica in Egitto dell'Università di Roma* (Rome: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onadoni, S. (1969) 'Mētēr Basileōs' [King's Mother] *Studi Classici e Orientali* (Pisa), 18, pp. 123–5.

Donadoni, S. (1970) 'Les fouilles à l'église de Sonqi Tino' in E. Dinkler (ed.), pp. 209–18.

Donadoni, S. and Curto, S. (1968) 'Le pitture murali della chiesa di Sonki nel Sudan' in *La Nubia Cristiana*, Quaderno No 2 de Museo Egizio di Torino (Turin: Fratelli Pozzo-Salvati), pp. 1–13.

Donadoni, S. and Vantini, G. (1967–8), 'Gli scavi nel diff di Sonqi Tino, Nubia Sudanese', in: *RPAR*, 40, pp. 247–73.

Donque, G. (1965) 'Le contexte océanique des anciennes migrations: vents et courants dans l'Océan Indien', *Taloha*, 1, pp. 43–59.

Donzel, E. van, Lewis, B., Pellat, C. (eds),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4 (2nd edn, Leiden: Brill).

Doresse, J. (1971) *Histoire sommaire de la Corne orientale de l'Afrique* (Paris: Geuthner).

Dos-Santos, J. and Everdosa, C. M. N. (1970) 'A Estacão arqueologica de Benfica, Luanda', *Revista da Fac. de Ciencias da Universidade de Luanda*, 5, pp. 33–51.

Douglas, M. (1981) *De la souillure. Essai sur les notions de pollution et de tabou* (Paris: Maspéro).

Dozy, R. (1874) *Geschichte der Mauren in Spanien bis zur Eroberung Andalusiens durch die Almoraviden (711–1110)* (2 vols, Leipzig: Grunow).

Dozy, R. (1932) *Histoire des Musulmans d'Espagne jusqu'à la conquête de l'Andalousie per les Almoravides (711–1110)* (2nd edn, Leiden: Brill).

Dramani-Issifou, Z. (1981) 'Routes de commerce et mise en place des populations du nord du Bénin actuel'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Vol 2, pp. 655–72.

Dramani-Issifou, Z. (1982) *L'Afrique noire dans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au XVI siècle. Analyse de la crise entre le Maroc et le Sonrhai* (Paris: Karthala–CRA).

Dramani-Issifou, Z. (1983a) 'Islam et société dans l'empire sonrhaï: sur quelques aspects des relations entre Gao et Tombouctou aux XVe–XVIe siècles d'après les Ta'rikhs soudanais', *L'Information historique*, 45, pp. 244–52.

Dramani-Issifou, Z. (1983b) 'Les nouvelles interprétations des relations entre le Maghreb et l'Afrique soudanaise au XVIe siècle' in *Actes du Second Colloque euro-africain sur 'Le Passé du Sahara et les zones limitrophes des Garamantes au Moyen âge'*. Paris, 15–16 Décembre 1983.

Dramani-Issifou, Z. (1984) 'Quand les voyageurs arabes découvraient le pays des noirs', *Balafon-Mémoire de l'Afrique*, 62, pp. 20–7.

Du Bourguet, P. (1970) 'La peinture murale compte: quelques problèmes devant la peinture murale nubienne' in E. Dinkler (ed.), pp. 303–12.

Ducatez, G. and Ducatez, J. (1980) 'Formation des dénominations de couleur et de luminosité en arabe classique et pré-classique: essai de périodisation selon une approche linguistique et anthropologique', *Peuples méditerranéens*, 10, pp. 139–92.

Duchemin, G. J. (1950) 'A propos des décorations murales des habitations de Oualata (Mauritanie)', *BIFAN* (B), 12, pp. 1095–110.

Duyvendak, J. J. L. (1949)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Probsthain).

Echallier, J. L. (1970) 'Forteresse et villages désertés du Toūat Goūrara (Sahara algérien)' (Thèse de 3ème cycle, Paris,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Echard, N. (ed.) (1983) *Métallurgies africaines. Nouvelles contributions* (Paris: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

Effah-Gyamfi, K. (1975) *Traditional History of the Bono State. An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Lego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Effah-Gyamfi, K. (1978) 'Bono Manso,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early Akan urbanism'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

Egharevba, J. (1960) *A Short History of Benin* (3rd edn,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Ehrenkreutz, A. S. (1959) 'Studies in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JESHO*, 2, pp. 128–61.

Ehrenkreutz, A. S. (1963) 'Studies in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II: the standard of finenes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dinars before the Crusades', *JESHO*, 6, pp. 243–77.
Ehrenkreutz, A. S. (1977) 'Numismatico-statis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nnual gold coinage production of the Ṭūlūnid Mint in Egypt', *JESHO*, 20, pp. 267–81.
Ehret, C. (1971) *Southern Nilotic History: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Past* (Evanston: NUP).
Ehret, C. (1972) 'Bantu origins and history: critique and interpretation', *TJH*, 2, pp. 1–9.
Ehret, C. (1973) 'Patterns of Bantu and Central Sudanic settlement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1000 BC 500 AD)', *TJH*, 3, pp. 1 71.
Ehret, C. (1974a) *Ethiopians and East Africa: The Problems of Contacts*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Ehret, C. (1974b)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ca 1000 BC to AD 500)', *TJH*, 4, 1 25.
Ehret, C. (1974c) 'Some trends in precolonial religious thought in Kenya and Tanzania' (Paper delivered at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frican Religions, Limuru, Kenya, June 1974).
Ehret, C. (1976) 'Asp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Western Kenya, AD 500–1800' in B. A. Ogot (ed.), pp. 1–20.
Ehret, C. (1980a) *The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Cushitic Phonology and Vocabulary* (Berlin: Reimer).
Ehret, C. (1980b) 'The Nilotic languages of Tanzania' in E. C. Polomé and C. P. Hill (eds), pp. 68–78.
Ehret, C. (1982a) 'Linguistic inferences about early Bantu history' in C. Ehret and M. Posnansky (eds), pp. 57 65.
Ehret, C. (1982b)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culture contact in the southern Sudan, *c.* 3000 BC to AD 1000: a preliminary linguistic overview' in J. Mack and P. Robertshaw (eds), pp. 19–48.
Ehret, C. (forthcoming), 'East African words and things: aspec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al change in East Africa' in B. A. Ogot (ed.).
Ehret, C. (unpublished a) 'The invention of highland planting agriculture in northeastern Tanzania social repercussions of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hret, C. (unpublished b)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ca. 1000 BC to AD 500'.
Ehret, C. and Nurse, D. (1981a) 'The Taita Cushites', *SUGIA*, 3, pp. 125 68.
Ehret, C. and Nurse, D. (1981b) 'History in the Taita Hills: a provisional synthesis', *KHR*, 7–8.
Ehret, C. and Posnansky, M. (eds) (1982) *The Archaeological and Linguistic Reconstruction of African Histor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Elaboration de l'Islam (1961) Colloque de Strasbourg, 12 14 Juin 1959 (Paris: PUF).
Eloff, J. F. and Meyer, A. (1981) 'The Greefswald sites' in E. A. Voigt (ed.), pp. 7–22.
Epstein, H. (1971) *The Origins of the Domestic Animals in Africa* (2 vols, New York: Africana Publishing)
Ervedosa, C. (1980) *Arqueologia Angolana* (Luanda: Ministério da Educaçao Nacional).
Etudes Nubiennes (1978) Colloque de Chantilly, 2–6 Juillet 1975 (Cairo: IFAO-Bibliothèque d'Etude, Vol. 77).
Etudes d'orientalisme de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E. Levi-Provençal (1962)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Eustache, D. (1970–1) *Etudes sur la monnaie antique et l'histoire monétaire du Maroc, I: Corpus des dirhams idrisites et contemporains. Collection de la Banque du Maroc et autres collections mondiales publiques et privées*(Rabat: Banque du Maroc).
Evans, D. (1975) 'Stonehenges of West Africa', *Country Life*, 16 January, pp. 134–5.
Evans-Pritchard, E. E. (1956) *Nuer Relig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Evers, T. M. (1980) 'Klingbeil Early Iron Age sites, Lydenburg, easter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SAAB*, 35, 131, pp. 46 57.
Evers, T. M. (1981) 'The Iron Age in the eastern Transvaal' in E. A. Voigt (ed.), pp. 65 109.
Evers, T. M. (1982) 'Excavations at the Lydenburg Heads site, easter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SAAB*, 37, 135, pp. 16–33.
Evers, T. M. (1984) 'Sotho-Tswana and Moloko settlement patterns and the Bantu cattle pattern', in M. J. Hall *et al.* (eds), pp. 236 47.
Ewert, C. (1971) *Islamische Funde in Balaguer und die Aljaferia in Zaragoza* (Berlin: De Gruyter).
Eyo, E. (1974) 'Recent excavations at Ife and Owo,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fe, Owo and Benin studie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Ibadan).
E. Eyo and F. Willett (1980, 1982) *Treasures of Ancient Nigeria* (New York: Knopf [1980],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in association with Collins [1982].

Fagan, B. M. (1967) *Iron Age Cultures in Zambia, I: Kalomo and Kangila* (London: Chatto & Windus).
Fagan, B. M. (1969a) 'Excavations at Ingombe Ilede, 1960–1962' in B. M. Fagan, D. W. Phillipson and S. G. H. Daniels (eds), pp. 55–161.
Fagan, B. M. (1969b) 'Radiocarbon dates for sub-Saharan Africa, VI', *JAH*, **10**, 1, pp. 149–69.
Fagan, B. M. and Nenquin, J. (eds) (1966) *Inventaria Archeologica Africana* (Tervuren: Musée Royale de l'Afrique Centrale).
Fagan, B. M. and Phillipson, D. W. (1965) 'Sebanzi, the Iron Age sequence of Lochinvar and the Tonga', *J. Roy. Anthropol. Inst.*, **45**, pp. 253–94.
Fagan, B. M., Phillipson, D. W. and Daniels, S. G. H. (eds) (1967–9), *Iron Age Cultures in Zambia* (2 vols, London: Chatto & Windus).
Fagan, B. and Yellen, J. E. (1968) 'Ivuna: ancient salt working in southern Tanzania', *Azania*, **3**, pp. 1–44.
Fage, J. D. (1964) 'Some thoughts on state-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Sudan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UPAH*, **1**, pp. 17–34.
Fage, J. D. (1969)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4th edn, Cambridge: CUP).
Fage, J. D. (1974) *States and Subjects in Sub-Saharan African History*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Raymond Dart Lecture).
Fage, J. D. (ed.) (1978)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2: c. 500 BC–AD 1050* (Cambridge: CUP).
Fage, J. D. (1980) 'Slaves and society in western Africa c. 1445–1700', *JAH*, **21**, 3, pp. 289–310.
Fage, J. D. and Oliver, R. A. (1970) *Papers in African Prehistory* (Cambridge: CUP).
Fagg, B. E. B. (1965) 'Carbon dates from Nigeria', *Man*, **54**, pp. 22–3.
Fagg, B. (1969) 'Recent work in West Africa: new light on the Nok Culture', *WA*, **1**, 1, pp. 41–50.
Fagg, W. (1963) *Nigerian Imag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Fall, Y. (1982) 'Silla: problématique d'un site de la vallée du Fleuve du Sénegal', *ASAG*, **46**, pp. 199–216.
Farias, P. F. de Moraes (1966) 'A reforma de Ibn Yāsīn', *Afro-Asia* (Salvador de Bahia), **2**–3, pp. 37–58.
Farias, P. F. de Moraes (1967) 'The Almoravids: some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movement during its periods of closest contact with the Western Sudan', *BIFAN* (B), **24**, 3–4, pp. 794–878.
Farias, P. F. de Moraes (1974) 'Silent trade: myth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HA*, **1**, pp. 9–24.
Farmer, H. G. (1929) *A History of Arabian Music to the XIIth century* (London: Luzac).
Fathy, H. (1981) *Des architectures de terre ou l'avenir d'un tradition millénaire* (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Fazlur, R. (1966) *Isla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Feierman, S. (1974) *The Shambaa Kingdom* (Madison: UWP).
Ferrand, G. (1891–1902) *Les Musulmans à Madagascar et aux Iles Comores* (3 vols, Paris: Leroux).
Ferrand, G. (1909) *Essai de phonétique comparée du malais et des dialectes malgaches* (Paris: Geuthner).
Ferrand, G. (1919) 'Les K'ouen-louen et les anciennes navigations interocéaniques dans les mers du Sud', *JA*, 11th series, **13**, pp. 239–333, 431–92; **14**, pp. 5–68, 201–41.
Ferrand, G. (1922) 'L'empire Sumatranais de Çrivijaya', *JA*, 11th series, **20**, pp. 1–104.
Ferrand, G. (1929) 'Wakwāk' in M. T. Houtsma *et al.* (eds), pp. 1105–9.
Filesi, T. (1962) *Le relazioni della Cina con l'Africa nel Medio-Evo* (Milan: Giuffrè).
Filesi, T. (1970)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Cass).
Filipowiak, W. (1979) *Etudes archéologiques sur la capitale médiévale du Mali* (Szczecin: Muzeum Narodowe).
Filipowiak, W., Jasnosz, S., Wolagiewicz, R. (1970) '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polono-guinéennes à Niani en 1968', *Materialy Zachodnio-pormorskie*, **14**, pp. 575–648.
Fisher, A. G. B. and Fisher, H. J. (1970) *Slavery and Muslim Society in Africa* (London: Hurst).
Fisher, H. J. (1972) '"He swalloweth the ground with fierceness and rage": the horse in the Central Sudan. I. Its introduction', *JAH*, **13**, 3, pp. 367–88.
Fisher, H. J. (1973a) '"He swalloweth the ground with fierceness and rage": the horse in the Central Sudan. II. Its use', *JAH*, **14**, 3, pp. 355–79.
Fisher, H. J. (1973b) 'Conversion reconsidered: some historical aspects of religious conversion in Black Africa', *Africa*, **43**, pp. 27–40.
Fisher, H. J. (1977) 'The eastern Maghrib and the central Sudan' in R. Oliver (ed.) (1977), pp. 232–330.
Flacourt, E. de, (1661) *Histoire de la Grande Ile Madagascar ... avec une relation de ce qui s'est passé ès*

années 1655, 1656 et 1667 (Paris: Pierre Bienfait. Edition prepared by A. Grandidier, G Grandidier and H. Froidevaux, 1913).

Fleischhacker, H. von (1969) 'Zur Rassen-und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Nordafrika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Aethiopiden, der Libyer und der Garamanten', *Paideuma*, 15, pp. 12 53.

Flight, C. (1967) 'The prehistoric sequence in the Kintampo area of Ghana', *Actes VIe Congr. PPEQ*, pp. 68 9.

Flight, C. (1973) 'A survey of recent results in the radiocarbon chronology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Africa', *JAH*, 14, 4, pp. 531 -54.

Flight, C. (1975) 'Gao, 1972: first interim report: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Cemetery at Sané', *WAJA*, 5, pp. 81–90.

Flight, C. (1976) 'The Kintampo culture and its place in the economic prehistory of West Africa' in J. Harlan *et al.* (eds), pp. 211-21.

Flight, C. (1978) 'Gao, 1974 second interim report: excavation in the Cemetery at Sané', *WAJA*, 7.

Flury, S. (1922) 'The Kufic inscriptions of Kisimkazi Mosque, Zanzibar, 500 A.H. (A.D. 1107)', *JRAS*, April, pp. 257-64.

Forand, P. (1971) 'Early Muslim relations with Nubia', *Islam*, 48, pp. 111 21.

Ford, J. (1971) *The Role of the Trypanosomiases in African Ecology: 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orde, D. and Jones, G. I. (1950) *The Ibo and Ibibio-speaking Peoples of South-Eastern Nigeria* (London: IAI)

Fordyce, B. N. S. (1984) 'The prehistory of Nylsvley' in B. Walker (ed.).

Foucauld, C. E. de (1940) *Dictionnaire abrégé touareg-français de noms propres (dialecte de l'Ahaggar)* (Paris: Larose).

Fouché, L. (ed.) (1937) *Mapungubwe: Ancient Bantu Civilization on the Limpopo* (Cambridge: CUP).

Fournel, H. (1875-81) *Les Berbères; étude sur la conquête de l'Afrique par les Arabes* (2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Fourquet, R., Sarthou, J.-L., Roux, J. and Acri, K. (1974) 'Hémoglobine S et origines du peuplement de Madagascar. Nouvelle hypothèse sur son introduction en Afrique', *Arch. Inst. Pasteur de Madagascar*, 43, pp 185 220.

Fraser, D. (1972) 'The fish-legged figure in Benin and Yoruba art' in D. Fraser and H. M. Cole (eds), pp. 261–94.

Fraser, D. (1975) 'The Tsoede bronzes and Owo Yoruba art', *African Arts*, 8, 3, pp. 30–5.

Fraser, D. and Cole, H. M. (1972) *African Art and Leadership* (Madison: UWP).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59) 'Some problems of East African coinage from early times to 1890', *TNR*, 53, pp. 250 60.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0) 'East African coin finds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JAH*, 1, 1, pp. 31–43.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a)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 (London: OUP).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b)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rend, W. H. C. (1972a) 'Coptic, Greek and Nubian at Qasr Ibrim', *Byzantinoslavica*, 33, pp. 224 -9.

Frend, W. H. C. (1972b) *The Rise of the Monophysite Movemen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enturies* (Cambridge: CUP).

Frend, W. H. C. (1979) 'The cult of military saints in Christian Nubia' in C. Andresen and G. Klein (eds) *Theologia Crucis – Signum Crucis. Festschrift für E. Dinkler zum 70. Geburstag* (Tübingen: J. C. B. Mohr), pp. 155–63.

Frobenius, L. (1913) *The Voice of Africa* (2 vols, London: Hutchinson).

Frobenius, L. and Wilm, R. von (1921 31) *Atlas Africanus* (Munich: Beck).

Gado, B. (1980) *Le Zarmatarey.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entre Niger et Dallol Mawri* (Niamey: Institut de Recherche en Sciences Humaines).

Gado, B. (1981) 'La recherch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au Niger' *Recherche, Pédagogie et Culture*, 55, pp. 33 40.

Gallais, J. (1984) *Hommes du Sahel, espace, temps et pouvoirs* (Paris: Flammarion).

Galloway, A. (1937) 'The skeletal remains of Mapungubwe' in L. Fouché (ed.), pp. 127–74.

Galloway, A. (1959) *The Skeletal Remains of Bambandyanalo* (Johannesburg: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Press).

Gao Jinyuan (1984) 'China and Africa: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over many centuries', *African Affairs*, 83, 331, pp. 241–50.

Garcin, J.-C. (1976) *Un centre musulman de la Haute-Egypte médiévale: Qūṣ* (Cairo: IFAO).

Gardner, G. A. (1963) *Mapungubwe*, Vol. 2 (Pretoria J. L. van Schaik).

Garlake, P. S. (1966) *The Early Islamic Architecture of the African Coast* (London and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Garlake, P. S. (1968) 'Test excavations at Mapela Hill, near the Shashi River, Rhodesia', *Arnoldia (Rhod.)*, 3, 34, pp. 1 29

Garlake, P. S. (1970) 'Iron Age site in the Urungwe district of Rhodesia', *SAAB*, **25**, 97, pp. 25 44.

Garlake, P. S. (1973) *Great Zimbabwe* (London: Thames & Hudson).

Garlake, P. S. (1978) 'Pastoralism and Zimbabwe', *JAH*, 19, 4, pp. 479–94

Garrard, T. F. (1975) 'Pottery and stone goldweights from Ghana', *Sankofa*, **1**, pp. 60–8.

Garrard, T. F. (1982) 'Myths and metrology. The early trans-Saharan gold trade', *JAH*, **23**, 4, pp 443–61.

Gartkiewicz, P. M. (1973) 'Stary Kościół w Dongoli na tle sakralnej architektury wczesnośredniowiecznej Nubii' [The Old Church in Dongol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acral architecture in Early Medieval Nubia], *Kwartalnik Architektury i Urbanistyki* (Warsaw), **18**, pp. 207 39.

Gartkiewicz, P. M. (1975) 'The central plan in Nubian church architecture' in K. Michałowski (ed.), pp. 49 64

Gartkiewicz, P. M. (1980) 'New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Nubian church architecture', *BAB*, 55, pp. 137 44

Gartkiewicz, P. M. (1982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Nubian church Architecture', *NC*, **1**, pp. 43–105.

Gartkiewicz, P. M. (1982b) 'Remarks on the cathedral at Qasr Ibrim'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87–94.

Gartkiewicz, P. M. (1983) 'Some remarks on the building-history of the Cathedral in Faras', *Nubian Letters*, (The Hague: Society for Nubian Studies), **1**, pp. 21–39.

Gast, M. (1972) 'Témoignages nouveaux sur Tin Hinan, ancêtre légendaire des Touareg Ahaggar', *ROMM*, 9, (Mélanges Le Tourneau), pp. 395–400.

Gaudio, A. (1978) *Le dossier de la Mauritanie* (Paris: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Gautier, E. F. (1927) *L'Islamisation de l'Afrique du Nord. Les siècles obscurs du Maghreb* (Paris: Payot).

Gautier, E. F. (1935) 'L'or du Soudan dans l'histoire', *AHES*, 7. pp. 113–23.

Gautier, E. F. (1937) *Le passé de l'Afrique du Nord. Les siècles obscurs* (Paris: Payot).

Gemery, H. A. and Hogendorn, J. S. (eds) (1979) *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erharz, R. (1983) 'Rock paintings and ruins: pictures from the history of Zimbabwe' in K. H. Striedter (ed.), *Rock Paintings from Zimbabwe* (Wiesbaden: Steiner).

Gerster, G. (1968) *Kirchen im Fels; Entdeckungen in Äthiopien* (Stuttgart: Kohlkammer).

Gerster, G. (1970) *Churches in Rock, Early Christian Art in Ethiopia* (London: Phaidon).

Gerster, G. (1974) *Äthiopien: das Dach Afrikas* (Zurich: Atlantis).

al-Ghazālī (1861) *Ihyā' 'ulūm al-dīn* (Bulak).

Gibb, H. A. R. (1963) *Arabic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ibb, H. A. R., Kramers, J. H., Lévi-Provençal, E. and Schacht, J. (eds) (1960)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1 (2nd edn, Leiden/London: Brill/Luzac).

Girard, D. (1686) *Discours historique de l'état de Borno*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Français, 12 220 [appendice]).

Godlewski, W. (1978) 'Some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Nubian baptisteries', *Etudes Nubiennes*, 1978, pp 107–17.

Godlewski, W. (1979) *Faras VI. Les baptistères nubiens* (Warsaw: PWN).

Godlewski, W. (1981) 'Throne hall at Old Dongola (the Sudan)'. *AB*, **30**, pp. 39 51.

Godlewski, W. (1982a) 'The mosque-building in Old Dongola' in P. van Moorsel (ed.), pp. 21–8.

Godlewski, W. (1982b) 'Some comments on the wall painting of Christ from Old Dongola'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95 9.

Goitein, S. D. (1962) 'La Tunisie du XIe siècle à la lumière des documents de la *Geniza* du Caire' in *Etudes d'orientalisme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E. Lévi-Provençal*, Vol. 2, pp. 559 79.

Goitein, S. D. (1963) 'Slaves and slave-girls in the Cairo Geniza Records', *Arabica*, **9**, pp. 1–20.

Goitein, S. D. (1966)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eiden: Brill).

Goitein, S. D. (1967)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Vol. I: Economic Founda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itein, S. D. (1973) *Letters of Medieval Jewish Traders* (Princeton: PUP).

Goldziher, I. (1925) *Vorlesungen über den Islam*. (2nd edn, Heidelberg: Carl Winter).

Goldziher, I. (1966) *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Arabic Literature* (Hildesheim: Georg Olms).

Goldziher, I. (1971) *Muslim Studies* (2 vols, London: Allen & Unwin).

Golgowski, T. (1968) 'Problems of the iconography of the Holy Virgin murals from Faras', *Etudes et Travaux*, 2 (CAMAP, 6), pp. 293–312.

Golgowski, T. (1969) 'Scènes de la Passion et de la Résurrection sur une peinture de Faras', *Etudes et Travaux*, 3 (CAMAP, 8), pp. 207–29.

Golvin, L. (1957) *Le Magrib central à l'époque des Zirides* (Paris).

Goody, J. (1964) 'The Mande and the Akan hinterland' in J. Vansina, *et al.* (eds), pp. 193–218.

Goody, J. (1971) *Technology, Tradition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London: OUP).

Grabar, O. (1957) *The coinage of the Tulunids* (New York: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Numismatic Notes and Monographs, 139).

Gray, J. M. (1951) 'A History of Kilwa, Part 1', *TNR*, 31, pp. 1–24.

Gray, J. M. (1954) 'The Wadebuli and the Wadiba', *TNR*, 36, pp. 22–42.

Gray, J. M. (1962) *History of Zanzibar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1856* (London: OUP).

Gray, R. (ed.) (197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4, c. 1600 to c. 1790* (Cambridge: CUP).

Gray, R. and Birmingham, D. (eds) (1970) *Pre-colonial African Trade. Essays on Trad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frica before 1900* (London: OUP).

Grebenart, D. (1983) 'Les débuts de la métallurgie en Afrique occidentale' (2 vols, Thèse de Doctorat d'Etat, Université d'Aix-en-Provence).

Greenberg, J. H. (1955)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New Haven: Compass Publishing).

Greenberg, J. H. (1963a)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IJAL*, 29, 1, pp. 1–177.

Greenberg, J. H. (1963b) *Languages of Africa*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Greenberg, J. H. (1966)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The Hague: Mouton).

Greenberg, J. H. (1972) 'Linguistic evidence regarding Bantu origins', *JAH*, 12, 2, pp. 189–216.

Grierson, P. (1961) Contribution to 'La discussione sul tema: gli scambi internazionali e la moneta', *Settimani di Studio de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8, pp. 683–721.

Grierson, P. (1975) *Monnaies et monnayage: introduction à la numismatique* (Paris: Aubier).

Griffith, F. L. (1913) 'The Nubian texts of the Christian period', *AAW*, Phil. Hist. Classe, 8.

Griffith, F. L. (1928) 'Christian documents from Nubia', *PBA*, 14, pp. 117–46.

Grottanelli, V. L. (1955) *Pescatori dell' Oceano Indiano* (Roma: Cremonse).

Grottanelli, V. L. (1975) 'The peopling of the Horn of Africa' in H. N. Chittick and R. I. Rotberg (eds), pp. 44–75.

Grunderbeck, M. C. van, Roche, E. and Doutrelepont, H. (1983a), *Le premier âge du Fer au Rwanda et au Burundi. Archéologie et environnement* (Butare: INRS, Publ. 23).

Grunderbeck, M. C. van, Roche, E. and Doutrelepont, H. (1983b) 'La métallurgie ancienne au Rwanda et au Burundi', *Journée de Paléométallurgie*, pp. 1–15.

Grunne, B. de (1980) *Terres cuites anciennes de l'ouest africain* (Louvain La Neuve: Institut Supérieur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de l'Art).

Gsell, S. (1913–28) *L'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8 vols, Paris: Hachette).

Gsell, S., Marçais, G. and Yver, G. (1935) *L'Algérie* (Paris: Boivin).

Guèbrè Sellassié (1930) *Chronique du règne de Ménélik II.* (Tr. and annotated by M. de Coppet) (Paris: Maisonneuve).

Guidi, I. (1932)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etiopica* (Roma: Istituto per Oriente).

Guthrie, M. (1948)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antu Languages* (London: OUP).

Guthrie, M. (1962) 'Some developments in the prehistory of the Bantu languages', *JAH*, 3, 2, pp. 273–82.

Guthrie, M. (1967–71) *Comparative Bantu* (4 vols. Farnborough: Gregg).

Haas, S. S. (1942) 'The contribution of slaves to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the culture of early Islam'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Hadj-Sadok, M. (1983) *Al-Idrīsī: le Magrib au XIIe siècle après J.C. (VIe siècle de l'Hégire)* (Paris: Publisud).

Hägg, T. (1982) 'Some remarks on the use of Greek in Nubia'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103–7.

Hair, P. E. H. (1968a) 'Ethnolinguistic continuity on the Guinea Coast', *JAH*, 8, 2, pp. 247–68.

Hair, P. E. H. (1968b) 'An ethnolinguistic inventory of the Lower Guinea Coast before 1700 (part I)', *ALR*, 7, pp. 47–73.

Hair, P. E. H. (1974) 'Barbot, Dapper, Davity: a critique of sources on Sierra Leone and Cape Mount', *HA*, 1, pp. 25–54.

al-Hakamī (1892) *Yaman, its Early Medieval History* . . ., ed. and tr. by H. C. Kay (London: Arnold).

Håland, R. (1980) 'Man's role in changing habitat of Mema during the old kingdom of Ghana', *Norwegian Archeological Review*, 13, 1, pp. 31–46.

Hall, D. G. (1964)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Hall, M. (1984) 'The myth of the Zulu homestead: archaeology and ethnography', *Africa* (IAI), 54, pp. 65–79.
Hall, M. and Vogel, J. C. (1980) 'Some recent radiocarbon dates from southern Africa', *JAH*, 21, 4, pp. 431–55.
Hall, M. J., Avery, G., Avery, D. M., Wilson, M. L. and Humphreys, A. J. B. (eds) (1984) *Frontiers: Southern African Archaeology Today* (Oxford: BAR, Cambridge Monographs in African Archaeology, 10).
Hall, S. L. (1981) 'Iron Age sequence and settlement in the Rooiberg, Thabazimbi area'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Hallam, W. K. R. (1966) 'The Bayajida legend in Hausa folklore', *JAH*, 7, 1, pp. 47–60.
Hamani, D. (1985) 'L'Ayar (Aïr) nigérien du XVe au XIXe siècle' (Thèse de doctorat d'Etat, Université de Paris I).
al-Hamdānī (1954) *Al-Iklīl*, ed. by O. Löfgren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s).
al-Hamdānī (1958) *On the Genealogy of Fatimid Caliphs*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at Cairo,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1).
Hamidullah, M. (1956) 'Les "Aḥābīsh" de La Mecque' in *Studi orientalistici in onore di Giorgio Levi della Vida* (Rome: Pubblicazioni dell'Istituto per l'Oriente), pp. 434–47.
Hanisch, E. O. M. (1979) 'Excavation at Icon, northern Transvaal' in *S. Afr. Archaeol Soc., Goodwin Series*, 3, pp. 72–9.
Hanisch, E. O. M. (1980) 'A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Iron Age sites in the Limpopo/Shashi Valley'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Pretoria).
Hanisch, E. O. M. (1981) 'Schroda: a Zhizo site in the northern Transvaal' in E. A. Voigt (ed.), pp. 37–53.
Harlan, J. R., De Wet, J. M. J. and Stemler, A. B. L. (eds) (1976a) *Origins of African Plant Domestication* (The Hague and Paris: Mouton).
Harlan, **J. R., De Wet, J. M. J. and Stemler, A. B.** L. (1976b) 'Plant domestication and indigenous African agriculture' in Harlan, J. R. *et al.* (eds) (1976a), pp. 3–19.
Harris, J. E. (1971)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sia* (Evanston: NUP).
Hartle, D. D. (1966) 'Bronze objects from the Ifeka gardens site Ezira', *WAAN*, 4.
Hartle, D. D. (1967) 'Archaeology in eastern Nigeria', *Nigeria Magazine*, 93, pp. 134–43.
Hartle, D. D. (1968) 'Radiocarbon dates', *WAAN*, 9, p. 73.
Hartmann, M. (1895) 'Der Naǧāšī Aṣḥama und sein Sohn Armā', *ZDMG*, 49, 1895, pp. 299–300.
Hasan, Y. F. (1966) 'The penetration of Islam in the eastern Sudan' in I. M. Lewis (ed.), pp. 144–59.
Hasan, Y. F. (1967) *The Arabs and the Sudan* (Edinburgh: EUP).
Hasan, Y. F. (ed.) (1971) *Sudan in Africa: 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Sudan Research Unit, 7–12 February 1968* (Khartoum: KUP).
Hasan, Y. F. (1973) *The Arabs and the Sudan* (3rd edn, Khartoum: KUP).
Haudricourt, A. G. and Hedin, L. (1943) *L'Homme et les plantes cultivées*. (Paris: Gallimard).
Havighurst, A. F. (1958) *The Pirenne Thesis: Analysis, Criticism and Revision* (Boston: Heath).
Heckel, E. (1903) *Les plantes médicinales et toxiques de Madagascar*. (Marseille-Paris: Institut Colonial-Challamel).
Heine, B. (1973) 'Zur genetischen Gliederung der Bantu-Sprachen', *AU*, 56, pp. 164–85.
Heine, B. (1978) 'The Sam languages: a history of Rendille, Boni and Somali', *Afroasiatic Linguistics*, 6, pp. 23–115.
Heine, B. (1981) 'Some cultural evidence on the early Sam-speaking people of eastern Africa', *SUGIA*, 3, pp. 169–200.
Heine, B., Hoff, H. and Vossen, R. (1977) 'Neuere Ergebnisse zur Territorial-geschichte der Bantu' in W. J. Mohlig, F. Rottland and B. Heine (eds), pp. 57–70.
Heine, B., Rottland, F., Vossen, R. (1979) 'Proto-Baz: some aspects of early Nilotic-Cushitic contacts', *SUGIA*, 1, pp. 75–91.
Héliodore (1960) *Les Ethiopiens (Théagène et Chariclée)* (3 vol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Heller, B. (1931) *Die Bedeutung des arabischen 'Antarromans für die vergleichende Litteraturkunde* (Leipzig: Eichblatt).
Henderson, R. N. (1972) *The King in Every Man. Evolutionary Trends in Onitsha Ibo Society*. (New Haven: YUP).
Henige, D. P. (1974) *The Chronology of Oral Tradition: Quest for a Chimer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ennequin, G. P. (1972) 'Problèmes théoriques et pratiques de la monnaie antique et médiévale', *AI*, 10, pp. 1–55

Hennequin, G. P. (1974) 'Points de vue sur l'histoire monétaire de l'Egypte musulmane au Moyen âge', *AI*, 12, pp. 1-36.
Herbert, E. (1984) *Red Gold of Africa: Copper in Precolonial History and Culture* (Madison: UWP).
Herodotus (1872) *Histoires* (Paris: Ed. Muller).
Hiernaux, J. (1968) 'Bantu expansion: the evidence from physical anthropology confronted with linguistic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JAH*, 9, 4, pp. 505-15.
Hiernaux, J., De Longrée, E. and De Buyst, J. (1971) *Fouilles archéologiques dans la vallée du Haut-Lualaba, I, Sanga (1958)* (Tervuren: Musée Royale de l'Afrique Centrale).
Hiernaux, J., Maquet, E. and De Buyst, J. (1973) 'Le cimetière protohistorique de Katoto, vallée du Lualaba, Congo-Kinshasa', *Actes du VI Congrès Panafricain de Préhistoire*, pp. 148-58.
Hill, M. H. (1970) 'Towards a culture sequence for Sierra Leone', *Africana Res. Bull.* (Freetown) 1, 2.
Hill, M. H. (1972) 'Speculations o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Sierra Leon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anding Studies, SOAS London, 1972).
Hinkel, F. (1977–) *The Archaeological Map of the Sudan*, Fasc. I-X (Berlin. Akademie-Verlag, Fasc. II and III have appeared, others forthcoming).
Hinkel, F. (1978) *Auszug aus Nubien* (Berlin: Akademie-Verlag).
Hintze, F. (1971-7) 'Beobachtungen zur altnubischen Grammatik, I-II' *Berliner Beiträge zur Ägyptologie und Sudanarchäologie: WZHUS*, 20, 3, 1971, pp. 287–93, III, *AF*, 2, 1975, pp. 11-24; IV in K. Michalowski (ed.), 1975, pp. 65–9; V, *AF*, 5, 1977, pp. 37-43.
Hirschberg, H. Z. (1963) 'The Problems of the Judaized Berbers', *JAH*, 4, 3, pp. 313-39.
Hirschberg, H. Z. (J. W.), (1974) *A History of Jews in North Africa, Volume I: From Antiquity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Hiskett, M. (1984)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Hitti, P. K. (1956) *History of the Arabs* (6th edn, London: Macmillan).
Hitti, P. K. (1970) *History of the Arabs* (10th edn, London: Macmillan).
Hodge, C. T. (ed.) (1971) *Papers on the Man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African Series, 3).
Hodgkin, T. (1975) *Nigerian Perspectives. An Historical Anthology* (2nd edn, London: OUP).
Hoenerbach, W. (ed.) (1967) *Der Orient in der Forschung, Festschrift für Otto Spi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Hofmann, I. (1967) *Die Kulturen des Niltals von Aswan bis Sennar, vom Mesolithikum bis zum Ende der Christlichen Epoche* (Hamburg: Hamburgischer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Holas, B. (1951) 'Deux haches polies de grande taille de la Basse Côte d'Ivoire', *BIFAN*, 13, 4, pp. 1174-80.
Holl, A. (1983) 'Essai sur l'économie néolithique du Dhar Tichitt (Mauritanie)' (Thèse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Hollingsworth, L. W. (197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ast Coast of Africa* (3rd edn, London: Macmillan).
Hopkins, A. G. (1973)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Hornell, J. (1934) 'Indonesian influence on East African culture', *JRAI*, 64, pp. 305-33
Hornell, J. (1942) 'The sea-going *mtepe* and *dau* of the Lamu Archipelago', *TNR*, 14, pp. 27-37.
Horton, M. (1981) 'Excavations at Shanga' (preliminary report).
Horton, R. (1976) 'Stateless societi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1976), pp. 72–113.
Horton, R. (1979) 'Ancient Ife: a reassessment', *JHSN*, 9, 4, pp. 69–150
Hourani, G. F. (1951)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PUP).
Houtsma, M. T., Wensinck, A. J., Arnold, T. W. and Lévi-Provençal, E. (eds) (1929)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st edn, Leyden and London: Brill and Luzac).
Hrbek, I. (1953) 'Die Slawen im Dienste der Fatimiden', *AROR*, 21, 4, pp. 543–81.
Huard, P. (1966) 'Introduction et diffusion du fer au Tchad', *JAH*, 7, 3, pp. 377–404.
Huffman, T. N. (1970) 'The Early Iron Age and the spread of the "Bantu"', *SAAB*, 25, pp. 3-21.
Huffman, T. N. (1971) 'A guide to the Iron Age of Mashonaland', *Occas. Papers Nat. Museum Rhodesia*, 4, 1, pp. 20–44.
Huffman, T. N. (1974a) 'The linguistic affinities of the Iron Age in Rhodesia', *Arnoldia* (Rhod.), 7
Huffman, T. N. (1974b) *The Leopard's Kopje Tradition* (Salisbury: National Museums and Monuments of Rhodesia, Museum Memoir, 6).
Huffman, T. N. (1978) 'The origins of Leopard's Kopje: an 11th century defaquane', *Arnoldia* (Rhod.), 8, 23, pp. 1-23.
Huffman, T. N. (1979) 'Test excavations at Naba and Lanlory, northern Mashonaland', *S. Afr. Archaeol. Soc., Goodwin Series*, 3, pp. 14–46.

Huffman, T. N. (1981) 'Snakes and birds: expressive space at Great Zimbabwe', *AS*, **40**, 2, pp. 131–50.
Huffman, T. N. (1982) 'Archaeology and ethnohistory of the African Iron Age', *Ann. Rev. Anthropol.*, **11**, pp. 133–50.
Huffman, T. N. (1984) 'Leopard's Kopje and the nature of the Iron Age in Bantu Africa', *Zimbabweana*, 1, 1.
Hugot, H. J. (1962) *Mission Berliet Ténéré-Tchad* (1960),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Hugot, H. J. (1966) 'Mission à l'Ile de Tidra', *BIFAN* (B), 28, pp. 555–64; 1019–23.
Hugot, H. J. *et al.* (1973) *Tichitt I. Rapport scientifique* (ronéo).
Hugot, H. J. (1974) *Le Sahara avant le désert* (Paris: Editions des Hespérides).
Hugot, H. J. (1979) 'Le Néolithique saharien' (Thèse de Doctorat ès Lettres,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
Huici-Miranda, A. (1959a) 'La Salida de los Almoravides del desierto y el reinado de Yusuf b. Tāšfin: adaraciones y rectificaciones', *Hespéris*, 47, pp. 155–82.
Huici-Miranda, A. (1959b) "Alī b. Yūsuf y sus empresas en El-Andalus', *Tamuda*, 7, pp. 77–122.
Huici-Miranda, A. (1960) 'El Rawḍ al-quirṭās y los Almorávides', *HT*, **1**, pp. 513–41
Huici-Miranda, A. (1961) 'Un fragmento inedito de Ibn 'Idhārī sobre los Almorávides', *HT*, **2**, pp. 43–111.
Huici-Miranda, A. (1962) 'Contribución al estudio de la dinastia almorávide: el gobierno de Tašfin Ben 'Alī Ben Yūsuf en el-Andalus' in *Etudes d'orientalisme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E. Lévi-Provençal*, Vol. 2, pp. 605–21.
Huici-Miranda, A. (1962) 'Los Banu Hud de Zaragoza, Alfonso I el Batallador y los Almoravides' in *Estudios de Edad Media de la Corona de Aragon*, (Zaragoza), **7**, pp. 7–38.
Huici-Miranda, A. (1963) 'Nuevas aportaciones de "Al-Bayān al-Mughrib" sobre los Almorávides', *Al-Andalus*, 28, pp. 313–30.
Huizinga, J. (1968) 'New phys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evidence bear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gon, Kurumba and the extinct West African Tellem populations', *Proc. KNAW*, (C), **71**, 1, pp. 16–30.
Al-Ḥulal al-Mawshīyya (1936) (ed. by I. Allouche, Rabat: IHEM).
Al-Ḥulal al-Mawshīyya (1952) in A. Huici-Miranda, *Colección de crónacas arabes de la Reconquista. Tomo I. Al-Hulal al-Mawshīyya* (Tetuan: Editori Marroquí).
Huntingford, G. W. B. (1965) *The Glorious Victories of Amda Seyon, King of Ethiop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untingford, G. W. B. (1963) 'The peopling of the interior of Africa by its modern inhabitants'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58–93.
Huntingford, G. W. B. (tr. and ed.) (1980) *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 (London: Hakluyt Society).
Hunwick, J. O. (1980) 'Gao and the Almoravids: a hypothesis' in B. K. Swartz and R. F. Dumett (eds), pp. 413–30.
Hunwick, J. O., Meillassoux, C. and Triaud J.-L. (1981) 'La géographie du Soudan d'après al-Bakrī. Trois lectures'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Ecrit*, Vol. 1, pp. 401–28.

Ibn 'Abd al-Ḥakam (1922)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Egypt, North Africa and Spain, known as the Futūḥ Miṣr of Ibn 'Abd al-Ḥakam*, ed. by C. C. Torrey (New Haven: YUP).
Ibn 'Abd al-Ḥakam (1947) *Conquête de l'Afrique du Nord et de l'Espagne*, ed. and tr. by A. Gateau (Algiers: Bibliothèque Arabe Française, II)
Ibn 'Abd Rabbihi (1876) *Al-'Iḳd al-farīd* (3 vols, Cairo).
Ibn 'Abdūn (1955) 'Risāla fī l-ḳaḍā' wa-l-ḥisba' in E. Lévi-Provençal (ed.) *Trois traités hispaniques de ḥisba*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du Caire).
Ibn Abī Dīnār (1869–70) *Kitāb al-mu'nis fī akhbār Ifrīḳīyyā wa-Tūnis* (Tunis).
Ibn Abī Zar' (1843–6) [*Rawḍ al-Kirṭas*] *Annales regum Mauritaniae a condito Idrisarum imperio ad annum fugae 726* ..., ed. by C. J. Tornberg (2 vols, Uppsala: Litteris Academicis).
Ibn Abī Zar' (1936) *Rawḍ al-Kirṭās*, ed. by M. al-Hāshimī al-Filālī (2 vols, Rabat).
Ibn al-Abbār (1963) *Al-Hulla al-Siyara* (2 vols, Ed. H. Mu'nis, Cairo).
Ibn al-Athīr, 'Alī b. Muḥammad (1885–6) *Al-Kāmil fī 'l-Ta'rīkh* (12 vols, Cairo).
Ibn al-Djawzī, Abū 'l-Faradj (1938–40) *Kitāb al-Muntaẓam* (10 vols, Hyderabad).
Ibn al-Faḳīh (1885) *Compendium libri Kitāb al-boldān*, ed. by M. J. de Goeje (Leiden: Brill).
Ibn al-Mudjāwir (1957) *Ta'rīkh al-Mustabṣir*, ed. by O. Lofgren (Leiden: Brill).
Ibn al-Rūmī (1924) *Dīwān*, ed. by K. Kaylānī (Cairo).

Ibn al-Saghīr (1975) 'Chronique d'Ibn Saghir sur les imams Rostemides de Tahert', CT, 23, 91–2, pp. 315–68.
Ibn al-Wardī (1868) *Tatimmat al-Mukhtaṣar fi akhbār al-bashār* (Cairo).
Ibn Baṭṭūṭa (1969) *Voyages d'Ibn Battûta*, ed and tr. by C. Defrémery et B. R. Sanguinetti (reprint of 1st edn 1854–8, with notes by V. Monteil, Paris: Anthropos).
Ibn Ḥadjar al-'Askalānī (1970) *Al-Iṣāba fī tamyīz al-Ṣaḥāba* (8 vols, ed. by A. M. al-Bajjāwī, Cairo).
Ibn Ḥammād (1927) *Histoire des rois 'obaidides, les califes fatimides*, ed. and tr. by M. Vonderheyden (Algiers: Carbonal).
Ibn Ḥawkal (1938) *Opus Geographicum*, ed. by J. H. Kramers (Leiden: Brill).
Ibn Ḥawkal (1964) *Configuration de la terre* (*kitāb Surat al-Arḍ*), tr. by J. H. Kramers and G. Wiet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Ibn Hazm (1962) *Djamharat Ansāb al-'Arab*, ed. by 'Abd al-Salām Hārūn (Cairo).
Ibn Hishām (1936) *Al-Sīra al-Nabawiyya* (4 vols, Cairo).
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ī (1848–51) *Histoire de l'Afrique et de l'Espagne intitulée al-Bayano 'l Mogrib* (2 vols, ed. by R. Dozy, Leiden: Brill).
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ī (1948 51)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et de l'Espagne musulmane, intitulée Kitab al-bayān al-mughrib, et fragments de la chronique de 'Arib* (4 vols, new edn of 1848–51 edn by R. Dozy from new ms, by G. S. Colin and E. Lévi-Provençal, Beirut: Da Assakafa).
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ī (1967)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al-Andalus wa-l-Maghrib* (4 vols, Beirut: Ed. Iḥsān 'Abbās).
Ibn Isḥāḳ (1955) *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 Iṣḥāq's Sīrat Rasūl Allāh*, tr. by A. Guillaume (Lahore: OUP).
Ibn Khaldūn (1847 51) *Histoire des Berbères et des dynasties musulman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tr. by Baron de Slane (2 vols, Algiers: Imprimerie du gouvernement).
Ibn Khaldūn (1867) *Kitāb al-'Ibār* (7 vols, Cairo).
Ibn Khaldūn (1925–56) *Histoire des Berbères et des dynasties musulman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tr. Baron de Slane (1st edn, 1852 6), new edition ed. by P. Casanova (4 vols, Paris: Geuthner).
Ibn Khaldūn (1956–9) *Kitab al-'Ibar* (4 vols, reprinted 1961, Beirut).
Ibn Khaldūn (1967–9) *Al-Muqaddima.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Trad. par V. Monteil (3 vols, Beirut: Com. Libanaise pour la traduction des chefs-d'oeuvre).
Ibn Khallikān (1843 71) *Ibn Khallikan'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tr. by Baron de Slane (4 vols, Paris: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Ibn Kutayba (1850) *Ibn Coteibas Hanbuch der Geschichte* [Kitāb al-ma'ārif], ed. by F. Wüstenfel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Ibn Miskawayh (1920–1) *The Experiences of the Nations* in *The Eclipse of the Abbasid Caliphate; Original Chronicles of the Fourth Islamic Century*, ed. by H. F. Amedroz and D. S. Margoliouth (6 vols, Oxford: Blackwell).
Ibn Muyassar (1919) *Annales d'Egypte* (*Akhbār Miṣr*) (ed. by H. Massé, Cairo: PIFAO).
Ibn Sa'd (1904–40) [*Kitāb al-tabakāt al-kubrā*] *Biographien Muhammeds, seiner Gefährten und der späteren Träger des Islams bis zum J. 230 der Flucht* (9 vols, ed. by E. Sachau *et al.*, Leiden Brill).
Ibn Sa'īd (1970) *Kitāb al-Djughrāfiyya* ed. by al-'Arabī (Beirut).
Idris, H. R. (1955) 'Deux maîtres de l'école juridique kairouanaise sous les Zīrīdes (XIe siècle): Abū Bakr b. 'Abd al-Raḥmān et Abū 'Imrān al-Fāsī', *AIEOA*, 13, pp. 30 60.
Idris, H. R. (1962) *La Berberie orientale sous les Zirides: 10e 12e siècle*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Idris, H. R. (1968a) 'De la réalité de la catastrophe hilalienne', *Annales ESC*, 13, 2, pp. 390–6.
Idris, H. R. (1968b) 'L'invasion hilalienne et ses conséquences', *CCM*, 11, pp. 353–71.
Idris, H. R. (1971) 'L'Occident musulman (Ifriqiya et al-Andalus) à l'avènement des Abbāsides d'après le chroniqueur zīrīde al-Raqīq', *REI*, 39, 2, pp. 109–91.
Idris, H. R. (1972) 'L'Ecole malikite de Mahdiya: l'Imām al-Mazārī' in *Etudes d'orientalisme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E. Lévi-Provençal*, Vol. 1, pp. 153–64.
al-Idrīsī (1866)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et de l'Espagne* (Arabic text and translation by R. Dozy and M. J. de Goeje, Leyden: Brill).
al-Idrīsī (1970) *Opus geographicum*, ed. by A. Bombaci *et al.* (Naples–Rome).
Igué, O. J. (1970 80)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civilisation Yoruba.* (Cotonou: Université Nationale du Bénin).
Ikime, O. (ed.) (1980) *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 (Ibadan: Heinemann).
Ingrams, W. H. (1931) *Zanzibar, its History and its People* (London: Witherby).
Inskeep, R. R. and Maggs, T. M. (1975) 'Unique art objects in the Iron Age of the Transvaal', *SAAB*, 30, 119–20, pp. 114–38.
al-Isfahānī, Abu 'l-Faradj (1868–9) *Kitāb al-Aghānī* (Būlāḳ).

Al-Iṣṭakhrī (1870) *Kitab masalik al-mamalik. Viae Regnorum* (ed. by M. J. de Goeje, Leiden: Brill).
Ivanow, W. (1942) *Ismaili Tradition Concerning the Rise of the Fatimids.* (London: OUP, Islamic Research Association Series, **10**).
Ivanow, W. (1952) *Brief Survey of the Evolution of Ismailism* (Leiden: Brill).

Jacques-Meunier, D. (1961) *Cités anciennes de Mauritanie* (Paris: Klincksieck).
Jakobielski, S. (1966a) 'La liste des évèques de Pakhoras', *Etudes et Travaux*, **1** (*CAMAP*, 3), pp. 151–70.
Jakobielski, S. (1966b) 'Two Coptic foundation stones from Faras'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Kazimierz Michalowski* (Warsaw: PWN), pp. 101–9.
Jakobielski, S. (1970)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1969' in E. Dinkler (ed.), pp. 171–80
Jakobielski, S. (1972) *Faras III: A History of the Bishopric of Pachoras on the basis of Coptic Inscriptions* (Warsaw: PWN).
Jakobielski, S. (1975)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1970–1972' in K. Michalowski (ed.), pp. 70–5.
Jakobielski, S. (1978)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1973–1974 seasons', *Etudes Nubiennes*, pp. 129–40.
Jakobielski, S. (1981) 'Nubian Christian architecture', *ZÄS*, 108, pp. 33–48.
Jakobielski, S. (1982a)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1976 and 1978'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116–26.
Jakobielski, S. (1982b) 'Portraits of the bishops of Faras'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127–42.
Jakobielski, S. (1982c)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hurches at Old Dongola' in P. van Moorsel (ed.), pp. 51–6.
Jakobielski, S. (1982d) 'Remarques sur la chronologie des peintures murales de Faras aux VIIIe et IXe siècles, *NC*, 1, pp. 142–72.
Jakobielski, S. and Krzyzaniak, L. (1967–8)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third season, December 1966–February 1967', *Kush*, **15**, pp. 143–64.
Jakobielski, S. and Ostrasz, A. (1967–8)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second season, December 1965–February 1966', *Kush*, **15**, pp. 125–42.
Jean de Nikiou (1883) *Chronique de Jean, Evêque de Nikiou*, ed. and tr. by H. Zotenberg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Jeffery, A. (1938) *The Foreign Vocabulary of the Qur'ān*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
Jeffreys, M. D. W. (1951) 'Neolithic stone implements (Bamenda, British Cameroons)', *BIFAN*, 13, 4, pp. 1203–17.
Jéquier, G. (1924) *Manuel d'archéologie égyptienne* (Paris: Picard).
Johnson, M. (1977) 'Cloth strips and archaeology', *WAJA*, 7, pp. 169–78.
Johnson, S. (1921) *The History of the Yoruba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British Protectorate* (London: Routledge).
Johnston, H. H. (1919–2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Bantu and Semi-Bantu Languages*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Joire, J. (1955) 'Découvertes archéologiques dans la région de Rao (Bas-Sénégal)', *BIFAN* (B), 17, 3–4, pp. 249–333.
Jones, A. (1981) 'Who were the Vai?', *JAH*, **22**, 2, pp. 159–78.
Jones, G. I. (1961) 'Ec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north-eastern Ibo', *Africa*, **31**, pp. 117–34.
Jones, G. I. (1963) *The Trading States of the Oil Rivers* (London: OUP).
Julien, C.-A. (1952)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Tunisie–Algérie–Maroc. De la conquête arabe à 1830* (Paris: Payot).
Julien, C.-A. (1970) *History of North Africa: Tunisa–Algeria–Morocco.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183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agabo, J. (1982) 'Les "Swahili" du Rwanda. Etude sur la formation d'une minorité islamisée' (Thèse de 3ème cycle, Paris: EHISS).
Kamal, Y. (1926–38)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Africae et Aegypti* (13 vols, Cairo/Leiden: Brill)
Kamisokho, W. (1975) 'L'empire du Mali' in *Premi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Bamako, 27 janvier–1 février 1975* (Fondation SCOA po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n Afrique noire).
Keenan, J. H. (1977) 'The Tuareg veil',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3, pp. 3–13.
Kendall, R. L. (1969)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Lake Victoria basin', *Ecological Monographs*, **39**, pp. 121–76.
Kent, R. K. (1970) *Early Kingdoms in Madagascar, 1500–170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Keswani, D. K. (1980) 'Influences culturelles et commerciales indiennes dans l'océan Indien, de l'Afrique et Madagascar à l'Asie du Sud-Est' in Unesco (1980), pp. 37 50.

Khalīf, Y. (1959) *Al-Shu'arā' al-ṣa 'ālīk fi'l 'aṣal-djāhili* (Cairo).

Khalis, S. (1966) *La vie littéraire à Seville au XIe siècle* (Paris: SNEA).

Khayar, I. H. (1976) *Le refus de l'école.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problèmes de l'éducation chez les musulmans de Ouaddai* (*Tchad*) (Paris: Maisonneuve).

al-Khuwārizmī (1926) *Das Kitāb Ṣūrat al-Arḍ des Abū Ga'far Muhammad ibn Mūsā al-Huwārizmī* ed. by Hans von Mžik (Leipzig: Harrassowitz).

Ki-Zerbo, J. (1978) *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Hatier)

Kiethega, J.-B. (1983) *L'or de la Volta Noire: exploitation traditionnelle,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Paris: Karthala).

Kimambo, I. N. (1969)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re of Tanzania*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Kirkman, J. S. (1954) *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London: OUP).

Kirkman, J. S. (1966) *Ungwana on the Tana* (The Hague: Mouton).

Kirwan, L. P. (1935) 'Notes on the topography of the Christian Nubian kingdoms', *JEA*, 21, pp. 57–62.

Kirwan, L. P. (1982) 'Some thoughts on the conversion of Nubia to Christianity'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142 5.

Kitāb al-Istibṣār (1852)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par un géographe arabe anonyme du VIe siècle de l'hégire* (Arabic text edited by M. Alfred Kramer, Vienna).

Kiyaga-Mulindwa, D. (1976) 'The earthworks of the Birim valley, southern Ghan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Kobishchanov, Y. M. (1962) 'Skazaniye o pokhode hadani Dan'ela' *NAA*, 6.

Kolodziejczyk, K. (1982) 'Some remarks on the Christian ceramics from Faras' *NC*, 1, pp. 173–89.

Konaré-Ba, A. (1977) *Sonni 'Ali Ber* (Niamey: IRSH, Etudes nigériennes, 40).

Kramers, J. H. (1954) 'L'Erythrée au Xe siècle' in *Analecta Orientalia*, (Leiden: Brill), Vol 1, pp. 159–72.

Krapf-Askari, E. (1969) *Yoruba Towns and Ci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rause, M. (1970) 'Zur Kirchen und Theologiegeschichte Nubiens' in E. Dinkler (ed.), pp. 71 86; the same reprinted as 'Neue Quellen und Probleme zur Kirchengeschichte Nubiens' in F. Altheim and R. Stiehl, *Christentum am Roten Meer*, Vol. 1 (Berlin New York: W. de Gruyter), pp. 510 15.

Krause, M. (1978) 'Bischof Johannes III von Faras und seine beiden Nachfolger. Noch einmal zum Probleme eines Konfessionswechsels in Faras' *Etudes Nubiennes*, pp. 153–64.

Kronenberg, A. and Kronenberg, W. (1965) 'Parallel cousin marriage in medieval and modern Nubia', *Kush*, 13, pp. 241–60.

Kropp-Dakubu, M. E. (1972) 'Linguistic pre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the Ga-Adangme migrations', *THSG*, 13, 1, pp. 87–111.

Kubbel, L. E. (1963) 'Iz istorii drevnego Mali', *AES*, 5, pp. 1–118.

Kubińska, J. (1974) *Faras IV: Inscriptions grecques chrétiennes* (Warsaw: PWN).

Kubińska, J. (1976) 'L'Ange Litakskuel en Nubie', *Le Muséon*, 89, pp. 451–5.

Kup, A. P. (1975) *Sierra Leone: A Concise History*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Kuper, A. (1982a) *Wives for Cattle: Bridewealth and Marriage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Kuper, A. (1982b) 'Lineage theory: a critical retrospect'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1, pp. 71–95.

Kuper, J. (ed.) (1977) *The Athropologist's Cookbook* (London: RAI).

Kuper, J. (ed.) (1981) *La Cuisine des ethnologues* (Paris: Berger-Levrault).

Kuper, R. (ed) (1978) *Sahara: 10.000 Jahre zwischen Weide und Wüste* (Köln. Museen der Stadt Köln).

Lacam, J. (1965) *Les Sarrasins dans le Haut Moyen âge français*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La Chapelle, F. de (1930)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Sahara occidental', *Hespéris*, 11, pp. 35–95.

Lacoste, Y. (1966) *Ibn Khaldoun. Naissance de l'histoire, passé du Tiers-Monde* (Paris: Maspéro).

Lacroix, P.-F. (1969) 'L'Ensemble songhay-djerma: problèmes et thèmes de travail', *AUA*, Série H, pp. 87-99.

Laforgue, P. (1940) 'Notes sur Aoudaghost, ancienne capitale des Berbères Lemtouna', *BIFAN*, 2, pp. 217 36.

Lagardère, V. (1976) 'Les Almoravides jusqu'au règne de Yūsuf b. Tāshfīn (430/1039–500/1106)' (Thèse de doctorat de 3eme cycle, Université de Bordeaux, III).

Lagardère, V. (1978) 'Le gouvernement des villes et la suprématie des Banū Turğūt au Maroc et en Andalus', *ROMM*, 25, pp. 49–65.
Lagardère, V. (1979) 'Esquisse de l'organisation des Mūrabiṭūn à l'epoque de Yūsuf b. Tašfin (430–1039/500–1106)', *ROMM*, 27, pp. 99–114.
Lagardère, V. (1981) 'L'unification du malékisme oriental et occidental à Alexandrie: Abū Bakr aṭ-Ṭurṭūšī', *ROMM*, 31, pp. 47–62.
Lagardère, V. (1983) 'La Tariqa et la révolte des Murīdūn en 539/1144 en Andalus', *ROMM*, 35, pp. 157–70.
Lambert, N. (1971) 'Les industries sur cuivre dans l'Ouest saharien', *WAJA*, 1, pp. 9–21.
Lammens, H. (1916) 'Les "Aḥabīš" et l'organisation militaire de La Mecque au siècle de l'Hégire, *JA*, 8, pp. 425–82.
Lamp, F. (1979) *African Art of the West Atlantic Coast: Transition in Form and Content* (New York: L. Kahen Gallery).
Lange, D. (1977) *Le Dīwān des sultans du [Kānem-]Bornu: chronologie et histoire d'un royaume africain (de la fin du Xe siecle jusqu'à 1808)* (Wiesbaden: Steiner).
Lange, D. (1978) 'Progrès de l'Islam et changement politique au Kānem du XIe au XIIIe siècle: un essai d'interprétation', *JAH*, 19, 4, pp. 495–513.
Lange, D. (1979a) 'Un texte de Maqrīzī sur les "races des Sūdān"', *AI*, 15, pp. 187–209.
Lange, D. (1979b) 'Les lieux de sépulture des rois sēfuwa (Kānem-Bornū): textes écrits et traditions orales', *Paideuma*, 25, pp. 145–57.
Lange, D. (1980) 'La région du lac Tchad d'après la Géographie d'Ibn Sa'īd. Texte et cartes', *AI*, 16, pp. 149–81.
Lange, D. (1982a), 'L'éviction des Séfuwa du Kānem et l'origine des Bulāla', *JAH*, 23, 3, pp. 315–31.
Lange, D. (1982b) 'L'Alun du Kawār: une exportation africaine en Europe', *Cahiers du CRA*, 2.
Lange, D. and Berthoud, S. (1977) 'Al-Qaṣaba et d'autres villes de la route centrale du Sahara', *Paideuma*, 23, pp. 19–40.
Largeau, V. (1879) *Le Pays de Rirha, Ouargla. Voyage à Rhadamès* (Paris: Hachette).
Laroui, A. (1970) *L'histoire du Maghreb: un essai de synthèse* (Paris: Maspéro).
Laroui, A. (1977)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Princeton: PUP).
Lathrap, D. W. (1973) 'The antiquity and importance of long distance trade relationships in the moist tropics of pre-Columbian South America', *WA*, 5, 2, pp. 170–86.
Launois, A. (1964) 'Influence des docteurs malékites sur le monnayage ziride de type sunnite et sur celui des Almoravides', *Arabica*, 11, pp. 127–50.
Launois, A. (1967) 'Sur un dinar almoravide en *nashī*', *Arabica*, 14, pp. 60–75.
Lavers, J. E. (1974) 'Islam in the Bornu Caliphate: a survey', *Odu*, 5, pp. 27–53.
Lavers, J. E. (1980) 'Kanem and Borno to 1808' in O. Ikime (ed.), pp. 187–209.
Law, R. C. C. (1967a) 'Contacts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civilisations and West Africa in pre-Islamic times', *LNR*, 1, 1, pp. 52–62.
Law, R. C. C. (1967b) 'The Garamantes and trans-Saharan enterprise in classical times', *JAH*, 8, 2, pp. 181–200.
Lawal, B. (1973) 'Dating problems at Igbo-Ukwu', *JAH*, 14, 1, pp. 1–8.
Lebeuf, A. and Lebeuf, J.-P. (1970) 'Datations au C14 de sites Sao (Cameroun et Tchad)', *NA*, 128, pp. 105–6.
Lebeuf, A. M. D. and Paques, V. (1970) *Archéologie malienne* (Paris: Catalogues du Musée de l'Homme, série C, Afrique Noire, 1).
Lebeuf, J.-P. (1962) *Archéologie tchadienne: les Sao du Cameroun et du Tchad* (Paris: Hermann).
Lebeuf, J.-P. (1981) 'Travaux archéologiques dans les basses vallées du Chari et du Logone (1963–1980)', *C-RAI*, pp. 636–56.
Lebeuf, J.-P. and Detourbet, A. M. (1950) *La civilisation du Tchad* (Paris: Payot).
Lebeuf, J.-P. and Lebeuf, A. (1977) *Les Arts des Sao: Cameroun, Tchad, Nigeria* (Paris: Chêne).
Lebeuf, J.-P., Lebeuf, A. M. D., Treinen-Claustre, F. and Courtin, J. (1980) *Le gisement sao de Magda-Fouilles 1960–68 (Tchad)* (Paris: Société d'ethnographie).
Leclant, J. (1958–74) 'Fouilles et travaux en Egypte et au Soudan' *Orientalia*, 27–43.
Leclant, J. (1975–83) 'Fouilles et travaux en Egypte et au Soudan', *Orientalia*, 44–52.
Leclant, J. (1976) 'L'Egypte, terre d'Afrique dans le monde gréco-romain' in J. Vercoutter *et al.* (eds), Vol. 1, pp. 269–85.
Leclant, J. and Huard, P. (1980) *La culture des chasseurs du Nil et du Sahara* (Algiers: SNED, Mémoires du CRAPE, 29, 1 and 2).
Leclant, J. and Leroy, J. (1968) 'Nubien' in *Propylaen Kunstgeschichte (Byzanz und Christlichen Osten)*, 3 (Berlin), pp. 361–6.

Leo Africanus [Jean Léon l'Africain] (1956)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tr. A. Epaulard, with notes by A. Epaulard, T. Monod, H. Lhote and R. Mauny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Lepage, C. (1972) 'L'église rupestre de Berakit', *AE*, 9, pp. 147–92.
Lepage, C. (1973) 'L'église de Zaréma (Ethiopie)', *C-RAI*, pp. 416–54.
Leroy, J. (1968) 'Un nouvel évangéliaire éthiopien illustré du Monastère d'Abba Garima in *Synthronon. Art et Archéologie de la fin de l'Antiquité et du Moyen âge* (Paris: Klincksieck), pp. 75–87.
Le Rouvreur, A. (1962) *Sahéliens et Sahariens du Tchad* (Paris: Berger-Levrault).
Lespinay, C. de (1981) 'Le chameau et l'histoire de l'Afrique pré-islamique. Approche critique des sources' (Mémoire de maitris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Lessard, J.-M. (1969) 'Sijilmassa: la ville et s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au XIe siècle d'après al-Bakrī', *HT*, 10, pp. 5–37.
Le Tourneau, R. (1949), *Fès avant le protectorat* (Casablanca: SMLE).
Le Tourneau, R. (1954) 'La révolte d'Abu Yazid au Xe siecle', *CT*, 2, pp. 103–25.
Le Tourneau, R. (1958) 'Barghawāta' in B. Lewis *et al.* (eds), pp. 1043–5.
Lévi-Provençal, E. (1928) *Documents inédits d'histoire almohade* (Paris: Geuthner).
Lévi-Provençal, E. (1938) 'La Fondation de Fès', *AIEOA*, 4.
Lévi-Provençal, E. (1948) 'Réflexion sur l'empire almoravide au début du XIIe siècle' in Lévi-Provençal, *Islam d'Occident; é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Paris: Maisonneuve), pp. 240–56.
Lévi-Provençal, E. (1950–3) *Histoire de l'Espagne musulmane* (3 vols, Paris-Leiden: Brill).
Lévi-Provençal, E. (1954a) 'Un nouveau récit de la conquête de l'Afrique du Nord par les Arabes', *Arabica*, 1.
Lévi-Provençal, E. (1954b) 'Un nuevo documento sobre la conquista de Norte de Africa por los árabes', *Revista de Instituto Egipcio de Estudios Islamicos en Madrid*, 2, 1–2, pp. 169, 193–239.
Lévi-Provençal, E. (1955) 'Le titre souverain des Almoravides et sa légitimation par le califat abbaside', *Arabica*, 2, pp. 266–88.
Lévi-Provençal, E. (1957) 'La fondation de Marrakech (462/1070)', *MHAOM*, 2, pp. 117–20.
Lévi-Provençal, E. (1960a) ''Abd al-Raḥman b. Ḥabīb b. Ḥabīb b. Abi 'Ubayda' in H. A. R. Gibb *et al.* (eds), p. 86.
Lévi-Provençal, E. (1960b) 'Abu 'Ubayd al-Bakrī' in H. A. R. Gibb *et al.* (eds), pp. 155–7.
Lévi-Provençal, E., Garcia-Gomez, E. and Oliver Asín, J. (1950) 'Novedades sobre la batalla llamada de al-Zallāqa', *Al-Andalus*, 15, pp. 111–55.
Levtzion, N. (1968a) 'Ibn Ḥawqal, the cheque and Awdaghost', *JAH*, 9, 2, pp. 223–33.
Levtzion, N. (1968b) *Muslims and Chiefs in West Africa. A Study of Islam in the Middle Volta Basin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evtzion, N. (1973) *Ancient Ghana and Mali* (London: Methuen).
Levtzion, N. (1978) 'The Sahara and the Sudan from the Arab conquest of the Maghrib to the rise of the Almoravids' in J. D. Fage (ed.), pp. 637–84.
Levtzion, N. (1979) ''Abd Allāh b. Yāsīn and the Amoravids' in J. R. Willis (ed.), pp. 78–112.
Levtzion, N. (1981) 'Ancient Ghana: a reassessment of some Arabic sources', in *(Le)Sol, la Parole et l'Ecrit*, Vol. 1, pp. 429–37.
Levtzion, N. and Hopkins, J. F. P. (eds) (1981) *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CUP).
Levy, R. (1957)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slam* (Cambridge: CUP).
Lewicki, T. (1939) 'Sur l'oasis de Ṣbrū (Ḍbr, Shbrū) des géographes arabes', *RA*, 378, pp. 45–64.
Lewicki, T. (1951–2) 'Une langue romane oubliée de l'Afrique du Nord. Observations d'un arabisant', *RO*, 17, pp. 415–80.
Lewicki, T. (1955) *Etudes ibāḍites nord-africaines. Partie I* (Warszawa: PWN).
Lewicki, T. (1957) 'La répartition géographique des groupements ibāḍites dans l'Afrique du Nord au Moyen âge', *RO*, 21, pp. 301–43.
Lewicki, T. (1959) 'A propos d'une liste de tribus berbères d'Ibn Ḥawḳal', *FO*, 1, pp. 128–35.
Lewicki, T. (1960) 'Quelques extraits inédits relatifs aux voyages des commerçants et des missionnaires ibāḍites nord-africains occidental au Moyen âge', *FO*, 2, pp. 1–27.
Lewicki, T. (1962) 'L'état nord-africain de Tāhert et ses relations avec le Soudan occidental à la fin du VIIIe et au IXe siècle', *CEA*, 4, 8, pp. 513–35.
Lewicki, T. (1964) 'Traits d'histoire du commerce saharien: marchands et missionnaires ibādites au Soudan occidental et central au cours des VIIIe–IXe siècles', *Ethnografia Polska*, 8, pp. 291–311.
Lewicki, T. (1965a) 'Animal husbandry among medieval agricultural people of Western and Middle Sudan (according to Arab sources)', *Acta Ethnographic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4, 1–2, pp. 165–78.
Lewicki, T. (1965b) 'L'Afrique noire dans le 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 d'Abū 'Ubayd al-Bakrī (XIe siècle)', *AB*, 2, pp. 9–14.

Lewicki, T. (1965c) 'A propos du nom de l'oasis de Koufra chez les géographes arabes du XIe et du XIIIe siècle', *JAH*, 6, 3, pp. 295–306.
Lewicki, T. (1965d) 'Prophètes, devins et magiciens chez les Berbères médiévaux', *FO*, 7, pp. 3–27.
Lewicki, T. (1966) 'A propos de la génèse de *Nuzhat al-Mūštāq fi-Istirāq al-āfāq* d'al-Idrisi', *Studi Maghrebini*, 1, pp. 41–55.
Lewicki, T. (1967a) 'Les ecrivains arabes du Moyen âge au sujet des mines de pierres précieuses et de pierres fines en territoire africain et de leur exploitation', *AB*, 7, pp. 49–67.
Lewicki, T. (1967b) 'Arab trade in negro slaves up to the end of the XVIth century', *AB*, 6, pp. 109–11.
Lewicki, T. (1969) *Arabic Externa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Africa to the South of Sahara* (Wroclaw-Warszawa-Kraków).
Lewicki, T. (1970) 'Les origines de l'islam dans les tribus berbères du Sahara occidental: Mūsā ibn Nuṣayr et 'Ubayd Allāh ibn al-Ḥabhāb', *SI*, 32, pp. 203–14.
Lewicki, T. (1971a) 'Un état soudanais médiéval inconnu: le royaume de Zāfūn(u)', *CEA*, 11, 44, pp. 501–25.
Lewicki, T. (1971b) 'Al-Ibāḍiyya' in B. Lewis *et al.* (eds), pp. 648–60.
Lewicki, T. (1973) 'Le monde berbère vu par les écrivains arabes du Moyen âge' in *Actes du Premier Congrès d'Études des cultures méditerranéennes d'influence arabo-berbère* (*Algiers: SNED*), pp. 31–42.
Lewicki, T. (1974) *West African Food in the Middle Ages according to Arabic Sources* (Cambridge: CUP).
Lewicki, T. (1976) *Études maghrébines et soudanaises* (Warsaw: Editions Scientifiques de Pologne).
Lewicki, T. (1977) 'L'exploitation et le commerce de l'or en Afrique de l'Est et du Sud-Est au Moyen âge d'après les sources arabes', *FO*, 18, pp. 167–86.
Lewicki, T. (1978) 'L'Origine nord-africaine des Bafour' in *Actes du Deux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Cultu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Occidentale*, 2 (Algiers: SNED), pp. 145–53.
Lewicki, T. (1981) 'Les origines et l'islamisation de la ville de Tādmakka d'après les sources arabes'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Vol. 1, pp. 439–44.
Lewis, A. R. (1951) *Naval Power and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A.D. 500–1100* (Princeton: PUP).
Lewis, B. (1940) *The Origins of Isma'ilism* (Cambridge: CUP).
Lewis, B. (1950) *The Arabs in History* (London: Hutchinson).
Lewis, B. (1971) *Race and Color in Islam* (New York: Harper & Row).
Lewis, B. (1982) *Race et couleur en pays d'Islam* (Paris: Payot).
Lewis, B., Pellat, C. and Schacht, J. (eds) (1958, 1965)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n, Vol. 1 (1958); Vol. 2 (1965) (Leiden/London: Brill/Luzac).
Lewis, B., Ménage, V. L., Pellat, C. and Schacht, J. (eds) (1971) *The Encyclopedia of Islam*, new edn, Vol. 3 (Leiden/London: Brill/Luzac).
Lewis, I. M. (ed.) (1966)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UP).
Lewis, I. M. (1974) 'Islamic frontiers in Africa and Asia: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in J. Schacht and C. E. Bosworth (eds) (1974), pp. 105–15.
Lhote, H. (1955) *Les Touaregs du Hoggar* (Paris: Payot).
Lhote, H. (1955–6)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Touaregs soudanais', *BIFAN*, 17, pp. 334–70; 18, pp. 391–407.
Lhote, H. (1972a) 'Recherches sur Takedda, ville décrite par le voyageur arabe Ibn Battouta, et située en Aïr', *BIFAN*, (B), 34, 3, pp. 429–70.
Lhote, H. (1972b) 'Une étonnante découverte archéologique au Niger', *Archéologia*, 5, pp. 63–7.
Liesegang, G. (1975) 'Mounds and graves near Famanougou, Mali', *Nyame Akuma*, 7, pp. 27–8.
Linares de Sapir, O. (1971) 'Shell middens of Lower Casamance and problems of Diola protohistory', *WAJA*, 1, pp. 23–54.
Lister, F. C. (1967) *Ceramic Studies of the Historic Periods in Ancient Nubia*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Anthropological Paper, 8, Nubian series, 2).
Littman, E. (1913) *Deutsche Aksum-Expedition, Vol. 4, Sabaische, Griechische und Abbessinische Inschriften* (Berlin: Reimer).
Livingstone, F. B. (1958)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sickle cell gene distribution in West Africa', *AA*, 60, 3, pp. 533–62.
Lockhart, L. (1960) 'Al-Ahwāz' in H. A. R. Gibb *et al* (eds) p. 305.
Loir, H. (1935) *Le tissage du raphia au Congo belge* (Tervuren: Musée du Congo Belge)
Lombard, J. and Mauny, R. (1954) 'Azelik et la question de Takedda', *NA*, 10, 64, pp. 99–101
Lombard, M. (1947) 'Les bases monétaires d'une suprématie économique: l'or musulman du VIIe au XIe siècle', *Annales ESC*, 2, pp. 143–60.
Lombard, M. (1971a) *Monnaie et Histoire d'Alexandre à Mahomet* (Paris: Mouton).
Lombard, M. (1971b) *L'Islam dans sa première grandeur* (*VIIIe–XIe siècle*) (Paris: Flammarion).

Lombard, M. (1978) *Les Textiles dans le monde musulman du VIIIe au XIIe siècle.* (Paris and The Hague: Mouton).
Long, R. (197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Northern Mande language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Loubser, J. H. N. (1981) 'Ndebele archaeology of the Pietersburg area'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Louhichi, A. (1984) 'La céramique musulmane d'origine médiévale importée à Tegdaoust. Etude archéologique; étude de laboratoire' (Thèse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Lucas, A. J. (1931) 'Considération sur l'ethnique maure et en particulier sur une race ancienne: les Bafour', *JSA*, 1, pp. 151–94.
Lucchesi-Falli, E. (1982) 'Some parallels to the figure of St. Mercurius at Faras'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162–9.
Lukaszewicz, A. (1978) 'Quelques remarques sur un saint anachorète de Faras', *Etudes et Travaux*, 10, (*CAMAP*, 20) pp. 355–62.
Lukaszewicz, A. (1982) 'En marge d'une image de l'anachorète Aaron dans la cathédrale de Faras', *NC*, 1, pp. 192–213.
Lwanga-Lunyiigo, S. (1976) 'The Bantu problem reconsidered', *Current Anthropology*, 17, 2, pp. 282–6

Mabogunje, A. L. (1962) *Yoruba Towns*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Mabogunje, A. L. (1971) 'The Land and Peoples of West Africa'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1971) Vol. 1, pp. 1–32.
McCall, D. F. (1971) 'The cultural map and time profile of the Mande speaking peoples' in C. T. Hodge (ed.).
MacGaffey, W. (1966) 'Concepts of rac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north-east Africa', *JAH*, 7, 1, pp. 1–17.
McIntosh, R. J. (1974) 'Archaeology and mud wall decay in a West African village', *WA*, 6, 2, pp. 154–71.
McIntosh, R. (1976) 'Finding lost walls on archaeological sites. The Hani model', *Sankofa*, 2, pp. 45–53.
McIntosh, R. J.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sm in West Africa: the example of Jenne, Mali' (unpublished PhD the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McIntosh, R. J. and McIntosh, S. K. (1979) 'Terra cotta statuettes from Mali', *African Arts*, 12, 2, pp. 51–3, 91.
McIntosh, R. J. and McIntosh S. K. (1981) 'The Inland Niger Delta before the empire of Mali: evidence from Jenne-Jeno', *JAH*, 22, 1, pp. 1–22.
McIntosh, S. K. (1979)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terra incognita*: excavation at Jenne-Jeno (Mali)'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McIntosh, S. K. (1981) 'A reconsideration of Wangara/Palolus, Island of Gold', *JAH*, 22, 1, pp. 145–58.
McIntosh, S. K. and McIntosh R. J. (1980a) 'Jenne-Jeno: an ancient African city', *Archaeology*, 33, 1, pp. 8–14.
McIntosh, S. K. and McIntosh, R. J. (1980b) *Prehistoric Investigations in the Region of Jenne (Mali)* (2 vols, Oxford: BAR, Cambridge Monographs in African Archaeology, 2).
McIntosh, S. K. and McIntosh, R. J. (1981) 'West African prehistory', *American Scientist*, 69, 6, pp. 602–13.
Mack, J. and Robertshaw, P. (eds) (1982) *Culture History in the Southern Sudan, Archeology, Linguistics, Ethnohistory.*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Madelung, W. (1961) 'Das Imamat in der frühen ismailitischen Lehre', *Der Islam*, 37, pp. 43–135.
Mādjid, 'Abd al-Mun'im (1968) *Zuhūr khilafāt at-Fātimiyyīn wa sukūtuhā.* (Cairo).
Maggs, T. M. (1976) *Iron Age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Highveld* (Pietermaritzburg: Natal Museum, Occ. Publ. Natal Museum, 2).
Maggs, T. M. (1980a) 'The Iron Age sequence south of the Vaal and Pongola rivers: som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JAH*, 21, 1, pp. 1–15.
Maggs, T. M. (1980b) 'Mzonjani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Iron Age in Natal', *ANM*, 24, 1, pp. 71–96.
Maggs, T. M. and Michael, M. A. (1976) 'Ntshekane: an Early Iron Age site in the Tugela Basin, Natal', *ANM*, 22, 3, pp. 705–40.
Mahjoubi, A. (1966) 'Nouveau témoignage épigraphique sur la communauté chrétienne de Kairouan au XIe siècle' *Africa* (INAA), 1, pp. 85–104.
al-Makkarī (1840–3)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tr. by P. de Gayangos (2 vols, London: W. H. Allen).

al-Makkarī (1855-1861) *Analectes sur l'histoire et la littérature des Arches d'Espagne* (2 vols, ed. by R. Dozy, G. Duget, L. Krehl et W. Wright, Leiden: Brill).
al-Makkarī (1969) *Kitāb Nafḥ al Tīb* (2 vols, Ed. Iḥsān 'Abbās, Beyrūt).
Maley, J. (1981) *Etudes palynologiques dans le bassin du Tchad et paléoclimatologie de l'Afrique nord-tropicale de 30.000 ans à l'époque actuelle.* (Paris: ORSTOM).
al-Mālikī (1951) *Riyāḍ al-Nufūs*, Vol. 1 (ed. H. Mu'nis: Kahira).
Malmusi, B. (1895) *Lapidi della necropoli musulmana di Dahlak* (Modena: Società tipografica).
Malowist, M. (1966) 'Le commerce d'or et d'esclaves au Soudan occidental' *AB*, 4, pp. 49-72.
Mamour, P. H. (1934) *Polemics on the Origin of the Fatimi Caliphs* (London: Luzac).
Manguin, P.-Y. (1972) *Les Portugais sur les côtes du Viet nam et du Campa. Etude sur les routes maritimes et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d'aprè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XVIe-XVIIIe siècles)* (Paris: EFEO).
Manguin, P.-Y. (1979) 'The South-East Asian trading ship. An historical approach' in ICIOS, 5. *The History of Commercial Exchange and Maritime History* (Perth).
Mantran, R. (1969) *L'expansion musulmane VIIe-XIe siècle* (Paris: PUF).
Marçais, G. (1946) *La Berbérie musulmane et l'Orient au Moyen-Age* (Paris: Aubier).
Marçais, G. (1953) 'Sîdî Ukba, Abû l-Muhâdjir et Kusaila', *CT*, 1, pp. 11-17.
Marçais, W. (1938) 'Comment l'Afrique du Nord a été arabisée', *AIEOA*, 4, pp. 1-22.
Maret, P. de (1975) 'A carbon-14 date from Zaire', *Antiquity*, 49, pp. 133-7.
Maret, P. de (1977) 'Sanga: new excavations, more data and more related problems', *JAH*, 18, 3, pp. 321-37.
Maret, P. de (1977-8) 'Chronologie de l'âge du fer dans la dépression de l'Upembe en République du Zaire' (3 vols, Brussels: unpublished Thèse de Doctorat).
Maret, P. de (1979) 'Luba roots: the first complete Iron Age sequence in Zaire' *Current Anthropology*, 20, pp. 233-5.
Maret, P. de (1980) 'Les trop fameux pots à fossette ... du Kasai' *Africa-Tervuren*, 26, pp. 4-12.
Maret, P. de (1981) 'L'évolution monétaire du Shaba central entre le VIIe et le XVIIIe siècle', *AEH*, 10, pp. 117-49.
Maret, P. de and Nsuka, F. (1977) 'History of Bantu metallurgy: some linguistic aspects', *HA*, 4, pp. 43-66.
Marquart, J. (1913) *Die Benin-Sammlung des Reichs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in Leiden* (Leiden: Brill).
Martens, M. (1972) 'Observations sur la composition du visage dans les peintures de Fara, VIIIe-IXe siècles', *Etudes et Travaux*, 6 (*CAMAP*, 13), pp. 207-50.
Martens, M. (1973) 'Observations sur la composition du visage dans les peintures de Faras, IXe-XIIe siècles', *Etudes et Travaux*, 8 (*CAMAP*, 14), pp. 163-226.
Martens-Czarnecka, M. (1982a) *Faras VII. Les éléments décoratifs sur les peintures de la cathédrale de Faras* (Warsaw: PWN).
Martens-Czarnecka, M. (1982b) 'Remarques sur les motifs décoratifs des peintures de la cathédrale de Faras'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170-8.
Martens-Czarnecka, M. (1982c) 'General results of using decorative ornaments and motifs on Faras murals as a criterion for their dating' *NC*, 1, pp. 214-22.
Martens-Czarnecka, M. (1982d) 'Influences extérieures dans l'art nubien', *AB*, 31, pp. 59-73.
Martin, B. G. (1969) 'Kanem Bornu and the Fazzā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trade route.' *JAH*, 10, 1, pp. 15-27.
Martin, B. G. (1974) 'Arab migrations to East Africa in medieval times', *IJAHS*, 7, 3, pp. 367-90.
Martin, P. (1970) 'The trade of Loango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R. Gray and D. Birmingham (eds), pp. 138-61.
Martin, V. and Becker, C. (1974a) *Répertoire des sites protohistoriques du Sénégal et de la Gambie* (Kaolack).
Martin, V. and Becker, C. (1974b) 'Vestiges protohistoriques et occupation humaine au Sénégal',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pp. 403-29.
Martin del Molino, A. L. (1965) *Secuencia cultural en el neolitico de Fernando Po* (Madrid: Trabajos de Prehistoria del Seminario de Historia Primitiva del Hombre de la Universidad de Madrid y del Instituto Español de Prehistoria del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 17).
Mason, M. (1973) 'Captive and client labour and the economy of the Bida emirate, 1857-1901', *JAH*, 14, 3, pp. 453-71.
Mason, R. J. (1968) 'Transvaal and Natal Iron Age settlements revealed by aerial photography and excavation', *AS*, 27, 4, pp. 1-14.
Mason, R. J. (1969) *Prehistory of the Transvaal: A Record of Human Activity*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Mason, R. J. (1974) 'Background to the Transvaal Iron Age – new discoveries at Olifantspoort and Broederstroom', *JSAIMM*, 74, 6, pp. 211–16.
Maspéro, G. (1928) *Le royaume de Champa* (Paris-Brussels. G. Van Oest).
Massé, H. (1966) *L'Islam* (Paris: A. Colin, 9th edn.).
Massignon, L. (1929) 'Zandj' in M. T. Houtsma *et al.* (eds), p. 1213.
al-Mas'ūdī (1861–77) *Les Prairies d'or*, ed. and tr. by C. Barbier de Meynard et P. de Courteille (9 vol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al-Mas'ūdī (1962–5) *Les Prairies d'or*, tr. by C. Pellat (Paris).
al-Mas'ūdī (1964) *Muru' al-Dhahab wa ma'ādin al Djawhar*, ed. by M. Abdulhamid (4 vols, Cairo).
Mathew, G. (1963) 'The East African coast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pp. 94–128.
Matthews, D. and Mordini, A. (1959) 'The monastery of Debra Damo, Ethiopia', *Archaeologia*, 97, pp. 1–58.
Matveyev, V. V. (1960) *Northern Boundaries of the Eastern Bantu (Zinj) in the Tenth Century, According to Arab Sources* (Moscow: Oriental Institute).
Mauny, R. (1951) 'Etat actuel de la question de Ghana' *BIFAN*, 13, pp. 463–75.
Mauny, R. (1955a) 'Notes d'histoire et d'archéologie sur Azougui, Chinguetti et Ouadane', *BIFAN* (B), 17, pp. 142–62.
Mauny, R. (1955b) 'Disques énigmatiques de poterie', *NA*, 68, p. 17.
Mauny, R. (1961) *Tableau géographiqu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 Age d'après les sources écrites, la tradition, l'archéologie* (Dakar: IFAN).
Mauny, R. (1965) 'The Wakwak and the Indonesian invasion in East Africa in 945 AD', *Studia* (Lisbon), pp. 7–16.
Mauny, R. (1970) *Les siècles obscurs de l'Afrique noire: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Paris: Fayard).
Mauny, R. (1973) 'Notes bibliographiques', *BIFAN*, (B), 35, 3, pp. 759–66.
Mauny, R. (1978) 'Trans-Saharan contacts and the Iron Age in West Africa' in J. D. Fage (ed.), pp. 272–341.
al-Māwardī (1922) *Al-ahkām al-sulṭāniyya* (Cairo).
Maxwell, R. J. (1932) 'The law relating to slavery among the Malays',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0, 1, p. 254.
Medeiros, F. de (1973) 'Recherches sur l'image des noir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13–15e siècles'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Paris).
Meeussen, A. E. (1969) *Bantu Lexical Reconstructions* (Tervuren, stenciled).
Meier, F. (1981) 'Almoraviden und Marabute', *Die Welt des Islams* (ns), 21, pp. 80–163.
Meillassoux, C. (ed.)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ondon: OUP for IAI).
Meillassoux, C. (ed.) (1975) *L'esclavage en Afrique précoloniale* (Paris: Maspéro).
Meinardus, O. (1967) 'The Christian kingdoms of Nubia', *Nubia, Cahiers d'Histoire Égyptienne*, 10, pp. 133–64.
Meinhof, C. (1899) *Grundriss einer Lautlehre der Bantusprachen* (Leipzig: Brockhaus).
Meinhof, C. (1906) *Grundzüge einer vergleichenden der Grammatik der Bantusprachen* (Berlin: Reimer).
Mekouria, T. T. (1959) *History of Ethiopia: Axum-Zagwé* (in Amharic, Addis Ababa).
Mendelsohn, I. (1949) *Slaver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New York: OUP).
Mercier, E. (1888–91) *Histoire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Berbéri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à la conquête française* (3 vols, Paris: Leroux).
Mercier, P. (1970) 'Guinée centrale et orientale' in H. Deschamps (ed.), Vol. 1.
Merwe, N. J. Van Der (1980) 'The advent of iron in Africa' in T. A. Wertime and J. D. Muhly (eds), pp. 463–506.
Messier, R. A. K. (1974) 'The Almoravids: West African gold and the gold currency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JESHO*, 17, 1, pp. 31–47.
Messier, R. A. (1980)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lmoravid dinars', *JESHO*, 23, pp. 102–18.
Metcalf, D. M. (1972) 'Analyses of the metal contents of medieval coins, methods of chemical and metallurgical investigation of ancient coinag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 8, pp. 383–434.
Metzger, B. M. (1968)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Nubia and the Old Nubian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Pagan, Jewish and Christian* (Grand Rapids, Michigan), pp. 111–22.
Meunié, J. and Allain, C. (1956) 'La forteresse almoravide de Zagora', *Hesperis*, 53, pp. 305–23.
Meunié, J. and Terrasse, H. (1952)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Marrakech*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Meyer, A. (1980) ''n Interpretasie van die Greefswald potwerk'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Pretoria).
Mez, A. (1922) *Die Renaissance des Islams* (Heidelberg: C. Winter).
Michałowski, K. (1962) *Faras, Vol. 1, Fouilles Polonaises 1961* (Warsaw: PWN).
Michałowski, K. (1964a) 'Polish Excavations at Faras, 1962–63', *Kush*, **12**, pp. 195–207.
Michałowski, K. (1964b) 'Die wichtigsten Entwicklungsetappen der Wandmalerei in Faras' in K. Wessel (ed.), pp. 79–94.
Michałowski, K. (1965a) 'La Nubie chrétienne', *AB*, 3, pp. 9–25.
Michałowski, K. (1965b) 'Polish excavations at Faras, fourth season, 1963–64', *Kush*, **13**, pp. 177–89.
Michałowski, K. (1965c) *Faras, Vol. 2, Fouilles Polonaises 1961–1962* (Warsaw: PWN).
Michałowski, K. (1966a) 'Polish excavations at Old Dongola: first season, November–December 1964', *Kush*, **14**, pp. 289–99.
Michałowski, K. (1966b) *Faras, centre artistique de la Nubie chrétienne* (Leiden: Instituut vor het Nabije Oosten).
Michałowski, K. (1967) *Faras, die Kathedrale aus dem Wüstensand* (Einsiedeln, Zurich, Cologne: Benzinger Verlag).
Michałowski, K. (1970) 'Open problems of Nub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light of the discoveries at Faras' in E. Dinkler (ed.) (1970), pp. 11–20.
Michałowski, K. (1974) *Faras, Wall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 (Warsaw: Wydawnictwo Artystyczno–Graficzne).
Michałowski, K. (ed.) (1975) *Nubia – récentes recherches. Actes du Colloque Nubiologique International au Musée National de Varsovie, 19–22 juin 1972* (Warsaw: National Museum).
Michalowski, K. (1979) 'Faras,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discovery', in F. Hintze (ed.) *Africa in Antiquity – the Arts of Ancient Nubia and the Sudan,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xhibition, Brooklyn, September 29–October 1, 1978, Meroitica*, 5 (Berlin: Humboldt-Universität), pp. 31–9.
Migne, J.-P. (ed.) (1844–64) *Patrologiæ cursus completus, series Latina* (Paris).
Mileham, G. (1910) *Churches in Lower Nub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Miller, J. C. (1976) *Kings and Kinsmen: Early Mbundu States in Angola* (London: OUP).
Miller, J. I. (1969) *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C to AD 64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iller, S. F. (1969) 'Contacts between the Later Stone Age and the Early Iron Age in Southern Central Africa', *Azania*, 4, pp. 81–90.
Millet, N. B. (1964) 'Gebel Adda. Preliminary Report, 1963–64', *JARCE*, **3**, pp. 5–14.
Millet, N. B. (1967) 'Gebel Adda. Preliminary Report, 1965–1966', *JARCE*, **6**, pp. 53–63.
Mills, E. A. C. and Filmer, N. T. (1972) 'Chondwe Iron Age site, Ndola, Zambia', *Azania*, 7, pp. 129–47.
Miquel, A. (1975) *La géographie humaine du monde musulman jusqu'au milieu du XIe siècle* (Paris: Mouton).
Miquel, A. (1977) *L'Islam et sa civilisation, VIIe–XXe siècles* (Paris: A. Colin).
Miskawaih (1914) *Tadjārib al-umam* (Cairo).
Mlaker, K. (1927) 'Die Inschrift von Ḥuṣn Ghurāb', *WZKM*, **34**, pp. 54–75.
Moberg, A. (1924) *The Book of the Himyarites. Fragments of a Hitherto Unknown Syriac Book* (Lund: Gleerup).
Modat, C. (1919) 'Les populations primitives de l'Adrar mauritanien', *BCEHS*, 4, pp. 372–91.
Möhlig, W. J., Rottland, F. and Heine, B. (eds) (1977) *Zur Sprachgeschichte und Ethnohistorie in Afrika* (Berlin: Reimer).
Mollat, M. (1971) 'Les relations de l'Afrique de l'Est avec l'Asie: essai de position de quelques problèmes historiques', *CHM*, 13, 2, pp. 291–316.
Mollat, M. (ed.) (1979) *Mouvements de populations dans l'Océan Indien* (Paris: Champion).
Monès, H. (1947) *Fatḥ al 'Arab li l-Maghrib* (Cairo).
Monès, H. (1962) 'Le malikisme et l'échec des Fatimides en Ifrikiya' in *Etudes d'orientalisme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E. Lévi-Provençal*, Vol. 1, pp. 197–220.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27) *Il Monastero di San Simeone presso Aswan* (Milan: S. Giuseppe).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35–57) *La Nubia medievale* (4 vols, Cairo: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38) *Storia della Nubia cristiana* (Rome: Orientalia Christiana Analecta, 118).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48) 'Aksum e i quattro re del mondo', *AL*, 12, pp. 175–80.
Monod, T. (1948) *Mission scientifique au Fezzan, 1944–45, 2è partie: Reconnaissance au Dohone* (Algiers: Institut de Recherches Sahariennes de l'Université d'Alger).

Monod, T. (1958) *Majābat al-Koubra.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Empty Quarter ouest-Saharien* (Dakar: IFAN).
Monod, T. (1969) 'Le "Maden Ijâfen"; une épave caravanière ancienne dans la Majâbat al-Koubrâ',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286–320.
Monod, T. (1973a) *Les déserts* (Paris: Horizons de France).
Monod, T. (1973b) 'Les monnaies nord-africaines anciennes de Corvo (Açores)', *BIFAN* (B), 35, pp. 231–5.
Monteil, C. (1903) *Soudan français. Monographie de Djenné, cercle et ville* (Tulle: Mazeirie).
Monteil, C. (1926) 'Le coton chez les noirs', *BCEHS*, 9, pp. 585–684.
Monteil, C. (1929) 'Les empires du Mali', *BCEHS*, 12, pp. 291–443.
Monteil, C. (1953) 'La légende de Ouagadou et l'origine des Sarakolé' in *Mélanges ethnologiques* (Dakar: IFAN) pp. 359–408.
Monteil, C. (1977) *Les Bambara du Ségou et du Kaarta. (Etude historique, ethn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une peuplade du Soudan français)*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Monteil, V. (1968) 'Al-Bakri (Cordoue, 1068); routier de l'Afrique blanche et noire du Nord-Ouest' *BIFAN* (B), 30, pp. 39–116.
Monteil, V. (1980) *L'Islam noir. Une religion à la conquête de l'Afrique* (3rd ed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Moore, M. P. J. (1981) 'The Iron Age of the Makapan Valley area, central Transvaal'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Moorsel, P. van (1966) 'Une théophanie nubienne', *RAC*, 42, pp. 297–316.
Moorsel, P. van (1970a) 'Die Wandmalereien der zentrale Kirche von Abdallah Nirqi' in E. Dinkler (ed.), pp. 103–111.
Moorsel, P. van (1970b) 'Die stillende Gottesmutter und die Monophysiten' in E. Dinkler (ed.), pp. 281–90.
Moorsel, P. van (1972) 'Die Nubier and das glorreiche Kreuz', *BAB*, 47, pp. 125–34.
Moorsel, P. van (1975) 'Bilder ohne Worte. Problems in Christian Nubian iconography' in K. Michalowski (ed.), pp. 126–9.
Moorsel, P. van (ed.) (1982) *New Discoveries in Nubia. Proceedings of the Colloquium on Nubian Studies, the Hague, 1979.* (Leiden: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 Egyptologische Uitgaven, 2).
Moorsel, P. van, Jacquet, J. and Schneider, H. D. (1975) *The Central Church of Abdallah Nirqi* (Leiden: Brill).
Moreau, J.-L. (1982) *Africains musulmans. Des communautés en mouvement* (Paris: PA, Abidjan: INADES édition).
Morrison, M. E. S. (1968) 'Vegetation and climate in the uplands of south-west Uganda during the later Pleistocene period. I. Muchoya Swamp, Kigizi district', *Journal of Ecology*, 156, pp. 363–84.
Morrison, M. E. S. and Hamilton, A. C. (1974) 'Forest clearance and other vegetational changes in the Rukiga Highlands during the past 8000 years', *Journal of Ecology*, 62, 1, pp. 1–31.
Morse, M. L. (1967) 'The question of Samogo' *JAL*, 6, pp. 61–80.
Mortelmans, G. (1962) 'Archéologie des Grottes Dimba et Ngovo', *Actes du IV congrès Panafricain de Préhistoire*, pp. 407–25.
al-Mubarrad (1864–92) in W. Wright (ed.) *Kāmil* (2 vols, Leipzig).
Mubitana, K. (ed.) (1977) *The Sculpture of Zambia* (Lusaka).
al-Mufaḍḍal (1918–21) *The Mufaḍḍalīyāt: An Anthology of Ancient Arabian Odes*, ed. by C. J. Ly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al-Muḳaddasī (1877) *Aḥsān al-taḳāsim. Descriptio imperii moslemici* (ed. by M. J. de Goeje, Leyden: Brill, 2nd edn, 1906).
Müller, C. D. G. (1975) 'Die nubische Literatur, Bestand und Eigenart' in K. Michalowski (ed.), pp. 93–100.
Müller, C. D. G. (1978) 'Die nubische Literatur, Bestand und Eigenart', *Etudes et Travaux*, 10, (*CAMAP*, 20) pp. 375–7.
Müller, H. (1980) *Die Kunst des Sklavenkaufs nach arabischem, persischem and turkischen Ratgebern von 1c. bis zum 18. Jhdt* (Freiburg: Klaus Schwarz).
Munson, P. (1968) 'Recent arch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Dhar Tichitt region of South-Central Mauritania', *WAAN*, 10, pp. 6–13.
Munson, P. (1970)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al comments concerning the Tichitt Tradition', *WAAN*, 12, pp. 47–8.
Munson, P.J. (1971) 'The Tichitt tradition: a late prehistoric occupation of the southern Sahar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Munson, P. (1980) 'Archaeology and the prehistoric origins of the Ghana empire', *JAH*, 21, 4, pp. 457–66.

Munthe, L. (1982) *La tradition arabico-malgache vue à travers le manuscrit A-6 d'Oslo et d'autres manuscrits disponibles* (Antananarivo: TPFLM).

Murdock, G. P. (1959)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Muriuki, G. (1974) *A History of the Kikuyu, 1500–1900* (Nairobi: OUP).

Musca, G. (1964) *L'Emirato di Bari: 847–871* (Bari: Dedalo).

Musonda, F. B. (1976)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ate Stone Age along the Voltaian scarp'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

Muṭahhar al-Maḳdīsī (1890–1919) *Le livre de la création et de l'histoire*, ed. and tr. by C. Huart (6 vols,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LOV).

Mutoro, H. W. (1979)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of the historical settlements on East African coast,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ruins of Takwa, North Coast'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Nairobi).

Mutoro, H. W. (1982a) 'New light on the archeology of East African coast', *KHR*, **9**, 1–2.

Mutoro, H. W. (1982b) 'A survey of the Kaya settlement system on hinterland Kenya coast' (Report to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Social Services, Government of Kenya).

Nachtigal, G. (1879–89) *Saharâ und Sûdân* (3 vols, Berlin–Leipzig: Weidmann).

Nachtigal, G. (1971–80) *Sahara and Sudan*, Vols 1, 2 and 4, Engl. tr by A. G. B. Fisher and H. J. Fisher (London: C. Hurst).

al-Naqar, U. (1969) 'Takrūr: the history of a name', *JAH*, **10**, 3, pp. 365–74.

al-Nawawī (1951) *En-Nawawi: Les Quarante Hadiths*, tr. by G. H. Bousquet (Algiers: La Maison des Livres).

Ndoricimpa, L. et al. (1981) 'Technologie et économie du sel végétal au Burundi' in *La Civilisation ancienne des peuples des Grands Lacs: colloque de Bujumbura* (Paris: Karthala), pp. 408–16.

Neaher, N. C. (1979) 'Nigerian bronze bells', *African Arts*, **12**, 3, pp. 42–7.

Needham, J. H. (1974) *La tradition scientifique chinoise* (Paris: Hermann).

Nenquin, J. (1959) 'Dimple based pots from Kasai, Belgian Congo', *Man*, **59**, art. 242

Nenquin, J. (1963) *Excavations at Sanga 1957* (Tervuren: Musée Royale de l'Afrique centrale).

Newman, J. L. (1970) *The Ecological Basis for Subsistence Change among the Sandawe of Tanzani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iane, D. T. (1970) 'Notes sur les fouilles de Niani, ancienne capitale du Mali', *WAAN*, **12**, pp. 43–6.

Nicholson, R. A. (1907)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Cambridge: CUP).

Nicholson, S. E. (1976) 'A climate chronology for Africa: synthesis of geological, historical and meteor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dat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Nicholson, S. E. (1979)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climate reconstru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frica', *JAH*, **20**, 1, pp. 31–50.

Nicolaï, R. (1979) 'Les dialectes du songhay.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changements linguistiques' (Thèse d'Etat, Université de Nice).

Nicolaisen, J. (1963) 'Niewolnictwo wśród pasterskich plemion Tuaregów', *Problemy afrykamstyki pod redakcja S. Strelcyna*, pp. 65–70.

Nicolas, G. (1978) 'L'enracinement ethnique de l'Islam au sud du Sahara' *CEA*, **16**, 71, pp. 347–77.

Nöldeke, T. H. (1892) 'Ein Sklavenkrieg im Orient' in Noldeke, *Orientalische Skizzen* (Berlin: von Gebrüder Paetel), pp. 153–84.

Norris, H. T. (1971) 'New evidence on the life of 'Abdallāh b. Yās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lmoravid movement', *JAH*, 12, 2, pp. 255–68.

Norris, H. T. (1972) *Saharan Myth and Sag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orthrup, D. (1972) 'The growth of trade among the Igbo before 1800', *JAH*, **13**, 2, pp. 217–36.

Noten, F. van (1982) *The Archeology of Central Africa*, with contribution by D. Cohen, P. de Maret, J. Moeyersons and E. Roche (Graz).

Noten, F. van (1983) *Histoire archéologique du Rwanda*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Noth, A. (1967) 'Das ribāt der Almoraviden' in W. Hoenerbach (ed.), pp. 503–10.

Nunoo, R. B. (1969) 'Buruburo factory' *Actes 1er Coll. Intern. Archéol. Afr.* pp. 321–3.

Nurse, D. (1974) 'A linguistic sketch of the north-east Bantu language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aga histor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Nurse, D. (1982) 'Bantu expansion into East Africa: linguistic evidence' in C. Ehret and M. Posnansky (eds), pp. 199–222.

Nurse, D. and Phillipson, D. W. (1974) *The North-eastern Bantu Languages of Tanzania and Kenya: A Classification* (Dar es Salaam: Dar es Salaam University Press).

Obayemi, A. (1976) 'The Yoruba and Edo-speaking peoples and their neighbours before 16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1976), pp. 196–266.
Obenga, T. (1971) *L'Afrique dans l'antiquité. Egypte pharaonique, Afrique noir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L'Occidente e l'Islam nell'Alto Medievo (1965) (2 vols, Spoleto: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evo).
O'Fahey, R. S. (1980) *State and Society in Darfur* (London: C. Hurst).
Ogot, B. A. (ed.) (1974)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2nd edn,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Ogot, B. A. (ed.) (1976) *Kenya before 1900*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Ogot, B. A. (ed.) (forthcoming) *Keny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got, B. A. and Kieran, J. A. (eds) (1968)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Olagüe, I. (1974) *La révolución islámica en occidente* (Barcelona: Fundación Juan March).
Olderogge, D. A. (1960) *Zapadnuiy Sudan v XV-XIX vv. Ocherki po istorii i istorii kulturyi* (Moscow and Leningrad: IAN).
Oliver, R. (1966) 'The problem of the Bantu expansion', *JAH*, 7, 3, pp. 361–76.
Oliver, R. (ed.) (1967) *The Middle Age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OUP).
Oliver, R. (ed.) (1977)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c. 1050–c. 1600* (Cambridge: CUP).
Oliver, R. (1979) 'Cameroon - The Bantu cradleland', *SUGIA*, 1, pp. 7–20.
Oliver, R. (1982) 'The Nilotic contribution to Bantu Africa', *JAH*, 23, 4, pp. 433–42.
Oliver, R. and Fagan, B. M. (eds) (1975) *Africa in the Iron Age: c. 500 BC to AD 1400* (Cambridge: CUP).
Oliver, R. and Fage, J. D. (1962) *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 (Harmondsworth: Penguin).
Oliver, R. and Mathew, G. (eds) (1963) *History of East Africa*,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man, G. (1974a) 'La necropoli islamica di Dahlak Kebir. Il materialo epigraphico', *Akten d. VII. Kongresses für Arabistik und Islamwissenschaft (Göttingen 1974)* (Göttingen: Vandenhoek Z. Ruprecht), pp. 273–81.
Oman, G. (1974b) 'The Islamic necropolis of Dahlak Kebir in the Red Sea: report on a preliminary survey carried out in April 1972', *East and West*, 24, 3–4, pp. 249–95.
Omi, G. (1982) *Mtongwe. The Preliminary Report* (Nagoya-Tokyo).
Onwuejeogwu, M. (1974)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Nri, south-eastern Nigeria'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Orhanlu, C. (1978) '*Khaṣī*' in E. van Donzel *et al.* (eds), pp. 1087–93.
Orr, K. G. (1971–2)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chaeology of Liberia', *LSJ*, 4, pp. 55–80.
Osman, A. (1982a) 'Medieval Nubia: retrospects and introspects' in P. Van Moorsel (ed.), pp. 69–90.
Osman, A. (1982b) 'The post-medieval kingdom of Kokka: a mean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medieval kingdom of Dongola'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185–97.
Ottino, P. (1974a) *Madagascar, les Comores et le Sud-Ouest de l'Océan Indien* (Tananarive: Université de Madagascar, Centre d'Anthropologie culturelle et sociale).
Ottino, P. (1974b) 'Le Moyen-Age de l'Océan Indien et le peuplement de Madagascar' in *Annuaire des Pays de l'Océan Indien* (Aix-en-Provence: CERSOI), pp. 197–221.
Ottino, P. (1983) 'Les Andriambahoaka malgaches et l'héritage indonésien', in F. Raison (ed.), pp. 71–96.
Ould el-Bah, A. (1982) *Les Almoravides à travers les sources orales en Mauritanie* (Mémoire-Université de Paris I).
Ozanne, P. (1966) 'The Anglo-Gambian Stone Circles Expedition', *WAAN*, 4, pp. 8–18.
Ozanne, P. (1969) 'A new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fe', *Odu*, (ns), 1, pp. 28–45.
Ozanne, P. (1971) 'Ghana' in P. L. Shinnie (ed.), pp. 36–55.

Pacha, N. (1976) *Le commerce au Maghreb du XIe-XIVe siècle* (Tunis: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Tunis).
Pacheco Pereira, D. (1956) *Esmeraldo de Situ Orbis.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du Sud marocain au Gabon*, tr. by R. Mauny (Bissau).
Painter, C. (1966) 'The Guang and West African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GNQ*, 9, pp. 58–65.
Palmer, H. R. (1908) 'The Kano Chronicle' *JRAI*, 38, pp. 58–98.
Palmer, H. R. (1928) *Sudanese Memoirs: being mainly translations of a number of Arabic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3 vols, Lagos: Govt Printer. Reprinted, 1967, London: Cass, in one volume).
Palmer, H. R. (1928–9) 'The Central Sahara and the Sudan in the XIIth century', *J. Afr. Soc.*, 28, pp 368–78.
Palmer, H. R. (1936) *The Bornu, Sahara and Sudan* (London: Murray).

Pansera, C. (1945) 'Quatro stele musulmane presso Uogher Hariba nell' Enderta', *Studi etiopici raccolti da C. Conti Rossini* (Rome: Istituto per l'Oriente), pp. 3–6.
Paret, R. (1924) *Sīrat Saif Ibn Dhī Yazan, ein arabischer Volksroman* (Hannover: Lafaire).
Paribeni, R. (1908) 'Richerche nel luogo dell'Antica Adulis', *Antichita Publicati per Curia della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18, pp. 438–572.
Parry, V. J. and Yapp, M. E. (eds) (1975) *War,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OUP).
Pearce, F. B. (1920) *Zanzibar, the Island Metropolis of Eastern Africa* (London: T. F. Unwin).
Pellat, C. (1953) *Le milieu Basrien et la formation de Gāhiz*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Pellat, C. (1963) 'Les esclaves-chanteuses de Gāhiz', *Arabica*, 10, pp. 121–47.
Pelliot, P. (1959) 'Çanghibar' in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pp. 598–603.
Pereira, F. M. E. (1899) *Historia dos martyres de Nagran, versão ethiopica* (Lisbon: Imprensa nacional).
Pérès, H. (1953) *La poésie andalouse en arabe classique du XIe siècle* (Paris: Maisonneuve).
Perrier de la Bathie, H. (1926) *Biogéographie des plantes de Madagascar* (Paris: Ed. Gé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Perruchon, J. (1889) 'Histoire des guerres d'Amda Sion, Roi d'Ethiopie' *JA*, 8th series, 14, pp 271–363, 381–493.
Perruchon, J. (1893) *Les chroniques de Zar'a Yā'eqôb et Ba'eda Mâryâm, rois d'Ethiopie de 1434 à 1478* (Paris: Bouillon).
Perruchon, J. (1894) 'Notes pour l'histoire d'Ethiopie' *RS*, 2, pp. 78–93.
Person, Y. (1968–75) *Samori, une révolution Dyula* (3 vols, Dakar: IFAN).
Person, Y. (1971) 'Ethnic movements and acculturation in Upper Guinea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AHS*, 4, 3, pp. 669–89.
Person, Y. (1972) 'Les Mandingues dans l'histoi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Manding Studies, SOAS, London, 1972)
Person, Y. (1981) 'Nyaani Mansa Manudu et la fin de l'empire du Mali'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Vol. 2, pp. 613–54.
Petitmaire, N. (1978) 'Die atlantische Sahara, der Mensch Zwischen Wuste und Ozean', in R. Kuper (ed.).
Petráček, K. (1960) 'Al-Ahwaz' in H. A. R. Gibb *et al* (eds), p. 305.
Phillipson, D. W. (1968) 'The Early Iron Age site of Kapwirimbwe, Lusaka', *Azania*, 3, pp. 87–105.
Phillipson, D. W. (1970a) 'Notes on the later prehistoric radiocarbon chronolog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JAH*, 11, 1, pp. 1–15.
Phillipson, D. W. (1970b) 'Excavations at Twickenham Road, Lusaka', *Azania*, 5, pp. 77–108.
Phillipson, D. W. (1971) 'An Early Iron Age site on the Lubusi River, Kaoma District, Zambia', *Zambia Museums Journal*, 2, pp 51–7.
Phillipson, D. W. (1972) 'Early Iron Age sites on the Zambian copper belt', *Azania*, 7, pp. 93–128.
Phillipson, D. W. (1974) 'Iron Ag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Zambia', *JAH*, 15, 1, pp. 1–25.
Phillipson, D. W. (1975) 'The chronology of the Iron Age in Bantu Africa', *JAH*, 16, 3, pp. 321–42.
Phillipson, D. W. (1976a) *The Prehistory of Eastern Zambia*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Phillipson, D. W. (1976b) 'The Early Iron Age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a critical reappraisal', *Azania*, 11, pp. 1–23
Phillipson, D. W. (1976c) 'Archaeology and Bantu linguistics', *WA*, 8, pp. 65–82.
Phillipson, D. W. (1977a) *The Later Prehistor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hillipson, D. W. (1977b) 'Zambian Sculpture on historical evidence' in K. Mubitana (ed.), pp. 85–8.
Phillipson, D. W. and Fagan, B. M. (1969) 'The dates of the Ingombe Ilede burials', *JAH*, 10, 2, pp. 199–204.
Picton, J. and Mack, J. (1979) *African Textiles. Looms, Weaving and Design*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Pigulevskaya, N. V. (1960, 1961) 'Les rapports sociaux à Nedjran au début du VI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JESHO*, 3, pp. 113–30; 4, pp. 1–14.
Pigulevskaya, N. V. (1969) *Byzanz auf den Wegen nach Indien* (Berlin: DAW).
Pipes, D. (1980) *Slaves, Soldiers and Islam: The Genesis of a Military System* (New Haven: YUP).
Pirenne, H. (1937) *Mahomet et Charlemagne* (4th edn, Paris: Alcan).
Plumley, J. M. (1970) 'Some examples of Christian Nubian art from the excavations at Qasr Ibrim' in E. Dinkler (ed.), pp. 129–40.
Plumley, J. M. (1971a) 'Pre-Christian Nubia (23 BC–535 AD): evidence from Qasr Ibrim', *Etudes et Travaux*, 5 (*CAMAP*, 11), pp. 7–24.
Plumley, J. M. (1971b) 'The stele of Marianos, Bishop of Faras', *BMNV*, 11, pp. 77–84.

Plumley, J. M. (1975a) 'The Christian period in Qasr Ibrim, some notes on the MSS finds' in K. Michalowski (ed.), pp 101–7.
Plumley, J. M. (1975b) *The Scrolls of Bishop Timotheos* (London: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
Plumley, J. M. (1978) 'New light on the Kingdom of Dotswo', *Etudes Nubiennes*, pp. 231 41.
Plumley, J. M. (ed.), (1982a) *Nubi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for Nubian Studies, Selwyn College, Cambridge*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Plumley, J. M. (1982b) 'The Christian period in Nubia as represented on the site of Qasr Ibrim' in P. van Moorsel (ed.), pp. 99 110.
Plumley, J. M. (1982c) 'New evidence on Christian Nubia in the light of recent excavations', *NC*, 1, pp. 15–24.
Plumley, J. M. (1983) 'Qasr Ibrim and the Islam', *Etudes et Travaux*, 12 (*CAMAP*, 24), pp. 157 70.
Plumley, J. M. and Adams, W. Y. (1974) 'Qasr Ibrim 1972', *JEA*, 60, pp. 212 38.
Plumley, J. M., Adams, W. Y. and Crowfoot, E. (1977) 'Qasr Ibrim 1976', *JEA*, 63, pp. 29–47.
Poirier, J. (1965) 'Données écologiques et démographiques de la mise en place des Proto-Malgaches', *Taloha*, 1, pp. 61–82.
Polet, J. (1980) 'Fouille d'un quartier de Tegdaoust. Urbanisation, architecture, utilisation de l'espace construit' (Thèse de 3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Polet, J. (forthcoming) *Tegdaoust IV. Recherches sur Aoudaghost. Fouille d'un quartier: urbanisation, architecture, utilisation de l'espace construit* (Paris).
Polomé, B. C. and Hill, C. P. (eds) (1980) *Language in Tanzania* (London: IAI).
Pomerantseva, N. (1982) 'The iconography of the Christian paintings of Nubia', in J. M. Plumley (ed.) (1982a), pp. 198–205.
Poncet, C. (1954) 'L'évolution des genres de vie en Tunisie', *CT*, 2, pp. 315 23.
Poncet, J. (1967) 'Le mythe de la "catastrophe" hilalienne', *Annales ESC* 9–10, pp. 1099–120.
Popovic, A. (1976) *La révolte des esclaves en Iraq au IIIe/IXe siècle* (Paris: Geuthner).
Portères, A. (1950) 'Vieilles agricultures africaines avant le XVI ème siècle. Berceaux d'agriculture et centres de variation', *L'Agronomie Tropicale*, 5, 9 10, pp. 489 507
Posnansky, M. (1964) 'Bantu genesis', *UJ*, 25, 1, pp. 86–92.
Posnansky, M. (1971) 'Ghana and the origins of West African trade', *AQ*, 11, 2, pp. 111 25.
Posnansky, M. (1973) 'Aspects of early West African trade', *WA*, 5, 2, pp. 149 62.
Posnansky, M. (1976) 'New radiocarbon dates from Ghana', *Sankofa*, 2, pp. 60–3.
Posnansky, M. (1977) 'Brass casting and its antecedents in West Africa', *JAH*, 18, 2, pp. 287–300.
Posnansky, M. (1980) 'Some reflections of a temporary nature on towns in general and on Begho, Ghana, in particular' in *African Studies Fall Colloquium on Indigenous African Tow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osnansky, M. and McIntosh, R. (1976) 'New radiocarbon dates for northern and western Africa', *JAH*, 17, 2, pp. 161 95.
Pouwels, R. C. (1974) 'Tenth-century settlement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the case of Qarmatian/Isma'ili connections', *Azania*, 9, pp. 65–74.
Priddy, B. (1973) 'Pottery traditions in Ghana,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archaeologist' (cyclostyled seminar paper,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Ghana, Legon).
Procopius (1954) *History of the Wars, Books I and II* (ed. and tr. by H. B. Dewing, London).
Prost, A. (1945) 'Notes sur les Boussané', *BIFAN*, 7, pp. 47–53.
Prost, A. (1953) *Les langues Mandé-Sud du groupe mana-busa* (Dakar: IFAN).
Prost, A. (1981) 'Les Mandé-sud en Afrique occidentale',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Vol 1, pp. 353–9.
Prussin, L. (1981) 'Building technologies in the West African savannah',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Vol. 1, pp. 227 45.
Puglisi, G. (1953) 'Le citerne di Dahlak Chebir e di Adal nell'archipelago delle Dahlak' *Bolletino di Istituto di Studi Etiopici (Asmara)* 1, pp. 53–70.
Puglisi, G. (1969) 'Alcuni vestigi dell'isola di Dahlak Chebir e la leggenda dei Furs' in *Proc. 3rd Intern. congress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eba), pp. 35 47.
Puygaudeau, O. du (1966) 'Une carte des chars à boeufs révèle les rapports trois fois millénaires entre le Maghreb et le Soudan', *Archéologia*, 3, pp. 37 *et seq.*

Quéchon, G. and Roset, J.-P. (1974) Prospection archéologique du massif de Termit (Niger), *Cahiers de l'ORSTOM sér. scien. hum.* 11, 1, 1974, pp. 85 104.
Quennell, P. (1928) *The Book of the Marvels of India* (London: Routledge).

al-Rabī' ibn Ḥabīb (n.d.) *Musnad.*

Radimilahy, C. (1980) *Archéologie de l'Androy.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phases de peuplements* (Antananarivo, Centre d'Art et d'Archeologie).

Radimilahy, C. (1981) 'Archéologie de l'Androy', *RPC*, 55, pp. 62–5.

Raison, F. (ed.) (1983) *Les souverains de Madagascar. L'Histoire royale et ses résurgences contemporaines* (Paris: Karthala).

Rakoto-Rastimamanga, A. (1939) 'Tâche pigmentaire et origine des Malgaches' (Thèse de sciences, Université de Paris).

Ralaimihoatra, E. (1948) 'Vazimba et Hova à Madagascar', *Revue de Madagascar*, pp. 35–48.

Ralaimihoatra, E. (1966) *Histoire du Madagascar* (Tananarive: Société Malgache d'Edition).

Ralaimihoatra, E. (1971a) 'Le contexte et la signification du terme Vazimba dans l'histoire de Madagascar', *Bull. Acad. Malg.*, 47, pp. 183–4.

Ralaimihoatra, E. (1971b) 'Elements de connaissance des proto-Malgaches', *Bull. Acad. Malg.*, 49, 1, pp. 29–33.

Ralaimihoatra, E. (1974) *Etapes successives du peuplement de Madagascar: relations avec l'Asie du Sud-Est, l'Océan Indien et l'Afrique* (Tananarive, roneo).

Ramadan, A. M. (1975) *Réflexions sur l'architecture islamique en Libye* (Tripoli)

Rasamuel, D. (1983) 'Alimentation et techniques anciennes dans le Sud malgache à travers une fosse à ordures du XIe siècle', *Etudes Océan Indien/Tsiokantimo* (Paris/Tuléar), 5, pp. 81–110.

Rasamuel, D. (1985) 'Culture matérielle ancienne à Madagascar: contribution des pays riverains de l'Océan Indien dans le mouvement des idées dans l'Océan Indien occidental' in *Actes de la Table Ronde de Saint-Denis [25–28 juin 1982]* (Saint-Denis, La Réunion), pp. 113–25

Rasamuel, D. (1986) *Fanongoavana, site ancien des Hautes Terres* (Paris: CRA-Karthala).

Rasheed, S. (1973) 'Slave girls under the early Abbasid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Rassart, M. (1972) 'Visages de Faras, caractéristiques et évolution stylistique', *Etudes et Travaux*, 6 (CAMAP, 13), pp. 251–75.

Rassart, M. (1978) 'Quelqu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rapports thématiques et stylistiques entre l'Egypte Copte et la Nubie chrétienne' in A. Destrée (ed.), *Mélanges Armand Abel* (Leiden: Brill), Vol. 3, pp. 200–20.

Rattray, R. S. (1923) *Ashant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attray, R. S. (1927) *Religion and Art in Ashant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avelojoana (1937) *Firaketana ny fiteny sy ny zavatra malagasy*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malgache) (Tananarive. Fiainana).

Ravereau, A. (1981) *Le M'zab, une leçon d'architecture* (Paris: Sindbad).

Ravisé, A. and Thilmans, G. (1978) 'A propos d'une clochette trouvée à Sintiou-Bara (Fleuve Sénégal)', *NA*, 159, pp. 57–9.

Ravoajanahary, C. (1980) 'Le peuplement de Madagascar: tentative d'approche', in Unesco, 1980, pp. 91–102.

Reinaud, J. (1836) *Invasion des Sarrazins en France* (Paris).

Renaudot, E. (1713) *Historia Patriarcharum Alexandrinorum Jacobitorum* (Paris).

Rey, G. de (1972) *Les Invasions des Sarrasins en Provence pendant les VIIIe, IXe et Xe siècles* (2nd edn, Paris)

Reygasse, M. (1940) 'Fouilles de monuments funéraires de type 'chouett' à Abalessa (Hoggar)', BSGAO, 61, fasc. 214.

Reygasse, M. (1950) *Monuments funéraires préislamiques de l'Afrique du Nord*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Richards, D. S. (ed.) (1970)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Oxford: Cassirer).

Rightmire, G. P. (1970) 'Iron Age skulls from southern Africa re-assessed by multiple discriminant analysis', *AJPA*, 33, 3, pp. 147–68.

(La) rime et la raison (1984)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de la Collection de Ménil, Grand Palais, Paris, 1984).

Rivallain, J. (1980) 'Le sel dans les villages côtiers et lagunaires du Bas-Dahomey: sa fabrication, sa place dans le circuit du sel africain', *AUA* (série 1: Histoire), 8, pp. 81–127.

Rizzitano, U. (1938) 'La poesia de Abū Miḥdjān, N. b. R. e necessita di uno studio piu completo sui poeti minori de secolo Ummayyade', *Actes XXe Congr. Int. Or.*, pp. 316–18.

Robert, D. (1966) 'Statuette anthropomorphe du site de Tegdaoust (Mauritanie orientale)', *NA*, 112, pp. 142–3.

Robert, D. (1970) 'Les fouilles de Tegdaoust', *JAH*, 11, 4, pp. 471–94.

Robert, D. (1980) 'Une "concession médiévale" à Tegdaoust: implantation évolutive d'une unité d'habitation' (2 vols, these de 3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Robert, D., Robert, S. and Devisse, J. (eds) (1970) *Tegdaoust I. Recherches sur Aoudaghost*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Robert, D., Robert, S. and Saison, B. (1976)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Tegdaoust-Koumbi Saleh', *AIMRS*, 2, pp. 53–84.
Robert, S. (1976) 'Archéologie des sites urbains des Hodh et problèmes de la désertification au Moyen âge' in *Colloque de Nouakchott*, pp. 46–55.
Robert-Chaleix, D. (forthcoming) *Tegdaoust V. Recherches sur Aoudaghost. Une concession médiévale, implantation et evolution d'une unité d'habitation* (Paris).
Robert-Chaleix, D. and Sognane, M. (1983) 'Une industrie métallurgique ancienne sur la rive mauritanienne du fleuve Sénégal' in N. Échard (ed.), pp. 45–62.
Roberts, R. (1908) *Das Familien, Sklaven und Erbrecht in Koran* (Leipzig).
Robey, T. (1980) 'Mpambanyoni: a Late Iron Age site on the Natal south coast', *ANM*, 24, 1, pp. 147–64.
Robineau, C. (1967) 'L'Islam aux Comores, une étude d'histoire culturelle de l'Ile d'Anjouan' in P. Vérin (ed.), pp. 39–56
Robinson, K. R. (1958) 'Four Rhodesian Iron Age sites: a brief account of stratigraphy and finds', *Occ. Pap. Natn. Mus. Sth. Rhod.*, 3A, 22, pp. 77–119.
Robinson, K. R. (1966a) 'The Leopard's Kopje Culture, its position in the Iron Age of Southern Rhodesia', *SAAB*, 21, 81, pp. 5–51.
Robinson, K. R. (1966b) 'The Sinoia Caves, Lomagundi District, Rhodesia', *Proc. Trans. Rhod. Sci. Ass.* 51, pp. 131–55.
Robinson, K. R. (1966c)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recent archeology of Ngonde, northern Malawi', *JAH*, 7, 2, pp. 169–88.
Robinson, K. R. (1968) 'An examination of five Iron Age structures in the Umguza Valley, 14 miles north of Bulawayo, Rhodesia', *Arnoldia* (*Rhod.*) 3, 35, pp. 1–21.
Robinson, K. R. (1970) *The Iron Age in the Southern Lake Area of Malawi* (Zomba).
Robinson, K. R. (1973) *The Iron Age of the Upper and Lower Shire, Malawi* (Zomba).
Robinson, K. R. (1976) 'A note on the spread of Early Iron Age ceramics in Malawi', *SAAB*, 31, pp. 166–75.
Rodinson, M. (1969) *Mahomet* (Paris: Seuil).
Rodinson, M. (1971) *Mohammad* (London: Allen Lane).
Rodney, W. (1967)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ane invasions of Sierra Leone', *JAH*, 8, 2, pp. 219–46.
Rodziewicz, M. (1972) 'Die Keramikfunde der deutschen Nubienunternehmungen 1968–69', *Ar. Anz.*, 4, pp. 643–713.
Rosenberger, B. (1970a) 'Les vieilles exploitations minières et les anciens centres métallurgiques du Maroc', *Revue de géographie du Maroc*, 17–18, pp. 71–102.
Rosenberger, B. (1970b) 'Tamdult, cité minière et caravanière pré-saharienne, IXe–XIVe siècles', *HT*, 11, pp. 103–39.
Roset, J.-P. (1983)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e problème de la néolithisation du Sahara méridionale: Aïr et Ténéré au Niger', *Cahiers de l'ORSTOM* (série Géologie) 13, 2, pp. 119–42.
Rosso, J.-C. and Petitmaire, N. (1978) 'Amas coquilliers du littoral atlantique saharien', *BMAPM*, 22, pp. 79–118.
Rostkowska, B. (1972) 'Iconographie des personnages historiques sur les peintures de Faras', in *Etudes et Travaux*, 6, (*CAMAP*, 13) pp. 195–205.
Rostkowska, B. (1981) 'Classical traditions in Christian art of the Nile Valley', in M. Mulett and R. Scott (eds), *Byzantium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thirteenth Spring Symposium of Byzantine Studies*, 1979 (Birmingham: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pp. 149–54.
Rostkowska, B. (1982a) 'Nobadian painting: present state of investigations', *NC*, 1, pp. 283–304.
Rostkowska, B. (1982b) 'The title and office of the king's mother in Christian Nubia', *AB*, 31, pp. 75–8.
Rotter, G. (1967) *Die Stellung des Negers in der islamisch-arabischen Gesellschaft bis zum XVI. Jhdt* (Bonn).
Rouger, G. (1923) *Le roman d'Antar d'après les anciens textes arabes* (Paris: L'Edition d'art).
Roux, V. (1980) 'Oscillation climatique et néolithisation: la pêche', *Cahiers du CRA* (Série Histoire) 1, pp. 3–38.
Rozenstroch, M. (1984) 'Liongo Fumo. Légende et signification politique' (Thèse de doctorat de 3èm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
Ryder, A. F. C. (1969) *Benin and the Europeans 1485–1897* (London: Longmans).
Ryckmans, J. (1956) *La persécution des chrétiens himyarites au VIe siècle* (Istanbul: 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in het Nabije Oosten).

al-Sābi', Abū' l'Hasan (1958) *Al-wuzara'* (Cairo).
al-Sābi', Hilāl (1964) *Rusūm dār al-khilāfa* (ed. M. 'Awwād, Baghdad).
as-Sa'dī, A. see Ta'rīkh al-Sūdān.
Sahlins, M.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London. Tavistock).
Saison, B. (1979) 'Fouille d'un quartier artisanal de Tegdaoust' (2 vols, Thèse de Doctorate de 3e cycle, Université de Paris, I).
Saison, B. (1981) 'Azugi, archéologie et histoire en Adrar Mauritanien', *Rercherche, Pédagogie et Culture*, 55, pp. 66–74.
Saison, B. (forthcoming) *Tegdaoust VI. Recherches sur Aoudaghost. Fouille d'un quartier artisanal* (Paris).
al-Salāwī (1954) *Al-Istiksā li-Akhbār al-Maghrib al-Aksā'* (2nd edn, Al-Dār al-Baydā Casablanca).
Saliège, J. F., Person, A., Barry, I. and Fontes, P. (1980) 'Premières datations de tumulus préislamiques au Mali: site mégalithique de Tondidarou',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291 (D), 12, pp. 981–4.
Sallūm, D. (1967) *Shi'r Nusaib b. Rabāh* (Baghdad).
al-Samir, F. (1971) *Thawrat al-Zandj* (2nd edn, Beirut).
Sanagustin, F. (1980) 'Un aide-mémoire à l'usage de l'acheteur d'esclaves' (unpublished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y of Paris, III).
Sandelowsky, B. (1973) 'Kapako, an Early Iron Age site on the Okavango River, South West Africa', *SAJS*, 69, p. 325.
Sanders, E. R. (1969) 'The Hamitic hypothesis, its origin and functions in time-perspective', *JAH*, 10, 4, pp. 521–32.
Sanneh, L. O. (1976) 'The origins of clericalism in West African Islam', *JAH*, 17, 1, pp. 49–72.
Sanneh, L. O. (1979) *The Jakhanke. The History of an Islamic Clerical People of the Senegambia* (London: IAI).
Santarem, M. F. de B. (1842) *Notice sur André Alvarez d'Almada et sa description de la Guinée* (Paris: Bertrand)
Sapir, J. D. (1971) 'West Atlantic: an inventory of the languages, their noun class systems and consonant alteration' in T. Sebeok (ed.), pp. 45–112.
Sauvaget, J. (1949) 'Les epitaphes royales de Gao', *Al-Andalus*, 14, pp. 123–41.
Säve-Söderbergh, T. (1970) 'Christian Nubia. The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by the Scandinavian Joint Expedition to Sudanese Nubia' in E. Dinkler (ed.) (1970), pp. 219–40.
Scanlon, G. (1970) 'Excavations at Kasr el-Wizz. A preliminary report I', *JEA*, 56, pp. 29–57.
Scanlon, G. (1972) 'Excavations at Kasr el-Wizz. A preliminary report II', *JEA*, 58, pp. 7–42.
Schacht, J. (1950) *The Origins of Muhammadan Jurisprude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chacht, J. (1954) 'Sur la diffusion des formes d'architecture religieuse musulmane à travers le Sahara', *TIRS*, 11, pp. 11–27.
Schacht, J. and Bosworth, C. E. (eds.) (1974) *The Legacy of Islam*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chapera, I. (1970) *Tribal Innovators: Tswana Chiefs and Social Change 1795–1940* (London: Athlone Press).
Schmidt, P. (1975) 'A new look a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arly Iron Age in East Africa', *HA*, 2, pp. 127–36.
Schmidt, P. R. (1978) *Historical Archeology: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n African Culture*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Schmidt, P. (1981) *The Origin of Iron Smelting in Africa: A Complex Technology in Tanzania* (Providence, RI, Brown University, Research Papers in Archeology, no 1).
Schneider, M. (1967) 'Stèles funéraires arabes de Quiha', *AE*, 7, pp. 107–22.
Schneider, M. (1969) 'Stèles funéraires de la région de Harar et Dahlak (Ethiopie), *REI*, 37, 2, pp. 339–43.
Schoenbrun, D. (1984) 'Forests of words: early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lacustrine East Africa, ca 1000 BC to ca. AD 1000' (Seminar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March 1984).
Schrire, C. (ed.) (1984) *Past and Present in Hunter Gatherer Stud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ebeok, T. (ed.) (1971)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Vol. 7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eligman, C. G. (1930) *Races of Africa* (London: Butterworth).
Seligman, C. G. (1935) *Les Races de l'Afrique* (Paris: Payot).
Semaan, K. I. (ed.) (1980) *Islam and the Medieval Wes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Semonin, P. (1964) 'The Almoravid movement in the Western Sudan', *THSG*, 7, pp. 42–59.
Sergew, H. S. (1972) *Ancient and Medieval Ethiopian History to 1270* (Addis-Ababa: United Printers)
van Sertima, I. (ed.) (1985) *African Presence in Early Asia*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Severus ibn al-Mukaffa' (1904) *Historia Patriarcharum Alexandronorum*. [CSCO, Script. Arab., ser. III, vol. IX] (ed. by C. F. Seybold, Beyrouth: Univ. St-Joseph).
Seydou, C. (1977) *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u monde Peul* (Niamey: IRSH, Etudes nigériennes, 43).
al-Shafi'i (1903) *Kitāb al-'amm* (Cairo).
Shaw, C. T. (1944) 'Report on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in the cave known as "Bosumpra" at Abetifi, Kwahu, Gold Coast Colony', *Proc. Prehist. Soc.*, 10, pp. 1–67.
Shaw, T. (1960) 'Excavations at Igbo-Ukwu, Eastern Nigeria: an interim report', *Man*, 60, pp. 161–4.
Shaw, T. (1961) *Excavation at Dawn* (Edinburgh: Nelson)
Shaw, T. (ed.) (1969a) *Lectures on Nigerian 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Shaw, T. (1969b) 'The Late Stone Age in the Nigerian forest' in *Actes Ier Coll Intern. Archeol. Afr.*, pp. 364–75.
Shaw, T. (1970) *Igbo-Ukwu: An Account of Arch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Eastern Nigeria* (2 vols, London: Faber).
Shaw, T. (1972) 'Early agriculture in Africa', *JHSN*, 6, 2, pp. 143–91.
Shaw, T. (1973) 'A note on trade and the Tsoede bronzes', *WAJA*, 3, pp. 233–8.
Shaw, T. (1974) 'Hunters, gatherers and first farmers in West Africa'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Hunters, Gatherers and First Farmers outside Europe held at Leicester University).
Shaw, T. (1975a) 'Those Igbo-Ukwu radiocarbon dates: facts, fictions and probabilities', *JAH*, 16, 4, pp. 503–17.
Shaw, T. (ed.) (1975b) *Discovering Nigeria's Past* (London: OUP).
Shaw, T. (1977) *Unearthing Igbo-Ukwu* (Ibadan: OUP).
Shaw, T. (1978) *Nigeria. Its Archaeology and Early History* (London: Thames & Hudson).
Shepherd, G. (1982) 'The earliest Swahilis: a perspective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oro Islands in the south-west Indian Ocean before the rise of Kilw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Swahili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don, SOAS, April 1982).
Shinnie, P. L. (1954) *Medieval Nubia* (Khartoum: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s, Museum Pamphlet, 2).
Shinnie, P. L. (1961) *Excavations at Soba* (Khartoum: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s, Occasional Paper, 3).
Shinnie, P. L. (1965) 'New light on medieval Nubia', *JAH*, 6, 3, pp. 263–73.
Shinnie, P. L. (1971) 'The culture of medieval Nubia and its impact on Africa' in Y. F. Hasan (ed.), pp. 124–8.
Shinnie, P. L. (ed.) (1971) *The African Iro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hinnie, P. L. (1974) 'Multilingualism in medieval Nubia' in A. M. Abdalla (ed.), pp. 41–7.
Shinnie, P. L. (1975) 'Excavations at Debeira West' in K. Michałowski (ed.), pp. 116–20.
Shinnie, P. L. (1978a) 'Christian Nubia' in J. D. Fage (ed.), pp. 556–88.
Shinnie, P. L. (1978b) 'Trade in medieval Nubia', in *Etudes Nubiennes*, pp. 253–64.
Shinnie, P. L. and Chittick, H. N. (1961) *Ghazali – A monastery in the Northern Sudan* (Khartoum: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Occasional Paper, 5)
Shinnie, P. L. and Shinnie, M. (1978) *Debeira West. A Medieval Nubian Town*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Simmonds, N. W. (1962) *The Evolution of the Bananas* (London: Longmans).
Simon, H. (1946) 'Le Judaïsme berbère dans l'Afrique ancienne', *RHPR*, 26, pp. 1–31.
Sinclair, P. J. J. (1981) 'An archaeological outline of two social formations of the Later Iron Age in Zimbabwe and Mozambique' in *10th Proc. Cong. Union Int. Scient. Prehist. Protohist.* (Mexico, D. F., Sections VII–IX), pp. 64–5.
Sinclair, P. J. J. (1982) 'Chibuene – an early trading site in southern Mozambique', *Paideuma*, 28, pp. 150–64.
Smith, A. (1970) 'Some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states in Hausaland', *JHSN*, 5, 3, pp. 329–46.
Smith, A. (1971)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Central Sudan'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1971), pp. 158–201
Smith, A. (1972) 'The legend of the Sefuwa' (unpublished seminar paper,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Smith, A. B. (1975) 'Radiocarbon dates from Bosompra Cave, Abetifi, Ghana' *Proc. Prehist. Soc.*, 41, pp. 179–82.
Smith, R. S. (1969) *Kingdoms of the Yoruba* (London: Methuen).
Smith, S. (1954) 'Events in Arabia in the 6th century AD', *BSOAS*, 16, pp. 425–68.
Snowden, F. M. (1970) *Blacks in Antiquity – Ethiopians in the Graeco-Ro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Raymond Mauny (1981) (2 vols, Paris: SFHOM).

Solheim, W. G. (1965) 'Indonesian culture and Malagasy origins', *Taloha*, 1, pp. 33–42.

Soper, R. C. (1967) 'Kwale: an early Iron Age site in south-eastern Kenya', *Azania*, 2, pp. 1–17.

Soper, R. C. (1971)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Early Iron Age in the southern half of Africa', *Azania*, 6, pp. 5–37.

Soper, R. C. (1982) 'Bantu expansion into eastern Africa: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C. Ehret and M. Posnansky (eds), pp. 223–44.

Southall, A. (1954) 'Alur tradition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UJ*, 18, pp. 137–65.

Spear, T. (1978) *The Kaya Complex. A History of the Mijikenda Peoples of the Kenya Coast* (Nairobi, Kenya Literature Bureau).

Spear, T. (1982) 'The Shirazi in Swahili traditions, culture and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Swahili Language and Society, London, SOAS, April 1982).

Stenning, D. J. (1959) *Savannah Nomads. A Study of the Woodaabe Pastoral Fulani of Western Bornu Province, Northern Region, Nigeria* (London, OUP).

Stepniewska, B. (1971) 'Portée sociale de l'Islam au Soudan occidentale aux 14e–16e siècles', *AB*, 14, pp. 35–8.

Stern, S. M. (1950) 'An Embass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to the Fāṭimid Caliph al-Mu'izz', *Byzantion*, 20, pp. 239–58.

Stern, S. M. (1961) 'Isma'ilis and Qarmatians', in *L'Elaboration de l'Islam*, pp. 99–108.

Stevenson, R. (1956) 'A survey of the phonetic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Nuba Mountain languages', *AU*, 40, pp. 73–84, 93–115.

Stevenson, R. (1971)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dan in linguistic researc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Y. F. Hasan (ed.), pp. 11–25.

Stewart, M. H. (1979) 'The role of the Manding in the hinterland trade of the Western Sudan: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analysis', *BIFAN* (B), 41, 2, pp. 280–302.

Stigand, C. H. (1913) *The Land of Zinj* (London: Constable).

Stillman, N. (1972) 'Un témoignage contemporain de l'histoire de la Tunisie Zirid', *IIT*, 13, pp. 37–59.

Stokes, E. and Brown, R. (eds) (1966) *The Zambezian Pas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tricker, B. H. (1940) 'A study in medieval Nubian', *BSOAS*, 10, pp. 439–54.

Strong, S. A. (1895) 'History of Kilwa', *JRAS*, 20, pp. 385–430.

Strothmann, R. (1928) 'Berber und Ibāditen', *Der Islam*, 17, pp. 258–79.

Summers, R. (1969) *Ancient Mining in Rhodesia and Adjacent Areas* (Salisbury: National Museum of Rhodesia).

Sundstrom, L. (1974) *The Exchange Economy of Pre-colonial Tropical Africa*. (London: Hurst)

Suret-Canale, J. (1974)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en Afrique tropicale et le concept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 Marxiste*, pp. 101–33.

Sutton, J. E. G. (1972) 'New radiocarbon dates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JAH*, 13, 1, pp. 1–24.

Sutton, J. E. G. (1976) 'Iron-working around Zaria', *Zaria Archaeology Paper*, 8 (Centre for Nigerian Cultural Studies,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Sutton, J. E. G. (1977) 'Radiocarbon dates for the Samaru West ironworks', *Zaria Archaeology Paper*, 8 (Addendum).

Sutton, J. E. G. (1979) 'Towards a less orthodox history of Hausaland', *JAH*, 20, 2, pp. 179–201.

Sutton, J. E. G. (1984) 'Archaeology in Rwanda and Burundi' (Book Review), *JAH*, 25, 2, pp. 222–3.

Sutton, J. E. G. and Roberts, A. D. (1968) 'Uvinza and its salt industry', *Azania*, 3, pp. 45–86.

Swartz, B. K. and Dumett, R. E. (eds) (1980) *West African Cultural Dynamics* (The Hague: Mouton)

al-Suyūṭī (1969) *Ta'rīkh al-khulafā'* (Cairo).

al-Ṭabarī, M. b. Dj. (1879–1901) *Annales: Ta'rīkh al-rusūl wa'l-mulūk*. (15 Vols. ed. J. M. de Goeje *et al.* Leiden: J. Brill).

al-Ṭabarī (1329 AH) *Tafsīr al-Ḳurān* (Būlāḳ).

al-Ṭabarī (1962–7) *Ta'rīkh al-rusūl wa-l-mulūk*, ed. by M. Abū 'l-Faḍl Ibrahim (Cairo).

al-Tahawī, Abū Dja'far (1950–1) *Mukhtaṣar al-Tahawī* (Cairo: 1370 AH).

Talbi, M. (1962) 'Kairouan et le mālikisme espagnol', *Etudes d'Orientalisme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Lévi-Provençal*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Talbi, M. (1966) *L'Emirat Aghlabide, 184–296 (800–909). Histoire politique*. (Paris: Maisonneuve).

Talbi, M. (1971) 'Un Nouveau fragment de l'histoire de l'Occident musulman (62–196/682–812). L'épopée d'Al-Kahina', *RT*, 19, pp. 19–52.

Talbi, M. (1973) 'Hérésie, acculturation et nationalisme des Berbères barġawāṭa' in *Actes du Premier Congrès d'Etudes des Cultures méditerranéennes d'influence arabo-berbère* (Alger: SNED), pp. 217–33.

Talbi, M. (forthcoming) *Etudes d'histoire Ifriqiyenne.*
Tamplin, M. J. (1977) *Preliminary Report on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the Republic of Botswana* (Peterborough: Trent University).
Tamrat, T. (1972) *Church and State in Ethiopia, 1270–152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andia, B. (1982–3) 'Sites d'habitats anciens sur la rive mauritanienne du fleuve Sénégal. Premières prospections' (Mémoire de fin d'Etudes,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de Nouakchott).
Ta'rīkh al-Fattāsh (1913–14), ed. and tr. by O. Houdas and M. Delafosse (Paris: Leroux).
Ta'rīkh al-Sūdān (1900) *Tarikh es-Soudan, par Abderrahmane ben Abdallah ben Imram ben Amir Es-Sadi*, tr. by O. Houdas (Paris: Leroux).
Tauxier, L. (1937) *Moeurs et histoire des Peuls* (Paris: Payot).
Taylor, M. O. V. (1979) 'Late Iron Age settlements o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Vredefort Dome'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Taylor, M. O. V. (1984) 'Southern Transvaal stone walled sites – a spatial consideration' in M. J. Hall *et al.* (eds), pp. 248–51.
Tedeschi, S. (1969) 'Note storiche sulle isole Dahlak' in *Proc. of the 3rd Intern. Conf.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pp. 49–74.
Teixeira da Mota, V. A. (1963) 'Méthodes de navigation et cartographie nautique dans l'Océan Indien avant le XVIe siècle', *Studia* (Lisbon), 11, pp. 45–9.
Terrasse, H. (1949–50) *Histoire du Maroc* (2 vols, Casablanca: Atlantides).
Terrasse, H. (1951) 'Consequences d'une invasion berbère: le rôle des Amoravides dans l'histoire de l'Occident' in *Mélanges d'histoire du moyen âge de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Louis Halphen* (Paris: PUF), pp. 673–81.
Terrasse, H., Meunié, J. and Deverdun, G. (1957) *Nouvel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Marrakech* (Paris)
Thelwall, R. (1978) 'Lexicostatical relations between Nubian, Daju and Dinka' in *Etudes Nubiennes*, pp. 265–86.
Thelwall, R. (1982) 'Linguistic aspects of greater Nubian history' in P. van Moorsel (ed.), p. 121.
Thilmans, G. (1979) 'Les disques perforés en céramique des sites proto-historiques du Fleuve Sénégal', *NA*, 162, pp. 59–61.
Thilmans, G. and Descamps, C. (1974) 'Le site mégalithique de Tiékène-Boussoura (Sénégal). Fouilles de 1973–4', *BIFAN*, (B), 36, 3, pp. 447–96.
Thilmans, G. and Descamps, C. (1975) 'Le site mégalithique de Tiékène-Boussoura (Sénégal). Fouilles de 1974–5', *BIFAN* (B), 37, 2, pp. 259–306.
Thilmans, G. and Descamps, C. (forthcoming) *Protohistoire du Sénégal*, Vol. 3.
Thilmans, G., Descamps, C. and Khayat, B. (1980) *Protohistoire du Sénégal.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Vol. I. Les sites mégalithiques* (Dakar: IFAN).
Thilmans, G. and Ravisé, A. (1983) *Protohistoire du Sénégal. Vol. II. Sintiou-Bara et les sites du Fleuve* (Dakar: IFAN).
Thilmans, G., Robert, D. and Ravisé, A. (1978) 'Découverte d'un fragment de poterie émaillée à Sintiou Bara (fleuve Sénégal)', *NA*, 159, pp. 59–61.
Thomassey, P. and Mauny, R. (1951) 'Campagne de fouilles à Koumbi Saleh', *BIFAN*, 13, pp. 436–62.
Thomassey, P. and Mauny, R. (1956) 'Campagne de fouilles de 1950 à Koumbi Saleh (Ghana?)', *BIFAN*, 17, pp. 117–40.
Thompson, L. A. and Ferguson, J. (eds) (1969) *Africa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bada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Thorbecke, A. (1867) *Antarah, ein vorislamischer Dichter* (Leipzig).
Tibbets, G. R. (ed.) (1971) *Arab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London: Luzac).
Tibbets, G. R. (1979) *A Study of the Arabic Texts Containing Material on South-East Asia* (Leiden: Brill).
Torday, E. and Joyce, T. A. (1910) *Notes ethnographiques sur les peuples communément appelés Bakuba, ainsi que sur les peuplades apparentées. Les Bushongo* (Tervuren: Musée du Congo Belge).
Török, L. (1975) 'Man in the Vessel, an intepretation of a Nubian fresco representation' in K. Michalowski (ed.), pp. 121–5.
Török, L. (1978) 'Money, economy and administration in Christian Nubia', *Etudes Nubiennes*, 1978, pp. 287–311.
Toupet, C. (1966) *Description du milieu physique de Massif de l'Assaba (Mauritanie)* (Dakar: IFAN).
Toupet, C. (1976) 'L'evolution du climat de la Mauritanie du Moyen âge jusqu'à nos jours' in *Colloque de Nouakchott*, pp. 56–63.

Toupet, C. (1977) *La sédentarisation des nomades en Mauritanie centrale sahélienne* (Paris: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Trabalhos de arqueologia e antropologia' (1980) in *Arqueologia e conhecimento do passado*, 1 (Maputo: 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
Treinen-Claustre, F. (1978) 'Eisenzeitliche Funde aus dem Nord-Tschad' in R. Kuper (ed.), pp. 330–3.
Trevor, T. G. and Mellor, E. T. (1908) 'Report on a reconnaissance of the north-western Zoutpansberg District' in *Special Publication Transvaal Mines Department* (Pretoria: Government Printer).
Triaud, J.-L. (1968)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islamisation du Mali des origines à 1300', *BIFAN* (B), 30, 4, pp. 1329–51.
Trigger, B. G. (1965) *History and Settlement in Lower Nub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69).
Trigger, B. G. (1967) *The Late Nubian Settlement at Arminna West* (New Haven-Philadelphia: Publications of the Pennyslvania-Yale Expedition to Egypt, 2).
Trigger, B. G. (1970)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Christian Nubia' in E. Dinkler (ed.), pp. 347–87.
Trimingham, J. S. (1949) *Islam in the Sudan* (London: OUP).
Trimingham, J. S. (1952) *Islam in Ethiopia* (London: OUP).
Trimingham, J. S. (1959)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OUP).
Trimingham, J. S. (1962)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OUP).
Trimingham, J. S. (1964) *Islam in East Africa* (London: OUP).
Tritton, A. S. (1958)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f the Isma'ilis', *JRAS*, pp. 178–88.
Troupeau, G. (1954) 'La description de la Nubie d'al-Uswānī (IVe/Xe siècle)', *Arabica*, 1, pp. 276–88.
Tubiana, M.-J. (1964) *Survivances préislamiques en pays Zaghawa*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Turay, A. K. (1978) 'Language contact: Mende and Temne - a case study', *Africana Marburgensia*, 11, 1, pp. 55–73.
Tylecote, R. (1975) 'Iron smelting at Taruga, Nigeria', *Journ. Hist. Metall. Soc.* Soc., 9, pp. 49–56

Ukwu, U. (1967)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marketing in Igboland', *JHSN*, 3, pp. 647–62.
al-'Umarī ibn Faḍl Allāh (1927) *Masālik al abṣār fī mamālik al-amṣār: l'Afrique moins l'Egypte*, tr. by Gaudefroy-Demombynes (Paris: Geuthner).
Unesco (1980) *Relations historiques à travers l'Océan Indien* (Paris: Unesco,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Etudes et Documents, 3).
Urvoy, Y. (1936)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u Soudan central (colonie du Niger)* (Paris: Larose).
Urvoy, Y. (1941) 'Chronologie du Bornou', *JSA*, 11, pp. 21–32.
Urvoy, Y. (1949) *Histoire de l'Empire du Bornou* (Paris: Larose).

Vacca, V. (1923 5) 'Le ambascerie di Maometto ai Sovrani secondo Ibn Ishāq ed. al-Wāqidī', *RSO*, 10, pp. 87–109.
Vajda, G. (1971) 'Ḥām' in B. Lewis *et al.* (eds), pp. 104–5.
Vallvé, J. (1967) 'Sobre algunas problemas de la invasion musulmana', *Anuario de Estudios Medievales*, 4, pp. 261–367.
Vanacker, C. (1973) 'Géographie économique de l'Afrique du Nord, selon les auteurs arabes du IXe au milieu du XIIe siècle', *Annales ESC*, 28, 3, pp. 659–80.
Vanacker, C. (1979) *Tegdaoust II. Recherches sur Aoudaghost. Fouille d'un quartier artisanal* (Nouakchott: Institut Mauritanien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Vanacker, C. (1983a) 'Cuivre et métallurgie du cuivre à Tegdaoust' in N. Echard (ed.), pp. 89–108.
Vansina, J. (1969) 'The bells of kings', *JAH*, 10, 2, pp. 187 97.
Vansina, J. (1971) 'Inner Africa' in *Horizon History of Africa* (New York: American Heritage Publishing Company) pp. 261 73.
Vansina, J. (1979–80) 'Bantu in the crystal ball', *HA*, 6, pp. 287–333; 7, pp. 293–325.
Vansina, J. (1984) 'Western Bantu expansion', *JAH*, 25, 2, pp. 129–44.
Vansina, J., Mauny, R. and Thomas, L. V. (eds) (1964a)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UP).
Vansina, J., Mauny, R. and Thomas, L. V. (1964b) 'Introductory summary' in Vansina, J. *et al.* (eds), pp. 59 103.
Vantini, G. (1970a) *The Excavations at Far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Nubia* (Bologna: Nigrizia).
Vantini, G. (1970b) 'Le Roi Kirki de Nubie à Baghdad: un ou deux voyages?' in E. Dinkler (ed.), pp. 41–8.
Vantini, G. (1975) *Oriental Sources Concerning Nubia* (Heidelberg and Warsaw: Heidelberger Akad. d Wiss. and Polish Acad. of Sciences).

Vantini, G. (1981a) *Christianity in the Sudan* (Bologna: EMI).

Vantini, G. (1981b) 'Les fresques de Faras et l'histoire', *BSA Copte*, 23, pp. 183–97.

Vercoutter, J. (1970) 'Les trouvailles chrétiennes françaises à Aksha, Mirgissa et Sai' in E. Dinkler (ed.), pp. 155–6.

Vercoutter, J. (1976) 'The iconography of the black in ancient Egypt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twenty-fifth dynasty' in J. Vercoutter, F. M. Snowden and J. Desanges, *The Image of the Black in Western Art* (Lausanne), pp. 33–78.

Vercoutter, J., Leclant, J., Snowden, F. M. and Desanges, J. (1976) *L'Image du Noire dans l'Art occidental*, Vol. 1 (Fribourg: Office du Livre).

Vérin, P. (ed.) (1967) *Arabes et islamisés à Madagascar et dans l'Océan Indien* (Tananarive: Revue de Madagascar).

Vérin, P. (1974), 'Archeology in Madagascar (1971–1973)', *The Far Eastern Pre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 pp. 37–40.

Vérin, P. (1975) *Les Echelles anciennes du commerce sur les côtes nord de Madagascar* (Lille: Université de Lille).

Vérin, P. (1980) 'Les apports culturels et la contribution africaine au peuplement de Madagascar' in Unesco 1980, pp. 103–24.

Vilá, J. B. (1956) *Los Almorávides* (Tetuán).

Viré, M. M. (1958) 'Notes sur trois épitaphes royales de Gao', *BIFAN* (B), 20, pp. 368–76.

Viré, M. M. (1959) 'Stèles funéraires musulmanes soudano-sahéliennes', *BIFAN* (B), 21, pp. 459–500.

Vogel, J. O. (1971) *Kumadzulo* (Lusaka).

Vogel, J. O. (1972a) 'The Shongwe tradition', *Zambia Museums Journal*, 3, pp. 27–34.

Vogel, J. O. (1972b) 'On Early Iron Age funerary practice in southern Zambia', *Current Anthropology*, 13, pp. 583–6.

Vogel, J. O. (1973a) 'The Early Iron Age sites at Sioma mission western Zambia', *Zambia Museums Journal*, 4, pp. 153–69.

Vogel, J. O. (1973b) 'Some Early Iron Age sites in southern and western Zambia', *Azania*, 8, pp. 25–54.

Vogel, J. O. (1973c) 'The Mosiatunya sequence', *Zambia Museums Journal*, 4, pp. 105–52.

Vogel, J. O. (1975) *Simbusenga. The Archeology of the Intermediate Period of the Southern Zambia Iron Age* (Lusaka: Zambia Museum Papers, 4).

Voigt, E. A. (1980) 'Reconstructing Iron Age economies of the northern Transvaal: a preliminary report', *SAAB*, 35, 131, pp. 39–45.

Voigt, E. A. (ed.) (1981a) *Guide to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Transvaal* (Pretoria: Transvaal Museum).

Voigt, E. A. (1981b) 'The Faunal remains from Schroda' in E. A. Voigt (ed.), pp. 55–62.

Voigt, E. A. (1983) *Mapungubwe: An Archaeozo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 Iron Age Community* (Pretoria: Transvaal Museum, Transvaal Museum Monograph, 1).

Vossen, R. (1978) 'Notes on the territorial history of the Maa-speaking peoples', *KHR*, 6.

al-Wāḥidī (1315 AH) *Asḥāb al-nuzūl* (Cairo).

Wai-Ogosu, B. (1974) 'Pleistocene man in Afric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West Africa', *JHSN*, 7, 2 pp. 357–68.

Waite, G. and Ehret, C. (forthcoming)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southern Tanzania', *TNR*.

Walker, B. (ed.) (1984)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South African Savanna Ecosystem*.

Wallis, J. R. (1955) 'The Kwahus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Afram plains', *THSG*, 1, 3, pp. 10–26.

Wang Gungwu (1980) 'Les Chinois et les pays situés de l'autre côté de l'Océan Indien' in *Unesco* (1980) pp. 69–75.

Wansbrough, J. (1968) 'The decolonization of North African history', *JAH*, 9, 4 pp. 643–50.

Wansleben, J. M. (1677) *Histoire de l'eglise d'Alexandrie* (Paris).

Watson, A. M. (1983)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 700–1100* (Cambridge: CUP).

Watt, W. M. (1953) *Muhammad at Mec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eeks, K. R. (1967) *The Classic Christian Townsite at Arminna West* (New Haven-Philadelphia: Publications of the Pennsylvania-Yale Expedition to Egypt, 3).

Weisweiler, M. (1924) *Buntes Prachtgewand über die guten Eigenschaften der Abessinier* (Hannover: Lafaire).

Weitzmann, K. (1970) 'Some remarks on the source of the fresco paintings of the cathedral of Faras' in E. Dinkler (ed.) (1970), pp. 325–46.

Welbourne, R. (1975) 'Tautswe Iron Age site: its yield of bones', *BNR*, 7, pp. 1–16.
Welmers, W. E. (1958) 'The Mande languages' in *Georgetown Univ. Monograph Series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1, pp. 9–24.
Welmers, W. E. (1971) 'Niger Congo Mande' in T. Sebeok (ed.), pp. 113–40.
Welmers, W. E. (1973) *African Language Structur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lsby, D. A. (1983) 'Recent work at Soba East in Central Sudan', *Azania*, 18, pp. 165–80.
Wenig, S. (1978) *Africa in Antiquity: The Arts of Ancient Nubia and the Sudan* (2 vols, New York: Brooklyn Museum).
Wensinck, A. J. *et al.* (1933–69) *Concordance et indices de la tradition musulmane* (7 vols, Leiden: Brill).
Werner, O. (1970) 'Metallurgische Untersuchungen der Benin Bronzen des Museums für Volkerkunde Berlin', *Baessler-Archiv*, 18, pp. 71–153.
Wertime, T. A. and Muhly, J. D. (1980) *The Coming of the Age of Iron* (New Haven: YUP).
Wessel, K. (ed.) *Christentum am Nil* (Recklinghausen: Vertag Aurel Bongers).
Westermann, D. (1928) 'Die westatlantische Gruppe der Sudansprachen', *MSOS*, 31, 3, pp. 63–86.
Wheatley, P. (1961) 'Geog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the Sung maritime trad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2, 2, p. 54.
Wheatley, P. (1970)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Yoruba urbanism', *CSSH*, 12, 4, pp. 393–423
Wheatley, P. (1971) *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Edinburgh: EUP).
Wheatley, P. (1975) 'Analecta Sino-Africana Recensa' in H. N. Chittick and R. I. Rotberg (eds), pp. 76–114.
Whitehouse, D. (1970) 'Siraf a medieval port on the Persian Gulf', *WA*, 2, pp. 141–58.
Wiesenfeld, S. L. (1967) 'Sickle-cell trait in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evolution', *Science*, 157, pp. 1134–40.
Wiet, G. (1932) *L'Egypte byzantine et musulmane*, Vol. 2 of *Précis de l'Histoire de l'Egypte* (Cairo).
Wiet, G. (1937) *L'Egypte arabe*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nationale).
Wiet, G. (1953) 'Roitelets de Dahlak', *BIE*, 34, pp. 89–95.
Wiet, G. (1966) *Introduction à la littérature arabe* (Paris: Unesco-Maisonneuve).
Willett, F. (1960) 'Ife and its archaeology', *JAH*, 1, 2, pp. 231–48.
Willett, F. (1967) *Ife in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n Sculpture* (London: Thames & Hudson).
Willett, F. (1970) 'Ife and its archaeology' in J. D. Fage and R. A. Oliver (eds), pp. 303–26.
Willett, F. (1971) 'A survey of recent results in the radiocarbon chronology of western and northern Africa', *JAH*, 12, 3, pp. 339–70.
Willett, F. (1973) 'Archaeology' in S. O. Biobaku (ed.), pp. 111–39.
Willett, F. and Fleming, S. J. (1976) 'A catalogue of important Nigerian copper-alloy castings dated by thermoluminescence', *Archaeometry*, 18, 2, pp. 135–46.
Williams, D. (1969) 'African iron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in L. A. Thompson and F. Ferguson (eds), pp. 62–80.
Williams, D. (1974) *Icon and Image* (London: Allen Lane).
Williamson, K. L. A. (1971) 'The Benue-Congo languages and Ijo' in T. Sebeok (ed.), pp. 245–306.
Willis, J. R. (1979) 'Reflections on the diffusion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in J. R. Willis (ed.), pp. 1–15.
Willis, J. R. (ed.) (1979) *Studie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Vol. 1, *The Cultivators of Islam* (London: Frank Cass).
Wilson, T. H. (1982) 'Spatial analysis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Paideuma*, 28, pp. 201–20
Wissman, H. von and Höfner, M. (1952) *Beitrage zur historischen Geographie der vorislamischen Sudarabien* (Wiesbaden: Steiner).
Wolf, E. R. (1951)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Mecca and the origins of Islam', *SWJA*, vol. 7, pp. 329–56
Wood, L. J. and Ehret, C. (1978) 'The origins and diffusion of the market institution in East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5, pp. 1–17.
Wright, H. T. (1984) 'Early seafarers of the Comoro Islands: the Dembeni Phase of the IXth–Xth centuries AD', *Azania*, 19, pp. 13–59.
Wrigley, C. C. (1960) 'Speculations on the economic prehistory of Africa', *JAH*, 1, 2, pp. 189–204.
Wüstenfeld, F. (1881) *Geschichte der Fatimiden-chalifen. Nach arabischen Quellen* (Gottingen: Dieterich).

al-Ya'kūbī (1870–94) *Kitāb al-buldān*, ed. by M. J. de Goeje (Leiden: Brill).
al-Ya'kūbī (1883) *Ibn Wadhih qui dicitur al-Ja'qūbī Historiae (Kitāb al-ta'rīkh)* (2 vols, ed. M. T. Houtsma, Leiden: Brill).
al-Ya'kūbī (1892) *Kitab al-Buldān* (ed. by M. J. de Goeje, Leiden: Brill).
al-Ya'kūbī (1937) *Les pays*, tr. by G. Wiet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e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al-Ya'kūbī (1962) *Description du Maghreb en 276/889, Extrait du Kitāb al-Buldān*, Arabic text by H. Pérès, tr. by G. Wiet (Algiers: Institut d'Etudes Orientale).
Yākūt (1866–73) *Jacut's Geographisches Wörterbuch* [*Mu'jam al-buldān*] (6 vols, ed. by F. Wustenfeld, Leipzig: Brockhaus).
Yākūt (1907) *Mu'djam al-buldān* (10 vols, Cairo: 1325 AH).
York, R. N. (1973) 'Excavations at New Buipe', *WAJA*, 3, pp. 1–189.

Zaborski, A. (1965) 'Notes on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Beja tribes', *FO*, 7, pp. 289–307.
Zaborski, A. (1970) 'Some Eritrean place-names in Arabic medieval sources', *FO*, 12, pp. 327–37.
Zaborski, A. (1971) 'Beja and Tigrē in 9th–10th century period', *RO*, 35, 1, pp. 117–30.
Zaghlūl, S. (1965) *Ta'rīkh al-Maghrib al-'Arabī* (Cairo).
Zaydān, J. (n.d.) *Al-'Arab kabla 'l-Islām* (Cairo: Dār al-Hilāl).
Zaydān, J. (1902) *Ta'rīkh al-Tamaddun al-Islāmī* (5 vols, Cairo).
Ziegert, H. (1969) 'Uberblick zur jüngeren Besiedlungsgeschichte des Fezzan', *BGA*, 8, pp. 49–58.
al-Zuhrī (1968) *Kitāb al-Dju'rāfiyya. Mappemonde du Calife al-Ma'mun réproduite par Fazārī (IIIe/IXe s.), rééditée et commentée par Zuhrī (VIe/XIIe s.)*. Arabic text by Muḥammad Hadj-Sadok, *BEO*, 21, pp. 1–312.
Zyhlarz, E. (1928a) *Grundzüge der nubischen Grammatik im christlichen Frühmittelalter (Altnubisch)*, *AKM*, 18, 1.
Zyhlarz, E. (1928b) 'Zur Stellung des Darfur-nubischen', *WZKM*, 35, pp. 84–123, 188–212.
Zyhlarz, E. (1932) 'Neue Sprachdenkmaler des Altnubischen' in S. R. K. Glanville (ed.) *Studies presented to F. Ll. Griffith* (London: OUP, pp. 187–97).

索　引

Aba, 阿巴, 84, 489
'Ababda, 阿巴布达人, 83
Abadan, 阿巴丹, 21
Abakaliki, 阿巴卡利基, 489, 523, 528
Abalessa, 阿巴莱萨, 124, 125
Abam, 阿巴姆, 495, 496
Abanyomland, 阿巴尼奥姆兰, 524
Abzar, 阿卜扎尔, 292
al-'Abbādī, A. M., A. M. 阿巴迪, 345
'Abbadān, 阿巴丹, 728
al-Abbas, 阿巴斯, 174
Abbasids, 阿拔斯王朝, 22, 45, 49-53, 314, 577, 581;
在埃及, 170-2, 177-8; 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 319, 330; 在北非, 65; 在撒哈拉, 288, 392, 396; 阿拔斯王朝和奴隶, 723, 724-5, 730
'Abd al-'Azīz, 阿卜德·阿齐兹, 170
'Abd al-'Azīz ibn Marwān, 阿卜德·阿齐兹·伊本·马尔万, 170, 240
'Abd al-'Azīz, 'Umar ibn, 奥马尔·伊本·阿卜德·阿齐兹, 244, 247
'Abd al-Djabbār b. Kays al-Murādī, 阿卜德·贾巴尔·本·凯斯·穆拉迪, 252
'Abd al-Hāmid, 阿卜德·哈米德, 255
'Abd al-Kādir al-Djīlānī, 阿卜德·卡迪尔·吉拉尼, 43
'Abd al-Karīm, 阿卜德·卡里姆, 80
'Abd Allāh ibn al-Khattāb al-Hawwāwī, 阿卜杜拉·伊本·哈塔卜·霍瓦里, 289
'Abd Allāh ibn al-Zubayr, 阿卜杜拉·伊本·祖拜尔, 231
'Abd Allāh ibn Hiyān al-Ibādī, 阿卜杜拉·伊本·希扬·易巴迪, 289
'Abd Allāh ibn Mu'izz, 阿卜杜拉·伊本·穆仪兹, 182
'Abd Allāh ibn Mas'ūd al-Tudjībī, 阿卜杜拉·伊本·马斯乌德·图吉比, 252
'Abd Allāh ibn Sa'd, 阿卜杜拉·伊本·萨阿德, 166, 231-2
'Abd Allāh ibn Walghū, 塔甲克·伊本·齐亚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瓦尔古, 241
'Abd Allāh ibn Yāsīn al-Djazūlī,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 309
'Abd al-Malik, 阿卜德·马利克（哈里发）, 49, 170, 729, 730
'Abd al-Malik b. Habīb, 阿卜德·马利克·本·哈比卜, 274
'Abd al-Malik ibn Nakhkās al-Gharfa, 阿卜德·马利克·伊本·纳赫哈斯·加尔法, 406
'Abd al-Malik ibn Marwān, 阿卜德·马利克·伊本·马尔万, 236-7, 238, 243, 281
'Abd al-Rahmān II, 阿卜德·拉赫曼二世, 270-1
'Abd al-Rahmān III, 阿卜德·拉赫曼三世, 52, 263, 319
'Abd al-Rahmān al-'Umarī, 阿卜德·拉赫曼·乌玛里, 209-10
'Abd al-Rahmān b. Abi 'Ubayda al-Fihrī, 阿卜德·拉赫曼·本·阿比·奥贝达·费赫里, 380
'Abd al-Rahmān b. Habīb, 阿卜德·拉赫曼·伊本·哈比卜, 252-3, 259, 260, 263, 271
'Abd al-Rahmān b. Mu'āwiya, 阿卜德·拉赫曼·本·穆阿维耶, 263
'Abd al-Rahmān b. Rustum, 阿卜德·拉赫曼·伊本·鲁斯泰姆, 65, 253, 278
'Abd al-Wahhaāb, 阿卜德·瓦哈卜, 254, 281, 288
'Abd al-Wāhid al-Hawwārī, 阿卜德·瓦希德·哈瓦里, 250
'Abd ar-Rahmān, 阿卜德·拉赫曼, 309
'Abdallāh ibn Abād, 103n; *see also* Ibadites, 阿卜杜拉·伊本·阿巴德, 103注; 又见"易巴德教派"栏目
'Abdallāh ibn Abī Sarh, 阿卜杜拉·伊本·阿比·萨尔赫, 194
'Abdallāh ibn Yāsīn,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 65, 71, 106
'Abdallāh ibn Yāsīn al-Djazūlī,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 337, 340, 342-6, 348
'Abdallāh Nirkī, 阿卜杜拉·尼尔基, 197, 204, 221
'Abdullāh al-Ansammānī, 阿卜杜拉·安萨姆马尼, 109
'abīd al-shirā', 沙拉阿奴隶（买来的黑奴）, 725
Abiriba, 阿比里巴, 522
Abodum, 阿博敦, 499
Abofur, see Bafour, 阿博富尔人, 见"巴福尔人"栏目
Abraha, 阿布拉哈, 706, 711
Abraham, 亚伯拉罕, 31, 93
Absbo/Babra Barkān, 阿布斯博/巴布拉·巴尔坎, 581
abtar, 布特尔（Butr）的单数形式, 226
Abū 'Abbad Ma'bad ibn Wahb, 阿布·阿巴德·马巴德·伊本·瓦赫卜, 730
Abū 'Abd Allāh al-Dāi, 阿布·阿卜杜拉·达伊, 252, 261
Abū 'Abd Allāh al-Shī'ī, 阿布·阿卜杜拉·希伊, 280, 317-18, 320-1
Abū 'Abd Allāh Muhammad ibn Tīfāt, 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提法特, 309
Abū 'Abd Allāh Sa'īd Ibn Djubar ibn Hishām, 阿布·阿卜杜拉·赛义德·伊本·朱巴尔·伊本·希沙姆, 731
Abū 'Abd al-Rahmān al-'Umarī,

阿布·阿卜德·拉赫曼·乌玛里, 209－10
Abū'Abdallāh, Muhammad, 穆罕默德·阿布·阿卜杜拉(谢赫), 340, 581
Abū al－Muhādjir, 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 233－6
Abū al－Muhādjir Dīnār 阿布·穆罕吉尔·迪纳尔, 247
Abū'Atā ibn Rabāh, 阿布·阿塔·伊本·拉巴赫, 731
Abū Bakr(632 634), 阿布·贝克尔(公元 632－634 年在位), 43, 47, 575－6, 709
Abū Bakr Ahmad ibn Hallūf al－Fāsī, 阿布·贝克尔·艾哈迈德·伊本·哈卢夫·法西, 406
Abū Bakr ibn Muhammad ibn Azhar al－din, 阿布·贝克尔·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爱资哈尔·丁, 585
Abū Bakr ibn'Umar(c. 1059), 阿布·贝克尔·伊本·奥马尔(公元 1059 年), 346, 348－51, 360－1
Abū Dhubyān, 阿布·祖卜扬, 708
Abū Dja'far al－Mansūr, 阿布·贾法尔·曼苏尔, 260
Abū Dulāma, 阿布·杜拉马, 730
Abū Hāmād, 阿布·哈马德, 209
Abū Hāmid al－Ghazālī, see al－Ghazālī, 阿布·哈米德·加扎利, 见"加扎利"栏目
Abū Hātim, 阿布·哈提姆, 253
Abū Ibrāhīm Ahmad, 阿布·易卜拉欣·艾哈迈德, 261
Abū'Imrān al－Fāsī, 阿布·伊姆兰·法西, 336－7, 342
Abū'Inān, 阿布·伊南, 108
Abū Khazar, 阿布·哈扎尔, 324
Abū Kurra, 阿布·库拉, 251, 253
Abū l'Abbas al－Saffāh, 阿布尔·阿巴斯·萨法赫, 726
Abū Lakıt, 阿布·拉基特, 709
Abū l－'Atāhiya, 阿布尔·阿塔希耶, 725
Abū'l－Hasan al－Baghdādī, 阿布尔·哈桑·巴格达迪, 731
Abū'l－hımār, see Abu Yazīd Makhlad, 阿布尔·希马尔, 见"阿布·亚齐德·马赫拉德·伊本·凯达德"栏目
Abū'l－Yusr al－Kātıb, 阿布尔·优斯尔·卡蒂布, 270
Abū Marwān'Abd al－Malık, 阿布·马尔万·阿卜德·马利克, 365
Abū Mihdjān, 阿布·米赫贾恩, 729
Abū Muslim, 阿布·穆斯林, 40
Abū Muwayhibah, 阿布·穆瓦伊希巴赫, 710
Abū Rakwa, 阿布·拉克瓦, 184, 215
Abū Rustam, 阿布·鲁斯塔姆, 406
Abū Sāleh, 阿布·萨利赫, 208
Abū Sālih, 阿布·萨利赫, 199
Abū Shīs 阿布·什斯, 723
Abū Sufyān, 阿布·苏夫扬, 254
Abū Tālib, 阿布·塔利卜, 86, 575, 710
Abū Tammām, 阿布·塔曼姆, 270
Abū'Ubayda'Abd al－Hamīd al－Djienāwunī, 阿布·乌巴依达·阿卜德·哈米德·吉纳乌尼, 293, 451
Abū 'Uthmān Sa'id ibn Misdjah, 阿布·奥斯曼·赛义德·伊本·米斯贾赫, 730
Abū Yazīd, 阿布·亚齐德, 69－70, 123, 341, 397, 741, 747, 784
Abū Yazīd Makhlad ibn Kaydād, 阿布·亚齐德·马赫拉德·伊本·凯达德, 323－4, 326, 328, 331
Abū'l－Khattāb, 阿布尔·哈塔卜, 253
Abū 'l－Khattāb 'Abd Allāh ibn as－Samh al－Ma'āfirī, 阿布尔·哈塔卜·阿卜杜拉·伊本·萨姆赫·马阿菲里, 284, 289
Abū'l－Khattāb al－Azdi, 阿布尔·哈塔卜·阿兹迪, 308
Abū'l－Misk Kāfūr, 阿布尔·米斯克·卡富尔, 717
Abuyazidu(Bayadjıdda), 阿布亚齐杜(巴亚吉达), 70
Accra, 阿克拉, 489, 495
Adal, 阿达尔, 阿达尔人, 561, 578, 584－5
Adam, 亚当(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32, 44
Adam, P., P. 亚当, 697
Adamawa, 阿达马瓦, 阿达马瓦人, 127, 523
Adamu Yanko, 阿达穆·扬科, 501
Adangme/Dangme, 阿当梅人/当梅人, 490, 492, 494, 495, 502－3
Adanse, 阿丹西, 501
Aden, 亚丁, 700－1, 714, 715－16
Aden, Gulf of, 亚丁湾, 85, 87
adīb, 文学家, 269－70
al－'Adid, 阿迪德, 189
Adjadābiya, 阿贾达比亚, 283, 290, 375, 406
Adjār Fezzān, 阿贾尔费赞人, 288
Adjdjer/Ajjer/Azger, 阿杰杰尔/阿杰尔/阿兹格尔, 阿杰杰尔人/阿杰尔人/阿兹格尔人, 303－4
Adjedabia, see Adjadābiya, 阿吉达比亚, 见"阿贾达比亚"栏目
Adjilū al－Gharbıyya, 阿杰卢·加尔比亚(西阿杰卢), 296
'adl, 公道证人, 731
Adradj, see Daradj, 阿德拉杰, 见"达拉杰"栏目
Adrār, 阿德拉尔, 126, 129, 130, 301, 311－13, 339, 343, 346
Adrār des Ifoghas, 伊福加斯高原, 124, 125, 138, 301, 303－6, 372
'Adud al－Dawlah, 阿杜德·道拉, 725
Adulis, 阿杜利斯, 559, 560, 561, 562, 577
Adwuku, 阿德武库, 502
Afar, 阿法尔人, 86, 561
Afārika, 阿非利加人, 229
al－Afdal Kutayfāt, 阿夫达尔·库泰法特, 187
Afghanistan, 阿富汗, 48, 52
Afikpo, 阿菲波, 489, 492, 528
Aflah ibn'Abd al－Wahhāb, 阿夫拉赫·伊本·阿卜德·瓦哈卜, 266, 297
Afrikaans, 阿非利堪斯语(布尔语), 147
Agar/Aggar, 阿贾尔, 288
Agatu, 阿加图人, 490, 492
Agaw, 阿高, 阿高人, 561, 567
age－sets, 年龄组, 638－9

al－Aghlab，阿格拉布，51
Aghlabids，阿格拉布王朝，7，51，65，243；阿格拉布王朝和法蒂玛王朝，314，317－18，325，328，在马格里布，254，255，260－1，265，271；阿格拉布王朝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379－80，383，387，392
Aghmāt，阿格马特，395；阿格马特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38－9，341，348，363；阿格马特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375，400－1，415
Aghmāt－Urīka，阿格马特－瓦里卡，235
'Aghribat al－'Arab，"阿拉伯的乌鸦"（指阿拉伯黑种诗人），707
Agni，阿格尼人，494
Agowo，阿戈伍，562，570－3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农业和畜牧业：讲班图语各族和农业、畜牧业，146－55散见各处，160，667－74，678－80；中部非洲，644，658，659，663，752；乍得，436，441，449；东部非洲，586，587，619－33散见各处，637－8，641－2，753；埃及，170，182，185，188，192，758；埃塞俄比亚，559，608－9，610；几内亚／西非，461－6，470，480，482－3，494，499，501－2，504，541，544－5，549，555，753，756－7；马格里布，224，257－9，262，758－9；努比亚，204，759；撒哈拉，277，282－95，散见各处，302，304，312，377；南部非洲，667，669－74，678－80，752－4；技术，743－4
Ahābish，阿哈比什（麦加的雇佣军），708
Ahadiyyūn，阿哈迪荣人，199
Ahafo，阿哈福，489
Ahaggar，*see* Hoggar，阿哈加尔，见"霍加尔"栏目
Ahanta，阿汉塔人，490，492
ahl al－Kitāb，信奉圣书的人们，31，46，56，57，575
ahl al－masdjid，"马斯吉德"（每天去圣寺做礼拜的人们），176和注
ahl al－sunna，逊尼派信徒，53
Ahmad b. Tūlūn，*see* Ibn Tūlūn，Ahmad，艾哈迈德·伊本·图伦，见"伊本·图伦，艾哈迈德"栏目
Ahmad Bābā，艾哈迈德·巴巴，112，116－17
Ahmad Grañ，艾哈迈德·格兰，86
Ahmad ibn Kurhub，艾哈迈德·伊本·库尔胡布，325
Ahmad ibn'Umar al－'Udhrī，艾哈迈德·伊本·奥马尔·乌兹里，406
Ahmed ibn Ibrāhīm，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585
al－Ahsā，艾赫萨，606
al－Ahwas，阿瓦斯，577
al－Ahwāz，阿瓦士，728
Ahwene Koko，阿赫温尼·科科，496
Aïr，阿伊尔，125，129，139，303，305，476，762，769，770
Ajjer，*see* Adjdjer，阿杰尔，阿杰尔人，见"阿杰杰尔、阿杰杰尔人"栏目
'Ayn Farah，艾因·法拉赫，199
akabir，"阿卡比尔"（显要人物），299
Akaguland，阿卡古兰，524
Akan/Akanland，阿坎（地区），阿坎人／阿坎兰、阿坎人居住的区域，490，492－4，496，501，504－5，526，539－40
Akdjudjt，阿克儒特，377
Akpafu，阿帕富，502
Akram，阿克拉姆，306
Akuapem，阿夸彭，502
Akuapem Akan，阿夸彭的阿坎人，501
Akwa，阿夸，522
Akwamu，阿夸穆，500
Akwanshi，"阿克万希"硬石雕，524－5，551
Akwatia，阿夸蒂亚，499
Akwetes，阿克威蒂人，529
Akyekyemabuo，阿基基马布奥，501
Akyem Manso，阿基姆曼索，499，501
Alawis，阿拉维王朝，45
Aldabra，阿尔达布拉，587
Aleppo，阿勒波，179，183，184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297
Alexandria，亚历山大城，48，737；亚历山大城和拜占廷帝国，163－4；亚历山大城和伊斯兰教，165，171，186，188
Alfonso VI，阿方索六世，351
algebra，代数，6
Algeria，*see* Maghrib，阿尔及利亚，见"马格里布"栏目
Algiers，阿尔及尔，316，737
Alhucemas，阿尔胡塞马斯，243
'Ali(656－61)，阿里（公元656－661年在位），43，44，45，47，48，169，181，314－15，319，709
'Ali(961－66)，阿里（公元961－966年在位），179
'Ali(later al－Dawla)，阿里（即后来的赛义夫·道拉），179
'Ali'Abd Allāh al－Makki，阿里·阿卜杜拉·马基，406
'Ali b. Hammud，阿里·本·哈穆德，256
'Ali Bābā，阿里·巴巴，209
'Ali ibn Abi Tālib，阿里·伊本·阿比·塔利布，43，575
'Ali ibn Dūnama，阿里·伊本·杜纳马，110
'Ali Khalifa Humayd b Hishām al－Buhayri，阿里·哈利法·胡马亚德·本·希沙姆·布海里，195
'Ali，*murabit* (son of Ibrāhīm Sura)，阿里（伊斯兰隐修士），（易卜拉欣·苏拉之子），79
'Ali，Sonni(1464－92)，松尼·阿里（1464－92年在位），109，115－16
'Alids，阿里派，阿里后代，258
Alima river，阿利马河，154
Alkali，N. 努尔·阿尔卡利，458
Allah，安拉（真主），33
al－'Allaki，Wādi，瓦迪－阿拉基干河，197，373
Allison，P.，P. 阿利森，506，525－6，550
Almohads，阿尔莫哈德王朝，阿尔莫哈德人，7，18，99，228－9，363
Almoravids，阿尔莫拉维德王朝，阿尔莫拉维德人，4，7，18，54，99，316，336－66，460；伊本·亚辛的改革和圣战，343－50，在北部非洲，65，67，351－4，政治的、宗教的和经济的背景，336－42，阿尔莫拉维德和撒哈拉，278，304，378，386，388，400－2，413，427－8，431－2，434，撒哈拉以南地区，354－66；在苏丹地区，69－70，72，74－5，132，135，139
Alodia，阿洛迪亚，196－7，199，560

Alukan，阿卢坎，73
alum，明矾，292，422
'Alwa，阿勒瓦，84，447，759
Amalfi，阿马尔菲，18，264
amān，"阿曼"，通行许可证，47，181
Ambasambazimba，安帕桑巴津巴，683，689
Ambodisiny，安布迪西尼，683，686
Ambonifanane，安布尼法纳内，692
'Amda Seyon I，阿姆达·塞约恩一世，582，583，584
Amedzofe Avatime，阿梅德佐费阿伐蒂梅，502
Amhara empire，阿姆哈拉帝国，67，86
Amharic language，阿姆哈拉语，84
amil，"埃米尔"(总督)，239
al-Amin(d. 813)，阿明(公元813年逝世)，725
amir，埃米尔，178
'āmma，"阿玛"(平民)，268
'Ammār Ibn Yāsir，阿玛尔·伊本·雅西尔，709
'Amr b. al-'As, see Ibn al-'As，阿姆鲁·伊本·阿斯，见"伊本·阿斯"栏目
Amuowi，阿穆奥威，496，505
Anbara，安巴拉，407
Anbiya，安比亚、安比亚人，308，310-11，339
ancestors，祖先，640
Andah，B. W. B. W.安达，488，530
Andaro，安达鲁，683
al-Andalus, see Spain，安达卢斯，见"西班牙"栏目
Andalusia，安达卢西亚，66，179
Andarasiny, see Ambodisiny，安达拉西尼，见"安布迪西尼"栏目
Andaro，安达鲁，692-3，694
Andjimi/Ndjimi，安吉米/恩吉米，294，457
Andranosoa，安德拉努苏阿，683，692-3，694
Anfray，F.，F.安弗雷，559，572
Angas，安格斯人，535
Argoche，安戈谢，89
Angola，安哥拉，644，646，649
Anjouan，昂儒昂岛，89
Ankalās，安卡拉斯，291，292
'Annāba，安纳巴，316
annona，"安诺纳"(小麦征实)，164和注
Anquandah，J. J.安克安达，488
Ansār，"安萨尔"，辅士"(先知辅助者)，35
Antalaotra，安塔洛特人，89，90
Antandroy，安坦德鲁伊，692
'Antara b. Shaddād，安塔拉·本·沙达德，707-8
Antemoro，安泰莫罗人，90
anti Muslim reaction，反穆斯林，有关反应，115-18，236-40
Antioch，安条克，174，182
Antiochia，安蒂奥基克，50
'anwatān，"安瓦坦"(指对方拒绝投降，发动进攻占领城镇)，165和注
Anyi language，阿尼语，490，492
Apreku，阿普雷库，501
'Akil ibn Abī Tālib，阿基尔·伊本·阿比·塔利布，582
'Arab Tamīn，'I-，阿布尔·阿拉伯·塔明，225
Arab world state，阿拉伯世界性国家，2-3；又见"伊斯兰"(Islam)栏目
Arababnī，阿拉巴卜尼，86
Arabia，阿拉伯半岛，23，52，89；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559，563；阿拉伯半岛和马达加斯加，700-1；奴隶，707-10，715-16；又见"穆罕默德"(Mohammad)、"伊斯兰"(Islam)诸栏目
Arabian Gulf, see Persian Gulf，阿拉伯湾，见"波斯湾"栏目
Arabic language，阿拉伯语，阿拉伯文，59，61，88，90，92，111-12，114，169，293，355，451，578-9，597，599，601，604，605，681
Arabic-Malagasy script，用阿拉伯文和马尔加什文写的文献，681
Arabization and Islamization，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96，112-15；伊斯兰化没有伴随着阿拉伯化，87，又见"伊斯兰教，传播"(Islam, spread)栏目
Ar'ad，Negus Sayfa，赛义发·阿拉德(国王)，580
Aramaic language，阿拉米语，48
Arameans，阿拉米人，49
Arat-n-anna，阿拉特-恩-安纳娥，344
Aratou，阿拉图，559
Arbore，阿尔博雷人，625
archaeological sites，考古遗址，781；和讲班图语各族，149-50，156-8，160；中部非洲，643-63；乍得，437，441；东部非洲，586-97，602，608-9，614-15，620，622，628；埃塞俄比亚，559-60；几内亚/西非，466-9，471-83，492-525散见各处，545-7，555；马达加斯加，681，689-95；努比亚，199-204；撒哈拉，367，374-8，389-91，395，401-3，414-22，427-31，433；南部非洲，664-80
architecture, see art，建筑，见"艺术"栏目
Arigh, see Righ，阿里格，见"里格"栏目
arkān al-islām, see Five Pillars，伊斯兰教的五功，见"五大基本功课"栏目
Arkū(d. 1067)，阿尔库(1067年逝世)，454
Arkū b. Būlū，阿尔库·伊本·布卢，453
Armah，阿尔马，560，565
armies, see warfare，军队，见"战争"栏目
Arminna，阿尔明纳，197，204
Aro，阿罗人，521
ar-Ramal，阿尔-拉马尔，197，204
Arsenius，阿西尼厄斯，213
art and architecture，艺术和建筑，761-3，765-6，769-71，790-3；乍得441-2；东非，588-9，593-7，607-8，614；埃及，189-92，193；埃塞俄比亚，562，566-74，578；几内亚/西非，478-9，487，497-500，506-24，526，545，548-52；艺术、建筑和伊斯兰教，34，36，39；马达加斯加，691，693，694；马格里布，257-9，262，271，273，349，352-3，363-4；努比亚，196，201-3，205-14散见各处，216-23；撒哈拉，296，420，429-32；又见"陶器、制陶工艺"(pottery)栏目
Arusi，阿鲁西，86
Arzila，阿尔济拉，737
Asabat，阿萨巴特人，304
'asabiyya，部族意识，318

Asad b. al-Furāt, 阿萨德·伊本·福拉特, 178, 180, 264, 272, 274
Asante, 阿散蒂, 阿散蒂人, 463-4, 491, 499, 501
Asa/Old Asa, 阿萨人/古阿萨人, 617, 618, 629, 635, 637, 640
asfal al-nās, "阿斯法尔·奈斯"(卑贱的人们), 176
'Ashā Sulaym, 阿沙·苏莱姆, 723
Ashāb, "圣门弟子", 35
al-Ashama b. Abdjar, Nadjāshī, 阿沙玛·本·阿卜贾尔(埃塞俄比亚国王), 710
Ashanti, 阿散蒂, 阿散蒂人, 535
al-Ash'ari, 艾什尔里, 53
Asia: and Africa, 亚洲:亚洲与非洲 19-29, 383, 739; 亚洲和东非, 597, 602, 608, 612-15; 亚洲和伊斯兰教, 41, 49, 52; 亚洲和马达加斯加, 689-90, 696-703; 又见"中国"(China)"散居各地的非洲人"(diaspora in Asia, African)、"印度"(India)、"苏门答腊"(Sumatra)诸栏目
Asia Minor, 小亚细亚, 52, 54
Askalon, 阿斯卡伦, 188
Askār, 阿斯卡尔人, 286
askiya, 阿斯基亚(桑海君主的称号), 76, 80-1, 108-10, 116-17
al-Asnām, 阿斯南, 250
Asokrochona, 阿索克罗乔纳, 489, 492
'Assassins', 阿萨辛派, 45
Asselar, 阿塞拉尔, 162
as-sūdān, 黑苏丹人/黑人(单数), 712
as-Sūs al-Aksā, 苏斯-阿克萨, 307-8
Asu, 阿苏语族, 618, 622, 627
Asūf, *see* Sūf, 阿苏夫, 见"苏夫"栏目
al-aswad, 黑苏丹人/黑人(复数) 712
Aswān, 阿斯旺, 195, 197, 211
al-Aswānī, Ibn Sālim, 伊本·萨利姆·阿斯瓦尼, 196, 208, 211
Atacora Mountains, 阿塔科拉山脉, 491
Atara, dynasty, 阿塔拉王朝, 501
atar/ataptal, 阿塔尔/阿塔普塔尔,(石雕)524
Ateker, 阿泰克尔人, 630
Athbadj, 阿思巴吉人, 333
Atherton, J. H. J. H. 阿瑟顿, 547, 549-51
al-Athīr ibn Bātin, 阿西尔·伊本·巴廷, 309
Atlas Mountains, 阿特拉斯山脉, 348, 366
Atsiz, 阿特西兹, 186
Aûghām, 奥加姆, 407
Augila/Awdjila, 奥古拉, 278-9, 283
Augustine, St., 圣·奥古斯丁, 99
Austronesians, 澳斯特罗尼西亚人, 太平洋南岛人,(南岛语系)684, 689, 693, 694, 696-7, 699
Awdāghust, *see* Tegdaoust, 奥胡达古斯特, 见"泰格达乌斯特"栏目
Awdjila/Augila, 奥吉拉、
Awdjilī, 奥古利人, 283
Awellimid, 阿维利米德人, 125
Awkār, 奥卡尔, 124, 126, 128, 130
Awlīl, 奥利尔, 124, 340; 奥利尔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5, 381-2, 407-8, 410-12
Awrāba, 奥拉巴人, 66, 227-8, 233-6, 254-5
Awrāken ibn Urtantak, 奥拉肯·伊本·乌尔坦塔克, 309
Awrās, 奥拉斯, 99, 235, 237-8, 322
'Awsān, 奥桑, 704
Awukugua, 阿乌库瓜, 501
axe factories, 石斧工厂, 527
Axum, 阿克苏姆, 23, 92, 558-63, 564-7, 572-3, 577-81散见各处, 700, 705, 706
āya/āyāt, 古兰经的"节"(前者是单数, 后者是复数), 35
a'yān, "阿扬"(显要人物), 299
'Aydhāb, 阿伊达布, 58, 82
Ayman Baraka, Umm, 乌姆·艾曼·巴拉卡, 710
'ayn, "艾因"(铸制黄金或铸金块), 383-4
Ayūma(d. 1007), 阿尤马(1007年逝世), 454
Ayyubids, 阿尤布王朝, 59
Ayzal, 艾扎勒, 311
Azd, 阿兹德人, 258
Azania, 阿扎尼亚, 697
Azārika, 阿扎里加教派, 240
Azben/Azbin, *see* Aïr, 阿兹本/阿兹宾, 见"阿伊尔"栏目
Azelik, *see* Takedda, 阿泽利克, 见"塔凯达"栏目
Azger, *see* Adjdjer, 阿兹格尔, 阿兹格尔人, 见"阿杰杰尔、阿杰杰尔人"栏目
al-Azhar, 爱资哈尔, 190
al-'Azīz(975-96), 阿齐兹(公元975-96年在位), 178, 182-3
al-'Azīz, Kānūm ibn 'Abd, 卡农·伊本·阿卜德·阿齐兹, 198, 212-13
'Azīz ibn Marwān, *see* Marwān, 阿齐兹·伊本·马尔万, 见"马尔万"栏目
Azkār, 阿兹卡尔, 阿兹卡尔人, 304, 411
Azougui, 阿祖古, 311
Azuki/Kūkadam, 阿祖基/库卡达姆, 311-12; 阿祖基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8, 346; 阿祖基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0, 372, 376, 410-15
Ba, A. R., A. R. 巴(阿卜杜拉赫马奈·巴), 103, 356
Babra Barkān/Absbo, 巴布拉·巴尔坎/阿布斯博, 581
'Bachwezi', 巴奇韦齐人、王朝, 628
Bādi 巴迪, 82, 561, 564
Bādis, 巴迪斯, 329-30
Badjkam, 巴杰卡姆, 179
Badlāy, Shihāb al-dīn Ahmed, 希哈卜·丁·艾哈迈德·巴德莱, 584-5
Badr, battle of, 巴德尔战役, 708
Badr al-Djamālī, 巴德尔·贾马利, 186-8, 190, 215
Bafing, 巴芬河, 75
Bafour/Baffor/Abofur, 巴福尔人/阿博富尔人, 312-13
Bafūr, 巴富尔人, 310
Baga, 巴加人, 541, 543
Bāghāya, 巴加亚, 235, 238
Baghayogho, 巴加尤古, 112
Baghdad, 巴格达, 17, 21, 43, 51, 67, 95, 716; 巴格达和埃及, 173, 179; 巴格达和努比亚, 198, 209
al-Baghdādī, Abu'l-Hasan, 阿布尔·哈桑·巴格达迪, 731

Bagirmi，巴吉尔米，巴吉尔米人，80，449
Bahnāsat al Wah，see Bahriyya，巴赫奈萨特·瓦赫，见"巴赫里亚"栏目
Bahr al-Ghazāl，加扎勒河，141，162，436，441，443
Bahrām，巴赫拉姆，188
Bahrayn，巴林，315，318，723
Bahriyya/Bahnāsat al Wāh，巴赫里亚/巴赫奈萨特·瓦赫，279，281-2
Bainuk，拜努克人，533
Bakbāk，巴克巴克，172
al-Bākillānī，巴基尔拉尼，53
Bakkāra，巴卡拉人，753
Baklīn，巴克林，564
al Bakrī，巴克里，70，72-4，106，108，120-1，125，131，132，134，136-7，335，476，547，744，790；关于阿尔莫拉维德的论述，339-40，343，355，364；关于骆驼的论述，737；关于乍得的论述，456-8，关于马的论述，741，关于撒哈拉的论述，276，283，285-90 散见各处，294，298，301-2，304，306，310，371，374，379-86，402-3，406-9，416-26 散见各处，432，481
bakt，巴克特条约，6，81，83，168 及注，182，194，198，209，211，373
al-Balādhurī，拜拉祖里，165，225，725
Balante，巴兰特人，533，545
Balaw，巴劳人，564
Baldj，巴尔杰，258
Bāli，巴来(封主国)，巴利人，86
Bali，巴厘，24
Balkans，巴尔干半岛，321
Balkh，巴尔赫，50，716
Bamana，巴马纳人，537
Bambandyanalo，巴姆班迪亚纳洛，162
Bambara，班巴拉人，81，117，535，536
Bambuk/Galam，班布克/加拉姆，124，301，358，424-5，463，471，742
bananas，香蕉，154，626，633-4，641，698
Bandiagara，班迪亚加拉，376，463，466，761
Bangui，班吉，159
Banmana(Bambara)，班马纳(班巴拉)人，117
Bantu Cattle Culture，班图牧牛文化，669-72，674，678-80
Bantu-speakers，讲班图语各族，88，100，492，593，598，599，600，603-4，615，621-42 散见各处；在中部非洲，643-4，646，661，663；扩张，140-62；在南部非洲，664-5，又见"僧祇人"(Zandj)栏目
Barbara，巴尔巴拉人，608，612
baraka，保佑权力，66，96
Barānis，巴拉尼斯(父系氏族群体)，226-7；又见"奥拉巴人"(Awrāba)，"豪瓦拉人"(Hawwāra)，"卢瓦塔人"(Luwāta)，"马斯穆达人"(Masmūda)，"桑哈贾人"(Sanhādja)诸栏目
Barāwa，see Brava，巴拉瓦，见"布拉瓦"栏目
Barbar-Barābir，巴尔巴尔人/巴拉比尔人，312-13，600
Bardjawān，巴尔贾万，183
Barghawāta，巴尔加瓦塔，巴尔加瓦塔人，65，66，67，228，251，255，378，410，757；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41，348；和法蒂玛王朝，316，331
Bargu language，巴尔古语，535
Baringo，巴林戈，631
Barīsā，巴里萨，411，412，416，423-5
Barka，拜尔凯，50，230，231，232，237，279，283-4，332
Barkadjāna，贝尔卡贾纳人，310，312
Barkindo，B. 巴伍罗·巴尔金多，458
Barros，J. de，若奥·德-巴罗斯，599
barter，see exchange；trade，物物交换，见"交易"；"贸易"诸栏目
Barth H. 海因里希·巴尔特，305，454
Barūyān ibn Washīk ibn Izār，巴鲁扬·伊本·瓦希克·伊本·伊扎尔，309
al Basāsīrī，白萨西里，186
Bashār ibn Burd，巴沙尔·伊本·布尔德，723
Basilios，巴西利奥，215
Basra，巴士拉，21，48，50，279，280，290，716，724，725，728
Basset，H.，H. 巴塞，226
Batawi，巴塔维人，603
Bathily，A.，A. 巴思利，129，731
Batn al-Hadjar，巴滕-哈杰尔，197，204，207
Bator，巴托尔，502
Battistini，R.，R. 巴蒂斯蒂尼，657
Baule，鲍勒人，490，492，493-4
bay'a，贝耶仪式宣誓效忠，174，255，260
Bayadjidda，巴亚吉达(阿布亚齐杜)，70
Baybars，拜巴尔斯，76
Baz，巴兹人，626，631
Bazaruto Archipelago，巴扎鲁托群岛，666，668，673
Bāzin，巴津，巴津人，564
Bedaux，R.，R.M.A. 贝多，360，432，761
Bede，贝德人，440
Bēdja，贝贾，贝贾人，82-3，198，209，210；在埃塞俄比亚，563-5；和法蒂玛王朝，316，330
Bedouins，贝都因人，6，33，61，83，172，174，179-80
Bega，see Bēdja，贝加人(即贝贾人)
Begemder，伯根德，563
Begho，贝戈，121，376，415，417，463，481，489，495-7，503-5，527，783
Bekwai，贝夸伊，489，499
Bele，贝莱人，542
Belew Kelew，贝卢·克卢人，564
Bello，M.，穆罕默德·贝洛，455-6，458
bell，钟或铃铛，789
Bemarivo，贝马里武河，483
Bemba，本巴人，65
Benadir，贝纳迪尔，602，606，608
Benfica，本菲卡，646，647，648
Benin (country)，see Guinea；Lower Guinea，贝宁(国)，见"几内亚"，"下几内亚"诸栏目
Benin(town)，贝宁(城)，463，489，491，506，508，513-17，523，526，529，783
Benue，贝努埃，贝努埃人，124，141-2

Benue－Congo languages，贝努埃－刚果亚语系诸语言，492－3，512，535，540
Berakit，贝拉基特，570，572
Berberā，柏培拉，58，86，561，600
Berbers and Islam，柏柏尔人：柏柏尔人与伊斯兰教，7－8，13，18－19，44，54，97，224－45，独立，251，154－5，261，266－9；在东部非洲，600－1；柏柏尔人和埃及，176－7，180，183－4，186；柏柏尔人和法蒂玛王朝，314，317－18，321－3，325，328－35；语言，269，286，293，369，372，451，535；社会体制，99－100，109，112，116，在北部非洲，61，62－4，66 91，柏柏尔人和撒哈拉通道，67－8，277 313 散见各处，369，371－2，409，414，425，438，447，450－1，455－9，475；在苏丹地区，69；又见"阿尔莫拉维德"（Almoravids）栏目
Beri，see Zaghāwa in Chad，贝里人，见"扎加瓦人在乍得"栏目
Berkadjāna，贝尔卡贾纳人，310
Berthoud，S.，S.伯绍德，422
Betsileo，贝齐莱乌人，113
Bia，比亚人，494
Bicu，比库，503
Bidjāya/Bougie，贝贾亚/布日伊，316，333，335，737
Bilād al－Djarīd，杰里德地区，277，279，281，312，324
Bilād al－Islām，伊斯兰地区，341
Bilād al－Sudān，黑人地区（或苏丹地区），121，712；又见"苏丹地区"（Sudan）栏目
Bilāl，比拉尔，575－6
Bilāl b. Rabāh，比拉尔·本·拉巴赫，709
Bilma，比尔马，292 415，417
Bima/Old Bima，比马/古比马，489，503，504
Bini，比尼人，492，512，517，520
Bira，比拉人，146－7
al－Bīrūnī，比鲁尼，28，598，602，611
Bisa/Busansi，比萨人/布桑西人，536
Bisson，M.，迈克尔·比松，653
Bizerta，比塞大，230，233，237
black people：Berbers，黑人：柏柏尔人，600－1；黑人和伊斯兰教，见"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Islam as social system）栏目，也见"讲班图语各族"（Bantu－speaker）、"尼格罗人"（Negroes）、"撒哈拉以南地区"（south of Sahara）、"奴隶"（slaves）、"苏丹地区"（Sudan）诸栏目
Blackburn，布莱克伯恩，布莱克伯恩人，665，668
blacksmiths，see iron，铁匠，见"铁"栏目
Bleek，W.，威廉·布莱克，141，161
Blemmyes，布伦米人，563
Bo，博城，548
blood studies，对血液的研究，541
Bobaomby，布巴温比，683，691
Bobo－Fing/Sya language，博博－芬（锡亚）语，536
Bofe，博菲，504
Bofota，博福塔，549
Bône，波尼，237
Bonnassié，P.，P.博纳西埃，399－400
Bonny，邦尼，529
Bono Manso，博诺曼索，495－6，503，504，505，576
Bonoso，博诺索，496
Boporo，博波罗，556
Border Cave，博德洞穴，162
Borku，博尔库，292
Bornu，博尔努，博尔努人，74，80，124，448，455，458
Borobudur，婆罗浮屠，24
Boskop Bush，博斯科普 布须人，672
Bosumpra Cave，博苏姆帕拉洞穴，501
botany，see vegetation，植物学，见"植被"栏目
Botswana，博茨瓦纳，752，又见"赞比西文化"（Zambezi culture）栏目
Bougie，see Bidjāya，布日伊，见"贝贾亚"栏目
Bovill，E. W.，E. W 博维尔，734
Boyase，博亚西，494
Brakna，布拉克纳，128
Bransem Diawuo，布兰塞姆·迪亚沃，501
brass，黄铜制品，476－7，481，486，487，521－2，548
Brava/Barawa，布拉瓦/巴拉瓦，58，86，87，600，602，606，608，612
Broken Hill Man，布罗肯希尔人，162
Brong，布龙，布龙人，489－90，494，496，499，504
bronze，青铜制品，442，477－9，486，508，512，517－18，520－3
Brunschwig，R.，R.布伦什维格，226，384，718
Bubi，布比人，145
Bucolics，布科利克斯，171
Buddhism，佛教，46
Buduma，布杜马人，440
Buganda，布干达，634
Bughrat，布格拉特，406－7
al－Buhayri，'Alī Khalīfa Humayd b. Hishām，阿里·哈利法·胡马亚德·本·希沙姆·布海里，195
Buipe，布伊佩，503
Bukhārā，布哈拉，715
al－Bukhārī，布哈里，40，94，711
Bukoba，布科巴，623，628
Bulala，布拉拉人，113－114
Bulgaria，保加利亚，326
Būlit，Banū，巴努－布利特人，286
Bullom，布隆人，541－3，549
Bulu，布卢，74，454
Bulukkīn ibn Zīrī，布鲁金·伊本·齐里，328－9
Bunumbu，布农布，547
Buré，布雷，布雷人，124，424，463，471，742
burial sites see archaeological sites，墓地遗址，见"考古遗址"栏目
Burke，E.，III，埃德蒙·伯克第三，225－6
Burkina Faso，布基纳法索，111，113，121，466；又见"几内亚"（Guinea），"上几内亚"（Upper Guinea）诸栏目
Burton－Page，J.，J.伯顿－佩奇，731
Burundi，布隆迪，139，159，623，772
Busa，布萨人，536，538
Busansi，see Bisa，布桑西人，见"比萨人"栏目
Bushong，布尚人，140
Busoga，布索加，643

Busr ibn 'Abi Artāt, 布斯尔·伊本·阿比·阿尔塔特, 231, 284
Butana, 布塔纳, 83
Butare/Rutara, 布塔雷/鲁塔雷, 153, 158
Butr, 布特尔(父系氏族群体), 226-7
Buwayhids, 白益王朝, 51-2, 342
Buzeima/Bzema, 布扎伊马山/卜泽马山 279, 283, 286
Buzurg ibn Shahriyār, 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亚, 598, 609, 613
Byzacena, 拜扎赛纳, 231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廷帝国: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 5, 6, 7, 10-12, 13, 15, 48-50, 54, 560, 565, 700; 拜占廷帝国和埃及, 163-4, 165-6, 170, 182-3, 191; 拜占廷帝国和法蒂玛王朝, 326-7; 拜占廷帝国在马格里布的活动, 229, 231-4, 237, 239; 拜占廷帝国和努比亚, 196, 219
Cahen, C., 克劳德·卡亨, 382, 399
Cairo, 开罗, 175, 183, 185-6, 189-93, 316, 328, 716
Calabar, 卡拉巴尔, 523, 528
Calabria, 卡拉布里亚, 264, 326
caliphs, first four, 最早的四位哈里发, 43-4, 47, 50; 见"阿布·贝克尔"(Abū Bakr)、"阿里"('Alī)、"奥马尔"(Umar)、"奥斯曼"(Uthman)诸栏目
camels, 骆驼, 125, 133, 289, 309, 363, 368, 371, 379, 388, 437, 625-6, 736-7, 758, 777
Cameroon, 喀麦隆, 139, 142, 644, 646; 又见"几内亚"(Guinea)、下几内亚(Lower Guinea)诸栏目
Cape Province, 开普省, 162, 646, 753; 开普省和讲班图语各族, 147, 160
Caprivi Strip, 卡普里维地峡, 649
caravans, see camels; trade, Sahara, 商队, 见"骆驼"、"贸易"、"撒哈拉"诸栏目
Carolingians, 加洛林王朝, 13, 15
Carthage, 迦太基, 62, 233, 237-9
carvings, see art, 雕刻品, 见"艺术"栏目
Casamance, 卡萨芒斯, 463, 468, 543-5
caste, see class, 等级, 见"阶级"栏目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5, 399-400
cattle, 牛, 669-72, 674, 678-9, 752-4; 又见"农业"(agriculture)和"畜牧"(pastoralism)栏目
Central Africa, 中部非洲, 144, 735, 792; 铁器时代, 643-63; 人口流动, 746, 760; 定居空间的构成 752-3, 技术, 764, 770; 贸易, 778-80
Central Sudan-speakers, 讲中苏丹语各族, 620, 628, 630, 637
ceramics, see pottery, 陶瓷, 见"陶器、制陶工艺"栏目
Cerulli, E., E. 塞鲁利, 569, 575
Ceuta/Sabta, 休达/萨卜塔, 241, 351, 739
Ceylon(Sri Lanka), 锡兰(斯里兰卡), 23, 26, 697, 700
Chad, 乍得, 101, 111, 199, 436-60, 735; 乍得和讲班图语各族, 141; 乍得和伊斯兰教, 58, 67, 69, 77, 78, 81, 450-4; 民族和语言, 131, 438-51; 塞富瓦王朝的兴起, 454-60; 乍得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4, 131, 138; 乍得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2, 414, 435; 乍得和扎加瓦, 445-50; 又见"萨赫勒"(Sahel)栏目
Chadic language, 乍得语, 131, 441, 444, 448-9
Chaga, 查加人, 622, 627, 631, 633-4, 637-41
Chagos, 查戈斯群岛, 697,
Chakosi, 查科西人, 492
Chalcedonian doctrine, 卡尔西登教义, 164, 170, 169
Champa, 占婆, 23, 694, 697
Chams, 占族人, 占语 698
Chao Ju-kua, 赵汝适, 613
Chari, 沙里河, 440-1, 443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 13, 15
Chavane, B., B. 沙瓦纳, 760
Chebka, 切布卡, 129
Cherekecherete, 切雷克切雷特, 495, 502-3
Chewa, 切瓦人, 658
Chibuene, 奇布埃内, 673
Chichāwa, 希沙沃, 338, 363, 432
chiefs, see rulers, 酋长, 见"统治者"栏目
Chimbalazi, 钦巴拉齐语, 600
China, 中国, 790; 中国和拜占廷帝国, 10; 中国和东非, 590, 597, 608, 612-14; 中国和伊斯兰教, 5, 8, 15, 21-4, 27, 28, 88; 语言, 147, 597; 中国和马达加斯加, 696-7, 701-2
Chimezana, 奇姆扎纳语, 564
Chirundu, 奇龙杜, 647, 654
Chittick, N., 内维尔·奇蒂克, 589, 593-4, 606
Cholas, 注辇王国, 15, 27, 28
Chondwe, 琼兑, 645, 647, 651, 653, 658-9
Chou Ch'u-fei, 周去非, 732
Christians, 基督徒, 基督教势力, 160, 351, 705, 745, 785, 786-7, 791; 乍得地区的基督教势力, 437, 441, 446; 基督教和伊斯兰, 18-20, 24, 29, 31-3, 37, 46, 48, 53-4, 56, 58-9, 61-2, 67, 71, 83, 85, 91, 93, 98, 164, 166, 168-71, 183-4, 189, 193; 撒哈拉的基督教势力, 281, 286, 288, 299, 302, 399-400, 417; 又见"拜占廷帝国"(Byzantine empire)、"科普特人"(Copts)、"梅尔凯特教派"(Melkites)、"基督一性论教派"(Monophysites)诸栏目以及"埃及"(Egypt)、"埃塞俄比亚"(Ethiopia)、"马格里布"(Maghrib)和"努比亚"(Nubia)各栏目的有关部分
Christian's Village, 克里斯琴村, 495
Christodulos, 克里斯托杜洛斯, 215
Chundu, 琼杜, 647, 656
Cilicia, 西利西亚, 173, 176
cinnamon, 香樟, 685-6, 687, 697, 700
Circumcellions, 塞孔西利昂教派, 61
circumcision, 割礼, 638
cities, see urban areas, 城市, 见"城镇地区"栏目
clan, 氏族、部落, 636
class/caste/status, 阶级/等级/身份和地位, 103, 125, 711-12, 746-9, 781, 埃及, 176, 184; 马格里布, 267-8; 奴隶的阶级、等级、身份和地位, 711-12; 南部非洲, 669-71, 676, 678-9; 又见"统治者"(rulers)栏目
climate, 气候, 188, 224, 276, 491, 531, 533, 586, 624, 626, 672, 692; 干旱和沙漠化, 126, 130, 368-70, 414, 436, 444, 756
clothing, see textiles, 衣服, 见"纺织品"栏目
Cocoli, 科科利人, 540

coins, *see* currency, 硬币, 见"通货"栏目
Comoe, 科莫埃河, 492
communication, *see* trade, 交通, 见"贸易"栏目
Comoro Islands, 科摩罗群岛, 587, 593, 595-6, 606, 609-10, 613, 700; 科摩罗群岛和伊斯兰教, 8, 9, 58, 88, 89
concubinage, 纳妾、蓄妾, 723-4
Congo, 刚果, 142, 145, 154, 162, 633, 646
Connah, G., G. 康纳赫, 441, 514, 523
conquest, *see* warfare, 征服, 见"战争"栏目
Conrad, D., D. 康拉德, 74
Constans II, 康斯坦斯二世, 232
Constantine IV, 康斯坦丁四世, 233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49, 52, 164, 233
Conti Rossini, C., C. 孔蒂·罗西尼, 563, 566
Coon, C., C. 库恩, 547
copper, 铜, 693, 742, 744, 769-70; 中部非洲, 651, 653, 654; 东部非洲, 611, 614; 几内亚/西非, 475-7, 480-1, 486, 496, 501, 522, 528, 546; 铜和撒哈拉通道, 374, 377, 389, 402, 428-9
Copperbelt, 铜带, 651, 653, 659, 769-70, 779
Coptic language, 科普特语, 59, 213
Copts, 科普特人, 11-12, 49, 59, 61, 91; 乍得, 447; 埃及, 164, 168-71, 206, 211, 223; 埃塞俄比亚, 565, 573; 努比亚, 196, 213, 215, 223; 撒哈拉, 281, 282
Coquery-Vidrovitch, C., 卡特琳·科奎里-维德罗维奇, 734
Cordoba, 科尔多瓦, 273, 716; 科尔多瓦和法蒂玛, 319, 323; 科尔多瓦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97, 399, 401
Corippus, 科利普斯, 297
Corrêa, A. A. M., A. A. M. 科雷亚, 530
Corridor, 科里道人, 618, 623
Cosenza, 科森扎, 264
Cosmas Indicopleustes, 科斯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 558-9, 563, 567, 597
cotton, 棉花, 325, 432, 541, 548, 607, 739, 773, 776; 又见"纺织品"(textiles)栏目
Courtois, C., 夏尔·库尔图瓦, 265
Cross River, 克罗斯河, 523-4
Crusades, 十字军, 7, 18-19, 54, 188
cultural:effects of Saharan trade, 撒哈拉贸易在文化上所起的作用, 354-66; 奴隶们所起的作用, 729-31; 又见"艺术"(art)、"语言"(language)、"文学"(literature)、"宗教"(religion)、"社会体制"(social systems)诸栏目
Cuoq, J. M., J. M. 库奥克, 121, 384, 425
currency/coins/monetary systems, 通货/硬币/货币体制, 744-5; 亚洲, 23, 29, 614; 埃及, 169; 埃塞俄比亚, 559, 560, 571; 几内亚, 528; 通货、硬币、货币体制和伊斯兰教, 4-5, 8; 没有货币体制的情况, 207; 马格里布, 265; 萨赫勒, 361-2; 又见"金币"(gold coins)栏目
Cushites/Cushitic language, 库希特人/库希特语, 85, 600-1, 616-19, 624-41 散见各处
Cydamus, *see* Ghadmes, 锡达穆斯, 见"古达梅斯"栏目
Cyrenaica, 昔兰尼加, 228, 229-31, 243, 327
Cyril of Alexandria, St, 亚历山大的圣·西里尔, 568
Cyrus, 居鲁士, 165, 229
dā'ī/du'ār, 达伊/杜阿特(传道者), 315, 317
al-Dabbāgh, 达巴格, 225
Dabhol, 达波尔, 25
al-Dabuli, 达布里人, 25
Dādjo, 达乔、达乔人, 447
Dadoga, 达多加人, 621, 629
Dag-Ghāli, 达格-加利人, 304
Daghūta, 达古塔, 611
Dagomba, 达贡巴、达贡巴人, 536, 538
Dahaloans/Dahalo language, 达哈洛人/达哈洛语, 617, 618, 625
Dahlak Islands, 达赫拉克群岛, 560, 563, 577-9; 达赫拉克群岛和伊斯兰教, 9, 58, 84-5
Dahomey, *see* Upper Guinea, 达荷美, 见"上几内亚"栏目
Daima, 达伊马, 437, 441-2, 463, 468, 522
Dākhla, 达赫拉(绿洲), 279, 281, 475
Dalby, E. G. D., E. G. D. 多尔比, 535-6, 646, 661
dallāl, 经纪人, 717
Dama language, 达马语, 553
Damascus, 大马士革, 51, 168-9, 174, 176, 188
Dambwa, 丹布瓦, 645, 647, 656, 657
Dāmūt, 达莫特, 达莫特人, 561, 566, 579, 582, 584
Danānīr, 达娜尼尔, 723
Dandāma, 丹达马, 611
Dan'el, 达内尔(一个凯觎王位者的名字), 565
Danenoch, 达内内乞人, 625
Dangme, *see* Adangme, 当梅人, 见"阿当梅人"栏目
Daniel, Abba, 达尼埃尔(大主教), 566
Dār al-ḥarb, 战争地区, 47, 83, 107, 719
Dār al-'ilm, 经院, 184和注
Dār al-Islām, 伊斯兰教地区, 47, 57, 83, 98-9, 101
Dār al-Kufr, 不信真主的地区, 107
dār al-murābiṭin, 隐修士学馆, 337, 342-3
Dār al-ṣulḥ, 停战地区, 47
Dar es Salaam, 达累斯萨拉姆, 622
Dar'a, Wādi, 达拉干河, 达拉干河城, 68, 228, 235, 241, 312, 339, 347-8, 379
Darāder, 达拉德尔, 583
Daradj/Adradj, 达拉杰/阿德拉杰, 286
Darafify, 达拉菲菲(马达加斯加"巨人"), 682, 684-5, 686, 688-9, 691-2
Darah, 达拉, 86
Daraina, 达拉伊纳, 691
Dardj, 达尔杰, 286
al-Dardjīnī, 达尔吉尼, 70, 108
Dārfūr, 达尔富尔, 84, 124, 373, 437, 440, 780; 达尔富尔和努比亚, 199, 207
Dark, P. J. C., P. J. C. 达克, 514-16
Darod Ismā'īl, 达罗德·伊斯梅尔, 87
Davies, O., 奥利弗·戴维斯, 499
da'wa, "达瓦"(某种什叶派教义), 56, 187 & n
dawābb, 牲畜, 719
Dawāro, 达瓦罗, 86, 561

da'wat al-hakk, 听从真理的召唤, 345
Dawhenya, 道亨尼亚, 502
Dawida, 达维达人, 622, 627, 633
Dāwit I, Negus, 达维特一世(国王), 584
al-Dawla, Kanz, 坎兹·道拉, 215
al-Dawla, Nāsir, 纳西尔·道拉, 179, 182, 186
al-Dawla, Sayf, 赛义夫·道拉, 182, 215
al-Dawlah, 'Adud, 阿杜德·道拉, 725
Dāwūd, 达乌德, 116
al-Daybul(Dabhol), 达波尔, 25
Daylamites, 代拉米人, 176
Daza, *see* Gorhan, 达扎人, 见"戈尔汉人"栏目
D'Azevedo, W. L., W. L. 德-阿塞韦多, 543
De, 德族人, 556
Debeyra West, 西德贝拉, 197, 204-5
Debre-Damo, 德卜勒-达莫(教堂), 570, 572-3
Debuli(Wadebuli), 达布里人, 25
decorations, *see* art, 装饰, 见"艺术"栏目
Degoum, 德古姆, 559
Deguesse, Hill, 德格斯丘陵, 443
Degum-Sellassie, 德古姆-塞拉西, 572
Delafosse, M., M. 德拉福斯, 120, 127, 129
Delnaad, 戴尔纳德, 566, 567
Dembeni, 登们尼, 595, 596 注
Deschamps, H., H. 德尚, 26
desertification, *see under* climate, 沙漠化, 见"气候"栏目有关部分
Despois, J., J. 德普瓦, 289
Devisse, J., J. 德维斯, 19, 336, 367, 747
dhahab, "达哈卜"(提炼加工过的黄金, 成色特纯, 统治者留作铸币), 384-6
Dhār Tishīt, 提希特陡崖, 129
dhikr, "齐克尔"(请神或应答祈祷), 43
dhimmī, "希姆米"(被保护的依附者), 46, 98, 268, 269, 714
Dhu l-hidjdj, 回历, 38, 164
Dhū'l-Karnayn, 祖尔-卡尔奈因(头生双角的人), 297
Dhū Nuwās, 祖-努瓦斯, 706
Diafunu/Diafounou, *see* Zāfunu, 迪亚富努, 迪亚富努人, 见"扎富努人"栏目
Dialloumbere, 迪亚洛姆贝宁, 547
diaspora in Asia, African, 散居在亚洲的非洲人, 704-55; 阿拉伯半岛, 704-10; 在文化上所起的作用, 729-31; 职业和社会状况, 721-6; 埃塞俄比亚和伊斯兰教, 710-11; 印度、东南亚和中国, 731-3; 伊斯兰社会中的各种身份, 711-12; 僧祇人起义, 726-9
Diaz de Vivar, Rodrigo(Cid), 罗德里戈·迪亚斯·德-比瓦多(锡德), 354 注
Didinga-Murle, 迪丁加-穆尔勒人, 630
Die, 迪耶人, 554
Diehl, C., 查尔斯·迪尔, 226
diet / food, 饮食/食物, 26, 186, 608, 633, 739-40, 752-9; 几内亚/西非, 464-5, 468, 487, 547; 马达加斯加, 691, 693-4; 撒哈拉, 377-8, 382, 419, 426-8, 又见"农业"(agriculture)栏目
Dil-gāmis, 迪尔-加米斯, 580
Dil-marrah, 迪尔-马拉赫, 580-1
Dimba, 迪姆巴, 647, 648
dīn, 宗教信仰, 40
al-Dīn 'Abdallāh, 赛义夫·丁·阿卜杜拉, 200
Dina, 迪纳, 129
Dīnār ibn Abū al-Muhādjir, 迪纳尔·伊本·阿布·穆哈吉尔, 233-6
Dioula, 迪儿拉人, 468, 545, 547, 555
Dionevar, 焦内瓦尔, 545
Dionisius, 狄奥尼修斯, 209
Diop, C.A., 谢赫·安塔迪奥普, 734
Diop, L. M., L. M. 迪奥普, 743
Diorom Boumak, 迪奥龙·布马克, 463, 468
Dir, 迪尔人, 87
Dirki/Dirko, 迪尔基/迪尔科, 291
diseases, 疾病, 465, 707
divination, 占卜, 卜卦, 125, 484
dīwān, "迪万"(行政公署、中央国库); (世系表), 57, 169, 172, 183, 270, 710
al-Dizbirī, 迪兹比里, 185
Djabal Buzeima, 布扎伊马山, 279, 283, 286
Djabal Lamtūna, 兰图纳山, 311
Djabal Mus'ab, 穆萨布山, 302
Djabal Nafūsa, 奈富塞山, 69, 122, 228, 231, 244; 奈富塞山和法蒂玛王朝, 316, 322; 奈富塞山和撒哈拉通道, 279, 281, 285-6, 288, 290-1, 293, 306, 312, 380, 406, 451
Djabal Tarik, 塔里克山, 242, 又见"直布罗陀"(Gibraltar)栏目
Djaddū, 贾杜, 406
Djādū/Djado, 贾杜/贾多, 285, 290
Dja'far al-Sādik, 贾法尔·萨迪格, 315
Dja'far ibn Abī Tālib, 贾法尔·伊本·阿比·塔利布, 575, 582
Dja'far ibn al-Fadl, 贾法尔·伊本·法德尔, 178
Dja'far ibn Falāh, 贾法尔·伊本·法拉赫, 182
Dja'far ibn al-Furāt, 贾法尔·伊本·福拉特, 178
Djāhiliya' poetry, 蒙昧时代的诗, 708
al-Djāhiz, 贾希兹, 270, 601, 603, 698, 723, 725, 728, 730, 731
djallāb, 奴隶进口商, 717
Djālū/Djalo, 贾卢/贾洛, 283
Djalūla, 贾卢拉, 230, 233
Djamāl al-dīn ibn Baziyū, 贾迈勒·丁·伊本·巴齐尤, 582, 584
al-Djamālī, Badr, 巴德尔·贾马利, 186-8, 190, 215
Djāme, 贾迈, 114
al-Djamm, *see* Thysdrus, 贾姆, 见"锡斯德鲁斯"栏目
Djanāwa, 贾纳瓦人, 313
Djantāma, 詹塔马, 611
Djarāwa, 贾拉瓦人, 237, 241
al-Djardjarā'ī, 贾尔贾拉伊, 185
Djardjarāya, 贾尔贾拉亚, 729
Djarīd, 杰里德, 295, 306, 409, 414, 715; 杰里德和法蒂玛王朝, 316, 324
djāriya, 女奴, 255, 268-9, 271
Djarma/Djerma/Garama, 贾尔马/杰尔马/加拉马, 284, 287-90, 292, 294, 370
Djāsta, 贾斯塔, 611
Djawhar, 贾瓦尔, 16, 180, 181, 189-90, 321, 323, 328
Djawhar ibn Sakkam, 贾瓦尔·伊本·萨卡姆, 337, 344
Djaysh, 贾伊什, 174

Djazīra, 贾齐拉, 83, 174
Djazūla/Gazula, 贾祖拉人, 228, 343, 347-8
al-Djazūlī, 贾祖里, 95
Djenné, 杰内, 417
Djerba, 杰尔巴岛, 230, 233, 316, 335
Djerma, *see* Djarma 杰尔马, 见"贾尔马"栏目
Djibāliyyūn, 杰巴利荣人, 199
Djidda, 吉达, 577
Djifar, bba, 阿巴·杰法尔, 580
djihād, "吉哈德"——圣战, 8, 46, 55, 81, 86, 94, 181, 263, 720; 圣战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41, 344-6, 351, 358
Djirdjis, 吉尔吉斯, 565
Djirdjis II, 吉尔吉斯二世, 566
djizya, "吉兹亚", 非伊斯兰教徒须付的人头税, 46, 57, 83, 239, 247
Djofra, 朱夫拉, 28?
Djubbā, 朱巴, 728
Djuddāla, 朱达拉, 朱达拉人, 68, 73, 122, 228, 308, 310, 312; 朱达拉人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6-7, 339, 342-8
djund, "宗德"(征兵区), 179 & n, 260, 263, 317
al-Djuyūshi, 朱尤希(清真寺), 192
Dogama, 多加马人, 493
Dogon, 多贡, 多贡人, 121, 466
dogs, 狗, 104
Domenichini-Ramiaramanana, B., B. 多梅尼契尼-腊米亚拉马纳纳, 681
Domiabra, 多米亚布拉, 499
Domoni, 多莫尼, 597
Donatists, 多纳图斯教派, 61, 235
Dongola, 栋古拉, 58, 81, 166, 194-201 散见各处, 207, 211-12, 216-18
Donque, G., G. 东奎, 697
Dozy, R., 莱因哈德·多齐, 64, 249
Dramani-Issifou, Z., Z. 德拉马尼-优素福, 92
Dravidian language, 达罗毗荼语, 127
drought, *see under* climate, 干旱, 见"气候"栏目有关部分
Druzes, 德鲁兹教派, 45
Duala, 杜亚拉人, 140
du'āt, "杜阿特"(传道师), 315
Duby, G., G. 迪比, 167
Duguwa dynasty, 杜古瓦王朝, 136
Dūkū, Banū, 巴努-杜库, 458
Dūnama, 杜纳马, 74
Dūnama Dībalāmi, 杜纳马·迪巴拉米, 440, 450, 456, 460
Dundo, 邓多, 647, 649
Dūnkūla, 顿库拉(栋古拉的阿拉伯词形), 780
Daura, 道拉, 70
Duyvendak, 杜文达克, 614
Dyā/Dia/Dyagha, 迪亚/迪亚/迪亚加, 73, 75, 78
Dyakhaba, 迪亚坎巴, 75
Dyakhanke, 迪亚坎凯人, 71, 75, 537
dynasties, *see* rulers, 诸王朝, 见"统治者"栏目
Dyoura(Dyula) 迪尤拉人, 71, 80-1, 111, 535-6, 533, 537, 539
East Africa, 东非、东部非洲, 586-615, 644, 694, 735, 747, 753, 783, 791; 建筑, 588-9, 593-7, 607-8, 614; 考古, 586-97, 602, 608-9, 614-15, 620, 622, 628; 沿海各族, 600-5; 经济活动, 608-15, 631-5; 族群演变的过程, 626-31; 地理背景, 586-7; 东非内地, 616-42; 东部非洲和伊斯兰教 8, 41, 88-90, 95, 101, 588-90, 597-607 散见各处, 613; 语言, 88-90, 598, 600, 603-5, 609-10, 616-42, 散见各处; 口头传说, 599-600; 人口流动, 616-26, 746, 759; 宗教, 639-40; 社会组织, 602-3, 635-9; 技术, 743, 762, 766, 772; 贸易, 20, 23-8, 89, 597, 602, 608, 612-15, 634-5, 641, 738-9, 778-80; 书面资料, 597-8; 又见各个具体国家的栏目
Eastern Europe, 东欧, 14-19
Eastern Highland Group, 东部高原语系, 663
ecology/geography, 生态/地理, 488-91; 埃塞俄比亚, 586-7; 几内亚/西非, 488-91; 努比亚, 531-34; 又见"气候"(climate) 栏目
economic activities, 经济活动; 见"农业"(agriculture)、"通货"(currency)、"渔业"(fishing)、"狩猎"(hunting)、"冶金术"(metallurgy)、"税"(tax)、"贸易"(trade) 诸栏目
Edfu, 埃德富, 197, 211
Edo, 埃多, 埃多人, 483, 490, 492-3, 526, 535
Effah-Gyamfi, K., K. 埃法赫-吉亚姆菲, 505
Effon, 埃丰, 507
Efik, 埃菲克人, 490, 492-3
Efua Nyarko, 埃富阿·尼亚科, 496
Egharevba, J. 埃格哈雷扶巴, 515 注
Egubbā, 埃古巴, 585
Egypt, 埃及, 734, 735, 761
Egypt and Byzantine empire, 埃及和拜占廷帝国, 10-11, 163-4, 165-6, 170, 182-3, 191; 基督教势力, 58, 83, 93, 164, 166, 168-71, 206, 211, 223; 法蒂玛王朝, 179, 180-9, 215-16, 323, 327-9; 埃及、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 6-7, 11, 16, 48, 50-1, 54-5, 58-61, 67, 77, 82, 90-2, 163-93, 783-4; 埃及、拜占廷帝国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95, 97, 98, 109; 埃及、拜占廷帝国和马达加斯加, 690, 700; 埃及、拜占廷帝国和努比亚, 166, 168, 173, 179-80, 194-6, 206-7, 209-16; 埃及、拜占廷帝国和撒哈拉通道, 373-4, 386-7, 397-8, 419-20, 476; 奴隶 614-15, 724; 技术, 743, 773; 贸易, 373-4, 386-7, 397-8, 419-20, 741, 758
Ehrenkreutz, A. S., A. S. 埃伦克鲁兹, 379
Ehret, C., 克里斯托弗·埃雷特, 159, 160, 615
Eiland, 埃兰, 埃兰人, 665, 668, 671, 672
Ekiti, 埃基蒂, 埃基蒂人, 490
Ekne Wan Aparan, 埃克内-万-阿帕兰, 437
Ekoi, 埃科伊人, 490, 492, 525
Ela, 埃拉, 559
elephants, 大象, 698, 参阅"象牙"(ivory) 栏目
El-Goléa, 吉莱阿, 301, 302
Ella Asbeha, 埃拉·阿什巴, 706
Ella-Tsaham, 埃拉-齐哈姆, 560
Ella-Gabaz, 埃拉-贾巴兹, 560
Elmenteita, 埃尔曼泰塔, 621, 634, 635
Elwana, 埃尔瓦纳人, 617, 627
employment of slaves, 奴隶的雇佣, 718-19, 721-6

Enda-Tcherqos, 恩达-特切库斯, 573
Endertā, 恩德塔, 579
enfranchisement of slaves, 释放奴隶, 267-8, 709, 721
Ere, 埃雷, 514-15
Eritrea, 厄立特里亚, 559, 563
Esdras, 以斯德拉, 568
Eshure, 埃舒雷, 507
Esie, 埃西, 489, 506, 507-8, 551
Eskender, Negus, 埃斯肯德尔(国王), 585
Es-Sūk, 埃斯-苏克, 301, 306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 575-85, 734, 735, 790; 艺术与建筑, 562, 566-74, 578; 基督教势力, 58, 59, 85, 91, 93, 559-70散见各处, 577, 579, 581-3, 585; 埃塞俄比亚和伊斯兰教, 6, 8-9, 15, 35, 58, 77, 84-8, 92, 560, 564, 575-85; 语言, 84, 85, 557, 560, 565, 570, 573, 576, 578-80; 来自该地的奴隶, 708, 712, 723, 725; 南方, 578-81; 贸易, 558-9, 578-9, 581, 778, 780; 埃塞俄比亚和也门, 704-7; 又见"达赫拉克群岛"(Dahlak Islands), "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 "伊法特"(Ifāt)诸栏目
ethnic groups, *see* population. 部族群体, 族群, 见"人口"栏目
eunuchs, 阉人, 宦官, 724-5
Euphemius, 欧菲米厄斯, 263
Europe, *see* Eastern Europe; Northern Europe; Western Europe, 欧洲, 见"东欧"、"北欧"、"西欧"诸栏目
Eusebios, 欧塞维奥斯, 196
Ewe/Eweland, 埃维人/埃维兰, 490, 492, 502-3, 526, 539
exchange, local, 当地交易, 地方性交易, 207, 469-70, 482; 又见"贸易"(trade)栏目
Ezana and Ezanian family, 伊扎纳和伊扎纳家族, 559, 568
Ezira, 埃齐拉, 517, 520
Fadl Hassan, Yūsuf, 优素福·法德勒·哈桑, 714
Fagg, W., 威廉·法格, 521
Fakfak, 法克法克, 28
Fakh, 法赫, 254
fakīhs/fukahā, "法基赫", 宗教法理学家, 法学博士, 40-1, 95, 263-4, 269, 272, 274-5, 342, 344, 354, 365
Falashas, 法拉沙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或"黑犹他人"), 569
Falémé, 法莱梅, 386
family, 家庭, 104-5, 107
Fang, 芳人, 140, 145
Fankun, 凡坤, 564
Fanti language, 芳蒂语, 490, 492, 539
Faradj al-Hadjām, 法拉吉·哈贾姆, 731
Faradj b. Sallām, 法拉吉·伊本·萨拉姆, 270
Farāfra/Farfārum, 费拉菲拉/法尔法龙, 279, 281
Faras, 法拉斯, 194-5, 197, 202, 203, 206-22散见各处
al-Farazdak, 费拉兹达克, 723
Fara-fenni, 法拉-芬尼, 546, 547
Farias, P. 保罗·法里亚斯, 745
Farkwa, 法尔夸, 610
Fās, Wādī, 法斯干河, 255, 256
Fasi, M., el, 穆罕默德·埃尔·法西, 31, 56, 59
Fatadjar, 法塔加, 561
Fātima, 法蒂玛(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 44, 45, 314, 319
Fātimids, 法蒂玛王朝, 6, 7, 8, 16, 22, 45, 52-5, 103, 175-6, 314-35, 578, 725; 法蒂玛王朝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7, 341, 342, 359; 柏柏尔人重建霸业, 328-32; 王朝的建立, 314-19; 在埃及, 91, 179, 180-9, 215-16; 在埃塞俄比亚, 85; 在欧洲, 315-18; 巴努希拉尔人和巴努苏莱姆人的入侵, 332-35; 在马格里布, 59, 65, 66, 70, 228, 251-2, 254, 319-25; 在努比亚, 82; 法蒂玛王朝和撒哈拉通道, 280, 298, 304, 373, 388, 392-3, 396-8, 402, 428, 434
Fatrapaitan(ana) 法特拉帕伊塔纳纳(马达加斯加"巨人"), 684-5
fatwā/fatāwā, 法特瓦/法塔瓦(宗教法律裁决), 117, 354
fay', 战利品, 247
Faykun, 费坤, 564
Fayyūm, 法尤姆(法雍), 177, 327
Fazāra, 法扎拉, 730
al-Fazārī, 法扎里, 122, 281, 308, 384
Fei Hsin, 费信, 608
Ferghāna, 费尔加纳, 178
Ferlo, 费尔洛, 128, 463
Fernandes, V., 瓦伦廷·费尔南德斯, 313
Ferrand, G., G. 费朗, 28, 681, 732
Feti la Choya, 费蒂-拉-乔亚, 649
feudalism, 封建主义, 封建制度, 18
Fez, 非斯, 58, 66, 78, 112, 244, 256-8, 266, 269, 272, 352-3, 738, 783; 非斯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8, 351; 非斯和法蒂玛王朝, 316, 322, 329, 331; 非斯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5, 378, 395, 400-1, 407
Fezzān, 费赞, 费赞人, 68, 69, 77, 97, 228, 447, 778; 费赞和撒哈拉通道, 276, 278-9, 281, 283, 285, 288-9, 294, 304, 370, 372, 375, 420, 437-8, 451, 453, 715; 费赞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2, 123, 124
fikh, "斐格海", 伊斯兰教, 法学体系, 41-2, 52, 95, 267, 271, 719
Filipowiak, W., W. 菲利波维亚克, 760
Fisher, H. J., H. J. 费希尔, 74
fishing, 渔业, 捕鱼, 148, 292, 356, 461, 468, 495, 501-2, 553, 609-10, 694, 756-7
fitna, "菲特纳"(穆斯林内部的战乱), 248
'Five Pillars of Islam', 伊斯兰教的五项基本功课, "五功", 37-8, 93-4
Flacourt, E., de, 艾蒂安·德-弗拉库, 685, 690
Flup, 弗卢普人, 533
foggāra, "福加拉"(灌溉渠道), 277-8, 289, 295, 302, 743
food, *see* agriculture, diet. 食物, 见"农业"、"饮食"诸栏目
forest, equatorial, Bantu in, 热带森林, 赤道森林; 热带森林中的班图人, 144, 151, 152, 154-5; 又见"生态"(ecology)栏目
Fort Jesus, 耶稣(苏)堡, 610
Fort-Dauphin, 多芬堡, 90
Fournel, H., 亨利·富尔内, 226
France, 法兰西、法国, 147, 225-6, 242, 264, 265, 326
Franks, 法兰克人, 13, 18, 49, 54, 188

Frobenius, L., 莱奥·弗罗贝尼乌斯, 513, 522
Frumentius, 弗鲁孟提乌斯, 559
Fudda, 富达, 710
fukahā' see fakīhs, "富卡哈", 见"法基赫"栏目
Fulani/Fulbe/Peul/Pullo/Tukuler, 富拉尼人/富尔贝人/颇尔人/普洛人/图库洛尔人, 53, 73, 78, 79, 91, 110, 112, 535, 543, 547; 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1, 126－8
Fulfulde/Pular, 富尔富尔德语/普拉尔语, 127－8, 539
Fundj, 芬吉人, 84
Fungo, 丰戈, 590, 593
Furātiyya, 富拉蒂亚人, 728
Fustāt/al－Fustāt, 伏斯泰特(开罗旧城), 50, 165, 171－7 散见各处, 180, 183－5, 189－90, 193, 211, 290, 327－8, 791
Futa/Futa Jallon/Futa Toro, 富塔、富塔人/富塔贾隆、富塔贾隆人/富塔托罗、富塔托罗人, 80, 124, 127－30, 464, 又见几内亚(Guinea)、上几内亚(Upper Guinea)诸栏目
Gã, 加人, 526
Gã language, 加语, 490, 492, 494, 495, 502
Gabon, 加蓬, 253, 741; 加蓬和讲班图语各族, 145, 147, 151; 加蓬和法蒂玛王朝, 316, 332
Gabriel, angel, 加百列, 天使, 33, 37, 94
Gade, 加德人, 490, 492
Gafsa, 加夫萨, 411
Galam, 加拉姆, 358, 424, 453
Galen, 加伦, 716
Galicia, 加利西亚, 399
Galla, 加拉人, 593
Gambia, 冈比亚, 80, 124, 377, 471
Ganda－Soga, 干达－索加人, 618
Ganeboafo, 加尼博阿福, 501
Gangara－Wangara, 甘加拉－万加拉人, 129－30
Gao/Kāw－Kāw/Tādmekka, 加奥/考考/塔德梅卡, 69, 70, 71, 73, 76, 78, 124, 359, 445, 463, 476, 513, 715, 738, 748, 778, 785;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8, 357, 359－60; 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3, 134－5; 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100, 116; 和撒哈拉通道, 279－81, 283, 286, 300－6, 313, 370, 375, 378, 380, 397, 406－18 散见各处, 424－5, 433－4, 449, 460, 476
Gara Krima, 加拉－克里马, 298
Garama, *see* Djarma, 加拉马, 见"贾尔马"栏目
Garamantes, 加拉曼特人, 122, 372; 在乍得地区, 437, 447; 和撒哈拉通道, 285, 287, 292, 295
Garree, 加雷人, 618
Gartkiewicz, P. M., P. M. 加特基维奇, 205, 218, 220
Gatung'ang'a ware, 加通甘加陶器, 622, 627
Gaul, 高卢, 高卢人, 264
Gautier, E. F., E. F. 戈捷(原译戈蒂埃), 224, 226, 227
Gbanshay, 班沙, 549
Gbari, 格巴里人, 490, 492
Gbegbe, 格贝格比, 502
Gbunde, 格本德人, 542
Gebel Adda, 阿达山城, 197, 204
Gebra－Masqal, 加布拉－马斯卡尔, 570
Gedi, 盖迪, 587, 590, 591, 594, 597, 602, 610, 614
Ge'ez, 格埃兹语、格埃兹文, 560, 563, 565, 568, 576
genealogical fictions, 虚构世系, 113－14, 247, 459, 567－8, 722
Genoa, 热那亚, 18, 386
Georgios I, 乔治斯一世, 209－10, 221
Georgios II, 乔治斯二世, 196, 198, 211
Georgios III, 乔治斯三世, 215
Ghadāmes, 古达梅斯, 233, 783; 古达梅斯和撒哈拉通道, 276－9, 281, 285－6, 304, 370, 406－7, 409－15, 432
Ghali, N., 努尔丁·加利, 384
Ghana / Wagadu / Gold Coast (country), 加纳/瓦加杜/黄金海岸(国家), 80, 113, 121, 129, 130, 493－501, 715, 738, 748; 又见几内亚(Guinea)、下几内亚(Lower Guinea)诸栏目
Ghana/Kumbi Saleh (town), 加纳/昆比萨利赫(城市), 121, 124, 475, 513, 738, 761, 766, 778, 783, 785;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8, 340－1, 357, 359－60; 和伊斯兰教, 67, 69, 71, 74－5, 80; 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1, 123, 129－39; 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280, 301, 308, 311, 313, 370, 374－6, 382, 385－6, 397, 406－16, 422－5, 434
'Gharbīl, 盖尔比勒, 423, 425
Ghamtīl, 盖尔恩蒂尔, 423
Ghast, *see* Tegdaoust, 加斯特, 见"泰格达乌斯特"栏目
Ghayārū, 盖耶鲁, 69
al－Ghazālī, Abū Hamid, 阿布·哈米德·加扎利, 42, 354 注, 365
al－Ghazālī (place), 加扎利(地方), 197, 204, 206
Ghaznavids, 伽色尼王朝, 52
Ghiyārā, 吉亚拉, 423－5
Ghiyārū, 吉亚鲁, 408, 411, 422－4
Ghomāra, Banū, 巴努－戈马拉人, 66, 297
Ghulām Allāh ibn 'Ayd, 古拉姆·阿拉·伊本·艾德, 84
ghulām, 白奴, 180, 185
Ghumāra, 古马拉人, 228
Giado, *see* Djāddū, 贾多, 见"贾杜"栏目
Gibraltar, 直布罗陀, 242, 351
Gikuyu, 吉库尤人, 636
Gio, 吉奥人, 556
Girāmgaz'i, 吉拉姆加兹, 580
Giriama, 吉利亚马人, 597
Gisaga, 吉萨加, 156, 158
Giza, 吉萨, 177
glass trade, 玻璃贸易, 207－8, 614, 673－4, 771
God, 上帝, 真主, 神, 31－2, 39, 93, 96, 788
Godjam, 戈贾姆, 561
Goitein, S.D., S.D.戈伊坦, 265, 399
Gokomere/Ziwa, 戈科梅雷/济瓦, 645
Gola, 戈拉人, 542－3, 552, 555, 556
Gold Coast, *see* Ghana (country); Guinea; Lower Guinea 黄金海岸, 见"加纳(国家)"、"几内亚"、"下几内亚"诸栏目
gold coins, 金币, 4－5, 8; 几内亚/西非, 480, 486, 513, 522; 金币和撒哈拉通道, 368, 379－402 散见各处, 409, 418－20, 428
gold production, 黄金生产, 102, 198, 209, 358, 414, 424, 463, 611－14 散见各处, 768

gold trade, 黄金贸易, 8, 9, 706, 741−2, 749, 768−9, 778−9; 埃塞俄比亚, 558; 几内亚/西非, 475−7, 480, 505, 546; 马格里布, 263, 265; 努比亚, 207; 穿越撒哈拉的黄金贸易, 282, 300−1, 306, 356−8, 367−8, 371, 379−80, 383−99散见各处, 404, 408−10, 414, 422−5, 434; 南部非洲, 672−4, 679; 苏丹地区, 135−6

Gorgol, 戈尔戈勒, 129

Gorhan/Daza, 戈尔汉人/达扎人, 277, 440

grain, *see* agriculture, 谷物, 见"农业"栏目

Great Lakes area, 大湖地区, 154, 160, 618−30散见各处, 633−4, 637, 647, 753,

Great Lakes people, 大湖地区各族人民, 637

Great Mughals, 莫卧儿人, 52

Great Zimbabwe, 大津巴布韦, 597, 611, 679

Greek language, 希腊语, 希腊文, 169, 202, 213, 215, 563, 568, 573

Greenberg, J. H., 约瑟夫·格林伯格, 492−3, 538−9

Gregory, 格雷戈里, 231−2

Gsell, S., 斯特凡纳·格塞尔, 226, 742,

Guan, 古安, 古安人, 501−2

Guang, 古昂人, 490, 492, 494

Guercalta, 盖拉尔塔, 572

Guerze, 格尔泽人, 538

Guinea/West Africa, 几内亚/西非, 735; 农业, 461−6, 470, 480, 482−3, 494, 499, 501−2, 504, 541, 544−5, 549, 555, 753, 756−7; 权力集中, 477−87; 疾病, 465; 语言, 492−3, 501, 531−41; 冶金术, 467−77; 人口流动, 746, 760−61; 技术, 743, 762, 764−77; 贸易, 469−71, 475−7, 480, 484−7, 499, 503−4, 548, 738−9, 742, 778, 781; 又见"下几内亚"(Lower Guinea)、"上几内亚"(Upper Guinea)诸栏目

gum, 树胶, 739

Gumanye, 古曼耶, 古曼耶人, 665, 667, 668

Gumba, 贡巴人, 617, 636

Gundu, 贡杜, 647, 657

Gur, 古尔语, 536

Gurage, 古拉格人, 561

Gurâra, 古拉拉, 278−9, 302−3, 370, 372

Gusii−Kuria, 古西−库里亚人, 618, 627

Guthrie, M., 马尔科姆·格思里, 142, 143, 145

Habash, 哈巴什(阿拉伯人对埃塞俄比亚人的称呼), 439, 708

Habasha, 哈巴夏人, 712

Habīb ibn Abī 'Ubayda b.'Ukba b. Nāfi', 哈比卜·伊本·阿比·乌巴达·本·乌克巴·本·奈菲, 68, 307−8

Habiba, Umm, 乌姆·哈比巴, 711

Hadāni, "哈达尼"(埃塞俄比亚一种称号), 565

Hadāriba, 哈达里巴人, 83

haddād, "哈达德"(阿拉伯语: 铁匠), 437, 446

hadith, 伊斯兰圣训("哈底斯"), 37, 40, 41, 45, 94, 104, 247, 249, 576, 709, 710, 731

al−Hadjām, Faradj, 法拉吉·哈贾姆, 731

hadjdj, 朝圣, 朝觐, 38, 45, 94, 96, 109, 337, 342, 720

al−Hadjdjādj, 哈吉贾吉, 729

Hadrumetum, *see* Sūs, 哈德鲁梅, 见"苏斯"栏目

Hadyā, 哈迪亚, 86, 561

Hadza, 哈扎人, 619

Hafsids, 哈夫斯王朝, 62, 452

Haghero−Deragoueh, 哈盖罗−德拉古埃, 559

Hair, P. E. H., P. E. H. 海尔, 540

al−Hakam I, 哈卡姆一世, 271

al−Hākim, 哈基姆, 183−4, 190, 211

Hakk al−din, 哈克·丁, 583−4

Hakk al−din II, 哈克·丁二世, 583, 584

Hal−pularen, 哈尔−普拉伦人, 128, 又见"富拉尼"(Fulani)栏目

Hām, 哈姆(圣经中诺亚之子), 721−2

al−Hamdāni, 哈姆达尼, 721

Hamdānids, 哈姆丹王朝, 179, 182−3

'Hamites', 含米特人, 119−20, 127, 128, 487

Hamito−Semitic language, 含米特−闪米特语, 444

Hammād, Banū, 巴努−哈马德王朝, 299, 335, 409, 414

Hammād Ibn Bulukkin, 哈马德·伊本·布鲁金, 329−31

Hammāda al−Hamrā', 哈马达·哈姆拉(哈姆拉石漠), 285

Hammādid al−Nāsir, 哈马德王朝的纳西尔, 333

Hammādids, 哈马德王朝, 299, 301, 354; 哈马德王朝和法蒂玛王朝, 316, 330−1, 333, 335

al−Hamwiya, Banū, 巴努−哈姆维亚人, 565

Hanafi/Hanafites, 哈乃斐/哈乃斐学派, 41, 274

Hanbali, 罕百里, 41

Hani, 哈尼, 463, 467, 469

Hanzala b. Safwān, 汉扎拉·伊本·萨夫万, 250, 259

Harar, 哈勒尔, 85, 86, 585

Harātin, 哈拉丁人, 125

Harb−ar'ad, 哈尔布−阿拉德, 580

al−Hārith b. Talīd al−Hadrami, 哈里斯·本·塔利德·哈德拉米, 252

Harthama Ibn A'yān, 哈尔萨马·伊本·阿扬, 260−1

Hārūn al−Rashīd, 哈龙·拉希德, 209, 260−1

Hārūn b. Khumārawayh, 哈龙·本·胡马拉瓦叶, 174

al−Hasan, 哈桑, 187, 314, 582

Hasan Ibn al−Sabbāh, 哈桑·伊本·萨巴赫, 187

al−Hasan ibn 'Alī al−Kalbī, 哈桑·伊本·阿里·卡勒比, 325

Hasanids, 哈桑团伙, 172

al−hasham, 追随者, 349

Hashimites, 哈希姆王朝, 45

al−Hashishiyyūn, 哈萨辛派, 45

Hassān ibn al−Nu'mān, 哈桑·伊本·努曼, 237−40, 241, 247

Hausa, 豪萨, 豪萨人, 70, 71, 79−80, 91, 110, 121, 487, 747; 在乍得, 444, 449; 语言, 535; 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4, 130−1, 139

Hawd/Hodh, 豪德/霍德, 130, 132, 339

Hawdīn, 豪丁, 445−6

Hawiya, 哈威亚人, 600

Hawrān, 戈兰高地, 188

Hawwā'/Hū, 豪瓦/胡, 453

Hawwāra, 豪瓦拉, 豪瓦拉人, 123,

124, 227, 231, 235, 241, 363; 和撒哈拉通道, 278, 284, 288, 304
Haydarān, 海达兰, 332, 333
al-Haykatan, 海卡丹, 729
Hayr, *see* Aïr, 海尔(阿伊尔的古名), 见"阿伊尔"栏目
al-Hazban'al Harbar, 哈兹班·哈尔巴尔, 304
Heine, B., 贝恩特·海涅, 644, 646, 661, 663
Henzat, 亨扎特, 559
herbs, *see* spices, 香草, 见"香料"栏目
herding, *see*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ism, 放牧, 见"农业"和"畜牧"栏目
Herero, 赫雷罗人, 赫雷罗语, 140, 644
Hermas, 赫马, 568
Herodotus, 希罗多德, 278, 285
Hidjāz, 汉志, 45, 577, 706, 715, 730
hidjra, "希吉拉"(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转移到麦地那), 35, 57, 344, 346
Hilāl, Banū, 巴努希拉尔人, 70, 186, 227, 281, 303, 760; 巴努希拉尔人和法蒂玛王朝, 316, 332-4; 迁移/入侵, 6, 54, 332-5
Hill, M. H., M. H. 希尔, 548, 552, 553, 555
Himyarites/Himyar, 希米亚里特人/希木叶尔, 456, 459, 559-60, 705, 706
Hinduism, 印度教, 24, 46
Hioweyo, 希奥韦约, 502
Hippo Diarhytus, *see* Bizerta, 希波-迪亚尔希图斯, 见"比塞大"栏目
Hippo Regius, 希波-雷吉乌斯, 237
Hir, *see* Aïr, 希尔(阿伊尔的古名), 见"阿伊尔"栏目
Hishām ibn 'Abd al-Malik, 希沙姆·伊本·阿卜德·马立克, 68, 248, 278, 298
Hiskett, M., M. 希斯基特, 74
Hōdh/Hawd, 霍德/豪德, 130, 132, 339
Hoggar/Ahaggar, 霍加尔, 霍加尔人/阿哈加尔, 123, 124, 125, 138, 421; 和撒哈拉通道, 295, 297, 303-4, 715
Hola Hola, 霍拉霍拉, 霍拉霍拉人, 666
Hollingsworth, L. W., L. W. 霍林斯沃思, 588
Homs, 霍姆斯, 179
Hopkins, A. G., A. G. 霍普金斯, 71
Hopkins, J. F. P., J. F. P. 霍普金斯, 121
Hori farima, "霍里·法里马"(大祭司), 110
Horn of Africa, 非洲之角, 558-74; 非洲之角和伊斯兰教, 58, 77, 84-8, 95; 又见"埃塞俄比亚"(Ethiopia)、索马里(Somalia)诸栏目
horses, 马, 133, 363, 371, 485, 741
Houlouf, 胡鲁夫, 442
houses, remains of, *see* archaeological sites, 房屋的遗迹, 见"考古遗址"栏目
Hrbek, I., I. 赫尔贝克, 1, 31, 56, 67, 314, 336
Hsien Tsung, 唐朝宪宗皇帝, 732
Huang Ch'ao, 黄巢, 21
Huffman, T. N., T. N. 赫夫曼, 664
Hugon, B., 巴泰勒米·于贡, 685
Hugot, H. J., H. J. 于戈, 126, 368, 370
Hū/Hawwā', 胡/豪瓦, 453-5
al-Hulwāni, 胡勒瓦尼, 254
Hummay(d. 1086), 胡迈依, (1086年卒), 455-6, 458-60
Hummay Djilmi (d. 1097), 胡迈依·吉勒米(1097年逝世), 73-4, 75, 101
Hummay Banū, 巴努-胡迈依, 454, 458
hunters/hunter-gatherers, 以狩猎为生者/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者, 587, 752, 755; 讲班图语各族, 148, 150, 155; 中部非洲, 653, 663; 东非、东部非洲, 610-11, 619-21, 624, 629, 635, 639; 几内亚/西非, 461, 464, 480, 495, 501; 南部非洲, 667
al-Husayn (son of 'Ali), 侯赛因(阿里·哈里发之子), 181, 314
Ibadan, 伊巴丹, 489
'ibādāt, 礼拜, 宗教义务, 720
Ibādites, 易巴德教派, 44, 97, 103, 451; 易巴德教派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41-2; 易巴德教派和法蒂玛王朝, 316, 320, 322, 324; 在马格里布, 249, 250, 252-3, 272; 在北部非洲, 69-71; 易巴德教派和撒哈拉通道, 277-92 散见各处, 295-8, 301, 306, 372, 373, 380, 389, 406
Iberian peninsula, *see* Spain, 伊比利亚半岛, 见"西班牙"栏目
Ibibio, 伊比比奥人, 490, 492-3, 512
Ibn 'Abd al-'Azīz, 'Umar, 奥马尔·伊本·阿卜德·阿齐兹, 170, 244, 247
Ibn 'Abd al-'Azīz, Kānūn, 卡农·伊本·阿卜德·阿齐兹, 198, 212-13
Ibn 'Abd al-Bākī al-Bukhārī al-Makki,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巴基·布哈里·马基, 576
Ibn 'Abd al-Hakam, 伊本·阿卜德·哈卡姆, 225, 226, 238, 286, 287, 291
Ibn 'Abd Allāh ibn al-Hasan, Sulaymān, 苏莱曼·伊本·阿卜杜拉·伊本·哈桑, 243-4
Ibn 'Abd Allāh, Khālid, 哈立德·伊本·阿卜杜拉, 726
Ibn 'Abd al-Malik, Hishām, 希沙姆·伊本·阿卜德·马立克, 68, 248, 278, 298
Ibn 'Abd al-Malik, Sulaymān, 苏莱曼·伊本·阿卜德·马利克, 170, 247
Ibn 'Abd al-Malik, Yazīd, 亚齐德·伊本·阿卜德·马立克, 730
Ibn 'Abd al-Rahmān al-Fihri, Yūsuf, 优素福·伊本·阿卜德·拉赫曼·菲赫里, 263
Ibn 'Abd al-Wahhāb', Aflah, 阿夫拉赫·伊本·阿卜德·瓦哈卜, 266
Ibn 'Abd Rabbihi, 伊本·阿卜德·拉比希, 270
Ibn 'Abdallāh,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 46
Ibn 'Abdille,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迪尔, 46
Ibn Abī Āmir, 伊本·阿比(埃米尔)271-2
Ibn Abī Zar', 伊本·阿比·扎尔, 309, 340, 345-6
Ibn Abī'l-Rabī', 伊本·阿比—拉比, 249

Ibn Abu Bakr ibn Azhar al dīn,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阿布·贝克尔·伊本·爱资哈尔·丁, 585
Ibn Aflah, Ya'kūb, 雅库布·伊本·阿夫拉赫, 298
Ibn al－Aghlab, Ibrahim, 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 255, 260
Ibn al－'As, 'Amr, 阿姆鲁·伊本·阿斯, 164－6, 169, 189, 231, 232, 575
Ibn al Ash'ath, 伊本·阿沙斯, 253, 287－9
Ibn al Athīr, 伊本·阿西尔, 225, 319, 337
Ibn al－Djarrāh, 伊本·贾拉赫, 184
Ibn al Djawzī, 伊本·贾乌齐, 576, 711
Ibn al－Fakīh al－Hamadānī, 伊本·法基赫·哈马达尼, 304－5; 关于东非的论述, 598; 关于撒哈拉的论述, 283, 308, 379, 384
Ibn al－Farra', 伊本·法拉, 274
Ibn al－Furāt, 伊本·福拉特, 178, 180, 264, 272, 274
Ibn al－Ikhshīd, Unudjūr, 乌努朱尔·伊本·伊赫什德, 179
Ibn al Khattāb, 'Umar, 奥马尔·伊本·哈塔卜, 226, 709
Ibn al－Mahdī, Ibrāhīm, 易卜拉欣·伊本·马赫迪, 724
Ibn al Mudabbir, 伊本·穆达比尔, 172－3
Ibn al Mudjāwir, 伊本·穆贾维尔, 700, 723
Ibn al Mukhtār Gombele, 伊本·穆赫塔尔·贡贝莱, 112
Ibn al－Nu'mān, Hassān, 哈桑·伊本·努曼, 237－40, 241, 247
Ibn al－Saghīr, 伊本·萨吉尔, 100, 272, 280
Ibn al－Sūfī, 伊本·苏菲, 173
Ibn 'Amr, 'Irar, 伊拉尔·伊本·阿姆鲁, 729
Ibn Abi Habīb, Yazīd, 亚齐德·伊本·阿比·哈比卜, 731
Ibn 'Arafa,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阿拉法, 266
Ibn A'yan, Harthama, 哈尔萨马·伊本·阿扬, 260－1
Ibn Badīs, Zīrīd, 齐里·伊本·巴迪斯, 186
Ibn Battūta, 伊本·巴图塔, 76, 78, 100, 121, 304－5, 476
Ibn Bulukkīn, Hammad, 哈马德·伊本·布鲁金, 329－31
Ibn Burd, Bashār, 巴沙尔·伊本·布尔德, 723
Ibn Butlān, 伊本·布特兰, 716
Ibn Dansal al Fūlānī, 伊本·丹萨勒·富拉尼, 112
Ibn Dā'ūd,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达乌德, 580
Ibn Dhi Yazan, Sayf, 赛义夫·伊本·西·亚赞, 131, 455－6, 458－9
Ibn Djubayr ibn Hishām, Abū 'Abd Allah Sa'id, 阿布·阿卜杜拉·赛义德·伊本·朱拜尔·伊本·希沙姆, 731
Ibn Fadl Allah al－'Umari, see al－'Umari, 伊本·法德尔·阿拉·欧麦里, 见"欧麦里"栏目
Ibn Hadjar al－'Askalānī,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 386
Ibn Hawkal, 伊本·豪卡勒, 120, 196, 198－9, 208, 265, 266, 关于阿尔莫拉维德的论述, 339,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论述, 564, 565－6, 关于撒哈拉商路的论述, 283, 286, 288－9, 294, 298, 305, 307, 310, 373－5, 379, 381－2, 389, 403, 412, 425－6, 740
Ibn Hudaydj, 伊本·胡代杰, 233
Ibn Humayd, 伊本·胡迈德, 268
Ibn Ibrāhīm, Ahmed, 艾哈迈德·伊本·易卜拉欣, 583, 585
Ibn Ibrāhīm, Yahyā, 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 336, 340, 342－4
Ibn 'Idhārī, 伊本·伊达里, 225
Ibn Ilyās, Yūnus, 尤努斯·伊本·伊利亚斯, 251
Ibn 'Imrān, Ishāk, 伊沙克·伊本·伊姆拉恩, 271
Ibn Ismā'il,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 315
Ibn Kāsin, Ismā'il, 伊斯梅尔·伊本·卡辛, 299
Ibn Khaldūn, 伊本·哈勒敦, 52, 63, 68, 76, 99－100, 123, 452, 722; 关于阿尔莫拉维德的论述, 336, 345－6; 关于柏柏尔人的论述, 224－8散见各处, 247, 251, 317;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论述, 579, 582; 关于法蒂玛王朝的论述, 319, 326, 333－334; 关于撒哈拉的论述, 277－8, 288, 296－8, 302－304, 308－9, 385－6
Ibn Khattāb, 伊本·哈塔卜, 452
Ibn Killis, Ya'kūb, 雅各布·伊本·基利斯, 182－3
Ibn Kurhub, Ahmad, 艾哈迈德·伊本·库尔胡布, 325
Ibn Kutayba, 伊本·古泰巴, 445－447
Ibn Lakīs, 伊本·拉基斯, 23, 28, 701－2
Ibn Manād, Zīrī, 齐里·伊本·马纳德, 323, 328
Ibn Mānī,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马尼, 74
Ibn Misdjah, Abū 'Uthman Sa'id, 阿布·奥斯曼·赛义德·伊本·米斯贾赫, 730
Ibn Muhammad, 'Alī (869), 伊本·穆罕默德, 阿里(869年), 727
Ibn Muhammad al－Mu'tazilī, Ibrāhīm, 易卜拉欣·伊本·穆罕默德·穆尔太齐赖, 254
Ibn Muhammad b. 'Abd al－Hamīd, 伊本·穆罕默德·本·阿卜德·哈米德, 255
Ibn Mukatil al－'Akkī,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穆卡蒂勒·阿基, 261
Ibn Mūsā al－Khuwārizmī,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胡瓦里兹米, 293
Ibn Rabāh, Abū 'Atā, 阿布·阿塔·伊本·拉巴赫, 731
Ibn Ra'īk, 伊本·拉伊克, 178－9
Ibn Rustum, 'Abd al－Rahman, 阿卜德·拉赫曼·伊本·鲁斯塔姆, 65, 278
Ibn Ruzzīk, Tala'i', 塔拉伊·伊本·鲁齐克, 187, 188
Ibn Sa'īd, 伊本·赛义德, 291, 576; 关于个得的论述, 439－40, 447, 450
Ibn Sālim al－Aswānī, 伊本·萨利姆·阿斯瓦尼, 196, 208, 211
Ibn Sallār, 伊本·萨拉尔, 189
Ibn Sulaym al－Uswānī, see al Uswānī, 伊本·苏莱姆·乌斯瓦尼, 见"乌斯瓦尼"栏目

Ibn Sulaymān, Ibrāhīm, 易卜拉欣·伊本·苏莱曼，270
Ibn Sumayz al-Murādī, Sharīk, 谢里克·伊本·苏迈兹·穆拉迪，234
Ibn Taghrībirdī, 伊本·台格利比尔迪，173
Ibn Tashfīn, Yūsuf,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350-1, 354, 361, 364, 366
Ibn Tughdj,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图格杰，174, 177-9
Ibn Tūlūn, Ahmad, 艾哈默德·伊本·图伦，172-5, 189-90, 190, 192, 210, 263, 725
Ibn Tumart, 伊本·图马特，99, 365
Ibn 'Umar al-'Udhrī, Ahmad, 艾哈迈德·伊本·奥马尔·乌兹里，406
Ibn 'Umar, Yahyā, 伊本·奥马尔，叶海亚，73, 344, 345, 346, 348,
Ibn Wabara, 'Amr, 阿姆鲁·伊本·瓦巴拉，725
Ibn Yāsīn, 'Abdallāh,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65, 71, 106
Ibn Yāsīn al-Djazūlī, 'Abdallah, 阿卜杜拉·伊本·亚辛·贾祖利，337, 340, 342-6, 348
Ibn Yāsir, 'Ammār, 阿玛尔·伊本·雅西尔，709
Ibn Yazīd, Isā, 伊萨·伊本·亚齐德，741
Ibn Yazīd,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亚齐德，247
Ibn Yūsuf al-Warrāk, Muhammad, 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沃拉克，406
Ibrāhīm II, 易卜拉欣二世，254, 261, 264
Ibrāhīm al-Mu'tasim, 易卜拉欣·穆尔台绥姆，209
Ibrāhīm ibn al-Aghlab, 易卜拉欣·伊本·阿格拉布，255, 260
Ibrāhīm ibn al-Mahdī, 易卜拉欣·伊本·马赫迪，724
Ibrāhīm ibn Muhammad al-Mu'tazilī, 易卜拉欣·伊本·穆罕默德·穆尔太齐赖，254
Ibrāhīm ibn Sulāyman, 易卜拉欣·伊本·苏莱曼，270
Ibrāhīm Sūra, 易卜拉欣·苏拉，79
Idah, 伊达，526
Idjīl, 伊吉勒，777
idjtihād, "伊智提哈德"，伊斯兰教法原则，41
idjmā', 公议原则，41, 42
Idoma, 伊多马人，490, 492
Idrīs Alaōma, 伊德里斯·阿拉沃马，80
Idrīs I, 伊德里斯一世，66, 254-5, 256
Idrīs II, 伊德里斯二世，66, 255-6, 258
al-Idrīsī, 伊德里西，25, 108, 131-2, 335; 关于阿尔莫拉维德的论述，355, 363-4; 关于乍得的论述，439-40, 446-7, 457-8; 关于东部非洲的论述，598, 600, 601, 610-11, 613; 关于撒哈拉贸易的论述，276, 282-3, 285-94, 300, 303-5, 311, 374, 381-2, 385, 403, 410-13, 416, 423, 425-7, 486
Idrīsids, 伊德里斯王朝，45, 52, 66, 244, 341; 在马格里布，228, 253-8, 314, 323, 328; 伊德里斯王朝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378, 392, 394
Iesou, 伊苏，210
Ifāt, 伊法特，86, 561, 579, 580-5
Ife, 伊费，121, 376, 463, 467, 481-7, 489, 491, 505-8, 512-16, 521-3, 764, 767, 783, 790
Ifran, Banū, 巴努-伊夫兰人，339
Ifrīkiya (Tunisia) and Islam, 伊弗里基亚（突尼斯），又译易弗里基叶，和伊斯兰教，50, 51, 62, 64-6, 68-9, 123, 124, 231-2, 233-40, 243, 307, 452, 715, 758, 784; 伊弗里基亚和埃及，178-9, 181, 186; 伊弗里基亚和法蒂玛王朝，316-34 散见各处; 拜占，258-71 散见各处; 伊弗里基亚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379-80, 383, 386, 391-2, 398-9, 409
Igala, 伊加拉，伊加拉人，490, 492, 512, 521
Igbira/Igbirra, 伊格比拉人，490, 492
Igbo, 伊格博，伊格博人，483, 490, 492-3, 512, 526, 539
Igbomina, 伊格博米纳，伊格博米纳人，490, 507
Igbo-Ukwu, 伊格博-乌库，415, 417, 463, 477-81, 486, 489, 517-24, 526, 528-9, 769, 771, 778, 783, 785, 792
Ighiran-Yattūf Cap (Gurr), 伊吉兰-亚图夫-古尔角，235-6
ihsān, "伊赫桑"（宽待奴仆），718
Ijaw, 伊乔人，490
Ijo language, 伊乔语，492-3, 512, 539
Ikānūn, "勃卡农"（大理石柱……），99
'Ikd al-Farid, 《……》，270
Ikern, 伊凯姆，394
Ikirmidī, 伊吉明迪，197, 204
al-Ikhshīdī, Kāfūr, 卡富尔·伊赫什德，724
Ikhshidids ikhshīd, 伊赫什德王朝，211, 392; 在埃及，178-80
Ikirun, 伊基伦，507
Iklībiyya (Djazrat Basha), 伊克利比亚（贾齐拉特·巴沙），234
iktā', "伊克塔"（征税权），54, 277 各行
Ilesha, 伊莱沙，489
Imām Imamate, 伊玛目，伊玛目之下的国家，伊玛目地位，41, 44-5, 64-5, 100, 176, 180-5, 189, 243, 249, 253-5, 266, 又见"哈利哲教派"（Khāridjite）栏目
'immorality' of Africa, 非洲人的"伤风败俗"行为，107
incense, see spices, 熏香，见"香料"栏目
India, 印度，26, 522, 528, 689, 739; 印度和伊古廷帝国，10, 12; 印度和东非，602, 612, 614; 印度和伊斯兰教，5-6, 8, 9, 15, 20, 23-5, 27-9, 41, 45, 48, 52, 87, 89
Indian Ocean, 印度洋，横跨印度洋的贸易，689, 734, 737, 747; 印度洋和伊斯兰教，8, 21-9, 54, 89-90; 印度洋和马达加斯加，689-90, 696-703, 又见"海运"（maritime）栏目
indigo, 靛蓝，289, 739, 775
indjaja, "因贾贾"（灌溉机械名），290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和东非，612, 613, 626, 641; 印度尼西亚和伊斯兰教，8, 23, 25-9, 41
Indus river, 印度河，25, 49
industry, 工业，744; 又见"铁"（iron）; "冶金术"（metallurgy）、"制陶工艺"（pottery）; "技术"（techniques），

"纺织品"(textiles);贸易(trade)诸栏目
Ingombe Ilede, 因贡贝-伊莱代(原译伊贡比-伊莱代), 647, 658
Ingrams, W. H., W. H. 英格拉姆斯, 588
Innarya, 因纳亚, 561
innovation, see techniques, 创新, 见"技术"栏目
In-Takkū, 因·塔库, 344
Ioannes, 约安尼斯, 196
Ioannes III, 约安尼斯三世, 212
Iramba, 伊兰巴人, 632
Iran, see Persia, 伊朗, 见"波斯"栏目
Irangi, 伊兰吉人, 623
Iraq, 伊拉克, 315; 伊拉克和东部非洲, 606, 613, 614; 伊拉克和伊斯兰教, 41, 45, 48-51; 奴隶, 714-16, 722, 724-8 散见各处
'Irār ibn 'Amr, 伊拉尔·伊本·阿姆鲁, 729
Irdjā', 信仰与赎罪, 274
Iringa, 伊林加人, 617, 618
Irodo, 伊鲁杜, 683, 691, 693, 694
Iron Age, 铁器时代, 743; 铁器时代和班图语族, 150-2, 156-9; 中部非洲, 643-63; 东部非洲, 592-3, 621-6; 几内亚, 499-523, 527, 528, 545, 548; 南部非洲, 664-80
iron mining/working/trade, 铁矿开采/铁器制作/铁贸易, 25, 358, 693, 739, 770, 772; 和讲班图语各族, 149, 151, 152, 156-8; 中部非洲, 653-4; 乍得, 435-7, 441; 东部非洲, 593, 611, 612, 621, 628, 634-5, 637; 埃塞俄比亚, 558; 几内亚/西非, 467-70, 495-6, 499, 501, 505, 512, 516, 521-2, 529, 541, 544, 546, 548; 和伊斯兰教, 102-3; 努比亚, 207; 和撒哈拉通道, 355, 357-8, 374, 377; 苏丹地区, 132-3, 139
irrigation, 灌溉, 743, 755; 东部非洲, 629, 632; 撒哈拉, 277-8, 289, 295, 302-4, 又见"绿洲"(oases)栏目
'Isa b. Dīnār, 伊萨·本·迪纳尔, 274
Isā Ibn Yazīd, 伊萨·伊本·亚齐德, 741
Isamu Pati, 伊萨穆·帕蒂, 647, 657
Isaq Somali, 伊萨克-索马里(部族), 87
Isedraten, see Sadrāta, 伊塞德拉顿, 见"萨德拉塔"栏目
Isebeten/Asabat, 伊塞贝顿人/阿萨巴特人, 304
Ishāk al-Mawsilī, 伊沙克·穆西利, 271
Ishāk ibn Muhammad b. 'Abd al-Hamīd, 伊沙克·伊本·穆罕默德·本·阿卜德·哈米德, 255
Ishāk, Shaykh, 伊沙克(谢赫), 87
Ishango, 伊尚戈, 162
Ishāk ibn 'Imrān, 伊沙克·伊本·伊姆拉恩, 271
Islam, 伊斯兰, 伊斯兰教, 734, 741, 748, 783-91; 伊斯兰教的兴起, 2-10; 伊斯兰教和散居各地的非洲人, 708-12; 伊斯兰教和亚洲, 20-2, 在个别 450-4; 伊斯兰教和东非, 588-90, 597-605 散见各处, 613; 在埃塞俄比亚, 560, 564, 575-85; 伊斯兰势力的扩张, 31-55; 在马达加斯加, 691, 701-2; 在撒哈拉, 278, 280, 284, 286-94, 298, 301-2, 307-10; 派别, 43-6, 特别见"哈列哲教派"(Khāridjites); "什叶派"(shi'ites); "逊尼派教义(Sunnism)诸栏目; 伊斯兰教的社会意义, 745-6; 伊斯兰教的传播, 56-91
Islamization, see Arabization, 伊斯兰化, 见"阿拉伯化"栏目
Ismā'īl, 伊斯玛仪, 45, 315; 又见"伊斯玛仪派"(Ismā'īliyya) 栏目
Ismā'īl ibn Kāsin, 伊斯梅尔·伊本·卡辛, 299
Isma'īl b. Ziyād al-Nafūsī, 伊斯梅尔·本·齐亚德·纳富西, 253
Ismā'īliyya, 伊斯玛仪派, 45, 55; 在埃及, 181, 182, 187; 在马格里布, 314-15, 327, 330; 又见"法蒂玛王朝"(Fātimids)栏目
isrā'a, 夜行, 710
Istafūra/Satfūra, 伊斯塔福拉/萨特福拉, 237
al-Istakhrī, 伊斯塔赫里, 601
Italy, 意大利, 18, 264-5; 意大利和伊斯兰教, 13, 18, 50, 54, 98, 326, 335
Ite Yemoo, 伊塔-耶茂, 513
Ithnā 'asharīyya/Twelvers, "伊斯纳·阿什里亚", 十二伊玛目派, 44-5, 181, 315
i'tizal, 伊蒂扎勒派, 隐士派, 254 & n. 269, 274
'itk, 释放奴隶, 赐给奴隶自由, 721
Itsekiri, 伊策基里人, 512
Ituri, 伊图里河, 159
Itlūtān ibn Talākākin, 伊特卢坦·伊本·塔拉卡金, 309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地名), 科特迪瓦(国名), 121, 376; 又见"几内亚"(Guinea); 下几内亚(Lower Guinea)诸栏目
ivory trade, 象牙贸易, 23, 24, 207, 290, 480-1, 484, 496, 501, 559, 612, 613, 673-4, 741, 779
Iwālāten, see Walata, 伊瓦拉顿, 见"瓦拉塔"栏目
Iwo Eleru, 伊沃-埃莱鲁, 162, 489, 492
'Iyād, 伊亚德, 275
Izal, 伊扎勒, 311
Izil, 伊齐勒, 301
Jaha, 贾哈, 561
Jakpawuase, 贾克帕武阿西, 503
Jave, see Sumatra and Java nexus, 爪哇, 见"苏门答腊-爪哇联合体"栏目
Jenne/Jenne-Jeno, 杰内/杰内-杰诺, 78, 112, 116, 463, 548, 782; 和撒哈拉贸易, 376-7, 415, 417-18
Jeremias, 耶雷米亚斯, 213
Jerma, 杰尔马, 133
Jerusalem, 耶路撒冷, 50, 188
Jesus Christ, 耶稣(苏)基督, 31, 32, 37, 93
Jews and Islam, 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 8, 31-2, 33, 46, 56, 61, 93, 166, 182-4, 268; 在埃及, 166, 182-4, 在埃塞俄比亚, 563; 在撒哈拉, 278, 290, 303
Job, 约伯, 129
John VIII, Pope, 约翰八世, 教皇, 265
Johnson, S., S. 约翰逊, 506
Johnston, H. H., H. H. 约翰斯顿, 141
Jones, A., A. 琼斯, 553-4
Jones, G. I., G. I. 琼斯, 529
Jordan, 约旦, 45, 558
Joseph, 约瑟夫, 209

Juafo Abotan, 朱阿福一阿博坦, 501
Juba, 朱巴河, 625-6
Judgement, Day of, 审判日, 38-9
Jukun, 朱昆人, 490 493
Julian, 朱利安(官衔名), 241
Julien, C.-A., C.-A. 朱利安, 226, 748
Justinian, 查士丁尼, 10, 706
Kaarta, 卡尔塔, 124, 128
Ka'ba sanctuary, 克尔白神殿, 33
Kabā'il, 卡巴伊尔, 228
Kabala, 卡巴拉, 547
Kabambian ware, 卡班比陶器, 649-50
kabīla, "卡比拉"(父系氏族群体), 46, 48, 114, 172, 185, 198-9, 333; 又见"柏柏尔人"(Berbers)栏目
Kābis, *see* Gabès, 卡比斯, 见"加贝斯"栏目
Kabuye, 卡布耶, 153, 157 8
Kabuye XXV, 卡布耶二十五世, 158
Kabylia, 卡比利亚, 99
kadar, "卡达尔", 命运, 274
Kādī, "卡迪"(执法官), 110, 176
al-Kādī 'Iyād, 卡迪·伊亚德, 337, 343
Kadin, Banū, 巴努 卡丁人, 288
Kādiriyya, 卡迪里教团, 95
Kādiriyya, 卡迪里亚, 42 3
kādīs, 卡迪(执法官), 71, 90, 181, 183, 187, 240
Kādisiyya, battle of, 卡迪西叶战役, 48
al-Kaf, 卡夫, 237
kāfir, 不信教者, 88
Kafsa, 加夫萨, 62
kafu, 卡富(西长国, 相当于马里如今的省), 81
Kāfūr, 卡富尔, 6, 179-80
Kāfur al-Ikhshīdī, 卡富尔·伊赫什德, 724
Kagoro, 卡戈罗人, 537
al-Kāhina, 卡希娜, 63, 237-8
al-Kā'im, 卡伊姆, 186
al-Kā'im bi-Amr Allāh, 卡伊姆·阿姆鲁·阿拉, 315, 322, 323 4, 326 7
Kakadam, *see* Azukī, 卡卡达姆, 见"阿祖基"栏目
Kakoya 卡科亚, 547
Kal'a, 城堡, 333, 335, 409, 414
Kal'a Abī Tawīl, 阿比·塔维尔堡, 301
Kal'a of the Banū Hammād, 巴努-哈马德堡, 301, 316, 330, 407
Kalābsha, 卡拉布沙, 197, 204
Kalah, 格勒(马六甲海峡港口), 21, 27
Kalahari, 卡拉哈里沙漠, 667, 669
kalam, 教义学, 53
Kalambo, 卡兰博, 645, 658
al-Kalamūn, 卡拉蒙, 279, 281
Kalanbu, 卡兰布, 407-8
Kalb, 卡尔布人, 185
Kaldīn/Kildin/Kadin, Banu, 巴努 卡尔丁人/基尔丁人/卡丁人, 288
Kalenjin, 卡伦津人, 618, 629, 631, 632, 635, 639-40
al-Kalkashandī, 卡尔卡尚迪, 186
Kalomo, 卡洛莫, 657-8
Kalous, M., M. 卡洛斯, 549-51
Kalundu, 卡隆杜, 645, 647, 653-4, 657
Kamabai, 卡马拜, 463, 468, 547, 550
Kamara, 卡马拉人, 554
Kambari language, 坎巴里语, 535
Kamilamba, 卡米兰巴, 649
Kamnama, 卡姆纳马, 647, 655
Kamnūnyya, 卡姆努里亚, 410-11
Kamusongolwa, 卡穆桑古尔瓦, 647, 661
kanat, *see foggāra*, "卡纳特"(灌溉渠道), 见"福加拉"栏目
Kanbalu(Pemba), 坎巴鲁(奔巴), 23, 27, 599, 601-2, 604, 605, 612, 701-2, 738
Kānem, 加奈姆, 113, 463, 551, 599, 604, 607, 784, 加奈姆和伊斯兰教, 58, 73-5, 77, 80, 100-1, 110; 起源, 437-40, 443, 445-60; 加奈姆和撒哈拉通道, 292-4, 306; 加奈姆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3, 130-3, 136-8
Kānembu, 卡嫩布人, 91, 100, 112, 131, 439, 441
Kanga, 坎加, 162
Kangila, 坎吉拉, 647, 658
Kankū Mūsā, Mansa, 坎库·穆萨(曼萨), 108, 389, 431
Kano, 卡诺, 79, 108, 463, 467
Kansanshi, 坎桑希, 647, 653, 661
Kansyore pottery, 干宁雷陶器, 620
Kānūn ibn 'Abd al-'Azīz, 卡农·伊本·阿卜德·阿齐兹, 198, 212-13
kānūn, "卡农"(法规和刑罚标准), 99
Kanuri, 卡努里人, 131, 440, 451, 535
Kanza, 坎扎, 255
Kaoma, 卡奥马, 653
Kaonde, 卡翁德人, 661
Kaouar, *see* Kawār, 卡瓦尔, 见"卡瓦尔"(kawār)栏目
Kapako, 卡帕科, 647, 649
Kapem Hill, 卡佩尼丘陵, 647, 659
Kapwirimbwe, 卡普维里姆布韦, 645, 647, 649, 653 4, 658
Karāfa, 卡拉法, 168, 185
Karima/Gara Krima, 凯里马 加拉-克里马, 298
Karmatians, 卡尔马特教派, 卡尔马特教徒, 21, 172, 174, 180, 181-2, 606; 和法蒂玛王朝, 317-18
Karmātiyya, 卡尔马蒂亚人, 728
al-Karn, 卡伦, 250
al-Kasaba(Gezabi), 卡萨巴(盖扎比), 373
Kasai, 开赛, 152, 155, 160, 644, 648
Kasila, *see* Kusayla 卡西拉, 见"库赛拉"栏目
al-Kasr, "卡斯尔"(堡区), 281
Kasr al-Wizz, 维兹堡, 197, 204-5
Kasr Banī Bakr, 巴尼-巴克尔堡, 298
Kasr Bani Nuba, 巴尼-努巴堡, 296
Kasr Ibrīm, 伊布里姆堡, 202, 207, 211-18 散见各处
Kasr Umm 'Isā, 乌姆-伊萨堡, 291
al-Kass, Sallāma, 萨拉马·卡斯, 730
kassāhin, 苦力, 728
Kastīliya, 卡斯蒂利亚, 301, 407
kāt, "卡特"(埃塞俄比亚穆斯林喜爱的一种饮料), 583
Kata'a, 卡塔阿, 卡塔阿人, 564
Katanekwe, N., N. 卡塔尼克韦, 619
Kāti, 卡蒂, 112
katibo, "卡蒂博"(负责保存传说的书史), 90, 684
Katoto, 卡托托, 647, 650-1, 661
Katr al-Nadā, 卡特尔·纳达, 174
Katsina, 卡齐纳, 79, 110
kawārī, "卡瓦里"(一种明矾矿), 292
Kawār/Kaouar, 卡瓦尔, 58, 68, 77, 97, 778; 卡瓦尔和撒哈拉通道, 279,

282、283、290—3、372、410、422、427、437—8、448、450—1、453、459
Kāw-Kāw. see Gao, 考考,考考人,见"加奥"栏目
Kay. 凯族,439
Kaya settlements, 卡亚定居点,593
Kaya Maghan Cissé, 卡雅·马汉·西赛,129
Kays. 凯斯人,170、258、263、578
Kaysar, 凯萨尔,321
al-Kaysī, 凯西,578
Kaysite, 凯斯父系氏族群体,170
Kayrawān, 凯鲁万,50、58、62、66、233—41散见各处、246—55散见各处、264—6、269—74、279—81、301、738、784;凯鲁万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36;凯鲁万和法蒂玛王朝,314、316、318、320、324、330、333—5;凯鲁万的马立克学派,342,凯鲁万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380、392、407—8
Kédiat d'Idjīl, 伊吉勒山,301、311
Kel Wi, 克尔-维人,125
Kele, 克勒人,493
Kent, R., 雷蒙德·K.肯特,26
Kenya, 肯尼亚,162、592—3;又见"东非、东部非洲"(East Africa)栏目
Kerbatch, 克巴奇,474
Kerbelā, 卡巴拉,45
Kerio Valley, 凯里奥河谷,632
Kerkenna Island, 克肯纳岛,316
Keswani, D. K., D. K.凯斯瓦尼,24
Khadīdja, 哈迪贾,576
Khalaf ibn as-Samh, 哈拉夫·伊本·萨姆赫,287、288
Khālid ibn 'Abd Allāh, 哈立德·伊本·阿卜杜拉,726
Khālid ibn al-Walīd, 哈立德·伊本·瓦利德,580
Khālid b. Humayd al-Zanātī, 哈立德·伊本·胡迈德·扎纳提,250
Khalifiya, 哈拉菲亚教派,286
kharādj, "卡拉杰"(土地税),165和注、170—3、178、261
Khāridjite/Khāridjism, 哈列哲教派/哈列哲教派的教义,7、43—4、46、51、747—8、哈列哲教派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41、347;在乍得451;哈列哲教派和法蒂玛王朝,314—15、317—18、320、323—4、331—2;在马格里布,64—7、244,在撒哈拉,69、70、74、278、298;在西班牙,254、248—53、255、260;哈列哲教派和苏丹地的人口流动,122、123;又见"易巴德教派"(Ibādites)、"苏非教派(Sufrite)诸栏目
Khārja, 海尔贾(绿洲),279、281、475、480
Khasonka, 哈松卡人,537
khātumu l'anbiyā', 最后的先知,32
al-Khattāb, 'Umar ibn, 奥马尔·伊本·哈塔卜,226、709
Khattāb, Banū, 巴努-哈塔卜人,巴努-哈塔卜王朝,69、451
khattāra, "凯塔拉"(灌溉机械),290
Khayar, I., 伊萨·哈亚尔,114
al-Khayr ibn Muhammad ibn Khazar al-Zanātī, 海尔·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哈扎尔·扎纳提,302
Khazars, 哈扎尔人,49
Khazrun, Banū, 巴努-哈兹龙,252
Khoi-Khoi, 科伊科伊人,753
Khoi/Khoisan, 科伊人/科伊桑人,147、160、162、617—20、624、641、646、735
Khorasān, 呼罗珊,170
Khufāf ibn Nadba, 胡法夫·伊本·纳德巴,707
al-khulafā' al-rashidūn, 真主使者的继任人,43、47
Khulayda, 胡莱达,725
Khumārawayh, 胡马拉瓦叶,174
Khurāsān, 呼罗珊,48、290
khurudj, "胡鲁杰"(公开起义),249 & n,252
khutba, "呼图白"(星期五礼拜时,宣讲师的讲道),176 & n,330
al-Khuwārizmī, 胡瓦里兹米,447
Khūzistān, 胡齐斯坦,728
kibla, "基卜拉"(礼拜者的朝向),233、240和注
al-Kā'id, 卡伊德,331
Kilab, 基拉布人,185
Kildin, Banū, 巴努-基尔丁人,288
Kilimanjaro, area, 乞力马扎罗地区,622、627—8、631、633、635、637、640
Kilombero, 基隆贝罗人,基隆贝罗山谷,618、623
Kilwa, 基尔瓦,25、58、88—9、129、589—91、594、596注、599、602—10散见各处、614、632、673、702、738
Kimbu, 金布人,632
al-Kindī, 金迪,174、270
kings. see rulers. 国王,见"统治者"栏目
Kinshasa, 金沙萨,648
Kintampo, 金坦波,162、489、492、494—5、499、504
Kipushi, 基普希,647
Kinnyaga Cushites, 基林亚加库希特人,617
Kirkman, J., 詹姆斯·柯克曼,588—9
Kisalian ware, 基萨尔陶器,649—51
Kisangani, 基桑加尼,159
Kisi, 基西,基西人,539、541、542—3、546—50、552、555、558
Kiswahili, 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文,20、88、89、598—600、603—6
Kitare, 基塔雷,503
Kitmān, "基特曼"(秘密工作),252和注,253
Kivu, 基伍,152
kiyās, 思辨原则,41
Ki-Zerbo, J., 约瑟夫·基-泽博,105、109
Kizimkaza, see Zanzibar, 基津卡济,见"桑给巴尔"栏目
Klingbeil, 克林贝尔,克林贝尔人,665、666
Kodiabe, 科迪亚贝人,501
Kohayto, 科海托,573
Koidu, 科伊杜,548
Kokobin, 科科宾,499
Kola nuts, 柯拉果,485、486、501、505
Komadugu Yobe valley, 科马杜古约贝河谷,440、443
Kondoa, 孔多阿,619、623
Kong, 孔城,124、782
Kongo, 刚果,刚果人,102、143、644、747
Kono, 科诺人,337—8、541—2、552、553、554、556
Konyaka, 科尼亚卡人,537
Koranko, see Kuranko, 科兰科,科兰科人,见"库兰科人"栏目
Korau, Muhammad, 穆罕默德·科鲁乌,79
Kordofān, 科尔多凡,84、124、127、207、437
Koro Toro, 科罗托罗,199、437、779
Kosa Brempong, 科萨·布雷蓬,501
Kosoy, 科索伊,73

Kotoko/Sao, 科托科人/萨奥人, 38, 440－1, 443, 448, 468, 525
Kpelle, 克佩勒, 克佩勒人, 536, 538, 542, 549, 556
Krim, 克林人, 541, 555
Kru, 克鲁人, 539, 543
ksārs, "克萨尔斯"(优美住宅), 252
ksūrs, 城堡, 290－1
Ktesiphon, 泰西封, 48
K2 site, K2 遗址, 672－3, 674－6, 678－80
Kub'ar/Ka'bar, 库巴尔/卡巴尔, 563
Kūfa, 库法, 48, 279－80, 290, 709
kufarā', 异教徒, 无神论者, 282
Kufic script, 古阿拉伯字体—库法手写体, 560
Kufra, 库夫拉, 279, 282, 293, 373
Kūgha, 库加, 69, 463, 475, 547; 库加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5, 407－8, 411, 423－4
Kūkadam, *see* Azukī, 库卡达姆, 见"阿祖基"栏目
Kuliak, 库利阿克人, 630
Kulthūm b. 'Iyād, 库尔苏姆·伊本·伊亚德, 250, 258
Kumadzulo, 库马佐洛, 647, 656
Kumasi, 库马西, 489, 494, 499－500, 527
Kumbi Saleh, *see* Ghana (town), 昆比萨利赫, 见"加纳(城)"栏目
al－Kummī, Muhammad, 孔米, 穆罕默德, 198
al－Kumr, *see* Comoro Islands; Madagascar, 库默尔, 见"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诸栏目
Kumr Zangi, *see* Zanzibar, 库默尔－桑给, 见"桑给巴尔"栏目
Kunama, 库纳马人, 561
kun－lun/kun－lun－bo, 昆仑/昆仑舶, 696－7, 701－2
Kuranko/Koranko, 库兰科人/科兰科人, 537, 543, 552, 556
Kurān/Korān, 古兰经/可兰经, 293
Kuraysh/Kurayshites, 古莱什/古莱什人, 31, 171, 572, 708－10
Kurifalat, 库里法拉特, 348
Kurra b. Sharik, 库拉·伊本·谢里克, 170
Kurra, Banū, 巴努·库拉人, 184
Kurta, 库尔塔, 197, 212
Kurumba, 库龙巴人, 466
Kūs, 库斯, 186, 188
Kusayla/Kasila, 库赛拉/卡西拉, 233－8, 241, 247
Kusayr 'Amra, 库赛尔·阿姆拉, 558
Kuta, 库塔, 507
Kutāma Berbers, 库塔马柏柏尔人, 65, 228, 261, 317－18, 321, 329
Kutāmites, 库塔米人, 181, 183
ku'ūd, "库乌德"(旨在削弱现存体制的颠覆行动), 249和注, 252－3
Kuwwār, *see* Kawār, 库瓦尔, 见"卡瓦尔"栏目
Kuzam, 库扎姆, 375
Kwa, 克瓦人, 克瓦亚语系诸语言, 490, 492－3, 535－40, 543, 552, 555
Kw'adza/Old Kw'adza, 夸德扎, 夸德扎人/古夸德扎, 617, 618－20, 629
Kwahu, 夸胡人, 490, 501
Kwale, 夸莱人, 593, 622－3, 644, 645
Kwapong, 夸蓬, 499
Kyerepong Dawu, 基耶雷蓬－达乌, 501
Kyriakos, 基里亚科斯, 196
Kyros, 基罗斯, 202, 203, 219
Labi ibn Wār－Dyābi, 拉比·伊本·沃尔－戴阿比, 346
labour, 劳工, 780－1; 又见"奴隶"栏目
Laccadives, 拉克代夫群岛, 26
Lacustrine language, 湖区语言, 593, 628, 640
Ladoku, 拉多库, 495, 502
Ladsū, *see* Hū, 拉德苏, 见"胡"栏目
Lagadère, V., V. 拉加代尔, 364－5
Laghwāt, 拉格瓦特, 299, 302
Laikipia, 莱基皮亚, 631
lakes, *see* Great Lakes area 大湖, 见"大湖地区"栏目
Lakka, 拉卡, 279, 282
Lalibela, 拉利贝拉, 568, 571, 573
Lālūt, 拉卢特, 286
Lambert, N., N. 兰伯特, 377
Lamboharana, 兰布哈拉纳, 683, 689
Lamlam, 拉姆拉姆人, 411, 412
Lamp, F., F. 兰普, 537－8
Lamta, 拉姆塔, 拉姆塔人, 123, 379;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47－8; 和撒哈拉通道, 292, 304, 375, 400
Lamtūna, 兰图纳, 兰图纳人, 68, 75, 100, 228, 278, 308－11;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9－40, 343－50 散见各处; 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2, 123, 125
Lamu, 拉穆(一译拉木), 58, 88, 89, 587, 599, 606
Landuma, 兰杜马人, 543
Lanet ware, 拉内特陶器, 635
Lange, D., D. 兰格, 137, 422, 436
Languages, 语言, 783; 阿非利堪语, 147; 阿姆哈拉语, 84; 阿拉伯语, 见"阿拉伯语"(Arabic language)栏目, 阿拉米语, 48; 亚洲语, 24, 597; 班图语, 见"讲班图语各族(Bantu speakers)"栏目; 贝努埃－刚果亚语系诸语, 492－3, 512, 535, 540; 柏柏尔语, 269, 286, 293, 369, 372, 451, 535; 比拉语, 146－7; 布比语, 145; 布尚语, 140; 中非语言, 643－4, 646, 661, 663; 乍得语, 131, 433－5, 448－51; 科普特语, 59, 213; 库希特语, 85, 600－1; 达罗毗荼语, 127, 扎亚拉语, 140; 东非语言, 88－90, 598, 600, 603－5, 609－10, 616－42 散见各处; 埃多语, 483; 埃及语言, 164, 169, 193, 597－606 散见各处, 615; 埃塞俄比亚语言, 84, 85, 560, 563, 568, 573, 576, 578－80; 芳语, 140, 145; 富尔贝语, 127－8; 格埃兹语, 557, 563, 565, 568, 576; 希腊语, 169, 202, 213, 215, 560, 565, 570; 几内亚/西非语言, 492－3, 501, 531－41; 含米特－闪米特语, 444; 赫雷罗语, 140; 卡嫩布语, 439, 科伊桑语, 147, 160, 162, 617－20, 624, 641, 646; 斯瓦希里语, 20, 88, 89, 598－600, 603－6; 拉丁语, 563, 林加拉语, 147; 下几内亚语言, 490, 492－3; 卢巴语, 140; 马达加斯加语言, 89, 681, 684－5, 693; 马格里布语言, 65, 226, 269(也见柏柏尔语); 马林克语, 75, 76; 曼德语, 131; 芒戈语, 140; 莫诺基图巴语, 147; 姆蓬圭语, 147; 尼日尔－刚果语系诸语, 492, 534－43; 尼罗－撒哈拉语, 444; 尼罗特语, 146, 努比亚语, 199, 202, 210, 213, 215; "帕胡因"语言集团, 145; 波斯语, 684; 古迦太基语, 284; 罗曼诸语, 269; 卢旺达语, 140; 撒哈拉诸语, 441, 444－5, 449; 桑语, 147, 160; 梵语, 24, 684; 萨拉－邦戈－巴吉尔

米语，450;闪米特语，85;塞雷尔语127;绍纳语，140,160,664,667,桑海语，444－5;南部非洲语言，664－5,667,671;苏丹地区语言，75,125,127－8,146,154,159,160,162;斯瓦希里语，147(也见 Kiswahili 栏目);古叙利亚语，570;特达一达扎语，131;提格雷语，84;蒂奥语，140;图阿雷格语，304;沃洛夫语，127,532,536;约鲁巴语，483,492,532,536－7;僧祇语，598,599,603,605;又见"讲班图语各族"(Bantu－speakers)栏目。
Lant, Banū，巴努－兰特人，297
Largeau, V.，V.拉尔若，97
Laroui, A.，A.拉鲁伊，748
Lasta，拉斯塔，86,562,567,581,786
al－Lāt，拉特(女神)，33
Latin，拉丁，560
Lavers, J.约翰·拉弗斯，458
al－Layth，莱斯，250
law, Islamic，伊斯兰法，伊斯兰法规，94-6,99,106,174,240,274,366,387,719－20;又见"社会"(societies)栏目
Lawāta，莱瓦特人，186,335;和撒哈拉通道，277,281,283－4,298,310,312
leaders, *see* rulers，领袖，见"统治者"栏目
Lebanon，黎巴嫩，45
al－Lebdi，莱卜迪，578
Lega－Guha，莱加－古哈人，159
legends, oral，口头传说
Lelesu ware，莱莱苏陶器，623,624,645,694
Leontius，莱昂提乌斯，238
Leopard's Kopje，豹地，豹地人，162,665,667－74 散见各处，763,791
'Leopoldian Neolithic'，"利奥波德新石器时代的文化"，644,648
Lepage, C.，C.勒帕热，570,572
Leroy, J.，J.勒鲁瓦，574
Lévi－Provençal, E.，E.莱维－普罗旺卡，226,256
Levtzion, N.尼赫迈亚·莱维蔡恩，(前译内赫米亚·莱扶济昂)，121,345
Lewicki, T.，T.莱维基，69,100,276,356,740;对黄金和食盐贸易的论述，379－80,408－9,414,419－21,430
Lewis, B.，伯纳德·刘易斯，711,725
Lhote, H.，H.洛特，306
Liberia, *see* Guinea; Upper Guinea，利比里亚，见"几内亚"；"上几内亚"诸栏目
Libya, *see* Maghrib，利比亚，见"马格里布"栏目
Libyan desert，利比亚沙漠，281－6
Libyco－Berbers，利比亚人与柏柏尔人的混血种，126,129,136,277－8,303,444
Ligbi，利格比人，549
Limba，林巴人，541,543
Limpopo，林波波河，139,641,779;又见"沙希/林波波地区"(shashi/Limpopo area)栏目
Linares de Sapir, O.，O.利纳雷斯·德－萨皮尔，544－5
Lingala，林加拉语，147
linguistics, *see* languages，语言学，见"语言"栏目
Lisala，利萨拉，159
literature/learning，文学/学术，193;埃塞俄比亚的文学、学术，565－6,573,576;伊斯兰教和文学、学术，111－12,113;马格里布的文学、学术，269－72,364;努比亚的文学、学术，213,215;奴隶和文学、学术，707－8,721,729－30;又见各个作家的个人栏目。
Little Muck，利特尔·穆克，679
Livingstone, F. B.，F. B.利文斯通，540－1
Lobi，洛比，洛比人，463
Loko，洛科人，543
Loma/Toma，洛马人/托马人，538,542,549,556
Lomagundi，洛马贡迪，654
Lombard, M.，莫里斯·隆巴德，714,736
Longobards，伦巴第人，13
Lotuko，洛图科，洛图科人，629,631
Lower Guinea：下几内亚："阿克方希"，525－6;贝宁，514－17;生态环境，488－91;黄金海岸，493－505;伊格博－乌库和恩里"王国"，517－25;语言学和早期历史，492－3;约鲁巴兰，505－13;又见"几内亚"(Guinea)栏目
Lualaba，卢阿拉巴，645,649－50,656,661
Luangwa，卢安瓜，658－61
Luba，卢巴人，140,651,661
Lubusi，卢布西，647,653,659
lugha kāninmiya，卡加奈姆语，293
Lunda，隆达人，658,661
Lundjūya，龙朱亚，601
Lungwebungu，伦韦本古，659,661－2
Luo，卢奥人，630
Lusaka，卢萨卡，653－4
Luwāta，卢瓦塔人，228,231,235
luxury goods, trade in，奢侈品(或精美昂贵物品)的贸易，418－22,428,475－9,486,528,591,613－14,706,740－2,779,791,又见"玻璃"(glass)，"黄金"(gold)，"宝石"(precious stones)诸栏目
Luyia－Gisu，卢伊亚－吉苏人，618,623,627,629,640
Lwanga－Lunyiigo, S.，S.卢旺加－卢尼伊戈，140,161
Ma'a/Old Ma'a (Southern Cushites)，马阿人/古马阿人(南库希特人)，618－19,627,631
Maa(Eastern Nilotes)，马亚人(东尼罗特人)，618
Maa－Ongamo，马亚－翁加莫人，630－5,638－9
Maasa，马萨伊人，630,753
Maasai steppe，马萨伊草原，617,621,629
Maba，马巴人，113－15
McCall, D. F.，D. F.麦考尔，530
McIntosh, R. J.，R. J.麦金托什，376,761
McIntosh, S. K.，S. K.麦金托什，376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626,681－703,735,784;马达加斯加和亚洲，26－9,689－90,696－703;物种植物学和考古学，689－95;国际范畴中的马达加斯加，695－703;马达加斯加和伊斯兰教，8,9,15,58,88,90,113,691,701－2;语言，89,681,684－5,693;口头资料，682－9;人口流动，746;贸易，684－8,695－702 散见各处
Madāsa，马达萨，411
Mādghis al－Abtar，马德吉斯·阿卜塔尔，226
al－Mādhārā'i family，马扎拉伊家族，177－8
madhhab/madhāhib，伊斯兰教法学学派，41－2,66,342;又见哈乃斐;罕百里;马立克;沙斐仪四个学

派的栏目
Madi，马迪人，618、630
Madīnat al－Nabī(later Medina)，麦地那特·纳比(先知城、后来的麦地那)，35
Madjābat，"马贾巴特"(沙漠)，426
Madjābat al－Kubrā，(马贾、巴特)库布拉沙漠，277，279，370，476，481
madjūs，"麦居斯"(拜火教徒)，229
madrasa 古兰经学院("马德拉沙"，高级宗教教育机构)，55，187
Mafia，马菲亚，602，607
al－Maghīlī，Muhammad，穆罕默德·马吉利，79－80，106－10
Maghmadās，马格马达斯，284
Maghrāwa，马格拉瓦人，296－7；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41，347；和法蒂玛王朝，323，330
Maghrib：and Islam，马格里布：马格里布和伊斯兰教，4－7，16－17，41，43，44，48－50，52，58－67，90－1，224－75，734，735，746，784－5；马格里布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36－66；马格里布和基督教势力，11，17，229，235，264，268，法蒂玛王朝在马格里布，314－35，独立，250－75；定居，758－9；马格里布作为社会体制，95，97，98－9；马格里布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133－4；技术，742－3；马格里布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231，263－6，339－41，363，378－81，386，392－402，414－15，420，425，737－9，741－2，778
al－Maghrib al－Aksā，马格里布·阿克萨，241－2
Magumi，马格米人，131
Mahafaly，马哈法利 683
Mahdī，"马赫迪"(救世主)，44－6，263，315，318
al－Mahdī，Muhammad，穆罕默德·马赫迪，(第十二代伊玛目)，44，315；又见十二伊玛目
al－Mahdiyya，马赫迪亚，316，319，320，324，326，333，335，396，737
Mahirane，马西拉内，692
mahram，特权授予书，73
Maimonides，迈蒙尼德，269
mai，马伊，(加奈姆君主的称呼)，73－5，80
Majikavo，马吉卡沃(陶器)，596注
Makhzūm，Banū，巴努－麦克朱姆(父系氏族群体)，709
Makhzūmate，Banū，巴努·麦克朱姆王朝，580
Makhzūmi family，麦克朱米族群，85，580
Makkiya，Umm，乌姆·马基雅，723
Makonde，马孔德人，618
al－Makrīzī，马克里齐，128，196，210，319，391，448
makrūh，"麦克鲁海"，受谴责或不赞成的行为和关系，41
Makuria，*see* Nubia，马库里亚(马库拉)，见"努比亚"栏目
Makurra，马库拉王国，373
Makwe，马克韦，660
Malabo Island，马拉博岛，145，151－2
Malagasy，马尔加什，马尔加什人，89，681，684－5
Malal，马拉尔，412
Malao，马劳，685
Malapati，马拉帕蒂，666
malana，兆头，465
Malawi，马拉维，144，159，633；又见"中部非洲"(Central Africa)栏目
Malaya，马来亚，8，21，23，26
Maldives，马尔代夫群岛，26，697
Malebo Pool，马莱博湖，648
Maley，J.，J.马莱伊，436
Malgache，马尔加什，马尔加什人，626
Mali，马里，78，121，139，162，737，748；马里和伊斯兰教，58，70，73，76－7，79，81；马里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101，102，107－11，116－17；又见"几内亚"(Guinea)；"萨赫勒"(Sahel)；"上几内亚"(Upper Guinea)诸栏目
Mālik，马立克，250，258，275
Mālikism/Mālikites，马立克派的学说、教义；马立克学派，41，95，99，103，108，225，274，299，720，787；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36－7，342，347－8，359，364－5；在马格里布，314，320，324，331；在北部非洲，66，67，在苏丹地区，70，71，75
Malindi，马林迪，58，604，607，609，611，738
Malinka/Malinke，马林克人，73，75，76，91，112，535－6，552－747
Mallel，马拉尔(王国)，70，73，101，417
mālūf，"马卢夫"曲，(平凡曲)，271
Mamluks，马木路克，(兵团、王朝、帝国)，61，83
Mamma，马姆马，237
al－Ma'mūn，马蒙恩，171－2
Manambovo，马南布武河，683，692，694
Manampatrana，马南帕特拉纳河，683，688
Mānān，马南，294，450，456
Mananjara，马南扎拉河，683，689
Manda，曼达，587－94 散见各处，602，606，612，614，673，692
Mande/Manden/Mandingo/Mandinka/Mende/Mendenka，曼德，曼德人/曼登、曼登人/曼丁哥、曼丁哥人、曼丁卡、曼丁卡人/门德、门德人/曼登卡，曼登卡人，113，121，129，131，138，468，490，533－8，540－1，543－4，547，549－50，552－6
Mandingo language，*see* Mande，曼丁哥语，见"曼德"栏目
mandūb，"曼杜卜"，可嘉许的行为和关系，41
Mandyak，曼迪亚克人，545
Mane，马内人，540－1，544
Manicheans，摩尼教徒，宗教二元论者，53
Maninka，马宁卡人，537
Mano，马诺人，537，549
Manon，马农人，542
Mansa，曼萨(马里皇帝)，76，101，102，108－9，117
Manso，曼索，502
al－Mansūr(765)，曼苏尔(公元 765 年)，726，730
al－Mansūr(d. 953)，曼苏尔(公元 953 年卒)，319，322，324
al－Mansūr(d. 996)，曼苏尔(公元 996 年卒)，329－30，452
Mansūr al－Tunbudhī，曼苏尔·通布齐，261
Mānū，马努，254
manumission，释放奴隶，见"释放奴隶"(enfranchisement)栏目
Manyanka，马尼扬卡人，537
Maore ware，马奥雷陶器，627
Mapela Hill，马佩拉山丘，679
Mapungubwe，马庞古布韦，597，641，676－80，773，784，786，789，792
marabouts，"马拉博"(伊斯兰教隐

修上), 43, 96 和注, 102
Marakwet, 马拉ク特人, 632
Maranda, Marandet, 马兰达、马兰达人, 马兰代特, 马兰代特人, 279, 283, 304-5, 373, 375-6, 476-7
Marçais, G., 乔治·马尔赛, 226, 748
Marçais, W., 威廉·马尔赛, 226
Maret, P. de, 皮埃尔·德马雷, 644, 648, 651
Mariam, 马里亚姆, 210
Marianos, 马里亚诺斯, 213, 214, 221
mà'rıd, 奴隶展销场, 715
Marin, Banū, 巴努马林人, 334
Marinids, 马林王朝, 108
maritime activities, 海运活动, 5, 326-7, 609-10, 696-702, 737; 又见"印度洋"(Indian Ocean)栏目
Marka, 马尔卡, 马尔卡人, 58, 75, 86, 87, 606, 612
market, slave, 奴隶市场, 715-17
Marosiky, 马鲁西基, 683
Marquart, J., J. 马夸特, 291, 305
Marrakesh, 马拉喀什, 259, 783;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8, 349-50, 363-4; 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95, 400-1, 431-2
Martel, charles, 夏尔·马泰尔, 49 注
Martha, 马萨, 210
Martin, B. G., B. G. 马丁, 589
Marwān, 马尔万, 241, 307, 729
Masāmida, *see* Masmūda, 马萨米达人, 见"马斯穆达人"栏目
Masao, F. T., F. T. 马萨奥, 586
Masila, 马西拉, 235
Masina, 马西纳, 78, 128
Masmūda, 马斯穆达, 马斯穆达人, 65, 228, 235, 241, 255, 316, 348
Massé, H., H. 马塞, 95 注
Massūfa, 马苏法, 马苏法人, 12, 68, 100, 124, 228;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9, 346-8, 350; 和撒哈拉通道, 307, 308, 310-12
Mas'ūd b. Wānūdīn, 马苏德·伊本·瓦努丁, 347
al-Mas'ūdī, 麦斯欧迪(前译马苏迪), 24, 101, 563, 673, 701, 716, 781; 关于东部非洲的论述, 598-9, 601, 603, 605, 608, 610-11; 关于撒哈拉的论述, 281, 308
Matabeleland, *see* Zambezi culture, 马塔贝莱兰, 见"赞比西文化"栏目
Matara, 马塔拉, 559, 560, 572-3
Matatana(na) 马塔塔纳(纳)河, 683, 685, 688
mathematics, 数学, 5-6
Matjes Rock shelter, 马切斯岩洞, 162
Matmāta, 马特马塔人, 235
matrilinear people, *see* Bantu-speakers, 母系社会各族, 见"讲班图语各族"栏目
Mau, 马乌, 635
Mauka, 茂卡人, 537
Mauny, R., 雷蒙德·莫尼, 379, 388,421, 734, 740, 745; 关于撒哈拉的论述, 292, 305
Maurice, 莫里斯, 229
Mauritania, 毛里塔尼亚, 111, 125, 127, 130, 312-13;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55-6, 358, 361; 和撒哈拉通道, 301, 303, 371, 402, 406, 420, 435; 又见"萨赫勒"(Sahel)栏目
mawlā/mawālī, 马乌拉/马瓦里(释放奴隶), 49, 247, 267, 271, 274, 709, 721, 726, 731
mawlātunā Miryam, 毛拉图纳·米尔雅姆(穆斯林对圣母马利亚的称呼), 32
Mawsil, 摩苏尔, 179
al-Mawsilī, Ishāk, 伊沙克·穆西利, 271
Maxton, 马克斯顿, 马克斯顿人, 665, 668
Maysara, 迈萨拉, 248, 250, 261
Maysūr al-Saklabī, 迈苏尔·萨克拉比, 323
Mazāta, 马扎塔人, 277, 284-5, 289
mazhūr, "马兹胡尔", 被禁的行为和关系, 42
Mbanza Ngungu, 姆班扎-恩贡古, 648
Mbisha, 姆比塞人, 617, 618, 627
Mbuguan languages, 姆布古安语, 617, 618-19, 625
Mecca, 麦加, 31, 58, 71, 85, 383; 麦加朝圣, 见"朝圣、朝觐"(hadjdj)栏目; 奴隶, 708, 716
Medea, 麦迪亚, 316
Medeiros, F. de, F. 德-梅德罗斯(前译德-麦德伊罗斯), 19, 119
medicine, 医学, 271
Medina, 麦地那, 35, 43, 708, 730
Mediterranean islands, 地中海岛屿, 325-8, 又见"西西里"(Sicily)栏目
Mehmed II Fatih, 迈赫默德二世法蒂赫, 52
Meier, F., F. 迈耶, 345
Meillassoux, C., 克劳德·梅拉苏, 734
Meinhof, C., 卡尔·迈因霍夫, 141
Meknes, 梅克内斯, 338
Mekouria, T. T., 特克勒·查迪克·梅库利阿, 558
Mel languages, 梅尔语, 538, 539, 541, 543, 552-4
Melanesians, 美拉尼西亚, 美拉尼西亚人, 28
Melkites, 梅尔凯特教派(东正教), 11, 164, 170, 212-13
Melle, 马勒, 79
Menouthias, 默努西亚斯, 602
Mera Tekle Haymanot, 梅拉·特克尔·海马诺, 567-8
Mercier, E., E. 梅西耶, 226
Merina, 梅里纳, 梅里纳人, 684
Merka, 梅尔卡, 600
Merkunos, 默库里奥斯, 195, 213, 215
Meroe, 麦罗埃, 133
Merovingians, 墨洛温王朝, 13
Mesobe-Work, 梅索贝珍品, 566-7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11, 33, 171, 726-8
Messier, R. A. K., R. A. K. 梅西耶, 380, 386, 398, 402
metallurgy/mining, 冶金术/采矿业, 742-3, 768-73; 讲班图语各族和冶金术、采矿业, 149, 151-2, 156-60; 中部非洲的冶金术、采矿业, 651, 653-4; 东部非洲的冶金术、采矿业, 593, 611, 612; 埃塞俄比亚的冶金术、采矿业, 558, 611; 几内亚/西部非洲的冶金术、采矿业, 463, 467-81, 486-7, 528, 529, 541, 544, 546, 548; 伊斯兰教和冶金术、采矿业, 102-3; 努比亚的冶金术、采矿业, 198, 207, 209; 萨赫勒的冶金术、采矿业, 355-8, 495-6, 499, 501, 505, 512, 516, 521-2; 苏丹地区的冶金术、采矿业, 132-3, 139; 又见黄铜(brass); 青铜(bronze); 铜(copper); 金(gold); 铁(iron)诸栏目
meynarti, 梅纳尔蒂, 197, 204
Mez, A., A. 梅茨, 721

Michael the Syrian，叙利亚人米海尔，209
Midrārid，米德拉尔，322
Midrār, Banū，巴努-米德拉尔，251-2, 280
migration, *see* population，移民，(民族)人迁移，见"人口"栏目
Mihdja'，米赫贾，709
Mijikenda，米杰肯达，米杰肯达人，593, 604-5, 627
al Mikdād b. 'Amr al-Aswad，米克达特·本·阿姆鲁·阿斯瓦德，709
Miknasa，米克纳萨人，66, 235, 251, 280, 301
Mila，米拉，234
Miller, J. J.，J. J. 米勒，685, 698, 699
mining, *see* metallurgy，采矿，采矿业，见"冶金术"栏目
mints，铸币处，4, 386-8, 391-5, 398-402；又见"货币"(currency)，金币(gold coins)诸栏目
Miranda, A. H.，安布罗西奥·维西·米兰达，345
Miri，米里人，290
Miryam，米尔雅姆(穆斯林对圣母马利亚的尊称)，32
Misr-Fustāt，米斯尔-伏斯泰特(开罗旧城)，190, 392-3
Mmangwa，姆曼格瓦，679
mmoatia，矮人，464
Mogadishu，摩加迪沙，58, 86, 87, 589, 602, 606-7, 612, 738
Moloko，莫洛科，莫洛科人，671
Mombasa，蒙巴萨，58, 599, 602, 604, 607, 611-12, 738
Mondunga，蒙东加人，159
Monès, H.，H. 莫纳，224
monetary systems, *see* currency，货币体制，见"通货"栏目
Mongo，芒戈人，140
Mongols，蒙古人，7, 52, 581
Monokituba，莫诺基图巴语，147
Monophysites，基督一性论教派，11, 12, 705；在埃及，164, 166, 169-70；在埃塞俄比亚，565, 568；在努比亚，195, 212-13, 215
Monteil, C.，夏尔·蒙泰伊，129, 741
Moraes Farias, P. de，P. 德-莫拉伊斯·法里亚斯，345
Moreau, J.-L.，让-吕克·莫罗，109
moriba，"摩里巴"(伊斯兰教士)，81
Morocco: and Islam，摩洛哥：摩洛哥和伊斯兰教，45, 58, 65-6, 68, 125；摩洛哥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95, 98, 109, 111, 117；又见"马格里布"(Maghrib)栏目
Moses，摩西，31, 93
Mosi(Mossi)，莫西，莫西人，80-1, 121, 535, 536, 538
Mosul，摩苏尔，726
Mounmagha Kankoi，穆里马加·坎科伊，112
Mozambique，莫桑比克，159, 644, 655, 673, 784；莫桑比克和伊斯兰教，88-9
Mpongwe，姆蓬圭，姆蓬圭语，147
Mpororo，姆波罗罗，628
Msila，姆西拉，411
Mtetengwe，姆泰滕格韦，679
Mtongwe，姆通韦，592
mu'adhdhin，"穆安津"(宣礼员)，709
Mu'allakat poets，穆阿拉卡特诗人，708
Mu'āwiya(of Syria)，穆阿威叶(叙利亚)，43, 48
Mu'āwiya ibn Abī Sufyān，穆阿威叶·伊本·阿比·苏夫扬，232-3
Mu'āwiya ibn Hudaydj al-Sakūni，穆阿威叶·伊本·胡代杰·萨库尼，232-3
mubāh，"木巴哈"，无关紧要的行为和关系，41
Mubarak，穆巴拉克，560, 562
mudabbar，"穆达巴尔"(死后赐予自由的奴隶)，721
Mudhdj，穆德利索人，258
Mudzi Mwiru, Kaya，穆齐-姆韦鲁，卡亚定居点，590, 593
al-Mufaddal，穆法德勒，581
Muflih，穆夫利赫，724
mufti，"穆夫提"，伊斯兰法典阐述者，731
Mughal emperors，莫卧儿帝王，52
Muhadjirun，"迁士"(随同先知从麦加迁来者)，35
al-Muhallabi，穆哈拉比，378；关于东得地区的论述，445-52散见各处；关于撒哈拉的论述，293-4, 310, 397
Muhallabids，穆哈拉比王朝，260
Muhammad(828-36)，穆罕默德(828-836年在位)，256
Muhammad I. *Askiya*，穆罕默德一世，阿斯基亚，80, 81, 109, 110, 116
Muhammad al-Kummi，穆罕默德·孔米，198
Muhammad al-Mahdī，穆罕默德·马赫迪，44, 315；又见"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s)栏目
Muhammad al-Maghīlī，穆罕默德·马吉利，79-80, 106-10
Muhammad al-Nafs al-Zakiyya，穆罕默德·纳夫斯·扎基亚，254
Muhammad ibn 'Abd Allah (Prophet)，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先知)，56-7, 92-5, 314, 572, 707, 712；黑人追随者，708-11，生平事迹，1, 32-5, 43, 44, 46
Muhammad ibn 'Abd al-Bākī al-Bukhārī al-Makkī，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巴基·布哈里·马基，576
Muhammad ibn 'Abdallāh，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46
Muhammad ibn 'Abdille，穆罕默德·伊本·阿卜迪尔，46
Muhammad ibn al-Warrak, *see* al-Bakrī，穆罕默德·伊本·沃拉克，见"巴克里"(al-Bakrī)栏目
Muhammad ibn 'Arafa，穆罕默德·伊本·阿拉法，266
Muhammad ibn Dā'ūd，穆罕默德·伊本·达乌德，580
Muhammad ibn Ismā'īl，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315
Muhammad ibn Mani，穆罕默德·伊本·马尼，74
Muhammad ibn Mukātil al-'Akkī，穆罕默德·伊本·穆卡蒂勒·阿基，261
Muhammad ibn Musa al-Khuwārizmī，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胡瓦里兹米，293
Muhammad ibn Tughdj，穆罕默德·伊本·图格杰，174, 177-9
Muhammad ibn Yūsuf al-Warrāk，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沃拉克，406
Muhammad ibn Yazīd，穆罕默德·伊本·亚齐德，247
Muhammad Rumfa，穆罕默德·鲁姆法，79, 108, 110
al-Mu'izz(d. 975)，穆仪兹(975年

哥[illegible]），180－2, 190, 304, 319, 322, 324

al－Mu'izz ibn Bādīs(d. 1062), 穆仪兹·伊本·巴迪斯(1062年逝世）, 330, 332－3, 452

Mu'izz al－Dawla, 穆仪兹·道拉，179

al Mukhtāra, 穆赫塔拉，729

al Muktadir, 穆克塔迪尔，725

al－Muktafī(d 1160), 穆克塔菲(公元1160年卒），724

al Mukurra Mukurra, 穆库拉，81－3, 560

mulaththamun, 蒙面纱者，339, 349, 363; 又见"阿尔莫拉维德"栏目

Mūlīt, Banū, 巴努－穆利特人, 296

al－Mulk, Nizām, 尼扎姆·穆尔克，55

mulūk al－tawā'if, 穆斯林诸小国，54, 351

Mumbwa cave, 蒙布瓦洞穴，654

Mu'min ibn Yūmar al Hawwārī, 穆敏·伊本·尤马尔·哈瓦里，406

Mumute Brong, 穆穆泰－布龙, 494

Mundu, 蒙杜人、蒙杜语，644

Munson, P. , P. 芒森，126, 129

Munthe, L., 路德维希·蒙特, 682

Munusa, 穆努萨，242

murābit/al－murābitūn, 穆拉比特，穆拉比顿(伊斯兰隐修士)，79, 342－3, 345－9; 又见"阿尔莫拉维德"(Almoravids)栏目

al－Murabitūn, see Almoravids, 穆拉比顿人，见"阿尔莫拉维德"栏目

Murdock, G. P. , G. P 默多克，76, 543, 789－90

Murrī, 穆鲁人，290

Mūsā(son of Dja'far), 穆萨(贾法尔·萨迪格之幼子），315

Musa ibn Nusayr, 穆萨·伊本·努赛尔，63, 68, 239－42, 247, 307

Mūsā Mansa, 穆萨(曼萨）, 78, 409

Mus'ab, 穆萨布，302

musaddik, "穆萨迪克"(收税人), 240

mushrikun 神人合一派，56

al－Mushtan ibn al－Aswad, 穆什塔甲·伊本·阿斯瓦德，308

music, 音乐，271, 484, 730

al－Muslimānī, 穆斯利马尼(马拉尔王国一位信奉伊斯兰的君主的称号），73

Muslims, see Islam, 穆斯林，见"伊斯兰"栏目

Musnad, "穆斯纳德"(圣训汇编), 249 和注

Musoma, 穆索马人，618

musta'minūn, 非穆斯林国家出民—"穆斯塔米农"，47

al－Mustansir(1036－94), 穆斯坦西尔(公元1036－94年)，185－7, 215, 332, 334

al－Mustansir(1228－77), 穆斯坦西尔)(公元1228－77年），452

al Mu'tadid, 穆阿台迪德，174

Mutahhar al－Makdisi, 穆塔哈尔·马克迪西，598

al－Muta'mid, 穆塔米德，173, 351, 354 注

Mutapa, 莫塔帕，89

Mutara I Semugeshi 穆塔拉一世萨穆盖希，153

al－Mu'tasim, 穆尔台绥姆，172, 198, 209

al－Mutawakkil, 穆塔瓦基尔，198

mutawalli, "穆塔瓦利"(行政官吏)，299

Mu'tazila, 穆尔太齐赖，280

Mu'tazilites, 穆尔太齐赖教派，255, 272, 274

Mutoro, H. W. , H W. 穆托罗, 586

al－Mu'tasim, Ibrāhīm, 易卜拉欣·穆尔台绥姆，209

al－Muttaki, 穆塔基，179

al－Muwaffak, 穆瓦法克, 173－4, 729

muwalladūn, "穆瓦拉敦"(阿拉伯或柏柏尔父亲与伊比利亚母亲生的安达卢斯人)，242

Muzaffar, 穆扎法尔，321

Mwabulambo, 姆瓦布兰博，645, 647, 655, 659

Mwamasapa, 姆瓦马萨帕, 647, 659

Mwana, 姆瓦纳，587, 591

mysticism, see sūfīs, 神秘主义，见"苏非主义"栏目

Mzāb, 姆扎布，姆扎布人，62, 70, 228, 239, 243, 261, 298, 324, 372, 784, 和撒哈拉通道，279, 280, 295, 300, 302

Nabaa, 娜巴阿，710

nabīdh, 纳比兹酒，271

Nachtigal, G. , 古斯塔夫·纳赫蒂加尔，291, 440

al－Nadjā, 纳贾，601

Nadjadāt, 纳贾达特教派，249

Nadjaf, 纳杰夫，45

Nadjāshī, "纳贾希"(埃塞俄比亚国王"尼格斯"一词的阿拉伯文，563

Nadjrān, 奈季兰，33, 705

Naffis, 纳菲斯，235

Nāfi' ibn 'Abd al－Kays, 纳菲·伊本·阿卜德凯斯，231

al－Nafs al－Zakiyya, Muhammad, 穆罕默德·纳夫斯·扎基亚，254, 258

Nafūsa, 奈富塞山，纳富萨人，124, 228; 和撒哈拉通道，278－9, 281, 286, 288, 290－1, 293, 306, 310, 312

Nafza, 纳富扎人，242

Nafzāwa, 纳夫扎瓦人，62, 227, 310, 312

Nagada, 纳加达，431

naggadie, "纳嘎迪"(一种意思是"商人";另一种意思是"穆斯林"), 579

Naghmārata, 纳格马拉塔人，385

Nakapapula, 纳卡帕普拉，647, 658

nakhkhās, 奴隶贩子，717

Nakis, 纳基斯，564

Nakūr, 纳库尔，243

Nalu, 纳卢人，541, 543, 555

Nālūt/Lālūt, 纳卢特/拉卢特，286

name changes, 更改姓名, 106, 114

Namghmarana, 非阿拉伯商人，425

Namibia, 纳米比亚，14, 160, 644, 646, 649

Namichimba Stream, 纳米钦巴溪，647, 655

Nanyangu, 纳尼扬古，647, 655

Naples, 那不勒斯，264, 265

Nasi', 纳西，563

Nāsir al－Dawla, 纳西尔·道拉，179, 182, 186

al－Nāsir, Hammādid, 纳西尔(哈马德王朝)，333

Nāsir ibn 'Alannas, 纳西尔·伊本·阿兰纳斯，299

Nāsir－i Khusraw, 纳西尔－伊·胡斯罗，215

Natal, 纳塔尔，160, 664, 665

Nde, 恩德人，525

Ndebele, 恩德贝勒人，671

Ndjīmī, see Andjimi, 恩吉米，见"安吉米"栏目

Ndonde, 恩侬德, 647, 657

Neboure Id Guebre Sellassie, 内布雷-伊德·盖卜雷·塞拉西, 567

Nefis, 奈非斯, 255

Nefzawa, 奈夫扎沃, 296

Negro-Berbers, 尼格罗-柏柏尔人, 112, 116

Negroes, 黑人, 尼格罗人: 早期尼格罗人, 162; 撒哈拉的尼格罗人, 277-8, 282, 287, 290, 292-3, 312-13; 又见"黑人"(black peopel)栏目

Negus of Ethiopia, "尼格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称号, 35

New Buipe, 纽布伊佩, 463, 469, 496, 498

New Guinea, 新几内亚, 28

Ngala, 恩加拉, 124

Ngorongoro, 恩戈罗恩戈罗, 617

Ngulu mountains, 恩古鲁山区, 622, 624

Nguni, 恩古尼人, 671

Niamey, 尼亚美, 376

Niani, 尼亚尼, 78, 463, 467, 760, 782; 尼亚尼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6, 378, 415-16, 418

Nicephorus, 尼斯福鲁斯, 232, 233

Niger area, 尼日尔河流域, 111, 444;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57-60; 和伊斯兰教, 58, 75, 77, 78, 80; 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8, 138, 139; 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7, 406, 410-13, 417, 423, 425, 432; 又见"几内亚"(Guinea)、"萨赫勒"(Sahel)诸栏目

Niger-Congo languages, 尼日尔-刚果语系诸语言, 492, 538; 又见"上几内亚"(Upper, Guinea)、"语言学"(linguistic)诸栏目

Nigeria, 尼日利亚, 121; 尼日利亚和讲班图语各族, 141-2; 尼日利亚最早的尼格罗人, 162; 又见"几内亚"(Guinea)栏目

Nihāwend, battle of, 尼哈温德战役, 48

Nikki, 尼基, 489, 491

Nile valley, 尼罗河流域, 82-4, 99; 又见"埃及"(Egypt)、努比亚(Nubia)、"苏丹地区"(Sudan)诸栏目

Nilo-Saharan language, 尼罗-撒哈拉语, 444

Nilotes/Nilotic language, 尼罗特人/尼罗特语, 146, 620-1, 624, 629, 631-2, 634-6, 638-9

'Nine Saints', "九圣徒", 570

Nisar, (马贾巴特)纳西尔沙漠, 426

nisba, "尼斯巴"(家谱出生地), 268

Nishāpur, 内沙布尔, 715

Niuty, 纽蒂, 209-10

Nizām al-Mulk, 尼扎姆·穆尔克, 55

Nizār, 尼扎尔, 187

Njombe/Mjombe, 恩乔姆贝人/姆乔姆贝人, 618, 623

Nkope, 恩科佩, 645, 647, 655, 658-9

Nkore, 恩科雷, 628

Nkukoa Buoho, 恩库夸-布奥霍, 499-500

Nkwerre, 恩奎雷, 522

Nnam, 恩纳姆, 恩纳姆人, 524

Nobadia, *see* Nubia, 诺巴迪亚, 见"努比亚"栏目

Nobles, battle of , 诺布尔斯战役, 258

Nok, 诺克, 133, 437, 463, 467, 489, 508, 515, 521, 523, 784, 791-2

Nöldeke, T. H. , 诺尔德克, T. H. , 727

nomads, *see* Beduin; Berbers, 游牧民, 见"贝都因人"(Beduin)、"柏柏尔人"(Berbers)诸栏目

nomoli, "诺莫利"(皂石人像), 548-52

non-Muslims: attitudes of, *see* anti-Muslim; attitudes to, 对非穆斯林的态度, 见"反穆斯林; 有关态度"栏目, 46-7

Normans, 诺曼人, 15, 16-17, 147

Norris, H. T. , H. T. 诺里斯, 125, 345, 459

North Africa, *see* Egypt; Maghrib, 北非、北部非洲, 见"埃及"、"马格里布"诸栏目

North-east-Coastal language, 东北沿海地带语言, 627

Northern Europe, 北欧, 14-19

Nosy(islands), 岛屿(马达加斯加语), 657

Noth, A. , A. 诺特, 345

Notse, 诺策, 526

Nri, 恩里, 恩里人, 490, 506, 517-21, 528

Nselle, 恩塞勒, 恩塞勒人, 524

Nsenga, 恩森加人, 658

Nsibidi writing, 恩西比迪文字, 525

al-Nāsir, Hammādid, 哈马德王朝的纳西尔, 333

Nsuta, 恩苏塔, 499

Nta, 恩塔, 恩塔人, 524-5

Ntereso, 恩泰雷索, 489, 492

Ntirikurom, 恩蒂里库罗姆, 499

Ntoon, "恩图恩"(祭司长), 525

Ntshekane, 恩策卡内, 恩策卡内人, 666

Ntwapa, 恩特瓦帕, 587

Nūba, *see* Nubia, slaves, 努巴、努巴人, 见"努比亚"、"奴隶"栏目

Nubia, 努比亚, 11, 24, 560, 566, 735, 742, 753, 759, 791; 努比亚和拜占廷帝国, 11-12; 努比亚的基督教势力, 58, 83, 91, 194-223; 努比亚和埃及, 166, 168, 173, 179-80, 184-6, 206-7, 209-16; 努比亚和伊斯兰教, 6, 15, 58, 77, 81-4, 91; 语言, 199, 202, 210, 213, 215; 来自努比亚的奴隶, 714-15, 723, 725, 728; 技术, 762, 768, 773; 努比亚和贸易, 373, 390, 431, 437, 790

nudity, 赤身露体, 107

Nukkar, 努卡尔, 286, 298

Nukkārites, 努卡尔教派, 44, 64, 324

Nūl, 努尔, 311, 408, 411

Nul Lamta, 努尔-拉姆塔, 400

Nu'mānīya, 努马尼耶, 729

Nupe, 努佩人, 490, 492, 508, 535

Nūr al-Dīn, 努尔丁, 188-9

Nurse, D. , 德里克·努尔斯, 604

al-Nuwayri, 努韦里, 225

Nyakyusa, 尼亚库萨人, 618, 623

Nyame, 尼亚梅人, 469

Nyamwezi-Sukuma, 尼扬韦齐-苏库马人, 632

Nyanza Cushites, 尼安扎-库希特人, 618

Nyarko, 尼亚科, 496-7, 783

Nyaruhengeri, 尼亚鲁亨盖里, 156-8

Nzema language, 恩泽马语, 492

Nzwani, 恩兹瓦尼, 593

Oakhurst, 奥克赫斯特, 162

oases, 绿洲, 277-85, 290, 295-303, 436-7; 又见"灌溉"(irrigation)、"撒哈拉贸易"(trade, Sahara)诸栏目

Obatala, 奥巴塔拉(造物主), 486

Obenga, T. , T. 奥本加, 734

Oba Ewuare, 埃乌阿雷(奥巴), 516
Obuasi Monkey Hill, 奥布阿西猴山, 499
Oda, 奥达, 489, 499
Odiaboa, 奥迪亚博阿, 501
Oduduwa, 奥杜杜瓦, 484–5, 507
Odumparara Bepo, 奥杜姆帕拉拉-贝波, 499
Ogiso, 奥吉索, 514–15
Ogo Old Ogo, 奥戈/古奥戈, 355, 358, 43?, 489,
Oguola, 奥古奥拉, 514, 515, 516
oil (vegetable), 植物油, 264, 325, 462, 501, 504, 739, 743, 779
Okigwe-Arochuku, 奥基圭-阿罗丘库, 523
Olderogge, D., D.奥尔德罗格, 102
Oliver, R., 罗兰·奥利弗, 142
Olokun Grove, 奥洛昆丛林, 513
Olympiodor, 奥林匹奥多, 278
Oman, 阿曼, 阿曼人, 21, 24
ombiasy, 预言家, 90
Ongamo-Old Ongamo, 翁加莫人/古翁加莫人, 618, 630, 631, 637, 639–40; 又见"马亚-翁加莫人"(Maa-Ongamo)栏目
Onitsha, 奥尼查, 477, 489, 520
Onjatsy, 翁贾齐, 翁贾齐人, 90, 701
Onwuejeogwu, M. A., M. A. 翁韦杰奥古, 520, 524, 528
oral records, 口头纪录, 92, 104, 448; 中部非洲, 661; 东部非洲, 599–600, 606–7, 628; 几内亚/西非, 496, 501, 505, 512, 520, 554; 马达加斯加, 681–9, 692, 695; 苏丹地区, 76, 121, 126, 129–32; 又见"语言"(languages)栏目
Oran, 奥兰, 351, 737, 739
Oranmiyan, 奥兰米扬, 507, 514
Ore, 奥雷(雕像名), 507
Oromo, 奥罗莫人, 580, 593–4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49, 52; 又见"突厥人"(Turks)栏目
ownership, *see* property concept, 所有权, 见"财产概念"栏目
Owo, 奥沃, 463, 486, 764
Oyo, 奥约, 奥约人, 489, 506–8, 512
Oyo Old Oyo, 奥约/古奥约, 526
Ozanne, P., P. 奥赞, 506
Ozi, 奥济, 607
Ozo society, 奥佐社, 520
Pachomius, St, 圣·帕科米乌斯, 568
'Pahouin' languages, "帕胡因"语言集团, 145
Painter, C., 科林·佩因特, 494
Pakistan, *see* India, 巴基斯坦, 见"印度"栏目
Pakomo, 帕科莫人, 617, 627
Palestine, 巴勒斯坦, 12, 19, 54, 188, 392–3
palm oil, *see* oil, 棕榈油, 见"油"栏目
Palmer, H. R., H. R. 帕尔默, 79, 120
Pangani, 潘加尼, 619, 622
Pantera, 潘特拉人, 504
paper, 纸, 5, 744
papyrus, 莎草纸文献, 265
Pare area, 帕雷地区, 622–4, 627, 631, 633, 635, 637, 640
pastoralism, *see* agriculture, 牧畜、畜牧, 见"农业"栏目
Pate, 帕塔(或译帕泰), 587, 599, 602–3, 738
patrilineality, 父系社会, 669–71
Paulos, 保罗斯, 195
Pearce, F. B., F. B. 皮尔斯, 588–9
peasants, *se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农民, 见"农业"、"乡村地区"诸栏目
Pela, 佩拉人, 159
Pelasgians, 佩拉斯吉人, 127
Pemba, *see* Kanbalū, 奔巴, 见"坎巴鲁"栏目
Pembele, 彭贝莱人, 159
Perrier de la Bathie, H., H. 佩里耶·德·拉·巴蒂, 690
Persia, 波斯, 44–5, 127, 129, 315; 波斯和拜占廷帝国, 10–11, 12; 波斯和东部非洲, 588–90, 594, 596, 598–9, 603, 606–7, 612; 波斯和埃及, 164; 波斯和埃塞俄比亚, 559, 565, 578; 波斯和伊斯兰教, 2–3, 8, 21–3, 48, 50, 53, 86, 88, 91; 语言, 684; 波斯和马达加斯加, 690, 691, 700–2; 奴隶, 727–8; 贸易, 27, 374, 393
Persian Gulf, 波斯湾, 8, 21–2, 54, 89
Person, Y., 伊夫·佩尔松, 550, 553–4
Petros I, 彼得罗斯一世, 202, 212
Peul, *see* Fulani, 颇尔人, 见"富拉尼人"栏目
Phalaborwa, 帕拉博鲁瓦, 770, 772
Phillipson, D. W., D. W. 菲利普森, 643, 660, 662
Philotheos/Filatewos, Abba, 菲洛西奥斯/菲拉特沃斯, 大主教, 212, 566
Phopo Hill, 福波丘陵, 647, 655
Pianoyo, 皮亚诺约, 502
Pirenne, H., 亨利·皮雷纳, 13–14, 19, 264
planting agriculture, 种植农业, 632–4, 637–9
Poitiers, battle of, 普瓦蒂埃战役, 242, 246
Pokomo, 波科莫人, 604–5
politics, 政治, 673–6; 又见"统治者"(rulers)栏目
polytheism, *see* religions, ancient, 多神论, 多神教, 见"古代宗教"栏目
pomdon, "蓬丹"(皂石祖先像), 548–5[illegible]
population/population movements, 人口、人口流动, 734, 746, 758–61; 人口流动和讲班图语各族, 140–62; 东部非洲, 616–31; 埃塞俄比亚 563–5; 欧洲, 12, 14, 17; 几内亚/西非, 512, 516, 534–57; 人口流动和撒哈拉通道, 276–81; 南部非洲, 664–73; 苏丹地区, 119–39; 又见"伊斯兰教的传播"(Islam, spread); 各个民族及其社会的栏目
porcelain, 瓷器, 23; 又见"陶器"(pottery)栏目
Portuguese, 葡萄牙人, 89, 90, 141, 312–13, 607, 678
Posnansky, M., 梅里克·波斯南斯基, 150, 504
pottery, 陶器, 761–7, 790–1; 和讲班图语各族, 149, 153; 乍得, 437, 442; 东部非洲, 589–97 散见各处, 613–14, 622–4, 628, 635; 埃塞俄比亚 559; 几内亚/西非, 475, 477, 494–503, 505, 519, 527, 528, 545–8, 550, 555; 马达加斯加, 691, 694–5; 努比亚, 199, 206–7; 和撒哈拉通道, 390, 419, 428–30; 南部非洲, 664–74, 676; 又见"艺术"(art)栏目
Poura, 普拉, 121
Prampram, 普拉姆普拉姆, 502
precious and semi-precious stones, 宝石和不算太珍贵的半宝石, 419–20, 742
Priddy, B., B. 普里迪, 527

Procopius, 普罗科皮乌斯, 706
property concept, 财产概念, 106－7
Prussin, L., L. 普鲁辛, 761
Ptolemy, Claudius, 克劳迪乌斯·托勒密, 600, 698
Pular/Fulfulde, 普拉尔语/富尔富尔德语, 127－8
Pullo, *see* Fulani, 普洛人, 见"富拉尼人"栏目
Punic language, 古迦太基语
puritanical movements: Ibn Yasin's reforms, 清教徒式的运动: 伊本·亚辛的改革, 343－50, 又见"哈列哲教派"(Kharidjites)栏目
pygmies, 俾格米人, 146
Qalidurut, 卡利杜鲁特, 194
Qataban, 卡塔班, 704
Qoran, 古兰经, 35－40, 45, 56, 137, 246, 267, 575－6, 578, 柏柏尔人, 65, 341; 古兰经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93, 99, 106, 109, 110, 114, 古兰经和奴隶, 711－12, 718－20, 729
al－Ra'ay al－Aswad al－Habashi, 拉艾·阿斯瓦德·哈巴希, 709
Rabāh, 拉巴赫, 710
Rabat, 拉巴特, 112, 784
Rabbo, Muhammad, 穆罕默德·拉博, 79
rābita, *see* *ribāt*, "拉比塔"(隐修所), 见"里巴特"(隐修所)栏目
al－Rādi, 拉迪, 724
Radjab, 回历 7 月, 165, 264
raffia, 酒椰树, 776
Rāh, 拉赫, 263
rā'is, 费赞地区的首领, 299
Rakka, 拉卡, 174, 179
Rakkāda, 拉卡达, 272, 318－19
Ramadān, 莱麦丹月, 斋月, 94
Ramayana epics, 罗摩衍那叙事诗, 24
Rametta, battle of, 拉梅塔之役, 327
Rao, 拉奥, 547
Raphael, 拉斐尔, 215
Rās al－Ma', 拉斯－马, 406－7
Rāshid, 拉希德, 255
al－Rashid, Hārūn, 哈龙·拉希德, 209, 260－1
Ravoaomena Andriamanavanana, 腊沃奥梅纳·安德里亚－马纳瓦纳纳(族群), 689
Rawda, 劳代岛(罗达岛), 165, 178
Rayy, 赖伊, 715
Red Sea, 红海, 373, 559, 577－8, 698, 红海和伊斯兰教, 8, 22, 54, 82, 85, 166, 173, 179, 188
reforms, Ibn Yasin's, 伊本·亚辛的改革, 343－50
relations between regions, *see* Islam; social changes; techniques; trade 各地区间的关系, 见"伊斯兰"(Islam); "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s); "技术"(techniques); "贸易"(trade)诸栏目
religions, 宗教, 125; 古代宗教, 229, 303, 484, 504, 520, 意识形态和艺术, 786－93; 又见"基督徒、基督教势力"(Christians); "伊斯兰"(Islam); "神学"(theology)诸栏目
Rhapta, 拉普塔, 602, 698
ribāt/rābita, 里巴特/拉比塔(隐修所), 70, 79, 261－2, 274, 341, 345
Ridwān, 里德万, 187
Rif, 里弗山脉, 241, 256
Rift peoples, 裂谷各族, 617－18, 619, 627－9, 634－5
Rift valley, 裂谷, 617, 621, 629, 635
Righ/Wādi Righ, 里格/瓦迪－里格, 276－81, 295－7, 312
Righa, 里加人, 296
rihla, 游记, 旅行, 270
Rimi, 里米人, 632
Riyah, 里亚赫人, 333, 726
Roan Antelope, 罗恩－安蒂洛普, 647, 651, 653
Robert, D., 德尼兹·罗贝尔, 422
Roda/Rawda, 罗达岛/劳代岛, 165, 178
Roderick, 罗德里克, 242
Rodney, W., 沃尔特·罗德尼, 530, 541
Rom, 罗姆人, 564
Roman Catholics, 罗马天主教, 11, 13
Roman empire, 古罗马帝国, 62, 71, 122, 147, 685, 690
Romance languages, 罗曼诸语言, 269
Romania, 罗马尼亚, 559
Rop, 罗普, 162
Rosenberger, B., B. 罗森伯格, 414
Rūdrīk, 鲁德里克, 242
rulers, 统治者, 780－9; 个传, 439－40, 445－60, 东非 598－9, 601－3, 636－7; 埃及, 163－93 散见各处; 埃塞俄比亚, 558－68, 578－85, 欧洲, 351, 几内亚－西非, 477, 506－8, 514－17, 520－5, 统治者和伊斯兰教, 72－82 散见各处, 85－6, 107－12; 马格里布, 228－45 散见各处, 247－63 散见各处, 266, 268, 314－37 散见各处, 343－54, 364; 努比亚, 194－6, 199－202, 208－11, 撒哈拉, 280－1, 284, 288－9, 291－4, 298－9, 302－11, 南部非洲, 669－72, 674, 676－80; 苏丹地区, 131, 134－8, 并参阅个人姓名栏目
Rumfa, Muhammad, 穆罕默德·鲁姆法, 79, 108, 110
rural areas, 乡村地区, 104－5, 107, 206; 埃及, 164, 170, 178, 183, 185－6; 又见"农业"(agriculture)栏目
Rustumids, 鲁斯泰姆王朝, 100, 253; 和法蒂玛王朝, 317－18, 322, 328; 和撒哈拉通道, 278, 280－1, 287－8, 290, 293, 298－9, 301
Rutara, 鲁塔拉人, 618, 628, 637
Ruvu, 鲁伏语族, 618, 622, 627, 632
Rwanda, 卢旺达, 卢旺达人, 105, 139, 140, 154, 156－8, 623, 766, 772, 和讲班图语各族, 152, 153, 158, 159
Rwanda Ha, 卢旺达－哈人, 618, 628
Sa'ad al－din, 萨阿德·丁, 584
sa'ālik, 萨阿利克(行踪不定的游伙帮), 707
Sabagura, 萨巴古拉, 197, 204
Sabaki, 萨巴基语族, 618, 622, 627
al－Sabbāh, Hasan, 哈桑·伊本·萨巴赫, 187
Sabeans, 萨比教徒, 46
Sabhā/Shabāha, 塞卜哈/沙巴哈, 288
Sab'iyyūna, *see* Ismā'īliyya, 七伊玛目派, 见"伊斯玛仪派"栏目
Sabr al－dīn I, 萨布尔·丁一世, 582－3, 584
Sabra－Mansūriyya, 萨布拉－曼苏里耶, 319, 428
Sabra/Sabrāta, 塞卜拉/塞卜拉泰, 230－1
Sadaf, 萨达夫人, 258
sadaka, "萨达卡"(按氏族群体财产收的税), 240

sa'dis, 萨迪斯王朝, 45
Sadrāta/Sedrata Isedraten, 萨德拉塔/塞德拉塔/伊塞德拉顿, 279-80, 298, 316, 784
al-Saffāh, 萨法赫, 260
Saffārids, 萨法尔王朝, 173
Safi, 萨菲, 235, 341
Saghala, 萨加拉人, 622
Saghāwa, see Zaghāwa, 萨加瓦人, 见"扎加瓦人"栏目
Saghmara, 萨格马拉, 萨格马拉人, 306, 411
Sahara, 撒哈拉, 276-313, 522, 734, 735, 747, 中撒哈拉, 303-7, 生态和人口, 276-81; 撒哈拉沙漠和伊斯兰教, 5, 8, 9, 15, 58, 67-8, 77, 97, 103; 语言, 441, 444-5, 449, 利比亚沙漠, 281-6, 北撒哈拉, 295-303, 人口流动, 746, 760; 定居空间的构成, 757-8; 技术 743, 777;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276-313 散见各处, 367-435, 738, 740, 778, 西撒哈拉, 307-13
Sahel, 萨赫勒, 106, 715, 735, 737, 756, 769; 阿尔莫拉维德人在萨赫勒地区活动情况, 354-66; 萨赫勒地区和伊斯兰教, 5, 7, 58, 71; 萨赫勒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7, 133, 138; 萨赫勒地区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56-9, 361, 363, 374-8, 383, 414, 422, 425, 又见"撒哈拉以南地区"(south of Sahara)栏目
al-Sahib b. 'Abbād, 萨希布·本·阿巴德, 270, 717
Sāhil, 萨希尔, 62
al-Sāhili, 萨希利, 108
Saho, 萨霍, 萨霍人, 561
Sa-huynh-Kalanay, 沙萤-卡拉奈, 694
Sai, 萨伊岛, 197, 212
Sa'id, 上埃及, 173
saints: 圣者, 圣徒; 基督教的, 568; 伊斯兰教的, 43, 96 和注, 102
Saison, B., B. 赛松, 419, 421
Sakadam/Seggedine, 萨卡达姆/塞格丁, 453
Sakāliba, see Slavs, "萨卡利巴"(白奴), 见:斯拉夫人"栏目
Sakawa, see Zaghāwa, 萨卡瓦, 见"扎加瓦"栏目
Sakiyyat al-Hamrā, 萨基亚特·哈姆拉, 311
Salā, 萨拉, 395, 400-1
Salāh al-Dīn, 萨拉丁, 189, 216
salām, "萨拉姆"(祝愿平安), 94
Salama, Abba, 萨拉马, 大主教, 559
Salamiyya, 塞莱米耶 315, 318
salāt, "拜功"、"沙拉特"(政治、军事权), 37, 93, 172, 178
Saldjuk Turks, 塞尔柱突厥人, 11, 52, 53-4
Salé, 萨勒, 251, 339, 341
Sāleh, kādi, 萨利赫, 执法官, 584
Sālih, 萨利赫, 341
Sālih b. Shukrān, 萨利赫·本·舒克兰, 710
Sālih ibn Mansūr al-Yamani, 萨利赫·伊本·曼苏尔·亚马尼, 243
Sālih ibn Tarīf, 萨利赫·伊本·塔里夫, 65
Sālih Talā'i', 萨利赫·塔拉伊, 192
Sallāma al Kass, 萨拉马·卡斯, 730
Salmān the Persian, 波斯人赛尔曼, 129
Salomon, 萨洛蒙, 215
salt trade, 食盐贸易, 136, 292, 307, 312, 558, 740, 776-7, 779-80; 几内亚/西部非洲, 480, 486, 501-2, 528, 529, 553, 食盐贸易和撒哈拉通道, 325, 340-1, 368, 372, 381-2, 408, 422
Salum, 萨卢姆, 546
Samakanda, 萨马坎达, 407, 411, 422
Samarkand, 撒马尔罕, 5, 715
Samarra, 萨迈拉, 172-3, 614, 716
Sambirano, 桑比拉诺, 683, 690
Samo, 萨摩人, 536
Samquelle, 桑克里, 549
San, 桑人, 147, 160, 793
Sandawe, 桑达维地区, 桑达维人, 619-20
Sanga, 桑加, 647, 649, 651-2, 661, 766, 786
Sangha river, 桑加河, 151, 154
Sango, 桑戈人, 469
Sanhādja, 桑哈贾, 桑哈贾人, 132, 227-8, 233-8, 242; 桑哈贾人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7-39 散见各处; 357, 361, 桑哈贾人和法蒂玛王朝, 321-3, 328-31, 333, 335; 桑哈贾人和撒哈拉通道, 277-8, 281, 306-13; 桑哈贾人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2, 124, 139
Sanneh, L. O., L. O. 桑纳, 74
Sanskrit, 梵语, 梵文, 24, 684
Santariya/Siwa, 桑塔里亚/锡瓦, 279, 281-3, 303, 373
Sao, see Kotoko, 萨奥人, 见"科托科人"栏目
Sapes, 萨佩人, 541, 542, 549
Sapi, 萨皮人, 543
Sapir, J. D., J. D. 萨皮尔, 539
sarakuna, 萨拉库纳(国王), 79
Sārat al-Lawātiya, 萨拉特·拉瓦蒂娅, 296 注
Sardinia, 撒丁, 259, 264
sarki, 萨尔基(大王), 79
Sara-Bongo-Bagirmian language, 萨拉-邦戈-巴吉尔米语, 450
Sarodrano, 萨鲁德拉诺, 683, 691
Sassanids, 萨珊王朝, 10-11, 48, 49, 560, 700
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 41, 又见"阿拉伯半岛"(Arabia)栏目
saum, "斋功", 37
Sawākin, 萨瓦金, 58, 82, 561
Sayyida Rukayya, 赛义德·鲁卡亚, 192
Schacht, J., J. 沙赫特, 430
Schroda, 施罗达, 666, 672-3, 674, 680
science, 科学, 271, 607; 又见"数学"(mathematics)栏目
script, see writing, 手写本、手抄本, 见"手迹、书写本"栏目
sculptures, see art, 雕刻, 见"艺术"栏目
seafaring, see Indian Ocean, maritime, 航海事业, 见"印度洋"; "海运活动"诸栏目
Sebanzi, 塞班齐, 647, 658
Sebrū, see Shebrū, 塞卜鲁, 见"谢卜鲁"栏目
sects, Islamic, 伊斯兰教各教派, 43-6, 又见, 特别是"哈列哲教派"(Kharidjites); "什叶派"(Shi'tes) "逊尼派教义"(Sunnism)诸栏目
sedentarization, 定居, 286
Sedrata, see Sadrata, 塞德拉塔, 见"萨德拉塔"栏目
Sefuwa, 塞富瓦, 塞富瓦人, 136-7, 445, 447, 450, 454-60

Seggedine, see Sakadam, 塞格丁，见"萨卡达姆"栏目
Segu, 塞古, 117
Seldjukids, 塞尔柱王朝, 186-8
Semitic language, 闪米特语, 85
Senegal, 塞内加尔, 285; 塞内加尔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55-9, 361; 塞内加尔和伊斯兰教, 58, 72-3, 77-8; 塞内加尔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4, 128, 130, 139; 塞内加尔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6-7, 408, 410-12, 432; 又见"几内亚"(Guinea)、"上几内亚"(Upper Guinea)诸栏目
Senegambia, 塞内冈比亚, 80, 544-7; 巨石, 470-5; 又见"几内亚"(Guinea); "上几内亚"(Upper Guinea)诸栏目
Sennar, 森纳尔, 84
Serengeti, 塞伦盖蒂, 617
Serer, 塞雷尔人、塞雷尔语, 127-9, 555, 468
Seres, 塞雷斯人, 698
Seuta, 塞乌塔语族, 618, 622, 627
Seveners, see Ismā'iliyya, 七伊玛目派，见"伊斯玛仪派"栏目
Sekyani, 塞克耶尼人, 147
Sfax, 斯法克斯, 744
Shaba, 沙巴, 142, 152, 646, 649, 663
Shabāha, 沙巴哈, 288
Shādhiliyya, 沙兹里教团沙兹里亚, 95
Shāfi'ī/Shāfi'ites, 沙斐仪/沙斐仪学派, 41, 95, 187, 725
shahāda, "念功", 37, 93
Shai, 沙伊, 501, 502-3
Shāma, 沙马, 294-5
al-Shammākh al-Yamānī, 沙马希·亚马尼, 255
Shams al-dīn ibn Muhammad, 沙姆斯·丁·伊本·穆罕默德, 585
Shanga, 尚加, 尚加人, 587, 590
sharī'a, "沙里亚", 伊斯兰教教规、教法, 40-2, 47, 95, 314
Sharīf, 谢里夫(先知穆罕默德后裔，荣誉称号), 45, 79, 171
Sharīk Ibn Sumayz al-Muradi, 谢里克·伊本·苏迈兹·穆拉迪, 234
Sharka, 萨尔卡, 86
Sharus, 沙鲁斯, 285
Shashi/Limpopo area, 沙希/林波波地区, 664-80
Shatt al-'Arab, 阿拉伯盐湖地区, 722, 728
Shaw, C. T., C. T. 肖, 461
Shaw, T., 瑟斯顿·肖, 522-3, 528
shaykh, 谢赫(教长), 42, 90
Shaykh Dāwūd(town), 谢赫-达乌德(城), 204
Shebrū/Shebrō, 谢卜鲁, 279, 282-3
Shepherd, G., G. 谢泼德, 593
Sheriff, A. M. H., A. M. H. 谢里夫, 705
Shī'a, see Shī'ites, 伊斯兰教什叶派信徒，什叶派穆斯林，见"什叶派"栏目
Shī atu 'Alī, see Shī'ites, 什叶图·阿里(阿里党)，见"什叶派"栏目
Shihāb al-dīn Ahmad Badlāy, 希哈卜·丁·艾哈迈德·巴德莱, 584-5
Shī'ites/Shī'a, 什叶派/什叶派穆斯林, 44-6, 51, 53, 55, 588; 什叶派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41-2; 埃及的情况, 169, 178, 181; 东部非洲的情况, 606; 北部非洲的情况, 65, 66, 67, 254, 255, 258, 261; 又见"法蒂玛王朝"(Fātimids)、"伊斯玛仪派"(Ismā'iliyya)诸栏目
Shinnie, P., P. 欣尼, 205
shipping/boats, see Indian Ocean; maritime, 海运/船舶，见"印度洋"(Indian Ocean); "海运"(maritime)诸栏目
Shiraz/Sīrāf, 设拉子/撒那威, 21, 578, 589-90, 596注
Shirāzi, 设拉子人, 589, 594, 596, 599, 606-7
Shirkūh, 希尔库赫, 189
Shoa, 绍阿, 85-6, 561, 566, 579-84
Shona, 绍纳人, 140, 160, 664, 667
Shongwe, 雄韦, 656
Shu'ayba, 舒艾拜, 577
shurā, "舒拉", 协商, 43
Shūridjiyya, 舒里吉亚人, 728
Sicca, Vaneria/Shikkahāriya/al-Kāf, 锡卡瓦奈里亚/希卡哈里亚/卡夫, 237
Sicily, 西西里, 18, 179, 325; 西西里和伊斯兰教, 7, 9, 14, 50, 51, 54, 259, 264-6, 269, 325-7
sickle-cell anaemia, 镰状细胞贫血症, 465, 541
Sidamas, 锡达莫人, 579
Sīdī 'Alī Čelebi, 西迪·阿里·塞莱比, 702-3
Sidjilmāsa, 锡吉勒马萨, 65, 66, 67, 68, 69, 251-2, 265-6, 738, 783; 锡吉勒马萨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8-9, 341, 346, 348, 361; 锡吉勒马萨和法蒂玛王朝, 316, 318, 322, 329, 331, 锡吉勒马萨和撒哈拉贸易, 276-7, 279-81, 299, 301, 308, 310-11, 370, 374-5, 379, 381, 389, 392-7, 400-2, 407-15, 715; 锡吉勒马萨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2, 123, 124
Sierral Leone, see Guinea; Upper Guinea, 塞拉利昂，见"几内亚"; "上几内亚"诸栏目
Siffīn, battle of, 绥芬战役, 709
silk, 丝绸, 548, 706
Sillā, 锡拉, 738; 锡拉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55, 356, 358; 锡拉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407, 410-11, 423, 432
silver, 银, 392, 402, 405, 614
Sinde, 辛德, 647, 658
Sindjāsen, Banū, 巴努-辛贾森人, 297
Sine, 辛, 546
Singwaya, Kaya, 辛瓦亚, 卡亚定居点, 590, 593
Sinoia, 锡诺亚, 锡诺亚人, 647, 665, 666, 667
Sintiu-Bara, 辛丘-巴拉, 358, 377, 415-16, 418, 792
Sioma, 锡奥马, 653
Sirāf, see Shiraz, 撒那威，见"设拉子"栏目
Sirt, 苏尔特, 284
Sīwa, see Santariya, 锡瓦，见"桑塔里亚"栏目
slaves/slave trade, 奴隶/奴隶贸易, 712-21, 740-1, 779; 个得, 451-3; 奴隶对文化所起的作用, 729-31; 东部非洲, 612-13, 埃及, 168, 172, 173, 185, 186; 就业与社会条件, 721-6; 释奴, 267-8, 709, 721; 几内亚/西非 480, 484, 486-7, 501; 伊斯兰教和奴隶, 3, 6, 9, 16, 23, 25; 马格里布, 260, 265, 267, 321-2; 努比亚, 195, 199, 207, 奴隶起义，见"僧祇"(Zandj)栏目; 奴隶贸易和撒哈拉通道, 284-

5; 290, 292, 293, 313, 372－3, 382; 奴隶的地位和身份, 711－12; 苏丹地区, 123, 134, 136－7. 又见"斯拉夫人"(Slavs)栏目
Slavs/Sakāliba, 斯拉夫人/萨卡利巴白奴, 14－16, 183, 265, 267, 321－2, 324; 又见"奴隶"(Slaves)栏目
Smith, A., 阿卜杜拉希·史密斯, 458
snakes, 蛇, 125
'Soba－Noba', "索巴－诺巴", 560
social conditions of slaves, 奴隶的社会条件, 721－6
social differentiation, *see* class; rulers, 社会差别, 见"阶级"(class)和"统治者"(rulers)栏目
social systems, 社会体制, 780－5, 乍得 477－87, 各种变化, 746－9; 东非, 602－3, 635－9, 努比亚, 204－8; 又见"伊斯兰"(Islam); "人口"(population); "宗教"(religions); "社会"(societies)诸栏目, 并参阅各具体民族栏目
societies and law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社会和法律, 历史的发展, 750－93, 定居空间的构成, 751－62; 又见"法律"(law); "社会体制"(social system); "技术"(techniques)诸栏目
Socotra, 索科特拉岛, 714
Sofala, 苏法拉, 苏法拉人, 88－9, 600, 601, 606, 609, 611, 615, 738
Soga, 索加人, 628
Sohar, 索哈尔, 596 注
Solomonids, 所罗门王朝, 581, 583
Solwezi, 索卢韦齐, 653
Somalia/Somali, 索马里, 索马里人, 600, 625－6, 641, 685; 索马里和伊斯兰教, 46, 58, 77, 86－7, 91; 又见"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栏目
Songea, 松盖阿人, 618, 623
Songhay, 桑海, 76－7, 117, 444－5, 532; 桑海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115－17; 桑海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1, 130, 138, 139
Soninke, 索宁克人, 74－5, 91, 112, 535－6, 747; 索宁克人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12－13; 索宁克人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4, 126－7, 129－31, 138
Songo, 松乔人, 629, 632
Sonki Tino, 松基·帝诺, 197, 212, 220－1
Soo, *see* Kotoko 索奥人, 见"科托科人"栏目
Soper, R., 罗伯特·索珀, 593
sorabe, "索拉贝"(传说汇编, 以阿拉伯文－马尔加什文书写), 90
sorcery, 巫术, 640; 又见"古代宗教"(religions, ancient)栏目
Soso, 索索, 索索人, 360, 537－8, 543
Sotho－Tswana language, 索托－茨瓦纳语, 671
South African Highland Group, 南非高原类陶器, 611
South African Lowland Group, 南非低地类陶器, 611
south of Sahara, 撒哈拉以南地区, 111; 该地区的伊斯兰教, 67－90, 130－8; 该地区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92－118, 语言, 见"讲班图语各族"(Bantu speakers)栏目; 人口, 见"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Sudan, population movements)栏目; 并见"中部非洲"(Central Africa); "乍得"(Chad); "东部非洲"(East Africa); "埃塞俄比亚"(Ethiopia); "几内亚"(Guinea); "萨赫勒"(Sahel); "南部非洲"(Southern Africa); "苏丹地区"(Sudan); "上几内亚"(Upper Guinea); "西部非洲"(West Africa)诸栏目
Southern Africa, 南部非洲, 162, 664－80, 735, 792－3; 部族流动和文化体系, 664－73; 马庞古布韦作为第一个津巴布韦的首都, 676－80, 政治, 673－6; 人口流动, 746; 定居空间的构成, 752－3; 技术, 761, 768; 贸易, 673－6, 739, 742, 779, 781
Spain, 西班牙, 742; 西班牙的基督教势力, 18, 399－400; 西班牙和法蒂玛王朝, 326－7; 西班牙和伊斯兰势力, 2－5, 7, 9, 13, 14, 41, 49－51, 54, 63－4, 98, 100, 171, 241－3, 254, 263－4, 266－7, 269, 326－7; 西班牙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86－7, 392, 395, 397－402
Spear, T., T.斯皮尔, 603
spices/incense/herbs, trade in, 香料/熏香/香草的贸易, 558, 612, 613; 马达加斯加, 684－8, 697
Sri Lanka, *see* Ceylon, 斯里兰卡, 见"锡兰"栏目
Srīvijaya empire 室利佛逝帝国, 701; 室利佛逝帝国和伊斯兰教, 15, 21, 27, 28; 室利佛逝帝国和奴隶, 732－3
Stanley Pool, 斯坦利湖, 152, 648
status, *see* class, 身份和地位, 见"阶级"栏目
Stephanos, 斯特凡诺斯, 196
Stone Age, 石器时代, 464, 466, 547, 760; 东非, 592－3; 几内亚, 494－5, 526－7, 528
Straits, battle of, 海峡之战, 327
Sū, *see* Hū, 苏, 见"胡"栏目
Subaytula, 苏拜图拉, 230, 232
sub－Saharan region, *see* south of Sahara, 下撒哈拉地区, 见"撒哈拉以南地区"栏目
Sūdān, 苏丹人, 103
Sudan, 苏丹地区, 544, 620, 622, 628, 630－1, 735, 742－3, 747－8, 中苏丹, 见乍得(Chad)栏目; 苏丹地区和伊斯兰教, 4, 6, 7－8, 9, 15, 41, 46, 67, 68－84, 91; 苏丹地区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109, 111; 语言, 75, 125, 127－8, 146, 154, 159, 160, 162; 人口流动, 119－39; 奴隶, 715, 723, 728; 苏丹地区和贸易, 69, 71, 78, 80, 123, 134－7, 339－41, 373, 398, 402, 406, 426, 431
Sūf, 苏夫, 277－9, 295, 312
Sufāla, 苏法拉, 苏法拉人, 28
Sufetula, 苏费图拉, 230, 232
sūfīs/sūfism/Sufites, 苏非主义, 苏非教义, 苏非教派, 7, 42, 44, 55, 64, 65, 69, 95, 97, 193, 731; 和法蒂玛王朝, 320; 在马格里布, 249, 250－2, 253, 272; 在撒哈拉, 278, 280
Sūk al－rakīk, 奴隶市场, 715－17
Sulayk b. al－Sulaka, 苏莱克·本·苏莱卡, 707
Sulaym, Banū, 巴努苏莱姆人, 186, 316, 332－4, 759
Sulaymān, Caliph(715－17) 苏莱曼(哈里发), (公元 715－17 年在位), 577
Sulaymān ibn 'Abd Allāh ibn al－Hasan, 苏莱曼·伊本·阿卜杜拉·伊本·哈桑, 243－4
Sulaymān ibn 'Abd al Malik, 苏莱曼·伊本·阿卜德·马利克

(哈里发), 170, 247
Sulaymān, Mansa, 苏莱曼(曼萨), 78, 108
Sulaymān, Muhammad b. 苏莱曼, 穆罕默德·本, 174
sulhān, "苏尔罕"(指通过对方投降占领城镇), 165
Sultanates, *see* rulers, 素丹, 见"统治者"栏目
Sumatra and Java nexus, 苏门答腊-爪哇联合体, 103, 689, 732-3; 又见"室利佛逝"(Srivijāya)栏目
Sumayfa 'Ashwa', 苏迈法·阿什瓦, 706
Summers, R., R. 萨默斯, 383 注
Sundiata, 松迪亚塔, 76, 103, 747
Sunnism/*Sunna*, 逊尼派教义/伊斯兰教的逊奈教规(圣行), 32, 40, 42, 45, 52, 53, 55, 94;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6-7, 342, 347-8, 359-61, 364-5; 在乍得地区, 451; 在埃及, 168, 170, 183-9 散见各处, 193, 和法蒂玛王朝, 319, 330-1; 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95, 99, 101, 104; 在马格里布, 65-7, 244, 251, 255, 272, 274, 314; 在撒哈拉, 278, 289; 又见"马立克派教义"(Malikism)栏目
sūra/sūrāt, *see* Qoran, 古兰经的"章"(前者是单数, 后者是复数), 见"古兰经"栏目
sūrat al-ard, 地形, 438
Surt/Sirt, 苏尔特, 284
Sūs, 苏斯 97, 232, 240, 262, 294, 316, 331, 757; 苏斯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43, 349, 351-4, 361, 364-6; 苏斯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8-9, 481
al-Sūs al-Aksā, 苏斯-阿克萨(苏斯省), 67-8, 241, 301
al-Suyūti, 苏尤提, 80, 108, 109, 576, 711
Swahili, 斯瓦希里, 斯瓦希里人, 88-9, 147, 594, 597, 602-5, 608, 615, 627, 641, 784; 又见"斯瓦希里语、斯瓦希里文"(kiswahili)栏目
Swahilini, 斯瓦希里尼(塔纳河三角洲以北地区), 607
Sya, *see* Bobo-Fing, 锡亚人, 锡亚语, 见"博博-芬语"栏目
Syracuse, 锡拉库塞, 264
Syria, 叙利亚, 12, 127, 315, 318, 709, 715; 叙利亚和埃及, 173-4, 182-3, 185, 188; 叙利亚和伊斯兰教, 7, 11, 41, 43, 45, 48-54; 叙利亚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92-3
Syriac language, 古叙利亚语、古叙利亚文, 573
Syrte desert, 锡尔特沙漠, 284
tabakāt, "塔巴卡特"(古代传记资料), 710, 730
Tabalbala, 塔巴尔巴拉, 338
al-Tabarī, 塔百里, 560, 573, 722
Tabarka, 泰拜尔盖, 237
Tabfārīllā, 塔卜法里拉, 346
Tacarcart, 塔卡尔卡尔特, 305
tachchelt, "啐蛇"占卜术, 125
Tada, 塔达, 487
tadbīr, "塔德比尔"(死后赐予奴隶自由), 721
Tādjinft, 塔杰里夫特, 284
Tādju, 塔朱人, 440
Tadla, 塔德莱, 339
Tādmāk, 塔德马克, 306
Tādmekka, *see* Gao, 塔德梅卡, 见"加奥"栏目
Tafilālet, 塔菲拉莱特, 235, 251, 316, 738; 塔菲拉莱特和撒哈拉通道, 279, 280, 301; 塔菲拉莱特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3, 124, 125
Tallīn, 塔夫林, 564
Tāgant, 塔甘特, 124, 126, 127, 129-30, 311, 339
Taghāzā/Tantintal, 塔加扎/坦廷塔尔, 124, 312, 475; 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9, 341
Tāghyārt, 塔格亚尔特, 299
Tāhert/Tiaret, 塔哈尔特/提亚雷特, 65, 66, 69, 228, 235, 253, 266, 269, 272, 738, 784; 塔哈尔特和法蒂玛王朝, 316-18, 322; 塔哈尔特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 100; 塔哈尔特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2, 124, 塔哈尔特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278-81, 299, 302, 372, 380-1, 389
Tahūdha, 塔胡扎, 236
Taita Hills, 泰塔丘陵, 617, 627, 633
Taita-Chaga language, 泰塔-齐加语, 618, 627, 631-2
Taitok, 塔伊托克人, 307
Taka, 塔卡, 407, 422
Takama, 塔卡马人, 618, 623, 627, 632-3
Takamat, 塔卡玛特, 125
Takarkart, 塔卡尔卡尔特, 305
Takedda/Azelik, 塔凯达/阿泽利克, 109, 305, 479, 523
takiyya, "塔基亚"(为逃避迫害, 不暴露真实的信仰), 249 和注, 253
Takrūr, 塔克鲁尔, 72-3, 107, 133, 778, 785, 塔克鲁尔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46, 355, 367; 塔克鲁尔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 124, 127, 130, 135, 138, 塔克鲁尔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85, 407, 410-13, 416, 423, 425, 434
Takwa, 塔夸, 589, 590-1
Takyiman, 塔基曼, 489, 496
Talā'i' ibn Ruzzīk, 塔拉伊·伊本·鲁齐克, 187, 188
talak, "塔拉克"(休妻), 720
Talaky, 塔拉基, 683, 692, 693-5
Talbi, M., M. 塔尔比, 246
Tālghement/Tilghement, 塔尔格门特/蒂尔格门特, 302
Talib, Y., Y. 塔利布, 704
Talkata, 塔尔卡塔人, 228, 328
Tamalma/Talamla, 塔马勒马/塔拉姆拉, 291
Tāmarmā, 塔马尔马, 288
tamasheq, 塔玛谢格语, 125
Tāmasna, 塔马斯纳, 251
Tambacounda, 坦巴昆达, 543
Tāmdūlt/Wāka, 坦杜尔特/瓦卡, 301, 338-9, 341, 370, 379-80, 408, 410, 414-15
Tamentīt, 塔曼提特, 302-3
Tamīm, 塔明, 243, 309
Tamīt, 塔密特, 197, 204, 212, 220-1
Tammām, 塔马姆, 26
Tāmzawā, 塔姆扎瓦, 288
Tana river area, 塔纳河流域, 617, 622
Tanbarūtān ibn Isfīshar, 坦巴鲁坦·伊本·伊斯菲沙, 310, 389
Tandja, *see* Tangiers, 丹贾, 见"丹吉尔"栏目
T'ang dynasty, 唐朝, 23, 612, 731-2
Tanganyika, Lake, 坦噶尼喀湖, 144, 159, 160
Tangier Tandja/Tingis, 丹吉尔/丹贾/廷吉斯, 235, 241-2, 394
Tanmak, Banū, 巴努-坦马克人, 69, 306

Tano，塔诺人，492
Tantintal，see Tāghāza，坦廷塔尔，见"塔加扎"栏目
Tanzania，坦桑尼亚，139，593，609；坦桑尼亚和讲班图语各族，141，142，152，159；又见"东非、东部非洲"（East Africa）栏目
Taolambiby，陶兰比比，683，689
Tārashna al-Lamtūnī，塔拉什纳·兰图尼，340
Tarazaki，塔拉扎基，450
Tarīf，Banū，巴努-塔里夫，241，251
Tarifa，塔里法，241
Tārik，塔里克，63
Tārik ibn Ziyād，塔里克·伊本·齐亚德，241-2，247
tarika/turuk，塔里卡/图鲁克，神秘主义教团或兄弟会，42 3，55
Tarka，see Tuareg，塔尔卡，塔尔卡人，见"图阿雷格"栏目
Tarkwa，塔夸，489，499
Tarses/Tarshish，see Tunis，泰尔塞斯 泰尔希什，见"突尼斯"栏目
Tārsina，塔尔西纳，309
Tarsus，塔尔苏斯，172，174
Taruga，塔鲁加，121，437，463，467，468
Tasalit/Tasalā，塔萨利特/塔萨拉，306
Tassawa/Tessaoua，塔萨瓦/泰萨瓦，287，289-90，304
Tassili-n-Ajjer，阿杰尔高原，125，303-4
Tatintāl，塔廷塔尔，407-8
Tato，塔托人，618，621，629，631，639
Tāwargha，塔瓦尔加，284
al-Tawārik，see Tuareg，塔瓦里克，塔瓦里克人，见"图阿雷格"栏目
Tawāt，塔瓦特，338，370，372
Tawtak，陶塔克，陶塔克人，307
tax/tributes：Egypt，税/贡品：埃及，164-6，170，172，177-8，183，186，326；欧洲，325，365；几内亚/西非，485；和伊斯兰教，46，57，103，165和注，170-3，178，239，247，261；马格里布，239-40，244，247，260，318，321，323；努比亚，83，206，209
Tayy，塔伊人，184，185
Tāzukkāght，塔祖卡格赫特，311
tchobro，"特舒卜鲁"（科普特语中的"村庄"），282
techniques，技术，438，468-9；技术的传播，742-5，762 93
Teda，see Tubu，特达人，见"图布人"栏目
Tegdaoust/Awdaghust，泰格达乌斯特/奥胡达古斯特，58，69，75，121，265，513，741，748，761，775，783；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38，340-2，359-60；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123，124，132，135；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279，281，301，303，310-12，370，375-7，380，382，389，390-1，397-8，403，408-24散见各处，427，428，430-4，475
Tellem，特勒姆人，360，466，774
Tema，特梅，489
Tembien，泰姆比恩，572
Temne，滕内，滕内人，535，539，541，543，555 6
Ténéré，泰内雷沙漠，444
tensions，social and cultural，of Islam，伊斯兰教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紧张局势，104 18
Termit，泰尔米特，437
Teseatu Kidusan，泰西图-基度桑（九圣徒），570
Tessaoua，see Tassāwa，泰萨瓦，见"塔萨瓦"栏目
Tetewabuo，泰泰瓦布奥，501
Tetedwa，泰泰瓦，502
textiles，纺织品，207，486，541，548，739，741，773，779；东部非洲，607，613；几内亚，528，529；纺织品和撒哈拉通道，301，432；南部非洲，674，678
Teda-Daza language，特达-达扎语，131
Thagicu，塔吉库人，618，627，633，636，639
Thandwe，丹兑，647，658
Theodore，西奥多，165
theology，神学，272，274-5，730-1；又见"宗教"（religion）栏目
Thysdrus/al-Djamm，锡斯德鲁斯/贾姆，230，232
Tiaret，see Tahert，提亚雷特，见"塔哈尔特"栏目
tibr，"提卜尔"（未经提炼加工的天然黄金，在统治者控制渠道之外进行交易），383-6，402
Tichitt，提希特，313
Tidikelt，提迪凯勒特，277，279，302
Tidjit，提吉特，296
Tidra，提德拉岛，345-6
tifinagh，提菲纳格文，125
Tighurt/Tuggurt，提吉尔特/图古尔特，296
Tigré，提格雷，84，85，556，561，570
Tihāma，帖哈麦，708
Tikarkarin/Tidkarir，提卡尔卡林/提德卡里尔（王国），304
Tilghemt，蒂尔格门特，302
Tilimsān，see Tlemcen，蒂利姆桑，见"特莱姆森"栏目
Tilūtān ibn Tiklān，提卢坦·伊本·提克兰，309
Timbuktu，廷巴克图，131，424；廷巴克图和伊斯兰教，76，78，80；廷巴克图和作为社会体制的伊斯兰教，109，112，116
tin，锡，435
Tin Hinan，廷-希南，125
Tin Yarūtān ibn Wisnū ibn Nazār，廷·亚鲁坦·伊本·维斯努·伊本·纳扎尔，310
Tināwuta，蒂纳乌塔人，286
Tīnazwa ibn Wanshīk ibn Bizār，提纳兹瓦·伊本·万希克·伊本·比扎尔，309
Tin Barūtan/Tin-Yarutān，廷-巴鲁坦/廷-亚鲁坦，339-40
Tingis，see Tangiers，廷吉斯，见"丹吉尔"栏目
Tinmāl，廷马尔，363
Tinnis，提尼斯，170
Tin-Shaman，廷-沙曼，294-5
Tiris，提里斯，130
Tiri/Tira，蒂里/蒂拉，285
Tirakkā，提拉卡，406-7，411，413，425
Tishit，提希特，121，124
Tiv，蒂夫人，490，492，535
Tiyūmetin，提尤梅廷，312
Tlemcen/Tilimsān，特莱姆森/蒂利姆桑，108，228，234 5，241，244，251，255，259，338，394-5，401，408；特莱姆森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351，354；特莱姆森和法蒂玛王朝，316，331；特莱姆森和撒哈拉通道，279，281，300，380，400
Togo，see Guinea；Upper Guinea，多哥，见"几内亚"；"上几内亚"诸栏目

Tokonda, 托康达, 559, 573
Toledo/Tulaytula, 托莱多/图莱图拉, 54, 242, 351, 354
Tolloy, 托洛伊, 托洛伊人, 376
Toma, *see* Loma, 托马人, 见"洛马人"栏目
Tomaghra, 托马格拉人, 439, 450
Tondidaru/Tondidarou, 通迪达鲁, 376, 463, 475
Tongoni, 通戈尼, 589
Torodbe, 托罗德贝人, 73
Toutswe, 图兹维, 图兹维人, 665, 667, 669, 671
Tozeur, 托泽尔, 62, 295
trade and commerce, 贸易和商业, 734, 736-42, 744-5, 778-81; 中部非洲, 778-80; 乍得, 372, 414, 435; 东部非洲, 20, 23-8, 89, 597, 602, 608, 612-15, 634-5, 641, 738-9, 778-80; 埃塞俄比亚 558-9, 578-9, 581, 778, 780; 欧洲, 10, 12, 14, 18, 325; 几内亚/西部非洲, 469-71, 475-7, 480, 484-7, 499, 503-4, 526-7, 528-9, 548, 738-9, 742, 778, 781; 伊斯兰教和商业, 贸易, 6, 8-9, 20-1, 29, 69, 71, 80, 89, 91; 马达加斯加, 684-8, 695-702 散见各处, 马格里布, 231, 263-6, 339-41, 363, 378-81, 392, 402, 414-15, 420, 425; 努比亚, 373, 390, 431, 437, 780; 撒哈拉通道和商业、贸易, 276-313 散见各处, 367-435, 738, 740, 778; 南部非洲, 673-6, 739, 742, 779, 781; 苏丹地区, 69, 71, 78, 80, 123, 134-7, 339-41, 373, 398, 402, 406, 426, 431; 又见"玻璃"(glass); "黄金"(gold); "印度洋"(Indian Ocean); "铁"(iron); "食盐"(salt); "奴隶"(slaves); "香料"(spices); "纺织品"(textiles)诸栏目
Trajan, 图拉真, 303
Transjordan, 外约旦, 33
transport, *see* maritime; ships; trade, 运输, 见"海运"; "船舶"; "贸易"诸栏目
Transvaal, 德兰士瓦, 160, 644; 又见"赞比西文化"(Zambezi culture)栏目
treaty, *see* bakt, 条约, 见"巴克特条约"栏目
tributes, *see* tax, 贡品, 见"税"栏目
Tripoli, 的黎波里, 231, 252-3; 的黎波里和撒哈拉通道, 279, 281, 290, 306, 406-7, 409
Tripolitania, 的黎波里塔尼亚, 123, 324, 715,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埃及, 173, 186,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伊斯兰教, 228, 229-31, 239;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撒哈拉通道, 278-9, 284, 286-7, 290, 372, 380, 410
tsetse fly, 采采蝇, 619, 624
Tshikapa, 奇卡帕, 644, 647, 648-9
Tuan Ch'eng Shih, 段成式, 608
Tuareg, 图阿雷格, 图阿雷格人, 123, 125, 228, 304, 306-7
Tubu, 图布人, 437, 439-40, 450, 451, 458; 图布人和撒哈拉通道, 277-8, 282, 290, 292-4; 又见"扎加瓦, 扎加瓦人"(Zaghāwa)栏目
Tuggurt, *see* Tighūrt, 图古尔特, 见"提古尔特"栏目
Tughril Bek, 图格里尔·贝克, 186
Tuinplaats, 滕普拉斯, 162
Tukulor/Toucouleur, 图库洛尔人, 73, 80, 128, 534, 又见"富拉尼人"(Fulani)栏目
Tulaytula, *see* Toledo, 图莱图拉, 见"托莱多"栏目
Tuli, 图利人, 159
Tulunids, 图伦王朝, 172-7
al-Tunbudhī, Mansūr, 通布齐, 曼苏尔, 261
Tundjur, 通朱尔人, 440
Tunis, 突尼斯, 50, 62, 239, 316, 330, 737
Tunisia, *see* Ifrīkiya; Maghrib, 突尼斯, 见"伊弗里基亚"; "马格里布"诸栏目
Turkana, 图尔卡纳湖, 631
Turks/Turkey, 突厥人, 土耳其人/土耳其, 724, 在埃及, 172, 174, 176, 183, 186, 189; 和伊斯兰教, 3, 11, 30, 41, 49, 52, 54, 塞尔柱突厥人, 11, 52, 53-4
turuk, *see* tarīka, "图鲁克", 见"塔里卡"栏目
Turunku, 图伦库, 463, 487
Tūtak/Tawtak, 图塔克/陶塔克, 307
Tūwāt, 图沃特, 117, 277, 279, 295, 302-3
Tūzūn, 图宗, 179
Twelvers, *see* Ithnā 'ashariyya, 十二伊玛目派, 见"伊斯纳·阿什里亚"栏目
Twi, 特维人, 490, 492, 539
Twickenham Road, 特维克纳姆通道, 647, 654, 658
Tzaganes, 茨冈人, 127
Ubangi, 乌班吉, 142, 154
'Ubayd Allāh al-Mahdī, 乌巴杜拉·马赫迪, 181, 252, 318-19, 321-7, 397
'Ubayd Allāh ibn al-Habhāb, 乌巴杜拉·伊本·哈卜哈卜, 239, 245, 307, 308
'Ubaydullāh, 乌巴杜拉, 65
Ubulla, 乌剌, 21
Udi, 乌迪, 522
Udo, 乌多, 516
Ufe Ijumo, 乌费-伊朱莫, 463, 467
Uganda, *see* East Africa, 乌干达, 见"东非、东部非洲"栏目
Ugurugu, 乌古鲁古, 526
Ugwuelle-Uturu, 乌格威勒-乌图鲁, 492
Uhud, Battle of, 乌呼德战役, 708
Ukagulu, 乌卡古鲁, 627
'Ukāsha, 乌卡沙, 250
'Ukba ibn 'Āmir al-Djuhanī, 乌克巴·伊本·阿米尔·朱哈尼, 232, 234-6, 239, 242, 247, 270
'Ukba ibn Nāfi, 乌克巴·伊本·奈菲, 48, 62, 68, 98, 233, 234-5, 284, 286-8, 290, 307, 438, 448, 450
Ukwa, *see* Igbo Ukwa, 乌库, 见"伊格博-乌库"栏目
'ulamā'/'ālim, 乌里玛(伊斯兰贤哲、伊斯兰学问家), 41, 42, 55
Uli, Mansa, 乌利(曼萨), 76
'Umar I(634-644), 奥马尔一世(公元 634-644 年在位), 43, 47, 577, 709, 710
'Umar II(717-720), 奥马尔二世(717-720 年在位), 57
'Umar, Banū, 巴努-奥马尔, 256
'Umar ibn 'Abd al-'Azīz, 奥马尔·伊本·阿卜杜·阿齐兹, 170, 244, 247
'Umar ibn al-Khattab, 奥马尔·伊本·哈塔卜, 226, 709
'Umar ibn Dunyā-hawz, 奥马尔·伊本·杜尼亚-豪兹, 582

'Umar Walasma, 奥马尔·'瓦拉斯玛, 86, 579
al-'Umari, ibn Faḍl Allāh, 伊本·法德尔·阿拉·欧麦里, 102, 173, 455, 458
al-'Umari Abū 'Abd al-Rahmān, 阿布·阿卜德·拉赫曼·乌玛里, 209-10
Umayyads, 伍麦叶王朝(前译倭马亚王朝), 4, 7, 49-52, 57, 577; 伍麦叶王朝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337, 339, 341, 351; 在乍得, 456-7; 在埃及, 168-70; 伍麦叶王朝和法蒂玛王朝, 319, 323-4, 331; 在马格里布, 49-52, 64, 68, 232-3, 236, 244-8, 265; 在撒哈拉, 68, 387-8, 391-2, 397, 399-400, 434; 伍麦叶王朝和奴隶, 723, 730; 在苏丹地区, 74; 又见"西班牙"(Spain)栏目
umm al-walad, "乌姆·瓦拉德"(与主人生孩子的女奴), 720
umma, "乌玛"(穆斯林社会), 35, 94, 260
Ungudja, *see* Zanzibar, 翁古贾, 见"桑给巴尔"(Zanzibar)栏目
Unguja Ukuu, 温古贾-乌库, 593-4, 606, 612
Ungwana, 翁格瓦纳, 610
Unudjūr Ibn al-Ikhshīd, 乌努朱尔·伊本·伊赫什德, 179
Upper Guinea, 上几内亚, 530-57; 生态环境, 531-4; 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 547-56; 语言和部族结构, 534-43; 塞内冈比亚, 544-7; 又见"几内亚"(Guinea)栏目
urban areas, *see* individual cities, 城镇地区, 见各个城市栏目
Urceliani, 乌尔塞利亚尼人, 297
Urewe, 乌雷韦, 623, 628, 643, 644, 645, 648, 651, 655
Uromi, 乌罗米, 489, 516
Urungwe, 乌伦圭, 654
Urvoy, Y, 伊夫·于尔瓦, 120
Ushongo, 乌雄戈, 526
al-Uswānī, 乌斯瓦尼, 561, 759
'Uthmān (644-56), 奥斯曼(公元644-656年在位), 43, 47, 48, 166, 168, 236, 248
'Uthmān al-Kānemi, 奥斯曼·卡奈米, 455
'Uthmān b. 'Affān, 奥斯曼·本·阿凡, 455
'Uthmān Dan Fodio, 奥斯曼·丹·福迪奥, 110
Uzigula, 乌济古拉, 627
Vai, 瓦伊人, 536-8, 541, 552-5
Van Noten, F., F. 范-诺顿, 153
Vansina, J., J. 范西纳, 140, 750
Vazimba, 瓦津巴(祖先), 瓦津巴人, 688
vegetation, *see* ecology, 植被, 见"生态"栏目
Venice, 威尼斯, 18, 522, 528
Verdun, 凡尔登, 16注, 265
Vérin, P., P. 韦兰, 657
Victoria, Lake, area of, 维多利亚湖(尼安扎湖)周围地区, 141, 144, 618, 620, 622-3, 628
Vikings/Vayags, 维金人/瓦亚戈斯, 15, 16-17
Vilanculos Bay, 维兰库卢什湾, 673
Visigoths, 西哥特, 西哥特人, 13, 50, 242
Volta area, 沃尔特河流域, 5, 124
Voltaic languages, 沃尔特诸语, 490, 492, 535
Vume Dugame, 武梅-杜加梅, 502
Wa-Changamwe, 钦根韦人, 599
Wadai, 瓦代, 瓦代人, 80
Waddaians, 瓦代人, 114
Waddān, 瓦丹, 230, 231, 232-3; 瓦丹和撒哈拉通道, 279, 284-5, 287, 291-2
Wadebuli, 达布里人, 25
wādjib, "瓦吉布", 绝对义务, 41
Wagadu, *see* Ghana(country) 瓦加杜, 见"加纳"(国)栏目
Waggāg ibn Zallū al-Lamti, 瓦贾杰·伊本·扎卢·拉姆蒂, 336-7, 342-4, 345
Waghlāna, 瓦格拉纳, 296
al-Wāhāt, 绿洲, 480
Wahb ibn Munabbih, 瓦赫卜·伊本·穆纳比赫, 293, 447
Wahbite Ibāḍites, 瓦赫比教派——正统的易巴德派, 286, 288-9, 298, 324
Wahriz, 瓦赫里兹, 707
Wāka, *see* Tāmdūlt, 瓦卡, 见"坦杜尔特"栏目
wakf, "瓦克夫"(捐赠), 177 和注, 178, 721
Wa-Kilindini, 基林迪尼人, 599
Wāk-Wāk people, 瓦克-瓦克人, 23, 27-8, 701-2
walā, "瓦拉"(依附关系), 268 和注, 721
Walamo, 瓦拉莫, 561
Walasma', 瓦拉斯玛人, 579, 581, 585
Walāta/Iwālāten, 瓦拉塔/伊瓦拉顿, 76, 81, 116, 124, 312; 瓦拉塔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70, 372, 385, 394, 397, 407-15, 425
Walese, 瓦勒人, 146
wālī, "瓦里"(区长), 239
al-Walīd I, 瓦利德一世(哈里发), 49
Wami river area, 瓦米河流域, 619, 623
Wang Ta-yüan, 汪大渊, 608
Wangara, 万加拉, 万加拉人, 75, 79, 110-11, 130; 万加拉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 385, 411, 424-5
Wa-Ngazija, 恩加齐贾人, 593
Wankāra, 万卡拉, 300, 413
Wanyika, 万尼卡人, 594, 597
Wār Diabi, 沃尔·迪亚比, 748
Wār Dyābi, 沃尔·戴阿比, 72
Waradjma, 瓦拉杰马人, 286
Wārdjlān, *see* Wargla, 瓦尔杰兰, 见"瓦尔格拉"栏目
Warfadjūma, 瓦尔法朱马人, 241, 253
Wargla, 瓦尔格拉, 69, 122, 124, 316; 瓦尔格拉和撒哈拉通道, 276-81, 295, 297-302, 306, 312, 715
Warith, Banū, 巴努-瓦里斯人, 228
Wārklān, *see* Wargla, 瓦尔克兰, 见"瓦尔格拉"栏目
Warmāz, Banū, 巴努-瓦尔马兹人, 297
al-Warrāk, 沃拉克, 381, 406
Warsifān, Banū, 巴努-瓦尔西凡人, 297
Wartīzalen, Banū, 巴努-瓦尔蒂扎伦人, 296
Warzemār, Banū, 巴努-瓦尔马泽尔人, 298
Wasa, 瓦萨人, 490
Wasanya, 瓦桑亚人, 594
Wāsilites, 瓦绥勒派, 254
Wāsiliyya, 瓦绥勒派, 280
Wāsit, 瓦西特, 729
Wassa, 瓦萨, 499, 501
Wassu, 瓦苏, 472-3, 544

Wasūl, Banū, 巴努－瓦苏勒，251－2
Wasulunka, 瓦苏隆卡人，534
Wa－Tangana, 坦加纳人，599
weaving, *see* textiles, 织布，见"纺织品"栏目
Webi Shebele, 谢贝利河，600
Wedem Ra 'ad, Negus, 韦代姆·拉阿德(国王)，578, 581
Wedem－Asfere, 韦代姆－阿斯费雷，566
weighing, 称，量，111, 433－4
wells, *see* irrigation; oases, 井，见"灌溉";"绿洲"诸栏目
Welmers, W. E., W. E. 韦尔默斯，538
Wembere river, 文贝雷河，632－3
Wenchi/Old Wenchi, 文奇/古文奇，489, 490, 501
Werner, O., O. 维尔纳，521
West Africa: 西非、西部非洲: 和伊斯兰教，8, 9－10, 105;定居空间的构成，753－7; 又见"几内亚"(Guinea);"撒哈拉以南地区"(south of Sahara)诸栏目
West Atlantic languages, 西大西洋诸语，535, 538－9, 541, 543, 551－3
Westerman, D., D. 韦斯特曼，539
Western Europe, 西欧，17, 716; 和伊斯兰教，2－3, 4, 5, 9, 12－14, 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399－400; 又见"法兰西"(France);"意大利"(Italy);"西班牙"(Spain)诸栏目
Western Highland Group, 西部高原语系，646, 661, 663
Western Kuliak, 西库利阿克人，630
Western Sahara, 西部撒哈拉，336－54; 又见"撒哈拉"(Sahara)栏目
Wheatley, P., P. 惠特利，506
whites, 'superiority' of, 白人血统"优越论"，131－2;又见"含米特谱系"(genealogical, Hamites)栏目
Wiese, C., 卡尔·维泽，621
Wiet, G., G. 维厄，364
Wīlīl, Banū, 巴努－维利尔人，297
Willett, F. 弗兰克·威利特，508, 522
Williamson, K., K. 威廉森，493
al－Wisyānī, 维斯亚尼，299
witchcraft, 巫术，640; 又见"古代宗教"(religions, ancient)栏目
Wolof, 沃洛夫，沃洛夫人，沃洛夫语，127－9, 535, 539, 544, 547, 555
women, 女人，39－40, 107, 148, 181, 565－7, 580; 女奴，710, 719, 723－4; 又见"母系社会各族"(matrilinear people)栏目
Woolandale, 伍兰代尔，671
world state, Arab, 阿拉伯世界国家，2, 3, 又见"伊斯兰"(Islam)栏目
Wrigley, C. C., C. C. 里格利，150
writing, 书写本，手迹，525, 560, 569, 681
Wulīlī/Volubilis, 伍利利/沃吕比利斯，50, 137, 254,
Wusuta, 武苏塔，502
Yaaku, 亚阿库人，625
Yabīb, ibn Zalghīn, 亚比卜·伊本·扎尔金，297
Yagala, 亚加拉，463, 464, 468, 544
Yaḥyā II, 叶海亚二世，256
Yahsūb, Banū, 巴努－亚赫苏布人，258
Yaḥyā ibn Ibrāhīm, 叶海亚·伊本·易卜拉欣，309, 336, 340, 342－4
Yaḥyā ibn 'Umar, 叶海亚·伊本·奥马尔，73, 344, 345, 346, 348
Yaḥyā ibn Yahya al－Laythī, 叶海亚·伊本·叶海亚·莱西，274
Yaji, *Sarki*, 亚吉(萨尔基)，79
Yākūt, 雅库特(一译亚库特)，408
Ya'kūb ibn Aflaḥ, 雅库布·伊本·阿夫拉赫，298
Ya'kūb ibn Killis, 雅库布·伊本·基利斯，182－3
al－Ya'kūbī, 雅库比(一译亚库比)，101, 120, 122, 123, 208, 258; 关于乍得地区的论述，445, 447, 450－1;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论述，560, 561;关于撒哈拉的论述，287, 289, 291－3, 304, 308, 310, 373, 389; 关于奴隶的论述，716, 721
Yākūt, 雅库特(一译亚库特)，285, 292, 299, 306, 744
Yandjāsen, Banū, 巴努－扬贾森人，297
Yao, 尧人，618
Yaresi, 亚莱希，738
Yarse, 雅尔塞人，75, 81, 113
al－Yasā 'b. Midrār, 雅萨·伊本·米德拉尔，252, 318
Yathrib(later Medina), 耶斯里卜(后来的麦地那)，35
Yaw Awere, 姚·阿韦雷，501
Yazīd, 亚齐德，234
Yazīd ibn 'Abd al－Malik, 亚齐德·伊本·阿卜德·马利克，730
Yazīd ibn Abī Muslim, 亚齐德·伊本·阿比·穆斯林，247
Yazīd ibn Abī Ḥabīb, 亚齐德·伊本·阿比·哈比卜，731
Yazīd ibn Ḥātim al－Muhallabī, 亚齐德·伊本·哈提姆·穆哈拉比，253
al－Yazūrī, 亚祖里，215, 332
Yekuno Amlāk, Negus, 耶库诺·阿姆拉克(国王)，581
Yemen, 也门，315, 458－9, 700－1, 704－7; 奴隶，708, 716
Yengema, 耶盖马，547
Ylvisaker, M., M. 伊尔维萨克，608
York, R. N., R. N. 约克，408, 527
Yoruba/Yorubaland, 约鲁巴、约鲁巴人/约鲁巴兰、约鲁巴人定居的区域，483－4, 486－7, 490, 491－3, 505－13, 516, 521, 524, 526, 535, 539－40, 551
Yūsuf Ibn 'Abd al－Raḥmān al－Fihrī, 优素福·伊本·阿卜德·拉赫曼·菲赫里，263
Yūeh(pottery), 约埃(陶器)，595, 596注
Yūnus b. Ilyās, 尤努斯·伊本·伊利亚斯，251
Yurki, 尤基，198
Yūsuf Fadl Hassan, 优素福·法德勒·哈桑，714
Yūsuf ibn Tāshfīn, 优素福·伊本·塔什芬，350
Zā, *see* Dyā, 扎，见"迪亚"栏目
Zabid, 扎比德，715－16
Zaborski, A., A. 扎博尔斯基，564
Zacharia, 扎察里亚，209
Zacharia III, 扎察里亚三世，210
Zafi(n－d) Raminia, 扎菲(n－d)－拉米尼亚人，689, 702
Zafiraminia, 扎菲拉米尼亚人，90
Zāfkāwa, 扎夫卡瓦人，125
Zafku/Zāfūn, 扎夫库、扎夫库人/扎丰、扎丰人，124, 407－8
Zāfunu/Diafunu, 扎富努人/迪亚富努人，69, 285, 313, 356, 358
Zaghāwa, 扎加瓦，扎加瓦人，100, 228, 715; 在乍得，437, 439－40, 445－50, 453－4, 457－60, 和撒哈拉通道，277, 290, 293－5; 438; 和苏丹地区的人口流动，123, 124, 131,

136－7
Zagôra，扎古拉，338
Zague，扎格王朝，568
al－Zāhır，查希尔，185，724
Zaire，扎伊尔，162，644，646；和讲班图语各族，141－2，144，146，151－2，154－5，160－1
zakāt，"课功"、天课，38，94
Zakrān，扎克兰，306
Zāla，see Zalhā，扎拉，见"扎尔哈"栏目
Zalghin，Banū，巴努－扎尔金人，297
Zalhā/Zāla/Zella，扎尔哈/扎拉/济莱，279，282，284－5
al－Zallāka，扎拉卡，351
Zambezi area，赞比西地区，142，144，160，162，633，653－5
Zambezi culture，赞比西文化，664－80
Zambia，赞比亚，159，160，646，651，653，又见"中部非洲"(Central Africa)栏目
Za－Mikael Aragawi，Abba，扎－米凯尔·阿拉加威，大主教，570
Zanāfidj，扎纳菲吉人，563，564
Zanāta，扎纳塔，扎纳塔人，65，69注，132，184，235，238，251－2，388；和阿尔莫拉维德，337，341－2，347，359；和法蒂玛王朝，316，322，329－30，333－4；和撒哈拉通道，277－8，280，286－302散见各处，310－13
Zandj，僧祗人，439，447，712，714，722，727－8；僧祗人和东部非洲，597－8，600－1，608－11，613；僧祗语，598，599，603，605；僧祗奴，23，101，173，613，698，701－2；奴隶起义，21，28，30，51，724，726－9；又见"讲班图语各族"(Bantu－speaker)栏目
Zanzibar，桑给巴尔，58，594，601，604，606，607，609，613，738
Zar'a ibn Abi Mudrik，扎拉·伊本·阿比·穆德里克，241
Zare'a Ya'qob，扎雷阿·亚戈布(国王)，585
Zarema，扎雷马，570－3
Zaria/Zazzau，扎里亚/扎扎乌，79，463，467，487
Zarma，扎尔马，扎尔马人，121
Zawila，宰维莱(又译扎维拉)，69，123，230，231，265，290；和撒哈拉的贸易，279，281，285，287，289－90，292－3，305，375，406，452
Zawīlī，扎维里(黑人士兵)，322
Zawiya，扎维亚人，282
Zaydites，栽德派，258
Zaylā'，宰莱，9，58，84－5，86，453，561，563
Zayla'，宰莱，715
Zaynab，扎奈布，348，350注
Zazzau，see Zaria，扎扎乌，见"扎里亚"栏目
Zella，see Zalha，济莱，见"扎尔哈"栏目
Zhizo，齐佐，齐佐人，665－9散见各处，672，674，680
Zibān，see Mzāb，济班，见"姆扎布"栏目
Zimbabwe，津巴布韦，88，162，383，615，641，654，747，768，786，又见"东非、东部非洲"(East Africa)栏目
zindiks，"曾特克斯"、不信神者，53
Zirī ibn Manād，齐里·伊本·马纳德，323，328
Zirīds，齐里王朝(前译齐里德王朝)，54，66，186，225，339；在作得，452，和法蒂玛王朝，316，328－35；和穿越撒哈拉的贸易，387－8，398
Ziryāb，齐尔亚卜，271
Ziyād b. Kalfūn，齐亚德·伊本·卡尔丰，271
Ziyādat Allāh I，齐亚德特·阿拉一世，263
Ziyādat Allāh II，齐亚德特·阿拉二世，270
Ziyādat Allāh III，齐亚德特·阿拉三世，263，318
Zomba Range，松巴山冈，647，655
Zoroastrians and Islam，袄教徒和伊斯兰，46，48，56
Zughba，祖格巴人，333
Zūghū，祖古，407
Zugwagha，祖格瓦加人，235
Zuhayr ibn Kays，祖海尔·伊本·凯斯，237
al－Zuhrī，祖赫里，68－9，75；关于冈比亚的论述，468；关于撒哈拉的论述，276，298，301，306，313
zuhūr，"祖胡尔"(东山再起)，253